



廿九年皇帝

盡其職亦臣

諧來新首亦

威在焉為

皇帝多詔

相於綽漢廣

星影不登

科告皆明

正

陝西地方志丛书

咸阳市志

四

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陕西地方志丛书

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咸阳市志

(四)

三秦出版社

陕西地方志丛书

咸阳市志

(四)

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三秦出版社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 | | |
|-------|-----|---------------|
| 主 任 | 程安东 | 省 长 |
| 副 主 任 | 贾治邦 | 常务副省长 |
| | 贾 湘 | 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
| | 滕 云 |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
| 委 员 | 鲍 澜 |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
| | 董健桥 |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
| | 冯在才 | 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
| | 刘文义 |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
| | 陈富深 |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
| | 冀东山 | 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
| | 丁全德 | 省财政厅厅长 |
| | 郭开民 | 省人事厅副厅长 |
| | 王正典 | 省政协常委 |
| | 杨志忠 | 省档案局局长 |
| | 武复兴 | 省图书馆名誉馆长 |
| | 霍松林 |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

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李堂堂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 主 任	杨光明	市委副书记
	胡补旭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董 军	副市长
	陈留根	市政协副主席
	尹学成	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委 员	刘聪博	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梁玉栋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李兴文	市政府副秘书长
	杨耀文	市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张孝敏	市纪委秘书长
	李仲武	咸阳军分区参谋长
	哈 锐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朱德旺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侯春纪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崔明星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聂万清	市农发办主任
	刘国志	市计委主任
	吴怀德	市财政局局长
	冯志强	市人事局局长
	陈 武	市建委主任
	牛继鹏	市经贸委主任
	汪 源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张进祥	市档案局局长
	王志玉	市统计局局长
	杜建儒	市志办副主任
	李玉悌	咸阳师专教授

《咸阳市志》编纂人员

主 编	尹学成		
副 主 编	杜建儒		
责 任 编 辑	司少华	张世民	
编 辑	(按姓氏笔划为序)		
	司少华	孙立新	张 沛
	张世民	张鸿杰	何金铠
	武冬莉	唐 明	高凤翔

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	尹学成		
副 主 任	杜建儒		
调 研 员	任清芳		
助理调研员	陈若虚	寇金生	
工 作 人 员	司少华	田锦亭	张世民
	张学松	武冬莉	边 谦
	石忙刚	池 诚	韩选峰
	郭美娟	刘亚婷	王永军

《咸阳市志》审定单位

初 审	咸阳市人民政府
终 审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历任咸阳市地方志编委会领导

主 任	王步唐	张宏勋	李锦江
	司 南	郑德义	高存德
副 主 任	郭建义	赵百平	张友才
	沈树森	强文祥	高仰秀
	孙万保	黄亚丽	张 卉
	焦义德	尚行韬	任清芳

历任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

主 任	尚行韬	任清芳	
副 主 任	李树君	王岳林	陈若虚

历任《咸阳市志》主编、副主编

主 编	尚行韬	任清芳
副 主 编	王岳林	陈若虚



1999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视察汉阳陵博物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视察汉阳陵博物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视察汉茂陵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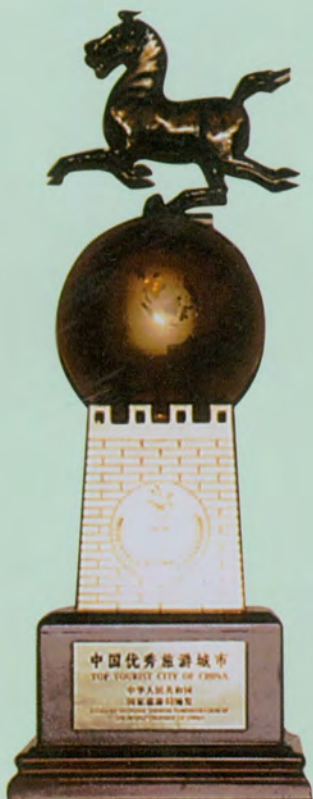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视察汉阳陵博物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 1995 年 1 月 21 日视察三原县大程镇东周村民居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 1999 年 9 月 10 日视察汉阳陵博物苑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奖杯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证书



迎接四城会火炬传递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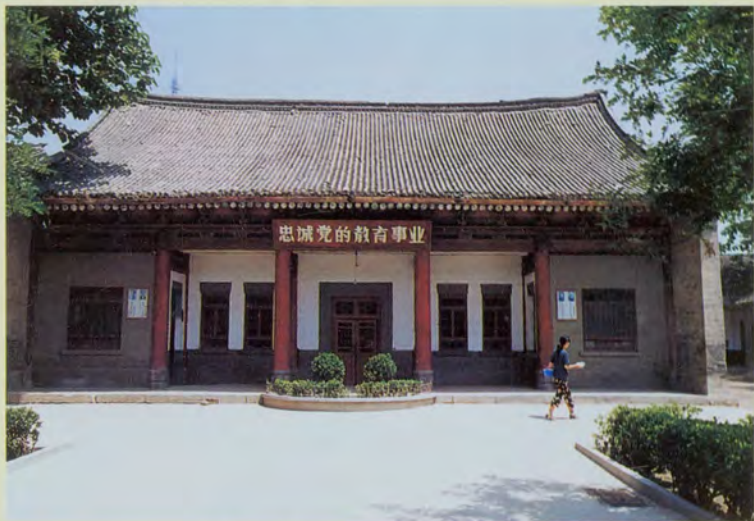
迎城运文艺晚会



四城会女排比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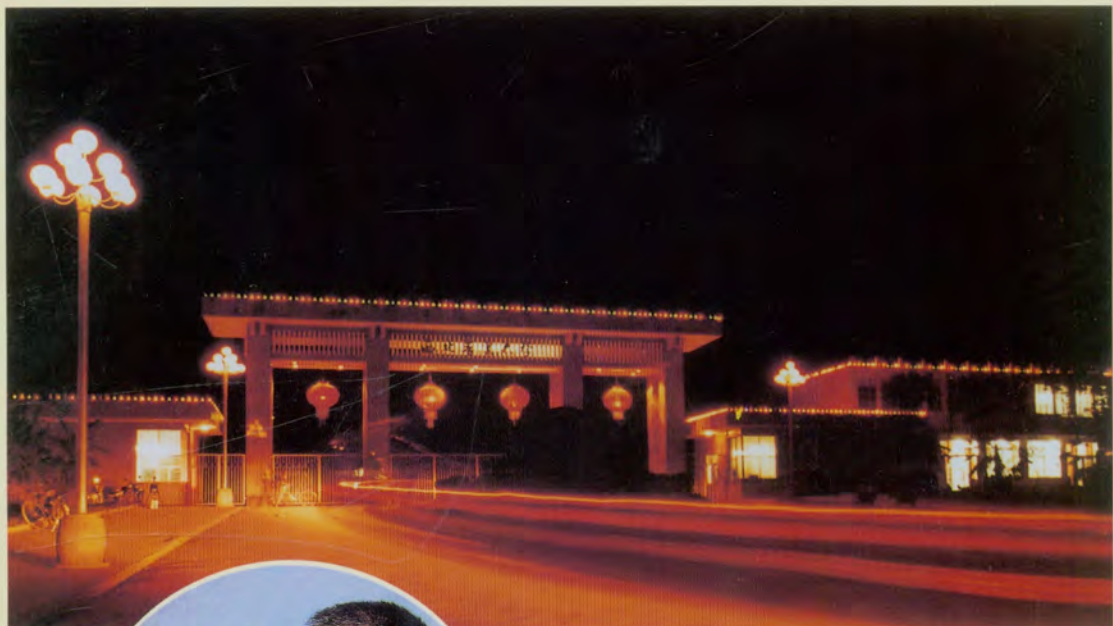
三原县宏道书院旧址



泾阳县陕甘味经书院旧址



安吴堡青训班旧址



西北农业大学



西藏民族学院



西北轻工业学院



陕西省乾县师范学校



陕西省农业机械化学学校实验教学



渭城第二职业中学实习现场



咸阳中学



三原南郊中学



成人宣誓仪式



革命历史教育



学生军事训练教育



中学电化教育



幼儿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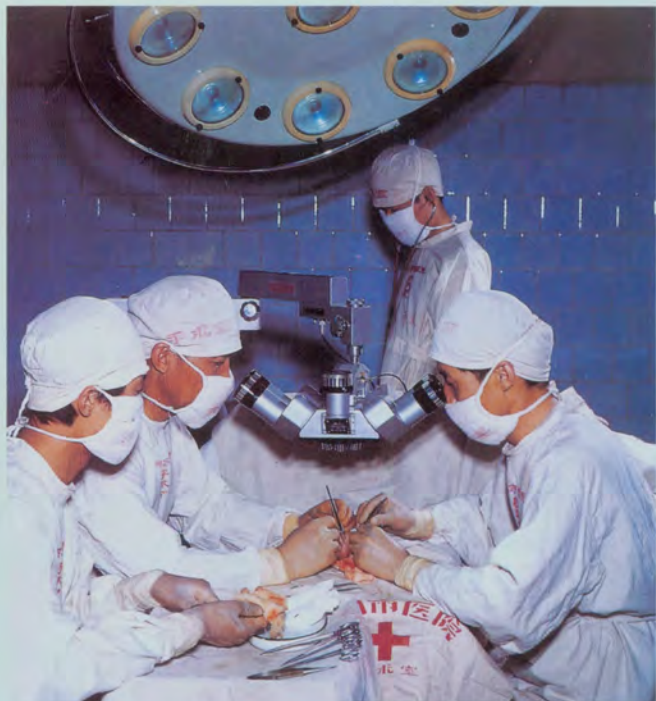
读书活动



小学生武术演练



陕西医史博物馆



断肢再植手术



医药保健节



文艺演出





澳大利亚艺术团来咸演出



民间社火



永觀文苑

新以漢書內卷云永觀文苑

谢德萍书法

大文開日月

威業紀尊彝

于右任

于右任书法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
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
兮紉秋蘭以為佩

屈原九章離騷句 鍾明善書於古長安之東市

钟明善书法

精點世間今

斷香殘韻

志厚序詞卷後陳大德句書於西工才閣
劉自棟

刘自棟书法



程隸原因李篆生蔡
 分展足始縱橫更依
 分勢成今隸不辨真
 源漫證盟

甲戌之初夏 李宏涛书于咸阳

清人之世臣
 柳至德句

李宏涛书法

詩如品酒原宜淡

乙丑孟冬日大寒室中
 溫暖如春書此以誌娛時

之水觀潮不友平

名居家山無隱山中

胸中

蒙子军书法

曙先左前
 勇攀高峰

戊寅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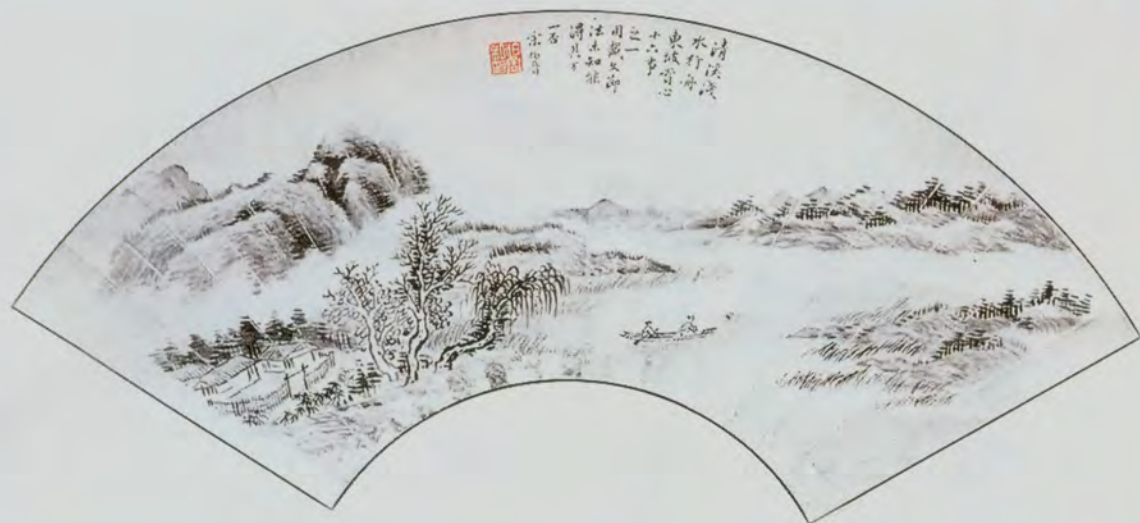
白日登山望峰生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
 刁斗空沙晴公坐琵琶
 琵琶怨邊野營黑
 軍城郭雨雪紛連天
 漢胡在哀鳴咽六胡
 見眼淚雙落古道三
 門稍被遠應物姓名
 邊輕車年戰骨埋
 荒外古是蒲萄入漢
 表

李耀儒古從軍行

己卯歲末耀儒書於長安

李耀儒书法

孙迟书法



宋伯鲁扇画



池趣·温友言画



迎春·韩虹画



咸阳书画界迎香港回归百米画卷（局部）



江山图·窦仲化画

牛娃

牛娃·李白颖画





汉玉骑马俑



战国金币



西周铜鼎



汉玉辟邪



汉玉熊



汉茂陵石刻

女皇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墓

乾陵





庄陵石马



献陵石虎



贞陵翼马



顺陵獬豸（独角兽）



渭城铁塔（明）



彬县彬塔（宋）



永寿武陵寺塔（宋）



旬邑泰塔（宋）



泾阳崇文塔（明）



乾陵壁画·马球图



乾陵壁画·捕蝉图



乾陵壁画·狩猎图



咸阳皮影



民间剪纸



民间绣品



戏剧剧照



名优小吃





首届修志成果



历史档案



序

谈俊琪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心和大力支持下,经过我市方志工作者多年的辛勤努力,新编《咸阳市志》文化卷终于付梓。这部洋洋巨著容纳古今信息,涵盖诸多部类,客观、翔实地展现了古老的咸阳社会文化蓬勃发展的史迹,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参考和资政鉴戒。

咸阳县具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早在一万年前,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先民便创造了号称“泾渭文化”的远古文明。周文化曾占据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开创了中国的人文文明。秦文化为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思想基础,使咸阳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为咸阳地方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隋唐时期,咸阳文化发展十分活跃。宋元以降,“关学”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地方教育兴盛,学术风气日渐浓厚。不少文人学士投入民间艺术的创造和研究,使秦腔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逐渐传到了咸阳境内。“五四”运动后,新思想、新文化在咸阳新民主主义

革命和人民解放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咸阳文化园地繁荣兴旺,世风民俗日新月异,科学技术异军突起,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从这部《咸阳市志》文化卷中,我们将沐浴到先民们播洒的文明之光,回溯咸阳文明起始发育的渊源,感受其跌宕起伏、弘扬光大的时代脉搏,更加坚定向现代文明进军信心。

在人类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面对西部大开发和知识经济到来的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用先进的思想、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教育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促进经济文化技术交流与协作;必须坚持科教兴市战略,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必须坚持唱响主旋律,弘扬先进的、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我认为,《咸阳市志》文化卷基本上达到了这些要求,它从咸阳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反映了时代主旋律,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带动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有利于推动全市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咸阳市志》文化卷是咸阳市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科学结晶,它的出版,必将发挥应有的资治、教化、存史和交流作用。

2000 年 8 月 9 日

(作者系中共咸阳市委书记、咸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序

李堂堂

《咸阳市志》文化卷满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即将付梓面世,我得以先睹为快。

咸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便生动地记载着这一人类文明的光辉历程。《诗经·大雅·生民》说的是姜嫄踩天神脚印,有感而孕,生下后稷。后稷教民稼穡,年年丰收。反映了当时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由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过渡。《诗经·大雅·公刘》记载公刘居豳(今彬县、旬邑县一带),复修后稷之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农耕文化,为加速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做出了卓越贡献。

农耕兴则文明始。自周、秦、汉、唐以来,咸阳作为国都和京畿之地,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之势。西汉时咸阳原上建成了五个陵邑,从全国各地迁来咸阳的精英人物无以数计。当时仅茂陵一邑,人口便比京城长安多出两万余人。五陵原人才荟萃,文学家司马相如、哲学家董仲舒、史学家司马迁、经学家孔安国等,都在五陵原上各领风骚,使咸阳成为全国文化教育和学术活动

的中心。

宋元以降,咸阳境内的文化教育事业承袭传统,一直处于祖国西北的领先地位。自宋元以后,咸阳境内曾建立各种书院达三十余个,清代陕西的五大书院中,就有宏道、味经、崇实、正谊等四大书院设在三原、泾阳两县,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陕甘学政衙署亦由西安迁至三原县城。尤其是明代状元康海创立的“康王腔”,成为秦腔艺术的先声。直到建国前后,乾县著名秦腔剧作家范紫东创作戏剧68部,进一步推动了秦腔艺术的发展,使秦腔成为西北地区老幼咸喜的艺术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咸阳社会文化事业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龙头的杨陵农业科学城蜚声中外,以西北轻工业学院为龙头的轻纺科研教学基地独树一帜,以陕西中医学院为龙头的中医药科研事业异军突起,使咸阳成为闻名遐迩的全国中等明星城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咸阳教育体系日臻完善,文艺园地百花竞艳,体育卫生全面发展,世风民俗日趋进步,处处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新气象。

咸阳文物甲天下。数千年的文明在境内地下地上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遗存。全市现有各类文物点4957处,其中古遗址1037处,古墓葬1135座,古建筑247处,石窟寺6处,石雕、碑碣2415件(组),其他遗迹117处。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3处。境内历代帝王陵墓多达34座,更属世所罕见。境内出土的西周大鼎、汉唐石雕、汉唐彩陶、唐代重彩壁画等,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人文资源,正是咸阳开放、开发的优势所在。

《咸阳市志》文化卷,全面翔实地记述了境内有史以来社会文化的历史与现状。鉴古知今,修志为用。希望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以志

为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昔日咸阳的辉煌业绩为起点,精心筹划未来。特别要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立足当前,放眼未来,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为把我市建设成为开放型现代化的陕西经济强市而努力奋斗!

2000年8月5日

(作者系中共咸阳市委副书记、咸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目 录

序	谈俊琪(1)
序	李堂堂(3)
概述	(1)
第一编 教 育	
第一章 传统教育	(21)
第一节 官立学校	(21)
第二节 私立学校	(26)
第三节 书院	(30)
第二章 学前教育	(37)
第一节 学校建设	(37)
第二节 保教管理	(41)
第三节 著名幼儿园简介	(43)
第三章 小学教育	(44)
第一节 学校建设	(44)
第二节 学制、课程	(58)
第三节 教学管理	(61)
第四节 部分小学简介	(68)
第四章 中学教育	(71)
第一节 学校建设	(71)

第二节 学制、课程	(76)
第三节 教学管理	(80)
第四节 著名中学简介	(87)
第五章 普通高等教育	(91)
第一节 发展概况	(91)
第二节 普通高等院校	(93)
第六章 职业技术教育	(97)
第一节 职业教育	(97)
第二节 中等专业技术教育	(101)
第七章 成人教育	(112)
第一节 发展概况	(112)
第二节 文化技术教育	(116)
第八章 教育管理	(124)
第一节 行政机构	(124)
第二节 教师管理	(126)
第三节 考试管理	(129)
第四节 经费管理	(131)
第二编 科 技	
第一章 科技管理	(143)
第一节 机构	(144)
第二节 队伍	(153)
第三节 业务	(156)
第二章 科技成果	(162)
第一节 农业	(162)
第二节 工业	(170)
第三节 医药	(175)
第四节 其他	(177)

第三章 科技交流	(180)
第一节 邀请科技活动	(180)
第二节 外派科技活动	(187)
第四章 科技测报	(195)
第一节 气象	(195)
第二节 地震	(198)
第三节 防灾抗灾	(203)
第三编 文 化	
第一章 文学	(209)
第一节 诗赋	(210)
第二节 散文	(212)
第三节 小说	(213)
第四节 民间文学	(214)
第二章 艺术	(217)
第一节 音乐	(217)
第二节 舞蹈	(220)
第三节 杂技曲艺	(222)
第四节 书画摄影	(224)
第五节 民间美术	(228)
第三章 戏剧	(229)
第一节 剧种	(231)
第二节 剧目	(236)
第三节 社团	(243)
第四节 演出场所	(257)
第五节 民间戏剧活动	(262)
第四章 群众文化活动	(264)
第一节 市县(区)艺术、文化馆	(265)

第二节	乡镇文化站	(271)
第三节	厂矿农村俱乐部	(272)
第五章	电影	(274)
第一节	发行	(275)
第二节	放映	(277)
第四编	新闻出版	
第一章	广播、电视	(283)
第一节	广播	(285)
第二节	广播电台、电视台	(288)
第三节	设施	(290)
第二章	报纸	(292)
第一节	地、市报	(293)
第二节	县、市报	(294)
第三节	专业报	(301)
第四节	企业报	(303)
第五节	校报	(307)
第三章	期刊	(311)
第一节	公开期刊	(312)
第二节	内部期刊	(322)
第四章	文化市场管理	(333)
第一节	音像管理	(333)
第二节	印刷管理	(335)
第三节	管理机构	(337)
第五编	文物	
第一章	古遗址	(341)
第一节	聚落遗址	(341)
第二节	城邑宫殿遗址	(348)

第三节	路桥渠道遗址	(355)
第四节	其他遗址	(358)
第二章	古墓葬	(363)
第一节	陵墓	(363)
第二节	名人墓	(380)
第三节	其他墓葬	(398)
第三章	古建筑、石窟寺	(408)
第一节	寺庙	(409)
第二节	塔	(412)
第三节	桥梁、民居	(416)
第四节	石窟寺	(418)
第四章	石刻	(420)
第一节	石雕	(421)
第二节	石椁线刻	(427)
第三节	碑碣	(428)
第四节	墓志	(439)
第五节	塔铭、经幢	(452)
第五章	青铜器	(454)
第一节	饪食器	(455)
第二节	酒器	(461)
第三节	兵器	(463)
第四节	诏版、衡量器	(465)
第五节	虎符、印章	(467)
第六节	铜镜	(469)
第七节	铜杂器	(472)
第六章	陶瓷器	(474)
第一节	陶建筑材料	(476)

第二节	陶俑	(484)
第三节	陶杂器	(490)
第四节	唐三彩	(491)
第五节	瓷器	(494)
第六节	陶文	(496)
第七章	其他遗物	(499)
第一节	玉石骨器	(500)
第二节	金银器	(501)
第三节	铁器	(503)
第四节	货币、钱范	(506)
第五节	壁画	(514)
第八章	近现代史迹	(519)
第一节	故址	(519)
第二节	纪念地	(522)
第九章	文博事业	(524)
第一节	管理机构	(524)
第二节	文物保护	(526)
第三节	考古调查与发掘	(529)
第四节	博物馆	(534)
第五节	文物收藏与陈列展览	(537)
第六节	科学研究	(539)
第七节	文物保护单位	(542)
第六编	卫生	
第一章	卫生防疫	(549)
第一节	爱国卫生	(549)
第二节	传染病防治	(551)
第三节	食品卫生	(556)

第四节	环境卫生	(558)
第五节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	(560)
第六节	地方病防治	(563)
第二章	妇幼保健	(567)
第一节	新法接生及围产期保健	(568)
第二节	妇女病防治	(569)
第三节	儿童保健	(571)
第三章	医疗	(575)
第一节	医疗机构	(575)
第二节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	(586)
第三节	西医	(589)
第四章	卫生管理	(591)
第一节	组织管理	(591)
第二节	医政管理	(595)
第三节	公费医疗	(599)
第四节	药政管理	(600)
第七编	体 育	
第一章	群众体育	(606)
第一节	传统体育	(606)
第二节	学生体育	(609)
第三节	职工体育	(616)
第四节	农民体育	(619)
第二章	竞技运动	(622)
第一节	田径运动	(622)
第二节	球类运动	(625)
第三节	武术、体操	(632)
第四节	其他运动	(636)

第三章 运动会	(641)
第一节 举办运动会	(642)
第二节 参加运动会	(653)
第三节 承办运动会	(657)
第四章 体育管理	(660)
第一节 组织机构	(660)
第二节 队伍建设	(660)
第三节 设施建设	(663)
第八编 档案·地方志	
第一章 档案	(667)
第一节 机构建设	(668)
第二节 队伍建设	(672)
第三节 档案管理	(674)
第二章 地方志	(683)
第一节 市志	(685)
第二节 县区志	(687)
第三节 专志、村镇志	(689)
第四节 旧志整理	(693)
第五节 修志机构	(694)
第九编 民族·宗教	
第一章 民族	(703)
第一节 汉族	(704)
第二节 少数民族	(711)
第二章 宗教	(715)
第一节 天主教	(716)
第二节 基督教	(720)
第三节 佛教	(727)

第四节 道教 (732)

第五节 伊斯兰教 (734)

第十编 民 俗

第一章 生产习俗 (743)

第一节 种植 (744)

第二节 林牧 (750)

第三节 工商 (753)

第二章 生活习俗 (757)

第一节 服饰 (757)

第二节 饮食 (763)

第三节 居住 (772)

第四节 行旅 (775)

第三章 礼仪习俗 (778)

第一节 婚嫁 (778)

第二节 丧葬 (787)

第三节 诞寿 (801)

第四节 禁忌 (806)

第四章 节日习俗 (810)

第一节 传统岁时 (810)

第二节 古会庙会 (818)

第三节 法定节日 (822)

第十一编 方 言

第一章 语音 (826)

第一节 语音特点 (826)

第二节 标音举例 (832)

第二章 词汇 (835)

第一节 构词特点 (835)

第二节 常用词汇对照 (841)

第三章 语法 (856)

第一节 常用虚词及句式 (856)

第二节 语法例句 (859)

卷末语

概 述

咸阳文化，源远流长。文明曙光，深入鸿蒙。以长武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晚更新世人牙标本而言，早在一万年以前，已有先民在本地繁衍生息，并创造了被考古学家称之为“泾渭文化”的远古文明。

公元前 23 世纪，周族发祥于邠（今咸阳市杨陵区及武功县西南部一带），传说其先祖后稷曾教民稼穡，播种百谷，解民饥困，还帮助大禹治理过洪水。五百年后，周人不堪忍受夏桀的暴政，在公刘率领下北上豳地（今长武、彬县、旬邑一带），“复修后稷之业”，并培养了勤劳勇敢、重农尊德、乐于奉献、敢于进取的美德。又五百年后，古公亶父“复修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得到了周人和其他部族人民的拥戴，“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史记·周本纪》）由此日益昌盛，不久全部拥有了今咸阳一带。周文化产生于邠、豳，成熟于岐下。古云“豳岐一礼”，咸阳地方文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逐渐融入了周文化。周文化曾占据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并进而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周文化是周人和邻近部族共同创造的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文化，它以“人”与“德”结合为特色，以“尊德”代替了“尊命”、“尊神”，从而开创了中国的人文文明。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孔子在仔细研究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后，曾发出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赞叹（《论语·八佾》）。长武县下孟村、旬邑县崔家河、武功县浒西庄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以及长武县碾子坡、武功县郑家坡、淳化县史家原等先周文化和西周文化遗址的相继发掘，就是这种先进文化的真实再现，而《诗经》中的《豳风》及《大雅·公刘》等许多隽美诗篇，则是这种人文文明的生动写照。

周室东迁之后，秦人开始向东拓展，于公元前 8 世纪，逐渐占据了今咸阳一带，并于秦孝公十二年（前 350 年）定都咸阳。秦人由于长期与戎、狄部族相处，本身又是由游牧民族转变而来的，因而形成了朴实豁达、剽悍勇猛的民族气质和尚武精神，而商鞅变法推行的重农重战政策，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最终成为一种人们所崇尚的风气而影响了秦国民众的

整个生活。原本已与周文化融为一体的咸阳地方文化受秦文化的影响，再加上强权政治的作用，遂渐次与秦文化融合。秦文化是秦部族在吸收和继承周文化并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融合外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处理分裂与统一关系的文化，它以“开拓”与“统一”结合为特色，“万邦来享”变成了“一统天下”，华夷相别变成了民族融合，中国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遂从此开始。战国时期的法家、墨家、儒家、纵横家、杂家、兵家等学派都曾西来咸阳，宣传他们的思想，尤以法家、兵家、杂家和纵横家对秦国的思想文化影响最大。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兵家代表人物尉缭的《尉缭子》、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以及张仪、甘茂、魏冉、范雎、蔡泽等纵横家代表人物的许多饱含睿智的精辟言辞，不仅是秦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正是这些优秀文化，丰富和完善了秦文化，为秦国的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秦统一后，咸阳因系国都，不仅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同时也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其固有的文化遂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巨流。客观地说，咸阳地方文化已经失去了明显的地域个性。然而正因为融入巨流，又成了国都，加上本身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因而内容更为宏富。从思想领域来说，当时各个学派几乎都在咸阳有过活动，仅杂家的代表人物吕不韦家中来自关东和秦地的宾客就达三千人，这些人不仅通晓诸子百家的哲学、政治、道德伦理等社会学说，还懂得天文、农业等自然科学知识；从教育方面来说，咸阳作为首善之区，除每乡设“三老”以“掌教化”、朝廷置博士七十人以“典教职”外，民间“私学”一度盛行，不久又提倡“以吏为师”，教育格外受到重视；从文化艺术方面来说，朝廷储存着大量的图书典籍和文书档案，宫中不断演出角抵、散乐、百戏等民间杂技歌舞，考古发现的秦宫壁画遗迹和各种建筑饰件，生动地展现了秦咸阳的绘画、雕塑艺术，而统一文字则大大便利了文化知识的传授和传播；从科学技术方面来说，考古发掘所见的秦都建筑遗址，无论是其高台建筑形式，还是逐层抬梁举高的结构，都表现出了精密的设计思想和高超的建筑水平，至于历年出土的许多精美器物，则更加充分地反映了咸阳在当时国内冶金、机械、制陶、纺织、皮革等手工业生产领域的先进技术；从社会风尚来说，亲自到过咸阳的大学者荀况所说的这段话可以概括一切。荀子说：“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汗，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

敦敬，忠信而不桡，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荀子·强国篇》）这段话虽然是记述秦统一前咸阳风俗的，但秦国当时那种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社会风气和政府作风，无疑延续到了秦统一之后。

西汉虽然建都长安，咸阳一带成了京畿之地，但因自汉高祖刘邦迁徙关东富豪在帝陵旁建立陵邑以来，咸阳原上先后出现了长陵邑、安陵邑、阳陵邑、茂陵邑和平陵邑等五个陵邑。由于统治阶级中大批有钱有势者迁到了陵邑，因而不仅显著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政治、经济素质，也极大地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当时许多文人学者云集陵邑，如文学家司马相如、哲学家董仲舒、史学家司马迁、经学家孔安国等都居于茂陵邑，茂陵邑俨然成为当时天下人文荟萃之区；大儒韦贤及知名学者张山拊、李寻、郑宽中、士孙张、吴章、张仲蔚、贾徽等都居于平陵邑，不少学子辐辏平陵，平陵邑无形中成了那时都城长安附近的著名教育和学术中心；安陵邑则聚集着关东各地迁来的曲艺世家五千户，因此成了蜚声京畿的一座艺术城和娱乐城。其时咸阳一带有许多重要建筑，除九座帝陵和五座陵邑外，还有甘泉宫、云陵邑及云陵。从现存遗迹和出土文物，不仅可以推想当年陵园建筑的宏伟壮丽，亦可看出当时建筑物的独特样式和艺术风格。茂陵霍去病墓前气象威严的石刻及诸陵附近出土的诸多精美的陶器、青铜器和金银玉器，都反映了当时造型艺术的无与伦比。东汉迁都洛阳，政治中心东移，但由于五陵邑经济实力不减，其文化积淀仍然十分深厚。当时全国著名的经学家贾逵、鲁丕、马融、赵岐与文学家傅毅、梁鸿、班昭，史学家班彪、班固以及精通天文数学的科学家马续等，都是五陵邑人。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西汉石渠阁和东汉白虎观学术会议上，五陵邑学者群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长武、兴平等地出土的“魏（魏）率善氏仟长”及“晋归义羌王”等铜印可知，魏晋时期，部分氏族和羌族人民已安居咸阳境内。晋室东迁后，匈奴、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纷纷入据关中，并先后在长安（今西安市三桥镇东北的汉城）建立过前赵（匈奴）、前秦（氐）、后秦（羌）、西魏（鲜卑）等割据政权。这个被称为“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咸阳一带不少汉族弃家南迁（所谓“关中无旧族”），少数民族相继进入，成了“华夷杂居”的区域。少数民族的首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断学习和吸收汉

族的先进文化，实行“汉化政策”。民族大融合的形成，为咸阳地方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这个时期，经像充斥，伽蓝林立，佛教广泛传入本地，建国前后本地出土的许多北朝造像碑，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各族人民对佛教的崇敬和虔诚。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加上位处京畿之地，咸阳一带造就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不仅有苏瑰、苏颋、苏源明、富嘉謨、苏鹗、皇甫枚等著名文学家和“中唐六窦”（窦叔向与其子窦常、窦牟、窦群、窦参、窦巩）及刘皂、马逢等著名诗人，还有吕向、苏冕等著名学者，窦庆、苏灵芝等著名书法家，苏冕、窦璘等著名音乐家及王方庆那样的著名学者兼医药学家。唐代十八陵中，有九座位于咸阳境内，其中高祖献陵、太宗昭陵及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附近，都有许多皇室人物和文武大臣的陪葬墓。不论是这些陵墓的宏伟石刻，还是陪葬墓出土的珍贵遗物，都反映了当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其中墓室壁画、石椁线刻和各种陶俑以及墓前置物，都是唐代绘画和雕塑艺术的杰作，而大量的碑石墓志，则是研究唐史和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

唐代以降，政治、文化中心一再东移，咸阳地方文化虽然早已与中国文化的巨流融为一体，但由于逐渐远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于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鲜明的地方特色。

北宋时，咸阳一带的民间文化活动已很普遍。从碑石文献看，那时各地都建有许多寺庙，各个寺庙每年都有固定的庙会，到时“四方辐辏，熙熙攘攘，盖踵相接”，各种艺术形式汇集，为了春祈秋报，竞相呈技献艺。著名学者沈括曾亲自聆听过“邠州父老”演唱的“唐羯鼓曲”（《梦溪笔谈》）。

在民间文化活跃的同时，以郿县（今眉县）张载为代表的“关学”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关学”在咸阳一带很有影响，武功苏昞、游师雄和三水（今旬邑县）范育等知名学者，都曾师事张载。张载的“关学”学说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与稍后成为理学正宗的程朱（程颢、程颐兄弟及朱熹）唯心主义学派明显不同。此后，历代咸阳的儒生、学者都尊他为师，“关学”学派在咸阳一带延续到了清末，其中元代的杨奂、第五居仁、程瑁，明代的王承裕、马理、吕潜、张节、郭郭、张鉴、王征，清代的王吉相、王承烈直至“关学后镇”刘光蕘等，都是“关学”传人。八百多年间，“关学”的进步思想和注重实践、讲求实用的淳朴学风对咸阳的知识阶层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关学”一同兴起的是地方教育。当时本地各州、县都已相继建立了州学和县学。邠州知州范仲淹曾亲自改建州学，并写过《邠州建学记》，淳化县至今存有北宋大观二年（1108）刊立的《学校八行八刑碑》。有元一代，本地又奉命在乡村陆续设立了不少社学。这种以州、县学 and 社学为主、私塾与义学为辅的教育网络，至晚清时达到极盛。在此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本地的书院教育。北宋时，张载曾在武功县绿野亭讲学，但绿野亭还不算书院。迄今所知本地建立最早的书院是创自元代的三原县学古书院。此后各州县都相继建立了书院，据地方志记载，元代至清末，本地曾建立各种书院三十余个。清代末年，陕西全省所号称的“五大书院”中，除省会所在地的“关中书院”外，其余“宏道”、“味经”、“崇实”、“正谊”等四个书院均在本地的泾阳、三原二县。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明清两代本地考取的384名进士中，有237名出于泾阳、三原两县。除过经济条件之外，这不能不归功于这些书院。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经陕甘总督年羹尧奏请，清廷将陕甘学政衙署由省会西安移驻三原县城，于是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一带成了当时西北地区的教育中心，以此足见本地教育之盛。

由于地方教育的兴盛，本地学术空气日渐浓厚，相继出现了不少知名学者，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著述，如元代杨奂的《还山集》，程瑄的《辽史》；明代王恕的《考经堂集》，马理的《尚书疏义》、《诗经删义》，温纯的《诗经评点》、《杜诗颇解》，牛应元的《四书质言》，文在中的《观宇》、《天极》，文翔凤的《太微经》、《九极篇》，王建常的《律吕图说》；清代王吉相的《四书心解》，王承烈的《毛诗解》、《尚书解》，刘绍攸的《周易详说》，袁仁林的《虚字说》、《古文周易参同契注》，宋振麟的《中岩集》，文应熊的《周易蠡测》、《乐经解》，上官章的《周易解易》，刘光蕘的《汉书食货志注》、《汉书艺文志注》等。同时，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文艺著作，如元代程瑄的《乐府文集》；明代康海的《中山狼》、《王兰卿传》、《汧东乐府》，张炼的《双溪乐府》、《太乙词抄》，温日知的《屿浮阁诗赋集》；清代孙枝蔚的《溉堂集》，孙髯的《永言堂诗文集》，周元鼎的《红菊轩文集》，毛汉诗的《爱吾庐诗钞》，张鼎望的《临清楼诗集》、《临清楼文集》，李念慈的《谷口山房集》，张恂的《樵山堂集》等。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淡泊名利，有志于科学技术和医学、农学的研究，同样留下了不少宝贵著作，如明代康佐的《医问》、《诊法》、《杂治略》，来复校订的《奇效良方辨》，王征的《远西奇器图录最》、《新制诸器图说》；清代陈尧道的《痘科辨证》、《伤

寒辨证》、《医学心得》，杨秀沅的《农言著述》，杨岫的《幽风广义》、《知本提纲》、《医学四鸟》，刘企向的《月婴宝笈》、《痘疗一得》等。这些著作对本地以至陕西文化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早在元代时，咸阳一带的民间戏曲活动就已十分活跃。当时著名杂剧作家马致远在追述居陕时所见秦中风俗时说：“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易尚义，风声习气，歌舞慷慨，且有秦汉之旧。”（《送秦中诸人引》）邠州人孙周卿就是当时关中许多散曲作家之一。到了明代，咸阳一带的地方戏曲有了更大发展。当时乾州、三原、武功等州县都有名隶乐籍、专门从事吹弹歌唱的“乐户”，其中武功县乐户就有9户。“前七子”之一的著名文学家康海回乡后与同为“前七子”之一的鄠县人王九思相聚汧东、鄠杜之间，创作乐曲，自比俳優。他们编创了不少散曲，仅《二太史乐府联璧》就收有260余篇之多。他们二人共同创造的“康王腔”，对陕西地方戏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清代，咸阳一带有不少文人学士投身民间艺术的创造和研究，其中张鼎望所撰的《秦腔论》和周元鼎所撰的《影戏论》，既是对当时地方戏曲艺术的总结，又是对戏曲活动的理论指导。从清代中叶开始，本地不少以自娱自乐为主的民间戏曲班社由自由搭班演出逐渐变为营业性演出，随着商业性经营的扩大，表演艺术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涌现出了一批批诸如张银花、三寿官、韩吉祥、姚静芳、晋公子、茂盛儿、二楼子、雷劳儿之类的秦腔名角，从而使秦腔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

明清时期，编修地方志也成了咸阳文化的一大特色。明代康海的《武功县志》文简事赅，训词古雅，被收入《四库全书》，世称名志。马理主编的《陕西通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西北通览式著述，对陕西地方志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清代乾隆年间，知名学者洪亮吉所纂的《淳化县志》、《长武县志》与孙星衍所纂的《醴泉县志》、《三水县志》和《直隶邠州志》，亦被学术界奉为名志，其中《淳化县志》和《三水县志》被清末学者张之洞列为“国朝省志、府州县志善本”（《书目答问》）。据不完全统计，仅明清两代，本地共新修州志、县志达60余部。与此同时，清代张鼎望的《鲁桥人物志》、王介的《泾阳鲁桥镇志》、胡凤丹的《马嵬志》和刘光蕘的《陕甘味经书院志》等，也颇有特色，为世所称。

随着经济文化的日益发展，清代本地的刊书业也引人注目。当时仅由三原县藏书家李锡龄编辑、宏道书院刻印的综合类大型丛书——《惜阴轩丛书》就达34种、324卷，此外，三原县东里堡刘绍攸创办的“刘氏传经堂”，

先后刻印《传经堂丛书》达 100 余种，东里堡还有个“述经堂”，主要刊印理学名著，亦达 10 余种。晚清时，一些著名书院也注重刻书，其中贺瑞麟主持的正谊书院刊印《清麓丛书》多种，刘光蕘主持的味经书院专设“刊书处”，刊印了不少宣传新学的书籍及重要学术著作。这些刊书活动为保存和整理地方文献、传播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文化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并逐渐传到了咸阳境内。当时，一方面是一些外国传教士出于各种需要，陆续在本地三原等县开设教堂，并相继开办了一些学校、医院，传播了一些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另一方面是本地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为了谋求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开始了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尝试。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进步思想家和教育家刘光蕘就在其主持的崇实书院开设了算学、英语、生物和机械制造等新学科，并在教授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不断向学生介绍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中西文化交融，已经势不可挡。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为了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消除封建社会的各种陈规陋俗，振奋民族精神，先后颁布了剪辫及禁烟、禁赌、禁唱淫戏等一系列法令与命令。本地各县政府及民众团体广为宣传，一时城乡到处形成了一股改革不适应民主共和制度的旧的社会习俗的潮流。当时泾阳、三原、乾县等地一度流传过不少诸如“民国兴，清朝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之类的谚语，这些一“兴”一“灭”，充分显示了民国初年本地民间风俗的新气象和新变化。

“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新思想的广泛传播，促使咸阳一带出现了不少新报刊。继清末《兴平报》和《西北白话报》之后，靖国军的《战争日刊》、《启明日报》和三原县的《救国日报》、《民声国报》等相继创刊。这些报刊或鼓吹国民革命，或传播社会主义，或宣传反帝爱国，或抨击封建专制，大都持论严正，言民心声，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报刊除设有著述、社论、新论、讲演录和时事新闻外，特别注意刊载新文化动态。当时三原县各类学校较多，思想空前活跃，报刊还特为中学生开辟了专栏，如省立三中设有《清流》，省立工职设有《工余》，省立女中设有《嵯峨》等。这些专栏思

想鲜明，文笔犀利、清新活泼，有力地推动了新思想、新文化在本地的深入传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本地文化界爱国人士立即投入了抗日救国斗争。当时三原县立中学曾主演过《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三原县刘尚达在“西安事变”前夕主持编演了轰动一时的大型爱国剧《鸟国》，兴平县符瑞亭编演了宣传抗日的戏剧《虎口团圆记》，乾县范紫东编演了以戚继光抗倭为题材的大型秦腔《鸳鸯阵》前后本，乾县张润泉编撰并出版了《日本侵略中国史》等，这些进步文化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宣传教育了民众，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随着抗日宣传活动的广泛开展，清末和民国初年已逐渐传入的现代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文化艺术在本地有了新的发展。抗战期间，驻在泾阳县云阳镇和栒邑县马栏镇的中共陕西省委、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及关中警备司令部等机关，曾先后组建过“七月”、“关中”、“关警”、“西北”、“八一”和“关中八一”等剧团。这些文艺团体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本地的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他们一面生产，一面打仗，一面演出，不仅演唱各种抗日救亡歌曲、表演从延安带来的腰鼓和秧歌剧，还编演了诸如现代秦腔戏《民族魂》、歌剧《大钉缸》、舞蹈《儿童舞》、话剧《祖国的儿女》、小歌剧《小放牛》、大话剧《蜕变》、《日出》及大型快板剧《世界大战》等新剧目。1942年底，配合整风运动，八一剧团曾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上演了古典剧《三滴血》，毛泽东主席及朱德总司令等许多中央领导观看了演出。这些演出活动不仅起了团结教育人民的作用，也推动了本地各种艺术形式的蓬勃发展和传统戏曲的改革创新。

抗日战争时期，受当时形势影响，本地一些爱国士绅和社会贤达痛感“教育救国”的迫切和重要，于是四处奔走，多方呼号，动员民众创办了不少学校。至民国30年（1941），不仅各县均有了县立高级小学、各乡镇和各保基本上都新建了公立中心国民学校和保国民学校，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县县都建起了县立初级中学。随着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各小学都开设了算术、自然，中学都开设了数学（算术、几何、代数）、植物、动物、化学、物理及生理卫生等课程，这些自然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对本地科技知识的普及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体育课程的普遍开设和学校各项体育活动的开展，则有力地促进了本地民间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结合。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重新挑起内战。战祸连年，经济崩溃，本地各种文

化事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摧残。以教育为例，1949年本地在校中学生数较1944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20%，各县学龄儿童入学率也较抗战时期明显降低，平均不到40%。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本地的社会文化事业欣欣向荣。特别是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咸阳人民在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奋发努力，求实创新，教育体系日臻完善，体育卫生全面发展，文化园地繁荣兴旺，文博事业盛况空前，科学技术异军突起，世风民俗日新月异，到处呈现出文化腾飞的喜人局面。

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1949年，本地只有3所规模不大的幼稚园，不到10个幼儿教师，至1990年，发展到36所幼儿园、2420个幼儿学前班，接受学前教育的幼儿达7.9万人，从事幼儿教育的教职工增至2500余人，其中三原、泾阳等县幼儿园曾受到全国妇联等部门的表彰。1949年，本地仅有各类小学2527所，在校学生11.48万人，到1990年，增加到3600所（另有教学点257个），在校学生达53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由解放前夕的不足40%增至98.4%，有171个乡镇依法实施了六年义务教育。1949年，本地仅有各类中学17所，在校学生5765人，至1990年，增加到401所，在校学生26.8万人。中小学教师队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本地共有中小学教师2800人，其中小学教师的合格率只有25%，至1990年，教职工总数增至4.6万人，中小学教师合格率均在50%以上。在基础教育稳定发展的同时，城乡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及中等专业教育也有了较大发展。1949年，本地只有三原初级工业职业学校等3所职业学校。经过80年代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到1990年，全市单设职业高中发展到32所，在校学生1.2万余人，60多个专业中，有11个骨干专业跨县区招生，其中泾阳县职中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示范职中。另外，还有技工学校20所。这些不同类型的职业学校，先后为本地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新型劳动者。本地民国时期的成人教育只有扫盲一事，且往往流于形式。建国后，政府下大力气抓扫盲工作，1980年，本地青壮年非盲率达到了85%以上，步入了扫盲先进行列。多年来，本地切切实实地开展了职工业余教育和农民文化技术教育。1990年，全市有各类职工业余学校55所，农民技术学校224所，成人高等教育机构3所。其中西北国棉一厂职工学校曾被评为全国业余教育先进单位。1949年，本地仅有两所大学、两所中师和一所中专，到1990年，已发展到6所大学、3所中师和9所中专。可以说，建国40年来，本市已经

逐步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多层次、多种类、多学科的现代教育体系，为咸阳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地民国时期的体育活动一度比较活跃，其主要项目为篮球、田径和体操，主要活动场所集中在城镇和部分条件较好的中小学校，广大农村仍以娱乐性和习武性传统体育活动为主。建国后，各级政府先后设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又陆续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县区分会和田径、篮球、排球、足球、武术、棋类等单项协会及农民体育协会、老年人体育协会，推动了全市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充分重视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是咸阳体育的一大特色。多年来，除了不断抓好各级各类学校的体育教学之外，还先后成立了19所业余体育学校。从1956年到1990年，咸阳各业余体校相继向陕西省体育队和国家体育队输送优秀运动员260多人。各级体委和教育行政部门协作，命名体育传统项目学校156所，参加训练的学生达4300余人，其中西北国棉七厂子弟小学被授予“全国先进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称号。与此同时，农民体育运动也有了较大发展，泾阳县先后三次荣获全国“田径之乡”称号，兴平县获“全国体育先进县”称号。80年代，本市先后举办了近10次不同类型的运动会，并多次派代表队参加了本省举办的各种运动会，取得了优异成绩，其中，李红梅在陕西省第三届青少年运动会上破了一项女子举重世界纪录，罗卫和肖关纪在参加全国第六届运动会期间获得了武术金牌。到1990年，市及各县均有专门的运动场地，市体育馆、射击馆也已建成投入使用，各项体育设施从无到有，逐渐齐备。

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西医逐渐传入境内，打破了传统的医药格局。公共卫生和妇幼卫生开始受到重视，医院、诊所及西医、中医都有所发展，但因受社会因素限制，医疗卫生事业整体上仍然十分落后。民国18年（1929）、21年（1932）两次霍乱大流行，造成了惨痛的历史悲剧。1949年解放前夕，本地仅有十余家卫生院和几十家私人诊所，每万人平均医护人员0.58人，病床每万人平均0.85张。建国以后，咸阳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很快，至1990年，全市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550余个，其中综合医院24个，县区中医医院12个，地段医院、乡镇卫生院211个，职工医院27个，企事业单位卫生所（卫生室）200多个，病床8000多张，卫生系统职工1.5万人，其中医务科技人员1.3万人，每万人拥有医务人员30余个、病床20余张。40年来，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医疗设备不断更新，医疗技术大大提高。中医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及内病外治方面有了明显进步；西医内科对心脑血管肝肾等疑难重症的

诊断准确率和治愈率显著提高；外科开展了断指（趾）再植、腹腔三脏器切除及脑外手术、心内直视手术、人工心内临时起搏术。与此同时，预防保健事业有了突破性进展。1990年末，全市有防疫机构15个，各类防疫专业人员590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卫生防疫网，在传染病防治、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劳动卫生、地方病防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另有妇幼保健机构15个，保健人员340人，在推广和普及新法接生、孕产妇围产期保健、妇女病防治、优生优育、儿童保健等工作中，也都硕果累累。

民国时期，本地的文化设施虽然有所增加，但仍少而零散。建国后，人民政府一直重视文化事业，各种设施日渐增多。1990年，全市有社会剧院14个，企事业剧场22个；电影放映单位557个，其中城市电影院、站和俱乐部75个，农村482个。在文化事业中，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尤为突出。经过多年的努力，本市已初步形成以文化馆为龙头、文化室为基础、文化站为枢纽、文化户为补充的四级文化娱乐网络。到1990年，全市共有227个乡文化站，24个镇文化中心，474个村文化室、79个文化专业户，业余演出团队73个，各种文艺队伍达3万余人。作为群众文化基础的乡村文化室，伴随改革开放，社会发展，正在由单一的娱乐型向文娱、科研、业余教育、体育、卫生五位一体的农村大文化道路前进。与此同时，文学艺术创作日益繁荣，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与音乐、舞蹈、戏曲、书画、摄影以及民间美术等，都出现了不少受到社会关注的优秀作品。而80年代后期完成的《咸阳民间故事集成》、《咸阳歌谣集成》和《咸阳谚语集成》等十大集成，则展现了咸阳地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丰富内涵，是一套名副其实的咸阳民间文学集大成之作。

建国以后，特别是80年代，咸阳的广播电视事业有了飞速发展。至1990年，除市电视台和市广播电台外，全市拥有电视差转台39座，卫星地面收转站50座，电视可覆盖90%以上的农村，加上绝大部分乡村通了广播，一个以乡镇广播放大站为基础的广播电视网已经初步形成。随着各种新闻报刊的广泛发行，广播、电视节目和新闻报刊已成为咸阳城乡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民国时期个别县城已出现了社会图书馆，但藏书普遍较少，借阅多有不便。建国后，各县相继建起了公共图书馆。1990年，全市共有公共图书馆13个，馆藏图书近百万册，全年接待读者50万人次。有些图书馆藏书甚丰，仅秦都区图书馆所藏线装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就达540种、4898册，其中

有4种、180册被列为国家级善本书，18种401册被列为省级善本书。建国以前，本地仅有少量书铺、书摊，至1990年，全市有新华书店13个，各种售书网点不下二三百个，全年销售各类图书近1000万册。建国之初，各县档案残缺不全，亦无专门机构管理，至1990年，全市已有15个综合档案馆和1个专门档案馆，共保管档案1575个全宗，近36万卷。另有文书档案机构1884个，科技档案机构281个，专业档案机构1344个，综合档案机构83个。当年全市正式向社会开放各类档案达18178卷、资料5393册。具有修志传统的咸阳地区，在民国时期仍然修纂了10余部县志和专业志书。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下，本市各县（区）都相继新修县（区）志，并有不少市属党政部门和中、省企事业单位已经编成或正在编纂本系统、本单位的志书。图书、档案和地方志事业的不断发展，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咸阳文物甲天下。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越的区位优势，使咸阳的文物古迹十分丰富。全市已经过中央和省、县（区）三级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遗址有139处（其中国家级3处、省级17处），古墓葬91处（其中国家级7处、省级34处），古建筑42处（其中国家级1处、省级19处），石窟寺3处（其中国家级1处，省级1处），石刻48处，其他遗物及近现代史迹30处。另外，还有各种馆藏青铜器，陶瓷器及其它诸如金银器、玉石骨器、铁器、货币、壁画等珍贵文物近10万件（组）。建国以来本地在全省统一组织下，先后开展了三次文物普查，其中1988—1989年的第三次普查中，确认全市有各类文物点4951处，近现代文物及其它遗存117处，从而为制定本市文物旅游发展规划提供了翔实的依据。1990年，全市有文物保管所14个，文物保护组织39个，各种文保员、通讯员435个，有306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树立了保护标志、设立了保护机构（或有专人管理）、建立了记录档案，即落实了“四有”，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物保护网络。建国以前，本地不仅没有一个文物管理机构，也没有一所博物馆，至1990年，市和各县（区）都相继建立健全了文物管理委员会，有不少文管会还设立了专门办公室，博物馆亦从无到有，发展到了11所。博物馆数量之多，居全省各地市之首。随着咸阳文物事业的日益发展，秦都咸阳和汉唐陵墓出土的不少珍品曾多次被选送参加对外展览。这些展览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咸阳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促进了咸阳的对外联系和改革开放。建国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后，咸阳在文物保护、

考古发掘及科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大部分列入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石窟寺与石刻得到了妥善维修，有计划清理、发掘的古遗址、古墓葬取得了丰硕成果，艰苦的考古实践培养和造就了诸如刘庆柱等一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博大精深的咸阳文物不仅将继续激发人们的文化自尊和民族自尊，也必将使咸阳受惠无穷。

1949年解放前夕，本地虽有不少科技人员，但绝大部分在西北农学院和西北工学院，基本上是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地方科技人员数量极少，到1990年，全市各类科技人员总数增至7.17万人，为建国前的12倍，其中地方工程技术人员由38名增至5091名，农业技术人员由19名增至2390名，卫生技术人员由不到百人增至7495名，分别为建国前的134倍、126倍和100多倍。截至1990年底，全市共有6万余人获得了专业技术职务，其中具有高级任职资格的1000余人，中级任职资格的近1万人。有各种科研机构64个，其中部、省属23个，市属8个，民办33个，据1990年统计，仅工程技术和农业科研获奖的成果就有1428项（国家级奖129项，省、部级奖591项，市级奖708项）。随着科技研究的逐步深入、科技交流的日益广泛和科学普及水平的不断提高，本市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科技进步给咸阳经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极大地改变了咸阳人民的文化观念，“科教兴市”已成为新时期咸阳人民的共识。

民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人们的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建国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本地人民的日常习俗也相应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从心理民俗来讲，由于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特别是通过长期以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人们已逐渐由传统的封建观念和迷信思想束缚下解脱出来，包括各种禁忌在内的反映在心理上的陋习旧俗已逐渐淡化，诸如男女平等、婚姻自主、舍己救人、大公无私、破旧立新、晚婚优生等新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随之兴起；从行为民俗来讲，礼节、仪式、岁时、服饰、饮食、住行以及纪念、游艺等各种有形的传承活动，随着人们心理的变化，亦呈现出推陈出新、移风易俗的态势，诸如摒弃繁文缛节、提倡一切从简，破除封建迷信，主张新事新办，继承优良传统、追求时代风尚等等即是；从语言民俗来讲，包括歌谣、谚语、戏剧以及行话、称谓语、游戏语等语言形式，都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外来民俗的影响，与各种民俗观念一起发生了新的变化。但由于本地经济

发展不够平衡，一些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所放松，因而看相算命、求神问卜之类的封建迷信活动有所抬头，婚丧喜庆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俗时有发生，诸如卖淫嫖娼、赌博吸毒之类早已被人民政府禁绝的丑恶现象仍有复发之势，因此，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移风易俗，仍将是摆在本市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一编

教 育

咸阳教育源远流长。远在西周时期，咸阳为京畿之地，庠、序、校普遍设立。秦朝建都咸阳后，于每乡设“三老”以“掌教化”，朝廷置博士70人以“典教职”。咸阳为首善之区，教育受到格外重视。其后各朝文风丕盛，除地方官学外，私学屡代不衰。西汉时，吴章治《尚书》经为博士，系“当世名儒”，其“教授尤盛”，有弟子千余人。东汉时，班昭教授马融诵读《汉书》，后来马融又设帐授徒，有门徒四万余人，著名经学家郑玄等人即出于其门。

唐代以来，乾州、邠州州学及各县县学相继设立。及至宋元，各州县又陆续创办书院。清代中期以降，号为鼎盛。光绪二十六年（1900），本地书院多达21处，其中以“宏道书院”、“正谊书院”、“陕甘味经书院”、“崇实书院”最为著名。

清代中期以来，本地商业经济繁荣，教育发展较快。康熙六十一年（1722），经陕甘总督年羹尧奏请，清廷将提督陕西甘肃学政衙署由西安移驻三原，三原成为当时西北地区的教育中心。光绪二年（1876），因左宗棠奏请，增置甘肃学政，但三原仍然是陕西全省的教育中心。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度，改州县儒学和书院为学堂。是年，陕西省督学沈卫率先改宏道书院为宏道大学堂，旋以味经、崇实两书院书籍、款项并入，改称宏道高等学堂。宏道高等学堂为当时陕西传播新学的最高学府之一。与此同时，本地各县相继取消书院，改建高等小学堂。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各县均设高等小学堂。宣统二年（1910），还先后建立3所初等师范学堂，2所初等农业学堂和1所教习纺织的艺徒学堂。本地各级各类学堂的兴建，标志着长期以来的封建教育在形式上的结束和近代教育模式的确立。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时期，可以说是本地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大发展时期。这场大的变化，是当时中国社会经

济、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本地近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二个大发展时期，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此之前，虽先后有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和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的大力提倡和推动，本地教育的发展仍比较缓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难当头，一些敌占区学校陆续迁陕，受形势影响，不少热心教育的爱国人士及地方士绅遂纷纷倡导，筹措经费，兴办学校。至1941年，各县普遍设立初级中学和公办高级小学，各区、乡也有了公立中心国民学校和保国民学校。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重新挑起内战，战乱连年，民不聊生，教育不仅没有进一步得到发展，反而出现萎缩。

本地近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三次大发展，则是到了建国之后。建国初期，伴随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顺利进行，教育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除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办学外，国家还提倡民办学校和厂矿企业办学。截止1957年，各类普通小学发展到2828所，在校学生242978人；各类中学92所，在校学生27284人。与1949年相比，普通中、小学校数分别增长了4.4倍和0.8倍，学生数分别增加了4倍和1.4倍。1958年高级中学发展到23所，实现了县县有高中。在普通教育大发展的同时，各种成人教育，特别是扫盲工作亦取得了显著成绩。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和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教育事业一度盲目发展。经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教育事业又回到了健康发展的轨道。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教育战线再次出现的大好形势。“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数目虽然增长较大，但教学质量普遍下降，学校布局亦多不合理，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破坏。

本地近现代教育史上的第四次大发展，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拨乱反正，清除了“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流毒影响，全面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调整了不合理的学校布局，特别是经过中小学管理体制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教育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80年代中期，又在地方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配合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集资办学、改善办学条件的热潮，教育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截止1990年底，全市有小学3600所，教学点257个，在校学生53万人；初中317所，在校学生21.8万人；高中84所，在校学生5万人。中小学教职工达46809人。在基础教育大发展的同时，本地普

通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各类成人教育，都有了很大进展。现有西北轻工业学院、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陕西中医学院和咸阳师范专科学校等6所普通高等院校，还有师范、农业、卫生、水利、农机、机器、纺织、财经、煤炭等中等专业学校12所，职业中学32所，职工业余学校55所，农民技术学校224所，技工学校20所，陕西省咸阳教育学院、铁道部基建干部管理学院、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咸阳分校等成人教育院校（部）10所。从教育层次看，幼儿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形成了梯次；从教育类别看，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职工教育、农民教育，覆盖了整个社会；从教育形式看，学校教育、函授教育、业余教育，无不具备。可以说，已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多层次、多种类、多学科的教育体系。各种类别、各种形式的教育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形成了立体交叉式的发展格局。

第一章 传统教育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前各种形式的教育，官方主要是州学、县学和社学；民间则主要是不同类型的私塾及义学。宋元以来，本地还先后创办过一些书院。此类书院到清代中期，已遍布各个州县，且多改为官办。这些不同层次的书院与州学、县学、社学和民间的私塾、义学相辅相成，为封建国家造就了不少人才，也基本满足了当时本地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第一节 官立学校

一、州、县学

学校概况

宋代境内的邠州和乾州即有州学，醴泉、武功、淳化等县已建立了县学。明清时期统称“儒学”，在州的称州儒学，在县的称县儒学。由于州、县儒学大都与文庙建在一起，清时儒学附于文庙已成定例，故清代又常称

州、县学所在地为“庙学”或“学宫”。本地各州学、县学虽然时盛时衰，情况不一，但一直是教育的主体。

邠州州学建于宋庆历六年（1046），系邠州知州范仲淹莅任后，令兵马监押刘保与节度推官杨承用主持修建。地址在州城东南角高敞之处，与孔庙同建。州学共有房舍 140 余间，周有长廊环绕，经堂、书库齐全。范仲淹曾作《邠州建学记》以记其事。明代初年，迁建于州署西半里处的万寿堂。嗣后屡经修葺，成化十六年（1480），赵州人刘济继任知州后，立意鼎新，修建了大门、戟门、大成殿及廊房，同时对厅堂、屋舍进行了扩充和修整，当年夏季开工，翌年秋季告成。成化十八年（1482），掌学事黄线钺曾为此请邑人刘昭作了《重修庙学记》。乾州州学初建于宋，其后颓废。明洪武四年（1371）重建。前为大门，次为仪门，中为明伦堂，堂阔五间，高三丈七尺，宽五丈，进深四丈二尺。天顺、隆庆、天启及清康熙、咸丰中，陆续进行过重修、扩建。邠州州学和乾州州学均废于清末。

宋代以来，本地各县陆续建立了县学。宋皇祐年间（1049—1054），醴泉县学率先建成，其时县署在今县东骏马乡旧县村。明洪武四年，县学随县署迁建于今县城。崇宁二年（1103），武功知县赵范曾倡建武功县学。大观二年（1108），淳化县学于县城南建成，明嘉靖三年（1524），县丞毕经奉命将县学迁到城北。元大德十年（1306），三原县学建成，初在文庙大成殿后，明初迁入旧洪福寺内。明洪武二年（1369），泾阳县学建成，天顺、弘治、万历、崇祯年间及清顺治中相继扩建、续修。清同治元年（1862）毁于战火。光绪初，官绅倡议修复县学及文庙、学署，耗金累万，规制一新。兴平县学亦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为知县沈讷创建，成化、嘉靖及清乾隆中屡经扩建、修缮。明洪武三年（1370），永寿县于县治（今县北永平乡政府驻地）文庙左侧设明伦堂为训导士子之所，是为县学。明天顺元年（1457）知县郭直曾主持重修。明洪武四年（1371），咸阳县丞孔文郁修建县学。明弘治元年（1488）知县孟统扩建，此后以至清末，屡有捐修。三水（今旬邑）县学亦建于明初，初在县城东南，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迁于文庙后，清康熙、嘉庆、道光、同治年间曾多次修葺。长武县学始建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建县之后，清乾隆间知县樊士锋主持重修，著名金石学家、陕西按察使王昶撰《修长武县学记》，以记其事。

州、县学地址部分时有变动，但一般比较固定。州、县学和文庙、学署三者合一，在清代已成为本地“学宫”的普遍形式。以兴平县学宫为例，其

前为“照壁”，照壁北为“泮池”（半月形水池），泮池北为“棂星门”（作牌楼式），棂星门北为“戟门”，戟门北为“大成殿”（七间，作重檐、悬山），殿前两侧为东、西庑（廊房，各五间），两庑南端分别为“名宦祠”（东）和“乡贤祠”（西），殿后为“明伦堂”，堂壁嵌“儒学卧牌”，堂后两侧为“学署”（“教谕”宅居东，“训导”宅居西）。学宫西部由南向北依次为“节孝祠”、“文昌祠”、“忠义孝悌祠”和“崇圣祠”。学宫东部为“儒学”（即县学）。兴平县学宫虽然比较完整，也比较规范，但与其他州、县学比，还缺少“尊经阁”（藏书楼）、“依仁斋”（或“修道斋”）、“游艺斋”、“博文约礼斋”、“退省堂”、“敬一亭”、“射圃亭”以及“饌堂”、“仓房”、内外号房等设施。

生员管理

明清时期，本地的邠州和乾州虽为直隶州，但州治不另设县，由知州亲临其民，故州学生员基本来源于州治所在地，州属各县生员多在县学读书。州学与县学无统属关系，规制大体相似。

明清时期的初学者，无论年龄长幼，统称“童生”，童生经过县试、府试、院试及格者称为“秀才”，即可入学为生员。

当时对生员身份有许多限制，一些被认为卑下的职业，如所谓倡优（倡伎、演员）、隶卒（差役）本身和直系亲属都不准应试入学。

州、县生员有规定的名额。但实际上，由于州、县有大小，文风有盛衰，州、县学生员名额历来不尽相同。如清道光七年（1827）时乾州州学生员为16名，邠州州学生员为8名，三原县学20名，武功县学16名，咸阳县学、兴平县学、醴泉县学及泾阳县学各15名，三水县学12名，永寿县学、淳化县学和长武县学各8名。

明崇祯十年（1637），朝廷令府、州、县学设武学生员。武童生与文童生一体考取，考中者称“武学生员”，简称“武生”，俗称“武秀才”。当时本地县学武童额岁试取进8名，由县学教官兼管。清代沿用明制，咸丰七八年，因捐饷出力，武童广额3名，钦定每岁试取进11名。有的县学名额较多，如兴平县岁试取进武生13名，可知后来因情况不同，学额亦不尽一致。

明清时期，州学设学正1名，训导1名，主管州学教务；县学设教谕1名，训导1名，主管县学教务。个别小县，学官仅有1人，如永寿县明天启元年（1621）革除训导，止留教谕一职，清康熙中又裁教谕，复设训导1名。长武县明代无训导之职，由教谕主持县学，清代又裁教谕而设训导，由训导

掌县学事。清中叶后，随着州县书院普及和改为官办，学官亦掌管书院。书院日趋兴盛，生员多投学于书院，学官往往配合书院对州、县学生员进行教学和管理。

州、县学对学生的管理极严。宋代淳化县学所铸《学校八刑八行碑》至今尚存。本地有的州、县学明代即铸有洪武时朝廷颁发的《卧碑文》，到清代，各州、县学都奉命于明伦堂左侧嵌有顺治九年（1652）所颁《新卧碑文》。咸阳县学“卧碑”至今犹存。“卧碑”实际上是生员的戒律。全文除序言外，共有七条。其序言开宗明义，宣称“朝廷建立学校，……全要养成贤材，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卧碑同时规定“生员当立志学为忠臣清官”，“不许干与他人词讼”，“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等。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又颁布《圣谕十六条》，雍正二年（1724）演为《圣谕广训》，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令儒学教官传集该学生员宣读令遵守，违者责令教官并地方官详革治罪”。

教学活动

州、县学教学以科举应试之文为主。明清时期一般限于“四书五经”，并以朱熹集注为范本。生员入学，专攻一经，并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设科分教。州、县学都注重教授性理书及八股文。晚清时期，八股文虽有所减弱，但教育思想已完全僵化。

州、县学考核生员的方法分月课、季考。此外，还要参加一年一次的岁试和两年一次的科考。

科考有固定的名额，即所谓“学额”。学额按州县文风高下及钱粮丁口多寡为差，分为“大学”、“中学”、“小学”。三原县原定学额15名，雍正十一年（1733）以文风特盛，奏准照府学额进20名，咸丰五年（1855）以捐军饷加永远学额1名。八年（1858），又捐输军饷加永远学额7名。十一年（1861），以捐输军饷，加永远学额2名。兴平县乾隆中为“中学”时，岁进文生员15名，拨府1名。泾阳县清道光年间（1821—1850）科考名额为15名，咸丰四年（1854）以捐输军饷加永远学额7名。清道光初年时，三原县学额增至30名为最高，乾州及武功、泾阳、醴泉、兴平、咸阳等县次之，改为15至16名，永寿、淳化、长武等县及邠州较低，仍为8名，三水县略高，增至12名。道光年间以后，因捐输军饷，各州、县学额多有所增加，惟数量不等。

武生入学后，由儒学教官兼管，除专学骑射外，还教授《武经七书》、《百将传》及《孝经》、“四书”等。岁试分内、外场。外场在演武厅试骑射，内场试策论。岁试列一、二等者，准予参加科举。

清代以来，各州、县为了组织好考试，一般设有“考院”（或称“考棚”）。本地兴平县的“槐花考院”即有一定的代表性。槐花考院创建于清道光年间，地址在槐花书院之北。考院前三楹对峙，西边的称“树人簃”，为唱名报卷之所。其内为“龙门”，龙门之内辟东、西文场 14 间，编有座号。正北称“可为堂”，为校阅试卷之处。“可为堂”之西为“内堂”，东为厨房。西北为“敦仁堂”，左右有房，为试官憩息之所。“树人簃”之东建有“先贤祠”，奉祀董仲舒、贾逵、马融三位古人。仪门外有“谒古亭”，亭前蓄水养鱼，闲时则任士子吟咏赏玩其间。

州、县学生员的出路，一是参加乡试竞考举人，再参加会试和殿试竞考进士。科举出身以进士考试为最高阶段；二是升入国子监取得贡生资格，再求出仕为官。在科举制度下，各州、县为封建国家培育了不少人才。据旧志记载，乾州唐代有进士 6 名，金代 2 名，元代 4 名，明代 19 名，清代 15 名（含武进士 5 名）。明代另有举人 111 名，清代有举人 130 名（含武举人 50 名）。武功县唐代有进士 13 名，宋代 6 名，元代 1 名，明代 24 名，清代 19 名（含武进士 1 名）。明代另有举人 61 名，清代有举人 123 名（含武举人 57 名），其中明洪武十八年（1385）殿试，马京中进士二甲第一名，弘治十五年（1502）殿试，康海中进士一甲第一名，成为状元，清代道光中，金凤周中武解元，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尚谦中解元。泾阳县明清两代有进士 127 名（含武进士 16 名），举人 632 名（含武举人 166 名），贡生、监生 477 名。三水县，宋元两代亦各有 2 名进士，明代有 8 名进士（含武进士 2 名），清代有 7 名进士，明代另有举人 22 名，清代有举人 36 名（含武举人 4 名），明清两代还有各类贡生 280 名。

二、社 学

境内元代以前社学无考。元朝州、县所属村疃 50 家为 1 社，不及 50 家者与近村合为 1 社，每社设社长 1 人，办学校 1 所，专以劝教社民“勤农桑，司礼仪，读诗文”，兼负蒙学教育之责。因学校是一社一所，故称社学。乾州等州、县奉令设立社学。一般每社立一学校，“拜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明初，诏天下设立社学，令民间幼童 15 岁以下者入学读书。

清沿明制，仍令各州县于大乡巨镇设社学。社学实际上是县以下的官学。

明弘治四年（1491），泾阳县全县修复的社学总计有48处，实为一里一所社学。明代改“社”为“里”，社学名称依旧。弘治六年（1493），武功知县宋学通按照《提学条约》规定，曾在全县十五里各设一社学。三水县明代曾于县城设一社学，系知县马宗仁所建，后与医学合并。兴平县城社学为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由知县章评所修，位于县学之南，有正堂五楹，寝堂五间，东西号房四间，马嵬、店张等村镇亦建有社学，其后长期停办。清顺治十五年（1658），知县徐开熙暂借保宁寺为社学，康熙十五年（1676），知县孙世泽在文庙前立社学，四十六年（1707）知县田衷孚撰《滋兰社约》八条。1934年，兴平县有据可查的社学尚有8所，其中县城内四街各1所，西吴、仪空、定周、赵村等镇各1所。据清雍正三年（1725）拜斯呼朗《重修陕西乾州新志》载，当时乾州城内“社学在州城北街，不知何时何人所建，今废”。长武县城内社学与县学同建于明万历十一年至十五年间（1583—1587），附于学官之东。咸阳县明初曾设社学1所，在旧治城南，县治迁至渭水驿（今咸阳老城）后，社学设于县署前面。有学舍1所，教读1人。嘉靖末年，知县周钦改社学为官厅，县城社学遂废，但各里仍设有教读1名，就邻近祠宇为学舍，继续办学。后来贾村、双照村和西城村亦曾办过社学。万历年间，对这三处社学均作过修复。清光绪七年（1881），知县严书麟在县城内主持修建了两所社学，一在北街，一在南街。

社学择聘通晓经书者为师，利用农闲时节组织农家子弟入学读书。社学经费一般由官府拨学田和地租维持，或用地方公款支付。校舍往往以庙宇、祠堂为之。学生上学名额不限，贫寒子弟亦可入学。社学一般为蒙馆性质，课程多为《三字经》、《百家姓》、《小儿语》等。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私塾相似。

第二节 私立学校

一、私塾

明清时期私塾遍布各地。虽为私人设馆讲学，但学生有富家子弟，有平民子弟，历来秀才、举人、进士多出于私塾之门。私塾教育是清末兴学堂以前学童读书的必经阶段。

本地私塾按程序有“蒙馆”与“经馆”之分。蒙馆招收启蒙学童，以识字为主。经馆招收年长的学生，以读经应举为主。还有相当一些私塾属于“蒙经混合馆”，既有启蒙儿童，又有读经、讲经的大龄学生，当地人称其为“大学长”。蒙馆课程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及《七言杂字》等，专重背诵，不重讲解。经馆课程有“四书五经”及《幼学琼林》等，采取背诵与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并学习对对联、做文章，注重深造。

本地私塾按性质划分，有“村塾”、“族塾”、“门馆”与“家塾”之别。村塾是一村或数村联议开设的私塾，又称“公延馆”，公推深孚众望的家长作学东，牵头延请塾师，择定馆址，襄理学务。学童一般七八人至二三十人不等。塾师的“束脩”（薪水）按入学人数认摊或分摊。这种私塾为数最多，以淳化县为例，清末全县的43所私塾中，村塾就有32所。

族塾一般是利用祠堂公产设立的私塾，专教本族子弟，间或兼收个别外姓子弟。本族子弟可以免费或减费入学。塾师束脩多从祠堂公产中支付。明代淳化县义门里罗氏创办“寿峰书坊”，就是这种私塾。该族塾建于嘉靖年间，由罗九霄主持开办，收纳罗姓子弟十余人入塾，教育罗姓“九”、“夫”、“延”、“究”四代子孙，当时曾任四川巡抚的罗延秀及山东莱州知府的罗奎等人，均是罗氏族塾的学童出身。

门馆是塾师和经师在自己家中（或租房设馆）招生授业、聚徒讲学的一种形式。门馆一般根据塾童家庭经济状况分别收费。清乾隆末年，淳化县贡生罗汝信就在自己家中设馆几十年，聚童子为小学之教。他执教严谨，事必躬亲，廉洁清苦，在当地很有影响。不少门馆是塾师迫于生计而设，教学水平不高，往往时办时停，开办较长的不多。

家塾是有钱人家延聘塾师在家设馆，以教自家子弟为主，间或收其亲族近戚子弟，又称“专延馆”。专延馆一般事先议定束脩及期限，并书有聘约，塾师多为有功名的秀才、举人或离职的官员。明万历年间（1573—1620），淳化县显宦贾克忠遭贬返里后，在家设馆，自任塾师，亲课二子，后其二子均中举人，一官至直隶大名府通判，一官至广西庆远府知府。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长武知县樊士峰延聘扶风举人李泰交设帐官署，教授其子弟。清同治、光绪年间，咸阳举人刘光蕘曾先后五次应家塾之聘，尤以应咸阳进士李敬恒家塾之聘，教授其子李岳瑞（后中进士）最为知名。

清代，本地川道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一般均有较大的私塾几十处甚至

百余处，渭北山区县一般也有二三十处，如清同治、光绪年间邠州东秦、后玉、杨家那、上长禄及大王等村的私塾，在当地很有影响。清末兴学堂后，因大部分民众生活艰辛无力让子弟上学堂读书，私塾仍遍及乡村。当时有的县奉令对私塾进行改良，办“改良私塾”；有的县改私塾为“简易识字学塾”，除个别略有改变外，大多有名无实。民国初年，本地各县仍保留着许多私塾，乾县一些大村甚至几处设馆，仅县城内即有私塾二十余所。兴平县民国初年公、私立小学校虽有了发展，但私塾在乡村仍受欢迎。据统计，一度有三十余所，比清末还多。武功县民国初年私塾也很普遍。当时县内较有名望的塾师有县城内北大街马骥承，县北关杨振轩，西原教场村贺必胜，凉马村薛敬轩，张堡村薛树荣、蒋树贵、高炳离，普集镇弓杰，薛固镇毛聘之、毛怀章等。

民国初期，各县私塾仍和公、私立学校并存。1931年前后，陕西省教育厅颁布了《关于私塾改良办法》，各县陆续对私塾进行了改良。改良办法主要是培训提高塾师，改善教法，更换教材，强调改用国民政府颁定的《共和国文》、《论说精华》及《常识》、《算术》等课本。以淳化县为例，1929年有私塾61所，改良37所。至1933年，有私塾18所，改良13所。1935年至1936年，遵从省教育厅训令，各县大多督促各乡镇将私塾归并为保立国民学校。此后，私塾逐年减少。但直至建国初期，一些偏远地区仍有私塾遗存。

私塾规模一般都比较小，收纳学童多少不定，入塾也无需进行考试，学习程度悬殊较大，也没有一定年限。教学活动主要是读书，同时特别重视写字训练。

村塾、族塾、家塾对塾师一年一聘，续聘或辞谢，皆在“冬至”日，设宴相定去留。门馆于是日由门生给塾师奉越冬之“毡鞋费”，先生则飧生徒一餐，以互表尊师爱生之情。

二、义学

本地义学（由人们捐资或由庙田田租兴办的免费学校）之设，从现有文献看，当以兴平县为最早。兴平县明代即有义学，地址在县城西门外，后废止。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知县章评重建义学2所，一在儒学南“真儒堂”，一在北寺“仰高深处”（今北塔巷内）。当时马嵬、店张等地亦建有义学，后废。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由知县田衷孚改槐花书院为义学。雍正七年（1729），又由知县胡蛟龄创办了回民义学2所，一在北吴村，一在板桥

村，专供回民子弟入学。道光二十三年（1843），义学由原有6所增至10所。

清雍正元年（1723），朝廷曾命各省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本地各州县均奉命设立了义学。

淳化县义学创建于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冬，由知县张如锦捐俸薪作为经费，延请明经刘大烈为师，先设学于县城北关的四公生祠内，后移至城隍庙道院。雍正八年（1730），知县高兆麟又于通润镇（今润镇）创办义学1所，后又在石桥镇办义学1所。除此而外，官庄村拔贡任敏萼在官庄村捐立义学1所，方里镇乡绅张明义在方里镇集资建义学1所。至乾隆五年（1740），淳化县共有义学5所。

乾州在清雍正三年（1725）前于陆陌里等4乡各设义学1所，学址迁徙无常。雍正三年，知州拜斯呼朗捐俸补修。光绪五年（1879），知州张伯恭又设立义学8所，其中州城内2所（一在八蜡庙，一在二圣庙），4乡分别于让村、杨庄、阡道镇、临平镇、十八里铺及铁佛寺村设6所义学。光绪十年（1884），知州周铭旗在王乐镇又添置1所。每年学师束脩由厘局各付钱四十串。

除上述州县外，其余各州县均有数量不等的义学，其中清咸丰十年（1860），泾阳、三原、兴平、醴泉等县曾奉令设立回民义学。回民义学均设在清真寺内，由“开学阿訇”授课，讲解伊斯兰教阿拉伯文的经典教义、语法文字，并且用汉语传授教义。汉语课本多以《天方三字经》、《清真指南》等为蓝本传教授业。在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后，为陕甘总督左宗棠襄理粮饷的袁文诚曾派员屯垦白渠两岸，并创办义学4处，以教回民子弟。既而又设宜善、临泾、甘延、金圭、广吉、瑞安、清流、临民等乡学10处，分布于泾阳县城及主要乡镇。另外，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光蕘禀复政府由赈灾余款中拨款筹立义学6所，其中扶风县1所，设午井镇；醴泉县1所，设烟霞洞；其余4所，设咸阳县之天阁村、马庄镇、魏家泉及西阳村。

义学一般均于门外悬挂匾额，中供至圣先师孔子牌位，旁挂义学规则木榜。公推首士1人（有捐资者则一般由捐资人充任），管理义学资产，监督义学事宜。义学一般延请塾师1人，招纳启蒙学生20至30人，对学童免收学费，塾师俸薪由义学的房田租课中支付，贫民子弟亦有机会就近免费上学。义学以识字为主，教材以《小儿经》、《小学诗体》、《圣谕广训》为主。学童读书到十四五岁时，加授农家事务知识，对个别成绩突出的学童，再由首士就近送入经馆或书院深造。

民国初年，义学逐渐消亡。

第三节 书院

一、书院建设

本地最早的书院是“学古书院”，于元延祐七年（1320）由邑人李之敬出资5万贯在三原县城兴建。首聘泾阳县名儒程瑁为主讲。程氏精研典籍，继承了汉儒的朴实学风，有名于当时，因其号“悦古”，人称“悦古先生”。书院初建，即有百余学者负笈求学。白慎独、张宏、胡贡诸名士，皆来此讲学。此书院元至正十八年（1358）停办，明弘治元年（1488）由邑人、吏部尚书王恕重建。此后开办达四百余年，至1915年停办。其间，关中硕儒李僕主讲书院（道光初年），得陕西督学张岳崧捐助千金，购置图书；贺瑞麟主讲书院时（同治七年），扩建藏书阁，采购图书七百余卷。此书院不仅是本地创办历史最久的书院，也是保存时间最长的书院。

明弘治八年（1495），王恕之子王承裕因病归里，假三原县北城永清坊普照寺废院建“弘道书院”，此书院为陕西最著名的书院之一。翌年（1496），经巡按御史李瀚时、提学副使杨一清提议，武功知县宋学通以宋人张载讲学之“绿野亭”于武功县城建“绿野书院”。稍后又在工部尚书康汝楫读书处建“东里书院”（因在县西原之东），以纳学子。明万历年间，三水人、吏部主事文在中辞官归里，在其家所在的半川府（今旬邑县太村镇文家村）创设“乐育书院”，日讲内圣外王之学，学子负笈从游者甚众，其文门子孙及邑中俊秀多从此进入仕途。万历年间，醴泉人郭玉柱于县城西北隅建“星聚书院”，明末时尚存。

清代前期，书院发展仍比较缓慢。主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深恐书院传播反清复明思想，曾诏令改书院为义学，并“不许别创书院”。尽管如此，本地邠州于清初曾创建“邠州书院”。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兴平知县张宏图于兴平县学东南创“槐花书院”（乾隆中更名“槐里书院”）。康熙五十七年（1718）提学使觉罗逢泰与知县刘铨捐俸于武功县城建“有邠书院”（乾隆中一度更名“静山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永寿县于永平里创建了“翠屏书院”。康熙六十一年（1722）书院开禁，雍正十一年始谕各省会设一书院。据雍正十三年（1735）编修的《陕西通志·学校志》，本地时有“学古”

(三原)、“弘道”(三原)、“绿野”(武功)、“乐育”(三水)等6个书院。乾隆五年(1740),泾阳知县康秉刚于学宫西侧建“瀛州书院”;乾隆十一年(1746),咸阳知县柴毕主持在县城西街建“渭阳书院”;乾隆二十一年(1756),醴泉知县于署东建“饮凤书院”(后一度更名“峻南书院”);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原县在邑人马理讲学处建“嵯峨书院”;乾隆间,淳化、三水及武功县还分别创建了“云阳书院”、“石门书院”及“西麓山房”。乾州“乾阳书院”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重建,当时陕西名儒高璇、顾麟、阎锡璜、杨舒、康睿、贾希适、王润、王万奎、梁式等,都曾在此讲学,特别是乾隆年间侍御史管斌若、太史路润生先后主讲于此,一时学风丕振,人才辈出在清代享有盛名。道光三年(1823),长武知县郑谦又创办“宜山书院”。至此本地各州县均创建了书院。

清代晚期,本地书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同治八年(1869),泾阳县于城内西北隅创建了有名的“泾干书院”。同治十二年(1873),经陕甘学政许振祜奏请,于泾阳县城内创建了有名的“陕甘味经书院”。光绪七年(1881),三原知县焦云龙在鲁桥镇创建了有名的“正谊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学政赵维熙奏请以陕甘味经书院“时务斋”为基础,创建了“崇实书院”。同年,刘光蕘于醴泉县九峻山南麓烟霞洞建“烟霞草堂”。邠州拔贡黄天相在邠州创办了“紫微书院”。据《乾州志》载,乾州还创办过“文明书院”。

各州、县的书院,清代以前多为民间创办,官方支持。清代中期以后,大部改为官办,鼓励民间资助。个别由私人开办的书院,如光绪年间,兴平人张元际(国子监学正衔)在其家乡庄头村创办“尊经堂”(后改名“爱日堂”,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避嫌改名“宏仁书院”),占地15亩,有房屋45间,以培养贫寒有志之士为宗旨,经历60余年,至1948年停办。此种书院,规模较小,名为书院,实似私塾。

规模较小的书院,如清乾隆年间淳化县创建的云阳书院,据《淳化县志》所附“云阳书院图”,头门之内,分讲堂、藏经阁、文昌阁三个院落,各院落两侧均有厢房数间。规模较大的书院,如三原县明弘治年间重建的学古书院,仅供士子讲读憩息的房舍即有大庭5间,读书室18间,居室12间。由于书院规模不同,学子的来源、数量及教学水平等,亦各不相同。

据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清末陕西五大著名书院中,除省会西安所设“关中书院”外,其余“宏道”、“味经”、“崇实”、“正谊”四个书院均在泾阳、三原两县。其中宏道书院创办历史最久、味经书院科举中式最多,崇

实书院讲授西学最早，正谊书院专讲闽洛义理之学等，均闻名全省，享誉西北。

二、教学管理

书院是学士文人讲学、生员应科举考试的进修场所。一般州县书院，学生一部分是秀才，一部分是未中秀才的文童。已中秀才的属“文生课”，以备应乡试为目标，每月来院听讲一次或两次，送文章、诗词请师修改，年龄不受限制；未中秀才的属“童生课”，以备应童生试而入州县学为目的。一般是经过考试合格入院读“四书五经”的童生，年龄在15岁以上。较有名的书院，则主要是“文生课”，以应乡试以至殿试为目标。参加“文生课”者，多不住书院，参加“童生课”者，则常年住院。

书院的办学宗旨和教学方法各有不同。创办最早的学古书院有一首《学古歌》，歌谓“读书贵勿取糟粕，博约二事宜兼举。立德立功并立言，三者不朽德为主。”“古人学古立大节，今人学古图华胥”。“处则学为君子儒”，“出则尽瘁于王庭。”此歌明白表示，书院读书要去粗取精，博约并举，立德为主，不图利禄。能出仕，要为国尽忠，不能出仕，就做个有德行的“君子儒”。这是书院由民间兴办时的办学宗旨。清代中期开放书院，改为官办后，除宏道、味经、崇实、正谊等著名书院坚持独特的办学宗旨外，大多数州县书院实际上均是以备应科举作为最终目标，并以此组织教学。清中期以后一般书院教学与管理同州县学已无明显区别，不少州县学的师长和学生同时也是书院的师长和学生。州县学几乎徒有其名了。

附表1-1：各州、县书院一览表

三、著名书院简介

弘道书院

弘道书院位于三原县北城，为明代三原北城人王承裕创建。初借僧舍作为讲学之所，题名“弘道书屋”。弘治八年（1495），因求学者众，众议募捐，遂假北城永清坊普照寺废院建“弘道书院”。

各州、县书院一览表

表 1-1

州 县	名 称	创办年代	创办人	地 址
三原县	学古书院	元延祐七年 (1320)	李之敬	县城西北隅
	宏道书院 (初名弘道书院)	明弘治八年 (1495)	王承裕	县北城
	嵯峨书院	清乾隆二十八年 (1763)		马理讲学处
	正谊书院	清光绪七年 (1881)	焦云龙	鲁桥镇北清凉垣
	崇真书院	清光绪十七年 (1891)	基督教会	福音村
	美丽书院	清光绪十七年 (1891)	基督教会	福音村
武功县	绿野书院	明弘治九年 (1496)	宋学通	县城绿野亭(张载讲学处)
	东里书院	明		县西原之东(康汝楫讲学处)
	有邨书院 (曾名静山书院)	清康熙五十七年 (1718)	刘 铨	
	西麓山房	清乾隆间 (1736—1795)		
三水县 (今旬邑县)	乐育书院	明万历年间 (1573—1620)	文在中	半川府(今太村镇文家村)
	石门书院	清乾隆间 (1736—1795)		县城
醴泉县 (今礼泉县)	星聚书院	明万历年间 (1573—1620)	郭玉柱	县城西北隅
	饮凤书院 (曾名峻南书院)	清乾隆二十一年 (1756)		县署东
	烟霞草堂	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刘光贲	县东北烟霞洞

续表 1—1

州 县	名 称	创办年代	创办人	地 址
邠 州 (今彬县)	邠州书院	清初		州城
	紫薇书院	清光绪间 (1875—1908)	黄天相	州城
兴平县	槐花书院 (后更名槐里书院)	清康熙三十八年 (1699)	张宏图	县学东南
	宏仁书院 (初名尊经堂, 后 一度改名爱日堂)	清光绪间 (1875—1908)	张元际	庄头村
永寿县	翠屏书院	清雍正十一年 (1733)		永平里
泾阳县	瀛洲书院	清乾隆五年 (1740)	康秉刚	县学宫西侧
	泾干书院	清同治八年 (1869)		县城西北隅
	陕甘味经书院	清同治十二年 (1873)	许振祎	县城东北隅
	崇实书院 (原名格致实学院)	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7)	赵维熙	味经书院东侧
咸阳县	渭阳书院	清乾隆十一年 (1746)	柴 毕	县城西街(今渭城区)
淳化县	云阳书院	清乾隆间 (1736—1795)		县城
乾 州 (今乾县)	紫阳书院	不 详		州城
	乾阳书院	清乾隆二十七年 (1762)		州城
	文明书院	不 详		不 详
长武县	宜山书院	清道光三年 (1823)	郑谦	县城

书院坐北向南，南北 40 丈，东西 20 丈，规模宏大，古朴典雅，其大门额题“仰高”，二门额题“恭敬”，三门额题“中立”，显寓培育英材、期待栋梁之意。

弘道书院以“父子亲、君臣义、夫妇列、长幼序、朋友信”为治学准则，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检验标准，把“赞化育、参天”视为弘道之极功，并依据朱子（熹）白鹿洞书院教条订立学规 20 条以约束诸生。书院有考经堂，藏书逾千卷。王承裕亲自授课，其父王恕致仕归里后，亦时至书院给诸生以指教。书院学生分 20 岁左右和 10 岁左右两种，有堂上学生与堂外学生的区别，均按勤惰及成绩优劣为升降标准。当时书院学生中出名者甚多，如康海、吕楠、马理、秦伟、郝世家、雒昂、张原、李伸、赵瀛、秦宁、王佩、李结等，均名振一时。

清乾隆时以避讳改“弘道书院”为“宏道书院”。清道光十年（1830），陕甘学政周之祜重修书院，使宏道书院成为陕甘（含今甘肃、宁夏、青海）两省学子深造之处。道光二十三年（1843），学政沈兆麟亦曾倡导各界捐资扩建书院。咸丰、同治年间，宏道书院一度大为发展。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颁布新学制，令改书院为学堂，陕西学政沈卫改宏道书院为“宏道大学堂”。

陕甘味经书院

陕甘味经书院位于泾阳县城内姚家巷，系清同治十二年（1873）陕甘学政许振祎奏建。书院以讲堂为中心，其前两侧各有号房 8 排，并有“时敏斋”、“日新斋”，朴素庄重，规模宏伟。光绪十一年（1885）扩建东院，增建了藏书楼、清白池、刊书处和售书处等。加以先有学政吴大澂筹银万两以增膏火，继有学政慕容干筹银三千生息资助，书院房舍宽敞，经费充裕，一时称盛。

味经书院创建之初，就与其他书院有所不同：一是其他书院专课时文（八股文），味经书院则以实学（切实有用之学）为主；二是其他书院除阅课外，师生不常接见，味经书院教师则日登讲堂，亲自授课，严于管教；三是其他书院全由官府掌管，味经书院则责成士绅经理，权不归官。

书院历任山长为史兆熊、赵宜煊、李尧、安维峻、柏景伟、刘光蕘等。刘光蕘号古愚，世称古愚先生。古愚先生自光绪十三年（1887）主讲书院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连续主讲味经书院达 12 年之久。在任期间，他不仅教授《朱子语类》、《资治通鉴》、《五礼通考》、“四书五经”及《大学衍义》

等传统经史、理学，并刊刻《梅氏筹算》、《平三角举要》等多种算学及其他科技类书籍，令诸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为了使学生学习天文知识，他建筑了“通儒台”，制晷造仪，令诸生观测天象；为了使学生会测绘技术，他鼓励学生参与由陕西布政使陶模主持的地图测绘。他于味经书院创建“求友斋”，致力于讲求西方新学；同时创建“时务斋”，专意研讨国内外大事。由于刘光蕘力主维新，遂使味经书院一改陈腐之气，成为近代少有的讲时务、重西学、开新风的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刘光蕘辞去味经书院讲席，味经书院渐失特色。

味经书院创办伊始，就明文规定禁食鸦片，禁赌博，禁群饮，禁骗诱、赊贷及禁闲游，对学习功课有严格的要求。光绪二十一年（1895），刘光蕘亲自为书院“时务斋”制订了“厉耻、习勤、求实、观时、广识、乐群”六条学规，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

味经书院以教学质量之高和培育人才之多闻名陕甘两省。据《味经书院志》载，从建立书院至清光绪十九年（1893）的21年间，书院在科举制度下，登第为“进士”的有18人，为“举人”的72人（不含已晋升进士者），其他登科为“副贡”、“优贡”者22人。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的李岳瑞、陈涛、杨蕙、张鹏一、邢瑞生、雷延寿等人，都是味经书院学生或刘光蕘的及门弟子。辛亥革命及民国时期，在西北军事、政治和科教文化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于右任、朱光照、茹卓亭、李子逸、王授金、冯孝伯、杨西堂、杨松轩、郭希仁、张季鸾、李仪祉等，都曾是味经书院的学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废科举、兴学堂”中，三原宏道书院改为“宏道大学堂”，陕西学政沈卫将味经书院、崇实书院及味经书院刊书处经费归并于宏道大学堂，味经书院遂行停办。

崇实书院

崇实书院位于泾阳县城内陕甘味经书院东侧，系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陕西学政赵维熙会同陕西巡抚张汝梅所奏建。原名“格致实学院”，翌年奉批改名“崇实书院”。陕西布政使张汝梅筹拨官银15000两以充经费，书院院址为泾阳县乡绅吴建勋所捐。

崇实书院是在陕甘味经书院“时务斋”基础上扩建的。书院分“致道”、“学古”、“求志”、“兴艺”四斋。

刘光蕘任崇实书院山长，主讲该院。课程注重格致、英文、算术、工艺制造等内容。曾分有“政事”、“工艺”二斋进行学习、实习及议论时局，并

曾将城郊南北二桑园作为教学实验场地。崇实书院不仅是陕西以至西北地区一所最早学习外国语的学校，也是一所最早讲授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的学校。

光绪二十八年（1902），崇实书院奉令归并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前后办学虽仅有6年，但同味经书院一起，对陕西近代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谊书院

清光绪七年（1881），贺瑞麟在“清麓精舍”基础上创设。书院位于泾阳县鲁桥镇以北之清凉垣（今属三原县境）。贺瑞麟号复斋，三原县北城人，中贡生后，绝意仕进，亲造“清麓精舍”，潜心研究程朱理学，并授徒讲学。同年，三原知县焦云龙筹集资金，在清凉垣建五间大厅一室，为贺瑞麟讲学之所，同时建宿舍20余间，土窑10余孔，为师生自修及憩息之所。三原县乡绅刘升之捐银2000两，发商生息，作为常年脩脯之供给，知县焦云龙又置水、旱田数十亩，作为书院日常之经费。书院另辟一窑为印刷局，时刊程、朱遗书（即世传《清麓丛书》），并依崖修成藏书洞三座，藏古籍数千卷，供士子学习。

书院以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办学宗旨，故名“正谊书院”。陕西巡抚冯誉骥曾为之题匾。书院初由山长贺瑞麟主讲，不延别师。专修洛闽义理之学，不以时文为务。清末时声誉颇高。关中名儒牛兆濂（蓝田人，人称“牛才子”）亦曾一度主讲正谊书院。

正谊书院为民间书院。来院学习者，食用自备。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后，大部书院改为学堂，学习官方编印的教科书，而正谊书院独树一帜，仍沿习理学，不随时俗。直到1948年停办，是陕西省保留到最后的一所有名的书院。

第二章 学前教育

第一节 学校建设

境内民众自古就重视幼儿的学前教育，1932年始有幼儿学前教育机构的

设立。建国后，1951年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正式将幼儿学前教育纳入国家教育计划，并把这种组织机构命名为“幼儿园”。1980年以来，大部分小学陆续附设了幼儿学前班。

一、幼儿园

1932年，淳化县立初级小学附设幼稚园（即幼稚园）1班，入园儿童10名。此幼稚园虽然规模较小，并于次年因战乱停办，却系本地民国时期创建的第一所幼稚园。1940年9月，三原县创办了县立城关幼稚园，该园分设两班，一在城隍庙内，一在东关善堂。1943年，枸邑县宝塔小学、张洪小学、庙底小学和太村小学等4所学校均附设幼稚园1班。在此之前，泾阳县城内之泾阳县第一高级小学、造士街小学、林桂巷小学及桥底镇之泾阳县第二高级小学等，均先后附设过幼稚班。1944年，国民政府公布之《国民学校法》第八条规定：“国民学校及中心国民学校均得附设幼稚园。”此令颁布之后，幼儿教育并无多大发展。先是1946年，兴平县在郭乡中心国民学校及长武县昭仁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均于校内附设幼稚园。同年，国立西北农学院附设幼稚园1所。1947年，泾阳县在县城老庙巷老爷庙内创办县立幼稚园1所。建国后，本地所办的幼儿园按性质可分为教育部门办幼儿园、企事业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三类。

教育部门办幼儿园

建国初期，坚持办下来的仅三原县幼稚园（后改称幼儿园）。1954年3月，咸阳市在城区创建了咸阳市幼儿园。此后，兴平（1956年）、泾阳（1957年）、彬县（1959年）、武功（1961年）、永寿（1968年）、旬邑（1973年）、淳化（1982年）等县陆续创办了县幼儿园或县机关幼儿园。1980年9月，咸阳地区在市内创办了中共咸阳地委机关幼儿园，后更名咸阳市机关幼儿园。1989年9月，咸阳市教育局又在新建的沈家小区创办了沈家幼儿园。至1990年底，全市共有此类幼儿园14所、65班，在园儿童3023名。

企事业办幼儿园

1949年5月，咸阳县解放，同年6月，咸阳纱厂（今陕西第八棉纺厂）创办幼儿班，是为咸阳城区企事业单位办园之始。至1953年，咸阳城区厂办幼儿园已发展到4所，在园幼儿279名。1955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工矿、企业自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规定》发布后，兴平县内的国营秦岭电气公司和国营华兴机械厂于1956年7月同时创办了幼儿园。随之，咸阳城区内一

些部、省属企事业单位，陆续创办了幼儿园。到1965年，城区已有厂办幼儿园13所，在园幼儿1453名。1973年以后，泾阳县棉纺厂等县属企事业单位亦陆续办起了幼儿园。截止1990年底，本地的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已达21所、118班，在园幼儿3489名。

民办幼儿园

1952年，本地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随着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建立，农村陆续办起了一批农忙幼托组织，这些幼托组织多称为“看娃组”，以保育为主。办得比较好的是长武县相公乡青年农民李世英自任园长的民办幼儿园。该幼儿园由小到大，越办越好，李世英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儿童工作者。中华基督教会陕西大会在三原县徐木乡福音村开办了一所幼儿园。该园设小班和混合班各1班，小班有三四岁的幼儿14名，混合班有幼儿30名。该园以保育为主。园内有园长1人，教养员1人，园务统一由教会经管。1955年底停办。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为解放女劳动力，本地各县按照中央教育部、卫生部、内务部关于幼托工作的联合通知精神，大力提倡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幼儿园和托儿所，如旬邑县当年即先后办起了农村“幼托园”29所。1958年7月22日，教育部转发江苏等省发展农村幼儿教育工作的四个材料，指出在当前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中，依靠群众大量发展幼儿园，更具有重大意义。同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应在3年到5年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在中央文件的号召下，本地各级政府结合贯彻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文教工作十二条奋斗目标》，大办幼儿园。如武功县当年帮助农业社办起537所临时幼儿园，彬县办起700所幼儿园，礼泉县办起786所幼儿园，淳化县办起248所幼儿园，其中淳化县入园儿童达7748名，约占全县应入园学龄前儿童总数的90.3%。兴平县仅27天，全县新办农村幼儿园744所，入园儿童达20922名，至当年年底，园数增至2592所，入园儿童达96899名。这些幼儿园多属季节性，农忙开办，农闲解散，条件一般比较简陋，幼儿均在家中食宿，不少是由老年妇女照管，仍以“看娃”为主。当时礼泉、彬县等县还要求幼儿园达到“四化”，即热炕化（或床铺化）、食堂化、卫生化和保育人员专业化。由于经济条件限制，这些要求并未真正实现。与此同时，本地城镇办起了一批街道幼儿园。据统计，仅咸阳市城区即有43所（43班），收有幼儿2334名。因系一哄而起，故办起不久，大都纷纷解散。到1965年时，仅存2所，有幼儿79

名。这些幼儿园大部分仍以“看娃”为主，与当时农村幼儿园无异。一般业务上受教育部门指导，行政上归街道居民委员会或街道办事处管理，属于集体性质。1960年，各级政府响应上级号召，纠正了幼儿教育重视数量、忽视质量，重视发展、忽视巩固的偏向，提倡群众办园，勤俭办园，坚持办下来的，条件都不同程度的有所改善。彬县北极公社南玉子生产队幼儿园本着服务社会、有利生产的原则，建立健全制度，幼儿园越办越好，受到了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的奖励。1961年，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农村集体办的幼儿园大部分停办。1966年，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妇女联合会转发了韩城县农村幼儿园的调查报告，本地兴平等县农村又相继办起了一些幼儿园，后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自行解散。“文化大革命”中，各县一度又提倡办农村幼儿园，如1974年，礼泉县在217个生产队办起了幼儿园和托儿所；1975年，旬邑县全县办起了147所幼儿园，入园儿童达2780名。这些幼儿园多数幼、托不分，有明显的季节性，往往流于形式。嗣后，随着“幼儿学前班”的产生和发展，农村集体幼儿园逐渐消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种形式的“专业户”出现，本地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乡村陆续开办了个体性质的幼儿园。至1986年底，泾阳县个体办幼儿园有21所，入园儿童612名；三原县个体办幼儿园有5所，入园儿童157名。这些个体办幼儿园多由初、高中毕业的女青年任教养员，接收3至6岁的幼儿，保教合一，给孩子们教唱歌、跳舞，组织游戏、讲故事，对五六岁的大孩子还教识字、计算，大都备有玩具、教具，坚持进行学前教育。这些幼儿园业务上由县幼儿园指导，经费由幼儿家长负担。大多开办不久即告解散。

二、幼儿学前班

60年代初期，随着普及教育的推广，本地一些耕读学校为了动员因家庭拖累重而失学的学龄儿童，允许学生带弟妹上学。长武等县适应形势发展，遂在有些小学附设了“学前耕读班”。一般招收五六岁的儿童，以“看娃”为主，教师报酬由生产队负担。1967年，淳化县固贤公社固贤村及铁王公社铁王、小池、寇家等村，在本村小学内附设了“红幼班”，招收5至7岁儿童入学。1969年，该县红幼班增至19班，在班幼儿329名，教师18人。这种红幼班在兴平等县又称“红小班”，与上述“学前耕读班”及附设于一些小学的“红幼班”一样，实际上均是幼儿学前班。武功等县1975年还专门召开

了学前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各生产大队的小学一律附设学前班，吸收4至6岁儿童入学。学前班教师基本由所在学校与生产队商定，聘请当地知识青年担任，报酬由生产队筹给，管理方式及教学方法大多类似幼儿园。由于学前班增加了农村幼儿入小学前接受学前一年教育的机会，为儿童入小学打下了基础，有利于普及小学教育，因而，在本地广大农村得到了较快发展。1979年，咸阳市（县级市）管辖范围内的农村幼儿学前班有46班，在班幼儿2194名，1980年增至167班，幼儿达5790名。经过整顿巩固，1986年时为114班，有幼儿3286名。由于幼儿学前班发展较快，一度出现了一些问题。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办好学前班的意见》的通知，本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贯彻这个文件时，针对部分学前班办班条件较差、师资缺乏专业训练及教育活动不甚符合幼儿年龄特点、存在小学化的缺陷等问题，结合实际，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学前班的管理。截止1990年底，本地附设幼儿学前班的小学有1964所，学前班总数达2238个，在班幼儿72558名，其中农村（不含县镇）1948班，在班幼儿60335名，约占全市在园幼儿总数的83.14%。

第二节 保教管理

一、保 教

民国时期，本地幼稚园入园儿童大都四五岁，以六周岁为限。每班二十或一二十名不等，有教养员一至二名（多为女性）。单独设立的幼稚园和学校附设的幼稚班，其幼儿食宿均在家中。园（班）内条件简陋，幼儿以游戏为主，辅以识字及简单的计算课程。大多无活动器具，较为完善的泾阳县立幼稚园亦仅有小皮球、跳绳、铁环等玩具。

建国以后，本地的各类幼儿园中，比较正规的是教育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所办的幼儿园。这些幼儿园入园儿童一般4至6岁，4岁编入小班，5岁编入中班，六岁编入大班，每班配备保育员1名，教养员（教师）2名。基本为全日制，部分实行半日制或寄宿制。1984年以前，幼儿园教材无统一规定，由各园教师自编自选教材。1984年起，选用全国统编幼儿教材，并根据教育部门颁布的《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及《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设置课程和安排课时。大中小班一般都开设语言（或称“认字”）、

计算、体育、音乐、美术（或称“美工”）、常识、故事、儿歌、认识环境及户外活动等课，不少幼儿园还把卫生习惯及思想品德作为教育内容，通过游戏、体育活动、上课、观察、劳动、娱乐和日常生活等各种活动，对幼儿进行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对幼儿在园内的睡眠、用餐、户外活动、作业、早操等的时间、次数，各园均参照1956年教育部公布的《关于幼儿园幼儿的作息制度和各项活动的规定》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很重视幼儿学前教育。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要求幼儿园对幼儿进行初步的全面发展的教养工作，并规定了幼儿学前教育的主要目标。1981年10月31日，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指出：3至6岁的幼儿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幼儿园的教育应该是向幼儿进行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使孩子们得以身心健康地活泼地生长，为入小学和造就一代新人打好基础。

70年代以来附设于各小学的幼儿学前班，其保教情况与教育部门办的幼儿园大体相似。幼儿学前班均由所在学校列入教学工作计划，一些办得较好的学前班都注意把发展幼儿智力、培养幼儿良好的道德品质及生活、卫生习惯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同时还教给幼儿一些生活中的常识，注意发展幼儿的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语言的表达能力，培养幼儿对学习的兴趣和良好的习惯。学前班基本招收本学区五六岁的幼儿入学，每班一二十至四五十人不等，配有班主任1人，有二三个班的另配有专职教体育、音乐、美工的教师1人。一般开设语言（口头表达）、计算（口头计算）、常识、体育、音乐（唱歌）、美工等课程，每节课35分钟左右，课后均有1课时的游戏活动，全天在校时间多为6小时。各科教学大纲及教学内容，原则上按照1980年12月教育部颁布的《幼儿教育纲要（征求意见稿）》实施，其中一些学前班还进行拼音教学（只教声、韵母，不教音节）的试验，并教100—150个常用汉字，计算20以内的不进位加法、不退位减法。学前班期中、期末均不进行考试，一般只在学期结束时进行口头测试或写一简单评语。其教育方针是保教并重，和一般幼儿园基本相同。

二、管 理

民国时期幼稚园，其单独设立的，一般由县教育局管理，附设于小学的，则由所在小学管理。

建国以后，除教育部门办的幼儿园全部由教育部门管理外，各企事业单位及城乡集体和个体所办的幼儿园，主要由办园单位和办园者管理，教育部门只负责业务指导。村和街道办的幼儿园则直接由主办的基层单位领导。园内一般配备园长、教师（教养员）、保育员及医务和杂勤人员。园长为园内主要领导，负责园内的全面工作。园内订有各项管理制度，特别是80年代中期教育体制改革之后，各幼儿园都先后建立了园长、教师、保育员及医务人员的岗位责任制，普遍建立和健全了保教员值班制度、环境卫生制度、幼儿个人卫生制度、儿童健康检查制度、家长联系制度、膳食管理制度、预防接种制度、消毒及隔离制度和安全制度等管理制度。

第三节 著名幼儿园简介

三原县幼儿园

三原县幼儿园前身为三原县城关幼稚园，创办于1940年，至建国前，共毕业10班、282名幼儿。1957年迁至城内东大街，1959年由整日制改为寄宿制。1960年三原县保育小学成立后，幼儿园改为保育小学幼儿部，1963年保育小学撤销，恢复原名。该园一直属县教育行政部门领导。1986年底有大班2个、中班3个、小班2个，在园儿童312名。1990年，有职工26人。多次受省、市（地）、县奖励，1983年被评为“三八红旗集体”，受到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妇女联合会及全国妇女联合会表彰。

泾阳县幼儿园

泾阳县幼儿园初名泾阳县城关幼儿园，创建于1957年，园址在县城内前街一家旧茶店偏院，用10余间旧房改建，招收幼儿100名，分大中小班，有11名保教员。实行整日制和寄宿制交替。1959年，泾阳归并于三原县，幼儿园改称三原县泾阳人民公社城关幼儿园。1961年恢复泾阳县建制后，园名依旧。是年泾阳县成立保育小学，幼儿园并入该校为幼儿部，园名取消。其时有幼儿85名，保教员8人。1966年8月，保育小学更名泾干小学，幼儿部分出，迁至城内老庙巷，恢复原名。1969年，因“文化大革命”干扰，幼儿园保教人员回本生产队任教，幼儿园停办。1975年在县城粮集巷选址重建幼儿园，投资15万元，占地5.67亩，建成幼儿活动室36间，职工宿舍20间，其他房屋7间。1978年底竣工，1979年3月招生。至1986年，共设大中小班5个，在园儿童204名，有保教员30人，其中专任教师12人。1960年，获陕西省人民委员会、陕西省总工会、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的奖

励，园长戴国群被评为幼儿教育先进个人，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女联合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及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的奖励。1969年以来，又先后荣获省、市（地）、县“模范幼儿园”及“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第三章 小学教育

第一节 学校建设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学中学、西学的学堂。此后数年间，本地各州县根据《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及《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在改书院为高等小学堂的同时，陆续设立了一些不同类型的初等小学堂。这些小学堂有官立的，有公立的，也有不少私立的。这些各种类型的小学堂，即是本地近代小学教育之始。

一、官立小学堂、公立小学堂、私立小学堂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小学教育分蒙学堂、寻常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把蒙学堂改为属于学龄前教育性质的蒙养院，小学教育只分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两级，两级都得单独设置。宣统元年（1909），学部又颁布了《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分初等小学为五年完全科、四年简易科和三年简易科三种，缩短了初等小学堂的年限，本地的小学教育遂有了进一步发展。

官立小学堂

官立小学堂分官立高等小学堂、官立初等小学堂两种：

官立高等小学堂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泾阳县改“瀛洲书院”为蒙养学堂，改“泾干书院”为高等小学堂。二十九年，醴泉县改“峻南书院”

为“峻南学堂”，永寿县改“翠屏书院”为“养正学堂”。三十年，醴泉县改“峻南学堂”为高等小学堂，三原县将“学古书院”改建为高等小学堂，兴平县将县考院改建为高等小学堂。三十一年，永寿县改“养正学堂”为高等小学堂，三水县（今旬邑县）改“石门书院”为高等小学堂，武功县改“绿野书院”为高等小学堂。三十二年，咸阳县改“渭阳书院”为高等小学堂，长武县改“宜山书院”为高等小学堂，淳化县改“云阳书院”为高等小学堂。乾州（今乾县）于三十年在“乾阳书院”设中学堂不久，即改名高等小学堂。泾阳县于三十二年将官立高等小学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同时将“蒙养学堂”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泾阳县官立高等小学堂有甲、乙两个班，41名学生，4名教员。兴平县于改建高等小学堂之前，知县杨宜瀚曾资遣邑贡生张元际及候选训导张渊赴沪考察学务，归来办学。因其建筑、管教多符程式，当时入学者极为踊跃。

官立初等小学堂 在建立官立高等小学堂的同时，本地各州县普遍设立了官立初等小学堂。这种初等小学堂一般每个州县至少有1所，带有示范性质，如长武县称“初等模范学堂”、武功县称“模范小学堂”。当时官立初等小学堂办得最多的是泾阳县。据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学期统计表，该县有官立初等小学堂20所，校名均按顺序排列，称“官立第一初等小学堂”、“官立第二初等小学堂”，直至“官立第二十初等小学堂”，共计24班，在校学生613名，教职员40名。至清宣统三年（1911）时，该县官立初等小学堂增至27所。

公立小学堂

公立小学堂分为公立高等小学堂、公立初等小学堂和公立两等小学堂共三种：

公立高等小学堂 公立高等小学堂与官立高等小学堂的重要区别，是公立者经费一般由联合办学的地方共同以公款支付，地方政府略有补贴，官立者经费均由官府从地方财政中支付。公立高等小学堂不是各县都有，仅见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县份。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原县乡绅孙汉清等在福音村建立公立高等小学堂1所，岁支银360两。

公立初等小学堂 公立初等小学堂初称公立寻常小学堂，多由旧义学改建，数目较公立高等小学堂为多。如三原、醴泉二县各有40所，淳化县35所，武功县22所，长武县9所。泾阳县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学期有14所（21班），栒邑县宣统二年有（1910）21所。最多的乾州，有80所。然据

1941年范紫东《乾州新志·教育志》载，其时乾州一般初等小学堂“但略具规模，与学章多不合。盖师资缺乏，学款无着，势使然也”。当时各县公立初等小学堂一般借庙立学，规模较小，经费主要由地方筹措。

公立两等小学堂 两等小学堂即高、初两等小学堂合而为一的学堂，类似后来的完全小学。此类学堂较少，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十六，本地仅三原县乡绅刘宗宴等于清宣统元年（1909）在东里村创建1所，岁支银700两。余均不详。

私立小学堂

私立小学堂分私立高等小学堂、私立初等小学堂及各类简易小学堂三种：

私立高等小学堂 私立高等小学堂不多，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十六，本地仅三原县乡绅刘昌晋于清宣统二年（1910）在东里村创建私立女子高等小学堂1所。岁支银300两。余均不详。

私立初等小学堂 私立初等小学堂各地多少不同。其中有的县较少，如兴平县仅有2处，一为老瓜嘴武进士杨发枝所立，一为齐家寨农民张光祖所立。有的县较多，如泾阳县有24所，枸邑县有34所。当时实行男女分校，女学极少，除三原县东里村由乡绅胡评建立的私立初等女学外，尚有乾州城小东巷由邑人李守先与诸同人建立的私立初等女学堂。关于此事，范紫东《乾州新志》记载说：“女学堂虽有定章，然阻力甚大，进行颇难。官家并未着手举办，……省西北各县之女学，实以此为最早云。”

简易小学堂 清宣统元年（1909），学部颁布《变通初等小学章程》，分初等小学为五年完全科、四年简易科和三年简易科三部。这些简易科基本上属于私立初等小学范围，教学条件又比一般初等小学堂为差，多数实行复式教学，规模较小，类似学塾。

同年，学部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次年又颁布《改良私塾章程》，咸阳、三水、长武等县均设立过“简易识字学塾”，并对原有的一些义学、家塾、门馆进行了改良，建成了一批“改良私塾”。如三水县清宣统二年（1910）对县内21所义学、家塾、门馆改良后，将其中3所改为简易识字学塾。简易识字学塾注意招收年长失学及贫寒子弟无力就学者，年限一般为1至3年，学习科目要求为“简易识字课本”、“国民必读课本”和“浅易算术”（珠算或笔算），并酌授体操。因条件限制，本地多数县的简易识字学塾课程设置与同等初等小学堂或四年、三年简易科相似，实为不发达的初等小学堂

的一种补充形式。

清末本地的各类小学堂大都延至中华民国初年。其设立时间虽仅数年，但较私塾、书院是一大进步，不但教学内容有了更新，而且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上课，有了明确的教学计划，对小学教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公立小学、私立小学、边区小学

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对清代的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读经讲经，刷新了教学内容，明令女子有受教育的权利，并将“小学堂”改称为“小学校”。1922年，北洋政府又颁布“新学制”，改“等”为“级”，次年又去“校”字，各高、初等小学堂遂改名为高、初级小学。

民国初期，本地灾荒连年，战乱不已，小学教育发展极为缓慢。1927年，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积极推行“强迫教育”，并发表了《强迫教育宣言》。《宣言》的发表，对本地小学教育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以当时咸阳县为例，此前只有各类小学100所，在校学生1802名，占全县学龄儿童15%；实施“强迫教育”后，小学发展到203所，在校学生达4518名。

1929年至1933年间，关中大旱，瘟疫流行，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本地不少学校停办，学生辍学。1933年后，随着灾情缓解，学校教育有了相应的恢复和发展。以泾阳县为例，1929年至1933年时，因灾害频繁，创办于1922年的泾阳县第二高级小学停办，闻名本地的泾阳县第一高级小学与泾阳县国民女子小学（即“香凝女子小学”）学生亦寥寥无几，初级小学由原有的90所左右锐减到29所。1933年后，泾惠渠告成，学校迅速发展，初级小学上升到150余所，并兴办了1所私立完全小学。

1935年，教育部颁布了《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广泛推行义务教育。当时本地各县均采取了相应的贯彻措施。咸阳县分每一保为一小学区，每一小学区设普通小学两班。次年实施保甲制度，改普通小学为保立小学（简称“保小”）。该年度第二学期，全县已有县立完全小学7所，其中教职员46名，在校学生1171名；保立初级小学94所，其中教职员179名，在校学生4916名；学龄儿童入学率达47%，较1932年提高11%。本地推行义务教育较为得力的还有武功县。1937年，该县通过的县教育助理员提案要求全县7岁以上儿童必须入学。1939年2月，县政府又明确规定：“凡八岁以上儿童不分男女，一律强迫入学。”为此规定每保划一小学区，每联保划一联

合小区，由保长和联保主任充任校长，实行“政教合一”。是年全县小学增至194处，在校学生达7822名，适龄儿童入学率占32%。

1940年11月，教育部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随之省教育厅颁布《陕西省普及乡镇中心学校及保国民学校办法》，本地各县于1941年均奉令实施国民教育，改完全小学为中心国民学校，保立小学为保立国民学校。1945年3月，本地各县又奉教育厅令，将各乡（镇）中心国民学校改名为某某乡（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分校改名某某乡（镇）第二中心国民学校。此前，于1939年，省政府划本地枸邑、淳化、长武、邠县、泾阳、三原等县为“特种教育施教区”，校名前均冠以“中山”二字，称“中山中心国民学校”和“中山保立国民学校”，专拨教育经费，编印各种“特种”小丛书及“特教”课本，实施“特种教育”，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宣传（1946年4月实施“特种教育”，各县方奉令取消小学名称前“中山”二字）。

民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实施国民教育以来，由于本地一些志士仁人和社会贤达的热情倡导和艰苦努力，小学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陕西省三十学年度办理国民教育优良事实表》，1941年，咸阳、醴泉、泾阳3县已有小学校705所（其中中心学校41所），班级868个（其中高级93个），教职员955名（其中中心学校262名），学生31091人（其中高级2984人）。据1943年2月22日和6月30日教育部指令，陕西省教育厅呈报全省办理国民教育成绩优良县为咸阳、富平、醴泉、扶风、泾阳5县，其中咸阳、醴泉2县因成绩“最优”，各得部颁奖金7000元，泾阳县成绩“略次”，部令省厅传令嘉奖。总的来看，小学教育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至1949年本地解放前夕，各县仅有不同类型的小学校约2404所，其中公立中心国民学校约179所，国民学校约2192所，其他学校约33所，小学生总数仅100234人。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不足40%。与此同时，本地隶属于陕甘宁边区领导的老解放区还创办了一批公立小学、民办公助小学以及民办小学，这些小学适应战争和生产的需要，为边区培养了不少革命人才。

公立小学

公立高级小学 公立高级小学的前身多为清末的官立和公立高等小学堂，亦即民国初年的高等小学校。这种高级小学经费由政府拨给，一般设于县城或文化较为发达的乡镇。1941年，本地实施国民教育后，有的县将公立高级小学扩充为完全小学，称为公立中心国民学校。

公立初级小学 公立初级小学的前身为清末的官立或公立初等小学堂，亦即民国初年的公立初等小学校。1937至1938年间，本地推行“义务教育”过程中，各乡（镇）及保奉令成立建校委员会，拟定建筑预算，呈县核定，就地募捐。于是，初级小学普遍设立。1941年，又实施“国民教育”，各乡（镇）及保极力创办初级小学，并多称之为“保立国民学校”（简称“保校”）。至1942、1943年，本地醴泉县建成以保立国民学校为主的初级小学196所，乾县建成193所，咸阳县建成192所，兴平县建成180所，武功县建成138所，邠县建成137所，永寿县建成106所，栒邑县建成80所。这些学校所需木料、砖瓦多由拆除的旧庙而来，或系由旧庙改建，条件均比较简陋。其经费主要由乡（镇）和保内自筹，然后县政府适当给予补助，属于公立学校。

公立中心国民学校 公立中心国民学校含高级小学和初级小学两部分，类似清末的两等小学堂。虽然大多数创设于1941年实施国民教育之后，然其前身基本上为各乡镇逐步发展起来的联保小学或私立完小。由于这些学校学级比较完全，又建于文化较为昌明的乡镇，遂名符其实地成了当地诸学校的中心。这种中心国民学校的经费，一部分由政府拨给，一部分由地方筹措，直隶于乡镇，有的直接由乡长兼任校长，明确属于公立学校。

中心国民学校一般每一个乡镇设立一所，但也有因条件限制，几个乡镇合设一所，或文化比较发达，一个乡镇设立两所的。中心国民学校前面均冠以乡镇名称，如设于邠县民乐镇城内东街的称“民乐镇中心国民学校”，而设于民乐镇大西街的，则称“民乐镇中心国民学校西街分校”。1945年3月后，各乡镇有两所中心国民学校的，其主校又改称为某某乡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分校称为“第二中心国民学校”。若属“特种教育”区的，“中心”二字前还须加“中山”二字。据统计，自1941年本地实施国民教育，至1943年，咸阳县有公立中心国民学校18所，泾阳县13所，三原县12所，醴泉、兴平县各11所，邠县10所，武功、栒邑、乾县各9所，永寿、淳化县各7所，长武县4所。

短期小学 1936年，本地各县根据《陕西省二十四年度推行义务教育数量及经费筹措办法》，成立了一批短期小学。短期小学属于公立，挂校牌，均附设于公立小学内，只设初级部，学制四年，经费由上级拨发，入学对象为15岁以下失学学龄儿童。当年咸阳县有短期小学99所，在校学生2970名。长武县有13所，其中县城内两所：一在北胡同原圣母庙内，有学生四十

余名，混合编班，复式教学；一在东街昭仁寺内，有学生二十余名。其余 11 所分别设于 4 乡镇和强村、马成寺、柳泉、牛王、柴厂、彭公、地掌等村。其他各县情况不详。短期小学因系奉令突击创设，时间不长，即纷纷解体。

私立小学

私立小学多为地方绅士和社会贤达创办，各县发展情况不同。兴平县 1914 年在“明经学堂”基础上创办“私立双山小学”，1934 年在县城西街北寺创办“私立北寺小学”，次年王鼎三（王作霖之父）在店张驿创办“私立作霖实验小学”，1939 年 9 月，方向知（杨法震遗孀）在庄头乡仪空镇南草堂寺创办“私立法震小学”，至 1949 年 1 月，兴平全县共有私立小学 13 所。武功县 1921 年由驻军将领杨虎城拨款创办“私立新民小学校”（于右任题写校牌），1922 年在薛固镇创办“私立启明小学”，1931 年在长宁镇创办“私立长宁小学”，在贞元乡创办“私立明日小学”，在河道村创办“私立民生小学”，1937 年在普集镇创办“私立俊生小学”，1941 年实施国民教育后，该县所有私立小学统一改成了乡镇中心国民学校。醴泉县 1917 年创办“私立健行小学校”，1928 年创办“私立新民小学”，两所皆在县城，后均改为高级小学。长武县 1931 年前后在县城创办“私立维新小学”，1933 年创建“昭仁私立实验小学”，1940 年胡蕴章创办“私立广仁小学”。乾县 1917 年，黄文轩于神坊村藉兴教寺创办“私立务本小学校”（1931 年改名“私立建国小学”）；1918 年，张对山、刘照青在龙岩村创办“私立自强初级小学校”；1923 年，吴愚若假兴国寺创办“私立乾阳高级小学”；张月亭、胡荣斋等于泔河北岸龙王山村创办“私立泔泉小学”；1934 年，旅省同人刘文伯、胡性安等人移其 1922 年在西安创办之“私立敬业小学校”于乾县城内高庙巷；1934 年，梁文典在陆陌村创办“私立蔚园小学”；史襄城、史赞铭在北上官村南大庙创办“私立襄铭初级小学”。上述诸校，有的办学时间不长，至 1939 年时，乾县全县仅存 3 所。泾阳县 1914 年创办“私立女子初等小学校”，1931 年前后由于右任创办“私立思恭初级小学”，1934 年由毛念修创办“私立竞志小学”，崔贯一创办“私立培英初级小学”，1938 年创办“私立东北小学”，1948 年王耀西创办“私立新民小学”，牛锡群、杨亚民创办“私立太白小学”。三原县私立小学发展最多，1934 年时，全县 5 所完全小学中，即有“私立察院巷小学”（后改称“私立克强小学”）、“私立民治小学”、“私立中山女子小学”和“私立崇德小学”等 4 所，此 4 所私立完小均在县城，县城同时还另有私立初级小学 6 所。1939 年时，三原全县 10 所完全小学中，除原

有4所私立者外，新增了“私立普育小学”、“私立靖国小学”、“私立崇美小学”、“私立益华小学”等4所。私立完全小学占全县完小总数的五分之四。该县1942年私立小学增至9所，1949年时降至7所，其余各县亦均办过数量不等的私立小学。

私立小学有单设高级班者，有单设初级班者，有并设高、初二级者，亦有先单设初级、后办为完全小学或升为高级小学者。时间或长或短，各不相同。这些私立小学往往系有识之士办理，办学较有经验，大部在县城之内。其高级小学或完全小学，皆能较严格地按部颁标准课本，多级单式进行教学，教学质量较高。如于右任创办的“私立民治小学”、崔贯一创办的“私立培英初级小学”、方向知创办的“私立法震小学”等，即为此中佼佼者。

此外，本地一些社会团体及行业亦办过一些小学，这些小学都属于私立小学。比如，1917年前后，设在兴平县庄头乡南于村的天主教堂于其东侧创办南于初级小学，有学生32名，经费由教会统筹。基督教会办小学以三原县福音村基督教堂所办的私立崇美小学最为有名。此外，兴平县基督教会于1924年在县城西街创办了振德女校、振德男校两级小学，该校隶属于基督教陕甘委员会，有学生三级、65名，教师2人（均属教徒）。该校除讲授国家所颁基本课程外，还讲授《圣经》。经费主要依赖教会所收部分房租。1949年时学生增至70余名，教员增至3人。另外，兴平县基督教自立会于1932年创办了桑园基督初级小学校，校址在桑园福音堂，教师多为教徒，学生最多时有40余名。经费主要依赖教会的30亩地租。1929年时，丹麦牧师杨明轩在长武县福音堂创办了“福音堂初级小学”。这些基督教会办的小学，一般都办至当地解放。此外，咸阳慈善会及咸阳花行、咸阳火车站亦办过小学。1932年，咸阳县慈善会在县城内创办初级小学1所，有学生11名。1936年，咸阳县城内花行会馆创建咸阳县花行公立初级小学，招收初级班两班，有学生52名，为复式教学。1937年8月，咸阳火车站创建了咸阳扶轮小学，招收铁路职工子女入学。

边区小学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淳化县北部东线区桃渠原建立了淳耀县苏维埃政府，11月，在西线区马家山建立了赤水县苏维埃政府。是年，在枸邑县建立了新正县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设有文化部，专司文化教育工作。1936年，赤水县苏维埃政府迁往今旬邑县马庄村后，即在原民办初级小学的基础上，成立了一所完全小学。1937年，新正县第一完全小学在今旬邑

县东牛坡村建立。同年，赤水县在今淳化县长畛寺建立了“救亡小学”，1938年，赤水县在今淳化县十里原建立了“抗日小学”，在今旬邑县清水原建立了“解放小学”。1939年5月，淳耀县在今淳化县安社村创建第一所完全小学。1939年春，因国民党军队侵犯边区，赤水县的“解放小学”迁往长畛寺，与“救亡小学”合并。同年6月，两校又迁往十里原乡蒙家村，与“抗日小学”合并，校名更为“赤水县联合完全小学”。与此同时，边区政府还与人民群众共同努力，在艰苦的环境下，创办了一批初级小学。边区小学主要分为公立完全小学、公立初级小学、民办公助小学和民办学校四类：

公立完全小学 公立完全小学是由边区政府所办的完全小学，如上述赤水县苏维埃政府在今旬邑县马庄村办的完全小学，在今淳化县长畛寺、十里原、清水原办的“救亡小学”、“抗日小学”、“解放小学”，新正县苏维埃政府在今旬邑县马家堡村及东牛坡村办的完全小学，淳耀县苏维埃政府在今淳化县安社村办的完全小学等。

公立初级小学 公立初级小学由苏维埃政府派遣教师，并发给津贴（小麦或小米若干斤）。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实施强迫教育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小学六年为义务教育，凡学龄儿童，不分性别及家庭成份，一律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并辅之强迫办法。其时，边区政府刚刚建立，经费极为短缺，群众生活也很困难，强迫入学难以实施，不久，遂改为努力办好学校，吸引学生入学的办法。此后，这类公立初级小学发展较快，但因条件限制，有的仍属识字班性质。

民办公助小学 民办公助小学是边区政府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和边区群众需要而办的初级小学。这种小学是边区的主要办学形式。其中有的是由政府指派的教员所办的学校，有的是相邻的数村联合创办，报请上级批准的学校，有的则是政府干部自发利用工作间隙所办的学校。这些学校一般都按照边区政府规定的课程和教材进行教学，受边区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经费主要由当地群众筹措，属于民办公助。其教学效果虽比不上公立小学，但却比一般民办学校为好。

民办学校 民办学校是由群众自请教师、自筹资金而办的学校。这种学校用啥学啥，如开路条、写标语、记地亩帐、识农用杂字等，没有课本，没有一定年限，随来随教，年龄不限。教师教学生念书，学生帮教师种地，上级只负责教师的业务培训和教学管理，不承担学校经费和教师津贴。

三、教育部门和集体办小学、其他部门办小学

1949年2—7月，本地各县相继获得解放。原国民党统治区的所有学校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陆续交由新成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各学校遵照上级关于“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指示，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人民政府要求原有教职工（除个别者外）一律照常供职。取消原“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校名前“省立”、“县立”等字样，统一改为“完全小学”和“初级小学”，并按新的行政区划名称与编号命名。当时沿袭解放前的办法，原则上采取完小公办、初小民办的方针，大部分初小仍为民办。同年9月，各地均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精神，开始以老解放区办学经验对旧学校进行改造，如废止“公民”、“党义”等内容反动的科目，更新语文、算术等课教材，废除训育制度与体罚等，使小学教育迅速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轨道。

1950年4月，为恢复国民经济，本地各县对学校普遍进行了精简整编。当时在一个学校内，同年级凡不足50人者并班上课；单班不足50人者并入附近学校上课，人数不足而不能归并者，与其他年级实行复式或二部制教学；音乐、体育、美术及政治课一律采用合堂上课，以节省人力。经过整编，学校和班级数虽有所减少，但随着经济逐步恢复发展，学生数迅速增加。截止1957年底，本地公办、民办、企业办小学发展到3362所，在校学生达297424人。1958年5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即全日制学习、劳动制与半工日制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各类小学越办越多。到1959年，本地小学校数和学生数由1957年的3362所、297424人增至4429所、504339人，适龄儿童入学率由50%左右增至80%左右。小学校数和学生数猛增，而其他办学条件一时跟不上，加之学校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过多，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接着，1959至1963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小学教育的发展又受到一定影响。1962至1963年，本地各县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合理调整了学校布局，适当合并了班级，压缩了教职工人数，教育秩序渐趋正常。1963至1965年，本地各县市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动员群众兴办了不少耕读小学，小学教育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咸阳市 1949 年解放前夕小学教育概况

表 1-2

县名	中心国民学校数 (所)	国民学校数 (所)	其他学校数 (所)	小学校总数 (所)	小学生总数 (人)
合计	174	2312	34	2520	108632
咸阳	21	207		228	11262
兴平	17	204	17	238	10606
武功	16	156		172	10105
醴泉	15	386		401	14991
乾县	21	254	9	284	12184
永寿	7	125		132	3927
邠县	10	131		141	5661
长武	7	108		115	5547
栒邑	7	153	1	161	6996
淳化	3	168		171	5242
泾阳	23	253		276	11978
三原	27	167	7	201	10133

- 说明：
1. 本表不包括边区小学。
 2. “其他学校数”统计不全。
 3. 咸阳县含今秦都、渭城二区。武功县含今杨陵区部分。
 4. 邠县为 1949 年 10 月统计数；栒邑为 1950 年整编前统计数；淳化为 1949 年统计数。

1966 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开始，各校陷入混乱状态。因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领导班子瘫痪，教师不能上课，学生中断学业。1967 年 3 月，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各校虽然开始上课，但干扰太大，“复课”徒具形式。1968 年冬至 1969 年春，本地各县市响应中央号召，学习山东省教育工作者侯振民、王庆余关于将公办小学下放到生产大队来办的建议（即“侯王建议”），广大公办教师被迫返回原

籍任教，取消了工资待遇，实行工分加补贴。1970年，向农村学校派遣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贫宣队”），向城镇小学派遣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贫宣队”和“工宣队”主要领导师生搞“斗批改”（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重视文化课教学。当时，在“教育要革命”的口号下，各县市不顾客观实际，村村办小学，不少初小升为完小，完小又戴上初中的帽子，变成七年制学校。学校层层升格，教师层层拔尖，教学质量普遍降低。1972年，各学校一度重视了教学质量，但到1973年，即被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初步好转的教学秩序又遭到了破坏。1973年，在贯彻《全国工作会议纪要》的过程中，各县市均把普及五年制小学教育作为教育工作重点，坚持多种形式办学，要求“学生上小学不出大队”，一时，学校和学生数又急骤增加，由于不少学校办学条件较差，教学质量普遍下降。1974年坚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校“学工”、“学农”时间过多。1975年又推广“朝农”（即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经验，实行“开门办学”，不少学校实行“厂校挂钩”、“校队挂钩”，影响了文化课教学。

1976年10月后，小学教育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1977年“工宣队”和“贫宣队”（后改称“贫管会”）退出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逐步恢复。1978年以后，各县市普遍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忽视小学教育的偏向，加强了对小学的领导，稳定和整顿了教师队伍，确定了一批重点小学。对大部分小学采取撤班并校的办法，逐步摘掉了一批七年制学校中的初中班帽子，撤掉了一些小学的附设初中班。1981年再度调整学校网点，逐步将各社镇重点小学改为中心小学。1983年，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改革农村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及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各县市集中力量，有效地进行了理顺农村教育事业的“四定”（即定校数、定校址、定规模、定编制）工作，调整了学校布局，节省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为小学教育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4年，各县区普遍改革管理体制，下放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同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群众办学热情空前高涨，全市所有小学基本实现了“一无两有”（即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校容校貌焕然一新。1985年，咸阳市提前三年全面完成了普及初等教育任务。

1987年，各县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陕西省义务教育实施办法》的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实施义务教育。兴平县冉庄乡

成为全省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乡。截止 1990 年底，全市共有小学 3545 所，班级 18659 个，在校学生达 509242 名，学龄儿童入学率为 98.40%，1989 年在校学生巩固率为 98.13%，1990 年毕业率为 97.55%。

教育部门和集体办小学

教育部门和集体办小学，分为公办完全小学、公办初级小学、民办小学及耕读小学四种：

公办完全小学 本地解放后，原公立小学随即改为公办小学，由各级人民政府教育部门管理。不久，一些私立完全小学也由政府接收，改为公办小学。公办完全小学是公办小学的主体部分，解放初期称“完全小学”（简称“完小”），其前冠以新的区（或乡镇）名和学校序数，有的县后来以地名作为小学校名。1958 年人民公社化后，本地广大农村的公办小学大部下放给公社管理，原公办小学的校名亦加上了某某公社的名称，教育部门只负责业务指导。一些完小自 1956 年后陆续附设了初中班，俗称“戴帽小学”，“文化大革命”期间，又称为“七年制学校”或“八年制学校”，1978 年后，陆续摘掉了“帽子”，恢复为单设完小，并于各公社确定了一所完小为重点小学。1982 年，改各公社重点小学为中心小学。人民公社改为乡后，又改称某某乡中心小学。中心小学负责辅导本学区其他学校的教学工作，大部分公办完小按照教育体制改革方案，交给了乡镇管理，变为集体办（即民办）小学。

公办初级小学 本地解放初期，原有的公立初级小学均为人民政府接收。除先后转为民办外，仍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公办初级小学，如长武县至 1956 年时，全县 128 所小学中，仍有 17 所公办小学，其中大部分为公办初小。1956 年，在国家办学的同时，提倡群众办学，一些县将小学交还民办，到 1958 年，交还民办的小学逐渐增多，如长武县当时共有小学 154 所，其中转为民办的已达 46 所。这种转为民办的小学，多数为初级小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城镇原有的公办初小陆续办成了完小，单设初小主要分布在农村。1969 年，包括初小在内的所有农村公办小学均下放到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来办，由贫下中农代表组成的“贫管会”管理。1971 年虽然收回了下放的公办教师，大部分学校仍由民办。1984 年前后，本地各县区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农村初小普遍改为村办乡（镇）管，成了集体办（即民办）初小。公办初小趋于消失。

民办小学 解放初期，本地一些县采取了完小公办、初小民办的方针，大部分初小交由民办，如 1951—1952 年，邠县有公办完小 11 所，民办初小

即有 167 所。1953 年，陕西省政府通知，各县民办小学一律改为公办，经费由政府供给。1956 年，根据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指示，各县又将所有公办普小交给民办。1958 年，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国家办学和群众办学并举，民办小学迅速发展，如长武县 1958 年全县 154 所初小中，民办初小由 1956 年的 11 所增至 46 所。1961 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一些县实行公、民办分家，初小全部移交民办。如经过整顿，至 1965 年时，兴平县公办小学为 62 所，民办小学为 153 所；三原县公办完小为 39 所，民办普小为 282 所，同时还有民办高级班 12 所。1968 年 11 月，各县市响应中央号召，学习“侯王建议”，农村公办小学全部下放到生产大队来办（后来改为乡镇或行政村民办）的情况，基本上再未改变。长期以来，一些农村民办小学因群众居住分散，生员较少，实行复式编班教学的较多。截止 1990 年，全市各类小学有复式班 1848 个，教学点 198 个，仅有 1 名教师的学校 500 所，10 个人以下的班级 1060 个，其中绝大部分为农村集体办初小。

耕读小学 1964 年，本地各县（市）遵照中央关于“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指示，在农村普遍创办了耕读小学。耕读小学多数单设，少数附设于全日制民办小学。学生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较好地解决了因家务拖累而失学的学龄儿童的上学问题。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陆续停办。耕读小学均为生产大队或生产队集体所办，属于民办初小范围，一般规模较小，多为复式班。有的两级复式，有的三级甚至四级复式。耕读学校除少数教学点坚持半耕半读外，多数附属于各民办小学，与同年级全日制学生一样要求。

企、事业部门办小学

解放初，咸阳境内已有几所社会团体和企业单位主办的小学，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本地的中央和省属部门，也陆续创办了一些子弟小学。1955 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工矿、企业自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规定》后，本地有的工矿企业为满足本单位职工子女上学的要求，又单独或联合创办了一些职工子弟学校。此后，伴随企事业部门的增多和单位的扩大，职工子弟小学越来越多，不仅驻咸阳的部、省属企事业单位办子弟小学，不少地（市）、县（区）属企事业单位也开办子弟小学。截止 1990 年底，全市已有其他部门办小学 40 所、632 班，在校学生达 21904 人，其中城市 27 所、424 班，在校学生 15524 人；县镇 13 所、208 班，在校学生 6380 人。

第二节 学制、课程

一、学 制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小学教育始分蒙学堂、寻常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三级，每级各学习三年。次年，改蒙学堂为蒙养园，以其隶于学龄前教育，小学教育分为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两级，两级都得单独设置，其中初等小学堂学习五年，高等小学堂学习四年。宣统元年（1909），学部规定初等小学除继续保留五年制完全科外，另增设四年制的简易科和三年制的简易科。这种学制直到清末再未改变。

民国时期，本地各类小学的学制有过一些明显的变更。1912年7月，国民教育部规定初等小学校为四年，高等小学校为三年。1922年11月，分小学为高、初二级，学制改为三三制。1928年5月，高、初级小学学制改为二四制，学校分为中心国民学校（即完全小学）、高级小学和国民学校（初级小学）三类。这种学制，各公立高级小学及其他小学，一直沿用到了本地解放初。

本地边区小学成立初期，因各地情况不同，学制很不统一。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规定为“四二学制”，即初年级四年、高年级二年。1942年，又改高年级为三年、初年级为四年，实行“四三学制”。

建国初，本地小学学制统一实行“四二分级制”，即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共为6年。有的秋季始业，有的春季始业。1952年秋季，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实施小学五年一贯制的指示》规定，部分县市试行五年一贯制。1953年秋，因师资和其他条件不具备，奉令停止试行，仍用四二制，并一律实行秋季始业。1960年，咸阳市二中和果子街小学等学校进行教学改革试验，均试行五年制学制。1963年，教育部再次决定试行小学“五年一贯制”，直至1965年，本地一些县市还奉令进行过试验，如淳化县再度在徐村小学和五爱小学进行小学五年制试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试验中断。1969年，根据毛泽东关于“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各完小一律改为五年制，实行“三二分段制”，即一、二、三年级为一段，四、五年级为一段。1972年统一改为春季始业，1976年又恢复为秋季始业。从1983年9月开始，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全日制小学学制由五年改为六年的安排意见》，各县市统一确定小学从

1983年的一年级起改行六年制，恢复“四二分段制”，其他年级课程仍按五年制过渡。1988年9月，全市完成小学改制工作。

二、课 程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规定初等小学堂必修学科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即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随意科有图画、手工。宣统二年（1910）咸阳县的初等小学堂授课表，还增加了“珠算”、“音乐”二科。高等小学堂必修学科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此外，还可加授手工、商业、农业等随意科。宣统元年（1909）后，本地五年制设课一般与普通初等小学堂相同，咸阳县试设的四年制和三年制简易科均开设修身、识字、图画、体操、手工、乐歌等课，有的还增加了珠算。其余各县亦大体如此。

民国时期，小学课程变动较大。1912年1月，初级小学设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图画、手工、唱歌和裁缝等9门课程，高级小学设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博物、理化、图画、唱歌、体操、裁缝、外语等12门课程。同年九月，取消了初级小学的“游戏”课，改高级小学的“外语”为“英语”（男生学习），“裁缝”为“缝纫”（女生学习），同时将“博物”、“理化”合并为“理科”。1915年7月，高等小学恢复“读经”一科，女生“缝纫”科改为“家事”科，初级小学的“裁缝”科改为“缝纫”科。1923年6月初级小学的“修身”科改为“社会”科（含“公民”、“卫生”及历史、地理），“国文”改为“国语”（改文言文为语体文），改“手工”、“图画”为“工用艺术”和“形象艺术”，“唱歌”改为“音乐”，“体操”改为“体育”，同时增设“自然”（含自然、园艺），取消了“缝纫”科。高级小学废止了“读经”一科，取消“修身”，增设“公民”、“卫生”两科，改“理科”为“自然”，改“体操”为“体育”，改文言文为语体文，停授英语。1928年2月，小学高、初级均增设“三民主义”、“党义”及“童子军”课程，同时，初小取消“社会”科，增设历史、地理、卫生科，“工用艺术”及“形象艺术”（仍称“手工”、“图画”），“音乐”改为“唱歌”。高小增加职业科目。1929年2月，简化课程，初小取消“三民主义”及“公民”科，历史、地理、卫生三科合并，重设“社会”科，“图画”、“手工”改为“美术”、“工作”，“唱歌”复改为“音乐”。高小将“公民”、“卫生”、“历史”、“地理”四科合并，设“社会”科，“三民主义”归并入“党义”，“图画”改

为“美术”，原有的“手工”改为“工作”。1932年规定不特设“党义”科，将“党义”内容融化于“国语”、“社会”、“自然”等学科中，另加“公民训练”为实施训育之标准，划出“社会”、“自然”两科中卫生教材增设“卫生”科，“工作”改为“劳作”，将“劳作”教材分为“家事”、“农事”、“校事”、“工艺”四项。1936年7月，初小的“社会”、“自然”两科并为“常识”科，一、二年级“劳作”、“美术”并为“劳作”科，“体育”、“音乐”并为“唱游”科。高小取消“卫生”科，其“社会”科分为“历史”、“地理”两科。1942年，改“公民训练”为“团体训练”。1948年，除将“团体训练”复改为“公民训练”外，其他科目再未变动。民国时期，各类小学基本按照上述课程设置实施教学。当时一些初小师资缺乏，学生又少，加之校舍不足，多为复式教学。复式教学时间一般比单设长，往往只保证国语、算术两门主要学科的学习（一般对国语尤为重视）。教学中由教员分级教授，以学完主要学科内容为限，其设班多以中、低年级穿插，或中、低年级合设。这种复式班教学大都由教员随意讲课，教学效果较差。

民国时期，本地北部的边区小学，其课程设置开始很不统一，到1941年时，各高小教学始趋正规，高年级开设国语、政治、算术、自然、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劳作等10门课程，初小开设国语、美术、常识、唱游等4门课程。1942年调整科目，增设“新文字”课。1945年以后，解放战争开始，小学课程基本上以“国语”为主，仅有少数学校开设“算术”。

1949年秋季，各县解放不久，即遵照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通知，取消了原小学课程中的“公民”、“军训”等课程和历史课中含有反动因素的部分，五、六年级设政治常识、国语、算术、自然、史地、体育、音乐、美术等8门课程；三、四年级设国语、算术、常识、体育、音乐、美术等6门课程；一、二年级设国语、算术、美术、唱游等四门课程。1952年，除试行五年一贯制的小学外，一律实行教育部颁发的《“四二”旧制小学暂行教学计划》，按“四二分段”安排：中、低年级（一至四年级）设置语文、算术、体育、音乐、美工等5门课程，高年级（五、六年级）增设历史、地理、自然3科，共8门课程，各年级均设“周会”。算术从四年级起加授珠算。美工科包括图画、劳作，本地一些学校从实际出发改授美术，进行小学五年一贯制试验的学校，一、二、三年级设语文、算术、体育、图画、音乐5科，四、五年级增设自然、历史、地理3科。1953年9月，各学校根据教育部颁发的《试行小学（四二制）教学计划（草案）》，改“美工”为“图画（含绘画、

剪贴)”。1954年贯彻教育部颁发的《小学生守则》，高年级普遍增设政治课。1955年，教育部颁发的《小学教学计划》之后，各校在低年级增设了“手工劳动”课，四、五年级算术课每周抽一节用于珠算教学，并按规定在语文课中增加了“写字”。1957年7月，教育部颁发1957—1958学年度小学教学计划之后，各小学又统一给高年级每周增设了一节“农业常识”课。1962年，省教育厅规定小学四年以上每年劳动半个月，纳入教学计划。1963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后，“农业常识”课改为“生产常识”课，“手工劳动”课改为“手工”课，将“劳动”列入了正式课程。“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学课程设置无统一要求，变动频繁。其开头几年中，大多安排学习毛主席著作课，“学工学农”课，“社会主义文化课(语文、数学)”和军体课4门，有的学校还设置“革命大批判”课和“革命文艺”课。1974年以后，大部分小学始参照《陕西省九年制中小学学时计划试行草案(修订稿)》“小学部分”，设政治(周会)、语文、数学、常识(四、五年级)体育、革命文艺等课程。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小学课程设置混乱的现象逐步得到了纠正。1978年，各小学遵照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计划试行草案》“小学部分”规定，设政治(四、五年级)、语文、外语(三、四、五年级)、数学、自然常识(四、五年级)和体育、音乐、美术等8门课程，外语课因当时本地师资不足，仅在条件较好的部分小学开设。1981年实行《陕西省全日制六年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政治课改称“思想品德”；语文含讲读、作文(三年级以上)、写字三部分；自然常识改称“自然”，从三年级开设；五年级增设地理课，六年级增设历史课；三年级以上增加劳动课。1984年8月，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六年制农村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六年级增设“农业常识”课。本地各小学均照此实施。自此，小学课程设置基本稳定。

第三节 教学管理

一、教材与教学计划

据泾阳县官立高等小学堂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学期甲班统计表，当时该班“修身”课用“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讲读经”用《礼记约编》、“国文”用《高等小学国文读本》，“算术”用《笔算

数学》，“历史”用《中国历史教科书》，“地理”用《中国地理教科书》，“格致”用《高等理科教科书》。又据咸阳县官立高等小学堂清宣统二年二月所制授课表，较之上述泾阳县官立高等小学堂统计表多“博物”、“手工”二科，且各科内容亦有所不同。初等小学堂的教学内容可以从泾阳县清光绪三十四年上学期课程表得知。当时“修身”用学部编《初等修身教科书》，“读讲经”用“四书”，“国文”用学部编《初等国文教科书》，算术用学部编《初等算学教科书》，“历史”用文明书局《蒙学历史教科书》，“地理”用学部编《初等地理教科书》，“格致”用学部编《初等格致教科书》，“图画”用学部编《初等毛笔习画帖》，“体操”用学部编《初等体操教科书》。宣统元年后出现的四年制和三年制简易科，亦有统一教材，当时咸阳县四年制简易科读《修身简易课本》及《简易识字课本》各4册，三年制简易科读《修身简易课本》2册，《简易识字课本》3册。上述这些课本均为文言文。

清末的高等小学堂每周上课36小时（当时称“钟点”），其中读讲经每周12小时，占总课时数的三分之一，国文每周8小时，算术、体操各3小时，其余科目各2小时。每周上课30小时，其中读讲经每周12小时，占总授课时数的五分之二。国文每周4小时，算术5小时，修身2小时，体操3小时，其余每周各1小时。

民国时期高小教材虽有统一规定，实际并不统一。咸阳县1948年度第一学期高小课程表所列教材中，国语、地理、历史、自然、公民等课为国立编译馆的“固定本”，而算术课则为中华书局孙允昭、陈治中编著本。泾阳县云阳中心小学办学初期，在校长崔贯一主持下，曾自编适合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的国语、历史及算术教材。泾阳县第一高级小学教师郭述金、王丙元、马述章等曾经让学生抄录鲁迅、朱自清、叶圣陶、谢冰心等著名文学家的作品进行教授。

本地民国时期各高小的教学时间大体相同。以淳化县为例，1913年，每周男生为28—30课时，女生为30—32课时（加缝纫2—4课时）；1930年为1500分钟（每节课30分钟）；1932年为1560分钟（每节课基本30分钟，有些课可延至45或60分钟，视科目性质而定）；1942年为1500分钟；1948年为1650分钟。各科教学时间，本地各高小亦比较统一。如1948年度，咸阳县高小及淳化县高小每周的国语课均为450分钟（每节课30分钟，下同），算术课均为210分钟，自然课均为120分钟。

民国时期，本地各初级小学原则上都须按规定开设课程，条件较好的城

镇学校，所用教材尚能符合统一规定，但多数乡村学校所用课本往往不大统一，有的新旧教材杂用，有的甚至新式课本与《百家姓》、《三字经》等并行。由于当时学生较少，师资缺乏，校舍不足，复式教学比较普遍。复式教学的教学时间比单设班长，往往只保证国语、算术这两门主要学科的学习（一般对国语尤为重视）。

本地各初小民国时期的教学时间基本相同。以淳化县为例，1913年时，每周男生22—28课时，女生23—29课时（加缝纫1课时）；1930年时，一、二年级为1140分钟，三、四年级为1320分钟；1948年时，一、二年级增至1200分钟，三、四年级增至1500分钟。各科教学时间，本地初小也都大体相同。

民国时期，边区完全小学的课程分高、初二级设立。高级部每周授国语9节，政治5节，算术5节，体育、劳作、新文字各3节，常识、唱游各2节，共32节。另安排高级部社会活动18节，初级部8节。每节课为45分钟。此后至1946年间，所开课程大体都按计划进行。解放战争开始后，结合战时和生产实际，游击区内上课时间或全日，或半日，或一年只上几个月课，均不强求一律。这些学校遵照边区政府“适应战争，结合生产”的办学指导思想，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组织学生进行列队、打靶、夜行军等军事训练，参加站岗放哨、传送信件、演戏唱歌及书写标语等社会活动，并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荒种地，克服生活困难，改善办学条件。赤水县联合完全小学曾为此受到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嘉奖。

边区的初等小学多在农村。针对地域偏僻，人烟稀少的情况，一般分为一、二、三年级，其课程设国语、政治、算术、新文字、常识、体育、唱游、美术及战时科学（防空、防毒知识）等9科，采用边区教材。一年级每日中午、下午上学，每周授课24课时，二、三年级全日上学，每周授课30课时，各年级每日另加自习2节。少数学校未开体育、唱游科。据赤水县政府第三科1939年8月编制的初级小学第二学期课程表，国语课内，尚包含专门的作文、写字和说话课程。每节课一般45分钟。每周有一次周会，并有一次社会活动。

边区学校大多数为复式教学，有的复式班多达六七十名学生。每逢社会教育运动开始，各学校往往是上午、下午给在校学生上课，中午给带小孩的妇女和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老人上课，晚上又给青壮年和村干部上课。教师有时教了这班教那班，还需带领学生写标语、出壁报、演节目，帮村干部处

理文件，帮变工队和互助组记工、算账，帮农民读报、写信、处理家务纠纷。在马家山的赤水县联合完全小学里，县长王振喜公务余暇，也坐在教室后排听课，和学生一样回答教师的提问。

本地解放以后，各小学一般都采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印的新课本，1951年秋季起开始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和修订的六年制小学教科书。1967年，“复课闹革命”后，因课程设置无统一规定，教材一般由各学校随意确定。1974年起，各学校开始统一采用省编教材。1978年开始采用全国统编新教材。1981年以后，基本上采用全国统编教材。

本地各小学的教学计划，建国以来均按国家教育部或省教育厅制定的教学计划安排教学。1952年，实行“四二分段制”的小学，低、中、高年级的各科教学时间每周分别为24、25（或26）、29学时，每学时为45分钟。每年实际上课34周。1957年后又有多次调整变动。1984年8月，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六年制农村小学教学计划（草案）》后，本地农村小学低年级每周上课23课时，余均为25课时。各小学的教学计划此后再无大的变更，原则上都能照此施行。

二、教学改革

清末，本地各县建立的各种小学堂，其教学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扩大了教学对象，女子有了读书的权利；二是更新了教学内容，增加了具有科学知识的“格致”（物理、化学）、“博物”（动物、植物）等自然学科，新设了“体操”、“乐歌”、“图画”、“手工”等有利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课程；三是改进了教学方式，废除了传统的个别授课制，要求实施班级授课制，有了明确的教学计划；四是改革了教学方法，从以前的照本宣科，死记硬背改为“以讲解为最要”、注意“循循善诱”，禁止体罚学生。但由于条件限制，本地女学生依然极少；有的小学堂新增课程开课不齐；一些初等小学因班额不足往往实行复式教学。

民国初年，各小学堂奉令取消了读经讲经等课程。袁世凯称帝后，一度又恢复讲经，教学中亦增加了封建性糟粕，旋即废止。

1925年，教育部公布“新学制”，规定小学课本一律改为语体文，“国文”改为“语文”，并先从语文开始改革教学方法。当时一般小学都按年级授课，普遍使用部颁教学计划和教科书，采取读、讲、背、练四步教学方法。本地一些学校曾推广国外的“五段教学法”，即引起动机（用简短故事

或提问、或重温旧知识启发儿童学习兴趣)、决定目的(让儿童明白学习这一课文的要求)、进行新课(通读,扫除障碍,讲解课文,概括段落大意,归纳主题)、复习新课(巩固知识)、布置作业。这一新式教学法的流行,对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方法起了一定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本地不少小学教员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语文、社会、音乐、美术等课,向学生宣传抗日,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与民族意识,三原等县的一些学校还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下,运用街头演讲、编演节目及办壁报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泾阳县云阳镇小学在校长崔贯一领导下,不仅直接投入抗日宣传活动,而且将学校纳入以抗日为中心的轨道。根据抗战需要,以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割地赔款、租界期限等史实为内容,新编了历史、地理、国语、算术等教材。抗战胜利、内战开始后,仍有一些怀有正义感的教师认真坚持教学,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建国后,本地各小学普遍学习陕甘宁边区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禁止对学生体罚或变相体罚,肃清反动的教学观点和主观主义的教学方法。还组织教师学习新民主主义教学方针和新教学法,明确规定废止“注入式”或“填鸭式”教学法,提倡“启发诱导式”或“讲述故事式”的教学方法,并要求对学生实行民主管理。要求教师订出课程进度计划,采取集体备课的方式,互相探讨,写出简明教案,并组织教师互相听课,组织观摩教学,进行评议交流,搞学生作业展览,组织学生座谈,使教师与学生之间互通情况,以改进教学方法。

1953年,本地各小学全面开展学习苏联凯洛夫教学理论的活动,推广普希金教学法,实行“五环教学”(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解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坚持“五项原则”(量力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巩固性原则、循环性原则、直观性原则),提倡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同时改百分制为五级分制(60年代初期又回改为百分制)。

1958年,本地各小学围绕“把学生培养成为亦工、亦农、亦学的既红又专的接班人”这一中心,开展以改革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为主的教学改革,贯彻“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生,适当增加劳动”的教改方针,其课程内容采取“增、合、调”的办法进行处理。部分完全小学和普通小学增添了俄语、代数等教学内容。

1960年以后,本地各小学推行“少而精”的教学方法,提倡“精讲多练”。广大教师努力改进教学方法,认真钻研教材,教学水平普遍得到了提

高。

1962年以后，根据毛主席关于“劳逸结合”的指示精神，本地一些六年制小学制定出了两套教学计划（一是年劳动1个月，学习9个月；一是年劳动2个月，学习8个月）。各级各类小学按照教育部教学大纲的要求，安排课时，要求教师教学做到“五勤”（即口勤、脑勤、耳勤、手勤、脚勤）和“五有”（即教学有计划、进度有安排、上课有教案、作业有检查、质量有考核）、“五认真”（即认真备课、认真讲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辅导、认真补差）。与此同时，由于中苏关系变化等原因，50年代普遍推广过的苏联教学经验逐渐受到冷落。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凯洛夫教育学与普希金教学法都被当作“修正主义货色”遭到彻底批判，连以前所提倡的“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及“三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学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等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原则也一概被当作“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基础教育走上正轨，教学方法的研讨活动亦出现了生机。1983年，本地各小学根据省教育厅指示，组织教师过好“教材教法关”，加强了教师对教材教法的学习与研究。此后，不少县广泛开展了小学语文、数学赛教活动，或举办小学教改学习会，或邀请外地名师进行教改示范课讲授，或放映教改录像，或组织观摩教改实验课，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1986年，泾阳县还组织有关教师实验湖北大学黎世法创造的“六因素单元教学实验法”，使全县不少教师较快地掌握了最优化（符合学情）的课堂教学要领（学习原则与指导原则），推动了教学改革。

从1985年起，市教研室和各县区教研室密切配合，紧抓教改实验。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有小学语文、数学教改实验1000多项，其中有“注音识字，提前读写”、“集中识字”、“快乐教学”、“情境教学”、“尝试教学”、“变序教学”、“六因素单元教学”、“三算结合”等十多项引进项目和“二式动态教学法”、“竞赛式阅读教学法”、“七步导学法”、“三点式思路教学法”、“三步七环反馈教学法”等多项自创教改实施项目。在抓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教改的同时，成立了北五县复式教学研究 centers。永寿县常宁乡孙家简易小学民办教师房振平被评为部级模范教师和陕西省特级教师。为了使“群教群研，求实创新”的群众性教改向纵深发展，市教研室又及时总结推广武功县游凤乡建立校、片、乡三级教研网的经验，把教学研究和教育科研密切结合，对

群众性教改活动中出现的近百项教改自创项目，根据“易学好推广”的原则，筛选出已经取得明显教学效益的“听说读写同步”和“三算结合”的语数教改经验，在全市小学推广。

建国以来，本地大部分小学积极开展了配合课堂教学的各种课外活动，成立了各种课外活动小组，以弥补课堂教学不足，培养学生多种爱好。

三、教学管理

清末民初，各县劝学所（或学务局）直接参与小学的教学管理。1923年以后，各县劝学所奉令改为教育局（或教育科），教育局（教育科）以下划分若干指导区，设督学和视导员分管各小学教学工作。建国以后，各县均有文教科，由文教科主管各小学的教学，县以下按行政区划，均设有文教助理员具体负责。50年代，一般各乡（镇）以完小为中心组织教学研究，辅导各普小的教学，同时县（市）文教（教育）科的主管业务员，也经常深入各辅导区检查、指导教学工作。60年代初，各县（市）在各公社（镇）设置了文教干事（或文教专干），直接负责所在学区内的教学管理及有关教育行政事务。80年代中期以来，各县（区）先后成立了乡（镇）文教组（教育组），具体负责各小学的教学管理。

清末和民国初期，本地的高小实行堂长制并配备监院（监学）协助堂长管理教学，初小则由教员总管。嗣后，各乡（镇）中心国民学校（高小）校长以下，配备教育（教导）主任管理教学，保国民学校（初小）一般仍由教员统管。建国以后，人民政府管理学校，实行校务委员会制，1952年3月，教育部颁发《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后，各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下发后，各小学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63年，部颁《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又规定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学校党支部对学校行政工作负有保证和监督的责任”。“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工宣队”、“贫管会”和“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领导学校。1978年，教育部颁发的《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规定：“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制，校长是学校的负责人，党支部统一领导学校各方面的工作。”1984年9月，陕西省人民政府批转教育厅《关于改革中小学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的若干意见》，又规定小学试行校长负责制。无论是实行校长负责制或是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以下均有教育（教导）主任，具体负责教学管理。一些规模较小的初小，仍

由教员直接管理。

小学的教学管理，一般是通过组织教学活动和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及学业考核来实施的。清末高等小学堂的监院（监学），主要是辅助堂长管理教学、纪律等教务，民国时期的教务（教导）主任主要是制订教学实施计划和教学规章制度，编制课程表和时间表，查阅学生的作业、试卷及教员的教案与实际进度，并进行学籍管理和学业考核等。建国以后各小学教育（教导）主任，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学校教学工作，协助校长制订教学计划并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组织领导教研组和班主任的工作，协调学校各方面的教育力量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学校的体育、卫生和教务行政工作，领导管理学生的学籍、招生、编班及升留级工作等。

民国时期，本地一些小学的校长和教育（教导）主任在教学管理中认真负责，经常检查指导，学校的教学水平较高，校风也较好，有些小学的教学管理则比较松弛，教学的要求和进度不统一，教学水平有高有低。建国以后，人民政府很重视教学工作，本地各小学大都加强了教学管理，制订了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各小学都自觉地把教学工作作为学校的主要工作和中心任务。“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正常的教学管理受到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执行了教育部重新修订颁布的《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各小学的教学管理才又走上了正轨。此后，各县市（区）、各小学陆续通过各种形式的教师培训和教材过关、专业合格考核等活动，大力提高教师业务素质，通过制订一系列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逐步加强了常规教学管理，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第四节 部分小学简介

乾县城关镇高庙中心小学

高庙中心小学是县、市重点小学。位于乾县城内高庙巷东段，占地 17.6 亩，建筑面积 3072 平方米。1990 年有教学班 18 个，学前班 2 个，共有学生 1519 名，教职工 46 名。

该校于 1904 年由乾县人李守先创办于药王庙，初名“私立初等女学堂”，后由其子李定志办为“模范初级小学校”。1933 年更名“私立敬业小学”。1946 年与黉学门小学合并，迁于高庙巷，更名为“乾县在城镇第一中心国民小学”。1950 年更名“乾县一区第二完全小学”。1951 年更名“乾县一区完全

小学”。1956年更名为“乾县高庙巷小学”。1970年更名“乾县高庙巷七年制学校”。1978年更名“乾县城关镇高庙中心小学”。

高庙小学有良好的校风。1983年，学校少先队被评为“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活动先进集体”，大队辅导员刘文平被评为全国优秀辅导员。1980年以来，语文教学推广“引读法”，数学教学试用“尝试法”、“发现法”，低年级采用“数学游戏”和“猜谜”等寓教于乐的新教法，均收到良好的效果。1983年，从一年级开始，设两个教改试验班，要求五年内学完六年制全部课程，1988年在毕业升学考试中，在提高录取分数20分的情况下，两个班升学率仍达94%。该校1985年被评为全省“中小学教材教法进修先进集体”，参加了全国四省区小学语文教法经验交流会。

该校的文艺、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多年来，学校保证学生每天有1小时体育活动。1963年，学校增设无线电发报等军事体育项目训练。1982年7月，《体育报》、《陕西体育报》分别报道了该校的体育、保健工作。1987年12月，体育教师宁征平获国家教委、国家体委授予的“全国传统项目学校先进体育工作者”光荣称号。学校的合唱队、舞蹈队、小乐队训练有素，经常参加县上表演，受到称赞。

兴平县槐巷小学

槐巷小学为兴平县创建最早的小学。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槐里书院”改建“兴平县立高等小学堂”，1922年更名“兴平县第一高级小学校”，1934年更名“兴平县槐巷小学”，1941更名“兴平县在郭乡中心国民学校”，并将“兴平县立高等女子小学”并入。因在原槐巷小学旧地创办县立中学，小学遂迁于原女子小学校内。1949年5月兴平解放后，更名为“兴平县在郭区第一完全小学”，1951年更名“兴平县城关完全小学”，1957年兴平县中学新建校舍，小学遂迁回原址，并恢复“槐巷小学”校名。

1927年，共产党支部在校内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共产党员曹碧轩任校长、葛寿祺任教务主任，做了许多革命工作。1940年学校建立了党支部，先后有8名教师和学生在校入党，参加了革命斗争。

1962年至1966年，该校教学质量及毕业升学率年年名列全县第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该校在全县各小学最早受到冲击，校名一度改称“槐巷学区”。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改为全日制八年制学校，增设初中班。1980年撤销初中部，仍恢复“槐巷小学”名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创三好”活动，

教学质量明显提高。1984年以来,加强了对学生的德育、智育、体育教育,进一步端正了校风、教风、学风,学生的思想品德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学业成绩稳步上升。还在实行教学岗位责任制的基础上,实行了量化管理,重视双基教学和能力的培养。1984年,从一年级着手,由教师李德武创造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学经验,得到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1982年、1983年,该校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先进集体”,大队辅导员陈希学1983年被评为“全国少儿先进工作者”。

**咸阳市 1990 年学龄儿童
入学率、毕业率及 1989 年在校学生巩固率一览表**

表 1-3

项 目 县 区	学 龄 儿 童 (7—12) 周 岁 总 数	学 龄 儿 童 入 学 率 (%)	其 中 : 农 村 学 龄 儿 童 入 学 率 (%)	1989 年 在 校 学 生 巩 固 率 (%)	1990 年 毕 业 班 毕 业 率 (%)	已 验 收 普 及 六 年 制 义 务 教 育 的 乡 镇 及 街 道 办 事 处 数
合 计	445, 854	98.40	98.21	98.13	97.55	171
秦 都 区	30, 496	97.23		98.60	95.31	12
渭 城 区	26, 379	99.81		96.63	95.54	11
杨 陵 区	10, 844	99.72		99.74	99.66	5
兴 平 县	52, 126	98.53	98.36	99.70	97.56	16
武 功 县	41, 870	94.95	94.24	96.69	99.49	15
三 原 县	34, 745	99.75	99.72	97.03	98.00	17
泾 阳 县	49, 755	100.00	100.00	99.70	99.90	7
礼 泉 县	47, 567	99.21	99.20	98.16	93.35	16
乾 县	55, 304	99.47	99.44	99.85	100.00	8
永 寿 县	17, 634	96.00	95.17	95.65	96.19	7
彬 县	23, 853	96.49	95.65	95.67	97.67	19
长 武 县	15, 529	97.46	97.10	96.24	96.91	12
旬 邑 县	24, 011	98.00	97.95	99.36	98.63	13
淳 化 县	15, 741	99.13	99.10	95.52	98.00	13

第四章 中学教育

第一节 学校建设

一、官立中学堂

清光绪三十二（1906）年，因教育会之督催，乾州（治今乾县）知州就乾阳书院改建“乾州中学堂”，岁支银 1780 两。因一切条件皆不具备，旋改名高等小学堂。清宣统二年（1910），邠州（治今彬县）知州就紫微书院及州考院改建“邠州中学堂”。州属淳化、三水（今旬邑）、长武三县助金修建，岁支银 821 两。辛亥革命后废州改县，邠州中学堂更名邠县高等小学堂。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朝廷下令改书院为学堂。次年，陕西督学沈卫改三原宏道书院为宏道大学堂，其内部附设普通中学科，是为本地中学教育之始。

二、公立中学、私立中学

1919 年，于右任在三原县“学古书院”旧址建立了“渭北中学校”，是为民国时期本地中学教育之始。1920 年 2 月，三原县大程镇福音村创办了一所教会中学，名为“三原县私立崇美中学校”，是为民国时期本地私立中学之始。1923 年，三原县和乾县均在县立高级小学内增设初中班，分别创建了县立初级中学校，是为民国时期本地县立中学之始。1923 年，胡笠僧（景翼）等人在三原县城东关筹立“私立中山女子中学”，后因经费不支，由省教育厅接管，易名“陕西省立女子中学”，为当时全省惟一的女子中学。嗣后，各县陆续建起了一批公立中学和私立中学。

1923 年 1 月，陕西省教育厅在三原县城内东渠岸原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旧址建立了“陕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学”；1938 年 1 月，泾阳县建成“泾阳

县私立泾干初级中学”；1939年5月，咸阳县建成“咸阳私立周陵初级中学”；同年8月，乾县人张润泉为振兴家乡教育、收授流亡学生，在乾县建起“陕西省立乾县中学”；1940年，醴泉县建起“昭陵中学”，武功县建起“武功县立初级中学”，三原县建成“私立振国中学”和“私立民治初级中学”；1941年，淳化、长武、枸邑、永寿、邠县、兴平等县，先后创建了县立初级中学，三原县复建了县立初级中学。是年，本地各县始普遍有了中学。

1941年后，本地还相继建立过“泾阳县私立仲麓中学”、“兴平县私立丹峰中学”（后易名“茂陵中学”）、“咸阳县私立东望初级中学”（后易名“咸阳县私立东北初级中学”）和“咸阳县沔胜初级中学”。本地民国时期中学建立最早和最多的是三原县。三原县民国时期先后存在过10所中学，直至1948年，仍有省立三原中学、省立三原女子中学、县立初级中学和私立振国中学、私立崇美初级中学、私立民治初级中学、私立池阳初级中学等7所普通中学，共有班级49个、在校学生2389人，居全省各县中学教育之首。

民国时期本地的公立中学中，省立三原女子中学、省立乾县中学、省立三原中学和县立邠县中学先后发展为完全中学。1945年，省立咸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曾附设高中部。临解放时，县立周陵中学亦开办了高中班。除此之外，各公立中学均为初级中学。与此同时，乾县、泾阳和咸阳等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均招收过初中班或附设过初中部。

民国时期，本地公立中学和私立中学的学制、课程及教学管理大体相同，其主要区别是：公立中学经费全部由公家支付，私立中学则主要由校董事会筹措；公立中学直接受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私立中学则在接受教育部门管理的同时，还要受校董事会管理。私立中学中比较有名的为泾阳县私立泾干初级中学（今泾阳县泾干中学前身）。该校于1946年秋增设高中部，成为完全中学，至1948年，有高中二级二班、初中三级七班，在校学生达473名。该校办学严格，加上名师荟萃，学生学习努力，校风优良，闻名全陕。1943年暑假，初春三一、秋三二两级毕业生中23人投考省立兴国高中，除1人因病中途退场外，其他22人被一榜录取，轰动一时。

本地民国时期的公、私立中学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了较大发展。至1949年，共有中学17所，其中公立中学13所，私立中学4所，内有班级152个，在校学生6893人。

三、教育部门 and 集体办中学、其他部门办中学

1949年2—7月，本地陆续解放后，人民政府派员接管了所有中学（分

别属陕甘宁边区咸阳分区、三原分区和邠县分区领导),并在及时恢复教学的同时,将原有私立中学(除个别停办外)陆续改成了公办中学。1950年,各公立中学取消了“省立”、“县立”等字样,分别由咸阳专员公署和宝鸡专员公署领导。1956年,各初级中学由专署下放给各县文教科领导,完全中学仍由专署领导。人民政府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至1957年时,各县市的中学增至92所(其中高级中学8所),中学生达27197人(其中高中生4077人)。

1958年,本地响应中央和各级政府号召,掀起了全党动员、全民办学的热潮,新成立了一批中学。其中高级中学发展到23所,实现了县县有高中。与此同时,各县市还相继创办了一些民办中学(即集体办中学)。这一时期,本地普通中学发展有些过急过快,带来了师资、校舍和经费上的困难,特别是民办中学一哄而上,各方面条件均不具备,加之当时处于“大跃进”时期,学校社会活动过多,因而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挫伤了群众的办学积极性。1960年冬季开始,本地各县市对普通中学进行了调整,撤销了一些民办中学,各中学普遍整顿了教学秩序,加强了基础课教学,教学质量逐步有所回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本地各中学学生纷纷起来“造反”,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有中学全部停课。1968年“复课闹革命”,“工宣队”、“贫管会”进驻学校,在“上初中不出大队,上高中不出公社”的口号下,队队办初中,社社办高中,处处“戴帽”,节节拔高,盲目发展,加上实行开卷考试和推荐升学制度,尤其是1975年推广“朝农经验”,各中学大搞“开门办学,厂(场)校挂钩”、“校队挂钩”,教学质量有所下降。其中仅高中就由1966年的26所发展到334所,初中由67所发展到1139所(含八年制学校618所),造成了经济发展与国家、集体的人、财、物力等办学能力严重脱节,小学、初中和高中这三级教育之间比例失调。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教育战线拨乱反正,中学教学秩序渐趋正常。1980年前后,各县市着手调整中学布局,撤并了一批初中和高中,使中学布局较为合理,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师资力量得到加强,教学质量逐年提高。1985年前后,各县市适应经济改革需要,调整了中等教育结构,进一步促进了中学教育发展。截止1990年底,全市共有中学401所,其中教育部门 and 集体办中学345所,其他部门办中学56所,在校中学生总数达212142人,其中高中生50343人,与1949年相比,中学数及学生数分别增长了23倍和30倍。

教育部门 and 集体办中学

公办高级中学 “文化大革命”以前，本地尚无单设高级中学。1973年，泾阳县始设泾干、石桥、永乐、云阳4所中学为单设高中，此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大力发展，一些县（市）陆续将少数完全中学办成了单设高中，其中川道平原和交通发达的县区办的较多，如兴平县已有南郊、西郊、西吴、赵村、南位等5所，武功县有绿野、普集、长宁、凤安、薛固等5所，三原县有南郊、北城、安乐、陵前、嵯峨等5所，礼泉有一中、二中及赵镇中学等6所，乾县有一中、二中及杨汉中学等8所。各县的单设高中均位于县城或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乡镇。这些学校多数历史悠久，师资力量较强，各方面办学条件较好，是各县区的重点中学。

公办初级中学 1958年以前，本地除泾阳、三原、咸阳、邠县、乾县及兴平（1954年以前）、武功（1956年以前）等县的重点中学办有高中部外，其余中学均为公办初级中学。1958年“大跃进”，到处兴办中学，初级中学发展很快，一年之内，新建初中31所（不含小学附设初中班）。这些初级中学中的多数学校因其办学条件较好，后来成了各县的重点中学，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本地单设初级中学已达53所。“文化大革命”前所建立的这批初级中学，有不少先是小学附设初中班，俟条件成熟后，升格为初级中学的。“文化大革命”中“复课闹革命”后，伴随“教育革命”的热潮，一些五年制全日制小学又办起了二年制的初中班，这些“戴帽”小学当时称为“七年制学校”。1978年初中学制恢复为三年后，这些学校又改称“八年制学校”。这种中小学教育合体的形式时间一久，既不利于小学教育，也不利于中学教育。1979年前后，各县（市）在对学校进行全面整顿的工作中，撤并了一些条件较差的初中班，确定并充实了一批条件较好的初级中学，初级中学的发展再次走上了正确轨道。1984年，根据教育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各县区把大部分初级中学交给了所在地的乡镇管理，成为由地方集体办的民办初级中学。截至1990年，仍由教育部门办的初级中学，已为数不多。

公办完全中学 本地初解放时，仅泾阳、三原、邠县、乾县等四县有公办完全中学，除三原县有两所（省立三原中学、省立三原女中）外，其余各县均只有一所。1954年和1956年，兴平中学和武功中学先后办成完全中学；1958年，枸邑、淳化、长武、永寿、醴泉等县中学亦均办成了完全中学。“文化大革命”中，完全中学发展较快。“文化大革命”后，经过整顿，特别

是经过教育体制改革及调整中等教育结构，乡镇管理的单设初中布局日趋合理，各县区基础较好的完全中学适应形势发展，多数办成了单设高中。

民办中学 5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现有的公办中学远远满足不了小学毕业生继续升学的需要。在此形势下，中央提出“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提倡公办与民办并行。据此，1957年前后，本地不少县创办了民办中学，较多的是泾阳县，1957年8月即在各乡办了20余所民办中学，招收未考上公办中学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民办中学在行政上由县（市）乡（镇）共管，校长、教师由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委任、调入，办学经费及教师工资由各乡（镇）自筹，业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领导。1960年前后，由于经济困难，大多民办中学被迫停办，有的学生归并到“农中”（农业中学）班。1962年以后，国民经济形势好转，一些公社办中学相继恢复，但大都更名“农业中学”，不再具有普通中学的性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民办中学基本消失。“文化大革命”后经过调整，办了一批单设初级中学。1985年前后，教育体制改革，规定初中由乡（镇）办乡（镇）管，这些乡（镇）办乡（镇）管的初级中学实际上成了地方集体办的民办中学。

“文化大革命”后的民办中学亦均为初中，其学制、课程、教材及学业考核等，与公办中学中的初中部完全相同。民办中学只是经费筹措和行政管理上以乡（镇）为主，在人事和教学上，仍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其招生及报考高一级学校，均与公办初级中学无异。

企、事业单位办中学

在教育部门办中学的同时，其他部门，主要是一些大中型企业和少数人数较多的事业单位，亦陆续办了一批中学。

1965年以前，仅有国营秦岭电气公司职工子弟中学（1953年建）、西北农学院附设中学、国营华星无线电器材厂职工子弟学校（1961年建）、省十一建筑工程公司兴平子弟学校（1963年建）、西北国棉二厂子弟中学（1965年）等少数几所。其他中央及省属驻咸阳地区的企事业职工子女均就近在教育部门办的中学内就读。1965年3月，咸阳市政府要求有条件的部、省属大厂自办中学。1966年8月，咸阳地区文卫局宣布市属各中学今后不再承担为各大厂代培学生的任务。随后，西北国棉一厂、西北国棉二厂等几个大厂的职工子弟小学陆续在校内附设初中班，后来，一些单位的子弟小学还同时附设初中班和高中班，称为“七年制学校”（小学五年，初中二年），或称为

“九年制学校”（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据 1971 年统计，咸阳市城区企事业单位已有初中 4 处、学生 4230 人；高中 5 处，学生 2478 人。到 1976 年，部、省属大厂或其他企事业单位办七年制学校 2 所，九年制学校 27 所。1978 年后，初中学制改为三年，各中小学合体的学校更名为“八年制学校”或“十年制学校”。1980 年，市区共有厂办完全中学 3 所，八年制学校 5 所，十年制学校 25 所。有初中班 211 个，在校学生 3175 人；高中班 70 人，在校学生 2290 人。以后，为方便管理，一些有条件的单位都相继将中小学分设，成立子弟中学。到 1989 年底，市内秦都、渭城两区共有厂办八年制学校 18 所，十二年制学校 10 所，完全中学 7 所，有初中生 7013 人，高中生 3468 人。

与此同时，分布在本地各县的一些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亦陆续办起了一批子弟中学。如 1966 年新办了航空工业部红原锻铸厂职工子弟学校，陕西柴油机厂职工子弟学校、陕西玻璃纤维总厂职工子弟学校，1971 年新建了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电务工程处职工子弟学校，1973 年建立了陕西省兴平化肥厂职工子弟学校，1974 年建立了西安铁路分局三原职工子弟学校，1976 年建立了陕西省汽车标准件厂职工子弟学校，1977 年建立了国营新征机械厂中学，1978 年建立了国营陕西柴油机厂中学。另外，武功县境内的五七〇二厂及红卫厂亦建起了子弟学校。截止 1990 年底，全市共有企事业单位办中学（含中小学合体的九年制和十二年制学校）56 所，在校初中生 10900 人，高中生 5799 人。

第二节 学制、课程

一、学 制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规定中学堂学制为四年，次年，改为五年。民国初年，中学堂学制仍为四年。1922 年，北洋政府改中学学制为六年，实行“三三制”，分初、高中两个阶段，各为三年。1941 年以前，实行春秋两季始业，从 1942 年起，统一改为秋季始业。

建国后，中学仍分为初、高中两个阶段，学制实行“三三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9 年中学学制为四年，实行中学“二二分段”，初、高中各为二年，并改秋季始业为春季始业（1972 年又回改为秋季始业）。1978 年

秋季起，中学改为“三二分段”，初中为三年，高中为二年。1982年根据咸阳市地区行政公署文教局教学计划，城乡中学全部恢复“三三制”，初、高中学制均为三年。

二、课 程

本地清末中学堂开设课程有修身、经学、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图画、音乐、外国文及体操等。民国初年，中学按规定开设修身、国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等课。本地当时中学极少，实际开课情况不详。1930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修正中学课程》后，本地初中一般开设课程为公民、童子军训练、体育、卫生、国文、英语、数学（一年级算术，二、三年级代数、几何）、植物、动物、生理卫生、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劳作、图画、音乐等17门，另外每周另有3节选修课程。高中一般开设公民、体育、卫生、军事训练（女生练习看护）、国文、英语、数学（含代数、几何、三角）、生理学、化学、物理、中外历史（先授中国历史、再授外国历史）、中外地理（先授中国地理，再授外国地理）、伦理、图画、音乐等15门，另外每周亦有3节选修课程。各校情况不同，开课并不完全一致。柘城县立初级中学1940年教学科目表中有博物而无植物、动物，卫生称为生理卫生。淳化县立初级中学1945年教学科目表与柘城县立初级中学1940年科目表大体相同，且有英语课，除规定作文每周占国文两节外，还规定英语作文从二年级起每周占英文课两节。1942年5月，泾阳县政府曾按教育部规定，通知各中学加设“兵役浅说”课。

1949年2—7月，人民政府接收各学校后，初中各年级立即停授了国民党政府设置的“公民”与“童训”等课，开设了新的政治常识课。1950年，各初中按照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普遍设政治、语文、数学（初一算术，初二代数，初三平面几何）、自然（含植物学、动物学、达尔文学说基础和生理卫生）、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外国语（英语或俄语任选一门）、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但各学校执行情况不尽相同。1950年淳化县初级中学各年级普遍开设的科目有语文、外国语、体育、音乐、图画5门；初二、初三政治课开设中国革命常识；数学课初一为算术，初二、初三为几何、代数；初二、初三开物理，初三开化学；生物课初一及初二上学期为植物，初二下学期及初三为动物，初一为卫生常识；历史课初

一及初二上学期为世界古代史、初二下学期及初三为中国古代史；地理课初一为自然地理，初二为世界地理，初三为中国地理。1954年秋，各初中执行上级规定停授外国语。1955年，各初中二年级又根据教育部通知，改原“中国革命常识”为“政治常识”。1956年，语文分为汉语、文学两科，初一恢复外国语，初三增设农业基础知识，取消政治课。1957年，初中又恢复政治课。1958年，汉语、文学又合并为语文课，劳动正式列入教学计划。是年，学生参加“大炼钢铁”、“大办粮食”的群众运动，部分教学时间被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活动占用，教学计划均未按规定完成。到1960年，教学秩序方趋于正常。1961年，初一算术教材下放给小学。1963年，遵照教育部《全日制中学新教学计划（草案）》规定，各初中一至三年级政治课分别设置道德品质教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建设，语文课包括讲读、作文等。1964年，调整和精简中学课程，各学校按规定初一开设6门课，初二开设8门课，初三开设9门课。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一度停止教学活动。1967年后，学校虽“复课闹革命”，但因干扰较大，教学秩序并未恢复。当时初中一般开设政语（或政治、语文）、数学、农基、军体、革命文艺和劳动等课，“政语”实际以宣讲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诗词及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和“大批判”文章为主；“革命文艺”主要是教唱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样板戏”选段。1970年至1976年，各校开设课程一般有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物、农基、体育、革命文艺、卫生知识及劳动（或“兼学”）等，这些课程经常被“学工”、“学农”、“学军”及各种政治活动所冲击，教学任务往往无法完成。1978年，各初中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计划试行草案》，普遍开设政治、语文、数学（几何、代数）、物理、化学、外语、历史、地理、农基、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1981年，根据教育部有关通知，初中政治课一年级开《青少年修养》，二年级为《法律常识》，三年级为《社会发展简史》。

建国以后，高中课程设置变化亦比较大。1949年，遵照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中等学校改革的指示》精神，高中取消了“公民”、“军训”、“伦理”等内容反动的课程，开始设置“政治常识”，同时改“图画”为“美术”，改“卫生”为“生理卫生”，增加“艺术”课，变英语为选修课，其余仍沿用民国时期课程设置。1950年，各高中依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一般设政治、语文、数学、生物、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外国

语、体育、音乐、美术、制图等课程，其中数学教学程序为高一平面几何、三角、立体几何，高二立体几何、大代数、解析几何，高三大代数、解析几何。1951年秋季起，各高中部又按教育部通知，取消“政治”课，于高二、三年级分别设置“中国革命常识”、“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及“共同纲领”等课。同年底，又依教育部通知，于高三年级增设“时事政策”课（每周1小时）。1953年秋季起，各高中又依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教学计划（修正草案）》，将中学的“地理”课分为“自然地理”、“世界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和“外国经济地理”，并取消了高中部的解析几何，增加了数学、物理的课时，其他各科的课时均有减少。1955年秋季起，各高中都根据教育部关于调整中学教学计划的通知，高二、三年级不再设“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二年级开设“社会科学常识”，三年级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语文分为汉语、文学两科，取消政治课。同年，按教育部规定，高中增设实习课（含农业实习、机器实习和电工实习）。1957年恢复政治课，高三依教育部通知增设“农业基础知识”，嗣后，又依补充通知于体育科中增加了卫生教育。1958年，汉语、文学重新合并为语文课，劳动课正式列入了教学计划（每周二小时），政治课改为“社会主义教育”。1963年，遵照教育部《全日制中学新教学计划（草案）》，高中政治课按一、二、三年级依次设政治常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和时事政策。1967年“复课闹革命”后，高中仅开设政治、语文、数学、农业基础知识及体育等课。1971年，本地一般高中教学秩序初步得到恢复，大多开设毛泽东思想、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农业基础知识、历史、地理、革命文艺、军体、卫生常识等课。1974年前后，在“学工学农”的口号下，不少高中部办了农业班、医疗班、会计班、文艺班等专业班，课程各有侧重，课时多无保证。1978年，各学校遵照教育部《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在高中开设政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生物、农业基础知识、体育等课程，其并开课程一般为八九门。1981年，高中增设地理课，政治课内容改为“政治经济学常识”和“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是年，又遵照省教育厅通知，增设劳动技术课程，农村高中一般开设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和手工工艺方面课程，城市高中一般开设工业劳动技术、手工工艺等方面课程。1987年，遵照省教育厅通知，各高中一年级政治课改“政治经济学常识”为“科学人生观”，1988年，高二年级改“辩证唯物主义常识”为“经济常识”，高三年级增加“政治常识”。为适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大部分中学均从高二年级起

实行文、理分科，理科班开设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体育，文科班不开物理、化学，改设历史、地理，其他与理科班同。1988年，市教育局根据国家教委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端正办学方向、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通知精神，提出高中不分文理科，各县区教育局都做了相应规定，但因高考制度无大的改革，各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在执行上并不积极。

第三节 教学管理

一、教材与教学计划

清末，本地开办的两所中学堂均只有一二年时间。按规定，中学堂一、二年级每周开修身课1节、读讲经9节、国文4节、外语8节、历史3节、地理2节、算学4节、博物2节、图画1节、体操2节，每节课1小时，各年级均授课36课时。但因师资、设备及学生知识水平等限制，教学多以经学、国文为主，外语多未开设，自然学科亦未开齐。乾州中学堂一度尚补习高等小学堂课程。

1912年，规定中学四学年，各学年每周授课依次为33、34、35、36课时，每课时为1小时。1935年，规定初中六学期中每周教学总时数依次为36、36、36、35、35、35课时，高中六学期中每周教学总时数依次为36、34、35、34、31、31课时。每课时仍为1小时，直到1943年度以后，每节课一般才改为45分钟。鉴于各校情况不同，实际开设课程及教学时间与规定不同。民国时期，本地各中学教材大都采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及中华、世界、文化等书局出版的教材，要求并不统一。

建国以后，本地各中学教材逐步统一。1949年初解放时，文科方面的课程大多改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新编教材，部分课程仍沿用民国时期的旧教材，政治常识课选学报章杂志有关文章。1951年秋季起，开始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教科书，数学课本有的使用苏联课本。1954年起，使用全国统编教材。1958年，为适应“大跃进”形势，各中学在部分科目中增授过一些乡土材料。1960年，陕西省普通中学语文、地理和高中的代数采用省编教材，其他各科增加了省编补充教材。1960年8月，咸阳市第二中学开始试验中学五年制后，初63级在初一时采用北京师范大学“九年一贯制教材”，从

二年级起改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十年制学校课本”，初 64、初 65 级一直用“七年制学校课本”，初 66 级使用新“十二年制课本”。其他进行五年制学制试验的中学情况大体相似。1963 年，本地各中学统一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日制中学统编教材，初三生产知识课使用省编教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并无教材。1970 年本地各中学多采用陕西省编写的暂用课本，部分科目使用自编教材或自选教材。此后，各校基本上采用陕西省统编教材，直到 1978 年以后，各普通中学始从各科第一册起使用全国通用的全日制试用教材。以后陆续使用全日制中学六年制统编教材，教材不统一、教学要求不一致的现象逐步得到了改变。1984 年，本地各中学遵循教育部《关于颁发高中数学、物理、化学三科两种要求的教学纲要》的通知，普通中学中采用的是要求较低的“乙种本”教学纲要进行教学，重点高中采用要求较高的“甲种本”教学纲要进行教学。1985 年前后，教育部根据各地试行全国统一教材的意见，发出了降低教材要求和难度的“实施意见”及“调整意见”。各中学根据实际情况，对教材作了适当调整。特别是初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四种。

建国以来，各中学均按国家教育部或省教育厅制定的教学计划安排教学。1950 年教育部颁布《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初中各科三年总计教学时数分别为：政治 240、语文 840、数学 560、自然 200、化学 160、物理 160、历史 360、地理 240、外语 260、体育 240、音乐 120、美术 120。高中各科三年总计教学时数分别为：政治 240、语文 640、数学 600、生物 160、化学 240、物理 240、历史 360、地理 240、外语 480、体育 240、音乐 40、制图 80、美术 40。每周教学时数除初一为 29、初二为 31 课时外，初三及高中各年级均为 30 课时。每学年上课周数初、高各年级均为 40 周，教学总时数除初一为 1160、初二为 1240 课时外，余均为 1200 课时。1953 年后，部、省又对此作了数次调整。1981 年 4 月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初、高中各科上课时数分别为政治 384、语文 1000、数学 1026、外语 932、物理 500、化学 372、历史 266、地理 234、生理卫生 192、生物 64、体育 384、音乐 100、美术 100，总计中学阶段上课总时数为 5554 课时，高二、三年级加选修课，总计为 240 课时。各年级加劳动技术课，总计约 576 课时（劳动技术课初中 2 周，每天按 4 节计，高中 4 周，每天按 6 节计）。对教育主管部门各阶段颁布的教学计划，除个别中学因条件限制或情况特殊，执行中往往有些调整外，本地大多数中学均能严格实施。

二、教学改革

清末本地中学堂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原则，设置了物理、化学、博物等课程，并增设了音乐、图画、体育等促使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课程。从教学内容来说，是一大改革。但由于条件限制，有的未能完全按教材内容讲授，教学方法亦比较陈旧。

民国初年，本地中学按规定取消了读经讲经等课程，教学方法仍多是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变化无多。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又一度恢复读经讲经，教学中增加了封建性糟粕。

此后，本地一些中学采用“五段教学法”，并提倡运用启发式和直观教学。一般教师仍习惯于因循守旧，多数学校既无教学研究，亦无明确的教学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只要不犯“党禁”，均可随意讲授。当时乾县中学各科均成立了“教育研究会”，制订了“教育研究章程”，但有名无实。各中学虽都有一些素质较好的教员，教学上各有千秋，但多不重视教学改革。

抗日战争时期，本地一些中学的教学曾经进行过改革。1937年《陕西省中等学校战时教育实施纲要》对授课时间和各科教学内容，都作了一些改革规定。国文课讲授民族英雄抗战御侮传记、抗战论文、国防文学等；历史和地理课均以一半时间加授民族革命运动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之遗害、中国革命运动史、地区地理、国防要塞、交通建设、中国资源之研究、国耻及战时地图等。要求数学课删除与生活无关的习题，而代之以国防上的数字。要求理化课应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加授国防化学、各种武器及交通工具之制造和使用等。生物、卫生课加授与食粮、细菌、害虫、传染病有关的教材、救护及医药常识等。由于条件限制，这些规定和要求尽管未能贯彻实施，但对教学改革仍起了一定促进作用。从当时三原、乾县、泾阳等县一些中学的实际情况看，大部分教师认识到了教学内容与抗战实际结合的必要性，不少进步教师曾认真进行过尝试。在政府提倡改革教学内容的同时，当时本地一些中学的学科性课外活动一度较盛。各科都建有课外兴趣小组，学校、班级经常举行作文竞赛，论文讲演，出刊中、英文壁报，举办辩论会，读书报告会，作业展览及征文、剧评等活动。这些丰富多彩的学科课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学改革。

1949年本地解放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通知新解放区的中学一律取消反动的公民、童子军等课程，删去教材中含有严重毒素的内容，补充反

帝、反封建、反法西斯主义的新教材。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发《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中学各科教学有了统一的计划，各中学教学有了新的起色。1951年5月全省中等教育会议召开后，本地各中学积极贯彻会议精神，进一步开展教学改革。1953年，开始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学习“五环教学法”、“五个教学原则”及“五级记分法”。同年8月，全省中学校长、教导主任联席会议后，本地各中学的各项工作进一步走上正轨，不但重视了教学工作，而且“管教不管导”、“教书不育人”、“管课内不管课外”的旧教育思想也同时得到批判，纠正了一些教师的单纯业务观点和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是年泾阳县泾干中学高中升学考试名列全省第一，初中升学考试名列渭南专区第一。1956年各中学普遍推广普通话教学，以语文课为主，教师、学生坚持课内课外讲普通话。1957年，不少中学在教学中除加强教学研究、改革教学方法外，还注意研究在各科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许多学校发动师生制作教具，采集标本，搜集资料，充实和丰富教学内容，进一步推动了教学改革。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本地中学教学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中学根据省上要求，将课堂教学延伸到工厂和农村，并自办工厂、农场，下农村支援“三秋”（秋收、秋耕、秋种）。由于教学改革过分强调与政治、生产、实际相结合，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忽视了基础知识的教学，而且劳动过多，完不成教学任务，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1959年至1960年，本地各中学贯彻党中央提出的“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的指示，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教改运动。不少县设立了教改办公室，由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挂帅”，各校分别成立了有党、政、工会、团支部负责人和教师学生代表参加的教改领导小组。在教改中，注意改革教材教法中的少、慢、差、费现象，增删了一些教材，合并了一些课程门类，缩短了学时，增加了劳动和自习。1963年贯彻《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后，各中学在课堂教学改革上特别注意废除“注入式”，普遍推行“启发式”和精讲多练，教学质量显著提高。1964年，根据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关于“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革”的谈话精神和教育部《关于克服中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的要求，各中学认真分析研究了学生课业负担、教学、劳动等问题，严格控制了作业分量和考试、测验的次数。一些中学要求教师不出偏

题、怪题，对学生不搞突然袭击，各学校都减少了劳动时间和社会活动时间，减轻了作业分量，有的中学还对部分学科实行了开卷考试。这一时期，各中学规章制度比较完善，学校教学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中学大力批判所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教学改革中断。建国17年来行之有效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被完全否定。“复课闹革命”后，各学校片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偏重实践，轻视理论，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普遍放松。1974年大反“复辟”、“回潮”，大搞“开门办学”，教改围绕“农”字，普遍实行“两办”（校办工厂、农场）、“两挂”（校队挂钩、厂校挂钩）、“两专”（专业课、专业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上课，教学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在教学改革中取得显著成绩的教师被诬蔑为执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干将”，一些教改步子快、教学质量高的重点中学被诬蔑为教育战线上的“黑样板”。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本地中学的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教学改革很快受到重视。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本地各中学结合贯彻会议精神，认真执行教育部修订后颁发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坚持以教学为主的原则，采取多种措施，切实改革与加强教学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一些中学迅速把工作重点转向教学，保证了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随后，又提出“向四十五分钟要质量”的口号，大力改进课堂教学，重视基础知识传授和基本技能训练。全国中学统编教材试用后，本地各中学进一步重视常规教学，加强教研活动。有的中学还通过经常组织观摩教学、进行试卷分析，寻找教学薄弱环节，杜绝教学上的“脱纲、脱本”现象，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80年代中、后期，不少县区教育部门要求各中学认真贯彻《咸阳市中小学工作十项要求》，强化教学管理，探索教学方法。有的中学总结出“讨论式”、“三点式”、“读、讲、议、练法”等教学经验；有的中学开展评选优质课和文科赛教活动。乾县各中学普遍加强了常规教学的改革。另外，在改革教学手段、开展电化教学以及开辟第二课堂等方面，各中学亦做了许多工作，为深入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85年，市教研室组织了有全市781名初中一年级语文教师参加的初中记叙文赛教活动，有效地促进了课堂教学改革。1989年开始，全市又用三年时间展开了高中青年教师滚动式教学大讲赛，逐步缓解了高中教师中教学骨

干“青黄不接”的状况。

伴随教学改革，教学研究亦取得了良好成绩。咸阳道北铁路中学语文教师呼秀珍总结的“一体一法，一课一新”的教改经验，在铁一局系统及市属学校推广，得到了好评，由她执教的《苏州园林》课堂录像获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三等奖。兴平桑镇一中赵立志积极开展语文第二课堂活动，1988年出席广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作了题为《对语文成绩考核的一点尝试》的经验介绍。西北橡胶厂子弟学校赵克礼《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及美国“冷战”政策》和兴平化肥厂子弟学校张秀兰《甲午中日战争》分别获得了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课堂录像二等奖。

三、教学管理

清末，本地先后开办的乾州中学堂和邠州中学堂，分别由所在州劝学所管理。民国时期，设在本地的省立中学由省教育厅管理，县立中学由各县教育科管理，私立中学的教育行政亦由县教育科管理。当地解放以后，中学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各分局接管，随后名义上由陕西省教育厅（初称“文教厅”）管理，实际上大部分仍由所在专员公署直接管理。1956年，初级中学下放由县（市）管理。1978年初步改变管理体制，县办中学由县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管理，公社办中学实行县、社双重领导。1984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批转了省教育厅《关于中小学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下放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办学，谁办谁管。各县区遂陆续将完全中学、单设高中、示范性初中由县（区）办县（区）管；一般初中交乡（镇）办乡（镇）管。但其教学业务一律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管理。

清末的中学堂由堂长总管学堂各项事务，另设教务长和监学分管教学事务。民国初期，改中学堂为中学校，设校长负责管理学校全面工作。1925年后，一般中学设校长及教务、训育、事务三处，各设主任一人，其中教务主任配合校长管理学校教学事务。各教学班设级任教师，负责管理学生的学习、纪律、思想、生活等，以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建国以后，人民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学实行的训导制度，改变了教育与训导分立，统一设教导处。一般中学设有校长和教导、总务二处，每处设主任一人。教导主任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校长进行教学管理。1952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与1963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都规定中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各中学设校长一人，负责领导全校各方面工作。同时，设

教导处与总务处，每处设主任一人，其中教导主任主要负责管理教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生生活指导等事项。“文化大革命”期间，本地各中学管理体制被破坏，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设正、副主任领导和管理全校工作。“革命委员会”下设政工、教育、后勤等组，其中教育组分管教学及学工、学农、学军等“兼学”活动。1978年教育部修订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规定全日制中学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1984年9月，陕西省人民政府批转的省教育厅《关于改革中小学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的若干意见》中规定，中学试行校长负责制，试行教师聘任制，建立学校工作岗位制。1985年4月，省教育厅又发出《关于进一步搞好中小学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了继续改革的要求、总方向和总目标。据此，本地一些县（区）的中学试行聘任了校长，有些学校开始进行教师优化组合的试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这些试验大都未继续下去）。1978年以来，虽然中学的行政管理体制多有变化，但各中学的教导处协助校长负责学校教学管理的规定一直未改。

清末中学堂的监学主要负责管理学生的课业学习、成绩考核及学规检查等事项。民国时期中学的教务处主要负责拟订教学实施计划和教学的规章制度；拟订学生实验、实习计划；编排教学课程表和时间表；查阅学生作业及试卷；查阅教员自编的教材及教学实际进度；办理教员缺课、补课等。中学校长管理教学方面的主要职责是聘请或遴选各科教员，考察辅导教学，检查学生实验、学习及各科作业等。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各中学校长和教务主任对教学管理重视程度不同，因而教学要求、进度极不统一，质量也相差较大。建国以后，各级教育部门都很重视教学管理。本地各中学大都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教学管理制度，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1951年6月，陕西省中等教育会议强调指出，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工作，校长的责任就是领导全体教师和学生按照教学计划、课程标准和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学方法做好教学工作。1956年8月召开的陕西省先进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要求学校领导必须以领导教学为中心安排学校工作，校长和教导主任要认真钻研教学业务，及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会后，本地各中学在贯彻会议精神过程中，大都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了教学管理。“文化大革命”期间，建国17年来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管理经验被扣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管、卡、压”的帽子，一概否定，学校的正常管理秩序遭到破坏。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日制中学

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贯彻执行，本地各中学普遍重视和加强了教学管理。

第四节 著名中学简介

三原县南郊中学

三原县南郊中学创立于1919年4月5日，由国民党元老、邑人于右任倡导，靖国军总司令部出资，田种玉、李寿亭等筹办，由田种玉任校长。始名“渭北中学校”，校址设在三原城内东渠岸原学台公馆，不久迁入城内山西街西端学古书院旧址。1921年3月改名“陕西省立渭北中学校”。1922年2月由省教育厅接管，更名为“陕西省立第四中学校”，不久又恢复“渭北中学校”旧名。1928年1月改称“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校”。1934年改为“陕西省立三原初级中学校”。1938年增设高中班，变为完全中学。1940年1月更名“陕西省立三原中学校”。1949年六七月间，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关中联合中学”与该校合并，改名“陕甘宁边区三原中学”。建国后改名“陕西省三原中学”。1954年春迁至县城南郊南环路东段，1958年更名“三原县第一中学”，不久改称“三原县南郊中学”。“文化大革命”中曾改称“三原县中学”，不久恢复“三原县南郊中学”校名，并沿用至今。

该校建校初期为四年制初级中学（后改四年制为三年制），每年招收一至二班。学校先后聘请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上海、天津、武昌等大学毕业生和留日学生来校任教或担任校长，其中许多是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名流，如郝梦九（第二任校长）、张耀斗（第三任校长）、朱佛光、李寿亭、茹欲立、韩兆鹗、严少儒。至1937年，共计毕业17届、510名学生。1938年设立高中部后，成为一所完全中学。1948年，高、初中共有12班，学生675名，教职员38名。解放前历届毕业初中学生共计1681名，高中学生755名。

建国后，南郊中学每年在校学生约在20班以上，学生和教职员工人数量大增，冯一航、潘同和、史恒镜、李德馨、翟培伦等曾先后担任校长。1990年至1991年度有24个班，成为单设高中，在校学生1500名，教职员150余名，专任教师中，大中专学历占90%，其中中级（原中教5级）以上教师40多名，袁均昌、刘光汉、陈锡寿、梁永明等，曾获全国或省级表彰奖励。

三原南郊中学1963年被陕西省教育厅确定为10所重点中学之一；1980年确定为陕西省首批办好的16所重点中学之一；1989年又被确定为陕西省24所重点中学之一。

咸阳中学

咸阳中学始建于1952年。校址在咸阳市区东风路。1953年，被省文教厅确定为省级重点中学，由省文教厅直接领导。1958年，咸阳县与咸阳市合并后，学校更名为“咸阳市第二中学”，改由市教育局直接领导。1960年后的几年间，咸阳市第二中学曾被作为陕西省教育试验学校之一，进行中学学制改革试验。1985年，省教育厅又确定咸阳市第二中学为陕西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同年，陕西省招生委员会将该校列为陕西省试行重点高校推荐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重点中学之一。1986年恢复原咸阳中学名称。

咸阳中学建校初期，梁益堂校长动员全校师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校舍，修建了校园，并领导教师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学质量。1959年，杨绥继任校长，他采取各种措施，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团结了一大批教学骨干，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和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号召和组织师生自制教具。1962年，学生自制的“五灯示教板”荣获国家青少年科技评比一等奖。1960年高考外语成绩荣获全省第一名。1965年高中毕业升学比例达到76.8%。先后荣获体育竞赛各项团体奖90余项，第一名60余项。5名运动员参加了全国中学田径运动会，8名运动员曾获得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9个项目的第一名，刷新了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9个项目的记录。推行“体育锻炼标准”以后，学生达标人数的百分比多次名列全市第一。

从1952年到1965年，咸阳中学培养高中毕业生3100人，其中2200人升入各类大专院校。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到1990年7月，又有7000余名初、高中学生从该校毕业，其中2000人升入高校或中等专业学校。

1981年11月，日本国德岛县城北高校与咸阳市第二中学结为姊妹学校。1983年4月，港澳友好访华团一行8人来校参观访问，同年8月，日本德岛县城北高校校友访华团一行14人来校访问。该校先后接待过加拿大、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友好人士。

咸阳中学初创时有高中班6个，初中班5个，学生563名，到1953年秋季班级达16个。80年代末每年稳定在25个班左右，分高、初中二部，学制6年，以高中为主，学生每班60人以上，在校总数在1600人左右，教职工110余名，在83名专任教师中，大专毕业生且受过师范专业训练的占教职工总数的95%以上，其中有高级职称的32人，中级职称的30人，初级职称的21人。图书馆有藏书62000余册，古籍70余部。理化、生物实验室设备先

进，可以完成初高中教学要求的全部实验。一幢包括语音室、电子计算机和电影放映室在内的教学实验楼已于1989年秋季建成。

咸阳市 1944 年普通中学一览表

表 1-4

校 名	校址	校长	科别	班级	学生	教职员	岁出经费 (元)	备注
省立三原中学	三原	关中哲	高、初中	高 9、初 3	630	41	156, 402	
省立三原女子中学	三原	陈济仓	高、初中	高 3、初 4	390	27	90, 058	
省立乾县中学	乾县	王丙	高、初中	高 6、初 4	540	40	143, 786	
武功县立初级中学	武功	蒋友亨	初中、简师	初 7、简 1	470	27	145, 200	
礼泉县立昭陵中学	礼泉	赵斌生	初中、简师	初 6、简 2	460	27	133, 680	
三原县立初级中学	三原	曹健吾	初中、简师	初 9、简 1	590	34	145, 200	
长武县立初级中学	长武	孟肇庆	初中	初 6	360	22	86160	
邠县县立中学	彬县	李宏超	高、初中	高 1, 初 6	410	27	109, 920	
旬邑县立初级中学	旬邑		初中	初 3	180	14	46, 690	
永寿县立初级中学	永寿	严志壮	初中, 简师	初 6, 简 1	410	26	109, 920	
淳化县立初级中学	淳化	张展策	初中, 简师	初 4, 简 1	290	20	82, 200	
咸阳县立周陵初级中学	咸阳	王藩城	初中, 简师	初 9, 简 1	580	34	145, 200	
私立崇美初级中学	三原	王令德	初中	初 6	360	22	62, 910	立案
私立泾干初级中学	泾阳	刘振之	初中	初 4	240	16	45, 710	立案
私立池阳初级中学	三原	李芝田	初中	初 6	360	20	62, 910	立案
私立振国中学	三原	王予元	高、初中	高 3, 初 6	510	34	99, 543	立案
私立民治初级中学	三原	吴伯坚	初中	初 8	480	27	76, 950	立案
附: 乾县县立师范简易学校	乾县	李作人	附设初中	初 3				

说明: 此表摘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陕西省 33 年度第一学期中等学校一览表》。

咸阳市重点中学一览表

表 1-5

公布时间	校 名	说 明
1951 年 6 月	咸阳周陵中学	省教育厅确定为全省首批实行《中学暂行规定》的 4 所重点中学之一
1963 年	三原南郊中学	省教育厅确定为全省扩大高中招生范围的 10 所重点中学之一
1980 年 10 月	三原县南郊中学	省教育厅确定为全省首批办好的 16 所重点中学之一
1985 年	咸阳市第二中学 (现咸阳中学)	省教育厅增补为全省首批办好的 19 所重点中学之一
1989 年 10 月	咸阳中学 三原南郊中学	省教育厅确定为全省 24 所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
	咸阳市周陵中学 兴平县南郊中学 泾阳县泾干中学 杨陵中学 武功县普集中学 秦都区育才中学 旬邑中学 彬县中学 永寿中学 长武中学 乾县第一中学 礼泉第一中学 淳化中学 咸阳市实验中学	省教育厅确定的 98 所县(区)属重点中学

第五章 普通高等教育

第一节 发展概况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陕西学政沈卫就宏道书院改立的“宏道大学堂”，成为当时陕西和西北地区惟一的工科大学，也是本地创建最早的高等学校，旋即又合并味经书院和崇实书院书籍款项，改为“宏道高等学堂”。学堂初建时曾派人赴日本请教习、购机器，拟办织、染、窑三业。实办染织、窑业二科，修业期限五年。清宣统初年（1909）改为中等工业学堂，前后开办仅有7年。

1934年创建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业大学前身）是本地民国期间建立最早的高等学校。

1946年，国立西北工学院迁至咸阳，校址在咸阳县治北门外（即今西藏民族学院所在地）。该校创建于1938年底，系由北平大学工学院、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而成，李书田为筹备主任，院址在城固县古路坝。1939年至1943年，赖琏、潘承孝先后任院长。初设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水利、航空等系。5月，复充实工科研究所及工程学术推广部。1941年3月，添工程管理学系，并招大学先修班。原有院址，遂不敷用，又在城固县七皇寺建房数百间，设立分院，又增设应用物理、应用数学两系。1945年奉令迁移西安，借早兹巷公字一号及咸阳酒精厂址为院址，招标修建。1947年1月开学，一年级及先修班在西安，二、三、四年级在咸阳，分别上课，是当时西北地区惟一的一所高等工科大学。1949年咸阳解放时，在校教师77人，学生554人。建国后，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调整，到1956年改建成为国防性质的高等学校，设4系12专业，教职工1013人，其中教师343人，共有学生2129人。从1949年至1957年，西北工学院共培养出各科毕业生2854人。1957年10月，西北工学院全部迁往西安，与西安航空学院合并，成立了西北工业大学。

1957年国家在原西北工学院旧址筹建西藏公学，1965年改名西藏民族学院，直属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要面向西藏招收各族青年，也在陕西招收部分学员。

1961年，陕西中医学院迁至咸阳。其前身是1952年创建于西安的西北中医进修学校。

1970年，西北轻工业学院在咸阳建立，其前身是1958年创办的北京轻工业学院，1970年迁至咸阳，与咸阳轻工业学院筹备处合并，成为西北轻工业学院。

1978年5月，咸阳师范专科学校成立，该校是本地惟一的普通高等师范学校。

1979年西北林学院成立，其前身是西北农学院林学系。

改革开放以来，咸阳地区的高等学校积极开展横向联合。西北农业大学与陕西澄城县签订协议，围绕“渭北旱原冬小麦增产技术综合研究”，开展了十几项重大技术研究，使这个县的冬小麦从1981年到1984年的4年间增产3亿斤，总产值达5000多万元。西北轻工业学院与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实行校际联合，前者负责工艺设计，后者负责建筑设计，取长补短，共同为西北发展轻工业进行整体配套服务。西北农业大学对西农莎能奶山羊的推广，使陕西成为全国著名的奶山羊之乡，全省共有奶山羊74万多只，约占全国奶山羊的四分之一。西北农业大学和西北轻工业学院、陕西中医学院、西北林学院等与陕西贫困县——麟游县签订了长期协议，大幅度优惠和无偿给该县转让科技成果，提供科技服务，有效促进了该县的脱贫致富。这些院校还为促进本地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在白水县经过研究桃小食心虫发生规律，狠抓地下和树上防治，至1985年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危害严重的苹果食心虫虫果率，由过去的30%—50%下降到2.36%，全县2万亩苹果产量达600万公斤，创历史记录，比1983年增产148%。西北农大园艺系与礼泉等13个县（市）签订合同，采用技术培训、巡回指导、现场参观、组织交流经验等方式，大力推广果品蔬菜人工干制技术，共建各类烘房1412座，可使农民增加收入1000多万元。这些学校还组织农作物栽培技术重大课题的联合攻关，促进了全省主要农作物的大面积丰收。如西北农业大学在乾县建立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乾陵综合试验基地，先后组织了9个系部、13个学科的近百名教师、研究生，共开展了16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使乾陵试验区农业收入大幅度增加。咸阳地区的高等学校贯

彻中共中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有效地促进了本地和陕西的经济建设。

第二节 普通高等院校

一、西北农业大学

西北农业大学（以下简称“西农”），是西北地区建立最早且至今仍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所多学科综合性农业大学，被誉为“大西北高级农业科教人才摇篮”。学校位于咸阳市杨陵区农业科技城中。校区占地4000余亩，总建筑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

1932年秋，经于右任、焦易堂、杨虎城等亲自踏勘校址，进行筹建。1934年开始招生，于右任为首任校长。1936年正式建成，命名为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华北一带的大专院校纷纷内迁。1938年前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和河南大学畜牧系相继并入西农，把原来的农艺、森林、园艺、畜牧、水利和农业经济6个组扩大为农艺学、森林学、园林学、畜牧兽医学、农田水利和农业化学6个系，于1939年改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为国立西北农学院，这期间任校长的有辛树帜和周伯敏。1944年5月至1949年5月武功解放期间，先后有邹树文、田培林、章文才、唐得源任校长。1949年5月当地解放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经营，飞跃发展，成果卓越，成为中国西北著名的高等农业学府。198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改称西北农业大学。从1949年到1990年，历届校长有王纲、邵敬勋、李赋都、辛树帜、刘敬修、康迪、万建中、张岳。全校设农学、植保、农化、园艺、农经、畜牧、水利和食品科学等10个系及基础课、社会科学和外语3个部，18个本科专业和3个专科，并设有管理干部分院和一个经营服务中心。在校生近3000人，其中研究生320多人。有教职工2000多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38人，讲师414人。学校面向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招生。建国以来，为国家培养了两万多名各种农业建设人才，取得科研成果528项，获得国家、部（省）奖励的有84项106奖次。有25个学科专业有权授予硕士学位，有10个学科专业有权授予博士学位，大学本科各专业都有学士学位授予权，全校设有13个研究室，100多个实验室。有一个藏有60余万册图书和1200余种中外期刊的图书馆，一个占有耕地近两千亩的教学实验农场，和拥有建筑

面积达 14000 多平方米的中心实验大楼。

全校有 9 种学术刊物向国内外发行。同西德以及美国的部分高等农业科技院校建立了校际联系。每年有不少外国专家、教授、学者来校讲学考察，合作进行科学研究。西农也有一批教师或在国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或合作进行科研、考察活动。著名教授如赵洪璋、虞宏正（2 人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尧、万建中、石声汉、刘荫武等，都为农业科学技术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西北林学院

西北林学院是林业部所属的高等院校之一。校址设在咸阳市杨陵区邠城路，建于 1979 年，前身是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业大学）林学系。校园占地 513 亩，建筑面积 82000 平方米，在校生 1200 余人，图书资料 16 万余册，固定资产总值 3100 万元（其中仪器设备总值 350 多万元）。教师 300 余人，其中讲师 120 余人，副教授以上职称 60 余人。根据教学科研的需要，院内成立了森林植物、森林生态、水土保持、森林保护、林木遗传育种等 13 个研究室，并建立了装配有数据处理、样品分析等大型精密测试设备的中心实验室和基础、专业课实验室 45 个。学院还设有教学实验苗圃、林场、附属木材加工厂、林特产品加工厂及印刷厂等。学院设林学、水土保持（含防护林专门化）、沙漠治理、森林保护、木材加工、经济林等本科专业及林学、园林、经济林、木材加工、林业经济管理等专科专业。学院 7 个学科有权授予硕士学位。此外还举办函授、干部专修科及《专业证书》教学班等形式的成人高等教育。学院还增设了一些林业生产上急需的新专业，已成为一个以生物学科为主，具有西北地区特色的高等林业院校。

学院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校际交流活动。建院以后，学院相继开展了 160 余项科研课题，有 50 余项取得成果，其中获部、委、省级以上奖励 21 项，得到推广应用的成果达 20 余项，为科技兴林做出了贡献。学院与美国、奥地利等国的一些林业院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先后聘请了来自美国、联邦德国、奥地利、加拿大等 10 个国家的 80 多名专家、学者来院访问、讲学和合作研究，与国外联合培养研究生并选派了不少教师出国进修、考察、合作研究或攻读博士学位。

三、西北轻工业学院

西北轻工业学院是轻工业部直属的多学科性高等工业院校，是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之一，面向全国招生。其前身北京轻工业学院创办于1958年6月，1970年迁至咸阳，与咸阳轻工业学院筹备处合并改为现名。学院占地388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有藏书50余万册的图书馆。

学校设7个系20个专业，另设基础课部和成人教育部。到1990年，在校学生2600余名，研究生100余名，教职工1100余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30名，讲师、工程师等中级技术人员300名。学院设有应用化学、微机应用、轻工设计3个研究所和10个研究室及40多个设备先进的实验室，并建有现代化的电教中心、计算机中心和分析测试中心。80年代承担的国家“六五”、“七五”攻关项目，先后有40项科研成果获得科学大会奖和轻工部、省级奖励，有400多篇论文在国外学术会议或杂志上发表。学院1984年成立了科技开发实业公司，利用科研成果为经济建设服务，1985年获全国首届科技成果交易会“技术卖方优胜奖”和“陕西省科技成果交易会”一等奖，1987年学院科技开发公司被评为陕西省横向经济联合先进单位。学院编辑出版的《西北轻工业学院学报》已被定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轻工技术资料》和《轻工高教研究》全国发行。

改革开放以来，学院先后与美、英、日等国高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1986年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斯陶特分校结为姊妹学校。先后有多名外籍专家来院讲学和进行科研工作。

四、陕西中医学院

陕西中医学院是我国西北地区建立最早的一所培养高级中医药人才的高等学校，隶属陕西省教育委员会。它的前身是设在西安的西北中医进修学校，创建于1952年初，同年9月改名为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1958年扩建为陕西中医学院，1961年由西安迁至咸阳市渭阳路。学院占地270亩（含附属医院），建筑面积40000平方米，固定资产1000万元，拥有实验楼、教学楼、电教楼、图书楼等。学院有教职工1300名，其中正副教授、正副主任医师120名；讲师、主治医师270名；助教、医师200名。设有医疗系、药学系、针灸系、函授成人教育部、研究生科、职业技术分校等系科。有12个学科及

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在校学生 1095 人，其中本科生 922 名，大专生 102 名，硕士研究生 71 名，在册中医大专函授生 220 名。为了满足社会对中医人才的需求，该院还开展了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分配及按规定招收代培研究生及本科生。该院被卫生部确定为高等中医院校师资培训基地之一。学院编辑出版的刊物有《陕西中医学院学报》及《陕西中医函授》两种杂志和几种内部交流刊物。学院先后派出 20 余人次去日本、美国、苏丹等国讲学、考察并进行医疗咨询服务，在马来西亚设有食疗中心。学院科研工作重点是在开展中医药文献整理、中医学基础理论、中医临床及中医学开发利用的研究。在科研手段上注意应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实行厂校挂钩，开展科技扶贫、面向生产。截止 1990 年，已有 45 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国家卫生部、陕西省科委、省卫生厅、省中医管理局以上的科研成果奖。

五、西藏民族学院

西藏民族学院是为西藏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及各类专业人才的高等综合院校，直属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名“西藏公学”，1957 年筹建，1958 年 9 月正式开学，1965 年 7 月 1 日改今名。校址位于咸阳市文汇东路，占地 613 亩，建筑面积 98000 平方米。

学院主要面向西藏招收各族青年，也在陕西招收部分学员，毕业后面向西藏分配，干部学员仍回原单位。设有政治、语文、历史、医药、体育、财经 6 个系，另有干训部、预科、民族研究所和图书馆等 10 个教学和科研单位。在校学生 1460 人，其中包括本科、专科、中专、成人专科、成人中专及各种专业知识进修学员。多年来，学院从西藏实际出发，服从经济建设需要，实行多规格、多层次、多形式、多学科的办学方式，学制有短有长是学院的主要特点。

学院设有电教中心、附属医院、附属中小学、保育院、印刷厂、校办工厂等。1986 年新建图书馆大楼建筑面积 4000 多平方米，藏书 30 余万册。学院有各种教学实验室 21 个，教学仪器 1220 件。体育系的运动场地和设施也有一定规模。学院有教职工 778 人，其中专任教师 225 人。教师中教授 1 人，副教授 28 人，主任医师 2 人，副主任医师 12 人，中学高级教师 4 人，讲师 104 人，工程师 6 人，初级技术职称 88 人。建院 30 多年来，已为西藏培养出 14000 余名民族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青年 12000 余人，毕业后遍布西藏各个地区，大都成为西藏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

量,不少人担负了领导工作。

学院从1980年至1988年6月,在全国各地报刊公开发表论文342篇,编写了《西藏审美文化》等书9种,并承担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中的《门巴族文学史》和《珞巴族文学史》的编写任务。此外还有《藏汉对经常用词典》等工具类图书7种。

六、咸阳师范专科学校

咸阳师范专科学校是咸阳地区惟一的一所全日制高等师范学校,主要面向咸阳市招生和分配。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初级中学教师。它的前身是陕西师范大学咸阳专修科,创建于1978年5月,创建时校址设周至县哑柏镇,开设中文、数学、物理、化学4个专业,学制两年。同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易名为咸阳师范专科学校。1983年起,又增设了英语、历史、地理3个专业。学制改为3年。1984年元月,学校全部搬迁至咸阳市渭城区杜家堡北原新址。占地150亩,校舍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150多万元,建成物理、化学、地理等专业实验室20个,可开出实验项目235个。学校出版《咸阳师专学报》及《咸阳师专》校刊。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55篇,文学艺术作品300余篇,其中35篇论文获省级科研奖。到1990年,已有10届3000余名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1988年经省高教局推荐,学校荣获“全国优秀师专”称号。

第六章 职业技术教育

第一节 职业教育

咸阳地区的职业教育,可追溯至先周。武功县故城东门外有“教稼台”,传为周族先祖后稷教民稼穡之处。明洪武年间(1368—1398),武功县知县严祀在县城大什字东建有医学舍。洪武十四年(1381),乾州曾于州城北街建州医学舍、阴阳学舍。清雍正六年(1728),兴平县杨双山在家乡桑家镇西门外

建立“养素园”，耕读兼顾，教养并举，致力于农桑畜牧。“养素园”既是杨双山的讲学处，也是研习农桑的实验场所。光绪十八年（1892），泾阳县县令涂官俊首倡养蚕植桑，并刊印《豳风广义》以教乡民。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受维新思想影响，相继兴办了一些实业性职业技术学校或讲习所。先有刘古愚在味经书院创立的“时务斋”，继有周楠在泾干书院“农艺科”基础上创设的“农艺学堂”，刘懋官设立的“艺徒学堂”，以及在崇实书院设立的“工业学堂”。清宣统元年（1909），同盟会会员张深如等去上海、汉口等地考察时，给兴平学堂购回新法织布机，招收工读生学习织布，后又创办“复豳桑园”，发展蚕桑。宣统二年（1910），咸阳知县刘林立、绅士苏凤章倡议“咸阳县立初等农业学堂”，校址设县城巾街，岁支银600两，辛亥革命时停办。辛亥革命后宏道中等工业学堂因经费不继，一度改为“染织传习所”，1913年改名为“陕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1922年改为“陕西省立第三职业学校”，1934年改称“陕西省立三原初级工业职业学校”。1913年，长武县在马神庙成立“实业女学校”（后迁吕祖洞），提取庙产以充学资，教材采用《蒙学读》，兼习纺线织布技术。1921年，泾阳县乡绅毛念修在鲁桥镇（今属三原县）设立“竞志习艺所”，男女生徒近200人，用人力车机织布。1937年，泾阳县云阳培英小学内附设纺织技术班，实行半工半读，学制二年，生徒100人，主办人崔贯一。1942年，兴平县在县城马号南成立“双山实用职业学校”。该校是“双山实业促进社”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先后办过养蜂班、园艺班、染织班、会计班。各班都只办了一期，每期约30多人。韩光奇任校长。岁出经费8400元。1945年，陕西省教育厅在咸阳县渭河南社树庄成立“陕西省咸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直属省教育厅管理，校长刘丹如。设有应用化学、制革两个专业，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三年。1946年至1948年共招生361名。建国后，尚有学生6班，共200人，教职工32人。1965年8月，学校改为咸阳县第一初级中学，职业班学生并入其他学校。1946年冬，乾县县长杨培森及各界人士在县城东大街筹建县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经一年筹备，于1947年8月成立。学校设农科两班，招初中毕业生100名，学制三年，首任校长王武亭。1948年学校分农艺、园艺两科，共招生94人，校长田承荃。解放后撤销。

建国后，地方政府将原有的私立职业技术学校改为国家办学，本着“积极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使其正常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的七年中，职业教育同整个教育事业一道有步骤地进行了改革并获

得了发展。1958年，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实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举。各县市相继办起了一批农业中学，办学形式、规模、学制无统一要求，因时因地制宜，农忙少办，此起彼落，至1961年大多自行消失。

1963年后，又兴办农业中学。1964年，在发展耕读小学的同时，扩大试办农业中学74所，学生达6360人。在此基础上试办农业中等技术学校，实行半耕半读。1964年下半年，开办了三原、咸阳两所职业学校。三原职校4个班，收完小毕业生，设植保、园艺专业，由咸阳专署委托三原县代管。咸阳职校4个班（完小、初中各两班），设植保、兽医、水电3个专业，由咸阳市主办。1965年将三原、咸阳两校改为半耕半读农业中等技术学校，当年全地区共有农业中等技校4所，11个班，学生514人（女193），教职工53人。另有农业中学44所，学生4051人，教职工149人。学生流动性大，不很巩固。1966年初，全地区农中发展到292所，学生19820人。一般是分散走读，初级技术性的居多。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部停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深入贯彻，生产责任制逐步完善，多种经营劳动致富已成为农村的突出特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突现出来。1982年5月，咸阳行署召开县长会议提出办好农业中学，并且迅速选址建校、配备师资，兴办了13所农业中学。1983年，农村职业中学达到16所（其中10所由普通中学改办），学生2700人，开设的专业技术课程有农作物种植、植物栽培、养殖、园林、牲畜兽医、建筑工艺等。

1984年，全市城乡单设职业中学发展到19所，附设职业班9个，在校生5333人，专业设置渐趋合理，领导班子、师资力量、办学条件有所加强，出现了一些办得较好的职业学校。其中，秦都区第二职业中学、三原县独李职业中学和礼泉县西张堡职业中学受到省教育厅奖励。1985年，全市企业办单设职校1所，附设职业班增加到19所，在校生2698人，全市职业技术教育基建总投资达250万元。同时，在专业设置上，南部平原地区向第三产业发展，北部山区在开设果林、畜牧兽医、农学专业的同时，也设置建筑、刺绣、家用电器修理等专业，使全市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门类达到60多种。1986年，全市单设职业中学达25所，附设职业班33个，在校生骤增至8312人，职校毕业生就业分配门路得到了进一步开拓。

1987年，全市有8所职校的10个专业实行跨县区招生，共招生430人，其中有渭城二职中的幼师专业，泾阳职中的建筑专业，三原独李职中的村建专业，杨陵职中的园林花卉专业，乾县上官职中的服装专业，永寿职中的戏

剧专业，兴平庄头职中的幼师、烹饪专业，礼泉职中的刺绣、美术、特种工艺专业。全市还推行“一挂两联”，即职校与厂矿企业、乡镇企业挂钩；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联合办学，企业与企业联合办学，发挥了社会办学的积极性，为招生、师资、经费、设备、实习以及学生就业等，拓宽了渠道。

1988年，单设职中达到29所，附设职业班26个。经过充实完善生产实习基地设施，加强学生实习环节，提高创收能力，职中人均收入增加30元以上。同年4月，市教育局组织了赴京职业教育工艺美术作品展览，在京展出工美作品4000多件，参观者近万人次。中国教育电视台录制了《秦川奇葩》电视录像片在全国播映。同年，全市有8个县的14所职中直接与部门企业挂钩，办起生产实习工厂21个，小农场7处126亩，实习站16个。如淳化秦庄职中，配合县科委星火计划，发展果林专业，开辟50亩果林基地；乾县上官职中办起了教具厂、服装厂，年创收利润3万元；礼泉西张堡职中特种工艺专业搞皮影制作，创收外汇数十万元。全市职中年总产值达122.23万元，纯利润22.9万元。

到1990年，全市单设职中增至32所，附设职业班27个，在校生12200人，专业60多个。有11个骨干专业实行跨县区招生，共招700余人。泾阳职中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示范职业高中，三原独李职中、长武职中被省教委初步确定为省级职中示范点。同年，还在泾阳、三原、长武、旬邑、杨陵5县区开展了农科教统筹工作，其中泾阳县成立了直接隶属于县政府的农科教统筹办公室，并单列了工作经费，有效地促进了此项工作。

是年，市上成立了城区职业教育就业领导小组，制定了发展城区职业教育若干问题的暂行办法。城区职校的办学点增加到19个，在校生达到2900多人，其中企业、行业办职校学生占城区地方职校学生的60%。同时采取部门联合办学的形式，其中教育部门与卫生部门联合办的卫生专业，实行统一布点、统一招生、统一教材、统一考试。学生毕业由两家共同审核发证。教育部门与城建部门联合办的建筑专业，实行人才预测培养，使毕业生对口率大大提高。

咸阳的职业教育，依照积极发展、按需施教、灵活多样、注重实效的工作方针，已形成了建筑、烹饪、财会、幼师、机电、旅游、服装、工艺、畜牧、医疗、农产品加工和农机维修等12个骨干专业，并扩大了办学规模，建立起了多规格、多层次的职教网络。

职业中学的招生与普通高中同时进行，毕业不包分配。就业单位录用为

干部的，按中专毕业对待；录用为工人的，按技工学校毕业对待。

建国以来，随着本地工业交通等事业的发展，不少国营大中型企业和省市有关部门，还相继创办了20所技工学校。这些培养各类技术工人的技工学校与培养各类职业技术人才的职业中学相辅相成，为本地和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新型劳动者。

第二节 中等专业技术教育

一、中等师范教育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兴平县改槐里书院为单级师范学堂，有1名教员，40多名学生。同年，泾阳县人蔡宝善将设在泾干书院内的高等小学堂改为“泾阳县官立初级师范学堂”，知县雷天裕亲任监督，招学生18人，开设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体操等课程。学生逐年递增，到光绪三十四年为30名。清宣统二年（1910）知县周楠改办为“农艺学堂”，师范学堂遂告停办。民国初年，武功故城南关关帝庙有“师范传习所”一所，由李致道主持，只办了一年。同时，永寿县高级学堂内曾附设“师范讲习所”，招收学员10名，讲习期一年。1919年，于鹤九在淳化县县城设立“师范传习所”。1921年，三原县成立“陕西师范”，隶属陕西省教育厅，不久改名为“陕西省第三师范学校”，首任校长张用童。同年，武功县长赵任卿倡办武功单级师范一处，学生50人，不到一年停办。1923年，长武县“单级师范讲习所”成立，高维岳任所长。1924年礼泉县创办“单级师范讲习所”，设一个班，学员45名。兴平县将原单级师范改称“兴平县立师范讲习所”，附设县立高级小学校内。县立师范讲习所设主任一人，由教育局局长尹浩兼任，副主任由县立高小校长兼任，利用县高小的师资与教学设施。讲习所招收高小毕业生，期限2年。设国语、算术、自然、史地、生理卫生、教育史、心理学、伦理学、小学行政及组织、教学法等课程。学生毕业后在乡村初级小学任教。1927年陕西省教育厅核准兴平县单级师范讲习所彭志高等43人毕业。县立单级师范讲习所还于每年暑期借县立高级小学校址及教员培训初小教员。1929年，因灾荒停办。1926年，泾阳县于文昌阁办单级师范1班，后因战乱停办。1931年，县长刘佛吾与地方士绅协商，筹办“师范讲习所”于姚家巷小学东院，招高小毕业生50名，由骆荫轩负责，开

设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儿童心理、教学法、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学制一年半。讲习所学生多系贫寒子弟，每月每人发生活费5元。1932年暑期，第一期结业，大部分于次年春任教于泾阳县乡村小学，少数人参加了社会工作，何长庆、杨子敬等北上延安参加了革命，讲习所只办1期，因经费不支停办。1934年，乾县创办乡村教师训练所，址设城内北街，牛方珊任所长。训练所招收高小及初中毕业生，每期半年，共办2期，培训乡村小学教师150余人。

1934年，三原县立初级中学附设简易师范班。此班一直办至1948年，其间还办过1期师训班。1937年，陕西省立邠州师范学校在邠县成立，招简师生100名。1942年起，同时招高师生。1939年，邠州师范学校附设了“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连办2期。

1941年，乾县在县城南门外火神庙创办简易师范学校。是年秋，从高小毕业生中首招3个四年制简易师范班，约190人；一个三年制的初中班60人，教职员14人，首任校长何守之。1942年后简师班学制由4年改为3年，1945年发展到12个班，学生508人，教职员30余人。开设课程有公民、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文、生理卫生、动物学、植物学、教育学、教育行政管理、农业经济合作、美术、体育等。到1949年撤销时，共毕业5届约290名学生。

1942年，兴平县立初级中学附设简易师范科，招收1班，51名学生，学制4年。前后共招6期，毕业学生176名，课程设党义、公民、国语、算术、历史、地理、植物、动物、化学、教育概论、教育心理、乡村教育、民众教育、教学法、教育行政等。1944年，师范科又开办了师训班，培训在初小任教2年以上的教员，学习期限1年，人数45名，只办1期。1950年县中附设简易师范科停办。

1943年，枸邑县始招简师班，附设于初级中学内，学制3年。1948年停办。1944年还招师训班1期，学员40名，学制1年，主要培训乡村初小任教1年以上者，次年停招。同年秋，长武中学招收师训班1班，学员29名，学制1年，毕业后停招；又附设简师班，学员27名，学制3年。同年泾阳县创办简易师范学校，邓霖生为校长，始招短训班1期，又续招四年制新生120名。课程开设教育学、儿童心理学以及其他与中等学校相同的课目。此年8月，因校舍短缺，迁至县西北之桥底镇原仲麓中学旧址，并续行扩建。同年，醴泉昭陵中学增设小学师资训练班，修业一年，结业后派往乡村小学任

教。同年又招收首批简易师范班，学制3年，每年招收1班60名学生。

1945年，咸阳县筹建简易师范学校，省教育厅委任魏江枫为校长，8月开学，将原附设在周陵中学的简师秋三六级和春三六级两班99名学生接收过来。学校初创时借用城关镇中心学校两座大教室，以后县政府拨给凤凰台以北的老君庙和公共体育场作为校址，继又拨给北极宫和城关镇公所等处，校舍得以扩大。1947年，咸阳县政府将东北中学和县卫生院旧址划归咸阳简易师范学校作为永久校址。1948年，李祯祥接任校长，继续扩建新校舍。建国前，共毕业260人。

1946年11月，武功县成立简易师范学校，校址设在县城东门外东岳庙，共有学生90多名，郭士俊任校长，学制3年。该校一直维持到武功县解放前夕。

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在本地办过师范教育。1938年，鲁迅师范由陕北延长县迁至关中分区驻地柜邑县马家堡，1940年，在柜邑县马家堡创办了边区第二师范。鲁迅师范迁到柜邑时有3个班，学生130余人，学生来自邠县、长武、柜邑、宜君、韩城等县。学生入学先进行编级测验，然后按文化程度分别编入师范班和预备班。学习期限一般为6个月。1939年春，招师范班3个，预备班1个，新办高师班1个，共计5个班，学生达300余名，是鲁迅师范发展的最盛时期，是年7月停办。1942年边区第二师范改称“关中师范”，一直办到当地解放。这两所学校均为边区教育和革命事业培训了不少人才。

建国以后，咸阳地区的中等师范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除邠县师范和乾县师范外，又陆续创办过咸阳、武功、兴平3所师范。

陕西省邠县师范学校创建于1937年，曾历经几个历史阶段，校名亦屡经变易。创建阶段招收四年制简师班，从创建到1949年，历时12年，培养8届简师学生650人，7届中师学生370人，1949年停办。1958年恢复到1962年停办，4年中培训中师学生120人，初师学生160人，加上幼师、中教训练班，共培养小学教师400多人。1978年又恢复，分文理两科，2年制，培养初中教师。1983年后，按中等师范学校的章程和教学大纲办学，正式定名为陕西省彬县师范学校。

陕西省乾县师范学校1945年9月创建，初名陕西省立乾州师范。后来，校名、学制、培养对象等屡经更改，学校几次停办，几次恢复。到1990年，学校规模及教职工数、班级数、在校生数和毕业生累计数，均为咸阳市中等

师范学校之冠，1989年被评为陕西省先进师范学校。

咸阳市师范学校，1958年经咸阳市政府批准筹建，1959年9月开学，校址位于市区西（安）兰（州）公路中段，占地30亩，1959年有教职员29人，专任教师18人，书记兼校长为苏建民。建校初期招收初师两班100人，学制3年，为解决教师严重不足，又从社会知识青年中招收50人，培养3个月分配小学任教。1960年9月招收中师和幼师各两班共200人，中师班学制3年，主要为初中培养师资；幼师班招完小毕业生，学制半年，为小学培养师资。1961年，由各校保送，中师生1班50名，学制3年，1962年4月停办。

武功县师范学校，建成于1958年，始招初中毕业生4个班，学制3年，中师招收武功、兴平、扶风、眉县、岐山和周至6县学生。后又增设初师和幼师，到1961年发展为13个班，在校生725名，1963年停办。1974年恢复，命名为“凤翔师范武功分校”，采用推荐办法招生，到1976年有6个班、270多名学生。1977年扩建校舍，增添设备，恢复武功师范学校校名，直属宝鸡市领导。1980年以后，学校有3个年级12个教学班，学生保持在600人左右。到1989年，先后招收18届，毕业16届，培养初中、小学教师共3760名，培训民办教师200多名，学校发展极盛时有学生18个班，在校学生840人，教职工110名。1988年初，划归咸阳市教育局领导。从1988年起三年时间，宝鸡地区学生、教师逐步退出，咸阳地区教师逐步进入，不再招收扶风、眉县、岐山学生。除杨陵区、武功县学生仍在此就学外，改招兴平县、秦都区、渭城区学生。到1990年底，有学生583人，在编教师76人。

兴平师范学校，初建于1960年9月，当时称兴平第二师范学校（第一师范为武功师范），招收三年制学生4班166人。1961年招1班56人，任务是培养小学和部分初中教师，并轮训小学教师。1962年5月停办。

二、中等技术教育

清末三原宏道中等工业学堂，不仅是本地最早的一所中等技术学校，也是全省乃至西北地区最早的中等技术学校，后来改为职业学校。截至1949年解放时，咸阳境内只有一所中等技术学校，这就是1942年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的堂妹李翥仪在泾阳县杨梧村创办的“仪祉农业学园”。到1990年，咸阳地区共有各类中等技术学校9所。除陕西省仪祉农业学校外，还有1950年创建的咸阳机器制造学校，1952年由西安西北工业技校分设的陕西省纺织工业学校，以及陕西省水利学校、陕西省农业学校、陕西省煤炭工业学校、陕西

省农业机械化学校、陕西省财经学校和咸阳市卫生学校。

陕西省水利学校，其前身可追溯到1952年春，当时西北水利部决定迁西安水利技术训练班于武功车站附近，命名为“西北水利学校”。1953年将宁夏、甘肃、汉中等地设立的水利班先后并入，1955年改校名为“水利部武功水利学校”。1958年以后陆续将三原水利学校以及商洛、延安两地的水利学校并入，遂改名为“陕西省武功水利学校”，属省水利局领导。1962年经济困难时，该校放假达一年。1963年9月复学招生，1967年改校名为“陕西省水利学校”。该校经过多次调整，到1989年共设5个专业，学制4年，有学生1200多名，面向西北五省区招生。

陕西省武功农业学校，其前身为1934年建成的西北农学院附设高级职业学校，到1953年1月，西北教育局将西北农学院的林技班和农技班并入，成立“武功农业学校”，并新建校于武功车站附近。1956年7月改由省农业厅领导，改校名为“陕西省武功农业学校”。1971年并入眉县林业学校，遂改名为“陕西省农林学校”，属省农牧厅领导。1987年省林业学校成立，遂改名为“陕西省农业学校”。有11个专业，学生1200多名。

陕西省煤炭工业学校是能源部统配煤矿总公司直属、陕西省煤炭工业局代管的一所煤炭工业中等专业学校。其前身是西安煤矿学校，创建于1953年。1961年易名为蒲城煤矿学校，1974年易名陕西省煤矿学校。1988年迁至咸阳市文林路，改称今名。该校设14个专业，学生1200多人。

陕西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原名茂陵农业机械化学校，位于咸阳市西郊茂陵车站东，创建于1956年9月，隶属陕西省农牧厅。学校设4个专业，学制4年，在校生737人。

陕西省财经学校于1960年在西安创建，1985年经省政府批准迁建咸阳市文林路，隶属省财政厅，培养财经管理方面的中级应用人才，在校生700名。学校开设5个专业，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

咸阳市卫生学校成立于1970年2月。1969年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卫生组决定将西安医学院附设护士学校划归咸阳地区建制。1970年护士学校教职工33人及全部设备搬迁至三原县山西街71号，4月定名为“咸阳地区三原卫生学校”。1977年经陕西省卫生局批准，搬迁到咸阳市建校。1978年10月更名为“咸阳地区卫生学校”。1979年陆续搬迁到咸阳市毕原路。至1982年，1984年更名为“咸阳市卫生学校”，设护士等4个专业，在校生660人。到1990年，短期培养各类医护人员2113人次；国家统一招生培训1462人，代培医

护人员 222 人。

此外，1958 年在永寿县创办“陕西林业技术学校”。1959 年永寿并入乾县，校名改称“乾县林业技术学校”，同年高中班并入郿县林校。1962 年停办。1960 年，邠县创办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招初中毕业生，学制 3 至 4 年，设果蔬、农机、水利 3 个专业。1962 年停办。

三、部分职业技术学校简介

陕西省立三原工业职业学校

学校前身为“宏道高等学堂”。清宣统二年（1910）改称“陕西工业学堂”。同时，学校派员东渡日本，请教习购机器，由日本人设计，建起了西式教学楼和工厂，设染织、窑业两科。1913 年，易名为“陕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1924 年改称“陕西省立第三职业学校”，1934 年，更名为“陕西省三原初级职业学校”，1940 年始改称“陕西省三原工业职业学校”。1951 年改为“陕西省三原水利学校”，1958 年迁往武功县和武功水利学校合并。

学校为工业学堂时，修业期限为 5 年。因政局动荡，经费不足，暂办“染织讲习所”，1913 年改为甲种工业学校时，修业期限改为 4 年，停办窑业，仅存染织 1 科。1923 年，有 6 班 132 名学生，教员 14 人，职员 13 人，校长范克立。1929 年起改修业期限为 3 年，经费由陕西省拨给。1934 年，设有公民、国语、英语、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体育、图画、用器画、图案画、意匠画、染色、机织、织物原料、织物分析、织物整理、纺绩簿记、染实习、织实习共 22 门课程。有学生 99 人，教职员 18 人。各年级平均每周上课 30 课时，实习 10 课时，并设有 1 所染织工厂供学生实习，同时有产品如各种布匹、袜子、毛巾、线毯在市场上出售。1941 年增设了应用化学、土木两科。1944 年又增设水利、制革两科。1947 年，染织科有 3 级 3 班 58 名学生，应用化学科 1 级 1 班 13 名学生，土木科 3 级 4 班 86 名学生，制革科 1 级 1 班 13 名学生，水利科 3 级 6 班 224 名学生。全校学生 395 名，教职员 57 名，其中教员 34 名。1948 年有染织 3 班，应用化学 1 班，土木 4 班，制革 1 班，水利 6 班，共 15 班 646 名学生，教职员 57 名。学校富有革命传统。远在宏道学堂时，学生中民主思想十分活跃，对清朝黑暗统治强烈不满，曾多次发生学潮。民主革命时期，1925 年 2 月，中共三原特支机关就设在该校。1926 年 3 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三原职业学校开设了支部，该校学生在党团组织领导下，积极参加三原的学生运动，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应

有的贡献。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是一所以培养边区小学教育师资、地方文化教育干部及边区抗战与建设工作的区乡干部为宗旨，具有地方党校、干部学校和教师进修学校的性质。

1939年9月，边区教育厅决定开办边区二师，派刘端棻、王伯勋任正副主任，在枸邑马家堡筹建，1940年3月25日正式建成。该校经历了8年半时间，其中7年时间在枸邑县。曾先后7次建校，6次搬家，即先后由马家堡迁到宁县的索罗、付家山，又回迁到枸邑的后掌、蜈蚣洞、黑牛窝、马栏。1943年该校改名“关中师范学校”。至1946年，关中师范一直在马栏。1946年8月因胡宗南侵犯边区，随中共关中地区及政府机关撤离马栏，向陕北、陇东及晋西转移。1947年8月，从吴堡的宋家川迁到山西离石县的军渡、柳林镇一带。10月过黄河返回陕西，11月转回到枸邑七界石前梁。时因国民党军队“暂编杂二旅”侵犯关中分区，关中师范紧急疏散，放假隐蔽。1948年2月在前梁又归队收假。后移到枸邑文家村，与邠县中学校长张四维带领的邠县中学部分学生合并，改称“联合中学”。1948年3月转移到清水原班村、桑村，4月并入三原中学。

该校行政组织是校长负责制，受专署和边区教育厅双重领导。1941年8月以后，校长由中共关中区委书记习仲勋兼任，副校长先后由教育厅派的刘端棻、邹锦城、袁子和、肖风、周子轩、张剑颖、田静忱担任。分设教导处（主任刘耿、李达、邹锦城、张华莘、潘同和）、总务处（主任王伯勋、王敏、冯宝仁、张仲良），另设有生产委员会、干部学习委员会、经费稽核委员会。学生组织有学生会，下设文化教育、体育娱乐、饮食卫生、生产劳动、妇女指导等股，负责学生民主生活各方面的活动。1941年初创时学校有教职员工28人，1943年42人，1946年27人。初创时期为适应在紧急战争中教学，教学单位按队编制，依据学生文化程度的差异编为师范队、预备队、妇女队、特别班，学生共120名。在环境比较稳定的中期，则改为班级编制，有师范二、三、四班和预备班，学生共140余名。在后期，仍为班级编制，有师范五、六、七、八班，学生215人。到1947年8月为了安全转移，改为劳山部第四支队，学生四五十名。学校从成立到结束，共培养学生470名。这些学生主要来自各县，在校学习多则一二年，少则几个月后便分配到地方参加教育工作，其中有一部分被分配到党政部门及军队中工作。课程方面，

师范班设有国语、数学、历史、地理、自然、政治、教学法、心理学、教育概论、图画、音乐、军事、书法、新文学、补充课（内容为党建、民运）以及土改方面的政策、时事材料等。除课堂授课外，主要进行分组讨论和自习。在教学时间上，一般均不因迁校和杂勤劳动过多而受影响。另外学校还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组织寒假工作团，下乡宣传做地方工作，支援当地群众生产，催收支前食粮等。同时，从1940年夏开始，每年同专署合办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和冬学教员训练班。从1943年春开始到1947年附设干训班，共培训边区区县乡干部256名。

学校具有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校风，在艰苦年代，学校经费严重不足，加之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围困，教学条件十分艰苦。没有粉笔用木炭、白粘土做；没有笔墨纸张利用桦树皮和旧报纸，特别班还采用沙盘练字；没有教室在大树底下上课；牛舍当宿舍，大腿当课桌，燃香记时，编织草鞋，开荒种地，拉粪割草。学校虽规定过学制为2年，而实际学完2年拿到毕业证的是极少数，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根据革命的需要，不等毕业就抽调参军或到各种工作岗位上去。学校是在战争中诞生，在战争中成长，是一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型革命学校。

陕西省仪祉农业学校

陕西省仪祉农业学校创办于1942年，系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的堂妹李翥仪创建。校址设在泾阳县城东5公里处的杨梧村，校舍占地180亩，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

1939年，李翥仪应泾惠渠流域5县代表请求，来到泾阳县三渠乡杨梧村，选棉花试验仓库为校址进行扩建，首建学校。1942年招生2班，校名定为“仪祉农业学园”。为私立性质，李翥仪首任校长。建国后，仪祉农校交由公办，其时开设3个专业9个班，计有农田水利科4班，农艺科2班，普通科2班，学生共266人，学制3年。接收后数易校名，1949年更名“陕甘宁边区仪祉农业职业中学”，1951年为“西北仪祉农业学校”，同年又易名为“陕西省农业学校”，1959年改为“三原农学院”，1962年改为“陕西省仪祉农业学校”，1973年改为“陕西省咸阳地区农业学校”，1978年恢复“陕西省仪祉农业学校”名称。

仪祉农校建校50年来，除1958年大跃进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两度停办外，总计毕业学生4262人，为陕西及西北各省输送了众多农业科技人才。该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齐全，校外另有实验农场1个，占地300

亩，内分农田、菜园、牧场、果园4部分，农场备有农用机械、汽车、马车、拖拉机等。1990年学校有职工204人，其中副教授5人，讲师、农艺师、兽医师44人。开设有园艺、农学、植保、土肥、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等6个专业，学制4年，在校学生400余人。

乾县师范学校

陕西省乾县师范学校是咸阳市教育局直属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1989年陕西省教委确定为省重点师范学校，位于乾县城内东大街，占地64亩，建筑面积17718平方米，拥有图书5万余册，仪器近5千件，模型、标本100余种，乐器150余种。有教职工146名，专职教师88名，其中具有高、中级职称者45名。共有24个教学班（其中4个藏族班），1100余名学生。

学校始建于1945年9月，名为“陕西省立乾州师范”，校址设乾县城内文庙并扩占黉学门小学。招收初中毕业生100名，学制3年。至1949年，毕业两届约200名学生。乾师校名屡经变更，解放初名为“陕甘宁边区乾县师范”。1950年名为“陕西省乾县师范”。1968年名为“咸阳地区师范”。1973年因校舍紧张，暂分两部：一部在乾县原址，为“咸阳地区乾县师范一部”；一部迁至周至哑柏，为“咸阳地区乾县师范二部”。1977年二部迁回乾县，学校称作“咸阳地区师范”。1981年，又恢复了“咸阳地区乾县师范学校”的名称。1949年至1954年，同时开办中师部和初师部，学制均为3年。1955年至1965年，多次举办师训班。1958年，又招收一期师专班，招高中毕业生，分文理两班，学制两年，培养高初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体育、音乐等科教师。1953年至1959年招收两期幼师班，学制1年，培养幼儿教师。1971年至1972年上半年，先后举办10期师训班。从1972年9月起，开始招收推荐来的学生，学制改为两年。两期共招14个普通班，学生700人。1974年至1976年，又招收3期专业班，培养初中各科教师。1977年招生考试制度恢复后，招收3个语文专业班，3个数学专业班和两个理化专业班，学制两年。自1978年至1981年，先后招收数学、音乐、英语3个专业班和1个幼师班，11个民办教师班和32个高中专普通班，计学生2360名，学制两年。1982年以后，开始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3年，培养小学教师。1989年始招西藏师范班。首届两班65名，1990年招两班75名。其学制同普通班，减少部分课程和科目，增开藏文课。

1956年招第一届函授生，1957年设立函授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1983年至1985年重新设立，1986年交咸阳教育学院函授部代理，1988年10

月收回。学习期限3年，考核采取单科结业的方式，全部课程合格，用各种结业证书换领毕业证书，承认中师学历。

1984年，学校被评为咸阳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1986年获咸阳市“政治思想工作先进单位”，1989年被评为陕西省“先进师范学校”。

咸阳机器制造学校

咸阳机器制造学校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重点中专学校，原属第一机械工业部，后改属陕西省机械工业厅领导。学校创建于1950年，原名西北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设电力、建筑、纺织、机械等4个科11个专业。1965年上海机床厂技工学校内迁和该校合并，建成校办工厂——咸阳机床厂，学校规模扩大。有四年制初中专、三年制高中专。开设机械制造、热处理、铸造、工业企业电气化、计算机应用、工业企业管理、劳动人事管理、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专业，在校生1146人，专任教师161人。学校是全国机械系统中专学校机械制造和热处理两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的主任单位，也是机械制造专业教学试点学校。

学校占地368亩，校舍总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设30个实验室，图书馆藏书22万册。校办工厂占地8.7万平方米，固定资产820多万元，主要设备497台，是国家磨床定点生产厂。工厂具有铸、锻、热处理、机械加工和装配等综合加工能力，年生产各种机床200多台，4个系列，14个品种。N6020万能及工具磨床、2N9120A多用磨床、NN9825及NN9850精密卡规磨床等主要产品获部、省优质产品称号，畅销国内各个省市自治区，并远销美国、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工厂有高级工程师4人，工程师46人。校址在咸阳市文汇西路。

陕西省纺织工业学校

陕西省纺织工业学校原名西北纺织工业学校，1952年9月由西安西北工业技术学校分出，成为单一培养纺织中等专业技术人才的学校。1987年纺织职工大学、陕西纺织技工学校迁入该校，初步形成了陕西纺织教育中心。主管部门为陕西省纺织工业公司。

学校设棉纺、毛纺、棉织、针织、电器、机械、纺织品设计、纺织品工艺等9个专业。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4年。1990年在校学生840人，教职工226人，专任教师90人，其中副教授7人，高级讲师7人，讲师39人。

校址设在咸阳市文汇西路，占地118.9亩，建筑面积23701平方米。图书馆藏书5.7万册，教学资料600余种。设有物理、化学、制图、电工、电

子、计算机、电气、针织、织物、织材等 11 个实验室。学校建校 30 多年来，共招收学生 4814 人，毕业 3308 人。

咸阳市渭城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渭城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于 1983 年 8 月创办，是一所城市职业中学。初名咸阳市第二职业中学。1987 年更名为渭城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首届招收 5 个教学班，257 名学生。设有幼儿师范、工艺美术、财务会计、电器维修 4 个专业，学制两年。1985 年，全校共有 6 个专业（新增旅游服务和铆焊工艺两专业）两个年级、10 个教学班，558 名学生，47 名教职工，其中教学人员 28 名。

从 1985 年开始，相继建成教学大楼、宿办楼和食堂、饭厅，同时于 1983 年和 1989 年建成纺织机械配件厂和电视机塑料托架厂等两个校内实习工厂。学校设有美工及幼师展室、美工画室以及机械电器、装潢等学习基地。学校占地 6.5 亩，校舍建筑面积 6935 平方米。以初中毕业生为招生对象，采取横向联合方式，分别与工厂和行政事业单位联合办学。除开设幼师、美工、财会、电器、旅游等专业外，还新开设了金属制品、仿印、电器、机械等专业，先后培养了 1300 余名具有一技之长的初、中级专业技术人才。1989 年共有教职工 70 余人，其中有中学高级教师 1 名，中学一级教师 16 名，会计师 2 名，工程师 3 名，讲师 6 名，高级工程师 1 名。在校学生 450 名。从 1983 年以来，先后 20 多次被共青团中央及省、市、区评为先进单位和文明学校。1985 年 6 月，财会班乔静惠等 3 名学生，参加了全国在北京举办的速算培训班，结业竞赛成绩分别获全国第一、第四和第七名。美工班制作的工艺品“喜鹊闹梅”装裱字画，代表陕西省教育成果，3 次以礼品赠送日本展出。1988 年，被评为陕西省一类职业中学。

泾阳县职业技术学校

泾阳县职业技术学校创建于 1984 年 8 月，位于县城西北 15 公里的扫宋乡三里村，占地 80 亩，建筑面积 5100 平方米。有教学班 14 个，学生 658 人，教工 67 人（其中教师 44 人）。开设有建筑、医疗、家用电器修理、缝纫刺绣 4 个专业。学制 3 年（缝纫专业为 3 至 5 月）。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

建筑专业为本校的骨干专业，从 1987 年起，咸阳市教育局决定该专业跨县招生，有淳化、旬邑、彬县、长武、兴平、礼泉、乾县、武功等县 100 多名学生在校学习。建筑专业除开设政治、语文、数学、物理、体育课外，还

开设建筑制图、建筑力学、应用电工、建筑材料、建筑测量、民用建筑构造、施工组织与管理、建筑施工技术、工艺指导等专业课，同时选开房屋卫生设备、地基与基础、钢结构、民用建筑设计、工业建筑、木结构等课程。家用电器修理专业除开5门文化课外，专业课有电工学等9门。医疗专业除开6门文化课外，专业课有15门。缝纫刺绣专业只开5门专业课。

学生学习期满，经考核合格，学校发给毕业证书，由企事业单位聘用。据对1985至1987年建筑、家电两个专业毕业生调查，179名毕业生中就有177名为国家和乡镇企业录用；医疗专业毕业41人，30人被录用，其余自行开业。咸阳市冶金建材厂、泾阳电器厂、扫帚电视设备厂、西安医学院团庄分院等单位共录用学生127人。

该校连续3年被评为泾阳县先进单位，1987年被中共咸阳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被陕西省教育厅评为一类职业中学。

第七章 成人教育

第一节 发展概况

建国以前本地成人教育主要是扫盲活动。时称夜学堂、民众夜校、平民学校等，多数通过民众教育馆进行。民国初年，邠县城内即有附设在县高小学校的平民学校3处，义务学校1处。1927年，国民联军驻陕司令部批准陕西省教育厅呈拟推行平民教育办法，规定陕西人民已逾学龄期而未曾入学者均受平民教育。长武县将平民教育附设于各小学，利用下午时间开展，但人民忙于生计，就学不多。亭口镇驻军曾派士兵挨户强令学习，但收效不大。这一年9月，咸阳县成立民众教育委员会，段登洲为委员长。此年，在城内南街小学附设民众学校1所，学员27名。

1928年，武功、三原等县成立民众教育委员会，泾阳县成立平民教育馆（后改为民众教育馆），开展民众识字教育。淳化县亦成立了中山教育委员会，负责社会教育，并先后在各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和少数保国民学校设置了中山教育部。同年，邠县有民众学校4处，学员48人。乾县有平民学校10

所，成立平民教育委员会予以督导，教育局长何宗基兼任委员长。该县还在中山公园附近设有民众读报社。

1929年，醴泉县成立通俗教育讲习所，地址在文庙东院，何志瑞（静吾）、魏鸿信（实哉）历任所长，到各乡镇利用集市或舞台宣传社会教育。同年，三原县办过3处民众学校，因经费不济而中途夭折。

1931年，陕西省教育厅颁布《民众学校办法大纲》。当年8月，咸阳县将公共图书馆改为县立第一民众教育馆，馆内除分设讲演、陈列、石迹介绍外，还附设小学部。1932年，三原县曾在陵前乡设一民众教育馆。

1933年以后，随着关中大旱结束，农业稍见恢复，民众教育又有起色，武功县成立了识字运动委员会。1934年泾阳全县共办民众学校56所，正式开学的37所，经费由合作社拨贴，每月3至5元，以供灯火之需，教员义务供职，书籍由公家供给。三原县教育局设有民众图书馆1处，民众阅报处3处。于右任特助经费1300元，该县教育局用此款在城乡办平民夜校24处，进行以扫盲为主的民众业余教育。同时，乾县亦在城乡小学附设民众学校，兴平在政警队设有民众夜校。

1935年，咸阳县设社会教育机关5处，民众学校3所（分别设在南街保小、西街保小和东街保小），均有成人、妇女各1班。其中西街保小附设的民众学校，以5个月为1期，全年共毕业学员210名。另外还有双泉教育设施区（试验点），其中分生计、教导、阅览、健康、保甲、事务6组。附设民校1所，有成人、妇女各1班，全年毕业201名，负责人阮佐才，职员4人，地址在马家堡。据不完全统计，咸阳县文盲约28000人，约占全县总人口28%。

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办法大纲》，咸阳县政府训令各保小均招收成人1班（含妇女），名额不低于30人。这一年咸阳共设民校43所，毕业2000多人。栒邑县在各小学附设民众教育补习班，每年两期，每期3至6月，每日授课2至3小时，强迫失学民众就学。设公民、识字、常识、职业等5门课程。

1937年，兴平县成立文教科，科内设民教干事（或称义教干事），专管社会教育。咸阳县除在各保立小学附设成人班外，省民校管理处总动员团还与咸阳民教馆合办了两所民众学校：一所设在西街保小，另一所由南街保小附设的民校改建。1939年，奉省府训令，成立“咸阳县战时失学民众补习教育推行委员会”和“咸阳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规划全县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实施与推行，并督促保甲人员对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予以协助。此年

礼泉县将县教育图书馆改名为民众教育馆，移址于昭陵中学对面，设有民众夜校班及阅览室、陈列室、游艺室。

1938年，乾县将原来的书报阅览处改成民众教育馆，馆址设城内东大街。同时还在各中心学校、保国民学校及私立各级小学设置民教部，实施民众补习教育。是年，武功县民众学校73所，至1941年，共办民校606班，就学人数28710人，毕业23471人，占全县文盲总数37200人的62%。武功县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经费，占全县教育经费最高达9.4%（1936年），最低仅占1%（1938年）。据统计，这一年，长武县有5万多人，文盲占47914人，其中男24278人，女23636人。枸邑县规定15—45岁的失学男女民众分期受初级（4至6个月）或高级（6个月至1年）的补习教育。至1942年枸邑共办初级成人班94班，学员4172人，其中妇女2024人。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所辖5个区内，社会教育坚持自觉自愿原则，采取民办公助办法搞冬学运动。条件差、居住分散的每乡办一个冬学，条件好的乡尽量多办。教育内容除扫盲识字外，亦传授珠算、农业、手工业技术、医疗卫生知识。同时办干部冬学，以提高地方干部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

1939年，乾县奉省厅命成立社会教育委员会。除专设民校与各校附设民校外，又在城内县立平民织布厂、私立敬业土布改进社等小工厂设立识字班。据不完全统计，此年中心学校附设民校学员2233名，其中妇女1058名。国民学校附设民校学员30248名，其中妇女17212名。民教馆兼办民众教育业务，组织中心学校、保国民学校、私立各级小学设置民教部，实施民众补习教育。

1942年，三原全县有成人识字班116班（其中妇女28班），3108人（其中妇女623人）参加初级班接受识字教育。同年，邠县在县城西大街设立了“邠县县立民众教育馆”，在邠县东街小学等校设有民教部，置主任1人，负责所辅导地区内的成人、妇女识字等社会教育。长武县这个时期也在全县各校正式设立民教部，各乡镇奉令强迫不识字的民众上学，县教科派督学、指导员巡回检查。据1942年9月统计：长武县各乡镇中心学校及保国民学校民教部有高级成人班9个，学员339名，其中妇女班5个，学员194名。初级部成人班187个，学员4522人，妇女班133个，学员3283名。共计民教班学员4861名，通过考核有4718名学员毕业。其中高级部有男子141名，妇女159名；初级部有男子1203名，妇女3215名。

兴平县1944年和1945年的县参议会文件载，历年各级小学办理民教部

共5期，计扫除男女文盲36980名。1945年，长武县全县5所乡镇中心学校民教部开设高级班5个，初级班10个。参加学习者421人；保国民学校民教部开设初级班136个，参加学习者4009人。此年乾县民教馆附设民众学校一处。据民教馆调查，乾县城内14—16岁文盲数男约2500名，女为5400名，按街巷划为20个分户自行施教区。全年举办5期，每期兴办4个分户，结业期限为两个月，约扫除文盲7500名。同年，乾县农业推广所呈请县政府，令饬各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及保国民学校于冬闲设农民识字班，由各校教员教农民学习浅显应用文字和农业新知识，但各校执行不力，识字班无多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本地成人教育的典范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所辖地区开办的“陕北公学”和“安吴青训班”。这两所学校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革命人才，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初期，地方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本地多数县即成立了冬学委员会领导扫盲工作，有的未设扫盲专门机构，由县人民政府统一部署。这一年，乾县、醴泉、三原、邠县、长武等县相继办起了冬学，利用小学教室、祠堂、庙宇等为办学场所，以识字教育为主。教材采用省编或边区政府编的冬学识字课本。除文化课外，兼及时事政策宣传。1950年到1951年，各县普遍设立了冬学委员会，扫盲形成高潮，出现了不少冬学、夜校、识字组、读报组和业余学校。除识字外，还配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进行宣传教育。1952年，普遍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各县举办速成识字法短训班，训练冬学教师，有的县部分学员转入半日制或全日制常年学习。1953年至1954年，经过调整巩固，有条件的冬学转入常年民校。除业余小学外，还办有业余初中和业余高中，组织形式灵活多样，有的采用二部制（晚班男的学，白班女的学），有的半农半读。学习内容注重学以致用。有的县还编出了适合当地用的《农民识字课本》和《同音识字课本》。1955年，按照省教育厅文件精神，结合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有的重点学校办起会计班，部分冬学继续转为民校。1956年，部分县成立了扫盲协会，进一步推动扫盲工作。

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的社论，号召“万人教，全民学”。是年10月以后，由于全民炼钢和“三秋”大忙劳力紧张，到1959年，扫盲工作逐渐进入低潮。1960—1962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扫盲工作基本停顿。1963—1965年，扫盲工作得到逐渐恢复、稳步发展，巩固提高。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县（市）到处办政治

夜校，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时事政治，政治活动代替了业余文化教育。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县（市）普遍加强了对扫盲工作的领导，扫盲工作重新回到了正确轨道。根据1980年统计，咸阳地区共举办业余小学校（班）138个，入学3688人；业余初中校（班）15个，入学492人。当年有农民教育专职干部145人，兼职93人，专职教师172人，兼职教师2360人。全地区12—15周岁少年489000人，其中中文盲、半文盲23000人，非盲率为95.3%；16—25周岁青年695000人，其中中文盲半文盲68730人，非盲率为90.4%；26—40周岁壮年795000人，文盲半文盲78000人，非盲率为90.2%。到1986年，全市青壮年非盲率达到85%以上，成为基本无盲市。

1980年，咸阳地区成立了工农教育委员会，各县（市）增设了工农教育专干，普遍加强了对扫盲工作和成人业余文化技术教育的领导。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培养了一批工农教育干部和教师队伍，并陆续解决了办学中的机构、编制、经费、教材及有关政策问题，各地相继办起了农民业余文化技校和职工工业校，对青壮年职工进行文化技术补课，初步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职工教育体系，并涌现出了西北国棉一厂职校等业余教育先进单位。

据统计，1990年，全市累计办扫盲夜校667个，扫盲班1630个，成立识字组1800多个，有4000多名基层干部，5100多名中小学教师和27000多名学生参加扫盲工作，参加学习的文盲半文盲达55348人，其中42776人脱盲，农村青壮年非盲率达96.4%。

第二节 文化技术教育

一、农民业余文化技术教育

70年代以前，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重点是进行扫盲工作。70年代末，随着农村商品经济和多种经营的发展，群众自发组织的以培训技术为目的的培训班应运而生，尤以单项实用技术的短期培训发展最为迅速。其中乾县由单位或私人办的培训班就有养鸡、养蜂、养牛、蘑菇培植、西瓜栽培、果树修剪及刺绣缝纫等多种类型。为满足群众学习农业技术的需要，本地各级政府协助基层，创办了许多业余技校。到1983年时，咸阳地区北部各县有20%的公社，南部各县有40%的公社陆续办起了业余技术学校。1984年本市各县

(区)、乡(镇)、村三级及各县(区)的教育、农业等部门普遍办起了各类农民业余文化技术学校。参加学习的多为青壮年。学校有脱产、半脱产和业余三种形式。课程设置普通课、基础课和专业课,或三者俱全,或有所偏重,各不相同。教学方法上既进行面授(包括咨询、现场指导),又运用广播电视教学和函授。师资队伍专兼结合,以兼为主,内选外聘,能者为师。办学基地和教学设施也因时因地制宜,一室多用。学制长短结合,以短为主。管理上无论县办乡办、自办联办,谁办谁管,紧密联系当地产业结构和劳力结构变化,按照急用先学的原则安排教学。

1988年,本地农技校增加到152所,这些学校先后共举办各类技术班3500期,培训254142人次。1990年,三级农技校达847所,其中县区办11所,办学面达78.5%;乡镇办220所,办学面为100%;村办616所,办学面20.3%。以乡镇农技校为主体的三级办学网络初步形成。泾阳、永寿、长武、杨陵等县区已建立了成人教育中心。全市约有半数农技校基本做到“五有四落实”,即有专职副校长,有专兼职教师,有固定教室和专用课桌凳,有经费来源,有实习基地,教学计划落实,培训对象落实,管理措施落实,实用技术推广项目落实。是年,在乡镇农技校中,有24所基本达到国家教委和农业部、财政部提出的教学标准。

咸阳市从1988年开始实施“燎原计划”,同年有两所职业中学和7所乡镇农技校共贷“燎原计划”实施款55万元,开展科学技术养鸡、蚕桑、农作物栽培、良种繁育、工艺美术等5个科技项目。其中三原县西阳镇实施科学植桑养蚕项目后,全乡90%以上的农户都养蚕,到1990年,全市建立“燎原计划”示范乡镇34个,示范校4个,市教育局制定了《咸阳市燎原计划示范乡基本条件及加强管理的意见(试行)》,使“燎原计划”管理实施工作步入正轨,全市累计贷款116万元。

1990年,咸阳市按照国家教委和省教委的统一安排,确定武功县薛固乡,兴平县庄头乡、冉庄乡,永寿县蒿店乡,彬县小章乡,泾阳县桥底镇,三原县大程镇,乾县注泔乡等8个乡镇农技校为联合国人口教育基金会人口教育项目受援学校,其中兴平县冉庄乡农技校为项目试点中心校。这些项目学校共有固定资产33万元,使用全国统编人口教材及自编乡土教材,坚持常年培训。当年还举办短期班129期,培训20500人次。通过培训,使受教育者人口观念和婚育观念有明显转变,促进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

二、工人业余文化技术教育

50年代初，扫盲是职工文化教育的重点，有的县区干部职工混合办学，称“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或“文化补习班”。多为县工会组织领导，以扫盲学文化为主，学员对象为店员、手工业工人及各行业工人，也包括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教材采用《冬学课本》、《工人课本》和中南出版社出版的《语文》、《算术》课本。1956年为适应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个别县办有“手工业业余学校”和“商业职工业余学校”。

1958年，本地不少县（市）创办了诸如“红专学校”、“业余大学”等多种名目的成人学校。据醴泉县统计，该县共办各类成人学校133所，学员6064人。这些学校有的未能坚持，有的办而不学，有名无实，1960年至1962年陆续停办。“文化大革命”期间，职工教育基本以政治教育为主。80年代以来，随着开放政策的实行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本地职工教育重新受到重视，并开始进入以技术教育为主的时期。至1990年，全市职工教育学校发展到55所，其中高等学校1所，中等学校5所，职工学校49所，校舍建筑面积达29667平方米。职工教育专职干部增加到297人，专职教师171人。全市职工中工人84534人接受岗位培训，达到结业以上程度的有13476人，参加高等教育并达到结业以上程度的286人，参加中等技术教育结业的1101人，参加高、初中教育结业1741人，接受岗位培训达到结业以上程度的工人及参加各类教育结业的工人约占总数的20%。

80年代初，本地各级政府和各单位，从实际出发，在职工教育中集中进行了一次补文化课和补技术课的“双补”教育。“双补”教育的对象主要是1966年至1968年期间高、初中毕业参加工作未经专业技术培训的三级或不足三级的青年工人。办学单位主要为各事企业单位。

“双补”教育开始以补初中文化课为主。职工初中文化补课班开设语文、数学课，技术工种开设语数、史地、理化课。经过各办学单位努力工作，1984—1985年全市各县区职工初中文化补课教育基本结束。1985年以后，有条件的单位开展了职工高中文化补课。课程设置实行文理分科，文科设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五门，理科设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教材采用教育部统编《职工业余中学高中课本》，结业由全市统考，颁发“职工高中毕业证书”。培训方式有岗位培训、技术业务培训、中专教育学习、高初中文化培训、高教自学考试等。有的单位还根据工作需要和业务

技术要求派人到大专院校进行业务进修。1986年底,全市职工的“双补”教育已经达标,职工文化补课合格人数达20488人,占应补人数的74%。6247名职工参加高中文化业余辅导学习,已取得结业证书2789人,毕业450人。

“双补”任务完成后,职工教育主要以岗位培训为中心。1989年,在经贸、银行、纺织、电力4个系统,建立了6个职工岗位培训联络点,全市岗位培训共13313人,结业10966人,各种技术培训8908人。1990年,职工岗位培训工作形成了以业务主管部门为主导,事企业单位为主体,职工学校和培训中心为主要阵地的培训网络。全市接受岗位培训的职工达74920人,占职工总数的86.5%。

三、干部文化业务进修

咸阳地区的干部文化业务进修从建国初开始即在一些县区着手进行,一般是夜校、业余学校,也有脱产的短训或长训班。有的是县政府办或委托工会组织办,有的由业务部门办。1950年兴平县办过3期夜校,有510名干部(包括职工)参加学习;1952年醴泉县抽调三级干部中文盲37人,进行40天的速成识字学习;同年,乾县组织干部中的文盲半文盲脱产轮训4期,学员127人。1954年,邠县县级党群系统、政府机关、事企业部门及各区公所、乡政府脱产干部695人中,文盲半文盲94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236人,因此政府兴办干部业余学校,到1955年,业校学员达135人。1956年成立“陕西省乾县农业合作干校”,主要培训乾县、兴平、三原、泾阳、醴泉、淳化、枸邑、邠县、永寿、长武等县的初高级农业社基层干部,学制半年至一年。每期收学员300名,开设有农技、财会、畜牧兽医、林业、园艺等课程,并附设兽医实习门市部。1958年改称“陕西省农村人民公社干部学校”。到1960年改为中专性质的学校,收高小毕业生。1962年停办。1959年邠县县级机关举办了5个干部业余文化学习初中班。到1960年,邠县各级干部246人参加业余广播函授大学学习。“文化大革命”中,各县(市)大办“五七干校”,借以培训干部,当时主要是学习政治,干部文化业务进修不被重视。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部的业务进修得以恢复。1987年,长武县成立农技校,由县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局3家合办,分长训班和短训班,先后培训乡镇农业干事、农技员和水保员2万多人次。1979年迁至泾阳县三渠乡的“陕西省农业干部学校”,主要培养在职农业干部,开设有农学、畜牧和经济管理3个专业,同时为农垦系统培训会计

和土壤化肥辅导员，还为省植保总站培训过站长。

80年代，干部教育形成热潮，各厂矿企事业单位贯彻中央、省、市关于培训干部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在立足在职培训的同时，还采取选派离职学习、业余自修和业务培训等形式进行培训。1985年以后，各系统的干部教育以技术培训和岗位培训为主，也开展相应的高中教育和大专教育。此外，陕西省咸阳教育学院和铁道部干部管理学院是市内两所比较正规的成人高等学校，两校办学多年，为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作出了一定贡献。

四、部分成人教育院校简介

陕北公学关中分校

陕北公学1937年8月创建于延安，次年7月在柘邑县看花宫村设立关中分校。1939年1月，总校迁来看花宫与分校合并。同年6月，中央决定与延安鲁迅艺术学校、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青年训练班4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迁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分校设柘邑一年半时间内，毕业学生两期，共计3000余人。

1938年春，分校先遣队来柘邑县看花宫村，自己动手挖窑洞50多孔，并借用群众房屋、板凳及生活用品，因陋就简整理好校舍，4月底由分校校长李维汉率人筹备开学事宜，7月正式开学。

陕北公学分校学生来源于全国各地，不分阶级、党派、信仰、性别，凡年龄在18岁以上，45岁以下（除汉奸、托派外），经全国各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即可上学，以广西、广东、南洋人最多。教师40多名，受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委派来分校任教。

分校在边区教育厅领导下，校内设有党委会（校党委书记申力生），各区队设党总支，分队设党支部。校部设看花宫村，校长罗迈（李维汉）、成仿吾。下设政治部（主任周纯金、张然含）有组织、宣传、社会科。校务部（主任柴树藩）有秘书、运输、事务科（后叫管理），教务部（主任邵式平）有教研、图书、文印等室。学生组织分自治、行政、军事三种。学生自治组织全校有学生会，各区队有学生分会。行政组织按区队编排，10—20人为班；3—4班为分队；3—4分队为区队。全校四个区队：一区队住坪坊村，队长何定华。二区队住门家村，队长朱改。三区队（女生队）住看花宫村，队长陈怡、张琳。四区队住照庄村，队长孙力余。1939年10月武汉失守，大部分毕业生深入敌后，所留六七百名学员改编成三、四、五、六4个高级

队。军事组织有营、连（区队）、排（分队）、班。

陕公分校学制不定，根据学生实际，普通队学习期限一般3至4月，占学校大部。高级队学习期限一般为一年。普通队开设4门课：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高级队给各学校培养师资，开设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运动史、世界政治、中国问题讲座、三民主义、战区政治工作研究等。教学形式以大课堂为主。教学方法有三：自学为主，循序渐进，发扬民主。教学内容比重：三分军事，七分文化和政治。教学原则：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少而精，教学一致。

陕公分校的校风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具体表现为：民主自由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生活军事化。陕北公学校歌是：“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今天我们要在这儿团结，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我们要忠实于民族的事业，我们献身于新社会建设，昂首看那边，胜利就在前面。”陕北公学关中分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抗日生力军，为宣传、动员全民族抗战到底培养了骨干力量，为边区文化教育培养了人才。

安吴青训班

安吴青训班的前身是1937年10月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持人为冯文彬和乔木）组织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第一期在泾阳县斗口村附近的村子开学，有150个学员，学员的寝室借用于右任农场一所现成房子，无教室，无饭堂，无运动娱乐场所，亦无详细的教学计划，而是从实际出发临时拟定。第一期办了15天。第二期由斗口村迁至泾阳县云阳镇一座破庙，并更名为“战时青年训练班”。学员增至300多人。第三期增至500多人，仍是露天教学，宿舍墙壁为纸糊草扎，条件虽艰苦，但学员情绪高昂。从第四期起迁至蒋路乡安吴堡，学习时间增加到1个月，学员有增无减，第五期增加2月班，第七期起又增加了3月班。学员中有各种职业、各种文化程度的人，不仅有来自国统区的知识青年，还有少数民族青年和海外华侨。工作人员包括炊事员、饲养员、勤务员直到处长、主任在内，一切待遇相同，每人每月发一元津贴。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对学员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教育。对怀疑统一战线的青年都是耐心加以说服。青训班经常协助地方党政组织开展工作，只要对统战有利而力所能及的无不尽心竭虑做到。万名以上的毕业学员，不论是在各地正规军和游击队里，还是在地方各级抗日政

府里，都博得了各阶层的赞许。

青训班的教育方针是在最短期间授予青年各种最低限度的战时军事知识和政治知识，依据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开展抗敌救亡工作。其教学内容，主要是关于抗战的基本理论与军事课程。青训班的教务机构为教务处，下设连一级组织为教学单位，同时又是军事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单位。连的组建，系依学员的政治水平、文化程度和社会经验而定，所有连队分为高级、普通、初级三类。高级班学员一般政治、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其中包括大学生和留学生；次一级的编入普通班；初级班多为农民、士兵和小贩；另外还组织了一个研究班。教员大多数是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会员，大都经过现实斗争和社会生活锻炼。在教学方法上，不机械采取某种定型的方法，有讲授，有问答，有讲座，除正课外还参加民运实习和野营演习，方式灵活，理论联系实际。

青训班后改名“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并于1940年春夏之际陆续撤回延安，但大部时间在泾阳县安吴堡，故习惯上都称之为“安吴青训班”。安吴青训班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训练学校，为民族革命战争培育了万余名青年干部，是革命青年的摇篮。

西北国棉一厂职工学校

西北国棉一厂是1952年正式投产的由国家投资兴建的一个中型棉纺织厂。为了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和提高职工文化水平，于1952年下半年即开始筹建职工学校，1953年正式开学。

1952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厂68%。到1958年，全厂基本扫除了文盲。从1958年到1962年，职工业校主要开办了高小、初中、中技和业余大专班，职工的入学率、出勤率和合格率都达到了95%以上。1960年6月，西北国棉一厂作为先进集体，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文教群英会。1962年，半工半读停办，职工业校继续开展各种形式的业余教育。“文化大革命”中业校停办，教师队伍解散，校舍改作厂房。1975年后陆续开办了两届“七·二一”工人大学。粉碎“四人帮”后，逐步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职工教育由原来单一的形式发展为多渠道、多学科的包括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干部教育在内的多种教学形式。1979年，国棉一厂建立了正规的广播电视大学教学班，1982年招收了语文类专业学员，1984年又有25名党政管理干部进入电大学习，各种类型的专业技术、财会管理班相继成立。从1979年开始，把职工教育任务列入经济责任制月月考评，并对青工进

行初中文化补课。从1982年到1984年，应补课的3671名青工中已有3646人经考试合格，领取了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工农教育委员会颁发的毕业证书，占应补对象的96%。

从1983年开始到1985年10月，组织职工进行系统的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课的学习，经考试合格人数达2754人。同期还进行了初级技术培训，按部颁技术标准，对三级以下的工人举办各类专业班，轮训了3113人，占全厂三级以下工人98%。在基本完成“双补”任务的同时，又把重点转向中级技术培训和干部教育。

1982年以后采取了内培与外培、业余与脱产、公费与自费相结合的办法，系统地培养了一批企业急需的人才。

西北国棉一厂在1981年、1982年相继被评为陕西省纺织工业公司职工教育先进单位。从1980年开始，先后4次在西北五省（区）协作区介绍开展职工教育经验。1984年，该厂被纺织工业部命名为职工教育先进单位。

陕西省咸阳教育学院

咸阳教育学院是咸阳地区培训初中在职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的成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统属关系是省市共管、以市管为主，校址在咸阳市文林路东段。学校前身系1979年成立的校址在三原的咸阳地区教师进修学校。教育学院于1984年7月正式成立。学院开设高师专科中文、数学、地理、英语、美术5个专业，学制2年。校园占地76亩，校舍建筑面积16444平方米，图书馆藏书51000册。截止1990年，国家基建总投资400万元。从1989年起利用世界银行贷款148万元重点加强教学仪器设备建设，利用地方配套投资进行图书实验楼和体育设施建设。

学院自1984年招生以来，坚持面向初中教师的办学方向，采取长期与短期结合、面授与函授结合、校内办班与校外办班相结合的多层次、多规格的办学形式，除办有中学教师离职培训的高师专科班外，还先后举办干部、教师短训班。建校以来，已培训大专毕业学员2000多人。其中离职培训学员800多人，函授培训学员1200多人。

此外，还培训教育行政干部400多人、半年或一年制教师短训55人、两年制中师程度英语教师97人。

第八章 教育管理

第一节 行政机构

一、咸阳市教育局

1961年9月咸阳专署正式恢复。10月，始设文教卫生局。1963年9月，又分设为文教局、卫生局。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文教局机关受到冲击。1967年2月，文教局被群众组织非法“夺权”，领导干部“靠边站”。从1967年2月到1968年8月咸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局机关瘫痪。1968年9月到1970年5月，咸阳专区（地区）革委会曾设过文教工作站，但随着人员变动很快解散。1970年6月，咸阳地区革委会文教局成立。到1979年元月，咸阳地区行政公署又将文教局分设为教育局、文化局。1984年5月咸阳地区更名为咸阳市，原咸阳地区教育局遂从6月1日起改为咸阳市教育局。

咸阳市教育局是市政府教育行政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能是：负责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令；指导全市各级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定全市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教育发展战略；综合管理全市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和幼儿教育等；统筹全市农村和城市教育综合改革；指导协调县市区和有关部门的教育工作；承办市委、市政府和省教委授权或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地区）教育（文教）局内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各个时期均不相同。1961年10月，属内行政编制12人，只分工而不分科。主管工作除教育外，还有文化、科学、体育、卫生、广播、档案、印刷厂等。1963年，编制13人，主管工作除教育外，有文化、科学、体育等。1970年6月，局内分设政办组（主管人事、财务、秘书）、教育组、文化组。1971年秋，局机关选址人民东路66号，编制增至20人。文化、教育分局办公后，教育局内分设办

公室（主管财务、秘书）、教育科、人事科，人员编制 28 人（含教研室）。

1984 年后，随着全市教育事业的日益发展，市教育系统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亦有大的改变。局内分设五科（即秘书科、人事科、计财科、普教科、职教科），直属事业单位有教育教学研究室、勤工俭学服务公司等。代管单位有咸阳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咸阳市工农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次年 7 月，勤工俭学服务公司改名勤工俭学办公室，咸阳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改名咸阳市招生办公室，同时成立咸阳市自学考试办公室、咸阳市电化教育馆。1988 年咸阳市工农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改称成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咸阳市企事业学校管理科。1989 年撤销市成人教育委员会，保留市成人教育办公室，成立教育督导室。1991 年改称咸阳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1990 年成立纪检监察室同时，并建成咸阳教育电视台。

二、县、区教育（文教）局

历代咸阳境内各州、县均设有儒学，明、清两代县学设教谕、训导。清末，各县相继改设学和局，后又改为劝学所，设学董或所长一人，下设劝学员数人以管理教务。

民国初期，设劝学所。1924 年前后，各县劝学所相继改称教育局，设局长 1 人，督学、视导员及学务员数人。1932 年前后，各县因灾荒裁去教育局，只留教育助理员一人。到 1937 年前后，各县教育行政机构相继恢复，改称教育科。1940 年前后又改称第三科，设科长一人，督学、助理员数人，直到本地解放初。

建国后，各县人民政府立即设立文教科，从 1952 年起兼管卫生，改称为文教卫生科。1956 年，兴平、乾县、永寿、淳化等县改称教育科。1958 年合大县后，有的县称为文教部，有的县称为文教卫生局。1961 年大县解体，各县遂重设文教局或文教卫生局。“文化大革命”初，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瘫痪。1968 年，咸阳专区各县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文教机构均附于政工组或生产组，名称大多是教育革命办公室。1970 年，各县文教卫生局相继恢复。粉碎“四人帮”后，大多又称为文教局。从 1984 年起，礼泉等县的文化、教育分局办公，到 1990 年，除杨陵、武功、彬县、长武、旬邑、淳化 6 县区仍称文教局外，其余 8 县区均称为教育局。

各县区市教育局的编制，也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而逐渐扩大。50 年代，一般编制为 3 至 7 人不等，60 年代增至 6 至 10 人，70 年代增至 15 人。至

1990年，连教研室在内，各县教育局人员多至30人左右。

三、乡、镇教育组

民国初年，各县始设视学及劝学员巡督乡、镇教育。30年代初，省政府规定各乡、镇要设学区，并设教育委员1人。1940年前后，实行“新县制”，在区设文化股，有主任干事1人；乡设文化干事1人。其职责为专门管理地方教育。

从建国初，到50年代后期，各乡、镇主管教育的干部大多称为文教助理员。50年代后期公社化后，有的县在公社设文教部，有部长一人和干事数人。1970年，各县普遍在公社配备文教专干，专司其事。1984年机构改革，三级办学，乡、镇普遍成立教育委员会或教育组，由乡镇主管领导、文教专干、初中校长和中心小学校长组成，并设有几名财务管理人员，主要负责集资办学等事务。

第二节 教师管理

一、教师队伍

明清时期，除州县儒学的学正、训导、教谕和书院山长外，从事教师职业主要有举人、生员、童生。他们或设馆授徒，或在村塾、家塾中受聘当塾师，学业、志趣相差甚远。维新变法前，各县从教教习塾师，少则几十人，多则百十人不等。此后情况略有改观，一些新学堂出现了新教员。民国时期，各县专职教师一般有一二百人，个别县达300余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区在1940年有小学教职员93人，到1946年底为141人。

建国后，咸阳地区接收愿意继续任教的中小学教师约2800人，其中一部分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调入党政机关，一部分参加了人民革命大学、西北军政大学和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离开了教师岗位。专区举办短期小学教师训练班，吸收完小以上毕业的失学青年学习，同时在完小设助教培训班，充实小学教师队伍。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提倡群众办学，增加了一批民办学校 and 民办教师。1958年，普教事业高速发展，师资力量急剧膨胀，教师队伍素质普遍下降。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学校

精简裁并，压缩编制，裁减了大量的小学公办教师，部分中学教师下放到小学，高小下放到初小。1963年到1964年继续精简，但由于耕读小学涌现，民办教师增加，教师队伍稳中有升。

“文化大革命”初期，据1966年10月统计，全地区共有教师18502人，其中公办9165人，民办5593人，耕读教师3744人。此后，许多小学附设初中班，初中附设高中班，一度有“上初中不出大队，上高中不出公社”的提法。中小学盲目发展，教师人数剧增。1969年，响应“侯王建议”，学校体制下放，公办小学教师回原籍，由生产大队选用，一部分教师因家庭成分或个人历史问题被清理回家，教师被任意抽调借用，各大队自选教师，教师管理混乱，教师队伍极不稳定。1972年，招转部分民办教师为公办教师，又在历届高初中毕业的返乡知识青年中吸收了一批教师，是年全地区教师人数达到31000人（其中公办15000人，民办16000人）。1975年以后，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和“社来社去”的中师毕业生，补充了师资队伍。1980年，离退休教职工的部分子女顶替加入教师行列。由于落实政策，又从1962年和1969年下放回家的教师中回收了一部分。1980年，停止招收民办教师，并对历年来招收的民办教师进行整顿，统一进行政治审查和文化考核，择优录用，发给“任用证书”。随着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和民办教师转公办，公办教师的比率渐趋增大，是年全地区中小学教师总数为49610人。到1983年，共辞退民办教师4246人，发任用证24200人，民办转公办2907人，中小学教职工总数达54424人（中学21018人，小学33406人）。民办教师29884人，占教师总数59%，其中小学民办教师24387人，占小学教师74%。1984年教师队伍中流出教育系统的537人（其中大专程度197人）。民办教师继续压缩，教师总数有所下降，中小学教职工42275人（含其他部门办的3615人），民办教师达20000多名，占教职工总数50.2%，小学教师民办比例达72%。1985年公办教师比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由1985年以前的47.8%提高到66.7%。这一年从民办教师和“社来社去”回乡的中师毕业生中招收了一批合同制教师。到1990年，全市中小学教职工总数为46081人，其中教师为39638人。

二、教师任用

明清时期县学教师多由教谕、训导充任，书院山长（清末书院改为学堂后称堂长）多由知县从举人、贡生中选聘，或由劝学所会同地方官绅商定聘

1990年咸阳市小学教职工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 1-6

单位：人

	教 职 工 数						代理 教师	临时工
	合计	专任 教师	行政 人员	工勤 人员	校办工厂、农场职工			
					计	其中：由厂、场 收入支付工资的		
总 计	27128	24936	1662	471	59	23	1842	153
教育部门办	10939	9742	1014	165	18		28	48
其他部门办	1576	1426	113	25	12		3	1
集体办	14613	13768	535	281	29	23	1811	104

1990年咸阳市普通中学教职工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 1-7

单位：人

	教 职 工 数							长期 代任 教职 工	临时 代任 教职 工	兼任 教师	
	合计	专任教师			行政 人员	工勤 人员	校办工厂、 农场职工				
		计	初中	高中			计				其中：由厂 收入支付 工资的
总 计	18953	14702	11158	3544	2888	1236	127	49	621	542	13
教育部门办	13819	10475	7698	2777	2281	967	96	38	264	230	9
其他部门办	2501	1909	1185	724	433	150	9		8	5	2
集体办	2633	2318	2275	43	174	119	22	11	349	307	2

用，教席由山长提名，报劝学所聘任。民间义学、私塾教师去留由学董或雇主义决。清末民初，各类学堂一般沿袭旧制，变化不大。如三水县（今旬邑县）的小学堂教员由县署和地方择优举荐任用，并有资格规定：高小学堂的教员应具备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及选科毕业生；初小学堂应具有初师二年以上的程度。

民国初年，有的县立小学、公立小学的教员由校长聘请，报县教育科备案，或由县教育科委派。1921年以后，一些县开始从西安、邠州、同州、凤翔师范毕业的学生中聘请小学教师，乡村初级小学还聘请县立高小毕业生和单级师范毕业生任教。1927年以后，大批私塾淘汰或改良，教师素质也随着

受过师范教育和培训的人逐渐增多而有所提高。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学法》和《小学法》，规定中小学教职员由校长聘任，呈请主管教育机关备案。1936年教育部颁布《修正中小学教育规程》，规定中小学教职员任用均由校长选聘，报经县政府（或教育科）加发派令。每聘一届，任教一学期，一年聘两次。

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属赤水、淳耀两县教师的任免与调配由边区各级政府决定。其中中学校长及主要教职员的任用由关中专署负责并呈报边区政府教育厅备查，完小教员由校长推荐请县政府委任，初小教员由各村选拔合格者呈请县政府审核和委任。任免一般在每学期始末实施，期限均为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教师聘任制，中小学教师实行统一调配、分级管理。中学教师由专署教育机关调配，小学教师由县文教机关调配。1955年，中小学教师管理权下放，均由县文教机关管理。1958年小学民办教师交由公社管理，县文教机关备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侯王建议”影响，中学下放到公社，小学下放到大队，公民办教师一律回各大队任教。1981年，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全地区对民办教师队伍进行了一次全面考核和整顿，合格者颁发任用证书，一部分缓发或辞退。1982年教育部《关于整顿和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意见》中，提出高中教师要具备大学本科毕业水平，初中教师要具备大学专科毕业水平的师资要求，各县对任课教师作了适当的调整。1984年，贯彻省委、省政府指示，中小学实行“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领导体制，县办中小学由县教育局管理；乡（镇）办初中和中心小学，主要由乡（镇）管理；普通小学实行“队办乡管”。对教师的任用，县办中学、直属小学、县幼儿园及乡（镇）中学由县文教局统一调配，乡（镇）办小学由乡（镇）统一调配，村办初小由村选用，上报乡镇政府批准。同年，根据上级指示，录用部分合同制“社来社去”大中专生。1987年，对符合招转条件的5000名中小学民办教师进行文化考试和业务考核，按分配指标择优录取了1700名。1988年，完成了全市中小学及市直属院校教师职务评聘工作。全市共评出高级职务教师488名，中级5045名，初级职务13326名。

第三节 考试管理

“文化大革命”前，招生工作由地区文教局负责。1977年恢复高考时，咸阳地区行政公署成立了招生委员会，主任由主管教育的副专员担任，副主

任由文教局长担任，委员分别由财政局、公安局、纪检委、体委、卫生局、粮食局领导担任，文教局副局长担任委员兼招生办公室主任。1977年至1984年5月，招生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普教科，1984年6月正式组建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编制6人。主要组织普通高校、中专的招生考试和初中专的评卷、录取工作，同时承办各类自学考试、研究生考试和成人学校招生考试工作。1986年4月30日咸阳市自学考试办公室成立，与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一套机构，两个牌子。1989年，撤销市招生委员会，招生办（含自考办）成为市教育局的一个科室。到1990年，招生办（含自考办）共有12人。建国初，部分县成立招生登记站。1954年起，各县普遍成立招生领导小组，1977年改称招生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从1978年起，各县招生委员会和办公室成为常设机构。1984年后，各县招生委员会相继撤销，招生办公室由教育局直接领导，工作人员一般有2—5名。

1979—1990年普通高、中等学校在咸阳录生情况统计表

表1-8

层次 \ 年度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总计	4313	4259	3343	3324	4307	4207	4810	4633	5030	4657	4001	4789
大学	2210	2188	1675	1856	2372	2240	2694	2479	2818	2460	2320	2808
高中专	1222	1492	1349	727	799	631	559	439	439	319	264	263
初中专	881	579	319	741	1136	1336	1557	1715	1773	1878	1417	1704
其中民办教师								229	350	350	300	350

1986—1990年成人高、中等学校在咸阳录取情况统计表

表1-9

年度	总计	大学 本科	大 学 专 科								中专	资格生	预科生
			电大	夜大	函授	职大	教院	管院	干专	合计			
1986	2368	183	401	16	198	186	557	201	193	1752	433		
1987	2401	198	384	19	217	161	632	121	178	1712	491		
1988	3480	217	809	32	451	115	696	163	107	2373	617	270	3
1989	2042	153	187	7	337	107	527	103	37	1305	397	179	8
1990	2748	164	449	153	401	121	396	99	23	1642	672	265	5

1985—1990年咸阳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大专毕业生情况统计表

表 1-10

年度	季别	党政干部	会计	英语	汉语言文学	工企业管理	法律	机制	统计	计算机	价格
1985	春季	11		9							
	秋季	34	3	25							
1986	春季	10	4	2	8						
	秋季	13	3	28	12		4				
1987	春季	13	3	6	3	1					
	秋季	43	23	18	13	1	13				
1988	春季	27	4	23	11	20	28			5	13
	秋季	40	20	19	10	20	44			2	14
1989	春季	24	18	16	9	17	11		47		
	秋季	50	11	18	28	9	10	2	26	4	
1990	春季	28	29	4	12	13	17	2	10	5	8
	秋季	4	35	21	32	17		5	15	10	4

第四节 经费管理

一、经费来源

民国以前

教育经费的来源，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历来官办学校，经费一般有学田收入、官府拨款、捐款筹款和其他收入；民办学校则以自筹为主，官府有时予以补助。

明清两代官办学校经费主要来源是学田收入。学田的数量，各个时期均有不同。如咸阳，明洪武四年（1371）有学田 39.2 亩，清顺治九年（1652）为 30 亩，乾隆年间为 748.2 亩，光绪年间为 970 亩。前后相差甚为悬殊。

学田而外，地方政府还有财政拨款用于县学、书院的开支。官府的拨款具有包揽性质，根据缺额的多少拨付。特别是官办书院，其经费大部来于拨款。官府拨款的形式主要有公款提充、派捐、照粮摊派等，有的属于直接使

用，多数作基金发商生息（即将其款发借商号，收取利息）。拨款的数量，因各县的财力薄厚有所不同。清乾隆五年（1740），泾阳县创办瀛州书院拨款40000两，光绪二十二年（1896）创办崇实书院时拨钱30000串，合银15000两。拨款多少亦与地方官员的重视程度有关，如永寿县虽不富裕，但在清末和民国初年就曾动用库存储银11000两兴办学校。明、清两代其他各县拨款数目少则数百串，多则一二千两不等。

捐款筹款也是传统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个人捐款者有地方官员、富绅、义士等。地方捐款则类于筹款，一般由地方官员出面办理。捐献的多为银、钱，也有捐地的，如兴平县冯克昭于乾隆三十年（1765）就曾捐地60亩，招佃起租作教育经费。个人捐款的数量有的是数百串钱，有的是几十两以至几百两、上千两银子。其中数额巨大者，如同治八年（1869）创建泾干书院时，泾阳县姚敏、姚德捐银15000两。光绪十七年（1891）复修陕甘味经书院及泾阳县文庙时，泾阳县安吴堡候补郎中吴聘之妻（即“安吴寡妇”）捐银40785两。这些巨额的个人捐款，远远超过官府平时的拨款。捐款的使用方式，创建书院的是直接使用，用于县学的则多为发商生息。

此外，还有官地和官房收租、产业租入、差徭余钱、存款利息、捐款利息以及地方款补助等经费来源，有的还有学生缴纳之款。这些款项数额不大，少则数百串，多亦不过数百两。其用途多为学校修缮及加膏火之类。

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教育经费大体沿用清制，以后始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经费具体来源有学田收入、捐税附加及个人资助。此外，当时的中央和地方也补助一部分。公、私立学校的主要区别为公立学校学生一般不交学费，私立学校要交学费。私塾则全由学生负担。

公办学校的经费来源：

学田收入 民国时期，各学校亦有一定的学田。这时学田的数量，比明清时期要多。如1928年咸阳县有学田3341.445亩；1949年泾阳县有水地1024.9亩，旱地975.93亩。学田之外，还有一些公产如房舍、地基等的收入，也用于教育经费。

捐税田赋 据1933年统计，教育经费来源中，有杂税四成、捐税附加、田赋附加三项，细分之则有房地捐、棉花捐等。例如咸阳县为筹集学款设立的棉花捐于民国初年屡有增加，到1931年每斤抽大洋四厘，全年收入3000余元；民粮正银每年每两派差钱大洋二角，全年收入3124.138元；田赋附加

到1929年每元六分，全年收入6619.707元。武功县1933年地方筹集经费8590.4元，其中包括田赋、杂税附加一至四成及斗行、牙行、药捐等收入。乾县1928年县财政拨款学款15200元，留支差徭4048.7元，四成杂税2600元，各项附加5400元，岁比额1578.7元，岁支比额8588.6元，连同田租，共计为37476元。泾阳县1934年教育经费计有棉捐19278元，房捐500元，地捐300元，斗捐405元，杂捐2400元，滩捐500元。三原县教育经费中由教育局直接管理的经费为4617.6元，其中四成杂税2640元，各项附加300元。同年，长武县有各项附加300元，杂税500元。淳化县民国初年于地方财政中开支的学校经费约8000银元，除408元的学租外，其余7600元为杂税四成及商行大户捐资款项。

个人资助 民国时期，政府鼓励个人捐资兴学，并订有褒奖章程。捐资助学的形式有的个人自捐，有的多人联捐；有的捐献银元、现金，有的捐献木料、土地；有的资助已有学校，有的创办私立学校。捐资者既有前清举人等社会贤达，又有南洋华侨等海外游子；民国元老于右任曾经创办多所学校，爱国将领杨虎城等亦曾一再共襄义举。

政府补助 民国时期地方上的办学经费，政府除以捐税田赋的形式正式拨款外，有时中央和省上也补助一部分。咸阳县于1937年、1939年、1940年就曾3次得到中央补助，1935年、1936年、1937年、1939年、1940年先后5次得到省上补助。兴平县于1939年由省教育厅补助6486元。武功县于1933年由省教育厅拨款5940元，1935年拨12840元，1936年拨18630元。乾县于1941年由省教育厅拨7040元。

在这些拨款中有一种“特种教育补助费”。从1939年起，国民党政府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实施“特种教育”，以反共为宗旨，其经费由蒋介石南昌行营和中央庚款董事会拨付。本地的柘邑、淳化、泾阳、三原、邠县等县就实行过“特种教育”。柘邑从1936年起由省上直拨“特种教育补助费”，1943年拨付8万元。

民国时期私立学校均向学生收取学杂费。泾阳县两所私立学校之一的竞志小学，1934年经费来源有：校田产150元，个人捐资700元，学杂费300元，政府补助50元，总计1200元。学杂费占四分之一。另一所私立的培英小学就是靠疏财募捐而筹建的，其中乡绅崔贯一捐款500元，献地3亩，其他乡绅、知名人士捐资1100元，杨虎城也曾给该校资助。

当时私立学校的经费往往发生困难，于右任创办的民治小学就遇到了这

种情况。1942年，于右任致信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将民治小学由私立改为国立。陈立夫收此信后，即拟就将该校改为国立民治商业职业学校提案一则，函致行政院，并于11月16日复信于右任告知其情。但其提案因“碍难照准”而被搁置。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所属的枸邑县五个区，从1937年开始，教育经费大部分向群众劝募筹集，小部分来源于公产收入和政府拨款补助。政府补助部分来自牲畜附加税和斗佣附加税。淳化境内的赤水、淳耀两县的高小经费在县地方经济内统筹，实报实销，每月报销一次，不足部分由学校勤工俭学收入补充。1942年，赤水、淳耀两县高小的经费分别为麦子130石和80石。初小经费由村款开支或群众自愿投资供给，县上予以少量补贴，实行民办办公助。

民国时期的教育经费虽由政府明文规定要有保障，然由于官吏克扣，物价飞涨，教育经费常常难以为继，教职工工资往往中断，甚至发生教师向保长索取薪俸而遭枪击的事件。直到解放时，有些教师工资仍未付清。至于灾荒年份，更有大量的学校因经费无着而停办。

建国以后

建国后，教育经费的来源大抵有以下几项：国家拨款、乡镇自筹、集资捐助、勤工俭学以及收取学杂费等。从1987年起，开始征收教育费附加。

国家拨款 这是教育经费中的主要部分。建国初期的1950年3月，政务院即作出决定，各级教育事业分别列入同级预算。大学、中学和高小的经费统由国家负担，初小的经费由村、乡筹措。其后到1953年前后，一些县的初小也由国家拨给经费。

建国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拨款逐年增加，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增加幅度更大。如兴平县1953年为24.6万元，1963年为68.4万元，1975年为134.1万元，1981年增至314.6万元，1990年达1050.6万元；泾阳县1953年为32.8万元，1963年为78.4万元，1975年为122.7万元，1981年增至311.6万元，1990年达1940.8万元。北部山区县虽然增加数额比不上条件较好的县，但逐年仍有大幅度的增加，如彬县1953年为20万元，1963年为44.8万元，1975年为75.3万元，1981年达201.7万元，1990年增至606万元；淳化县1957年为30.8万元，1975年为73万元，1981年达224.8万元，1990年增至502.2万元。从全市各县统计情况看，1990年各县区国家对教育的拨款数额都较建国初期高出三四十倍。

除了计划拨款，国家每年还有一定的追加补助和专款。其用途主要有：中小学危房修缮和课桌椅购置，老、少、边、贫地区普及初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高师函授教育，中小学师资培训，民办教师补助经费，重点中小学电化教学，购置教学仪器，以及教育事业费等。这些补助和专款有的是省财政厅（局）拨付的，有的是市（地区）财政局、教育局拨付的。由于使用目的明确，这些拨款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些追加补助款项，只有一部分列入当年预算，大部分并未列入当年预算之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市教育投入年年增加。1984年，教育经费总支出是4279万元，1988年增加到8356万元，1990年已突破1亿元，教育投入占全市国民收入的3%以上。每年市上都拿出相当数目的专款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并且逐年有较大幅度增加。如1984年为160万元，1988年增加到353万元。从1988年开始，对按期实施义务教育的乡镇各奖励1万元，其中首批实施的奖励1.5万元。1989年，市政府拨给义务教育专款100万元，沈家小区3所学校开办费50万元，学校基建专款165万元，并将新增财力的10%用于发展教育事业。但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增加的教育经费。

乡、村自筹和集资捐助 建国初期，初级小学一般由乡、村自筹经费，教师的薪资由实物（主要是小麦）折付。校舍亦多利用旧庙祠堂。50年代中期初级小学由县上拔付经费，不足部分由乡、村筹措。60年代以后，民办教师多是低工资，大部分是工分加补贴。进入80年代初，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村上改记工分为付工资，这样民办教师工资的数额便大幅度增加。加上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经费问题更加突出。1981年，开始抓集资办学。到1984年，全市各县掀起一个集资办学的高潮，群众集资7073万元。由于集资办学成绩显著，咸阳市被评为陕西省集资办学先进市。

1985年，市委、市政府制定出了《咸阳市集资办学奖励办法》，从而使集资办学经常化。到1989年底，全市有9个县区集资分别在100万元以上，其中渭城区群众集资260万元。

从1984年到1989年，全市群众共集资1.4亿多元，是同期国家拨款的5.6倍。这是本市教育事业上的空前盛举。其中兴平县桑镇和彬县永乐乡的集资活动尤为突出。前者集资58万多元，一举改变了15所小学的面貌，后者集资36.7万元，新建学校10所。

勤工俭学 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以后，勤工俭学收入亦为中小学教育

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勤工俭学收入 50% 以上用于改善办学条件，此外还用于教职工福利或减免学费。

学杂费 建国初期，学校不向学生收费。1955 年开始收少量学杂费，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以后 1963 年、1979 年，教育部、财政部对学杂费的收取、减免、使用等作了原则规定，省上亦下发了相应文件。1979 年 2 月省教育厅下发的《陕西省中小学学杂费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规定，学杂费不列入国家预算。其标准是：小学 1—3 年级 1.5 元；4—5 年级 2 元；初中 2.5 元；高中 3 元。农村学校各等级别相应降低 0.5 元。对家庭确有困难学生可酌情适当减免。减免比例城镇学校不得超过 5%，金额不得超过 10%；农村学校各相应提高 5%。收取的学杂费 50% 留学校使用，50% 上缴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使用。其用途为行政经费开支和充实教学设备。1985 年省教育厅、财政厅、物价局发文提高收费标准，初小 2 元，高小 2.5 元，初中 3.5 元，高中 4.5 元。

教育费附加 1986 年，国务院发布了《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1987 年，各县区开始征收教育费附加和人民教师基金，使农村中小学的公用事业费和民办教师工资有了可靠的来源。从 1987 年至 1990 年，全市分别征收教育费附加 704.6、438.6、1451.6 和 1920.9 万元。

二、经费使用

明清时代，教育经费的使用大致有教职员薪资、仆役工食、生员服食用品及学校各项杂用等。根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咸阳等三县学务岁出统计表（表 1-11），即可看出当时学校经费使用的一般情况。

光绪三十三年（1907）咸阳等县学务岁出类别统计表

表 1-11

单位：银元

县份	合计	教员薪俸	职员薪俸	仆役工食	服食用品	图书标本仪器	营建修缮	杂用
咸阳	4831	2875	260	162	230	405		899
武功	4733	1346	454	102	926	954	30	921
长武	2070	1550	240	36	200			44

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的分类支出尚无系统资料。根据 1942 年咸阳等五县教育经费使用情况统计表（表 1-12），可以看出一般情况。

1942 年咸阳等县教育经费使用情况

表 1-12

单位：元

县份	总支出	中等教育	国民教育	社会教育	奖学金	童子军训练费
咸阳	257746	75150	162166	8856	10500	1080
醴泉	268498	63940	12880	7200	7600	878
邠县	154500	47300	93000	5760	7600	846
栒邑	111107	33220	72960	227	4700	
长武	110880	25270	72520	3600	7600	1890

建国后，教育经费的支出，可分为中等专业教育、职业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幼儿教育、民办补助、高等业余教育、教师培训进修以及广播电视教育等门类开支，开支种类较历史上大为增加；具体使用可分为个人部分和公用部分。个人部分有工资、补助工资、福利、离退人员经费、助学金、副食补贴、差额补助等；公用部分有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等，其类别亦较历史上大为增加。以 1984 年和 1990 年全市各类教育经费支出情况为例，1984 年教育事业经费总支出为 4279 万元，1990 年增至 10566.3 万元，其中幼儿、小学、中学教育分别由 1984 年的 20 万元、1434 万元和 1638 万元增至 953 万元、3418.4 万元和 4480.5 万元。再以 1984 年和 1990 年全市教育经费使用情况为例，1984 年职工工资和补助工资分别为 1368 万元和 1209 万元，1990 年则分别增至 4214 万元和 2717 万元，增长幅度均比较大。相对而言，修缮费增加不多，设备购置费还稍有下降。但因有群众集资加以补充，公用经费实际上也有较大增加。

三、校 舍

历来县学和书院校舍多由官府出资修建，并有较为规范的布局设计。清末和民国时期，县立高等小学以至中学校舍，亦由当时政府建造。至于乡间

小学，大多设立于寺庙祠堂之内。个别由个人捐资新建的学校则有专修的校舍，如于右任创办的三原民治小学即是。

建国后，所有中学校舍均系重修或新造，小学亦大部分有了新建的校舍，只有一部分初小还办在寺庙祠堂以至窑洞里。50年代，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新设立了一批中、小学，其校舍全系新建。60年代后期，一些校舍或遭到破坏，或被其他单位挤占。到1973年6月，全地区被占用的校舍有1343间，建筑面积41001平方米。占用校舍的有党政机关、国营企事业、合营企业单位等。70年代后期在戴帽中学盲目发展时期，虽然也曾由国家拨出一定款项，再加上群众献工献料、师生动手自建学校，校舍建设有所发展，但总的改观不大。据1981年调查，当时全地区有危房16540间，占全地区中小学校舍的40%；缺课桌凳161302套；6000多个教学班没教室，4000多名学生实行二部制，有不少学生在露天上课；三分之一的学生没有课桌凳。“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的现象到处都有。

1980年，国家《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下达以后，各级领导对教育事业的认识有了提高，开始努力实现“一无两有”（即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为此，各县区发动群众集资办学，四年中，全市共集资7073万元，加上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总投资9517万元。到1984年底，已有杨陵、秦都、泾阳、礼泉、兴平五县区普及了初等教育；乾县、三原、永寿、旬邑、长武等五县基本上实现“一无两有”。全市从1984年开始，在普及初等教育工作中，推行分级办学、分工管理制度，各级多方筹措办学资金。1984、1985两年，全市投资6982.8万元，新建学校840所，校舍约50万平方米，修缮危房20万平方米，添置课桌凳11万套，各类小学全部实现了“一无两有”。1986、1987两年，又投资1346万元进一步改善了办学条件。1988、1989年又实施六年义务教育，同时开展乡办初中校舍的改造和建设，共计新建校舍27万多平方米，共投资3837.4万元。

80年代以后，全市各县区新建的校舍不但数量远超以前，而且质量也大大提高。以前的校舍多为土木结构，老式门窗，地面潮湿，光线不足，年代稍久，即成危房。新建的校舍则多为高标准，1984年全市新建的学校中有87所建起了教学楼，全市有楼房的小学达227所，新建的校舍中82%为砖木结构，18740间教室为砖铺地面，修筑的60多万平方米围墙中有31万多米是砖砌的。各地多方面创造良好的办学条件，为学校建起了厨房、图书阅览室、教学仪器室、电化教学室、会议室等。

四、教学设备

清代末年，具有维新思想的关中大儒刘古愚主持的味经书院，不但藏书丰富，自己刊书，而且购置了一批供学习“西学”用的仪器。民国时期，除县立初级中学和少数完全小学有简单的教学实验用品及史地挂图外，一般小学基本上没有其他教学设备。据《陕西省中等教育视察报告》，三原县初级中学国民三十年（1941）时“设备十分简陋，校舍系借用关帝庙，既简陋，且不敷用，校具教具勉强可以足用。图书、仪器、标本、实习用品等一无所有，药品、体育用品勉强足用”。小学如淳化县润镇国民中心小学在民国36年（1947）时所有教学设备计有：课桌35张，椅子4把，长凳5条，短凳1条，圆凳1个，黑板1个，校牌1个，架板2个，油灯4个，篮球1个，排球1个，银盾1个。

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对中小学的教学设备建设日渐重视，一些重点中小学的图书仪器有了保证，部分中学还建立了新型实验室。但经“文化大革命”后，原有的教学设备损失、破坏殆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学设备建设受到重视，各校始重新配备，大量购置。从1988年开始，全市实施六年制义务教育，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配备教学仪器。在这项工作中，将全市小学分为一、二、三类，分别配备。三年共计配备教学仪器1744套，其中一类27套，二类208套，三类1509套。各类学校都按相应标准配备齐全了教学仪器，基本上满足了教学之用。

中学的教学仪器配备，首先保证各县（区）的重点中学。截止1990年，各县区重点中学的仪器已经配备齐全，其他中学的仪器设备也逐年增加。

第二编

科 技

第一章 科技管理

咸阳境内古代尚无专门科技管理和研究机构。19世纪末叶，在传播近代科技知识的学校中以数学为主，附设一些科学实验场所，使科技逐渐得到发展。清光绪年间，陕西维新派领袖刘古愚在泾阳味经书院、崇实书院讲授时务、天文、地理、算学、制造、英文等课程，“以读书致用，转移风气为己任”，同时，自制晷仪，测绘陕西地图，进行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等科技实验。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亲自筹建“保富机器纺织局”，在泾阳兴办轧花厂，把轧棉花机推广到渭北农村。1905年由味经、崇实、宏道三书院合并组建的三原宏道工业学堂，与陕西高等学堂、陕西师范学堂一起选派48名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农、工、路矿等方面的科学技术。（1909）清宣统元年兴平张深如等去上海、武汉等地时，给兴平学堂购回新法织布机，招收工读学生学习织布，同时创办“复豳桑园”，发展蚕桑。同年泾阳知县周楠开办泾干农业学堂和试验农场，培养农业科技人才。1930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用祖田建立斗口村农事试验场，主要从事果树栽培试验。1933年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在泾阳梁宋村开办西北农事试验场，进行小麦、棉花、粟类的育种、灌溉、肥料等试验工作，先后育成了“兰花麦”和“517棉花”等优良品种。1937年省政府在泾阳设立农事试验所，在兴平成立渭惠农场，专责进行棉花、小麦栽培试验。1938年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次年改为国立西北农学院。1940年中央水利实验处又在杨陵建立水土经济研究室，开创了咸阳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新时期。

建国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市县科技管理体制逐步建立，科学研究机构迅速增多。截止1990年底，全市已有各类科研机构64所。其中中央部属、省属23所，市属8所，民办33所。

第一节 机构

一、管理机构

建国后，科技管理机构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先是 50 年代各县由建设科兼管，后至 60 年代归计划委员会兼管。

1972 年 4 月，根据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和陕西省科技会议要求，咸阳地区成立了计划委员会科技组，具体管理科技工作。1975 年 10 月，成立咸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科学技术局，并增设了资料室。1977 年 10 月，分别成立咸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咸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科学技术协会。1980 年元月，正式更名为咸阳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1984 年 6 月，又更名为“咸阳市科学技术委员会”。1985 年，相继成立了专利管理处和专利事务所。1988 年又成立了技术市场。至此，咸阳市科技管理机构基本完善。

咸阳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是市政府管理科学技术的综合职能部门，具体职责是：管理全市的科技工作；制定全市贯彻落实各项科学技术方针、政策的具体办法、规定和细则；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管理科技经费和科研项目；负责科技成果的鉴定奖励、推广和应用，向上级推荐重大科技成果；制定科技市场的管理办法，负责技术合同登记、审核和监督工作；审批各类民营科研机构；协调市经济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和对外经济协作委员会的科技项目引进论证；负责全市科技干部的管理、培训、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等。

咸阳市各县区的科技管理机构 1978 年开始设立，到 1983 年全部建立。各县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是县区政府的直属工作部门，职责是负责管理科学技术工作，促进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业务上接受市科委领导。

二、公办科研机构

市属科研机构

咸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于 1962 年建立。所址在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该所是以小麦、玉米、棉花、油菜的良种选育及其栽培技术为重点研究项目。设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土壤肥料（附设分析化验室）、植物保护、

科技档案情报资料等研究室，以及试验农场等。有固定资产 79 万元，建筑面积 5866 平方米。有职工 116 人，其中高级技术职务的 12 人、中级 23 人。到 1990 年已取得科研成果 41 项，其中获部、省级奖 32 项。

咸阳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于 1981 年 7 月成立，1984 年由咸阳地区林业科学研究所更名至今。所址在咸阳市渭城区任家嘴。该所面向渭北黄土高原，以推广林业适用技术为主要任务，开展育苗、造林、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及应用研究。所址占地 502.97 亩，建筑面积 2607.39 平方米，主要仪器设备 29 台（件）。有职工 41 人，其中高级技术职务 1 人，中级 6 人。到 1990 年获省级奖 3 项。

咸阳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是咸阳市一所综合性科技情报服务中心，1979 年成立咸阳地区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1984 年更名至今。地址在咸阳市西兰路六号院内。工作任务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科技情报工作的方针和政策；负责代行咸阳市科技情报工作的管理职能；为市各级领导部门决策当好参谋；面向社会、面向经济、面向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开展科技情报资料服务，情报调研、咨询服务；进行编辑报导传递信息。拥有建筑面积 400 平方米，馆藏国内外文献资料 6 万余册件。编辑刊物有《科技信息》。有职工 19 人，其中高级技术职务 1 人，中级 6 人。到 1990 年已完成科研课题 6 项。

咸阳市城市科学研究所 成立于 1985 年 8 月，研究重点放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方面，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所址位于咸阳市渭阳西路 5 号。有职工 6 人，其中经济师 1 人，工程师 1 人。到 1990 年已取得科研成果 3 项，其中《对关中经济区城市发展战略的思考》在第二届亚洲城市化国际会议上宣读。

咸阳市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1978 年 8 月在原咸阳地区卫生防疫站地方病科的基础上重新组建，所址在咸阳市滨河路 1 号。1984 年定名至今。该所重点是进行全市 14 个县区的地方病防治研究。地方病主要包括大骨节病、克山病、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甲状腺肿，另外还兼管麻风病、皮肤病、性病等。有两个挂靠单位：咸阳市中心血站、咸阳市医药卫生科技情报站。有职工 45 人，其中高级技术职务 2 人，中级 9 人。到 1990 年已完成科研课题 5 项。获省级奖 1 项。

咸阳市建筑设计院 于 1985 年元月由原来咸阳地区设计室、咸阳市设计处合并成立。院址在咸阳市渭阳西路 50 号。现为乙级勘察设计单位。

该院以对工业、民用建筑的研究设计为主。有职工 77 人，其中高级工程

师 5 人，工程师、建筑师 22 人。到 1990 年已取得科研成果 7 项，荣获省级奖励 2 项。

咸阳市环境科学研究所 始建于 1987 年 10 月。位于咸阳市闻喜路 5 号。主要业务以环境科学研究和环境影响评价为主。有 39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1 人，工程师 6 人。到 1990 年已有两项大的科研成果《咸阳市工业污染源调查技术报告》和《渭河咸阳段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已编制咸阳涤纶化纤厂，武功化工厂等 8 个单位新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书，并填报了陕西第一毛纺织厂等 20 余份环境影响报告表。

咸阳市化工研究所 于 1985 年成立。所址位于咸阳市毕原路。科研方向为配套电子产品研究所需的有机、无机化工产品，促进实施中央有关彩电产品国产化的政策，为发展全市电子工业服务。占地面积 4.2 亩，有职工 40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1 人，工程师 4 人。荧光屏研磨盘技术项目获省科技进步奖。

驻咸中央、省属科研机构

陕西省农业科学院 是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的农业研究机构。位于咸阳市杨陵区。该院前身为 1952 年建立的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8 年改名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1973 年改名陕西省农林科学院。1980 年林业研究所分出后，1983 年更名陕西省农业科学院。

该院下设粮食作物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所、土壤肥料研究所、畜牧兽医研究所（址设渭城区）、特种作物研究所、棉花研究所（址设泾阳县）、蚕桑研究所（址设周至县）、果树研究所、蔬菜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农业区划研究所、农业科技情报研究所、黄土高原治理研究所（址设米脂县）、黄土高原农业测试中心等 14 所独立的专业研究机构。有 46 个研究室。拥有大中型仪器设备 847 台（件），馆藏图书 12 万册，试验地 2300 多亩。全院固定资产原值 2000 多万元，建筑面积 10 万多平方米。有职工 1614 人，其中高级技术职务 20 人，中级 345 人。到 1990 年已取得科技成果 365 项，获国家奖 7 项，获部、省级奖 61 项。

陕西省植物保护研究所 位于咸阳市杨陵区，1958 年建立。初期有 40 名研究人员，1989 年在岗职工 74 人，其中高级技术职务 17 人，中级 14 人。

研究方向主要是面向陕西省粮、棉产区，进行主要农作物病、虫、草、鼠害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研究；农作物大面积丰产的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措施，化学农药使用技术，新农药筛选试验等。同时又开展了生物防治和农业生态工程控制病虫发生危害的研究，并对西瓜、豆类、蔬菜、核桃、板栗等

经济作物病虫害开展防治研究。承担“七五”国家攻关及省科委、农牧厅、农办等科研课题 20 余项。建筑面积 1590 平方米，有温室 570 平方米，养虫室 187 平方米，网室 190 平方米，低温室 93 平方米和大田试验地 20 余亩，并在太白县建立高山温室一座。

到 1990 年取得科研成果 66 项，其中荣获国家级奖励的有 5 项，部、省级 21 项。小麦条锈病、小麦吸浆虫，棉花枯、黄萎病、棉花害虫，玉米丝黑穗病等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成果已在农业生产上发挥重要作用。出版各种专著及科技图书 10 余册；公开发表论文 220 余篇，其中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 7 篇，全国性学报发表 35 篇。还派出研究人员到日、美、法、英、苏、瑞典等国进行专业考察或合作研究，有 26 人次担任全国、省级专业学会或其他学术机构的理事或委员。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是以水土保持为研究对象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机构。位于咸阳市杨陵区。1956 年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成立。1958 年改名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1964 年改为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1979 年 10 月更名至今。

该所主攻方向是：面向黄土高原，以水土保持为中心任务，开展水土流失规律、预测预报和防治途径，土壤及土地资源的评价和合理利用，植被恢复的理论与技术，旱作农业增产体系和依据等方面的研究，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和农林牧综合发展服务。建筑面积 3 万多平方米，万元以上仪器设备 108 台（件）。有职工 363 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 78 人，中级科技人员 92 人。到 1990 年取得科研成果 240 多项，有 10 项获国家奖，31 项获部、省级奖。《黄土高原飞机播种造林种草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 是一所以应用技术为主，面向西北地区的综合性水利科学研究机构，位于咸阳市杨陵区。1950 年西北水工实验所成立。1956 年更名至今。

该所以承担西北地区重点水利水电工程试验研究为主，同时承接其他地区的横向试验研究任务。占地 190 亩（包括灌溉试验场地 46 亩），建设面积 4.3 万平方米。有职工 371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37 人，工程师 81 人。到 1990 年已取得工程委托试验报告和研究成果 1000 多项，有 11 项获国家奖，34 项获部省级奖。

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1958 年建成。1959 年冬并入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1980 年独立。位于咸阳市杨陵区。设有 6 个研究室及林业综合实验

室。还有渭河、安康、南五台三个试验站及延安树木园。所部占地 51 亩，试验场地 2115 亩。建筑面积 1.1 万平方米。有职工 163 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 15 人，中级科技人员 33 人。到 1990 年取得科技成果 65 项，有 2 项获国家奖，6 项获部、省级奖。

陕西省机械研究所 于 1958 年 12 月在西安成立，1973 年 3 月在咸阳重新建所。位于咸阳市文汇西路 13 号。占地 47.1 亩。该所是以工艺研究为主要对象的地方综合性研究机构。面向地方机械工业，以工艺研究为主，发展材料研究和微电子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承担有机机械工业系统的行业技术任务。建筑面积 21350 平方米，有职工 296 人，其中中级以上科技人员 83 人。到 1990 年取得科技成果约 200 余项，其中 20 多项获部、省级奖，40 多项获地、市级奖。“100KW/100IH 中频感应真空烧结炉”荣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陕西省特种作物研究所 于 1960 年 7 月成立。所址位于咸阳市杨陵区。有职工 66 人，其中高级技术职务人员 8 名，中级 15 人。该所以经济作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油菜、花生、芝麻、烟草、麻类、甜菜等栽培、育种、开发、加工等应用研究。到 1990 年取得了 28 项科研成果，其中国家级 1 项，部、省级 12 项，为国家增加财税收入 5 亿余元。

陕西省农业经济研究所、陕西省农业区划研究所 省农业科学院下属独立的专业科研单位。位于咸阳市杨陵区。一套机构，两个牌子。

农业经济所主要研究陕西省农业生产力合理配置与宏观政策。包括农村产业结构与布局、农业技术经济与管理，农产品成本与价格，农业积累与消费以及农村综合发展等。农业区划所主要研究陕西省农业资源的综合评价，动态监测、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以及农业区划、区域发展和农业商品基地建设等。有职工 29 人，其中高级技术人员 2 人，中级 10 人。到 1990 年已取得科学研究成果 19 项，其中部、省级以上的 4 项，取得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农村发展研究成果 23 项。出版专著 3 册，协作出版的著作 7 册，在省以上刊物发表论文、报告 102 篇。

机械电子工业部第二〇二研究所 是以兵器专业系统总体技术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应用技术研究机构。所址位于咸阳市毕原东路 5 号。1957 年 6 月始建于北京。由新中国兵器工业创始人之一的吴运铎任第一任所长。1969 年底迁来陕西省咸阳市。1970 年更名至今。

该所以兵器专业系统总体技术研究为主，承担专业系统工程、结构力

学、专业零部件、液压、电器、电子、自控、实验、测试和计算机等应用技术研究开发任务，是兵器行业的第二技术开发中心。有职工 1300 多人，其中高级技术职务 139 人，中级 340 人。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据 1978 年至 1989 年不完全统计，已取得各项科技成果 327 项，其中国家级成果 15 项，部（委）级成果 34 项。

化学工业部西北橡胶工业制品研究所 于 1966 年建立。该所已成为综合性橡胶工业制品研究中心。位于咸阳市西郊。主要为军工设施配套，70 年代后期面向社会服务。主要承担橡胶工业制品（包括橡胶密封制品、模型和非模型制品）和特种橡胶制品的研制；新型橡胶助剂合成；工艺装备研究、设计；塑料制品、聚氨脂泡沫等产品的开发研究，同时也配合产品研究开展橡胶物性测试、化学分析，老化贮存期快速测算以及标准情报的研究。建筑面积 53590 平方米，有技术设备 1122 台，有职工 751 人，其中高级技术职务 30 人，中级 156 人。

到 1990 年，取得科技成果 404 项，其中获国家级成果 16 项，部省级成果 41 项。

陕西纺织器材研究所 是以纺织器材技术开发为主的综合性研究机构。1964 年纺织工业部纺织器材研究室成立，1976 年 8 月更名至今。位于咸阳市秦都区渭阳西路 37 号。为陕西省纺织工业公司直属科研事业单位，面向全国纺织器材行业，承担着全国纺织器材工业科技情报站业务，是全国纺织器材标准化归口单位；承担着橡胶器材部优质产品评比检测，省纺织器材质量监督检验站工作及省优产品的检测。建筑面积为 22556 平方米，万元以上设备、仪器 39 台（件）。有职工 194 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 9 人，中级科技人员 39 人，到 1990 年，取得科技成果 25 项，有 4 项获国家奖，14 项获部、省级奖。

陕西省土壤肥料研究所 是以土壤、肥料为研究对象的专业研究机构。1960 年 7 月 1 日成立。位于咸阳市杨陵区。

该所面向黄土高原，以土壤改良与培肥，开辟肥源与合理施肥为中心；开展土壤肥力演变规律的监测和培肥途径；绿肥牧草的栽培利用和化肥合理施用；土壤资源评价及改良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建筑面积 2600 平方米，试验场地 78 亩。有科研人员 50 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 11 人，中级 19 人。到 1990 年已取得各项科研成果 44 项，其中获国家奖 1 项，部、省级奖 11 项。

陕西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是以畜牧和兽医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研究所，于 1958 年 10 月成立。1963 年 12 月分为省畜牧研究所和省兽医研究所。1969 年

1月合并，更名至今。1980年元月迁至渭城区窑店镇。研究项目：牧草、饲料资源开发利用，畜禽营养与配合饲料技术，畜禽品种选育与改良，繁殖技术及生物技术，养蜂综合技术；畜禽传染病、寄生虫病、微量元素代谢病，真菌中毒病及中西兽医结合等。建筑面积12696平方米，有职工182人，其中高级技术人员22人，中级50人。到1990年取得科研成果72项，有4项获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奖，1项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3项获省科技进步奖，47项获省农牧科技成果奖。“耕牛蹄腿肿烂病病源和柯氏伪裸类绦虫生活史的研究”，获农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高陵县养鸡良种化的实践”，“陕北细毛羊的培育”，获省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

陕西中药研究所 于1981年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建立，占地面积约60亩，建筑面积13159平方米。位于咸阳市毕原路16号。主要从事陕西省及西北地区中药的栽培、引种以及病虫害防治；药源调查和综合利用研究；中药制剂研究、中药成分分析；药理研究及药用动物的研究。有职工214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11人，中级研究人员31人。有汉、英、日、俄有关医药书籍10000余册，期刊近300种，常规仪器设备齐全。到1990年已取得科研成果6项，获国家奖1项，省级奖2项。

西北植物研究所 是我国西北地区惟一的一所综合性植物专业研究机构。位于咸阳市杨陵区。于1965年成立，有职工273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33人，中级67人。

主要研究任务是：植物系统分类、植物区系；黄土高原植物演替规律，经济植物人工群落；资源植物开发利用；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及遗传规律、小麦染色体工程，小麦杂种优势利用；植物细胞工程等。现存植物腊叶标本52万多份，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收集最全的植物标本馆。大型通用显微镜、气相色谱、原子吸收光谱、人工气候箱及细胞培养专用仪器设备基本配套。

到1990年，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主持和参加编撰出版的专著50多部；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64项，远缘杂交培育的小麦优良品种“小偃6号”在全国十省（区）推广面积5000万亩，于1985年获国家科学发明一等奖，1988年获首届陈嘉庚农业奖。所编《西北植物学报》已出刊发行10卷33期。

陕西省农业科技情报研究所 1980年组建。位于咸阳市杨陵区。主要面向陕西经济建设，开发农业信息资源，为农业生产、科学研究和领导决策提供情报服务。主要任务：有针对性地对搜集国内外农业文献资料，实行科学管

理,开展检索、借阅、复制和咨询服务;开展情报研究,分析研究国内外农业生产和技术发展的水平、动向、趋势和经验;组织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科技信息库,逐步开展电子计算机情报检索;办好情报刊物;开展声像、印刷服务。有职工62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8人,中级13人。到1990年已有3项科研成果获省级奖励。

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十二研究所 创建于1964年,是我国造船行业唯一的热加工工艺研究所。以铸造、锻造、热处理专业为主,兼及材料研究、理化检测等,有较强的研究力量及先进的检测手段,并有一定的生产试制能力。位于兴平板桥。有职工300余人,其中科技人员152人。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各种科研、生产、测试设备仪器526台。到1990年,获国务院国防工办、原六机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山西省、上海市等颁发的重大科技成果奖11项。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咸阳非金属矿研究所 直属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的科研事业单位。主要从事非金属矿物和非金属矿工业技术开发及综合应用研究。1963年始建于北京,1975年迁至咸阳市西郊。有职工263名,其中高级工程师24名,工程师61名。研究领域:各种非金属矿物的采矿、选矿、深加工、制品、综合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技术和工艺研究;专用工艺设备,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研究、设计;岩石矿物、矿产品及其制品的物化性能的测试、研究;新矿种的开发利用研究;产品标准及其检测方法的研究、制订。承担着国家对非金属矿产品和部分制品的质量检测、评价、认证和仲裁任务;还编辑出版《国外非金属与宝石》杂志,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到1990年已取得科研成果51项。其中获国家级奖7项,获省级奖1项。

陕西省蔬菜研究所 该所是研究和解决蔬菜生产中重大关键性技术问题的一级科研机构。前身是原西北农科所园艺系蔬菜组。1959年与西安市园艺所合并成立陕西省蔬菜所,设在西安市三桥镇。1961年与西安市园艺所分开,搬迁到杨陵镇。“文化大革命”中,曾与本院的特作所、农经所合并成为经作组。1975年再度独立。主要任务:蔬菜品种资源的收集、整理、利用,研究培育出抗病、高产、优质的早、中、晚蔬菜品种,在生产实际中扩大、推广应用。现有科技人员38名,其中中级以上技术职务22名。1978—1988年共取得科研成果25项。其中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项,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2项,省科技成果奖4项。

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 1970年陕西省工业陶瓷厂玻璃陶瓷研究室成立。

1973年改为陕西省建筑陶瓷研究所，1975年成立陕西省陶瓷非金属矿研究所。1983年改为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位于咸阳市渭阳西路。面向全国，以建筑卫生陶瓷科研设计为主，是我国建筑卫生陶瓷技术开发中心、行业情报信息中心、产品标准化质检中心以及建筑卫生陶瓷热工测试中心。主要从事卫生瓷和建卫瓷工艺研究及产品的研究开发；设计、研究机械装备（当前以消化吸收为主）；研究、制订产品标准和测试方法标准，新组建的建厂设计室承担老厂的改造和设计业务；工业陶瓷和耐火材料的技术开发。设置在学院的质检中心、情报信息中心及窑炉热工测试中心，除承担委托测试任务外还从事部分行业管理工作。有职工273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18人，中级61人。科研、生产、试验区占地42.4亩，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试验仪器设备约300台（件）。藏有各类图书2万余册，资料期刊1.7万册。编辑并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有《陶瓷》、《陶瓷信息》。到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获全国科技大会奖1项，国家建材局科技成果二等奖1项，部、省级科技成果三等奖2项，部、行业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省科技星火二等奖1项，国家建材局标准化科技成果四等奖2项。

核工业西北地勘局二〇三研究所 该所是以铀矿地质开发应用为研究对象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机构，于1974年成立，位于咸阳市渭阳西路48号。1988年定名如题。所址设咸阳市毕原东路5号。任务是：面向西北，以铀矿地质研究为主，开展铀矿床成矿机制、区域成矿条件、成矿规律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为西北地区的铀矿开发服务。同时开展民用技术产品的开发应用研究，为发展地方经济服务。有职工317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36人，中级科技人员79人。拥有各种设备仪器810台（套）。到1990年先后完成各类科研成果198项，其中31项分别获得全国和省部级奖励。

三、民办科研机构

从1988年起，咸阳市民办科研机构迅速兴起。诸如咸阳市秦城农村科技开发研究所，咸阳经济技术开发服务部，咸阳挂毯技术开发公司，东方应用科学技术研究所，咸阳汉陵电子产品研制所，咸阳秦城科技建筑安装技术开发公司，咸阳无损检测电子技术服务公司，广宇计算机应用开发研究所，咸阳化工新产品研制所，咸阳科理新技术研究所，咸阳市人体衰老增生中医研究所、咸阳生物化学研究所等12个科研机构。

1989年，民办科研机构相继增建了8个：咸阳节能应用技术研究所、咸

阳工程科学研究所、咸阳医药保健品研究所、咸阳羊毛资源开发研究中心、咸阳金属表面技术研究所、咸阳抗衰老研究所、咸阳技术市场新产品试制加工厂、咸阳专利技术应用研究所。1990年又增建了13个，使民办科研机构总数达33个。增建的有：咸阳秦塬电子组件研究所、咸阳石油设备安装技术服务队、兴平传感器研究所、咸阳中医肿瘤研究所、陕西咸阳电源技术研究所、咸阳崇光电子研究所、礼泉大粒葡萄研究中心、咸阳市特种橡胶制品厂、咸阳基建科技事务所，杨陵科技开发实验厂、咸阳电子技术应用研究所，秦城科技建筑安装技术公司、咸阳精华红外电子技术应用研究所。

民办科研单位，绝大部分为集体经济性质，是科技人员自由结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与生产紧密结合的科研实体。其科技成果转化生产力的环节少、周期短、效益大。最典型的有：（一）渭城区科委所属的咸阳羊毛资源开发研究中心。先后在淳化、合阳、长安等7个县建立了13个羊毛生产基地，引进推广细毛羊优良品种1503只。在咸阳、渭南建起了两个良种羊场。目前基地羊存栏1.45万只。同时，为各基地培训了一批会管理，懂生产技术，疫病防治及生态效益好的养羊骨干力量。在此基础上，建成了年产洗净毛600吨，毛条500吨，产值1000万元，利税百万元的渭河毛条厂，推动了羊毛资源的开发利用。1990年，获科技兴陕先进集体称号，在全国第五次星火计划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二）秦塬电子组件研究所。该所开发的电子玩具，电子医疗诊断仪等产品被轻工部定为优秀产品。B型系列防爆电子组件替代进口产品，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安全栅项目已同西安仪表厂配套生产。（三）咸阳抗衰老研究所，以配制生产505神功元气袋为主。1989年8月开始批量生产。1991年底产品已销售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及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销售收入4868万元，实现利税650万元，上缴税金347万元，创汇150万美元。同时向灾区以及卫生、教育、科技等部门捐赠救济款和奖励基金共计550多万元。505神功系列产品和发明者来辉武厂长，先后荣获首届中国商品市场销售博览会最受消费者欢迎奖、中国国货精品博览会金奖、全国优质保健品金奖、中国“星火”计划项目在泰国展示会金奖、第82届巴黎国际发明博览会发明铜奖、第14届世界发明家博览会发明家奖及国际成果奖多项，全国各地200多家新闻单位作了专题报道。

第二节 队 伍

民国时期，咸阳经济、文化落后，技术力量薄弱，难以形成一支稳定的

科技队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科技队伍逐步壮大起来。建国初，全市共有各类科技人员 6042 名；1966 年，已发展到 26011 名，为建国初的 4.3 倍；1990 年，发展到 71656 人，为建国初的 12 倍。

科技人员中，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 名，部级各类专业技术委员会委员 5 名，国家各种学会理事 10 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4 名，全国劳动模范 3 名，全国“三八”红旗手 2 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2 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2 名。

一、专业类别

建国初的 6042 名科技人员中：工程技术人员 38 名，农业科技人员 19 名，卫生技术人员 50 名，教学人员 5935 名。

1966 年的 26011 名科技人员中：工程技术人员 3000 名，农业科技人员 1233 名，卫生技术人员 4319 名，教学人员 17459 名。

1990 年的 71656 名科技人员中：工程技术人员 5091 名，农业科技人员 2360 名，卫生科技人员 7495 名，经济专业 2285 名，会计专业 5980 名，统计专业 1622 名，中小学教育 43670 名，技工学校 81 名，中等专业学校 296 名，高等学校 67 名，图书、文博、档案专业 541 名，艺术专业 992 名，律师专业 118 名，公证专业 102 名，新闻专业 96 名，出版专业 103 名，党史专业 77 名，播音专业 29 名，党校专业 242 名，电影专业 277 名，情报专业 57 名，翻译专业 16 名，工艺美术专业 59 名。

中央、省驻咸单位的 6839 名科技人员中：西北农业大学 1326 名，西北林学院 467 名，西北轻工业学院 713 名，陕西中医学院 463 名，铁道部干部管理学院 196 名，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295 名，西北橡胶工业制品研究所 302 名，二〇三研究所 200 名，西北植物研究所 273 名，水利科学研究所 362 名，二〇二研究所 760 名，非金属研究所 166 名，陶瓷研究设计院 170 名，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十二研究所 152 名，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112 名，省农业科技情报研究所 36 名，省棉花研究所 66 名，省纺织器材研究所 88 名，省农业经济研究所 26 名，省土壤肥料研究所 50 名，省特种作物研究所 47 名，省蔬菜研究所 38 名，省机械研究所 168 名，省植保研究所 57 名，省粮食作物研究所 83 名，省林科所 126 名，省中药研究所 97 名。

二、技术职务

1979年，咸阳地区人事局、科委联合对全区科学技术人员情况进行了普查，全区共有科技人员14385人，其中从事科技工作的11983人，用非所学的2403人。1980年，在工程技术人员和农业技术人员中开展了技术职称的复查、套改、考核、晋升工作。至1982年2月，有426名科技人员获得中级技术职务。其中工程师262名，农艺师117名，畜牧师17名，兽医师30名。1983年9月，全市应评技术职务的12140人中，有8131人获得技术职务。其中高级7人，中级1220人，助理级2993人，技术员3911人。

1985年5月，市科协对地改市后全市科技人员进行了调查。全市共有科技人员29973人。其中高级职称374人，中级职称7377人，初级职称7961人，技术员7262人，待定的6999人。

1987年，在职称改革中，全市设立4个高级、30个中级、137个初级技术职务评委会，在23个系列，4347个部门开展技术职务的评定工作。这次评定，涉及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71656名科技人员，截止1990年底共有60327人获得技术职务。其中具有高级任职资格的1086人（正职4人，副职1082人），中级任职资格的9909人。

中央、省驻咸科研、教学单位6839名科技人员中，有高级技术职务的1068人，中级技术职务的2400人。

三、归口管理

1979年元月开始，咸阳市按照“人尽其才，用其所长”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科技人员的调整归队工作，并注重了农业、教育、科研部门的充实。三原县调整20名，到农业部门工作的有8人，去科研单位的有8人；彬县调整16名，到农业部门的有14人；淳化县调整10名，去教育部门的有5人。通过调整，对于当工人、营业员的大专毕业生共117名转入人事部门按干部管理。截止1979年6月全市共调整462名，占应调整人数的94.7%。1983年按照有关政策，解决了专业技术干部家庭户口的“农转非”问题，止年底统计共解决各类专业技术干部户口1291户，4826人。其中自然科学类有899户、3343人；社会科学类有96户、354人；中小学教师296户，1122人。安置在山区的762户，平原区的529户。同时还充实了山区县乡科技队伍。

截止 1984 年 6 月，调往山区的科技干部中，计有 121 名被提拔各级领导岗位。此外当年批准科技干部“农转非”855 户、2612 人。实行山区津贴有 6043 人，享受浮动工资的有 8413 人。同时按照政策规定，还安排了科技干部子女就业。1987 年实行科技干部合理流动政策，至年底已有 20 余名专业技术人员从城市分流到县区工作。1988 年 12 月省科技兴陕会议后，咸阳开始实行农业科技集团承包政策，止 1989 年统计全市共组建 14 个承包集团，承包了粮、油、棉、畜等 9 大类 200 个项目，承包人数 3026 人。承包粮食面积 620 亩，总计增产粮食 13.8 万吨，增加多种经营产值 1.96 亿元。

第三节 业 务

咸阳市科技管理业务工作起步于 1972 年。在此之前无专管机构和管理章程，项目经费多由各厂矿企业自选实施。1972 年地区计划委员会始设科技组，1977 年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管理体制和规划实施，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轨道。

一、项目经费、计划项目

科技项目管理主要是科研计划管理，包括新产品研制、中间试验和重要科学研究三个大类。1972 年地区计委科技组成立后，项目开始分类列入年度计划管理，由计委科技组根据国民经济计划、规划，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计划。地区科技组协同各部门考查项目，审查结转项目的年度计划和经费申请，批准项目计划任务书，编制出科学技术研究计划草案，经计委审定后，纳入当年国民经济计划，统一下达各县、市有关部门执行。年度计划下达后，新增项目可随时上报，经批准后专项下达，以后再补充列入年度调整计划。计划项目完成后，进行工作总结和技术考证，对取得的科技成果由地区科技组或委托主管部门组织鉴定，并负责对科技成果提出推广应用方案。

1982 年地区科委按照国家科委提出的“专项管理，分级负责，同行评议，签订合同”的工作原则，对部分科技项目和新产品项目，开始试行科技项目经费合同制管理，根据项目性质、难易程度、效益情况和偿还能力，实行无偿、部分有偿、全部偿还的办法，每年都安排一部分有偿项目。截止 1990 年底共签订有偿合同 56 项。这种管理办法把技术责任、经济责任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取得显著成效，使课题成功率由“六五”期间的 78.5%，提

高到 97%，推广应用率达到 95% 以上。项目完成情况详见表 2-1。

“星火计划”乃国家科技发展部署，1986 年咸阳市开始推行实施，截止 1990 年统计共安排市、省、国家级项目 90 项，其中国家级 14 项，省级 17 项。至 1990 年完成项目 44 项，基本完成 21 项，共占总项目的 72.2%。获市和市以上各种奖励 32 个。市县区科委会同有关部门完成“星火计划”培训项目 46 个，培训人员 9360 名。据市“星火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七五”期间累计新增产值 1.57 亿元，新增税利 3210 万元，创汇 203 万元。全市通过“星火计划”的实施，不仅促进了一批原有区域性支柱产业如蔬菜种植、养殖、造纸等进一步发展，也因势利导有效地推动了编织、生物发酵、农副产品加工与大工业配套等一批新的区域性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科技项目经费包括科研、中间试验和新产品试制三项，凡列入省科技项目的由省科委拨给本市承担单位，市科委负责管理和检查使用情况。国家科委和省厅局项目，经费随计划下达给承担单位。

1980 年实行地方财政包干后，市科委科技项目经费按照《陕西省科技三项费用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进行管理，首先考察论证出切实可行的项目，并报市计委计划会审批下达，经费由市财政局一次或分批拨给市科委。市科委按专项经费一次或分期拨款给有关主管部门，专款专用。其使用范围包括：新产品试制所需的工模、卡具的购置，超出生产该产品试制计划数量的正常消耗和报废部分的补贴；中间试验必需的设备、仪器和原材料的购置、安装、必要的土建工程和试验开支；科研项目增添的专用仪器设备费，试验用的材料费，专用图书和技术资料费，以及计算、测试、调研费等。项目完成后要有经费决算和工作总结。

1982 年试行合同制管理后，项目受到课题负责人的保证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从而在制度上得到保障及计划的完成，促使承担单位合理使用科研经费。1985 年三项费有偿额 16.4 万元，1986 年三项费有偿额 12.6 万元，1987 年回收 3 万元，1989 年有偿使用资金已占总投入资金的 30% 以上。1985 年 12 月后，制定出《咸阳市科学技术优惠贷款暂行管理办法》，增设科技信贷专项拨款，由市财政局列入 1986 年财政预算，一次性划出 400 万元，由市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科技信贷业务。历年科技经费安排详见表 2-2。

咸阳市 1972 年至 1990 年科技计划项目与完成情况统计表

表 2-1

单位：项

年 份	项目总数	分 类				完成 情况	有 偿 项 目	备 注
		工业	农业	医药 卫生	其他			
1972 年	89	41	35	6	7			
1973 年	57	23	22	6	6			
1974 年	61	29	23	4	5			
1975 年	55	18	28	7	2			
1976 年	27	/	/	/	/			
1977 年	29	9	15	2	3			
1978 年	25	/	/	/	/			
1979 年	23	3	16	2	2			
1980 年	38	8	16	7	7	37		
1981 年	34	6	17	6	5	33		
1982 年	30	8	17	3	2			
1983 年	27	6	17	2	2	19		4 项未进行
1984 年	25	6	16	1	2		2	
1985 年	48	13	28	4	3	47	19	
1986 年	47	7	29	6	5		13	自筹 2 项
1987 年	46	11	31	2	2		4	
1988 年	57	12	35	2	8		6	自筹 1 项
1989 年	54	17	30	3	4	48	4	
1990 年	64	26	27	3	8		2	

注：“七五”期间（1986—1990年）完成省科技计划项目 33 项。表内数据来自咸阳地区（市）计划委员会下达的历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

咸阳市 1972—1990 年科技项目经费统计表

表 2-2

单位：万元

年 份	科技三项经费	年 份	科技三项经费
1972 年	44. 0	1982 年	33. 0
1973 年	47. 1	1983 年	15. 0
1974 年	34. 0	1984 年	15. 0
1975 年	39. 0	1985 年	34. 6
1976 年	38. 1	1986 年	29. 5
1977 年	28. 7	1987 年	25. 77
1978 年	34. 7	1988 年	25. 7
1979 年	26. 0	1989 年	42. 3
1980 年	31. 0	1990 年	100. 0
1981 年	12. 4		

注：表内数字来自咸阳地区（市）计委下达的历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

二、成果专利

科技成果管理主要职责是技术鉴定和成果奖励。鉴定工作开始于 1972 年计委科技组成立后，根据国务院 1961 年 4 月《关于新产品、新工艺技术鉴定暂行办法》鉴定分地方级和基层级，由下达部门主持、技术人员参加进行（包括同行专家，本市和驻咸阳科研室，大专院校）。1978 年后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鉴定工作分检测鉴定、验收鉴定和专家评议三种形式，地区科委主要负责对直接下达的项目主持鉴定。另外根据基层要求，对计划外项目亦协助主持鉴定。鉴定委员会设委员 11 人左右，并负责做出鉴定结论。1978 年 5 月，咸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国家《技术改进奖励条例》，首次召开地区科学技术大会，表彰奖励优秀成果 235 项（包括驻咸单位成果）。1979—1981 年地区行政公署在每年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上对科技成果进行奖励。全区工、农、医等系统共奖励优秀成果 56 项，其中工业 14 项，农业 35 项，医疗卫生 7 项。1980 年获省政府奖励 5 项，1981 年获省政府奖励 9 项，获省主管局奖励 2 项，这些成果在生产中已推广应用，经济效益显著。

1982年7月咸阳地区行政公署颁布了《咸阳市科技成果奖励试行办法》1988年3月市政府对15个项目给予奖励，其中一等奖1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6个，四等奖3个。奖状、证书由科委代市政府颁发，奖金由市财政局拨给。

1986年12月市政府颁发了《咸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市科委又制定了实施细则，同年成立市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负责市级科技进步奖的评审和申报省级项目的初审。下设工业、农业、卫生、综合4个评审组。1987年5月，市政府首次批准市级获奖项目共30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6项，四等奖17项。这些项目中，有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5项，达到省内先进水平的6项。还有可计算经济效益的22项，累计经济效益2300万元。1986年咸阳市建立科技成果公报制度，公报所公布的科技成果，均经过技术鉴定，验收审定并上报登记。

1987年至1989年市政府对94项科技成果进行奖励，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16项，三等奖38项，四等奖36项，此外同期市科委先后参加在北京、广州等地举行的第一、二、三届全国技术交易会，在西安举行的西北五省技术交易会，本省第一届技术交易会第四、五届发明展览会和第二、三届国际科技发明博览会，展出的技术、设备和新产品获金、银、铜奖30多枚，同时引进大量先进的实用技术和技术人才，促进了全市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中国于1984年3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5年4月1日起执行。随着专利法的公布，1985年3月咸阳市成立专利管理处和专利事务所，直属市科委领导，并经陕西省专利管理局批准，报国家专利局备案。

市专利管理处负责制定市专利工作规划和计划，组织协调全市专利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处理专利纠纷，管理许可证贸易和技术引进中的有关专利事项，领导市属专利机构，组织专利宣传和干部培训。市专利事务所设三个业务室：专利代理室、专利文献检索室和专利技术开发部。主要任务是承担专利文献服务、专利代理、专利技术开发和专利情报咨询，开发专利信息交流，为申请人提供申请专利可行性咨询，办理申请和审查请求，编写专利申请文件。为专利权人提供实施专利咨询和代理许可证贸易等业务。筹集专利发明基金，对发明人或发明单位在申请专利和实施专利遇到的困难，提供一定的费用资助。

驻市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和各县区设置专利联络员，形成全市的专利工作网络。组织全市专利技术参加了国家专利局在长春、成都、天津举办的全国科技发明展览，参展项目共10项，获银牌2枚，铜牌4枚。1985年3月至1990年12月全市代理专利申请98项。

三、情报市场

科技情报管理

1975年10月咸阳地区成立科技局，内设资料室主管全地区科技情报工作的实施。业务范围：掌握全市科技发展动向，搜集掌握内部和公开发行的技术情报资料。同全国480多个单位建立了科技资料交流关系，1979年馆藏资料、图书2000余册，期刊790多种，交换资料4000余份。同年4月还成立了咸阳地区科技情报研究所。1984年6月改为市科技情报研究所，行使对全市科技情报工作的管理职能。截止1990年，馆藏国内外文献资料共计6万余册。涉及国内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工矿企业的科研和生产试验报告、学术论文、专业学术会议资料、出国考察报告、科技译文等，共计12大类。存有外文期刊18种，国内产品样本1968本，检索工具297种430册。

1985年举办所藏部分国外产品样本展览，接待读者1000多人次。1987年在兴平县举办科技信息展览会，展销信息1500多种，出销信息200余条。科技情报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为咸阳市工农业生产服务，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定点服务、情报传递和情报调研，体现为领导机构提供决策依据，为基层生产单位提供信息情报，使科技迅速转变为生产力。

技术市场管理

1988年成立了咸阳市科技市场，属市科委领导下惟一的技术合同登记管理机构。其任务是：负责市属科研院所及企业单位的技术合同登记；民办科研机构和个人依法签订的技术合同登记；在市范围内为进行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交易活动的单位或个人依法办理技术合同，并为经过登记的技术合同，办理酬金和审批。同年12月，举办了首届咸阳市技术人才交易会，开设工业、农业、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人才交流四个展馆，展出技术1600项，洽谈技术430项，成交技术26项。还登记技术合同85项，合同金额33.5万元，实现金额28.5万元。至1990年统计签订各类技术合同共计246项，合同金额611.0万元，实现金额611.0万元；其中技术开发合同8项，实现金额46.88万元；技术转让合同2项，实现金额36.5万元；技术咨询合同38项，实现金额7.3万元；技术服务合同198项，实现金额520.3万元。

第二章 科技成果

第一节 农 业

咸阳是中国农业科技的发祥地。周族先祖弃相地之宜播种五谷，教民稼穡。帝尧举之为农师，帝舜举之为“后稷”。嗣后公刘复兴后稷之业，迁豳定居，按河川走向将其族人分划为三单，筑道路，开沟洫，垦荒种植，驯养家畜，改进农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公元前 246 年，秦王嬴政命郑国主持设计，并用十余年修成“郑国渠”。渠长 300 余华里，灌溉面积据《史记》载为四万余顷。

公元前 239 年，中国现存最早反映农业科技成果的《吕氏春秋》修成。该书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及技术。

公元前 134 年至前 129 年，成国渠修成，可灌溉今境内武功、兴平、秦都、渭城一带农田。

1785 年，著名农学家杨岫著《豳风广义》10 卷、《经国五政纲目》8 卷、《论蚕桑要法》10 卷，对 18 世纪以来的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1934 年 4 月 20 日，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武功县张家岗举行奠基典礼，宣告我国西北第一所农业教学与科研的高等学府成立（以后更名西北农学院、西北农业大学），为境内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创造了条件。

1938—1944 年，金陵大学西北农业试验场、泾惠渠管理局共同进行棉花、小麦灌溉试验研究。试验结果：棉花灌溉量以 140 厘米为最优，时间以生长期每 20 天灌水一次为最佳；小麦灌溉量愈大产量愈高，时间以休眠期和开花授粉期为最优。

1944 年，泾阳农场开始大豆区域试验。结果是西北农学院 509、414 两品种在当地土壤种植为优良。同年，陕西省农业改进所泾阳农场，对棉花种子

进行提纯复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和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成为国人的奋斗目标。随着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示范工作的建立与完善,驻咸各大专院校,科学研究单位和广大科技人员,认真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方针,针对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难题,认真组织,积极配合,协同攻关,取得丰硕的成果。据1990年统计获奖成果共有851项,其中获国家级奖70项,获省、部级奖356项。按承担完成任务单位计,有大专院校227项,各科研机构451项,工矿企业7项,市级各委、办、局58项,各县(区)共108项。这些成果中,有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4项,发明奖3项,自然科学奖2项,技术改进奖6项,科学大会奖38项,其他奖7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65项,技术改进10项,科学大会奖70项,其他奖励11项。获市级科技进步奖265项,科学大会奖51项,其他奖109项。市属主要农业科技成果有:

玉米丝黑穗病防治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由咸阳地区玉米丝黑穗病防治研究协作组暨贤贵、孙福兴、毛焕斌、苗久儒、张秦生、吴天荣、李翠平、云志武、程志兴等协作完成。

通过对玉米丝黑穗病的发病规律与杂交种类型,杂交种与自交系抗病鉴定及其综合防治方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以抗病品种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筛选出了高抗、丰产优质的杂交种“中单2号”、“陕单9号”和九个抗病自交系。采用“种、轮、拔、药、管”的综合措施。1979年平均发病株率下降到4.8%,挽回粮食损失635万公斤。1979年获咸阳地区科技成果三等奖。并参加省协作组,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一等奖。

礼泉县红卫公社花寨大队辐射井非稳定流抽水试验

由咸阳地区地下水工作队、礼泉县地下水工作队完成。

用非稳定流抽水试验法索求水文地质参数,是国内逐渐推广采用的一种较好方法。该项试验用非稳定流理论,利用实测抽水资料,按照均质各向同性的潜水含水层延迟给水的布尔顿模型和半对数图解法索出水文地质参数:导水系数、给水度、压力传导系数。为正确评价地下水资源,摸清地下水的贮存和运移规律提供了科学依据。1979年获咸阳地区科技成果二等奖。

梨树密植丰产管理技术措施的研究

由礼泉县园艺站刘静堂、白教育、张让完成。在良种壮苗加强水肥基础上,适时催花、人工授粉、疏花疏果、病虫害防治、合理修剪等。梨树密植丰

产的主要特点：结果早、产量高、品质优，在西北、西南地区梨果鉴评中，礼泉密植梨均名列第一，连续三年试销香港，反映良好，经济效益显著。此项成果，超过了国内有关同类研究的丰产纪录，并超过了苏联、保加利亚等国家的产量纪录。1979年获咸阳地区科技成果三等奖，1981年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小麦良种咸农 151 的选育

由咸阳地区农科所罗洪溪、张效良完成。

该品种系用 67 (33) —1—1—9 \times 泾麦 5 号杂交选育而成。主要特征是：

$$\begin{array}{c} / 8 \\ \backslash 10 \end{array}$$

矮秆（80 厘米左右）、抗倒伏、早熟（比阿勃早 5—7 天）、较抗病、抗吸浆虫、品质好，适宜于关中灌区水肥条件较好的地方种植。1982 年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推广，累计种植面积 700 多万亩，增产小麦 1.5 亿多公斤，价值 7000 多万元。1982 年获咸阳地区和陕西省科技成果一等奖。

小麦良种 4732 的选育

由咸阳市农场、咸阳市农科所雷然、杨达生完成。

该品种是以阿勃为母本，华山红为父本杂交育成，株高 100—115 厘米，茎秆粗壮，较抗倒伏，白粒，抗病性优于阿勃，同时兼抗叶枯病、白粉病和赤霉病，抗青干，千粒重 38—40 克。经 1978—1980 年三年多点试验，平均较阿勃增产 16.3%，1982 年播种 80 万亩以上，经省品种委员会批准为推广良种。1982 年获咸阳地区科技成果二等奖、陕西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盐酸左旋咪唑硫双二氯酚片

由咸阳市农牧局、咸阳市畜牧兽医站、兴平县畜牧兽医站李太倡、葛承庆等人完成。

兽药新制剂“鸡蠕虫净片”，对于驱除鸡蠕虫（鸡蛔虫、鸡瑞利绦虫、鸡异刺线虫等）效果良好，驱除率达 90% 以上，此片剂广谱、高效、低毒、安全，且无配伍禁忌，使用方便，应用广泛。还可用于驱治猫的寄生蠕虫，效果亦佳。此药生产以来，已行销山东、内蒙、河北、江苏、甘肃、青海、宁夏等地，深受群众欢迎。1984 年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关中黑猪的育种

由西北农大、咸阳市农牧局、咸阳市畜牧站、兴平县种猪场、户县种猪场路兴中、张鼎文、董伦、贺信义、李春生、杨随义、屈金平完成。

关中黑猪是在总结群众喜爱用的巴克夏杂交改良猪的基础上，根据市场

需求选育而成的新品种。它具有胴体瘦肉率高、杂交效果好等特点。根据模拟研究择优组成配套技术系列,设计“产仔力—生长速度模式选育法”科学合理、简单易行。关中黑猪育种是结合生产边选育、边推广。现除已推广选育三代以上的猪种 1500 头外,在农村繁殖推广纯种及杂交种猪约计 10 万头,分布在关中南部的 16 个县、区。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86 年获陕西省和咸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黑松林、官山水库老库“还童”,死库“复活”技术

由水电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泾阳县冶峪河管理局夏迈定、程建民、马润祥、姚潼关完成。

该技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对入库泥沙合理调节,尽量减少在库内的淤积;对水库前期淤积采用高渠拉沙方式清淤,以恢复被淤库容,使老库“还童”,死库“复活”。该技术不用机械,不耗电力。清淤费用低廉,冲刷部位灵活,可对全库区进行拉淤,不受位置限制,使水库永葆青春,长期使用。1984 年该项技术在黑松林和官山水库应用。截止 1986 年共恢复和扩大库容 31.3 万立方米,使灌区群众减少损失 770.4 万元。1986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秦麦四号小麦良种选育

由长武县农技中心农技站梁增基、陈德虎完成。

秦麦四号 1979 年参加省区域试验。1984 年底省品种审定会审定命名推广。1986 年包括陕甘两省收获面积已达 112.6 万亩,连前累计 261 万亩。该小麦良种经历了较长期的考验,具有抗冻、抗锈、抗旱、粗秆、大穗、丰产、结实性好,中早熟、落黄好、旱涝兼优、适应性强、高中有稳等特点。该品种抗锈抗倒和丰产性优于原主栽品种 702,抗旱性近似 702,优于原推广品种 404,其中早年比 702 增长 3.3%—5.9%,丰年增产 9.8%—18.6%;1984 年后,702 抗锈性开始退化,秦麦四号则比 702 增产 20% 以上,比 404 增产 10%—26%。1986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小麦新品种咸农 151 区域栽培试验和推广

由咸阳市种子分公司、咸阳市农科所李文敏、罗洪溪、杨忠贤、王志贵、刘忠堂完成。

通过 1979—1986 年连续试验、示范生产,结果证明咸农 151 表现春性,矮秆抗倒,大穗多粒、大粒、白粒,品质好,较抗病,一般较阿勃早熟 5 天左右,高产,是适应关中灌区种植的好品种。除在本地区组织安排试验示范

外，并将该品种及时推荐参加了陕西省关中灌区的小麦品种区域试验；实施了该新品系的种子、繁殖和保纯工作。咸农 151 的迅速推广，促进了咸阳粮食的持续稳定增产，6 年累计增产小麦 82970 吨。1986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鸦儿沟小流域综合治理

由长武县水利水保局、长武县水保站杜绳武、赵克信、陈民权完成。

鸦儿沟是长武县境内一条最大的沟道，属泾河中游的一级支沟。治理前由于沟深坡陡，植被稀少，每逢暴雨洪流四起，沟岸扩张，沟头延伸，坍塌农田，威胁村庄。治理后，鸦儿沟生态条件日趋良好，原面实现了方田林网化，部分农田水利化，荒坡荒沟绝大部分绿化。治理面积达 40.95 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 75.27%，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年径流量比治理前减少了 72.24%，侵蚀量减少 90.95%，基本做到了水不下原，泥不出沟，促进了农林牧副业的全面发展，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此项成果 1986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灌区冬小麦高稳优低综合栽培技术指标研究

由咸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李民栋、陈彦博、白辅汉、薛美亭完成。

该研究以泾阳县双赵、市农科所试验地和乾县西天堡为基地，观察研究了不同类型小麦品种分蘖成穗、幼穗分化，籽粒灌浆等生长发育规律，测定了不同苗型植株的氮、磷、碳素营养，叶绿素含量及光合能力等生理指标，确定了不同产量水平的养水指标、灌水技术指标、苗性诊断指标、群体结构指标、产量结构指标、生产成本指标和优质指标，以及实现以上指标的优化方案和栽培管理规范。在研究中，采取所内与基地、试验与示范、试验区与推广区相结合，田间设计与多因素、多水平的综合试验，应用了近代“回归试验设计”方法，建立数量模型，通过定量分析，进行计算机模拟寻优，以各项技术指标为依据，参照试验结果，提出了高产低成本的栽培方案。该项研究结果，在不同类型地区推广应用，证明栽培技术指标可靠，重演性强，经济效益良好，为小麦生产规范化提供了科学依据，达到了省内研究的先进水平，可在关中西部和中中部灌区推广。1987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咸阳市小麦丰产方

由咸阳市小麦丰产方技术协作组郭树健、尚德文、余心诚、秦天佑、陈振兴、于建湖、白辅汉完成。

咸阳市小麦丰产方是一项大范围、大面积丰产栽培应用研究项目。该项

目针对农村分户经营的现状，采取行政管理的手段，技术承包的形式和以点带面的方法，把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与传统的农业生产经验组装配套，抓住关键措施，综合推广应用。坚持定期检查，认真评比奖励，保证了技术方案的贯彻实施，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和较好的科技投资率与农民得益率。1987、1988 两年应用推广面积 330.99 万亩，增产小麦 19069.08 万公斤，直接经济效益 8074 万元。

该项应用研究主要优点是：组织严密，方法科学，技术覆盖面宽，推广规模大，既可获得方内均衡增产，又促进了面上小麦栽培技术的进步，是科技下乡，科技兴农的一种好形式。1988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夏玉米规范化栽培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由咸阳市农技推广中心站马应斌、刘平社、张德华、王凤斌、段顺章、李克恭、林忠完成。

夏玉米规范化栽培是在继承和借鉴传统丰产栽培经验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科学理论、方法、手段及研究成果，选优组装配套，综合应用实施的一项指标化、模式化栽培技术。咸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从 1986 年起，通过电子计算机综合模拟和寻优处理，建立了夏玉米主要栽培因子与产量的回归数学模式，确定了不同生产条件的较优组合方案，提出了规范化栽培技术指标，并组织南九县区农技站进行大面积示范推广。3 年累计面积 287.85 万亩，增产玉米 17843 万公斤，增值 6367.8 万元，纯增益 3451.88 万元。1988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咸阳市农业区划

由咸阳市农业区划委员会完成。

《咸阳市农业区划》由 15 个专业组成，它比较系统全面地查清了全市农口各业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分布，抓住带有方向性、关键性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经验收认为：对农业发展现状和问题分析比较深入，对存在的矛盾揭示得清楚。提出了本世纪发展农业的方向、战略重点、步骤和关键措施。“区划”把全市划分为 5 个综合农业区和 63 个专业分区。

分区的原则和方法正确合理，各区特点及发展途径论述清晰，突破了农业区划的传统模式和研究内容，在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拓宽了区划研究的领域。该成果资料齐全，内容丰富，有较强的科学性、综合性和可行性，对指导咸阳市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1989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池塘精养鱼高产试验

由咸阳市水产站李成成、李亚林、高勋、陈书易、王志端完成。

该课题从1986年至1988年实施3年，完成各项预定指标，积累了大量数据，为发展咸阳市水产养殖业提供了宝贵经验。3年共推广1597.6亩，其中1988年推广1608亩，占全市可推广面积25%，平均亩产416.2公斤，单塘最高亩产达825公斤，达到省内同类项目的先进水平。3年为社会提供鲜鱼613.6吨，总收入311.8万元。应用的主要技术：投放大规格鱼种，增大优质鱼比例，除主养草鱼之外，增加罗非鱼、银鲫、半鲤等优良品种放养量；设计科学鱼用饲料配方，生产颗粒饲料，满足鱼类生长需要；采用精料和青料结合，合理投喂，使精料系数降低为1.4，青饲料为5.2；配备渔机设备，采用水质改良机或者增氧机与水泵并用，有效地控制水质，增加放养密度；在鱼病防治方面，采用定期水体消毒和投喂防病药饵相结合，使草鱼成活率提高到80%以上。所有这些，为池塘养鱼提供科学依据，具有实际推广价值。1988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渭北旱原烤烟优质适产施肥技术研究与应用

由咸阳市烟草局、咸阳市农科所钱立信、周思俊、温祥哲、陈发勤、车随炼、豆虎镇、张小军完成。

渭北旱原全省烤烟主要产区，但存在着烟碱含量低，含糖量偏高，叶色淡薄，油分、香气不足等低质量问题。通过调查、试验和研究，认为与施肥有关：烟草移栽后15天至成熟期需氮最多，烟碱含量随着施氮量增加而提高，一般亩施纯氮3—6公斤为宜；施磷与烟叶内含磷量关系明显，但当亩施纯磷8—11公斤时，叶内含磷量不再增加；施钾量增加烟叶内含钾量在各生育期均衡增加，亩施以12—21公斤为宜。总之，在市渭北旱原正常条件下，氮、磷、钾配比以1:2:3为佳。应用该技术，3年来增值1689.6万元（农民增收），财政增收642.05万元，行业增利48万元，合计2380.6万元，1989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咸阳市渭北黄土高原造林立地条件类型划分及适地适树中间试验推广

由咸阳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咸阳市林业局刘天毅、李修性、张平彦、王民生、刘西保、杨有举、徐少平完成。

科学的划分造林立地条件类型是评价立地质量、尽而达到适地适树的根本途径。该研究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确立了土壤水分是划分造林立地条件类型的主导因子，利用反映土壤水分的地形部位、坡向、土壤类型三个主

要地貌因子进行组合,划出了全市渭北黄土高原12个造林立地条件类型,筛选了各类型相应的适生造林树种,开展了同一树种(刺槐)在不同立地条件类型及不同树种在同一立地条件类型的造林试验。同时,在不同地貌类型的永寿(沟壑)及旬邑(山地)基点进行了干旱季节土壤水分动态测定,再次验证了土壤水分是划分渭北黄土高原造林立地条件类型的主导因子。经过五年的中试推广,共完成荒山荒沟不同立地类型造林14540亩,原面类型间作造林71560.8亩,平均造林成活率达88.8%,保存率88%,全面完成和超过了原定计划指标。在中试基点带动下,辐射造林面积达30多万亩,总经济效益为2876.2万元。

这项研究为提高渭北黄土高原造林成活与生长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全国同类科技推广项目中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1989年获得了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咸阳市西瓜、甜瓜病毒病防治技术研究

由咸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咸阳市植保植检站张范强、赵世德、魏宁生、高建强完成。

该研究结合生产实际,明确了西瓜、甜瓜病毒病以西瓜花叶病毒2号为主,而桃蚜、菜缢蚜则为主要传毒介体,查清了传毒蚜虫周年期主要转主和病毒侵染循环,发现了蚜虫在油菜上越冬的习性,揭示了以油菜病毒病为主的充足毒源和群体性的传毒蚜虫是形成病害大流行的主要因素,以及病毒病的危害特点和流行规律。为指导该病的防治,制定防治措施和预测病害的流行提出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使全国在西瓜、甜瓜病毒病方面的研究水平提高了一个新的台阶。专家认为,该项目是本省对西瓜、甜瓜病毒病防治技术的首次较系统的研究,达到国内研究的同等水平。其中,首次揭示了油菜田病毒病与本病的关系,对提高防治水平,尽快控制其危害,确保西瓜、甜瓜正常生产具有指导意义。1990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日本苹果品种引进及优质丰产栽培试验研究

由旬邑县园艺站郭民主、许虎林、高博平完成。

该课题对从日本引进的“津轻”、“王林”、“乔纳金”、“长富1”、“长富2”等苹果品种(系)进行观察研究和栽培试验,初步探索出一套适于渭北旱原地区的管理技术。根据各品种的特性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在栽培时一要水肥供给充足;二要整形修剪保证树冠通风透光良好,注意开张角度,不可留枝过密;三要严格按树龄、树势进行科学疏花疏果;四要在生长前期重

点预防津轻、王林品种的“灰斑病”和富士着色系果实的“霉心病”，生长中期注意预防富士、乔纳金品种的“褐斑病”和“煤点病”；五要对津轻苹果分批采收，减少落果，乔纳金应避免早采而留涩味，王林花后避免喷洒有机磷农药，富士着色系幼树整形时宜早拉枝；六要各品种适时晚采，确保丰产优质。

此外配合苹果基地建设建立良种示范园，为陕西省十几个县提供良种苗木，扩大繁殖面积，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990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第二节 工业

在历史上，咸阳市境工业科技成果不曾多见，屈指可数者当属三国时代茂陵人马钧研制的指南车，他还发明翻斗水车，扬水以灌高田；明代天启年间泾阳王征，翻译传播西方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原理，发明抽水机械“虹吸鹤饮”、“转碓轮激”，农业机具“自转磨”、“轮壶代耕”以及“计时器”等。建国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得到全党的共识和重视，驻咸阳诸多大专院校科学研究单位和本市广大科技工作者，刻苦钻研，奋发上进，攻克了工业生产中的各项科技难点，取得丰硕的科技成果，促进了咸阳经济的发展。据1990年统计，获奖成果共有577项，其中国家级奖59项，省、部级235项，市级奖283项。依承担完成单位分，有大专院校81项，科研所156项，国营工矿企业303项，市级各委、办、局14项，各县（区）23项。按获奖类别分，有国家级科技进步奖24项，发明奖42项，技术改进奖6项，科学大会奖11项，其他奖14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77项，省级科学大会奖4项，其他奖54项；获市级科学进步奖93项，技术改进奖1项，市级科学大会奖159项，其他方面奖励30项。市属主要工业科技成果有：

体温计三角管垂直拉料新工艺

由陕西省医疗仪器厂与西北轻工业学院协作完成，赵清源、朱正华等12人承担。

该项研究是改原坩锅圆炉熔造，人工拉料成型为池炉熔制，连续一次加工成型垂直拉料新工艺，结束了操作工人“围着坩锅炉转，拿着拉料铁扞跑”的手工操作的原始生产状态，体温计玻璃三角管生产实现了机械化，自

动化。使用池熔炉，解决了玻璃析晶这一关键问题，保证了熔制质量，又简化了烧造系统及采取了余热利用措施，使产量提高了5.6倍，成品率提高了1倍以上，人员减少了60%，成本降低了55%。1979年获咸阳地区科技成果一等奖。

废活性炭脱硫过热蒸气再生工艺

户县氮肥厂、咸阳地区重工局协作完成，于正学、张明科、司波承担。

采用大化工企业使用过后退下来的废活性炭用于生成合成氨用半水煤气的脱硫，饱和后过热蒸气再生工艺，脱硫效果好，脱硫效率稳定在90%—95%之间，气体净化程度高，与氨水中和法脱硫比较，消耗低，且可回收硫磺变害为利，消除了硫化氢对环境的污染，又可为硫酸和橡胶工业提供原材料，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活性炭脱硫效率高，工艺稳定，能有效地保护变换合成触媒，延长触媒的寿命，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可以大大减少精炼喷液、带液，有利降低铜耗；脱硫操作简便，安全可靠。1979年获咸阳地区科技成果二等奖。

半干压瓦成型工艺研究

由建材部西安砖瓦研究所与兴平县砖瓦厂协作完成。

半干压瓦成型工艺的研究是以陕西的黄土为原料，经过测定、试验，找出了成型压力和含水量的关系，确定了合适的成型含水量的范围。并通过将整体瓦模改为装配瓦模，缩短了排气路程，增加了排气面积，基本上解决了瓦坯的分层问题。瓦坯经过干燥，焙烧可使瓦的质量达到部颁标准。1980年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付58号粗布试制层压板

由西安绝缘材料厂、泾阳县纺织厂协作完成。

用付58号粗布制作层压板可为国家节省大量好布，使低级棉，下脚棉得到充分利用，而且层压板的售价也可相应降低，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1982年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JQA家用煤气炉

由咸阳市劳动人事局、户县宋南机械厂薛德文、王育德、王武克完成。

JQA型家用煤气炉，根据煤的气化理论，使固体燃料变为气体燃料燃烧，作为节能、环保技术在家庭中应用，是80年代进入千家万户的先进燃具。它具有一炉多用，热效率高，湿法除渣，文明卫生，水封防爆，安全可靠和燃料适应性强等优点。1983年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MCZ-1 型全自动棉纤维测长仪

由长城电工机械厂、户县棉绒厂韩刚、彭孝斌、张秉坚、石金堂完成。

MCZ-1 型棉纤维自动测长仪，用于测量棉纤维的跨越长度指标，替代了传统的手扯尺量。该仪器应用光电转换的测试原理，采用机电一体化的结构，在 20 秒内即可自动完成试样，扫描计长显示，反转清理及水分补偿等功能。具有操作简单、维修方便、测量准确、速度快、精密度高和定性准等特点，适合在通常大气压力条件下使用。该仪器与传统手扯尺量比较，相符率达 95% 以上，重复性和再现性较好，适合中国国情，为棉花流通过程中的质量检验、监督和仲裁工作，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部分测试指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具有国内先进水平。1983 年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S303 型电动机械牙科椅

由西北医疗器械一厂王锡璋、何永超、左志杰、李波完成。

S303 型电动机械牙科椅，是参照国内外先进水平设计的中国口腔治疗设备的新品种，与国内同类产品比较，具有能耗指标低，全机械结构，所有润滑采用干润滑脂，不漏油。在较小功率电动驱动下，有较大的承载能力（可达 200 公斤）。该椅的设计适合人体自然体态，能满足各种体位的口腔治疗，患者坐卧舒适，医生操作方便。该椅自动程度高，传动平稳，造型美观，坚实耐用，装有机电联锁保安设施，有较大的安全系数。1984 年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ZXP-301 照相排字机

由咸阳市铸字机械厂徐满生、王华民、付建武、李云才完成。

ZXP-301 照相排字机是采用了变焦距单镜头变倍数、字程序控制，步进电机推送的一种新颖照排机，它具有结构简单，性能优良，操作方便，版面文字清晰，工艺范围广，外形美观等优点。对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均能自动缩格，尤其是增设了自动划表功能后，对一般表格的拍制，提供了方便。ZXP-301 照相排字机的研制成功，为印刷机械实现现代化打开了新路。1979 年获咸阳地区科技成果二等奖。

有线广播自动控制台

由三原县广播站王富栋等 5 人完成。

该控制台可完成每日三次广播的开机、程序自动转换、关机等一系列动作。其加时电路可根据需要，调整节目的时间且不影响下面节目的广播。实现了无人值班。1979 年获咸阳地区科技成果二等奖。

火灾自动报警灭火装置

由礼泉县赵镇棉绒厂完成。

该报警装置由光电转换电路、报警电路、控制电路和供水设备组成，输棉道内安有光敏元件，一有火情，便发出指令，使动力线断电、报警、并接通水源，自动灭火。1979年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ZSY-101型半自动铸排机

由咸阳铸字机械厂完成。

ZSY-101型半自动铸排机是根据中国文字丰富、字数多，版面要求复杂的特点进行设计制造的。排版工人只要按动开关，即可自动铸字排版。全机收容字模数4608个，可满足一般文稿排版要求。该机还设计有机动换模装置，随时可换上字表中没有编入的字模，使机器有更广泛的适应性。该机还装有铅温自动控制 and 自动加铅及吸尘装置，减少了有害气体对操作工人身体健康的影响。ZSY-101型机设计紧凑，操作方便，维修简单，为国内首创。1980年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自动粮食测温仪

由礼泉县粮食局完成。

该仪器分总机一台和分机十台，可同时测量2560个点的温度，时间仅为11分钟。分机具有自动选库功能，总机可以自动打开，停机，自动显示库、区、层、点的温度数字值，并能快速打印记录。超温时，除声光报警外，记录仪将超温点打成红色数字。该仪器的使用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人力，使全国粮食测温技术向仪表化、自动化的方向迈进。1980年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带锯机跑车可控硅无级调速及摇尺数控装置

由三原木材加工厂周加升完成。

该数控装置是在老式跑车带锯机上用先进的数控技术，自控跑车和锯材厚度的一种新型自控装置。跑车可控硅无级调速，主要用来控制牵引跑车的直流电机，使其能按生产工艺来进行无级调速，满足跑车往返直线运动的需要；摇尺数字控制装置，主要用来控制并检测计算原木直径，自动、准确地按要求给定板材的厚度。该装置使锯材精度和进尺精度均有明显提高，出材率也由65%提高到73%以上，板材质量符合部颁标准。1982年分别获陕西省、咸阳地区科技成果三等奖。

3WS-S-6型塑料手动压缩喷雾器

由咸阳市植保机械厂张镇忠、刘怀仁、王亚玲、王裕心、贾宏登、张文琪完成。

3WS-S-6型手动喷雾器，经过多次性能测试及田间试用，并与丹麦进口的“TRY-1型”喷雾器相对比，证明3WS-S-6型喷雾器性能良好，填补了国内手动压缩式塑料喷雾器的空白，该喷雾器整体设计合理，结构简单，维修方便，重量轻，耐腐蚀，安全可靠，是80年代粮、棉、仓储除虫卫生防疫较理想的手动喷雾器。1983年获陕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缓倾斜厚煤层滑移顶梁液压支架放顶煤采煤方法

由彬县百子沟煤矿、西北煤炭设计院邓世恭、姜希孟、李彦文、计新成、李效儒、尹瑞彬、陈家驹完成。

彬县百子沟煤矿应用西安煤炭设计院的可行性论证方案设计，首次在该矿成功地推广应用缓倾斜厚煤层滑移支架顶梁液压支架长壁工作面放顶煤采煤法，填补了缓倾斜厚煤层开采的空白。该试验在 0° — 5° ，煤层厚4.2—4.86米，工作面长108米的具体条件下，经过7个月的工业性试验，取得安全生产、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实际效果，回采率从30%左右提高到81%，坑木消耗由40立方米/万吨下降到2立方米/万吨，万吨掘进率由150米下降到50米。同时运用科学手段对开采过程中的矿压进行实地观测，基本掌握了该煤层顶板来压的活动规律，能够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控制顶板管理的相应方法和措施。该项工业性试验中所取得的实际技术经济效益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在缓倾斜厚煤层开采中具有推广应用价值，尤其对当前地方煤矿厚煤层开采更具有现实的普遍意义。1989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应用亚铵法制浆工艺开发高强度瓦楞原纸

由秦都区沔东造纸厂、西北轻院造纸系刘智忠、郭文选、任维羨、李友森完成。

该项目利用当地丰富的麦草资源和采用先进的中性亚铵法制浆工艺技术，形成了年产4600吨高强度瓦楞原纸的生产能力。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并可与进口木浆生产的瓦楞原纸相媲美，产品部分已出口创汇。中性亚铵法制浆比传统的碱法制浆收获率高10%左右，可节约20%的纤维原料，同时减轻了废水对环境的污染。废水经过沉淀可直接灌溉农田，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1989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咸阳市秦都影剧院工程设计

由咸阳市建筑设计院薛光熙、史允士、王正贵、杨继春、解爽完成。

秦都影剧院是以演出为主，兼放电影的中等规模的多功能影剧院，是全市 80 年代修建的重点公共建筑物之一。观众厅的音质设计及多设置反射材料充分利用反射声，尽量减少噪音材料，提高了大厅的混响效果。其次在基础、结构设计和内部装修等方面均达到了经济合理，安全可靠的目的。经实践证明，该影剧院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均达到了较满意的效果，具有一定的设计质量和技术水平，对推动设计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1987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2V-3/7 型空气压缩机

由咸阳压缩机厂亢长生、崔天生、沈明尧、白富泾完成。

该成果运用新气阀理论对压缩机气阀、阀腔、润滑系统、消声装置等作了改进，有效地降低了阀隙流速，从而减轻了功率消耗。与老产品相比，经济技术指标有了明显的提高，居于国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其中：比功率、噪音、振动指标已达到 80 年代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该产品是一种新型的低噪音、低振动的节能产品。1990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稀土耐高压铸铁暖气片

由兴平暖气片工业公司张永田、段旭明、段兵义、刘坐思完成。

稀土耐高压铸铁散热器主要是通过加入稀土元素达到提高材质的机械性能及工艺水平，有利于减薄铸件壁厚，减轻重量和节约材料，提高散热器的承压能力和热工性能，其承压能力和金属热强度均超过城乡环境保护部颁发的 JGJ301-87 国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同时超过国外生产同类产品的日本、苏联等国家的散热器热性能标准，满足高原建筑采暖的需要，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0 年获咸阳市星火科技二等奖。

第三节 医 药

明清时期，咸阳地区医药卫生科技已达一定水平，同时造就了一代名医，著述恢宏。三原人张征，曾任明代太医，疗疾有方，升为御医院判。武功康佐、泾阳张碧山、王春阳等人，时誉“学医有解悟、诊脉用药，皆世医所不及”。礼泉韩福恒、高珍等精于脉理，善治疑难杂症。兴平张炯对医书研究颇深，用药治病以《神农本草经》为据，且有独到之见。民国时期，医学发展缓慢，科技成果不曾显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咸阳医药科研和

成果管理工作，日趋完善。据 1990 年统计，全市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奖共 128 项。市属主要医药科技成果有：

苦木总生物碱的研究

由咸阳地区药品检验所杜志德、程准权、来华安完成。

苦木的降压作用是咸阳市药检所通过动物实验首先发现的。该所对苦木进行了提取、分离和筛选，找出了苦木降压的有效成分——苦木总生物碱。通过对苦木总生物碱进行植化、药理、制备工艺、质量标准等系统研究。经咸阳市第二医院 287 例的临床观察，降压有效率达 93.5%。苦木总生物碱国内外是首次应用，毒副作用小，能改善心肌功能，有比较理想的降压作用，具有省内先进水平。该项研究获省卫生厅科技成果二等奖，获省政府 1980 年科技成果三等奖和卫生部 1981 年二等乙级科技成果奖。

植物血球凝集素在流行性出血热预防、诊断、治疗应用中的研究

由咸阳市卫生防疫站季蔚文、赵海彦、刘军礼、刘生安、孙德虎、张淑群、杨沛君完成。

流行性出血热（EHF）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是危害市内疫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最严重的一种传染病。该研究应用 PHA 预防、诊断、治疗 EHF 获得明显效果。通过在市重疫区连续 3 年近 5 万人次的现场试验观察，证明了 PHA 皮试阴性者发病率较高，阳性者发病率较低。通过筛选阴性反应易感者注射 PHA，有一定预防效果。在疫病区发病高峰季节对发热患者进行 PHA 皮试诊断与临床诊断符合率达 79.2%，可作为早期诊断的参考指标之一。免疫调整剂可使出血热患者病情较快缓解，特别是将 PHA 与环磷酰胺联合应用，其临床效果尤为显著。在 EHF 特异性免疫诊断尚不普及，以及 80 年代尚无特异性预防措施条件下，该法有一定创新及实际意义，具有省级先进水平。1986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输精管穿线圈卡可逆性节育术

由乾县妇幼保健院张剑英、张侗、王英完成。

输精管穿线圈卡可逆性节育术是一种设卡控制的可放可取的可逆性手术，是一种控制人口增长的男性节育方法。手术不开刀、不流血、无痛苦。省人、省时、省事、省手术设备及手术费用，是一种经济方便的理想节育方法。这种手术国内外未见报导，属创新的可逆性节育术，手术安全可靠、有效、可逆，其再通手术较其他节育术简便易行。经过 1000 多例的临床观察，随访 512 例，其节育率达 98.6%，优于已有的其他节育方法。1988 年获咸阳

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咸阳市大骨节病区大面积推广硒盐研究

由咸阳市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完成。

大骨节病是市境北部 7 县的主要地方病之一，严重地威胁着病区儿童的生长发育。长期以来，由于病因不明，缺乏有效的防治措施。80 年代以来，经过环境、医学等部门大量调查研究，发现大骨节病多发生于低硒地带，病区人群处于低硒状态，得出硒对大骨节病干骺端变具有促进修复和防止恶化作用。为了尽早控制大骨节病病情，在病区旬邑、淳化、长武、永寿、乾县、礼泉的 85 个乡镇，1112 个生产大队，117 万人群中大面积推广 1/6 万硒盐防治大骨节病。通过 5 年点上的观察，X 线阳性率由 68.1% 下降到 14.9%，干骺端阳性率由 45.9% 下降到 3.4%，活跃指数由 72.3 下降到 27.5。好转率占 90.2%，使市内大骨节病病情得到了大面积控制。该研究防治效果显著，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为在全省、全国大面积防治大骨节病获得了可靠的科学依据，也为大面积防治工作的组织管理提供了经验。1989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奶片国产化系列产品开发

由三原县轻工公司、三原县防疫站孟庆瑞、刘周选、张万胜完成。

奶片国产化系列产品开发项目，工艺设计先进，配方科学，用量正确，产品质量可靠，经济效益显著，在国内同类产品中处领先地位。奶片系列产品是以优质牛奶粉为主要原料，加入微量元素及维生素，使其具有合理的蛋白质、脂肪、糖、磷、钙、铁、锌、维生素及乳酸菌等，是理想的营养保健食品，具有口感好、食用方便等特点。产品有：多维奶片、丁维钙奶片、铁强化多维奶片、锌强化多维奶片、果味酸奶片等。1989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第四节 其他

1990 年统计，市属其他科技成果 33 项。主要成果有：

JQ-80 型全自动电子测记仪

由乾县科委罗兴中完成。

JQ-80 型全自动电子测记仪，是一种多功能、全自动检测与记录的仪器。可自动检测与记录地电、温度、湿度等多种项目的微弱缓变电讯号的变化。该仪器采用高频脉冲电子打孔记录，具有特殊的走纸计时机构，走时准

确，可连续地自动检测和积累资料。仪器功耗小，寿命长，无失真，无温漂，记录间隔时间可自由调节，电源采用交直流两用。该仪器性能稳定、设计新颖、结构合理，使用方便，自动化程度高，具有国内先进水平。该项研究成果曾获陕西省人民政府 1980 年度科技成果三等奖。

影院场务机务程序控制器

由咸阳地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咸阳市电影管理站、咸阳市电影院杜锦华、罗双印、耿志恒、王宏鹏、王志贤、王勇完成。

影院场务机务程序控制器的程序控制电路由若干电子延时和开关电路组成。带电继电器、接触器工作，配合拉幕机等辅助设备，实现了自动打铃、开闭幕、开关窗、开关场灯、放映幻灯、电影、换机、停机等 15 项程序工作。工作准确可靠，程序简单，使用维修方便，大大提高了影院放映工作的自动化程序，保证了放映质量。该控制器设计合理，具有省内先进水平。曾获文化厅科研成果四等奖，1982 年咸阳地区科技成果二等奖。

咸阳国土资源

由咸阳市计划委员会完成。

该成果对咸阳市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运用科学的方法和体系，从结构和区域布局上客观地反映了咸阳市的资源优势和潜在优势，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以及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与存在问题。从地域上展示了现实经济结构和生产实力，为编撰国土计划、调整产业结构、确定重点开发区、合理布局生产力、制定正确的资源配置政策等，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1989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咸阳市城市总体规划

由咸阳市城市规划办公室、咸阳市建筑设计院王生昌、唐启汉、林为民、郭家泉、王涛、朱宗仁、刘世忠、张岗完成。

该规划全面分析 30 多年来城市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和存在的突出矛盾，以提高城市综合效益为中心，从区域经济发展论证、设计了后 20 年城市的发展方向。该规划主要特点是：从经济与城市体系着眼，突出了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合理客观地确定了城市的性质、规模、工业经济结构及发展方向，展示了市、县、镇发展的网络体系；突破了城市规划主要依布置道路骨架，确定功能分区，安排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手法，突出研究了提高城市的综合效益，使城市的建设与城市的效益同步发展；突破了城市

规划理论中关于按城市功能分区作总体布局的原则，而是本着从实际出发，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节约建设投资的精神，将全市规划列为八个功能的综合分区。该规划是 30 多年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1987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咸阳市工业污染源调查评价及防治对策

由咸阳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王永安、李清善、田振华、张晓莉、贾焕文、段斌、周长智完成。

该课题从实际出发，以系统论为指导，围绕污染物排放量为重点，运用投入—转化—产出的衡算、统计、分析等技术，对咸阳市工矿企业的原辅材料、能源、水源等消耗情况，进行多层次的分析比较；运用“等标污染负荷”评价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各类污染负荷进行了评价，筛选出咸阳市主要工业污染源和污染物，确定了各类污染负荷在区域、行业、接纳水系的分布状况；对污染治理设施效益进行了定量评价，并应用微机对调查结果进行贮存，建立了市一级的工业污染源动态微机数据库，提出了咸阳市工业污染源管理、治理、监测、规划等方面的多项对策。本课题属基础性应用研究，为咸阳市环境定量化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为企业的技术改造、污染治理、综合利用和促进经济管理指出了方向，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其研究成果已在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水资源管理、企业生产管理、污染治理及科研方面得到应用。1987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咸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经济指标管理信息系统

由咸阳市计划委员会雷衍庆、董俊波、魏兰英、王保华、韩保福、万群民完成。

该系统程序设计中采用软件覆盖技术，解决了软件系统大，微机资源有限的矛盾，系统设置了 DBASE III 和 BASIC 语言间的转换接口，使系统既具有较强的数据管理能力，又有较好的计算、统计和制作图表能力。为主要经济指标的管理和综合分析研究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为领导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了解，掌握和使用各类经济指标提供了快速、准确的现代化工具。1990 年获咸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第三章 科技交流

第一节 邀请科技活动

建国后，随着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咸阳境内的科学技术交流活动逐渐展开。特别是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咸阳市科技外事活动日益频繁，科学技术交流十分活跃。据1990年统计，历年来共接待外国科技团体121次，接待外籍专家学者270余人。

咸阳市历年接待国际科技考察、交流情况表

表2-3

日 期	国别和地区	人 员	组 织 单 位	活 动 内 容
1974 年	马里共和国	阿巴斯、海达拉、卡里木古利巴利、马马社·斯得彼、马马社·古马雪、法古利巴利	陕西第八棉纺织厂	学习纺织工艺、准备技术管理、色织技术、大提花技术、准备设备维修。时间一年。
1979 年	美国波士顿大学	丁玉澄教授	西北植物研究所	玉米自交系的组织培养报告
1980 年	美国密执安大学	戴威廉教授	西北植物研究所	玉米细胞多级分裂和染色体的分割及排除
	美国波士顿大学	丁玉澄教授	西北植物研究所	玉米单倍体细胞学研究报告
1981 年	美国波士顿大学	丁玉澄教授	西北植物研究所	植物染色体的倒置易位与互换
	美国夏威夷大学	唐崇实、杨文静教授(夫妇)	西北植物研究所	细胞运动的机能与探讨报告
	日本	5人(访问、讲学)	水电部(水科所)	灌溉排水、土壤改良、水资源开发利用、系统分析在灌溉中的应用
1982 年	美国密执安大学	卡尔逊教授	西北植物研究所	植物遗传工程讲座
	美国波士顿大学	丁玉澄教授	西北植物研究所	植物细胞突变与核酸报告
1982 年	美国	4人(参观)	省水电局(水科所)	防洪和流域规划
	意大利	3人(参观座谈)	水电部(水科所)	江河动力学,泥沙沉积形态及影响

续表 2-3

日 期	国别和地区	人 员	组 织 单 位	活 动 内 容
1983 年	美国波士顿大学	丁玉澄教授	西北植物所	第十五届国际遗传学大会见闻报告
	日本	3人(参观与讲学)	武功科研中心	地下水、农用水利、水文水力学交流
	美国	4人(参观)	水电部(水科所)	水保及泥沙
	日本	4人(参观、座谈)	农牧渔业部(水科所)	旱田灌溉、土壤改良
1984 年	意大利	16人(参观、座谈)	中国科学院(水科所)	水系统管理、洪水控制等。
	美国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大学	肯布尔教授	中国科学院(水科所)	小麦染色体组型分析及将异源变异导入小麦方法选择
	罗马尼亚	1人(座谈)	中科院(水科所)	水管理及设计
	匈牙利	1人(报告、座谈)	中科院(水科所)	技术交流、水力学理论、经济管理等
	美国密执安大学	巴恩斯教授	西北植物所	森林生态系统分类及管理措施
	荷兰奈梅根大学理学院	林斯肯斯院长	西北植物所	种子植物受精过程中的不亲和性
1985 年	美国乔治保尔公司	朱耀源经理	西北植物所	参观组织培养
	美国孟山都公司	孟山都生物代表6人	西北植物所	参观遗传育种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艾林格布	西北植物所	传统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报告
	日本东京大学	山口彦之教授	西北植物所	日本的突变育种现状报告
	美国波士顿大学	丁玉澄教授	西北植物所	生物技术与农业报告
	日本金井重要针布代表团	代表团	陕西省纺织器材研究所	技术交流
	美国爱达荷大学林业、野生动物和牧区管理学院	代表团	西北林学院	就交换学者研究生以及科技文献、科技信息合作、进行科学研究等方面达成了协议,建立长期交流关系

续表 2-3

日 期	国别和地区	人 员	组 织 单 位	活 动 内 容
1985 年	奥地利维也纳农业大学森林培育研究所	代表团	西北林学院	落实了和奥方的合作项目：在我国陕西秦岭以建立现代化林业企业样板的方式，合作进行“中国秦岭山地天然及人工森林生态系统经营技术”的研究。该项目已被国家科委正式列入中奥两国政府间的科技合作项目
	美国	3 人	水电部邀请讲学（水科所）	美国加州水资源利用、作物需水，加州水管理
	美国	1 人	（水科所）讲学	水文资源
	苏联	6 人	（水科所）考察访问	水利研究情况介绍
1986 年	日本	10 人	（水科所）讲学	水的利用
	美国	1 人	顺访	学术交流
	美国遗传学会	西尔斯主席等	西北植物所	国际遗传学会 40 名专家参观育种
	美国	海雷、琼兰琴、马·凡、斯万森、弗恩、大卫·刘、洛意·莱特、汤姆	西北轻工业学院	访问、交流
	美国	黄知春（美籍华人）、卡尔顿·莱特、克利斯·思隆、安美森·思隆	西北轻工业学院	访问、交流
	英国	T·H·大卫斯	西北轻工业学院	访问、交流
	日本	凡山晴男	西北轻工业学院	访问、交流
	美国	路易斯·英金堡	西北轻工业学院	访问、交流
	英国	沙利·乔敦	西北轻工业学院	访问、交流
西德	海德曼夫妇	西北轻工业学院	访问、交流	

续表 2-3

日 期	国别和地区	人 员	组 织 单 位	活 动 内 容
1986 年	瑞典	1 人	陕西省水利 科学研究所	河流预报的 HBV 降雨径流模型、洪 水警报
	加拿大	瑞利	国家建材局 陶研院	加拿大非金属矿及石棉选矿技术
	日本	寺典乌二夫妇	西北轻工业 学院	访问、交流
	日本	山井严、山井雪 子、寺典女儿	西北轻工业 学院	访问、交流
	西德	葛兰茨、齐弗尔	西北轻工业 学院	访问、交流
	法国	封丹纳、德克五 利、盖莱尔安塔 夫、勒米奥尔利	西北轻工业 学院	访问、交流
	美国	提莫尔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日本	金浜合雄、小暮 好光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1987 年	美国塔萨斯 大学	吉尔教授	西北植物所	参观遗传育种
	美国福特公 司	朱耀源总裁	西北植物所	参加并座谈生物技术合作
	美国	克列斯·斯隆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美国	莉沙·维吾尔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英国	吉坦斯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美国	卜罗斯夫妇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美国	艾尔吾德夫妇、 理查德夫妇、阿 瑟夫妇、张厚 民、何进环父子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加拿大	慕坚达夫妇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美国	简爱斯贴、凯琴 琳·苏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日本	赫尔居阔父子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日本	柏木 阔、村上 浩二、村上弘子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续表 2-3

日 期	国别和地区	人 员	组 织 单 位	活 动 内 容
1987 年	美国	凯文·霍华德夫妇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日本	黑木薰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美国	克尔伯特夫妇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英国	伊托克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日本	凡野重雄、林喜代治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美国	黛夫妇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加拿大	加索·雅克夫夫妇、女儿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日本	井上仁子夫妇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加拿大	卡拉·波派斯库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丹麦	波尔森夫妇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瑞典	造纸代表团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西德	聘请专家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美国	1人	陕机院	参观黑松林排沙
	美国	1人(讲学)	西北农大	土壤中水盐运和空间变异性研究动态
英国	2人(洽谈业务)	水电部水科所	介绍查马公司仪器	
1988 年	加拿大	卡拉·波派斯库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丹麦	波尔森夫妇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瑞典	造纸代表团 3人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续表 2-3

日 期	国别和地区	人 员	组 织 单 位	活 动 内 容
1988 年	英国	维尔考克夫妇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美国	罗伯特、玛丽挪亚、约翰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美国	克列斯、维托克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苏联	4人考察	水电部(水科所)	渠道防渗、管道输水设计和施工技术
	美国	2人参观	水利部(水科所)	参观考察
	瑞典	1人(座谈)	国家、省科委(水科所)	科技合作交流
	意大利	1人(聘请专家)	威陶院陶瓷发展中心	建卫瓷标准检测
1989 年	美国	2人(参观)	西农大	参观讲学
	波兰	1人(讲学)	长沙铁道学院(在水科所)	管道水力输送技术
	日本	凡野重雄、佐治学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美国	涂书怡、贝利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加拿大	莱萨德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日本	光田武、进藤明夫、进藤桂子	西北轻院	访问、交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肯布尔教授	西北植物所	小麦种的进化方式等报告
	美国	1人(参观)	陕西省机械学院	访问
	日本	1人(讲学)	陕机院	流体流动显示、图像处理, 固体颗粒空气输送
	土耳其	1人(聘请专家)	威陶研院陶瓷发展中心	窑炉用耐火材料研究
	捷克	1人(聘请专家)	威陶研院陶瓷发展中心	窑炉结构研究

续表 2-3

日期	国别和地区	人员	组织单位	活动内容
1989年	日本	(名古屋工业技术研究所应用部部长) 陈内和彦	国家建材局(陶瓷研究所)	名古屋工业技术研究所介绍; 人工合成粘土
	日本	(九州工业技术研究所开发部部长) 柴田正三	国家建材局(陶瓷研究所)	九州工业技术开发研究所介绍; 考查粘土矿物
1990年	苏联	3人	陕西农科中心	考察讲学
	美国	3人	陕西农科中心	考察讲学
	日本	3人	陕西农科中心	访问
	苏联	哈萨克斯坦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等4人	西北植物研究所	参观遗传研究室
	苏联	列宁格勒植物所生态学家2人	西北植物研究所	参观遗传生态研究室
	日本	3人	西北水保研究所	访问、合作
	苏联	2人	西北水保研究所	考察
	日本	大森博雄等5人	西北水保研究所	合作、研究
	日本	稻永忍等2人	西北水保研究所	访问
	日本	竹松等5人	西北水保研究所	合作、研究
	美国	3人	西北水保研究所	考察
	苏联	2人	西北水保研究所	访问
英国	1人	西北水保研究所	学术交流	

续表 2-3

日 期	国别和地区	人 员	组 织 单 位	活 动 内 容
1990 年	新西兰	1 人	西北水保研究所	合作、研究
	日本	田中明等 2 人	西北水保研究所	访问
	日本	春原亘等 2 人	西北水保研究所	考察
	美国	4 人	西北水保研究所	访问

第二节 外派科技活动

建国后，党和政府正视科学技术落后的实际，采取派出国门，取长补短等活动形式，开阔了科技工作者的视野和思路，使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据 1990 年统计，派往国外考察、进修学习的团体共计 163 次，300 余人。

咸阳市历年出国科技考察、援外、进修情况表

表 2-4

时 间	组织单位	姓 名	国别、地区和活动
1954—1959 年	秦岭电气公司	四批共 23 人	赴苏联学习
1958 年	水电部	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1 人)	捷克 参加国际排灌会议
1966 年	陕棉八厂	动力科技工 覃志明	支援建设马里共和国赛古纺织厂 (2 年)
1973 年	陕棉八厂	覃志明 闰智	支援马里共和国赛古纺织厂建设
1976 年	陕棉八厂	张俊和 崔世金	支援马里共和国赛古纺织厂建设
	水电部	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1 人)	墨西哥 参加国际十二届大坝会议
	水电部	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1 人)	喀麦隆 援建
1977 年	陕棉八厂	闰智	斯里兰卡敏耐丽亚纺织厂工作 (2 年)
	省政府	省林科所	南斯拉夫考察油橄榄
	水电部	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1 人)	喀麦隆 援建

续表 2-4

时 间	组 织 单 位	姓 名	国 别、地 区 和 活 动
1978 年	西北植物所	潘景丽	中国北京参加中澳植物组织培养学术讨论会
1979 年	陕西省农业学校	赵崇喜	日本 考察养鸡
1980 年	陕西省农业学校	杨新林、陈登文、王虎云	日本 分别研修畜牧、园艺
	西北植物研究所	李振声	日本 参加陕西赴日友好考察团进行农业考察
	省农业局	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余有成	日本 研修
1981 年	林业部	省林科所 (1 人)	意大利 造林培训
	水电部	水科所 (1 人)	日本 进修水管理技术
	陕西省农业学校	马首先	日本 研修园艺
	西北林学院	杨茂生	瑞典农业大学林学院进修森林生态
	西北林学院	宋士奎	加拿大戴斯仑大学进修森林生态
	西北林学院	杨忠岐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进修森林昆虫
	建林工业部	咸阳陶瓷厂 (1 人)	陶瓷技术设备考察保加利亚
	陕棉八厂	崔世金	支援孟加拉湾纺织厂工作 (2 年)
1982 年	省农业局	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武和平	日本 研修
	咸阳陶瓷厂	咸阳陶瓷厂 (6 人)	日本 应日邀请进行大型陶瓷装饰面板生产线设备和技术引进方面考察和实习
	陕棉八厂	黎友民 (工程师) 等 11 人	赴伊拉克库索尔棉纺织厂工作 (2 年)
	水电部	省水科所 (1 人)	巴基斯坦考察: 水利建设情况
	省纺织器材研究所	高跃岭	瑞士考察: 纺织丁腈技术
	省林科所	省林科所 (1 人)	美国合作研究
	西北林学院	苏印泉	日本岩年市岩年大学进修造林

续表 2-4

时 间	组织单位	姓 名	国别、地区和活动
1982	陕西省农业学校	陈登文	日本考察养蚕
	省农科院	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张百祥	美国 进修
1983 年	水电部	省水科所	意大利、进修河流泥沙
	省纺织器材研究所	何万璞	捷克 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纺织机械与附件技术委员 (280/TC72) 的第 10 次全会和下属的 SC1 第 19 次会议, SC2 的第 15 次会议, SC3 的第 12 次会议
	西北林学院	张广军	西德哥廷根造林学院进修造林
	西北林学院	李广毅	美国斯蒂文斯波恩特大学进修干旱造林
	林业部	省林科所 (1 人)	意大利 培训造林
	省政府	省林科所 (1 人)	美国 考察农林生产
	水电部	省水科所 (1 人)	哥伦比亚考察土石坝建设技术
	西北植物研究所	张满祥	赴日本参加国际苔藓植物会议
	西北植物研究所	李振声	赴印度参加“第十五届国际遗传学会议”, 作兰粒小麦的细胞学研究报告
	国家建材局	张有源	赴加拿大考察石棉选矿技术
	1984 年	西北植物研究所	袁永明
西北医疗设备厂		殷洪森 施贤达 郭 淮 薛宗儒	考察 X 线机
湖北省建材局		赵克中	赴日考察石棉技术经济
水电部		省水科所 (6 人)	美国进修: 计算机在水利工程上的应用
水电部		省水科所 (1 人)	美国进修: 土工试验技术
水电部		省水科所 (2 人)	美国 考察灌排工程管理及农田水利科研
水电部		省水科所 (1 人)	瑞典 参加国际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发管理培训
陕西省农业学校		何高社	日本研修农学

续表 2-4

时 间	组 织 单 位	姓 名	国 别、地 区 和 活 动
1984 年	陕西省农业学校	陈建民	日本研修园艺
	陕西省农业学校	黄大为	美国 进修畜牧
	省电子厅	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 周仲仪、陈增培、曹 乐天、关锁贵、吕炳 根	日本胜利株式会社（JVC 公司）考察 胜利公司彩电开发、生产、经营等有 关技术问题，引进先进的彩电新机 型，签订定货合同、技术协作协议
	国家建材局	陶瓷研究所（双方各 2 人）	日本 中日合作乳白釉项目；乳白釉 试验研究
	陕棉八厂	技工刘志安等一行 8 人	支援伊拉克库索尔纺织厂工作（2 年）
1985 年	水电部	省水科所（1 人）	荷兰考察人工砗与新技术
	水电部	省水科所（1 人）	日本 进修水资源及水管理
	新乡灌溉所	省水科所（2 人）	日本 讲学考察农田灌溉技术
	西北林学院	赵忠	奥地利维也纳农业大学林业研究所进 修造林获博士学位
	西北林学院	陈存根	奥地利维也纳农业大学林业研究所进 修造林获博士学位
	省林科所	省林科所（1 人）	美国培训工厂化育苗
	林业部	省林科所（1 人）	美国、加拿大考察教学科研
	陕广厂	吴明正 陈同兴 刘文武 宋光照	参加三菱重 IMF 系列注塑机技术培 训、验收日方为该厂设计制造的 14 吋彩电用模具 9 套
	西北植物研究所	李振声	赴美访问小偃麦遗传分析及育种
	西北植物所	李向民	日本进修植物遗传资源
	国家建材局	李梦杰	赴南斯拉夫参加第一届世界非金属矿 物会议
	西北轻院	赵岩峰	日本进修
	西北轻院	吴皆正 戚长征	日本访问
	西北轻院	常 江	西德 博士生
西北轻院	潘之芳	美国 博士生	

续表 2-4

时 间	组织单位	姓 名	国别、地区和活动
1985 年	西北轻院	王 炜	英国 博士生
	西北轻院	周志明	意大利访问
	西北轻院	陈宋德	西德访问
	西北轻院	曾嘉琪	加拿大访问
	中技公司	国棉七厂 3 人	赴瑞士等国考察纺织机械
1986 年	陕棉八厂	陈永明	支援伊拉克库索尔棉纺织厂工作 (2 年)
	省水利厅	省水科所 (3 人)	赴日考察渠道防渗
	咸阳陶瓷设计院 陶瓷发展中心	(5 人)	赴日考察建筑卫生陶瓷生产设备及其技术
	省建材局	张金铭	赴意大利考察石材工业
	西北轻院	权兴共	美国访问
	西北轻院	张永裕	瑞典访问
	西北轻院	金光太	苏联访问
	西北轻院	洪 枫	英国 博士生
	西北轻院	金 平	日本 博士生
	西北轻院	孙蕴宝	美国 博士生
	西北轻院	李宗斌	苏联 博士生
	西北轻院	山静民	日本访问
	西北轻院	王德忠	日本访问
	林业部	省林科所 (1 人)	赴意大利参加造林培训
	林业部	省林科所 (1 人)	澳大利亚考察科研管理
	省林科所	省林科所 (1 人)	赴美国攻读昆虫病理硕士学位
	省林科所	省林科所 (1 人)	赴美国攻读有机物提取硕士学位
	省林科所	省林科所 (1 人)	赴日本考察仪器
	西北林业学院	雷瑞德	苏联列宁格勒林学院进修森林生态
	西北林业学院	郭 超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修森林昆虫

续表 2-4

时 间	组 织 单 位	姓 名	国 别、地 区 和 活 动
1986 年	西北林学院	马希汉	澳大利亚进修天然产物化学分析
	西北林学院	王成果	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进修森林病理 攻读博士
	西北林学院	王通会	加拿大蕴莎大学进修生物统计 攻读 博士
1987 年	省农科院	省林科所 (2 人)	赴瑞典合作研究黄土高原能源林
	省林科所	省林科所 (4 人)	对美国、加拿大“造林、育种、组 培”等进行考察
	省林科所	省林科所 (4 人)	赴美国、日本考察美、日森林保护概 况等
	省林科所	省林科所 (1 人)	赴美国留学、攻读植物生理 生化博 士
	西北轻院	陈连怡	日本进修
	西北轻院	彭 晖	加拿大进修
	西北植物研究所	周俊彦	巴赛尔生物研究所进修《植物组织培 养》一年
	国家建材局	陶瓷研究院谭新民 江杰男	赴朝鲜考察非金属矿生产技术
	国家建材局	陶研所 俞纯桥	赴匈牙利考察非金属矿物
	国家建材局	陶研所 何国庆	捷克斯洛伐克 参加非金属矿物原料 综合开发讲习班
	国家建材局	陶研所葛文辉	日本 考察非金属矿物深加工
	陕西省农业学校	曹卫贤	西德 进修土化
	广播电影电视部 对外工程公司	陕广厂 龚协亨	对尼日利亚广播电视技术市场进行考 察；对尼日利亚出国六部 10KW 脉宽 机进行商务洽谈；对四部 500KW 短 波机进行技术改造，由尼日利亚拉格 斯尼日利亚 MG 公司接待
	省电子厅	陕广厂 陈增培	考察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新加坡子公 司生产电视接收机生产线所用设备、 仪器、仪表，并考虑购买。考察地 点：新加坡 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接 待

续表 2-4

时 间	组织单位	姓 名	国别、地区和活动
1987 年	西北医疗设备厂	张海滨 李凌云	赴日本考察电容放电 X 线机
	国家医药管理局	西北医疗设备厂殷洪森	赴日本考察专用汽车等
	中机公司	国棉七厂 (1 人)	赴捷克对气流纺纱机进行考察
	国棉七厂	5 人	赴瑞士进行片梭机培训
	咸阳院陶瓷发展中心	6 人	日本考察建筑卫生瓷生产技术
	省农科院	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惠家政	日本进修
	省农科院	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秦晟	赴丹麦考察
1988 年	西北植物研究所	张宗勤	赴美国福特公司进修生物组织培养
	国家建材局	咸阳陶瓷厂	随国家建材局代表团赴日本进行企业管理研修
	省农科院	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赴美国进修
	陶瓷研究设计院	5 人	赴美、英国考察建卫瓷用窑炉耐火材料的生产技术
	陕西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西北医疗设备厂	郭 淮 缙重庆	赴法国、比利时、美国考察 ECT
	陕西省	陕广厂 黄宗有 董 琪	参加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办的陕西省工业展览会, 考察欧洲市场对我省电视产品的需求
	陕西省农业学校	司传正 陈登文	赴日本考察农业教育
	国家建材局	陶瓷研究设计院朱迎波 刘开平 王 峰	赴美国考察硅藻土加工技术
	西北林学院	张亮成	赴苏联库班农学院学习经济林栽培
	西北林学院	张星耀	赴日本鹿儿岛大学学习森林病理
	西北轻工业学院	李树明	美国访问
西北轻院	黄世栋	英国访问	

续表 2-4

时 间	组 织 单 位	姓 名	国 别、地 区 和 活 动
1988 年	西北轻院	孙洪仁	日本访问
	西北轻院	吴 俊	比利时 博士生
	西北轻院	唐惠儒	英国 博士生
	西北国棉七厂	西北国棉七厂 3 人	赴日本 喷气织机培训
	省林科所	省林科所 (1 人)	赴美留学攻读森林土壤学 硕士学位
	省林科所	省林科所 (1 人)	赴美留学攻读食品科学 硕士学位
	省林科所	省林科所 (1 人)	赴美国培训: 昆虫性锈剂的分离合成等
	省林科所	省林科所 (1 人)	赴美留学、获取森林生态博士学位
1989 年	西北轻院	谢西平 郝际发	美国 博士生
	西北轻院	林 杰	英国 博士生
	省农科院	省林科所 (1 人)	瑞典 合作研究能源林
	省林科所	省林科所 (2 人)	美国 考察仪器
	西北植物研究所	钟冠昌	赴日本参加“第六届亚太地区育种研究”国际会议。《长穗偃麦草—普通小麦核质杂种的创制及其细胞遗传学分析》(交流内容)
	西北植物研究所	陈一鸷	赴法国参加“第十六届国际草地会议”, 论文《滩羊分布区植被与饲草资源的评价》
	陕西省农业学校	杨新林	日本 进修畜产品加工
	国家建材局	咸陶瓷研究院葛文辉	日本 中日合作科技项目
	陕西省中电分公司	陕广厂马新 李中南 关锁贵	考察美国电视生产先进技术和流水生产线用的仪器设备, 自动化插件机的引进等

续表 2-4

时 间	组织单位	姓 名	国别、地区和活动
1989 年	机电部贸促会陕西分会	陕广厂 张继录 罗文祥 陆卫平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互姆市参加中国周展览
	康富公司	康富公司 1 人	赴日本考察喷气织机
	康富公司	康富公司 2 人	赴比利时等国考察空气压缩机
	咸陶院陶瓷发展中心	5 人	意大利、西德, 对建卫瓷用色、釉料的生产技术考察
	咸陶瓷研究设计院	3 人	赴捷克, 陶瓷热工能源管理、能源保护方面考察
	陕棉八厂	何佩焕 孙鸿江 郭洪斌	赴马里共和国赛古纺织厂工作 (2 年)
	机电部通广中心	陕广厂胡永杰 钮德华	赴英国、荷兰、比利时菲利浦公司各子公司考察红外遥控器应用技术及陕广厂开发该产品所需的关键器件订货
1990 年	国棉七厂	国棉七厂 (5 人)	赴日本参加喷气织机培训
	陕西省农科中心	农科中心 3 人	荷兰考察

第四章 科技测报

第一节 气 象

建国后,咸阳市的气象测报技术发展很快。1953年到1958年,各县市相继建立了气象站。1962年咸阳专区中心气象站成立,负责管理县市气象站的业务工作,并开始发布长、中、短期天气预报。1966年咸阳专区气象台成立,在中心气象站的基础上,增加了人员、设备,调整了机构,改进了预报手段,加强了全区气象工作管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气象事业发展缓慢。1978年1月成立了咸阳地区气象局,技术设备有了新的发展,从1983年起县市站都装备了CZ-80型传真图接收机和791型定频接收机,随着PC-1500微型计算机在观测、报表预审、天气预报工作的广泛应用,探索天气变

化规律，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有了好的条件。截止 1990 年，气象事业从建站初期单一从事地面观测发报工作，发展到既能制作发布长、中、短期天气预报，又能承担农业气象研究、专业气象服务和农作物产量预报等十多项业务工作的实体。

一、气象台站分布

咸阳市拥有 12 个气象站，每站都有地面观测任务。建站最早的是 1953 年建立的武功县气象站，1954 年正式启用测报，观测内容主要有：能见度、风速风向、降水蒸发等天气现象和地面状态等十几项。1953 年 5 月经阳斗口农业气象试验站成立，同年地面观测工作正式开始，1954 年合并成泾阳县气象站。1956 年至 1958 年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相继成立了长武、彬县、礼泉、兴平、乾县、旬邑、淳化、永寿等 8 个气象站。1958 年以后成立了三原县气象站。至此全区共有 12 个气象站，代表了 6 个不同类型的地貌单元，有效的气象测报站网完全建立。咸阳市 12 个地面观测站中，长武、武功两站是国家基本站，由国家气象局指定设置，每月按规定向国家气象局报气象月报表。其余十站由陕西省气象局审批，主要为当地农业生产和其他的气象服务。国家站每日四次定时观测，昼夜值班；一般站每天三次定时观测，不守夜班。咸阳是西北要道，过往军航、民航较多，为了保证空中飞行的气候条件需要，长武、武功、乾县、永寿、淳化五站还承担省内外十多家用户的航危报天气观测任务，并编发每小时一次的天气实况和危险天气现象报告，另外，各气象站都要拍发重要天气预报、小天气图，乾县站每逢汛期还要给黄河水利委员会定期报告雨情，各站除开展预报外，还要制作气象记录的月、年报表。

二、观测方法及仪器

建国初期，完全搬照美国、日本观测规范进行工作。1954—1957 年，又选用苏联规程进行测报。当时的仪器基本上是外国产品，仪器落后，操作不便，测报不适应中国实际。如绝对湿度是以干湿球温度表测得，能见度记录用级数，风速用风速器，风程表，风向用常蜂鸣器风向器，观测记录有地面状态和最低草温。这些项目和观测远不能满足天气预报和气象服务的要求。60 年代初，咸阳地区各站陆续装备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 Er 型电接风向风速

计,使用了E-601型大型蒸发器,取消了雨量筒防风圈,并将高度由2米降为70厘米,增加了积雪密度和冻土观测,采用了百叶箱通风干湿表。同时制定出严格的仪器使用办法和检定程序,规定了器差订正值和使用年限,保证了地面观测工作的质量要求。1972—1984年,国家先后两次出版《中国云图》,陕西高陵试制了全天云况照像设备,该系统为观测研究云层的生消、演变,为探测大气的奥妙积累了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观测环境和观测记录的相比试验,发现了观测条件和观测场周的障碍物对地面气象要素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国家要求各部门严格保护气象台站的观测环境。咸阳地区各站进行了清障和保护,使观测环境和条件,日趋合理标准,观测成果愈加准确。随着计算机软件的利用,气象台站开始应用计算机程序审核地面气象报表和统计资料。1986年长武、武功两个国家站正式启用夏普PC-1500计算机编发气象报表,并装备了新型的观测仪器。此后各站均用计算机制作气象报表和气压筒表,观测手段更加先进,从而减轻了观测员的劳动量,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地面测报工作质量。

三、天气预报

1962年咸阳专区中心气象站成立,主要负责台站业务管理工作,并结合省台长期预报,参考有关资料,向地区领导机关和各县站不定期发送长期气候展望。采取的预报方法有相关统计、偏距法、太阳黑子辐射与天气变化的关系等。1963年在全区县站推广了四川预报经验,整理了大量资料,总结出了霜冻、雪雨、大风、降水等十多种预报方法和指标。按照中央气象局关于天气预报必须“土洋结合,以土为主”的指示,1966年初,咸阳专区气象服务台成立,养殖了黄鳝、泥鳅、田螺、鱼、蚂蚁等动物作为预报工具,开展土法预报。编制了物象电码型式,对动物进行观测。历时一载,因缺乏科学根据而废弃,改为单站资料,曲线图、距平图、九线图和农谚等。1974年3月,地区台在三原建立流动服务台,填绘分析了0.8h、14h亚欧地面天气图,点绘了中央气象台高空分析图,采用天气图作预报。正式开始发布1—3天的短期天气预报。进入80年代后,由于国内数值天气预报成果的逐渐增多,市台天气预报方法有了新的改进,应用数值预报结果的MOS(模式输出统计方法)预报,投入业务运转,取得一定成效。1985年,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咸阳市气象台进行了分片预报方法试验研究,并已完成全市4—10月份小雨以上降水,5—10月份中雨以上降水,7—8月份大暴雨降水的分片预

报方法。于 1986 年开始投入业务使用，效果极佳。分片预报的依据是充分利用市区范围的小天气图、能量图、流场图及有关资料，用 HKC-8800 计算机分析计算，全部操作过程由计算机完成。由于市区能量小天气图有加密的观测资料，比用大天气图更能详细揭示本地区范围内的地面流场分布和不同热力状况，以及天气的演变过程，从而有助于了解地方性天气的差异和特点，结合大范围天气形势，使省、市、县三者预报相互结合，日臻完善和准确。

四、通讯接收

1974 年咸阳市气象台开始使用无线莫尔斯通讯，当时配备 7512-丙短波接收机一台，“239”短波接收机两台，编制报务员三名，使用莫尔斯电码接收中央气象台和西安、兰州中心台拍发的国内外气象情报。1975 年，咸阳市气象局又配备移频终端机二台、克利德电传打字机两台。1976 年又配备 55 型电传机，设备水平大为改观。1979 年咸阳市气象局开始接收气象传真广播，配备有 711 型传真收片机一部，同时又增加国产 62-丙单边接收机一部，55 型电传机一部。1980 年又配备 721 传真接收机一台，56 型超短波接收机一台，51 型电传机二部。1983 年咸阳地区 12 个县市站全部配齐了 CZ-80 传真机和 701 型定频接收机，各级台站通过接收气象传真广播，获得了天气预报所需的各种工具图表，提高了预报的准确程度。为了适应气象服务工作的需要，1986 年咸阳市还购置了天气警报发射系统，安装了 QTF-83 型天气报警发射机二部，同时向用户配备了 20 台 XSP-C10 天气警报接收机，深受用户欢迎。

第二节 地震

1976 年唐山地震后，咸阳地区始设抗震救灾指挥部，1977 年改为地震办公室，揭开了群测群防、预测预防地震工作的序幕。1978 年后国家对地方地震工作提出了三大任务，即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科普宣传和工程防震工作。经过几年的调整和提高，1986 年底咸阳市已具有省属专业台站 3 处，县属地震中心监测站 5 处，市属地震中心监测站 1 处，骨干群测点 37 个，企业台站 9 个和众多的宏观点哨。基本组成了专群结合，宏微观结合，监测手段多样，观测项目齐全的地震前兆监测网络。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地震地质、地质灾害、监测仪器等方面的探讨和研究。在推进地震科学技术现代化方面，采用

PC-1500 微型计算机对前兆监测资料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达到有效的监测 MS0.5 级以上的地震,在省内属地震监测精度能力最高的地市之一。

一、监测设施

1974 年在省地震大队的帮助下,咸阳地区首批建立了彬县、高陵气象站两个群众地震监测站,开始了地震监测工作。1975 年海城地震后,陆续建立了淳化、彬县新民、旬邑职田、长武四个中学和长武、淳化、三原 3 个气象站等 46 个地震群测站。1976 年唐山地震后,一个群众性的监测工作蓬勃兴起。据 1977 年不完全统计,全地区有群测点多达 613 个,遍布 14 个县市的各行各业,测报人员多达 3678 人,自制各种土仪器 1839 件套。其范围之广,人员之众,空前罕见。1977 年始建常设机构,从此咸阳市地震预防工作步入正常轨道,地震预报及其宏、微观监测纳入地震部门的工作任务。咸阳市地震监测工作,由国家专业地震台站和地方群测点共同承担,按国家规定内容分为中、长期地震监测和短期、临震监测两大类。

中、长期地震监测是为中、长期地震预报提供大范围内震情发展变化的趋势性监测资料。按监测项目分为:

地表形变测量 传统的地表形变测量原是由于大地测量和地形图的测绘,只因精度较低,不得直接用于地震监测预报。1970 年国家地震局首先完成潼关—嘉峪关间水准复测和西安水准环测量任务。试图找出未来的地震危险区域。为此还在渭河断陷盆地,布设了区域形变监测网,至 1986 年底,已完成了三次复测任务。在水平形变监测中,布设了泾阳口镇小三角网和韩城、白水两处跨断原测量的短基线。1982 年省地震局沿渭河断陷盆地内主要活动断层增设 7 处水位测量点(其中包括口镇观测点)。所有的形变测量为陕西省中、长期地震的监测预报积累了大量实用资料。

重力测量 1979 年 8 月,咸阳地区行政公署在兴平地震中心监测站敷设了一台加拿大环球牌重力仪进行重力点观测。因仪器陈旧,经常出现故障,难于达到精度要求,于 1982 年 3 月停测,中断了定点测量。本市境内主要分布在周至—武功—乾县—永寿—彬县和咸阳—兴平—武功两线,其监测任务由省地震局流动重力组完成,至 1989 年共复测 9 次,质量均符合规范要求。

测震 1953—1958 年,陕西境内有专业测震台 15 个,其中分布在咸阳市的有彬县、乾陵、泾阳共 3 个台。地方测震台 4 个,其中咸阳市一个。咸阳市地震中心监测站为西北五省区惟一的深井微震台,主要监测距本市 100—

300公里范围内的微小地震。

地下水监测 咸阳市地下水监测井网，主要沿宝鸡—华县断层和渭河断陷盆地北缘断层布设，均属地质构造之敏感部位。计有兴平县安家自流井，北市井，泾阳县筛珠洞低温泉水温、泾阳地震中心站成井，三原汽车标准件厂水井和乾县文管所井、康家井、梁山郃山井和龙岩寺温泉水温等。监测项目有水位、水温、水化学和水电导等 20 多项。

地倾斜监测 陕西省 1970—1986 年设置于咸阳市的地倾斜台有 3 个，即彬县台、乾陵台和泾阳台，市属的地方群测倾斜台网有 6 处观测点，即西北国棉二厂、七厂、西北橡胶厂、长城电工机械厂地震测报站和咸阳市地震中心监测站，兴平县地震中心监测站。这些台站自 1978 年开始投入观测，已观测到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前兆信息。以 1980 年 6 月 24 日陇县发生 4.3 级和 3.8 级地震，距震中约 180 公里的西北国棉二厂，西北橡胶厂地震测报站的地倾斜在震前均有明显的前兆反应。市地震中心监测站的地倾斜，对于国家 5 级以上地震和国外 7 级以上地震都有明显的前兆显示。

地电监测 咸阳市自 1970 年建立第一批群测点开始，就有了土地电观测，至 1976 年唐山地震后监测达到高峰。1976 年以后，中国大陆地震处于一个相对平静时期，对众多的群测点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充实，至 1989 年保留了 6 个地电测报站，即西北国棉二厂、七厂测报站、长城电工机械厂测报站、乾县一中地震测报站、礼泉、武功地震中心测报站。监测设施是将电极埋入地下 2—3 米深的土层内，引出两相导线，再串联一个微安表头，形成一个闭合回路，便组成一个土地监测装置进行观测，精度可达到微安级。

地磁监测 本市地磁台网始建于 1976 年唐山地震之后，1978 年广泛开展，有 30 多处地磁监测站。经整顿优化，至 1989 年全市保留地磁台 6 个，即市地震中心监测站、三原县地震中心站、西北国棉二厂、西北橡胶厂、七九五厂、地矿局区域地质队地震测报站。观测的主要仪器有地磁偏角仪，磁力仪和磁感应传感器等。

地应力监测 1977 年咸阳地区开始引用 75-1 型简易应力仪，进行地震监测。首先使用的是泾阳、三原和咸阳市少数群测点。1979—1980 年 75-1 型地应力仪在全地区普遍应用，分别在 40 多个群测点安装、测试。经过 1979 年和 1984 年两次调整、优化，直到 1989 年底咸阳市保留地应力监测点共 5 个。1980 年后相继引进了 82 应力仪、83-1 型应力仪和西工大研制的应力仪。由于这些仪器技术落后、精度较差、抗干扰性能不佳等因素，致使观

测曲线大幅度变化,多年观测资料表明,曲线形态无规律可寻,更难从中判定与地震有关的前兆信息。这就给地震工作者提出一个攻关的课题,有待于研究和完善。

二、预报系统

咸阳市地震分析预报工作是从1976年唐山地震以后开始的。1976年10月8日陕西省发布了短期地震预报,认为在关中地区有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危险。为此,咸阳地区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承担本地区的地震监测预报工作,1977年易名为地区地震办公室,领导众多的测报台站,开展了大规模群测群防工作。后因所预报的地震未曾发生,1977年4月省上正式宣布解除预报,地震预防工作恢复正常秩序。为了及时准确作好地震预报,市地震部门采取“会诊”制度商讨预测未来。1977年元月至1980年5月,每半月召开一次全地区的震情会商会,研究预测未来半个月内的震情发展趋势,提出震情分析预报意见。同时参加陕西省震情会商会。1980年6月至1990年底半月会商会改为月会商会,分析预报未来一个月内全市的震情趋势。之后又在月会商的基础上,又进行年度会商,提出年度会商预报意见。其年度地震预报如下:1976—1977年,咸阳地区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1978—1984年,咸阳地区不会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1985—1987年,咸阳市不会发生6级以上破坏性地震;1988—1990年,咸阳市不会发生6级以上破坏性地震,但要警惕泾阳、三原的小震活动。

三、测报记录

微观变化监测

历时十余年的水准测量,地震工作者发现,1971—1977年渭河断陷盆地自武功经三原、富平、澄城直至韩城,为一大范围地表形变隆起带,且上升速率由武功向韩城逐渐增大,其速率可达12毫米/年。同时韩城地区相对于乾县、淳化一带以年平均10—18毫米的速率上升,而盆地的西部,则是一个下沉区,其中心有两个,一是宝鸡,二是麟游—平凉。陇县、宝鸡相对于乾县、淳化以年平均4—8毫米的速率下沉。咸阳相对平静,而西安却处于特殊下沉区,年速率高达60毫米/年。1977—1980年地壳形变一反常态,上升区变为下沉区,而下沉区又变成上升区。从三原经富平,过澄城到韩城,已变

为沉降带，其沉降速率依然是从三原至韩城逐渐增大，降幅最大的地方仍在韩城，年变化速率为14毫米/年。相对于淳化以年平均12—16毫米/年的速率下沉。盆地的西部由下沉变成上升区，上升中心仍在宝鸡和平凉。千阳相对于淳化以年平均4—8毫米/年的速率上升。武功一带保持原来的上升态势，西安、咸阳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原状。1980—1986年间，关中盆地东部相对平静，而西部地区仍继续上升，其中心在麟游—陇县—华亭一线；千阳相对于淳化以年平均4—6毫米/年的速率上升；蓝田、西安、咸阳为一沉降区，其中以西安最甚，沉降速率有趋大之势。

小震群活动，主要有两处：一是周至震群。据测1976年6月6日至7日县西南发生小震10次，其中可定震中的有4次，最大震级2.1级。1982年6月28日至30日仍在原地区发生小震78次，可定震中的有8次，最大震级2级，震源深5—6公里。间隔7年，两次小震发生在同一地区。二是泾阳震群。1983年4月底至1984年6月间，陆续测到距泾阳地震监测台东北5—6公里发生小震350次，其中可定震中的有10次，最大震级2.2级，震源深度亦是5—6公里。震群活动期、震中位置较为集中，并呈现三个活动高潮，而每个高潮都包含1—2个2.2级主震，持续时间一月有余。

其它监测项目，如地下水、地倾斜、地磁电等无明显变化。其中地下水位变幅虽然较大，但多与自然降水量和人工灌溉关系密切。

(二)、宏观前兆监测

动物宏观异常 1976年12月—1977年元月隆冬季节，平均气温 -5°C 左右，咸阳地区各县都发现有蛇活动，当时统计发现78条。出现于动物冬眠期的异常活动，有待研究。

地光异常 1976年9月2日19时30分许，永寿县“五七学校”教师刘万春在家门前看到一个白色光球，自窗下突然升起，无声无味，很快消失，并在砖墙上留有白色痕迹，宽约15—20厘米，长30厘米，当场目睹者还有四位教师。他们认为并非磷光。同年9月20日零时45分，三原县洪水乡干部惠有智等人开会结束，发现距会议室南300米处空地上，出现瓦蓝色带状闪光，持续数秒钟消失。

地气味异常 1976年12月20日20时30分许，礼泉县赵镇乡吴村，有半条街自地下突然冒出青蓝色气体，味臭，使人恶心欲吐，心闷不适，持续少许消失。

地下水异常 1976年11月24日泾阳县三渠乡水井突然翻花冒泡，约15

分钟冒泡一次。11月30日兴平化肥厂7号井（深150米）自8时30分突然发浑，直至12月1日晚，井水仍然浑浊，无法使用。1984年12月30日至1985年元月20日，兴平县安家泉出现喷砂现象，砂圈直径2米，水浑、色白、颗粒较细。属此泉五六十年来罕见变异。

地裂缝异常 自1958年开始，市境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等县，沿北山断层和口镇至关山断层，陆续出现了一系列地表裂缝。尤其是1976—1984年间，裂缝频繁发生，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迫使部分群众避险搬迁。1984年泾阳县水泥厂生产、生活用房地面、墙壁裂缝，机器位移，致使工厂无法生产。后经调查口镇、龙泉、蒋路三乡，在东西长20公里，南北宽约2—4公里范围内，发现地面裂缝约55处之多。

第三节 防灾抗灾

一、天灾预防

建国初至1958年，咸阳地县两级相继成立了气象台站，运用单站天气预报并结合当地实际为农业生产服务，1970年，全区组织了3次规模较大的预报会战，主攻春季连阴雨、干旱、冰雹等灾害性天气，汇编了春季连阴雨、冰雹、春播期第一场透雨等预报方法22种，春、夏短期预报指标、模式188条。初步摸索总结出三套冰雹预报方法，对于防灾抗灾有着积极作用。1976年市气象工作者积极研究三夏天气规律，编写了《三夏连阴雨长、中、短期预报方法》，及时做好连阴雨期天气预报工作。遇有旱汛，就充分作好准备，进行气象预报。1987年6月，正值收割大忙之际，连阴雨连绵不断，市气象局报准了期间四天晴好天气，使收割、碾打、晾晒得以顺利完成。除此之外，低温、霜冻、暴雨、冰雹、大风等也常常造成局部地区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如棉花生长与气象关系密切，每年四月上、中旬前后进入播种期，要求天气晴朗，地表温度 12°C 以上，但咸阳地区春季常有霜冰、阴雨出现，若遇这种天气，棉花可能产生烂种、缺苗、断垄现象。为了避免这种灾害，农村采取地膜育苗方法，以便保温防冻。但遇到天晴日暖，地膜内温度猛增，又会引起幼苗焦死。因此，必须依靠气象预报和实际情况进行生产管理。根据试验研究，晴天最高温度升到 25°C ，地膜温度可升到 $40\text{—}50^{\circ}\text{C}$ 。天晴日暖时，地膜内温度过高，需要及时通风降温，天冷温度太低时，需及时覆盖保

温。所以春播期气象预报显得尤为重要。七八月份正是棉花结铃时期，需要充足水分，可是同期恰属盛夏季节，阳光强烈、湿度高、水分蒸发快，两周不雨即成干旱，威胁棉花生长。这时气象台及时发布干旱天气预报，群众灌水抗旱，就能保证棉花生产夺得丰收高产。

气象预报除与农业生产活动关系密切外，还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乃至城乡人民生活有着重要的联系。建国初期，咸阳市气象台站曾担负航空飞行天气报告，先后执行《航空天气观测暂行办法》、《危险天气通报暂行规定》等文件，为飞行预报服务。直至1987年，仍有长武、武功、淳化、永寿、乾县五站担负着航空气象情报任务，按规定各站每小时提供一次航空气象情报，主要内容包括飞行高度上的风向、风速、云量、云状、有无积雨云、积冰、雷暴等项目。在交通运输方面，因天气异常而出现的交通事故，连年不断，咸阳市公路总段1986年安置了气象警报接收机，每年可为国家减少损失6万元。

二、抗震防灾

1981年咸阳市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抗震设防城市，抗震防灾工作开始得到重视和加强。1985年5月，成立了抗震机构，在国务院关于“预作准备，减少损失”和“以防为主”方针指导下，市政府对抗震工作非常重视，从而保证了抗震防灾工作的顺利开展。

编制规划

从1986年6月至1988年8月，全市14个县区和136个重点单位，全面完成了抗震防灾规划。1989年10月由全国地震、抗震界的21名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对此进行技术评审，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抗震规划编制工作实现了“四个全省第一”：一是三原县73天完成了县城防灾规划，成为陕西省第一个完成规划编制的县；二是彩色显像管总厂成为陕西省第一个完成防灾规划的企业；三是提前两年半完成市辖14个县区的抗震防灾规划，是省内第一个全部完成编制任务的地市；四是永寿、彬县、长武、旬邑、淳化5县成为陕西省六度地震区第一批完成抗震防灾规划的县份。

抗震工程

从1977年至1988年，咸阳市对市区的生命线工程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程进行了防震加固，累计完成102.8万平方米，占应加固258.6万平方米的39.7%。至1990年，全市累计完成工程加固156万方平方米，先后评出优

良工程 80 多项，占加固项目的 36%，同时完成 4 个八度县区和 5 个七度县的生命线工程加固任务，建立健全了从鉴定、设计、审批、施工到竣工验收的“一条龙”监督体系。

新建工程的设防管理，咸阳市是从 1990 年起步的。仅 1991 年，全市审查设计 148 项工程，涉及建筑面积达 290 余万平方米，均达到抗震设防要求。

宣传培训

1985 年以来，全市先后举办抗震加固技术培训班 6 次，参加培训的施工企业经理、队长、技术人员及建设单位管理干部 1000 多人；举办新建工程设防培训班两期，参加培训的 300 多人；举办建、构筑物抗震性能普查鉴定学习班 9 期，培训技术干部 600 多人；举办抗震管理干部学习班一期，培训 300 人；举办乡镇长培训班 3 期，受训人数 200 多人。此外，还在市委党校和县区党校讲抗震科普知识 13 次，听讲人数达 600 多人。

管理机构

1985 年 5 月咸阳市抗震办公室成立。到 1989 年，编制人数达 16 名。此外，全市各县区市均已成立抗震机构，明确八度区抗震办编制 5 人，七度区编制 4 人，六度区不少于 3 人。截止 1990 年底，全市各县区抗震办全部配齐人员，136 个重点单位也都建立了机构，配备管理干部 600 名。从市、县到各重点单位已基本形成防、抗、救相结合的一体化管理网络，从组织上保证了抗震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三编

文 化

第一章 文学

咸阳的文学艺术起源甚早。在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收录了有关周秦故地的民间歌谣。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约集门客共同编写《吕氏春秋》（又称《吕览》），被称为杂家的代表作。李斯、韩非的政论文章，如《谏逐客书》、《说难》等，亦成为法家的典范作品。

两汉时期，在文学、史学领域，班氏家族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席位。尤其是班固的《汉书》，堪称史事与文学相结合的典雅之作。

魏晋以下，地方作者也层出不穷。特别突出的是，前秦女才子苏蕙创作《璇玑图》，西魏政论家苏绰擅长制诰文，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上均倍受青睐。

隋唐之际，咸阳地方文学艺术受京畿文化中心的影响，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武功人富嘉谟与文学家吴少微开创了“富吴体”，反对南北朝以来萎靡不振的文风；苏頲与政治家张说并称“燕许大手笔”，在制诰文风方面，形成了迥别习俗的独特风格，受到朝野欢迎。中唐六谏的诗歌创作、皇甫枚的《三水小牍》，在唐代文学史上也有重要位置。

宋元以后，咸阳地方文艺的发展脱去了帝都氤氲，其地方性开始凸现出来。宋代文学家张舜民破声律之藩篱，独好乐府，有《画墁集》传世；金代道教全真派鼻祖王重阳，颇好填词，仅《道藏》和《全金元词》中，就收录了670余首词作。明代状元康海作为“前七子”之一，积极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古文运动，但其诗作却受苏洵影响较大；明末进士温纯雅好文艺赏析、选批，其后裔对三原文化界影响至大。

进入近代，以著名教育家刘古愚为代表的维新人物，从民众教育入手，在陕西地区开辟了新的文化风气。其追随者如于右任、吴宓等直传、再传弟子，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发挥了显著作用。民国以后，以冯润璋为代表的

左翼作家，创作了许多批判现实的文艺作品；以李敷仁为代表的民俗作家，和以范紫东为代表的戏剧作家，均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建国后，在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级文化管理部门逐步建立，管理制度也日益健全。在50年代和80年代，咸阳地区文学艺术创作出现过两次大的热潮。以咸阳陵照“五一”俱乐部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以邹志安、库淑兰、李若冰、冯日乾等为代表的小说、剪纸、散文和杂文作品，均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第一节 诗 赋

先秦时期，《诗经》中的《邶风》和《大雅》就反映了周人在咸阳境内的活动，可以看做境内最早的诗歌创作。两汉之际，班氏家族的诗赋之作，成为本地最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班婕妤作《团扇歌》，为我国文学史上公认较早的五言体诗；《自悼赋》、《捣素赋》为最早的女性赋作。嗣后东汉班彪、班固、班昭、傅毅、马融和赵岐等学人，分别有《览海赋》、《西都赋》、《东征赋》、《舞赋》、《长笛赋》、《蓝赋》等名赋传世。梁鸿《五噫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楚声短歌，讽刺汉章帝劳民伤财，患害不尽，表现出对国家人民的深切关心和忧伤，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备受关注。

北朝时期，前秦女诗人苏蕙创作《璇玑图》共841字，反读、斜读、交互读，可得诗3800余首，表达了哀感顽艳的复杂情绪，被誉为超古迈今的卓犖之作。隋唐时期，咸阳诗人更为多见，比较有名的如中唐六窦，其中包括窦叔向，“诗法谨严，又非常格”（辛文房语）；其子窦常诗多旅游题咏、寄赠酬答；窦巩，诗多绝句；窦牟素以五律、七绝见长；窦群以绝句见长；窦庠亦以绝句见长。“六窦”大多为写景咏物，送别赠答之作。此外，尚有曾任武功主簿的姚合，也称姚武功，刻意求工，幽折清峭，其诗派被称为“武功体”。

宋元以来，咸阳地方诗人虽然较多，但在文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仍比较少见。宋代张舜民，著有《画墁集》、《画墁词》，诗学白居易，词近苏东坡，其《卖花声》词被多家词选所录。金代王重阳开创道教全真派，特别擅长填词，在《全金元词》中收录他的词作多达674首。其弟子马钰、孙不二、谭处端、郝大通、刘处玄、王处一、邱处机等人词作，亦占较大篇幅。明中叶状元康海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台阁体束缚创作、文风萎靡的时弊，以复古为号召，重视模拟，在当时为消除八股文影响、廓清萎靡不振的诗风有一定的

成绩。但因其过分强调格调、法度，走上了形式摹拟的道路。其所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前七子”的理论旗帜。明末三原温纯喜好文艺鉴赏与批评，清初孙枝蔚、孙髯翁雅好诗歌与楹联，前者著《溉堂集》，被誉为“波澜老成，绚烂极于平淡”（王泽宏）；后者创作昆明大观楼长联，气势磅礴，亦是清代盛举。

进入近代以来，面对政府腐败，列强凌辱，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化，一些咸阳籍作家的诗咏之作多寄托着爱国思想和壮怀激烈之情。宋伯鲁擅长诗词书画，著有《海棠仙馆文集》，词作清雅可观；李岳瑞著《郢云词集》，内容博赡，皆有同光诗风。同时陈涛著《审安斋诗集》，王典章著《安隐庐诗》，皆有较大的影响。稍后于右任、吴宓，一个是政治家兼诗人，一个是教育家兼诗人，所做大量诗歌在述物言志方面，皆有独到之处。《半哭半笑楼诗草》《右任诗存》，保存了于右任大量豪放大气的爱国诗篇；《吴宓诗集》及所附诗话，既是作者浑厚淳真的生平写照，又堪称关中诗学的脉络传真。

建国后，咸阳诗歌创作更有了新的发展。诗人毛铨所写《云帆集》、《春花初集》（合作），以写社会生活为主；峭石诗作《白杨树和战士》、《驰骋集》等，以写部队生活为主。他们在五六十年代产生过较大影响。70年代以来，诗人雷抒雁创作《小草在歌唱》，获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其后陆续出版《沙海军歌》、《漫长的边境线》、《小草在歌唱》、《春神》、《云雀》、《绿色交响乐》、《父母之河》、《掌上的心》、《跨世纪的桥》、《踏尘而过》等14本诗集，1982年曾出席南斯拉夫特鲁卡国际诗歌节，并作大会发言，在海内外诗坛产生过很大影响。与此同时，诗人马林帆著《坎坷的河》，注意诗情与诗意结合，在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外交家兼诗人符浩著《天南地北集》、赵富考著《竹石集》、文建国著《文新阁抒怀》皆收录了作者创作的旧体诗词。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诗坛“西北风”的呼啸而起，年轻诗人耿翔和田玉川等一批诗坛新秀逐步崛起。耿翔著有《岩画·猎人与鹰》、《望一眼家园》等散文诗集，以及《母语》、《西安的背影》诗集等；田玉川著有《倾斜的大陆》、《中国菜》等，一近唐韵，一仿宋调，各具风格。还有李文德著《儿歌选》、叙事长诗《邓颖超》、《赵梦桃之歌》、吴树民著《玫瑰色的夜》、董信义著《望月清泉》、武永莉著《在边缘上》、张文章著《雨后看云》、杜晓旺著《裸浴清晨》、魏栋宇著《星汉与四季》等作品。此外，咸阳境内还涌现了一些群众诗社，如50年代咸阳陵照“五一”俱乐部的农民歌谣创作，90年代礼泉民间诗社的歌谣创作，也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影响。

第二节 散文

境内散文创作以史传体和政论体文章为盛。从秦代丞相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兼容儒道名法等诸家开始，到李斯撰写《谏逐客书》，其富于雄辩的议论色彩，令人折服。班氏父子历时 20 余年，潜精集思，辛苦笔耕，完成《汉书》编写工作，开辟了断代纪传体的先河，尤为世人敬仰。北朝时，西魏苏绰辅佐宇文泰治国，重视整饬吏治，端正风气，所著《佛性论》、《七经论》和《六条诏书》等制造文章，旨在纠正当时文尚浮华的通弊，被称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声。

隋唐时期，以王方庆为代表的政治家，非常重视政事著述，所写《魏郑公谏录》等，颇有经世传统。武功人苏瑰能诗善文，与其子苏颋俱有盛名。其子苏颋，武后时进士，袭封许国公，与政治家燕国公张说以文辞见长，并称“燕许大手笔”，其作品流转自如而气势挺拔，讲究实用、重视风骨，为中唐古文运动之先声。“北京三杰”之一富嘉谟，与文学家吴少微合创“富吴体”，为文雅厚雄迈，深受时人羡慕。其《丽色赋》格调高昂，于豪华场面中寓年华易逝的悲感。

金元时期，“关西夫子”杨奂，与文学家元好问友善，所著《还山集》120 卷，《正统书》60 卷，其中大部分内容已经佚失，但就其佚存来说，仍不失为当时北传理学学派的代表之作。明代中叶，以王恕为代表的政治家，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其所创立“三原学派”，注重阐述程朱学术，对此后理学学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康海及户县王九思等“前七子”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台阁体，对明清两代文坛风气皆有较大影响。即使反对“前七子”的学派，也不能不承认其独特的学风。

明清之际，以三原温氏为代表的地方文化家族崛起，除温纯喜好文艺鉴赏，著有《诗经评点》、《杜律一得》、《汉魏诗选粹》、《古文选粹》、《二园诗集》、《文法品汇》等 30 余卷外，其长子温予知著有《无知子集》，次子温日知著《屿浮阁诗文集》，三子自知著有《海印楼文集》等数十部著作。温氏后裔还相继著有《北山集》、《九峻小草》、《养晦斋文集》等 60 余种。清代初期，兴平杨岫师法二曲先生李颙，重视实学，所著《幽风广义》、《知本提纲》，特别关注国计民生，强调通俗易懂。

近代以来，以刘古愚为代表的地方文化人重视救亡图存，强调维新变革。在文风上，以《烟霞草堂文集》为代表，形成了一种犀利、明快且务实

的独特语风。民国时期，李敷仁重视民俗民风研究，将报刊、著述语言引向民间方向；而吴宓重视传统文言风格，强调保留传统文体中优秀的成分，将刊物、著述语言引向学术方向。

建国后，散文文体逐步有所分化，一种倾向是公文语言，逐步从白话趋于雅致。一种倾向是文艺语言，逐步从文言趋于语体。李若冰著《柴达木手记》、《在勘探的道路上》、《旅途集》及《山·湖·草原》、《神泉日出》、《塔里木书简》等散文作品，反映了包括石油工人在内的劳动者的精神风貌，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毛铨散文集《听雪记》、《黄河揽胜》、《毛铨散文选》、《种金坪闲话》、《北窗散笔》，从散文渐入杂文，有其独特个性。冯日乾著《风雨蔷薇》，汇集了作者在《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和《半月谈》等所发表的杂文作品，在全国杂文界具有较广泛的影响。1992年《文汇报》曾为其开辟专栏，作为第一位新杂文家介绍于世。田长山著《市居乡情》、《故土絮语》、《幽默与情趣》、《随缘集》等，在省内外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梁澄清著《俗眼望莲》、《生命念想》等，在民间文化与散文创作结合上独树一帜。此外，作家杨焕亭著《人影月影》、沙石著《夏夜静悄悄》、石匠著《还是那弯红月牙》《人迹》、郭群著《逃离魂灵》、陈德宝《故乡风景》、鲁曦著《寻梦》、王永杰著《冷眼热泪》、董信义著《雪也陶人》等，也有一定的地域性影响。

第三节 小说

唐代，三水人皇甫枚著《三水小牍》，收集了作者所写的传奇性小说。此为本地小说创作的先河。

民国时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冯润璋，与鲁迅、冯雪峰、夏衍、阿英等人相交谊，创作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鞭挞社会黑暗的小说作品，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收入《冯润璋文存》一书。

建国后，咸阳地区小说创作发展很快，一大批小说作家如邹志安、峭石、杨争光、程海等，在省内外均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80年代以来，邹志安（1946—1993）创作短篇小说《哦，小公马》、《支书下台唱大戏》，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又出版《关中异事录》、《多情最是男人》、《女人的骚动》等3部长篇小说，在国内小说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家峭石著有短篇小说集《欢乐的梦》和长篇小说《女贞巷》、《杳晃峪》、《劣根》等，始终坚持其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费宏达著中国西部风情系列小说《女人们》、《情人

们》、《兄弟们》，反映了关中中部一带的风情民俗；程海著《热爱命运》、《苦难祈祷》、《我的夏娃》等小说，其中短篇小说《三棵枸杞豆》曾获全国优秀作品奖；杨争光著《老旦是一棵树》、《双旗镇刀客》等小说，极具个性，已被搬上影视屏幕；白描著《苍凉青春》，亦被改为电影《遭遇昨天》，均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军旅作家张鼎全著《雪域高原》，反映了奋斗在青藏高原的汽车兵生涯，受到人们关注。此外，还有李春光作《红森林·黑森林》，沙石作《倾斜的黄土地》、《告别不了的昨天》，文兰作《三十二盒录音带》，王启儒作《残月如钩》、《夜的迷茫》，梦萌作《绿太阳》，李文德作《秦野》、《商家坪》、《人狼》、《神城》、《银水巷》，刘宇文作《独牛村》，雷国胜作《悲纱》等小说，均在省内有一定的影响。作家董信义作《悲意的雪》、王海作《鬼山》、辛建斌作《情窦》、引泉作《摘星峰》、石竹作《涪泉河》等小说集，也都融化着作者生活与感情的真切体会。

在文艺评论方面，著名评论家阎纲著《悲壮的红岩》、《小说创作谈》、《〈创业史〉与小说艺术》、《小说论集》、《文艺徜徉录》、《文学八年》等，在全国小说评论领域有重大影响。韩梅村著《多棱透镜下的人生——张俊彪论》、《文学鉴赏录》、《历代名家咏汉陂诗鉴赏》、《王蓬的艺术世界》、《意味的探寻》等，亦构成了自己的评论风格。

第四节 民间文学

流传在咸阳民间的口头文学，包括故事、歌谣、谚语和新故事等，无不抒发人民之情怀。如北部山原曾孕育产生过“七月流火”的《幽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南部泾、渭流域在汉代产生过歌颂郑白渠的歌谣，寓示“水为农之本”的哲理。建国以后，新故事、新民歌的提倡和传诵更加普遍。1985年，根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要求，咸阳市民族、民间文学艺术集成编辑委员会成立，开始了采集、整理工作。经数年采风，动员数千人参与挖掘整理，14个县区共普查、抢救出民间故事5970篇，其中各县区送审2481篇；歌谣5000余首，县区送审2000余首；谚语92816条，县区送审23944条。至1988年，咸阳市民间文学集成结集出版。《咸阳民间故事集成》收集故事976篇；《咸阳歌谣集成》收集歌谣1000首；《咸阳谚语集成》收集谚语6524条。三套八卷集成总计200万字。主编为梁澄清，副主编为强万康、张廉、姚友访。此外，各县区也都完成了相应的民间歌谣、谚语和故事集成。这是咸阳文学史上一次难得的清理和总结。民间艺人李登峰的

歌谣，就是在这次活动中发掘出来的。

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有神话、传说及狭义的民间故事。在历史的演化中，一些已经演变为与当地风物相关的神与半神人物，得到了流传和歌颂，如《后稷的传说》、《二郎神担山压太阳》、《女娲造人》等，显示了神的辉煌。传说，大都以人物传说为主，同时兼有史事、地方风物、风俗等各类传说。如《刘邦斩蛇》、《刘关张桃园结义》、《朱洪武杀大官》、《甘罗十二拜宰相》以及《宋伯鲁的传说》、《温纯的传说》、《孙思邈的传说》等等，都具有讲述历史事件，歌功颂德的特征。故事，有一部分是幻想故事，如《七仙女下凡》等。但大量的是现实生活故事，如长工与地主的故事，巧媳妇的故事等。还有所谓的“酸故事”，讲述男女相悦，阴阳媾合，生命繁衍等。此外还有反映世态人情的鬼狐精怪故事，有奇异幻想的寓言故事、笑话故事等，这些故事发人深思，给人启迪。

民间歌谣

歌谣，民之心声，合乐者歌，徒歌者谣。因受地理、历史、经济、民风等影响，咸阳歌谣在表达共性的“慷慨”、“深沉”的地方文化特质中，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歌谣所唱无不与当地社会历史变迁、历史人物评价、人民生活生活紧密相关。歌谣可分为时政歌、生活歌、情歌、仪式歌等。时政歌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流传于民间代表性歌谣，可看到一条比较清晰的历史轨迹、社会风貌。如写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的心态：《庆胜利》“相公娃放炮哩，‘先生’看报哩，掌柜的上吊哩。”简短三句俗言俚语，勾画出三个不同社会层次人们的心态。大跃进时代的《新民歌》：“说谎的、得奖哩，实干的、批判哩。”“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首《学小靳庄歌》：“球打赢咧，戏唱红咧，报登成咧，人出名咧，看把庄稼务成熊咧！”真实、尖锐、泼辣，有强烈的现实感，又具有冷峻的历史价值。生活歌，则从社会形态，家庭关系，特别是妇女命运、伦理道德等方面，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真实感情，给人以教化、娱乐的感受。仪式歌中“诀术歌”、“节令歌”、“祀典歌”等，是一种原始的文化遗迹。“诙谐歌”，表现了人民的幽默、情趣。谣，咸阳人称“顺口溜”，一个“溜”字，充满了随意与机巧性，最能体现口语化特色，人们感于社会变迁，人间世态，心中所想便冲口而出，说当地事，讲当地话，褒贬现实，率直亲切，易传易记。

民间谚语

谚语，是历代人民美好品德的见证和聪明智慧的结晶。伴随着人类的一切生活实践，谚语既总结了经验，又给人以劝诫和指导。谚语有明显的批判性，如：“没有泥腿子，饿死油嘴子”；“富人四季穿衣，穷人衣穿四季”；“官有十条路，九条人不知”。谚语也反映人生态度，拓展人的视野，如“与其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求土”；“富日子应有穷打算”；“芝麻虽小，粒粒出油”；“有钱的王八坐席”；“没因善小而不为，没因恶小而为之”等等，所讲的人情世故，至理喻言，褒贬皆有分寸。一些谚语哲理性很强，如“理剥千层，层层有理，有理无理，全在众人口里”，“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俭省医贫，读书医俗”。一些谚语，运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形象生动，如“有天大的窟窿，就有地大的补丁”；“理捆住人比绳还紧”；“狐狸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姜老味辣，人老经验多”；“人祸比天灾更可怕”等。在时政、事理、修养、社交中，扶正祛邪、弃恶扬善的谚语，比比皆是，枚不胜数。谚语的哲理性还表现为一种处世哲学，如“种田钱万万，作工钱后代延，经商钱三十年，衙门钱一袋烟”。与之相反，随着社会的发展，又有“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等新谚语。

新故事

咸阳新故事编讲活动兴起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当时多数乡镇农村设有故事组和故事员。如高平创作的革命故事《起根发苗》，被《人民日报》转载，引起全国轰动。后有《石头赶车》、《二舅》、《大嫂子队长》、《刘二婶》和《车走正道》等故事作品相继问世。高雨田《矮嫂坐上席》，杨继成《我的婚事》1978年分获陕西省新故事创作一、二等奖。陈念银的《奇巧姻缘》1986年获陕西省新故事调演三等奖。此外有影响的作品还有《故事员的故事》、《四川流浪女》、《吕后篡权》、《破碑记》、《打算盘》、《一罐银元》、《田军的心事》、《伟大的友谊》等200余篇。咸阳地区先后评出作品奖110个，讲出奖150个，先进代表队奖10个。到了80年代后期，讲故事活动逐渐衰落。

第二章 艺 术

第一节 音 乐

咸阳音乐历史悠远。周敬王元年（前519）吴季札观乐，称《豳风》“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秦相李斯称秦声“夫击瓮叩缶，弹箜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秦时设有乐府，广收六国之乐。《西京杂记》中记述自行联奏的“奇巧乐器”：秦咸阳宫有“铸铜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缀华采，俨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众乐皆作，与真乐不异焉。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宝饰之，铭曰璠琦之乐；玉管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鳞相次，吹息亦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瑄。”汉时宣帝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充实安陵邑。倡优、乐人“善啁戏”，故俗称“女啁戏”。隋炀帝大业年间，京邑与近郊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灯炬照地，人带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伎，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唐高宗上元元年（674）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两棚赛乐。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被谱曲后，久唱不衰。元代永寿、泾阳等县城隍庙戏楼建成，乃造歌楼。明代状元康海罢官归里后，以山水声伎自娱，歌咏、舞蹈于泉石间，达30余年。武功张炼罢官归里，亦“西堂歌舞、东山伎”，“打诨、品竹、调弦、采戏衣”。清代光绪年间，乾州、永寿社火扮故事，并有船灯、竹马、采茶、秧歌等。咸阳民间音乐主要有唢呐鼓吹乐、管子鼓吹乐和民间锣鼓乐。

唢呐鼓吹乐

据考始于汉献帝初平年间（190-193），从新疆传入秦地。清末民初，彬县、长武、旬邑等县曾有官办乐班，专为县衙“开印”、“封印”，以及迎送、宴会助兴服务。建国后，多数县区只在“白事”仪式中应用，但彬县、旬邑除在“红”、“白”二事之外，还在喜庆节日，送子参军等活动中吹奏助兴。

据 1955 年统计，全区唢呐鼓吹乐班共有 300 多个，从艺人员达 2100 余人。其中著名乐班有：乾县长留乡乐楼店的刘家乐班，兴平冉庄乡西堡子的龚家乐班，淳化官庄乡北张村的张润民乐班，彬县西坡乡甘津头村的程富贵乐班，旬邑郑家乡的周家乐班，底庙乡的周凤梧乐班等。著名艺人有乾县刘家乐班的刘振全、刘振海、旬邑周家班的周东及其传人周拴娃和周凤梧乐班的万忠院等。1955 年陕西省第二届民间艺人演出观摩大会，刘振全以唢呐双吹《雁落沙滩》荣获乙等奖。1957 年陕西省第三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龚奎率弟子 7 人，演出唢呐咪戏《哭道情》，获大会音乐集体三等奖和个人奖。刘振全被大会推选为评委，他的演奏同时获音乐集体二等奖和个人奖。周东与潘进喜等三人表演的《雁落沙滩》，获音乐集体一等奖，周本人获音乐一等奖。1982 年，咸阳市第一届秦都音乐会上，万忠院海笛独奏《十对花》获二等奖。1985 年陕西省民间音乐征集办公室编选出《万忠院》唢呐演奏曲集专卷。

唢呐鼓吹乐，分为“行乐”与“坐乐”两种表演形式。行乐主要用于迎送宾朋和送葬，坐乐则用于家庭礼棚的祭吊和坟茔的礼拜，以及晚辈的专点曲目演奏。曲目来源有古典的《海青拿鹅》、《三麻楷》、《刮地风》、《雁落沙滩》和《水龙吟》等，有来自民间的《祭灵》、《吊孝》、《抱灵牌》，各种大小《开门》等；还有来自民间歌曲的《十月花》、《十二月忙》、《十对花》、《哭长城》和《绣荷包》等。南部九县区经济交通发达，文化交流频繁，演奏风格细腻秀逸，绚丽流畅，以兴平龚家班，乾县刘家班尤为突出。泾阳演奏缠绵幽怨，苍凉悲峻，独具一格。北五县演奏风格古朴雄浑，遒劲峭拔，尤以周凤梧乐班兼收并蓄，对陇东一带影响深远。其传人万忠院的海笛演奏潇洒明丽、泼辣清新。淳化张润民、赵玉洁等以音高速度快、气足“喷子硬”，影响三原、耀县一带。唢呐乐曲大都是由传统曲调加工发展而成，加花变奏或以多种变化手段扩大乐段结构，集多种曲调构成一曲的创作方式进行，总体剖析不外单曲和套曲两种结构。小型乐曲属“单曲”，大型乐曲如《三道令》属“套曲”。《拿鹅》、《刮地风》、《三麻楷》等传统乐曲，明显存有汉代歌舞大曲的曲式结构痕迹。

管子鼓吹乐

古代流传于长武、彬县、旬邑等地，而今仅存长武有活动的乐班共 4 个，艺人不足 20 位。管子来源于古代西域少数民族，管子吹乐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长武管子乐，是以民间道士所组成的乐班，为民间“白事”做“道场”，为死者超度亡灵，自古至今，流传不绝。

演奏方式，常以两支管子为主，配有柳笛和笙，打击乐有鼓、渔鼓、铙、钹、小钗、三雷锣、甩铃、星、木鱼等道教乐器。演奏者有固定的服装、顶冠和佩饰，并有严格的演奏场所和设置。在野外演奏要有斗牌、灵牌、幡杆、法坛和天桥。室内要设置经堂和奠棚。演奏形式分行乐、坐乐、舞乐三种。行乐是一人执鼓一人执锣，二人吹管，一人执铙兼吹笛。击乐在前，管乐随后，成单行纵队，边吹边打。坐乐在灵前、经堂、法坛、奠棚上下演奏。舞乐是在分灯、转碟倒坛等过程中伴奏。先奏击乐，管子随经韵而起，道士则云步起舞，走倒八字形，由慢渐快，按章而行。其后跑圆场，状如龙摆蛇缠，变队形穿插有序，时起时伏。在快速舞蹈中，油灯随手翻转，或抛向顶空，或左右旋转，灯动而油不洒，灯不灭。当然，这一鼓吹乐，带有迷信色彩，如何推陈出新，尚待音乐工作者探讨研究。

民间锣鼓乐

各地广为流传，建国前称为“社”或“同乐会”。建国后则由各县区村委会承办。比较突出的有秦都利民锣鼓队，渭滨乡锣鼓队；兴平大阜锣鼓队；永寿监军锣鼓队，城关西村锣鼓队；乾县大王、姜村、梁村锣鼓队；淳化润镇锣鼓队等。尤其是咸阳市秦都利民队之牛拉鼓民乐技艺，因鼓面大，鼓壁高，置牛车之上而得名。所奏《什样锦》套曲久负盛名。据1955年统计，全市锣鼓队多达1000余个，演奏人数逾万名。著名艺人和曲目有秦都利民锣鼓队鼓师郑春寿父子演奏的牛拉鼓《什样锦》，兴平桑镇锣鼓队鼓师赵俊明演奏的《凤凰单闪翅》，大阜锣鼓队鼓师高教养演奏的《十面埋伏》，永寿监军锣鼓队鼓师南俊彦演奏的《五样》，监军西村锣鼓队鼓师王开元演奏的《鼓乐》，淳化润镇锣鼓队演奏的《赛鼓》等曲目，质朴真切，俊芳明丽，激越劲健，深沉豪放。秦都利民锣鼓队的牛拉鼓——《什样锦》，在1957年陕西省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鼓师郑春寿与集体均获嘉奖。1958年、1959年两次参加省上庆祝性演出和大型火花芯子调演。1982年还被陕西省民间歌舞集成办公室专门录像，电视台播放。

民间锣鼓乐，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如牛拉鼓由过去牛拉车改为大卡车运送，由于车身宽敞，为鼓师提供了翻身、跳跃、击节、摆槌等施展技巧的条件，便于与车下众多演奏者亮铙、举锣、转身、变化队形，互相呼应。同时鼓师舞姿造型亦有创新，如张飞舞鞭、猛虎扑食、金蛇狂舞、白鹤展翅等几十种舞姿，都是经提炼加工而成。游行乐队少则五六十人，多的可达四五百人，而且讲求服饰花色，配乐效果，男女穿插，注重表情步伐。民间鼓

乐无谱可循，均以师承传授“锣鼓经”，集演奏与伴奏锣鼓于一体，既可独立演奏，又可为社火、舞蹈伴奏。大型民间锣鼓乐多是套曲结构，中型是回旋曲体或三段体，小型则是一段体添花加点的自由反复。如秦都牛拉鼓的《什样锦》，就是由“三起三落”、“杀鼓头”、“单惊鸟”、“干鼓头”四个鼓头和四环花样“单劈”、“单槌”、“单过桥”、“双铃”及两个主调“干鼓翻”、“四季花”等10段子组成。四个鼓头可由鼓师选择，即兴带领乐队演奏，下可接四环花样的任意一个，最后与主调“下鼓翻”或“四季花”续奏。这样头可变、环可变、主调不变，在变化中不断翻新，引人入胜，妙在其中。再如淳化“赛鼓”，或称老鼓，以“九点十三翻”的打法而著名。九点是“赛头”、“滚绣球”、“硬三翻”、“软三翻”、“双击边”、“三点锣”、“双采头”、“单采头”和“三步头”9个乐段组成。此外又加共用乐段“鸭子拌嘴”和“小翻”。演奏时依其顺序，将“小翻”插入，并在“滚绣球”、“三点锣”、“双采头”之后，必须加“鸭子拌嘴”，依次结合，共13个乐段，演奏13次，每次称为一翻。

咸阳民间音乐藏量丰厚，经文化部门普查搜集整理，采录器乐班社230多个，艺人2220余人，器乐曲809首，其中记谱整理571首，成册资料202册，图片242幅，艺人小传、介绍24篇；释文17篇，注释77条，其他文字资料2.5万字。精选唢呐鼓乐曲96首（套），管子鼓乐曲4首，锣鼓乐曲10首（套），共计达110首（套）。

第二节 舞 蹈

咸阳舞蹈历史悠久。市郊杨家湾汉墓出土的“三千兵马俑”，就有指挥俑和乐舞俑。乾陵、茂陵和昭陵出土的大量骑乐俑、舞俑及舞蹈壁画，造型准确，形象生动。彬县大佛寺唐代石雕、飞天，舞姿飘逸，栩栩如生。三原城内明洪武八年（1375）建造的城隍庙照壁上的“鲤鱼跳龙门”、“苍龙训事”等砖刻浮雕，舞蹈造型优美逼真。长武昭仁寺清咸丰七年（1857）铸造的铁钟上有八卦图案，钟身铸有“日、鱼、水”图案。为研究龙舞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民间舞蹈是伴随本地民俗活动而开展的。据《东周列国志》载：“秦俗，农事毕，国中纵倡乐三日，以节其劳。凡百戏任人陈设，有一长一艺人所不能者，全在此日施逞。”两千年前的古代百戏，就是现今社火的前身。《咸阳县志》又载：“春节元日祀六神，戚友相拜，以食互遗。上元昼作社虎柳木腿诸戏，夜则张灯作竹马竹纸船各戏，金鼓喧阗，举国若狂。然亦古雉

之遗。”《谷梁传》云：“五谷皆熟为有年”，过年或重大节日，各县乡组织“同乐会”、“农乐会”、“庙会”、“古会”等多种形式，操办社火，自娱同乐。建国后，民间舞蹈形式如锣鼓、社火、跑旱船、竹马等，有盛无衰，不断发展。除农村外，各工矿企业俱乐部，亦于重大节日上街演出，增添喜庆气氛。

民间舞蹈有两种风格：一种热烈粗犷，豪迈矫健，如《牛拉鼓》、《牛斗虎》、《鱼龙变化》，动作幅度大，节奏强烈，气势磅礴。大多分布在南部平原地区，由于场地宽坦，大道纵横，能适应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表演。另一种细腻含蓄，风趣幽默，乡土气息浓郁，如《地故事》中的《夫妻扬场》、《捉蚰蚰》、《打酸枣》、《拉骡驴》等。这些舞蹈动作幅度小，以“蹶蹶步”为基本步调，上身、手臂随节奏自由摆动，演跑各种环形图案为主，这类舞蹈以北部五县为主，大都以反映劳动生产为背景，喜剧意味较浓。

咸阳市广大农村还流传着一种宗教祭祀的民间舞蹈，如《马角》、《肩鼓舞》、《醮师分灯》等，它是古代“驱雉”礼仪的延续。如兴平《八斩》，是一组恐怖气氛的舞蹈造型；三原《十八罗汉》则是体育杂技性的舞蹈，以跑队形、做造型为主。其他如“立娃罗汉”、“蹬瓮”、“叠罗汉”、“过天桥”等造型都具有惊险性的技巧特色。建国后的扭秧歌、打花鼓、腰鼓，盛行一时。80年代的“迪斯科”、“柔姿舞”颇为风行。咸阳民间舞蹈，共有54个品种，其中《牛拉鼓》、《鱼龙变化》、《十八罗汉》、《子母船》、《拉骡驴》、《贼打鬼》、《捉蚰蚰》、《打酸枣》、《赶女》、《蛟龙转鼓》、《牛斗虎》、《八斩》、《肩鼓舞》、《醮师分灯》等40余个节目，均有现场录音、摄影、录像，有照片千余幅，录像带840种。

建国后，老解放区的秧歌、打花棍、腰鼓舞传入城乡，活跃非凡。1951年后，“交谊舞”在城市机关、学校开始流行，课间休息时亦组织学生表演。1960年后“友谊舞”在工人文化宫开始兴起，参与者多属机关干部、工厂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三忠于”活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忠”字舞，挤占了舞台。70年代，各地重视少儿舞蹈，幼儿园、小学校普遍开展比赛活动。咸阳儿童歌舞剧《会摇尾巴的狼》参加地区歌舞会演，获创作一等奖，演出二等奖。市艺术馆陈菊珍编创的《鱼龙情》，1984年获全国轻纺系统文化调演一等奖，1985年获国防工厂文艺调演创作和演出一等奖。1987年市群众艺术馆举办首届“青年现代舞”大赛，选手有300人参赛。1989年陕西省少儿歌舞创作评奖中，咸

咸阳市民族民间舞蹈统计表

表 3-1

地 区	舞 蹈 形 式 及 名 称
市 区	狮子、龙灯、竹马、旱船、高跷、牛拉鼓、绑绞舞、云朵子、抢板凳、腰鼓、跑驴、二人摔跤、莲花仙子、织布机、小放牛、猪八戒背媳妇、芯子、虎手勾、五虾闹鲢鱼、打花棍（霸王鞭）
兴 平	狮子、龙灯、竹马、牛斗虎、腰鼓、旱船、蚌舞、马灯舞、小车、马角、八斩
武 功	狮子、龙灯、旱船、竹马、腰鼓、芯子
杨陵区	狮子、龙灯、旱船、竹马、腰鼓、芯子
三 原	狮子、龙灯、七巧图、轱辘灯、挑芯篮、扑蝶、旱船、子母船、大头娃、十八罗汉、魃变化、花鼓
泾 阳	狮子、竹马、推小车、纸台、扑蝶、旱船、地故事、霸王鞭、地圈子、拉翠驴、贼打鬼、大头娃、和尚戏柳翠、刘海捉蟾
乾 县	狮子、龙灯、旱船、花鼓、竹马、小车、转鼓、马故事、平台故事
礼 泉	狮子、龙灯、旱船、竹马、甩纸花、拉翠驴、小车、独杆轿
永 寿	狮子、龙灯、旱船、甩纸花、拉翠驴、小车、独杆轿
彬 县	狮子、龙灯、旱船、竹马、蚌鹤相争、亭子、高跷、二鬼打架
长 武	狮子、龙灯、旱船、竹马、蚌舞、亭子、高跷、地故事、大头和尚戏柳翠、张公背张婆、醮师分灯、肩鼓舞
旬 邑	狮子、龙灯、旱船、竹马、蚌舞、高亭、背亭、高跷、赶十五、赶女、夫妻扬场
淳 化	狮子、龙灯、竹马、大头娃、高跷、背亭子、旱船、捉蟾蚩、五女逛会、娃拜年、打酸枣

阳市吴静编舞《拾麦穗的姑娘》获创作二等奖。1990年市文化局主办的“咸阳市民族民间音乐舞蹈大赛”，有10个县区400多名演员参加，舞蹈节目20余个。优秀节目有旬邑乐舞《孟姜女》、《秦王出征》，渭城舞蹈《螃蟹舞》，彬县《花枝伞》，三原《抬花轿》，兴平《桃花舞》等。

第三节 杂技曲艺

咸阳杂技艺术源于民间。咸阳、兴平一带广为流传的“高跷”、“狮子

舞”、“芯子”等节目均属杂技种类。这种表演艺术技巧性较强，逐步形成了杂技专业。建国以来，各县区杂技班社逐步变成职业性的演出团体，其中颇具盛名者当属兴平县杂技团，演出节目有杂技、马戏、魔术、飞车走壁等，还有乾县、武功等县民间杂技团，节目多，技巧精，远至湖南、广东等地演出，受到观众好评。

兴平县杂技团原名“西北同义马戏团”，1960年4月由兴平县接收，易名“陕西省兴平杂技团”。时有演职人员70余人，演出节目有武术、狮子舞、双爬杆、顶碗、高台赛车等40余个。1973年在武功机场为巴基斯坦飞行员演出，1974年在咸阳为坦桑尼亚、越南、朝鲜、老挝等国来宾专场演出。同年在青海演出，还被电视台录像、报纸报道。1976年在西安庆安公司、革命公园等地为外宾作专场演出。1980年变舞台演出为地面演出，增添了传统魔术和飞车走壁节目。1981年被陕西省文化厅命名为“先进集体”，并由电视台两次现场直播。1988年改为大篷演出，以杂技为主，兼插音乐歌舞，受到群众欢迎。1989年演出节目有走钢丝、高车踢碗、杂技、口技、水火流星、秋千飞人等。1990年在咸阳市杂技曲艺小品大赛中，《高台赛车》获一等奖，《水碗》获二等奖，《蹬梯》、《空中飞人》获三等奖。王荣兰、王新利获演员一等奖，姚长江、王云利获二等奖，王群获三等奖。同年7月还为日本奈良友好城市少年访华团专场演出，博得好评。

乾县民间杂技团，是由铁佛乡青年农民组织起来的杂技班社，开始只有六七人，活跃于农闲季节。后来发展较快，至1990年已有28人，设备道具亦较齐全，一些节目质量达到专业水平，剧场广场均能表演。杂技有空中飞人、空中变鸽、车技、扛杆等20多个。武功王飞魔术班社，有2至5人，主要节目有魔术、口技，如百鸟朝凤、阅兵、炮头轰鸣等，多次参加会演，受到观众好评。

咸阳曲艺，早在战国后期已经出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优旃在世并讽刺秦始皇。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言笑。始皇议欲大苑囿，东到函谷关，西到雍陈仓。优旃笑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见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可称史载最早的滑稽说谏曲艺。汉代，经过“文景之治”，人民生活安定，民间乐舞、杂技、说唱艺术蓬勃兴起，出现了百戏繁荣的时代。官方成立了专门管理机构，收集整理这类民间艺术。今在汉茂陵出土的彩塑侏儒俑，就是说唱艺人。说书与小说的兴起是相关的，这些艺术形式，以表演戏谑、滑稽为主的

俳优、侏儒，形成说、逗、唱兼备的曲艺最早雏形。

曲子，始于隋唐。唐时，以科白、逗趣的“参军戏”，形成当时以唱为主和以说为主的几种演唱形式。明正德元年（1506）武功状元康海因刘瑾事株连，罢官归里，沉溺山水，以歌咏自娱，为发展本地戏曲、曲艺开创了新局面。据《明史》载：“海与九思同里、同官、同以瑾党败，每相聚汧东户杜间，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佛郁，九思常费重货购乐工学琵琶，海掐弹尤善，后人传相仿效。”康海散曲主要收集在《汧东乐府》一书中，集小令套数 296 首。书中有些作品如《叹世情》等，至今仍在民间流传。清末，王敬一有曲艺专著《羽衣新谱》，是作者在武功时成书。此书共收集曲子 223 篇，汇书 5 卷，使用曲调 76 个。书中序、跋、评文达 14 篇之多。该书始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终于宣统元年（1909），西安公益书局出版。建国后，咸阳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外来人口增多，文化交流频繁，繁衍了新的曲种。50 年代初咸阳城区就有和平茶社、同和茶社、群众茶社和二支书棚等曲艺演出场所，演出曲种除本地的曲子、道情外，还有外来曲艺评书、相声、坠子、河南曲子、山东快书、快板书、渔鼓、荷叶等。这些曲艺短小精悍，讽刺诙谐、风味浓郁，受到群众喜爱。三原民间快板艺人谢茂恭配合宣传《婚姻法》、抗美援朝等运动，编写快板，进行宣传。咸阳文艺改进组，也结合“三反”、“五反”、慰问志愿军伤病员，走上街头，义演宣传。50 年代后期，茶社停办，曲艺班子解散。十年“文化大革命”，艺人受迫害，亦无演出场所。80 年代，礼泉刘志鹏，利用当地地方戏曲中的“数叛”（亦称“数罗汉”）吸收山东快书的艺术形式，创造出新的曲种——陕西快书。一般由一人演出，表演者手执竹板或四页瓦，边打边说。有时也由数人同演，以唱为主，间以说白。唱词长短不一，可以一韵到底，也可采用花辙，曲目都是短篇。1983 年崔存根的快书《都怪我》，姜德华的相声《老院长》，张廉的快书《钱》均获陕西省文化局曲艺会演三等奖。1987 年姜德华《传统曲子汇编》获省文化厅收集整理奖，1992 年相声《保密与泄密》获文化部、广电部、国家保密局三等奖。

第四节 书画摄影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实现“书同文字”，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三人对长期来已经在演化着的大篆文字的字形结构、笔画走向作省改，削繁就简，分别写出《苍颉篇》、《爰历篇》和《博

学篇》三个小篆样本字书，做到字形规矩，走向匀称，偏旁部首统一，然后由秦王朝把官方统一的标准文字以法令形式推行到全国去，从而取代了六国文字。秦宫殿一号遗址出土的陶文 259 个、84 种，便是秦代推行小篆和大力提倡隶书的物证。汉代曹喜工篆隶，“善悬针垂露，后世则之”；徐干擅长章草，班固称其“笔势殊工，知识读之，莫不叹息”。苏班 5 岁能书，甚得徐干赏识。汉代兴平人庞人显，工书法，所书《清净濩命得道经》，现存西安碑林。北周的窦庆，袭封陈公，“有姿仪，性和厚，工草隶”。礼泉昭陵碑石众多，有初唐欧阳询书温彦博碑，字体开朗，骨气劲峭，法度严正；有王知敬书李靖碑，笔力韵秀，恭正有力；有褚遂良书房玄龄碑，书法秀逸柔婉，笔力丰满，又微参以隶书，别创一格；有殷仲容书马周碑，赵模书高士廉碑等，这些碑文反映了初唐各流派的书法艺术。近年出土的李孟常碑、吴广碑、周护碑，碑石完好，字迹秀丽。唐俭碑、唐嘉会碑，代表了盛唐书法风格，而且反映了唐代书法从瘦硬向肥厚的发展。长武《昭仁寺碑》为欧阳询书，记载了“义士勇夫，捐身戎阵”的情况，现存大殿前。唐武功人苏廷芝“行书有二王法，当于徐浩行”。三原温可象，书画名重一时。宋代彬县人陶谷，《宋史》称其“多蓄书法、多画，善隶书”。张舜民亦善书，后人评其用笔“兔起鹘落，动静有致”。明代杨震州（彬县人），被誉为“诗、书、画三绝”。清代咸阳书法人才济济，魏毓翁（咸阳人）工书画，程一敬善书法。谢文华，善擘窠书，关中各县及省城商号牌匾多出自他的手笔。兴平人赵可台、王纲、付嵩尤精汉隶小篆。清末关中理学领袖人物之一的三原人贺瑞麟，书艺宗法于颜，深得其奥，楷书结构严谨，行草运笔浑厚敦实。临潼华清池乐善亭石碑，为他于清光绪四年（1878）所书。其子贺伯箴有为“三·一八”死难烈士张仲超表书石和其父的墓志铭书石。三原人数理学家李寿亭，楷书笔力刚劲，结构紧密，三原博物馆存有他书写唐王维《送张少府诗》条幅。礼泉人宋伯鲁，书宗魏晋，尤工小楷。现代书法巨匠于右任（三原人），早年精研六朝碑版，工行、楷，后致力于草书研究改革，其草书融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雄浑奇伟，仪态万千，创中国书坛上著名的“于体”，《李雨田先生墓表》、《王陆一墓志铭》和《标准草书》是他的代表作。他的墨迹遍布海内外，被誉为“一代书圣”，其狂草为稀世珍品，丰富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三原人茹欲立，著名书法家，据《宝凤阁随笔》介绍他“精研汉事例，喜临玩碑版”，功力深厚，笔笔不苟，字字质朴，墨迹或碑石，篇篇恭正。于右任伯母《房太夫人行述》墓碑是他所写。民国时期，三原修建临履

桥和维修古龙桥记事碑，均系他撰文并书石。泾阳人周伯敏，曾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受舅父于右任熏陶，笔法刚劲有力，流畅秀丽，在全国享有盛名。何天恩（泾阳人）书法以行、草见长，尤其是大写行、草，激情奔放，刚劲苍老，曾为李仪祉书匾额“功在万民”四个大字。

建国后，咸阳地区书法培训、展览活动空前活跃。各地艺术馆、文化宫、俱乐部经营开设举办书法美术学习班、讲座、作品讨论会，并举办展览。1978年“秦岭书画会”成立。1980年咸阳中国画院成立，相继举办书画展览。1984年7月，有9幅美术书法被陕西省送北京参加全国六届美展。同年三原县还举办于右任诞辰105周年书法展。1986年7月市文化局举办“全国十二明星城市书画展”，展出作品178件。1989年9月咸阳市中国画院主办的咸阳风物画展在北京中国画院展览馆展出。1990年9月市文化局、文联、工会联合举办“咸阳百家书画展”在西安美术家画廊展出。

绘画艺术不仅与书法水乳交融，而且和雕塑、篆刻、工艺美术相得益彰。秦咸阳宫遗址出土的壁画，风格健朗，反映了秦代绘画艺术特色。秦瓦当，纹饰丰富多彩，篆字挺健。汉代绘画、雕刻高度发展。咸阳博物馆藏玉马、玉狮、玉熊，琢磨精细，光泽柔和，为稀世珍品。汉三千兵马俑，造型逼真，形象生动。茂陵“竹节薰炉”，龙体鏊名，鳞甲灵动、体态矫健。汉墓出土陶俑，人物传神，神态各异。茂陵石雕，气势雄浑，风格纯朴，刻画真实，手法洗练，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一批石雕艺术珍品。彬县大佛寺造像，刀法平直，质朴凝重，窟内衬托雕刻飞天和舞伎，仙袂飘举，婀娜多姿。唐乾陵壁画，内容丰富，反映了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绘画技巧娴熟，形象生动。《打马球》、《观鸟扑蝉》、《客使图》、《狩猎出行图》、《仪仗出行图》，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的珍贵史料。三原唐献陵石雕犀牛，以整石刻成，手法大刀阔斧，风格粗犷，线条简练，形态逼真。礼泉唐昭陵的石刻“昭陵六骏”，举世闻名。其中飒露紫浮雕中，丘行恭作侧立状，面容削劲，马头下垂贴近丘行恭，三腿直立，后腿微曲，双目深沉，似在忍受着拔箭的剧烈疼痛。这幅作品采用高浮雕手法，人马半面突出，细部几近镂雕，肌肉突出，使人和马各具不同质感，神形兼备，艺术品位极高。咸阳顺陵石刻立狮，威武壮观，异常精美生动，尤其是高高突起的健壮胸肌，有强烈的坚实感。天禄（又名独角兽）头似鹿，身如牛，头顶有一弯曲独角，有双翅，翅上雕有卷云花纹，足为蹄，尾垂与石座相连。体形高大，为唐代石刻中的上乘之作。宋代彬县人张舜民《跋百子诗画》，对后世影响颇大，不

惟“善山水，精题评”，且于画论多有建树，主张“诗画致一”，提倡“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被誉为诗画艺术的金科玉律。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彬县人杨云峰，亦善山水泉林，有《石龙窝写生》、《蒲谷雪夜》等佳作传世。旬邑唐廷铨墓石碑、泾阳安吴堡坟莹石碑楼，雕工精细，气势宏伟，有戏曲故事、民间传说内容，生动逼真，形象感人，实属难得的艺术精品。近代礼泉人宋伯鲁，诗、书、画造诣极深，时人誉为“三绝”。他的山水、花卉作品典雅清秀，自谓“作画如弹琴，必有弦外音，其指法始妙，作诗必有句外音，其意境始高”。

建国后，咸阳市美术活动比较活跃。50年代初期，市、县文化馆陆续建立，馆内成立美术组，辅导美术创作，举办美术学习班、讲座、作品研讨会和改稿会提高作者创作水平。1957年以后，美术创作为政治服务，提倡“写中心、唱中心、画中心，时时事事为中心”。1962年成立了“咸阳市职工美术组”，成员有40余人。同年省美协在咸阳举办画家康师尧画展，展出《公社鸭塘》等百余幅作品，还举办了康师尧美术讲座。1963年余仲志水彩画展在咸阳展出。1972年地区文教局举办首届“咸阳地区国画展”，1974年5月文化局举办“地区农民画展览”，展出作品200余件。1976年举办“地区农业学大寨美术展览”，在旬邑开办剪纸美术学习班，创作作品500余件。1979年文教局在永寿召开民间美术经验交流会，陈列展品2800余件，并推广旬邑、永寿、淳化等县经验。1982年组织儿童画展，送省参展作品200余件，其中有54件获省优秀奖，12幅送北京参加“全国儿童画展”。1984年举办美术观摩评比活动，评出39幅作品送省六届美展办公室，9幅作品送京参加全国六届美展。张水意创作永乐宫壁画《朝阳图》还赴美国展出。1986年前后，温友言个人书画展览在全国各地举行，并曾赴美国、东南亚讲学并展出，海内外电视、报刊媒体多有报道。其所出版《中国美术史稿》、《书学导论》等，从理论上阐述了作者的艺术思想和艺术主张。

建国前咸阳地区仅有三家私人照相馆，各县也只要一两家，主要拍摄人物肖像。建国后，各县文化馆逐步配备摄影干部，辅导群众的摄影艺术活动。50年代，市县文化主管部门多次举办摄影展览，培训人员，促进、繁荣摄影事业。1971年专署文教局首次举办全区摄影展览。1982年，地区文化局举办农村文化摄影人员学习班。1984年4月，市文化局举办庆祝建国35周年书画摄影展览。1986年秦都区承办“西安、咸阳、宝鸡、铜川、延安、汉中六市职工摄影展”，“魏少云从影30年回顾展”，“田园黄山风光摄影展”和

“振兴秦都摄影展”。1989年雷计东摄影作品在国际尼康大赛中获铜牌奖。1990年陆康宁摄影作品参加《全国十六届摄影展览》获银牌奖。安克仁《咸阳的考古发现》被评为新华社优秀新闻照片，并参加第三十届荷兰世界新闻片比赛。

第五节 民间美术

咸阳民间美术，内容丰富，历史悠久。不仅有花鸟鱼虫、风景名胜、动物情趣、装饰图案、历史故事、民俗传说、戏剧人物等等，而且历经沧桑、广为流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地方特色。除具有古朴、粗犷、深厚的特点及富于装饰性外，且造型美观、线条精细匀称，蕴含幽默和趣味，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流传于旬邑、永寿、兴平、秦都等地的剪纸艺术，瑰丽多姿，久负盛名。1980年后，旬邑县先后举办剪纸学习班6次，发展重点作者113人，收集作品近万件，存档资料3000幅。1983年，省群众艺术馆出版了《咸阳剪纸》专刊。1984年秦都区举办了《首届民间剪纸艺术展览》，展出作品400余件。1986年5月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市文化局、旬邑县政府联合举办“旬邑民间美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共展出该县20多位剪纸能手的250幅作品。尤其是库淑兰彩色剪纸，以其独特充实的造型，浪漫尽情的装饰和饶有风趣的民谣相结合，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其作品先后赴法国等国家展出，本人荣获“民间艺术大师”称号。1990年咸阳市“民间剪纸理论研讨会”召开，并评出一等奖3篇，二等奖5篇，三等奖7篇。同年10月秦都区、渭城区张桂英、丰金凤，在省妇联举办的“民间剪纸展览”中，分别获得一、二等奖。其他如长武赵秋娥、永寿张彦娥、方兰英、高翠平都获省级奖。兴平张义和的剪纸作品曾多次见诸报端。咸阳市农村剪纸内容多是五谷六畜十二相，多子石榴，骑虎胖娃等，寓意祈求平安、夫妻美满、家庭和睦、老幼安康。剪纸一般都贴帘花、顶棚，作刺绣纸样和赠送亲友。

刺绣是民间妇女一项劳作，古称针工，俗称扎花。讲究图案精美，配色协调。刺绣品有帽、鞋、鞋垫、袜底、裹肚、被单、床围、枕头、枕套、香包及兔、狗、猫、虎等小巧玲珑的布玩具。结婚洞房用物如门帘、枕头、床围无不精心绣成。孩子满月、过岁，更是绚丽多彩，五毒坎肩、动物刺绣，栩栩如生。广大农村妇女农闲之余，多刺针工，刺绣能手到处皆有。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刺绣已由传统手工转向缝纫机生产，不论城市或农村，每

逢集日，门帘、床单、电视机罩、洗衣机套等刺绣品，正以商品形式走向市场，丰富着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花馍，即用面团捏塑人物、花鸟虫鱼，蒸熟后涂上红绿色素。花馍作为礼馍和供品形式出现，源于古老的阴阳观和周礼传承风俗。长武春节用状似猪羊的花馍供献、祭祀神灵和祖先。元宵节用状似十二属相的花馍，互赠亲友，俗称“牛犊”。秦都区钓台乡一带群众制作“九月花糕”，富有地方特色，除手工捏制外，还使用木梳、剪刀等简单工具。花馍白如雪，叶如碧玉，果红似玛瑙，色香味俱全。据《咸阳县志》载：“春节元月祀六畜，戚友相拜，以食互遗。”此风俗世代沿习至今。

第三章 戏剧

咸阳戏剧，源远流长。据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观“俳優角抵之戏”。至秦末，东海人黄公善为术，能立兴云雾，坐成山河。“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西京杂记》）唐歌舞与“百戏”融合发展，梨园、教坊更有专业队伍。元代戏曲活动有盛无衰，一批戏楼相继建成，演事兴盛。其时咸阳有著名演员卢纲，被誉为“元知音善歌之士”。杂剧散曲作家群中还有邠州的孙周卿。此时咸阳有了以行院或家庭为单位的戏曲班社。“秦腔”名称正式出现在明朝中叶，明万历年间传奇剧本《钵中莲》有“西秦腔二犯”唱调。据史料记载，武功县1978户中，乐户达9户。对戏曲作过重大贡献的康海（字对山），即家居武功。他“自定黄钟而用，宣以五音”，“立盟艺苑，垂四十年”，“康家班”演出剧目有《中山狼》、《王兰卿》等杂剧。同时“华庆班”也是在康海支持下建立的，在关中名噪一时。李开先《康海传》记，他多次主持武功东岳庙赛会。有时竟能集乐工千余人，他开创的“康王腔”，对秦腔的发展功不可没。清代戏曲家李调元赞曰：“康王腔”，真秦腔也。经过明代的艺术实践，秦腔在杂剧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一个新的戏曲剧种。明末清初，秦腔已在咸阳、武功、周至、户县等地，确定了高亢激越、古朴苍劲的艺术风格。清代秦腔蔚为大观，咸阳各县农村广为流传。每逢庙会必演秦腔戏，此时演出班社众多，人才辈出，著名演员有

豌豆花、金坠子、双儿、党甘亭、张银花、韩吉祥等。民国初年艺坛红极一时的袁璧辉，名震陕甘两省的有“二楼子”、李范，秦腔班社“锦绣班”、“清华学社”、“唐家班”、“王红班”、“雷家班”、“得胜班”等数十个，戏楼500多处，秦腔昌盛可见一斑。

清中叶弦板腔、阿宫腔出现并流传于渭北诸县。本地二黄由汉中、安康流入，活动于三原、泾阳一带，至40年代二黄绝迹，阿宫腔流入富平等地。抗日战争时期，咸阳作为大后方曾接待不少外地剧种、剧团演出。原国民党三十六军创办的京剧团，在咸阳、泾阳、三原等地活动，刘凤兰的评剧团风靡一时，著名蒲剧演员王秀兰、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都多次来咸阳演出。

咸阳北部各县部分地方，是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辖地，为宣传抗日，一批革命的艺术团体应运而生。先后有“七月剧团”（1938）、“关中剧团”（1939）、“关警剧团”（1940）、“西北剧团”（1940）和“八一剧团”等。这些革命文艺团体演出了大批革命剧目如《穷人恨》、《血泪仇》、《白毛女》、《刘胡兰》等等。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坚持自力更生，服务群众，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遵照中央戏改政策，清除禁演剧目，接管旧班社，教育旧艺人。50年代初各县均成立新的戏曲团体，并先后办起戏剧学校，专门培养艺术人才。1956年陕西省首届戏剧会演，咸阳人民剧团演出的《丰乐园》，三原新艺社迷胡《中秋之夜》，咸阳豫剧团《西厢记》，泾阳剧团《藏舟》和兴平剧团迷胡《迎春花开了》都分别获剧本、导演、演员奖。1959年乾县将弦板腔搬上舞台，新排《紫金簪》参加省地方戏会演，受到好评。1960年全省青年演员会演，咸阳代表团参演的《十三姐妹闯三关》、《假恹惶》、《三滴血》、《满堂红》获集体奖，马友仙等41名演员获表演奖。60年代新创作现代戏《赵梦桃》（人民剧团演出）、《第一个浪头》（大众剧团演出）、《秦川儿女》（礼泉剧团演出），在省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剧团大都改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剧目多为“革命样板戏”。不少老艺人被批斗，古装戏箱被烧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咸阳戏曲再现生机。1979年地区戏剧调演，《紫金簪》、《连心锁》、《赶花轿》、《党的女儿》等15个剧目获奖。1987年，举办《咸阳杯》西北五省区电视台秦腔戏大赛，荧屏展现一月有余，盛况空前。1989年陕西省第二届艺术节，咸阳参演的《丹青泪》、《女皇与公主》、《琵琶公主》获银奖。《尚书背绢》、《霍去病》、《苏武》、小戏《借年》、《四贤册》亦获陕西省艺术节奖。

第一节 剧种

秦腔

又名乱弹、桃桃子、梆子腔。属板式变化体音乐结构的板腔体。为咸阳主要剧种，秦腔以关中方言语音为基础，特别是泾河、渭河流域诸县的语音发声为“正音”。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载：“元知音善歌者，三十六人中之首者卢纲，咸阳人，音属宫而杂商，如神虎之啸风，雄而且壮，为当时之杰。”演员吐字以泾阳、三原语言为“标准”。据载明代中叶咸阳就已流行秦腔，武宗正德五年（1510）武功康海组建戏班，演唱“康王腔”。清康熙年间（1662-1722），咸阳的秦腔班社已为数众多，如保符班、江乐班、华庆班、双才班等。乾隆时期（1736-1795）翰林院学士严长明（江苏人）宦游陕西，酷爱秦腔，所著《秦云撷英小谱》记载关中秦腔班社共有36个，并以礼泉、周至、渭南、大荔为四大流派。秦腔班社演出，不仅为当地人钟爱，赴北京演出亦受欢迎，被称为“传情在无意之间”，“哑趣传神许擅长”。此时，演员白双儿、豌豆花和金坠子等随泾阳锦绣班演红西安城内。1912年，李桐轩、孙仁玉、范紫东和高培支等人，受辛亥革命影响，办起“易俗社”，并编写出《一字狱》等剧本。咸阳各县以“易俗社”为榜样，先后成立了“高兴班”（长武），“马家班”（武功），“秦贵社”（礼泉），“益民社”（咸阳），“晓钟社”（乾县），“新中社”、“明正社”（三原）等演出团体。1937年中共陕西省委（驻泾阳县云阳镇）、关中工委（驻旬邑县马家堡），相继成立了七月剧团、关中剧团、关警剧团等，创作演出《大上当》、《新教子》、《十里塬》等大批新剧目，在唱腔、表演、舞美、服饰等方面都有创新。建国后，咸阳地区有专业剧团14个，创作了大批新剧目，涌现出众多名演员，如郭明霞、王麦兰、舒曼莉、马金仙、赵斌、王义民、咎金香等，新秀如赵改琴、王平、白萍、冯武耕、王亚萍等。这些演员均先后在西北、省、市会演大赛中获奖。据1989年统计，咸阳市有市直戏曲团体3个，县秦腔剧团11个，共有演职人员1100余人。艺术创作人员30余名，演出本折戏目100余个。

咸阳秦腔唱腔，分板式和彩腔两部分，每个部分均由“苦音”和“欢音”（又称花音）两种声腔体系组成。苦音腔是秦腔区别于其他剧种，最具有特色的一种唱腔，演唱时激越、悲壮、深沉、高亢，表现出悲愤、痛恨、怀念、凄凉的感情。欢音腔则欢快、明朗、刚健，擅长表现喜悦、愉快的感情。秦腔板式分为一板三眼、一板一眼、有板无眼和无板无眼四种。板腔称

谓有慢板、拦头板、一锤安板、阴司板、二六板、拉锤二六板、带板、尖板、滚板、二导板、双锤板等。总归称是六大板头、慢板、带板、垫板、二导板和滚板。秦腔曲牌分为弦索类、击乐类、喷呐类、笙管类、海笛类、套曲类共6种。早期乐队分文、武两部6人。建国后，由于戏曲事业的发展，乐队人数增加，文乐场加扬琴、二胡、琵琶、京胡以及提琴、黑管、吊钹等，使传统音域更加宽广。乐队市级团增加近20人，县级剧团10人以上。秦腔角色分四大行：即生、旦、净、丑。一支戏班只要具备“四梁四柱”，头、二道演员，就是强硬戏班。清末民初，秦腔吸收外地剧种之长，班社扩大，演员阵营增加，出现了四生、六旦、二净、一丑四大行十三门的角色行当，俗称十三头网子。演员素质要求掌握唱、念、做、打四功五法技巧。演员表演从戏情出发，很讲究个人技艺功底。《游西湖》的吹火表演，属旦角门绝活；《鞭打殷夫人》的甩麻鞭技巧，是须生门的特技；净角的标钺，丑行的“夹鸡蛋簸米”亦是世人称颂的硬功。生角的抢稍子、摇帽翅、抖胡须、提袍甩袖等功夫，都为世人所称道。

弦板腔

亦称“板板腔”，是主要地方剧种之一。由主要伴奏乐器“弦子”和击鼓乐器“板子”而得名。流行于乾县、礼泉、兴平及陇东地区，为陕、甘两省群众所喜闻乐见。据考证，皮影戏“弦板腔”，起源于宋代。清嘉庆五年（1800）前后，“弦板腔”与“道情”同台演唱，而后独台演出，形成独特剧种。乾县马连村皮影戏老艺人郝正发回忆：原来的皮影子工艺粗糙，没有色彩，型体较大，人称皮影戏为“四人忙”。四个人分作两部分，在“亮子”前耍皮影兼唱一人的叫“前手”，后面乐队的三人叫“后手”，其中一人打鼓带弹三弦，一人拉二弦带拍钹钹，一人甩呆呆带大锣、喷呐、大号和小锣。“弦板腔”剧目主要特点是语言通俗，故事内容丰富，剧目取材于历史演义、民间生活故事。音乐豪迈奔放、慷慨激昂，具有西北群众传统的乐观气质和明快开朗的性格风度，表现英雄豪杰一类的武打戏最为适宜，但对表现温柔缠绵的抒情戏，则显得不足。近代由于名老艺人多分布于乾县、礼泉一带，因而形成东西两路流派。东路以礼泉的王天德为首，擅长演唱武打戏，以演唱《封神榜》、《西游记》等剧目而著称；乾县著名老艺人郝振安、马怀玉、陈文蔚、王正友以演三国戏而著名。郝振安后期演传奇戏，唱腔缠绵抒情，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深受群众喜爱。1958年初第一出弦板腔戏《槐荫媒》搬上大戏舞台，一经演唱，座无虚席。同年5月赴西安汇报演出，薄一波副

总理、赵伯平省长观看《紫金簪》演出，并接见了全体演员。1960年“乾县剧团”易名为“乾县弦板腔剧团”，同年3月参加陕西省新搬上舞台剧种汇演大会后，弦板腔被确定为全省重点培养的五大剧种之一。省戏曲剧院、易俗社和歌舞剧院都派人到剧团指导，对其剧目、表演、唱腔、舞台布景、道具进行了尝试和改革。1979年9月弦板腔《紫金簪》参加省文化局举办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并获演出二等奖。陕西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弦板腔唱段和选场。弦板腔作为皮影形式演出，乐队少而精，文武场面互相兼顾，音乐形式比较单调，唱腔通常都是上下两句反复，“二次板”与紧板更似说唱性的“板壳子”。其相同板式的“板头”和“放板”后的长过门，多为同一主体曲调的加花变异，句中的小过门，基本是吹腔旋律的反复变化和延长。弦板腔板式有10多种，正板（即慢板）是核心板路。此外，使用较多的还有“紧板”、“滚白”、“撇板”等。“气死人”（即“阴死板”、“提头”等）实际是变化局部唱腔的正板；“伤音子”是在紧板的首句加上拖腔，基本属于带字叫板的唱法。其余的“尖板”、“二六”、“三不齐”、“三偕一”、“七偕一”等，都是短暂插入性板式，很少单独使用。弦板腔的唱词，主要是7字句和10字句，也有6字句、8字句和9字句的。其音乐伴奏，除部分模拟唱腔或衬托节奏外，一般只伴奏句中或句尾的过门，宛如曲子戏的演唱形式。“扎板子”在唱腔中起击节作用，所以唱腔清晰，雅而易懂。

迷胡戏（眉户戏）

又名“曲子戏”，属曲牌体，是古代“清曲”中“月弦曲子”搬上舞台的称谓。在咸阳市各县区广泛流行。迷胡之说有二，一为“迷胡”，传说春秋时代，郑国与犬戎交战于华县、华阴一带，郑军以优人唱曲，致敌兵迷迷糊糊败阵，故为“迷胡”戏；一说迷胡发祥于眉县、户县，应称“眉户”。《新唐书·礼乐志》载：“隋初有清曲，其音清雅，玄宗善音律，又酷嗜清曲，而选乐部弟子三百人教于梨园，为弦竹之戏。”清曲，曲调众多，秦代咸阳流传甚广，汉代《乐府》收集了一部分，北魏继续收集成册。元、明两代，清曲发展到昌盛时期，并由单调说唱发展成叙事联缀体。明正德年间，武功康海著有《沂东乐府》，继北曲余焰，创作里曲小调，为明朝北曲一支劲军。后人便“转相仿效”，清代已有专演的迷胡戏班。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驻旬邑马栏镇的关中分区八一剧团，请迷胡老艺人当教练，在淳化、旬邑等地解放区演出迷胡传统戏《张连卖布》、《刘三挑菜》、《五更鸟》、《王连哭五更》和新编迷胡现代戏《劳军》、《赵满堂上吊》、《十里塬》等。同时，延安鲁艺还

整理编印了《眉户音乐》。建国后，迷胡戏日益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咸阳秦腔剧团大都演过迷胡《梁秋燕》、《小女婿》、《囊哉装箱》等戏。礼泉剧团于1964年还创作大型迷胡现代戏《秦川儿女》，并参加了陕西省第二届戏剧会演。咸阳周陵乡“五一俱乐部”的《四女拜年》、西北国棉一厂的《联盟渠》、《五十五号车》等自编自演的迷胡戏，分别获省奖，有的还到北京等地演出。迷胡戏由曲子小戏发展成大戏，成为仅次于秦腔的一大剧种。80年代抄录在案的剧本就有520种。迷胡戏的内容多是反映社会人事风情，抒发男女爱情幽怨等，有喜剧、闹剧、讽刺剧、幽默剧等，情节生动有趣，表演明快酣畅，语言通俗，人物活现，见长表现现实生活。迷胡，号称72大调，36小调，《羽衣新谱》记载有130多种。曲调大致分三类：即民歌曲体、说诵性曲体和戏曲化曲体。迷胡演出形式，分台下、台上。台下清唱又分两类：一类“清客曲子”，专为士大夫茶余酒后娱乐消遣，曲词典雅，如《古城会》、《曲江打子》等；二类“江湖曲子”，为一般艺人街头卖唱或农闲过节娱乐，曲词通俗，如《光棍哭坟》等。台上演分角色行当，一人一角，演唱有的单曲单调，有的联曲多调，均以人物出发设计唱腔唱段。它的联缀规律是，起调“月头”，终调必为“月尾”；起调“背宫”，终调必为“背宫尾”；起调先“月”后“背”，终调必是先“背”后“月”。中间联缀曲牌自由，词句多少不等。迷胡清唱乐器有三弦（或板胡）、四页瓦、碰铃，有的加笛子。舞台演出，文场增加二胡、打琴，武场全套打击乐齐备。其演唱风格，欢音轻快、清扬、优美、动听；苦音幽怨、深沉、凄楚、悲痛。化妆、服饰简朴、真实，具有生活化气息，颇受群众喜爱。

阿宫腔

又称遏工腔，亦称北路秦腔，原以皮影形式演出。清代在礼泉、兴平、咸阳、泾阳、三原、乾县等地流行，建国前逐渐消失。据史料记载，清同治年间和光绪初年，有乾县人任相公为班主，艺人任进思、任百思等组成的“任家班”；礼泉外号瞎娃子为班主，艺人马娃子、红娃子成立的“灯影班”，流传民间，专演阿宫腔。剧目题材广泛，有历史剧《七箭书》、《重耳光国》等，也有儿女情长的世俗剧和传奇剧《西厢记》、《屎巴牛抬亲》，还有抨击恶势力和恶少丑妇的讽刺喜剧《婆娘顶嘴》、《打锅》等。剧目有证可查的300余本。因演出是一人签子兼唱，剧本编写手法是说繁唱少，要唱多是十字或七字句的唱上四句或六句，偶数为多，也有三五句的奇数唱腔组合。灯影戏演出对象主要是农民，唱词意思浅显易懂，朴实敦厚，生活趣味极浓。

可惜该剧种是一个“吃本”，不是“抱本”，人走剧亡，好多剧本只知其名，而无剧情内容。阿宫腔是属板式变化体音乐，板式结构严谨，声腔亦分“欢音”、“苦音”两大体系。音乐的表现形式由唱腔、曲牌和打击乐三部分组成，曲牌又可分为弦乐和管乐两类。弦乐曲牌常用的有《小桃红》、《柳生芽》等，管乐常用曲牌有《两句腔》、《上中山》、《喜相逢》等，打击曲牌有《开场曲》、《动作曲》、《板头曲》共三大类。阿宫腔班子演出通常由六人组成，其分工可用一首顺口溜说明：签手唱戏满台跑，两手忙把签子挑；二把手帮签心要巧，还有鼓锣吹大号；打板的小锣堂鼓一齐敲，填空说白凑热闹；弹月琴的没品麻，抽空跟上拍大铙；二股弦带上领头拉，着急了还要吹唢呐；拿的胡琴手不离，打梆的还要带吹笛。

本地二黄

清末由汉中、安康流入本区，民国初年，咸阳、三原、泾阳有二黄班社。泾阳人陈兰亭在他的著作《略谈汉调二黄》一书中载：“清末民初，陕西大戏虽有梆子、二黄、迷胡、徽调数种，人多以眉户是曲子，并非大戏，不甚重视，对徽调又不太懂，梆子嫌粗糙。一时多好听、好看二黄，其中商绅、军政要人喜爱尤甚。不仅有专业戏班，业余和自乐班，就连一些女眷也能清唱和挂衣登台”。清末，泾阳富户安吴寡妇收养二黄艺人，亲自参与修改流散剧本。辛亥革命后，名震西安的“鸣盛社”曾在三原县城演出，当时贾仁辅和一些教师成立“二黄会”亦很活跃。20年代，泾阳驻军田玉洁师长和士兵多系商洛籍人，所以常演家乡戏二黄。本地二黄唱念并重，能文能武、行当齐全，程式多样，尤以武戏最为突出。剧目以三国戏为主，兼演其他古典戏。二黄戏当时在泾阳有贾兴运戏班，驻县城老爷庙，开台售票演出，深受城内商、绅、知识分子喜爱。后有二黄庆义班，在泾阳演出10年之久。此时本地二黄各戏班主要演员有：须生连云贵，主演《徐策跑城》、《放粮》等；杜和尚主演《三打王英》、《山海关》等；山鸣岐主演《斩黄袍》、《击鼓骂曹》等；张鸣顺主演《观春秋》、《水淹七军》等；刘鸣祥主演《金刚庙》、《火烧绵山》等；净角丁鸣山代表剧目《抱琵琶》、《太师问朝》等；黄亮子有《取长沙》、《马踏五营》等；吕坤山有《五台会兄》、《姚梆子》等；旦角有石鸣全，扮像清俊秀丽，功底扎实，代表剧目有《日月图》、《杀狗劝妻》等；刘春华唱念并重，表演柔美多姿，功力纯熟，代表剧目有《教子》、《大登殿》等；丑角有张庆宏，代表剧目有《过三关》、《张松献川》等；刘子胜、李子喜、张佩文、陈子印、王安奎、刘子俊、李致和等艺人都

名重一时。二黄戏在三原有顺德社，演出十余年，受到当地观众欢迎。尤其是山鸣岐的《审刺客》、李智和的《破洛阳》、华启民的《金钱豹》、张佩文的《收姜维》最为时人所称道。本地二黄的角色有末、净、生、旦、丑，以唱做为主，尤重唱功。乐队分文武场，文场由弦乐器吹奏乐器组成，有胡琴（京胡）、京二胡、月琴三大件，以伴唱为主。武场以板、鼓、管、木响打击乐器组成。唱腔有二黄、支二黄、西皮三种调式。二黄板式有慢三眼、原板、摇板、散板、飞嗓子、小导板、快板、滚板等程式。腔类有回龙四柱、流里表、板头、麻鞋底、硬三眼、十八板等。西皮板式有导板、二六、三流、摇板、快板、滚板等。本地二黄道白语言，以韵白和陕白为主，还流行按剧中人物之籍贯方言道白的艺术形式。本地二黄在40年代，班社逐步停止活动，二黄剧种在咸阳销声匿迹。

第二节 剧 目

咸阳市剧目经80年代搜集整理，总计有1600余个，其中秦腔剧目1200多个，弦板腔剧目300多个，豫剧剧目近100个。建国后，古老剧种获得新生，文艺演出空前活跃，至1990年统计舞台演出各剧种剧目1200多个，其中整理加工历史剧目128个，新编传统剧目100多个，新编现代戏剧目80余个。剧目内容总体上体现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概貌，是一部中国社会历史的缩影。其中有颂扬爱国精神，抵御外辱，宫廷斗争，宦海沉浮，农民起义，忠奸纠纷，爱情婚姻道德等等。也有一些宣扬宿命论、封建礼教和丑化劳动者以及内容不健康的剧目。这些剧目属作家创作、改编和移植的约有300个，属于无名氏创作移植的有近1000个。主要有康海编写杂剧《中山狼》、《王兰卿》等，范紫东创作的《软玉屏》、《三滴血》、《盗虎符》共计45部。新创作剧目有《第一个浪头》、《赵梦桃》、《秦川儿女》、《丹青泪》、《女皇与公主》共数十个。从风格上看，剧目有文戏、武戏、正戏、唱功戏、唱做并重戏、文武兼备戏，悲剧、喜剧、公案戏、宫廷戏等等。从形式上分有连台戏、本戏、折子戏、小戏等。从性质上论有历史剧、社会剧、神话剧、宗教剧。总之剧目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百花齐放。

一、秦腔主要剧目

《打渔杀家》 又名《庆项珠》、《杀船》、《渔夫恨》秦腔传统戏。写太

湖渔民肖恩和女儿桂英打鱼为生。天旱水浅鱼不上网，渔民无法度日，恶霸“爬山虎”，仗势勒逼鱼税，家奴丁郎被痛打而逃，肖恩上县告状，反被县太爷痛打，并逼向“爬山虎”赔罪，肖恩忍无可忍，携桂英黑夜过湖，假献庆项珠为名，杀死“爬山虎”，自刎而亡，桂英带珠投奔婆家。1943年关中八一剧团赵德蒲、张志光于陕甘宁边区首演。1953年咸阳人民剧团王化民、赵梦兰再演此戏。

、《玉虎坠》 又名《洛阳点炮》，秦腔传统本戏。写东汉时马武起义，下山求访英雄。酒馆偶遇冯彦，慕其武艺，冯不允，乃杀王腾，夜悬首级于冯家门外，以逼冯上山。冯子天明发现人头，冯彦报知继母贺氏，贺氏之子贺其卷欲谋冯家产业，趁此诬告冯彦杀人，冯被收监。其卷又假扮僧人，调戏冯妻，并责其不点，逐其母子。冯妻与子夜宿慈云庵，巧遇王腾之女娟娟，遂与冯子订婚，并赠玉虎坠，令其变卖以救其父。冯子出外，大将军王元引往洛阳，冯妻与娟娟同去洛阳点炮告状，巧至王元衙门，王元看中冯子，将其女许配，冯子将娟娟所赠玉虎坠作聘礼。后调冯彦一案审理，马武归刘秀，说明前情，冯彦沉冤始明，贺氏母子被斩，全家团圆。其中《探监》、《慈云庵》、《洛阳点炮》为著名折戏，广为流传，系党甘亭、王益民、何毓华、马振华、王化民、肖鸿斌等演员的拿手戏。1958年长安书店出版封至模改编本。

《下河东》 又名《龙虎斗》、《斩呼延寿廷》，秦腔传统本戏。写宋太祖时，河东白龙造反，赵匡胤御驾亲征，欧阳芳挂帅，呼延寿廷兄妹为先锋。欧阳芳阵前密结白龙乘夜偷营，并私斩呼延寿廷，夺走太祖印玺，谋权篡位，赵匡胤河东巡营，呼延凤英寻兄，又被赵匡胤盘龙棍误伤而亡。呼延寿廷妻与子呼延赞于河东赶驾、救驾，共除欧阳芳。此剧为红生、武花脸、小生、武旦戏。泾阳剧团陈仁义，永寿剧团尚祥民擅演此剧。省电台录制了《下河东》演出全本。

《万寿屏》 秦腔古代戏。写元主荒淫愚昧，渴望长生，向全国征调万寿屏，并钦选美女，大开万花道场，诵经求寿。河南千户山云之女吉拉射猎坠崖，被汉民猎户吴真救治，吉拉入山报恩赠银，二人互相爱慕。杭州绣女吴秀娟在匠工局绣制万寿屏，与总管巴延结识，山云因女中选，又抢秀娟代替，幸为巴延救回，巴延犯罪解京，又被秀娟之兄吴真解救。1985年张汉编剧，乾县剧团演出。主演许俊峰、李思民、弋志君、高钦科等。

《马嵬坡》 秦腔古代戏。写唐明皇李隆基父纳子妻，封杨玉环为贵妃，

“逞侈心而穷人欲”，沉于美色，不理朝政。玉环入宫后，其兄杨国忠专权祸国，安禄山、史思明谋反，唐明皇反认禄山为义子。安史之乱，唐室君臣弃京西逃，兵至马嵬坡，三军提出诛灭祸国罪魁，逼李隆基处死杨玉环，并当场打死杨国忠。明皇无奈，遂赐杨贵妃自缢身亡，草葬马嵬坡前。1980年由兴平剧团演出，曹剑创作，杨大瑜导演，咎金香、王琪童、范明仲、杨奇生、姚玉民、贾兴才等演出。剧本获陕西省1980年度创作三等奖。

《火焰驹》 又名《卖水记》，秦腔传统本戏。写宋朝时，北狄造反，李彦荣挂帅出征，因粮草不济滞留边关，奸人王强诬陷彦荣降藩，彦荣之父李绶被问罪入狱。弟李彦贵卖水奉母，黄璋因之悔婚退亲。黄桂英命丫环芸香约彦贵花园赠金，被王良发现，报于璋，璋命王良杀害芸香，诬彦贵入狱问斩。马贩子艾谦，骑火焰驹边关报信。彦荣领兵劫了法场，杀死王强，救回彦贵，全家团圆。兴平剧团查俊卿，咸阳市人民剧团王麦兰、王化民，武功剧团范俊芳，乾县剧团刘智民、李思民和彬县剧团李晓霞等主演此剧。剧本有谢迈千的改编本。

《丹青泪》 秦腔古代戏。写东汉末年，陈留秀才蔡伯喈得中状元，丞相马通为结党羽，强逼招赘。其时，陈留遭灾，其妻赵五娘，苦度时日，剪发葬亲，备受艰辛。为找夫君，不顾路途坎坷，奸人谋害，入京寻夫，假扮道姑进入相府，绘丹青以探夫心，几经磨难，恩爱夫妻终于相认，在喜庆团圆之时，一道圣旨令五娘入庵为尼，她血溅皇匾，饮恨而终，酿成千秋悲剧。三原剧团1986年演出，邓春松改编，朱文艺导演，赵改琴、王亚平、冯武耕、张新民等演出。曾获陕西省首届艺术节铜牌奖。

《白蛇传》 又名《雷峰塔》，秦腔传统本戏。写白云仙（白蛇）与许仙有三载夫妻缘分，遂下凡至西湖，遇雨借伞，与许仙相见，青儿作媒，结为良缘。适逢端午节，许仙带回药酒，强使饮之，蛇现原形，吓坏许仙，白蛇盗来仙草救之，西天佛祖派来法海，收伏白蛇，暗渡许仙。诱许仙金山寺焚香，言明其妻系白蛇所化，并留许不归。白蛇和青儿往讨，与法海相斗，水淹金山。法海借天将战败二蛇，又给许仙金钵，令其归家。许仙行至断桥，遇白蛇、青儿，青儿欲杀许仙，白蛇恩爱不忍，后生子，被许仙金钵押发，法海将白蛇压于雷峰塔下。白子士林长大成人，得中状元，遇菩萨指点，乃于雷峰塔前祭母，玉帝封白蛇为白云菩萨。市人民剧团王麦兰、市大众剧团马友仙、马金仙都曾主演。

《四贤册》 秦腔剧目。写某地大旱之年颗粒无收，方文珍未能领回赈

济粮，要卖子度日，恐妻不允，伪称要卖侄子，妻子怒斥文珍忘却故去兄嫂之托。二子听后，都跪哭愿卖己身，文珍假计以抢草为名，终于卖掉亲子。1940年关中八一剧团袁光、张云、张志宽、谭增成主演。1952年后经马耀光多次修改，为人民剧团郭明霞、赵斌等主演剧目。1984年省电视台录制戏曲艺术片，中央唱片社还录制郭明霞唱片发行。

《打虎记》 新编秦腔古代戏。写宋时猎户解珍、解宝为官府所逼，进山打虎。一日，射得之虎滚入毛太公花园。翌晨，解氏兄弟去毛府讨虎。毛太公匿虎请赏，反诬珍、宝入府行劫，送于官衙，问成死罪。幸得乐和传讯与孙立、孙新和顾大嫂，又约邹渊、邹润劫狱，救出解氏兄弟，一同反上梁山。编者周军、屈映明，音乐设计王依群。1945年由关中八一剧团首演，1952年后由咸阳人民剧团王正廉、尹小露、王惠芳、肖鸿斌等主演。

《状元与乞丐》 秦腔古代戏。根据陈树青原作同名莆田戏移植。写丁氏兄弟婚后各得一子，起名文龙、文凤，举家欢欣。其舅申亲来到丁家，为二甥算命，算就文龙为乞丐命，文凤为状元命。文龙之母柳杨氏在夫君丧命后，含辛茹苦，严加管教儿子，使被算为“乞丐命”的文龙金榜题名，高中状元。而被算为“状元命”的文凤，在其母胡氏娇惯放纵下，吃喝嫖赌，学业荒废，沦为乞丐。此剧由市大众剧团移植上演，屡演不衰，成为保留剧目之一。

《贞观遗恨》 秦腔新编古代戏。写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代明君，立太子但不许皇储有非礼行为，当既定太子演练登基典礼时，太宗发现太子不轨，将其贬为庶人。一时魏良荐举吴王，褚遂良保荐晋王，立嫡立庶遂成皇室斗争中心，长孙无忌为了国家安危，力荐才不出众、温和谦恭的晋王，排挤李恪，杀魏良，夺太宗密诏，架空李世民，最后不惜用毒药害死千里寻父的李恪，酿成李氏父子双死翠微宫的悲剧。1987年白连柯编剧，淳化剧团演出。贺康建、王自强、王宏莲、罗娟等主演。

《李白辞朝》 秦腔新编古代戏。写唐天宝元年，玄宗下诏求贤，三次征召李白入朝辅政。李白怀着“尽其智能，愿为辅弼”的恢宏志向来到长安。他虽受天子恩宠，但却招来高力士、杨国忠等的谗毁，“假其名而无所职”，入京三载，政治上毫无建树，还几乎被罪，最后不得不愤然辞朝。1985年孙俊发编剧，泾阳剧团演出。

《第一个浪头》 大型秦腔现代戏。写高庄生产队斗争复杂，刘红云受党委托任队长。敌人企图利用高俊发的自发势力及迷信思想，将刘搞垮。刘

红云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同敌人斗争，教育了高俊发夫妇和他的父亲，掀起了胜利的第一个浪头。此剧由市大众剧团演出。1964年王志毅、毛云霄等创作，任韵琴、芦九令、刘宏琴、周向荣、杨桂琴、解培元、马金仙等演出。

《除夕寒史》 秦腔现代戏。写由河南至陕西逃荒的二老一小难民，因夜晚无处安身，住在地主家场房内，可恶的地主狗腿子，说败坏了他家风脉，于除夕夜大风雪中赶走了一家逃荒难民。1963年由陕棉八厂俱乐部演出，编剧刘世林、田志珍，主演马淑珍、苟木林等。

《赵梦桃》 秦腔现代戏。写纺织女工赵梦桃为了多出纱、出好纱苦钻技术，不让小组一个伙伴掉队。通过心换心，手把手，家访排忧解难等行动与思想交融，带动全组人员超额完成任务，创造了“巡回清洁检查操作法”，为纺织工业做出重大贡献。1963年由咸阳人民剧团演出。

《党的女儿》 大型秦腔现代戏。根据电影《党的女儿》改编。写1933年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后，红军家属中女共产党员主动组织群众，诛杀叛徒，建立党的组织，成立游击队，同敌人展开殊死斗争的故事。1958年由杨兴、谭增成改编，郭明霞、芦晓霞、贺天珍等演出。剧本由长安书店出版发行。

二、弦板腔主要剧目

《紫金簪》 弦板腔古代戏。写宋吏部尚书高元贵嫌贫爱富，逼女高寄玉与秀才夏昌时退婚，女誓死不从。高吏部借李善甫杀死丫环，诬告夏昌时，吴知县判夏死罪，适逢察院来县明冤，寄玉和昌时终结良缘。1959年由张汉、丁明、王绍猷创作，乾县弦板腔剧团车秀花、刘智民主演，并参加省庆祝国庆三十周年献演大会。剧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

《十三姐妹闯三关》 弦板腔现代戏。写为集体多养猪、养好猪的十三姐妹不仅解决了思想认识这一关，还克服了饲料缺少和科学养猪两道难关，为国家作出贡献。1959年创作，兴平剧团演出。刘芬芬、姚玉民等主演。

《赶花轿》 弦板腔古代戏。写灵草妈人称“要不够”，在女儿出嫁时，刁难亲家，轿人生气，在迎亲途中出“要不够”洋相，抨击了她的封建思想。咸阳五一俱乐部演出，1964年《剧本》月刊发表。

《白马血盟》 大型弦板腔古典剧。写汉时吕后专权，残酷陷害刘氏家族与忠臣，周勃与陈平挺身而出，终灭奸党。乾县弦板腔剧团演出，1978年张汉创作，强淑霞、税小玲、黎小云等演出，省戏剧家协会、省艺术研究所藏本。

《山村小店》 弦板腔现代戏。主要写国营商业部门，不只是在山村办商店，还要挑担背货、跋山涉水到深山一家一户上门服务。1971年张英创作，乾县剧团演出。

三、迷胡主要剧目

《劳军》 新编迷胡剧。写蒋介石军队抓了名叫猪娃的农民修战壕，解放军救了他并放回家。郭某感谢解放军为百姓打仗。二人途中相遇，相商慰劳解放军去，猪娃回家告知妻与大妈，四人共同慰问亲人解放军。作者、导演屈映明。1947年关中八一剧团首次在淳化县马家山演出。1950年后三原、咸阳等剧团再演。剧本收于《西北文艺》，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

《加速曲》 迷胡剧。写为顺利完成生产任务，动力车间工人在车速上下功夫，搞革新，使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咸阳西北国棉一厂迷胡团演出，1959年国庆献礼获省演出二等奖。

《秦川儿女》 大型迷胡现代戏。写礼泉县烽火大队走合作化道路，坚持科学种田，产量不断提高，农业得到迅速发展。礼泉剧团演出本，1964年孙迟创作，杨秋霞、郑盟、李化英演出。省戏剧家协会藏本。

《四女拜年》 小型迷胡现代戏。写农业合作化中用科学方法种田获得丰收。四个已嫁的女儿以新式礼物向父母祝贺春节。咸阳陵照五一俱乐部创作、演出。省迷胡剧团陈文波、李瑜、张锦演出。

《红纺新歌》 中型迷胡现代戏。写纺织女工秦虹，为了帮助只讲吃喝玩乐、不学技术、过不了生产质量关的小英，请来小英养母，进行忆苦思甜教育，使小英思想转变，认识到真正的幸福是为社会多做贡献。西北国棉七厂秦剧队演出本，1977年高治民创作，展运华、杨秋霞等演出。省戏剧家协会藏本。

四、其他剧种主要剧目

《中山狼》 寓言杂剧。明代武功状元康海编剧。全剧共四折，第一、二折交代了中山狼被赵简子等人追杀，逃窜无路，遇见墨家信徒东郭先生，并被藏进书囊里。赵简子赶来查问，东郭先生巧言遮掩，全力救护，终于保住了这个恶狼。第三折是狼从书囊出来，非但不谢救命之恩，却反目成仇说“肚儿饿得慌”，要把东郭先生吃掉，它还讲了不少理由。温情仁爱的东郭先

生张口结舌，只好托词说：“要得好，问三老。”一问老杏，再问老悖，老杏老悖正话反说，帮了东郭先生的倒忙，这时狼更加猖狂，东郭先生更加窘迫。第四折写东郭先生在绝望中遇到杖藜老人，老人以不偏不倚的“公正面貌”，听了双方陈述后，提出“依旧缚在囊中，把那受苦的模样，使俺亲见一番”的主张，结果狼中了计，东郭先生化险为夷。最后，在东郭先生仍不肯杀中山狼时，杖藜老人严肃地批评了他的“愚”，并正面点出“世上负恩的不个个都是这中山狼么”这一主题思想。该剧被列为中国十大喜剧之首。

《布袋队》 独幕话剧。写国民党不抗日，却令特务抓捕抗日群众，为掩人耳目，用布袋套住头而拉走。一次遇到机智的抗日群众反套住了特务的头，将其痛打。1938年由中共陕西省委机关业余剧团演出。罗文治、刘宏章、张振银等主演。

《荣誉》 独幕话剧。写西北国棉一厂织布工刘小变在全省技术比武大赛中获第一名，但她并不满足，继续同工友们苦练技术，使产量不断提高，又获得了省级劳动模范称号，1960年由该厂歌舞队演出，获省职工会演剧本奖和演出奖。

《红桃满园》 中型歌剧。写全国劳动模范、党员赵梦桃，人虽去世，她的精神却在工人中传颂。工人中处处有梦桃，生产任务年年完成。西北国棉一厂歌剧队演出。1962年向西北局、省委汇报演出20多场，受到好评。

《杨八姐盗刀》 豫剧改编戏。豫剧团盖韵笙根据京剧改编而成。写北宋大将杨继业为抵抗辽兵英勇牺牲，随他征战多年的武器——“定宋宝刀”遗失辽邦，辽主将刀当作胜利象征，视若珍宝，专门修建藏刀楼严加看管。杨家久欲夺回宝刀，苦无良策。朝中佞臣潘士贵暗与辽邦勾结，奏请宋王降旨，命杨家派兵征辽取刀，欲借机残害杨家后代。佘太君令杨门教场比武选将，八姐取胜，遂命八姐乔装改扮前往辽帮“盗刀”。八姐出关，就遇辽邦行围打猎的银花公主，躲避不及，身被箭伤，逃到玉清观，被道士杨继康相救。杨乃遗留辽邦宋将，系八姐远门叔父。他令八姐改扮道童，蒙混过去。可银花公主偏偏爱上道童，定要带回辽邦。杨与八姐暗中计议，将计就计，同随公主进入辽邦，他们利用萧太后为银花公主招驸马之机，进入藏刀楼，最后夺回“定宋宝刀”。该剧系豫剧团保留剧目。1958年赴四川成都、重庆演出，1960年赴山西、河北、江苏、河南、山东5省13个大城市巡回演出。

《桃花庵》 豫剧传统剧目，又名《卖衣收子》。写张才之妻窦氏，将一学童苏宝童收为螟蛉。贫妇王桑氏因生活所迫，到张家卖道袍，窦氏发现了

自己亲手所做的丈夫12年前穿去的衣物，见物思人，顿生诧异，再三诘问，王桑氏说是桃花庵尼姑陈妙善之物。窦氏以还愿为名，到桃花庵寻夫，毫无踪影。窦氏与妙善结为姊妹，经过仔细攀谈，妙善吐露真情，13年前张才已死于桃花庵，曾生一子，让王桑氏抱去，道袍即抱子之物。王桑氏言明此子卖给苏州知府苏琨，正是窦氏义子苏宝童。于是窦氏带妙善和王桑氏到苏州府堂认子，苏张两家争执不休。妙善指出她儿左脚有齿痕为记，才证明苏宝童确系张门亲生。可苏家将子养大成人，情难割舍。最后，窦氏提出一门继承两家，矛盾得以和平解决。此剧为市豫剧团保留剧目。正旦、青衣俱工，唱做并重，各门角色，人人有戏，屡演不衰。

《秦香莲后传》 豫剧古代戏。写包公铡陈世美后，秦香莲之子边关立功，张元帅欲把他与公主（陈世美之妻）所生之女紫兰姑娘嫁于秦春哥，遭到香莲拒绝，后由包公出面调解，言说不要把父母辈之恩怨，再让儿女们承担，秦张终于缔结良缘。此剧由市豫剧团演出。

《探阴山》 豫剧古代戏。元宵之夜，柳金蝉同父观灯惊散，遇纨绔子弟李保趁机调戏，将柳致死，嫁祸公子颜查散。祥符县令畏于权势，将错就错，柳之冤魂告于阴曹地府，判官张洪包庇外甥李保，冤案难明。官司打到开封府，包公受理此案，通过探阴山，明察暗访得到真凭实据，断清了这件牵涉阴阳、错综复杂的疑案，万民称颂。此剧系刘凤洲根据京剧本改编整理，市豫剧团演出。

《劝公公》 快板剧。写一美貌农村姑娘，接到未婚夫要参军的信，公公害怕儿媳妇飞了，她亲自去婆家劝公公，途中巧遇一老人为儿子参军而生气，姑娘说明参军的意义，并说明自己正是劝公公也让未婚夫参军，愿主动到婆家去做家务事。姑娘走了，老人方知她就是未过门的儿媳妇，欣慰地让儿子参了军。此剧1956年由西北国棉一厂演出，同年获省第一届职工业余文艺观摩演出创作、演出奖。

第三节 社 团

据史料记载，元代杂剧兴盛时期，咸阳境内就出现了著名戏剧演员卢纲，并有了以行院或家庭单位的戏剧班社。至明中叶，一些富绅或归隐的官吏在当地乐户的基础上办起了专业戏剧班社，明正德五年（1510）状元康海罢官归里，赋闲在家乡武功，办起了“康家班”，并创作“康王腔”，远近闻名。清代戏剧趋于鼎盛，一些官僚、富绅为消愁解闷，如旬邑的唐红、泾阳

的安吴寡妇都有家院形式的戏班，演员行当较全，一般都有 30 余人。民国时期，咸阳有了以文人、富豪、军官和著名演员联合创办的剧社，如咸阳的“益民社”，三原的“新中社”、乾县的“晓钟社”、泾阳的“明正社”等，招收学生，培养三月至半年，排上几本戏，即开始演出。1937 年，中共陕西省委驻泾阳县云阳镇，为了宣传抗日，组织机关能演戏的同志，先后组建了“七月剧团”、“关中剧团”、“关警剧团”和“八一剧团”等，这些革命的艺术团体，一面生产，一面演出，一面打仗，紧密配合当时的斗争，创作排演了大批新的剧目，在解放区起到宣传群众、打击敌人的作用。建国后，各地班社改称剧团，管理体制仍沿旧戏班规。1951 年 5 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各县对一些基础好的戏班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广大艺人通过学习，政治思想觉悟得到提高，班社的戏箱，大多折旧归集体所有。广大艺术工作者，提高了对传统剧目精华与糟粕的认识，开创了净化舞台、上演好戏的新风气。1950 年成立了第一个国营的咸阳市人民剧团，后又成立大众剧团、豫剧团。尔后各县陆续成立了 12 个集体所有制、民营公助剧团，配备干部，建立章规，进一步贯彻改人、改制、改戏的政策。1953 年各剧团建立健全了行政管理制度，废除了旧戏班的陈规陋习，演员工资改为固定工资制，建立了党、团和艺委会组织，在演出上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创作、移植了一批现代戏。1956 年一批演员在全省戏剧会演中获奖。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剧团停止演出，部分衣箱被焚，艺人下放劳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剧团恢复生机，上演剧目增加，至 1989 年全市有 15 个艺术表演团体，其中国营一个。演出剧目 200 余个，演职人员 900 余名。

一、建国前的戏班

康家班 咸阳史载最早的一个戏曲班社。明正德五年（1510）由状元康海创办。康海赋闲在武功老家，以戏消愁，招收弟子在家教授他和王九思创作的“慷慨悲壮，喉转音声，有阳刚之美，有阴柔之情”的“康王腔”。排练他所创作的《中山狼》、《王兰卿》、《杜子美游春》等戏。康海的继室张氏，出身乐户，能歌善舞，声震秦中，原有“随身四帅”金菊、小斗、芙蓉、采莲深受观众喜爱。康家班演出的戏“歌有新词，舞有娇姿”，30 年红极了家乡，对秦腔流派的发展影响很大。明嘉靖十九年（1540）康海谢世，康家戏班解散。

玉盛班 清同治年间(1862—1874)演出于三原、泾阳、咸阳、礼泉、兴平等地。光绪年间(1875—1908)由贫生演员润润子领班演出,演员有须生李范(泾阳石桥人),擅长演出道袍和官衣纱帽戏,如《煤山杀宫》、《李白辞朝》等,唱做俱佳,形神感人。须生二楼子(张侠)系咸阳人,为该社的台柱子,擅长靠把和纱帽官衣戏,演出的《铁冠图》中周遇春、《光武山》中秦琼,以及《广寒图》、《玉凤簪》、《八件衣》等,都唱舞动人,名噪一时。该班于辛亥革命初散班。

春盛班 秦腔班社。清同治年间(1862—1874)由药材商人张寻春组建。长驻三原,演出于泾阳、咸阳、淳化、礼泉、兴平等地。主要演员有须生银富子,号称“活孔明”的黄娃子,老生老九、小生隋达子、丑角九门儿、军娃、武生福生子等。演出剧目都是秦腔传统戏,如《葫芦峪》、《日月图》、《封神榜》等。光绪年间,该班赴甘肃、宁夏等地演出数年后仍归三原。辛亥革命初解散。

福盛班 秦腔班社。清光绪年间(1875—1908),长期演出于三原、泾阳、淳化、礼泉、咸阳、兴平、武功等地,著名演员有黑头雷劳儿(泾阳人)扮演包拯、姚奇、张飞等人物,唱演俱佳,唱有声、动有功,观众喜爱。该班台柱演员有小生晋公子(三原人)和茂盛儿。他二人扮相俊秀、嗓音圆润、行腔有味、做派细腻、功底厚实、文武兼备,所演《永寿庵》、《金台将》、《和氏璧》等,特别是《美人图》中的重耳,演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故人称晋公子。清末散班。

德胜班 秦腔班社。清光绪十年(1884),由蒲城商人陈福儿创办。长期在三原、泾阳、咸阳、礼泉、淳化、兴平、武功等地演出。主要演员有须生李云章,人称“十八红”,他“扮君则龙眉凤眼,扮官则气度不凡”,特长靠架官衣戏。小生有党金良、茂盛儿(均为晋公子的高徒),须生有郗德有,人称“小麻子红”,旦角有李德印等。常演剧目《法门寺》、《老辕门》、《破宁国》、《火焰驹》等。清宣统元年(1909)进西安落户,1913年白朗起义军进攻西安,该戏班解散。

马家班 秦腔戏班。1911年成立于武功,该班下设两个社。头班戏有50余人,司鼓王老昆,二弦才石,主要演员有马娃,工须生,饰演梅伯(《闯宫抱斗》)、海瑞(《金鼎山》)、花仁义等角色。净角有四喜等人。二班戏,是在雷家戏班原箱原人的基础上组建的。司鼓洪班长,头弦高得康,主要演员有生角高班长、名旦袁璧辉、润娃子、羊娃子、刘双录等,主要剧目《破

宁国》、《花亭》、《观文》、《送女》等。该班自设作坊，请来技工，常年自制头帽把子，修缮服装道具，使戏班服装新颖。1920年著名旦角演员袁璧辉为班主，主要演员有刘金库，演出剧目《假金牌》共20余本，尤其《八仙过海》演技独具绝招，红极一时。1924年袁璧辉病故，戏班解散。

秦钟社 成立于1924年，地址设在三原城内老爷庙。创办人刘立杰任社长、教练和导演。当时有学生四五十名，来自临潼、长安、周至、户县、三原等地的贫苦人家，培养方法仿效易俗社章规。在演出节目的选择上，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经营上则以演出养社。“秦钟社”在三原培养的科班学生，当时多数已经登台演出，后来成才者亦不少。如须生刘裕秦（刘易平）16岁入社，受业于赵顺教师，开蒙戏《双背鞭》出场首句尖板“我父子出营来天昏地暗”满场喝彩，掌声四起。后刘立杰亲自传授的《二户箭》、《取都城》、《八义图》均成了他的拿手好戏。花旦姜瑶钟，扮相、身段端庄秀丽，唱腔、做戏真切细腻，她在《蝴蝶杯》“洞房”一折中饰演卢凤英一角可与王天民媲美，可惜年仅18岁因病而亡。崔晓钟在《五典坡》中扮演王宝钏，由花旦到青衣，一人到底，行当分明，被誉为“秦腔皇后”。王斌秦以扇子道袍戏为主，兼演武戏，他演《蝴蝶杯》中田玉川一角，曾红极一时。净角惠强秦，擅演《铡美案》中的包拯、《黄河阵》中的三教主、《荆轲刺秦》中的荆轲，气魄雄伟，刚毅豪迈。丑角演员杜干秦兼演媒旦，尤以《软玉屏》中黑氏最为拿手。他面部表情丰富，喜怒哀乐，无不适戏。须生姜望秦、汤秉钟，贫生张振秦，二花脸（架子黑头）何锐秦等，演出名重一时。常演剧目有《蝴蝶杯》、《软玉屏》、《玉镜台》等30余本，还有时装戏《金莲痛史》、《鸦片之战》、《文字狱》、《家庭痛史》等等。由于国民党军政警宪及特工人员看“白戏”者多，经济拮据，入不敷出，于1931年宣告破产。

益民社 1929年春咸阳郑益斋、长安高仲仁、杨嘉绪三人创办。由蓝田高公茂（秦腔名丑）为社长，又收了杨安民、何毓华共五、六个跟班学生，1930年在长安、蓝田等地演出。半年后郑益斋领社回到咸阳，招收学生30余名，在城内张飞庙训练。并请名导演惠济民、王安民排戏，学生中先后涌现出旦角何毓华、王秀华、刘敏华等；小生唐玄民、杨安民、张建民；须生益庆民、王正民、王益民（牛娃子）等；花脸秦易中，丑角肖益（鸿斌）、刘治中；媒旦姚振杰等优秀演员。所演《济南案》等10余部戏很受欢迎。据王绍猷《秦中六十年来之著名演员》云：“王益民，泾阳云阳人，咸阳益民社学生，每饰一角，风度宜人，如《介之推刮肉奉君》、《程婴盘门救主》、

《宁武关》、《拆命书》无论文做武做，则活泼豪爽，无所不能。”1935年郑益斋带益民社沿西兰公路，直演到甘肃平凉、庆阳等地。1938年又在长武收了一批学生，其中不仅培养出小生高登云、旦角李正华等较好的男演员，还有一位由平凉来的女学生周燕云，她的小旦戏更受群众喜爱。益民社是当时陕西、甘肃较有名气的剧社之一，演出长达20年，名演员出的不少，1948年戏班解散。

顺德社 二黄戏班。1931年由西安迁到三原落户。领班人吕安奎，淳化人，旦角演员。该社受到当地二黄会和县城官员、教师支持，10年间，先后请教练张鸣峰、山鸣岐以及净角华启民、李伯如等执教，学员以子字取名。在群众中较有影响的有须生、红生兼长的刘子盛，主演《烙碗计》、《出五关》；须生李子喜，主演《辕门斩子》、《柳林写状》等；净角何子刚，主演《铡美案》、《打金枝》等；须生山鸣岐演的《审刺客》、净角李智和演的《上天台》、《破洛阳》、演秦腔和二黄的净角华启民《金钱豹》等戏，最为观众所称赞。二黄戏班后于抗日战争中散班。

民意社 1935年成立于咸阳的二黄戏班。社长李茂林，以演二黄为主兼演秦腔。演员阵容强，山鸣岐，名二黄须生，擅演《斩黄袍》、《审刺客》，刘坤角（名张秋兰）主演《天水关》或《空城计》。李镇俗和王明华的秦腔《赶坡》，华启民的二黄戏《降豹子》、《九龙王》、《铁公鸡》，观众称民意社是“风搅雪”。社里培养了一批能演二黄和秦腔的学生，如王集荣、曹集中、刘道生等。后因乡绅排挤，民意社于1936年底解体。

秦声社 秦腔戏班。成立于1936年，由武功民团团团长冯俊生出面集资，组成了秦声社，刘金库任领班长。由于刘艺德兼备，重用人才，演出日益兴盛，人数多达80有余，同时吸引外地名角，增添导演李穷忠和京剧教练齐少奎，并让乐队添设笛子、底胡、三弦伴奏，使演出效果大为提高，令西府十县观众叫绝。

晓钟社 1938年，张秦伯等集股1200元（银币）创办戏剧团体，名“新民学社”，社址乾县城内。张秦伯任社长，聘请武生杨安民和礼泉三花脸张景民当教练，招收学员30余名，在尚家园子排练，并兼文化基础课程。后经范紫东说合，请当地首富刘文伯为剧社箱主，承担剧社开支，并将剧社改名为“晓钟社”，寓意鸡鸣报晓，晨钟惊梦之意，点破唤醒民众，迎接光明的宗旨。当时增收学生50余名，为与剧社名称相应，学生艺名带“中华民国晓钟”六字。来社的首名学生唐福，易名唐晓钟，后有任哲中、殷守中、杨晓

华、韩绪中等。1938年古会，晓钟社首演《杀狗》、《升官》、《二进宫》等20余出传统折子戏，获得成功。但由于剧目太小，没有本钱，学生水平有限，声誉日渐下落，刘文伯不惜重金在西安聘请演员，如刘毓中、孟遏云、刘易平、晋福长等，来“晓钟社”演出，轰动一时。接着精心排练范紫东创作的《三滴血》、《貂蝉》、《琴剑飞声》、《玉镜台》等10多个剧目，聘请文化和历史教员上课，加深演员对历史剧的时代背景、人物性格的了解。此时的“晓钟社”演员、乐队阵容整齐，生、丑、净、旦各有高手，加之剧目思想进步，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戏越演越红，一时名噪关中。1943年“晓钟社”扩大队伍，加强管理，移风易俗，不断革新。刘文伯特邀范紫东任理事长，刘昌卿任社长，招收了付晓民、付晓义等20余名艺班学生。当时王宝珊（王炳南之父）为“晓钟社”写对联一幅：“晓虽初年，光被四表；钟声浮动，响震三秦。”1947年晓钟社迁往西安。

明正社 秦腔戏班，1941年成立于泾阳。班主贾志明（山西荣河人）。同年亮台演出，声誉大振，成为渭北驰名的大型秦腔班社，十年不衰。如建国后仍为秦腔须生刘易平、阎原平、郭育民、焦晓春；净角田德年、田艺奎；生角任哲中、高登云；旦角孟遏云、何振中、肖若兰、宁秀云、余巧云；丑角阎振俗等都曾在明正社搭班演出。演员阵容整齐人才荟萃，在渭北观众中享有较高声誉。1950年后被三原专署接收。

民众剧社 豫剧戏班。1950年豫剧著名须生、红生演员曹子道在三原县城组建。先后在社内演出的主要演员有马双枝、张秀芳、巩金玉、孔艳琴等。上演剧目主要是豫剧传统戏《苏护进姐己》、《出五关》、《秦雪梅吊孝》、《西厢记》、《白蛇传》等，经常演出于泾阳、富平、耀县和铜川等地。1952年进了西安，后与狮吼剧团合建为西安市豫剧团。

二、建国后的剧团

咸阳市人民剧团 1950年5月成立。前身为三原分区人民剧团。剧团归咸阳专区领导，性质为地方国营。演职人员阵容整齐，导演田畴易、杨安民。至1952年，先后排演了《打虎计》、《闯王遗恨》、《红娘子》、《逼上梁山》、《大家喜欢》、《天河配》等剧目。1953年，咸阳专区撤销，改名“陕西省人民剧团”，归省领导。姜炳泰、袁光改编排导《屈原》、《法门寺》等戏，演出后反响较好。1954年5月向省汇报演出，获得好评，郭明霞已崭露头角。1956年陕西省第一届戏剧会演，创作剧目《丰乐园》获剧本二等奖，演

出和导演二等奖，音乐伴奏一等奖，美术设计三等奖。刘秉国、王正廉、郭明霞、王麦兰、李惠珍、王化民、孙正国、杨云堂获演员奖。同年，为了支持兄弟县文艺建设，郭维民、肖鸿斌、李发民、王碧云、车秀花、王月亭去乾县剧团；刘正民、王明花、贾玉花到高陵；刘玉英、芦晓霞去宝鸡；王惠芳、薛志秀、武惠群去省实验剧团、兰州秦剧团。1958年，杨兴、谭增成改编的《党的女儿》和杨兴、金茂创作的《跃进之歌》在西北五省会演中受到好评。1959年郭明霞、殷守中参加陕西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团进京和赴13省、市演出。1960年《岳家庄》、《假恹惶》等剧参加了全省青年会演。杨安民、梁雅山、康民强、李惠珍、芦晓霞等获奖，剧团获集体奖。1961年剧团交咸阳市领导。1962年董务本、赵梦兰、熊易民主演的《三打白骨精》，郭明霞、舒曼莉主演的《游西湖》在西安招待演出，反映强烈，《一家人》还由省电台录音。1965年丁明、谭增成、刘凤洲、王歌创作现代戏《庄稼人》，演出后反响很好。“文化大革命”中，剧团领导易人频繁，演出受到干扰和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艺术获得新生。先后排出《逼上梁山》、《洪湖赤卫队》、《杨门女将》、《窦娥冤》，恢复《铡美案》、《党的女儿》、《劈山救母》等戏，省电台、电视台作了录音、录像，向全省播放。1982年，排演《秦楼案》、《双钗记》参加了省、市会演并获奖。1986年排演《霍去病》、《醉仙图》，参加市新创作剧目调演，并获剧目、创作、演出奖。1989年，剧团实行公开招标，储志诚中标任团长，排演《九江口》，赴西安演出，获得好评，省电视台拍了电视，还有《阴差阳错》也录了像，向全省播放。

咸阳市大众剧团 1950年成立，属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文艺团体。当时主要演员有任哲中、师风琴、白甲寿等共10余名，上演剧目以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为主。1952年成立了剧团党支部、工会和少先队群众组织。1953年建成演出剧院，1954年又在马庄镇建起露天剧场。1958年剧团新编历史剧《双疑案》、《血溅鸳鸯楼》和《麻疯女》等保留剧目，在西安解放剧院演出，座无虚席。1960年，陕西省首届青年演员会演，剧团参演的《断桥》、《刺梁》获得赞誉。1961年2月改名为陕西省大众剧团，10月，仍归咸阳。1964年创作排演现代戏《第一个浪头》，参加省第二届戏剧观摩演出，受到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和省委书记张德生等领导的接见，省电视台实况转播，电台录音，《陕西日报》、《西安日报》发表剧评、观感、体会等文章10多篇。粉碎“四人帮”后，上演古典戏《逼上梁山》，轰动咸阳并波及西安，接着还演出

《八一风暴》、《杜鹃山》、《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特别是《万水千山》赴青海演出，反响很大。1981年在“咸阳地区青年演员会演”中，《断桥》中扮演白蛇的马金仙获一等奖，扮演许仙的贺天珍获三等奖；《安安送米》中扮演安母亲的王秀兰获一等奖，扮安安的巩正月获三等奖；《黄鹤楼》中扮周瑜的董素琴获二等奖；《打神告庙》中演员王莲歌获三等奖。1989年在省“农行杯”比赛中马金仙获一等奖，王义民获二等奖。9月《女皇与公主》，参加省第二届艺术节获银奖。后又代表陕西参加第二届中国艺术节，获优秀演出奖。《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和《文化艺术报》发表评论文章，省电视台录像并播放全省。

咸阳市豫剧团 1952年成立。时有演职人员21人。1953年增加到80余人。因专署撤销，改名咸阳市豫剧团。1955年建立党组织。1956年以《拷红》参加陕西省第一届观摩演出，主演张香芙获演员一等奖，梁凤彩获二等奖，盖韵笙获导演三等奖。1959年剧团赴四川成都、重庆等地演出，主要剧目有《杨八姐盗刀》、《十二寡妇征西》共10多本戏，巡回演出8月之久，盛况空前。《重庆日报》、《成都日报》连篇发表赞誉文章。1960年剧团以《庵堂认母》、《挡马》，参加陕西省青年演员会演，潘景仙、梁凤彩、李志芳获演员奖，关山峰获导演奖。1962年毛云霄改编《香囊记》、《云中落绣鞋》，移植《杨立贝》，挖掘《反楚国》，经演出反响很大。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领导人靠边，艺人挨斗，戏箱被焚。1972年市革委会撤销豫剧团，成立文工团，大批人员改行就业。1973年元月恢复豫剧团，流失人员陆续调回，排演了《山鹰》、《杜鹃山》、《朝阳沟》，以及《李双双》、《宋文英》等剧目，演出日益繁荣。1981年地区中青年演员调演，吴美玲获一等奖，何丽萍获二等奖，张建芳获三等奖。1984年豫剧团归咸阳市领导。1986年排演了现代戏《十五的月亮》、《酷情》、《儿女传奇》等。1989年，举行咸阳市中青年演员“农行杯”大赛，潘景仙获一等奖，朱建平、徐凤云获三等奖。

礼泉剧团 成立于1952年，始名群众剧团，属民间职业性质。1955年参加宝鸡地区戏剧会演大会，演出秦腔传统戏《铡美案》，罗玉山获演员甲等奖，杨秀芳、郑维民获乙等奖。演出《三滴血》，强凤贤、马友爱、薛德发获演员甲等奖，郑盟获乙等奖。1956年改为全民单位，易名人民剧团，1958年又将国营剧团转为集体事业单位，实行国家补贴。后随礼泉并入乾县，改为乾县一团，1961年复改为礼泉县剧团。1964年改编古典剧《双命案》、《郁轮袍》和现代剧《秦川儿女》，参加陕西省第二届戏剧观摩大会，迷胡剧

《秦川儿女》获得好评。1981年参加咸阳地区青年演员会演，折子戏《杀狗劝妻》、现代戏《杜鹃山》主演李化英、韩利梅获演员二等奖。1985年新排古代戏《碧云寺》，参加地区新创作剧目会演。1988年所演剧目《薛刚反唐》、《大破天门阵》、《葫芦峪》等，受到观众欢迎。

永寿剧团 1952年成立，属集体性质的事业单位。演出剧目有《放饭》、《打盗驾》、《拣柴》、《长坂坡》等，深受山区人民欢迎。1955年重点排导《貂蝉》一剧，参加了宝鸡地区文艺会演，李树茂获一等奖，师明金、吴小红获二等奖，苟仁发获三等奖，乐队刘芳获伴奏二等奖。1958年，演出《苦菜花》、《赤卫军》深受观众喜爱。1964年剧团以迷胡现代戏《金花浪》、《卖醪糟》参加了咸阳地区会演。同年，古典戏停演，剧团改名“永寿县文工团”，人员精简，留团36名。请省歌舞剧院协助排演了歌剧《江姐》、《向阳川》。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资料遭焚毁。至1967年剧团人员仅留18名，正常业务停止。1970年排导现代迷胡剧《风展红旗》，并参加咸阳地区戏剧会演。1977年剧团排演《逼上梁山》、《十五贯》，轰动乾县、礼泉、永寿三县。1982年以《藏舟》、《打渔杀家》等戏参加地区中青年演员调演，尚祥民获演员二等奖，陈秀兰获三等奖。1984年剧团实行团长负责制。排演《四贤册》，1985年参加市上调演，高清水获一等奖，苟伯平获二等奖，后参加省首届艺术节高清水、苟伯平分获二、三等奖。1986年排演《轶侯剑》，参加新创作剧目展览演出，省电视台录像，向全省播放。1990年新排小戏《借宿》，参加省现代戏调演，获舞美设计、音乐伴奏三等奖，王小玲、左文娟获表演三等奖。

泾阳县剧团 1951年由民间班社“民声社”改建，1952年正式命名民声剧团，集体性质，自负盈亏。演职人员90余名。主要剧目有新编历史剧《新九件衣》、《赤胆忠心》和传统戏《梁山伯与祝英台》、《家庭痛史》、《天河配》等70多本，经常演出于三原、高陵、富平、耀县、铜川等地，影响较大。1953年，相继排演《西厢记》、《窦娥冤》、《四进士》等戏，一大批青年演员脱颖而出。1955年除传统历史剧外，还演了大量现代戏剧目。1956年，彭易国主演的《梅路》、宋竹梅《藏舟》参加陕西省戏剧会演，并分别获二、三等奖。1960年泾阳、三原、高陵、淳化合为三原大县，民声剧团改编为三原县戏曲剧院秦腔一团，以演现代戏为主，且秦腔、迷胡兼演，上座率较高。1961年恢复泾阳县人民剧团，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剧团演出处于低潮。1966年泾阳县开展“四清运动”，剧团停演，人员下乡参加社教，工资由政

府拨发。“文化大革命”中，领导靠边，艺人挨批，绝大部分演职人员回了老家。1969年剧团精简，仅留演职人员9人，其余全部解散回家。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戏曲艺术获得新生，剧团步入正轨，相继排演了《逼上梁山》、《十五贯》和现代戏《洪湖赤卫队》、《八一风暴》、《万水千山》等。主要演员有薛德发、焦振堂、肖益民等10多位。剧团办起“文艺训练班”，聘请教练，加强培养，先后排出《双明珠》等7本和12个折子戏，其中《白蛇传》被省电台录音播放。1978年恢复泾阳县人民剧团建制，重排了20多本传统剧目，演出日渐繁荣。同年何本云任书记兼团长，主要演员有陈仁义、王益民、宋竹梅等，剧团行当齐全，阵容可观。尤其是陈仁义入团主演《下河东》驰名全省，别具一格。代表剧目有《下河东》、《斩李广》、《出汤邑》、《辕门斩子》等。1984年新排《泾阳之盟》（作者孙俊发），参加省展览演出，获文化开拓奖。1985年新排《画龙点睛》，在西安易俗社连演18场。《李白辞朝》主演周留华、陈仁义、杨金胜、孙美蓉等，省电视台、电台录音录像，向全省播放。1988年陈仁义任团长、王剑英任副团长兼书记，排演现代戏《酷情》，受到社会关注。省电视台录像播放后反响很大。后又新排《孝廉弑母》、《清风亭》等剧。

三原县剧团 成立于1952年，当时接收建国社，改名为三原新艺社，属集体性质。县委派李文兴为政治指导员，杨尚文任行政团长，王宝森、梁秋芳任业务团长。1956年，渭南地区首届戏曲会演，新艺社参演剧目有《梁秋燕》、《铡美案》、《中秋之夜》、《黑旋风李逵》等，其《中秋之夜》获演出奖，王建娥、张秦民、李光辉、梁秋芳获表演三等奖。1960年泾阳、三原、高陵、淳化合为大县，剧团相应合并，统称三原戏曲剧院，刘克诚任院党委书记，侯永福任院长，全院共分四团，泾阳一团、三原二团、高陵三团、淳化四团。同年参加陕西省青年演员会演，三原戏曲剧院，从四个团中抽调骨干，组成“标兵”剧团，三原二团宋桂兰《悔路》获表演二等奖，省电台作了录音。1961年三原大县分开，三原戏曲剧院随之解体，四个剧团各归各县，恢复原名。三原剧团历经合分，但演员阵容整齐，演职人员多至80余人。刘克诚任书记兼团长，狠抓排练，经常上演剧目有《火焰驹》、《玉虎坠》等10余部，受到观众好评。1964年，古典戏停演，剧团排演了《沙岗村》、《第一个浪头》、《杜鹃山》、《沙家浜》等一批现代戏，在渭北一带演出，名噪一时。创作剧目《婆媳之间》，赴咸阳参加调演，程小玲、张秦民和剧本同时获奖。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领导挨斗，演员受批，戏装

损坏，正常演出不能进行。1976年“四人帮”垮台，古典戏获得复苏。剧团先后排演了《三滴血》、《十五贯》、《游龟山》、《四进士》等剧目。1978年创作改编了大型历史剧《甲午海战》，多次在西安演出。1981年文艺班与剧团合并，参加咸阳地区中青年演员会演，程天德、贾金娥获三等奖，冯武耕、刘美丽获三等奖。1987年参加省首届艺术节，以《丹青泪》（作者邓春松，导演胡正友、朱文艺，作曲田传熙）参赛获剧本二等奖，综合演出三等奖，赵改琴获演员一等奖，另外还获得12个单项奖。1988年陕西电视台举办“公主杯”大赛，刘美丽《痴梦》获一等奖，“咸阳杯”及西北五省电视大赛二等奖。年底剧团还配合省电视台举办了春节戏曲晚会。

淳化剧团 1951年由民间班社“化淳社”组建的，属集体事业单位。改名为“淳化县民艺剧团”，首任团长王增才，副团长王义国，共有演职人员40余名，排导了《鱼腹山》、《三滴血》、《九件衣》和现代戏《白毛女》等。1957年又派侯永福、张新青为剧团支部正、副书记。同年招收学员40余名，演出《梁秋燕》等现代戏10多本。1958年淳化合并为三原大县，民艺剧团人员归属于演出二团，出色演员如张爱英、杨淑兰等20余人编入青年标兵团。1961年分县，以演现代戏为主，兼演古典戏，先后演出20余个剧目，活跃于咸阳地区及延安、西安、宝鸡等地。1964年古典戏陆续停演和限演。1966年剧团改名“淳化县文工团”。1969年以后，开始排演“样板戏”及现代戏共10多台。1975年咸阳地区戏剧调演，青年演员刘锁侠、刘卓中主演的《红色娘子军》，得到省电台录音播放。1978年，淳化县文工团接收文艺班王宏莲、罗娟等13名学员，恢复排演了《假婿乘龙》、《慈母泪》、《杨门女将》等数十本古典剧目。1981年文工团更名为“淳化县剧团”，参加咸阳地区中青年演员调演，刘锁侠主演《红色娘子军》“常青指路”一折，获演员二等奖，刘胜利演的《烙碗记》，获三等奖。1983年，罗启涛任团长，王文才、贺康健任副团长，排导了冯萌献编古代戏《启棺辨贤》，参加市新创作剧目会演，获综合演出三等奖。1988年，剧团实行“团长负责制”，贺康健任团长，对《贞观遗恨》进行加工整理，并参加咸阳市第二届新创作剧目调演，获综合演出二等奖、舞台美术奖，贺康健、王文才获艺术管理和导演奖，王宏莲获表演一等奖，王志强、罗娟、杨宝利获表演二等奖。

旬邑县剧团 1951年县政府成立“旬邑文风剧团”，属集体事业单位，张杰任团长，全团演职人员40人。当时演出水平不高，后从外调来余庆民等近10名演员，并招收学生30余名，相继排出《回荆州》、《玉堂春》、《梁秋

燕》等10多出戏。1956年王西亭为团长，导演严明军，教练王安中。先后演出《金瓯钗》、《盗虎符》、《青梅传》等近10个剧目。王升云演《长坂坡》、《回荆州》中的赵云、陈云英扮演《西厢记》、《青梅传》的红娘和丫环，石含民扮演《杀庙》中的韩琪，均受到群众的欢迎。1959年彬县、旬邑、长武三县剧团合并为一个剧团，王西亭任团长，全团共180人，分甲、乙两个班。当时上演的《血泪仇》、《三世仇》、《火焰驹》、《三滴血》等剧目获较高评价。1961年剧团人员流失严重，演职人员仅留35人，后经同意招收演员，扩充实力；在传统历史剧停演的情况下，着力排导了秦腔、迷胡、歌剧等剧种的现代戏，演出新戏《会计姑娘》、《血泪仇》等大小剧目25本。并向“乌兰牧骑”学习，剧团演职人员分成若干小组，深入乡镇农村演出，颇受群众喜爱。1966年剧团演出停止，后又成立文工团，1979年剧团更名为“旬邑县人民剧团”，王升云任团长，演出历史传统剧目。1981年咸阳地区中青年演员会演，王升云、陈云英获二等奖，石含民获三等奖。1984年剧团进行体制改革，实行承包责任制，苟明文任团长。新排剧目有《秦香莲后传》、《春江月》、《喜脉案》、《徐九经升官记》等。1985年，张芳玲在市青年演员调演中获二等奖。1986年新编剧目《杏林案》，参加市新剧目会演获演出奖和音乐创作奖。同时先后在咸阳剧校培养学员40余名。1988年，卢元琦任团长，实行基本工资加浮动等一整套规章制度，并新排了《海瑞驯虎》、《窦娥冤》、《凤冠梦》等新戏。

武功县剧团 1952年由民间班社改组成立，名为“新武剧团”。1956年命名武功县人民剧团，为集体所有制。武自忠任指导员，薛安民任团长。有翟登云、王新芳、张小云等85名演职人员，上演剧目85本，其中《状元媒》红极一时。1958年，武功、扶风、兴平合并为兴平大县，武功、扶风剧团合称二团，书记王正民、副团长靖新安，主要剧目有《两颗铃》等，演红周边几县，曾在西安连演一月之久，青年演员范俊芳出演的关中道情《隔门贤》、《庙遇》获省青年演员会演一等奖。1961年分县，恢复武功人民剧团，张彦汝任书记，翟登云任团长。1965年主要演员有范俊芳、许友成、许良俊、薛慧芳、蔡素珍等近10名，新排《黑旋风李逵》等10余本剧目，现代戏《党的女儿》等新戏也陆续上演。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文艺获得新生，演出日趋正常，刘培英任书记，恢复演出历史剧和现代剧。1981年贺文岐任书记，张万春、范俊芳担任正副团长，全团演职人员共60余名，排演了大批新编历史剧和传统剧。同年赴宝鸡市会演，罗志杰、李碧莲主演的《三对

面》，分别获演员一、二等奖，范俊芳、万辉主演的《柜中缘》，分别获一、三等奖，王丽、冯永红主演的《花园卖水》，李慧茹主演的《鬼怨》均获演员三等奖。省电台录播了李碧莲、陈新怀、罗志杰的部分唱腔。年末剧团被评为宝鸡市农村文化艺术工作者先进集体，获得锦旗一面。1984年，鲁建华任剧团党支部书记。10月参加咸阳市折子戏选拔赛，李慧茹主演的《陈姑赶船》获青年演员一等奖，并参加省会演获二等奖。冯永红、万辉获市青年演员三等奖。1988年新编古代戏《苏武》参加市新创作剧目会演。同年张德启、康建海参加省中青年演员“农行杯”大赛，同获一等奖。1990年，剧团新排《活捉三郎》，参加省丑角戏调演，刘关卫获表演二等奖。

彬县剧团 1951年成立“彬县文声剧团”，王伯华任团长，肖锋任副团长，张镜堂任导演，实行供给制。1954年取消供给制，实行工资制。1959年，剧团在西安演出，李晓霞应邀到人民大厦为会议演出《斩秦英》。1961年，分县分团，仍为“彬县剧团”，县财政每年给一定补贴。1966年王俊杰任团长兼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历史剧服装及道具被烧毁，演出停止。1970年张登高任团长，排演了《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由于派性干扰，演出极不正常。粉碎“四人帮”后，《逼上梁山》、《三滴血》、《十五贯》等剧重新演出，深受观众喜爱。1981年咸阳地区中青年演员调演，李晓霞、赵琴霞、王萍和祝栓民，分别获一、二、三等奖。1983年焦春明、巨太民担任正、副团长，1984年参加市青年演员调演，王萍获一等奖，刘芳霞获二等奖，穆爱玲获三等奖。李晓霞主演的《斩秦英》，省电视台、电台录像录音，向全省播放。1985年由曹剑、杨民权创作的《刘志丹下邠州》，受到市文化局表扬，并奖励2000元。1986年创作剧目《雍城之变》，获市调演大会演出奖。新创作剧目《八十一天县令》，参加了1988年市新创作剧目调演，剧团获综合演出奖，剧本三等奖和音乐伴奏奖，杨民权获艺术管理奖，房德怀获作曲奖，胡锋、苟香梅、刘芳霞、房燕均获三等奖。1989年省市举办“农行杯”大赛，李晓霞获省三等奖，市一等奖，苟香梅、关风云、郭宽儒均获市二等奖，王生华获市三等奖。杨民权参加市老艺人发证录像演出。

乾县剧团 1952年接收“艺声社”，改名“乾县人民剧团”，为自负盈亏集体单位。演员阵容整齐，演出很受欢迎，须生龚清义的《拆书》、旦角崔惠芳主演《天河配》和《秋江》，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不久，剧团被宝鸡专署接收为“宝鸡人民剧团”。1954年张建中任团长，办起了“灯塔剧社”。1955年县上对剧团进行整顿，并派葛振川任指导员。1956年贯彻党的

“支持地方文化建设”精神，原省人民剧团向乾县调了郭维民等 20 余名演员，将原“和平剧团”，经过组合下放，组成“乾县人民剧团”，演出质量提高，以团养团，且略有节余。1958 年乾县、礼泉、永寿三县合并，剧团改名“乾县第二人民剧团”，派胡广才、杨森林任支部书记、团长，周希文、王碧云任副团长。经过一年努力，皮影弦板腔搬上大戏舞台。并于 1959 年新排弦板腔《紫金簪》参加陕西省地方戏曲会演，引起关注和轰动，遂将剧团改名为“乾县弦板腔剧团”。1960 年省文化局举荐赴甘肃、青海、宁夏等地作巡回演出，蜚声西北。弦板戏《九联珠》王碧云唱段、《紫金簪》车秀花唱段、《三女告状》车秀花、赵琴芳、王月亭的唱段均被录制成唱片，在省台和中央台播放。“文化大革命”中，古典戏停演，大批演员离团。1977 年传统剧解冻，恢复了保留剧目《紫金簪》、《九联珠》等。1978 年张汉新编历史剧《白马盟》参加了地区创作调演，获创作一等奖，并参加省上会演，祝光裕获市布景一等奖，李育亭获音乐二等奖。刘智民、贾希成获导演三等奖，税小玲、黎小云获演员三等奖。《紫金簪》全剧被省电台录相录音。1983 年剧团分两个演出队，一队由黄振武、马效武担任正副队长，演员有强淑霞等 60 人组成，主要剧目有《劈山救母》、《夺锦楼》等。二队由刘智民任队长，演员有税小玲、丁碧霞等 60 名学生为主，排练整理《金鳞记》、《紫金簪》，演出于陕甘两省。1987 年两队合团，刘智民任团长，并排出《四姐临凡》，省电视台曾录像播放。1988 年付飞社演的《拾黄金》，参加市上会演，获演员一等奖，参加西北五省区电视大赛获三等奖。同期，以梁建国创作的《人鬼情》参加市上会演，演员税小玲获一等奖，周峰、陈晨分别获二、三等奖，刘智民、弋志军演弦板腔获省电台“钟楼杯”一等奖。

长武县剧团 成立于 1956 年，属集体性质文艺团体，首任团长尚崇基，副团长袁发明，共有演职人员 70 余名。其中主要演员有须生袁发明、鱼庆民，旦角齐佩红、鱼淑芳，生角王忠彦、吕集皓，净角赵济民等。1957 年建成剧院。1958 年彬县、长武、旬邑三县合并，剧团改名“彬县第三人民剧团”，1959 年三团合一为“彬县人民剧团”。1960 年参加陕西省青年演员会演，鱼淑芳获演员二等奖，贾化民获导演奖，《长坂坡》获音乐奖。1961 年长武县人民剧团恢复，书记王尚斌，团长邓春福，演职人员共 50 余名。演出现代戏《山里人》、《接枪》等，受到群众欢迎。《接枪》小戏还参加兰州军区会演，并获二等奖。“文化大革命”初，改名为“长武县文工团”。1972 年参加咸阳地区现代戏会演，汤桂琴获演员一等奖，胡进善获二等奖，创作剧

《机井之花》获二等奖。1981年尚光哲任团长，陈理贤、李扶中任副团长。剧团参加咸阳地区中青年会演，李扶中主演《哭祖庙》获演员一等奖，白萍、陈理贤分别获二、三等奖。1984年，参加地区青年演员会演，白萍主演《藏舟》获一等奖，雷金鹏的《打擂台》、贾琦玲的《拾玉镯》、武红霞的《辕门斩子》均获演员二等奖。白萍主演《藏舟》参加省青年演员会演，获演员二等奖。1987年县文教局副局长尚忠厚兼任剧团书记，陈理贤任团长。同年吸收县“文训班”学员27名，参加市青年演员会演，白萍演《桃李梅》获一等奖，郭云惠《窦娥冤》获二等奖，李孝义《杀庙》获三等奖。1988年参加市“农行杯”中青年演员大赛，陈理贤演《座窑》获市一等奖、省上二等奖，李孝义、段国栋、张文钊、田义虎均获市三等奖。1989年剧团新排现代戏《败家子》，古代戏《陆巡挂帅》、《杨门女将》，演出反响良好。剧团被市文化局评为先进单位。

第四节 演出场所

咸阳古代的演出场所，是伴随宗教祭祀活动而出现的庙会。演员在露天土台演唱，观众围在四面观看，虽然简陋，却是劳动人民的重要娱乐场所。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戏楼，亦称戏台、乐楼。咸阳地区建筑最早的戏楼，当属泾阳蒋路乡安吴堡村的迎祥宫戏楼。据明修《泾阳县志》载：“迎祥宫建于金大定四年（1164）。”史料记载，清至解放前夕，彬县就有古戏楼100余座，遍及全县各地，礼泉有古戏楼30多座，分布城乡。据粗略统计，全市古戏楼约1000余座。这些戏楼多为砖木结构，拱脊翘檐，雕梁画栋，墙壁彩绘，两边有对联。如礼泉赵镇石鼓戏楼对联是：“可刚可柔格外文章圈外柱；是真是假水中明月镜中花”，上额是“遇今见古。”三原城隍庙戏楼是：“假貌写真情莫闲看镜花水月；新声传旧事须认作暮鼓晨钟。”建国后，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日益提高，封建迷信活动减少，绝大部分庙宇已被拆除，仅留戏楼供群众演出娱乐。1960年以后，戏剧发展很快，剧团规模较大，旧戏楼所剩无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戏剧舞台加露天剧场，各个乡镇和大村几乎都有，粗略估计全地区有400多处。尔后演出场所逐步向室内剧场变化，戏楼小台向剧院发展。现在全市有社会剧院14所。同时，由于咸阳工业的发展，国营厂矿企业有的建成俱乐部或礼堂，如西北国棉一、二厂礼堂，纺织机械厂、石油钢管厂俱乐部、西藏民院礼堂等一批设备齐全，建筑现代化的剧场，不仅可供集会，还可演戏、放映电影。据1989年统计，全

市共有剧场 22 座、座位 30467 个，演出场所潜力很大。

一、古戏楼

咸阳县城隍庙戏楼 始建于明洪武四年（1371）。砖木结构，拱斗挑角，四面流水，台口两根明柱，将表演与伴奏分开，前后台有墙隔离，前台演出，后台化妆。台前约四五亩地旷场，可容万余观众。建国后，曾登记为“双友”茶坊，以便接待演出团体。由于演出增多，茶坊生意兴隆，在台下盖起大席篷，设置长连椅，演戏风雨无阻。1951 年初，省公安厅文光剧团来此演出《红楼梦》，轰动咸阳，连演数十场，场场爆满。戏楼于 60 年代拆除。

咸阳县忠显王庙戏楼 位于仁义巷中段，建于明初。砖木结构，拱斗挑角，四面流水，坐南向北，紧靠城垛，正对忠显王庙大殿。戏楼与大殿之间，有 10 米左右宽的院落，可容千人站立观戏。益民社、民艺社和外来戏班先后在此演出。建国后，县粮食局将大殿和廊房改作仓库，1962 年拆除。

咸阳县里民局戏楼 位于中山街里门局内。1944 年县参议会设此处，曾修葺一新。戏楼坐北向南，宽五间，挑角明柱，砖木结构。台前场地开阔，可容万人站立。益民社、民意社、战胜剧团等班社曾在此演出。建国后，咸阳专区文工团曾在此演出。80 年代拆除。现为市人民剧团驻地。

咸阳县关帝庙戏楼 位于仪凤街东头，坐南向北，台前可容五六千人，与关帝庙相对。砖木结构，拱斗挑角，四面流水，系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所建。因戏楼位置适中，1941 年前后，宣传抗日的文艺队曾在此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剧目，1946 年因修建八保学校而拆除。

咸阳县圣母宫戏楼 位于仪凤东街，坐南向北，面对大殿，台口明柱两根，雕刻绣花门楣。台后高垛、台下正中为圣母宫大门。此戏楼为市内惟一保留比较完整的古戏楼。

泾阳县迎祥宫戏楼 位于蒋路乡安吴堡村。据宫内现存《敕建大道迎祥宫》碑石看，金元时期这里已是具有相当规模的道教宫院了。清末安吴拾义堂周夫人（即安吴寡妇）重修。迎祥宫戏楼，系砖木结构，南北两拱相连，琉璃瓦盖顶，有脊有兽，两边檐角高翘，高约 10 米。舞台正面四根红柱撑起前檐，约 5 米高，檐下雕刻、彩绘“二龙戏珠”、“飞凤朝阳”等艺术作品。合顶中央悬挂八卦太极图，四阁天花板尽画《封神全传》故事。正面木板隔着前后台，上端书写“清歌妙舞”牌匾，舞台两侧各有一间城楼，屋顶室为化妆之所，由三间磨砖刻画而成。舞台向北，正对大殿。殿前高地 1 米，全

用青石方砖铺地，供官员士绅观戏。戏台可供观众三面看戏。1937年，中国西北青训班的戏剧工作者和省委“七月剧团”等，曾在此戏楼演出3年之久。现在戏楼犹存，但破损严重。

彬县城隍庙戏楼 位于城关小学院内，创建于明太祖洪武初年，宣德四年（1429）和弘治元年（1488）都曾重修过。戏楼为坐南向北两层重檐楼阁式建筑，通高约12米，戏台长10米，宽8米，向左右八字形伸展，建成供官吏、士绅观戏的长廊。戏台两边有乐队边厢，整个戏台呈扇形展开，显得协调开朗。楼顶有五脊大兽，筒瓦清沟，装设精美铁制的避雷针，戏楼四角檐下，挂有风铃。戏楼布局合理，建造精致。清至民国，城隍庙每年都有庙会，正会在农历正月十五和四月初八。副会在七月二十二日，为生意人敬奉财神的盛会。起会又有演戏助兴，戏楼专供使用，善男信女云集观戏，热闹非凡。彬县人民政府曾拨专款维修。

彬县云寂寺戏楼 位于永寿县甘井乡杜家砦村。寺院建筑占地660平方米，周围古柏参天，风景如画。戏楼坐落寺内，台口向北与大成殿相对。戏楼系砖石木结构，面积3间，建筑考究，设计古雅，观众可从三面观戏。据《永寿县志》记载，明天顺元年七月（1457）重修过云寂寺。大成殿3间改为5间，两廡旧各5间增为9间，以至戟门棂星门神等均予修复。1950年拆除。

彬县毕公村戏楼 位于杨陵区五泉乡，建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坐南向北，和太白庙遥遥相对。1923年二次翻新，将土木石结构变成砖木石结构，台口全用青石条砌成。楼内有四道幕柱，楼后有化妆室，两侧是木雕画廊，又是文武场面活动场所。戏楼规模宏伟，美观大方，是当地群众戏剧活动中心，每年古历二月初七演唱社戏。1965年拆除。

三原县城隍庙戏楼 又称歌楼。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经几次修葺，至今尚好。戏楼属汉族古典建筑风格，大屋顶，高台阶，楼顶呈“重十字歇山顶”形式，全部用优质松、水磨砖、青石砌筑而成。楼外两层，上为舞台，下设中门和两个偏门。楼顶中央矗立高达3米之“明月楼”琉璃饰物，雕塑精巧，楼脊饰以琉璃怪兽，四角挑檐各挂风钟。楼正面屏障彩绘“海水朝阳”、“夔龙对舞”图，正中竖一匾额，上书“伶人献技”。楼前长柱悬挂对联一幅：“假貌写真情莫闲看镜花水月；新声传旧事须认作暮鼓晨钟。”戏楼斗拱悬空，圆柱林立，木刻雕花，檩椽纵横。古时每逢农历八月初二庙会，楼上载歌载舞，善男信女楼下观看，大殿石栏上设立雅座，达官贵人居高下览，欣赏演出。由于年代久远，戏楼毁坏严重。1983年国家拨款

重修。

杨陵洪积寺古戏楼 位于杨陵区李台乡。明万历二年(1574),云游高僧登真来到洪积村,发现村南甜水井一口,石香炉座,认为此地灵气通仙,于是化缘集资,在洪积村南修建一座寺院和戏楼。戏楼高3.5米,宽5米,是一座砖木结构建筑。楼脊飞禽走兽,龙飞凤舞,楼口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戏楼虽不宽敞高大,但却玲珑美观。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洪积村的群众自愿集资,对寺院和戏楼进行了翻修。随着群众对戏剧活动的喜爱日深,不仅木偶、皮影、自乐班在洪积寺戏楼常演不衰,而且大戏亦在戏楼上演。后来两村群众建起了一座专演大戏的北戏楼,一座上演小戏的南戏楼,每年农历三月初十洪积寺戏楼演唱社戏一台,十月十日北戏楼演出大戏一台,正月十三、十月十三关帝庙前的南戏楼,要唱小戏两台。“文化大革命”中,三座戏楼无一幸存。

杨陵永安村渭阳楼 位于杨陵区永安村。据说在清乾隆年间,永安镇四乡群众曾自动集资翻修一次,1958年后,一场大火,焚毁无存。据回忆,古戏楼宽5间,楼7米,砖木结构。楼脊是陶土烧成的飞禽走兽,楼口有红木柱子两根,用于张贴对联。五楞花木窗两孔,分居两侧,为乐队伴奏场地。中间有一道腰墙,把戏楼分隔前后台两部分,旁开小门两个,供演员上下场之用。前台供演出,后台化妆和休息。永安村古称永乐,每年农历三月初六、四月初六过会两次,演戏助兴,庆祝丰收。据说袁璧辉、刘金库等人曾在此楼演出《拾玉镯》、《走雪》等戏,名噪一时,流为美谈。

二、剧场(院)、礼堂

关中分区马栏大礼堂 1941年马栏解放,关中地委、军分区决定,自力更生,义务劳动,建个大礼堂,既可开会,又能演戏。经军民共同努力,1943年建成一座简易礼堂。正门上方“大礼堂”三字镶在山字形砖墙中央,观众可由三个大门同时入场。一个舞台两用,逢雨雪或暑寒之时,活动均在屋内,若天气晴和,观众可坐在广场观看演出。前后两个台口,明柱、大梁一色大红油漆,台沿立木刻花栏,台中木板架在12个大瓮上,以借瓮声共鸣。1947年蒋军大举进犯边区,大礼堂遭到破坏。解放后,旬邑县在此遗址上,建立了一个地段医院。

咸阳人民剧院 又名咸阳剧院,位于咸阳市城内中山街,1956年落成,剧院占地面积2148平方米,系砖木结构,舞台口宽9米,深14米,池厅座

位 754 个，厅内面积 984 平方米，设计造型大方别致，1957 年进行了扩大增修，设立站位。1963 年扩建后台，增修简易票房两间。1964 年，咸阳三大剧院（新兴、大众、咸阳）合并，命名咸阳市剧院。1966 年，咸阳市剧院改为咸阳地区人民剧院。自开放以来，曾先后接待省、市、县级剧团和外地表演团体。接纳剧团之多，上演剧目之繁，社会影响之大，位列咸阳市境各剧院之首。

咸阳市大众剧院 落成于 1954 年，位于市内中山街东段。剧院舞台宽 9 米，纵深 12 米，青瓦盖顶。池厅为油毡大棚，宽 20 米，长 30 米，设 800 个座位。1956 年剧院进行翻修，将油毡大棚改建为简易木结构瓦房。1958 年，咸阳县政府批准大众剧院属国营事业单位，并将原个人投资由地方财政归还，剧院与剧团脱钩。1965 年对舞台升高加大，建成宽 20 米，深 20 米，高 8 米，台口宽 12 米的舞台。以后又在台后建成 120 平方米的化妆室，解决了舞台小、低和化妆室拥挤问题。1972 年，又将池座条凳改为单座木椅，座位 1000 多个。1978 年，在池厅东边修建厦房 8 间。1979 年，将观众厅改建成长 30 米，宽 21 米的砖木结构，设座位 1175 个，门厅上边增加 120 平方米电影放映室，添置电影大座机 2 台，舞台增加灯光、幕布和全套扩音设备。1986 年建成临街房 5 间，开展多种经营。剧院曾接待了省戏曲研究院、易俗社、北京艺术团、兰州秦剧团等数百个艺术表演团体。

新兴剧院 位于新兴路东侧，1955 年兴建。1956 年农历正月初一落成开放。同年转为公私合营。初建为土木结构，有座位 810 个。1965 年政府拨款 4 万元，翻修为砖木结构，座位改成单独木椅，增加了电影放映设备。多接待豫剧、曲剧等文艺团体演出。1985 年后归市领导，后又下放渭城区文化局管理。

咸阳市秦都影剧院 位于人民路七厂什字西段，1979 年政府投资 400 余万元兴建，1984 年底落成营业。剧院建筑宏伟，设备先进，环境幽雅，为省内一流规模。总面积 8250 平方米，观众厅上下两层，设有 1500 个软座，舞台纵深 17.5 米，台口宽 14.5 米，高 9.5 米，两边侧台为 80 平方米。36 道电动吊杆，三速电动金丝绒幕，90 路可控硅灯光操作台。面光 2 千瓦 17 支，耳光 12X₂，梯光 12X₂，侧光 10X₂ 及顶，天幕蓝、红排灯。音响设备为进口和国产，混响齐全。后台有化妆室、更衣室和演员休息室。台前有 100 平方米乐池，剧院有大厅、二厅、东厅 450 平方米的观众休息厅。放映设备先进，配套齐全。剧院安装空调，冬暖夏凉。剧院属市文化局事业单位，经费自收

自支。1990年陕西省文化厅授予“演出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咸阳市工人文化宫剧场 1956年由陕西省总工会拨款兴建，1958年国庆节落成开放。该宫坐落于人民中路，门向北开，鱼背型砖木结构，总面积为1500平方米，南北长50米，东西宽30米，设座位686个，两侧栏杆外可容200人站立。舞台口宽12米，深14米，高5米，两边文武场地各3米多，后边续建化妆室48平方米，前门又续建了过厅。楼上是电影放映机房，过厅两侧各有一间工作人员办公室。舞台幕帐、灯光、化妆镜设备齐全。文化宫地址适中，流量大，上座率较高，曾接待不少中央、省、地剧团演出。

纺机剧场 位于市人民路纺织机械厂生活区内，建于1983年，混凝土结构，池厅两层，座位2139个。舞台高8米，台口宽14米，舞台深13.2米，空间高度18米，乐池40平方米，化妆室80平方米。扩音设备齐全，可控硅灯光设备、吊杆20道，幕布齐全。

国棉一厂大礼堂 位于西北国棉一厂生活区内，1984年建成，池厅两层，座位2491个。舞台口高7米，台口宽14米，深13.5米，舞台空间高度12米，乐池28平方米，化妆室3间，扩音、灯光、幕布、地毯齐全。

西藏民族学院大礼堂 位于民院西侧，建于50年代初。池厅有座位2006个，台口高5米，宽6米，入深5米，舞台空间高度12米，化妆室4间80平方米，扩音、灯光和幕布齐全。

彩电剧场 位于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生活区内，1987年建成，池厅座位1600个，台口高8米，宽15米，入深8米，舞台空间高度19米，乐池60平方米，化妆室4间，吊杆37道，扩音、灯光、幕布齐全。

石油俱乐部剧场 位于毕原路东段，建成于1986年，池厅有座位1155个，舞台口高度6.5米，台口宽13米，舞台深度13米，舞台空间高14米，化妆室两间40平方米，幕布灯光齐全。

二厂俱乐部剧场 位于人民路西段，西北国棉二厂生活区内，1987年建成，池厅有座位1600个，台口高8米，宽15米，入深8米，舞台空间高度为19米，乐池60平方米，化妆室4间80平方米，吊杆37道，扩音、灯光、幕布设备齐全。

境内各县也均有剧院，而且多数在七八十年代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维修和改建。

第五节 民间戏剧活动

咸阳市民间戏剧活动，历史久远，遍及村镇。随着大戏班社的发展，民

间小戏班如小型剧团、木偶戏、皮影戏大批出现，据考证清代乾隆以后尤为兴盛。这些小戏满足了下层劳苦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所以师承相传，经久不衰。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至1949年间，全区民间小型剧团共有35个，从艺人员800余人。木偶、皮影戏更是悠久，清同治元年（1862）至1949年，共有33个，从艺人员400余人。建国以来，城区厂矿单位的业余演出应运而生，农村小戏活动更是十分活跃。这些小戏多在节假工余或农闲季节演出，演职人员来自工人、农民或小手工业者，多是根据工作任务和生活实践，自编自演。据不完全统计，全市1949—1989年共有民间小型秦腔剧团55个，演员近200人；有木偶、皮影和曲子小戏班117个，从艺人员约700人。礼泉县被誉为“小戏之乡”，闻名遐迩。1949年以前有戏班19个，建国后至80年代全县有小戏班34个，从艺人员约300人。城乡业余剧团主要有：

咸阳总工会秦腔剧团 成立于1977年。演员是来自工厂、农村业余爱好者和剧团退休老艺人。戏箱由各工厂业余剧团捐赠和自购添置。剧团成立后，排演《游西湖》、《双明珠》等戏，经常下厂矿企业单位慰问演出。1979年，市总工会拨款，购置了衣箱道具。1980年招收学员60余名进行培训，边训练，边演出，经费自理。1983年正式称为咸阳市总工会秦腔剧团，聘请郭建民、王正民、程新予等艺人来团演出。团长杨秋霞、副团长郭继民并兼导演。主要演员有朱海娥、杨亚红、赵艳梅、吕立夏、张爱珍、王英、孔密果、孔新声、王金婷等。演出剧目有《葫芦峪》、《黑叮本》、《打金枝》、《法门寺》等。剧团服务于城乡群众，并巡回演出于甘肃、宁夏等地。

杨陵夹道村剧团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夹道村群众自愿筹资，成立了一个小型自乐班。1951年长安艺人李正明来夹道落户，收徒传艺，培养出一批青年演员，戏班人员增加到40多名。1958年扶风、武功、兴平三县合并，夹道村剧团被毕公管区接收为水利专业宣传队，后改成公社剧团，成为较早的民办职业剧团。主要演员有王哲、王天太、王蓄银、张志怀、巨锦章等，上演剧目有《串龙珠》、《玉虎坠》、《八件衣》等。

陕棉八厂秦腔队 成立于1950年，在厂工会主席康树恩领导下，由工人司鼓刘培均、工人李长乾、韩定敏等骨干组成。后吸收田志珍、苟木林、马淑英等一批骨干演员，先后排演了《罗汉钱》、《古城寒夜》、《二巧离婚》等大小50多折（本）现代戏目。由于坚持创作、演出，在全省纺织系统产生了很大影响。

西北农学院剧团 成立于1946年，演职人员都是学生、教师中的文艺爱

好者，随着学生毕业，人员不断更替。1946—1948年，演出话剧《小人物狂想曲》、《秋海棠》，京剧《捉放曹》、《坐宫》、《群英会》等，还有秦腔剧目。建国后，剧团更名“西农京剧社”。曾用现代服装演出京剧传统戏《打渔杀家》，宣传有压迫就有反抗的主题思想。同时还上演《女起解》、《宇宙锋》等传统京剧。1950年筹建“西农文工团”，并介绍解放区戏剧活动情况，教演秧歌剧、新歌剧。学院文工团除下农村宣传演出《夫妻识字》等秧歌剧外，还自己创作、排演了一些大型话剧如《白毛女》、《刘胡兰》等。

三原学联剧团 1948年成立。剧团成员均由各学校的文艺骨干组成。演出队分歌舞组、戏剧组。1949年剧团在雷家巷剧院，救灾捐献义演。1950年，参加西北地区第一届文代会。同年改名为“三原县学联剧团”，由县共青团工委领导，演职人员保持在20至50人，演出规模和效益都十分可观。1950—1952年寒暑假期间，配合减租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多次下乡巡回演出，白天利用举办图片展览、说快板、小演唱、活报剧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形势；晚上演出文艺节目。所演节目都是紧密配合中心工作，如反霸斗争的《阴谋》；土改运动中的《保卫村政权》和抗美援朝中《王大妈要和平》等。1953年自行解散。

第四章 群众文化活动

咸阳市群众文化活动，是以图书阅览为阵地开展活动的。明万历年间（1573—1619）工部尚书温纯，在三原县城盐店街建尊经阁。清代，三原宏道书院是陕西最高学府，院内藏书1500余卷，经、史、子、集一应俱全，有“渭北书阁”之称。1919年，咸阳成立了公共图书馆，1942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咸阳县立民众教育馆在城内凤凰台合并设馆，面向社会借阅图书、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建国后，党和政府设立专管机构，负责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教育工作。1958年合作化时期，城乡办起了图书室、俱乐部和业余宣传队、剧团等文化艺术团体，并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活跃于城镇农村，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后因种种原因，群众文化活动时起时落，处于自然发展状态。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群众文化活动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咸阳市已初步形成以文化（艺术）馆为龙头，文化室为基础，文化站为枢纽，文化户为补充的四级文化网络。至1990年，全市成立227个乡文化站，24个镇文化中心，共占地4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5万平方米，拥有室内电影院18座，露天剧院102个，灯光球场5个，藏有图书25万册，配有文化体育活动器材1.6万件，电视机、照相机100多台。还有民间职业剧团18个，业余演出团、队73个，拥有各类文艺队伍3万余人。全市有文化室474处，文化专业户79家。

第一节 市县（区）艺术、文化馆

咸阳市群众艺术馆

1972年4月成立工农兵艺术馆。馆内设文学戏剧部、音乐舞蹈部、美术摄影部和音像发行社。1979年改为群众艺术馆，人员编制25人。先后编印《咸阳文艺》、《文化园地》、《新作》、《演唱》等6种文艺刊物。1985年以后，陆续编印《咸阳市器乐曲集成》、《咸阳市舞蹈集成》等8部集成。先后举办全区故事调讲5次，涌现出一批优秀故事作品，如《起根发苗》、《石头赶车》等，培养出一批故事员如甄亮、高雨田等。举办过10余次美术、书法、摄影展览，尤其是户县农民画展，培养了一批农民画家，如李凤兰、刘知贵、刘志德等，在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展出。1986年7月举办全国十二明星城市书画联展，1987年10月举办咸阳、自贡、三明市美术展等。80年代，还举办过四届秦都音乐会、青年现代舞大赛、市民族民间音乐舞蹈大赛等，先后派歌手赴湖南、上海、四川等地参赛。以民族旋律为基础的歌曲《谁家姑娘不风流》被省委宣传部推荐为优秀农村歌曲。充满关中民族特色的长卷黑白风俗画“三秦古风村俗画展”，被中央电视台选播，是咸阳美术作品第一次上中央电视台。同时馆设文化艺术学校，培育少儿艺术人才近1000人次，被评为“先进办学单位”。

泾阳县文化馆

1950年成立。至1990年，建筑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工作人员24名。馆内包括图书收藏室、阅览室、创作组、音乐舞蹈组、美术组和文化站工作组。建馆以来，共举办各种文化艺术展览81期，展出图片、组画等531套，总计2700余张。其中有影响的如1988年“泾云杯”书画大赛，展示了泾阳县书画艺术成果。同时，除对燕王、花里等5个中学进行音乐舞蹈辅导外，

还协助姚坊、龙泉等6个乡办起了民间铜管乐队。1988年业余歌手梁兰荣获全国农民歌手大赛陕西赛区一等奖。全县业余作者历年在各级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民间故事等稿件120余篇，选编有《爱是不能忘记的》诗集1本，《修石渡的传说》、《龙女下凡》民间故事2本，同时编纂泾阳县民间文学、歌谣、谚语三大集成。

秦都区文化馆

1987年建立，位于防洪渠西段中部。建筑面积1920平方米，内有小剧场、舞厅、游艺室、美术活动室等设施。有工作人员12名。负责全区文化站、俱乐部活动的组织辅导工作。

渭城区文化馆

1938年设立，时名咸阳县民众教育馆，位于城内中山街中段。后迁移安国寺，1948年又迁凤凰台。主要业务是阅览报刊、杂志，群众称“阅览室”。1949年7月成立咸阳县文化馆，馆址设在中山街。1952年成立咸阳市，文化馆归市政府领导。1953年并入陕西省咸阳文化馆。工作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普及群众文化，开展扫盲工作；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先后举办过“解放台湾”、“新旧社会对比”、“科学技术”等大型图片展览活动。1956年改称咸阳市文化馆。1959年市文化馆与工人文化宫合并。1961年宫、馆分设。“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博、图”三家合一，成立“文博图革委会”。1970年以后，“革委会”解体。馆设有业务组，主管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文学等；群众组，主管乡镇文化站、文化中心工作；行政办公组，主管文档、财会、后勤等。

三原县文化馆

前身为民众教育馆，成立于1938年，馆址设在武庙，主要任务是组织民众看书读报、识字，同时进行抗日宣传，接待文艺演出团体。1950年三原县文化馆正式成立，地址在城隍庙。馆内设教育部、艺宣部、图书组、文物组。1974年建成1300平方米的文化馆活动大楼。1990年实有工作人员28名，馆内设有办公室、群文组、财务组、美术摄影组等。

1956年春节举办第一次全县群众文艺会演，1957年，新庄乡大李村焰火被选送到北京表演。在此之后至1966年，每年都组织规模盛大的群众业余文艺会演活动。从1972年至1978年，文化馆每年都要组织一次革命故事巡回讲出活动，先后创作并讲出故事20多个。其中高雨田的《矮嫂坐上席》、杨继成的《我的婚事》，在1978年省故事调讲会上，分别获创作一、二等奖和

讲出一、二等奖，曾多次在省广播电台播放。1980年至1985年间，先后举办过邮电职工韩虹书法展、省美院教师戴培军版画展、西北大学教授温友言和书法名家谢德萍书画展，还有本县画家李文兴、徐展、秦宏章、苟彦斌、左子军等人的书画展和宋克明个人摄影作品展。其中书画家苟彦斌、左子军、秦宏章三人的作品还在咸阳、西安等地展出。1986年，文化馆参加于右任书法作品搜集展览活动，共收集作品400余幅，曾先后在西安、北京、福州等市展出，引起强烈反响。1987—1989年组成三原民间文学编委会，整理出民谚2200条，歌谣360首，故事150篇，汇集成约20万字的《三原县民间文学集成》，并于1989年11月内部印刷出版1000册。同时，1988年还成立了文艺创作协会，有会员36人。1990年文化馆出版农民诗人谢茂恭作品，发行全国。

长武县文化馆

1949年成立，主要开展报纸阅读活动。1953年馆址迁往县城西门十字南街，订报10余种，藏书5000本。同年首次组织民间社火、唢呐代表队，赴宝鸡参加调演。1965年文化馆增设创作、摄影、美术专业工作人员3名，辅导诗歌创作和绘画摄影、教唱歌曲活动。1975年创办《长武文艺》刊物，活跃全县创作。1976年扩编至13人，设美术书法、文学创作、图书阅览、摄影文物保护等组。1982年，成立长武县木偶剧团，共25人，属业余性质演出团体；同时还在农村组建业余秦腔剧团3个，皮影戏班8个。到1990年，全县文艺创作队伍发展到120人，搜集谚语1.1万条，民间故事410余篇，编纂了民间文学集成3卷，并获省文艺志书集成纪念奖。此外，还辅导业余创作大型秦腔剧本3个，张瑞祥的小品《煮熟了的鸭子飞上天》，获咸阳市创作奖。

旬邑县文化馆

前身为县民众教育馆，1949年更名为“旬邑县文化馆”，馆址在县城正街。1986年又将图书业务分出。文化馆通过挖掘、整理，对全县风格独具的剪纸、面花、刺绣、根雕、石马桩、布织、唢呐曲谱等民间艺术建立档案，拍照录像。1988年5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为期10天的“旬邑民间剪纸”展览，展出作品572幅，中央电台、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等进行了报道。有246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和中央美院收藏，部分作品销往日本、法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家。1989年全国民间剪纸理论会在旬邑召开。同年与咸阳中国画院在公园举办艺术展览，100多位日本友人参观。此

外，还搜集整理民间故事 350 篇，歌谣 500 首，谚语 13.7 万条。完成民间文学三大集成的整理和编纂工作。为了弘扬民族民间音乐，发展各流派唢呐艺术，先后举办过 7 届音乐会，演奏传统和新创作曲牌。17 个乡镇文化站建立后，文化馆举办了烤烟栽培、甜菜种植、果树管理等培训班 270 多期，受培训人数约 5 万人次。同时还培训了一大批刺绣、剪纸能手。举办民间文学创作学习班 3 期，培养学员 68 人。在第二届中国文化博览会上，旬邑县文化馆送展出的剪纸作品，获特别奖 1 个，一等奖 2 个，三等奖 3 个，佳作奖 5 个。文为群撰写的《剪花娘子库淑兰》一书，已由台湾《汉声》杂志社出版。

兴平县文化馆

1949 年 11 月成立，1950 年改名兴平县人民文化馆，有工作人员 5 人。1955 年改名兴平县文化馆，为全民事业单位。1972 年编制增至 24 人。1989 年职工 29 人，活动场地 7700 平方米，馆内建筑面积 2600 平方米，内设文学、美术、摄影、文物、馆站、音舞、阵地宣传和行政后勤共 8 个业务组。先后成立茂陵书画学会、教师书画学会、老年书画学会、楹联学会等，自办书画、民间剪纸、工艺美术展览 9 次，作品 1600 件，观众 3.1 万人次。参加全国省、市书画、剪纸、工艺美术、民间文学成果展览 8 次，作品 160 件，获省、市共 11 个奖。木刻《东来西往》获全国大路画展优秀奖，风俗画《端午》参加了全国风俗画展。每年春节，组织大型群众文化活动，有高跷、竹马、旱船、龙灯、灯会、牛斗虎等；举办国庆综合文艺晚会、茂陵音乐大赛、诗歌朗诵大赛、秦腔演唱大赛共 12 次，获省市优秀奖、组织奖 13 个，遥远女声独唱获全国优秀奖。同时，还创办《兴平文化》期刊 24 期。基本完成十大志书集成的编纂任务。总计采访对象 3370 人，收集资料 200 万字，编纂 80 余万字。

乾县文化馆

1928 年设立民众读报社，1938 年改为民众教育馆，1942 年民众教育馆增设教导、艺术两组，工作人员 4 名。1951 年成立乾县文化馆，负责全县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辅导工作。1987 年 10 月，在县城东街新建一幢建筑面积为 2000 平方米的文化大楼。

文化馆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搜集整理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三大集成。编印文艺期刊《乾陵艺苑》。1985 年后，举办多次美术摄影、书画剪纸、法制教育和专业村等展览活动，辅导业余作者编写曲艺、小演唱 20 多篇，有 47 篇文章在省市刊物发表。在历次大赛中，获演出奖 2 个，剪纸论文

奖3个，剪纸奖1个和群研论文奖3个。同时组织辅导梁村、王村等6个镇的锣鼓大赛，组织大羊、阳洪竹马、狮子和灵源、阳洪、长留社火表演，影响较大。

武功县文化馆

1950年成立，馆址在县城西街，馆内设美术书法、创作、音乐、文物保护、馆站、图书阅览组，编制干部12名，负责全县群众文化的辅导和组织工作。50年代，开展抗美援朝、婚姻法、农业纲要的文艺宣传、展览活动。60年代初举办各种展览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组织“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下农村演出。70年代，每年组织一次革命故事巡回讲出。80年代，多次举办书画展览、宣传武功。各乡镇文化站都举办文艺演唱会、书法美术展览和文学作品大赛等活动。1986年负责编纂《武功县民间故事集成》、《武功县民间歌谣集成》、《武功县谚语集成》等。

礼泉县文化馆

1950年建馆，以表演展览、幻灯、图书借阅等活动，促进了全县文化工作的发展。70年代初，礼泉创作小戏300多个，被誉为“小戏之乡”。省文化局在礼泉召开全省戏曲工作现场会议，出版了小戏专集《车轮飞转》，涌现出一批小戏作者如蔺志顺、侯振北、张廉、刘乃奇、冯仁、邹志安、冯守章等，创作了一批优秀剧目如秦腔《红梅》、《爬坡》、《合绳》、《疙瘩结石榴》、迷胡《渠水东流》、话剧《修猪栏》等。1986年文化馆负责编纂了礼泉民间文学三大集成，组织收集整理民间故事760篇、歌谣2830首，谚语9000条，发现民间歌谣家李登峰、王世民，民间故事家刘怀民，并为他们编辑出版了选集。文化馆还编辑出版有《诗花》、《烽火诗选》、《礼泉民间文学》等书。同时，多次举办书画展览，如《孙迟书画展》、《礼泉群众书画展》，展出作品200余件。

杨陵区文化馆

1985年建立，编制11人，属三馆合一体制（文化馆、图书馆、文馆所），业务范围有文学、美术、书法、摄影、音乐、图书和文物。建馆以来，曾建立金身、晨光、幼芽文学社，创作人员13人。1987年举办杨陵区第一届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览，展出美术作品4幅、书法100幅、摄影85幅。1989年举办第二届展览，展出美术作品29幅、书法117幅、摄影46幅。同时还坚持培训辅导活动，1986年举办写作学习班，培训17人；1987年举办美术学习班，培训学员32人；1988年举办书法学习班，培训学员20人；

1989年又培训书法学员31人，辅导业余剧团演员55人。此外，收集整理有舞蹈《旱船》一部，编辑出版杨陵区民间故事、歌谣和谚语共3卷。

彬县文化馆

1950年建馆，内设美术、摄影、文艺、文物4个业务组，负责全县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辅导和文物管理工作。1966年，先后举办县级文艺会演8次，培训班13次，编印《春节演唱材料》、《彬县民歌集》、《春联》等，编辑出版《彬县文艺》31期，至1972年停刊。80年代以来，编撰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3个集成和《彬县戏剧志》等书。1990年协助有关部门举办文艺晚会11台，辅导乡镇文化站配合科技宣传演出文艺节目110多个，在县城开办橱窗10期50块版面，为经贸洽谈制作版面13块，大型广告2块，中小型广告24块。此外，还举办过“秦腔流派演唱赛”及书法、美术、摄影展，举办了赵三民石雕展、程天祥根雕展、徐义汉塑型展，共展出作品200余件。

永寿县文化馆

1925年设立民众教育馆，1950年成立永寿大众阅览室，1952年改为永寿县文化馆，地址在县城北街。1989年有工作人员22人，馆内设美术、文艺、图书阅览、群众文化和文物保护等业务组，负责组织、辅导全县文化艺术活动。1986年后，文化馆内完成了《文化志》、《文物志》以及永寿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三个集成。有120多篇文艺作品在市级报刊上发表。1990年永寿剪纸作品参加省首届艺术节大赛，张彦娥获“西凤杯”二等奖，夏宽获省文化厅一等奖，方兰英、高翠平获二等奖，安俊艺获优秀辅导奖，文化馆获集体奖。

淳化县文化馆

1943年民众教育馆创立，1951年在此基础上成立文化馆。至1990年，有职工19名，文化活动楼和图书楼各1座，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建馆以来，通过戏曲、展览、幻灯、美术、音乐、书法和图书阅览等宣传形式，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1985年后，采集编写了淳化县民间歌谣、谚语、故事三大集成。每年都在重大节日举办演出、展览、花灯、焰火等活动，活跃城乡文化生活。组织力量抓文学、美术、书画辅导，分类指导各文化站完成达标任务，开展经营性的“大文化”活动。先后举办文艺晚会8场，美术书法展览6次，参加市少儿“神灵杯”秦腔大赛。征集野外大型石刻文物10多种，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制作完成，集中整顿了农村文物保护组织。

第二节 乡镇文化站

建国以来，咸阳农村多数村镇开办了识字班、图书室，继又办起了俱乐部、业余剧团。1955年咸阳周陵乡陵照村创办“五一俱乐部”，设有宣传、体育两队，宣传队又设创作、演出、板报、读报组和图书室。尤其文艺创作和业余演出最为活跃。以后由于多种原因，农村群众文化生活时起时落，处于自然发展状态。1981年1月，地区文化局在三原召开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传达省文化局大荔会议精神，讨论制定了建设农村乡镇文化站计划。11月在泾阳召开了全区文化站工作会议，各县区文化局长、文化馆长、站长共110人参加了会议。1982年召开建站工作会议，交流了进展情况和工作经验。1984年又召开了建站工作经验交流会，表彰了先进集体20个，先进个人26名。1985年，咸阳市群众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郑作舟副市长任主任，宣传部长郭建义任副主任，由市人大、政协等15个单位领导组成。1986年市政府决定，由市上负担全市140名文化站干部每人每月10元的补贴工资；由县、区担负每个文化站每年1000元活动经费及文化中心活动经费。各乡镇文化站、文化中心在工作实践中，坚持改革搞活逐步开拓了路子，形成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新格局；文化站已突破了“小文化”的模式，正在朝着综合性、多功能的“大文化”方向发展。如三原县各文化站，1986年共举办各种技术培训班95期，参加人员3000余人，还为群众提供科技咨询6.4万人次，发放各类图书资料3.2万份，各站设有专栏、板报85块，年出时政宣传、科技普及、法制宣传、计划生育等内容的宣传专栏926期。秦都、渭城两区文化站将绘制的农业科技、法律知识、计划生育等版面带到农村巡回展出，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永寿、彬县、长武等县文化站，根据生产活动和群众需要，用橱窗宣传和办学习班向群众传授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小麦良种介绍、病虫害防治、种籽科学处理、农药化肥使用、烤烟烘烤技术，以及家兔家禽饲养技术知识，传递致富信息，促进综合经营，为农村脱贫致富做出了贡献。由于开展了以文为主的多种经营和有偿服务，为文化站自身壮大和发展，增强了经济实力。淳化润镇、秦都洋西、乾县梁村、三原大程文化中心年收入都在5000元甚至数万元。1988年兴平县给文化站投资1.8万元，乡镇投资28万元，文化站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331平方米，使群众文化生活有了固定场所，并拥有各类藏书1.4万册，电影放映队25个，戏校2所，文化室28个，体育器械500余件，露天剧场10个，影剧院1处。

至1990年，三原县文化站建设首先达标，17个乡镇文化站总占地面积4.8万平方米，拥有各类活动器具213件，藏书2.3万册，固定资产值150万元，乡镇文化中心5处，占地1980平方米以上，共有工作人员51名。1983年新兴文化中心被评为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大程文化中心还被评为全国先进文化站。1990年底，秦都区政府向文化站投资17万元，22个乡镇文化站占地面积总面积达19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6918平方米，拥有影剧院3个，露天剧场17个，图书室22个，游艺室19个，藏书2万余册，各种文艺体育用品118件，电影队16个，电视机22台，照相机23部，基本设施和配备初具规模。

第三节 厂矿农村俱乐部

1953年以后，在党的“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群众文化“八字”方针指导下，咸阳城市工矿企业普遍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利用各种文化艺术形式，自编节目，业余演出，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风尚，教育、鼓舞群众革命生产的积极性。其中长期坚持的俱乐部有：

西北国棉一厂俱乐部

1956年成立。设有合唱、话剧、秦腔、豫剧、京剧、歌舞和文艺创作、音乐、美术等专业活动组织，组成人员达360余人。1952年为配合“三反”运动，排演话剧《蜕变》、《控诉》。1955年创作排演舞蹈《工人游艺舞》、话剧《台湾人民的心愿》。1956年俱乐部以7个节目参加省职工文艺会演，竟有6个获奖，其中2个节目参加了全国会演。1959年，有5个节目参加省第二届职工文艺会演，4人获奖，1人参加全国会演。1968年厂俱乐部组织创作《赵梦桃》、《红桃满园》共11个演唱节目，其中《红桃满园》在1964年省第二届戏剧会演中作展览演出。1977年，排演了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1979年排演了大型话剧《丹心谱》。1981年在中省纺织公司举办的文艺会演上，话剧《谁是贼》、《夜明珠》获得演出一等奖。1984年元宵节表演的《赶花轿》、《二鬼摔跤》、《猪八戒背媳妇》等11个节目，被评为优秀节目。

西北国棉二厂俱乐部

1953年始建，1956年成立俱乐部管委会，设有秦腔、豫剧、迷胡、曲子4个剧组和1个歌舞队，有文艺骨干286人。60年代初，二厂俱乐部《逛新城》、女声独唱、男女声二重唱、器乐合奏等节目，多次在省、市调演中获奖。1965年，表演唱《老两口学毛选》获市文艺调演一等奖，省职工会演三

等奖。1981年，自编自演节目20多个，组织大型文艺晚会7场，同年参加市职工文艺调演，获集体奖1个，表演奖3个。1982年、1984年两次参加省纺织品公司文艺调演，并获演出一等奖2个，二等奖7个，创作奖3个。工人李福庆参加1990年陕西省“如意杯”卡拉OK大赛，获业余组第一名。厂俱乐部的电声乐队、歌舞队、独唱演员，多次参加市、区专场晚会，并为日本友人作专场演出。

陕棉八厂俱乐部

早在建国前打包厂时期，就已组成豫剧、京剧演出队，经常自演自乐。建国后俱乐部文艺队经常上街宣传，演唱歌曲、演革命戏，很受群众欢迎。俱乐部刘世林、田志珍创作的秦腔《协作之花》，由马淑珍、乔佩霞主演，轰动古城咸阳。70年代由田志珍创作的秦腔剧《争夺》，由苟木林、刘桂兰主演，参加咸阳市职工文艺会演，受到好评。俱乐部设有图书阅览、游艺室、露天剧场等文化设施。

兴平县工人俱乐部

1956年陕西省总工会投资建成“七里镇工人俱乐部”，总面积1.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内设700座位的剧场，露天灯光球场、旱冰场，及乒乓球室、游艺室、讲座室、藏书5000册的图书馆。有工作人员7名，是秦岭电工厂、新征机械厂和陕西柴油机厂等职工的文化娱乐场所，1970年活动停止，由各厂自建的俱乐部替代，各自开展职工文化娱乐活动。1972年前城关俱乐部、七里镇工人俱乐部和文化馆合并，成立兴平县工人俱乐部。1980—1982年分别被评为省、市工会先进单位。1985年内设电视室、阅览室、游艺室、图书馆等。1989年有工作人员5名，设有美工、文体、宣传和图书馆。

渭城区“五一俱乐部”

渭城区周陵乡陵照村“五一”俱乐部，是195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而建立的农村俱乐部（陵照村合作化时期曾用名“五一”农业社，故此得名）。设有文艺创作、演出组，体育、美术、象棋、板报、图书阅览等组室。其中，文艺创作和演出尤为活跃，成绩卓著。至1985年，演出外来节目不计，自编自演的戏曲、话剧、舞蹈、相声、快板、表演唱等共计40余个，其中参加会演得奖的、招待外宾的、报刊发表的、拍摄电影的就有20多个。这些节目，不仅活跃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配合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贯彻，在全省甚至全国产生过较大影响。业余创作者赵德礼、赵德义、吴向白、赵西

恒、赵西文等组成文艺创作组，创作组编写的第一个戏是宣传合作化的《四女拜年》。此戏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上演后群众非常喜欢，《陕西日报》1956年2月21日刊载，各地专业、业余剧团纷纷上演。北京人民剧院还演出此剧。此外，还有反映科学种田的快板剧《介绍丰产经验》、反映合作化后社员集体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的迷胡剧《抢收》、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话剧《14号病床》、表现农民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的秦腔剧《让房》、《一对银手镯》、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秦腔《一罐银元》、歌颂劳动人民英雄气概的表演唱《渭水上高原》、揭露封建买卖婚姻的弦板腔《赶花轿》、提倡尊敬老人的秦腔剧《审女婿》等共计40余本。

“五一”俱乐部，是全省第一个农村俱乐部，由于他们立足农村，自编剧目，业余演出，享誉关中。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由省文化局局长鱼讯陪同视察，认为俱乐部办得很有章法、很有劲头。曾有《向“五一”俱乐部看齐》的文章，发表在1956年2月13日《陕西日报》上，总结出“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群众文化活动八字方针，向全国推广。俱乐部被省上树为群众文化的一面旗帜。1958年他们的创作成绩向全省文化工作会议献礼，并参加献礼演出，受到会议重视。1964年俱乐部创作演出的《赶花轿》、《花手帕》等剧目，参加了全省戏剧会演，受到戏曲工作者的好评。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曾有民主德国、苏联、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印尼、朝鲜、越南等国文化代表团参观访问。国内有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共8个省的文化代表和省内不少地、县文化馆干部，前来参观学习和交流经验。业余作者赵西文被评为先进文化工作者，吸收为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并推荐为理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五一”俱乐部受到冲击。1979年工作得以逐步恢复。

第五章 电 影

1930年电影始在咸阳天主教堂出现，1934年无声电影在咸阳县城营业放映。建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电影事业发展较快。先后建立了“咸阳人民”、“兴平卫星”两座电影院和一批农村放映队。至1960年，已有放映单

位 95 个，其中电影院 13 个，农村放映队 66 个，电影俱乐部 14 个。各县（市）普遍设置电影管理站，城乡放映网点建设初具规模。1961 年，咸阳专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成立，各项业务的开展与制度建设日臻完善。1963 年，全省调整电影管理体制，国营电影院、站、队，集中由省统一领导，乡镇放映队转为县办集体队，加强了地、县管理机构。全区现代革命题材影片的发行、农村普及规划放映和电影幻灯宣传工作蓬勃发展，出现了周至哑柏放映队等知名度颇高的先进典型。“文化大革命”中，全区电影发行和放映陷入混乱。1976 年后，全区电影工作拨乱反正，恢复放映秩序，适应城乡人民生活需要，电影发行放映工作重新迈向健康发展的轨道。1980 年咸阳地区进一步在全区发展了集镇电影院和放映队。1982 年，总结推广“新兴经验”，抓了农村普及放映工作，在全区放映单位中开展了“两创”（创建文明电影院、电影队）竞赛活动。1983 年咸阳分公司改为咸阳市公司，开始推行经济承包制，在放映单位与发行部门之间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在农村试办农民个体电影队，开放服务区域，推行售票放映。到 1990 年，全市已拥有一个遍布城乡的以国营、集体院队为主渠道，多种所有制并举的电影放映网络。

第一节 发 行

1960 年，陕西省电影公司咸阳管理站正式成立，咸阳地区始有地区性的影片发行业务。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改面向小队排片为面向县（市）管理站排片，充分发挥县站作用。1962 年贯彻全国“九江会议”精神，管理站对影片拷贝作了全面清理，改进了排片方法，发挥了各类影片的作用。既配合了形势教育和政治运动的宣传，又注意到影片节目的多样化，基本上克服了供需之间的矛盾。35 毫米影片，重点发行了《人民公敌蒋介石》、《肯尼迪的真面目》、《保卫古巴》等影片；配合农村开展社教运动，选排了《刘介梅》、《三年早知道》、《李双双》等 14 部长片和有关科教、纪录短片。按照省“35 毫米新片拷贝调度试行办法”，对地区发行的新片实行了定时间、定场次、定成分的三定管理办法，加速了拷贝的周转使用。同时对 16 毫米影片扩大发行到 11 个县。1964 年全区重点发行和普遍映出《李双双》、《槐树庄》、《红色宣传员》及《夺印》、《白毛女》、《暴风骤雨》等优秀影片，配合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当年统计，农村放映现代题材影片场次占总场次的 85%。其中反映革命现代题材片共 48 部，映出 6400 多场，观众达 550 万人次。1965 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20 周年，发行放映了《南征北战》、《青春

之歌》、《铁道游击队》和《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等影片。

“文化大革命”初期停映影片达 100 多部，批判放映了《兵临城下》、《舞台姐妹》、《逆风千里》、《桃花扇》等 7 部影片。1970 年 12 月，“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开始在咸阳发行。1971 年，配合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重点发行了“样板戏”电影《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为了在较短时间内让更多的群众看到电影，对《沙家浜》实行快速流转，两次调度的办法，仅用 25 天时间，在全区 14 个县（市）映出；对《红色娘子军》则采取“一线多机、多点”，串片放映的方法，加速了影片流转。全年“样板戏”片映出达 4332 场，观众有 533 万人次。1973 年地区又对 10 部“样板戏”影片普及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并在全区开展了“赛学习比路线，赛干劲比贡献，赛团结比协作，赛技术比质量，赛纪律比作风”的“五赛五比”竞赛活动，推动“样板戏”片及重点农业片的普及工作，全年“样板戏”片共放映 6337 场。《红旗渠》、《大寨红旗》等 5 部重点农业片，共用了 64 个拷贝，映出 4818 场。1975 年 5 至 6 月，全区举行了“样板戏”电影汇映，新增《杜鹃山》、《平原作战》、《闪闪的红星》3 部影片。汇映月共映出 2271 场，其中 35 毫米 354 场，16 毫米 1917 场。同年 9 月，地区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文艺是党的事业”、“文艺要百花齐放”和“样板戏不能阻碍文艺事业的发展”三条指示，其他影片发行开始有了增加。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解禁，全区重点发行放映了《新的长征》、《甲午风云》、《林则徐》、《李时珍》以及《大庆之路》、《知识老人》、《勇攀科技高峰》等影片。1979 年，地区文教局对电影发行渠道进行了整顿，恢复了计划发行和放映秩序。同时坚持对 16 毫米影片采取快速流传、两次调度的办法，提高了节目使用率。1981 年贯彻全省电影发行业务三级管理体制，地区分公司对 35 毫米影片试行先地区所在地和重点县城，后一般县城；先县城影院，后大集镇国营影院、站，再乡办集体电影院、站；先对外映出单位，后对内映出单位。同时重点影片全区使用 1-2 个月，第一轮只安排县（市）所在地影院，第二轮依次安排到集镇国营影院、工矿和乡办院、站。全区放映时间 130 天，地区实行两次调度。复映节目，按照先对外，后对内原则，结合实际具体安排。新闻纪录和科教片，实行普遍加映和专场映出、专业性影片对口对路发行。从当年 7 月重点影片《喜盈门》开始放映，至 1982 年 1 月，35 毫米映出 556 场，观众 50 万人次，发行收入 3 万元。16 毫米、8.75 毫米映出 3296 场，观众 460 万人次，发行收入

2.4万元。农村每人平均观看1.47次，该片普及的深度、广度和观众反映的强烈程度，以及单元收入在地区均属空前。

1982—1983年贯彻“城乡兼顾，重点抓好农村”的方针，地区各级公司和各类放映单位，积极开展了优秀影片、科教影片和配合青少年教育影片的映出活动。影片发行本着“地县结合，穿插组织，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合理使用”的原则，实行“季调度、月补充、快速流传、节假日增供”的办法，发行放映了具有重大现实教育意义的优秀影片，如《西安事变》、《喜盈门》、《春晖》、《血，总是热的》等故事片；《莫让年华付流水》、《拼搏》等纪录片；《绿化祖国》、《岳滩小麦高产之路》、《叶面施肥》、《地膜覆盖》、《计划生育》等科教片。

1984年后电影市场受到电视、录像和文化夜市的严重冲击，咸阳市电影公司提出“在竞争中求生存发展”的口号，在影片发行上进行了多项业务改革。制定了“优秀影片单片承包试行办法”，规定放映单位在超额完成承包影片核定的映出天数、场次、上座率、放映收入、发行收入等项指标后，可提留发行收入超收部分的2%（35毫米）或3%（16毫米），作为参加放映和有关业务人员的劳务费。对开放单位新片实行浮动分账，集镇影院实行包底分成。部分影片作“内部发行”，实行浮动票、租价。1985年，全年17部重点影片共映出6047场，观众323万人次，发行收入47万元。1986年重点影片《少年犯》，首轮映期65天，映出792场，观众69万人次，放映收入14.8万元，发行收入7.7万元。1988年，全市电影发行放映人员转变观念，以市场为导向，以观众需求为中心，加强了发行放映企业经营工作。不少县公司利用价格杠杆，调节市场供需，充分发挥了浮动票、租价政策的作用，增加了发行收入。全市年发行收入达到221.74万元，创历史最高记录。

1989年影片发行工作不断深化业务改革，实行效益排片，促进映出，提高拷贝创值水平。1990年，全市开展了“除六害”、树新风电影宣传活动，排映了《赌命汉》、《赌博——罪恶之源》、《夜幕下的黄色幽灵》和《阿罗汉神兽》等影片。

第二节 放 映

建国初期，咸阳电影均由省属各系统的放映队在城区及各县进行巡回放映。1950年7月，张鸿勋与西安阿房宫电影院合办“红星联合电影放映队”，带有35毫米座机和改装的发电机，在咸阳城内仁义巷露场映出约半月，影片

有《大西南凯歌》、《红旗漫卷西风》、《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以后曾在泾阳、三原、武功、兴平等地巡回映出。1951年末有省中苏友好协会放映队、团中央放映队等，映出影片有《游击英雄》、《解放大西南》、《农家乐》、《百万雄师下江南》等共90场，观众约8万人次，其中描写战争和生产的影片最受群众欢迎。1952年省文教厅筹建咸阳人民电影院，在县城文庙（今人民剧院处）借用露天场地，搭棚置凳可容500人左右，于12月正式映出，每晚一场，映出影片有《翠岗红旗》等。各县电影活动统由省电影队各分队承担映出，省一队在三原，四队在咸阳、兴平、礼泉，六队在咸阳，九队在咸阳、兴平，三队在乾县，省属长武队包片长武、永寿、彬县等地。

1953年省上投资16.9万元新建咸阳人民电影院，计征地10亩，建筑面积1294平方米，座位972个，于1954年国庆竣工开业。同时西北工学院、西北国棉一、二厂相继成立了放映单位。1956年省属文化系统电影放映队、站、院分批下放交专、县政府管理，两批下放16个放映队，实现了县县都有电影放映站、队。1958年礼泉烽火农业社、咸阳“五一”农业社试办了省内第一批“社办放映队”。经过3年发展，到1960年咸阳专区建立时，全区电影放映单位共计93个，其中文化系统79个，厂矿和机关单位电影俱乐部14个。南部6县市全部有了电影院或放映站，农村拥有电影放映队66个，城乡电影放映网已初具规模，电影事业有了较大发展。

1961年专区成立后，因国民经济处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对电影放映进行了调整和整顿，放慢了发展速度。在“分而不乱，事有人管”的原则下，专县结合，上下齐抓，对放映单位和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业务培训和财务监督，以及登记考核和签证工作，加强了管理，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1964年开展“面向农村，面向山区”服务，电影得到进一步普及发展。“文化大革命”初，工作秩序失常，规章制度废止，放映人员流失，企业严重亏损。全区有1/3的人员没经过专门技术培训，放映事故时有发生，电影事业受到严重干扰。1972年起，由于实现“转轨定向，支援农业”和普及“革命样板戏”电影的需要，农村放映队有所发展。1973全区放映点扩大到3525个，年放映“样板戏”电影6337场，每个生产大队年均放映两场。同时在农村放映了《大寨红旗》、《昔阳盛开大寨花》、《沙石峪》、《红旗渠》等5部农业影片，受到群众好评。1974年在“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口号下，地区开始发展8.75毫米放映队。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区电影放映事业有了较快发展，当年增加

放映单位 122 个，同时出现了县乡和集镇兴办电影院站的势头。1979 年开始在市区试办礼堂、俱乐部对外开放工作。至 1980 年，全区放映单位达到 445 个，其中城市电影院、站、俱乐部共 109 处，农村 337 个，实现了“县县有电影院，乡乡有放映队”的目标。80 年代，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电影放映事业提供新的机遇。1981 年后，咸阳地区集镇电影院开始有计划地发展起来。1983 年乾县、礼泉率先试办了农民个体放映队，为农村电影放映网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1987 年起，部分影院和对外开放单位，筹资进行建筑装修和设施改造，开展多种经营。1989 年咸阳电影院改建成全市第一家立体声电影院。至 1990 年，全市拥有电影放映单位 557 个，其中城市电影院、站、俱乐部共计 75 个；农村 482 个，电影普及成效显著。尤其是乡办放映队 144 个，集镇电影院 10 个和个体放映队 290 个，基本满足了广大农村人民群众对电影的需求。

1951 年省属电影放映队在咸阳各地巡回映出统计表

表 3-2

放映地点	影片名称	观众人次
咸阳县城	大西南凯歌、翠岗红旗、白毛女、百万雄师下江南、伟大的转变、新儿女英雄传、游击英雄、黑河魂、拳斗大王	1.8 万
窑店乡	游击英雄、黑河魂、斯大林格勒大血战	0.5 万
晋公庙	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怒海潮	
双照乡	百万雄师下江南、大西南凯歌	0.3 万
周陵中学	百万雄师下江南、大西南凯歌	0.5 万
北杜村	赵一曼、怒海潮、玛丽黛传	0.8 万
马庄	玛丽黛传、八年离乱、忆江南、世界青年大会师、新中国周报 27 号	0.8 万
兴平店张	忆江南、八年离乱	0.4 万
泾阳县	光荣人家、易水相逢、赵一曼	2.2 万
柏赵村	光荣人家、赵一曼	0.4 万
石桥镇	光荣人家、赵一曼、易水相逢	1.0 万
九娘庙	光荣人家、赵一曼	0.4 万

续表 3-2

放映地点	影 片 名 称	观众人次
口 镇	光荣人家、赵一曼	0.4万
清凉寺	光荣人家、赵一曼	0.8万
云 阳	百万雄师下江南、光荣人家、大西南凯歌、钢铁战士、伟大的转变	0.9万
三原县	百万雄师下江南、大西南凯歌、新儿女英雄传、伟大的转变	1.4万
雁北村	百万雄师下江南、大西南凯歌	1.8万
大寨村	新儿女英雄传、中国人民的胜利	0.8万
陂西村	百万雄师下江南	0.2万
东里堡	新儿女英雄传、中国人民的胜利	1.6万
西阳乡	光荣人家、钢铁战士、伟大的转变	0.4万
新 庄	新儿女英雄传、中国人民的胜利	1.5万
瓦子寨	新儿女英雄传、中国人民的胜利	0.6万
西岳庙	新儿女英雄传、中国人民的胜利、钢铁战士、翠岗红旗、解放了的中国	2.3万
西阳镇	新儿女英雄传、中国人民的胜利	1.5万
大桂区	光荣人家、钢铁战士、伟大的转变	0.5万
永寿县	钢铁战士、卫国保家、赵一曼	1.4万
乾 县	钢铁战士、卫国保家	2.8万
长武县	钢铁战士、卫国保家、赵一曼	0.5万
彬 县	钢铁战士、卫国保家、赵一曼	0.9万
高 村	卫国保家	0.3万
井 村	卫国保家、钢铁战士	1.5万
寇家村	卫国保家	0.6万
香庙村	卫国保家	0.4万
旬邑县	翠岗红旗、解放了的中国	0.4万
马 栏	翠岗红旗、解放了的中国	0.1万
马家堡	翠岗红旗、解放了的中国	1.2万
淳化铁王镇	翠岗红旗、解放了的中国	1.7万

第四编

新闻出版

第一章 广播、电视

广播电视事业在咸阳兴起较晚。1936年，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曾发给三原县中学、女子中学和三原工业职业学校、泾阳县姚家巷小学及兴平师范学校直流收音机各一台，分别建立了收音室。其后又给乾县、咸阳、三原民众教育馆和礼泉县参议会配发无线电直流收音机，并设立收音室。其活动都由国民党县党部所控制，主要任务是收听国民党中央社广播新闻。至1949年解放时，咸阳共有收音机11台，私人有收音机的仅为泾阳县银行经理崔贯一—台。

建国后，咸阳分区广播电视事业逐步发展起来。1951—1953年全区14县均由西北人民广播电台配发收音机，先后建立起县广播收音站，同时文教部门还给25所中学购置配发了收音机，礼泉县工会和彬县煤矿等单位自购了收音机，基本形成了以专区、县、区三级广播收音站为骨干，包括学校、工矿、农业社收音点为网络的城乡广播收音网。对传达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指示，传播时事新闻，鼓舞城乡人民恢复发展生产，活跃政治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6年咸阳市广播站建成播音，这是咸阳地区第一个县级有线广播站。1958年，永寿县广播站建成播音，此后各县相继建成了广播站。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有线广播造价低、收听点多、传播面广，而且是由国家投资兴建，所以受到城乡人民的欢迎。1957年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在咸阳建成一座广播发射台，播发陕台节目，1958年增加转播中央台第一套节目。1959年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发射台又在咸阳建成播音。中央台和省台在咸阳的建成，扩大了地区无线广播的覆盖面，提高了收听率。同时兴平、武功两县率先利用低压电力线发展居民入户小喇叭，有线广播开始进入居民家庭院落。至1965

年，全区乡镇和绝大部分农村开通了有线广播，城乡各种高、中、低音广播喇叭总数达到 7.66 万只（而收音机拥有量仅为 6500 台）。

“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蜂起，争斗不息，各县广播站受到冲击干扰，或被“接管夺权”，成为派性斗争的工具。1968 年后，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结束了无政府状态，但广播事业仍受“左”的支配和干扰，甚至有的盲目推广“有线广播载波化”、“电灯零线挂广播喇叭”，结果遭到失败。

1968 年咸阳纺织机械厂购置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是咸阳地区第一台电视机。到 1970 年全区共有电视机 103 台，均属黑白电视机，多为 12、14、16 英寸小屏幕电视，而且均为国家机关、大型国营企事业单位所有。1972 年，乾县广播站以原有设备改制成广播自动开关机。以后在学习乾县经验进行技术革新活动中，相继研制了电源自动调压机、自动倒换和讯号回测等装置，对农村有线广播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年，咸阳地区广播事业管理站（1971 年 6 月成立）组织技术人员，自制出一台 QL—1 型黑白投影电视机。这在电视初兴、投影电视在国家还处于试制阶段的当时，是一项很受社会重视的科技成果。1975 年，武功县建成县城至乡镇的全部广播专线。彬县广播站自己组装一台晶体管电视差转机，并于 1976 年建成咸阳地区第一个电视差转台。

粉碎“四人帮”以后，咸阳广播电视事业获得新生，1977 年 3 月，咸阳地区广播事业管理局成立。1978 年地区四分之一农村广播网重新修复整顿，达到国家规定标准，一些厂矿企业自筹资金，办起了小型电视差转台。至 1980 年，地区有 9 个县建成县乡广播专线，农村专线达 0.91 万杆公里，乡广播放大站 255 座，城乡喇叭数近 50 万只，收音机的社会拥有量达到 24 万台，增长速度超过前 25 年总和。电视机的拥有量猛增到 1.53 万台，与 1975 年相比数量增长 10 倍。各种小功率电视差转台建成 13 座。

1981 年 10 月，广播事业管理局改名广播事业局，指导各县在重点办好新闻节目的同时，开辟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新节目，以经济改革中的新闻报道，取代了单纯的政治宣传活动。1983 年礼泉县烽火、袁家和秦都区红旗三队率先建成家家有电视机的“电视村”。1984 年咸阳市广播事业局改为“咸阳市广播电视局”。兴平、武功、淳化、三原、泾阳等县也都成立了县广播电视局。至 1985 年全市有 10 个县区成立了广播电视局，建立广播站和乡镇广播放大站共 216 个，并实现广播讯号传输专线化，城乡拥有各种广播喇叭 35 万只。建成各种小功率电视差转台 36 座，发射总功率 0.7 千瓦，城乡居民

拥有电视机计5.9万台,平均每16户居民、77人有电视机一台。城乡居民拥有收音机总计57.9万台,平均每7人、1.5户就有一台。据市统计局在秦都区抽样调查,每百户城乡居民有收音机103台,录音机43台;城市居民每百户有电视机77台。收音机、电视机在广大城乡已经普及。

1986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化,广播电视事业得到空前发展。一个以县乡广播站、电视差转台、卫星地面收转为基础的中央、省、市无线广播电视与县、乡有线广播相结合的、城市和农村并重的社会广播宣传体系在咸阳形成。同时咸阳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筹建和试播,兴平、三原两县人民广播电台的建成,标志着咸阳市广播、电视事业跨入一个新的水平。到1989年,全市拥有电视差转台39座(其中县、区广播电视局有11座,工矿企业28座),卫星地面收转站50座(县、区广播电视局9座,工矿企业41座)。全市有线电视系统175家,工矿企业大都安装了闭路电视。有近20万户居民可看到6—9套电视节目,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和省电视台一套节目覆盖90%农村。市内南部各县、区可以看到中央、省电视台一、二套和西安、咸阳电视台共6套节目。全市所辖14县区共219个乡镇,有215个乡镇通广播,乡通播率97%。全市3988个自然村中,有2509个村通了广播,占到63%,音响率达到92%,其中有1925个村建立了村广播室。实现了县到乡镇专线传输广播信号,拥有专线1257杆公里,乡镇至村4130杆公里。全市市、县两级广播电视台、站,每年播出自制节目8447小时,转播中央、省电台、电视台节目22974小时,听广播、看电视已成为城乡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第一节 广 播

建国初,咸阳专区和各县广播收音站的宣传工作主要是使用收音机,收抄中央、西北局和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即时送交县委、政府领导人和有关单位阅知,同时将其中一些内容编印小报发送机关、学校、区、乡政府学习、宣传和贯彻。记录新闻内容包括每日国内外重大新闻消息、中共中央政策、法令、指示、通知和领导讲话等。收音站收录的记录新闻,收音员无权更改、删节或增添文字,不经领导审阅不得向外传播。收音员及一切公私收音机均不许收听台湾、美国等电台广播。为了扩大宣传效果,各县收音站有计划地在城乡组建了一批广播收音点和收听小组,利用黑板报、屋顶土广播等形式扩大宣传,并组织干部、工人、学生和农民收听重要新闻广

播，推动各级党和政府开展各项中心工作。

1956年后，各县广播站相继建立，收音站的宣传广播由广播站替代，并逐步建立起一套自办节目，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调整。

1961年后由于县区建制得到调整，宣传力量明显加强，自办节目质量有所提高，节目设置、时间、内容较为固定。如咸阳市（即今秦都区）广播站自办节目定名《本市综合节目》，每天固定播音两次，同时还开设了《寻人启事》等专题节目。各县广播站自办节目，基本上都是综合性政治宣传节目，其特点是广播大会多，领导讲话多，宣传文件多，会议消息多，知识性、文艺性节目少，为听众服务的节目少。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8年各县革命委员会建立前，各县广播站均受到冲击，自办节目停办，每天只转播中央台《新闻》节目和省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等节目。以后陆续恢复了自办节目，政治宣传内容有增无减，同时相继播出“革命样板戏”节目，使群众文化生活有所改善。

各县广播站从1973年至1979年开办“农业学大寨”节目，持续7年之久，占据突出位置，无论是来稿、用稿量，还是稿件的形式、内容、广播时间，都明显超过其他自办节目，成为县广播站宣传的中心内容。据统计，当时地区14个县的自办节目中，有80%以上播出稿件是宣传“农业学大寨”的，其中11个县广播站的“农业学大寨”节目被省台采用播出。可谓各县自办节目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专题节目之一。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各县广播站把广播宣传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上来，在保证转播中央和省台广播节目的同时，注重办好自办节目，其内容有“本县新闻”、“本地风光”、“为听众服务”、“学科学用科学”、“理论政策讲座”、“听众来信”、“计划生育专题”等新闻性、教育性、知识性、文艺性、服务性节目，而且内容日趋丰富，形式愈加活泼，受到广大听众欢迎。1985年，咸阳市各县区广播站共有各类自办节目70多个，每日广播67小时，其中转播节目46小时，自办节目21小时。各县广播站平均每天播音5小时10分钟，其中转播节目3小时18分钟，自办节目1小时42分钟。

1986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县区广播站除认真做好转播中央、省、市广播节目外，对自办节目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改革，如秦都区广播站增设《振兴秦都》、《法制教育》、《广告信息联播》、《每周一歌》等节目。三原县广播站除坚持办好《三原新闻》、《新闻简讯》、《外地新闻》、《为

听众服务》、《文艺节目》、《小说连播》共6个节目外，还与县科协合办了《科技与生活》节目。乾县广播站将自办节目改为《本县新闻》和《专题节目》，扩大了信息量。

兴平、泾阳广播站突出报道了本县籍解放军战士在老山前线的战斗情况。彬县广播站增设了《彬塔了望》，以本县好人好事为主，突出宣传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有线广播网，1956年前主要利用邮电系统的农村电话线路定时传输广播讯号，互相干扰，效果较差。1962年起，各县相继重视了农村广播网建设，至1985年大部分县区实现了专线化和线路水泥杆化。据统计1986年全市已架起县至乡广播专线1394杆公里，乡至村支线8362杆公里，县至乡通播率达到90%以上，村通播率达到71%，入户率达到53%，音响率达到85%，扩大机入级率达到25%。1987年，全市建起村广播室1861处，拥有大音量喇叭4052只。

1988年8月全市遭受暴雨灾害，致使中、北部8县的广播线路设备被毁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1.6万元，有18个乡镇中断广播，有线广播网建设严重受阻。此后各县财政拨款64万元，各方集资15万元，修复、更新了陈旧设备和线路。据年终统计，全市村通播率达到76%。杨陵、渭城、秦都、泾阳、永寿增长10%以上，入户率达到58%；淳化、旬邑、杨陵、秦都、渭城、永寿增长10%以上，音响率达到93%。

1989年初，永寿、彬县、旬邑、淳化等县又遭冻雨袭击，广播线路冻结10厘米冰柱，造成大量杆倒线断，广播瘫痪。据各县灾情统计，直接损失41万元，其中尤以广播损失最重。灾害出现后，县广播站职工不畏难不泄气，紧急动员，奋力抢救。一是抢收被冻雨压倒的线杆、横担、瓷瓶和铁件，尽量减轻损失；二是摸清灾情写出报告，申请救灾经费，在各级政府支持和群众的帮助下，为救灾和恢复广播筹措了24万元；三是市局重视支持，县局领导职工全力以赴，扛杆拉线、架设线路，保质保量完成抢修任务。年终受灾地区不仅恢复了原有水平，而且在标准化、规范化程度上大大提高；未受灾地区在巩固和发展的基础上，设备更新迈出了新的一步。全市农村通播率达到63%，广播覆盖率和入户率合计为65%，音响率达到92%。咸阳市建立农村广播室1925个，拥有大喇叭4835只，联户喇叭1.25万只，小片广播网650处。农村广播网在困难和曲折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第二节 广播电台、电视台

咸阳市区距省会西安中心距离约 20 公里，是中央、省，广播、电视的最佳覆盖范围，故此，咸阳市自身广播、电视事业起步较晚。自 1976 年开始，个别大型厂矿企业为解决职工看电视难的问题，自筹资金、抽调人员、购置设备，相继办起了小型电视差转台，发射功率均属百瓦以内的小功率差转台。这些差转台，有的是经过国家广播电视部门批准，多数则是未经批准而自行设置的。但社会需要，人民需要，对边远地区普及电视起了积极作用。

1983 年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建设方针，促进了咸阳市级广播电视从无到有，蓬勃发展。

1984 年中共咸阳市决定，建立咸阳人民广播电台，拾配中波台频率为 1296 千赫，发射功率 1 千瓦；调频台拾配频率为 100.8 兆赫，发射功率 1 千瓦。第一期工程投资 62.5 万元，编制 55 人，经省广播电视厅审定，列入国家基建计划，并成立了以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陈昌骥主管的电台筹建处，负责建设事宜。1985 年底，完成建设征地 7.26 亩的一切手续，落实了电台建设的工艺、施工单位，同时还订购了播录音机、调频立体声发射机等主要设备和器材。1986 年筹建处派员赴丹东、郑州、广州等地考察学习，开始筹划、编制电台总体设计及筹建“咸阳广播电视中心”。中心建设项目包括中波广播电台、调频电台、电视台、卫星地面收转站、微波传输中枢等工程，总建筑面积 1.1 万平方米，总投资控制在 600 万元以内，总体工程一次规划，分期实施。电台筹建处根据这一原则，本着“边基建、边出效益，尽快发挥广播电视在振兴经济、深化改革开放中的作用”的指导思想，精心施工，艰苦创业。当年建起电视发射塔，1 千瓦调频立体声发射和播音设备安装调试成功，还面向社会招收了两名播音员。

筹建办还对宝鸡、西安两台的组织机构、部门职能、岗位责任、管理制度和编采、广播业务分工进行了考察。1987 年 2 月 26 日开始调机试播。每天播出两小时，内容有音乐、戏剧、曲艺节目。同年 6 月鞍山广播设备厂派人安装、调试电视发射机成功，并经中央广播电视部技术局批准，建设咸阳电视台，使用频道为 40 频道，发射机功率为 3 千瓦。

经过一年的调机试播、培训编采播音人员，咸阳人民广播电台终于 1988 年元月 1 日转为正式开播。开办《本市新闻》、《文艺》，本市天气预报及广告信息节目。咸阳市电台成为全省第一家市级调频立体声广播电台，全天播音

3次，共4小时5分钟。

为办好“咸阳人民广播电台”，市政府投资15万元，建成咸阳电视台卫星地面收转站，接着长武、淳化、彬县、永寿等县卫星地面接收站相继建成，解决了北部山区看电视难的问题。与此同时，咸阳电视台开始试转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省台不转播），又调整节目内容，增加了播出时间。第一次播音增加太极拳乐曲，全省天气预报；第二次播音增加《每周一歌》、综合服务节目，全天播音达到6小时25分钟。

1988年7月份，广播电视中心的广播技术楼装修告竣，电台播控室、播音室、电视播控室和编辑部由简易临时机房搬入新楼，改善了广播电视播出、制作的工作条件。全年累计播出时间2000小时，其中，播出咸阳新闻稿件2942篇，计274小时；播出专题节目87篇，计37小时；制作《每周一歌》48组，播出自制文艺节目400小时，转播中央台立体声文艺节目730小时。电视台在设备短缺尚不具备自办节目的条件下，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共计960小时。同时，为省台提供了反映咸阳各条战线的新闻片96条，专题片6条。其中专题片《闪光的纪实》获省三等奖。1989年春节为了扩大电台、电视台的知名度，举办了中央、省驻咸阳企业单位制作的电视节目联播，共播出专题片21条，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好评。

1989年国庆节，电视台正式开播。电台每天仍播音三次，节目增加了《古渡晨曲》、《简明新闻》、《广告与信息》、《今日咸阳》、《科学与生活》、《学习园地》、《地方戏曲》、《歌曲荟萃》、《曲艺之窗》、《星期剧场》、《小说连播》。电视台每星期二、五晚18:50—22:00各播出一次，节目内容有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咸阳新闻》、《歌曲欣赏》、《专题节目》、《广告信息》，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内容。截止1989年底电台正式播出3个月，共播出920条新闻稿，92组专题稿，播出文艺节目460小时，转播中央、省台调频立体声节目96小时，广告56条、150次，收入5000余元。电视台播出本市新闻238条，口播新闻47条，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共计138小时。

咸阳人民广播电台、咸阳电视台，作为咸阳广播电视中心的主要阵地，从1985年开始筹建，至1989年正式播出，历经5年之久，动用市政府投资269.5万元，社会集资20余万元，征地7.06亩，建成1100平方米的广播技术楼一座，150平方米的职工食堂一处。广播、电视设备机械配套，人员编制45名，机构为县级事业建制，电台、电视台两个牌子一套机构，设台长1

人，副台长2人。内设两台办公室、广播编辑部、电视新闻部、总编办公室、两台技术播出部等职能部门。

第三节 设 施

一、有线广播

县区广播站基本设备包括机房、播音室、扩大机、收音机、录音机、电唱机、话筒，以及配电柜、发电机等。

在录制设备方面，1956年前统由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采购供应、安装维修、技术培训和业务指导。各县广播站只配备发电机、扩大机、话筒和电唱机等。进入70年代后，陆续配有上海生产的L—601和L—602型盘式磁带录音机，以后又为较先进的国产635型和653型录音机所更新。80年代，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各县广播站普遍采用上海葵花牌HL—104型录音机、红灯牌收录机，有的站还配备进口日本M2511型便携式台式录音机，TRQ717型和ALC型盘式收录机以及夏普700型、蓬勃806型收录机等。话筒采用电容话筒和无线话筒等。

在控播设备方面，1965年三原县广播站安装试用调频广播机，成为全国最早采用调频广播的县广播站。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停用，未能普及推广。进入70年代后，地区广播管理站推广乾县技术革新经验，各县相继在机房安装了电源自动调压、倒换，广播站自动开关、转换，以及广播讯号回测等装置。1978年，三原广播站自行设计组装一台装有数字钟、数字控制仪、前置放大器、收音机、录音机、稳压电源、综合指示器等设备的自动控制台，使机房可自动开关、转换和记录广播时间。

80年代初，地区广播事业局为贯彻国家部颁规定标准，对咸阳、彬县、礼泉、淳化、三原5市县广播站机房扩大机进行检查测试，结果7项技术指标均未达到国家标准。此后，在全面检修改造、加强维护管理的基础上，陆续增置了频率特性、失真度、音频测试仪器和万用电桥、示波器、毫伏表等必要的技术监测设备，各县站扩大机性能有了一定改善，主要技术指标基本达到《农村有线广播技术标准》规定的乙、丙级规定。

乡镇放大站技术装备亦经历了逐步发展过程。1958年初建的放大站仅配有发电机、扩大机。1961年增加配备了增音机、收音机、唱机话筒等广播设

备。1973年全区共有73个放大站安装了自动开关机。兴平、乾县两县所有乡镇放大站均实现了自动开关机，没有专线的都安装了广播与电话自动倒闸装置。1980年全区有147个乡镇放大站实现自动开关机，占总数57%以上。

至1985年，咸阳市216个放大站，共有扩大机231部，总输出功率为110万千瓦，各放大站拥有录音机，多为L—601盘式机，有的还是国产或进口盒式的录音机。放大站的收音机，多为国产凯歌牌、红灯牌的台式机，少数站还有上海产71型红波牌收、扩、唱三用机。唱机全系国产206型，扩大机有西安产的500瓦扩大机，上海产2×250瓦扩大机。设备技术比较齐全先进，广播效果不断提高。

农村广播网建设从无到有，逐步完善。据1985年统计，全市拥有县区至乡镇的广播干线1394.36杆公里，乡镇至村屯的广播支线8320杆公里，合计为9715.16杆公里，且均为水泥杆。随着广播网正规化建设，各地广播喇叭的质量安全逐步达标，普遍使用合格皮线，总计拥有喇叭34.69万只，入户率达51%，音响率达到58.4%。

二、无线广播和电视

兴平转播台 1975年中央广播事业局确定在兴平投资兴建一座广播转播台，1977年破土施工，1979年基本建成，1985年收归咸阳市广播电视局管理。台址占地面积11.55亩，建有机房237平方米，收测室60平方米，专用高压线路1.5公里，通讯专用线路3.0公里，中波广播发射铁塔两座，地网、馈线等附属设施齐备，前后共动用国家投资38万元。

咸阳市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 1978年，咸阳地区广播事业局按省电视台要求配备了电视通讯点，任务是专为省台提供电视新闻资料带，为此地区财政拨款购置了两部16毫米电影摄影机和一些辅助设备。从1985年起，咸阳市决定筹建广播、电视台，至1989年国庆节两台正式开播。

三、社会兴办广播电视事业

本世纪50年代，咸阳地区一些厂矿和城镇学校就办起了广播室（站），设备有扩大机、收音机、话筒、唱机、广播喇叭等，用于本单位收听新闻广播、开会扩音和发布通知等，一般无专职工作人员。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广播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所用器材、装备不断更新完善。至1985年统计，

咸阳市各厂矿、学校经常开展宣传的广播室（站）已有 35 家之多，这些广播室（站）都有专职人员编制，有正规的工作秩序和先进齐全的广播设备。开办广播节目内容也有了明显的改进和提高，一般除了转播中央、省台广播节目外，还有自办节目和文艺节目，而且质量和效果日趋提高，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电视事业在国家财力不济的状况下，各厂矿企业自筹资金纷纷办起了电视差转台，以满足本单位职工收看电视的要求。从 1976 年开始出现至 1985 年，国家广播电视系统以外的电视差转台已达 26 家，是国家兴办电视差转台的 2.5 倍。

第二章 报 纸

咸阳报纸始于辛亥革命前夕。清宣统元年（1909），出版了两种报纸，即《兴平报》和《西北白话报》。《兴平报》是进步文士张瑞玘任兴平知县时，约集革命党人南南轩、张深如、南雪亭等创办的。报社社址在县城内，由南南轩担任报社社长。宣统三年（1911），报社迁往长安，并改为《兴平星期报》。后又改名为《帝州报》，是陕西兴办的三家报纸之一。当时该报纸对揭露清政府的腐败黑暗统治、宣传民主、启迪民智起了积极作用。《西北白话报》由范卓甫、胡平甫等人在三原县东关创办。

1911 年 10 月，革命党人胡景翼驻军三原，创办《三原报》，旨在宣传国民革命。

1918 年，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司令，总部设在三原县城，创办《战争日刊》。司令部参谋于鹤九任主编，姚养吾、李春堂、成柏仁等任编辑。该报持论严正，招致嫉恨，1919 年于鹤九惨遭杀害，该报停刊。此后，蔡江澄等改刊主编靖国军司令部机关报《启明日报》，社址在三原县城内管家巷。该报设有著述、社论、新论、讲演录、要闻等栏目，宣传革命思想。主要撰稿人有汝夫、王平正、胡伯岳（胡伯一）、周伯敏等。1920 年 12 月 12 日该报还在新潮专版中刊登《社会主义的概观》一文，宣传“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曾连载罗素的演讲《布尔什维克 ideal》，有一期还刊登了马克思的画像。

1921年9月停刊。

1920年,《救国日报》在三原创刊,主办人杨憾尘。主要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山东半岛的侵略行为,兼载新文化消息、时事新闻。后因发表批评军人的言论,冯自明枪杀了杨憾尘,报遂停刊。

1933年,三原有《民声周报》,张苏沛主编。西安事变后,改周刊为三日刊,更名为《三原民报》。当时三原县城内的中学,都在该报辟有专栏。例如三中是《清流》,工职是《工余》,女中是《嵯峨》。

1937年2月,《自生民报》在咸阳创刊。后改为《新生民报》。经费由咸阳县政府及商会补助。1939年停刊。

1939年,彬县抗敌后援会与国民党县党部合办《彬县报》,社址在县党部内。新闻纸八开,双面石印。内容有“中央”新闻,战地动态,各地要闻,补白为彬县简讯。初为日报,后改为周刊,不定期。一年后停刊。1945年复刊,由县党部独家主办,后因多种原因停刊。1939年,咸阳县政府创办三日刊《咸阳新报》。1943年、1947年、1949年先后创办过《渭阳民报》、《咸阳民报》、《咸阳民意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咸阳的报纸业有所发展。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报纸发展较快,但不稳定。1980年以后,报纸得到规范发展。

第一节 地、市报

1961年9月,中共咸阳地区委员会决定创刊《咸阳报》。经过3个月的筹备,于1962年元旦正式刊行。

《咸阳报》是中共咸阳地委机关报。宗旨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咸阳地委的决定和意图;表扬先进典型,及时交流经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宣传农业、工业及其他自然科学常识;报道国内外重要时事。

《咸阳报》每周出刊3期,逢星期二、四、六出版。该报为四开四版。一版为要闻版,辟有“大家谈”、“评论”等专栏;二版以农村经济为主,兼顾工、商、交通等,辟有“知心话”、“简要新闻”等专栏;三版为文教文艺版,辟有“党的生活”、“学校新风”、“科学知识”、“向阳花”等专栏;四版为时事版,主要转载国内外重要新闻,辟有“国际简讯”、“新闻简报”等专栏。该报通过邮局向全国发行,每份定价0.02元,平均刊发数量为3万份。《咸阳报》报头用字为郭沫若所题。

《咸阳报》主编高尔谦，编委高尔谦、高志英、赵有瑞、李润霖、崔岭等。编辑部设有办公室、经济组、文教组、记者组等，共约20人。1963年2月28日停刊。共出刊177期。

1985年4月，中共咸阳市委决定重新恢复《咸阳报》。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咸阳报》于当年9月27日正式复刊。其宗旨是：及时准确地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有关决定精神；站在改革前列，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宣传咸阳各条战线的成就、经验和广大干部群众在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新人新事，为振兴咸阳，促进生产力发展鸣锣开道。《咸阳报》报头仍用郭沫若题字。1986年9月至1987年6月，为内部发行，半月一期；从1987年7月1日至12月底为周刊，全国公开发行；从1988年1月1日起改为每周出2期。国内统一刊号：CN61—007，邮发代号：51—37。报纸仍为四开四版，一版为要闻版，二版为经济版，三版为科教文艺版，四版为政法时事版。

1990年报社实有干部19人。实行主编负责制，高仲田任主编，梁为策任副主编，社址位于渭阳西路彩电什字。

第二节 县、市报

一、《三原报》

《三原报》初创于1956年10月1日，为中共三原县委员会机关报。

《三原报》的宗旨是：遵循三原县委指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报道三原县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介绍各地工作经验，发挥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社址设在三原县城东关胡家巷。主编郭生辉。初刊时为五日一张。1958年7月1日，改为周二刊；10月1日，又改为周三刊。发行量逐步上升到1万份。

1958年12月8日，泾阳、三原、高陵、淳化4县合并，县治设在三原，统称三原县。《三原报》扩大机构，增加人员。除主编仍由郭生辉担任外，副主编有崔德志、张学仁、齐乙峰、刘凤祥、徐志善、李志思等。1961年9月，撤销大县，恢复原三原县治，《三原报》由曹慧岐任副主编，主编空缺。同年10月21日，《三原报》停刊，共出刊至第462期。1988年初中共三原县

委决定《三原报》复刊。1989年1月1日,《三原报》与三原人民见面。

复刊后的《三原报》仍为中共三原县委机关报。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报道改革和四化建设的新经验、新成果、新人新事、新风尚,反映群众生活和呼声,传播各种知识和信息,加强上下、内外联系,进行舆论监督,为振兴三原服务。初为内部报纸,在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注册登记,登记刊号为陕西省内部报刊统一刊号SX09—0004,半月一期,四开。1991年5月18日,省出版局将《三原报》交咸阳市新闻出版局代管,并在市上注册,其刊号为陕西省内部报刊准印证第552号,并改为周刊。1992年4月10日,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三原报》转为正式报纸,公开向全国发行,并直接在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注册登记,刊号为:CN61—0053。报纸由寄赠改交邮局发行。《三原报》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冯立法,副主编吴树民。各版面内容依次为:要闻、经济、综合、文艺。由陕西日报印刷厂承印,每期发行1万份。

二、《兴平县报》与《兴平报》

《兴平县报》是中共兴平县委机关报,创刊于1956年9月1日。周刊,初期发行量为6400份。1957年元月改为五日刊,发行量降为3700份,到当年第四季度,上升到10800份。1958年5月1日改为三日刊,发行量为8700份。同年10月又改为双日刊,发行量为8200份。同年12月5日,兴平、武功、扶风三县合并为兴平县,报名仍称《兴平县报》,发行量为34000份。

1959年元旦,更名《兴平日报》,发行量为6300份。1961年2月,报社与县广播站合并。同年8月14日停刊。共出报1157期。先后担任报社社长、主编的有:穆德裕(主编)、张志健(社长)、刘启哲(主编)、郝崇仁(副主编)。

《兴平报》创刊于1993年7月1日,由中共兴平县委主办、主管。报社社址设在兴平县门街32号,刊号为:陕西省报刊登记证04—0015(S)。四开四版,周报。《兴平报》是中共兴平县委机关报。其宗旨为:紧密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及时传达领导机关的重大决策,纳百家之言,载民众呼声,广南北信讯,促横向经济联系,为兴平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各项社会事业的长足发展而呐喊助力。

《兴平报》属于新闻报纸。一版为要闻和重大社会新闻版;二版为经济版;三版为科、教、文、卫、体和社会生活版;四版为文摘、信息版,并开

设有党建、政法、人武、驻兴单位专栏。该报的编辑方针是：坚持新闻工作的“二为”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真实、客观、公正的编辑工作原则，力求围绕中心搞报道，贴近生活作文章，使领导机关满意，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兴平报社编制16人。经费由县财政统一划拨。兴平县印刷厂激光照排、印刷，每期印数在10000份以上。自办发行。

三、《咸阳县报》、《咸阳市报》和《咸阳日报》

《咸阳县报》是中共咸阳县委机关报。1956年元旦创刊，1955年12月14日正式开始办公，并启用《陕西省咸阳县报社》印鉴。《咸阳县报》报头由县委副书记许廷方题写。其编辑方针是：主要根据咸阳县工作重点在农村的实际情况，除面向全县人民群众外，着重以乡村干部及广大的农民群众为主要对象，适当满足其他人民群众的文化政治生活，搞好宣传。初为周二刊，1957年改为周三刊。均为八开二版，一版是要闻，二版为人民群众之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重要时事综述、人民来信等。

《咸阳县报》主编高志英、副主编王云呈。创刊后，正值合作社的生产高潮时期，报纸热情反映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当时的生产运动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咸阳市报》系中共咸阳市委机关报。报头由市委书记王笃题写。1958年5月2日创刊，每旬逢二、五、八出版，篇幅为两版。1958年7月2日扩为四版。其方针任务是：面向全市人民，特别是面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路线，宣传党在各个时期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报道工人农民和全市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干劲。主编刘少吾。

1958年底咸阳县并入咸阳市，《咸阳县报》也随之停刊。《咸阳市报》于1959年1月1日改为《咸阳日报》。《咸阳日报》为中共咸阳地委机关报。主编高志英，副主编刘少吾、赵有瑞。

《咸阳日报》一版是要闻版，二版经济版，三版文教版，四版时事版。1959年3月9日创办《情况反映》，主要送地委书记处书记和行署专员参考。同年11月25日停办。《咸阳日报》1961年国庆节停刊。

“文化大革命”中的《咸阳报》于1968年10月1日创刊，1970年1月1日停刊，为咸阳市革命委员会机关报。报纸为周二刊，每逢星期三、六出

版，重大节日加刊。共出版 147 期，发行量为 1 万多份。发行范围为咸阳市所辖地区。报纸发刊词中称：新生的《咸阳报》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指示，把报纸办成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为保卫巩固红色政权大喊大叫。该报按照毛泽东主席“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来办，而不能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的指示，采取办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的办法，吸收工厂、农村、部队等爱好新闻写作的人办报。报社共有 10 多人，分农村组、城市组、办公室，从总编辑到编辑记者及办公室人员，都是从工厂、农村、部队借来的。

当时的《咸阳报》除设“群众论坛”、渭南副刊外，主要刊登的是一些社论、短评，每天的报眼上都有毛主席语录，二、三、四版上都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多数都是些大块文章，有转载的社论，还有大批判文章、工农兵诗歌、照片等。

四、《泾阳报》

1956 年 9 月，《泾阳报》开始筹办，由泾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宗洁负责，日常业务由杨永茂办理。报社地址设在县城半截巷。1956 年 12 月 26 日，《泾阳报》与读者见面。其“见面话”中说：《泾阳报》是中共泾阳县委机关报，因为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农民，所以它又是农民的通俗报纸。

《泾阳报》创办以后，五日一期，逢一、六出版，八开四版，发行量约 2—3 千份，订户以机关单位、学校为主，一些农业社组织也订阅，通过邮局发送。

1958 年初，泾阳报社迁址老爷庙，刘奉祥为主编，刘乙峰为副主编。

1958 年后，《泾阳报》发行量增至 4—5 千份，并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通讯员队伍，主要分布在机关单位和农村学校。主要经费来源于县财政拨款。每份报向订户收工本费二分，作为经费补充。

1958 年 12 月 13 日合大县后，《泾阳报》社并入《三原报》社。至此，共出版 141 期，发行约 56.4 万份。

五、《礼泉报》

《礼泉县》为中共礼泉县委机关报。1956 年元月开始筹办，1956 年 8 月

30日试刊，11月1日创刊。

该报为八开四版，一版是国内要闻和时事，二版农业，三版其他，四版副刊。初期为五日刊，每逢五、十出刊，从1958年元月1日起，改为三日刊。报纸在创刊后赠阅几期外，以后全部交邮局发行，最高发行量曾达27000多份。报社编制7人，主编1人。另外，报社还发展有390多名兼职通讯员。

1957年11月1日，中共礼泉县委决定县报社与广播站机构合并，挂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

1959年1月，因合大县，《礼泉报》并入《乾县日报》。1961年8月，分大县后不久停刊。共出195期。

六、《乾县报》、《乾县日报》

《乾县报》创刊于1956年10月1日，是中共乾县县委机关报。其宗旨是：向全县干部群众传达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交流本县各地办社经验和生产知识，刊登国内外大事，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乾县报》为五天一期，八开两版。其一版为要闻、政策；二版是综合版，主要是经济、文教、时事政策等。1958年12月21日停刊。主编刘祝三，社址先设在县城内文前巷。后迁进县委大院。报纸由县邮局发行。

1959年1月1日合大县后，《乾县报》改为《乾县日报》，仍为八开两版。一版要闻政策，二版是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时事政策等。1960年3月22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参观乾陵时，为《乾县日报》题写了报头。4月14日正式启用。

1961年8月4日，《乾县日报》因三县分设而停刊。主编是李润霖，副主编是杨树芳、刘祝三。同年8月16日，《乾县报》又复刊，版面为八开，每两日一期，9月30日停刊。《乾县报》出刊183期，每期发行约9000余份；《乾县日报》出刊797期，每期发行21000余份。

七、《武功报》、《武功日报》

1956年6月，《武功报》创刊出版，为中共武功县委机关报。社址设在县委机关内。初为四开四版。刊载内容以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等方

面。其中一版为通讯、社论、编后感和领导讲话摘要，二版主要报道县上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三版是一些综合性消息，四版刊登文学艺术方面的文章及新闻摘要。不久，由周报改为五日刊，1958年3月改为三日刊，同年10月1日改刊《武功日报》。主编张子健，副主编袁忠岐。至1958年12月5日撤销武功县制，《武功报》随即停办。共出版252期，发行量由开始每期2300份，发展到每期9700份。

八、《彬县报》、《彬县日报》

1956年6月1日，《彬县报》正式出版发行，为中共彬县委员会机关报。办报宗旨是：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报道全县工业生产的情况和建设成就，表彰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以及推广典型经验，宣传科学，破除封建迷信，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推动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

报纸初为周二刊，每周一、六出刊，八开两版。1958年12月，彬、旬、长3县合并，从第199期开始扩大发行。到1959年元月1日，报纸改为双日刊，逢单日报，同年4月起，又改刊《彬县日报》。1961年4月1日，报纸又改为隔日刊，恢复《彬县报》原名。同年8月21日，改为三日刊，逢一、四、六出版。1961年10月11日停刊。

《彬县报》从创办到停刊，历时5年零5个月，共出版916期，发行范围遍及整个彬县地区，合大县时发行到彬县、旬邑、长武县所属地区。初期发行400多份，发行最多时为3000份左右。除创刊号赠阅外，正式出版后由邮局办理订阅，并与省内30多家报社进行交流。

《彬县报》社初创时仅有7名职工，到1960年前后，职工人数增加到24名。此外，还发展有通讯员400多名。1957年后季到1958年12月初，曾和县广播站合署办公。历任主编有陈尚志、王宏德、郑志修、尚蔚、王西乾，副主编有张维玺、孙维杰。

九、《旬邑报》

1956年底《旬邑报》创刊，该报为县委机关报。版面为四开张，县内发行，1958年合大县后，并入《彬县报》。其办报宗旨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报道县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新气象

和工农业建设中的新经验，介绍旬邑的人文历史、名人轶事等。主编郑志修。还有 50 多名通讯员和撰稿人。

十、《长武报》

《长武报》是中共长武县委机关报。1956 年 9 月创办，11 月 1 日正式出刊。报纸为四开两版，三日刊。报头最早是选用毛泽东同志的手写体拼写成的，后由县委宣传部长葛志平为《长武报》题写了报头。版面安排是：一版为要闻版，主要刊登国内外及当地的重要新闻，二版是地方版，主要刊登地方的新闻、文化、科学、卫生等方面的稿件。主编李彦斌。邮电部门发行，每期发行约 1500 份左右。

1958 年合大县时，并入《彬县报》。1961 年分县后，重建的《长武报》社与县广播站一套人员，合署办公，当时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尚蔚兼任主编。同年底，停办。

十一、《淳化报》

《淳化报》创刊于 1956 年 8 月，为中共淳化县委机关报。创办初为八开版，五日刊，后改为四开版，五日刊。主编徐志善，1958 年底，因合大县而停办。

十二、《永寿报》

1956 年，《永寿报》筹办，为县委机关报。地址设在北街路东，张永清任报社社长兼主编。

10 月 1 日，《永寿报》试刊，随后正式出版。报纸系四开两版，定期出刊，每次印刷 300 余份，先由报社向各机关单位、乡政府、学校赠阅。一个月后，开始订阅，发行量达到 600 多份。

版面设置为：一版是新闻版；二版时事版。主要宣传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配合县上的政治运动，介绍工农业生产情况，各行各业的典型经验、先进人物及科学技术等。

乾县、礼泉、永寿三县合并时，并入乾县报社。1961 年分县不久，该报即停办。

第三节 专业报

一、《工人文化报》

原名《职工文艺》，1974年10月创刊。报纸由当时的咸阳市工农兵文化宫（即今工人文化宫）主办。

1990年8月，更名《工人文化报》。八开四版，双月刊。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证04—0002（S）。

其宗旨是：活跃职工文化生活，繁荣职工业余文艺创作，培养和建立职工业余创作队伍。主要栏目有：基层文化、文学、艺术、秦都诗苑、九州词萃、健康之友、历史文化、报刊文摘等。该报面向全市基层厂矿、工会及职工业余作者，另外还与省内外工会组织进行交流。

费宏达、赵尧、修骏先后任主编，副主编赵尧。印数2000份，自费邮寄。

二、《咸阳法制报》

创刊于1985年1月，咸阳市司法局主办。四开四版，月刊。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证04—0001（S）。

该报以积极为经济建设和民主与法制建设服务为宗旨，属全市政法系统普法专业报纸。版面设置是：一版为法制新闻，二版法制知识，三版法制文艺，四版案例通讯。

1985年9月，因经费紧缺，停刊一年。1986年4月21日，成立《咸阳法制报》编辑室。9月复刊，由市财政拨付专项经费。

1993年改为编辑部，编辑部主任张兴国，副主任魏建平。另外，有通讯员110名。每期发行23000份。

三、《咸阳影讯》

原名《咸阳电影》，创办于1976年。1986年更名《咸阳影讯》，由咸阳市文化局主管，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主办。月报，八开二版。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证04—0006（S）。

其宗旨是用健康、活泼的内容和形式宣传电影，帮助群众看懂看好电影，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水平。主要面向全市电影发行放映系统的干部、职工，以及广大电影观众。主编龚淑惠。每期印数 5000 份。

四、《秦都文明月报》

1992 年 3 月 25 日创刊，由秦都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街道工作委员会主办，秦都区人民政府主管。月报，四开四版。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证 04—0007 (S)。该报是以宣传秦都区两个文明建设成就，报道新人新事新风尚，提高秦都知名度，培养新作者，团结老朋友为宗旨的社会综合性报纸。主要读者对象为辖区的市民、学生、军人及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主编费洪贻。每期印数 2000 份。

五、《儿童保健报》

1992 年 8 月 4 日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出版，咸阳市经济委员会主管，咸阳儿童保健研究所、咸阳儿童保健品厂主办。龙沁主编。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证 04—0008 (S)。四开四版，双月刊。该报是一份科技类的专业报纸，服务对象为医疗保健系统的单位及产品用户。其宗旨是服务科研、生产、销售，宣传儿童保健知识，在厂家与用户中间起桥梁纽带作用。每期印数 50000 份。自办发行。

六、《咸阳教育电视》

1991 年 6 月 1 日创刊。系半月报，八开四版。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证 04—0011 (S)。其宗旨是坚持为社会主义大教育服务，为师资培训、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工教育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为广大电视观众准确及时地介绍电视节目，提供服务。

版面安排是：一版宣传中央及省市有关教育的方针、政策，反映教育信息和动态；二版、三版预告两周的教育电视节目；四版刊登节目内容简介、电化教育等方面的小常识及兄弟教育电视台的经验等。

主编高天奇。以赠阅形式向市区发行。

七、《侦探报》

1993年2月26日创刊，由咸阳市公安局主办、主管。刊号是：陕西省报刊登证04—0012(S)。旬报，初为四开八版，后为四开四版，共出7期。

为公安系统专业报纸。其宗旨是立足公安战线，全方位地反映广大干警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增强公安工作的透明度，宣扬公安战线的英模和先进人物，宣传法制、扬善抑恶，争取更大范围的群众基础和理解，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建设一支富有战斗力的人民警察队伍做好舆论先导工作。

《侦探报》采取主编个人承包负责制。每期印数35000份，主要采用在各县、区建立发行联络站的方法推销发行，同时向兄弟省、市公安局系统进行交流。主编郭群。

1993年7月13日，该报由于刊登超越专业范围、格调不高、导向不好的文章，并违反《内部报刊管理原则》在正式报纸上为自己进行宣传，被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撤销登记。

第四节 企业报

一、《西北二棉报》

原名为《二厂工人报》，创办于1956年，周报，国营西北第二棉纺织厂主办，1958年初停刊。该报是咸阳境内创办最早的企业报。

《西北二棉报》创刊于1987年5月4日，四开四版，半月报，刊号为：陕西省报刊登证SX11—0055(S)。主编彭长兴。每期印1500份，发至本厂各科室(部门)、车间及班组。

二、《秦岭报》

其前身为《秦岭生活》和《新秦岭》。《秦岭生活》始创于1958年2月13日，四开四版，周报。1960年9月1日停刊，共出128期。《新秦岭》创办于1968年7月，刊期与开版同《秦岭生活》，1969年12月停刊，共出刊70期。

1989年9月27日《秦岭报》出刊，国营秦岭电气公司党委宣传部主办。周报，四开四版。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证SX11—0015(S)。历任主编李

明、刘世杰、张元武。每期发行 4500 份。

三、《陕柴报》

初名《陕柴战报》，创刊于 1974 年 11 月 7 日，国营陕西柴油机厂主办。1979 年 1 月 13 日更名为《陕柴简报》，周报。四开、八开间出。1982 年 2 月 27 日又更名为《陕柴报》，四开四版，周报，刊号：陕西省报刊登登记证 SX11—0086 (S)。

主编陈春宝。每期印数 2100 份，以赠阅形式发至本厂班组、中层以上干部，还在本系统进行交流。

四、《陕毛一厂报》

创办于 1984 年 3 月 18 日，由国营陕西第一毛纺织厂党委宣传部主办。半月报，四开四版。刊号：陕西省报刊登登记证 SX11—0105 (S)。历任主编马兆瑞、马东顺、刘建勋、任彬科。每期印 1000 份，自办发行并在陕西纺织系统进行交流。

五、《开路先锋》

原名《铁道工地报》，1984 年 7 月 1 日创刊，由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党委主办、主管。1989 年 7 月 1 日更名为《四海报》。1991 年 6 月 13 日更名为《开路先锋》，并在陕西省新闻出版局登记注册，刊号为陕西省报刊登登记证 SX11—0038 (S)。周报，四开四版。

主编唐吉勤。每期发行 2000 份，主要服务于本局职工。

六、《如意报》

原名《陕广报》，创办于 1984 年 12 月 26 日，由国营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党委工作部主办。1988 年 5 月 15 日更名《如意报》，报名来自其“如意”牌电视机的商标名称。旬报，四开四版。刊号：SX11—0142 (S)。每期印 1500 份，向厂内发行。历任主编刘长义、贾永建、边保臣、马永权。

七、《兴化报》

创办于 1985 年 1 月 1 日，由国营陕西兴平化肥厂党委宣传部主办。八开

四版，半月报。1986年改为旬报。1988年，八开两版与四开四版两种开版交替出版。1989年以后，定为四开四版，旬报。刊号为SX11—0078(S)。历任主编王喜斌、郭素霞、冀晨辉、鱼坤。每期印1800份，免费向职工赠阅。

八、《彩虹报》

1985年4月10日创办，国营彩虹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主办。初期为月报，后改为半月报、旬报，1992年7月改为周报。开版为八开四版。刊号：SX11—0045(S)。以本公司职工为主要读者对象，兼顾家属，并与全国150多家企业报进行交流。主编孙水利，副主编姚建明。每期发行3000份。该报为陕西省暨全国电子企业报协会会员单位。

九、《秦岭管理》

1986年6月创刊，由国营秦岭电气公司主办。月报，四开四版。刊号：SX11—0046(S)。该报主要是宣传党和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普及管理基础知识，探索、研究、交流现代化管理经验，介绍国内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沟通信息，反映工厂各级管理人员的建议和要求，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编辑部由公司企业管理办公室和企业管理协会组成，历任主编陈启云、赵艳茹、高玉柱。每期印750份，以赠阅形式发至公司各部门、企业管理协会各小组、部分管理人员，还与各同行单位进行交流。

十、《西北七棉报》

初名《钢铁战报》，于1958年10月25日创办，由国营西北第七棉纺织厂筹建处主办。后只出8期，于当年11月4日停刊。1959年2月19日，该厂又创办了《跃进报》，仅出刊4期。1960年7月31日，又创办了《七厂工人报》，八开，不定期出刊。1970年1月1日，又出刊《战报》，1972年10月8日停刊。

1986年9月，经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批准，《西北七棉报》创刊，由国营西北第七棉纺织厂党委政治处主办，四开四版，半月报，刊号：SX11—0129(S)，每期印1500份。历任总编有杨益新、刘锡淑、曹晓原。

十一、《咸陶厂报》

创办于1987年4月，由国营陕西省咸阳陶瓷厂党委宣传部主办。八开四版月报，1988年划归厂行政办公室主办。1990年元月又交由宣传部主办。历任主编有成希英、杨国华、马越超。发行份数1987年为250份，1990年500份，到1992年为1000份。发行对象为全厂职工、车间班组、机关科室，并与全国80多家建材行业的企业报刊进行交流。该报1990年加入了中国建材报刊协会，成为会员单位。

十二、《华兴报》

1988年5月29日创办，由国营华兴航空机轮公司党委宣传部主办。四开四版，周报。刊号：SX11—0054(S)。历任主编李越、辛英、袁爱民、潘俊灵。每期印2000份，以本公司职工自费订阅为主。

十三、《咸纺机报》

1988年12月创刊，国营咸阳纺织机械厂党委宣传部主办。半月报，开版为四开四版。刊号：SX11—0156(S)。主编马惠民。每期印1000份。发至机关处室、分厂、车间。

十四、《陕西八棉报》

创办于1989年1月1日，半月报，四开四版。由国营陕西第八棉纺织厂党委宣传部主办。刊号：SX11—0060(S)。历任主编刘彦臻、王建中。每期印1000份，向全体职工赠送。

十五、《西北一棉报》

创刊于1986年8月25日，国营西北第一棉纺织厂党委主办，由陕西省纺织工业总公司主管。

半月报，每期印数为2000份，四开四版，自办发行。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11—0137(S)。主编李宝林。

十六、《西橡报》

1987年创刊，由国营西北橡胶厂主办。半月报，八开四版。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证11—0172(S)。主编杜杰、宋鹏涛。

十七、《美乐报》

创刊于1988年6月5日，三原县大程镇政府主管，三原美乐公司主办。

刊号为：陕西省报刊登证04—0009(S)，月报，四开四版。其办报宗旨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职工思想觉悟，扩大企业影响，与同行业及兄弟厂家进行生产经营方面的信息交流。以本企业干部职工为主要读者对象。

编委会主任郭建民，历任主编高雨田、屈大乾。每期印数30000份。自办发行。

第五节 校 报

一、《西北轻院》

1980年7月创刊，由西北轻工业学院党委宣传部主办，院党委主管。初为不定期，1984年后定为月报，四开四版。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证11—0084(S)。

历任主编冯益谦、李长真。每期发行1500份。

《西北轻院》是学院党委的机关报，其宗旨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报道教学、科研、管理及思想政治工作动态，反映师生员工的批评、建议，配合学院党委中心工作。服务对象是全院师生员工。

二、《陕西中医学院报》

初名《陕西中医学院》，1982年8月创刊，陕西中医学院党委主办。1991年1月更名《陕西中医学院报》。月报，四开四版。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证11—0090(S)。

该报为学院党委机关报，其办报宗旨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思想工作，弘扬祖国医学，普及中医知识；加强校际交流，沟通医教信息，襄助德育教学，致力服务育人。主要读者为院内师生员工，以及全省中医工作者。历任主编陈炜、王中文。每期印 2000 份，内部赠阅。

三、《西藏民族学院院报》

创刊于 1984 年 5 月，由西藏民族学院党委宣传部主办。该报创办时，在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注册登记，刊号：SX11—0127（S）。1993 年 7 月，改在西藏自治区文化厅新闻出版局登记，刊号：西藏自治区内部报刊准印证号（XZ）01—075。四开四版，不定期。

办报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服务的方针，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宣传西藏形势、民族政策和党的教育方针，颂扬学院教学、科研、管理、开发等各项工作改革的优异成绩，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宣传新人、新事、新风尚，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立优良的校风和学风，做出应有的贡献。主要服务于学院师生员工。

平均每年出 7—8 期，每期印 1000 份，发至校内，并与全国 300 多所兄弟院校进行交流。历任主编群培、詹炳全、郭有为。

四、《咸阳师专报》

原名《咸阳师专》，创刊于 1986 年 7 月 4 日，由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党委主办，陕西省教委主管。报头用舒同题写的校名。1993 年 10 月，更名为《咸阳师专报》。

月报，四开四版，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证 11—0067（S）。历任主编梁承志、高时阔。每期发行 1200 份。

《咸阳师专报》旨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及时反映学校教学、科研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情况，热情讴歌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交流经验，推动工作，揭露缺点，批评不良倾向；激励全校师生员工奋发进取，勇于改革。主要面向校内师生员工和咸阳市一些重点中学，同时与全国 250 多家兄弟院校互相交流。

五、《咸阳党校通讯》

1986年8月1日创刊，中共咸阳市委党校主办。四开四版，月报。每期印数700份。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04—0003(S)。

办报宗旨是：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党校工作的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探讨搞好党校教育和干部培训工作的经验，推动教学、科研和干部培训工作的开展。版面安排是：一版为要闻版，刊登中共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党校工作的指示，学校的重大政治活动；二版是动态版，报道市、县（区）党校的教学活动、工作经验和外地干部教育的工作经验；三版是理论版，刊登教师、党员及各级干部的论文、学习体会；四版为综合版，刊登文艺作品及党校的行政、后勤工作情况。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党校系统的教职工、学员以及本市各级党政干部。

主编李雨河。赠阅发行。

六、《陕西农科院》

原名《长征》，1979年1月9日创刊，由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主办。不定期，八开四版。1985年1月19日更名《陕西农科院》，四开四版，月报。刊号：陕西省内部报刊准印证第820号。该报以指导工作、交流信息、宣传先进和激励职工努力完成任务、促进科研工作为宗旨，主要报道陕西省农业科学院系统的科研成果、农技推广、生产建议、先进人物、党政工团及民主党派的活动和国内外农业科技动态等，同时开辟有文艺、卫生等方面的专栏。其服务对象为陕西省农业科学院系统、省级有关领导和部门、兄弟农科院（所）、中国农科院、国家科委以及驻咸阳市杨陵区的各科研教学单位。历任主编梁巨锋、马丰振、王玉堂。每期发行量为1000份，自办发行。1992年底停办。

七、《农科城报》

1989年10月1日创刊，由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协调委员会主办。四开四版，周报。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11—0076(S)。主编李建之、马英才、商鸿生。发行数量2000份，自办发行。该报宗旨是以党的基本路线、方

针、政策为指导，坚持为发展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和农业科学服务，集中反映杨陵农科城科研、教学、工农业生产活动，同时结合科研、教学改革问题组织科学家论坛和专题科技咨询。版面安排：一版为要闻版，主要宣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报道农科城的科技活动和新成就；二版为交流信息版，反映杨陵地区广大科技人员的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介绍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交流国内外重要农业科技信息和动态；三版为科技论坛版，刊登科学家建议、专家论谈及各项农业技术；四版是综合版，主要为广大农民、大中专学生和科技人员提供各种服务。主要服务对象是农科城各科研教学单位和陕西省、地（市）、县三级科技部门的广大技术人员、管理工作者和各级领导。

八、《科技信息报》

1989年7月创刊，杨陵区职业中学主办，咸阳市职教科技信息中心主管。1990年1月易为陕西省职教研究会、咸阳市职教科技信息中心和杨陵科技情报研究所主办，陕西省教委、陕西省教育学会主管。半月刊，四开四版。刊号：陕西省报刊登登记证11—0089（S）。

主编夏伦。每期发行10000份，自办发行。该报主要通过收集、处理农科城及全国各地科技信息、科研产品，以报纸作媒介，促使其转化为生产力，为社会服务，特别是为职业教育的实习、实践和校办企业服务。报纸内容涉及工业、农业、医疗保健等方面，以农业方面的信息为主。服务对象主要是全省职教系统和教育行政部门。

九、《果农实用技术信息报》

创刊于1993年5月20日，陕西省农业厅主管、陕西省农业学校主办。该报为月报，四开四版。刊号：陕西省报刊登登记证11—0178（S）。主编司传正，执行副主编李启民。

该报报头由陕西省副省长王双锡题写。每期发行约3万份，自办发行。

该报以为果农传授科技知识，为果农传递市场信息，为果农沟通生产渠道为办报宗旨，以市场为先导，充分发挥杨陵农科城的科技优势，对陕西果树生产实行全面系统的技术指导。其内容包括果树生产的方针政策，果树优良品种的推广、标准化果苗的培育、果树栽培管理、果园病虫害防治、果品

的贮藏加工和运销，以及与果业相关的其他产业综合开发技术等。服务对象为果业技术干部、大中专及职业中学师生、果农等。

十、《高中历史报》

1988年5月1日在泾阳县永乐店创办，由全国中学历史教学信息交流中心与陕西省中小学历史教学研究会合办。到1992年6月28日，共出刊86期（学年16期）。

1992年12月，经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批准，改由陕西省教育学会主办，陕西省教委主管。四开四版。半月报，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11—0167(S)。主编董志民。该报有编委128人。每期发行数万份，自办发行。该报的宗旨是研究我国中学历史课程的教材、教学、会考、高考的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三章 期 刊

清宣统元年（1909），境内创办了两种期刊。一是《关中学报》，一是《陕西杂志》。《关中学报》是陕西省境内最早的教育杂志，在三原县北城崇贤街出版。《陕西杂志》则是综合性期刊，由三原宏道学堂的吴宓、胡文豹、胡文骥、胡文犀、南又文、牟深等人联合创办。

1925年8月4日，设在三原的渭北青年社中央执行委员会创办了《渭北青年》。创办人是蒲子田、亢维格、李子健等。该刊内容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共出两期。

1936年，《西北农林》在杨陵创刊。该刊由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主办，是西北地区最早的期刊。

1939年，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迁至泾阳县云阳镇，省委机关刊物《西北周刊》亦于当年7月1日在云阳复刊。主编欧阳钦（笔名杨清）。后因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不断升级，《西北周刊》于1940年4月停刊。

建国后，境内期刊得到了复苏发展。1955年，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创办《西北农业科学技术汇刊》；1956年，西北农学院校刊《西北农学院学报》亦

在杨陵复刊。1960年，国家对报刊采取收缩精简，惟有《西北农学院学报》继续出版。

1966年到1976年，境内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先后创刊了《特种橡胶制品》、《陕西农业科技》、《陕西林业科技》、《橡胶参考资料》、《热加工工艺》、《轻工技术资料》、《陶瓷》、《纺织器材通讯》、《黄牛技术资料》等期刊。咸阳地区所属单位亦创办了文艺性期刊《新作》、《咸阳文艺》及教育期刊《学习与实践》等。这些刊物均属内部期刊，只在规定范围内发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境内期刊渐渐繁荣。至1990年，省农学方面共有21种正式学术性期刊，其中咸阳境内就有18种之多。同时，市属单位亦相继创办了一批专业性强、门类比较齐全的内部期刊。

第一节 公开期刊

一、《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前身为《西北农林》和《西北农学院学报》。《西北农林》创刊于1936年，是我国西北地区农业方面最早的学术期刊。1956年《西北农学院学报》正式创办，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期刊。1986年更名为《西北农业大学学报》。该学报是农业方面综合性的学术期刊，由西北农业大学主办，陕西省教委主管。学报的国际标准刊号为：ISSN1000—2782。国内统一刊号为：CN61—1081/S。国际刊名代码为：CODEN XNOXED。季刊，16开本，每期110页，邮发代号52—32。

办刊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促进学术交流，发展学科理论，推动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服务。刊登内容主要是农业、植物保护、园艺、土壤农化、畜牧、兽医、农业经济、食品科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农业工程、古农学等方面的科研新成果。设置的栏目有：学术论文、学术动态等。服务对象为国内外农业科学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师生。

从创刊至1993年6月，共编辑出版108期（其中建国前23期，建国后85期），共发表学术论文1343篇。1989—1992年，学报刊登科研成果获奖的论文占38.4%，刊登具有国内首创或领先水平的论文占75.8%，该刊已入选为全国中文核心（重要）期刊。

历任主编康迪、周尧、沈煜清。每期印 1000—1200 份，交邮局发行。

二、《陕西农业科学》

1955 年创刊，为陕西省农业科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农业科学技术期刊。前身为《西北农业科学技术汇刊》；1957 年正式定名为《西北农业科学》，在国内发行；1958 年更名为《陕西农业科学》，1960 年停刊。1970 年复刊后改为以普及农业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陕西农业科技》；1980 年恢复原名《陕西农业科学》，限国内发行，1988 年公开发行。办刊宗旨是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提高与普及兼顾，追踪农业科学研究热点，报道最新研究成果，提供创新的农业技术，重点报道黄土高原旱地农业，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迅速转化。该刊以应用科学为主要内容，服务对象为农业科研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各级管理干部、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及农业专业户等。双月刊，16 开本，48 页。国内统一刊号为：CN61—1089/S。国际标准刊号为：ISSN0488—5368。邮局发行，邮发代号为：52—50。发行量 1980—1985 年每期发行 9000—10000 份，1986—1988 年 5000—5500 份，1989—1992 年 3500 份左右。

历任主编祝泽驹、宋家声、郭寿坤、李荣宗、张瑞玲。

三、《陕西林业科技》

1973 年元月创刊，是由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陕西省林学会和陕西省森林工业管理局三家合办的一种综合性林业科技刊物。其办刊宗旨是介绍林业科研成果、介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广普及科学技术知识。该刊主要刊登育苗、造林、经营、森林保护、采伐运输、木材加工、林产化学、调查设计、经济管理等方面科技论文、试验研究、调查总结、基础知识讲座、树种介绍、译文等文章。读者对象是从事林业、生物工作的科研人员、院校师生、勘察设计技术人员以及从事林业生产的职工。

创刊时为月刊，1974 年起改为双月刊。1982—1987 年为国内发行，季刊。1988 年以后，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统一刊号为：CN61—1092/S，每期发行约 300 份。

历任主编李宽胜、符毓秦。自办发行。1988 年公开发行后，与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科研、教学等 10 多个单位建立了交换关系。

四、《热加工工艺》

创刊于1972年，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原第六机械工业部）热加工工艺研究所主办。国内统一刊号：CN61—1133/TG。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1—7415。双月刊，16开本，56页。该刊是国内惟一公开发行的热加工专业科技期刊。其宗旨是反映热加工工艺技术的科技进步，促进科技交流和推广应用。刊登的主要内容是：铸造、锻压、热处理等热加工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及有关检测技术方面的试验研究论文和技术报告；具有较大推广应用价值的工艺技术改造、设备改造、检测方法等的经验介绍等。读者对象为从事铸、锻热处理、金属材料及相关专业的科技人员、技术工人、管理干部和高等院校师生。

《热加工工艺》设有编委、编辑部和通讯员网。主编娄鸿恩。邮局发行，期发行量为6000份。1978年以前为不定期，内部赠阅交换；1978年改为定期双月刊，限国内发行；1988年改为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热加工工艺研究所和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工艺与材料学术委员会联办，公开发行。

五、《陶瓷》

创办于1974年6月，国家建材局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主办，国家建材局主管，国家科委批准。双月刊，16开本，56页。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2872。国内统一刊号：CN61—1143/TV。编辑部位于咸阳市渭阳西路35号。《陶瓷》是国内建筑卫生陶瓷、工业陶瓷、特种陶瓷以及陶瓷耐火材料、陶瓷机械设备等专业的技术性刊物，旨在报道其科技新成果、生产经验、现代化管理、革新挖潜、节能利废、基础理论以及与之有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和标准检测、测试方法、技术经济、市场信息等内容，并适当报道国外该行业的先进技术和经贸动态等。读者对象主要是从事陶瓷生产、科研设计、教学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和技术工人，以及大专院校学生等。历任主编黄艺林、姚治才。每期印4000份。公开发行，邮局代办，邮发代号为：52—76。

六、《纺织器材》

前身是《纺织器材通讯》。创刊于1974年9月，由纺织工业部科学技术

情报研究所、中国纺织器材协会、中国纺织器材工业公司、陕西纺织器材研究所四家主办。1979年9月更名为《纺织器材》。1980年8月经纺织工业部批准，1981年7月经全国科技情报编辑出版委员会批准为正式刊物，限国内发行。经国家科委批准，1986年起公开发行。该刊为双月刊，16开本，64页，每期约10万字。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1—9634。国内统一刊号：CN61—1131/TS。

《纺织器材》是全国纺织器材行业惟一的综合性技术期刊，其专业范围为国内外纺织器材的理论研究、科研成果、成果制造技术、技术座谈、科学管理及其使用、维修和保养，并有市场动态、经济体制改革、节能、环保、教育等信息。读者对象是纺织器材制造厂家、使用厂家和科研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管理干部以及大专院校的师生。

历任主编高耀岭、冯玉田、任智明、李成基。每期印数2000份，自办向外发行。

七、《黄牛杂志》

原名《黄牛技术资料》。1975年创刊，系农业部委托西北农业大学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1981年改名为《中国良种黄牛》。季刊，内部发行。1986年更名为《中国黄牛》，经陕西省科委批准，陕西省出版总社1986年1月25日颁发了“陕西省期刊登记证”，刊号为第194号，国内外公开发行。1989年又更名为《黄牛杂志》，主管单位为农业部，仍为季刊，16开本，90—92页。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1—9111。国内统一刊号：CN61—1087/S。1992年该刊入选全国畜牧类核心期刊。

办刊宗旨为：大力宣传党和政府有关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政策，普及与提高并重，反映我国黄牛传育种、饲养、繁殖、牛病防治等工作的新形势和科学研究上的新成果，传播先进经验，交流科技情况，促进我国养牛业的发展。该刊以广大养牛专业户、兽医、基层畜牧干部为主要服务对象，并兼顾科研人员及院校师生。

《黄牛杂志》编委会由全国8个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吉林、辽宁）的10个良种黄牛品种（秦川牛、晋南牛、南阳牛、鲁西牛、延边牛、复州牛、西镇牛、徐州牛、郑县红牛、渤海黑牛）产区从事教学、科研、生产的专家、教授共24人组成，主编邱怀，另聘有4名国内外畜牧专家为技术顾问。

每期发行 1600 份，开始为自办发行，1993 年开始由邮局发行，邮发代号：52—1133。止 1993 年 6 月，共出版 63 期。

八、《畜牧生态》

1978 年创刊，中国马匹育种协会主办。每年 1 期，属内部发行。1983 年改由家畜生态研究会主办，每年 2 期。1988 年改由西北农业大学和家畜生态研究会联合主办，每年出 2 期。1989 年起改为季刊。1992 年公开发行。16 开本，48 页。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5228。国内统一刊号：CN61—1221/S。

《畜牧生态》为科技刊物，其宗旨是宣传、推广与畜牧生态学有关的科学理论和技术，交流各行运用生态学原理治理牧业生态环境、优化牧业生产系统，提高畜牧生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经济和信息，开展学术讨论，组织理论传授，为促进畜牧生产和科学的发展做出努力。主要栏目有家畜生态、牧业生态方面的科学研究、观摩分析、调查报告、经验总结、文献综述、学术讨论等。读者对象为农牧院校师生、农牧科研人员、畜牧兽医及从事生态学、农业经济工作的人员。

《畜牧生态》设有编委会，有编委 17 人；主编李震中。编辑部设在西北农业大学畜牧系。每期印数 1800 份，邮局发行。

九、《昆虫分类学报》

1979 年创办，由西北农业大学主办，陕西省教委主管。季刊，16 开本，80 页。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7482。国内统一刊号：CN61—1084/Q。

主办宗旨是：搞清中国的昆虫资源（包括害虫、天敌昆虫及其他益虫），促进我国分类学的发展，加强我国昆虫分类工作的国际交流。该刊主要服务于从事农业昆虫、天敌昆虫、昆虫区系及生态研究的昆虫学工作者，本校生物系、植保系、森保等专业师生，农、林、医、牧、师范及综合院校的有关关系、专业，农林、卫生科研及生产单位。

《昆虫分类学报》编委会有世界著名昆虫学专家 20 余人；历任主编周尧、路进生。年发行量 5000 份。自办发行。

十、《西北植物学报》

前身是《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丛刊》和《西北植物研究》。《中国西北植

物调查所丛刊》，创刊于1939年10月，由国立北平研究院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主办。主编刘慎谔，出版地在重庆，至解放前夕停刊。《西北植物研究》创办于1980年，刊号：陕西省期刊登记证第036号，半年刊，国内发行。1982年经陕西省科委批准，更名为《西北植物学报》，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和陕西省植物学会合办的植物学学术期刊，季刊，16开本。国内统一刊号为：CN61—1091/Q。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4025。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指定专用期刊、中国科学院中文核心期刊。办刊宗旨是立足西北，面向全国，开展学术讨论，交流科研成果，介绍植物分类与区划、植物遗传、植物化学、形态细胞及生态地植物等方面研究上的新成就、新技术，探讨有关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促进本学科基础理论和实践技术的发展。

《西北植物学报》编委会由西北5省区27名植物学专家教授组成，编辑部设在杨陵区西北植物研究所内。主编刘顺义，由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至1993年6月已出版13卷38期，每期发行约2000份。

十一、《国外兽医学——畜禽疾病》

创刊于1980年6月，由西北农业大学主办，农业部主管，是国家级公开发行的兽医科技情报刊物。季刊，16开本，48页。国内统一刊号：CN61—1086/S。该刊宗旨是：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从我国畜牧兽医科研和生产实践实际出发，有目的、有计划地翻译介绍国外畜禽疾病方面的科学技术文献资料，以促进我国畜牧兽医事业的发展。主要内容是报道国外畜禽内科、外科、产科疾病的发生原因和诊疗经验，报道国外畜禽传染病、寄生虫病的病原、流行情况、病理发生、病理变化、临床症状及防治技术，以及报道与临床密切相关的兽医基础理论。该刊为兽医学的核心期刊。

《国外兽医学——畜禽疾病》是由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编译委员会协调下达任务而创办的。创刊时，由西北农业大学和陕西省科技情报所合办。1980年创办时为季刊，1981年改为双月刊；1984年改为月刊。发行量由4000多份上升到1985年的8800份。1986年后，又改为双月刊，1989年又复为季刊。该刊设有由14名副教授和讲师组成的编委，主编王建长。除1986年自办发行一年外，一直由邮局发行。

十二、《国外农学——麦类作物》

《国外农学——麦类作物》是由陕西省农业科学院主办、农业部主管的全国农业科技译报类系列刊物之一。创刊于1981年7月，双月刊，逢单月20日出版，16开本，48页。公开发行，国内统一刊号：CN61—1090/S。该刊作为国内惟一报道国外“麦类作物”研究的译报期刊，主要是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结合我国“麦类作物”研究及生产的实际需要，及时反映国外小麦、大麦、小黑麦等的遗传育种、耕作栽培、生理生化、植物保护、机械加工等方面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同时适量反映国内麦类作物科研进展的论文和信息。1992年被列入全国农业专业类的核心期刊。历任主编左同、吕玉琴。邮局发行，印数近200份。

十三、《畜牧兽医杂志》

1982年创刊，由陕西省畜牧兽医学会、西北农业大学、陕西省农牧厅畜局联合主办，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主管。季刊，16开本，48页。国内统一刊号：CN61—1085/S。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6704。编辑部设在西北农业大学。

《畜牧兽医杂志》为公开发行的兽医学学术期刊，主要刊登畜牧兽方面的科研成果、调查报告、经验交流、文献综述与专论、畜禽病防治、信息广告。普及与提高并重，为广大畜牧兽医工作者在教学、科研和生产方面提供参考。该刊编委会由20人组成，历任主编侯从远、张岳。邮局发行，邮发代号：52—56。

十四、《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1983年9月创刊，是由西北农业大学干旱半干旱研究中心主办，陕西省教委主管。为我国第一个以专门反映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为主的学术期刊。季刊，16开本，96页。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统一刊号：CN61—1088/S。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7601。办刊宗旨是通过报道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成果、新理论、新技术，结合介绍国外有关旱农研究的新进展，努力为促进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科学研究和生产的发展，以及全面地开发整治服务。主要刊登有关干旱、半干旱及半湿润易旱地区的旱农耕

作栽培技术、土壤培肥、旱地水分动态与利用、节水灌溉、抗旱作物与生理、资源开发利用、旱区治理与建设、干旱与类型划分等方面的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综合评述等。主要读者是广大从事旱地农业研究的科技人员、生产管理工作者及农业院校师生。

创刊时设有编辑工作委员会，编委由国内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及有关管理部门从事干旱问题研究、管理方面的专家、教授等 27 人组成。主编万建中，副主编钮溥。开始为自办发行，年发行量约 4000 册，1988 年交邮局发行后，年发行量稳定在 8000 册以上。

十五、《水土保持通报》

创刊于 1981 年，经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批准，由中国科学院、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主办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双月刊，16 开本，64 页。国内统一刊号：CN61—1094/X。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288X。国内外公开发行。

办刊宗旨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双百”方针，捕捉水土保持科研及生产、治理前沿的热点和生长点，及时报道具有导向性的文章，注意选登能反映国家或某一地区科研和生产治理方面的前沿问题及水土流失、泥石流等灾害的预防、监督、监测等方面的信息动态及技术措施和依法防治水土流失的典型经验；刊登水土保持领域内新的科研成果论文；新的实验方法、技术、土壤侵蚀规律和治理对策；水土保持工作方面的评价、综述和问题讨论等。主要服务于全国各地从事水土保持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各级主管水保工作的干部、基层水保专业人员及大专院校师生。

历任主编曾祥渊、刘玉民、唐克丽。西安市报刊发行局发行，每期发行 2000 份。

十六、《水土保持学报》

1987 年 3 月在咸阳杨陵区创刊，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和中国科学院、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主办。国内统一刊号：CN61—1093/X。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3010。16 开本，96 页，季刊。该刊为公开发行的全国性学术期刊，其编辑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我国水土保持科学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主要刊登水土保持学科的基础理论、应用

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以及有关的边缘和交叉学科具有创造性的科学论文、调查报告、综述和评述等。服务于从事水土保持、水土资源合理利用、山丘区灾害与环境，以及水土保持型农林牧业等方面的技术管理、科学研究、教学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历任主编曾祥渊、刘玉民。该刊由西安报刊发行局向全国发行，邮发代号 52—27，发行份数为 1000—1500 份。

十七、《西北林学院学报》

创刊于 1984 年 10 月，由西北林学院主办。为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1985 年停刊。1987 年复刊。1989 年 8 月经国家科委批准公开发行人。1992 年起由邮局发行。国内统一刊号 CN61—1202/S。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1—7461，16 开本，96 页，季刊。

办刊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双百”方针，提倡学术民主、科学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及时发表本院的科研教学成果及国内外林业科技新成果，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主要刊载林木遗传育种、造林、森林经营管理、森林资源及其保护，水土保持、森林绿化、经济林栽培、林业机械、木材学及木材加工、林产化学、林业经济等学科和有关的基础理论学科方面的学术论文、调查研究、试验简报、学术讨论、文献综述、学术动态等。读者对象为农林院校及综合院校有关专业师生，林业科研、中等农林学校和生产设计的科研和技术人员。

编委会主任张仰渠，副主任邱明光、王性炎，编辑室主任范升才。国内由邮局发行，国外由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发行。每期印刷 1200 册。

十八、《西北农业学报》

1991 年 7 月国家科委批准创刊，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5 省（区）农业科学院和青海、新疆畜牧兽医科学院联合主办，为综合性农牧业科学学术期刊。办刊宗旨是立足大西北、面向国内外，跟踪世界高新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动态，反映国内外最新农业研究成果。主要刊载有关动植物遗传育种、生理生化、生物遗传工程、组织培养、土壤肥料、耕作栽培、饲料饲草、病虫害防治、农业气象、农产品加工等各学科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方面，具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和创新性研究成果报告。刊稿均附英文摘

要，以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主要读者对象是国内外农牧业科研人员、农业院校师生及农业管理和推广人员。

学报为季刊，16开本，96页。国内统一刊号：CN61—1220/S。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389。国内由杨陵邮局发行，邮发代号52—111；国外总发行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该刊设有编委会和编辑部，由全国知名专家和主办单位领导任顾问和编委，第一任编委会主任是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吕金殿，主编李荣宗。办刊经费由西北5省（区）7个农牧业科学院分担。期刊主管单位是陕西省农业科学院。

十九、《沙棘》

1988年3月创刊，由国水资源与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沙棘协调办公室、中国水土保持学会沙棘专业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沙棘办公室、陕西省沙棘开发利用办公室、陕西省沙棘开发利用科研中心主办，陕西省科委、陕西省水利厅主管。季刊，16开本，48页。国内统一刊号：CN61—1212/S。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8809。邮发代号：52—100。

办刊宗旨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积极宣传贯彻党和政府关于沙棘开发利用的方针政策，认真探讨我国沙棘开发利用事业的发展战略和策略，广泛介绍国内外沙棘开发信息，报道沙棘开发利用新技术、新经验、新成果。专业范围涉及农业、生态、水土保持、生化、食品、医药、木材加工等方面。主要栏目有专稿、综述、品种与资源、资源建设、综合开发利用研究、医药研究、工作研究、科技与生产、信息研究、简讯等。主要服务于农业、林业、经济资源利用、医疗保健、化工、食品、制药等专业的科研工作者、大中专院校师生及技术推广部门的工作者。主编袁海珍，副主编解柱华。每期发行2000册。

二十、《西北轻工业学院学报》

1982年12月25日创刊，由西北轻工业学院主办。1986年7月经国家科委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季刊，16开本，每期页码80—100页。国内统一刊号：CN61—1080/TS。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5811。为自然科学类的学术期刊，主要内容包括制浆造纸、皮革、食品、饮料、玻璃、陶瓷、搪瓷及钟表、自行车、缝纫机、包装等轻工机械、轻工自动控制

以及基础科学在轻工业上的应用等方面的科学论文和研究成果，以从事轻工业生产、科研、教学人员中的中级以上技术人员为主要读者对象。主编沈良骥。国内自办发行，国外总发行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负责。

二十一、《陕西中医函授》

创办于1981年8月，由陕西中医学院主办，陕西省教委主管。双月刊，16开本，48页。国内统一刊号：CN61—1106/R。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1523。邮发代号为：52—23。

办刊宗旨是进行中医函授大专专业教育，培养中医人才，提高在职中医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主要服务于基层中医医生、大专院校在校学生及中医爱好者。

编委会主任杜雨茂，主编王景洪。每期发行7000册。

二十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创办于1980年1月，由西藏民族学院主办。季刊，16开本，96页码。国内统一刊号：CN54—1012/C。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8388。

该刊为社会科学综合性期刊。其办刊宗旨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和遵循高校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提高教学的原则，依靠全院广大师生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促进科研工作与教学改革的发展。该报以刊登有关研究西藏的民族、宗教、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藏学论文为主，兼登文科各专业的学术和教学研究文章，主要为从事藏学、民族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及民族院校师生服务。主编彭英全，副主编胡秉之。每期发行1500份，自办向外发行。

第二节 内部期刊

一、《特种橡胶制品》

1966年创刊，后因“文化大革命”停办。1979年试刊，1980年正式出刊。由化工部西北橡胶制品研究所主办，化工部主管。国内统一刊号：

CN61—1141/TQ。双月刊，16开本，64页码，属内部发行的正式期刊。

办刊宗旨是反映国内外橡胶制品工业的进展和动向，推广交流橡胶制品用的材料与配合技术、产品结构、设计、生产工艺、测试方法等。主要供化工，特别是合成橡胶和加工工业部门及石油、地质、煤炭、冶金、交通、航天、电子、核子、机械、兵器等有关部门从事橡胶制品生产、设计和使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及高等院校的师生阅读参考。

历任主编王有道、陈根度。兴平邮局发行，期发3000份。

二、《橡胶参考资料》

1971年创刊，由化工部西北橡胶制品研究所主办，陕西省石化厅主管。月刊，16开本，64页。国内统一刊号：CN61—1140/TQ。该刊为陕西省科委批准出版的译文月刊，主要报道国外橡胶密封和其他制品及其新材料、配合技术、工艺设备、分析测试、理论研究、仪器仪表等内容。形式采用选择或摘译国外橡胶期刊、专刊、样本、文摘、外国公司技术资料等。可供橡胶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机械制造业、航空工业、电子仪表工业、造船工业、车辆制造业等有关单位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大专院校的师生参考。

历任主编陈根度、刘印文。1989年前为邮发，期发2400份；1990年至1993年改为自办发行，期发800份；1994年起又改为邮发。

三、《火炮发射与控制学报》

原名《兵工学报武器分册》。创办于1979年，由中国兵器工业部第二〇二研究所主办，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主编任久东。1994年更名《火炮发射与控制学报》。

季刊，16开本，64—68页。国内统一刊号CN61—1280/TJ，属内部发行的正式期刊。该刊以工程应用为主，主要刊载火炮、弹道、武器自动控制方面的学术论文、课题研究报告、新原理、新技术、新结构、新的设计和计算方法，跟踪国内外最新技术成果和发展动态。自办发行，期发1000册。

四、《西北水资源与水工程》

1990年1月创办，由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主办，水利部、陕西省

水利厅主管。季刊，16开本，96页。国内统一刊号：CN61—1201/TV，属内部发行的正式学术期刊。办刊宗旨在于加速西北地区水电科技的发展，促进水利水电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促进学术交流和西北地区水利资源与水工程的开发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内容包括水文资源、河渠泥沙、水工水力学、岩土工程、材料结构、水利经济、环境水利、农田水利、水工程运行管理，以及水利水电工程测试的新技术、新设备。主要服务于水利水电、建筑、交通等部门从事水资源和水工程科研、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的中级以上的科技工作者及大专院校的师生。

五、《教学研究》

原名《学习与实践》。创办于1975年7月，由咸阳地区文教局教育革命办公室主办，季刊。1979年3月更名《教学研究》，由咸阳地区文教局教学研究室主办。1984年6月由咸阳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主办，咸阳市教育局主管。历任主编门子祥、崔明善，副主编郑旭祖、岳基廉。初为不定期出版。从1991年起，确定为季刊，16开本，56个页码。刊号：陕西报刊登证64—1009(S)。其办刊宗旨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为全市广大中小学教师、市县两级教研员提供教育研究阵地，促进全市教学改革。其编辑方针是交流教学经验，发表教改论文、研究教材教法、提供教改信息、反映国内外教改动态。读者对象为全市中小学教师、教研员。

《教学研究》的内容只涉及中小学教学及研究方面，稿件主要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师生。每期约印3000册。初期为赠阅，自1992年起在各县区征订，县区发行由通讯员发送。

六、《秦都》

1981年1月出刊，地区文化局主管，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主办。1988年改由咸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秦都》编辑部主办。1991年5月刊号：陕西省内部报刊准印证第555号，双月刊，16开本，80个页码。1993年1月起，刊号改为陕西省报刊登证04—1007(S)。从创刊到1991年5月，共出刊53期（包括合期）。该刊主要发表以反映咸阳地区现实生活为主，有地方特色的各类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含中篇）、散文、诗歌（含古体诗词）、戏剧、评论、报告文学等。该刊以发表本地区作家及作者的作品为主，同时也

发表外来稿件。该刊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历任主编峭石、沙石、冯仁。

七、《党史文苑》

原名《咸阳党史资料征集通讯》。创办于1983年11月，由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中共咸阳市委主管。

初为不定期，内容多以刊载回忆录、烈士传略、历史文献、报刊资料、征集动态为主。1989年1月更名《咸阳党史通讯》，内容偏重党史征研成果的宣传利用工作。1990年12月停办。1993年7月复刊，更名《党史文苑》，季刊，16开本，48个页码。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04—1015(S)。读者对象主要是全市的党史工作者。

历任主编赵富考、刘舜国、方世信、贾俊华。从创刊到1994年6月，共出刊57期，约200万字。每期印300份，主要向各县(区)党史部门、市直机关有关单位和领导发送，另外还与省内各地市的党史研究部门进行交流。

八、《咸阳经济》

创刊于1985年3月，由咸阳市体改委、咸阳市经济研究中心主办。16开本，双月刊，48页。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04—1004(S)。

办刊宗旨是：卓有成效地开展本市经济研究，与兄弟地市互通经济情况，为市政府经济工作决策和领导经济决策提供依据和资料，同时为全市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战线的实际工作者提供学术研究和探讨的园地。服务对象为市经济决策层、经济研究部门，党政群机关及企事业单位。

主编吴淑珍。每期印1000—3000份，内部赠阅，发行范围是和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及100多个中等城市的体改委(办)、经济研究中心交换，市内发至中央、省、市属企业、单位及各县(区)党政部门。

九、《咸阳财会》

1986年5月创刊，咸阳市财政学会、咸阳市会计学会和咸阳市珠算学会联合主办，咸阳市财政局主管。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04—1002(S)。16开本，60页码。历任主编骆景茂、吴怀德。

办刊宗旨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发

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探讨财政、会计、珠算理论和实际问题，宣传《会计法》和财会战线上的先进人物，汇集财会信息，交流工作经验。读者对象为全市财政、会计、珠算工作者，广大审计、税务干部。

每期印刷 1500 册，内部赠阅。到 1993 年 6 月，共出版 27 期，

十、《咸阳税务》

创办于 1987 年 1 月，由咸阳市税务局、咸阳市税务学会主办。初为不定期，16 开本，40—60 页码。1991 年 5 月重新登记后，确定为双月刊，16 开本，48 页码。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04—1003 (S)。

办刊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开展税收学术研究，总结税收经验，宣传税收政策法规，提高税收征管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发行对象主要是基层税务机关和广大税务干部以及国营、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并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地（市）以上及本省各地（市）税务部门，本市各科研学（协）会组织进行学术交流和资料交换。该刊在发行中除对基层税务部门和税务干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个体工商户减半收取工本费外，其余均为赠阅。历任主编王敬伦、马清理。每期印 4000 册。

十一、《咸阳城市科学》

创刊于 1987 年 10 月，由咸阳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和咸阳市城市科学研究所主办，咸阳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管。初为不定期后为季刊。16 开本，46 页码。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04—1008 (S)。

办刊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双百”方针，研究城市科学的基本理论，探索城镇建设的基本规律，总结城镇建设的经验教训，研讨城镇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传递城镇建设的信息，介绍国内外城镇建设的动向。内容以发表学术论文、专著、经验为主，同时发表信息动态文章。服务对象为国内各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单位和城市科学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本市从事城市工作的领导、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

主编窦宽荣，副主编周效学、何昆华。发行量 2000 份，以赠阅形式向市

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领导及办公室、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市建委系统各单位，以及国家建设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省建厅等上级部门投送，另外还同国内其他城市的有关单位和刊物进行交流。

十二、《方志研究》

创办于1988年10月，由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编辑方针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突出资料性、知识性，从而达到“资治、教化、存史”的目的。主要服务于修志工作者、方志研究者，以及愿了解咸阳的各界人士。编委会主任是尚行韬，主编王岳林、副主编陈若虚。1992年后，停刊。刊号：陕西省内部报刊准印证第564号。最多印数1000册，最少300册。发行范围为咸阳市各县区、各部门的志书承编单位，也和全国各地互赠资料。

十三、《挚友》

1990年创刊，政协咸阳市委员会主办，政协咸阳市委员会党组主管。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04—1010(S)。季刊，48页。

办刊宗旨是：立足统战，面向社会实行政治性和服务性统一的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触及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发挥政协参政议政的职能，为政协委员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理论学习、视察调查、协商监督、提案建议、联谊交往、工作经验、撰写文史资料等活动提供园地。在内容上突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突出共产党领导和多党合作，突出振奋民族精神的主题。读者对象为市、县（区）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各界知名人士。

《挚友》编辑委员会主任沈树森，副主任姚树发，主编费宏达。每期印数3000册，内部赠阅。

十四、《秦苑》

创办于1990年，由咸阳市艺术研究室主办，咸阳市文化局主管。初为季刊，16开本。后改为双月刊。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04—1012(S)。

《秦苑》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期刊，其宗旨是繁荣和发展市戏剧文学事业，体现市文艺创作和研究成果，培养文艺人才。其主要面向本地剧团、文化馆等各行各业的读者，同时还与外地同行进行交流。主编王俊学。每期印

数 1500 册，用以赠阅、交流。

十五、《秦岭区测》

1973 年创刊，陕西省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队主办，陕西省地质矿产局主管。1991 年前不定期出刊，16 开本，50 页。1991 年起为半年刊。1993 年起页码改为 32 页。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11—1231 (Z)。该刊是以基础地质科研为主的综合性刊物，主要反映该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区域调查的科研成果，内容包括地质矿产、物化探等的新成果、新认识和问题讨论，以及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介绍。为从事区域地质调查、矿产普查勘探、地质科研及地质院校有关人员服务。

主编卢一伦。每期发行 600 余册。

十六、《西北铀矿地质》

原名《地质科研》。创刊于 1974 年，1989 年更名《西北铀矿地质》，由核工业部西北地勘局二〇三研究所主办，核工业部西北地勘局主管。半年刊，16 开本，64 页码。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11—1219 (Z)。该刊为技术性期刊。主要刊登铀金地质（含遥感地质和教学地质）、物化探、选矿工艺、分析测试以及民品开发研究等方面的内容。读者对象为核工业铀矿地质系统以及地矿、煤炭、石油地质系统科技工作者、有关院校师生。历任主编施文静、熊福清。每期印 1000 本，免费向系统内及国内相关单位赠送。

十七、《秦岭科技》

创办于 1978 年 4 月，由国营秦岭电气公司主办。季刊，16 开本，40 页码。刊号为：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11—1135 (Z)。1985 年前，为不定期刊物。办刊宗旨是：通过综合评述科技成果、生产经验，报道本单位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成果以及革新改造、科技活动和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等，进行经验交流、技术推广、信息传递，以提高科技队伍水平，促进公司新产品开发、科研生产的更大发展。其专业范围为航空电源系统、航空发动机点火系统、各类电机及民用制冷电机、家用电扇、汽车火花塞等产品设计、制造、测试技术，重点服务于公司的科技人员。

历任主编曹旭昌、吴国安、贾永旭、尹养莉、张士仁。每期印 500 册，

约有 2/5 用于刊物交流。

十八、《空军导弹学院学报》

初名《学报》。创刊于 1979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高射炮学院主办。1984 年起更名《空军地对空导弹学院学报》。从 1986 年起，又更名《空军导弹学院学报》。季刊，16 开本，130 页。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11—1096 (S)。主编王锦升。该刊为综合性学术刊物。其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贯彻“双百”方针，认真执行出版发行的有关政策，崇尚科学道德，开展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其专业范围包括机械、电子、计算机、军事等。读者对象为学院教员、干部及地空导弹部队指战员。每期发行 500 份。

十九、《华兴科技》

原名《新征科技》。于 1980 年 6 月创刊，国营新征机械厂主办。1987 年，更名《华兴科技》，华兴航空机轮公司主办。1990 年 7 月，由不定期定为半年刊，1992 年 11 月，改为年刊，16 开本，48 页。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11—1196 (Z)。历任主编黄天石、穆宇新。该刊宗旨在于为公司生产、科研和管理服务，宣传公司的新设备、新产品、新工艺，推广新技术。刊载内容包括学术论文、制造技术、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企业管理、科技信息等。每期印 500 册。通过邮局对外交流、交换 120 册，公司内发行 360 册。

二十、《中国干旱农业通讯》

创办于 1981 年 4 月，由西北农业大学干旱半干旱研究中心（其前身为西北农业学院干旱半干旱农业培训研究中心）主办。初期为不定期出刊。1987 年后为季刊，16 开本，8 页。1992 年底，改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11—1286 (S)，16 页码。

该刊是适应国内外旱农研究的新形势，为了加强国内外对于旱半干旱农业问题的学术交流，促进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而创办。以中英文两种版本与国内外有关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进行交流。旨在集中反映我国北方旱农研究与开发的成果、进展和动态，并通过刊物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美、澳、加、印、叙及前苏联等 70 多个国际组织与科

研机构建立起联系。每期 1000 份以上。1993 年停刊。

二十一、《彩色显像管》

原名《显像管技术》。创刊于 1981 年 12 月，是由国营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主办，陕西省电子工业厅主管。1989 年，更名为《彩色显像管》。季刊，16 开本，80 页。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11—1048 (Z)。该刊为中级彩管技术刊物。旨在以有利国内外彩管的研究和生产动态、技术状况和市场信息，促进行业内部的技术合作和经验交流，推动本行业科研生产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主要刊登彩色显像方面的理论研究、设计改进、工艺革新、材料代换、科研成果及其推广应用等内容，同时也刊登一些手板显示方面的文章。主编武英忠。每期发行 2000 册。

二十二、《兴华科技》

创刊于 1983 年，由国营陕西省兴平化肥厂主办。半年刊，16 开本，70 页码。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11—1075 (Z)。办刊宗旨是：以党的方针政策为指导，贯彻办厂方针，依靠科技，振兴兴化；为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交流技术经验、增长才干提供园地，为把知识与科学技术变成建设兴化、发展兴化的巨大力量，提高全厂职工素质服务。该刊主要为本厂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及职工服务，并与 120 余家同类型企业，以及有关的研究设计单位、高等院校进行交流。历任主编史济田、赵依紧、祝天熙。每期印 500 份。

二十三、《防渗技术》

原名《渠道防渗技术》。于 1984 年创办，为全国渠道防渗科研协调组暨情报网供内部交流技术情报的刊物，由各网长单位轮流不定期出刊。1991 年更名《防渗技术》，由总网长单位（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编辑出刊，并定为季刊。

该刊旨在推广水利水电及其他工程的防渗技术，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我国水工防渗和节水技术的发展。主要刊登全国渠道、水库等水利水电工程、民用建筑、地下洞室防渗方面的科技成果，专题论述、技术经验，重点介绍工程设计、施工、运行中有关防渗、补漏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经验以及国内外防渗技术发展动向和水平等研究试验成果和现场、室内测验新设

备、新方法。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11—1203 (Z)，16 开本，80 页。主编杨立业。每期印数 1200 份，发送各网员单位及全国有关部门。

二十四、《火炮科技信息》

创刊于 1984 年，中国兵器工业火炮技术开发中心主办，陕西兵器工业管理局主管。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11—1074 (Z)，双月刊，16 开本，36 页。该刊是为加强火炮科技信息能力而创刊的，旨在为火炮现代化服务，为火炮技术发展和规划预测服务，为重点攻关项目服务，为火炮科技咨询服务。该刊除报道国外火炮发展简讯、动态、题录、文摘、索引以外，还报道兵器工业部二〇二研究所馆藏内部科技文献资料的索引、新书目以及简介情报业务方面的知识等。主编卫福顺。每期印数 500 份，通过邮局发行到全国火炮行业各单位。

二十五、《轻工高教研究》

1984 年 11 月创刊，由西北轻工业学院主办。初为不定期。1986 年定为半年刊。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11—1263 (S)，16 开本，56 页码。该刊旨在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办学效益，开展校际交流。主编时树中。每期发行 600 份，主要用于内部交流、交换。

二十六、《咸阳师专学报》

创刊于 1986 年，由陕西省教委主管，咸阳师范专科学校主办。为文理综合刊物。旨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突出师范特点，探求教育规律，开展学术研究，交流教学经验，讲求学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是以反映教学与科研为主的综合性刊物。从 1988 年起，文理分开，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分别出刊。哲学社会科学版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11—1252 (S)，季刊。自然科学版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11—1253 (S)，半年刊。哲学社会科学版每期印数为 1200 册，自然科学版每期印数为 1000 册，均为 16 开本，每期 64 页码。自办发行，读者对象为全国高校师生与本地区广大教育工作者。

哲学社会科学版学报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会员单位，自然科学版学报为全国高等学校理科学报研究会会员单位，并都加入了陕西省高等

学校学报研究会。哲学社会科学版历任主编赵和兴、马善贵、宋忠泰。自然科学版主编马忠报。

二十七、《如意广播电视》

创办于1988年9月，国营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主办。季刊，16开本，48页。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11—1190(Z)。该刊为技术期刊，旨在促进该厂科研、生产工作，提高科技人员技术水平，开展对外交流。刊载广播电视技术理论、设计、制造；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器件、新设备、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引进技术消化、产品推广应用、质量管理内容等。主编刘民生。每期1500册。

二十八、《世界职业技术教育》

创刊于1988年12月，由西北农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九三学社陕西省委、新疆建设兵团教委等单位联办，西北农业大学主办，陕西省教委主管。双月刊，16开本，48页码。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11—1282(S)。编辑部设在西北农业大学。该刊为介绍世界各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动态和经验的专刊，办刊宗旨是借鉴创新，外为中用，开阔视野，引发思路，为广大职教工作者服务。该刊设有职教动态、职教立法、教学研究、师资培养、理论探讨、经验交流、先进典型、职教文摘、国内职教、海外文选等栏目。主要供职教工作者、职教研究人员和职校师生阅读。

主编兰斌。每期发行约2000份。

二十九、《西北高等农林教育》

原名《农业教育研究》，西北农业大学主办，创刊于1984年，半年刊，共出4期。1986年更名为《高等农业教育研究》，共出版6期。主编马凌云。1989年3月《西北高等农林教育》创刊。由陕西省教委主管，西北农林院校教育协作组、西北农业大学主办。季刊，16开本，80—90页码。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11—1007(Z)。该刊为高教研究的学术期刊。主要刊载有关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农业教育资料介绍和理论研究等。办刊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深入探讨高等农业教育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题，为深化高等农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读者对象主要是西北地区 9 所高等农林院校暨西藏农牧学院的广大师生员工。该刊编委由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甘肃农业大学、青海大学、青海牧兽医学院、宁夏农学院、新疆八一农学院、石河子农学院、塔里木农垦大学和西藏农牧学院等 10 所院校的领导和高教研究人员 15 人组成。主编傅维斌。每期发行 1300 份，自办发行。

三十、《咸阳金融》

原名《咸阳金融调研》。1985 年创办，中国人民银行咸阳市分行主办。

1992 年 3 月，改刊《咸阳金融》，咸阳市金融学会、中国人民银行咸阳市分行主办。季刊，16 开本，48 页。刊号：陕西省报刊登记证 11—1119 (S)。该刊为咸阳市金融学会会刊。办刊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货币信用理论为基础，坚持以应用理论和现实经济、金融问题为重点，坚持以货币信用、银行研究为中心，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开展金融学术研究与工作探讨交流，以进一步提高咸阳市的金融科研水平，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读者对象主要是全市金融工作者。主编赵军平、副主编陈同泰。每期印 2000 册。自办发行。

第四章 文化市场管理

第一节 音像管理

建国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咸阳境内销售的音像制品仅有唱片一种。直至 70 年代后期，国营商业单位开始销售录音带。1980 年以前，唱片和录音带主要销售于广播电台、电影院、文艺团体、国家机关，以及工矿企业单位的广播室、宣传站，私人购买唱片和录音带的还非常少。1980 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从各种渠道流入社会的录音带、唱片数量很多，内容也十分庞杂。为此，1981 年贯彻执行了国家文化部等部门《关于禁止收购、出售、转录进口录音带、唱片的通知》精神，加强了对唱片、录音带的

管理工作。

1982年咸阳音像制品的管理工作始由广播电视部门负责。

1983年地委宣传部、地区广播事业局、文化局、教育局、公安处、工会、团委联合提出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意见，“坚决查禁复制、播放黄色音像带，严厉打击制造贩卖黄色下流制品的犯罪活动”。

1984年，市广播电视局、工商局、公安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音像管理的通知》，规定咸阳的营业性录像放映，只限制在文化和广播电视两个系统逐步发展，对个体申请者暂不批准。凡未经三个部门共同批准的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进行营业性音像放映。接着又对营业性录像放映的内容、收费标准，以及外来录像放映单位的管理都作了明确规定。

1985年初，营业性录像放映已遍及城乡，由于发展太快，音像管理未能及时跟上，市场比较混乱。市广播电视局、工商局、公安局三家联合对全市城乡所有的营业性放映队进行了清理登记、停业整顿，并对兴平、武功、杨陵、礼泉、乾县、秦都区重点进行了检查。全市共封存禁放录像带1296盘。根据这次整顿统计，全市共有营业性录像放映队156个，其中有执照的共100个，名为集体实为私人经营的队95个。

1986年扩大录像放映试点，范围限定在广播电视和文化两个系统，节目带定为凡国家音像出版单位出版发行的节目、中央和陕西电视台播放过的节目和正式发行的电影录像片。规定秦都区每张票价为0.2元，各县区为0.15元至0.2元。同年10月，全市电影系统有7家单位首批成立录像放映队。

1988年6月，市文化局发出《关于加强文化系统录音录像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县（区）文化局依据省文化厅文件精神，限期对原来由其他部门审批的文化系统放像单位重新进行登记，积极稳妥地发展新的放像单位。从此，市文化局开始对文化系统的录音录像进行管理。年底，全市已有47家录像放映单位在市文化局领取了《许可证》。

1989年6月，根据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颁发《关于录音录像管理分工问题的通知》，实行文化系统所属放映单位，由文化部门审批、管理；广播影视及其系统所属放映单位，由各广播影视部门审批。从此，咸阳的录音录像工作进入由文化、广播电视两个部门分工管理时期。

从1989年7月到11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第一次“扫黄”行动，组织了三次大的集中活动，出动检查人员5738人（次），检查了860余家文化经营单位。检查录像发行放映单位120多个，录音带销售点213个，共收缴

非法录像带 386 盘（其中淫秽带 162 盘），录音带 2744 盘（其中色情带 34 盒），取缔录像队 15 个，查封放像机 10 部，彩色电视机 8 台。全市音像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第二次“扫黄”从 1989 年 12 月至 1990 年 6 月结束，重点是对书报刊市场、印刷行业和音像市场进行整顿。其间，市广播电视局音像发行社自查后封存 17 个片目，31 盘录像带；市电影公司音像发行社自查封存 18 个片目，39 盘录像带；市群众艺术馆发行社通过整顿，改变了私人承包性质，由艺术馆经营发行。对全市营业性录像放映队，经过整顿压缩为 87 个队（其中文化系统 44 个队，广播系统 37 个队，其他 6 个队），取缔了 69 个队。此外，还对全市 178 个录音磁带经销商店全面进行了清查整顿。共收缴了 965 盘非法录音磁带。全市的音像市场经过第二次“扫黄”，初步得到了净化。

第三次“扫黄”从 1990 年 12 月到 1991 年 3 月结束。共组织了三次集中行动。其中第二次行动主要检查音像市场。这次行动，共检查音像单位 330 家，取缔了 45 家，对 4 家宣布停业整顿。

第二节 印刷管理

咸阳的书刊印刷源远流长。书隐斋是南宋刻印图书的堂号，也是资料记载咸阳最早的专门刻印图书的场所。历至南宋中叶，咸阳书隐斋在四川成都刻印图书，传世的有庆元二年（1196）刊印的《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300 卷。明代，咸阳、三原、泾阳、乾州、邠州的雕版印刷业较为兴盛，官刻、私刻、书院刻的书籍都不少。

清代刻书多于前朝。乾隆六年（1741）三原人刘绍放创办“刘氏传经堂”，自刊自著的《九畹古文》10 卷，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续刊《九畹古文续集》2 卷。“刘氏传经堂”存世 170 年之久，刻印书籍 100 余种。其他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武功县署刊《康对山先生文集》10 卷。乾隆四十四年（1779）礼泉“滋德堂”刊刻明代颜正注的《丹桂籍》4 卷。嘉庆十四年（1809）三原“敦厚堂”刊印明代武之望辑录的《疹科内编》。清光绪元年（1875）乾州王氏创办“乾阳书院”，刊《大学或问》。光绪三年（1877），三原东里“述经堂”刊刻宋代邵雍撰写的《伊川击艰集》，出版《论语集注》、《关学论》、《朱子遗书》、《朱子文集》等十余种图书。光绪十一年（1885）咸阳人刘古愚创立“求友斋”，先后刊刻《诗意折中》、《春秋大事表》、《易经读本》、《诗经读本》等。光绪十七年（1891）“求友斋”扩大为“刊书处”，

“味经书院”成为官办书院后，更名为“味经官书局”。光绪十八年又在书局设立售书处，使“味经官书局”成为陕西第一家官办出版发行机构。宣统三年（1911），泾阳的“味经官书局”划归初成立的陕西省图书馆管理，除沿用木版印刷外，又引用石印技术，印刷内容多重于新学堂的课本，两三年间刻印图书近百种。

1921年咸阳开设“悦来书局”，出售图书之外兼营印刷。李祖荣创办“乾县天足会”，编写刻印《天足会讲劝歌》，散发宣传妇女天足益处，反对缠足。1934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杨陵创建印刷厂，主要印刷教材和出版《西北农林》期刊。1939年初，驻泾阳云阳镇的陕西省委和“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在淳化县创办“青年印刷厂”，主要印刷省委主办的《西北周刊》。翌年该印刷厂并入延安的中央印刷厂。

建国后，咸阳地区印刷企业，在政府领导下经过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有计划、有分工的建设和发展道路。解放初，由私人创办的“书局”、“印刷所”等承担文书印刷任务。1954年，首先在三原和兴平两县建成县印刷厂；1956年，合营建成咸阳市、彬县和乾县印刷厂；1958年，礼泉县印刷厂建成投产；1961年泾阳县印刷厂建成投产；1965年淳化县印刷厂建成投产。与此同时，西北农业大学、空军导弹学院、西北林学院、西北轻工业学院、陕西省农科中心、核工业部二〇二研究所等单位也相继办起了印刷厂，为发展咸阳地区印刷事业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蜂起，混乱不堪。1968年成立咸阳专区革委会之后，对各单位进行初步整顿，这一时期，所有印刷厂都以印刷《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等为主，印刷形式和内容都要求相当严格。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咸阳市的印刷企业逐渐增多，各个厂家印刷范围不断扩大，为此，1980年8月，咸阳地区行政公署批转文化局等单位《关于加强印刷出版管理的报告》，开始对印刷行业进行严格管理。1989年1月，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公布了第一批已办出版物印刷许可证的印刷企业，其中有：咸阳市印刷厂、兴平县印刷厂、空军导弹学院印刷厂、西北农业大学印刷厂、西北林学院印刷厂、彬县印刷厂、淳化县印刷厂、乾县印刷厂、三原县印刷厂和二〇二研究所印刷厂等10家单位。同时规定了各个厂家的印刷权限和范围，除西北农业大学印刷厂只承印内部出版物外，其他各厂均可承印正式出版物。同年7月，开展了第一次“扫黄”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对全

市印刷企业进行了清理和整顿。咸阳市新闻出版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市公安局联合发出《关于在全市印刷行业实行〈经营许可证〉的通知》，要求全市所有印刷企业，都必须登记办理《咸阳市印刷企业经营许可证》，并对印刷经营范围作了适当限制。以后又开展了多次清理整顿，印刷出版业逐步步入规范化轨道。

第三节 管理机构

宋元以后，咸阳地区曾刊刻出版过不少经典、志书、剧本，当时均属仁人志士的自发行为。民国初期，由于军阀割据，连年战乱，文化工作几乎无法顾及。后因日本侵略，国民党政府苟延残喘，更加无力顾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发动内战，残害解放区人民，这时除了国民党宣传部对进步刊物、文化作品实行控制封锁外，无其他资料可考。1937年至1949年6月，旬邑、淳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所辖，最早建立了革命政权。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文化工作，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关中分区专员公署，1939年专署设在旬邑马栏，辖赤水、淳耀、新正、新宁4个县和中心、路东2个区共6个县区。专署设三科，负责关中分区的文化、教育工作。1942年，关中新华书店正式在马栏成立，是中共西北局宣传部领导下的边区新华书店的一个书刊发行网点。在解放区，新华书店一直受党的宣传部门管理，直至全国解放，机构管理始有新的调整。

1949年5月18日咸阳解放后，兼管新闻出版工作的机构是地区文教局。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各县普遍自1956年后创刊了县报，县办的印刷厂也相继建立，分工管理大都是县报由各县宣传部门主管，印刷厂由轻工部门管理。当时文教局只管新华书店。1959年1月根据文化部通知各地新华书店的人权、财权下放地方管理，人权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这是地区文教局第一次实行对书店的领导和管理。1962年11月，地、县新华书店财权上收省新华书店。1963年改为新华书店咸阳地区中心店，归地区文教局领导，并开始管理下属13个县店的业务和行政工作。1979年1月地区文教局分为文化局和教育局。新华书店由地区文化局领导。1983年11月将地、县两级新华书店人权由省店领导，实行条条管理。

1984年5月，地区文化局改称市文化局，内设有秘书科、人事科、社会文化科、演出科、艺术科。1987年，市文化局社会文化科开始对市内部交流性图书实行审批管理，内部交流报刊仍归市委宣传部审批。同年市政府成立

咸阳市文化工作管理委员会，办公设在市文化局。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指示和部署，咸阳市开展第一次“扫黄”活动，为了统一领导“扫黄”活动，又成立了咸阳市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具体事务由文化局负责。1988年市文化局对所属文化系统的音像经营单位开始进行管理，并审批《录像放映经营许可证》。同时接收市县两级新华书店的人权、财权。1990年12月咸阳市新闻出版局成立，与市文化局一套机构、两个牌子。在市文化局增设新闻出版科，具体办理日常事务。至此，新闻出版事业有了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新闻出版局成立以后，将全市的内部书、报、刊的印刷发行审批权限统一接管，同时对国家定点印刷厂以及领有《陕西省报刊印制许可证》和《陕西省书刊印制专项许可证》的印刷企业实行监督。对于一般印刷打字、复印企业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原社会文化科管理的音像经营单位的审批管理工作，统归新闻出版科管理。至此，新闻出版工作的全部管理工作走向了正轨。

第五编

文物

第一章 古遗址

咸阳境内的古文化遗址分布广、数量多。仅国家和省、县三级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 139 处，而据 1988 年全省文物普查登记的即有 1037 处。从地域看，渭水、漆水和泾水流域分布比较密集；从时代看，新石器时代和周、秦、汉三代数量最多；从类型看，史前、先周的聚落遗址，和秦汉时代的城邑、宫殿遗址，以及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古渠道、古道路、古桥梁遗址，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古遗址中最早的是长武县窑头沟及鸭儿沟的旧石器中期遗址。这个遗址中有一枚智人牙齿和一批打制石器，这是迄今所见咸阳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古遗址中曾经引起考古学界重视的是长武县下孟村仰韶文化遗址和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前者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系列提供了地层证据，后者为探讨和研究周人早期历史及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而古遗址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举世闻名的秦都咸阳遗址，其中包括秦咸阳的宫殿遗址、宫墙遗址、手工业作坊遗址、陶窑遗址以及地下陶排水管道和陶水井遗址等。秦咸阳遗址、秦郑国渠遗址及秦汉甘泉宫遗址，均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一节 聚落遗址

长武古人类化石及旧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长武县城关镇窑头沟及鸭儿沟，属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1972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陇东进行第四纪考察时发现。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当时发现许多打制石器和少量哺乳动物化石，并在当地群众出售的“龙骨”中获得了一枚智人牙齿化石。人牙齿根缺失，齿冠近中侧和齿面釉质被破坏，但牙本质完整，可

以按其形态复原。牙齿呈灰白色，原尖大，次尖小。后者位于远中侧的中间，前尖略大于后尖，前尖、后尖与原尖的三尖交汇处成一凹面。远中侧无接触面，近中侧釉质脱失，亦看不出与前齿的接触面。这些性质表明此牙是萌出不久的左上第二白齿，可能为一少年个体。此标本为中国人类化石增添了新的地点和材料，尤其是出自陇东黄土高原地区，更具有特殊的考古学价值。伴随出土的动物化石有鼯鼠属、披毛犀、似野马、野驴、大角鹿属、斑鹿、牛类等。野马和野驴均属晚更新世动物，结合地层剖面的上下层关系，长武发现人牙化石的地质时代与蓝田涝池河等地点的相当层位大体一致，属晚更新世的早一阶段。

长武旧石器地点地处泾河中游，人工打制的石制品类型颇多，提供研究的标本约 200 件。石器材料主要是石英岩，占全部材料的 80%，其余燧石占 10%，脉石英占 5%，其他占 5%。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是砾石，60% 的标本均保留有砾石面。石核的台面也多利用砾石面，修整台面的石核较少。石器的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等。石器以小型为主，多用砾石石片制成。加工粗糙，类型简单，外形多依石片的原始形态。石器的第二步加工多由壁裂面向背面加工，尖状器修理得相当精细。石器组合以单边直刃刮削器为主，尖状器、砍砸器数量较少。

研究者认为，长武旧石器地点与陕西、甘肃、宁夏等黄土高原地区已经发现的一些晚更新世旧石器地点在层位上和文化性质上有许多共性，可以统称为泾渭文化。

下孟村遗址 位于长武县冉店乡下孟村北台地上，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1958 年发现，1959—1963 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联合发掘。遗址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 2—4 米，从下到上可分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共清理出房址 7 座，均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式，以坑壁为墙，居住面和墙壁均抹草泥土，居住面中部有圆形或瓢形灶坑，后部有保存火种的陶罐，门开在房屋的东壁上。另清理出窖穴 107 座，有圆底形、长方形、锅底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其中一些袋状坑底部有二层台阶或三层台阶旋转而下，有些窖穴抹有草泥土并经火烤过，坚硬平整。据已发掘的情况看，住宅附近有许多灰坑，灰坑与居室相互打破或迭压，证明原始人在此居住延续甚久。同时清理陶窑 5 座，分竖穴和横穴两种。其中竖穴窑 3 座，由火口、火道、窑室等几部分组成；横穴窑 2 座，由火口、火膛、火道、火孔、窑室等组成。其横穴窑结构与半坡 Y₃ 基本相同，惟窑算四周为 10 个梭形火眼，与半坡的长方形火眼不同。此外，还清理出瓮棺葬 8 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多件。

下孟村遗址出土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粗陶占多数。器形有红陶钵、红陶碗、杯口尖底瓶、二层台口尖底瓶、粗砂陶罐和瓮、曲腹钵、罐，另外还有灰陶大口小底缸和灰陶瓶。纹饰多见弦纹、绳纹，彩陶纹饰有勾叶、圆点、黑宽带纹，有些彩陶带有白衣。石器有斧、刀、镑、凿、网坠、纺轮、球等。骨器有铲、针、箭头等。还发现有陶铍、陶纺轮、陶刀、蚌刀和蚌饰。在陶器中有一件三足罐，属老官台文化的遗物，出自最早的地层。

下孟村遗址的发掘，主要收获是从地层上证实了老官台文化早于仰韶文化，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

崔家河遗址 位于旬邑县城关镇崔家河西岸第二台地上，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调查发现。1980年咸阳地区文物普查中又进行了复查。

遗址所在的台地北临汭(bì)水，东靠崔家河，南北约300米，东西约400米。暴露在断崖上的文化层厚约3—6米，所见的人类活动遗迹有房基址、窖穴、灰沟、灶坑、灰坑等多处。其中居住面4处，长3—4米不等，两处为发白色的姜石地面，均经过火烧，呈赭红色。灶坑3个，径0.6—0.8米，深0.5米，其中一个周围为白色姜石地面，内出土素面夹砂红陶罐1件，线纹夹砂红陶罐2件，彩绘细泥红陶片1件。一个内有厚0.15米和0.25米的草木灰两层，两层草木灰之间有一个厚约4厘米的硬而平的红烧土面。一个在红色居住面上，内出土线纹夹砂红陶罐1个。另外有袋状灰坑6个，口径0.9—3米、底径1.5—6.1米，深1.5—5米不等。还在一处断面上看见灰沟1处，沟口宽8米、底宽4米、深5米，沟口距地表3米。沟边为生土，出土石斧1件。此灰沟当属一东西向的安全防护沟。

遗址出土的遗物主要是石器和陶器。石器器形有斧、镑、凿及刀形器4种。陶器器形有钵、罐、瓶、盆4种。陶质有细泥红陶、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其中泥质陶最多，夹砂陶次之，细泥沙陶又次之。泥质陶多未经淘洗，或麝入少量细沙。夹砂陶内加入大量的白砂、碎石或碎陶末。细泥陶经过淘洗，不加任何麝和料。泥质红陶烧成温度较低，虽表面磨光，但因其质地一般不很细腻，不施彩绘。细泥红陶烧成温度较高，质地坚硬细腻，内外壁均磨光，多施彩绘。出土遗物表面装饰除有彩绘外，还有附加堆纹、弦纹、线纹、绳纹、刺纹、压纹、画纹等。彩绘均用黑色，部位主要在器物口沿、肩部和腹部的外壁。已见到的纹样有宽带纹、鱼形纹和圆点、直线、三角构成的各种几何纹。附加堆纹只有长条形一种。这些陶器有轮制，也有手制，器物口沿多经过轮修。陶片中，有两件在器物口沿上面有刻画符号(均为“|”)。

崔家河遗址被考古界认为是渭水流域仰韶文化遗址中比较典型的半坡类型遗址。

尹家村遗址 位于秦都区渭滨乡尹家村一带，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1957年10月文物普查时发现。遗址在渭河北岸东西向高起的台地上，台地高出河面约20米，其范围东西长约2公里（东至麻子渡村西约100米，向西通过尹家村至兴平县田阜乡段村中间），南北宽约1公里（北至陈良村以南约150米，南至尹家村南面断崖），总面积约131万平方米。文化遗物丰富，暴露在断面上的灰坑、灰层几乎连结成片。灰坑口一般距地表约1米，宽约1.5—4米，深约2—4米，形状不一，有的为圆桶状，有的为袋状，有的为锅底状。灰层距地表深约50厘米，露出地表外的厚度约1—3米。在村西城壕内西边断面上还发现窑址一处，窑顶距地表约80厘米，形似三角形，高1.5米，下宽2米，窑壁面有厚约1厘米的烧土层，内部充塞积土，深度不明。在村西南角向渭河的断面上和村西一条水渠的断面上，暴露出灶坑两处，坑口距地表约1米，宽约60—70厘米，红烧土壁高约20厘米，与西安半坡遗址发掘的大致相同。在村西南角高约2米的土坎断面上，还露出长约1米和重叠三层的居住面痕迹，每层间距约20—30厘米。

采集的遗物有石器、陶器及陶片等。石器共23件，石料有燧石和玉石等。制法分磨制和琢磨两种，器形有斧、锛、凿、刀、簪与敲砸器。陶器和陶片的质料有细泥红陶、细泥灰陶、夹砂粗红陶和夹砂粗黑陶，以细泥红陶为最多。器形有杯、碗、钵、盆、罐、环和尖底器等，制法以手制为主，少数器物沿部有轮旋痕迹。火候高，质坚硬，器壁厚0.3—0.7厘米。彩陶数量较少，器缘或腹部施有宽带纹，或作平行的几道横线，或作半圆形的圈点纹。采集到较完整和较典型的陶器和陶片共31件。另有骨簪1件（已残）。

尹家村遗址的彩陶与磨光石器并存，其文化类型可能与仰韶文化中的庙底沟类型相当，但就发现的带孔石斧和制作精美的石锛、石凿等观察，其文化时代还可能要稍晚一些。它是本地迄今所见规模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原始聚落遗址。

浒西庄遗址 位于武功县西部漆水河西岸，北距武功镇约3公里，属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1959年发现，1979—1981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发掘。遗址东西约500米，南北约700米，面积约35万平方米，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2米。

遗址出土的12座房址，多为方形半地穴式，圆形较少。墙壁和居住面均为草泥土上加白灰面，坚硬平整。灰坑或窖穴发现35座，形状有袋形、筒形、椭圆形套联坑、勺形坑和不规则形坑。陶窑4座，均为横穴窑，其中3

座为“非”字形，1座为两组树杈状分火道。墓葬18座，骨架头多向西北和东南，随葬器物仅有骨镞和几十个贝壳。葬式均为单人葬，有仰身直肢、俯身直肢、侧身葬和二次葬4种。

遗址出土的陶器陶质有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夹砂红陶及泥质红陶；纹饰有篮纹、绳纹、附加堆纹、画纹、方格纹、戳刺纹、镂孔；彩绘只见于一种喇叭口圆肩罐的顶部及几片碎片上。颜色有红、白两种，均为烧成后彩绘，分横条红彩、横条白彩。器形有鼎、喇叭口圆肩罐、筒形罐、单耳圆腹罐、侈口圆腹罐、单耳杯形罐、敛口罐、小罐、壶、浅腹盆、刻槽盆、碗、豆、圈足盘、灶、盘、杯、器盖、钵、盘形器、甑、棒槌形器、纹异形陶器。生产工具、装饰品及其他用具有刀、斧、镰、铲、铤、凿、刮削器、锥、针、纺轮、陶拍、磨石、矛、镞、环、球、磨盘等。

浒西庄遗址区域内发现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类型和西周文化遗存，其中以庙底沟二期遗存文化层最厚，为本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遗址。

田阜遗址 位于兴平县田阜乡田阜村西北渭水北岸一级台地上，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调查发现。

遗址南临渭河，北有水渠，地势平坦。在农民挖土形成的断壕上，暴露出极为丰富的遗物，有房基、灰坑和墓葬等。遗址面积较大，东西长750米，南北宽300米。文化层堆积较厚，约3—4米。采集的标本分石器、陶器两类。石器有斧、环；陶器有盆、罐、鼎、豆和纺轮等。陶质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4种。其中夹砂灰陶较多，泥质灰陶次之，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又次之。纹饰主要有附加堆纹、绳纹、篮纹、戳刺纹等，制法均为手制。田阜遗址被认为是渭水流域龙山文化中庙底沟二期文化类型中较为典型的遗址。

将台山遗址 位于长武县丁家乡将台山村南黑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属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调查发现。

遗址南为黑河，东西各有一条深沟，北靠后梁高山。遗址高出黑河约150米，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100米。文化层厚约4米左右。由于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层又厚，暴露在地面上的遗迹、遗物十分丰富。从断崖上见到白灰面房基5座，均为方形，其中一座残长2.5米，墙高0.25米，白灰面厚0.3厘米。有几座房基有叠压现象。此外，还发现多处零星的白灰面，说明该遗址房屋较多。灰坑发现的不少，多为袋形，也有不规则形，口径一般为2米左右，最大的有4米左右。

采集到的标本有石斧、石凿、磨石以及陶鬲、陶甗、陶罐、陶甑、陶瓮

等。石斧和石凿均为双面刃，刃部锋利，通体打磨得极为光滑。陶器为夹砂灰陶、夹砂红陶。纹饰有绳纹、篮纹和麻点纹。陶器制法多为手制。

长武将台山遗址被认为是渭水流域龙山文化中客省庄二期文化类型中有代表性的遗址。

碾子坡遗址 位于长武县冉店乡碾子坡村的黑河（泾水支流）北岸，为先周文化遗址。总面积约 0.5 平方公里（不含墓地）。1958 年发现，1980 年以后连续发掘，发掘面积达 7000 多平方米，古墓葬 200 多座。

碾子坡遗址的文化层，是由仰韶居址和墓葬、先周居址和墓葬、西周居址和墓葬、东周居址和墓葬等多种不同的古文化堆积构成的，但主要内涵是先周文化遗存。

先周文化的遗迹有房基址、窖穴、灰坑和烧陶窑址等数十座。其中房基址约有 10 多座，分为土窑式和半竖穴式两类。土窑式房子均属坑径 5—9 米的椭圆形深土坑，穴里一壁向外掏，利用窑顶作掩蔽。穴底有条出入的土坡道将住室分为两部分。半竖穴式房子有方形和长方形两种，房子出入口是斜坡道。出土的遗物数量和种类均甚多。生产工具有斧、斨、凿、锤、棒、铲、刀、镰、陶拍、纺轮、针、锥和磨石等，其中平面近似三角形的石锤斧是先周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另一个特点是工具以石质的居多，陶质的和骨质的次之，铜质的很少，蚌质的尚未见到。这与西周时期大量使用蚌壳制造农具的情况截然不同。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有甗、鬲、甑、罐、簋、豆、孟、盆、尊和瓮等，其中以鬲形器为多。青铜器出土不多，有一件乳纹鼎重约 10.75 公斤，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重器之一。其他遗物以先周卜骨的发现最为重要，特征是有钻有灼而无凿，与商代卜骨形制相似。发现的先周墓葬近 80 座，墓穴口小于底若“覆斗状”，与寺洼文化和西周的墓穴形制相似，均为单人葬，仰身和俯身并存。随葬品多为陶器，以鬲为常见。据已掌握的材料分析研究，以及若干个 C₁₄ 年代数据加以判断，碾子坡先周遗址应是周人迁岐以前的文化遗存。这一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探讨和研究周人早期历史及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

郑家坡遗址 位于武功县武功镇以东 0.5 公里的漆水河东岸，为先周文化遗址。1980 年发现，1981 年宝鸡市考古队正式发掘。遗址东西宽约 500 米，南北长约 3000 米，揭露面积 2000 平方米。发掘区分南北两个小区，中间有一条呈东西走向的壕沟。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北区，时代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下层，中期约在太王迁岐前后，晚期约在文王作丰之时。中、晚期遗存在两个小区内均有分布。发现先周时期的房基 17 座，灰坑 15 个，窖穴 3 个，陶窑 2 个，另有陶器、石器、石器等遗物。

早期房基为半地穴式，门向北，门道为斜坡状，下端有台阶。门通道将房屋分作两室。陶窑为竖穴式，由窑室、窑算、火膛组成。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以红褐陶为主，灰陶较少，磨光黑陶亦较少。陶器以手制为主，兼用模制，盛行粘接法。表面除素面和磨光以外，纹饰以粗疏散乱的绳纹为主，还有印纹、弦纹、附加堆纹和刻画符号。器形有鬲、盆、罐、瓮、尊、甗、箕等。另外还有骨箕、石铲、卜骨等遗物。

中期房基有长圆形、圆形半地穴式。房屋分前后两室，中有通道，前室大，后室小。窖穴为袋状，坑底经过加工。陶器仍以红褐陶为主，灰陶较早期增多。纹饰以绳纹为主，印纹种类增多，常见的有方格纹、乳钉纹、重棱纹、叶脉纹、“S”形纹等。附加堆纹继续使用；亦发现有刻画符号。器形有鬲、钵、深腹盆、簋、盂、盘等，还有石刀、镞、凿、纺轮、陶拍、骨镞、箕、铜镞和卜骨、陶人头像等遗物。

晚期房屋为浅地穴圆形。其中一处灶坑位于室的西北正中，有火膛、火眼、进火口和出烟口。室内有柱洞。室内活动面狭小，似为炊事专用的厨房。生产工具有陶纺轮、骨镞、石镞等。

郑家坡遗址的早、中、晚三期是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文献记载周人早期活动在漆水下游一带，此遗址即在这个范围之内，为探索先周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岸底遗址 位于武功县游凤乡岸底村西的漆水河东岸台地上。为先周文化遗址。总面积约 21000 平方米，1992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发掘了 400 平方米。发掘清理的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陶窑及墓葬。

遗物包括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两大类。早期生活用具有陶器，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均以红褐色为主，也有少量的灰褐陶、灰陶和橘红陶。绳纹以粗疏散乱的麦粒状绳纹为主，印纹全为方格纹，画纹为网格状，附加堆纹极为盛行。另外还有弦纹、旋纹。器形有鬲、盆、尊、罐、簋、豆、瓮等。生活工具有石斧、骨锥、纺轮等。中期生活用具中，陶器仍以红褐陶为主，灰褐陶、灰陶占相当大比例。麦粒状绳纹有所减少，粗绳纹数量增加，新出现了方格乳钉纹、叶脉纹、涡旋纹。器形新出现了直口罐、分裆甗。骨器有骨针 2 枚，通体打磨光滑，残长 7 厘米以上。生产工具包括石镰、铲、刀、凿、坠，骨锥、矛和陶拍、纺轮等。另外还出土了用牛肩胛骨作成的卜骨，上有钻、灼而无凿，钻孔背面有兆纹。晚期生活用具中，陶器以灰陶为主，红褐、灰褐陶极少。绳纹以粗绳纹为主，印纹、方格纹、弦纹、附加堆纹较少见，出现了重棱乳钉纹。器形新出现了夹砂罐、三足瓮。生产工具有石矛、骨铲、骨锥、陶拍和陶纺轮等。另外还有骨饰、蚌泡等遗物。

岸底遗址早期相当于殷墟一期，上限可能还要早些。中期相当于殷墟二、三期，对先周文化的分期有积极意义。下限可至西周初期。遗址出土了较多的不同种类的陶器，夹砂粗陶缸、夹砂罐、直口罐、三足瓮等，在其他遗址中较为少见，为先周文化陶器序列的建立提供了重要资料。

西梁家遗址 位于淳化县润镇乡西梁家村，为西周遗址，1952年发现。遗址西至西梁家村沟畔，东至三（原）旬（邑）公路，从西梁家村向北延续至枣树沟脑村，南至西梁家村南，面积约30万平方米。遗址居于平原中央，地势平坦。有多处灰坑，埋于地下约4米处。历年出土陶器、铜器和石器、骨器多件。陶器器形有罐、盆、鬲、豆、三足瓮和甗，陶质以灰夹砂陶和灰细泥陶为主，纹饰有方格纹、指甲纹、回纹、篮纹和细绳纹。所见细泥红陶残片有素面或饰弦纹。建筑材料有筒瓦和板瓦残件。板瓦面饰细绳纹，内有柱丁和圆环。筒瓦面饰黻黼纹和细绳纹。铜器有鼎、戈、削、铃、铍和铜泡。石器有斧、铲和石球。骨器有锥、笄、刀、管形器和卜骨。

遗址南边西梁家村是墓葬区，村民历年挖土中发现多座中小型墓。经县文化馆调查，在村中1300平方米范围内，探出墓葬28座。这些墓均为土圪竖穴，墓口径2—4米，深4—9米。1986年曾清理其中一座西周墓，墓口东西长4.1米，南北宽2.85米，深7.55米。竖井内填五花土，经过夯筑。生土二层台高1.38米，宽1.24—1.50米。南、北、东三方生土台上各有一殉人骨架。椁室东西长2.88米，南北宽1.83米，椁室用木椽垒筑围砌。椁底棺板下有腰坑，坑内有一殉狗骨架。此墓曾遭盗掘，竖井东、南、西壁各有一盗洞，椁室内被扰乱，随葬器物被盗，仅有贝壳、小玉器和铜屑。

史家原遗址 位于淳化县石桥乡史家原村南，冶峪河北原面上。以1979年发现屈舌釜大铜鼎而闻名。为西周遗址。遗址东、西两边各有一条沟壑，南至冶峪河北原畔，北至史家原村，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1000米，占地约50万平方米，北高南低，略呈阶梯状，最高处约高出冶峪河床150米。文化层随阶地有高有低。文化层一般堆积为1.2—2.3米。土质为较松的深褐色或浅褐色，有烧土块、炭屑和残陶片。公路旁的断崖上暴露有灰坑、居住面以及灶坑和路土等遗迹。还发现一座半地穴式房址，直径为5.1米，中部有深20厘米的灶坑，直径75厘米。居住面经过火烤，呈红褐色，表面坚硬平整。在遗址口采集有夹砂灰陶罐、鬲、甗、瓮，均饰绳纹。夹砂红陶见到残片，泥质灰陶有罐和豆，为素面。陶器残片上有斜方格纹和篮纹。

第二节 城邑宫殿遗址

秦咸阳城遗址 即秦都城遗址。位于咸阳市渭城区东部。自秦孝公十二

年（前350）迁都于此，到秦完成统一大业和最后覆亡，这里作为秦国和秦王朝的首都达144年之久，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1959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管会对咸阳故城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和发掘，探明秦咸阳中心位置在今窑店镇一带，城区范围未见明显界限，大致为北起窑店镇以北二道原下，南至渭河以南西安市三桥镇巨家庄，西起塔尔坡，东到柏家嘴。在这渭水两岸100余平方公里内分布着极为丰富的文化遗存。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的30年间，考古工作者通过勘查和发掘，共发现各类遗址遗迹230余处，其中6处经过试掘和重点发掘，揭露面积15000余平方米，清理战国秦墓128座，出土和采集文物5000余件。虽然至今尚未发现咸阳故城的郭城范围，但却发现了大小不等的夯土建筑遗址27处，包括宫墙遗址和重点发掘的第一、二、三号宫殿遗址，以及多处手工业作坊遗址和长达4公里的墓葬区，为进一步探清秦咸阳故城的范围积累了重要资料。1988年1月，秦咸阳城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秦咸阳宫墙遗址 位于渭城区窑店镇以东牛羊村至姬家道北原一带。1960年至1973年，陕西省考古所对窑店镇以东的牛羊村至姬家道北塬暴露于沟坎断崖、东西连成一线的夯土遗迹进行了钻探，发现这是一条全长为843米的夯筑北墙基。墙基距地表1.40~2.20米，基宽5.5~7.6米，现存夯基厚4.6米左右。由此向东、西、南三面顺延，得知西墙长576米，南墙长902米，构成一个东西向长方形的夯墙。1962年，在北墙中段，即赛家沟沟坎东壁作了以了解夯墙时代为目的的试掘，得知夯墙是在秦文化层之中，墙基中夹有较多战国时期的板瓦、筒瓦残片和少量战国时期的瓦、鬲、釜、盆、罐等陶器残片。从出土遗物判断，此夯墙是战国时期修筑的咸阳宫墙。在秦咸阳城遗址发现的27处大小不等的夯土建筑遗址中，有8处即分布在此宫墙之内。

在遗址西面与之相邻的扶风县揉谷乡法禧村周围，亦发现有大量灰坑和秦汉粗绳纹砖瓦、云纹瓦当、五角水管及铸铁作坊遗址等。1978年还发现有宽约10米左右的秦汉时期城墙遗迹。尤其是出土了刻有“郃”字铭文的秦代铜鼎和铜温壶等。两处遗址同处渭河北岸同一台地上，文化内涵相同，实为同一文化遗址。不仅有新石器时代遗存，也有先周遗存和秦汉遗存，而以秦汉遗存为多。据文献记载，此地周为郃国，秦汉为郃县，古称郃城。西魏时武功县城置此。

长陵县遗址 位于渭城区韩家湾乡怡魏村，居汉高祖长陵之北，相距约3里。陵邑的南、北、西三面城墙部分遗迹尚存，未见东墙遗迹。《长安志》卷十三引《关中记》云：“长陵城有南、北、西三面，东面无城。”其说可以

相信。

长陵邑城址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约 2200 米，东西宽约 1245 米，墙宽 7—9 米，地面上城墙保存最高处约 6 米。城墙均为夯筑，夯层一般厚 6—8 厘米。墙基夯层较厚，一般 15—18 厘米。南、北、西三面城墙各开一门，南、北二门相对，西门辟于西城墙中央。门道有路土遗迹。陵邑东部地势低洼，似不便筑墙，有无壕沟代之，尚不可知。《汉书·高后纪》载：高后六年（前 182）“六月城长陵”，是长陵邑始筑于高后六年。

长陵邑内分布有大面积的汉代建筑遗址，出土过多种汉代的生产和陶器、铜器，并发现了许多地下陶管道和砖瓦残块堆积，以及烧制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品的窑址，在陵邑内还发现了一些具有山东齐地风格的树木双兽纹、双鸟纹、树木箭头乳丁纹和树木卷云乳丁纹半瓦当。这些瓦当该是高祖九年（前 198）徙齐诸田于长陵的佐证。

安陵邑遗址 位于渭城区韩家湾乡白庙村，居汉惠帝安陵之北，相距约 900 米。

安陵邑城址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约 1548 米，南北长约 445 米。东墙和北墙现仍依稀可辨。墙宽约 9 米，残高 2—3.6 米。在东墙和北墙中央辟有城门，门址附近曾发现涂朱的云纹瓦当以及其他西汉瓦当。陶管道和砖瓦残块堆积随处可见。传世的“安邑珮柱”文字瓦当当出于安陵邑。“安邑”即安陵邑之省称，“珮”为“雕”之假借，“珮柱”疑即雕梁画栋之义。《长安志》卷 13 引《关中记》云：“徙关东倡优人五千户以为陵邑，善为调戏，故俗称女调陵也。”可知安陵邑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东艺人。据《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安陵邑本周之程邑。

秦咸阳宫殿遗址 位于渭城区窑店镇东北牛羊沟东西两侧。1973—1982 年，陕西省考古所对位于秦咸阳宫墙遗址之内的一号宫殿遗址和三号、二号宫殿遗址相继进行了发掘，发掘总面积 15168 平方米。根据遗址复原，可知这是一组对称的高台宫观，由跨越谷道的飞阁连成一体，为富有艺术魅力的台榭复合体。

第一号宫殿遗址位于牛羊沟西侧。东西 60 米，南北 45 米，一层台高 6 米，平面略呈 L 形，南北内含若干室。南部西段一列 5 室，西边 4 室为卧室，出土有壁画残片，伴出陶纺轮，当年可能是宫嫔居室；最东一室，内有取暖的壁炉及大型陶制地漏与排水管，可知是浴室。浴室的一角有贮存食物的窖穴。大台的南、西、北三面建有回廊，它既是联系各房间的通道，又起到保护土台的作用。大台的中央有版筑厚墙围护的主体宫室，东西 13.4 米，南北 12 米，面积约 160.8 平方米。南、北墙各开二门，东墙居中一门（门道有壁

画痕迹)。中央有直径 60 厘米的“都柱”遗迹；地表为朱红色，即当时的“丹地”。它表明这里是最高统治者所使用的厅堂。厅堂东侧接连卧室，内设有壁炉。厅堂西侧，有慢道通至厅的楼层。大台的西侧还有大卧室、大浴室和贮藏室，也应是嫔妃、宫女居住使用的。朝北有宽敞的厅堂，朝南有宽阔的大露台，由此可以俯瞰全城，并可远眺渭水与南山风景。

第三号宫殿遗址位于一号宫殿遗址西南角上，其间有夯土互相连接。此遗址也是一处高台建筑。遗址中间高、两边低，呈鱼脊形。其东西长约 117 米，南北宽约 60 余米，总面积约 7020 平方米。发掘时清理出阁道、回廊两道，屋宇两室。阁道留存高 0.2—1.08 米的残墙，东西两壁饰壁画，壁画总长 32.40 米。题材有建筑、车马、人物、游猎、鸟兽、植物、鬼怪等，色彩有红、黑、紫红、石黄、石青、石绿等。车马图每组为四马一车，其系驾方式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车马相似。此壁画是迄今仅见的秦代绘画原作，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宫廷壁画。

第二号宫殿遗址在一号宫殿遗址西北 93 米处。东西长 127 米，南北宽 32.8—45.5 米不等。房屋依台阶分为二层。室内发现封闭式排水池和蓄水窖，出土较完整的龙纹、动物纹、四叶纹空心砖多件。此外还出土瓦当、带钩、半两钱和大量壁画残片等遗物。

从一号宫殿遗址出土的遗物和地面、墙面留有多次维修、改建的痕迹判断，上述宫殿遗址，可能是秦咸阳宫的某个殿址。始建于战国，秦统一前后又经过多次修缮。

“六国宫室”遗址 位于渭城区窑店镇北的头道原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秦国“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因六国灭亡有先后，六国宫室的建造时间和地点亦当不同。经勘查，在毛王沟附近宫殿建筑遗址曾出土楚国形制的瓦当，在柏家嘴曾出土燕国形制的瓦当，在怡魏村曾出土齐国形制的瓦当。这些发现都为确定六国宫室的具体位置和进一步进行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兰池宫遗址 位于渭城区正阳乡柏家嘴，西距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约 3.5 公里，盖即今渭河发电厂厂区。《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此“兰池”盖即兰池宫。此处有一台阶式秦代建筑群遗址，已发现夯筑基址 6 处。在编号为“兰一号”遗址的北部暴露有 6.5 米的房屋地面，秦代的弯曲陶水管至今仍残存于断崖夯土中间。在遗址堆积层中发现有细绳纹筒瓦、板瓦、铺地方砖，龙凤纹和素面空心砖及饕餮纹、蝉纹、变形兽纹与各种云纹瓦当多件，其风格大多与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的相似。

望夷宫遗址 位于泾阳县蒋刘乡五福村和二杨庄之间；北临泾水，南与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相距约8公里。1983年发现。《三辅黄图》卷一载：“望夷宫在泾阳县界长平观道东，北临泾水，以望北夷，以为宫名。”其位置与记载基本吻合。基址因泾水历年南移而多崩塌，经钻探得知，现仅存东西长98米、南北宽34米，残存夯基厚3.20米。基址堆积中遗存着大量砖瓦残片、红烧土渣和墙皮。在基址范围及其周围地面散布有许多秦瓦当和秦砖。另外还采集到两块与凤翔雍城马家庄遗址中同类的槽形瓦。《读史方輿纪要》卷53载：“望夷宫，在（泾阳）县东南八里，秦始皇建。”从遗址中采集所得的早期槽形瓦分析，其营建时间可能要早于上述记载。望夷宫是秦咸阳北原上最北面的一座宫殿。《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世三年，“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沉四白马。”赵高与其婿咸阳县令阎乐等乘机逼令二世自杀于此。

梁山宫遗址 位于乾县县城西郊的鳌盖至漠谷河东崖一带。《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说明始皇帝曾幸此宫。《金石索》收有“梁山铜”一件，铸有“元康元年造”字样。元康为西汉宣帝年号，可知西汉中、后期时梁山宫仍在沿用。此遗址规模宏大，面积约60万平方米，发现有大型夯土基址及板瓦、筒瓦和空心砖等大型建筑材料。最重要的是发现有数块“梁宫”瓦当。宫在梁山脚下，合当以梁山为名。《汉书·地理志》注云：“梁山宫，秦始皇起。”可知此宫始建于秦。

秦汉郃城遗址 位于杨陵区李台乡杜家坡村西至圪塔庙以南、永安村以北一带，东西约1.5公里，南北约1公里。属渭河北岸二级台地。在台地断崖上发现有大面积、多层次的古代遗迹。灰层堆积高达3米，在未扰乱的灰层中、下层发现有红、黑细泥陶器和夹砂灰陶器，以及附加堆纹和绳纹灰陶器。上层有秦汉云纹瓦当和瓦片。除灰层外，还发现多处灰坑、窑址和长约15米的居住遗址与高4米、宽2米的窖穴遗址。在杜家坡西和圪塔庙村西南，还发现两处南北长8米和28米的夯土层。杜家坡以北的西北林学院内，则是一古墓葬群。遗址内出土有大小不同的磨制石斧、陶碗、陶釜、陶罐、陶鬲、陶纺轮、骨锄、薄片小纽铜镜及铜戈等器物。在战国至西汉的8件陶釜、陶瓮上，发现有“黡（郃）市”、“黡（郃）亭”二字印文。

甘泉宫遗址 位于淳化县铁王乡凉武帝村、董村和卜家乡城前头村一带。地处好花圪塔山（古称甘泉山）南麓，西至卜家乡朱家村，东至武家山沟，东西宽约2公里，南北长约3公里，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

甘泉山地势险要，秦代曾于此建林光宫，通直道，既为避暑之地，又为关中屏障。汉代以秦林光宫为基础进行扩建，是为甘泉宫。汉武帝时，甘泉

宫为重要离宫，曾有不少重大国事活动在这里举行。现存遗迹主要有城墙、大型建筑夯土台基和陶窑等。

城墙呈长方形，南城墙长 1948 米，西城墙长 890 米，北城墙长 1950 米，东城墙长 880 米。周长约 5668 米，与《括地志》“周十余里”的记载相近。在城墙的西南角和西北角墙外转角处，各有略呈圆形的夯土台基一处，顶端残径约 7 米，残高分别为 2 米和 4 米，当为角楼遗迹。在东北角小沟道断崖地表下 3 米深处，暴露有夯土和大量砖瓦残块，亦当为角楼建筑遗存。

城西、南、北墙皆有门，其中西门宽 9.5 米，南、北门宽度不详，东墙门尚未发现。在南墙有两个砖券小门洞。在南城墙东段南 100 米处有东西排列的两个夯土台基，相距约 50 米，高 4 米，底周长 80—90 米，两台形状大小略同，可能是门阙遗迹。

北城墙东段墙南，有两个圆锥形夯土台基，东西相距约 70 米。西台基高约 15 米，底周长约 200 米，顶周长约 40 米，底部东侧向外突出。东台基高约 16 米，底周长约 220 米，顶周长约 30 余米，根据史书记载和现在地面遗存分析，这两个台基可能是“通天台”遗迹。在西台基西南侧 5 米处，有一圆锥形小夯土台基，高 6 米，底周长约 60 米，内有大量烧渣和残砖瓦；其南侧西 36 米处，有一略呈长方形的夯土台基，高 5 米，底周长 64 米，台中部和底部夯土中出土有石块和铺地砖。这两个较小的台基，可能是“通天台”的附属建筑。“通天台”作于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亦称“候神台”，又称“望仙台”，意欲候神明而望神仙。

在西大台基南 240 米处田埂上，发现东西走向的白灰面墙壁，残高 0.5 米，长 4.25 米。附近有东西对峙的白灰面墙壁两道，残高 35 厘米，距地表 0.7 米，东西两墙间距 2.70 米，在西墙下尚发现柱洞痕迹。这两道东西对峙的墙壁，可能是一处回廊式建筑遗迹。

在回廊式建筑遗迹南 10 余米处，有方形棕色门枢石 1 块，边长 1 米，厚 0.47 米，石面中央有一直径 8 厘米、深 6 厘米的圆窝，圆窝两侧各有一个浅长槽。凉武帝村村民于 1977 年平整土地时在村东又发现 3 块，4 石东西一字排开，两两间距约 30 米。由此向北约 10 米，另有一排方石，亦是 4 块，现已打碎散失。

在凉武帝村、城前头村先后发现陶窑遗址 10 余处，大部被毁坏，现存 2 处：一处在城前头村东北的田埂中，尚未清理；另一处在城墙西南角向东约 150 米的南城墙下，窑室内存有绳纹板瓦、筒瓦等残片和“长生未央”瓦当残件。

在遗址中心区凉武帝村、城前头村和董村以及遗址外的英烈山、营坊

坡、萍家山、焦家山、辛店村、大店村等地，都发现有圆形、方形和五角形陶水管道。

在遗址内发现有大量建筑材料，主要的陶质建筑材料有铺地砖、空心砖、条砖、子母砖、画像砖、板瓦、筒瓦、瓦当和半瓦当。其他遗物有铜熨斗、戳印、弩机、矢镞、构件及铁铲、铁镢、铁夯头等。陶建筑材料中不少戳记上有“甘居”、“北司”、“大匠”、“大子”、“大寅”及“本”、“生”、“嘉”、“左”、“成”、“仓”等印文。

甘泉山秦汉建筑遗址 位于淳化县北30公里的好花圪塔山主峰上。1986年发现。主峰海拔1809.9米。遗址分布有7处，其中以主峰遗址最大，约350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4米多。峰顶有一处椭圆形平台，东西长100米，南北宽30余米。台东为一处长宽各70余米的小平台，内有板瓦、筒瓦、铺地砖等建筑材料。据此推测，此遗址可能是秦汉时的一处离宫。遗址内发现的建筑材料很多，有几何纹、曲尺纹和素面铺地砖，以及“甘林”、“长生未央”、“卫”字和卷云纹瓦当。发现遗物有货币、弩机、带钩及铁镢等。

此遗址未见于记载。《三辅黄图》卷4云：“秦离宫三百，汉武帝往往修治之。”此遗址在直道之旁，秦林光宫和汉甘泉宫之北，相距又极近，为研究秦汉直道设施及宫殿建筑提供了新的内容。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载：范雎曾谓秦昭王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此王者之地也。”此“北有甘泉”，即今淳化县西北之甘泉山。战国时已为秦国北方门户，故此遗址可上溯到秦徙都咸阳之时。

洪厓宫遗址 位于淳化县铁王乡程家堡村西。为汉代离宫之一。

遗址东西有两道沟，两沟间的塬面宽约2公里。遗址在隆起的原中央，其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约400米，面积约12万平方米。曾出土大量建筑砖瓦残件，有的地段残砖瓦深埋在地下达3米。1979年以来，县文化馆文物工作者先后多次对遗址进行了调查，采集到各种出土遗物标本数十件，主要是建筑材料，如几何纹方砖、乳丁纹方砖、子母砖、空心砖、曲尺形砖及筒瓦、板瓦与各种瓦当，其中有“长生未央”、“长生无极”、“卫”字瓦当等文字瓦当32件，圆瓦当及夔纹半瓦当、云纹半瓦当等图案瓦当33件。还有五角形和圆形陶管道以及铜构件、铜铺首、铜泥筒等铜器3件。

《汉书·扬雄传》载：“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厓、旁皇、储胥、弩陆，远则石关、封峦、鸱鹞、露寒……屈奇瑰玮。”此遗址北去甘泉宫遗址2公里，距宫殿遗址南城墙1公里，其地名今称“红崖村”，以“宫外近则洪厓”应之，此遗地即汉洪厓宫。

出土遗物中夔纹半瓦当与内圆饰网纹、格纹、树枝纹和菱纹的云纹瓦当，都有可能为秦代遗物。洪厓宫疑为秦筑汉葺。

黄山宫遗址 位于兴平县田阜乡侯村。《汉书·东方朔传》载，武帝微行，西至黄山宫，即指此处。黄山宫又作“横山宫”。面积约2.5万平方米。陕西省考古所曾进行了勘探和试掘。

遗址现存夯土宫殿台基高出地表近2米，发现有道路、墙基、散水和大量的建筑材料。文字瓦当有“长生无极”、“千秋万岁”、“长乐未央”、“黄山宫当”等。70年代末，曾在此发现刻有“黄山宫”铭的铜灯及龙凤纹空心砖等。《汉书·地理志》槐里县（治今兴平县东南）条注云：“有黄山宫，孝惠三年造。”可知此宫建于惠帝三年（前192）。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渭水》于“渭水又东过槐里县南，又东，涝水从南来注之”之后云：“渭水又东北迳黄山宫南”。可知黄山宫即在渭河北岸。旧谓在远离渭河的马嵬镇北原，显误。

第三节 路桥渠道遗址

郑国渠首遗址 郑国渠渠首位于仲山西麓的瓠口（今泾阳县王桥乡船头村西北），是战国时代秦国修筑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与四川都江堰和广西灵渠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此渠修建于秦王嬴政元年至十年（前246—前237），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修建，故名。

郑国渠流经今泾阳、三原、阎良、富平、临潼、渭南、蒲城等地，最后流入洛河，全长约150余公里，灌溉面积4万余顷，约合今280万亩。郑国渠从引水口至灌溉干渠，修有宽15—20米、高3—5米、长达6公里的引水渠堤。现在的王桥乡船头村西北泾河东岸上，还保存有引水渠故道的遗迹。总干渠上曾修有退水渠，宽度与引水渠基本相等，其作用相当于现代水利工程中的溢洪道。今郑国渠和白公渠渠首遗址之北还有北宋丰利渠、元代王御史渠、明代广惠渠、清代龙洞渠和民国时期所修的泾惠渠渠首遗址。

直道遗址 秦统一六国后，为北御匈奴，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有名的秦直道。秦直道南起云阳林光宫（即汉之甘泉宫），其遗址在今淳化县铁王乡凉武帝村。由此向北，经英烈山南麓，过马槽梁，至好花圪塔山，到达今淳化、耀县、旬邑三县交界的七里川，进入旬邑县境的庙沟村，穿石门关，再沿子午岭北行，逶迤至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秦九原郡治），全长约合今1400余里。它是由秦咸阳到九原郡最直捷的道路，不仅有利于军事调动，对南北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无疑也是有利的。

秦直道一般路宽 20—30 米，最宽达 50 米，转弯处最大半径 50—60 米，路基坚实，夯打坚硬，坡度平缓，部分路面坡度仅为 7 度。淳化、旬邑境内的直道，自好花圪塔山以北，基本上是沿山梁而行。1986 年在旬邑县境子午岭上的直道遗址附近，发现了一座大型秦代建筑遗址（距陕甘交界的“调令关”约 1600—2000 米，其所在山梁叫大古梁），遗址位于一片近 40 亩的葫芦状险要台地上，占地约 70 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秦代建筑材料和残砖碎瓦。经调查试掘，发现保存有高约 60 厘米的隔墙，室内外地面先行夯打，然后用料礓石粉打磨光滑，异常坚硬。此遗址可能是直道上的驿站馆舍或离宫别馆之一。

沙河桥遗址 位于秦都区钓台乡西屯和资村交界的沙河古河道。东北距咸阳市区约 8 公里，北离渭河岸约 2.5 公里。1985 年当地村民拉沙时暴露一号桥，1986 年在一号桥北端暴露出二号桥，两桥相距约 300 米，均为木架结构。秦都区文管会和陕西省考古所先后进行了调查、试掘和发掘清理。

一号桥木桩排列整齐，清理出 16 排 143 根桥桩。二号桥清理出 5 排 40 根桥桩。东西排列、南北对应。第一排有辅助桩，南北竖列，起承重和稳固的作用。木桩表皮有明显裂痕，上端参差不齐，形状各异，有砍砸陈迹，另有一些似有榫卯结构。这些桥桩表面涂过一层油质或漆类防朽保护物，并用火烤过。有些桩外面虽无表皮，但同样有一层与内部木质颜色不同的保护层。木桩直径 0.34—0.48 米，间距 2.10—3.20 米。木质主要有松、柏、柳、漆、梨、槐木。木桩上端断面形状区别较大，有圆锥形、夹榫形、平榫形、凸凹形、子母卯形等。

一号桥桥桩排距 4.5—5.5 米，桥宽约 17 米以上。附近出土有变形夔纹瓦当、素面半瓦当、几何纹方砖、绳纹板瓦、绳纹筒瓦等。年代较早，与秦都咸阳遗址中出土同类遗物相似。云纹瓦当与汉长安城等地同类文物的陶色、制法和风格相同。其西南 13.5 米处出土一大型铜饰件，外形呈叶状，长 116 厘米、宽 43 厘米、厚 3.3 厘米，重 32.5 公斤，两面均铸有花纹，一面是简化夔纹，另一面是三角几何纹，时代属战国晚期，为桥自身的附属物。在一号桥南端，还出土大型槽状铁构件 7 件，长 7 米，宽 1.1 米，高 1.05 米，厚 0.03—0.06 米。二号桥桥桩排距 6.5—7.2 米之间，桥宽约 16 米以上。附近出土遗物有板瓦、铜甑、铜熨斗、铜鱼、铜釜、铜戈以及陶罐、铺地砖等。

沙河古桥是秦都咸阳、汉长安城去上林苑和西入巴蜀而跨渡丰水的桥梁，应属古丰水桥。据推断，一号桥建于战国末期，毁于秦亡；二号桥建于西汉初年，毁于西汉末期。此与对桥桩进行 C_{14} 测定所得结果（一号桥 2120

± 80, 二号桥 1900 ± 80) 大体相符。

便桥遗址 位于秦都区渭滨乡吕村以东渭河中。便桥即便门桥。《三辅黄图》云：“武帝建元三年初作此桥，在便门外，跨渭水，通茂陵。”原注文曰：“长安城西门曰便门，此桥与门对直，因号便桥。”此桥遗迹至今尚存，每遇天旱河枯，木桥桩即有显露。桥桩直径约 80 厘米。1989 年文物普查时，在与桥对直的渭河北岸断崖上发现古代道路遗迹，上距地表 0.5 米，宽约 50 米，厚 0.1 米。王国维《水经注校》云：“渭水又东，与丰水会于短阴山内。……水上旧有便门桥，与便门对直，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造。”张昌曰：桥在长安西北、茂陵东。如淳曰：去长安四十里（《元和郡县志》作“去长安二十里”）。文献所述与遗迹方位大体相合，足证其即汉便桥遗址。《旧唐书·太宗本纪》云：武德九年八月癸未（二十八日），“突厥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遣其酋帅执失思力入朝为觐，自张形势，太宗命囚之，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乙酉（三十日），又幸便桥，与颉利刑白马设盟，突厥引退。”可知便桥唐时仍存。

泾河桥遗址 位于泾阳县蒋刘乡五福村与二杨庄之间秦望夷宫遗址北面的泾河上。据调查，该处曾陆续发现桥桩（每逢枯水季节即有显露），桥桩大部为松木，直径约 30 厘米，呈梅花桩状排布。桥身走向为西北—东南，宽度 8 米左右。由此桥向南上原之坡古称“长平坂”，汉时有宫观曰“长平观”。据《三辅黄图》记载，长平观道西即秦望夷宫旧址。《汉书·宣帝纪》载：“甘露三年（前 51）正月，宣帝行幸甘泉宫，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獠来朝……使有司道单于先行就邸长安，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颜师古注引如淳曰：“阪名也，……上原之阪有长平观。”据《汉书·元后传》载：元始四年（4）冬，元后（王政君）“登长平馆，临泾水而览焉。”可知西汉中、后期，长平观仍为一重要宫观。又据《后汉书·献帝纪》中“韩遂、马腾与郭汜、樊稠战于长平观”的记载，长平观在东汉末年仍存，以此推断，此观脚下的泾河桥东汉时一直使用。

此桥史籍失载。近年有些研究者依据《官印存征》所收“长夷泾桥”，推测此桥即古之“长夷泾桥”，并进而根据秦代陶文中所见当时命名规律，推测“长夷”为泾桥所在地名，且与“长平坂”有一定关系（《说文》曰：“夷，平也”）。因此桥位于秦望夷宫北面不远处，故推断其为秦时所筑。

成国渠遗址 成国渠为汉武帝时（前 141—前 87）兴修的一条重要灌溉渠道。从今眉县东北的渭水北岸起，引渭水经扶风、武功、兴平、咸阳复入渭，全长约 240 余里。自后旋废旋修，至唐代又纳韦川、莫谷、香谷和武安四水，灌溉武功、兴平、咸阳、高陵等县 2 万余顷田地，俗称“渭白渠”（言

其利与泾白渠相上下)。唐代成国渠除灌溉农田外，还与三国时魏国卫臻向西延伸的成国渠西段（至泔水）相接，将陇县、千阳一带的木材藉此运至长安。宋代以后淤塞，成为历史陈迹。经考古调查，从武功至咸阳的170里内，已发现十余处成国故渠的横断面和纵剖面。其主要遗迹出露地点有：武功县漆水河东岸渭惠一支渠渡槽东北300米处，故渠遗迹嵌于一崖面上；张堡村北（张堡火车站北），遗迹见于渭惠一支渠北20米平整土地的崖面上；郝家堡村西北渭惠一支渠北200米处，平整土地时有三个横断面；西孟村北渭惠一支渠北，起土壤内东西两壁均可见清晰的横断面；曹家店北肖马村沟壕里；上寨村北大土壤里；焦村几条沟均有遗迹；寨陈村沟壕里；兴平县纸坊头村北砖瓦窑取土壤；宋村（马嵬坡西，西宝公路南）；板桥抽水站东南退水渠北；豆马村北，原第一生产队饲养室北两个土壤中有三个横断面；渭城区窑店北2公里，13号公路东侧一小支渠中；红旗抽水站，73斗门南250米一支渠中，北距长陵约1500米。所有出露断面大致相同。以兴平县豆马村北起土壤为例，故渠在渭惠高于渠南400米，低于高干渠20米。在黄土地层中嵌有一清晰的渠道横断面。渠底呈锅底状半圆形、宽约8米，沉积物层次分明，系细腻的粘土间细砂土，厚0.1—20毫米不等。沉积物颜色亦各不相同，有褐色、紫色、灰色等。

第四节 其他遗址

秦咸阳手工业作坊遗址 已发现6处。一处位于渭城区正阳乡兰池宫遗址附近，其余分布在窑店镇秦宫殿遗址西部。

手工业作坊分由中央官署控制的和民营的两类。属中央官署控制的行业如冶铜、铸铁和制作宫殿建筑使用的砖瓦，多在宫殿遗址附近。如东临宫殿遗址的聂家沟附近的手工业作坊，是由制砖瓦、冶铜、铸铁三个行业形成的大型作坊区。该处遗存有大量铁渣、铁块和黄绿色的堆积层，并发现铸造铜器的陶范残块多件和陶窑4处。再如宫殿遗址以西的胡家沟附近作坊，似专为宫殿建筑供应砖瓦的专业作坊区。该处窑址已毁坏较多，但仍遗存29座，占地面积为7936平方米。窑址东西成排，南北成行，排列有序。窑址中出土的部分残砖瓦上戳印着“周”、“古”等以示官署生产的文字标记。与此相距不远的西北方，又是一处生产砖瓦的专业作坊，遗址附近发现有素面瓦当、瓦片和烧结变形的龙凤纹空心砖残件。

以民营生产为主的作坊区在宫殿遗址以西约4公里的长陵火车站周围，此处也同时存在着市府经营的制陶业和切锯骨料的加工业。该作坊区，除遗

存着许多陶窑和窑内堆积物外，还分布着数以百计的水井和地下排水管道。1959—1963年曾在此作了几次发掘，揭露面积424平方米，清理出陶窑4座、窖穴6个和一些水井及小孩墓葬，出土陶盆、鬲、瓮、茧形壶、罐、制陶工具、货币和兵器等遗物数百件。在相当数量陶器上戳有带“咸”字的文字印记，有类似文字印记的陶器不仅在咸阳战国墓中多处出土，而且在西安半坡战国墓中也有发现，这说明其产品已在咸阳以外的地区经销。

1961年、1962年和1982年，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作坊区的长陵火车站北面、南面和西南面三个地点，发现了铜器和铁器窖藏。其中北沙坑出土的铜、铁器共达1000余斤。这批铜、铁器大部被烧熔变形，能辨认出的有建筑构件和饰有花纹并镶嵌铭文的铜器装饰。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块完整的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铜诏版。南沙坑出土铜器共280余件，货币140枚和一些铜块。铜器中除鉴、鼎、盒、釜等生活用具外，还有兵器（弩机零件、镞、矛、戈、镢等）、车马器（害、辖、盖弓帽等），以及带钩、铺首等装饰品。140枚货币中除3枚秦“半两”外，其余均为关东诸国的钱币，如“安邑二铢”、“齐法化”和“蚁鼻钱”等。此外，此处还出土过楚国金币“郢爰”、“陈爰”和魏国器具“安邑铜锤”，反映了秦统一前各国货币流通及物质文化交往的情形。同时出土的还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残铜诏版3块。西南沙坑出土的铜器共320余件，大都残缺不全。有车饰、兵器、构件、生产工具、生活器皿与秦“半两”钱和铜人头像等。其中出土的秦二世皇帝元年统一度量衡诏版1件，是继1961年发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诏版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

秦咸阳陶窑遗址 位于渭城区窑店镇黄家沟至仓张村砖厂一带及正阳乡柏家嘴附近的原头断面上。1980—1983年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调查时发现秦窑14座，清理了其中3座。经过调查及清理，发现秦都咸阳的秦窑形状为圆形或长方形两种。窑室容积较小，直径约2.5米，高2米左右。其修筑方法皆为在生土上挖成窑室，部分窑壁的四周涂抹厚约0.8—1.2厘米的草拌泥。依其形制的差异，可分为二式：Ⅰ式是圆形弧顶窑，共12座，这是秦窑的主要形制。其结构由窑门、火膛、窑床、窑室、烟道等部分组成。窑床平坦，窑壁外鼓，窑顶上弧，烟道附贴在后壁。Ⅱ式是长方形或方形弧顶窑，共2座。窑体为弧形顶，由窑门、火膛、窑室、烟道几部分组成。

陶窑遗址出土遗物有制陶工具、器物及陶文。制陶工具仅器托1件，长方形器1件。器物最多的瓦，包括板瓦、筒瓦和瓦当。一般烧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色呈青灰色。另外还出土了一些板瓦、筒瓦生坯。同时出土有下水管道、铺地方砖及陶井圈残块等。在3座窑址中，共出土9片带陶文的板

瓦片，皆为单字戳印，陶文分别为“甲”、“天”及“周”等。从出土遗物看，这些陶窑几乎全部生产建筑材料，产品有板瓦、筒瓦、铺地砖、水管道、陶井圈等，供宫廷建筑的用途很明显。如在胡家沟窑址出土的带“周”、“甲”、“天”等字的陶片，在秦咸阳一号、三号宫殿建筑遗址中均有发现。

秦咸阳陶水井遗址 绝大部分分布在长陵火车站东北、西北和西南沙层中，在火车站以南的渭河北岸，东起西龙西村，西至摆旗寨，也有少量发现。多属战国时期和秦代，也有晚至西汉的。共发现 100 余口，多集中在秦咸阳陶作坊区。水井大都用陶圈安装，圈径一般在 70 厘米左右，每节高约 35 厘米。井深 1.73—3.12 米不等，口径在 0.68—1.26 米之间。多数井都是用单层陶井圈垒砌而成，也有上部用瓦片、下装陶圈和通体用瓦片、砖块箍成的，但为数甚少。井底大部有沙粒滤水层，个别井底遗存陶罐或陶盆等汲水器。宫殿区因地处北原，地势较高，至今尚未发现用水井，只是在建筑周围出现少量结构与用水井相仿的渗水井。宫殿区的生活用水当系由别处输送。

秦咸阳排水管道遗址 多数位于秦宫殿遗址周围。已发现 29 处。管道分单管道、双管并列管道和四管并列管道 3 种。管道均作陶质圆筒形，子母口，每节长 53—68 厘米，口径 19—56 厘米，节节套接，挖槽埋入地面以下。管道的大小及排列数量系根据各建筑物排水量的多少而定，如一号建筑周围分别安装有单管道和双管并列管道两种，三号建筑基址旁边则分别安装有单管道和四管并列管道。排水管道的入水口均挖有池，池中铺板瓦，瓦中置地漏。工艺设计和施工技术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手工业作坊区发现有用筒瓦扣合成筒状的暗管和用板瓦顺序排列的明渠。可知宫殿区的排水设施与作坊区明显不同。

渭城陶窑遗址 即西汉渭城县东陶窑遗址。位于渭城区窑店乡黄家沟以东到正阳乡柏家嘴一带的原头断面上。1980—1983 年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调查中发现 75 座。因这些窑址多依原头，残破殊甚，均未清理。但又因其数量较多，崖面暴露的剖面多，故大致情况多能看出。这些陶窑的基本形式为圆形和长方形两种，结构由窑门、火膛、窑床、窑室、烟道几部分组成，与当地秦代陶窑相比，不仅窑室有所扩大，在修筑方法上也有了较大改进。所见当地秦代陶窑均为土壁窑，而这些汉代陶窑除土壁窑外，还有土坯或砖砌窑，以及夯筑壁窑。遗物有制陶工具、器物及陶文。制陶工具有三角形器及支垫。器物有板瓦、筒瓦、土坯、砖及陶器残片。陶器残片有盆、罐等生活用具，质多为细夹砂灰陶，少量为细夹砂红陶，平口器沿较多。在汉代陶窑共发现陶文数个，皆见于制陶器具上，有“甯”、“佶”、“安”等字。这些陶窑分布密集，数量极多，与汉长安城仅一河之隔，故很可能是汉代官营制陶

作坊。这批陶窑主要生产砖瓦等建筑材料，同时也生产盆、罐等生活用品，当为西汉长安的主要陶窑区之一。

细柳仓遗址 位于秦都区渭滨乡过唐村、两寺渡村至吕村沿渭河一带以及河对岸马家寨西北渭河沿岸。1989年咸阳市文物普查队发现。经初步踏查，其范围北起两寺渡村，南到吕村，西起过唐村，东抵渭河，南北长约2100米，东西宽约2000米（其东部明显已为渭水冲毁）。遗址内砖瓦残块遍地，柱础散布其间，并采集到“百万石仓”瓦当2件，均出于遗址北部沿河一带。这种瓦当在汉长安城也出过几件，陈直认为属“西汉时仓庾所用之物”。据《三辅黄图》记载，西汉除在长安城外东南造“太仓”外，在“古徼西有细柳仓”。“古徼”疑即“石缴”，由《水经注》知“石缴”在古丰水入渭处，即今遗址东渭河对岸。而“古徼西”正好是今遗址范围。1990年，陕西省考古所曾在两寺渡、过唐村及渭河对岸马家寨西北，发现一处大范围的汉代建筑遗址，渭河将遗址分成两部分，在岸边地层中多处发现汉代布纹板瓦，并于西岸发现“百万石仓”瓦当1枚，确认此处即是汉细柳仓遗址。

《汉书·文帝纪》载：七年，“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服虔注云：“在长安西北。”如淳注云：“长安细柳仓，在渭北，近石缴。”又《元和郡县图志》卷1云：“细柳仓，在咸阳县西郊二十里，汉旧仓也。周亚夫军次细柳，即是此也。”据此可知，细柳仓遗址亦即周亚夫屯军的细柳营所在地。

天井岸汉代礼制建筑遗址 位于三原县嵯峨乡天井岸村中。1988年咸阳市文物普查队发现。嗣后配合复查进行了勘测和局部钻探。遗址主体是一巨型盆状圆坑，坑平面呈规则圆形，口径260米、深32米、底径170米。经调查，巨坑四周坑壁均为夹有红色古土壤层的原始黄土堆积，堆积地层岩性结构正常。坑南侧及西侧，发现大量人工堆积土层，其间夹有一些坚硬踏面层，踏面层自人工堆积区通往坑沿，证实此坑确有人工开挖痕迹。经局部钻探，坑底存有厚达7—8米的淤土层，淤层土质纯净，未见文化遗物。淤层底部分布一层厚8—10厘米的坚硬人工踏面，土质驳杂，踏面下即为生土。原坑最大深度可达42米，整个工程土方约150万立方米。坑正北部有一长方形缺口，宽30米、长约80米，中部有一平台，台上发现少量汉代瓦砾。据调查，原坑形状很圆，坑壁下缘有一周台阶，近几十年遭到破坏，台阶多已不存，仅坑底西北部尚存一段台阶，宽约4米。此外，坑北侧80米处曾出土大量汉代绳纹瓦，坑西北200余米处为冲沟边缘，暴露有部分绳纹瓦砾及人工堆积层，坑北1.5公里范围内，另发现5处汉代绳纹瓦砾密集区，一些地段还见盆、罐器物残片及散水石。

《汉书·地理志》云：“谷口，九峻山在西。有天齐公、五床山、仙人、

五帝祠四所。”此坑所在地汉隶谷口县。坑东原分布有一组大型建筑遗址，现存五座呈“十”字形分布的建筑夯台，疑即汉“五帝祠”遗址。坑西嵯峨山（因有五峰，又名五台山、骞薛山）最高峰顶亦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汉代绳纹筒瓦、板瓦残块。疑即汉“五床山祠”遗址。依据坑内深厚的淤积堆积及坑周集水面积较小的关系考虑，其时代绝不会太晚。坑周分布有较单纯的汉代建筑遗址，同时东与汉“五帝祠”相依，西与汉“五床山祠”相望，加之该坑与汉长陵、汉长安城及子午谷口等南北联为一线，故推测其为汉“天齐公祠”的主体建筑，“天井”疑即“天齐”之讹。“天齐”者，依史家解释，指天之中央，或如“天之腹齐（脐）也。”天井岸礼制建筑遗址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

安仁古瓷窑遗址 位于旬邑县城关镇安仁村。遗址西临三水河道，东依高出河床约700余米的高原。因自然和人为的原因，遗址破坏严重，现存面积东西宽约1000米，南北长约1500米。1977年5月发现并作过调查，同年秋和1978年夏，咸阳地区文管会先后两次进行了清理发掘。发掘分甲、乙、丙三区进行。共计发掘面积1261平方米，清理出瓷窑10座，出土遗物（含瓷片）达89101件，主要器形有碗、碟、盆、罐、壶等。此外，在甲区钻探出一处面积约1065平方米的堆料与晾坯场遗址，并调查了暴露于地面的窑址31座、炉灰渣瓷片堆积坑22个、坩土原生层7处。

在发掘的10座瓷窑中，宋窑仅1座，金元窑共9座。宋窑破坏严重，结构难以辨认。金元窑分为两种类型，其中7座分窑门、火膛、窑床、烟孔和烟囱五部分，另2座分排灰通风道、窑门、火膛、窑床和烟囱五部分。

两次发掘的89101件遗物中，完整和可复原的器物有5930件。在宋代文化层遗物中，有碗1493件、碟307件、盘10件、瓶10件、壶26件、五足炉66件、尊1件、狗34件、灯68件和不知名器5件，另有匣钵13件、钵底117件及三足垫饼、喇叭状支具与烧芒口碗的支圈等支烧具78件。在金元文化层遗物中，有完整和可复原的碗、碟、洗、盘、罐、盆、盒、瓶、壶、奩、盅、茶托、灯盏、灯座、器盖等16类共1626件生活用具，马、牛、羊、蛙及小圆球等玩具36件，匣钵、底钵、支烧具等窑具1598件，印模、石具、瓷环、釉浆盆、研钵、器托及铜剃刀等作坊用具93件。

遗址的文化遗存，显示了宋金至元时期都以烧制碗、碟、盆、罐、壶等民间日用瓷器为主，并以烧制青瓷为主，同时也烧造相当数量的黑釉和酱色釉瓷器。据出土碗类釉色统计：宋代青瓷占55%，黑瓷和酱色釉瓷各占22%；金元时青瓷占41%，酱色釉瓷和黑瓷分别占35%和23%。花纹装饰多在青瓷碗、碟、盆、洗的内壁，仅少数宋代产品饰于外壁。纹样以模印花卉

为主，次为水波、动物和人物。从釉色、装饰纹样和器物造型等方面看，它与耀州窑风格相同，为我们了解“耀州瓷”的生产地域提供了新的资料。

第二章 古墓葬

俗语：“金圪塔，银圪塔，比不上咸阳原冢圪塔。”咸阳原上丰冢累累，天下闻名。向北望去，沿梁山、五将山、九峻山迤迤而东，陵山嵯峨，陪墓棋布。境内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即有7处，属于省级重点保护的有34处。1988年全省文物普查中，咸阳市境登记的古墓葬达1135座，占全省登记总数的五分之一。

咸阳市境因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古墓葬有一个显著特点：帝王陵墓多。现已确认的秦、西汉、前秦、北齐、北周、隋、唐7个朝代的帝王陵墓共25座，约占全省已确定或基本确定的39座帝王陵墓的2/3，此尚不包含钩弋夫人云陵、李虎永康陵、李昉兴宁陵及武则天之母杨氏的顺陵。这些陵墓大都有陪葬墓，最多的唐太宗昭陵陪葬墓达180余座。除帝王陵墓外，历史上有许多名人死后安葬于此，其中以西汉、北周和唐代为最多。他们中大多数人正史中有传，有不少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学者。另外，还有一批经过考古发掘的秦汉墓群和无名墓葬，这些墓葬对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一节 陵 墓

秦文王公陵 秦文王公陵位于渭城区周陵乡周陵中学北。为战国时秦惠文王的陵墓。秦惠文王后十四年（前311）葬。

秦惠文王（前355—前311），名驪，秦孝公之子，在位27年，执政初期即车裂了力主变法的商鞅，但却坚持了孝公时已卓见成效的商君之法，使秦国日益富强。十三年（前325）自称为王。

公陵以北200米处为秦武王永陵，二陵南北毗邻，宋代以后讹传为“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现陵前仍存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书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碑。公陵呈覆斗形，封土高11.8米，底边长78米，顶边长48

米。1973年在陵南40米处地下1米未经扰乱的地层中出土了圆形瓦当2件，其形制相同，面径12厘米，无边轮，当面有一凸圆，径10.3厘米，纹饰用圆形印模制成，中由十字单线分为四区，各饰云纹，外缘围以两条边线为边缘，战国时期瓦当的特点十分明显。

公陵及其北面的永陵在唐时尚是明确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又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一十五里。”《史记正义》作者张守节为唐代人，唐代咸阳县城在今渭城区龚家湾一带，由此向西北十四五里，正是世传“周陵”之地。宋以后人以秦文王、武王陵为周文王、武王陵，显然失于考稽。周文王、武王陵在今长安县丰、镐二京一带，史有明载。

秦武王永陵 秦武王永陵位于渭城区周陵乡周陵中学北，为战国时秦悼武王的陵墓。秦武王四年（前307）葬。永陵与公陵南北排列，永陵在公陵之北，相距约200米。

秦悼武王（前329—前307），名荡，秦惠文王之子。即位第四年（前307），秦攻占韩国西部战略要地宜阳，武王至周都洛阳，因与力士孟贲比赛举鼎，用力过猛，折断腿骨，死于洛阳。

永陵呈覆斗型，封土高12.3米，底边长71米，顶边长41米。宋以后讹传为周武王陵。

汉高祖长陵 位于渭城区窑店镇三义村北1.5公里原上。为汉高祖刘邦与皇后吕雉的陵墓。汉高祖十二年（前195）五月丙寅葬。

刘邦（前256—前195），字季，秦朝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出身农家，曾任秦泗水亭长。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起义，他起兵响应，称沛公。初属项梁，后与项羽领导的义军同为反秦主力。公元前206年率军入关，推翻秦朝统治。同年被项羽封为汉王。不久即与项羽展开长达4年的战争。公元前202年战胜项羽，即皇帝位，建立汉朝。在位7年。死后谥高皇帝，葬长山，陵称长陵。吕后（前241—前180），名雉。曾助汉高祖杀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后其子惠帝刘盈即位，她掌握实权。惠帝死后，临朝称制。高后八年（前180）死，葬于长陵。

长陵附近曾出土“长陵东当”、“长陵西当”及“长陵西神”等文字瓦当，证实了此处陵墓确为长陵。长陵东西并列着两座陵墓。据《史记集解》引《皇览》所谓“高帝、吕后，山各一所”的记载，不仅知道这两座陵墓是高祖、吕后的陵墓，而且知道帝后虽云合葬，却是同茔而不同穴。又据《史

记集解》引《关中记》所谓“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的记载，可知其西一座是高祖陵，其东一座是吕后陵。清陕西巡抚毕沅为长陵树碑时以东为高祖陵，西为吕后陵，当是记颠倒了。

二陵相距约 250 米，大小形制略同，皆呈覆斗形。根据现存遗迹测得，高祖陵底部东西长 165 米，南北宽 145 米，高 32 米，顶部东西长 40.5 米，南北宽 15.3 米。吕后陵底部东西长 148—157 米，南北宽 129—132 米，高 31.8 米，顶部边长 17.5 米。

长陵陵园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 1000 米，东西宽 900 米。四面墙壁均有遗存，以西墙保存较好。地面尚存长 600 米、高 3 米、宽约 6 米的残迹。四周未见明显的门阙遗迹。从园内夯土、瓦砾及排水管道的分布状况看，陵园建筑主要在陵冢北部和两侧。陵园四角，除东北角外，其余 3 处均发现了角楼建筑遗址。吕后陵冢南部北距陵园南墙约 30 米，有一大型建筑遗址，东西长 250 米，南北宽百米以上，遗址内有巨大的柱础石、红色墙皮和大量砖瓦堆积。在此以南约 400 米，有一建筑遗址，东西长 150 米，南北宽近百米，遗址内纵横分布着圆形、五角形水管道。均当为礼制建筑遗迹。

长陵陪葬墓众多，西起长陵东门，东到泾河南岸，长约 8 公里的范围内，仍保留封土堆的尚有 63 座。据记载，西汉初年名臣萧何、曹参、张良、周勃、王陵等人均陪葬长陵。陪葬墓有单冢、双冢、三连冢；封土有山形、圆锥形、覆斗形；其分布以杨家湾、西史村、徐家寨及泾阳县新庄村一带最为集中。1956 年以来，文物考古部门对长陵进行了多次调查。1965 年发掘 34 号陪葬墓的陪葬坑，出土大批彩绘兵马俑。1971—1976 年发掘了 4、5 号陪葬墓，出土了大批遗物。

长陵陵园的遗物以各种陶建筑材料为最多。除有“长陵”字样的瓦当外，还有“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等文字瓦当。陶水管道有圆形和五角形两种。花纹砖以回纹和菱形纹最常见。砖瓦上戳印的陶文有“宫平”、“宫二”、“宫三”、“大三十”、“右三十”等。1966 年在长陵附近出土的玉奔马和 1968 年在长陵附近出土的“皇后之玺”玉印，当是长陵遗物中的珍品。

汉惠帝安陵 位于渭城区韩家湾乡白庙村南 1.5 公里处。为西汉的第二位皇帝惠帝刘盈的陵墓。惠帝七年（前 188）九月辛丑葬。

刘盈（前 210—前 188），字满，刘邦与吕后之子。17 岁即位，在位 7 年。在位期间，实际政权仍为其母吕后掌握。吕后作主将其不满 10 岁的外孙女张嫣嫁给刘盈作皇后，刘盈对此甥舅夫妻深为不满，加上吕后残害戚夫人和赵

王如意，对他造成一定的精神压力，遂忧郁成疾，于23岁时病死，死后葬于安陵。

近年在安陵南聂家沟发现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四皓庙碑》。结合《水经注》记载，确认此墓为惠帝安陵。安陵呈覆斗形，底部东西长163米，南北宽140米，顶部东西长50米，南北宽29米，封土高28米。清陕西巡抚毕沅以汉景帝阳陵东北一里处的墓冢为安陵，并树碑为记，其实是将景帝王皇后墓误认为安陵。

安陵西北270米处有一墓冢，疑为孝惠张皇后墓。墓冢呈覆斗形，底部东西长60米，南北宽50米，顶部边长28米，封土高12米。顶面凹陷。

安陵之东是陪葬墓群。现存12座，大多数为圆锥形。见于文献记载的陪葬墓有鲁元公主、张敖、陈平、张仓、袁盎和扬雄等。目前大致能辨认名位的有鲁元公主和其丈夫赵王张敖墓。鲁元公主墓在安陵东北约1000米，冢为覆斗形，底边东西长140米，南北宽120米，高19米，其规模略小于帝陵，而远远大于一般陪葬墓。张敖墓在鲁元公主墓东60米，墓冢远小于鲁元公主墓。

在安陵以东约2000米的狼家沟东原头—安陵陪葬墓圪四周有陪葬坑，东西长21米，南北长19米，从已发掘的南面9米长的陪葬沟内，出土武士俑84件、陶牛46件、陶羊125件、陶猪23件。此陪葬沟的西北角于1950年曾遭破坏，出土彩绘陶俑多已散失，只有少数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内。

汉景帝阳陵 位于渭城区正阳乡四沟村北800米的原上。为汉文帝刘恒之子景帝刘启的陵墓。景帝后元三年（前141）二月癸酉葬。

刘启（前188—前141），字开，西汉第四位皇帝。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16年。在位期间继续实行“与民休息”政策，进行“削藩”，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巩固了中央集权。旧史家把他和文帝统治时期并举，称为“文景之治”。死年42岁，葬于阳陵。

阳陵西距长陵6公里，是咸阳原上9座西汉帝陵中最东面的一座。陵区范围向北伸进泾阳县高庄乡，向东伸至高陵县马家湾乡。

景帝陵封土堆为覆斗形，底部边长160米，顶部南北长55米，东西宽54米，封土高31.8米。陵东北450米处有一陵冢，形制与景帝陵相同。清陕西巡抚毕沅树碑以为“汉惠帝安陵”，实为景帝王皇后陵。王皇后陵底部边长160米，顶部边长45米，封土高25.2米。

景帝陵和王皇后陵各置一座陵园，平面均为方形。景帝陵园边长410米，

陵园四面中央各辟一门，各门距帝陵封土均为110米。门外各有双阙，形制大小基本相同，惟北边门阙今已铲平。东、西二门阙底部东西20米，南北40米，高4.15米。南门阙底部东西20米，南北10米，高5米。二阙址间相距12—14米。在东阙门中间原有1米宽的河卵石路面，直达陵前。王皇后陵园亦为方形，边长320米，陵园四门阙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遗址保存较好。以南门外阙址为例，每个阙址底部东西40米，南北20米，高4米。每座门门外阙址间距12米。景帝和王皇后陵园门道和阙址附近均露出墙壁、柱洞、铺砖、卵石散水等。文化层堆积中有汉代板瓦、筒瓦、瓦当和铺地砖等建筑遗物。瓦当中有云纹和“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瓦当。在阳陵南约400米处，有一汉代建筑遗址，东西长120米，南北宽80米，疑为景帝庙“德阳宫”遗址。遗址内有“十”字形凹槽石板，俗称“罗经石”。

阳陵陪葬墓群主要分布在陵园之东大约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500米范围内，共30余座。阳陵北面只有两座陪葬墓。据文献记载，景帝废太子刘荣之母栗姬之墓在王皇后陵北100步，今阳陵以北830米，泾阳县高庄村南有一大冢，覆斗形，底部东西60米，南北55米，封土高20米，疑即栗姬之墓。此外，李广从弟李蔡、苏武之父苏建等亦葬于阳陵附近。

70年代，在阳陵西北1.5公里处发现刑徒墓地。90年代初，在景帝陵东南、北距王皇后墓300米处发现陪葬俑坑。经过发掘清理，均出土了一批重要遗物。

汉武帝茂陵 位于兴平县南位乡策村南1公里处。为汉武帝刘彻的陵墓。武帝后元二年（前87）三月甲申葬。

刘彻（前156—前87），字通，景帝之子，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为西汉第五位皇帝。统治期间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采用法术、刑名，以加强统治。曾派唐蒙去夜郎，在西南建立了7个郡；派卫青、霍去病征匈奴，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并发展了经济文化交流。同时兴修水利，推广铁器，实行“代田法”，从而开创了西汉王朝的鼎盛局面。71岁时死于五柞宫，葬茂陵。

茂陵是咸阳原上9座西汉帝陵中最西面的一座。此陵始建于建元二年（前139），历时53年而成，是西汉诸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因陵地在当时槐里县茂乡，故名茂陵。

茂陵为覆斗形，全用夯土筑成。底部东西231米，南北234米，顶部东

西 39.5 米，南北 35.5 米，封土高 46.5 米。陵园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430 米，南北宽 414 米，墙基宽 5.8 米。园墙四面中央各辟 1 门，门外置双阙，今东、西、北土阙尚存，高 3 米，宽 9 米，长 38 米，为夯筑。阙内有瓦砾、红烧土和被火烧过的砖瓦。陵西北 500 米处为李夫人墓。经实测，封土底部东西 90 米，南北 120 米，顶部平面方形，边长 19.5 米，封土高 24.5 米。中腰内收成二层台，台面东西两面各宽 3.5 米，南北两面各宽 4.5 米。无垣墙。

茂陵东南 1 公里处发现大型汉代建筑遗址，出土遗物有朱雀纹、玄武纹、青虎纹、白虎纹空心砖，字纹瓦当和琉璃璧等。推测这里可能是当时寝殿所在。另外，附近还出土了铜犀牛尊和鎏金兽头银盘等珍贵文物。在茂陵东南豆马村附近，发现西汉建筑基址、石子路面、五角形陶水管道和拐角陶水管道等遗物，推测这里可能是茂陵邑遗址。

茂陵的陪葬墓主要分布在陵墓以东。地面现存封土的陪葬墓共 12 座。据文献记载，陪葬于茂陵的有卫青、平阳公主、霍去病、金日磾、霍光、董仲舒、公孙弘、李延年、上官安、上官桀以及京兆尹曹氏等。现方位比较明确的有霍去病墓（即今茂陵博物馆所在地）、董仲舒墓（传为茂陵东北约 650 米处的“次冢”）、霍光墓（传为茂陵东南 2 公里处 5 座并列墓冢的最东面一座）和平阳公主墓（5 座并列墓中最西面的一座）。平阳公主墓的一座从葬坑已经发掘，出土甚富。整个茂陵陵园的考古钻探尚在继续进行，初步已知陵园内有多处陪葬俑坑。

汉昭帝平陵 位于秦都区平陵乡小寨村东 1 公里处。为汉昭帝刘弗陵的陵墓。元平元年（前 74）六月壬申葬。

刘弗陵（前 94—前 74），字不，汉武帝之子。母为钩弋夫人。8 岁即位，为西汉的第六位皇帝。公元前 87—前 74 年在位。统治期间，由霍光、桑弘羊等辅政。移民屯田，多次派兵击败匈奴、乌桓，加强了北方的防卫。始元六年（前 81），曾召开盐铁会议。21 岁时病死，葬平原乡，陵称平陵。

平陵东南为上官皇后陵。平陵与上官皇后陵以往被误认为汉哀帝义陵和汉平帝康陵，陵前尚存清陕西巡抚毕沅书立的哀帝义陵和平帝康陵的记墓碑。《三辅黄图》云：“昭帝平陵，在长安西北七十里，去茂陵十里。”今实测距茂陵 12 里。当以此为是。

平陵为覆斗形。底边长 160 米，顶边长 49 米，封土高 29 米，位于陵园正中。上官皇后陵位于平陵东南 465 米处。封土底部平面为方形，边长 150 米。顶部平面为长方形，东西 25 米，南北 30.5 米，封土高 26.2 米。

昭帝与上官皇后陵各有陵园。帝陵陵园平面为方形，边长约 370 米。四周有墙基，墙中央各辟一门，门距封土 110 米。门道有路土遗址。东门和南门外两对阙址尚存。每对阙址两阙间距 16 米，每个阙址面宽 29 米、进深 6 米、残高 1.6 米。皇后陵陵园平面亦呈方形，边长约 400 米，面积较帝陵大。陵园四门外置双阙，两阙间距 16 米，每个阙址面宽 25 米，进深 6 米，残高 3.5 米。阙内为门，门距封土 125 米。帝陵和皇后陵陵园西北角均发现较大的夯土建筑遗址。两陵之间，有一条连接两陵的东西大路，路宽 5 米，考古工作者曾在此路两侧分别发现了东西向排列的成组玉器。

平陵邑位于陵园东北今李都村、庞村一带。陵邑遗址内发现当时制陶、制骨作坊遗迹和部分建筑遗址，出土遗物有板瓦、瓦当、残陶器、铜鼎、铁铍、铁逼土和骨料等。

平陵东南今肖家堡村北，当是汉昭帝“徘徊庙”遗址。庙建于 3 米高的夯土台上，今台上仍有汉代板瓦、筒瓦及几何纹方砖、凤纹空心砖与“长生无极”瓦当等。

平陵陪葬墓在陵东侧，今封土较完整的有 11 座，封土不全的 12 座（其中 1 座在陵北）。据文献记载，陪葬平陵的有窦婴、夏侯胜、朱云、张禹和韦贤等，但名位难考。

汉元帝渭陵 位于渭城区周陵乡新庄村西南约 600 米处。为汉元帝刘奭的陵墓。竟宁元年（前 33）七月丙戌葬。

刘奭（前 76—前 33），宣帝之子。公元前 49—前 33 年在位。为西汉的第八位皇帝。爱好儒术，先后任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等为丞相。宦官弘恭、石显专权，任石显为中书令，赏赐达钱一万万。统治期间赋役繁重，西汉开始由盛而衰。43 岁时死，葬渭城寿陵亭部原上，陵称渭陵。

渭陵封土为覆斗形，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方形，底边长 175 米，顶边长 50 米，高 25 米。渭陵西北 380 米处墓冢为王皇后陵。皇后陵封土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方形，底边长 90 米，顶边长 36 米，封土高 13.5 米。以往以渭陵为汉昭帝平陵，以王皇后陵为周康王陵，均误。

渭陵陵园平面近方形，边长 400—410 米。陵园墙基宽 4.5 米，四门阙址保存尚好。每座门外二阙间距 14—16 米，每个阙址现存台基面宽 46 米，进深 10 米，残高 2 米，门址距封土均约 110 米。王皇后陵园称“长寿园”。陵园平面亦为方形，边长约 300 米。周辟四门，门址离封土各为 135 米。门外有双阙，二阙间距 15 米。现存阙址台基面宽 33 米，进深 13 米。门阙遗址附

近堆积大量汉代砖瓦，其中有“长生无极”、“长乐未央”文字瓦当。

在渭陵北 300 米处发现一建筑遗址，东西长约 200 米，南北宽约 100 米，建筑墙基、平面方砖、居住面和路面遗迹犹存，并出土了一批精美的玉雕和其它遗物。此处当为礼制建筑。

渭陵东北 350 米处有一残冢，俗称“塌塌冢”。东西长 170 米，南北宽 150 米，高 2 米，当是傅昭仪的墓冢。傅昭仪是汉哀帝的祖母，哀帝即位后下令以皇后礼仪将其祖母葬于渭陵。哀帝死后，王莽执政，借口傅昭仪“冢高与元帝山齐”（《汉书·外戚传》），调集 10 万余人，历时 20 余天，夷平了傅昭仪墓。故现存低矮的陵冢，当是被平掉的残冢。

渭陵陪葬墓群在陵东北 500 米左右。陪葬墓排列有序，东西 4 行，每行 7 座，俗称“二十八宿墓”。现存墓冢 12 座。《咸阳县志》又称这些墓为“七妃墓”。“七”当言其多，实不止“七妃”。可能是元帝妃嫔的墓。这个墓区曾发现一些建筑遗址。出土了“长生无极”、“长乐未央”和“永奉无疆”文字瓦当，以及汉代砖瓦和散水卵石。在渭陵南约 550 米处东西排列着 5 座汉墓，因距渭陵较近，疑为渭陵的陪葬墓。据文献记载，陪葬渭陵者有王凤、王莽妻子和冯奉世等，但今名位难考。王莽的妻子死后谥曰“孝睦皇后”，葬于渭陵长寿园之西，“名陵曰亿年”。渭陵附近出土过“亿年无疆”文字瓦当，可能为“亿年陵”遗物。

汉成帝延陵 位于渭城区周陵乡郭旗寨村北 1 公里处。为汉成帝刘骜的陵墓。绥和二年（前 7）四月己卯葬。

刘骜（前 51—前 7），字太孙，元帝之子。20 岁即位，公元前 33—前 7 年在位。为西汉的第九位皇帝。时值国势衰弱，民不聊生，却不关心国事，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45 岁时死，葬延乡，陵称延陵。

延陵封土形如覆斗，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方形，底部边长 173 米，顶部边长 51 米，封土高 31 米。陵顶中部塌陷，深约 3 米。陵园略呈方形，东西 382 米，南北 400 米。周辟四门，门外置双阙。二阙间距 12 米。今除南门东阙已毁外，其余门阙遗迹犹在。阙址台基面宽 48 米，进深 13 米，高 3 米。陵园南门附近曾出土过排列整齐的玉圭。

据文献记载，葬在延陵附近的成帝后妃有许皇后、赵皇后、班婕妤和马氏二婕妤等。许皇后为许嘉之女，后因故被废，成帝赐药自杀，“葬延陵交道厩西”。今陵西（偏北）二里有一大冢，疑为许皇后冢。班婕妤为班况之女，成帝死后，“充奉园陵”，死后遂葬在延陵附近。《重修咸阳县志》载

“班婕妤墓在延陵北一里许”。今延陵东北 652 米处有一大冢，形如覆斗，封土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方形，底部边长 80 米，顶部边长 30 米，封土高 14 米。旧以为“周恭王陵”，墓冢前尚有毕沅书立的“周恭王陵”碑。因“周陵”不在咸阳原上，故此陵亦不会是周恭王陵。当地人称其为“丑女子坟”或“丑娘娘坟”。“丑”疑为“愁”。班婕妤受赵皇后迫害，“退处东宫”，成帝死后又“奉充园陵”，终日处于愁苦之中，故其死后，世传其墓为“愁女子坟”或“愁娘娘坟”。

延陵陪葬墓大多分布于陵东 1500 米的地方，今五冢村南、黄家窑东北仍保存着 7 座陪葬墓的封土。

汉哀帝义陵 位于渭城区周陵乡南贺村东南 1 公里处。为汉哀帝刘欣的陵墓。元寿二年（前 1）九月壬寅葬。

刘欣（前 26—前 1），字喜，定陶王刘康之子。成帝无子，立其侄刘欣为帝。公元前 7—前 1 年在位，为西汉的第十位皇帝。执政期间，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自己又昏庸无能，26 岁时便结束了性命。死后葬义陵。

义陵封土形如覆斗，封土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方形。底部边长 175 米，顶部边长 55 米，封土高 30 米。陵园平面为方形，边长 420 米，今垣墙残高 1 米左右、宽约 0.7 米。北垣墙正中现存一门阙，其余三面垣墙门阙都已无遗迹可寻。

陵园东北 620 米处有一冢，为覆斗形，底部东西长 100 米，南北长 85 米，顶部东西长 30 米，南北长 17 米，封土高 19 米。此墓疑为傅皇后墓。哀帝死后，傅氏失势，傅皇后退就桂宫，月余废为庶人，就其园自杀。可能被葬于义陵。

义陵陪葬墓现存封土者有 15 座，其中分布在陵东北的 3 座，南边 5 座，西部 4 座，另有 3 座分别在义陵东、北和西南。据文献记载，陪葬义陵的有董贤。董贤被封为高安侯，义陵附近出土汉代“高安万世”文字瓦当，当是哀帝为董贤在义陵所修茔地建筑的遗物。哀帝死后，王莽专权，董贤及妻子自杀而亡，“因埋狱中”。（《汉书·佞幸传》）哀帝为董贤所修的“寿墓”方位不明。

汉哀帝义陵旧误作隋恭帝义陵。

汉平帝康陵 位于渭城区周陵乡北大寨村东 1 公里处。为汉平帝刘行的陵墓。元始五年十二月（6 年 1—2 月）葬。

刘行（公元前 8—公元 6），字乐，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刘兴之子。公元

1年至5年在位，为西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在位期间，政权为王莽所把持。元始五年十二月丙午被王莽毒死。葬康陵。

康陵陵冢形如覆斗，封土底部东西长216米，南北宽209米。顶部平面为方形，边长60米，封土高26.6米。陵墓封土接近顶部，内收成台，台面东西两边各宽6米，长93米；台面南、北两边各宽11.5米，长90米。台面与封土顶部垂直距离5.5米。陵冢通高30.5米。此形制在汉陵中较为特殊。康陵园平面为方形，边长420米。

康陵东南570米，今咸阳市农科所院内有一陵墓，封土形如覆斗，封土底部和顶部均为方形，底部边长86米，顶部边长33米，封土高10米。旧传为周成王陵，实应为汉墓。除封土形制可以说明这一点外，封土附近出土的大量西汉时期砖瓦等遗物亦是重要佐证。从其位置来看，应为平帝王皇后的陵墓。

前秦国王苻坚墓 位于彬县水口乡九田村西，传为十六国时前秦国王苻坚的葬地。约葬于前秦太安元年（385）。

苻坚（338—385），字永固，略阳郡临渭县（今甘肃省天水市东）氏人。前秦帝苻生寿光三年（357），苻坚杀苻生自立，去帝号，称“大秦天王”。357—385年在位。他励精图治，用武力统一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威服西域，企图乘胜一举消灭东晋偏安政权，统一中国。不料淝水之战，大败而归。各首领乘机叛离，前秦瓦解，他携带妻子出奔至今礼泉县北五将山，企图东山再起，卒被姚萇所擒，缢死于新平郡（治今彬县）今大佛寺之南不远处。

苻坚墓居一低洼的土田内。墓坐南向北，茔域占地约140平方米。因地面所存封土一头高为3米，东西宽7米，另一头高约2米，东西宽仅3米，墓的南北长度为21米，故呈一横宽纵狭的平面，形状像一个角锥体，当地习称为“长角冢”。今墓前犹存墓碑一通，上题“前秦国王苻坚之墓”。苻坚《晋书》有载记。

北周武帝孝陵 位于渭城区底张镇陈马村南。为北周武帝宇文邕的陵墓。北周宣政元年（578）葬。

宇文邕（543—578），鲜卑族。560—578年在位。周明帝武成二年（560）即位后，堂兄宇文护专权。天和七年（572）杀宇文护，始亲政。禁止佛道两教，使寺院占有的大量人口向国家纳税服役。建德六年（577）灭北齐，拥有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为后来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建德七年（578）病死于

北征归程中，死后葬孝陵。

周武帝一生节俭，遗诏墓而不坟，地面无明显标记。近年发现周武帝皇后阿史那氏墓志，由志文中皇后“合葬于孝陵”之语，始知孝陵方位。经发掘清理，发现该墓为一座南北向的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单室墓。墓道长31米，有2米见方的天井5个，在第四、五号天井两侧各有两个壁龛。墓室平面呈“凸”字型，约5米见方，顶部已坍塌。在墓室甬道口发现一合85厘米见方的石墓志，志盖盃顶素面无文，志石镌9个篆书大字：“大周高祖武皇帝孝陵”。墓室内东西各置一套木质棺槨，东边一套是皇后阿史那氏的，已遭破坏；西边一套是周武帝的，棺底部遗迹尚存，棺内骨骸散乱，残留有股骨、盆骨、下颌、肋骨等。从棺底遗迹可知葬地铺垫着缀有金丝的丝织品。因墓室多次被盗（墓顶有盗洞9个），仅遗有珍珠、玛瑙珠、小金饰件及龙首三足铜铏斗等少量物品。惟天井壁龛遗物较多，有甲马及鞍马武士俑、文吏俑、侍女俑约180余件，另有丝织品、玉器、玻璃珠、革带、铜带扣等装饰品及陶制模型冥器如屋、仓、灶、井、磨、碓等，总计出土遗物300余件。

据《北史》记载，北周5位皇帝中，孝闵帝宇文觉葬静陵，明帝宇文毓葬昭陵，武帝宇文邕葬孝陵，宣帝宇文赟葬定陵，静帝宇文阐葬恭陵。但均未记载葬地。武帝孝陵以西已知其为北周重臣葬地，北周诸陵亦当在渭城区底张镇一带。

隋文帝泰陵 位于杨陵区五泉乡王上村东，为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合葬陵。因隋朝皇帝姓杨，俗称其陵为“杨家陵”，今杨陵区即得名于此。文帝葬于仁寿四年十月十六日（604年11月13日）。

杨坚（541—604），隋朝开国皇帝。弘农郡华阴县（今属陕西）人。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女为宣帝皇后。静帝年幼即位，他任丞相，总揽朝政，封隋王。大定元年（581）废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开皇九年（589）灭陈，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局面，统一全国。581—604年在位，致力于恢复经济，加强中央集权。仁寿四年（604）卒，葬泰陵。

泰陵陵园现已基本毁坏，惟北城残墙尚存，长约130余米，最高处1.2米，宽5.5米，夯层清楚。经钻探，陵园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总面积约4.9万平方米。四周垣墙中部均发现有砖瓦残片，当为四面城门建筑遗存。城垣四角，亦有砖瓦残片，说明曾建有角楼。陵冢位于陵园中部偏南处。冢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底部东西残长166米，南北宽160米，顶部平坦，东西长48米、南北宽38米，冢高27.4米。

《隋书·后妃列传》载：“文献独孤皇后仁寿二年（602）八月葬于泰陵。”两年后，文帝死，“合葬于泰陵，同坟而异穴。”此与汉陵合葬形式不同。

唐高祖献陵 位于三原县徐木乡永和村东南。为唐高祖李渊的陵墓。贞观九年十月二十七日（635年12月12日）葬。

李渊（566—635），唐代开国皇帝。祖籍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省秦安县），贵族出身，袭封唐国公。隋大业十三年（617）任太原留守。乘隋末农民大起义之机起兵反隋，逼隋帝杨侑让位，建立唐朝。618—626年在位。

献陵陵冢形如覆斗，底部东西130米，南北110米，顶部东西30米，南北10米，高19米。陵园地跨三原、富平两县，规模较大。陵园遗存石虎5个，华表1对，石犀1对，除1虎、1犀移置西安碑林外，余均在原地。

献陵陪葬墓集中分布于陵东北。地面现存封土30个，墓区东西4000米，南北1500米。据《长安志》载，内有诸王墓16座，公主墓1座，大臣墓6座，现已发掘的和有墓碑的，计有李凤、李寿、李孝同、臧怀恪、臧怀亮、樊兴及房陵大长公主等，其他名位难以考定。

唐太宗昭陵 位于礼泉县昭陵乡九峻山上，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649年9月29日）葬。

李世民（599—649），李渊次子。李渊即位后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武德九年（626）发动玄武门之变，立为太子，继即帝位。626—649年在位。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经济恢复，社会安定，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二十三年（649）病死。葬昭陵。

昭陵始建于贞观十年（636），始开唐代皇帝“以山为陵”之例，是关中唐十八陵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陵墓。陵墓依山势突兀的九峻山主峰而建，海拔1187.6米。陵园规模巨大，以九峻山主峰为基点，自北向南，呈扇形展开，地跨今礼泉县昭陵、烟霞、北屯及赵镇等4个乡镇，面积约2万公顷，周回达60公里。陵园内陪葬墓众多，除封土已被夷平无法统计者外，尚存180余座，是中国古代帝陵陵园中陪葬墓最多的一座。

昭陵陵山以北约500米的土梁上，为北司马门和寝殿遗址。遗址南高北低，内有大量唐代砖瓦（有刻文），还有明清时期的祭陵碑。著名的“昭陵六骏”和十四国酋长石像曾置于此。陵山南约800米的皇城村土梁上有一唐代建筑遗址，疑即献殿。殿址长宽约40米，殿内铺地砖及断垣上的壁画痕迹尚存，此处曾出土过高130厘米、底长100厘米、宽65厘米的鸱尾。当年献殿的规模于此可知。陵山西南约1150米的皇坪村有一唐代建筑遗址，疑为下

宫。遗址东西 237 米、南北 334 米，四周墙基约 3.5 米。陵山山腰东、西、南三面均凿有窑洞，其中东、西两面各为两组数孔，南面仅一孔。东面 8 孔为石砌，西面 8 孔为土洞，南面一孔有封门石，东、南窑中均有壁画遗痕。此外，在陵山东南至西南，还发现当年“缘山傍岩，架栈为楼道”的小石洞和牛鼻形穿孔石遗迹。

昭陵以石刻闻名于世。其北司马门内有唐高宗为“阐扬先帝徽烈”而令匠人琢石雕刻的十四国酋长石像，石像今已不存，仅遗石像座题名 7 种。现在昭陵博物馆陈列。北司马门内两廊竖有特勒骠、飒露紫等六匹骏马的六块石板浮雕。其中“飒露紫”、“拳毛騧”两件已于 1914 年被偷运至美国陈列，其余 4 件现藏西安碑林。在昭陵陵山以南 9 公里的赵镇后寨村遗有石狮一对，现已移西安碑林陈列。从其大小形制看，当为昭陵陵园或兆门门狮。

昭陵陪葬墓中，分布于山上者地位较高，如韦贵妃、长乐公主等，墓冢均依山为陵或作覆斗形。山下陪葬墓分布则一般按死者埋葬年代，年代越早，离山越近。其冢形除李勣、李靖二墓作山形外，余均为覆斗形、圆锥形。陪葬墓中有不少从葬和祔葬墓，往往一个家族一个墓地，故葬于昭陵陵园者，远远不止文献所载之数。陪葬墓前当年都有石刻，大多今已损毁。从仅存的一些墓前石刻看，覆斗形墓一般靠墓前有石人一对，再南东列石羊 3 只，西列石虎 3 只，再南有石柱一对，再南有石碑一通；山形冢一般冢前有石人一对，再东列石羊 3 只，西列石虎 3 只，再南有石碑一通；圆锥形冢前一般为石羊、石虎和石碑。从调查和清理发掘的墓葬看，大多数墓前各有石碑，墓内均有墓志。现已发现陪葬墓碑 42 通，墓志 45 合。昭陵博物馆已专辟“昭陵碑林”，以保存和陈列这些石刻。

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 位于乾县乾陵乡梁山上。为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的合葬陵。高宗葬于光宅元年八月十一日（684 年 9 月 25 日），武则天葬于神龙二年五月十八日（706 年 7 月 2 日）。

李治（628—683），字为善，唐太宗第九子，太子承乾被废后，得母舅长孙无忌之助，被选为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死后即位。649—683 年在位。武则天（624—705），名曩，祖籍并州文水县（今山西省文水县），太宗时为才人，太宗死后，削发为尼，居感业寺。高宗幸感业寺，见而悦之，复召入宫。不久立为昭仪，进号宸妃。永徽六年（655）为皇后，参与朝政。高宗晚年多病，政事多委托武后处理。上元元年（674），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天下谓之“二圣”。高宗死后，武后临朝称制，天授元年（690）九

月改国号为“周”，加尊号为“圣神皇帝”，是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女皇帝。684—705年在位执政。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发动政变，拥立中宗复位。同年十一月武则天死于洛阳，临终遗嘱去皇帝尊号。光宅元年（684）高宗葬于乾陵，神龙二年（706）武后与高宗合葬。乾陵是世界历史上惟一埋葬着一对夫妻、两朝皇帝的陵墓。

乾陵所在的梁山海拔1047.5米，东有豹谷，西有漠谷，山岭有三，北峰乾陵最高，呈圆锥形，南面二峰较低，东西对峙，其上各有土阙，俗称“乳峰山（奶头山）”。乾陵以山为阙，气势雄伟，此为唐陵中所仅见。

据《长安志图》记载，乾陵陵园原有内外两重墙垣。经调查勘探，内城城墙、四门、献殿和城墙角遗迹已经发现。内城南北城墙各长1450米，东城墙长1582米，西城墙长1438米，墙厚2.4米，陵园内城总面积240万平方米。城墙四面有城门，南为朱雀门，北为玄武门，东为青龙门，西为白虎门。四门形制略同，门址均宽约2.7米。朱雀门北一片空地上有残砖、瓦等建筑材料，疑为献殿遗址。

1962年曾经对乾陵进行了试掘，寻出了墓道。墓道长63.1米、宽3.9米，全用石条填砌，从墓道口至墓门共39层石条，各层石条均用铁栓板固定，并灌注白铁，与《新唐书》所谓“乾陵玄阙石门，冶金固隙”的记载相合。据有关资料分析，乾陵是关中18座唐陵中惟一未被盗掘过的陵墓。

乾陵的地面遗物主要是石刻。这些石刻都集中在朱雀门外。从南面第一对土阙起，向北有石柱、飞马、朱雀（鸵鸟）各1对，石马5对，石人10对。四门外各有石卧狮1对，北门外有石马3对。另外，在朱雀门外东西两边分别还有一座丰碑：其东者碑首浮雕九螭下垂，碑侧线刻大龙云纹，因上无一字，故称“无字碑”；其西者俗称“七节碑”，上层作屋顶，下层为碑座，中间五层镌刻武后所撰、中宗所书的颂扬高宗文治武功的碑文，即“述圣记碑”。两碑之北有61个“蕃酋”石像，东31个，西30个，均穿紧袖衣，束宽腰带，足蹬皮靴，身背刻国名、官爵及姓名，衣饰上的异域和少数民族特点十分突出。这些雕像虽然头部均于建国前被毁，但看去体形雄伟，生动有力，显示了盛唐时期高超的雕刻技艺。

据《唐会要》载，乾陵有陪葬墓16座，这些陪葬墓封土基本完好，个别墓前还遗存一些石刻。60年代以来，国家重点发掘了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及懿德太子等陪葬墓，并在永泰公主墓地建立了乾陵博物馆，供参观游览。

唐肃宗建陵 位于礼泉县建陵乡五将山上。为唐肃宗李亨的陵墓。广德

元年三月二十七日（763年5月14日）葬。

李亨（711—762），玄宗子。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发生，次年玄宗逃往四川，他于灵武即位。756—762年在位。在收复长安、洛阳，平定藩镇叛乱中，助长了宦官势力。宝应元年（762），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拥立太子李豫（即唐代宗），他忧惊而死。葬建陵。

建陵依山为陵，陵园遗迹尚在。城垣基本呈方形，东长1524米，西长1373米，南长1050米，北长878米。地跨礼泉县建陵、昭陵二乡，面积15万平方米。城阙四门外各有石狮一对。陵前尚存800平方米的献殿遗址。司马道两侧今存华表1对，翼马1对，鸾鸟1对，石人10对，石鞍马5对，每马左前方各有牵马人1个，均是武士装饰，这在唐陵石刻中是少见的。陵前各类石刻较其以前唐诸陵体形略小，但其雕刻技巧已超出前代各陵。又由于沿山沟壑纵横，游人比较稀少，因而成为现在保存石刻最多最完整的一座唐陵。

据《唐会要》载，建陵陪葬墓仅尚父汾阳王郭子仪，又传有汧国公李怀让。今均夷为平地，无从考稽。

唐德宗崇陵 位于泾阳县蒋路乡石马巷村嵯峨山南麓，为唐德宗李适的陵墓。永贞元年十月十四日（805年11月8日）葬。

李适（742—805），代宗子。代宗时为兵马元帅，讨史朝义，平定河北。大历十四年（779）即位。779—805年在位。在位期间改租庸调为两税法并征收间架税、茶税等，加强搜刮。对藩镇割据采取裁抑政策，但无成效。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长安被朱泚占领，他一度逃往奉天（今乾县）；后又发生李怀光之乱，他又逃到汉中。自此朝政日衰。死后葬崇陵。

陵墓位于居高临下山环水抱的石山坳中，墓冢高突，完全用开凿的青石块砌叠，嵌凿石槽，浇灌生铁汁，卡有铁栓板，异常坚固。陵园周长20公里，陵前石刻多有损坏。自陵前朱雀门向南为石人10对（全残。左为文臣，右为武将），石马5对（存9全残），朱雀（鸵鸟）1对，翼马1对，石柱1对。四门均有石狮1对，北门外又有石马3对（残甚）。朱雀门西存石础3个，旁有一石人无头而仆，身穿斗篷，疑为原8尊立像之一。

唐敬宗庄陵 位于三原县陵前乡柴家窑东。为唐敬宗李湛的陵墓。太和元年七月十三日（827年8月9日）葬。

李湛（809—826），穆宗长子。始封鄂王，徙封景王。长庆二年（822）立为皇太子，长庆四年（824）即皇帝位。824—826年在位。在位期间游宴无

度，荒于国政。宝历二年（826）为宦官刘克明等杀害，年仅18岁。葬庄陵。

庄陵封土为方形土丘，高12米，直径31米。现存石刻仅有陵南倒地石柱1对，石马1对，翼鸟1对，石人6个及四门石狮各1对。

据《唐会要》载，庄陵陪葬墓1座，为悼怀太子李普。庄陵东北800米处有一陪葬墓，疑即李普葬地。

唐武宗端陵 位于三原县徐木乡桃沟村东，为唐武宗李炎的陵墓。会昌六年八月三日（846年8月28日）葬。

李炎（814—846），原名灋，穆宗第五子。27岁即位。在位期间，不仅抑制藩镇势力，而且坚决反对佛教。在会昌五年（845）的灭佛运动中，共废毁大、中寺院4600多所，小寺院（招提、兰若）4万多处，还俗僧尼26万人，没收肥沃良田数千万顷，解放寺院奴婢15万人，大大削弱了佛教在全国的影响。840—846年在位。死后葬端陵。

端陵陵园东西540米，南北593米，四个角阙虽已夷平，但东南、西南和西北三个角阙遗迹尚可看出。陵冢在陵园中部系积土为冢，陵台底东西58米，南北60米，高15米。陵前石刻现存石柱1个，翼马和仗马各2个，石人4个，皆残损仆地，鸵鸟1个，已移置西安碑林。另有四门石狮2对。

据《新唐书·后妃传》载，武宗之妃王氏审帝已崩，即自刭幄下，人皆为之感动。宣宗即位，嘉其节，赠贤妃，葬端陵。墓址无考。

唐宣宗贞陵 位于泾阳县白王乡崔黄村北的仲山南麓。为唐宣宗李忱的陵墓。咸通元年二月十五日（860年3月11日）葬。

李忱（810—859），宪宗第十二子，武宗李炎的叔父，武宗死后以皇太叔即帝位，执政期间，“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资治通鉴》语）。846—859年在位。死后葬贞陵。

贞陵依山营造，墓冢突兀，今司马道两侧尚存石柱1对，翼马1对，鸵鸟1只，石马5对，石狮4对，石人13尊，皆残损。另有宋开宝元年（968）所立的《大宋新修唐宣宗庙碑》1通。

唐僖宗靖陵 位于乾县铁佛乡南陵村东，为唐僖宗李儂的陵墓。文德元年十月二十七日（888年12月4日）葬。

李儂（862—888），初名俨，立皇太子后改名儂。懿宗第五子。咸通十四年（873）即位。873—888年在位。翌年爆发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僖宗两次被挟持逃往成都。文德元年（888）二次回到长安，不久即死。

死后葬靖陵。

靖陵居陵园中部，为覆斗形封土冢，底、顶皆方形。底边长40米，高8.6米。顶边长8米。陵前石刻大部沉埋地下，地面残存石柱1对（皆仆地），翼马1对，石狮1对，石人2个。陵园呈方形，边长480米，其东北、西北和西南角阙址遗迹尚在。靖陵陪葬墓史无记载。

咸阳境内历代帝王陵墓一览表

表5-1

朝代名 (国名)	墓主姓名	庙号 谥号	卒年 (公元)	葬年 (公元)	陵号	葬地	备注
西 周	姬诵	成王				咸阳北原	位置不明，一说在西安市西南鄠坞岭
	姬钊	康王			有陵	咸阳北原	
	姬繁	共王				咸阳北原	位置不明
	姬赧	懿王				兴平	
(秦)	嬴驷	惠文王	前311	前311	公陵	渭城区周陵乡	旧误为周文王陵
	嬴荡	悼武王	前307	前307	永陵	渭城区周陵乡	旧误为周武王陵
西 汉	刘邦	高祖	前195	前195	长陵	渭城区窑店乡	
	刘盈	惠帝	前188	前188	安陵	渭城区韩家湾乡	
	刘启	景帝	前141	前141	阳陵	渭城区正阳乡	
	刘彻	武帝	前87	前87	茂陵	兴平县南位乡	
	刘弗陵	昭帝	前74	前74	平陵	秦都区平陵乡	旧误为汉哀帝义陵
	刘奭	元帝	前33	前33	渭陵	渭城区周陵乡	旧误为汉昭帝平陵
	刘骞	成帝	前7	前7	延陵	渭城区周陵乡	旧误为周恭王陵
	刘欣	哀帝	前1	前1	义陵	渭城区周陵乡	旧误为隋恭帝义陵
	刘衍	平帝	6	6	康陵	渭城区周陵乡	旧误为周成王陵
前秦	苻坚	世祖	385	385		彬县水口乡	
北齐	高纬	后主	580	580		咸阳北原洪滨川	位置不明
	高恒	幼主	580	580		咸阳北原洪滨川	位置不明

续表 5-1

朝代名 (国名)	墓主姓名	庙号 谥号	卒年 (公元)	葬年 (公元)	埋葬 情况	葬地	备注
北 周	宇文觉	孝闵帝	557		静陵	渭城区底张镇一带	位置不明
	宇文毓	明帝	560		昭陵	渭城区底张镇一带	位置不明
	宇文邕	武帝	578	578	孝陵	渭城区底张镇	在陈马村南
	宇文赟	宣帝	580	580	定陵	渭城区底张镇一带	位置不明
	宇文闳	静帝	581	581	恭陵	渭城区底张镇一带	位置不明
隋	杨 坚	文帝	604	604	泰陵	杨陵区五泉乡	
唐	李 渊	高祖	635	635	献陵	三原县徐木乡	
	李世民	太宗	649	649	昭陵	礼泉县昭陵乡	
	李 治	高宗	683	684	乾陵	乾县乾陵乡	合葬
	武则天 (武曌)	神圣皇帝	705	706			
	李 亨	肃宗	762	763	建陵	礼泉县建陵乡	
	李 适	德宗	805	805	崇陵	泾阳县蒋路乡	
	李 湛	敬宗	826	827	庄陵	三原县陵前乡	
	李 炎	武宗	846	846	端陵	三原县徐木乡	
	李 忱	宣宗	859	860	贞陵	泾阳县白王乡	
李 儼	僖宗	888	888	靖陵	乾县铁佛乡		

第二节 名人墓

姜嫄墓 位于彬县炭店乡水北村东，西距县城 5 公里。传说是古代姜嫄的葬地。

姜嫄，一作姜原。周族始祖后稷之母，有郤氏之女。一说为帝喾之妻。

姜嫄墓前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书立的“姜嫄圣母墓碑”。再前有水一潭，名叫“响潭”。潭对面有平地一区，俗称“拜家凹”，传说系昔日春秋致祭之处。

公刘墓 位于彬县龙高乡土陵村南。传说是周族祖先公刘的葬地。

公刘，传为后稷的曾孙，周文王的十代祖。夏代末年，公刘不辞劳苦，努力恢复后稷的事业。他率领周族迁移到豳，观察地形水利，开垦荒地，安定居处，周族由此逐渐振兴起来。后来受到历代人们的赞颂。

公刘墓似依山为陵，墓丘长 1500 米，丘垅高约 50 米，略呈梯形平面，至顶平坦。墓周占地达 500 余亩。南有泾水潏洄，山谷倒映，草色浮动；北为连绵不断、起伏隐显的丘陵与村落；东、西两旁是高山峻岭，峰峦叠障。公刘墓因其地形庞厚，势如蟠龙，故有“周墓蟠龙”之称。

白起墓 位于渭城区任家嘴村北三五三〇厂院内。战国时秦国大将白起的葬地。约葬于秦昭王五十年（前 257）。

白起（前？—前 257），一称公孙起。秦国名将。郿邑（今陕西眉县）人。屡战获胜，夺得韩、魏、赵、楚很多土地。秦昭王二十九年（前 278），攻克楚都郢，因功封武安君。长平之战大胜赵军，坑杀俘虏 40 多万人。后为相国范雎所妒嫉，意见不合，被逼自杀。《史记》有传。记载：“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遂自杀。”可知葬地即秦国杜邮亭附近。

白起墓封土呈圆形，高 6 米，底部直径约 19 米，墓园面积约 120 亩。墙垣为夯筑，东墙似有门。70 年代因在墓区进行基本建设，文物部门随工清理了墓葬。墓内有墓道、墓室，均为砖券，并出土了铁剑等遗物。

萧何墓 位于渭城区汉高祖长陵东司马门道北，为西汉开国名臣萧何的葬地。

萧何（前？—前 193），沛县（今江苏沛县）人。曾为沛县吏。秦末佐刘邦起义，对战胜项羽、建立汉朝起了重要作用。为西汉开国元勋、首任相国。封酈侯。死后陪葬长陵。《史记》、《汉书》均有传。《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萧何墓在雍州咸阳县东三十七里。”《史记集解》引《东观汉记》云：“萧何墓在长陵东司马道北百步。”即今韩家湾乡史村（或推测为徐家寨双冢）。《咸阳县志》记萧何墓两处：一在长陵司马道北，一在今渭城区底张乡王村西 700 米处，后者墓前有清乾隆时陕西巡抚毕沅书立的记墓碑。

今按，萧何为汉初功臣，既陪葬长陵，墓葬当在长陵陪葬墓区，不应当远葬长陵以西数十里外之地。据《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三年十一月癸卯（91 年 12 月 1 日），和帝于行幸长安后“祠高庙”，诏曰：“高祖功臣，萧、曹为首，有传世不绝之义。……朕望长陵东门，见二臣之垄，循其远节，每有感焉。”东汉和帝既望长陵东门，能见二臣之垅，是萧何、曹参二人墓地在长陵东司马道旁无疑。毕沅记墓碑不足为据。《城固县志》谓萧何墓在城固县西二里，河南《永城县志》言萧何墓在永城县境内，当均属讹传。

曹参墓 位于渭城区汉长陵东司马门道北，为西汉名臣曹参的葬地。

曹参（前？—前190），沛县（今江苏沛县）人。曾为沛县狱吏。秦末从刘邦起义，屡立战功。为高祖元从功臣，是西汉第二任相国。封平阳侯。死后陪葬长陵。《史记》、《汉书》均有传。《后汉书》李贤注引《庙记》云：“曹参冢在长陵旁道北，近萧何冢。”又引《东观汉记》曰：“萧何墓在长陵东司马门道北百步。”又据《后汉书·和帝纪》载，东汉和帝祠高祖庙时，曾“望长陵东门，见二臣之垆。”“二臣”即指萧何、曹参。可知曹参墓与萧何墓相近，同在长陵东门外司马道北，今韩家湾乡史村、徐家寨一带。今渭城区底张乡王村西800米处有一冢，传为曹参墓，并有清乾隆时陕西巡抚毕沅书立的记墓碑。此碑与其东萧何记墓碑一样，同为讹传，不足凭信。

娄敬墓 位于永寿县店头镇苏家原村。传为西汉关内侯娄敬的葬地。

娄敬（前？—前182），即刘敬。汉初齐人，因高祖五年（前202）首劝高祖定都关中，后又谏阻高祖出击匈奴，深受高祖信任，赐姓刘。封关内侯。高后六年（前182）死葬好畤明月山之东，后人因称明月山为娄敬山。《史记》、《汉书》均有传。

陆贾墓 位于永寿县店头镇庄桃村旁。传为西汉太中大夫陆贾的葬地。

陆贾（约前240—前170），楚人，汉初政论家。早年以客从高祖平定天下，有文才，善辩，因功被封为太中大夫。高祖死后，诸吕擅权，右丞相陈平听陆贾之计，与太尉周勃深相交结，使吕氏阴谋益衰。史称：“及诛诸吕，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陆贾后以寿终。所著《新语》为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统治的先声。《史记》、《汉书》均有传。

霍去病墓 位于兴平县南位乡茂陵东侧1公里处，即今茂陵博物馆所在地。为西汉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的葬地。

霍去病（前140—前117），西汉名将。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南）人。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元狩二年（前121），两次大败匈奴，控制河西地区，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元狩四年（前119），又和卫青共同击败匈奴主力。汉武帝曾为他建造府第，他拒绝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前后6次出击匈奴，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死年24岁。死后，汉武帝特修了这座墓冢，形状象征祁连山，以炫耀其赫赫战功。《史记》、《汉书》均有传。

霍去病墓冢底部南北长92米，东西宽61米，顶部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封土高15.5米。墓前现存石刻16件，计有怪人、怪兽吃羊、卧牛、人抱兽、卧猪、跃马、马踏匈奴、卧马、卧虎、卧象、短口鱼、长口鱼、獭、

蝠、“左司空”刻石和“平原”刻石。雕刻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手法简练，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批大型石雕艺术珍品。从铭文石刻推断，这批石刻当是当时官府左司空监造的。

董仲舒墓 位于兴平县南位乡策村东南约250米处，传为西汉哲学家董仲舒的葬地。

董仲舒（约前179—前104），广川郡（今河北景县西南广川镇）人。自幼攻读儒家典籍，景帝时为博士。建元五年（前136），董仲舒建议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在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在教育上，他主张立太学，设庠序；在人事制度方面，提出州郡举秀才孝廉。董仲舒在朝廷当官后徙居茂陵邑，年老时“去位归居”，在家中去世。《史记》、《汉书》均有传。

《太平寰宇记》载：“董仲舒墓在县（兴平）东北二十里。”西南距茂陵约650米。当地群众称为“次冢”。冢底部长71米，宽30米，高14.3米。

公孙贺墓 位于彬县水口乡祁家崖村，传为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贺的葬地。

公孙贺，北地郡义渠县（今甘肃合水西南）人。其先为胡人。武帝为太子时为太子舍人，武帝即位后，曾7次为将军出击匈奴，无大功。太初二年（前103）以太仆为丞相，封葛绎侯。后因罪被灭族。《史记》、《汉书》均有传。

公孙贺墓冢高3米，东西11米，南北7米。已严重残缺。

钩弋夫人墓（云陵） 位于淳化县铁王乡大圪塔村西，为汉武帝赵婕妤钩弋夫人的陵墓。武帝欲立钩弋夫人之子弗陵为太子，恐子稚母少，女主乱国，遂委托霍光辅政，逼死了钩弋夫人。钩弋夫人死于甘泉宫，即葬于甘泉宫南。武帝死后，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后元二年（前87）秋，昭帝追尊其母钩弋夫人为皇太后，起云陵。

云陵为覆斗形，夯筑，底部东西长158米，南北宽155米，顶部东西长39米，南北宽37米，封土高35米。陵垣四边正中各有夯筑阙门一处。阙门遗迹尚存。墓冢在陵园内偏东南处。陵园平面近方形，东西长337米，南北宽283米，周长1220米，占地约140亩。

陵园东南角和东北角各有土丘一处，直径约15米，残高1米，内有砖瓦和夯土块。西南角土丘外侧曾发现曲尺形砖。两土丘可能是角楼建筑遗迹。正对南阙处，有宽10米南北向道路遗迹，比现在农田低1米余，似为陵前司

马道。北阙周围有不少卵石、草泥土及不规则的石块（可能是础石），陵周围建筑材料有铺地砖、条砖、子母砖、空心砖和板瓦、筒瓦残件。有“卫”字瓦当和“长生未央”文字瓦当以及纹饰多变的云纹瓦当、五角形陶水管与圆形陶水管等。

云陵邑遗址在云陵偏西约 500 米处。城墙、城门遗迹尚存。

霍光墓 位于兴平县南位乡陈阡村，为西汉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葬地。

霍光（前？—前 68），字子孟，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霍去病异母弟。武帝时为奉车都尉。昭帝年幼即位，他与桑弘羊等同受武帝遗诏辅政，任大司马大将军，封博陆侯。昭帝死后，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即废，又迎立宣帝。前后执政凡 20 年。地节二年（前 68）卒后，宣帝亲临哀悼，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在茂陵东边，为霍光修建了坟墓和祠堂。

墓在茂陵以东约 4 公里处，墓前有清乾隆时陕西巡抚毕沅书立的记墓碑。墓冢底部长 72 米，宽 64 米，高 19.5 米。

苏武墓 位于武功县武功镇北门外龙门村。为西汉名臣苏武葬地。

苏武（前？—前 60），字子卿，西汉武功县杜陵（一说为阳陵）人。天汉元年（前 100）奉命出使匈奴被扣，宁死不降，被徙于北海边牧羊，坚持 19 年不屈。始元六年（前 81）因匈奴与汉和好，才被遣回朝。官典属国。《史记》、《汉书》均有传。

苏武墓为一圆锥形夯土堆，高约 4 米，南北约 30 米，东西约 20 米。墓前有清康熙、乾隆和道光各个年间树立的“汉典属国碑”、“重修苏武墓门碑”等。

班昭墓 位于兴平县丰仪乡大姑村东北 500 米处，又名“曹大家墓”。为东汉史学家班昭的葬地。

班昭（约 49—约 120），右扶风安陵邑人，字惠班，一名姬。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博学高才，其夫曹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班固著《汉书》未竟而卒，班昭奉诏续修。书初成，读者多不通晓，她又教授马融等诵读。和帝召入宫，令皇后及诸贵人以师事之，世称为曹大家（家读若姑）。《后汉书》有传。

班昭墓封土尚存，四边各长 15 米，高 7 米。

侯义墓 位于渭城区窑店乡胡家沟仓张砖厂内。为西魏太师开府参军事侯义的葬地。葬于西魏大统十年五月二十六日（544 年 7 月 1 日）。

侯义（530—544），字僧伽，燕州上谷郡居庸县（治今北京延庆县）人。

祖父侯刚，曾任魏侍中、司徒，封武阳公；父侯渊，曾任魏燕州刺史。侯义为太师开府参军事，病死于西魏大统十年（544），年仅15岁。

1984年底至1985年初，咸阳市文管会和咸阳博物馆对该墓进行了清理。墓为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构成。墓道为斜坡式，已被破坏。甬道平顶，长1.85米、宽1.2米、高1.22—1.78米，两壁涂白灰，可见黑红两色壁画痕迹。墓室平面略呈抹角梯形，为穹窿顶，长2.74—2.86米，宽2.8—3米，高1.55米，四壁及顶部亦有壁画痕迹。墓室西部有生土棺台，棺台上置砖三排，其间填充木炭，上面盖有白灰。木棺已朽，棺内南端有一颅骨和一些零碎骨骸。

此墓早年被盗，清理中共得到遗物160余件，主要有镇墓兽、镇墓武士俑、武士俑、侍从俑、文吏俑、女俑、胡俑、骑马武士俑、骑马乐俑、动物俑等陶俑87件，房屋、灶、仓、井、磨、碓陶模型各1件，碗、盘、壶等日用陶器12件，“永安五铢”钱1枚，石墓志一方。此墓为西魏墓葬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李虎墓（永康陵） 位于三原县陵前乡侯家堡西南。为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的葬地。约葬于西魏大统十七年（551）。

李虎（？—551），西魏时任左仆射，封陇西郡公，与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马独孤信等以功参佐命，当时称为“八柱国”。大统十七年五月卒。北周追封唐国公。唐武德元年（618）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增修墓园，称墓为陵，号“永康陵”。

陵园今存一高7米、东西140米、南北86米的封土丘。封土南尚存石刻8件，计有石人1件，石狮1件，石鞍马、石天禄、石华表各2件。

李昫墓（兴宁陵） 位于渭城区正阳乡后排村北原上。为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昫的葬地。北周建德元年（572）葬。

李昫（？—572），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北周天和七年（572）卒。武德元年（618）追尊元皇帝，庙号世祖，增修墓园，称墓为陵，号“兴宁陵”。

今存圆锥形封土丘，高5米，底部直径13米，封土南的墓道外，塌陷成长6米、宽3米、深约4米的椭圆形坑。封土前有石雕两排，从南向北，计有天禄1对、鞍马2对、狮2对，石马与石狮之间，原有石人3尊，亦两两对称，现已埋入1米深的土中。石刻品类虽简，但雕刻精细，造型生动。

叱罗协墓 位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面。为北周骠骑大将军叱罗协的

葬地。葬于北周建德四年三月五日（575年4月1日）。

叱罗协（499—574），本名宏，避讳改协。少寒微，初为州小吏。后屡经征战，累官至大都督、仪同三司。西魏恭帝三年（556）赐姓宇文氏。入北周后，曾任执掌国政的晋国公宇文护府长史，进位大将军，封南阳郡公，并仍复旧姓叱罗。《周书》、《北史》均有传。

叱罗协墓为当地原有5个封土冢中最大的一个，高约20余米，俗称“大冢”。1961年农田建设中，封土被铲平。1989年冬陕西省考古所进行了发掘。墓为一南北向的斜坡形长墓道洞室墓。南北总长68.5米，由墓道、隧道、天井、壁龛、甬道及前室、后室构成。墓道口距地表2米，墓道长27.4米，宽1.5—1.7米。墓道口的北端向北至甬道南口长32.5米的一段为隧道，隧道为拱顶，高2.4米，有6个天井，在第5、6两个天井底部东、西两壁各开壁龛2个。甬道长2.5米，南端顶高2.05米，宽1.9米，北端顶高1.25米，宽1.6米。甬道底与墓室底平，未铺砖。墓道与隧道两壁可见白灰墙皮及壁画痕迹。墓室分前室和后室。前室平面呈正方形，边长3.8米，四壁距地1.75米以上内收成盝顶，顶高2.5米。底铺条砖，壁有画痕，靠东壁有一合墓志。后室为一方形平顶土洞，长2.7米，宽1.7米，高1.35米。土质棺床上人骨已朽，地面有木灰痕迹。

此墓前后室被盗一空，但4个壁龛完好无损。墓中共出土器物312件，其中绝大部分是陶俑。第1龛内放置陶罐9件；第2龛内放置陶罐3件及陶立俑、骑马俑、仪仗俑、文官俑、女侍俑、男侍俑等159件，其他动物俑、陶模型等27件；第3龛内放置镇墓兽4件，兜鍪男骑俑及武士俑28件；第4龛内放置束髻男骑俑5件，帷帽男骑俑13件，骑马乐俑3件。

王士良墓 位于渭城区北杜镇靳里村东。为隋上大将军王士良与其妻董荣晖的葬地。董氏初葬于北周保定五年十一月五日（565年12月12日），王士良葬于隋开皇三年十一月十四日（583年12月4日）。

王士良（500—581），字君明，代郡（今山西大同市北）人。初仕北魏，继事东魏，后归降北周，授大将军、小司徒，赐爵广昌郡公。隋授使持节、上大将军。开皇元年（581）卒。《周书》、《北史》均有传。

王士良墓封土已被铲平，但墓室保存完好。1988年陕西省考古所进行了随工清理。此墓为竖穴式土洞墓。墓为南北向，全长13米。墓葬结构分墓道、过洞、甬道、前室、后室等5部分。墓道呈长方形竖穴，南北长4.9米，东西宽1.9米，深11米。在墓道与过洞相接的东、西二壁上，高2.3米，宽

1.9米之处均涂成白灰面，其上有黑红两色的壁画痕迹，东、西二壁紧连甬道之处全涂红彩。甬道长1.74米，宽1.6—1.7米，高1.4米。甬道底与墓道、墓室底平。甬道南口用土坯封门，东西二壁均涂成白灰面。在甬道北端，东、西并列，放置王士良和妻董氏两方墓志。前室平面呈方形，边长3.2—3.4米，高2.5米，壁上有绘画痕迹。前室有木棺两具，一置正中，一置靠近东壁之处。棺内各有人骨架一具。人骨及棺木均仅留残痕。后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04米，南端宽1.4米，北端宽1.14米，高1.2米，平顶，东、西、北三面涂白灰面，无彩绘。内置木棺一具，棺内有一人骨架，头南脚北，仰身直肢。

墓内随葬器物均保持着原来的位置。其中前室进门处有陶俑11件、镇墓兽1件；前室西南角与东北角有陶俑10件，陶器18件，陶模型3件，铁器6件。其他均出于3具人棺内外。从墓志及木棺位置、随葬器物分析，前室正中为北周大将军、隋使持节上大将军王士良，后室为王士良夫人董荣晖，前室东壁为王士良继室（或侍妾）“姜克都”（“克邑”）。董荣晖葬于北周，王士良葬于隋代，因董氏先葬，其墓当建于北周。此墓未经盗扰，是研究北周和隋初墓葬的珍贵资料。

李和墓 位于三原县陵前乡双盛村正东。为隋上柱国李和的葬地。葬于隋开皇二年（582）十二月。

李和（506—582），本名庆和，其先陇西郡狄道县（今甘肃省临洮县）人。父僧养为夏州酋长。李和年少有为，以功迁征北将军。大统初加车骑将军。累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夏州刺史，赐姓宇文氏，又赐名意。天和六年（571）进柱国大将军，隋开皇元年（581）迁上柱国，更名和。开皇二年卒。《周书》、《北史》均有传。

墓封土堆高约2米，直径约4米。墓前约59米处有石羊一对。1964年10—11月，陕西省文管会进行了发掘清理。墓为土坑单室，带天井斜坡长墓道。墓道全长37.55米，共有5个天井。甬道接近墓室南边中间，长3米、宽1.5米、高约2米。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四壁宽3.6—4米，从室底至拱顶高约4米。

墓室和墓道均有壁画，墓道壁画是在每个过洞入口外的两侧，内容都是单立的男像或女像。墓室壁画，在各壁面的下半部还能看出用赭红色画出的9个框，框内用墨色画出枯树及假山等。

墓早年被盗。在墓室西壁下有石棺一口，棺内填满泥土，无任何随葬

品。出土物除石门、石棺和石墓志外，全为陶俑和生活用具，计有侍吏俑、仪仗俑、骑马俑、武士俑和胡俑等人俑 79 件，马、牛、驼、羊、猪、狗、鸡等陶动物模型 26 件，舂米工具、仓、井栏等器物模型 3 件，陶碗、陶罐等生活用品 3 件。另外，石门、石棺表面都刻画有人像、野兽、花卉等图案。

牛弘墓 位于长武县相公乡相公镇南，为隋朝大臣牛弘的葬地。

牛弘（545—610），字里仁，安定郡鹑觚县（今长武县）人。本姓寮，其父寮允为后魏侍中，赐姓牛。隋时先后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业二年（606）进位上大将军，三年（607）改为右光禄大夫，六年（610）从炀帝南下，病死江都，归葬安定。《隋史·牛弘传》评曰：“牛弘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

牛弘墓为圆锥形，高 4 米，底部周长 53 米。墓门前尚存石柱，墓冢保存完好。

李寿墓 位于三原县陵前乡焦村。为唐淮安王李寿的葬地。葬于唐贞观五年二月十一日（632 年 1 月 8 日）。

李寿（？—631），字神通。唐高祖李渊从父弟。隋末在长安举兵反隋，从李渊平京师，拜宗正卿。武德元年（618），拜右翊卫大将军，封淮安王，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后从平刘黑闥，迁左武卫大将军。贞观元年（627）拜开府仪同三司。贞观四年（631）卒。《旧唐书》有传。

墓地残存的封土堆为不规则圆锥形，高 8.4 米，周长 61.4 米，夯筑。封土南尚存石刻 9 件，计有石人 1 尊，石羊 2 对；石虎 1 对，石柱 1 对。1973 年 3 月至 8 月，陕西省博物馆和陕西省文管会对该墓进行了发掘。墓由墓道、过洞、天井、小龕、甬道、墓室构成，全长 44.4 米。斜坡墓道水平长 16.8 米，宽 2.3 米。有过洞 4 个，天井 5 个，小龕 2 个。甬道以石门为界，分前后两段，前段为长 4 米、宽 1.86 米的斜坡土面，后段为长 2.8 米、宽 1.4 米的方砖铺地。石门南为砖砌封门墙，石门里置龟形墓志。墓室长 3.8 米、宽 3.95 米，四壁砌砖，为拱形土洞顶。墓室东部用条砖铺地，西部放屋形石椁一具。椁由 28 块青石组成，高 2.2 米、底长 3.55 米、宽 1.85 米，歇山顶。面宽 3 间，进深 1 间，当心间装置可以开合的石门两扇。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均绘有精美的壁画。墓中石刻亦很精美，除罕见的龟形墓志外，石门和石椁上均有题材丰富的线刻画。在小龕和墓室中，共出土各种器物 333 件，如彩绘贴金武士俑、男骑马俑以及黑瓷碗、四耳白瓷罐、金带

扣等。

温彦博墓 位于礼泉县烟霞乡山底村南约 300 米处。昭陵陪葬墓之一。为唐中书令温彦博的葬地。

温彦博（573—637），唐初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人。隋末从罗艺为司马，后归唐，官中书侍郎。武德八年（625）以行军长史从张瑾攻突厥，兵败被俘。太宗即位后回朝。贞观四年（630）任中书令（宰相），多有建树。两《唐书》均有传。

墓冢为圆锥形，底径 20 米，高 6 米。墓前有石羊、石虎及神道碑。神道碑已移昭陵博物馆陈列。

魏征墓 位于礼泉县昭陵乡魏陵村北五凤山。昭陵陪葬墓之一。为唐初贞观名臣魏征的葬地。葬于贞观十七年（643）。

魏征（580—643），字玄成，馆陶县（今河北省馆陶县）人。少时孤贫落拓，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李密败后，又被窦建德所获，任起居舍人。建德败后，入唐任太子洗马，成为李建成的心腹。玄武门之变后归太宗李世民，任谏议大夫。以屡次犯颜直谏而深得太宗信任，为名重一时的谏臣。曾任秘书监、侍中（宰相），封郑国公。死后陪葬昭陵。两《唐书》均有传。

魏征墓系依山为陵，旧称“魏陵”，陵前尚存土阙一对，神道碑一通。碑为太宗亲自撰书，今已仆地，文字灭泐，惟碑首所刻蟠桃纹完好清晰。

房玄龄墓 位于礼泉县昭陵乡刘东村东北约 3 公里处。昭陵陪葬墓之一。为唐初大臣房玄龄的葬地。

房玄龄（579—648），名乔，字玄龄，以字行。齐州临淄县（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人。隋末举进士，任隰城尉。唐兵入关中，归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参与玄武门之变，助秦王取得帝位。贞观元年（627）为中书令。后任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他长期执政，为唐太宗的重要助手。后封梁国公。两《唐书》均有传。

墓冢为圆锥形，底径 18 米，高 5 米。墓前神道碑已移昭陵博物馆陈列。

马周墓 位于礼泉县烟霞乡上古村东约 500 米处。昭陵陪葬墓之一。为唐初大臣马周的葬地。

马周（601—648），字宾王，博州茌平县（今属山东）人。少孤贫，后到长安，为中郎将常何家客。贞观五年（631）代常何上书，为太宗所赏识，即日召见，授监御史，后累官至中书令。他直言善谏，为贞观名臣。两《唐

书》均有传。

墓冢为圆锥形，底径 1.5 米，高 4 米。墓前神道碑已移至昭陵博物馆陈列。

李靖墓 位于礼泉县烟霞乡官厅村北。昭陵陪葬墓之一。为唐初大将李靖的葬地。葬于贞观二十三年（649）。

李靖（571—649），唐初军事家。本名药师，京兆郡三原县（今陕西省三原县东北）人。隋末任马邑郡丞，后归唐。高祖时任行军总管，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两《唐书》均有传。

墓冢为三个东西并列的封土堆，中高 12 米，周长 226 米。其中者为圆锥形，两旁平面作长方形、东断西连。据《旧唐书》本传，系一像铁山，一像积石山，以旌殊功也。冢前有石人、石虎、石羊，又有神道碑。碑甚丰，已移置昭陵博物馆。

张士贵墓 位于礼泉县烟霞乡马寨村西南。昭陵陪葬墓之一。为唐初大将张士贵与夫人岐氏的葬地。葬于显庆二年十一月十八日（658 年 12 月 18 日）。

张士贵（586—657），字武安，弘农郡卢氏县（今河南省卢氏县）人。隋末绿林为寇，后降唐为将，屡立战功，授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玄武门之变中又立大功，深受太宗信任，封虢国公。高宗永徽二年，累官至左领军大将军。两《唐书》均有传。

墓地留有高约 9.1 米、直径约 20 米的封土堆。其墓于 1972 年由文物部门进行了清理发掘。墓葬由墓室、甬道和墓道构成。南北全长约 57 米。墓道为斜坡形，长 21 米、宽 2.4 米。有 5 个过洞、5 个天井。在第三、四天井中各有一对小龕。甬道在墓室南面偏东，分两段：南段为土结构，长 1.7 米、宽 1.9 米；北段为砖结构，长 4.9 米、宽 1.7 米。在砖结构甬道内的南端安有石门，向外一面均有线刻画，两扇门上东画男侍，西画女侍。在土结构甬道内，砌有坚实的封门砖。墓室用砖砌成，四角攒尖式，墓室底平面近方形，惟四边向外稍张，南北长 4.3 米，东西宽 4.05 米，四壁高 2.3 米，顶高 4.7 米。墓室原有壁画，惜已剥落无存。墓室两侧有石棺床，用 8 块大小不等的石条砌成，棺床南北长 3.65 米，东西宽 1.9 米，高 0.25 米。未见葬具及人遗骨。

墓曾被盗，但仍清理出遗物共 409 件。其中有彩绘釉陶俑和动物模型

190件：男立俑103件，持物男立俑3件，男胡立俑4件，男牵马俑4件，女立俑44件，女坐俑2件，男骑马文官俑2件，男骑马武士俑2件，女骑马俑14件，马2件，动物模型10件。彩绘瓷俑22件，全是男骑马乐俑。彩绘红陶俑和动物模型95件：男立俑33件，女立俑4件，男骑胡俑6件，女骑俑9件，还有男残俑12件及其他残件，动物模型31件。瓷器均成残片，能复原者有罐2件，盂2件，瓶1件，壶盖1件。另有釉陶器7件，铜器4件，墓志1合，墓志盖1件。墓志属墓主张士贵，墓志盖属张士贵夫人岐氏。张士贵葬时岐氏尚在世。岐氏死后，方与夫合葬于此。岐氏仅存志盖，疑志石为盗墓者所毁弃。

尉迟敬德墓 位于礼泉县烟霞乡烟霞新村街道北边。昭陵陪葬墓之一。为唐初大将尉迟敬德与夫人苏斌的葬地。葬于显庆四年四月十四日（659年5月10日）。

尉迟敬德（565—658），朔州善阳县（今山西省朔县）人。隋末，为刘武周偏将。唐武德二年（619）秦王李世民击刘武周，降唐。后从秦王击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闥、徐圆朗等，战功卓著；在玄武门之变中又建殊勋，深得唐太宗信任，封鄂国公。晚年杜门不出，以声色自娱。两《唐书》均有传。

墓前神道碑尚存，现移置昭陵碑林博物馆。封土呈尖锥状，堆基直径长26.5米，高8.8米，全经夯筑。1971年10月—1972年1月，文物部门对墓葬进行了清理发掘。墓由墓道、过洞、天井、前后甬道和前后墓室构成，水平全长56.3米。在第三过洞和前甬道两壁共有4个小龕。墓道呈斜坡形，长16.5米。过洞4个，为拱顶土洞。天井4个。甬道分前后两部分：前甬道在第四天井北，至前室南口，甬道南端有石门一道；后甬道在前后墓室之间，呈梯形。墓室分前室和后室两部分：前室平面略呈方形，南北两壁正中券有门洞，室内东西宽2.5米，南北长2.6米，顶高3.7米；后室结构与前室同，长宽各5.1米、高5.35米，穹窿顶。前后甬道和墓室均为砖砌，地铺方砖。后墓室有石棺床一台，正方形，长宽各3.9米、高0.3米。墓室充满淤泥，随葬品被盗一空，惟存有两合完整的墓志，一合属墓主尉迟敬德，一合属敬德夫人苏斌。墓志纹饰及石门、棺床的雕刻均很精美。

墓中清理出的残存随葬品有陶俑头15件，陶俑履9件，陶马头5件，残瓷碗1件。另外，还有鎏金铜带饰1件，残破玉环3件，玉佩饰1件，料珠58粒。

程知节墓 位于礼泉县烟霞乡上营村西。昭陵陪葬墓之一。为唐初大将程知节与其孙、崔二夫人的葬地。葬于麟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665年12月4日）。

程知节（589—665），俗作程咬金，后改名知节，字义贞，济州东阿县（今属山东省）人，隋末从李密参加瓦岗军，任内军骠骑。李密败，属王世充，后归唐，任秦王府左三统军，从李世民镇压窦建德，击败王世充。历任泸州都督、左领军大将军等职，封卢国公。高宗时率军征西突厥，无功而还，被免职。两《唐书》均有传。

墓为圆锥形，高7米，直径20米，周长63米。所遗神道碑首趺均佚，碑身两端残缺，已移置昭陵博物馆。墓经发掘，因早年毁坏严重，仅出土部分陶俑残件及一合墓志。

韦贵妃墓 位于礼泉县烟霞乡陵光村中岭上，西北距昭陵约1公里。为唐太宗贵妃韦珪的葬地。葬于乾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667年1月28日）。

韦贵妃（597—665）名珪，字泽，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人。北周太傅韦孝宽曾孙，隋沈、陈二州刺史韦圆成之女。初嫁隋户部尚书李雄之子李友珉，生定襄县主。改嫁秦王李世民，贞观元年（627）册封为贵妃，生纪王李慎与临川公主李孟姜。永徽元年（650）拜纪国太妃。麟德二年（665）卒。

韦贵妃墓依山为陵。近年昭陵博物馆进行了清理发掘。墓道长50米。墓前有土阙1对，石柱1对，神道碑1通。墓中出土遗物174件，主要有陶俑101件，包括男立俑、女立俑、骑马俑、双头人面镇墓兽及天王俑等。出土壁画72幅，分布于墓道、甬道和墓室，包括四灵、仪卫、列戟、给使、男装女侍及乐伎等。遗存墓志一方。该墓经过整理，已对游人开放。

李勣墓 位于礼泉县烟霞乡烟霞新村西，在今昭陵博物馆院内。昭陵陪葬墓之一。为唐初大将李勣与夫人的葬地。葬于总章三年二月六日（670年3月2日）。

李勣（594—669），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曹州离狐县（今山东省东明县东南）人。家富有，初从翟让起义，参加瓦岗军，因功封东海郡公。瓦岗军失败后降唐，任右武侯大将军，封曹国公。赐姓李，因避太宗讳，单名勣。贞观三年（629）与李靖出击东突厥，因功封英国公，守并州16年。高宗时官至司空。两《唐书》均有传。

墓为三个锥形土堆，作倒“品”字形。中高25米，直径98米，周长307米。三峰象征阴山、铁山、乌德鞬山，用以表彰其平薛延陀、破高句丽之

功。墓前有石人、石虎、石羊各1对，并有高宗李治亲自撰书的神道碑。其墓70年代经过清理发掘，虽损毁殊甚，遗物极少，但出土的“三梁进德冠”和部分壁画却极为珍贵。李勣墓志亦保存尚好。据《唐书》记载，李勣葬后13年，即嗣圣元年（684），李勣之孙徐敬业于扬州起兵讨伐武后，武后下令追削其祖（勣）、父（震）官爵，并令“剖坟斫棺”，李勣墓即被毁坏。中宗李显复辟后，诏令为李勣“起坟建葬”，当有所修复。

武则天母杨氏墓（顺陵） 位于渭城区底张镇韩家村东。为周武则天之母杨氏的葬地。杨氏死于高宗咸亨元年八月二日（670年8月22日），是年闰九月二十一日（670年11月9日）以王礼葬。文明元年（684）称顺义陵，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之后，追封其母为孝明高皇后，改顺义陵为顺陵。

陵园分外城和内城，外城南北1246米，东西866米。内城东长298米，西长310米，南长280米，北长282米，略呈方形。内城四角夯土墙遗迹仍存。内城南门有二土阙，间距20米。陵冢在内城。呈方锥形，底边长48.5米，高12.6米。经钻探获知，墓道为斜坡形，长28.5米，宽2米，两壁绘有壁画。外城是号墓为陵后扩建的。陵前有石人6对，石羊、石坐狮各1对，莲花座1个。内城门外有巨石雕成的走狮和天禄（独角兽）各1对。在陵的东、西、北三面各有石坐狮1对，陵北石坐狮以北还有石马1对。顺陵的石走狮和天禄，是顺陵石刻的精品，亦是唐代陵墓石刻的精品。顺陵外城中部碑塔寺遗址原竖有《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系武三思撰文，相王李旦书，明代关中大地震中倒地碎为数节，后又被咸阳知县派人砸碎筑了河堤。以后陆续发现8个碎块，世称“顺陵残碑”。

阿史那忠墓 位于礼泉县烟霞乡西周村西。昭陵陪葬墓之一。为唐薛国公阿史那忠与其妻定襄县主的葬地。葬于上元二年十月十五日（675年11月7日）。

阿史那忠（611—675），字义节，突厥人。贞观四年（630）诱执颉利可汗，因功封左屯卫将军，尚定襄县主（太宗韦贵妃与前夫李友珉之女），九年封薛国公。累官至右骁卫大将军及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上元二年（675）卒。两《唐书》均有传。

墓冢圆锥形，径25米，高6米。墓前存神道碑一通，已移置昭陵博物馆。1972年5月文物部门对墓葬进行了清理。墓由斜坡墓道、5个过洞、5个天井及甬道、墓室构成。第四天井下有两个小龕。第一、二、三过洞及甬

道、墓室均为砖砌。全墓南北水平长 55 米。墓室近方形，边长 3.7 米。墓底距今地表深约 12.7 米。墓室西侧有砖砌棺床，长 3 米、宽 2.1 米、高 0.3 米，东侧尚有砖刻壶门。

墓道口、过洞和天井的壁面均有壁画。墓道口内东壁画龙、马、骆驼、仪仗等；西壁从南向北仅存虎身下部、犍车和武弁。第一过洞两壁各画 2 人，内外共有男侍 6 人。第二过洞有男侍 4 人，第三、四、五过洞有男、女侍各 4 人。第一天井两壁画戟架，东壁保存完整，插 6 戟。第二天井有男侍 4 人。第三天井男、女侍 4 人。第四天井两壁正中各有一龕，龕两旁亦有侍人。第五天井有男、女侍 6 人。该墓曾被盗，墓内遗物几乎全被扰乱和破坏。计出土男侍俑 60 件，女侍俑 6 件，陶动物俑 4 件，白瓷坛 1 件，瓷罐 1 件，铁锁 4 件。

墓室出土墓志一合，镇墓石一方，另有墓志盖一件。从墓志可知，墓主为阿史那忠，志盖属其妻定襄县主。定襄县主死于高宗永徽四年（653），先葬。阿史那忠上元二年死后，合陪葬于昭陵。

永泰公主墓 位于乾县乾陵乡韩家窑东，乾陵博物馆内。乾陵陪葬墓之一。为中宗李显的第七女李仙蕙葬地。葬于神龙二年五月十八日（706 年 7 月 2 日）。

永泰公主（685—701），名仙蕙，高宗李治与武后之孙，中宗李显之女。久视元年（700）初封永泰郡主，不久与武则天皇帝侄孙魏王武延基成婚。大足元年（701）因忤张易之，夫妇二人同时被害，死年 17 岁。中宗复辟，于神龙元年（705）追封为永泰公主。《新唐书》有传。

墓冢为覆斗形，高 14 米，见方宽 56 米。墓冢四周有围墙，南北长 275 米，东西长 220 米，总面积 6050 平方米。围墙外南面排列有石狮 1 对，石人 2 对，石柱 1 对。1960 年，陕西省文管会对墓葬进行了发掘，墓为斜坡土洞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等构成。全长 87.5 米，宽 3.9 米，深 16.7 米。共有 6 个天井，5 个过洞，8 个小龕，都对称地排列在第一至第四天井下面。内置随葬品。

此墓虽经盗掘，但出土遗物达 1350 余件，仍称丰富。出土遗物中有壁画、陶俑、三彩俑、石刻、陶瓷器以及各种金属随葬品等。墓中所有墙壁绘有重彩壁画和藻井图案，壁画在整个墓的结构上占着重要的地位。从整个墓内壁画的布局看，除墓道上画有巨大的青龙、白虎外，两侧上下绘有对称的花卉和穿紫、红、绿袍的武士们组成的仪仗队列。这些武士头戴幘头，腰佩

贴金宝剑，末尾两位牵着彩色宝马，威严地排列在阙楼和六戟兵器架前，表现了武士们的威武气概。中间为男女各半的侍从。前室以侍女为主，体态丰盈，线条流利，色彩鲜艳，性格各异，栩栩如生，是唐墓壁画的杰作。石椁、石门、墓志上雕有飞鸟、花草、人物以及十二生肖等线刻，流畅雄劲，造型生动。陶俑中有男女骑马俑、胡骑俑、武士俑、镇墓兽和各种动物俑，特别是三彩俑，在造型和釉色各方面，都反映了唐代陶瓷工艺的高度水平。此外，出土的金、玉、铜、铁、锡器等，铸作精巧，雕刻细腻，华美大方，并为精品。

章怀太子墓 位于乾县乾陵乡东金村。乾陵陪葬墓之一。为高宗李治次子李贤与妃房氏的葬地。李贤初葬于神龙二年（706）七月，景云二年（711）与房氏合葬。

章怀太子（654—684），名贤，字永明，武则天所生。初封为潞王、雍王。上元二年（675），皇太子李弘卒，立为皇太子。监国期间，处理过政务，并招募学者共注《后汉书》。因得罪其母武则天，永隆元年（680）被废为庶人。文明元年（684）被害于巴州。后追复雍王。中宗复辟，于神龙二年（706）陪葬乾陵。景云二年（711），追赠皇太子。两《唐书》均有传。

墓冢为覆斗形，高18米，见方43米。冢南残存土阙门和石羊1对。1971年至1972年，陕西省文管会对墓葬进行了发掘。墓为斜坡土洞砖室墓，由斜坡墓道、4个过洞、4个天井、6个小龕及砖砌甬道和前、后墓室构成。全长71米，宽3.3米、深7米。后室有殿式石椁，长4米、宽3米、高2米，由33块大石板组成，上刻男女侍从、朱雀、飞马、蔓草等线刻画，特别是男、女侍线刻，线条流畅，体态丰盈，气韵生动。墓曾被盗，出土随葬品600余件，绝大部分为陶器，有陶立俑、伎乐俑、武士俑、文臣俑。各种动物和镇墓兽，还有三彩马、绿釉花盆和彩绘塔式罐等。制作精美，造型生动，各具特色。

壁画为墓中的重要遗存。分为墓道和墓室两部分，共约400平方米，可分为50多组。大都保存完好。所绘题材有出行、客使、仪仗、马球、歌舞、游戏以及宫廷的侍女、陪臣等。全部壁画不但色彩鲜艳，所绘人物、动植物、山水等，皆技巧娴熟，生动自然。特别是东壁的巨幅“狩猎出行图”、西壁的“打马球图”以及“礼宾图”、“观鸟捕蝉图”等，最为精采。

墓中出土墓志二方。一方是神龙二年（706）迁葬时的《大唐雍王墓志铭》，一方是景云二年（711）追封后与其妃合葬的《大唐故章怀太子并妃清

河房氏墓志铭》。

懿德太子墓 位于乾县乾陵乡韩家堡西北。乾陵陪葬墓之一。为中宗李显的长子李重润的葬地。神龙二年（706），由洛阳迁葬于此。

懿德太子（682—701），本名重照，避武后讳改重润。《唐书》载，重润生于东宫，高宗甚喜，及满月，改元永淳，是岁立为皇太孙。圣历初（699），中宗为皇太子，封为邵王。大足元年（701）为人诬陷，则天皇帝命杖杀之。中宗即位，追赠皇太子，陪葬乾陵。两《唐书》均有传。

墓冢为覆斗形，高 17.9 米，东西长 55 米、南北长 56.7 米。冢四周有围墙遗迹，南北 256.7 米，东西 214 米。围墙南有石狮 1 对，石人 2 对（1 件残），石柱 1 对（已残，倒塌后埋入地下）。1971 年至 1972 年陕西省文管会对墓葬进行了发掘。墓为斜坡土洞砖室墓。全长 100.80 米，由斜坡墓道、6 个过洞、7 个天井、8 个小龕及前、后甬道和前、后墓室构成。此墓规模宏大，有“号墓为陵”之说。

墓内随葬品甚丰。共出土遗物约 1000 余件，其中有欧体阴刻玉质填金表册残片及各种陶俑、三彩俑与陶、金、铜、铁器等。尤以分别绘在墓道、过洞、天井、前后甬道及前后墓室的 40 组（约 400 平方米）壁画最为珍贵。这些壁画保存比较完整。题材有青龙、白虎、城墙、阙楼、仪仗队、伎乐、男仆、宫女等。特别是前室为南北对称的“宫女图”，各有宫女 7 人，色彩绚丽，姿态各异，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宫廷的日常生活。戟数多少是唐代地位的象征，永泰公主墓绘 12 戟，章怀太子墓绘 14 戟，而此墓绘 48 戟，应属帝王一级。石椁内外的线画雕刻亦很细致，堪称佳作。

懿德太子迁葬时，曾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

杨贵妃墓 位于兴平县马嵬镇西，相传为唐玄宗李隆基贵妃杨玉环的埋葬地。

杨玉环（718—756）即杨太真，小名玉环，天生丽质，又通晓音律，初入宫为玄宗之子李瑁妃，后得玄宗宠爱，册封贵妃。三姊妹分别被封为韩、虢、秦国夫人，堂兄杨国忠升任宰相，操纵国政。安禄山叛乱后，玄宗携贵妃西逃四川，行至马嵬驿，六军不发，斩杀杨国忠，并请杀杨贵妃，玄宗无奈，遂命将贵妃缢死。肃宗至德二年（757），玄宗自成都返回长安后，密令中官将贵妃遗体迁葬。此墓为原来的葬地还是迁葬的墓冢，均无确证。

建国后，政府对墓地多次进行修葺，形成了一个占地 5 亩的陵园。墓冢为圆形砖砌，高 2.2 米，直径 4.5 米，墓周有三面回廊，上嵌历代文人题咏

碑碣 25 块。

冯晖墓 位于彬县底店乡二桥村西南冯家沟，为五代时后周朔方军节度使冯晖的葬地。葬于后周显德五年（958）。

冯晖（894—952），字广照，邳都高唐（今山东省高唐县）人，青年从军，屡立战功，后晋天福二年（937）任滑州节度使，开运二年（945）移镇邠州节度使，翌年改授朔方军节度使。后汉天福二年（948），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周广顺元年（951），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陈留郡王，翌年死于公署，赠卫王。《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均有传。

墓坐北朝南，三面环山。封土残高 4.20 米。墓由墓道、甬道、主室、耳室构成，全长 44.42 米。除墓道外，其余部分均用长方形、方形或楔形砖砌，并用草拌泥、青灰渣、白灰浆分别混合粉刷。斜坡墓道长 25 米，甬道口有砖砌门楼，高 6.4 米。门洞呈弧形，门楼外表彩绘，楼阁雕刻有妇人启门、柱础、柱、斗拱等。墓门高 2.20 米、宽 2.06 米，双扇向外开的门面上雕有泡钉、手环孔。在门楼之前用砖封门洞。甬道呈弧形顶，长 8.14 米，宽 2.06 米，高 2.78 米。甬道北端连接主室。主室略呈方形，长 6.80 米，宽 5.24 米，高 1.75 米，穹窿顶。前室的东、西、北各有一弧顶耳室，东、西耳室均长 4.03 米、宽 1.70 米、高 1.90 米，北耳室长 3.68 米、宽 1.65 米、高 1.86 米。墓内共有弧形和凸字形小龕 35 个，其中甬道两边各有 2 个，主室两壁各在耳室两旁排列 2 个，北壁两旁各有 1 个，东、西、北三个耳室内各有 7 个。

此墓墓壁均绘有壁画。甬道、耳室、小龕内绘蔓草、牡丹、双凤等；主室顶部绘 28 宿星相图及银河、北斗、明月，周壁绘 6 个侍女手持花瓶、果盘，拱手站立；墓门以西为庖厨图，图中有锅、灶、柴、蔬菜、肉、瓢、盆、碗碟等；墓门以东为宴饮图，图中有桌、凳、盘、水果、茶具、酒具等。壁画色彩艳丽，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甬道两侧用 56 块方砖精雕成 28 对乐舞人物浮雕，有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人物，有男人女人，翩翩起舞。乐器有笛、箫、笙、排箫、磬、鼓、腰鼓以及箜篌、琵琶等。在每侧北端有乐舞指挥，构成完整的乐舞演出场面。

出土遗物有瓷盂、碗、壶、杯、茶托、器盖、鎏金铜饰、铁锁、玉饰、石器、“开元通宝”铜钱和一合墓志。

从墓志可知，与墓主冯晖同时埋葬的有亲属 7 人，其中有长子继勋等 4 个儿子、1 个孙女及两个夫人。据《资治通鉴》载，冯晖死后“其子牙内都

尉侯继业杀其兄继勋、自知军府事”。看来冯晖死后，为了争夺权力，家庭内部曾发生过激烈的斗争。五代墓葬特别是较大的墓葬发现很少。此墓葬为研究五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康海墓 位于武功县武功镇浒西庄西北。为明代状元康海的葬地。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武功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曾任翰林院修撰。因与权阉刘瑾为同乡，初为刘瑾笼络，刘瑾被杀后又被列为瑾党而遭罢黜。以所著《武功县志》和《中山狼》杂剧为世所称。其葬地处于漆水与泮河的夹角高地，俗称“凤头”（亦称“龙头），流水环绕，柳绿柏翠，传说即其生前挟友携酒，吟诗弹唱之处。

康海墓占地 12 亩，墓基 8 分余。60 年代以前尚存高陵吕楠、户县王九思及三原马理等所撰碑石。可惜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这些墓碑均已被毁坏。

杨岫墓 位于兴平县桑镇学校北崖上。为清代农业教育家杨岫的葬地。

杨岫（1687—1785），字双山，清监生，兴平县桑镇人。少出整屋（今周至县）李二曲之门，潜心圣学，博学好问，不应科举。一生著书讲学，作务农桑，先后著有《幽风广义》、《知本提纲》及《论蚕桑要法》等数十卷。

杨岫墓冢高 3 米，东南边长 13 米，南北 10 米。崖下有砖砌窑洞一孔，俗称“双山祠”。

刘古愚墓 位于秦都区马庄乡天阁村北，为清末维新教育家刘古愚的埋葬地。

刘古愚（1843—1903），名光蕘，字焕唐，号古愚，人称“古愚先生”。同治九年（1870）肄业关中书院，馆家塾十余年，嗣后主讲泾干书院、味经书院及崇实书院。戊戌变法中，积极倡议维新，并支持门人李岳瑞等参与变法活动。变法失败后被迫辞职，徙居礼泉烟霞草堂继续讲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受甘肃总督崧蕃所聘，赴兰州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同年八月病逝，归葬天阁村。

墓为圆丘形，底径 4—5 米，高 1.65 米。墓志存咸阳博物馆，墓碑仍在天阁村。

第三节 其他墓葬

高家堡戈国墓 位于泾阳县兴隆乡高家堡。1971 年 12 月、1991 年 7—8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两次发掘。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圜墓，墓上未见封土。

经考证，为商代末期或西周早期墓葬。

1号墓墓室为南北向，长3.66米，北宽1.76米、南宽1.6米，距地表5.5米。二层台为生土，高0.76米、宽0.34米；腰坑长0.25米、宽0.25—0.15米；椁长2.98米、宽1.02米；棺长2.4米、宽0.65米。墓主头朝北，为仰身直肢，无殉人殉狗。墓室保存完好，未经盗扰。人头骨周围有铜器14件、陶器1件、玉器5件。其中以“卣”尊、钺卣及夔龙方座簋等青铜器最为珍贵。据铜器铭文推定，此墓为戈国墓。2—6号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2号墓东壁二层台上有一殉人，填土中有一殉狗，头厢中有铜器7件，玉器5件；3号墓东壁二层台上有一殉人，填土中有一殉狗，头箱中有铜器6件；4号墓较其他墓为大，无殉人殉狗，头箱中有铜器27件、玉器5件，出土遗物最丰。值得注意的是在2、3、4号墓的铜炊食器中，发现了44枚梅核，考古工作者由此推知当时是以梅作为调料而获得酸味的。经科学发掘的6座高家堡戈国墓均保存完好，未经盗扰。这为研究商末周初时期今泾阳县西北部一带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黄家河西周墓 位于武功县游凤乡黄家河村南，在漆水河西岸第一台地上，面积约1.5万平方米。1959年发现。1982年试掘，随后发掘，发掘面积700平方米。黄家河西周墓共发现49座墓葬和2座马坑。2座马坑中，1座埋马2匹，1座6匹，系将马处死后埋入的。49座墓葬均为长方竖穴墓，根据形制，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大墓仅1座，长4.3米、宽3.3米、深9.9米。该墓被盗，仅在棺内和棺与椁之间出土铜管、玉器、蚌泡等20余件小器物。在墓内埋土中，距墓口6米左右发现殉葬人3个。中墓发现不多，一般长2.8米、宽1.8米、深6米左右。墓坑埋土中亦有殉葬人。小墓最多，一般长2.2米、宽1米、深1.2—1.8米，一般墓底略大于墓口，有二层台，均无腰坑。墓的方向有东西和南北二种，均为仰身直肢葬，双手放于胸前或腹部，葬具均为有棺无椁。随葬器物一般放置在二层台上，多数在头前或二层台中间，足下放置的很少。随葬品多为一鬲一罐或一鬲，随葬一罐的较少，少数墓随葬铜戈1—3把，但都把戈折成两段，将尖端扔掉不放入墓内，可能是一种葬俗。个别墓随葬铜镜、铜泡以及小件玉器、蚌壳、贝、石圭等。从出土器物看，个别墓属于先周时期，多数属于西周早期，少数属于西周中期或晚期。

任家嘴春秋墓 位于渭城区任家嘴。1990年冬长庆油田修建助剂厂时发现，咸阳市文物局组织力量进行了随工清理。共清理古墓葬285座，其中春

秋时期墓葬 24 座。另外有战国至秦代墓葬 219 座，汉代墓葬 42 座。

春秋墓葬分布于任家嘴墓葬中心地带。墓向除 3 座头向北外，余皆头向西。从墓葬形制上，可分口小底大的覆斗形竖穴及四壁垂直的长方形竖穴两大类。除 2 座在竖穴底部四周留有生土二层台外，其他各墓在竖穴底部四周皆有夯土二层台。其中覆斗形竖穴墓共 6 座，四壁垂直式竖穴墓共 18 座，而此类墓又依墓壁长宽之比的变化分为狭长式、宽敞式和梯形三种形式，以狭长式为主。

葬具为木质棺、椁，有的墓在二层台上加棚圆木或方木，为椁室的顶盖。棺、椁采用板箱式（已朽）。24 座墓中，一棺一椁者 16 座，两棺一椁者 1 座，并排两棺者 1 座。少数墓在棺椁之间又分隔出头厢和边厢，绝大多数墓葬是利用棺椁之间的空间放置随葬品，不再分隔头厢、边厢或足厢。

葬式除 1 座微屈，1 座为仰身直肢葬外，余皆为屈肢葬，有仰身屈肢和侧身屈肢两种。多卷屈呈蹲坐状，脚跟紧贴臀部。

随葬品中的礼器及生活实用器皿，除 1 座置于棺内头前，1 座置于足厢内面，其他则均置于棺椁之间的头厢和边厢内。小件随葬品如铜带钩、石璧、铜镞、骨石饰品及陶圭、石圭等，或置于人侧，或与其他的随葬品置于一处。

24 座墓共出土 196 件器物，按质料分为陶器、铜器、骨器和石器。陶器 115 件，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夹砂红陶最少。种类有鬲、鼎、甗、簋、豆、匜、盘、钵、盆、大口缸及缸、囷、壶、圭、车轮等。铜器 32 件，皆为装饰器与兵器。骨器、石器共 49 件，骨器有管状装饰品，石器有圭、璧、口琚等。

这批墓葬，根据随葬品的形制和组合关系，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 11 座墓为春秋中期，其中个别墓可能早到春秋早期。第二期 13 座墓为春秋晚期。这批春秋墓在墓葬形制、棺椁制度、器物形制等方面，与凤翔、宝鸡一带的春秋墓有一定联系，又有差异。作为贮粮设施的陶囷往往与礼器同出，则已具有特殊的意义。

上孟村秦国墓葬 位于长武县冉店乡上孟村东南面台地上。台地高出泾河河谷 20 米，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台地被一条东西向沟壑分为两部分，沟南是下孟村遗址，沟北即上孟村秦国墓地。

墓地于 1978—1979 年发掘，共发掘墓葬 28 座，车马坑 1 座，获得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在 28 座墓中，除 2 座为仰身直肢葬外，其余 26 座均为

屈肢葬。其中6座墓中的尸骨下肢蹠屈程度较轻，股骨和胫骨弯成60度至90度，两腿相并，膝向左或向右，双手交于腹上；12座墓中的尸骨两膝向前或向左右，胫骨紧屈在股骨之下，脚跟贴近臂部，双手交于腹上；7座墓中的尸骨下肢上屈到胸前，股骨和胫骨并在一起，脚跟接近臂部，上身仰卧，两手或在腹、或在胸、或抱膝。墓葬结构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圻口大于底。最大的长4.02米、宽2.05米，最小的长1.40米、宽1.22米。墓底距地表最深者达7.30米。最浅者仅2米。每座墓都在一角相邻的两壁挖有椭圆形脚窝。一座较大的侧身屈肢葬墓东壁有2个壁龛，龛内置有泥质鬲、甗、罐等随葬品，另一座较大的仰身直肢葬墓有一方形腰坑，坑内存狗骨一副。比较大的墓都有椁室。棺椁均已腐朽。有2座较大的墓椁壁是利用生土二层台作成，台上加铺椁板。一座墓的人骨架底部留有席子痕迹，似以席子为葬具，其墓内亦无随葬品，显与有棺椁者身份迥异。

随葬器物主要是陶器和铜器，且大都放在棺椁之内，尤以放在棺内的居多。因为墓主人多为屈肢，棺内空隙较大，故往往能在墓主人头端把器物排成一行。墓中常见的石圭多置于脚边或胸前，人架耳旁则放置玉块。在28座墓葬中，出土各类随葬品200余件。其中有铜甗1件，铜鼎1件，铜铃6件，陶鼎6件，陶尊8件，陶簋2件，陶壶2件，陶鬲11件，陶甗4件，陶豆5件，陶盆9件，陶罐2件，陶杯1件，陶仓2件，陶纺轮6件，陶拍子1件，彩陶片1件。另外有各式石圭110件。石圭为上孟村秦墓中的主要而且常见的随葬品。多数为片页岩磨制而成，制作较细，最大的长47.5厘米、厚1厘米，最小的长6.3厘米、宽0.6厘米、厚0.1厘米。还有蚌圭5件，骨镞1件，贝饰30枚，玉块10枚。

从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分析，上孟村秦国墓葬可能属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塔尔坡秦人墓地 位于渭城区塔尔坡原上。占地面积80亩。1995年3月至8月，咸阳市文物部门配合咸阳石油钢管钢绳厂基建工程进行了发掘清理。共发现秦人墓葬384座。

墓葬以洞室墓为主，有281座，占总数的73%，其余有竖穴墓96座，瓮棺葬墓7座。除瓮棺葬外，葬具均为木棺。葬式以屈肢葬为主，其中仰身屈肢210座，侧身屈肢82座，而7座瓮棺葬，均为一盆一瓮，盆覆于瓮上。最大的瓮棺直径约有1米。

墓地共出土各种器物1260余件。其中随葬有陶器的墓200余座，没有随

葬品的有 44 座，其余均用小件器物随葬。随葬的陶器有鼎、盒、壶、釜等 16 种、590 余件，其中 60 余件陶器上有戳印文字和刻画符号，上有“咸蒲里奇”、“咸广里奇”之类印文的有 7 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 2 件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骑马俑，和 1 件秦孝公十九年（前 343）造的有铭文铜镢，以及 170 余件造型和纹饰均较精美的铜带钩。

塔尔坡秦人墓地属战国晚期至秦代秦都咸阳西部的一处平民墓葬区，也是考古发掘中发现秦人墓葬最多的一处。为研究秦人丧葬制度、生活习俗及秦都咸阳城区的功能区划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黄家沟战国墓群 位于渭城区窑店镇黄家沟一带，西起渭城乡摆旗寨，东到毛王沟，在东西长 4 公里、南北宽 3 公里的地域内。为战国至秦的一个平民墓葬区。

1975 年和 1977 年，秦都咸阳考古队先后两次共清理墓葬 80 座。均为小型竖穴墓和洞室墓。头向以西为多，葬具多为一棺一椁，葬式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和侧身屈肢。竖穴墓屈肢者占 63%，洞室墓屈肢者占 39%，而且前者屈肢较甚。随葬品最多的 21 件，最少的 1 件，一般是 3—5 件，其中生活用品有壶、豆、蒜头壶、茧形壶、盒、罐、釜、盆、勺、镜、带钩、削、印章等。礼器有鼎、璧等。墓葬共分 4 期，即战国中期、战国中晚期、战国晚期、战国末至秦统一。从这批墓葬中可以看出：从战国中期开始，腰坑已逐渐被壁龛取代；屈肢葬在秦都咸阳的一般官吏和贫民中非常流行，但在秦统一前后已很少见；竖穴墓随葬品一般比洞室墓多，竖穴墓的屈肢葬也比洞室墓多。在平民的观念中直肢葬与屈肢葬似并无贵贱之分。

长陵车站小孩墓 位于渭城区窑店乡咸铜铁路长陵车站一带。1981 年到 1982 年，零星清理秦代小孩墓 9 座，其中店上村南沙坑 1 座，长兴村二队沙坑 1 座，长兴村二队南渭河岸 1 座，长兴村北沙坑 3 座，冶家台南沙坑 2 座，长陵车站北沙坑 1 座。以葬具不同可分为瓦瓮葬、瓦棺葬、瓦槽葬、瓦鬲葬、陶釜葬、板瓦葬。埋葬时均是把葬具置于长方形或方形竖穴墓圻内。死者有仰身直肢和侧身曲肢两种葬式。一般在葬具内或墓圻中放置陶质的盆、盒、鬲、罐等。从墓葬分布看，秦代对夭折小孩的处置依然沿袭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作法，即不把小孩葬入郊野成人墓地，而是置于父母的居处或工作场地附近。长陵车站一带属秦咸阳的手工业作坊区（同时也是手工业者居住区），因发现者均为零星清理的，故这一带小孩墓当不在少数。

杨家湾汉墓 位于渭城区正阳乡杨家湾村北。据《水经注》记述和对其

地望的分析，疑为西汉太尉周勃或其子周亚夫的葬地。1971—1976年由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博物馆和咸阳博物馆发掘。墓共两座，原编为长陵4、5号陪葬墓。南北并列，形制相似，都有封土。疑其南较大者（4号墓）为夫墓，北面较小者（5号墓）为妻墓。

4号墓封土略经夯筑而成，高4米、长20米、宽15米。墓道平面呈曲尺形，全长约100米。其中南北向一段残长44米，东西向一段长50米，曲尺转折处有一东西长6.8—7.35米、宽6.5—7.6米的平台，成为整个斜坡墓道向西拐弯的过渡部分。墓室构筑于墓道两头。墓坑和西墓道内原有复杂的木构建筑，连同棺椁全遭焚毁，原貌不明。在墓道填土中和墓道外有陪葬坑7个，用砖砌或木枋垒成“椁厢”，保存完好。其中1个坑放置漆器、食品等祭奠物品，3个坑放车马模型，另3个用具坑中，一坑内有13个大的鸭蛋壶，内储稻谷；一坑内有116件日用陶器，一坑内有35个陶方仓，仓内盛有谷子、黄米、小麦、油菜籽、荞麦、豆类等粮油作物。这些陶器质地精良，造型优美，除方仓外，多饰以朱红、豆绿、葡萄紫、锌白、天蓝、石黄、石青等颜色彩绘，纹饰线条流畅，色彩对比鲜明，有着明显的同时代漆器图案的特点。

5号墓在4号墓之北26米，规模略小。虽经盗掘，仍保留着较完整的墓葬形制。封土为覆斗形，底边长约20米，残高3—4米。墓道平面呈曲尺形，转折方向与4号墓相反。总长82米，墓室深3.25米。葬具一棺一椁，椁的周围及底下垫塞木炭。棺的两端和椁板靠近，两侧距椁板60厘米，形成南北两厢，厢内放置随葬物品。北厢置彩绘陶器和精制玉器，南厢放置钟、磬等乐器。

两墓发现玉片各200余枚。玉片有三角形、梯形、长方形、菱形等，质地较好，有白玉、碧玉等。个别玉片的四角小孔内还残留有银丝。推断上述玉片应为“玉衣”的一部分，死者应该身穿“银缕玉衣”。

1965年曾在4号墓南约70米处清理兵马俑坑11座，其中骑马俑坑6座，步兵俑坑4座，分左右两列，前后5排，都是带竖井坑道的洞室。共有骑兵俑58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乐舞杂役俑100多件。另有战车坑1座，居两列之间，已被扰乱。此外，坑内还有盾牌模型410件、鍍金车马饰1100件，各种蚌、骨、陶、铁器55件。

杨家湾汉墓规模巨大，构筑复杂，为已发掘的汉墓中所罕见，在西汉帝陵陪葬墓中很有代表性。

阳陵刑徒墓地 位于渭城区正阳乡上狼沟村。此处东南距阳陵 1.5 公里。1972 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墓葬 29 座，共出土人骨架 35 副，确认这是一处刑徒墓地。

经探测，墓地范围约 8 万平方米，估计埋葬刑徒万人以上。墓地的墓葬排列没有一定次序，葬式也不一样。墓坑平面多呈长方形或不规则形。如一号墓内埋葬 1 人，身首异处，颈上有钳，翘端向下，死于斩刑。又如二号墓，共葬 6 具尸体，人架 4 具在上，2 具在下，发掘中发现，这些人骨架上有的颈上有钳，有的脚或腿上附铁，也有的被腰斩。死者的墓坑中未见棺槨和随葬品。遗存刑具铁钳，直径 17—24 厘米，每只重约 1150—1600 克。铁铁系套在刑徒脚后跟上的刑具，类似后世的脚镣，直径 9.5 厘米，每只重约 820—1100 克。从发掘情况看，这些刑徒大多是在营建阳陵及其附近众多建筑的繁重劳动中被摧残致死，或因某种原因被斩首、腰斩的。

阳陵南区从葬坑 位于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景帝王皇后陵南 300 米处。1990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修筑西安通往咸阳国际机场的高等级专用公路进行了调查和抢救性清理。

从葬坑东西跨度 320 米，南北 300 米，占地范围 9.6 万平方米。在此区域内分布着 24 个俑坑。坑作南北向的长条形和“中”字形，由东向西排作 14 行，行距 20 米。每行坑数不一，最少 1 个，最多 6 个。坑宽一般为 4 米，个别坑也有宽 10.5 米的。深度约 7—8 米。坑长度不等，最长的达 291 米，最短的仅 25.3 米。总面积约 1.25 万多平方米。

这组从葬坑均作地下隧道式木框架结构。竖穴式的坑体深约 2 米。坑上架设棚木，棚木之上铺席，再回填黄土，加以粗夯。坑两端有斜坡通道，通道与坑体相接处有木封门。共先后清理发掘了编号为第 6、8、16、17、20、21、22、23 共 8 个坑。其中 17、20、21 号坑出土最丰。17 号坑体可分为南北两区，南区长 18.6 米、宽 2.9 米，其间以板材隔成 9 格，分别堆放粮食。粮食已全部腐朽，所留灰壳厚达 10—20 厘米；北区长 5.2 米、宽 2.8 米，装置两乘彩绘木车马，每车驾 3 马。一号车后和两侧有武士陶俑 62 件随从，均持戟、拥盾、佩长剑，横向排作 8 行，面东。车右为粮食残迹。左为二号车，车前方有一组成套的铜量器计 22 件，后面排列陶井和灶各 1 件，还有髹朱红漆木柄 1 件，似为旗杆。20 号坑体亦可分南北两区。南区为排列整齐的车马武士俑群，俑群面北，横向排列 55 行，每行站立穿袍擗甲的彩绘陶俑 3—16 件，共 363 件，另有木俑 21 件。北区内置朱红色大漆木箱 4 个，南北两两相

对，内有佩剑执盾的陶武士俑及成捆的带柄长矛、兵器架及兵器和生产工具。21号坑主坑体内用木板隔成6个木框，各置有不同器物。一般均有漆盆或盘数件，多者达16件。盘、盆内所盛多为生活用具。有的漆盘边立有陶俑。有些木框中有成组的陶器，有些器内还装有粮食，并放置铜量器。

已发掘的从葬坑，出土物计有：木车5乘，木马3件，木俑2件，彩绘裸体俑90件，俑头537件，彩绘战袍铠甲俑368件，俑头320件，彩绘动物俑18件，铜镞、弩机、承弓器2597件，铁镞、戟、矛、剑527件，铁锤、铍、凿、手锯、削、铍等377件，车马器166件，铜量器47件，铜权26件，陶灶、井、罐、盆、甑、盘、长方形器80件，铁鼎、釜、舟形器8件，铜鉴、釜、镜、带钩95件，还有大量的半两铜冥钱和漆器、兵器架遗迹。

茂陵一号无名墓一号从葬坑 位于兴平县南位乡茂陵陵园东司马门以东约2100米处。东司马道南侧，分布着东西并列的5座陪葬墓。最西面的一座封土最大，为一号无名墓。墓南北长95米、东西宽64米、封土高22米。由于封土南端高大、北端低小，呈“羊头”状，故俗称其为“羊头冢”。1981年5月，西吴乡豆马村农民在一号无名冢南60米处发现一座从葬坑（编为一号坑）。陕西省文物局随即组织进行发掘，并在一号无名冢周围进行了大面积钻探和勘查工作，得知周围尚有38个坑和4座墓葬。

一号坑为南北方向，是带过洞的方形洞穴坑室，平面呈“凸”字形，全长4.15米，深3.2米。坑口上部已被破坏，坑口长1.2米，过洞长1.22米，宽0.85米，高0.8米。原为弧顶，已坍塌，坑室用木板封门。坑室南北长2.45米、东西宽21.3米、高1.95米，弧形顶已坍塌。坑内从葬物主要分布在东西两侧，铜器最多，其次有铁器、漆器、铅器、木器等。在这些器物中，有实用器，也有明器。在4平方米的陪葬坑里，出土了230多件器物，以其中的鎏金铜马和鎏金鎏银竹节铜薰炉等物最为著名。这些珍品反映了西汉时期最高的工艺水平。此外，还有提链炉、温手炉、灯、锤、甗、甑、盆、匜、鼎、温酒器、斗、铍、臼、虎镇等铜器。名贵的漆器作工精细。车马器是随葬品中的大宗。出土的一辆小车和十四小马，均为木质，表面髹漆。残留金属小车器、马饰等19种，计121件。

坑内出土的铜器，多数刻有铭文，记载器物名称、高度、重量、容积、产地、制作或购买年月等。一些器物刻记了器物主人“阳信家”，为判断一号坑的时代和主人提供了重要线索。据《史记索引》按引如淳云：平阳公主“本阳信长公主，为平阳侯所尚，故称平阳公主。”由此推测，此一号无名冢

可能即汉武帝之姊阳信长公主之墓，一号从葬坑的出土器物即阳信公主家之物。

大泉汉墓 位于秦都区马泉乡大泉村头道原上。1975年2月咸阳博物馆清理。墓上残留封土堆高约3米。系双室砖券墓。墓由墓道、甬道及前室、后室构成。前室长8.75米、宽2.4米、高3.18米，放置罐、壶、缸、鼎、釜、甑、洗、勺、耳杯、温酒炉及灯等；后室为椁室，长3.78米、宽2.2米、高约1.7米。椁与墓室间填以厚约20厘米的木炭，棺底板下铺一层五铢钱，椁的头厢放置铁刀、铜刀，北箱放置木羊俑70余件，南箱放置玉杯等。椁室北部发现桥纽铜印一枚，文曰“官垣”，另有圆形琥珀印章一枚，文曰“惠君”。墓道内放置盛有谷子、糜子、荞麦、高粱、青稞等粮食的陶瓮11件。此墓出土的农作物与谷物具有重要的考古学价值。另外，此墓出土的银扣金平脱奩盒和漆罐，亦极为珍贵。漆奩上的平脱图案，表现出车马、人物、狩猎、杂技等多种形象，姿态生动，主题突出，标志着当时的平脱技法已趋成熟。

此墓为西汉晚期墓葬。印文中“官垣”二字疑为墓主姓名。

龚家湾一号汉墓 位于渭城区渭城乡龚家湾西村与羊过村之间的头道原上。此处共有6座土冢，西边南北向一排3座，间距20余米，以北头一座为最大，占地约1.2亩，编号为一号墓。1983年咸阳市文物部门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该墓系砖石结构的积石、积沙墓。墓是由封土、墓圪、墓道、甬道和墓室五部分构成的。筑法是先挖墓圪，再构筑墓室、甬道和墓道。在墓室与甬道两侧及顶部均填以沙石，以防盗掘。顶部沙石层厚1.86—2.1米，以每块重约2吨左右的大卵石垒三层，卵石之间填充沙子，在沙石层上面再填土夯实。夯层清晰，厚8—11厘米，为圆平夯，夯窝直径7.4厘米。夯土层上再堆筑封土。

墓圪平面呈“甲”字形，为口大底小的长方形竖穴，壁面平整，现存上口东西长19.5米、南北宽13—14.8米，墓室距地表7.6米，在3.2米处留有生土台，台面宽约1米。墓道位于甬道以东，呈斜坡状，长30.35米，上口宽5.7—7.9米，深2.4—7.6米。砖券墓道内填沙和一层卵石，在与甬道相接处垒放两层卵石。砖券墓道口置有墓葬的第一重门。在1.88米厚的填沙石上面，上下插木板封门。甬道位于墓室与墓道之间，结构与墓道相同。墓室位于墓道以西，分前后二室，皆用青沙石构筑。第二重门是石门，位于前室

的东口。后室在墓葬的最两端。第三重门位于后室的入口处，亦是石门。葬具为木棺槨，可见髹漆痕迹。由于墓室损毁殊甚、葬式不清。该墓曾6次被盗，仍遗小件铜器115件，铁器60件，陶器19件，货币34枚，其他饰物10余件。

该墓为大型砖石结构墓。构筑中用大块卵石和沙子填充墓道、墓室，这在咸阳周围虽然屡有发现，但在关中及全省范围内并不多见，可谓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制。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重门的门楣上，发现了有由羊、树、仙人、异兽、云气等图像构成的摹线画，这在咸阳一带的汉墓中是首次发现。在第三层石门门扉上还发现被砸成碎块的画像石，这在关中亦属罕见。该墓位于汉元帝渭陵和哀帝义陵之南，相去均只2.5公里左右，当为某帝陵的陪葬墓。墓葬建造时代，可能在西汉末年。

秦宫遗址汉墓 位于渭城区窑店乡牛羊村秦宫殿遗址。1980年至1982年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在发掘秦宫殿遗址时发现其间有中、小型汉墓多座，清理了其中的16座。

墓葬形制有两种：一种是竖井墓道洞室墓，一种是斜坡墓道洞室墓。随葬品有陶器、铜器、玉器、货币和文字符号砖等共计1912件。内有货币1555枚，其中最早的为四铢半两，最晚的是大泉五十及货泉、货布等。在甲M10墓中出土了一块刻有“永平十三年”字样的纪年砖。“永平”为东汉明帝年号。由此推断，这些墓葬最早者为西汉武帝以后，最晚者为东汉明帝年间。反映出牛羊村一带的秦宫殿在西汉中期以前尚为汉代人沿用，中期以后则日渐圯弃，成为墓葬区。此墓一些砖上刻有男女外生殖器及交欢画面，对研究这一时期民间风俗和普通百姓的心态具有参考价值。

塔尔坡空心砖墓 位于渭城区塔尔坡砖厂附近地质部第三普查大队驻地。1980年8月文物部门进行了随工清理，共发现古墓葬51座，在其中9座汉墓中有3座空心砖墓（M26、M34、M36）较为特殊。

34号墓由墓道、墓门和墓室三部分构成。墓道为竖穴式，底部与墓室地面平齐，长3.1米、宽0.72米。墓门向东，宽0.77米、高0.94米。在墓门两侧的砖壁上横置一长方形空心砖，构成门楣。空心砖长1.16米、宽0.38米、厚0.20米，两端各伸出砖壁外，北端并插入墓圻壁内。空心砖向墓道的一面，饰浮雕背向双虎纹，一虎正在向前飞奔，一虎站立回视前一虎。上侧面亦饰浮雕背向双虎，虎均作奔走状。其他四面为素面。随葬陶器、铜器、铁器和石器50余件。

36号墓系以空心砖为主构筑的砖室墓。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构成。墓道位于北边，为竖穴式，长3.4米、宽1米。底部高出墓室地面7厘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3.67米、宽1.86米、高1.48米，尖顶。整个墓室用方柱形空心砖27块，长方形空心砖37块，子母形空心砖2块，并间用小砖构成。方形空心砖一般长1.105—1.14米、宽0.24米、厚0.22米，一头多有三角形榫口，饰几何纹。长方形空心砖中，长1.18米、宽0.38米、厚0.18米者24块，饰四神图案纹或回形纹。长1.11—1.03米、宽0.3—0.41米、厚0.11—0.15米者13块（多残），饰几何纹。子母形空心砖长1.13米、宽0.28米、厚0.19米，一端有榫口，其中1块饰四神图案。此墓残存随葬器物有壶、罐、灶等陶器4件，“半两”钱2枚，“货泉”1枚，铁棺钉15枚，石斧形器1件。

26号墓呈刀把形，东北向，有墓道，仅残存3块长方形空心砖和一些碎砖块。

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来分析，这三座空心砖墓中，34号墓较早，约为西汉中后期；36号墓与26号墓较晚，约为王莽新朝时期。三座墓形制简单，规格比较低，应属中下层阶级的墓葬。各墓所出空心砖以四神图案者最为珍贵。

第三章 古建筑、石窟寺

咸阳境内属于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有19处，其中最著名的是长武县昭仁寺大殿。该殿建于唐贞观十三年（639），按传统说法是一座“九梁十八担”的三间挑角大殿，其内不见立柱，全由四周大梁架叠起，结构极为特殊，不仅是本省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也是全国现存古建筑中所罕见的。

由于历史原因，本地古代寺庙的木构建筑大部倾圮无存，但作为寺庙重要组成部分的佛塔却相对遗留较多，其中的彬县开元寺塔、礼泉香积寺塔、永寿武陵寺塔及旬邑泰塔、兴平北塔等5座宋塔，大都继承了唐塔的结构法式，造型典雅秀丽，展现了当时特有的建筑风格。泾阳崇文塔高达83.214

米，为全国现存最高的砖塔之一；三原中王堡木塔为四层六角攒尖，是西北地区仅有的一座高台阶砖木结构的木塔；咸阳北杜铁塔为八角九层楼阁式，是省内仅有的一座铁砖结构的铁塔。这三座塔虽然建于明代后期，但因其各具特色，在建筑史上都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本地古建筑中享有盛名的还有三原龙桥和孟店、唐家民居。建于明代的三原龙桥采用多孔券拱式，长达110米，是省内现存最早的古代石桥；建于清代的三原孟店民居和旬邑唐家庄院荟萃了民居建筑艺术的精华，具有浓厚的陕西地方特色，是省内古代民居遗存中的佼佼者。

石窟寺为古代佛教徒进行佛事活动的场所。咸阳境内的石窟寺现存数量不多，主要分布于旬邑、彬县、淳化一带。据实地考察，遗存较多的是旬邑县三水河沿岸，其中黑牛窝石窟建于西魏大统五年（539），是咸阳境内迄今所见建造时间最早的石窟。咸阳境内最有名的石窟是彬县大佛寺。彬县大佛寺建于唐贞观二年（628），主窟高达25米，有佛龕70多个，造像740余尊，其中主像高约20米，是我省现存最大的古代佛教石窟。此外，淳化县金川湾石窟亦很有特色。该窟开凿时代不晚于北宋。其突出特点是窟内壁上刻有近10万字的佛经，其中经名可见者即有《妙法莲花经》及信行禅师所撰《大集月藏分经略》等9部。一窟之内，刻经如此之多，不仅在省内现存石窟中为仅见，即在全国众多石窟中亦很少见到。

第一节 寺 庙

昭仁寺大殿 位于长武县城东关。寺建于唐贞观十三年（639），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武德元年（618）战胜薛举、薛仁果父子的阵亡将士而建。昭仁寺初建时规模很大，后大部坍塌，现仅存大殿一座。殿面阔3间、进深3间，各约10.5米，殿高约8.5米。单檐歇山顶，基座高1米。前有月台。梁架为彻上明造，通檐用六椽栿，四角以抹角梁构成歇山收山和翼角构架。歇山收山近半间，老角梁后尾直抵平梁端头之下。柱头斗拱为四铺作出一跳。补间用一朵，为“把头绞顶造”。耍头后尾起跳斡压在下平之下，转角辅作重拱偷心造。传统说法是一座九梁十八担的三间挑角大殿。特点是其内不见立柱，全由四周大梁架叠起，即俗传八卦悬顶方式拱起来的。结构颇为特殊，为国内现存古建筑中所罕见。

寺内现存唐昭仁寺碑一通，朱子奢撰文，无书者姓名（传为虞世南书，一说为王知敬书）。原竖于大殿西北，后迁于殿前。1985年国家大殿进行

了维修并建了碑亭。

彬县城隍庙 位于彬县县城东街，明洪武年间（1368—1398）创建。

城隍庙座北向南，自南而北，依次由庙门、神路、戏楼、钟鼓楼、东西厢、大殿、寝殿及两侧配殿组成。其戏楼与两侧建筑的组合颇具特色。戏楼系坐南向北的楼阁式建筑。其南面为砖结构券门，屋面为重檐歇山顶。北面为三重檐戏台，戏台面阔5间，进深3间，通高约12米，戏台长约10米，宽约8米。戏楼两侧接建八字形过街楼，楼上下两层，底层3间，明间为门道，两次间为小房。楼上各为3间小房，直通戏台。过街楼两侧又与四角攒尖顶的钟、鼓楼相接，连成一组建筑。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构思奇巧，建造精美。

清末以前，此地为邠州治所，城隍庙为州城的重要建筑。据载，明、清两代，曾多次对此庙进行过修缮，仅明代对戏楼就作过两次（宣德四年、弘治元年）大的维修。1982年，彬县人民政府亦拨款对城隍庙戏楼等建筑进行了维修。

凤凰台 位于渭城区原咸阳县城中山街北口。建于明洪武四年（1371）。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扩建县城时保留下来，加以修葺。初以状似凤凰得名，后又寓意秦穆公之女弄玉与萧史恋爱乘凤凰成仙的故事。

凤凰台坐北面南，高6米，面积约800平方米。原南面有24级石砌蹬道，可拾阶而上。东、西面亦各有29级石砌蹬道，可由北向南而上。台上正中有两座殿，东西两边亦各有一座殿。中殿系1929年遭火灾后重修。西殿已毁，台上现仅存正中献殿、座殿和东殿。台下吕祖庙、药王庙基本完好。台南竖有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重修凤凰台碑记》。

兴平文庙大殿 位于兴平县县城东街，在今县文化馆内。为明洪武五年（1372）所建。

大殿为歇山顶，坐北向南，面阔5间，屋面坡度平缓，斗拱用材硕大，檐柱有明显侧脚和生起。面宽18.5米，进深14.3米，面积264.92平方米。殿前有北魏石狮一尊，隋代贺若谊碑一通，宋徽宗御制《大观圣作之碑》一通，明代铁焚纸楼一座，殿内藏直径达1.5米的唐代白玉塔顶盘一个，另有明代巨形铜造像两尊。

大殿1964年进行过维修，1990年陕西省文物局又拨专款进行了全面的维修。

三原城隍庙 位于三原县县城内，始建于明洪武八年（1375），成化十二

年（1486）增建寝殿等建筑。为本省现存最完整的明代建筑群。1980年至1988年，陕西省文物局曾多次拨专款进行了维修和加固。

门前照壁高10米，上饰龙凤纹砖刻浮雕。照壁北有一对13米高的铸铁旗杆。旗杆以北为3间木牌楼。门为重檐歇山顶，高15米，两旁各踞石狮。大门两侧为青砖砌成的八字屏墙，门楼顶以华栱、重昂承托榀卯，衔接成“八卦悬顶”、“十柱山门”之状。进门楼后，中间石板条铺路，东西两侧有廊，内壁各嵌岳飞手书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刻石。再北通过二道牌楼，即至布满浮雕的棂星门。穿过上下两层的戏楼，方进入庙院。院内殿庑周环，曲屋连属，雕梁粉壁，典雅富丽。

大殿坐落在一石砌高台上，面阔5间，进深4间，“双槽”平面，单檐歇山顶。梁架为彻上明造，抬梁式构架。五架梁上用瓜柱、角背，太平梁上保留驼峰、叉手和丁华抹额拱。外檐斗栱为五踩双下昂，平身科仅用两攒。后檐平身科耍头刻作卷草、“三福云”式样，后尾向上托在下金檩下，起挑杆作用。歇山顶转角为抹角梁与顺、扒梁并用。大殿与其前的拜殿呈“勾连搭”形式。拜殿为单檐歇山卷棚顶。殿前有一道木牌坊，歇山十字脊，东西两侧为钟、鼓楼，形制峻秀。大殿后为寝殿，寝殿为独特的庭院建筑，雕墙峻宇，比屋连甍。殿面阔5间，进深4间，重檐歇山顶，梁架为彻上明造，其构造特征与大殿基本相同。

太壺寺大殿 位于泾阳县县城。太壺寺创建于前秦苻坚，时为行宫。至隋，因隋文帝杨坚之母好佛，遂将行宫改为佛寺，号太壺寺。唐玄宗天宝年间改名中兴寺，与长安青龙寺同为讲经圣地。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改建惠果寺。明景泰年间（1450—1456）重修，现存大殿当建于此时。

大殿为砖木结构，保存完好。寺内有北朝八尺石佛1尊，唐代石经幢2件（一刻《金刚经》，一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明景泰二年（1451）增建时刻立的《重修泾阳惠果寺碑记》一通。

泾阳县文庙 位于泾阳县县城。始建年代无考。明嘉靖间原有建筑毁于地震，知县钟岱重修。后在万历四年（1576）、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扩建。清同治元年（1862）复毁于战乱，同治四年（1865）、光绪十一年（1885）两次重修。光绪十一年重修时本县安吴寡妇周氏捐银4万两，所成建筑规模宏大。今仅存戟门至大成殿一进院落，包括大成殿、戟门、乐房、东西庑殿等。

大成殿面阔7间，进深4间，歇山顶，八架椽，带前廊。前檐柱为方形

石柱，梁架为彻上明造，用驼峰、叉手，多雕饰。歇山转角做法用顺梁和扒梁。外檐斗拱出45度斜拱，昂角也做雕饰。戟门面阔3间，进深2间，单檐歇山顶，细部做法与大成殿略同。1988年至1990年陕西省文物局拨专款对大成殿、戟门和东西两庑进行了加固维修。

第二节 塔

开元寺塔 位于彬县县城西街紫微山下的唐开元寺遗址内。北宋仁宗皇祐五年八月十四日（1053年9月28日）建。

开元寺创建于唐神龙元年（705），寺院建筑毁于天宝末年战乱。开元寺塔是一座平面呈八边形的七层仿木结构的楼阁式砖塔。通高47.84米，塔基底层每边长5.6米，正南和正北面各有一宽1.61米的券门，底层塔壁厚4.6米。塔体内结构为空筒式，各层有木楼梯。外层磨砖对缝，以黄胶泥砌筑。每层均有拱形门洞与竖形假门相间，逐层依次变换方位。塔体每层各面均为三开间，中间为券门洞或竖形隔扇假门，开间较宽，门扇上有乳钉，其余两间均有一横木条格假窗，并用砖作出隐柱，柱头上有一朵一斗三升斗拱，斗拱之上再叠涩出檐，并间有两层菱角牙子，檐下用砖作出方栊和瓦形，然后反叠涩砌筑。腰檐上置平座栏杆，下用砖作出两出跳斗拱，每角有一转角斗拱。塔刹为铁质，现存一层相轮，铁刹中间为一莲瓣。在铁刹相轮上铸有“大宋皇祐五年岁次癸巳秋八月十四建谨记”。1983—1987年，陕西省文物局拨专款对寺塔的塔檐、斗拱、平座栏杆、塔体裂缝等进行加固和维修，并恢复了塔内的木楼梯，游人可盘旋而上，登高远眺。1985年4月，在塔顶铁刹周围发现宋代铜佛像30尊，莲花佛座1个，壶门座铜棺和“大观通宝”、“宣和通宝”铜钱等珍贵遗物。

香积寺塔 位于礼泉县烽火乡薄太后村东南。此地原为香积寺。因在薄太后村旁，俗称“薄太后塔”。北宋时建。

塔为四方形，共七层，为仿木结构楼阁式砖塔，通高27.618米，向东南方向倾斜，偏离垂直中心线42.2厘米。塔身底层较高，每边长6.5米，南北各有一券门，宽1.25米、高3.03米。塔壁厚2.15米。塔自第二层以上，各层四面均砌出砖柱及平座栏杆，并于每层叠涩砖檐下，隐出斗拱。塔内结构为空筒式，第二到第四层各面相错劈券门，五、六、七层则四面劈券门。塔刹不知毁于何时。寺内残存宋代残幢数节，余无所遗。

此塔造型雄伟、秀丽，异常别致，是中国古代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塔

型。1985—1986年，陕西省文物局拨专款对香积寺塔身各层用铁箍加固，修补塔檐、券门，加固了塔基及海漫散水，恢复了塔内的木楼梯和塔檐各角的风铃。

泰塔 又名“旬邑塔”。位于旬邑县城内北街旬邑中学院内。建于北宋嘉祐四年（1059）。

塔为八棱、七层仿木楼阁式结构，通高56米。塔身一层较高，南北各辟一门，有梯可登顶层。一层塔檐下有仿木斗拱，叠涩出檐。在二至七层塔檐上有平座栏杆，下为两出跳仿木斗拱。每面均为三开间，用砖砌出隐柱，柱间有阑额。二层塔身四面正中各辟一券门，门洞两侧各有横格棂窗或球形菱花格子假窗。三层至七层塔身各面的券门洞与二层作法相同，位置依次相间。各层塔檐的檐角饰螭首，系铁铃。塔刹为石质，系50年代维修时重新制作的。

此塔相传建于唐代，但据第七层北面东侧槛窗上砖刻的“嘉祐四年正月中建”字样，确知建于北宋仁宗年间。

报本寺塔 位于武功县武功镇西北隅原报本寺内。建于北宋初年，因在武功旧县城中，又俗称武功宋塔。

塔为七级八面的仿木楼阁式结构，高38.94米。塔身底层较高，每边长4.65米。塔门向东，宽1.6米，高2.77米。正南、西、北各有一假门。塔檐下部有砖作的平枋，八个角有垂莲柱，平枋上面有斗拱一朵，八个转角斗拱，用砖作出菱角牙子两层，层层叠涩出檐。第二层塔身以上各层塔檐下均有一朵一斗三升的补间斗拱，八个角用砖砌出隐柱，柱头上有一朵一斗三升的转角斗拱，然后用13层砖叠涩与反叠涩出檐。二层塔身正南、北各有一券门洞，正东、西各有一假门洞；三层塔身的正南、北为假门洞，正东、西为券门洞；四、五、六、七层的券门洞依次相间。塔刹不知毁于何时。塔身的隐柱、券门、斗拱等均涂有红土色，各层每面均用白灰粉刷。塔内中空，原有木楼梯可登，今已不存。

塔势雄秀挺拔，据其形制、构造，其中一些建造手法，仍具有唐塔的风格。此塔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曾经加固，包砌了底层塔身和塔檐。由于年久失修，塔已向东北倾斜 $3^{\circ}36'$ 。塔顶偏离垂直中心线2.41米。

1987年6月初，在报本寺塔下地宫内发现北宋彩绘石椁、银椁、金棺、舍利子、铜镜、白瓷净水瓶、包银宝函、葫芦形琉璃瓶、彩绘仰覆莲石座以及北宋货币等文物。

武陵寺塔 位于永寿县永平乡武陵寺遗址内。因其地原为永寿县城，故俗称“永寿塔”。旧传为唐代建，1984年维修时在塔顶北券门洞西侧砖上发现墨书“大观元年五月”题记和“熙宁重宝”铜钱，确认此塔建于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

塔为八棱七层仿木空心楼阁式结构。通高27.7米。塔门西开，第三层与第七层的正南、正西、正北、正东四面各有一券门洞，第五层则在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面各辟一券门洞。塔檐下用砖砌出平枋，每角有一五铺作出双抄斗拱一朵，补间斗拱亦为一斗三出双抄。塔檐以上用相同的作法作出平座栏杆。第三、五、七层每面为三开间，正中辟一券门洞或带乳钉的假门，两侧则用砖作出竖条格假窗。平座栏杆的栏板上有精美的砖浮雕二龙戏珠、飞凤、流云火焰等图案。塔身向东北方向倾斜，偏离塔身垂直中心线约80厘米。1982—1985年陕西省文物局拨出专款对塔身底部、塔檐、楼梯进行了维修加固。

兴平县北塔 位于兴平县县城西街。在原保安寺内。其南500米处原有与此塔同时建造的七层四方形砖塔一座，两塔对峙，俗称“双塔”。又称南面的塔为南塔，北边的塔为北塔。南塔因严重倾斜，危及附近居民安全，已于1963年拆除。现仅存北塔。

北塔为七层八棱砖塔，通高38.6米，底部每边长4.35米。第一、四、五、六、七层，每角有砖柱，第二、三层除砖柱外，还有砖砌转角和斗拱。每层南北两面有门。塔身基本完好，惟塔刹已损。

塔所在的原保安寺相传建于隋唐之际。此塔始建年代无考。从塔的风格看，当不晚于宋代。

铁佛寺崇文宝塔 位于泾阳县崇文乡西太平村东侧。始建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竣工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清同治元年（1862）因战乱，寺院被毁，惟留此塔与大门楼。

塔为八角形十三层仿木空心楼阁式结构。塔基地平面至铜刹尖高83.214米。塔门向正南，门额上刻“崇文宝塔”四字。第一层每边长9米，上下两层塔檐，下层塔檐八个角翘起，各用砖砌成半圆形柱子，柱头上有一朵一斗三升斗拱。檐每面用砖砌出五层平板枋，从下向上第二层平板枋之间每面各有一斗三升拱九朵。在两层平板枋上砌出46个蚂蚱头、其上再砌两层平板枋，再上为方栿两层，最后有一层砖出檐。上层塔檐作法基本同于下层作法，蚂蚱头每面只有36个。两层平板枋上有两层菱角牙子，然后叠涩出檐。

塔第二层每面各开券门，可通塔檐。在塔檐下的四层平板枋上作出垂莲柱两个，将每个面分为三开间。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各层每面的券门与佛龕，依次错开，并且在券门与佛龕的两侧各有出檐小龕一个。第十二、十三层每面的佛龕内均有石刻佛像一尊。塔顶用砖叠涩收顶，在砖砌的仰莲瓣形刹座内，用砖砌成一个球状体，上为高约5米的铜质葫芦形塔刹。塔内有砖梯，沿塔壁盘旋而上，可直达第十三层。1980年10月在塔顶发现鎏金卧佛、弥勒佛和天王力士铜佛像三尊。1988年陕西省文物局拨专款，对塔内砖梯进行了加固和修整。

中王堡木塔 位于三原县安乐乡中王堡村东北。建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清康熙年间重修。据《三原县志》载，三原县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堪輿家建议于巽位（东南方）建峰，方能文运通达，人才辈出。塔建成后初名“文运浮”，后更名“文峰塔”，因全为木结构，故又称“文峰木塔”。

木塔为重檐四注高台基砖木结构。六角攒尖顶，共四层，通高约20米。下为六棱形，高4米，每边长13米，每层每面檐角翘起，有正脊和戗脊、脊兽，檐角下有套兽，兽头下挂风铃。原设有砖阶木梯，可以拾级而上，登高远眺。

1984—1986年，陕西省文物局先后拨专款加固了砖台基，增修了台基排水设施，翻修了每层屋面，补修更换了部分糟朽的木构件和楼梯，又将三原县城文庙存留的一座明代木牌楼迁建院内，使木塔更为生色。

福昌寺千佛铁塔 位于渭城区北杜镇西街，是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南书房太监杜茂所建。

塔为八角形九层楼阁式铁砖结构，通高21.5米，基座每边长2.38米，每角用砖砌出半圆形柱，柱额上有斗拱一朵，每面有砖雕装饰。塔座南、北各有一宽0.8米、高1.6米券门，门内有砖台阶可登。塔座正南面券门上有铁制匾额，居中铸“千佛塔”三个大字，右端铸“南书房太监杜茂”，左端铸“大明万历三十八年岁次庚戌吉日立”。塔身通体内为砖砌，外为铁铸。塔身第一层正南、正西、正北、正东各有一券门，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面各铸有一尊天王立像。塔檐下铸有平枋、斗拱、蔓草图案等。正南、正北券门有砖台阶可盘旋登上第二层。第二层塔身正东、正西各有一券门，其它各面铸浮雕小佛。第三层塔身的正南、正西、正北、正东四面各有一券门，其余各面均铸浮雕小佛。第五、七、八层塔身在正南、正北辟有券门，其余各面均铸浮雕小佛。各层塔檐下均饰仿木结构的斗拱和昂等。塔刹为宝

瓶形，因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地震而向南倾。

铁塔所在处为金大定年间（1161—1173）所建的福昌寺，明万历年间杜茂在建造铁塔的同时修建了寺院建筑。福昌寺大殿 1962 年拆毁，殿内明代铸造的一尊高 2.2 米的铜佛像移存于咸阳博物馆。1988 年，陕西省文物局拨专款对塔进行了维修。

金龟寺塔 位于礼泉县阡东乡底照吴村小学校内，建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因塔前原有寺院为金龟寺，故名金龟寺塔。

塔为八棱十层，通高约 45 米。塔身底层每边长 3.85 米，壁厚 3 米，每面有一长宽各 0.57 米的青石块，上有浮雕仙人一尊，八个仙人之上，有同样大小的青石一块，按方位依次分别刻“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大字。塔门面南，门楣上刻“金龟寺”三字。塔为仿木楼阁式结构，每层叠涩出檐，檐下为单抄三跳斗拱，每面各角均有一朵转角斗拱。塔身第二层正南、正西、正北和正东四面各有券门洞一个，上有青石浮雕佛像，东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四面塔檐下亦各有青石浮雕佛像。第三层正南、正西、正北和正东四面为假券门洞，内镶青石浮雕佛像，东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四面各有一券门洞。第四、五层依次相间。第六层的正西、正东为一券门洞，其它各面均为假券门洞，内镶青石浮雕佛像。第七层与第五层相同。第八层每面用砖作出八卦符号，以示方位。第九、十层每面均为青石浮雕佛像。塔刹为铜质。每个塔檐角原均有一个风铃。塔内呈圆柱形，原有木质楼梯可盘旋上至六层，清同治年间战乱时楼梯毁坏。塔门前竖有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补修金龟寺碑》一通。

第三节 桥梁、民居

龙桥 位于三原县城南、北两城之间的清水河上，始建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竣工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系由知县高进孝创建，邑绅温纯捐资续建而成。故桥南原有“高公祠”，桥北有“温公祠”。

桥身长 110 米、宽 11 米、高 26 米。此桥建筑设计采用多孔券拱式。共有 3 孔，中间一孔大，两边两孔小。中间大孔采用尖形拱顶，两边小孔采用对称半圆形式。全桥为石构铁钳，桥面用长方形大青石板铺道，两边各雕有石柱栏杆，整个桥身用长方形青石块筑成，造型宏伟，坚实美观，是关中现存最早的古代石桥。

清顺治十年（1656）、乾隆二十年（1755）、道光六年（1826）以及 1940

年，先后几次对桥面和桥基两侧堤岸进行过修补，1984年陕西省文物局又拨专款对护堤作了加固。

孟店民居 位于三原县鲁桥镇孟店村，为清代孟店村巨商、刑部员外郎、江苏司行走周梅村的私宅。初建于嘉庆年间（1796—1820），至道光初年，共建有17院。同治初年（1862）于战乱中焚毁16院，仅存此一院。

此院建筑坐北向南，东西宽13.8米，南北进深71米，面积979.8平方米，由门楼、抱厅卷棚、客厅、退厅、前厢房、后厢房和后楼等五拱二平四进院落组成，共有房舍35间。

门楼居中开闾，为五间二层楼房，门额上高悬“主政策”匾额。进门迎面立一垂莲柱大屏风门，东西有偏门，西偏门旁有上马石。屏风门两边南墙上有精美的“大禹放牧”和“鼠吃葡萄”等砖雕图案。进入二门后为主要院落，两侧各为四开门、三架梁带前廊的厢房，厢房门窗隔扇皆为硬木镂空，裙板上分别雕有“耕、樵、渔、读”、“长安八景”、“八蛮进宝”等五彩图案。正面为三间大堂，五架梁带后廊。接着就是五开间五架梁带后廊的大厅。前堂和大厅的门窗隔扇上刻有“郭子仪拜寿”、“岳母刺字”及“忠孝节义”故事和象征“福、禄、寿、喜”的图案。院内侧墙上的砖雕有“鹭鸶戏莲”、“凤凰戏牡丹”等。大厅厅柱上悬挂楹联一副，文曰：“燕翼貽谋堂上箕裘绵福荫，凤毛济美阶前兰桂发奇英”。五间大厅之后为宅主之居所，东西厢房各三间带前廊。后楼房为五间二层楼房，三架梁带前廊，进深5.9米，建在青石叠铺的高台基上。后楼房正中檐下，悬挂宅主周梅村道光十五年（1835）自题的“怀古月轩”木匾。孟店民居具有中轴贯通，左右对称，厅堂并列，庭院深邃等传统建筑的特点，特别是砖雕、石雕和木雕艺术，表现出建筑工匠的精湛技艺。

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时，将孟店民居分给了11户农民。1953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购回，由三原县代管，后辟为“阶级教育展览馆”对外开放。1988年成立孟店民居文管所。1988—1993年，陕西省文物局先后拨专款对前后厢房、东西山墙、前堂、大厅、后楼等作了维修加固。

唐家庄院 位于旬邑县太村镇唐家村。唐家是清代中晚期驰名省内外的巨财主。当时在三水（今旬邑）、邠州（今彬县）、淳化、耀县等地有土地达1.9万余亩，年收租约3000余石。与此同时，在陕、甘等13省有商业街坊90余所。可谓富甲一方。先后建成屋宇87院，约2700余间。由于子孙奢侈无度，恣意挥霍，到清代末年，家道完全衰落。87座庄院，仅留此一所。

此庄院为两进三院相毗连的庭院。其中两院各分前厅房、中厅房和后厅房三座房。前、后厅房均为两层，中厅虽有一层，但与前后厅房同高。厅房之间均为对檐厢房。厅内有全堂执事、板隔墙屏风及神龛等。神龛及板隔墙上刻有“八仙图”、“二十四孝图”等图案。院内角柱、墙壁上雕有周穆王“八骏马”、宋太祖赵匡胤与陈抟老祖“看棋图”以及姜子牙“钓鱼图”等。这些雕刻作工精细，造型逼真。大门、厅堂和居室的众多匾额、楹联，则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屋顶脊卧兽飞，檐牙高啄，钩心斗角，墙壁为水磨石、砖，嵌以木、砖、石雕，精美细致，巧夺天工。至于门栏窗棂，更是刻镂细致，玲珑剔透。整个建筑群落布局合理，浑然一体，具有北方民间建筑的鲜明特色。

1958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准于此建立唐家地主庄园博物馆，1971年改名旬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1979年恢复唐家地主庄园博物馆名称，1988年更名旬邑县唐家民俗博物馆。

第四节 石窟寺

旬邑黑牛窝石窟 位于旬邑县马栏乡黑牛窝村附近的三水河岸旁。石窟约略分为两类：一类在石崖上，位置稍高，约有数十处，窟小而古，大多已空无一物，非攀登不能上；另一类在河边小路旁，位置稍低，均为方形平顶，窟内面积约三四平方米，损坏严重，亦空无一物。据一窟门外残存的发愿文刻石中“大统五年岁次己未正月”及“十七日庚午造”字样可知，该窟造于北朝西魏文帝大统五年正月十七日，即公元539年2月20日（按：是年正月十七日为“辛未”，石刻作“庚午”，而庚午是十六日，疑是日甲子推算有误）。又从残文中“比丘县方、比丘法涌、清信士盖阿□”等字样可知，该窟系僧人县方、法涌及信士盖阿□等人开凿。北朝时当地少数民族卢水胡人中有盖氏，疑此“信士盖阿□”为卢水胡人，并据此推知，卢水胡人是崇佛的。陕西境内北朝石窟发现不多，且主要集中于陕北，有年代题记的更少。故从现有资料看，旬邑黑牛窝石窟当是咸阳境内迄今所见最早的石窟建筑。它的发现，有较为重要的价值。

在黑牛窝北朝石窟下游，各种大小石窟星罗棋布，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堡子湾石窟、蜈蚣洞石窟、赵家洞石窟及马家河石窟等。这些石窟有的可能凿于北朝后期至唐代，有的凿于北宋中期至金代，有的凿于明代，有的为佛龛，有的为道像，有的还存留清代以来的泥塑和壁画。虽然大多曾因作过民

居，文化遗存严重损毁，但仍然引起了地方史、宗教史、民族史和美术史研究工作者的关注。

彬县大佛寺石窟 位于彬县水帘乡大佛寺村西兰公路旁，唐贞观二年（628），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幽州浅水原大战和五龙坂大战阵亡将士而建。初名应福寺，北宋仁宗为其养母刘太后庆寿时改名庆寿寺。后人因佛像巨大，俗称大佛寺。

石窟依山雕凿，平面呈半圆形，南北13米，东西28米，窟底周长74米，顶高25米。窟内主像为一佛二菩萨。大佛居中，结跏趺坐，肩宽体厚，高约20米。上体穿窟室中心而上。佛两旁菩萨头戴宝冠，衣着华丽，身高均达15米许。窟壁为佛龕，均雕刻大小佛及菩萨等像。计有龕约70个，造像740余尊。窟前有护楼三层，可以登临眺望。此窟规模宏大，造像宏伟，雕饰富丽，技巧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大佛发式作螺髻状，方面垂耳，披衣袒胸，腰下系结佩带两条，盘腿端坐于莲台之上；佛的左手着膝，右臂上弯，手掌向内，手指微屈，作说法状。全身健硕雄伟，姿态自然，面相端严。背景就崖雕刻而成，在靠近大佛的头部周围浮雕坐像7尊，边缘更围绕19个飞天，极富装饰性。

大佛窟西侧为“罗汉洞”窟群，东西向排列四个小石窟，各窟大小不一，西起第三窟壁上浮雕经变故事60余幅，并留有唐宋以来游人题刻；其余三窟，各有佛及菩萨立体造像数尊，亦皆优美生动。罗汉洞窟群以东，为另一窟群“千佛洞”。东西向排列三窟，中窟略小，另两窟较大，均为方形。壁间有浮雕300余幅，另有少数立体菩萨和佛的造像，均栩栩如生。大佛寺石窟为本省现存古代造型艺术中惟一的大型石窟。

淳化金川湾石窟 位于淳化县石桥乡金川湾村西的冶峪河南岸石崖上。窟为唐代所凿。

窟口北向，窟内平面略呈方形，平顶，高7.5米，深5米，宽9米。窟内后壁有半圆雕佛坐像一尊，“文化大革命”中当地农民将佛头打碎，佛座亦遭损坏，残像连座高4.3米，胸宽2.5米。佛像两侧各雕有一尊胁侍像，从残迹看，原像高约2米。大佛凿有背光，涂朱色，作舟形，宽3.4米，高4.8米。其上浮雕7尊跏趺坐佛像，坐于仰莲上，高0.54米，今残存6尊，局部泐蚀不清。

金川湾石窟的突出特点，是窟东西两壁满刻佛经。字大体为1.5厘米见方，均为正书。因经文刻在易风化的沉积细砂壁上，部分石壁表层已成粉末

状，一触即毁。

西壁经文分上下7段，每段高0.84米，从内向外直至断裂的洞口，有200余行，每行33字，计约4.5万余字。其经名可见者有：《七阶佛名经》1卷，刻于下段窟口处，残存10余行；《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卷，刻于《七阶佛名经》内侧，周有阴线边栏，高0.86米，阔2.57米；《如来施教胜军王经》1卷，□□施手书，刻于《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内侧。西壁下段以上其余六段均刻《妙法莲花经》，从下往上，依次刻卷1、卷2、卷3、卷4、卷5、卷6，每段1卷，卷2以上字多残缺。

东壁刻文款式与西壁略同。上下亦为7段，每段210余行，每行37字或42字，计约5万余字。其经名可见者有：《明诸经中对根时深发菩提心法》一卷，信行禅师撰；《明诸大乘修多罗内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同异法》一卷，信行禅师撰；《大集月藏分经略》抄出1卷，信行禅师撰；《佛说大方广十轮经序品》若干卷。

后壁佛像左侧背光沿上刻宋人题记一段，文曰：“济南王致尧、河南刘伯雨、大梁赵重道同游，大观戊子三月廿七日。”西壁正中佛经上刻宋人题记一段，文曰：“郡丞吕致□、邑簿（簿）刘泽□，政和甲午十月二十七日同游。”大观戊子为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政和甲午为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

第四章 石 刻

石刻是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咸阳境内遗存了大批石刻珍品。据1988年全省文物普查，本地共有石雕、碑碣、墓志等各类石刻2415件（组），其遗存数量之多，居全省各地市之首。这些石刻依照形式，主要分为石刻造型和石刻文字两大类。

本地石刻造型中，圆雕精品首推汉唐陵墓前的置物，尤以汉茂陵霍去病墓前石雕群和唐顺陵前石狮、天禄名闻遐迩；其浮雕遗存中，诸多北朝宗教造像和唐代“昭陵六骏”，无疑最负盛名；而唐代李寿、永泰公主和懿德太子等墓葬石椁四壁及墓门上遗存的许多线条生动、“画味”十足的线刻画，

则充分体现了线雕这种石刻技法的高超水平。

本地遗存的碑碣类文字石刻遍布各处，代代有之。以时代而言，从已公布的资料看，茂陵霍去病墓前“左司空”及“平原乐陵”刻石是陕西省现存较早的石刻文字；以保存名碑数量而言，本地亦居全省各地市之首。据1979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书法艺术名碑参考名单》，陕西省共94碑，而其中咸阳境内的即有43碑，占全省45.7%，其中昭陵博物馆的“昭陵碑林”中即有22碑，占全省书法艺术名碑总数将近1/4。

70年代以来，本地陆续出土了许多历代墓志，其中的10多方西魏、北周墓志和100余方隋唐墓志最为珍贵。这些墓志不仅从雕刻技法上看，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从内容上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据初步研究，这些北朝和隋唐墓志中，有一半左右的志主在正史中有传或曾有记述，这些墓志所具有的补史、正史作用，早已引起了国内外历史学者的关注。

本地文字石刻中，除过碑碣、墓志，还有一些佛教塔铭、经幢。隋文帝仁寿元年十月十五日午时，全国各大寺院奉诏“与国家世塔同时建立”过无数舍利塔，每个塔都有相同的铭记，咸阳博物馆收藏的《延兴寺舍利塔记》是国内仅存的数件之一；礼泉县赵镇唐代广济寺遗址遗存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不作八棱柱，而为鼓形，世称“石鼓尊胜经”，从金石文献看，其特殊的形制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第一节 石 雕

马踏匈奴 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石雕，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刻。圆雕。高168厘米、长190厘米。霍去病6次抗击匈奴，击败匈奴主力，打通河西走廊，为汉朝立了大功。汉武帝封其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死后为之建墓，墓形仿其生前征战过的祁连山形状。墓前刻置了一批大型石雕。此像为主题石雕，是利用天然石块不规则的形体，加工雕成的一匹威武轩昂的战马，腹下仰卧手持弓箭、作垂死挣扎的匈奴奴隶主。石雕高度概括了霍去病一生的主要业绩与战功。想象力丰富，构思巧妙，手法简洁明快，堪称雕刻艺术的杰作，是一件富有历史政治意义的石刻巨制。现存茂陵博物馆。

卧牛 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石雕。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刻。圆雕。长260厘米、宽162厘米。卧牛筋肉丰满，双目圆睁，大鼻厚唇，曲颈比例均匀。牛的背部鞍鞯用线刻成，其他仅粗略地雕出大体形状。刀法粗犷有

力，自然、真切地雕出了牛善良、驯顺的本性。现存原地。

卧马 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石雕。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刻。圆雕。高114厘米、长260厘米。卧马小耳直竖，为典型的“大宛马”。马头昂起，目前视，后躯体和后腿在原石块断面上保留，将前身躯的石块作了较多的加工处理，刀法简练准确，大大增强了卧马的雄健气质。现存原地。

跃马 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石雕。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刻。圆雕。高150厘米、长240厘米。作者利用石块的自然形体，刻出一马前两腿同时并起，后两腿用力着地、刹那间即将跃起的生动形象。马躯体几乎完全保持了石块的原有形态，只浮雕出四肢的轮廓。现存原地。

怪兽食羊 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石雕。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刻。圆雕。长274厘米、宽220厘米。作者利用原石块凸凹起伏的自然形态，刻出了一只属于猛虎化身、头生双角的“怪兽”，“怪兽”前腿合抱，张着凶猛大口，正在吞食一只小羊。此种形象在汉代以后石刻艺术中极为少见。现存原地。

石虎 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石雕。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刻。圆雕。长220厘米、宽84厘米。作者利用一长方形石块，雕虎呈俯卧状，凶猛而机警，尾巴有力地卷挺在背上。在虎的面颊和躯体处，运用了稀疏而流畅的阴刻线条，表现出遍身茸茸长毛和斑纹的质感。现存原地。

卧象 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石雕。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刻。圆雕。高189厘米、宽103厘米。象呈自然的卧伏状，头部扭向一侧，长鼻舒适地搭于前腿。小目圆睁，显得安祥驯顺。现存原地。

石双兽 汉陵墓石刻。秦都区沈家村出土。圆雕。它综合狮、虎等兽的特点而成为一种凶猛神态的神兽，名“辟邪”，专司守卫坟墓。石双兽雌雄各一，均高110厘米、长210厘米、宽45厘米。环目小耳昂首，张口吐舌，长尾落地翘起，四肢挺拔有力。雌兽右爪踩一小羊，雄兽背上有须。均威武矫健，呈快步疾走状，是汉代雕刻艺术中的杰作。现移置于西安碑林。

乡义邑子造像 北周保定五年二月二十六日（565年4月12日）刻立。乡义邑子二百人等共造。无撰书人姓名。造像为八棱八面柱体，高118厘米，每面下宽25.5厘米、上宽19厘米。面各有四龕，上三龕浮雕一佛二菩萨或一佛像，下龕均浮雕一佛。共有雕像79尊。龕外线刻跏趺坐佛、火焰形背光及供养人等。柱上有圆形榫，佚首。座为长方形，长81厘米、宽69厘米、高49厘米，四边棱角作斜杀面。斜面线刻供养人像及二百造像人姓名。文字

大部可读。石座右侧斜杀面有“大魏时□有保定五年岁次乙酉二月甲寅朔二十六日己卯乡义邑子二百人等共造八面石像一区”字样，据此可知造像时间及造像人。但“保定”为北周武帝年号，已非“大魏”（西魏），不知何故有此之误。检中国史历日，北周保定五年岁次为乙酉，二月朔日为甲寅，二月二十六日为乙卯，均与刻石所记相符，疑周虽代魏，乡间仍相沿未改所致。原存淳化县夕阳乡于寨村，1985年移存淳化县文化馆。

王迎男造像 北周天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569年9月18日）刻立。坛越主王迎男造，无撰书人姓名。造像作碑形，青石质，首、趺均佚。身高145厘米，下宽63厘米、上宽50厘米，下厚32厘米、上厚28厘米。上有高5厘米的半圆形榫。正面和背面上部各有一龕，龕同高44厘米、宽41厘米、深8厘米。内均有善跏趺坐佛一尊，佛两旁各有一胁侍立仰覆莲座上。像皆残损。正面龕下刻造像记，正书16行，行11字，字径约2厘米。两侧上部各有一小龕，同高25厘米、宽18.5厘米、深4厘米。左侧龕内为一半浮雕老君像，两侧各有一道童侍立。龕外下方有线刻二老君像，两侧皆刻有小童像及供养人像。右侧龕内为一半浮雕佛像，两旁有小像侍立。龕外下部似另有四个小像，已泐蚀不清。此造像佛道同龕，对研究宗教史有重要价值。造像记文杂简体，亦是研究文字演变的珍贵资料。现存咸阳博物馆。

刘伐等造像 隋开皇十五年三月八日（595年4月22日）刻立。刘伐等28人造。无撰书人姓名。碑形，青石质。首残，趺佚。身高138厘米，上宽43厘米，下宽52厘米，上厚17.5厘米，下厚18厘米。上方凿一佛龕，龕高35厘米、宽37厘米。龕中央台上为释迦牟尼坐像，旁为二菩萨立像，佛与菩萨间各站一弟子，均为半浮雕。龕下中部阴刻荷蕾，旁阴刻一对蹲狮。线刻下面以双线划分为四等分，刻造像记及佛弟子、化主、邑子等名目。此造像系1987年在彬县新堡子乡白店村发现。现藏于彬县文化馆。

永康陵蹲狮 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永康陵前石雕，唐武德（618—626）年间刻。圆雕。高212厘米，长182厘米，宽85厘米。狮呈三角蹲势。胸部肌肉突起，前肢挺立；颈项部披长毛，状如尖形叶片；尾端呈三叉形；颚下有三卷尖形髯；胸前为涡状卷毛。雄健威武。据《旧唐书·高祖本纪》载：武德元年六月“己卯，看法驾，迎皇高祖宣简公已下神主，祔于太庙。”永康陵及陵前石刻当建造于武德间。现仍存陵前。

献陵石虎 唐高祖献陵陵前石雕。唐贞观元年（627）刻。圆雕。长253厘米、高205厘米、宽102厘米。石虎身躯浑圆，姿态凝重，虎头硕大，双

眼圆睁，颈粗短，背平阔，四肢伫立，垂尾，腹下透雕。四足与石座相连。虎前、后腰处的棱角线表现了虎身躯的强劲和肌肉的柔韧感，其两颊似在颤动，如发怒吼。

献陵石虎原为4对，现存5个，大小、形制相同。一个现陈列于西安碑林，其余4个仍存陵前。其中南神门外东列石虎颈下刻“武德拾年九月十一日石匠小汤二记”。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退位，唐太宗即位后，于翌年改元，为贞观元年，此仍作“武德拾年”，疑宫中当时仍用武德年号。

献陵石犀 唐高祖献陵陵前石雕。唐贞观元年（627）前后刻。圆雕。高238厘米、长357厘米、宽115厘米。身躯硕壮高大，通体遍披鳞甲，头长一角，双目出神，四肢挺立，作走动姿态。石犀前三足底板上刻有“□祖怀□之德”，疑即“高祖怀远之德”，是唐初国外向唐朝进献犀牛之证。现存西安碑林。石犀底座仍存陵前，座长350厘米、宽205厘米、高52厘米。

献陵望柱 唐高祖献陵陵前石雕。唐贞观元年（627）前后刻。圆雕。望柱通高723厘米，分上中下三部分。下为石座，石座四面线雕花纹，座上浮雕为首尾衔接的二螭龙相对环状。龙身组成的环座中央有卯；中部为柱身，其下有榫，置于龙身环座的卯中。柱身为八棱，每面最宽43厘米，均线刻植物花纹，柱身向上收杀；上部为八棱形盖，盖径大于柱顶径，盖上蹲踞一圆雕石狮，披鬣，张口耸耳，昂首挺胸，前二足支承身体，石狮高90厘米。现仍存陵前南神门外原地。

昭陵六骏 唐太宗昭陵北阙石雕。唐贞观十年（636）至永徽元年（650）前后刻。浮雕。原嵌于北阙司马门东西两廊上，东廊依次是特勒骠、青锥和什伐赤，西廊依次是飒露紫、拳毛騧和白蹄乌。其上还有唐太宗撰文、欧阳询书的赞语。上述六骏是唐太宗征战时所骑过的六匹战马，将其刻石，是为了纪念武功。六骏系六块石板浮雕的六匹骏马，每块石板高2.5米、宽3米。1914年，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被盗卖运往美国，现藏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在1918年即将被盗卖时为群众阻止未遂，先存于陕西省图书馆，后移至西安碑林。

乾陵蹲狮 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陵前石雕。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前后刻。圆雕。高335厘米、长332厘米、宽130厘米。体形高大，昂首挺胸，圆眼突出，张口吐舌，雄健威武。二前肢挺立前伸，后腿稍屈，身躯后压，似有刹那间纵起前扑之势。整个造型呈“金字塔”状，显示出蹲狮有顶天立地、睥睨一切、“惟我独尊”的气势。蹲狮共一对，大小、形制相同，均仍

存乾陵南神门（朱雀门）外。

乾陵翼马 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陵前石雕。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前后刻。圆雕。高317厘米、长280厘米。为神话传说中的神马。马昂首站立，圆目直视，颈项两侧分披鬃毛，翼卷曲。颈、腿较粗短。腹下透雕。翼面重叠转折，双翼展于前肢上部，刻浮雕云纹，有腾云驾雾之势，形神兼美。翼马四足和尾与石座相连，石座四周线刻各种纹饰。翼马共一对，现仍存乾陵神道两侧。

乾陵鸵鸟 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陵前石雕。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前后刻。浮雕。鸵鸟高180厘米、宽140厘米。浮雕于石屏之上，石屏与石座相连，石座下为基础石。鸵鸟作侍立状，长颈短翼，体形硕大，一足略向前，似欲走之势。颜师古称鸵鸟为“金吾”，“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职主先导，以禁非常，故执此鸟向前”。鸵鸟共一对，大小、形制相同。均仍存乾陵神道两侧。

乾陵王宾群像 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陵前石雕。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刻。圆雕。位于南神门外阙址以北18米处。东西分列，现存东列31位、西列30位，共61位。头部皆残缺，个别仅存下半身。石像服饰、发型不尽相同。大多穿窄袖阔裾服装，个别袖胡较长。有圆领，也有大翻领或斜叉领。有卷发，也有披发。均腰束带，脚穿靴，双足并立，两手前拱，作侍立状。石像背后刻有国名、官职和姓名，可见者有“木俱罕国主斯陀勒”、“于阗国尉迟敏”、“吐火罗王子羯达健”等。大多刻文已风化剥蚀，无从辨识。

群像东西两边均为南北4行、东西8排。东列群像范围东西为15.44米、南北为7.47米；西列群像范围东西为15.15米、南北为7.35米。石人均足连石座，座为方形，边长90厘米。残像身高一般为150厘米左右，最高者存177厘米，最低者仅存46厘米。据文献记载，睿宗文明元年（684）埋葬高宗时，唐朝周边许多国家的国王（即“蕃酋”）都远道前来参加葬礼。武则天为纪念这一盛事，遂命匠刻石以写其形。此群像不仅反映了盛唐时期高超的石刻艺术水平，也是当时各民族友好往来的见证。现仍存乾陵原地。

顺陵天禄 武则天之母杨氏顺陵陵前石雕。武周天授元年（690）前后刻。圆雕。高415厘米、长420厘米、宽190厘米。天禄为瑞兽。其形似鹿，一名“天鹿”。又因头长一角，俗称“独角兽”。此像昂首端立，神态镇静而威猛。肩部和前腿两边相接处长有双翅，翅上刻卷纹。四肢雄健，长尾拖地。《汉书》称此兽为“獬豸”。郭璞注引张辑语云：“獬豸似鹿而生一角。”

人君刑罚得中，则生于朝廷，主触不直者。”唐陵多此石刻，而以顺陵所刻形体最大、最为生动。顺陵天禄共一对，现均存于陵前神道两侧。

顺陵走狮 武则天之母杨氏顺陵陵前石雕。武周天授元年（690）前后刻。圆雕。雄、雌各一，其中雄狮最为雄伟，高305厘米、长345厘米、宽100厘米。头披卷毛，突眼隆鼻，丰颐利齿，阔口半开，令人如闻吼声。整个雕刻气势磅礴，威武有力，特别是高高突起的健壮胸肌和向前迈步的腿足部分，比例匀称，极富质感，为唐代诸陵中现存形体最大而最具代表性的石刻之一。二走狮现均仍存原地。

建陵翼马 唐肃宗建陵陵前石雕。唐宝应二年（763）前后刻。圆雕。马身长240厘米、高245厘米。翼马披长鬃，两胁浮雕出翼翅，翅作三长翎，翎尾有突出的卷云纹，后腿上部线刻卷云纹，腹下与座连为实体，其左、右侧和前面浅浮雕流云纹。马尾下垂，与石座相连，其雕刻之精致在唐诸陵中最为突出。翼马共一对，均存陵前神道两侧。

建陵鸵鸟 唐肃宗建陵陵前石雕。唐宝应二年（763）前后刻。浮雕。鸟身高119厘米、长140厘米，浮雕于石屏之上，石屏与石座相连。鸟腿较短，头颈弯曲折于翅外中部，头较大，眼突出，尾发达，其毛羽清晰，犹如鳞状。鸵鸟身下衬以山石，前后同高。造型与乾陵鸵鸟迥异。鸵鸟共一对，现仍存陵前神道两侧。

释迦牟尼立像 唐代石刻。1956年出土于礼泉县。像为白玉质，通高198厘米。佛为螺髻，圆脸，秀目长眉，直鼻大耳，头微上扬，口角涡深，目视前方。右手残缺，左臂手掌下垂，立于覆莲座上。身穿袈裟，衣褶用双穿弧线纹显示，腹膝微鼓，襟稍上卷，表现出衣服的张力。造型比例匀称，刀笔流畅精练，在简单的手法中，雕刻出端正而简洁的躯体，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现存西安碑林。

石灯 唐代石刻。原存乾县石湖村石牛寺。高180厘米，底宽75厘米。共8层。顶呈方形，四边刻有8个花瓣；其下为屋脊形房顶，刻有瓦沟，似为一建筑物；再下为一完整的方石，四面透风，用于置灯；以下依次为莲花纹圆形座、石鼓和八棱石盘；第七层为圆形石柱，周刻四条蟠螭，各有一爪上撑石盘，一爪下撑，依于躯体；底层为一方座，四面有八座小山，整个石灯看去似置于群山之中。构思奇巧，刻工精细，是一件少见的装饰性寺庙石刻。现存西安碑林。

第二节 石椁线刻

舞伎图 唐李寿墓石椁内壁的一幅线刻舞伎画。唐贞观四年（630）刻。高152厘米、宽74厘米。画面为六个女舞伎翩翩起舞的情景。六人分三列，两两相向。舞伎头结双环螺髻，身穿窄袖内衣，外套方领宽袖襦，下穿曳地长裙，足穿云头履，腰肢微曲，舞步缓慢，神情飘逸，姿态优美。线条流畅凝练，为表现唐初舞蹈艺术的佳作。该墓石椁内壁的立部、坐部乐伎图和石椁正面的朱雀人物图亦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现均存西安碑林。

戏鸟赏花侍女图 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石椁外壁一幅线刻侍女画。唐神龙二年（706）刻。高132厘米、宽80厘米。二侍女均穿短襦，束长裙，披纱巾。其中一侍女头结单螺髻，发髻前插步摇，手持鲜花一枝，近鼻闻香；一侍女头结双螺髻，左手驾一长尾鸟，右手食指戏鸟。二宫女的神态，表现了不同的生活情趣。侍女周围饰以几朵盛开的鲜花，显得画面充实丰满，富于生活气息。现存乾陵博物馆内。

执壶侍女图 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石椁内壁一幅线刻侍女画。唐神龙二年（706）刻。高132厘米、宽65厘米。侍女头结双螺髻，眉如新月，风姿优美。身穿圆翻领窄袖长衣，腰系革带，带上系荷包及长短飘带，下穿花条裙，脚穿小头便履。双手捧凤头壶。壶通体刻花。凤头生动逼真。画面线条准确，简练流畅。现存乾陵博物馆。

披巾侍女图 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石椁内壁一幅线刻侍女画。唐神龙二年（706）刻。高132厘米、宽80厘米。侍女头梳螺髻，后插步摇，身穿短襦胸上衣，外套对襟半臂，两襟以宽带结于胸前，下穿曳地长裙，足穿云头履；两臂举起，持披巾在背后翩翩展开，窈窕袅娜，风采照人。脚旁为盛开的鲜花，头侧是飞翔的锦鸡，使人感到生机盎然，一片春意。现存乾陵博物馆内。

宫女图 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石椁外壁一幅线刻宫女图。唐神龙二年（706）刻。高138厘米、宽80厘米。两宫女相向立于花丛之中，身穿宽袖短衣，长裙曳地，裙腰齐胸，长长的“同心结缕带”上系着宝珠与玉雕之类饰物。头戴凤冠，前后插步摇，步摇下垂串珠。画面顶端一对鸳鸯，画一中横眉，刻缠枝花纹，使整个画面爽朗大方，富有情趣。现存乾陵博物馆。

第三节 碑 碣

“左司空”刻石 霍去病墓前石刻。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刻。“左司空”三字刻于一不规则石材平面之侧，二行，“左”字在右居中，“司空”二字居左，上下刻。篆书。字框边长22厘米。笔画浑润遒劲，具有朴拙、粗豪的艺术风格。“左司空”为官名。职掌工程。刻石仍存原地。

“平原乐陵”刻石 霍去病墓前石刻。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刻。文曰：“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此10字刻于一不大规则的长条形石材平面下端，前7字单行竖书，末3字左行横书，作“⊥”形。隶书，字框高64厘米，下宽16.5厘米，字径约7厘米。笔法劲健雄放，浑厚朴拙，单纯自然，无波磔。“平原乐陵”为郡县名，“宿伯[牙]霍巨孟”疑为二人姓名。刻石现仍存原地。

豆卢恩碑 北周天和元年二月六日（566年9月13日）刻石。1919年于咸阳县“周文王陵”附近出土。碑首、座均佚，碑身上部断缺。现存碑身残高192厘米，上宽103厘米、下宽112厘米。碑文为庾信撰，隶书31行，行51字。碑右部字尚清晰，左部泐灭殆尽。全文载《文苑英华》。无书者姓名，但书法整丽清俊，恐为当时名人所书。于右任曾赋诗，称其可与《广武将军碑》并称。豆卢恩为北周大将，官至陇右总管府长史，为北周佐命元勋豆卢宁之弟，事附《周书·豆卢宁传》。撰者庾信为北周文学家，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世称“庾开府”。碑原移置咸阳县署，现存咸阳博物馆。

贺若谊碑 隋开皇十六年（596）刻立。清代存兴平县文庙。高336厘米，宽128厘米。正书。28行，行67字。额篆书阳文20字。此碑上半部甚为清朗，下半部漫漶殊甚。无书者姓名，但字画精整，笔势遒劲，为隋碑中能品。据明赵涵《石墨镌华》载，宋人磨其碑阴刻《夫子庙记》。贺若谊为隋朝大将，官至左武侯大将军，封海陵郡公。《隋书》有传。碑仍存兴平县文庙大成殿前。

昭仁寺碑 唐贞观四年（630）十一月刻立。竖于长武县昭仁寺内。碑螭首龟趺，高393厘米、宽150厘米。额篆书“大唐幽州昭仁寺之碑”9字，碑文正书，朱子奢撰文，40行，行84字。碑文主要记述秦王李世民武德元年率军破薛举、薛仁果父子的功绩。此碑书法劲秀俊逸，又有圆腴之致，笔迹端正，结体严密，刻工精美传神，是初唐瘦劲书风的典型之作。碑阴作两

截，为宋代欧阳修撰文，张淳正书，上截 15 行，行 15 字，下截 5 行，行 11 字。

温彦博碑 唐贞观十一年（637）刻立。原竖礼泉县烟霞乡山底村温彦博墓前，1975 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 342 厘米、下宽 111 厘米、厚 37 厘米。额篆“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公之碑”，岑文本撰，欧阳询书。碑文正书 36 行，行 77 字。碑下部断裂，字多磨泐。此碑为欧阳询晚年之作，观其楷法精妙，字字风骨整峻，神采奕奕，确系唐碑上品。温彦博两《唐书》均有传，碑叙其历官甚详，可补史传之阙。

段志玄碑 唐贞观十六年（642）刻立。原竖礼泉县昭陵乡庄河村北段志玄墓前，1975 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 334 厘米、下宽 105 厘米、厚 35 厘米。额篆题“大唐故右卫大将军扬州都督段公之碑”。碑文正书 32 行，行 65 字。碑中部以下文字凿损较甚。段志玄两《唐书》均有传。此碑未见撰书人姓名，然其书法方整，于正书时作一二笔隶书，显然系六朝遗风。

魏征碑 唐贞观十七年（643）刻立。现仆于礼泉县昭陵乡魏陵村北五凤山魏征墓前。碑首雕蟠桃纹，与昭陵现存诸碑均作六螭下垂迥异。身首高 370 厘米、宽 130 厘米、厚 40 厘米。文已磨灭无存。魏征为贞观名臣，生前深受太宗宠信，死后葬仪异常隆重。《旧唐书·魏征传》谓魏征卒后，“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可知魏征碑文为唐太宗亲撰并书。然据《新唐书》本传载，太宗尝因小人诋毁，不悦魏征而“仆所为碑”；辽东之役后，又因怀念魏征而“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此碑当为太宗树而令仆，仆而复立者。宋赵明诚《金石录》云：“唐魏郑公碑。本太宗御制并行书。贞观十七年正月。”可知宋时碑尚有文。宋以后未见著录。

孔颖达碑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刻立。原竖礼泉县烟霞乡袁家村西孔颖达墓前，1975 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螭首方趺，身首高 347 厘米、下宽 102 厘米、厚 35 厘米。额篆题“大唐故国子祭酒曲阜宪公孔公之碑铭”。于志宁撰文。正书 35 行，行 76 字。碑趺榫口两侧均刻有字，其中左侧 18 字，右侧 22 字，正、草、行书相杂，似镌碑者随意所刻。碑面凿损特甚，字多残缺。此碑世传为虞世南书，细检原石，首行“于志宁字仲谧撰”以下 18 格全空，可知本无书者姓名。但笔势遒美，盖善虞书者所为也。孔颖达两《唐书》均有传，碑中所记，多有可补阙者。撰文者于志宁贞观中曾任中书侍郎、太子左庶子。两《唐书》均有传。

裴艺碑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刻立。原竖于礼泉县烟霞乡上古村西南裴艺墓前，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363厘米、下宽111厘米、厚39厘米。额隶书“大唐赠晋州刺史顺义公碑铭”。上官仪撰，褚遂良书。碑文正书33行，行71字。碑上截凿损特甚，仅下截略有字迹。此碑字体较小，然字画秀娟而又多健笔。裴艺两《唐书》未为立传，碑记可以补阙。撰者上官仪为唐初诗人，官至弘文馆学士、西台侍郎等职。书者褚遂良为唐初大臣、书法家，累官至中书令。此二人两《唐书》均有传。

昭陵十四国首长石像座题名 约唐贞观末至永徽初（649—650）刻。均在昭陵北阙遗址。据《唐会要》载：唐太宗“山陵毕，上（高宗）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服、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名。”共14石，已佚7石。现存7石文曰：“突厥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赞府”；“于阗王闾者信”；“焉耆王龙突骑支”；“高昌王左卫将军鞠智勇”；“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阿那顺”。字径约5厘米左右，殷仲容书，具有较高的历史和书法艺术价值。

豆卢宽碑 唐永徽元年（650）刻立。原竖礼泉县烟霞乡岩峪村北豆卢宽墓前，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361厘米、下宽100厘米、厚37厘米。额篆题“唐故特进芮定公之碑”。李义府撰文。正书32行，行69字。无书者姓名。但书法精健。惜碑字凿损过甚，上截多难辨认。豆卢宽两《唐书》未为立传，其事附见于其孙豆卢钦望传中。此碑叙事颇详，可补唐史之阙。撰者李义府为唐大臣，高宗时累官至中书令。两《唐书》均有传。

樊兴碑 唐永徽元年（650）刻立。原竖三原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樊兴墓前，清道光八年（1828）周贞木移置三原县城内陕西提学使署衙中。现存三原县城隍庙。碑额篆“唐故大将军樊君之碑”，高260厘米、宽113厘米。正书31行，行61字。无撰、书者姓名。但书法甚似褚遂良。诚为唐初佳刻。碑阴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钱塘沈兆霖题记。樊兴为唐初大将，官至左监门大将军，其事附见《新唐书·刘文静传》，然所载官爵事迹不若碑详，此可补其阙。

房玄龄碑 唐永徽三年（652）刻立。原竖礼泉县昭陵乡刘东村东北房玄龄墓前，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385厘米、下宽136厘米、厚45厘米。额篆题“大唐故左仆射上柱国太尉梁文昭公碑”。褚遂良书。正书35行，行81字。碑上截存字较多，下部凿损特甚。房玄龄为唐初名臣，两《唐书》均有传。此碑书法酷似《雁塔圣教序》，但较《圣教序》为优。

笔力瘦劲，韵格超绝。历来以为褚遂良书中杰作。

高士廉茔兆记 唐永徽六年（655）刻立。原竖于礼泉县烟霞乡山底村高士廉墓前，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437厘米、下宽130厘米、厚50厘米。额篆题“大唐尚书右仆射司徒申文献公茔兆记”。许敬宗撰，赵模书。正书37行，行81字。中部字迹凿损较甚。碑左侧镌唐会昌四年（844）五月六代孙元裕及少逸题记各一段。高士廉名俭，字士廉，以字行。两《唐书》均有传。此碑书法方整娟秀，极为人所称道。撰者许敬宗为唐大臣，高宗时累官至礼部尚书、侍中、中书令。两《唐书》均有传。书者赵模即太宗命与冯承素同摹《兰亭序》者，亦为当时知名书法家。

薛收碑 唐永徽六年（655）刻立。原竖礼泉县赵镇新寨村东北薛收墓前，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293厘米、下宽103厘米、厚33厘米。额篆题“唐故太常卿上柱国汾阴献公薛府君碑”。于志宁撰。正书38行，行82字。碑上端字迹尚存，余均磨灭难识。薛收两《唐书》均有传。碑字虽多磨灭，但叙事较本传为详，足可补史之阙。碑字极遒秀，惜无书者姓名。明赵涵谓为于立政书，清孙承泽因笔法大体与《李靖碑》相似，谓均为王知敬手迹。

张胤碑 唐显庆三年（658）刻立。原竖于礼泉县烟霞乡岩峪村东南张胤墓前，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354厘米、下宽110厘米、厚35厘米。额篆题“大唐故礼部尚书张府君之碑”。碑文正书32行，行81字。上截字尚清晰。此碑无撰书人姓名，宋王厚之《复斋碑录》谓李义府撰，或有所据。碑字书法精健，前人谓得褚遂良之支流而开颜真卿之门户者。张胤两《唐书》均有传（传作“张後胤”）。

李靖碑 唐显庆三年（658）刻立。原竖礼泉县烟霞乡官厅村西北李靖墓前，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碑身高427厘米、下宽128厘米、厚42厘米。额篆题“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司徒卫景武公碑”。许敬宗撰，王知敬书。碑文正书39行，行82字。下截凿损过甚。碑阴刻宋游师雄元祐四年（1089）题记。李靖为唐初名将，两《唐书》均有传，碑文较本传为详，多有可补正者。此碑书法健劲道美，婀娜多姿，有北派风格，书家咸以为王知敬代表作。

周护碑 唐显庆三年（658）刻立。原仆于礼泉县烟霞乡西二村东北周护墓前，1964年发现，1974年掘出，翌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341厘米、下宽111厘米、厚37厘米。额篆题“大唐故辅国大将军上柱国襄

公之碑”。许敬宗撰，王行满书。正书 33 行，行 84 字。碑身中部断裂，书体遒劲古朴，惜左部三分之一字多磨灭。周护两《唐书》未为立传，此碑可以补阙。书者王行满，亦为当时知名书家。

尉迟敬德碑 唐显庆四年（659）刻立。1971 年冬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烟霞新村尉迟敬德墓前，1975 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 442 厘米、下宽 150 厘米、厚 53 厘米。额篆题“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鄂国忠武公之碑”。许敬宗撰。碑文正书 41 行，行 87 字。碑下截字尚可辨，上截了无只字。此碑书者不详，但书法挺秀恭谨，光明俊伟。碑文收入《文苑英华》，二者对照，既可补碑文之阙，亦可知旧录之讹。敬德两《唐书》均有传。

杜君绰碑 唐麟德元年（664）刻立。原竖于礼泉县烟霞乡大冢渠村杜君绰墓前，1975 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 352 厘米、下宽 123 厘米、厚 30 厘米。额篆题“大唐故左戎卫大将军兼太子左典戎卫率赠荆州都督上柱国怀宁县开国襄公杜君碑”。李俨撰，高正臣书，万宝哲刻字。正书 39 行，行 76 字。高正臣习王羲之书，字体极秀逸，惜上截字多磨灭。杜君绰两《唐书》未为立传，此可补阙。书者高正臣，亦为当时知名书家。

清河长公主李敬碑 唐麟德元年（664）刻立。原竖礼泉县烟霞乡上营村东清河长公主墓前，1975 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 354 厘米、下宽 119 厘米、厚 35.5 厘米。额篆题“大唐故清河长公主碑”。李俨撰，畅整书，辛胡师镌字。碑文正书 27 行，行 57 字。下截字尚可观，余均磨灭。公主为太宗第十一女，《新唐书》有传极简，此碑可补史之阙。碑字书法劲峻奇伟，篆额飞动流丽，不可多得。书者畅整为当时名书家。

程知节碑 唐麟德二年（665）刻立。原仆于礼泉县烟霞乡上营村西程知节墓前，民国时期由醴泉县民教馆收藏，建国后为县文化馆保存，1975 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首、趺皆佚，碑身两端残缺，仅余中段，残高 280 厘米、中宽 107 厘米、厚 36 厘米。许敬宗撰，畅整书。正书 36 行，行存 40 余字不等。近年发掘其墓时，又发现残石一块，存 36 字。程知节即程咬金，两《唐书》均有传。此碑书法瘦硬放纵，英挺秀逸，于当时书体中别具一格。

越国太妃燕氏碑 唐咸亨三年（672）刻立。原仆于礼泉县烟霞乡东坪村东燕妃墓前，清末出土，后又埋没。1964 年重新出土。1975 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 353 厘米、下宽 117 厘米、厚 35 厘米。额篆题“大唐越国故太妃燕氏之碑铭”。许敬宗撰，高正臣书，万宝哲刻字。正书 40 行，行 100 字。碑上端断裂，字多泐灭。太妃为太宗之妃，越王之母，两《唐书》

无传，此可补阙。此碑书法恭整挺拔，自是珍品。

马周碑 唐上元元年（674）刻立。原竖礼泉县烟霞乡上古村东马周墓前，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358厘米、下宽116厘米、厚39厘米。额篆题“大唐故中书令高唐马公之碑”。许敬宗撰，殷仲容书。正书37行，行约84字。碑字左上部较清晰，余均难识。碑阴刻明万历十三年（1585）荏平张第《谒唐中书马公墓》五律一首。马周为贞观名臣，两《唐书》均有传。书者殷仲容为唐初著名书家。或谓殷仲容书法神味浅薄，不耐寻玩。然此碑书法精工，仍属佳作。

阿史那忠碑 唐上元二年（675）刻立。原竖礼泉县烟霞乡西周村西南阿史那忠墓前，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388厘米、下宽118厘米、厚34厘米。额篆题“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薛国贞公阿史那府君之碑”。碑文正书32行，行82字。下端字较清晰，余均泐甚。阿史那忠为少数民族将领，两《唐书》均有传。碑虽泐甚，其可补正史籍者不少。碑无书者姓名，但书法劲拔，在虞、褚之间。

李勣碑 唐仪凤二年（677）刻立。一直竖立于礼泉县烟霞乡烟霞新村李勣墓前（今昭陵博物馆院内）。碑为螭首龟趺，身首高570厘米、下宽180厘米、厚54厘米。额篆题“大唐故司空上柱国赠太尉英贞武公碑”。高宗李治撰并书。书为行草，32行，行110余字不等。碑题下“御制御书”四字及文末年款为正书。碑下截凿损过甚，余则清晰，碑阴刻宋游师雄元祐四年（1089）题记。李勣为唐初名臣，出将入相达数十年。两《唐书》均有传。此碑笔致神采奕奕，后半尤见纵横笔势，有晋人风度。

贞观十五年封临川郡公主诏书刻石 唐永淳元年（683）刻。1972年春出土于礼泉县赵镇新寨村东北临川公主墓中。刻石为长方形，长85厘米、宽36厘米。正书29行，每行字数不等。上刻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封其第十二女李孟姜为临川郡公主诏书。刻石右下角断裂。此刻石保存了诏书原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现存昭陵博物馆。

永徽元年封临川郡公主为长公主诏书刻石 唐永淳元年（683）刻。1972年春出土于礼泉县赵镇新寨村东北临川公主墓中。刻石为长方形，长89厘米、宽37厘米。正书29行，每行字数不等。上刻永徽元年（650）唐高宗加封其第十一姊临川郡公主为长公主诏书。刻石中部纵向断裂。此刻石永徽元年由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签署，却于总章二年（669）才“给”，很值得研究。现存昭陵博物馆。

褚亮碑 约唐高宗在位时（649—683）刻立。原竖礼泉县烟霞乡上岩峪村东南褚亮墓前。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298厘米、下宽110厘米、厚39厘米。额题“大唐褚卿之碑”，篆体兼隶，传为太宗所书。碑文隶书36行，行65字，传为殷仲容书。此碑书法精工，金石家誉为“唐石之最佳者”。褚亮为褚遂良之父，两《唐书》均有传。此可补史之阙。

崔敦礼碑 约唐高宗在位时（649—683）刻立。原竖礼泉县烟霞乡官厅村南崔敦礼墓前，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338厘米、下宽110厘米、厚35厘米。额篆题“大唐太子故少师中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李昭公神道碑”。碑文正书，约36行，行84字。于志宁撰，于立政书。此碑笔致整洁俊逸，惜碑字大多磨灭。崔敦礼为唐初名臣，两《唐书》均有传。此碑多有可补正史籍者。

房仁裕碑 约唐高宗在位时（649—683）刻立。原仆于礼泉县烟霞乡岩峪村东南房仁裕墓前，近代出土，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324厘米、下宽106厘米、厚34厘米。额篆题“大唐故清河房忠公神道之碑”。崔融撰，房琳书。碑文正书37行，行约76字。碑下截字尚可读，余均磨灭。睦州女子陈硕贞举兵反唐后，房仁裕曾奉诏率军镇压。两《唐书》未为立传，此碑可补史之阙。

述圣记碑 唐文明元年（684）刻立。竖于乾陵陵园，位于神道之西。碑用七块巨石累积而成，故俗称“七节碑”。碑通高691厘米，截面为方形，边长186厘米。武则天后撰，中宗李显书。碑是为高宗歌功颂德，故称“述圣记”。七块巨石中，上下两石为顶和座。顶为庀殿式，庀顶下西南角和东南角各有一浮雕蹲踞力士。座四面线雕獬豸纹等，其神异色彩颇浓。碑正面刻文，原来字画上“填以金屑”，其余三面平素。碑文除第三石全部泐灭外，第一、二、四石存字较多。书法整饬，共64行，行120字，约计8000字左右，可谓碑中巨制。碑文为骈体，主要记述了高宗初立为皇太子事及追随太宗征战、奉侍太子疗疾等事，还记述了高宗即位后的文治武功以及临终前戒厚葬留遗嘱等事。此碑明万历以前已仆，1957年乾县人民政府曾加以整修。

顺陵残碑 武周长安二年（702）刻立。碑原竖于渭城区底张镇韩家村顺陵陵园，是则天皇帝为其母杨氏所立。明嘉靖三十四年（1556）关中大地震中仆地，后被咸阳县令派人打成碎块，用于修补渭河堤岸。清初渭河堤决，发现三块，移藏县署。其后最大的一块又断为三截，使原存残石变为五块。1964年在底张水利工地出土两块，1965年又在原咸阳县文庙门前水道工地上

出土一块，共得残碑8块，存283字。碑文为梁王武三思奉敕撰，相王李旦奉敕书。正书，约45行，行约98字，全文4449字。孙星衍《续古文苑》录有全文。碑文兼用武皇所造新字。碑字体方正，健壮有力，稍兼篆隶，古雅拙朴，世称名碑。残碑现存咸阳博物馆。

乾陵“无字碑” 唐神龙二年（706）立。竖于乾陵陵园，位于神道之东。此碑为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碑首作“九螭下垂”（其他文武大臣碑首均作“六螭下垂”），碑趺为长方形。通高753厘米、宽210厘米、厚149厘米，总重约98.8吨。碑侧各镌一升龙。碑趺正面线刻狮马相斗图。其形体之高大雄浑，雕刻之瑰丽精美，堪为唐碑之冠。因其当初无字，故世称“无字碑”。自北宋崇宁二年（1103）开封王谷其人按行边部，道经奉天，拜谒乾陵，于无字碑上题刻以来，止于明代，在上题词者凡39人，遗留题刻共42段，其中较有价值、而且保存完好的是碑阳正中所刻金天会二年（1134）《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前段为契丹小字（旧误认为女真文字），后段为正书汉字。两种文字工整俊秀，苍劲有力，极为珍贵。题记中所谓“皇弟”为金太宗完颜晟之弟撒里喝，其所记之事亦有一定历史价值。

何汉南《唐代乾陵石刻取象初探》一文依据《周礼·考工记》中“左祖右社”之说，认为乾陵神道之西的《述圣记碑》可称“石社”，神道之东的这通“无字碑”可称“石祖”。文中引用了《唐书·韦湊传》中一段记载：“开元二年夏，敕靖陵建碑，……湊（指韦湊）以自古园陵无建碑之礼，飞表极谏，工役乃止。”据此以为唐代既认为古陵园不立碑，因而“无字碑”也就不应称碑。此略备一说。

姜遐碑 约唐玄宗即位后（712）刻立。此碑早年断裂，碑首及上截遗失，仅余下截，故金石家称之为“姜遐断碑”。1974年在礼泉县昭陵乡庄河村姜遐墓附近发现碑首及上截，始成全碑。碑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279厘米、下宽103厘米、厚31厘米，额篆书“大唐故吏部尚书姜府君之碑”。碑文正书34行，行70字。下截因捶拓既久，字已磨灭殆尽；上截断为两块，碑首与碑身相接处亦已断裂。然因出土不久，文字大部清晰。姜暉撰文并书。此碑书法绰约，正书中略带行意，体势规模虞世南，笔画柔圆而有力，大方而姣媚。其于姜遐事迹记述甚详，足以补史。

契苾明碑 唐先天元年（712）刻立。原在渭城区渭阳乡药王洞村北契苾明墓前。碑为螭首方趺，碑身高328厘米、宽150厘米。碑额减底平铍篆题“大唐故大将军凉国公契苾府君之碑”。姜师德撰，殷玄祚书，正书37行，行

77字。字多泐蚀，但尚可读。书者殷玄祚为殷仲容之子、殷令名之孙，三世俱有能书名。此碑笔法虽不及其祖、父，亦自瘦劲可观。现存咸阳博物馆。契苾明为唐初铁勒别部首领、镇军大将军、凉国公契苾何力长子，官至左鹰扬卫大将军，兼贺兰都督，袭爵凉国公。《唐书》虽有传而极略。此碑可补史阙。

冯仁杰碑 唐开元十一年（723）刻立。原在渭城区窑店镇刘家沟原上。1962年移入咸阳博物馆。碑为螭首，碑身高203厘米、下宽100厘米、厚27厘米。额篆题“大唐故朝散大夫守沁州刺史冯公之碑”。崔尚撰，郭谦光书并篆额。碑文隶书19行，行37字。碑文泐蚀过甚，难以成读。郭谦光是唐代书法名家之一，所书碑文堪称隶书精品。

恒山愍王李承乾碑 唐开元二十六年十二月四日（739年1月17日）刻立。原仆于礼泉县烟霞乡马寨村西南李承乾墓前，1975年发现，移入昭陵博物馆。碑首及碑身上端残缺，残高152厘米、下宽105厘米、厚29厘米。碑文篆书，15行，行存字不等。李承乾为唐太宗长子，贞观九年立为太子，十七年度为庶人，十八年死于黔州，开元二十四年追封为恒山郡王，谥曰愍。李承乾两《唐书》均有传，此可与传互补。碑文全为篆书者不多见。

唐俭碑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重刻。原存于礼泉县北屯乡西页沟村东南唐俭墓前。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360厘米、下宽120厘米、厚34厘米。额隶题“唐故特进莒国公唐府君之碑”。碑文正书40行，行85字。碑上端部分文字尚为清晰，余多磨泐难识。此碑无撰、书者姓名，然书法轻圆秀劲，卓然名家。唐俭为唐初名臣，两《唐书》均有传，碑中所述，可以补史。

臧怀恪碑 唐广德元年（763）刻立。原竖三原县陵前乡三家店村。碑高467厘米、宽124厘米。额篆题“唐故东莞臧公神道碑”。碑文正书28行，行64字。颜真卿撰并书，李秀岩篆额。王昶《金石萃编》以其立于大历三年（768），此从杨震方《碑帖叙录》。此碑书法伟劲，不减其他著名颜碑。文记臧怀恪参与抵御突厥等事，可补两《唐书》之阙。现移存于西安碑林。

姜嫄公刘新庙碑 约唐贞元九年（793）刻立。1935年邠县城中修建碉堡时，于姜嫄庙残砖中发现，《中央日报》曾予报道。先移存县署保管，其后弃置县西街忠烈祠戏台后，1955年移至县文化馆。“文化大革命”初被当作“四旧”弃于垃圾坑内，1972年省文物部门查询时复刨出由县文化馆保存。碑为大中大夫高郢撰文，侍御史韦丹建立，处士张瑄篆额，大理评事张

谊所书。行书 28 行，行 49 字。此碑书法绝佳，镌工尤美，惜发现时已经两断，残缺不全。现存 1620 余字，主要是颂扬周族远祖姜嫄、公刘之德，记述重修姜嫄公刘新庙之事。碑中既云“粤以贞元六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庙于南郭”，又云“祠成三岁矣而铭记尚阙”，可知此碑镌于贞元九年。碑前两行空处有明末邠州学官范文光题记，可知明代此碑尚竖于庙中。

荐福寺大戒大德律师碑 唐大历六年（771）刻立。原存大戒大德律师家乡泾阳县。碑高 234 厘米、宽 74 厘米。碑额篆书“唐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大德律师之碑”。碑文隶书 16 行，行 36 字，右下角残缺 11 字，余皆完整。韩云卿撰文，书法颇具骨力。为唐代书法名碑之一。现存泾阳县博物馆。

寂照和上碑 唐开成六年（841）刻立。原在咸阳县魏店村，后移至县城内凤凰台，民国时移至县民教馆，今存咸阳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 212 厘米、宽 74 厘米、厚 21 厘米。段成式撰文，僧无可书，顾玄篆额，李郢刻字。额篆题“唐故安国寺寂照和上碑”。碑文正书 29 行，行 52 字。此碑撰文者段成式为唐代文学家。书者无可和尚为诗人贾岛之弟，与柳公权同时，模仿柳书而妍媚多姿。

刘沔碑 唐大中二年（846）刻立。原在永寿县好时河畔刘沔墓前，现移存永寿县文化馆碑亭。碑为螭首龟趺，通高 284 厘米、宽 98 厘米。额篆题“唐故太子太傅致仕赠司徒刘公神道碑”。碑文正书 36 行，行 65 字。韦博撰，柳公权书，唐元度摹勒并篆额。碑文漫漶，约三分之二的字尚清晰。此碑为柳公权 70 岁书。结构严谨，笔力遒劲，较其所书冯宿神道碑更为清秀挺拔。

大宋新修周武王庙碑 宋开宝六年（973）刻立。原在咸阳城内周四王庙（今渭城区果子市小学），1963 年移入咸阳博物馆。碑为螭首龟趺。碑身高 230 厘米、宽 114 厘米，已断为两截。额正书“大宋新修周武王庙碑”。卢多逊奉敕撰，孙崇望奉敕书。行书 24 行，行 55 字。碑文泐蚀过甚，模糊难辨。孙崇望为北宋书家，时称“院体”。

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 宋开宝六年（973）刻立。原竖于礼泉县骏马乡旧县村（宋醴泉县治）唐太宗庙遗址。1975 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为螭首，身首高 292 厘米、下宽 103 厘米。碑阳刻《大宋新修唐太宗庙铭并序》，李莹奉敕撰，孙崇望奉敕书。额正书“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碑文行书 23 行，行 50 字左右不等。碑阴刻游师雄《唐太宗昭陵图》，其上段正书题记 41 行，行 19 字；下段线刻昭陵图。宋绍圣元年（1094）游师雄题，杨安书，魏敏刊，醴泉知县符寤刻石。

大观圣作碑 宋大观二年（1108）刻立。原存乾州文庙。现移存西安碑林。宋徽宗赵佶撰并书，李时雍摹写上石。碑为螭首龟趺，高378厘米、宽140厘米。正书28行，行69字。额为蔡京行书“大观圣作之碑”，文记宋代学校制度较详。赵佶能书，书体纤细秀劲，横竖收笔多带钩，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后人称之为“瘦金体”。同一碑，当时分刻于数处。惟此碑较赵佶其他手迹瘦直、挺拔，加以刻技精湛，尤能显出“瘦金体”的艺术特点。

金重修唐太宗庙碑 金天眷元年（1138）刻立。原竖礼泉县骏马乡旧县村唐太宗庙遗址，1975年移入昭陵博物馆。碑身首高284厘米、下宽106厘米、厚34厘米。孙九鼎撰，康庆立石，庙住持刻字。碑文正书27行，行54字。碑中部断裂。此碑主要是颂扬唐太宗的功绩及重修太宗庙之事。

广教禅院牒碑 金大定四年（1164）刻立。原存咸阳县睦村广教寺内，后移入咸阳博物馆。碑为圆首，身首一体，通高163厘米、宽77厘米、厚13厘米。碑文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刻《尚书礼部牒》原文，文9行，行2—32字不等。下部刻《咸阳县睦村广教禅院记》，王靖撰，徐颐书，沙门普满建。正书22行，行26字。此碑为研究金朝宗教管理提供了可靠资料。

重阳王祖师仙迹记 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刻立。原存咸阳市双照乡大魏村，1963年移存咸阳博物馆。碑为螭首方趺，身首高332厘米、宽127厘米、厚34.3厘米。额隶题“重阳王祖师仙迹记”。碑文正书，27行，行57字。刘祖谦撰，刘汾题额并书，杨志纯立石。此碑记述了大魏村人王喆（道号“重阳”）的生平及其创建道教全真派之事，对研究金元时期全真教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其碑书法刚柔得体，亦有可观。

重修重阳天圣宫碑 明嘉靖四年（1525）十月立。原存咸阳市双照乡大魏村（王重阳故里）。1963年移存咸阳博物馆。碑为蟠首，身首一体，通高280厘米、宽100厘米、厚25厘米。额篆书“重修重阳天圣宫碑记”9字。碑文正书26行，行56字。翰林院检讨、经筵讲官鄠县王九思撰，辽东巡按监察御史邑人张纬篆额，江西道监察御史、邑人王献书。本宫道人立石。碑字书法健秀。文记王重阳生平事迹及重修天圣宫始末，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撰者王九思为明“前七子”之一。碑虽碎为五块，然碑字大部完好清晰。

淳化县地粮记碑 明万历十年（1582）秋刻立。原在淳化县政府。碑身首一体，通高180厘米、宽73厘米、厚20厘米。额正书“淳化县地粮记”6字。碑文正书29行，行59字。知县李应科等立。碑文详列西安府邠州淳化

县所辖 15 里中各里地粮数目、全县地粮数目及全县“上上”、“上下”、“中上”、“中下”、“下上”及“下下”各等地的地粮数目。据《明史·食货志》载：“万历六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此碑所载，当是此次奉令丈量田亩的翔实记录。碑阴刻万历二十六年（1598）二月欧阳煖《题名碑记》。现存淳化县文化馆。

清防护唐昭陵碑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立。原竖于礼泉县烟霞乡东坪村燕妃墓前，1975 年移入昭陵博物馆。仅存碑身，身高 170 厘米、宽 106 厘米，毕沅撰文，钱坫篆书，孙星衍摹勒并篆额，王景恒刻字。碑文 28 行，行 55 字。毕沅当时为陕西巡抚、著名学者，钱坫、孙星衍亦均为清代著名篆书家和学者，此碑为毕沅注意保护唐太宗昭陵的实证。

刘古愚墓表 1933 年刻立，曾被置于秦都区马庄乡天阁村一饮水槽底，近年被刘古愚后裔移存其家，保存完好。碑身首一体，通高 205 厘米、宽 85 厘米、厚 20 厘米。额篆题“清征士刘古愚先生墓表”。碑文正书 21 行，行 64 字。陈澹然撰，宋联奎书，高树基篆额，刘安国立石，郭希安刻字。碑文主要是表彰刘古愚的为人和业绩。书法俊秀，刻工精美。

李雨田碑 1939 年刻。原存李氏家中，现移存三原县博物馆。碑刻于六块长方形石条上，石条均长 90 厘米，宽 32 厘米，厚 13 厘米。每石 16 行，每 4 行一组，行字数不等，多为 7 字，字为草书。于右任撰文并书。字迹清晰，保存完好。据碑文后自跋，此碑文系于右任于 1934 年书过后所重书。李雨田为三原富商，为人豪爽，清末曾救助于右任于危难。1918 年靖国军总司令部驻扎三原时，又曾协助靖国军筹划财政。

我的双亲墓碑记 1941 年刻立。原竖咸阳县北杜镇李敷仁父母墓前，后移至其侄李共平家后院。碑为圆首，身首一体，高 163 厘米、宽 66.5 厘米、厚 15.5 厘米。额正题“中华民国”四字。碑由李敷仁撰并书。楷书。正文 23 行，行 56 字，共 1323 字。李敷仁以创办《老百姓》报而闻名。碑文记述了清末至民国期间关中地区的许多社会情况，不仅是研究李敷仁生平的第一手资料，亦是研究近代陕西历史的宝贵资料。碑文纯用白话文体，并加了新式标点符号，语言通俗流畅，记叙生动感人，在现存碑石中甚为特殊。

第四节 墓 志

侯僧伽墓志 西魏大统十年（544）葬，1984 年出土于渭城区窑店乡胡家沟村北侯义墓中。侯义字僧伽，故志末书作“侯僧伽墓志”。无盖，志石

为正方形，边长 67 厘米、厚 7 厘米。正书 12 行，行 13 字。书法俊秀。“五”字故作篆书，“月”、“日”二字故作象形字，颇为别致。据志文，侯僧伽为侯刚之孙、侯渊之子。侯刚《魏书》、《北史》均有传，《魏书》本传谓“刚以上谷先有侯氏，于是始家焉”，与志中“燕川上谷居庸县人”相合，但侯刚传仅著其长子侯详，据志中僧伽“幼而丧父”之语判断，疑其父亦早死，功业未立，故史传不及。西魏墓志少见。此墓志可补史阙。《魏书》、《北史》有侯渊传，自是另一人，与侯僧伽无关。墓志现存咸阳博物馆内。

贺兰祥墓志 北周保定二年（562）葬。1965 年出土于今渭城区周陵乡贺家村。墓志为正方形。志盖边长 86 厘米、厚 13 厘米。盖面篆书“周故太师柱国大司马凉国景公之墓志”16 字。志石边长 86 厘米、厚 14 厘米。正书 40 行，行 41 字。字体隶意极浓，个别字仍存篆体。贺兰祥之母为周文帝姊建安长公主。贺兰祥北周累官柱国、大司马，进封凉国公，卒赠太师。《周书》、《北史》均有传。志文较本传记述详确，足可补史。现存咸阳博物馆。

拓跋虎墓志 北周保定四年（564）葬。1990 年 4 月发现于渭城区渭城乡坡刘村拓跋虎墓中。墓志为正方形。志盖盃顶，平素无纹，盖面隶书“大周邓城郡君墓志铭”9 字。墓志边长亦 42 厘米。志石刻栏，志文正书，28 行，行 28 字。无撰书者姓名。拓跋虎为鲜卑贵族，累官至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周书》、《北史》未为立传，此志可补史之阙。

董荣晖墓志 北周保定五年（565）葬。1988 年夏出土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王士良与其妻董荣晖合葬墓中。墓志为方形。志盖为盃顶，盖面篆书“周大将军广昌公故夫人董氏之墓志铭”16 字，四边无纹饰。墓志边长 49 厘米。志文正书 25 行，行 27 字。无书者姓名。四边亦无纹饰。董荣晖为北周大将军王士良之妻。王士良《周书》、《北史》均有传。此志可以补史。

叱罗协墓志 北周建德四年（575）葬。1989 年出土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南叱罗协墓中。墓志为正方形。志盖盃顶，平素无纹。盖面篆书“大周开府南阳公墓志”9 字。墓志边长 73.3 厘米。志文隶书，35 行，行 37 字。无撰书者姓名。四侧无纹饰。叱罗协为北周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封南阳郡公。《周书》、《北史》均有传，此志可与史互补。

王德衡墓志 北周建德五年（576）葬。1988 年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王德衡墓中出土。墓志为正方形。志盖盃顶，平素无纹。盖面篆书“太原王使君墓志之铭”9 字。墓志边长 51 厘米。志文正书，22 行，行 23 字。无撰、书者姓名。王德衡为王士良之子，官至周使持节、仪同大将军。正史无

传，此志可补史之阙。

北周武帝宇文邕孝陵墓志 北周宣政元年（578）葬。1995年元月于渭城区底张镇陈马村南北周武帝宇文邕孝陵墓室甬道口出土。正方形。志盖盪顶，素面无文，志石正面镌“大周高祖武皇帝孝陵”9字。边长85厘米。帝陵墓志出土极为罕见。此墓志不仅为确定北周孝陵提供了可靠证据，亦对研究历代墓志的演变提供了宝贵资料。

独孤藏墓志 北周宣政元年（578）葬。1988年8月出土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独孤藏墓中。墓志为正方形。志盖盪顶，盖面正书“大周金州刺史武平公独孤使君之墓志”16字。四杀及四侧线刻卷草及朱雀图案。墓志边长54厘米。志文正书29行，行29字。无撰、书者姓名。四侧线刻十二生肖图案。独孤藏为北周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之子，官至大都督、金州刺史。《周书》、《北史》未为立传。此志可补史阙。

若干云墓志 北周宣政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579年2月4日）葬。1988年5月出土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若干云墓中。墓志为正方形。志盖盪顶，盖面篆书“上开府仪同三司任城郡公若干公墓志”16字。四杀及四侧均线刻卷草及朱雀图案。墓志边长57厘米。四侧无纹饰。志文正书27行，行29字。若干云为周武帝婿。官至骠骑大将军、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封任城郡公。《周书》、《北史》未为立传。此可补阙。志文首行“十二月己酉”疑为“乙酉”之误（因是月无己酉，己酉在下一月）。

尉迟运墓志 北周大成元年（579）葬。80年代末出土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尉迟运墓中。墓志为正方形。志盖盪顶，盖面篆书“大周上柱国卢国公志”9字。志文四周线刻忍冬纹饰，四杀线刻忍冬纹与莲籽纹饰，四侧无纹饰。墓志边长73厘米。志文37行，行37字。四侧无纹饰。无撰、书者姓名。尉迟运官至使持节、上柱国，封卢国公。为北周大臣。《周书》、《北史》均有传。此志可补史之阙。

北周武德皇后阿史那氏墓志 隋开皇二年（582）葬。1993年8月出土。现藏咸阳市文物保护中心。经调查，此墓志出土于渭城区底张镇陈马村南北周武帝孝陵墓中。墓志为正方形，青石质，志盖和志石边长均50厘米，厚11厘米。志盖顶边长40厘米，其上篆书“周武德皇后志铭”7字，斜杀及唇均为素面。志石正书7行，行7字，文曰：“大隋开皇二年岁次壬寅四月甲戌朔廿三日乙未，周武帝皇后阿史那氏徂，谥曰武德皇后，其月廿九日壬寅合葬于孝陵。”四侧亦为素面。志文谓开皇二年四月二十三为“乙未”，据其月

甲戌朔推之，乙未为二十二日。“廿三日乙未”当为“廿二日乙未”之误。

李和墓志 隋开皇二年（582）葬。1964年出土于三原县陵前公社李和墓中。墓志为正方形，边长68厘米。志盖面部篆书“大隋上柱国德广肃公李使君之墓志铭”16字。周边线刻花草及青龙等图案。志文正书33行，行34字。其书法承北魏书法之神韵，书体瘦劲俊丽。字属正书，仍有隶书笔意。志石四边线刻山、树、草及动物等纹饰。李和本名庆和，北周累迁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夏州刺史，赐名意。隋开皇元年迁上柱国，复名和。《周书》、《北史》均有传。此志较本传记述为详，可以补史。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王士良墓志 隋开皇三年（583）葬。1988年夏出土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王士良墓中。墓志为方形。志盖呈盃顶，盖面篆书“大隋上大将军广昌肃公墓志”12字。墓志长65厘米、宽68厘米。四边均无纹饰。志文正书40行，行37字。无撰书人姓名。王士良先事北齐，官至侍中、吏部尚书、开府仪同三司，出为豫州道行台、豫州刺史。后降北周，授大将军、小司徒，赐爵广昌郡公，加授上大将军。隋开皇元年卒。《周书》、《北史》均有传。此志文详，可以补史。

独孤罗墓志 隋开皇十九年（599）葬。1953年出土于咸阳县底张湾村。墓志为正方形，边长均为83厘米。志盖面部篆书“隋使持节大将军赵国德公独孤君墓志”16字。志石正书28行，行30字。独孤罗为北周大将军独孤信长子、隋文帝独孤皇后之长兄。先被囚于北齐，后归北周，拜仪同。隋文帝即位，袭爵赵国公，进位上柱国，征拜左武卫大将军。《周书》、《隋书》、《北史》均有传。《北史》本传谓“炀帝嗣位，改封蜀国公。未几卒官，谥曰恭”，而此志葬于文帝开皇十九年，志盖称“赵国德公”，是独孤罗于文帝时已死、谥号曰德，且仍为赵国公。《北史》记载显误。此志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贺拔毗沙墓志 隋仁寿元年（601）葬。80年代末出土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尉迟运与贺拔毗沙合葬墓中。墓志为正方形。志盖呈盃顶，因残损过甚，盖面文字、纹饰不清。志石边长50厘米。志文正书25行，行27字。无撰、书者姓名。四边无纹饰。贺拔毗沙为北周太师贺拔胜之女、北周卢国公尉迟运之妻。志云：隋仁寿元年与夫“合葬于雍州泾阳县奉贤乡静民里”，而其夫志谓周大成元年“葬于咸阳县泾阳县洪渎乡永贵里”。这为研究当时地名变更及政区沿革提供了可靠资料。

李寿墓志 唐贞观五年（631）葬。1973年出土于三原县焦村李寿墓。墓志为兽首龟形，这是建国以来出土的惟一的一合龟形墓志。墓志由志盖、志铭和底座三部分组成，其中志铭及底座为合石而刻。志盖呈龟背状，以龟甲纹为主，并饰有联珠、水波等纹饰，中部篆书“大唐故司空公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16字。志铭兽首双目圆睁，四肢变曲有力，四爪紧扣底座。志文正书31行，行31字。铭文四杀饰水波纹，龟身饰龟甲纹。底座呈长方形，四侧饰水波纹。无撰、书者姓名。从志文可知，李寿为唐高祖李渊从弟、太宗李世民从叔。志称李寿与刘黑闥作战“累致克捷”，但《旧唐书·宗室诸子传》则谓其“全军陷没”。墓志为尊者讳之弊，于此可见一斑。墓志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杨恭仁墓志 唐贞观十四年（640）葬。1979年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山底村杨恭仁墓中。志盖厚13.8厘米、底边长87.3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特进观国公杨君墓志”12字。四杀饰四神。志石边长87.4厘米、厚14厘米。志文正书37行，行37字。四侧饰十二异兽。无撰、书者姓名，志盖纵向断裂。杨恭仁为隋朝旧臣，唐高宗、太宗时相继为相，两《唐书》均有传。《旧唐书》本传谓“杨恭仁本名纶”，此志云“公姓杨氏，讳温，字恭仁。”志文谓其名温，而两《唐书》均直称“杨恭仁”，盖其本名纶，改名温，世以字行。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长乐公主李丽质墓志 唐贞观十七年（643）葬。1986年秋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陵光村长乐公主墓中。志盖厚12.2厘米、底边长98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长乐公主墓志”9字。四杀饰四神。志石边长98.1厘米、厚13.5厘米。志文正书33行，行33字。四侧饰十二生肖。无撰、书者姓名。志盖左下角残缺，志石已碎为数块。长乐公主为唐太宗第五女，长孙皇后所生，卒年仅23岁，《新唐书》有传，极简，此志可以补史。墓志现陈列于昭陵长乐公主墓中。

王君愕墓志 唐贞观十九年（645）葬。1972年10月出土于礼泉县昭陵乡庄河村王君愕墓中。志盖厚11.2厘米、底边长89.2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幽州都督邢国公王君之墓志铭”16字，四杀饰四神。志石边长89.2厘米、厚13.5厘米。志文正书31行，行31字。四侧饰十二生肖。无撰、书者姓名。王君愕为唐太宗亲征辽东时阵亡将领。志文中所记君愕卒日与《新唐书·太宗本纪》所载不合。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薛颙墓志 唐贞观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647年1月25日）葬。1974年

4月出土于礼泉县北屯乡西页沟村薛颐墓中。志盖厚11.5厘米、底边长53.2厘米，盖面篆书“唐故中大夫紫府观道士薛先生墓志铭”16字。四杀饰四神。志石边长53.2厘米、厚9.4厘米。志文正书29行，行30字。无撰、书者姓名。薛颐为唐初天文学家，曾任太史令。两《唐书》均有传。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李思摩墓志 唐贞观二十一年（647）葬。近年出土于礼泉县昭陵乡庄河村李思摩墓中。志盖厚8厘米、底边长64厘米。盖面篆书“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兵部尚书李君铭志”16字。四杀饰四神。志石边长64厘米、厚13厘米。志文正书34行，行35字，四侧饰十二生肖。无撰、书者姓名。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为突厥族将领，后归唐，赐姓李。两《唐书》均有传。志文记述思摩家世及事功较本传为详，且多有不合，可补正史籍。志现存昭陵博物馆内。

统毗伽可贺敦延陀墓志 唐贞观二十一年（647）葬。近年与其夫李思摩墓志一同出土于二人合葬墓中。志盖厚7厘米、底边长59厘米。盖面篆书“唐故李思摩妻统毗伽可贺敦延陀墓志”16字。四杀饰四神。志石边长59厘米、厚10.5厘米。志文正书25行，行25字。四侧饰十二生肖。无撰、书者姓名。“可贺敦”是古代突厥族对可汗妻的尊称。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窦诞墓志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葬。1985年出土于渭城区顺陵内阙门外西南角窦诞墓中。墓志为方形。志盖呈覆斗状。厚13厘米、底边长70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光禄大夫工部尚书使持节都督荆州刺史驸马都尉上柱国莘安公窦府君墓志铭”36字。周边刻葡萄图案，四杀刻四神，四侧刻缠枝花纹。志石边长70厘米、厚12厘米。志文正书39行，行39字，四侧刻十二壶门，壶门内分别饰十二生肖图案。无撰、书人姓名。窦诞为唐高祖之女襄阳公主驸马，两《唐书》均有传。据《新唐书》本传，贞观中“太宗与语，昏谬失对”。太宗乃下诏曰：“诞比衰耗，不能事事，朕知而任之，是谓不明。且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其以光禄大夫罢就第。”此为唐太宗任人惟贤的一段嘉话，而墓志言及此事却云：“公志尚清旷，性笃逍遥。……其年上表请致仕，蒙敕允之，授光禄大夫。”墓志为亲者讳，此亦一例。墓志现存咸阳博物馆。

牛进达墓志 唐永徽二年（651）葬。1976年4月出土于礼泉县赵镇石鼓村西北牛进达墓中。志盖厚13.4厘米、底边长70.5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左武卫大将军上柱国琅琊郡开国公牛府君墓志之铭”25字。四杀饰四神。

志石边长 70.5 厘米、厚 12.5 厘米。正书 39 行，行 39 字，四侧饰十二生肖。无撰、书者姓名。牛进达为唐初重要将领，两《唐书》未为立传，此可以补阙。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唐俭墓志 唐显庆元年（656）葬。1978 年 3 月出土于礼泉县北屯乡西页沟东唐俭墓中。志盖厚 12.1 厘米、底边长 73.2 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特进户部尚书上柱国莒国公唐君墓志”25 字，四杀饰四神。志石边长 73.2 厘米、厚 11.6 厘米。许敬宗撰。正书 46 行，行 45 字。四侧饰十二生肖。唐俭两《唐书》均有传。志文中所记其生平事业不少为本传所无，可补史籍之阙。撰文者许敬宗为唐代大臣。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张士贵墓志 唐显庆二年（657）葬。1972 年 1 月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马寨村西南张士贵墓中。志盖厚 15.1 厘米、底边长 98.1 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铭”20 字。志石边长 98.2 厘米、厚 15.1 厘米。上官仪撰，张玄靓书。正书 55 行，行 57 字。志盖已残。书法方正瘦劲，为唐志中佳品。张士贵两《唐书》均有传。墓志记张士贵于贞观六年以鹑州道行军总管平“獠”之事，唐史均失载。志称“东西王洞獠”，与《册府元龟》同，而《旧唐书·太宗本纪》作“东西五洞獠”，似误。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尉迟敬德基志 唐显庆四年（659）葬。1971 年冬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烟霞新村公路北侧尉迟敬德基中。志盖厚 23.1 厘米、底边长 120 厘米。盖面飞白书“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忠武公尉迟府君墓志之铭”25 字。四杀饰缠枝牡丹纹。志石边长 120 厘米、厚 20 厘米。志文正书 47 行，行 50 字。四侧饰十二生肖，间饰流云纹。无撰、书者姓名。墓志形体宏伟，字迹整齐可观，线刻生动逼真，为唐志中佳品。尉迟敬德两《唐书》均有传。《旧唐书》本传仅作“尉迟敬德”，《新唐书》本传云：“尉迟敬德名恭，以字行”。而志文谓“公讳融，字敬德。”墓志为当时所书，似较可信。又，志谓其曾祖本真曾任后魏冠军将军、幽州刺史。祖孟都曾任“齐左兵郎中”、“周济州刺史”。父伽曾任“隋仪同（三司）”。《太平广记》谓其微时曾以“锻铁”为业，似不可信。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鄂国夫人苏斌墓志 唐显庆四年（659）葬。1971 年冬与其夫尉迟敬德基志一起出土。志盖厚 18.1 厘米、底边长 99.1 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忠武公夫人苏氏墓志之铭”25 字。四边四杀及四侧皆饰缠枝牡丹纹。志石边长 99.1 厘米、厚 18.1 厘米。志文正书 34 行，行 34

字。四侧饰十二生肖。无撰、书者姓名。书体严谨有力，线刻精细生动，亦为唐志中佳品。鄂国夫人为尉迟敬德元配。志载其曾祖毅为后魏“太府卿”。祖元吉为“齐秘书郎”。父谦先后为“齐安南王府西曹祭酒，隋仪同三司、檀州诸军事、檀州刺史。”其家显为宦族。苏氏约于隋开皇九年出嫁，当时门阀观念极重，若敬德微时以“锻铁”为业，两姓难以联姻。墓志对了解敬德出身提供了新的证据。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郑仁泰墓志 唐麟德元年（664）葬。1971年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马寨村西南郑仁泰墓中。志盖厚12.1厘米、底边长72.1厘米。左部残缺，可见“大唐右武卫大将军使持节”诸字。志石边长72.1厘米、厚13.5厘米。志文正书37行，行37字。四侧饰十二异兽，无撰、书者姓名。右上角断裂。志文书体遒劲有力。郑仁泰玄武门之变中曾立大功。后累官至右武卫大将军、凉甘肃伊瓜沙六州诸军事、凉州刺史。为唐初名将，两《唐书》未为立传。此可补阙。《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作“郑仁泰”，《新唐书·长孙无忌传》作“郑仁恭”，所述同为玄武门事，以志证之，可知《新唐书》之“恭”为“泰”之误。墓志存昭陵博物馆。

程知节墓志 唐麟德二年（665）葬。1986年4月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上营村西程知节墓中。志盖厚15.1厘米、底边长78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骠骑大将军卢国公程使君墓志”16字。四杀饰四神。志石边长78厘米、厚14.9厘米。志文正书45行，行46字。四侧饰十二生肖。无撰、书者姓名。程知节俗称程咬金，两《唐书》均有传。《旧唐书》本传谓以葱山道行军大总管讨贺鲁事在显庆二年，志文谓在显庆初，即显庆元年，与《旧唐书》之《高宗本纪》及《回纥传》同，可知《旧唐书》本传记载有误。墓志存昭陵博物馆。

李震墓志 唐麟德二年（665）葬。1973年5月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烟霞新村李震墓中。志盖厚13.1厘米、底边长83.3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梓州刺史使持节定国公之墓志”16字。四杀饰四神。志石边长83.3厘米、厚12.4厘米。志文正书37行，行37字。四侧饰十二生肖。无撰、书者姓名。李震为李勣之子。《新唐书·李勣传》谓李震“终桂州刺史”，而据墓志，“桂”当为“梓”之讹。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唐太宗贵妃韦珪墓志 唐乾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667年1月28日）葬。近年发现于礼泉县烟霞乡陵光村中岭韦贵妃墓中。志盖厚19厘米、底边长84厘米。盖面篆书“唐太宗文皇帝故贵妃纪国太妃韦氏铭”16字。志石

边长 84 厘米、厚 20 厘米。志文正书 39 行，行 38 字。志盖与志石表面局部泐蚀。志文作者为史学家令狐德棻。韦贵妃为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卒后宫中之至尊者，为纪王李慎及临川公主李孟姜之母。两《唐书》未为立传，其神道碑虽存而文已泐灭，此志可补史之阙。

曹钦墓志 唐乾封二年（667）葬。1988 年咸阳市文物普查队发现于乾县。志盖已佚。志石为青石质，正方形。边长 105 厘米、厚 12 厘米。四侧线刻缠枝忍冬纹。志文行书。46 行，行 44 字。首行题“大唐故左骁卫大将军上柱国云中县开国公曹府君墓志铭并序”。无撰、书者姓名。曹钦为京兆郡好畤县（治今乾县西北）人，唐初大将，曾多次从征，先后任交河道总管、灵武道总管、葱山道总管，拜上柱国、左骁卫将军，封云中县公。两《唐书》未为立传，此可补史之阙。墓志现存咸阳市文物保护中心。

李勣墓志 唐总章三年（670）葬。1971 年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烟霞新村西李勣墓中。志盖厚 15 厘米、底边长 86 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司空公太子太师赠扬州大都督上柱国英国公李公墓志之铭”28 字。志石边长 82 厘米、厚 17 厘米。刘祎之奉敕撰文。正书 55 行，行 54 字。李勣两《唐书》均有传。据《新唐书》本传，贞观三年，李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而 1975 年中华书局校点本《旧唐书》本传则改“通漠道”为“通汉道”，并作校勘记，然此志作“通漠道”，可知中华书局校点本校勘有误。志文所记与两《唐书》本传多有不合，可资补正。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王大礼墓志 唐咸亨元年（670）葬。1964 年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山底村东王大礼墓中。志盖厚 10.5 厘米、底边长 75 厘米。盖面正书“大唐故歙州刺史驸马都尉王君墓志铭”16 字。志石边长 75 厘米、厚 11 厘米。崔行功撰文，敬客师正书。共 41 行，行 41 字。盖面及志石表面局部剥蚀。王大礼为太宗之女遂安公主驸马。王大礼两《唐书》未为立传。《新唐书·诸帝公主传》云：“遂安公主，下嫁窦遼。遼死，又嫁王大礼。”至于王大礼生平事迹，则略而未书。此志可补史之阙。墓志原为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现存昭陵博物馆。

斛斯政则墓志 唐咸亨元年（670）葬。1979 年 4 月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上营村西斛斯政则墓中。志盖厚 14.7 厘米、底边长 71 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斛斯君墓志铭”9 字。志石边长 71.5、厚 14.6 厘米。志文正书 51 行，行 50 字。斛斯政则擅长养马。先事隋，继事唐，累官至右监门卫大将军。两《唐书》未为立传。中华书局《旧唐书》和《新唐书》点校本或与“斛斯政”

混为一人，或误作“斛斯正”。此墓志可补正史籍。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赵王李福墓志 唐咸亨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672年2月1日）葬。1972年5月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岩峪村西北李福墓中。志盖厚18厘米、底边长112.5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赠司空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赵王墓志铭”19字。志石边长112.5厘米、厚15厘米。志文正书41行，行38字。四侧饰十二生肖。无撰、书者姓名。志石表面局部剥蚀。赵王李福为太宗之子，官至梁州都督，两《唐书》均有传。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越国太妃燕氏墓志 唐咸亨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672年2月1日）葬。1990年5月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东坪村东燕妃墓中。志盖厚18厘米、底边长96.5厘米。盖面篆书“大唐越国故太妃燕氏墓志铭”12字。志石边长96.5厘米、厚18.2厘米。志文正书50行，行48字。燕氏为太宗之妃、越王李贞及江王李嚣之母。两《唐书》未为立传，此志记燕氏世系极详，可以补史志之阙。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阿史那忠墓志 唐上元二年（675）葬。1972年6月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西周村西南阿史那忠墓中。志盖厚15.5厘米、底边长76.5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赠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薛国公阿史那忠公墓志之铭”30字。志石边长76.5厘米、厚15.5厘米。志文正书44行，行44字。秘书少监崔行功撰文。阿史那忠两《唐书》均有传，但失之简略，且多有与志文不合者，如本传称阿史那忠以擒颉利功，“赐名为忠，单称史氏”，而志文均作“阿史那忠”，可知更名为实，并未改姓。此志可补正史籍处不少。现存昭陵博物馆。

临川郡长公主李孟姜墓志 唐永淳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683年1月27日）葬。1972年出土于礼泉县赵镇新寨村东北李孟姜墓中。志盖厚17厘米、底边长89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12字。志石边长89厘米、厚19厘米。志文正书41行，行42字。志石表面局部剥蚀。临川公主为太宗之女。秘书少监郭正一撰文。志中记临川公主长于书法（“词迹”受太宗称赞），且善于绘画（曾“自画佛像”），此均为史籍所失载。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安元寿墓志 唐光宅元年（684）葬。1972年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马寨村西南安元寿墓中。志盖无存。志石边长87厘米、厚12.5厘米，国子祭酒郭正一撰文。正书39行，行39字。安元寿为西域胡人将领，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累官至右威卫将军。两《唐书》未为立传。志中所载武德九年太

宗初即位后渭桥退兵内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志 唐神龙二年(706)葬。1960年出土于乾县乾陵乡韩家窑东永泰公主墓中。墓志方形,边长114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9字。周边刻忍冬蔓草及十二生肖图案。志文正书。32行,行32字。太常少卿徐彦伯撰。无书者姓名。永泰公主为中宗李显之女,《新唐书》则天皇后纪、中宗八女传及三宗诸子传均谓公主系为其祖母武则天所杀,墓志则闪烁其词,似谓因病而死;《新唐书·则天皇后纪》及《资治通鉴》谓公主死于大足元年“九月壬申”,九月壬申为九月三日,而墓志谓“以大足元年九月四日薨”。此均可与史籍互补。墓志存乾陵博物馆。

贺兰敏之墓志 唐景龙三年(709)葬。1964年从咸阳市周陵乡出土。墓志为正方形。志盖厚18厘米、底边长82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贺兰府君墓志”9字。周边饰折枝花,四杀饰对兽,盖已断裂为两块。志石边长84厘米、厚20厘米。正书34行,行33字。四侧刻宝相花纹饰。无撰、书人姓名。贺兰敏之为武则天之姊韩国夫人之子,武士彠(武则天之父)诸子相继被害死后,武则天以姊子贺兰敏之为武士彠嗣,改姓武氏,累拜左侍极、兰台太史,袭封周国公。据《旧唐书·外戚传》,敏之年轻美貌,与武则天之母杨氏私通,并“恃宠多愆犯,则天颇不悦之。”咸亨元年(670)杨氏死,二年六月敏之因“奸汙事发”,复姓贺兰氏,除名,配流雷州。行至韶州自杀。然墓志中有敏之“非辜获罪,命矣长嗟”之叹,又有中宗“重悬日月”,赠官敕葬等词,其中似有冤情。此墓志为唐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现存咸阳博物馆。

章怀太子李贤墓志 唐景云二年(711)葬。1972年出土于乾县乾陵乡东金村李贤墓中。墓志方形,边长87厘米。志盖篆书“大唐故章怀太子并妃清河房氏墓志铭”16字。周边刻缠枝花鸟纹。卢粲撰,李范书。志文正书34行,行33字。周边饰牡丹花纹。李贤为高宗第二子,《新唐书·三宗诸子传》载系为其母武则天派人“逼令自杀”。神龙二年(706)迁葬乾陵。景云二年与其妃房氏合葬。此墓志为合葬时所刻。迁葬时所刻雍王墓志亦同时出土(李贤生前曾封雍王)。二墓志均存乾陵博物馆。

越王李贞墓志 唐开元六年(718)葬。1972年秋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兴隆村东李贞墓中。志盖厚13厘米、底边长89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太子少保豫州刺史越王墓志铭”16字。志石边长89厘米、厚16厘米。志文隶书,30行,行32字。四杀及四侧均饰异兽。李贞为太宗第八子,武后临朝

之后，暗结诸王，志图匡复，兵败而死。两《唐书》均有传。两《唐书》本传所载李贞历官与志文相校，不仅详略有别，次序亦多不同。然志文所记卒年，则与两《唐书》不一，属于误记。墓志现存昭陵博物馆。

执失善光墓志 唐开元十一年（723）葬。1976年夏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兴隆村西南执失善光墓中。志盖厚12厘米、底边长77.8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朔方公执失府君墓志铭”12字，字为双钩。志石边长78厘米、厚22厘米。志文正书34行，行34字。执失善光为突厥族，归唐后任右监门卫将军、上柱国、朔方郡开国公，兼尚食内供奉。此志所记武德九年太宗渭桥退兵内幕有重要史料价值。墓志存昭陵博物馆。

杨执一墓志 唐开元十五年（727）葬。1951年咸阳县顺陵区底张湾村出土。方形，边长86厘米。志盖篆书“大唐故杨府君墓志铭”9字。周边刻瑞兽间蔓草纹。志文正书45行，行45字。撰文者为盛唐诗人贺知章，书者为杨执一第四子杨汲，书体秀逸，工整端庄。杨执一为观国公杨恭仁从孙。神龙初以诛张易之功封河东郡公，累官至右金吾卫大将军。其兄执柔因系武后外家（武后母杨氏为杨恭仁叔父杨达之女），曾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杨执一事迹附见于两《唐书》杨恭仁传，文极简略，此志可补史阙。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臧怀亮墓志 二合。1985年出土于三原县陵前乡三合村西臧怀亮墓中。其中一号墓志为臧怀亮卒后所刻，葬于开元十八年（730）。志盖厚12厘米、底边长84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羽林大将军东莞公臧府君墓志”16字。四杀刻四神。志石边长84厘米、厚12厘米。志文正书（略带行意）27行，行26字。无撰、书者姓名。二号墓志为夫人任氏卒后与夫合葬时所刻，葬于天宝十载（751）。志盖厚11厘米、边长75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臧府君志铭”8字。四杀亦刻四神。志石边长75厘米、厚11厘米。志文正书37行，行37字。朝议郎行侍御史颜真卿撰文，无书者姓名。臧怀亮出身将门，累官至冠军大将军，封东莞郡开国公。臧氏家族《隋书》、两《唐书》均未为立传。据颜真卿《东莞臧氏纠宗碑铭》云：“开元、天宝间，宗族之纡青紫、佐麾幢者，已数百人。”此二合墓志是了解臧氏家族的珍贵资料。二合墓志均存三原县博物馆。

王仁淑墓志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葬。1971年出土于秦都区古渡乡药王洞村东王仁淑墓中。墓志盖为覆斗形，厚8厘米、底边长48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王夫人墓志铭”9字。周边刻宝相花四朵，斜杀刻卷草纹。志

石为方形，边长 47 厘米、厚 8 厘米。志文正书 18 行，行 19 字。张令晖撰，唐万顷书，书体略带行意，飘逸可观。志云“室人韶姿婉顺，靖态繁华。昔在童颜，天纵歌舞。巴渝郑卫之曲，□蔡秦齐之声，皆能练其节奏，赏其音律。年符二八，召入宫闱，彩袖香裾，频升桂殿。清歌妙舞，常踏花筵。”可知王仁淑为开元年间一位宫廷音乐舞蹈家。惜年仅 26 岁病死家中。此为珍贵的音乐舞蹈史料。墓志现存咸阳博物馆。

冯晖墓志 后周显德五年（958）葬。近年出土于彬县冯晖墓中，志石方形，边长 91 厘米。正书 47 行，行 47 字。刘应撰。志题作“周朔方军节度使中书令卫王故冯公墓志铭”。据志文，冯晖于广顺二年五月二十五日（952 年 6 月 20 日）卒于公署，《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本传均作广顺三年卒，显误。《资治通鉴》作广顺二年六月己亥（六月十五日，即 952 年 7 月 9 日），亦误。据《资治通鉴》载，冯晖死后，“其子牙内都虞候继业杀其兄继勋，自知军府事。”志文仅谓晖长子继勋癸丑年（广顺三年）亡，同时陪葬，是故为掩饰。此志可与史籍互补。墓志现存彬县文化馆。

游师雄墓志 宋绍圣四年（1097）葬。此墓志明末赵涵《石墨镌华》即已著录，可知至迟于明代已经出土。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游师雄是武功县人，墓志当出土于武功。志石方形，边长 122 厘米。志文正书 68 行，行 67 字。张舜民撰文，邵觥书，章窰篆盖，安民、安敏、姚文、安延年模刻。游师雄《宋史》有传。师雄为张载弟子，绍平元年举进士，为仪州参军，自绍平迄元祐，20 余年皆在边帅幕府，颇多建树。其墓志所记，对研究宋与西夏战守之事极有价值。

郝天泽墓志 元大德九年（1305）葬于三原县修真乡长孙村利谷西原（元代地名）郝天泽墓中，1988 年 12 月咸阳市文物普查队在鲁桥镇楼底村征集。墓志为长方形。志盖呈覆斗状，盖面篆书“大元故少中大夫四川道宣慰副使金都元帅府事郝公墓志铭”25 字。底边长 90 厘米、宽 73 厘米、厚 15 厘米。志石长 92 厘米、宽 71 厘米、厚 15 厘米。前金淮西北道肃政廉访司事郭松年撰，无书者姓名。志文记郝天泽生平事业，为研究元代政治、经济特别是元初平定云南、巩固边疆的军事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

王南洋墓志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葬。1983 年出土于渭城区东耳村王南洋墓中，现存咸阳市社会福利厂院内。墓志为长方形，共两块。志盖横长 118 厘米，纵宽 65 厘米，厚 14 厘米。盖面篆书“明大中大夫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参政南洋王公之墓”24 字。志石与志盖同大。正书 60 行，满

行 24 字。许宗鲁撰，杜鸾篆盖，王准书。王南洋在任山东按察副使期间，疏通海道、发展海运，颇有建树。后遭诬陷，被调往山西，旋抱病家居，死葬毕原。志文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王南洋勘修马濠至麻湾海道的情形，是研究明代山东历史、地理及经济的有用资料。

刘古愚墓志 清光绪三十年（1904）镌。原存咸阳县天阁村，现存咸阳博物馆。志石为二方，均为正方形，边长 87 厘米。第一石厚 8 厘米，第二石厚 12 厘米，二石文字相接。额篆题“圣清征士咸阳刘古愚先生墓志铭”。志文正书 72 行，行 44 字。李岳瑞撰，宋伯鲁书丹并篆盖。刘古愚积极倡导变法维新，世有“南康（有为）北刘（古愚）”之称。《清史稿》未为立传。此可补史之阙。

第五节 塔铭、经幢

延兴寺舍利塔记 隋仁寿元年十月十五日（601 年 11 月 15 日）建立。石为方形，边长 32 厘米、厚 9 厘米。正书五行，行十字，文曰：“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十五日延兴寺比丘智璆为皇帝及法界众生敬造舍利塔一区，与国家世塔同时建立。”文字大部清晰。现存咸阳博物馆。清人叶昌炽《语石》云：“唐释道宣《广弘明集》载：仁寿元年，诏沙门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往诸州起塔，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盖当时诸州皆奉诏起塔，并皆撰文刻石。”今咸阳博物馆所存此延兴寺舍利塔记，当系隋仁寿元年奉诏所刻。起塔日期为十月十五日，亦与文献记载相合。叶氏所见同州兴国寺等九寺舍利塔记中无此延兴寺塔记。此塔记为世主佞佛以祈福祐之证。

广济寺阿弥陀石像塔铭 唐景龙三年六月八日（709 年 7 月 19 日）北狄拔也贞家人翟永安建。近年出土于礼泉县唐昭陵封域广济寺遗址（今赵镇石鼓村）。塔铭略呈方形，纵 46.5 厘米、横 44.1 厘米、厚 7.4 厘米。铭文正书 23 行，行 24 字。背面龕内镌半浮雕佛像，为“西方三圣”，即一佛二菩萨。佛为坐像，当是接引众生往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二菩萨为立像，其左胁侍是观世音菩萨，右胁侍是大势至菩萨。龕顶有一对飞天，佛座下有一对侏儒。塔铭云：“上为应天皇帝，爰及曹主，下为法界苍生，存亡眷属，敬造阿弥陀像一铺，并勒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经卷刻石已佚。塔铭存昭陵博物馆。

瑶台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唐天宝二年八月十五日（743 年 9 月 7 日）王思训偕妻、女、婿等为其父王凤祥建立。近年出土于礼泉县唐昭陵封域唐

瑶台寺遗址。幢为八棱柱状，高174厘米，共八面，面宽17厘米。幢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署“罽宾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每面镌字8行，行70字，正书。幢身保存尚好，宝盖、莲座已佚。现藏昭陵博物馆。

七祖院尊胜陀罗尼幢 唐长庆四年（824年）十月刘□、刘士峰等造。原存永寿县店头镇好时村古庙中，1964年移存永寿县监军镇，现竖于永寿县文化馆院内碑亭。幢为八棱柱状，高167厘米，共八面，面宽21厘米。幢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咒及记。第一面7行，其余七面均8行，行66字，正书。首题“大唐京兆府好时县镇为国敬造尊胜陀罗尼幢一所，施七祖院人刘□、刘士峰，大兴善寺和尚惠应□。”幢文末署“成都府沙门国威□”，“时大唐长庆甲辰岁十月□落十二叶记”及“朝议郎权知京兆府好时县令飞□尉开国男、右神策军好时镇边兵马使朝散郎检校太子右谕德□殿中侍御史□徙矩、监军使朝议郎行内侍省内府局□员水置同正员上柱国□□幹、都虞候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子詹□□史上柱国□□。”幢下端一周刻捐款人名目。幢身保存完好，宝盖及座遗失。幢首题“好时县镇”即“好时县好时镇”的省称。

刘文焯尊胜影幢 唐大和七年五月十八日（833年6月9日）建。1982年出土于秦都区平陵乡白良村。现藏咸阳博物馆。幢为八棱柱形，下大上小，顶、座均佚。幢身高151.5厘米，上径30.5厘米，下径32厘米。共8面，面宽13厘米。每面正书7行，行81字。幢文分铭记、序及经、咒。铭记并序为董□撰，无书者姓名。题记为“维大唐京兆府咸阳县平城乡龙池里张白龙村仁勇校尉、守左金卫晋州神山府折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左神武军宿卫彭城郡刘文焯奉为先亡于坟茔处建立尊胜影幢一所铭记并序。”故称此幢为“尊胜影幢”。经文下署“罽宾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幢身保存基本完好。

梨园店尊胜宝幢 唐大中五年六月三日（851年7月5日）建。1952年出土于淳化县城南唐塔下。幢身高151厘米，八棱形、面上宽16厘米、下宽19厘米。每面8行，行62字或65字不等。行书，无书者姓名。幢文有序、经、咒，末刻“维大唐大中五年辛未岁六月壬寅朔三日甲辰，梨园店奉为敬圣文思和武光孝皇及文武百官众施主等建立尊胜宝幢一所。”故称“尊胜宝幢”。现藏淳化县文化馆。

广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约唐中期刻立。幢似鼓形，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故又称《石鼓尊胜经》。现仍存礼泉县唐昭陵封域广济寺遗址

(赵镇石鼓村)。幢分上下两截，上截为圆筒状，其上镌刻经文。共 68 行，行约 30 字，行书。除中下部可见 300 余字外，余均磨灭难识。因已残断，前人以二铁箍束之。下截作圆柱状，九面均为浮雕佛像。造型优美，惜头部皆缺。上截高 110 厘米、下截高 102 厘米、外围 588 厘米。经幢作鼓形，仅见此一例。明清以来金石家恒为著录。

无畏不空法师塔记 塔记末署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刊，陈聚、陈廷施石。无撰、书人姓名。原在咸阳县窑店镇北，民国时期移县民众教育馆，现存咸阳博物馆。塔记为长方形，高 60 厘米、宽 87 厘米、厚 15 厘米。正书 35 行，行 22 字。此塔记谓无畏不空法师为西域密教高僧，所述事实与史籍多有不合。本不足录，今以其为历代诸家所著录，故亦录之。文中有“尝慨《资治通鉴》称真观中有僧自西域来”之句，《资治通鉴》为北宋司马光所著，“贞观”改作“真观”是因宋人避仁宗赵祯之讳所改。此塔记为宋人所刻当属无疑。

第五章 青铜器

建国以前，市境就出土过一些青铜器。建国以后，市境几乎年年都有青铜器出土，这些青铜器有些出自墓葬，有的出自遗址或窖藏，其中有不少属于国宝。1979 年淳化县史家原西周墓出土的高 122 厘米、重 226 公斤的饕餮纹大鼎，是目前已知西周青铜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珍品。

咸阳境内的商周青铜器中，商代仅发现晚期的部分遗物。商周青铜器中数量较大的是西周时期的遗物。西周时期遗物的出土地点，早期的主要有武功黄家窑、乾县临平镇、泾阳高家堡、渭城柏家嘴、长武张家沟和刘主河、淳化史家原和黑豆嘴等处，中期的主要有永寿好时河、武功任北村等处，晚期的主要有永寿好时河、长武方庄、武功北坡村和金龙村等处。西周遗物中，尤以 1962 年永寿县好时河发现的“仲枌父”器窖藏及 1978 年武功县任北村发现的“楚簠”诸器窖藏最为著名。境内西周青铜器发现较多，可能与本地西邻周原、南接丰镐有关。

战国和秦汉时期，青铜器逐渐被铁器所代替。但因咸阳是秦国都城，后

来又成为秦王朝的统治中心，继而又为西汉京畿之地，故遗物十分丰富。本地发现的战国和秦汉时期的青铜器中，作为礼器并在商周青铜器中常见的鼎、簋之类重器基本消失，制作精巧的日用器皿逐渐增多，其中一些鼎、壶、炉、灯等器物，不只工艺精湛，且其所镌刻的诸多郡县、宫观、职官、工匠名目及容积、重量铭文，都具有较高的考古学价值。

本地发现的青铜器中，还有一些器物，如秦咸阳遗址出土的秦诏版、兴平东门外出土的铜漏壶、渭城塔尔坡出土的飞龙钮鐔于等，其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都比较高。另外，本地出土的大批商周以来的历代铜镜，其中有不少精品；渭城区周陵乡出土的汉鲁王虎符和秦都区沔西乡出土的汉齐郡太守虎符，以及“爰田之史”、“伏波将军章”等一批汉魏至金元时期的官印，亦是补史、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第一节 饪食器

饕餮纹鼎 商代晚期。1977年礼泉县朱马嘴商代遗址出土。通耳高77厘米，口径60厘米，腹深83.5厘米，重65公斤。造型古朴，厚重典雅，形体浑大，鼎口有加厚的宽沿，立耳做成曲槽形，足中空与腹相通。口下及足部饰细线饕餮纹。足的外侧及其对应的颈部无扉牙。整体花纹呈单层细线的形式，是同时期青铜器中少见的重器之一。

夔龙方座簋（甲） 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1971年泾阳县高家堡戈国墓出土。通高34.5厘米，口径21.5厘米，腹深13厘米，重6.4公斤。侈口，圆腹，圈足，方座，兽首，双耳，器腹、圈足及耳下均设扉牙，庄重典雅。腹及方座饰两两相对的夔龙纹，圈足则饰前后相逐的蚕纹。

乳钉纹簋 西周早期，1972年11月长武县枣园乡张家沟出土。高17.4厘米，口径25.2厘米，腹深12.7厘米，足径18厘米。平沿，高圈足。口沿下饰平雕夔龙纹，腹部饰斜方格乳钉纹，以云雷纹衬底。器形与纹饰具有商器特征，或为先周遗物。

蝉纹鼎（甲） 西周早期。1970年乾县临平镇出土。通高37厘米，口径29.5厘米，腹深18.1厘米，重7.8公斤，口稍敛，折沿方唇。腹微鼓，立耳。口沿下饰夔纹间以涡纹，细云雷纹填地，并以六道脊棱间隔。腹饰垂叶纹，叶面满布细雷纹，上浮雕蝉状纹，足根部饰饕餮纹，隙间填有细雷纹地。工艺精湛。

弹鼎 西周早期。1972年长武县枣园村出土。通高22.2厘米，口径

17.4厘米，腹深9.5厘米，重2.7公斤。立耳，方唇，平沿，分档高柱足。腹饰饕餮纹，饕餮圆目促鼻，口啖蹄足，以细雷纹填地。外底有烟炱。腹内壁铸“弹乍（作）父辛亚𠄎𠄎（尊）彝”8字铭文。

天簋 西周早期。1969年10月长武县丁家乡刘主河村出土。通高14厘米，口径19.8厘米，圈足高4厘米。器腹底有一“天”（天）字，当为族徽。器上体似盆，口沿宽而外折，腹深而壁微斜，腹侧有一对兽首耳，耳下有小勾珥。底部圈足稍向外侈。颈部及圈足饰兽面纹、云雷纹、饕餮纹及乳钉纹。

夂簋 西周早期。1982年出土于武功县游风乡黄南窑村南一土圻墓中。通高17.2厘米，口径24.9厘米，腹深13.9厘米，重4公斤。簋敛口侈沿，下腹微鼓。兽首曲舌形双耳，无珥。口沿下饰夔纹，云雷纹填底，前后置牺首一对。圈足饰夔龙纹组成的饕餮纹，亦用云雷纹填底。腹部饰菱形方格乳丁纹，器内底铸一“夂”字，当为族徽。保存完好。

三螭耳饕餮纹鼎 西周早期。1979年淳化县史家原村西周墓出土。通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腹深54厘米，重226公斤，是目前已知西周铜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珍品。鼎造型宏伟，纹饰庄重神奇，也是青铜器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一件瑰宝。

鼎平沿外折，方唇，与足相应的腹部铸有三个牺首屈螭耳，牺首促鼻，盘角高耸，并饰卷曲夔龙纹，螭耳下有勾珥。鼎耳外侧曲体上缘饰夔龙，龙体满布鳞纹，地填云雷纹。沿下饰两两相对三组夔龙，夔龙暴目张口，竖角奋足，鳞身卷尾，云雷为地。两龙中隔短扉，并以扉为鼻呈一饕餮面。饕餮口下饰牛首，饕餮咧嘴奋爪作啖牛之势。足根亦饰带鼻棱的饕餮纹。此鼎体大超重，搬动非易，故附三螭耳，以便众人用力。

凤纹鼎 西周早期后段。1971年出土于渭城区正阳乡柏家嘴村西。通高20厘米，口径18.6厘米。立耳，柱足，口沿下有一纹饰带，云雷纹作底，饰凤鸟纹，两两相对，共三组。腹内壁铸铭文三字，文曰：“白（伯）乍（作）鼎”。与1971年宝鸡市茹家庄出土的“伯作鼎”（西周早期后段）相似。

楚簋 西周中期。1978年武功县苏坊乡任北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簋通高22.5厘米，口径18.5厘米，腹深11.7厘米，腹径23厘米，重3.7公斤。弃口，鼓腹，圈足下设三小兽足。簋腹侧有兽首衔环双耳。盖冠作圈状。盖沿、器沿及圈足均饰窃曲纹。盖冠内饰团鸟纹。器腹及盖为瓦纹、簋器内底及盖内各铸铭文71字，文曰：“佳（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各（格）于康宫，

中(仲)棚父内(人)又(右)楚,立中廷。内史尹氏册命楚:赤市(鞅)、𦉳(盞)旂,取遄五孚,辞(司)弁鬲(鄙)官内师舟。楚敢捧(拜)手顙(稽)首,𦉳(扬)天子不(丕)顯休,用乍(作)罍(尊)𦉳(簋),其子子孫孫邁(万)年永寶用。”楚簋同时出土甲乙丙丁4件,铭文大体相同。

仲枌父鬲(甲) 西周中期。1962年永寿县好時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高14厘米,口径19.5厘米,腹深8.5厘米,重2.2公斤。束颈,口沿平折,方唇,平裆,蹄足,腹与足根有脊棱扉牙,腹饰头向扉牙的夔龙纹,并以扉为鼻,组成一组饕餮纹。夔龙、饕餮均有所变异。口沿及内壁铸铭文38字,文曰:“佳(唯)六月初吉,師汤父有辞(司)中(仲)枌父乍(作)寶鬲,用敢鄉(饗)孝皇且(祖)丕(考),用旛(旂)盥(眉)壽,其万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仲枌父鬲同出甲、乙、丙、丁、戊、己6件,铭文大体相同。

仲枌父匕 1962年永寿县店头乡好時河村出土。柄部平直,柄末端稍宽,面有凤鸟纹饰。中部为扁平长方形,中间有一条纵的凸起直棱,两旁有两条阴文。通长25.8厘米,头部宽5.2厘米,厚0.2厘米,勺部右边较齐直,左边较薄利,似为实用器。勺内有篆书铭文2行,每行4字,文曰:“中(仲)枌父乍(作)匕永寶用”。铜匕制作精巧,保存完好。匕为食器,犹如今之饭匙。与此匕同时出土有铜盃、铜鼎等。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藏“中枌父簋”与上海博物馆藏“中枌父鬲”,当与此匕及同时出土的盃、鼎等,为同一铜器群遗物。

白考父簋盖 西周中期。1962年出土于永寿县好時村一铜器窖藏中。簋佚,仅存簋盖。盖高4.2厘米,口径21.6厘米,握手圆形中空,高2.4厘米。盖沿外饰窃曲纹一周,上饰瓦纹。重1.14公斤。盖内铸铭文3行,16字。文曰:“白(伯)考父乍(作)宝𦉳(簋),其万年子子孫孫永宝用。”与仲枌父鬲甲、乙二器同时出土。

𦉳叔簋 西周中、晚期。1978年武功县苏坊乡任北村西周铜器窖藏出土。簋器、盖相配,敛口鼓腹,腹较低矮。两兽耳有珥,兽头长独角,卷鼻长舌。器身饰瓦纹,口沿及圈足部分饰窃曲纹。圈足下三小兽足,兽足上部为兽头,着地部分为兽爪。盖中部为圆形握手,握手底内有重环纹一周,中间为圆涡纹。盖饰瓦纹、窃曲纹,折沿较急,折沿部位饰变形三角形蝉纹。通高24厘米,腹深11.7厘米,口径19.3厘米。器、盖同铭,铭文曰:“𦉳

叔馯姬乍（作）白（伯）媿媿（媿）殷，用享孝于其姑公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寶用。”同器一道出土3件，铭文、行款一致。

叔皇父鬲 西周晚期。1975年长武县彭公乡方庄出土。高13.8厘米，口径18.3厘米，腹径16.5厘米。平沿束颈，平裆，蹄足，有烟炆。腰部饰变形鸟纹，以云雷纹衬底。口沿内有铭文一行，文曰：“弟（叔）皇父乍（作）中（仲）姜罇（尊）鬲”。此器与“白邦父鬲”形制、纹饰相似，应为同期（西周中叶之后）遗物。

师痕簋盖 西周共王初年。1963年4月出土于武功县南仁乡北坡村。二件。形制大体相同。一号口径19.8厘米，带钮高8.1厘米。顶面边沿有宽2.7厘米的窃曲纹，空间饰有细回文和线纹。内有铭文10行，行10字左右。文曰：“隹二月初吉在戊寅，王在周师辞马宫，各大室，即立。辞马井伯鬲右师痕，入门立中廷。王乎内史吴册命师痕曰：先王既命女，今余唯鬲先王命：女官辞邑人，师氏，易箴勒。痕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乍朕文考外季奠簋。痕其万年，孫孫子子其永寶用享于宗室。”二号口径为19.7厘米，带钮高7.5厘米。铭文相同，字体似不出于一人之手。

驹父盨盖 西周宣王时期。1974年武功县金龙村西周遗址出土。高8厘米，口径纵25厘米、横17厘米，盖深5厘米，重1.7公斤。钮作四扁足，足饰卷云纹，沿饰重环纹。盖内铸铭文82字，文曰：“唯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中（仲）邦父命驹父即南者戾（侯），逯（率）高父见南淮尸（夷），卑（厥）取卑（厥）般（服），至，尸（夷）俗豢不敢不苟（敬）畏王命逆见我，卑（厥）獻（獻）卑（厥）般（服）。我乃至于淮，小大邦亡（毋）敢不敬鼻（具）逆王命。四月，還至于希（蔡），乍（作）旅盨。驹父其萬年永用多休。”南仲其人曾见于无叟鼎，郭沫若考证他就是《诗经》中《小雅·出车》和《大雅·常武》中的南仲，宣王时的辅臣。

中啟鼎 战国。1966年4月出土于咸阳塔尔坡砖瓦厂。通高28.5厘米，口径25.3厘米，耳高10厘米，腹深19厘米。敛口，子母唇，鼓腹。长方形大耳，耳稍外撇。马蹄形短足。盖隆起，上有三环钮，盖和器身各饰三道兽纹，耳的上沿和两侧饰半圆形雷纹，足饰饕餮纹。鼎唇部一侧横刻“中啟□鼎”4字，另一侧横刻“六斗”2字，“六斗”2字为秦篆，与“中啟□鼎”4字风格不同，似为此器传入秦国后所补刻。此鼎容积为12000毫升，按此折算，一斗为2000毫升，与秦量相同。与此鼎一道出土的“平鼎”（一耳外侧刻一“平”字），形制与此鼎完全相同，只是鼎盖未施纹饰。

筍鼎 战国晚期。1979年初出土于旬邑县转角乡一石室墓中。通高14.5厘米，口径13.8厘米。盖上有三兽钮，盖中饰柿蒂纹，周围纹饰形似梅花，腹部饰三道双头兽纹。一耳侧螭刻“筍廿”二字。“筍”读作“柟”，为“柟邑”之省。“廿”为器物编号。

平安君鼎 战国晚期。1979年6月武功县游凤乡驛驪村西汉墓葬出土。通高19厘米，口径19厘米，腹深12.3厘米。体呈扁球形，方附耳稍外张，弁口有盖，子母合口，盖上等距离分布三个环钮，三蹄足，腹中部有凸棱一周。盖上刻铭文二处，一处5行20字，文曰：“评（平）安君△（私）官，虜（容）伞（料），眡（视）事欽，冶。瘡十二年受，二益（鎰）六斩。”另一处1行4字，文曰：“下官，虜（容）伞（料）”。器口沿下亦刻铭文二处，一处6行21字，文曰：“评（平）安君△（私）官，虜（容）伞（料），眡（视）事司马欽，冶王石。十二年受，九益（鎰）。”另一处1行4字，文曰“下官，虜（容）伞（料）”。此鼎是一件卫国铜器，大约是在秦统一战争中辗转流入秦国的。铭中的“料”即“料”字，为半斗的专用字。鼎经测定，容积为3569.75毫升，与魏国大梁鼎铭刻伞（料）实测容积3570毫升十分接近，是战国时期流行在卫、魏等国的一种量制。与鼎同出的还有一件箕形首勺，柄上刻“当阳七两”4字，据字形看，当为秦末汉初螭刻。

三十六年私官鼎 秦昭襄王时期。1966年咸阳市塔尔坡砖瓦厂出土，通高20厘米，口径14.7厘米，耳高5.7厘米，腹深12厘米，敛口，子母唇，圆鼓腹，马蹄足，长方形兽首衔环双耳。有盖，盖上有三环钮。盖沿及器沿均饰蟠虺纹一周。腹外壁刻铭文21字，铭曰：“三十六年，币（师）工賡，工疑，一斗半正，十三斤八两十四朱（铢）。”盖上刻铭为“△（私）官”2字。此鼎容积为3000毫升，按此折算一斗为2000毫升；鼎身重3500克，按此折算一斤为258.1克。

半斗鼎 战国晚期。1966年4月出土于咸阳市塔尔坡砖瓦厂。通高19厘米，口径14.7厘米，耳高7厘米，腹深11厘米。敛口，子母唇，腹较浅，圜底，底有烟炱。长方形耳，稍向外撇，马蹄形足，腹部有凸弦纹一道。盖隆起，上有三环钮。盖面刻“半斗”二字。器口近盖处直刻“半斗，四”3字。此鼎容积为2700毫升，按此折算，一斗之值为5400毫升，半斗之值比秦一斗之值还大，故此鼎恐非秦鼎。

虔丘鼎 秦。1972年武功县上王村出土。通高17厘米，口径15厘米，腹深10厘米。弁口，鼓腹，附耳，蹄足，圜底，体呈扁球形，盖上置三环

钮。腹饰凸弦纹一周。口沿下刻铭文5行9字，文曰：“废丘，一斗，重七斤，丑四。”废丘，秦县名，秦汉之际章邯受封雍王都废丘，汉高祖三年（前204）更名槐里（治今兴平县东南南佐村），由此推断，此鼎极可能为秦代所造。

新丰宫鼎 西汉。三原县文化馆征集。通高16.3厘米，口径13.8厘米，耳高5.6厘米，腹深11.4厘米。敛口，子母唇，鼓腹，圜底，底有烟炱。长方形耳，稍外撇，腹部施凸弦纹一周，三马蹄形足，鼎盖较小，似与鼎身并非一套，盖隆起，上有三环钮带圆泡，可倒置。器身上部一边有铭文：“新丰宫，容一斗三升，十斤五两。”铭文竖书5行，左读。此铭后有竖行铭文：“新丰宫。一斗三升，九斤二两。”器身上部另一边亦有竖书铭文：“夕里癸”。此鼎身重1762克，盖重576克；鼎身容量2607毫升，鼎盖容量480毫升。新丰宫系汉高祖刘邦为太上皇于新丰（治今临潼县北）所筑之宫。此“新丰宫”鼎当为新丰宫遗物。

馆陶家四连鼎 西汉前期。咸阳博物馆收藏。此器由四个形制大小相同的鼎连结而成，均有盖（其中二盖已佚），盖上有三环纽。敛口，子母唇，鼓腹，圜底，有二环形耳，外侧各有一蹄形足，腹部皆有凸弦纹一道，其中一鼎腹部有一行20字铭文，文曰：“铜连鼎四合，容各三斗，并重九十三斤，馆陶家霸田。”鼎通高22厘米，口径21.5厘米，腹径27.5厘米。“馆陶家”为器主人名称。据《汉书》，文帝女为馆陶公主，疑此鼎为馆陶公主家之器。

长乐私官鼎 西汉。1979年8月武功县史新村砖瓦厂汉墓出土。通高24.5厘米，口径25厘米，腹深16厘米。鼎体呈扁球形。马蹄足，方附耳，子母口，盖上有三环钮。鼎足铁铸，口下饰凹弦纹一周。盖上刻铭文3处，分别为“长信私”、“丁”、“□□斤□两”；左耳上刻一“市”字；口下刻铭文4处，左读两条，分别为“十年夏输，容一斗六升，重廿四斤，大官四百六十一，今长乐私”、“今元年，长宁私官第六十九”；右读一条，为“十六年，长信食詹”；靠近右耳为一“尝”字。

“大官”即“太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为少府属官，职掌皇家饗膳事宜。“中官”、“私官”亦为汉中央官署，职掌太后饗膳。“长乐”，官名，高帝以后供太后居住。“长信”为宫殿名，据《三辅黄图》，系长乐宫建筑群之一部分。“长宁”亦当为宫殿名，疑即“永宁”，仍属长乐宫。从铭文看，此鼎为某十年，某郡国输给长乐宫，归太官署掌管，编号四百六十一，加刻

“长乐钁官”字样；某元年转归长宁宫，编号六十九，加刻“长宁私官”字样；某十六年又归长信宫，加刻“长信食詹”字样。此鼎为太后宫中遗物，且有容积、重量铭文，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王氏一斗鼎 西汉。1969年出土于秦都区双照乡庞村。通高15.6厘米，口径14.1厘米，腹径18.3厘米，鼎有盖，盖上有三环钮。器身敛口，子母唇，长方形双耳微向外撇。鼓腹，圜底。腹部有凸弦纹一道。一耳旁口沿下直刻铭文4行共11字，文曰：“王氏容一斗，重七斤十一两”，另一旁刻有“庚”字。器盖边缘一处横刻铭文1行共8字，文曰：“王氏重一斤十四两”，另一处也刻有“庚”字。铭文“一斗”为鼎的容量，“七斤十一两”、“一斤十四两”分别是鼎身和鼎盖的重量，“庚”是鼎的编号，“王氏”应是鼎的主人。此鼎身重1900克，盖重378克，用小米实测容2024毫升。

赵内者豆 西汉。1979年5月武功县北显村出土。通高7.5厘米，口径10厘米，腹深5.6厘米。体较圆，两旁有衔环耳，圈足，柄极短。失盖。圈足内刻铭文一周，文曰：“赵内者，容二升，重二斤二两，第八”。“赵内者”即赵国之内者。据《汉书·地理志》赵国：“故秦邯郸，高帝四年为赵国，景帝三年复为邯郸，五年复故。”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内者”，汉官署名。《汉书·百官公卿表》有内者令、丞。据此豆铭文可知，西汉时诸侯王国亦有此官署。

谷口宫鼎 西汉。1976年7月淳化县固贤乡固贤村医院建房中出土。通耳高24厘米，口径21厘米，耳高7厘米，耳宽4.4厘米。器呈扁球形，三蹄足，双附耳，附耳略外撇。器盖子母口套合，盖上置三钮，顶部有一径0.4厘米的小孔，腹部有一周凸棱，棱高1厘米，宽0.3厘米。口沿下刻铭文8字，文曰：“谷口宫元康二年造”。元康二年为公元前64年，“元康”为西汉宣帝年号。

第二节 酒 器

卣尊 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1971年泾阳县高家堡戈国墓出土。高31.5厘米，口径22.5厘米，腹深24.3厘米，重6.5公斤。圈足，侈口，四壁通体置四道扉棱，各分三段。颈饰蕉叶纹，叶面饰浮雕状饕餮纹，其下饰两两相对的蚕纹。腹饰卷体夔龙纹，夔体两两相对，并以扉棱为鼻而组成大饕餮面。圈足亦饰饕餮纹。此尊工艺精湛，花纹中均以细云雷纹为地，实为商代晚期铜器佳作。器内底铸铭文一字，作“卣”形，当为族徽。

夔卣 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1971年泾阳县高家堡戈国墓出土。通高36厘米，口横14.8厘米、口纵11.6厘米，腹深20厘米，重6.5公斤。器身椭圆，鼓腹，盖钮作菌状，横梁两端作龙首形，体侧有棱脊。花纹分五组，均有细雷纹填地。盖面饰两两相对的夔龙纹，腹饰相对夔龙组成的大饕餮面。器内底铸“夔”形铭文，当为族徽符号。盖内原应有相对之铭文，然此器则在原铭之上另铸一小铜饼，并在小铜饼上铸有“夔作父戊罇彝戈”7字铭文。

涡纹罍 西周早期。1982年出土于武功县游凤乡黄家窑村南一土圻墓中。共3件。3件形制、纹饰完全相同，大小相次，最大一件通高31厘米、口径10.9厘米，腹深19.7厘米，重3.8公斤。罍束颈圆肩，圈足外侈，喇叭形盖钮，两侧腹部铸牛首衔环双耳，前下腹置牛首饕餮。肩部和盖上均饰圆周纹，颈部饰弦纹两道，肩腰间有阴弦纹一周。三器在圻底三角形排列置放。保存基本完好。

禽兽纹壶 春秋。1982年8月淳化县夕阳乡秋社村春秋墓出土。通高11厘米，口内径4.2厘米，底径4.8厘米，最大腹径9.5厘米，重0.4公斤。直口，短颈，鼓腹，平底，体为球形。口沿外有子母口和对称小孔，孔上器沿处有小缺口。出土时上覆一盖，半球形，口为椭圆形，径稍大于壶口，无套合的子母口，形状似勺，似非原器之盖。盖面光素，近沿处有倒流状空心小钮，但与盖内不通。壶体外饰线刻阴纹禽、兽60余种，可辨者有长颈鸟、长足鸟、麋、象、牛、骆驼、猪、蛇、狼、狐狸、兔、犬、鼠、鱼、鳧、鹤、鸡、豹、龙等。这些动物图像，造型各异，繁简不尽相同，有蜷曲似蛇，长鼻高翘如象，双翼舒展似长颈鸟，昂首疾驰如麋，俨然一幅“百兽争雄图”。

安邑下官钟 战国。1966年咸阳塔尔坡砖瓦厂墓葬出土。通高56厘米，口径19厘米，腹围116厘米，重19.7公斤。颈至腹下有四条带纹，带纹中原有镶嵌物，今已脱落。盖有三环钮，环钮上附有外撇的鸟首，肩部有对称的铺首衔环。口沿铸有铭文5字，文曰：“十三斗一升。”颈部刻有一长横杠，杠下刻“至此”2字。另一面刻有“安邑下官钟，七年九月府啬夫裁冶吏翟斲之六口一斗一益少半益”27字。安邑为战国时魏国国都，秦攻占后仍称安邑。原铸“十三斗一升”，后用秦量校定，故刻“至此”标记以示之。此钟容积为25900毫升，按此折算，一斗即为1977.1毫升，与秦一斗之值相近。从字体看，“十三斗一升”是此器由魏传入秦后补刻。

修武府温杯 战国。1966年咸阳塔尔坡砖厂出土。耳杯长15厘米，宽12.9厘米，腹深5厘米，平面呈椭圆形，下有四蹄形足。耳杯纵长的两边有铺首衔环。底盘长方形，长15厘米，腹深2厘米，下亦有四马蹄形足。在耳杯一耳阴面与同侧底盘的边上各刻有“修武^府”3字。“修武”属战国魏地。此温杯应是魏器。

大官盃 约战国末或秦代。出土于渭城区窑店乡黄家沟，1974年征集。通高12.9厘米，口径8.3厘米。扁腹，圜底，盖稍隆起，三矮蹄足（一足已残），提梁已失。腹上部有兽头管流。盖上饰弦纹二道，中有桥形纽。肩、腹饰弦纹，足较细。下腹刻“穆大”2字，流右侧刻“四斤”2字，器底刻“大官四升”4字。水测容量803毫升，一升合275毫升，同商鞅方升接近。据“大官”刻铭，知其为秦官用具。“大官”主宫中馐膳。“穆大”疑为秦人名字。

二年寺工师初壶 战国晚期。1973年咸阳市博物馆征集，圆口，鼓腹，圈足，腹部饰三对凸起的弦带纹，肩部置一对对称的铺首衔环。腹部刻铭文15字，文曰：“二年，寺工师初、承拊，廩人莽。三斗。北寢（寢）”。圈足横刻“酋府”2字。“寺工师”当是“寺工工师”之省。寺工有“工师”，有“丞”。“初”、“拊”当为人名。“廩人”职掌仓库，“莽”亦为人名。“北寢”疑即北园之寢。“酋府”疑即酒府。“三斗”为壶之容积。当为秦国铜器。

雍工啟壶 秦。1974年咸阳市博物馆征集。圆口，鼓腹，圈足，腹部饰三对凸起的弦带纹，肩部设一对对称的铺首衔环。腹部刻铭文7字，文曰：“雍工啟，三斗，北寢（寢）”。圈足横刻“酋（酒）府”2字。是为秦国铜壶。“雍工啟”之“啟”为雍地工师之名。

“当阳七两”勺 西汉。1979年6月出土于武功县游凤乡驛驪村西汉墓。出土时置于“平安君”鼎内。勺首呈箕形，勺柄和勺首垂直相接，筒形盞，可装木柄。勺口宽9.5厘米，首长8.9厘米，通高13厘米，盞径2厘米。柄内侧平面刻“当阳七两”4字铭文。“当阳”为县名，西汉置。治今湖北省荆门县西南。

第三节 兵器

长阑无孔刀 商代后期。1984年淳化县官庄乡赵家庄箭杆梁墓葬出土。锋向后折卷，正好顶住柄的上端。一侧开刃，另一侧有长阑，阑出下刺，阑侧有长方形二穿，以便缚柄。通长35厘米。

短阑直内弋 商代晚期。1971年淳化县润镇郑家村出土。援宽而较短，略如三角形。自阑至锋铸一棱，两边各饰一突起圆点，组成简易饕餮纹。内稍下斜，阑窄于援而宽于内。阑上下与援形成的空档为二穿。通长20厘米，援长14.5厘米，宽8.4厘米，内长5.5厘米，宽4.5厘米。

有鉴直内弋 2件。均商代晚期。标本一：1985年9月淳化县夕阳乡陈家嘴出土。援体略如三角形，两侧有棱脊，前锋圆弧状、直内。通长21.1厘米，釜内径1.8×2.4厘米。标本二：1982年12月淳化县夕阳乡夕阳村黑豆嘴墓出土。援如舌条状，援下刃稍出短胡，直内。通长21厘米，釜径3×1.6厘米。

大孔长内有阑钺 商代晚期。1983年11月淳化县卜家乡营坊坡村出土。钺体略偏长，弧形钺刃，中有一大孔，孔两侧有弧形突棱。长内有阑，两肩有穿，两穿下各饰一乳钉。通长19厘米。

长阑有孔刀 商末周初。1982年12月淳化县夕阳乡夕阳村黑豆嘴墓葬出土。形制与上述长阑无孔刀略同，惟刀身有5个圆孔，孔径2.1厘米。刀通长31厘米。

直内大孔戚 商末周初。1982年12月淳化县夕阳乡夕阳村黑豆嘴墓葬出土。钺体舌形，中间有一大圆孔，三边开刃。内长方形，上部有一“口”形阴符。肩有二穿。通长17厘米。

三孔管釜戚 商末周初。与上述直内大孔戚同时出土。体扁，略呈梯形。有三圆孔，其中孔下端一棱，棱至锋端逐渐消失。孔上有长管状釜，可安秘。釜两侧有长方形对穿的三个辖孔。釜脊铸三个突起的圆涡。长约12.7厘米。

长内有阑钺 商末周初。1980年11月淳化县石桥乡史家原村出土。钺体扁长，刃口延展成弧形。长内有阑，两肩有穿。钺身饰有突起的三角纹和弧线纹。通长16.5厘米。

短胡扬援戈 西周晚期。1986年3月淳化县润镇出土。援向上扬起，下刃缓弯弧形，有中脊。锋残，短胡一穿，有阑，阑出上下齿。内残缺。

中胡二穿圭首戈 西周晚期。1985年淳化县铁王乡小沟畔村出土。援起中脊，锋呈圭首形，中胡，胡部一穿，援基上部一穿。有阑，阑下出刺。内较长，上有菱形穿一。通长15.5厘米。

短胡一穿戈 春秋早期。1980年9月淳化县十里原乡马家山出土。援长，锋圆润，有中脊。短胡一穿，有阑，出上下刺。内为长方形，通长21.3

厘米。

中胡一穿戈 春秋早期。1972年淳化县方里乡供销社废铜中拣选。援长，有棱脊，断面为菱形。中胡一穿，有阑。内上铸“⊕”形阳文符号。通长23.3厘米。

中胡二穿戈 春秋中期。1980年淳化县润镇乡供销社废铜中拣选。形制与上述中胡一穿戈略同。此为中胡二穿。通长21.2厘米。

前内长阑戈 战国中期秦器。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征集。戈援平直，锋弧尖，长阑，内在阑前援基后。穿在阑上，共四穿，援基部一圆形穿。戈通长约19厘米。此型戈形制特殊，国内仅见此一例。

勾援型戟 西汉。咸阳博物馆征集。戟刺无尖锋。援宽短后曲钩，勾刃下一子刺。直长胡，四个圆形穿。长方形内。全长约20厘米。此戟形制是古制的残留，主要用于勾，戟刺无杀伤作用。

弩机 东汉。1979年8月武功县普集镇印刷厂东汉墓出土。通长13.3厘米、体宽3.3厘米、厚2.3厘米，前体下刻3行铭文，文曰：“十五年八月卅日，督刘钧，将刘金”；后体下刻4行铭文，文曰：“队（燧）王善佐、向小所作”。弩机即弩的机件。此弩机铭文为研究东汉时兵器制作情况提供了可靠资料。

第四节 诏版、衡量器

秦诏版 秦。1961年咸阳长陵火车站北沙坑出土。铜质，长方形，长10厘米，宽6.5厘米，厚0.2厘米，正面刻秦始皇为统一天下度量衡而发布的诏令。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

两诏秦楠量 秦。1982年9月出土于礼泉县药王洞乡南晏村南。出土时置于一小陶罐内。量为椭圆形，口沿下部2.5厘米处有一周突棱；短柄，中空。重1275克，高7厘米。口长20.8厘米、宽12.5厘米、深6.1厘米，实测容水980毫升。外底面略鼓，长15.5厘米、宽7.8厘米。柄长5.7厘米、上宽4.7厘米。下部呈拱形，高4.3厘米。柄面上刻字3行，自右向左为“右”、“北私府”、“半斗、一”。柄的左侧面刻一“私”字。“北私府”为秦宫中的收藏单位，“半斗”系自铭容量，“一”系编号，左侧“私”字当为“北私府”的省称。容器左右外壁上分别刻两个内容相同的秦始皇二十六年诏，容器外底刻秦二世诏。容器左、右外壁上诏文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

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器外底上诏文为：“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勿疑。”二世诏文中“疾”、“焉”、“帝”、“德”四字右下方均有“L”形勾识。此器为实用器。实测容水 980 毫克，正合秦制半斗，与自铭相符。在秦量器中，铜质半斗量为少见。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定名为“两诏秦椭量”，属国家一级甲等文物。

枸邑两诏铜权 秦。呈八角棱体，腹空。高 6.5 厘米、面径 8.4 厘米、底径 9.6 厘米，重 2270 克。权身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和二世元年诏书，各占四面，顶部横梁左右有阳文篆书“枸邑”2 字，“枸邑”即今旬邑县。此权是有别于一般半球形秦权的精品。原出土地点不详。现藏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咸阳亭半两铜权 秦。权身略呈扁方体，上窄下宽，顶部冠以弧形鼻纽。高 2.35 厘米、宽 1.1 厘米、厚 0.45 厘米，重 7.55 克。一面刻“咸阳亭”3 字，一面刻“半两”2 字。皆为秦隶。斤以下秦权很少发现，此权弥足珍贵。出土地点不详。现藏上海博物馆。

西汉圭、撮、龠三量 西汉。1981 年淳化县润镇乡西坡村出土。圭、撮、龠各一件。形制相同，由小到大，依次为圭、撮、龠。器首如勺，侈口，平底，斜腹，有长柄，柄端有系环。经实测：圭通长 6.7 厘米，径 1.273 厘米，底径 0.772 厘米，高 0.637 厘米，重 6.8171 克，容 0.54 毫升；撮通长 8.8 厘米，口径 1.884 厘米，底径 1.29 厘米，高 0.96 厘米，重 14.3368 克，容 1.69 毫升；龠通长 11.6 厘米，口径 3.088 厘米，底径 1.733 厘米，高 1.415 厘米，重 27.1839 克，容 6.80 毫升。为一套四进位的小量器。

始建国律量籥 新莽始建国元年（9）正月初一制。1970 年出土于渭城区底张乡布里村。器形似圆勺，有柄，柄长 9.2 厘米，宽 0.5—0.7 厘米，厚 0.4—0.8 厘米。柄正面有铭文一行，文曰：“律量籥方寸而圜，其外庖旁九豪冥百六十二分，深五分，积八百一十分，容如黄钟。”柄背面亦有铭文一行，文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经测量，籥内径 3.164 厘米，外径 3.643 厘米，深 1.119 厘米，容水 9.287 毫升。籥的表面饰夔凤纹。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公元 9 年 1 月 15 日）改元为“始建国”，此为改元后颁发的标准量器。

第五节 虎符、印章

鲁王虎符 西汉前期。1976年出土于渭城区周陵乡南贺村。鍍金铜质，虎作伏卧状。符长5.6厘米、高2.35厘米、厚1厘米，虎前爪内侧有宽0.4厘米的凹槽，可与虎符另一半上的凸键相对应作合符时用。符上文字分脊文和肋文两部分，脊文由首至尾共7字，符为半字，文曰：“汉与鲁王为虎符”；肋文3字，文曰：“鲁左五。”10字皆错银篆体。此为西汉之物无疑。据《汉书》载，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先是惠帝七年（前188），吕后封其外孙张偃为鲁王，及文帝元年（前179）“诸吕之乱”平定，鲁王降为侯，故这一虎符与此前张姓鲁王无涉。景帝元年（前156）用晁错之计削吴、楚，“分楚，复置鲁国”，封其子刘余为鲁王。故此虎符所谓鲁王当是景帝元年复封的刘姓鲁王。据《史记索引》引小颜“右留京师，左与之”与《史记集解》引应劭“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等语，肋文所谓“鲁左五”，即表明此虎符是汉朝付与复封的刘姓鲁王的兵符。

齐郡太守虎符 汉。1988年12月出土于秦都区沔西乡李家村北。虎符为铜质，两半同时发现，保存基本完好。虎呈伏卧状，两眼平视，嘴较短，口微张，鼻扁平，鼻梁较宽，双耳下垂，耳较大，尾极短粗，上翘。两半合在一起像小圆球。符底较平。虎符长5.8厘米、高2.3厘米、厚2.1厘米。两半厚薄不同，右半厚1.1厘米，左半厚1厘米。右半重69.5克，左半重56.5克，共重126克。符文分脊文和肋文两部分，同为错银小篆。脊文为“与齐郡太守为虎符”8字，肋文右半为“右二”2字，左半当为“齐郡左二”4字（“齐”、“二”2字不清）。汉时虎符为“右在内而左在外”。此虎符左右同时出土，可知并未用过。

藜田之史 西汉。武功县出土。印面正方形，铜质桥钮，通高1.7厘米、边长2.6厘米、厚0.7厘米。印面阴文篆书“藜田之史”4字。“藜”，即郃，古地名，故址在今武功县西南永安村西、扶风县法禧寺东。“藜田之史”，当为汉代管理郃地农田之官。

伏波将军章 汉。1981年渭城区窑店乡西毛村出土。印面正方形。铜质龟钮。通高2厘米、边长2.2厘米。印面阴文篆书“伏波将军章”5字。印文为镌刻。据《范氏印谱》记载，清光绪年间，嵯峨山曾出土“伏波将军印”，下落不明。伏波将军两汉皆三品，不常设置，凡任伏波将军者，必善水战。

通笃将军章 汉。1983年淳化县秦家凹村出土。印面正方形。铜质龟钮，通高3厘米、厚1.2厘米，边长2.3厘米。印面阴文篆书“通笃将军章”5字，印文为镌刻。似急就章，通笃将军之职史籍失载，此可补阙。

左属国左部前小长 汉。渭城区窑店乡黄家沟出土。印面正方形。铜质桥钮，通高2厘米、边长2.2厘米，印面阴文篆书“左属国左部前小长”8字。此印疑为属国都尉属官所用。

沙遂酒平 汉。1981年咸阳市出土。印面正方形。铜质桥钮，通高1.7厘米、边长2.2厘米。印面阴文篆书“沙遂酒平”4字。“沙遂”疑即“沙随”，在今河南省宁陵县西北，此印当为沙随酒官所用。

军司马印 东汉。1976年淳化县夕阳乡夕阳村汉墓出土。印面正方形，铜质桥钮，通高2厘米、边长2.4厘米，印面阴文篆书“军司马印”4字。模铸。后汉军司马比千石，为大将军府属官。

都乡侯印 东汉。1989年杨陵区古邠遗址墓葬中出土。印面正方形。铜质，龟钮。通高2.6厘米、边长1.9厘米。印面阴文篆书“都乡侯印”4字。印文凿刻。都乡侯为东汉所封侯国名，在列侯之下，关内侯之上。

关外侯印 东汉末或魏初。咸阳出土。印面正方形，铜质龟钮。通高2.5厘米、边长2厘米。印面阴文篆书“关外侯印”4字。关外侯为东汉建安二十三年（218）始置，为十二侯爵之一。魏黄初定制，爵十六级，序在关内侯下，为虚封爵位。

巍率善氏仟长 三国魏。二方。长武、兴平各出土一方。印面正方形，铜质驼钮，通高2.6厘米、边长2.3厘米。印面阴文篆书“巍率善氏仟长”六字。“巍”即“魏”字，此为三国曹魏之魏。氏，古族名。此印当为曹魏时颁给归附的氏族仟（千）长的印信。

诏假司马 东汉至三国。礼泉县出土。印面正方形，铜质鼻钮，通高2.5厘米、边长2.3厘米。印面阴文篆书“诏假司马”4字。“诏假司马”为皇帝派遣的兼职或代理司马。

部曲督印 东汉至西晋。三原县出土。印面正方形。铜质鼻钮，通高2厘米、边长2.3厘米。印面阴文篆书“部曲督印”4字。印文为镌刻。部曲督为部曲武官。

骑部曲督 东汉至西晋。长武县出土。石质鼻钮，通高2.3厘米，边长2.6厘米。方形印面阴文篆书“骑部曲督”4字。“骑部曲督”与“部曲督”同为部曲武官。

晋归义羌王 西晋。长武县附近出土。印面正方形。鎏金铜质，驼钮。通高2.7厘米、厚0.9厘米、边长2.1厘米。印面阴文篆书“晋归义羌王”5字。此即晋朝颁给归附羌王的印信。

蕃落第四副指挥使朱记 宋。三原县出土。印面为方形。铜质，矩形钮。通高5.2厘米、边长5.3厘米，印面阳文篆书“蕃落第四副指挥使朱记”10字。印背左刻“少府监铸”4字，右刻“天圣五年”4字，均为阳文正书。“蕃落”是党项羌的一个部落。天圣为宋仁宗年号。天圣五年为公元1027年。

义军副统之印 金。礼泉县出土。印面正方形。铜质矩形钮，通高6.6厘米、边长6.4厘米。印面阳文篆书“义军副统之印”6字，印背右刻“正九正月日造”6字，左刻“义副统”3字。“正九正月”即金正大九年（1232）正月。《金史·宣宗纪》载，兴定三年十月“乙丑，用蒙古纲言，招集义军，各置都统、副统等官，如贞祐三年制。”《金史·兵志》载：“元光间，时招义军，……四万户为一副统。”

安抚副使之印 金。1976年礼泉县花寨村出土。印面正方形。铜质矩形钮，通高5.2厘米、边长7.3厘米，印面阳文篆书“安抚副使之印”6字，印背无款识。据《金史·百官志》，承安三年，改“宣抚”为“安抚”。泰和八年（1208）规定：“上京、东京等路按察使并安抚司使，正三品，……副使二员，正四品。”

河中府知事印 元。1982年淳化县汉寨村出土。印面正方形。铜质矩形钮，通高5.6厘米、边长6厘米、厚1.3厘米。印面刻阳文八思巴文，印背阴刻汉文3行，右为“河中府知事印”，左为“中书礼部造”和“延祐元年三月日”。河中府治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延祐元年为公元1314年。

屯田百户印 元。1980年淳化县冯寨村出土。印面正方形。铜质矩形钮。通高8厘米、边长6.2厘米。印面刻阳文八思巴文，背阴刻汉文2行，右为“屯田百户印”，左为“知鄜延至正二十三年”。据《元史·兵志》，世祖至元九年，于延安路探马赤草地屯田，为户二千二十七。此印当为至正二十三年（1363）颁给该处某屯田百户的印信。

第六节 铜 镜

网纹镜 商。1982年3月淳化县官庄乡赵家庄灰堆坡商墓出土。为不规则圆形，直径5.5厘米。橄榄钮，圆座。座外有两道凸弦纹，弦纹间饰四乳和网纹，边缘为浑棱。此镜为本地迄今所见最早的铜镜。

素面镜 西周早期。1978年3月旬邑县城关镇崔家河早周墓(M₁)出土。圆形，直径9.5厘米、厚0.2厘米，重100克。扁条形钮。正面平整。有锈，锈有席纹痕迹。

动物纹镜 春秋。1982年8月淳化县夕阳乡秋社村春秋墓出土。圆形。直径7.7厘米，厚0.2厘米。桥钮，圆座。座外用两道凸弦纹隔成三区，每区饰爬伏状动物组成镜纹，动物均为右旋排列。内区二虎二豹，中区三鹿三牛，外区四虎四豹。宽素缘。

云雷纹镜 战国。1986年5月淳化县城关小学学生送交。圆形。直径7.8厘米，胎厚0.15厘米。三弦钮，圆座。内区饰云雷纹，外区饰十六连弧纹。素卷边，斜杀沿。

蟠螭纹镜 秦。渭城区窑店乡秦遗址采集。圆形。直径11.2厘米，三弦钮，圆座。座外满饰蟠螭纹。边缘上卷。

菱纹镜 秦。1980年3月淳化县秦河乡南坪村秦墓出土。圆形，薄身，铜色青白，直径22.8厘米。三弦钮，圆钮座。座外饰涡纹，外为素宽带与栉篔纹。外区在内外两道栉篔纹间饰变形菱纹。云雷地纹。素宽沿微卷。

昭明镜 西汉。1978年淳化县北城堡乡崔家原村出土。圆形。直径13.3厘米，沿厚0.5厘米。圆钮，十二连珠座。每三珠外有一三角纹。内区有两圈宽凸弦纹，其间有“见日之光，长毋相忘”8字铭文（左旋读），每字间有一涡纹；外区在两圈栉篔纹和弦纹间有“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杨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24字铭文（左旋读）。宽素边，斜杀沿。

日光镜 西汉。1982年9月淳化县秦河乡高家砭村西汉墓出土。圆形。直径8.2厘米。圆钮，圆座。内区在两圈栉篔纹间有凸起平沿带，外区有“见日之光，长毋相忘”8字铭文（左旋读）。铭带外为弦纹、栉篔纹。素宽边，斜杀沿。现藏淳化县文化馆。该馆另藏有西汉日光镜二种，形制大小相近，一刻“见日之光，天下大明”8字铭文，一刻“见日之光乎，与君寻毋相忘兮”12字铭文。

清白镜 西汉。1975年2月秦都区马泉乡大泉村西汉晚期墓出土。圆形。直径18厘米。球形钮，四蒂纹座。座外饰连珠纹、蝙蝠及连弧纹等。有31字铭文，文曰：“絜清白而事怨，污之舛明。玄锡之流泽，而恐日忘美弘。外承可兑，灵愿而永思绝。”

长相思镜 西汉。1985年6月淳化县城关镇庄头村西汉墓出土。圆形。直径11.9厘米。三弦钮，圆座。内区有“长相思，毋相忘，千万岁，乐未

央”12字铭文（左旋读），每三字间有一乳钉，字间隔一竖线。外区为内向十六连弧纹。素卷边，斜杀沿。

尚方镜 东汉。咸阳博物馆征集。圆形。直径23.4厘米。球形钮，方钮座，上有41字铭文，文曰：“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贵富昌，常未央。”

绝照铭带规矩纹镜 隋。1978年兴平县桑镇出土。圆形，直径21.4厘米，半球形圆钮，双线方框钮座。钮座内饰瑞兽及云纹。以规矩纹将内区分四部分，每部分饰瑞兽及云纹。栉齿纹窄棱相隔，其外为一周铭文，文曰：“绝照览心，圆辉烛面。藏宝匣而光掩，挂玉台而影见。鉴罗绮于后庭，写衣簪乎前殿。”铭带外饰连珠纹和栉齿纹各一周，其间分饰十二生肖。

仁寿铭带神兽纹镜 隋。1978年永寿县出土。圆形，直径24厘米。圆钮，双线八角形钮座，钮座角内饰云纹和章纹，章纹为“金、高、宜、昌、长、明、作、□”8字。八角纹突出的双直线纹将镜面分为八部分，分别饰“东王公”、“西王母”、“四神”和神兽。其中一周饰玄武、花瓣图案，并有“宜君大吉”2印文。以齿纹窄棱相隔，外区有铭文一周，文曰：“淮南起照，仁寿传名。琢玉斯表，熔金勒成。时雍炎晋，节茂朱明。爰模鉴彻，用拟流清。光无亏满，叶不枯荣。图形览质，千载为贞。”铭文之外饰十二生肖、朱雀、玄武纹饰一周。此镜体大，内容丰富，是隋镜中珍品。

鉴若铭带鸟兽纹镜 唐。1971年乾县乾陵乡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圆形，直径24.5厘米，厚1.5厘米，重4.26公斤。半球形钮，宝相花纹方形座。内区四方饰鸾鸟、凤凰、青龙、麒麟，间以菊花纹相隔。鸟兽间饰花卉、祥云。中区为一条宽1.5厘米的铭文带，正书32字，文曰：“鉴若止水，光如电耀。仙客来磨，灵妃往照。鸾翔凤舞，龙腾麟跳。写态征神，凝兹巧笑。”外区饰奔走的麒麟、交颈的鸳鸯、翱翔的仙鹤和子实累累的石榴。靠镜沿饰蔓草纹一周。镜面用铜银合金作过处理，至今明亮如新。

卍字纹镜 唐。1979年1月淳化县铁王乡回收废品中发现。钝角方圆形（或称“亞”字形），直径14厘米，沿厚0.4厘米，以圆钮为中心饰双钩“卍”字纹。素宽边，斜杀沿。现藏淳化县文化馆。“卍”为“万”字，在梵文中意为“吉祥万德之所集”，佛教徒认为它是释迦牟尼胸部所现的“瑞相”，用作“万德”吉祥的标志。

鸟兽山水纹镜 唐。1978年乾县薛梅村出土。圆形，直径20.2厘米，桥形钮，钮四角外伸，顺钮形为圆角方形钮座。钮座圆角延伸而成四角山峰，

峰上饰草和树。山峰将纹样分为四组，两山之间分布饰流水、树木、花草、奔兽、飞鸟，组合形成一幅完整的山水图案。此镜装饰新颖，是难得的写实鸟兽山水装饰画。

航海纹镜 宋。1953年乾县出土。八曲菱花形，直径17.5厘米。半球形圆钮，素缘。镜背通饰海波纹，波浪中一条船扬帆而行，有数人在船上，长帆刻有“凤翔府”等10字。此镜纹饰是研究古代航海史的重要资料。

第七节 铜杂器

甬钟 西周。1978年10月乾县石牛乡周家河村出土。一件。钟无铭文，干、舞、篆、隧均饰云纹，甬作素面。通高48.4厘米，甬高15.9厘米，舞修22.5厘米，广18.3厘米，鼓间19.2厘米，铙间25.5厘米，重22.7公斤。甬钟为古代乐器。

飞龙钮铎于 战国。1978年11月咸阳市塔尔坡秦建筑遗址出土。通高69.6厘米，肩围111厘米，腰围88厘米，底围118厘米。平盘顶，顶中置龙钮，圆肩，圈足，束腰。龙钮首尾长15.6厘米，高7.6厘米。龙弓腰，尾（残）上卷，口大张，曲颈回顾，下腭与腹背相连，首尾曲卷对称，龙体阳雕双翼，阴刻鳞纹，若腾飞之状，形象生动。四爪两两相并，分铸铎于平盘顶中部。龙腹弯曲处有悬挂磨擦的痕迹。平盘直径20厘米，边厚0.7厘米，高1.1厘米，纹饰与铎于表面相同，均饰弦带纹。顶盘与肩相连处的弦带宽1.2厘米，弦带上有一周三角纹，三角纹之间有3.3厘米的宽带，由上而下将铎于表面分为两半。底边亦有一条宽4厘米的弦带，其上之三角纹与肩上的三角纹对称。铎于是军中乐器之一，也称铎，以往多发现于四川、湖北境内，多为楚器，现存铎于形如筒状，上部稍大于下部，顶上之钮多作虎形。此铎于形体高大，造形奇特美观，图案精致，上部稍小于下部，中为束腰，钮作飞龙形，实属罕见。

叶状铜饰件 秦。1988年10月出土于秦都区钓台乡资村沙河第一号古桥遗址西南35米处。长116厘米、宽43厘米、厚3.3厘米，重32.5公斤。外形为叶状，两面均有铸出的花纹，一面为简化夔纹，另一面为三角形几何纹，技法是由细线、连珠、云雷三种纹样组成画面，手法简炼，格调明快，与秦咸阳和雍城出土的空心砖、方砖、瓦当及铜器上的纹饰风格相似。

雁足烛台 秦。1966年4月出土于塔尔坡砖瓦厂墓中。共2件。形制、大小相同。通高40厘米，雁腿股部托住环形灯盘，盘呈槽状，以承蜡泪。槽

底面上有三个距离相等的小柱钉，用以固定蜡槽，雁足下踏四桃形踏板上。膝后羽毛向上卷翘，悬趾弯而下垂，造型颇为形象。

提链炉 秦。1966年4月出土于塔尔坡砖瓦厂。共2件，形制、大小皆同。炉盘平面近方形，边长分别为23.6厘米和24.4厘米，盘深4厘米，炉盘四角盘沿平折，宽2.5厘米，盘四角有4个兽面马蹄形足，足高4.5厘米。炉盘两旁有提链，盘身外侧四边和盘沿上布满纹饰，十分精致。

铜漏壶 西汉早期。1958年出土于兴平县城东门外一空心砖墓中。通高32.3厘米，径10.6厘米，盖径11.1厘米，盖沿高1.7厘米。器呈筒状。盖上插标的梁为扁平形，高6厘米。梁及盖有直对的长方孔，孔径长1.75厘米，宽0.5厘米。孔内原应插有上露刻度的浮标，已失。壶身素面无纹，底部有旁出的漏嘴，漏嘴长3.8厘米，出水口径0.5厘米。下底附置三个马蹄形足。此漏壶是古代计时的器具，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

铜套灯 西汉。1990年10月出土于兴平县汉武帝茂陵西南部从葬坑中。套灯由顶灯、灯筒、翻灯、高灯四部分组合而成。通高24.3厘米，直径9厘米，总重2.455千克。此器构思奇绝，设计合理，做工精细，美观实用，是一件弥足珍贵的汉代照明用具。考虑到伴随出土的“上林铜釜”及“水衡鼎”等贵重铜器，此灯疑为皇家乘輿上的行灯。现藏茂陵博物馆。

阳邑铜烛行锭 西汉。1977年杨陵区徐西湾出土。圆盘，三蹄足，盘中有尖柱，匙状柄。通高5.4厘米，通长25.3厘米，盘径12.3厘米、深2.4厘米，沿厚0.35厘米，柄上刻铭2行，文曰：“阳邑铜烛行锭，重三斤十二两，初元年三月河东造，第三。”“锭”即灯，属阳邑县所用。“初元年三月”即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三月。“河东”即河东郡。据此可知西汉时河东郡有铜官。《汉书·地理志》失载。可补史之阙。

横山宫灯 西汉。1984年2月出土于兴平县田阜乡侯村。灯体为浅圆盘状，口微侈，中心有一锥柱。盘的一侧向外伸出曲形叶状手柄，柄端上阴刻篆书“横山宫”3字。盘下附三蹄足。灯高5.4厘米、盘径14.4厘米、盘深3厘米、柱高2厘米、柄宽2厘米、长12.8厘米。此灯显为西汉“横山宫”遗物。“横山宫”亦即“黄山宫”。传世有“黄山第四灯”（《小校经阁金文》卷十一）。此灯出土，对确定汉横山宫地望有重要价值。

林华观行镡 西汉宣帝年间造。1972年于乾县废品收购站拣选。镡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部为带柄三足小圆盘，下部为底盘。小圆盘置于底盘中心。底盘为平底，弧腹侈口。通高7.5厘米，上径11.5厘米，深1.9厘米，

下盘径20.5厘米，深2.3厘米，柄长6.5厘米，高7.5厘米，宽3厘米，镫足高2.5厘米。上下盘间系由铆接构成一个整体。镫上有铭文3处：镫的小圆盘外壁篆刻“林华观行镫。重一斤十五两。五凤二年造。第卅。”镫柄下端外部篆刻“扶”字。镫的底盘平沿上刻“泰山宫行镫。下盘并重四斤九两。甘露二年。工王意造。第卅一。”从铭文看，镫身为林华观行镫，造于五凤二年（前56），镫盘为泰山宫行镫，造于甘露二年（前52）。此镫形制特殊，制作精美，而铭文所记“林华观”、“泰山宫”二宫观名亦不见于史籍，故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此镫原应是林华观之物，后转为泰山宫所有。“镫”即“灯”字。

鳖座雁足灯 西汉。1985年出土于旬邑县马栏农场砖窑工地。通高14.3厘米，灯盘直径13厘米，鳖座通长14.3厘米、宽10厘米。雁足呈立柱形，掌踏于鳖背之上，上承灯盘。灯盘为圆形凹槽，铜片将灯盘分隔为三部分，每部分立尖头烛杆一支。鳖伸颈探头，小眼圆睁，四足有力，做爬行状。出土后为陕西省博物馆征集。

铜棺 唐。1981年8月出土于彬县炭店公社林家堡大队第二生产队，出土时距地表约4.5米。棺前高后低，通长33.3厘米，宽15厘米，高29.5厘米，盖长31厘米，宽14.2厘米、高8.3厘米。棺盖前、后上方有云形铜饰片。棺盖前方有造像，为一佛二菩萨。棺底四角有雕孔栏杆，四周有对称雕花。棺箱前方左右两角有一立佛。棺内有骨灰及人牙两枚。似为僧人葬具。

福昌寺铜佛 明。原供于渭城区北杜镇福昌寺大殿，1962年殿毁，移至咸阳城内凤凰台。1964年移存咸阳文庙，即今咸阳博物馆内。佛像作结跏趺坐状，中空，外壁厚0.7厘米，通高220厘米。高肉髻，额有白毫相，双目微闭，两手置膝，掌心向上，作禅定印。身着袈裟，两肩披巾，披巾及袈裟领、襟边雕有莲花纹饰，胸前有稍凸起的“卐”字。腰系裙，结带中饰有一钮。左、右肩窝分别刻正书“日”、“月”2字，似为日、月二菩萨之意。造型丰满匀称，表情肃穆庄重。当铸于明万历年间造铁塔之时。

第六章 陶瓷器

建国以来，伴随各项基本建设和考古调查、发掘及对古遗址、古墓葬的

清理，本地先后出土了不少陶瓷器。古代陶瓷是中国灿烂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地各类馆藏文物中数量较大的一种。

咸阳是秦王朝的都城，西汉时是京畿之地，其间宫殿官署、园囿陵墓比比皆是。这些建筑虽已不复存在，但其遗迹和砖瓦等陶建筑材料随处可寻。在这些陶建筑材料中，除过普通砖瓦外，饰有各种精美图案、纹式的大型空心砖和瓦当，以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格外引人注目。从前人著录及公开发表的资料看，中国秦汉瓦当中的多数种类，在咸阳境内遗存达百种以上，其中文字瓦当不下四五十品。这些精美的遗物，主要发现于秦咸阳遗址、汉甘泉宫遗址及汉代陵墓附近。

由于咸阳境内是汉唐王朝的主要墓葬区，因而，陶俑这种古代陪葬用的明器，在墓葬清理和发掘中几乎无所不在。从制作工艺看，除一般灰陶俑外，西汉时多施彩绘，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时期釉陶盛行，唐代则彩绘陶俑、彩绘釉陶俑及彩绘贴金釉陶俑皆有。从俑类题材看，多数为人物，有着装的、裸体的，有徒手的、持物的，有骑马牵驼的，也有奏乐舞蹈的，可谓千姿百态，形形色色。随着丧葬制度的世俗化，西汉中期以后，鼎、壶之类仿制礼器迅速消失，出现了禽畜俑和井、灶、猪圈等陶模型。彩绘陶俑以长陵附近的杨家湾大墓陪葬坑出土的大批步兵俑与骑马俑和阳陵南区从葬坑出土的大批裸体俑与战袍铠甲俑最为著名。葬于唐高宗麟德初年的昭陵郑仁泰墓出土的一批彩绘釉陶俑和彩绘贴金釉陶俑，不仅色泽鲜艳，造型逼真，而且在陕西省是首次发现，其制作时间亦属最早。

唐三彩是古代陶瓷工艺中的瑰宝。咸阳发现的唐三彩大部作工精良，造型优美，并系经过发掘清理，出土于昭陵、乾陵等有明确纪年的陪葬墓中，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昭陵郑仁泰墓和李震墓出土的三彩器物，被认为是由北朝的单彩器、双彩器向唐三彩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

本地出土的几批古代瓷器中，以80年代末咸阳国际机场基建中发掘的几座北周大臣墓之所出最为重要。其中王德衡墓的青瓷盘口四耳壶、独孤藏墓的青瓷盘口六耳壶和青瓷碟等，胎质坚硬，华丽凝重，均为北朝青瓷的珍品。独孤藏墓中发现的白瓷盘口唾壶和黑瓷盘口唾壶，虽然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白釉和黑釉，但在北朝白瓷与黑瓷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旬邑县安仁村宋金元瓷窑遗址是本地惟一经过科学清理的古瓷窑遗址，其中出土的青釉刻花瓷壶、青釉瓷浴婴等代表性作品，为研究耀州窑系瓷器提供了新的资料。

陶文是遗留在砖瓦及陶器残片上的文字，有随意刻画的，也有着意戳印的。本地陶文遗存以秦代的最有价值。秦咸阳遗址建国前即有陶文发现，建国后，特别是对秦咸阳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发现更多。另外，淳化县汉甘泉宫遗址附近亦发现了不少陶文。据初步统计，共约有四五百件之多。这些陶文中，有中央官署制陶作坊的，有咸阳亭里制陶作坊的，其中有不少亭里名、官署名和工匠名，为研究秦汉手工业生产制度及咸阳附近亭里名称，都有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再加上这些陶文产生于汉字由小篆向隶书演变的重要时期，因而受到多方面的重视。

第一节 陶建筑材料

筒瓦 战国至秦。1974年秦咸阳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多件。标本长61.2厘米，筒径14—19厘米，厚1.5厘米。瓦面饰直绳纹，两端各有10厘米宽抹去绳纹，中部有数道抹去绳纹而成的带纹，瓦里为涡点纹，瓦唇向里收敛形成瓦榫。

方砖 战国至秦。1980—1982年秦咸阳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多件。青灰色，少数为红色。有的为素面，有的饰有菱形纹、回纹、绳纹、云格纹、太阳纹、锯齿纹和圆圈纹等不同纹饰。主要有：菱形纹方砖，长42.6—48.8厘米，宽32.7—35.5厘米，厚3—4.4厘米；菱格圆璧云纹方砖，长43.5—44.6厘米，宽31.8—32.7厘米，厚3.1—4.2厘米；回纹方砖，长38.5—39.4厘米，宽38.1—39.3厘米，厚2.8—4厘米；绳纹方砖，长40—52.5厘米，宽32—34.6厘米，厚2.5—5.8厘米；锯齿纹方砖，四边有子母唇，残长22厘米，宽32.3厘米，厚4.5厘米。这些方砖均用于回廊内铺地或廊沿镶边。

空心砖 战国至秦。1974年、1980—1982年先后于秦咸阳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多件。均为大型长方形，中空。泥质手制。砖面打磨光亮，呈青灰色。有的素面，大部表面阴刻多样龙纹、凤纹、动物纹、四叶纹和横印几何阳纹，其中砖体五面均饰横印几何纹的，以回纹和菱形纹为主，长136厘米，宽38厘米，高18厘米；砖面为龙纹的，有单龙绕璧和双龙交尾两种，单龙绕璧砖长117厘米，宽39厘米，高16.3厘米，双龙交尾砖残长64厘米，宽37.5厘米，高17厘米；砖面为凤纹的，有立凤、卷凤和水神骑凤三种。

陶水管道 战国至秦。1974—1976年秦咸阳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主

要有圆形水管、五角形水管、直角水管弯头及散水漏斗等。圆形水管为圆筒形，子母口，一般每节长58—59厘米，一头大，一头小，大头直径28厘米，小头直径25厘米，厚1厘米。外饰粗绳纹，内为大麻点纹；五角形水管呈五棱形，体厚重，剖面似房屋山墙形，内壁素面，外壁拍粗绳纹；直角水管弯头为圆筒状，中间弯曲90°，一般长约35—38厘米，口径约21—25厘米。表面饰细绳纹，里为麻点纹，大头小尾套接；散水漏斗口壁为圆形，径74—75厘米，壁厚1.3厘米，深23厘米，流长14厘米，口径13.5厘米。平沿直壁，圆底，底部有漏水孔，孔下有流。

陶窖底盆 战国至秦。1974年秦咸阳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多件。口、底均呈椭圆形，或沿微向外翻，腹呈抛物线形。泥质细，火候高。口径96.8—102厘米，宽63.3—66.5厘米，高59—65厘米，底径54—67厘米，宽35—37厘米，厚2.8厘米。陶窖底盆为陶水管道的配件。或以为是冷藏窖的窖底。

饕餮纹半瓦当 战国中期。渭城区窑店乡秦遗址采集。当面为一半圆形，长19厘米，瓦背残长23厘米，当面饰简化饕餮纹。线条粗犷，风格古朴典雅。

变形葵纹瓦当 战国至秦。1974年秦咸阳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当径19厘米，轮宽1厘米。当中心圆内饰四瓣尖状旋叶，间有小乳钉。环形区间饰S纹与云纹相间的变形葵纹。此纹饰为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所仅见。

鹿燕龟纹瓦当 战国至秦。1974年秦咸阳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当径17.4厘米、轮宽0.8厘米。轮内饰弦纹。中心圆内饰一突起大乳钉。内外圆之间以双线“十”字栏界，将当面分为四个扇形区间。上区间饰相向的双鹿，下区间饰背向的双鹿，左区间饰一双展翅的飞燕，右区间饰前后相随的二小龟。附筒瓦背部印有“左登”2字。此种将当面一分为四饰以多种动物图案者极少见。

龟蛇雁纹瓦当 秦。1979年淳化县铁王乡董家村秦林光宫遗址采集。当径15.5厘米、轮宽1.6厘米。轮内饰单线弦纹。当面饰一伸头展足的大龟，龟头部分有一蛇横绕，左右各饰一飞雁。

树木鸟兽纹半瓦当 秦。1976年渭城区杨家嘴秦遗址采集。当径18.5厘米、轮宽0.8厘米。轮内饰单线弦纹。当面正中为一树，树旁有两相向而立的走兽，兽上各饰一飞鸟。画面生动。

蟾蜍玉兔纹瓦当 秦。1979年淳化县铁王乡董家村秦林光宫遗址采集。

当残径 17.5 厘米。锯齿形外轮。当面右侧饰一四肢曲伸的蟾蜍，左侧饰一向上奔跃的兔子，间饰桂枝，恰似月满当空图。故又称“月宫纹当”。

菊纹瓦当 秦。1975 年渭城区聂家沟秦遗址采集。当径 16.3 厘米，轮宽 1.5 厘米。轮内饰单线弦纹和中心圆，绕圆心饰八瓣菊花纹。线条简洁明快，为瓦当中所少见。

蝉纹瓦当 秦。渭城区窑店乡秦遗址采集。当径 15.2 厘米，轮宽 0.7 厘米。当面为四只蝉，蝉有双目，羽呈线形卷曲，似蝉“振羽”之状。如舍去蝉身，则近似云纹。或以为云纹即是以此演变而成。

葵纹瓦当 秦。渭城区滩毛村出土。当径 15.6 厘米，轮宽 0.5 厘米。单线中心圆有一小乳钉，外轮至中心圆以单线“十”字栏界，将内外圆分别分成四个区间，内圆每区饰一葵花瓣，外圆每区饰二葵花瓣。瓦背戳印“圭宫”2 字。现藏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葵纹瓦当在秦咸阳遗址出土较多，形式多样，线条粗犷，因其纹样似带有若干口耳的太阳，故又有称之为“太阳纹”瓦当者。此种瓦当咸阳博物馆藏有多件。

陶井圈 秦。1974 年秦咸阳遗址内窑店乡出土。多件。灰色，泥质夹沙，外饰粗绳纹，内为涡点纹或斜方格纹。圈高 47 厘米，内径 87 厘米，壁厚 2.5—3.6 厘米。

板瓦 汉。淳化县汉云陵北阙门遗址出土。灰色。多件。一种特大，长 94 厘米，宽 41 厘米，厚 2 厘米。外饰斜绳纹，内为素面。一种略如梯形，长 47.8 厘米，宽 29.2—32.4 厘米，厚 2.4 厘米。外饰细绳纹，内为布纹。

条形空心砖 汉。兴平县汉茂陵陵园出土。多件。长条形。空心。其上均模印各种纹饰。除作云雷纹者外，多数以菱形纹或方格纹为边，中间画成斜方格或菱形格，格内饰天象或葵纹图案。以纹饰不同，可分为六种：云雷纹砖，长 105 厘米、宽 42 厘米；三光纹砖，长 105 厘米、宽 41 厘米；联璧纹砖，长 50.1 厘米、宽 39 厘米；日月纹砖，长 132 厘米、宽 43 厘米；天象纹砖，长 96 厘米、宽 41 厘米；葵纹砖，长 92 厘米、宽 37.2 厘米。这些条砖制作精良，雕饰华美，充分反映了西汉中期高超的建筑技术和艺术风格。

青龙纹空心砖 汉。1976 年兴平县汉茂陵陵园出土。长方形，空心。残长 63.5 厘米、宽 37 厘米、厚 14 厘米。此砖残长虽仅余一半，但可看出砖面为相向卷曲的双龙图像。今仅见右边一龙。龙头有双角，昂首翻唇咧嘴，上下有鬃，周身有鳞有鳍，两爪为三趾，上下有云朵。画面单线阴刻，形象非常生动。

白虎纹空心砖 汉。1976年兴平县汉茂陵陵园出土。长方形，空心。残长46.5厘米、宽30厘米、厚14厘米。此砖残甚，今所见者仅三分之一强。虽不可见虎的全貌，但头部形象逼真，周身线条简洁，残余前腿作大步缓行状，虎的威武姿势大略可见。

朱雀纹空心砖 汉。1976年兴平县汉茂陵陵园出土。长方形，空心。砖长111厘米、宽30厘米、厚15厘米。砖面饰一对背向朱雀。朱雀昂首羽冠，尖嘴含丹，胸部挺拔，合翅阔步向前。尾部两朵叶状羽毛恰似孔雀开屏。两雀尾部之间砖上饰垂桃形花苞，枝下两侧有对称叶片。笔法简洁，线条十分流畅。

玄武纹空心砖 汉。1976年兴平县汉茂陵陵园出土。长方形，空心。砖长115厘米、宽34厘米。砖面为一对相向的龟蛇相交图。龟形矫健，头向外伸，昂首闭嘴，圆目巨睁。口上下以柳纹为鬃，四足作迈步前进状。菱形回纹龟背隆起；蛇与龟卷曲相交，头有冠羽，张口与龟头相对，绕龟腹部，尾向前翘。周身斑斓，似有鳞鳍。画面丰满，形象逼真。

长生未央方砖 汉。1985年淳化县铁王乡铁王村汉陶棺墓出土。边长34厘米、厚4.5厘米。砖面分四方。两斜对方为阳纹穿壁，壁面四分为扇面形，上饰小圆点；另两斜对方为阳文篆书“长生未央”4字。

陶拐角水道管 汉。1973年10月出土于兴平县西吴乡豆马村东南约1000米处。二件。形制、大小相同。水道管通长141.5厘米，高29厘米。管道出水口断面作马蹄形，管口面作斜坡状，流口周饰方格云纹、圆形连珠纹。斜面高36厘米、宽32厘米，流口宽12厘米。管尾拐角成90°，套口成圆形，外径25.5厘米、内径16.5厘米。全管外壁均厚3厘米。尾至顶长127厘米。出土地附近有可能是西汉茂陵邑遗址。此拐角水道管疑为茂陵邑或大型建筑遗址遗物。

菱纹半瓦当 汉。1984年淳化县铁王乡程家堡村汉洪厓宫遗址发现。半圆形当面高9厘米，轮宽1.1厘米，底边长19厘米。连有外饰细绳纹筒瓦。当面饰阳文夔龙图案。

“兰池宫当”瓦当 汉。渭城区杨家湾附近出土。当径18厘米、轮宽1.4厘米。轮内饰单线弦纹。当面单线“十”字栏界，四区间阳文篆书“兰池宫当”4字。字体圆转勾连与方折平直相结合，遒劲俊秀。兰池宫为秦宫，此瓦当为汉代修葺时制作。

“长陵西当”瓦当 汉。1976年渭城区汉长陵陵园西墙附近发现。多枚。

当径 18 厘米、轮宽 1.5 厘米。双线中心圆内有联珠，圆心有乳突。内外圆之间四个扇形区内阳文篆书“长陵西当”4 字。

“长陵东当”瓦当 汉。1976 年渭城区汉长陵陵园以东陪葬区西侧附近采集。当径 15.7 厘米、轮宽 1.4 厘米。当面阳文篆书“长陵东当”四字。章法、布局与“长陵西当”瓦当相同。据《史记集解》引《关中记》：“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同陵地。”此“东当”当为吕后陵瓦当，前述“西当”当为高祖陵瓦当。

“齐园”瓦当 汉。1976 年渭城区汉长陵东北陪葬区采集。当径 16.1 厘米、轮宽 1 厘米。轮内饰单线弦纹。弦纹内上下排列阳文“齐园”二字。“齐”字点下一横顺弦纹下垂，几将“园”字包括，“园”字末笔一横亦有弧度。字内方外圆，为篆文中佼佼者。汉武帝子刘闳为齐怀王，疑此瓦当及同地出土的“齐一宫当”、“齐园宫当”诸瓦当皆为齐怀王墓园遗物。

“齐园宫当”瓦当 汉。1976 年渭城区长陵东北陪葬区采集。当径 14.8 厘米、轮宽 0.9 厘米。当面阳文篆书“齐园宫当”4 字。章法、布局与汉代四字瓦当相同。同地点还采集有“齐一宫当”。现均藏咸阳博物馆。

“甘林”瓦当 汉。1979 年淳化县凉武帝村汉甘泉宫遗址采集。当径 14 厘米、轮宽 1 厘米。轮内饰单线弦纹。弦纹内双横线分当面为上下两半圆，上下区阳文篆书“甘林”二字。“甘林”疑为“甘泉上林”之省。

“卫”字瓦当 汉。1979 年淳化县汉甘泉宫遗址采集。当径 13.5 厘米、轮宽 1 厘米。轮内阳文篆书一“卫”字，当面涂朱。此瓦当淳化县文化馆收藏多件，形式略有区别。《汉书·百官公卿表》云：“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此瓦当疑即甘泉宫卫尉官署遗物。

“宫”字瓦当 汉。1986 年于淳化县固贤乡下常社村汉离宫遗址发现。当径 16 厘米、轮宽 0.9 厘米。中心圆内为一阳文篆书“宫”字。双界区分的四个扇面上饰内曲云纹。现藏淳化县文化馆。该馆还藏有同时出土的“宀”字瓦当。“宀”疑即“宫”的另一种写法。

“便”字瓦当 汉。咸阳市郊区马庄采集。当径 15 厘米、轮宽 1 厘米。轮内饰单线弦纹。单线方形当心。方块内阴文篆书一“便”字。方形四角单线四出栏界。四个扇形区各饰一组卷云纹。云纹左右饰有瓣状纹。汉帝陵多建有便殿，此当为便殿遗物。

“冢当”瓦当 汉。1988 年淳化县胡家庙乡那家村汉代祠堂建筑遗址发现。当径 15.8 厘米，轮宽 1.1 厘米。当面中心圆较小，圆心两旁阳文篆书

“冢当”二字。

“嵬氏冢舍”瓦当 汉。兴平县马嵬镇附近采集。当径14厘米、轮宽0.9厘米。轮内饰单线弦纹。单线中心圆。内外圆之间以双线“十”字栏界交于当心。当面阳文篆书“嵬氏冢舍”4字。四字逆时针排列。此瓦当疑为嵬氏墓前建筑遗物。

“长相毋忘”瓦当 汉。1984年于淳化县董家村采集。当径14.9厘米、轮宽0.9厘米。轮内饰单线弦纹。中心圆内有一突起乳钉。内外圆之间“十”字形双界格将当面分为四区，有阳文篆书“长相毋忘”四字。疑为“长相思，毋相忘”一语之省。

“六畜蕃息”瓦当 汉。1984年于淳化县甘泉宫遗址采集。当径16.4厘米、轮宽1.1厘米。轮内单线中心圆内饰一乳钉。环形区间逆时针阳文篆书“六畜蕃息”4字。

“千秋万岁”瓦当 汉。淳化县汉甘泉宫遗址出土。当径18.5厘米、轮宽1.2厘米。当面有小圆心，内为凸起半圆球。四扇面有阳文篆书“千秋万岁”4字，右起竖读。

“加气始降”瓦当 汉。1979年兴平县汉茂陵东陪葬区出土。当径18厘米、轮宽1厘米。轮内饰单线弦纹。中心圆内有乳突。内外圆之间以双线分为四区，阳文篆书“加气始降”4字。“加”即“嘉”字。现藏茂陵博物馆。与此瓦当同时出土的还有“光踰由宇”、“屯美流远”、“泱茫无垠”、“屯泽流池”及“道德顺序”诸瓦当，书法均极精妙。

“光踰由宇”瓦当 汉。1979年兴平县汉茂陵东陪葬区出土。当径18厘米、轮宽1厘米。当面阳文篆书“光踰由宇”4字。章法、布局与“加气始降”瓦当同。“由”即块字。

“屯美流远”瓦当 汉。1979年兴平县汉茂陵东陪葬区出土。当径16厘米、轮宽1厘米。当面阳文篆书“屯美流远”4字。章法、布局与“加气始降”瓦当相同。

“泱茫无垠”瓦当 汉。1976年兴平县汉茂陵东陪葬区出土。当径17.5厘米、轮宽1厘米。当面阳文篆书“泱茫无垠”4字。章法、布局与“加气始降”瓦当相同。

“屯泽流池”瓦当 汉。1976年兴平县汉茂陵东陪葬区出土。当径15厘米、轮宽1厘米。当面阳文篆书“屯泽流池”4字。章法、布局与“加气始降”瓦当相同。

“道德顺序”瓦当 汉。1976年兴平县汉茂陵东陪葬区出土。当径15厘米、轮宽1厘米。当面阳文篆书“道德顺序”4字。章法、布局与“加气始降”瓦当相同。

“千金宜富贵当”瓦当 汉。1984年于淳化县董家村以东采集。当径16.5厘米、轮宽1.1厘米。单线中心圆内阳文篆书“千金”2字，2字平列。双界格分当面为四区，阳文篆书“宜富贵当”4字。顺时针环读，字体秀丽。

“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瓦当 汉。渭城区杨家湾出土。当径约16厘米左右。轮内饰单线弦纹。当面有3行阳文篆书，每行4字，文曰：“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字四边有简化龙纹，龙纹与文字间饰若干小乳钉。

“与民世世天地相方永安中正”瓦当 汉。1974年兴平县茂陵东南采集。当径19.3厘米、轮宽2厘米，附筒瓦9.1厘米。当面轮内饰单线弦纹。单线中心圆内阳文篆书“永安中正”四字，内外圆之间四个扇形区，每区篆书阳文2字，8字顺时针为“与民世世天地相方”。

“延年益寿”瓦当 汉。1974年兴平县汉茂陵陵园出土。当径18厘米、轮宽1厘米。轮内饰单线弦纹。当面四个扇形区间阳文篆书“延年益寿”4字。出土二件，均书法精妙。一件平折方直，一件曲屈流畅。为同类瓦当中珍品。

又，1979年淳化县甘泉宫遗址曾出土“益延寿”瓦当。疑为“益寿延年”四字之省。其意与“延年益寿”瓦当相同。

“永奉无疆”瓦当 汉。1976年渭城区杨家湾附近采集。当径14.8厘米、轮宽1.2厘米。当面阳文篆书“永奉无疆”4字。章法、布局与一般汉代四字瓦当相同。从出土地点分析，可能为长陵陵前建筑遗物。

“加露沼沫”瓦当 汉。秦都区马泉乡姜家村原畔采集。当径15.7厘米、轮宽0.3厘米。当面为阳文篆书“加露沼沫”四字。章法、布局与同期四字瓦当相同。

“长生未央”瓦当 汉。淳化县汉甘泉宫、云陵及云陵邑诸遗址均有出土。同式有200余件。当径15.2—19厘米，轮宽0.5—1.5厘米。当面阳文篆书“长生未央”4字。字形变化多端，多数向左竖读，亦有向右竖读或顺时针旋读者。圆心多半球形，亦有在半圆球上饰方格纹或四个小圆点，半圆球外有增饰联珠或中心圆内饰弦纹者。当面多见涂白垩和朱色。

“长生无极”瓦当 汉。渭城区汉阳陵陵园采集。当径17.8厘米、轮宽

1.3厘米。当面对阳文篆书“长生无极”4字。章法、布局与同期四字瓦当相同。此瓦当在汉陵极为常见。

“千秋万岁”瓦当 汉。渭城区汉阳陵陵园采集。当径18厘米、轮宽1.2厘米。当面对阳文篆书“千秋万岁”四字。章法、布局与同期四字瓦当相同。

“亿年无疆”瓦当 汉。渭城区汉渭陵陵园采集。当径18.8厘米、轮宽1.8厘米。当面对阳文篆书“亿年无疆”四字。章法、布局与同期四字瓦当相同。疑即王莽之妻孝睦皇后亿年陵遗物。

“百万石仓”瓦当 汉。秦都区渭滨乡两寺渡南村汉细柳仓遗址采集。当径15.7厘米、轮宽1.2厘米。当面对阳文篆书“百万石仓”四字。章法、布局与同期四字瓦当相同。

鹿“甲天下”瓦当 汉。淳化县汉甘泉宫遗址采集。当面残。当径约16厘米，轮宽1.1厘米。当面中心圆较大，圆内半圆球顶低平，中心圆外上部饰二鹿，一鹿仅见头部，“甲天下”3字阳文篆书，仅见局部笔画。瓦画鹿形代鹿字，“鹿甲天下，所从表瑞也。”

云纹瓦当范 汉。1981、1982年分别出土于淳化县石桥乡刘家埝村和卜家乡排子村汉遗址。均为陶质。前件径15.7厘米，厚3.8厘米，范侧视似“凸”字形。范面在四个扇形面上饰凹云纹，内圆在三道凹弦纹内饰阴纹方框、“十”字和小圆点；后件径17.5厘米、厚3厘米，侧视亦似“凸”字形。范面下凹的双界格线通过中心圆，圆内“井”字形图案外有阴曲尺纹，外区四扇面饰阴线内曲纹。

陶鸱吻 唐。1971年礼泉县昭陵献殿遗址出土。陶制。中空。状若鸱尾。由两节相接构成。靠内面一节中下部有圆孔。尾朝上置，高150厘米，长102厘米，前端厚34厘米、后端厚77厘米，重150公斤。表面磨光，似涂有色彩。形体之大，颇为罕见。

兽面纹瓦当 唐。1979年礼泉县唐昭陵献殿遗址出土。当径15厘米、轮宽2厘米。当面浮雕以蔓草勾绘出一个怪兽面部轮廓，两道弯眉上竖，横目怒睁，鼻孔上翻，巨齿外露，额部有“上王”二字。此瓦当图像新奇，线条清晰，是唐代瓦当中珍品。

莲花纹瓦当 唐。礼泉县唐昭陵北阙遗址采集。多件。当径约13.5厘米、轮宽2厘米。轮内饰联珠，当面饰短而稍肥的双瓣莲花纹，花蕊为一小乳钉。此瓦当在唐代瓦当中较为常见。

莲纹方砖 唐。1980年淳化县石桥乡石马坪村唐贞陵北门遗址出土。边长31厘米，厚4.5厘米。面饰阳莲花纹，背饰阴方格纹。

第二节 陶 俑

彩绘裸体男立俑 西汉。近年渭城区窑店乡三义村高祖长陵从葬坑出土。高58厘米。红陶，模制，裸体，无臂，两肩部有插孔，用以组装木臂。通体彩绘，俊眉细目，丰颊直鼻，头结高髻。从发掘出的部分木臂残件和少量织物痕迹推测，陶俑原安有可以活动的木臂，并穿有彩色麻织衣服。

彩绘裸体女立俑 西汉。近年渭城区窑店乡三义村高祖长陵从葬坑出土。高54厘米。红陶，模制。裸体，无臂，双目前视，嘴紧闭，唇部描红，头上作羊尾髻。前胸双乳隆起，下腹及形体轮廓圆润，女性特征明显。

彩绘指挥俑 西汉。1965年渭城区杨家湾汉墓出土。高55厘米。俑头系巾，下有结带。身穿白、红镶边的绿色战袍，外披黑色甲衣，腰系带，足登彩绘高勒靴。右手上举与前额齐，食指和大拇指伸出作指挥状，左臂偏外下垂，手平伸，姿态和服饰与其他俑不同，显然是一指挥官形象。此俑仅出1件，非常珍贵。

彩绘持盾俑 西汉。1965年渭城区杨家湾汉墓出土。高49厘米。俑头系巾，下有结带，沿两颊结于颌下。右手空拳半握，左手持盾，右手原来可能持有器物（已失）。神态端庄威武。俑身穿着色鲜艳及膝短襦。腿扎行滕。

彩绘铠甲俑 西汉。1965年渭城区杨家湾汉墓出土。高49.5厘米。俑头系巾，下有结带。身穿黑色甲衣，甲上有红、白描绘的甲片。腿扎行滕。姿态和服饰与上述持盾俑相同，作持兵器状（兵器已失），俑的背后有一箭囊。

彩绘骑马俑 西汉。1965年出土于渭城区杨家湾汉墓。通高69厘米，马长55厘米。俑身穿红、白、绿、紫等色服饰，手作持缰或执器械状。马身绘有鞞子和髻头，有的静立，有的嘶鸣，造型优美，制作精致，在俑坑中构成了阵容雄伟的骑兵阵。大部分马的臀、尾部和俑的脊上，刻画有各种不同的数字。骑马俑和马尾全是另外作成，可以取下或安置。

彩绘乐俑 西汉。1965年渭城区杨家湾汉墓出土。高48厘米。俑系头巾，身着白彩至膝短襦，腿扎行滕，右手微曲，臂腕上抬，臂前屈至胸，手心向上，手半握，似在奏乐（乐器已失）。

彩绘舞俑 西汉。渭城区狼家沟汉墓出土。高45厘米。头戴红巾帻，身

穿绿色至膝短襦，腿扎行滕。身体修长，向前略屈，腰肢轻摆，左手甩出粉色长袖，脚下亦似作某种舞步。

彩绘裸体陶俑 西汉。90年代初渭城区正阳乡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出土。共出土完整陶俑100余件，均为男性裸体。高约60厘米左右。出土的绝大多数无臂，肩部是个竖直的圆面，中有一圆孔，横向穿过胸腔。个别倒在地上的陶俑还保留有胳膊的痕迹。塑造逼真，躯体各部合乎比例，阳物、肚脐、窍孔俱备。俑头形象各异，显出年龄、个性的区别。发均由额际中分，经两颞，至脑后合拢上折，然后或纽结，或梳理，或辮织上顶，再于头顶绾髻，横插笄。俑烧后皆敷彩，颜面、躯干、下肢均绘橙红色，有如肌肤。发、眉、须、睛为赭黑。俑分头、躯干、腿、脚四大段制作，各用范模，然后粘接，再经捏、塑、刻、划、抹手法，使同模形象各具个性。陶质细腻坚硬。个别俑身可见麻织物痕迹，俑旁多发现有铜带钩，推测俑身原穿有衣服。同类型且形体相近的陶俑在兴平县武帝茂陵附近亦有出土。

彩绘战袍铠甲俑 西汉。90年代初渭城区正阳乡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第20号坑出土。同坑出土此类陶俑363件。俑高62厘米，均头戴武弁，身穿战袍铠甲，肩部有圆孔连结木质胳膊，个别陶俑木手依稀可辨。俑头扎红色丝绸抹额，腿裹红色行滕，战袍覆于膝下，下宽上窄，中有束腰。战袍外套铠甲。木甲已朽，仅存痕迹。俑姿以双脚并齐站立者居多，此外有单脚前行者，并脚弯腰者及弯腰奔跑者。陶俑发型与制作方法等与上述阳陵南区从葬坑出土的彩绘裸体陶俑相同。

彩绘陶动物模型 西汉。90年代初渭城区正阳乡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第21号坑出土。有代表性的为猪、牛、鸡、狗、羊等。均为彩绘。其中陶猪长44厘米、背宽15.5厘米、高24厘米，白色，皆为母猪。身躯肥大，有两排垂乳，长嘴大耳，木质尾巴，已朽。陶牛长71厘米、背宽24.2厘米、高39厘米，身躯肥壮，四腿如柱，竖耳，鼓目，颈短粗，木质角、尾已朽。陶鸡分雌雄两种：雄鸡长16.2厘米、高14.4厘米，昂首翘尾，朱红色高冠，赭黑色眼睛，黑、红、黄三色羽毛；雌鸡长14.6厘米、高12.3厘米，以红、黄色为主。木质鸡腿已朽。陶狗长33厘米、高19.3厘米。分狼狗、家狗两种，均白色。狼狗长嘴竖耳，两腮外鼓，怒目前视，扁圆身躯，长尾下垂；家狗短嘴小耳，小尾上卷，躯干较粗壮。羊分绵羊、山羊两种；绵羊长36.5厘米、背宽11.5厘米、高44厘米，腿细长，双耳略垂，臀肥大，尾下垂；山羊长39厘米、背宽12.5厘米、高29厘米。柱形腿，身躯扁圆，胡须下

垂，小尾上翘，竖耳，木质犄角已朽。

陶方仓模型 西汉。1970年出土于渭城区杨家湾4号汉墓。高70厘米，长50厘米，宽40厘米。方肩，侈口，小底，有一盒状套盖。器身饰有赭色陶衣。

陶井模型 汉。1986年4月出土于淳化县铁王乡小池村汉墓。圆筒状，直口，平沿，方唇，平底，沿上竖有井亭，亭下装置直径1.7厘米滑轮，井外壁饰两道凹弦纹。通高29厘米，口内径12.6厘米，腹深13厘米，底径16.5厘米。出土时井内置一小桶，略如球形，敛口，鼓腹，平底，口沿外有小孔，高4.8厘米，口内径2厘米，腹径5厘米，底径2厘米。均为泥质灰陶。同式共3件。为明器。

陶灶模型 汉。近年咸阳市东郊地质矿产部第三普查大队驻地36号汉墓出土。长19厘米，宽13厘米，通高13.6厘米。灶面上有前后两个火眼，灶后有圆柱形烟囱，中有小孔。火眼上各置一陶釜，前火眼釜上又置一陶甑。火门两边饰几何纹。灶面上火眼周围有鱼、钩、勺、刷等食物和灶具图案。此类陶灶模型显为明器，在本地各汉墓中屡有出土。

绿釉陶鸭 汉。1985年兴平县仪空村汉墓出土。高18厘米，长23厘米。鸭体肥胖，昂首翘尾，作水上浮游状，通体施绿釉，釉中透出银白色，故此种釉又称“银釉”。

绿釉陶奩 汉。近年咸阳市东郊地质矿产部第三普查大队驻地34号墓出土。通高24.5厘米，口径19.5厘米。外涂绿釉，红胎。直口，直壁，平底，三熊足。有博山式奩盖。在器身两道弦纹之间饰有山峦、瑞鸟、异兽浮雕。显为明器，制作精美，造型奇特。

黑釉猴 汉。1981年淳化县铁王乡铁王村汉陶棺墓出土。猴作蹲坐状，双目正视，两耳高耸，右掌掩鼻，左臂搂一幼猴于胸前，幼猴站立，后足踩大猴足，前爪按大猴膝，仰视大猴。造型生动。高5.3厘米，座宽2.8厘米。灰陶胎，表施黑釉。

绿釉猪圈 东汉。1960年乾县出土。圈为长方形，高14.5厘米，宽20.5厘米，长23.5厘米。通施绿釉。圈内一角搭一小棚，当为供猪卧之处。母猪正在槽边吃食，四头仔猪涌向母猪争相吮乳。饲养者在圈外照料，面前置有盆瓢。造型生动，是东汉农家生活的真实写照。

陶胡人武士俑 西魏。1984年渭城区侯义墓出土。高14.9厘米。此俑出土时置于墓室中部武士俑与乐俑之间。卷发披肩，高鼻深目，身躯粗壮，显

为胡人。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足穿靴。右手握拳，上举于胸。左手握拳下垂。拳中皆有一孔，原物已失。

彩绘武士骑马俑 北周。1989年出土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叱罗协墓中。共12件。马高18厘米，通高22.5厘米。武士头戴白色兜鍪，两侧都有护耳，并在额前正中部位下突，与眉心相交，顶上有长缨；身着红色白甲，有护肩，腰束黑带，下着白裤，足穿黑靴，下踩马镫；右手下垂握鞍，左手下垂握拳，拳中空，似供插所持之物。马身亦披铠甲。马首下垂，首涂红色，鬃涂白色，马尾下垂。这12件甲马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鱼鳞甲，第二种是曲线甲，第三种是圆形带点甲。马背部都有黑色鞍，鞍上搭有红色毡垫。骑者眉毛、眼睛、胡须涂黑色，口涂红色，端坐于马上。马无拖板，大小相同。这些骑马武士俑，是北周骑兵部队的真实写照。

彩绘骑马乐俑 北周。1988年出土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王德衡墓中。共4件。均高19厘米，为吹奏乐俑。头戴黑色披肩风帽，身着广袖通肩大衣，腰束带，下着裤，足穿黑色靴子，踏于马镫内。马全身绘红彩，低首，垂尾，无板座。其中一俑双手捧排箫偃依于胸前作吹奏状，一俑左手曲于胸前，右手弯曲持长笛，待演奏状，另二俑右手弯曲偃胸，左手握一小圆物（似哨子），紧靠口部，作吹奏状。

彩绘击鼓女坐俑 唐永徽二年（651）。1976年礼泉县牛进达墓出土。高16厘米。女俑头梳双螺髻，脸庞丰润，神态端庄，身着半臂，穿红白条纹相间的齐胸长裙，跪坐于台上，双膝上横置一细腰鼓，两手分贴于鼓面，似拍击伴奏。

白陶舞马 唐显庆二年（657）。1971年礼泉县张士贵墓出土。马通体皆白，如象牙雕刻，膘肥体壮，体态俊美。披鬃缚尾，扬颈低首，右前蹄抬起，似正随乐曲舞蹈。此马或称“诞马”（指随仪从以备的散马）。出土2件，现昭陵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各藏1件。

彩绘骑马戴笠帽女俑 唐显庆二年（657）。1971年礼泉县张士贵墓出土。通高34.5厘米，长29厘米。女俑头戴笠，下似风帽，穿圆领窄袖长衫，外套白色对襟绘花襦，袒胸，系红色长裙。右手下垂，左手紧勒马缰。面目清秀，阔眉朱唇，神态自若。马披鬃拖尾，首下弯，与勒缰时的手势相呼应。鞍鞯彩绘贴金。此俑为初唐仕女骑马出行的写真。

陶舂米机模型 唐显庆二年（657）。1972年礼泉县张士贵墓中出土。通高9厘米，长23.5厘米，宽15厘米。为一陶制舂米机模型。舂米的石棒安

装在长木柄一端，下置石臼；木柄中间用架子支撑。人在杠杆另一端上下用力，利用杠杆原理舂米。机下置有帚、瓢等舂米时使用的工具。机房还塑有一温顺而机警的小狗。整个模型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贴金彩绘镇墓兽 唐麟德元年(664)。1971年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二件。一为人面，一为兽面。人面的通高64厘米，蹲踞状，头上独角前伸，有肩鬣，背鳍，背上插戟。竖眉环眼，方口大鼻，连鬃胡，相貌剽悍异常。兽面的通高62厘米，亦为蹲踞状，头上杖杈形双角后倾，肩长山字形双翼，巨口獠牙，背上插戟，怒目圆睁。二兽均外饰彩绘并贴金，纹饰华丽，色彩十分鲜艳。

彩绘釉陶贴金文官俑 唐麟德元年(664)。1971年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俑高69厘米。文官头戴进德冠，穿红色阔袖短袍，披饰花两裆，着乳白色裳，脚穿黑色如意云头履，衫缘、袖口、襟边饰花纹，衣、冠边缘均贴金。浓眉高鼻，八字胡上翘，面目文雅清俊。此俑共出2件，现分别藏于昭陵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

彩绘釉陶贴金武官俑 唐麟德元年(664)。1971年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俑高72厘米。武官头戴胄帻，着明光铠，虎头护膊，虎皮纹裤，花战袍，黑色圆头靴。右臂作持兵器状。通体贴金。仪态威武雄壮。此俑共出土2件，现分别藏于昭陵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

彩绘骑马奏乐俑 唐麟德元年(664)。1971年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二件。一件吹排箫，一件吹笛。吹排箫俑高30厘米，俑头戴笼冠，窄肩瘦脸，身穿宽袖红袍，足着乌靴，左手执马缰，右手执排箫紧贴于口，作吹奏状。骑黄色马，马的颈部和臀部有圆形红斑点，马头下弯，与勒缰手势相呼应。吹笛俑高40厘米，俑头戴风帽，身穿窄袖红长袍，足着黑靴，双手执笛，紧贴口部，身体微倾，作吹奏状。骑马黄色，马体雄伟。二俑人马协调，神态自然。

彩绘釉陶胡人骑马俑 唐麟德元年(664)。1971年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通高41厘米，马长34厘米。骑马俑深目高鼻、络须胡、戴幞头、穿窄袖翻领袍，着黑色长靴，双手呈勒缰状，体态硕壮，神情自若。马披鬃缚尾，张口静立，墨描鞍辔，兽皮纹靴。这些人马相配协调，是胡人骑马的生动写照。

黄釉陶乐舞俑 唐麟德元年(664)。1971年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共7件，高17.6—26.2厘米。5个手执乐器的乐女围坐地上演奏，当中两个舞女

轻拂长袖，娉娉起舞。奏者全神贯注，舞者姿态优美。5个乐俑中，4人梳双髻，1人单髻，均穿半臂半裙。两个舞俑头梳双髻，身着半臂，穿紧身长裙，双手执巾。从其面带稚气和娇柔的姿态判断，她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少女。

彩绘男装女俑 唐麟德元年（664）。1971年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二件。二俑均立于方形踏板之上。一俑高31厘米。头戴黑色幞头，穿褐色圆领窄袖袍，襟缘饰团花图案。束腰，波斯裤，淡蓝色尖头鞋。阔眉细眼，神态娴静，筒袖直立，虽着男装，仍透出闺秀之气。另一俑高24厘米。发髻后梳，穿淡黄色圆领交衽窄袖袍，束腰。双手拱交胸前，颇具俊态。

彩釉女立俑 唐麟德元年（664）。1971年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高38厘米。俑梳扇形高髻，穿窄袖衫，帔帛长拖，系红、白条纹相间长裙。娥眉凤眼，小口朱唇，面容俊丽。袒胸。双手拢于腹前，体形修长，神态端庄，是唐代仕女的典型形象。

彩绘釉陶烧灶女俑 唐麟德元年（664）。1971年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俑高10厘米。女俑发色深黑，挽高髻，圆形脸，双目微虚，神态安详，似坐于小凳上。从面容看，像一中年妇女。身穿方领袒胸上衣，窄袖，背上披一方小巾，可能是用以挡尘，下穿长裙，两腿弯曲，双膝并拢，左手置于膝上，右手轻轻贴于小腿，姿态优美逼真。面部及上衣施淡黄色釉。女俑面前置一长方形陶灶，灶高16厘米、长14厘米、宽12厘米。灶上置一锅，灶后有圆形烟囱。灶门为半椭圆形，灶门两侧及上方饰红色火苗。这种劳动妇女的形象在唐俑中罕见。

彩绘釉陶载物驼 唐麟德元年（664）。1971年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高34厘米。驼背上有椭圆形花毡，毡上搭有木鞍架，架上驮有装满物品的圆形花袋，一小猴爬在袋上。袋两边各置有丝卷，丝卷下有扁壶、兔子、刀鞘和箭囊等，生动地塑造出了当年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形象。

彩绘双头镇墓兽 唐乾封二年（667）。1990年礼泉县韦贵妃墓出土。高54厘米，长50厘米。兽为连体相背双头，四足四翼，四足支撑有力，下有黑色底座。黑发直耸，双目外凸，络腮胡须。唇及耳孔、鼻孔涂红彩，翼涂红、黑、绿色。整体造型奇特，强劲有力。

彩绘骑马斗豹俑 唐神龙二年（706）。1960年乾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出土。高30.5厘米，长21厘米。此俑深目高鼻，左手抓猎豹，右臂高举，作击打猎豹状。从骑马者的装束和面容看，显系胡人。唐代骑马狩猎俑出土不少，似这种骑在马背上击兽的狩猎俑似为仅见。

彩绘贴金甲马武士骑俑 唐神龙二年(706)。1971年乾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高35厘米,长34.5厘米。武士戴青帻,身穿铠甲,脚穿黑靴,左手握缰,右手似执兵器。战马身披具装,双耳竖立,耳间有火焰状鬃毛,当卢贴金,体现了仪仗武士的威仪。

彩绘胡服女俑 唐开元二年(714)。1952年咸阳市边防村杨谏臣墓出土。高52厘米。俑头戴红色翻缘式绣花浑脱帽,身穿翻领窄袖胡服,领角及襟边用赭、绿、黑三色彩绘牡丹花纹,腰系黑色蹀躞带,带铤突起,左边挂有鞶囊,绿色紧腿裤,赭色低勒靴,胸前朱书“阿谏”二字。此俑一出土,就受到了文物工作者的重视。

彩绘侍卫俑 唐开元六年(718)。1972年礼泉县越王李贞墓出土。二件。一为文侍俑,一为武卫俑。文侍俑高112厘米,武卫俑高113厘米。文侍俑头戴进贤冠,白色长袍曳地,外套红色高领交襟右衽宽袖外衣,腰束博带,足登彩花云头靴,双手拱琬圭,神态斯文雍容。武卫俑头戴鹞冠,白色长袍外着赭色高领宽袖外衣,足登黑色云头翘靴,双手执一琬圭,浓眉怒目。二俑生动地显示了盛唐时期朝班文武侍卫的风采。

陶黑人舞俑 唐。1985年长武县枣园乡郭村出土。高25厘米。俑为“昆仑奴”形象,卷发,黑肤,赤足,高鼻,鼻翼较宽,双目圆睁,大嘴微笑,头偏斜,脸庞半圆,颈短而粗,饰缨络。手腕、脚腕戴舞环。全身大部裸露,脐乳俱全。橘红丝帛绕双肩缠至下腹及膝上部。左臂举至头际,右手五指并拢放至腰部,右腿后蹬呈扭胯状,动感强烈。黑人俑唐墓中屡有发现,黑人舞俑却不多见。

陶双环髻女舞俑 唐。1985年长武县枣园乡郭村出土。同时出土2件。高37.8厘米。舞俑身材颀长,头饰双环髻,脸庞圆润,柳眉凤眼,挺鼻丹唇。延颈瓔珞,皓质呈露。肩若削成,腰如素约。玉臂钏镯,纤指袅袅。上穿舞袖襦衫,腰着曳地羽衣,脚登云首履。造型极为优美。

第三节 陶杂器

彩陶瓶 新石器时代。1980年出土于旬邑县城关镇崔家河西村仰韶文化遗址。高18.9厘米,口径5.2厘米,底径11厘米,壁厚1—1.3厘米。小口,平底,下腹微鼓。细泥红陶,器表磨光,绘六组黑彩几何纹图案。此瓶形制、纹饰在同期遗物中比较特殊。

尖底瓶 新石器时代。1981年淳化县卜家乡辛庄村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

遗址出土。口内径4厘米，高37厘米，底径2厘米。杯口，小平底，腹部有两个半环形耳，最大腹径在上腹部。细泥红陶，通体有紫红色陶衣，腹饰竖绳纹。

陶龟形壶 新石器时代。武功县水渠遗址出土。高16.2厘米，长41.1厘米。泥质红陶，素面。整体为一龟形。龟张口瞪目，长颈，大腹小平底，尾部有一上仰的圆柱形口，为注入水用，嘴部与腹腔相通，为出水口。造形奇特。

陶埙 新石器时代。1982年淳化县夕阳乡黑豆嘴原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细泥红陶，形如杏核，扁平中空。边棱有修刮痕。高3.5厘米，宽3.3厘米，厚1.4厘米。一面左右两音孔，孔径0.3厘米，孔距0.4厘米。边棱一吹孔，孔径0.5厘米，距音孔1.1厘米。经西安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实测：音孔全闭发音为G₂⁺，开左孔或右孔发单音为B₅，全开发音为D₆。埙为古代吹奏乐器。

高领袋足鬲 先周遗物。1980年淳化县史家原西周早期遗址出土。口径14.3厘米，高12厘米。高领，袋足，分裆，直口，领上有捉手，足尖较平。此鬲与郑家坡先周遗址出土的鬲相似，对研究周文化的渊源具有一定的考古学价值。

陶鱼 秦咸阳遗址出土。长15厘米，宽5厘米。鱼身刻有鳞，形似鲫鱼，鱼腹中空，内有物，摇之有声。当为玩具。

陶鸭蛋形壶 秦。咸阳博物馆征集。高48.5厘米，宽36.5厘米，长56厘米。形如鸭蛋，杯口，底部较平，可作盛器。壶身上有七道云雷纹。鸭蛋壶因其形似蚕茧，又名“茧形壶”。

陶棺 汉。1981年淳化县铁王乡铁王村汉陶棺墓出土。共11件，收藏5件。形式略同，大小有别。大者长162厘米、宽52厘米、高30厘米，小者长122.5厘米、宽43厘米、高26厘米。棺为长方形凹槽状，直壁，棺外和顶端饰菱形格纹，内壁素面。壁缝接合处有沫光痕迹。盖为素面，两节相接，同棺长度。此为小孩葬具。

第四节 唐三彩

三彩女立俑 唐光宅元年(684)。1972年礼泉县安元寿墓中出土。高23厘米。女俑头梳高髻，墨描眉目，朱红点唇，面庞丰满，体态端庄，神情优雅，身穿蓝地白花半高领长衣，束腰，双手交于腹前。衣褶清晰，自然流

畅。蓝釉在唐三彩中较少见。这种釉料中含有其他唐三彩中没有的氧化锑和氧化钴。它的发现，对研究唐三彩的施釉技术及三彩釉料的种类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三彩侍女俑 唐大足元年（701）。1960年乾县乾陵乡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出土。共约数十件，高10—12厘米。侍女俑有着男装的，有穿短襦长裙的，手中分别持灯、盘、方盒、包袱等物，其形象与壁画中的宫女颇相似。

三彩碗 唐大足元年（701）。1960年乾县乾陵乡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出土。碗为白胎，胎质较细。轮制。侈口，壁较直，腹外有一道突出的弦纹。内外壁均饰浅黄色釉。外壁被弦纹分为上下两层，上下层均施疏密有致的细垂条纹。内壁有十二道绿色宽垂条纹，垂条纹之间又施浅褐色不规则细线纹。纹饰自然流畅，色彩鲜艳协调，器体完好无缺。与同时出土的三彩盘和三彩注盆同为三彩器中的珍品。

三彩天王俑 唐神龙二年（706）。1971年乾县乾陵乡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通高130厘米。俑双目圆睁，宽眉高竖，呈倒八字形状。头戴盔，身穿铠甲，脚穿长筒靴，左手卡腰，右手握掌前举，神态威武，气宇轩昂，脚踏魔鬼，魔鬼伏卧作挣扎状。俑胎为红色，胎质较疏松，釉较厚，釉色光泽不及同期其他三彩釉晶莹透亮，但体态如此巨大，在唐墓中确为罕见。

三彩镇墓兽 唐神龙二年（706）。1971年乾县乾陵乡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高100厘米，狮面兽身，形体高大，双角和鬃毛高耸，两肩生翼。胎为粉红色，胎质较粗，周身施赭、绿相间的釉。

三彩文吏俑 唐神龙二年（706）。1971年乾县乾陵乡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高120厘米。俑形体魁梧高大，面部表情严肃、拘谨。头戴高冠，身穿交襟宽袖长袍，下穿宽裤，足穿云头履，双手持一长方形物于胸前，衣袖下垂直至膝下。通体施赭、绿两色釉，冠上釉子流淌到了腹部。

三彩双螭瓶 唐神龙二年（706）。1971年乾县乾陵乡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高50厘米。侈口，细长颈，鼓腹，圈足。口与肩部有对称细柄，柄为相对的二螭，螭首伸入瓶内作戏水状。螭首雕工精细，眉须清晰，双角上翘，造型生动。瓶通体施浓淡相间的翠绿色釉。

三彩骑马狩猎俑 唐神龙二年（706）。1971年乾县乾陵乡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马长30厘米，通高35厘米。骑俑头戴幞头，幞头彩绘为黑、红两色，面部施白彩，以墨画发、眉、胡须，口涂红色，五官清晰。身佩弓箭囊，双手握拳前举，端坐于马上。俑身施蓝釉，马为淡绿色。另一件马长

30厘米，通高34厘米。骑俑头部紧贴马颈，一手上举，作翻身仰射状。俑身后放有已猎获的野兽。俑和马均施赭釉，惟马鞍和俑带的箭束为绿色。

三彩三花马 唐神龙二年(706)。1971年乾县乾陵乡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高65厘米，长80厘米。马形体高大，造型精美。头微向左勾，双目有神，鬃剪三花，尾巴挽起，四蹄大而坚实，显得矫健有力。背置鞍，上搭“障泥”。笼头、胸带和背带上均系有花形垂饰。马为黄赭色釉，“障泥”为绿色。

三彩骆驼 唐先天元年(712)。1973年渭城区渭阳乡药王洞村北契苾明墓出土。高82厘米，长70厘米。驼为单峰，施深赭色釉，胸部、前腿和背部为淡黄色釉。单峰驼产于北非，是唐三彩中极少见的造型。

三彩马及牵马俑 唐先天元年(712)。1973年渭城区渭阳乡药王洞村北契苾明墓出土。马高68厘米，俑高49厘米。马头小、臀圆、蹄大，当系以西域优良马种为模特雕塑而成。马施浅赭色和淡黄色釉，蹄下踏板呈覆槽状。牵马俑头戴尖顶帽，身穿窄袖翻领胡服，衣施赭色釉，翻领为绿色。双手握拳，作牵马状。

三彩四孝塔式罐 唐先天元年(712)。1973年渭城区渭阳乡药王洞村北契苾明墓出土。通高50.8厘米，腹径15厘米。整器分为罐盖、罐体和底座三部分。盖纽为佛塔形，周饰浮雕山，顶为宝珠形。罐体肩部饰流云纹。上腹饰捏塑的山川人物四组：第一组三人，山左侧二人，右侧一人，均站立。榜题“董永卖身葬父”；第二组二人，榜题“曾子抚琴悦父”；第三组二人，一男子立于山右，一老姬盘坐于山左，榜题“郭巨埋儿养母”；第四组二人，男站女坐，榜题“曾子汲水济母”。榜题文字均为阴刻。罐下腹饰兽面四个，罐底部以浮雕仰莲与底座相接。造型与纹饰奇特，为唐三彩中罕见之物。

三彩骑马乐俑 唐开元六年(718)。1972年礼泉县越王李贞墓出土。高33厘米，长28厘米。马通体施黄褐色釉，四蹄踏于长方形踏板上，为静立状。马背上置鞍，上骑一女乐俑。乐俑头戴帷帽，身穿右衽宽袖绿衣，腰束带，下穿淡褐色窄裤，足穿尖头毡靴，双脚踩马镫。俑左前方置一鼓，双手紧握鼓锤作敲击状。衣袖飘然而起，具有强烈的动感。

三彩骑驼胡俑 唐。1977年礼泉县烟霞乡兴隆村一号唐墓出土。通高69.5厘米。骆驼体态高大，通体施褐色釉。驼头高昂，张口露齿、嘶鸣。背上骑一深目高鼻、体态魁梧的胡人，头戴胡帽，面带微笑，身穿长袍，袒右臂，腰束带，脚穿尖头毡靴，两腿微曲，双手弓曲胸前，作持缰状。

绞胎贴面盂 唐。1952年咸阳市边防村杨谏臣墓出土。高6厘米，口径3厘米，腹围28.6厘米。盂为圆形，小口内敛，鼓腹平底。内壁露白色胎，胎坚硬细密。外壁于浅褐色釉里透出深褐色木纹状花纹，线路清晰自然。据研究，该器应为绞胎贴面。绞胎贴面工艺复杂，是唐代陶瓷的新产品，风格别具，色调协调。出土绞胎贴面器物极少。

第五节 瓷 器

青瓷盘口四耳壶 葬于北周建德五年（576）。1988年4月出土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王德衡墓中。高35.5厘米，口径14.6厘米，腹径25厘米，底径11.1厘米。器作盘口，细颈，颈稍倾斜，口沿外有绿色带纹一周，颈中部有凸弦纹三周，肩部四个方形耳。自腹中部以下向内收，平底。釉为青绿色，口沿外部和腹部有较细的冰裂纹开片，盘口及颈内外均施釉。器表釉施至腹下部，其下露胎，胎为白灰色，杂有红褐色小斑点。器腹釉下流成滴泪痕。此器体形高大，造型宏伟，凝重质朴，自成一格，表现了北方青瓷的风格。

青瓷盘口六耳壶 葬于北周宣政元年（578）。1988年8月出土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独孤藏墓中。高32.5厘米，口径10厘米，腹径19厘米，底径8.9厘米。盘口，细长颈，颈部有凸弦纹四周，肩部有弦纹二周，并有二组六个方形耳。腹部有绵线形状的凸棱一周，壶内和器表上部全施釉，腹以下至底4.5厘米未施釉，露出白胎，平底。釉为青灰色。此器造型端庄，装饰秀丽，胎质坚硬，并集中运用了印贴、刻画和堆塑等艺术手法，是北周青瓷器的代表作品。

白瓷盘口唾壶 葬于北周宣政元年（578）。1988年8月出土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独孤藏墓中。高14厘米，口径9.4厘米，盘口高1.8厘米，最大腹径15厘米，底径12厘米。高盘口，口部有弦纹一周，内插式盖，盖形似盘口，中部下凹套入壶颈中，盘口盖中间有一直圆柱，柱顶为桃形釜，盘口盖内有黄釉宽带纹二周。短颈，扁体，圆形腹，上腹斜直，下腹向内收成圈足，圈足部分不施釉，露出白胎。平底。此器釉色虽还不是白釉（釉色白中闪黄），胎质亦尚未达到纯白，但对研究北朝瓷器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黑瓷盘口唾壶 葬于北周宣政元年（578）。1988年8月出土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独孤藏墓中。高14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8.5厘米。盘口，细颈，颈有弦纹三周，扁圆腹，腹上部有弦纹四周，腹下部内收成圈形足。

通体施黑釉，釉色黑中泛黄。此器造型稳重大方，制作精致规整，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黑釉，但在北朝黑瓷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青瓷碟 葬于北周宣政元年（578）。1988年8月出土于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独孤藏墓中。高2.8厘米，口径11.7厘米。敞口，平底，器内外均施青釉，釉不到底，露出灰白色胎质。器内口部有弦纹一周，底部用斜线和凸连珠纹三周将底部分成三区，内区浮雕一虎擒羊，中区浮雕草叶纹和三只奔虎，外区浮雕成莲瓣式花纹。内壁用黄釉条作不规则纹饰。此器胎质坚硬，釉色莹润，造型优美，纹饰华丽，是北朝瓷器中的代表性作品。

白瓷辟雍砚 葬于唐贞观十七年（643）。1986年出土于礼泉县昭陵长乐公主李丽质墓中。圆形，由砚台和砚盖组成。砚面隆起，周边有棱，棱内凹处可容水。砚台下有座，由25个马蹄形足构成。砚台口径27.5厘米，座径31.5厘米，通高9.4厘米。砚盖圆形，盖面隆起，有圆形尖顶纽。未施釉。此砚以其圆形周边环水如辟雍，故名辟雍砚。

赭釉双耳投壶 葬于唐开元六年（718）。1972年出土于礼泉县昭陵越王李贞墓中。壶高35厘米。颈粗长，口略呈喇叭形，颈中部两侧粘接有圆筒状双耳。施赭色釉，腹下部釉不到底，瓷胎为青白色。此器称作投壶，是古代宴会上用来进行“投壶”活动的器具，其以矢在一定距离投入壶中的多少而决胜负。此种双耳投壶又名“贯耳”，投矢中耳者，可得双采。

青瓷提梁倒灌瓷壶 宋。1968年彬县出土。高18.3厘米，腹径14.3厘米，腹深12厘米。胎质坚细，呈灰白色，釉色淡青而略泛灰，光泽莹润。壶身呈圆形，壶盖不能启用，盖与提梁连接。提梁为一伏卧凤凰，壶嘴为一对哺乳母子狮。造型生动逼真。壶周饰蔓草缠枝牡丹花及仰莲瓣纹。底部中心有五瓣梅花孔，灌水时将壶倒置，水从母狮口外流时始盛满，因壶内有漏柱与水相隔，底虽有孔而不漏。这件提梁倒灌壶造型、结构极为奇特，是国内外耀州窑瓷器著录中罕见的珍品。

青釉瓷浴婴 宋。1978年出土于旬邑县城关镇安仁窑遗址。浴婴置于莲盆内，莲盆分六瓣，盆内水波荡漾。浴婴双腿架于盆沿，右手在水中戏耍，左手伸向脑际，造型生动活泼，极富生活气息。盆径5.8厘米，底径2.8厘米，高3厘米。红胎素烧，外施青釉，温润如脂。为耀州窑系珍品。

青釉刻花瓷壶 宋。旬邑县城关镇安仁村安仁窑遗址出土。通高16.8厘米，口径6厘米，腹径15.8厘米，底径11.2厘米。侈口，高颈，鼓腹，双脊把，八棱管状流。壶肩部饰两匝弦纹和对称的两组折枝菊花，腹部饰三组

盆景牡丹。通体施橄榄色青釉，明澈温润。

青釉瓷盏托 宋。1954年彬县出土。耀州窑瓷器。通高8.2厘米，口径5.2厘米。胎质灰白，釉色青绿深沉。杯作钵式，上有粗壮的柳条纹，下有平沿深腹托盘，托盘中靠杯的一周堆塑莲瓣花纹。杯托上下结合，实用美观。同时出土有青釉十折花瓣碗、青釉六折洗、青釉瓷印花碗、青釉雕花莲瓣碗等，都是耀州窑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第六节 陶 文

早周陶文 近年武功县郑家坡和岸底早周文化遗址及长武县碾子坡早周文化遗址出土的个别陶器上刻有陶文，如郑家坡的陶文有“𠄎”、“U”、“二”、“𠄎”、“𠄎”等，岸底的陶文有“𠄎”、“个”、“𠄎”、“𠄎”等，碾子坡的陶文有“个”、“十”、“𠄎”、“𠄎”、“三”等。可释者有“十”（疑为“七”或“甲”）、“𠄎”（疑为“午”）、“𠄎”（疑为“缶”）、“𠄎”（疑为“周”）、“三”（为“三”）、“二”（为“二”）等。这些陶文是研究汉字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资料。

西周陶罐卦文 1987年淳化县石桥乡石桥村出土的一件西周晚期陶罐肩部，刻画有十组卦文，笔画清晰，其文为：“重”、“叠”、“夔”、“夔”、“叠”、“爻”、“爻”、“爻”、“爻”、“爻”。出土此卦文陶罐的石桥村在史家原遗址附近。此卦文陶罐的出土，对周文化、特别是对《周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秦中央官署陶作坊陶文 大多发现于建国以来秦都咸阳遗址出土的砖瓦或陶器残片上。由于左司空和右司空是当时主要负责宫殿建筑的中央官署，因此，在发现的秦中央官署制陶作坊陶文中，以左、右司空的为最多。这类陶文中，一个字的较少，如“左”，即是左司空的省称。大部分为两个字：如属左司空的有左如、左禹、左戎、左悺、左贝、左胡、左旦、左嘉、左李、左黍、左巷、左登、左林、左昌、左弋等；属右司空的有右嘉、右童、右秋、右校、右徒、右角、右禾、右豕、右贸、右迂、右得等。上述二字陶文中，其前一字“左”、“右”都是“左司空”、“右司空”的省称，后一字大都是陶工或工师的姓或名，有的则可能表示领属，如“左弋”、“左旦”、“右校”、“右徒”等。这些陶文都是戳印，多数为阳文，少数为阴文，大都见于板瓦或筒瓦上。另外，淳化县秦林光宫遗址采集有二件戳印“北司”二字的残板瓦，秦咸阳遗址采集的一陶垫上刻有一“北”字。此“北”疑即“北

司”的省称。北司与左、右司空一样，同属少府，为中央官署。这些中央官署制陶作坊的陶文是研究秦代官制和建筑的可信资料。

秦咸阳亭里制陶作坊陶文 大多发现于建国以来秦都咸阳遗址出土的日用生活陶器残片和瓦片上。秦咸阳亭里陶文中，四字印文的第一字均为“咸”字，因第二字有作“亭”字者，故多以“咸”字为“咸亭”之省。依据咸阳秦都考古工作队在秦咸阳遗址西部所采集的一件陶盘（长采：2）口沿所存竖书“咸阳亭”三字戳记推之，四字陶文中的“咸”字或“咸亭”二字，均当为“咸阳亭”之省。靠近秦咸阳宫殿遗址的窑店乡毛王沟出土的陶器中有“咸阳亭久”戳记，“咸阳亭”三字相连，即可为证。

咸阳亭里陶文中印文最多的六字，如“咸亭郟里丹器”、“咸亭泾里忿器”、“咸亭右里道器”、“咸亭东里倕器”、“咸亭郟里夔器”、“咸亭郟里芮器”等，有亭名第一字（咸）、里名第一字（郟、泾、右、东、郟）及人名（丹、忿、道、倕、夔、芮）与“器”字，表示此器为某某亭某某里某人造作。有的六字印文省去了亭名第二字“阳”和“里”字，里名二字未省，如“咸亭当柳昌器”、“咸亭当柳恚器”；“咸亭阳安驛器”、“咸亭芮柳嬰器”、“咸亭沙寿□器”，此“当柳”、“阳安”、“芮柳”、“沙寿”，均为咸阳亭所属里名的全称。

咸阳亭里陶文大部分为四字印记。四字印记中，又以省去“阳亭”二字和里名第二字以及“器”字者最为常见。如“咸芮里喜”、“咸旨里繅”、“咸恒里□”、“咸中里□”、“咸牛里□”、“咸禾里玉”、“咸白里公”、“咸京里杜”、“咸平里汇”、“咸寅里高”、“咸相里圆”、“咸闾里咳”、“咸尗里辰”、“咸广里高”、“咸高里昌”、“咸高里嘉”、“咸蒲里奇”、“咸蒲里京”、“咸戊里恒”、“咸戊里奇”、“咸商里宣”、“咸商里若”、“咸卜里队”、“咸卜里戎”、“咸沙里疾”、“咸沙里卫”、“咸沙里冢”、“咸沙里壮”、“咸直里文”、“咸直里繅”、“咸郟里夫”、“咸郟里奢”、“咸郟里昧”、“咸郟里牝”、“咸完（郟）里黄”以及“咸郟里道”、“咸郟里尼”、“咸郟里致”、“咸郟里果”、“咸郟里组”、“咸郟里就”、“咸郟里纹”、“咸郟里率”、“咸郟里举”、“咸郟里瘞”、“咸郟里跬”、“咸郟里善”、“咸郟里夔”、“咸郟里害”、“咸郟里纪”、“咸郟里疆”、“咸郟里段”、“咸郟里馐”、“咸郟里荟”、“咸郟里贝”、“咸郟里角”、“咸郟里夸”、“咸郟里新”、“咸郟里專”、“咸郟里欠”、“咸郟里财”、“咸郟里台”、“咸郟里长”、“咸郟里富”、“咸郟里壮”、“咸郟里尻”、“咸郟里宦”、“咸郟里骄”、“咸郟里竭”、“咸郟里杞”、“咸郟里函”等。联系到前述六字

陶文中“咸亭郿里鬃器”和“咸亭郿里芮器”，可知当时咸阳亭属下的“郿里”（当为“郿□里”）是咸阳亭制陶作坊最密集之地。

四字陶文中，省去“阳亭”二字而出现完整里名、省去“里”字、“器”字者亦为数不少。如“咸成阳童”、“咸成阳洛”、“咸成阳石”、“咸成阳申”、“咸少原角”、“咸少原申”、“咸少原婴”、“咸巨阳鬲”、“咸巨阳釜”、“咸巨阳戏”、“咸如邑顷”、“咸阳邑戊”以及“咸安阳钦”、“咸遂阳便”、“咸新安盼”、“咸高陈区”等，即意为咸阳亭之“成阳里”、“少原里”、“巨阳里”、“如邑里”、“安阳里”、“遂阳里”、“新安里”、“高陈里”的“童”、“洛”、“石”、“申”诸陶工所作之器。仿此，“咸于阳市”当为咸阳亭于阳里之“市”所作之器。此“市”殆非人名，疑为亭里所属市井之“市”。

四字陶文中，还有省去“阳亭”二字及里名第二字者，如“咸于里市”意即咸阳亭于阳里之“市”所作之器。也有省去亭名第二字（“阳”）及里名第二字者，如“咸亭平彙”，意即咸阳亭平□里名“彙”的所作之器。

四字陶文中，有个别只有亭、里第一字，名却为二字者，如“咸郿小颖”、“咸郿小有”，意即咸阳亭郿□里“小颖”、“小有”所作之器。

秦咸阳亭市陶文中，除“咸阳亭”（多简称“咸亭”或“咸”）外，还发现有“杜亭”，当为秦咸阳西门外十里的“杜邮亭”之省称。这些亭里作坊陶文，不仅对研究秦咸阳的地方和民营手工业具有重要价值，也为探讨秦咸阳的亭里名称提供了可信资料。上述陶文中提到的一些里名，如“芮柳”、“沙寿”、“当柳”、“阳安”、“成阳”、“少原”、“巨阳”、“如邑”、“于阳”、“安阳”、“遂阳”、“新安”、“高陈”等，大多为前所未见，足可补史志之阙。

秦咸阳制陶工匠姓名陶文 大多发现于建国以来秦都咸阳遗址出土的砖瓦及陶器残片上。多为一字，或为姓，或为名。《礼记·月令》云：“物勒工名，以考其诚。”这些陶文可以说都是当时制陶作坊的工匠们为担保信誉而有意留下的凭证。这一类只记工匠姓、名的陶文有：王、向、任、秦、文、黄、周、胡、吴、古、念、尚、昊、半、儒、彭、界、潦、困、厝、记、癸、延、田、齐、童、禾、就、鲋、须、苾、珍、敬、中、瓜、公、山、岁、弋、勺、角、白、之、交、安、莫、带、厘、么、舍、酉、百、鱼、徕、臧、吏、伏、成、得、贝、嘉、戎、如等。这些陶文记录的工匠，有的可能属某个中央官署的制陶作坊，有的可能属某个亭、里的制陶作坊。文字大部为戳记，也有随意刻画的。戳记多为阳文，刻画的均为阴文。从字体来说基本都是小篆。这些陶文数量不少，对研究文字发展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汉甘泉宫遗址及附近发现的陶文 70年代以来，淳化县汉甘泉宫遗址及附近陆续发现了一些陶文。这些陶文主要分为四种。中央官署陶文：如“大匠”陶文2件，均见于筒瓦残片上。为戳记。《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景帝六年更名将作大匠。”故可知“大匠”即“将作大匠”的省称。“亭”、“市”陶文：其中“云亭”陶文3件，“亭”字陶文1件，“云市”陶文11件，“云”字陶文1件，“市”字陶文1件。“亭”字疑为“云阳亭”之省，“云”、“市”二字疑为“云阳市”之省。《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十四年，“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可知“云阳”为战国时秦邑，汉初置县，取名“云阳”。“云亭”、“云市”，当皆得名于此。“亭”、“市”文亦皆为戳记。“甘”字类陶文：汉以秦林光宫为甘泉宫，“甘”字类陶文当为甘泉宫遗物。采集的标本计有“甘”字戳记的板瓦残片1件，有“甘居”、“居甘”二字的残砖瓦7件，有“甘北”二字的残陶罐1件，有“居”字的残砖瓦2件。秦咸阳亭里陶文：皆为戳记，文字清晰的4件，为“咸少原角”、“咸直里章”、“咸直里缙”及“咸阳亭久”。疑为秦林光宫遗物。

第七章 其他遗物

咸阳市文博机构的馆藏文物，除青铜器和陶瓷器两大宗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遗物，如玉石骨器、金银器、铁器、货币及壁画等。

玉石骨器中以旬邑出土的黄河剑齿象化石和茂陵出土的兽面纹玉铺首最为著名。咸阳北原新庄乡相继出土的玉奔马及玉熊、玉鹰等，亦是西汉帝陵遗存的玉雕珍品。60年代和80年代茂陵附近出土的汉代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及鎏金铜马、鎏金银竹节薰炉等，亦都具有较高的科学和艺术价值。

本地收藏的铁器大部是汉代遗物。从种类看，主要为各种刑具、农具，其中最大的一件为80年代中期秦都区沙河古桥遗址出土的巨型槽形铁板。这件罕见的巨型铁构件，是研究古代桥梁史的重要资料。同时，馆藏各种货币非常丰富，几乎历代都有。其中秦代（或西汉）的金饼，西汉的马蹄金和麟趾金，6世纪的东罗马金币及元代“中统元宝交钞”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文

物珍品。

壁画是咸阳市文物藏品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门类。现存的秦咸阳三号宫殿遗址壁画，是国内迄今所见最早的宫殿壁画，而昭陵、乾陵等诸陪葬墓出土的一批批精美的唐墓壁画，则为研究唐代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第一节 玉石骨器

旬邑黄河剑齿象化石 1975年出土于旬邑县后掌乡西原村附近。化石为一完整的黄河剑齿象遗骸，身高4.3米，体长8.45米，据推测体重约7—8吨。1992年经西北大学地质系协助整理，在旬邑县博物馆内建成了专门陈列室，已公开展出。此剑齿象化石形体硕大，保存完好。它的出土，为研究中国黄河中游及黄土高原的古地质、古生物、古气候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根据。

玉鱼 西周。1983年淳化县润镇乡西梁家村西周墓出土。立体圆雕。长9.8厘米，中宽3.1厘米，厚0.4厘米。淡青色，半透明，扁平鱼状。表面阴雕鱼嘴、鱼目及鳞、脊、胸、腹、尾、鳍。刻工精细。两面纹饰相同。鱼嘴和尾部各有一小孔。形象逼真，颇为生动。

兽面纹玉铺首 西汉。1974年兴平县道常村汉茂陵园出土，为陵园建筑门扉饰物。长39.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10.6公斤。青玉质，灰绿色间有灰褐色斑。铺首呈兽面状，双目圆睁，露齿，卷鼻，表情凶猛，系以半浮雕和镂空透雕相结合的手法雕琢而成。铺首四角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图像，雕琢精美、细腻。铺首背面有方形鼻钮，钮上有可以穿壁的方孔。它是国内目前发现的西汉时期最大的玉雕铺首。

玉奔马 西汉。1966年渭城区周陵乡新庄村附近出土。立体圆雕。通长8.9厘米，高7厘米。白玉质，色泽宛若羊脂，温润莹亮。玉雕整体由奔马、骑者和底座组成。马高大健壮，驱体前倾，长尾高扬，四蹄前蹬，如腾云驾雾之状。马上骑者纶巾束首，身着短襦，昂首挺胸，双手抓着马鬃，两腿贴着马腹，看上去怡然自得。马蹄下的底座上线雕出相互缠绕的朵朵祥云，前肢和马尾皆有云柱与底座相接。

玉俑头像 西汉。1966年渭城区周陵乡新庄村出土。立体圆雕。高8.5厘米，面宽4厘米，玉质呈青白色，头部完整，颈下有断裂面。头上有代表束发的布围。冠顶凸起，中有一小孔。头发、眼、口用阴线刻出。神态端庄，是汉代玉雕珍品。

玉熊 西汉。1972年渭城区周陵乡新庄村出土。立体圆雕。长8厘米，

宽4.8厘米。白玉质，间微有黄色斑。玉熊呈四足交错前行状，双唇紧闭，两耳后抵，小眼圆而有神，腮边及腿侧用阴线刻出鬃毛的效果。憨态可爱，生动逼真。

玉鹰 西汉。1972年渭城区周陵乡新庄村出土。立体圆雕。长5厘米，高7厘米。白玉质。鹰嘴呈勾状，两翼平展，尾羽散张，似面对猎物作俯冲之势。玉鹰造型浑厚自然，看去可爱而不凶残。整体小巧玲珑，线条流畅，质感很强。

玉辟邪 西汉。1972年渭城区周陵乡新庄村出土。立体圆雕。长7厘米，高5.4厘米。白玉质，色淡黄。辟邪面目凶恶，张口露齿，双目直视前方，半圆形双耳竖起，耳旁各有一角，前胯处雕有双翼，紧贴前身，前足弯曲有力，身体前倾略微下伏，后足前脚掌着地，足跟抬起。神情专注，似在悄悄接近目标。角上有紫红色沁斑。

玉带 北周。1988年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若干云墓出土。玉带主要由带扣、铐（带环）和铤尾组成。铐长3.5厘米，宽3.4厘米，铤尾全长8.3厘米，宽3.1厘米。玉带铐九块，其中八块下附椭圆形玉环八个。铐为方形，大小相同。每块玉铐背面，有一块与玉铐相同的鍍金铜片，用五个小金钉将玉铐与鍍金铜片钉于鞅上。每一个玉鞅下面有一个金片制成的小环，直接插入玉铐之中，上附着椭圆形玉环八个，其中两个玉环上挂着如象牙圆棒形的装饰品。玉带玉质细腻，温润洁白。制作精致，保存完整，是迄今国内发现时代最早、最为完整的一条玉带。

第二节 金银器

金耳环 西周早期。1982年12月出土于淳化县夕阳乡夕阳村西黑豆嘴原西周早期墓中。5件，形状相同，大小不一。环上部为扁平螺旋式花头，下有圆柱形柄，有的柄上穿有一颗绿松石珠。大环花头宽7.1厘米，厚0.05厘米，柄长10.6厘米，通长15厘米。实测重13.4克。小环通长10.3厘米，柄长7.5厘米，花头宽6.5厘米，厚0.05厘米，实测重8.82克。

鍍金银竹节熏炉 西汉。1981年兴平县豆马村传为霍光墓南60米处汉墓从葬坑出土。铜炉系博山炉形式，由炉体、炉柄分铸铆合而成。通高58厘米，口径9厘米，盖高6厘米，底径13.3厘米。博山炉突出鍍银带一圈，上浮饰四条鍍金顾龙，龙身从波涛中腾出。盘口沿有银宽带纹一周，其下有十组三角纹，三角纹内饰蟠龙纹，蟠龙为鍍金，底色鍍银。炉盖透雕多层山

峦，其中云雾缭绕，加之金银勾勒，宛如一幅秀丽的山景。炉口外侧刻铭文一周，135字。柄下座为圈足，足高7厘米，上浮透雕二蟠龙相纠，龙身满饰鎏金细纹鳞甲、眼、须、爪，银竹节形柄纳入龙口，柄分五节，节上刻出竹叶枝杈，上端铸上歧出的三蟠龙，龙身鎏金，爪鍍银，龙首上承炉盘。高杆枝头结华炉，鎏金鍍银，精雕细镂，是西汉时期的一件艺术精品。

鎏金铜马 西汉。1981年兴平县豆马村传为霍光墓南60米处汉墓从葬坑出土。通高62厘米，长76厘米，昂首站立，两耳前竖，显得异常机警。马体匀称，肌肉、筋骨造型合乎比例。体内空腔，尾下留一小孔。鞅囊系另铸铆合，制作一丝不苟。通体鎏金，无锈，俗谓之“金马驹”。同出的马具、车饰亦皆鎏金。

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西汉。1963年出土于兴平县豆马村，高34.1厘米，长58.1厘米，重13.3公斤。整体造型为一雄健的犀牛，头部有两角，体形硕壮，充分体现了犀牛刚强健壮的特点。尊背上有盖可开启，犀口侧有一管状短流，用以倾注。整个尊体饰有华丽的错金流云纹，并嵌有断断续续的金丝以象征犀身的毫毛。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金花冠 唐。1988年咸阳国际机场建设工地唐贺若厥墓出土。墓主为独孤罗之妻。金花冠系用金圈、金花钿、金花叶、金花蕊及玉片、珍珠、各色宝石连缀而成。金花冠上的丝绸编织物已全部腐朽，金花圈发现时戴在墓主头骨上，其余均散落在头部周围。整个花冠饰件制作细致，表现了唐初精湛的工艺水平。同时出土嵌有各色宝石的金篋和金耳坠，作工精美。

金壶 唐。1969年咸阳市毕原路西北医疗器械厂出土。通高21.3厘米，口径、底径均6.6厘米，圈足高0.6厘米，直口、长颈、圆肩、深腹。肩部为器身最宽处，腹部下收至圈足。壶盖上一莲苞状钮，钮周鍍覆莲瓣二周，下饰四朵花瓣，间饰鱼子地蔓草纹，盖唇饰流波纹。壶柄呈如意状，宽1.6厘米，表面饰鱼子纹组成的双线菱形纹，基部饰海棠纹，上卧一引颈抬头的小龟，可以转动，头上圆孔中系环链，与盖钮相连接。壶颈肩交接处饰覆莲瓣一周，肩部至底，花纹依次为：以四朵莲花为中心组成的抱合式蔓草纹，上下以联珠纹为栏界的四对鸳鸯间饰蔓草纹，二方连续卷云式蔓草纹，三层仰莲纹。壶嘴饰仰莲瓣朵花。

鎏金龙首银锁链 唐。渭城区窑店出土。长10.2厘米，龙首最大径3厘米，链径1.9厘米。链为龙身，龙首与银链铆接一体。龙首为铜质，外包银，表面鎏金，独角长嘴，巨目龇牙，大耳长须，鼻上卷，口含圆环锁扣。

鍤金银薰球 唐。1980年4月渭城区窑店出土。薰球是花叶纹镂空球。分两半组成，有合页与风钩，可随意启闭，带链可以悬空，内有两道环和半球杯，当银球自动摆动时，内部银杯始终向上，里面放的薰香亦不会外洒。制作过程中应用了锤击、切削、抛光、刻铆等工艺，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第三节 铁 器

巨型槽形铁板 西汉。1986年出土于秦都区沙河古桥遗址。每件铁板用3块大小相近的矩形铸铁板相接铸成，呈槽形，厚3厘米，宽100—110厘米，长6—7米。当即沙河古桥的建筑构件。

铁颈钳 西汉。1974年11月出土于兴平县汉茂陵东侧。刑具。近圆环状，颈圈大小可调节。又，1972年春，渭城区西汉阳陵刑徒墓亦曾出土两种不同式样的铁颈钳：一种是圆形的铁环，另一种是有与圆形圈垂直的一根铁杆，称为翘。出土的钳直径17—24厘米，重1150—1600克，翘长29.5—34厘米。

铁手铐 西汉。1977年12月出土于兴平县定周村。刑具。由5个串联的扁环链与两端的圆铐圈相连组成。铐圈可开合。

铁脚镣 西汉。1974年10月出土于兴平县陈王村。刑具。同出刑具有铐、钳等8件。镣近于环形，有缺口。径9.5厘米，宽5厘米。多锈斑。又，1972年春，渭城区汉阳陵刑徒墓亦曾出土铁脚镣，当时称为“铁”，直径9.5厘米，重820—1100克，分马蹄形和圆形两种。

铁辟土 汉。1964年渭城区周陵乡赵家村出土。辟土呈不规则菱形，长45厘米，宽24厘米，一边有凹凸的弧，背面有四个鼻钮，并铸一“田”字。

铁铍 汉。1974年10月永寿县监军镇西村出土。共26件。分为四式：Ⅰ式5件，属于小铍之类。器呈三角锥体形。正面起脊，背面弧形，上部有一圆孔，铍有两边刃，顶部中空成釜。器高11.7厘米、宽8.8厘米，刃长12.1厘米，釜口长6.8厘米、宽4.5厘米。器身背部圆孔径0.6厘米。Ⅱ式18件，亦属小铍之类。器呈舌形，刃为凸弧状。正、背面均呈弧形。背面中部有一长圆孔。器体上部中空成釜。器高11.7厘米，釜口长10.1厘米、宽4.8厘米。器身背部长圆孔径0.8—1厘米。Ⅲ式2件，形与Ⅱ式相同，器体略宽大。器高15.3厘米，釜口长14厘米、宽6.5厘米。器身背部长圆孔径0.8—1.1厘米。Ⅳ式1件，器身正视为等腰梯形。铍刃平直，器两边斜直，器身上部中空成釜，器身背面有一圆孔。器高26厘米，刃宽10.5厘米，釜

口长15厘米、宽10厘米。器背圆孔径1.9厘米。又，1964年渭城区周陵乡赵家村亦曾出土汉代铁铍，铍呈舌形，长37厘米，宽35厘米，高11厘米，后端有扁圆形釜，背面铸一“川”字。

V形铁铍冠 汉。1974年10月永寿县监军镇西村出土。单合范铸造，前锐后阔。两翼外侧均有刃，翼侧呈弧形，背部呈釜状，两翼于前端汇成120°角的尖锋。铍冠高17.6厘米，每翼刃长23.5厘米，两翼尾部间距28厘米，翼尾宽2.3厘米，翼尾釜口宽1.4厘米。

凹口铁锤 汉。1974年10月永寿县监军镇西村出土。2件，大小、形制相同。器呈“凹”字形，刃外拱。器身长10.3厘米，刃宽11.8厘米，首宽11.8厘米。其中一锤左首上面铸阳文“阳二”2字。“阳”可能为地名简称，“二”疑为铁器作坊编号。

铲形铁锄 汉。1974年10月永寿县监军镇西村出土。1件。器如铲形。锄首高出，首有长方形釜，可横装木柄。锄肩圆弧折角，两边斜直，刃口平直。器身通高13.5厘米，锄身高8.6厘米，刃宽8.9厘米，锄首高4.9厘米、宽2厘米、厚2.2厘米，锄首釜长2.4厘米、宽1.1厘米。此类铲形锄俗称铍锄，釜部厚实，锄身却较薄。

铁铲 汉。2件。一件，1985年淳化县汉云陵陵区出土。正视呈长方形，高6厘米，刃宽13厘米，釜口长12.5厘米，宽0.8厘米。另一件，1979年淳化县城关镇龙屋村出土。形如铲，通高14厘米，刃宽11厘米，上有方釜，釜内径4.7厘米、宽2.1厘米，釜上有辖孔。

铁锄 汉。1974年出土于长武县丁家乡。锄作六角形，上部有长方形釜可安柄。高12.8厘米，刃宽20.5厘米，釜长3.6厘米，宽2.1厘米。双范合铸，锄身很薄，釜部较厚实。在锄脑和两肩有一道与边沿平行的凸线，使边沿形成一道沟。釜两侧亦有同样一道沟。锄面上部有单线卷云纹和桃叶纹凸线。

铁夯头 西汉。1973年5月兴平县豆马村出土。夯土器具。圆柱形、中空。平底素面。高7.3厘米，夯头直径8.5厘米。系铸铁浇范一次成型。腹即为装柄的釜。

铁锤 汉。1975年4月长武县丁家乡出土。锤身为圆柱形，直径2.8厘米，高5.1厘米。中部有长方釜，可安柄。一边宽12厘米，一边宽11厘米。

铁凿 汉。1975年4月出土于长武县丁家乡。一端中空成釜，可安柄，釜口近方形。凿长14.9厘米，刃厚0.2厘米，宽1.6厘米，柄端长3厘米、

宽2.5厘米，釜口长1.8厘米、宽1.5厘米、深4.2厘米，凿刃淬火部分长2.7厘米。

铁锯条 汉。1975年4月出土于长武县丁家乡。2件，其中完整1件。厚0.18—0.22厘米，长58厘米。一头宽，一头窄，由宽到窄为3.7—2.8厘米。锯齿形状为60°三角形。锯条两头靠背部有固定锯条的系绳小孔各一。此锯条有锯架，与近代锯基本相同。

铁齿轮 汉。1975年4月出土于长武县丁家乡。共8件，其中正齿轮1件，棘轮7件。正齿轮系锻件，并经过加工。正齿轮为传动齿轮，有咬合磨损痕迹，模数1，齿数48，齿宽1.2厘米，节圆直径4.8厘米，齿顶圆直径5厘米，齿根圆直径4.56厘米，轮厚1.2厘米，轴孔2.4×2.4厘米。齿轮直接套于轴上，当为花键轴的原始锥形。此正齿轮的齿形轮廓已由直线发展为曲线。齿厚等于其节距，齿宽足以承受它所传递的扭矩。轮盘的厚度等于齿宽，为1.2厘米，是齿厚的12倍，可保齿轮在工作状态下轴向位置正确。棘轮7件，大小、形制相同。齿数16，向一个方向偏倚。棘轮外径6.9厘米，牙距1.17厘米，轮牙弧面半径约为2厘米，牙根角度为70°，牙尖以圆角过渡，可减少牙尖磨损和棘爪的损坏。轴孔、轮盘与正齿轮相同。铁齿轮出土为研究汉代铁器冶铸及机械应用提供了珍贵资料。

铁提梁暖炉 汉。1986年秦都区马泉乡程家砖厂汉墓出土。通高17.4厘米，重8公斤。铁炉分上下两层，均高8.7厘米。上层直径23.7厘米，盆状，侈口，为炉膛（盛炭火部分）；下层直径26.5厘米，碟状，侈口，为底座（接炭灰部分）。上层有可活动的弧形提梁，炉膛腹部和底部各有3个和6个透风孔。下层有3个外撇的兽腿形足。整个器物造型美观，接茬严密，在出土器物中极为少见。

铁釜 宋。1977年1月长武县巨家乡巨家村出土。炊器。通高41厘米，口径50厘米，壁厚1.8厘米，重80公斤。同出2件，其中一件已残。二釜均呈敛口，鼓腹，圜底，上腹有一圈宽沿。

铁钟 金。淳化县云寂院遗物。钟通高2.25米，口径1.73米。二蒲牢交尾形钮。顶浑圆，有对称的四个圆孔，孔径12厘米。孔下饰莲瓣八个。腹壁较直，下端八唇，上饰蔓草和莲花纹。钟腹以突起双线分为上下两部分，每部分又以双线界分为八区。上截每区一字，连读为“皇帝万岁，臣佐千秋”，下截铸劝缘人、监铸人及与会诸人名目。金大定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1189年11月26日）云寂院监铸。现存淳化中学校园。

第四节 货币、钱范

海贝 西周早期。1980年淳化县石桥乡史家原村西周早期墓中出土。共95枚。为椭圆形自然海贝。一侧有齿形细锋，另一侧有修磨小孔。长1.5—2厘米，宽小于长。海贝为西周流通货币之一。

蚌贝 西周。1986年3月淳化县润镇乡西梁家村西周墓出土。用蚌壳磨制而成，白色，表面有海蚌珍珠光泽。菱形，长1.5—2厘米，宽小于长。此贝一面扁平，一面中间有刻画小槽，小槽两边有对应的细锋，形如贝，两端有穿孔，又称“珧贝”。蚌贝为西周流通货币之一。

“陈爰”金版 战国。也叫陈冉金版。1972年出土于渭城区窑店乡路家坡村北约1公里处。共8块，其中圆饼形3块，重249—250克，瓦形5块，重230—265克，含金量均在95%—96%之间。每块金版上戳有10—17个方形印记，印记为阴文“陈爰”二字。“陈爰”是战国时楚国爰金之一。“陈”为楚国大城，在今河南省淮阳市。此金版存世极少，外地未发现完整者。

“宅阳”布钱 战国。1962年渭城区窑店乡长陵火车站出土。铜质，平首，方足，方肩，方裆，体较小而薄。通长4.5厘米，足宽2.9厘米。钱文为“宅阳”二字。为战国时韩、赵、魏国所铸。属半铢布钱，俗称“方足小布”。

“安邑二铢”布钱 战国。1962年渭城区窑店乡长陵火车站出土。铜质。平首，方足，圆裆，方肩。钱文为“安邑二铢”4字。钱通长约6.5厘米，足宽4.15厘米。背平素。此种布钱为战国时魏武侯二年（前394）城安邑之后至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39）徙都大梁之前所铸。1974年咸阳博物馆将此钱赠予安徽省博物馆。

“齐法化”刀币 战国。1962年渭城区窑店乡长陵火车站出土。铜质，刀形，平首，柄端有环，刀身边缘隆起，弧部外缘隆起在刀身与柄之间不断。刀面模铸阳文“齐法化”三字。通长约18.5厘米，最宽2.85厘米，重约45克。“齐法化”即齐国标准铸币之意。

蚁鼻钱 战国。1962年渭城区窑店乡长陵火车站出土。铜质，椭圆形，上狭下宽，正面突起并有阴文，背面扁平无文。依钱文分为两种：一种75枚，钱文似鬼脸，一般释作“贝化”，钱文加上穿孔，犹如古怪的人脸，故俗称“鬼脸钱”，此钱最大的长1.9厘米，最宽1.3厘米，重3.4—4.1克，最小的长1.3厘米，最宽0.7厘米，重0.6克；另一种48枚，钱文笔画较多，

颇像一只蚂蚁，一般释“各六朱（铢）”三字。最大的长 2.1 厘米，最宽 1.3 厘米，重 2.9—3.6 克，最小的长 1.6 厘米，最宽 0.9 厘米，重 1 克。此均为战国时楚国使用的一种小型铜币。

“文信”圜钱 战国。1980 年 8 月出土于咸阳市东郊地质部第三普查大队驻地基建工地 34 号空心砖汉墓。铜质，圆形方孔。钱径 2.4 厘米，孔边长 0.7 厘米，无内外郭，背平素。孔两侧为阳文篆书“文信”二字（左读），面有外向四曲纹，故又称“四曲文钱”。此钱是秦文信侯吕不韦在其封国河南城所铸。1955 年河南省洛阳市河南城遗址出土一块文信圜钱残石范可证。此钱极罕见。

“半两”钱 秦。1980 年秦咸阳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共 25 枚。铜质。圆形，方孔。依大小可分为 2 种。一种钱径 2.7 厘米，重 5.3 克，方穿正面边长 0.8—0.9 厘米，背面边长 0.65—0.7 厘米。有郭，钱文“半两”，笔画规整，文有隶意；另一种钱径 2.3 厘米，重 2.5 克。“半两”二字较小，模糊不清。出自秦宫殿遗址的这批“半两”钱，为秦钱的研究提供了可信的实物资料。

金饼 秦或西汉。1963 年 7 月征集。1929 年出土于兴平县念流寨西门外土壕。出土 7 枚，仅存 1 枚。金饼为圆形薄身，直径 5.1 厘米，正面光素，阴刻一“寅”字。背面堆起，高耸不平，边高中低，形不规则。纯度为 99%，质地为赤金，色泽金黄，净重 250 克。其上阴刻有“□两半”字样。“寅”字似为编号，“□两半”当为计量。念流寨位于秦废丘遗址附近。据实地调查，认为此金饼是秦或西汉时遗物。

“三铢”钱 西汉。1978 年 2 月兴平县西汉墓出土。铜质，1 枚。圆形方孔，钱面有外郭，背平素无郭，穿右上角有一星文。钱直径 2.3 厘米，穿边长 0.8 厘米，厚 0.1 厘米，重 2.1 克。钱面穿右铸一“三”字，左铸一“铢”字，二字清晰。此钱为汉武帝建元元年（前 140）二月始铸，至建元五年（前 136）春即停铸。王献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云：三铢钱“唐宋人未见，清人见者亦无几”、“迨既发现三铢，为世珍重”。

马蹄金和麟趾金 西汉武帝时的黄金币。1968 年在渭城区窑店乡毛王沟村东出土马蹄金 1 枚，1978 年在毛王沟村北出土马蹄金和麟趾金各 2 枚。马蹄金呈马蹄形，底部椭圆，内部中空，中央凹进 2—4 厘米，向上收缩成斜面，并有椭圆形小孔与顶部椭圆形孔相通，壁面厚 1—3 厘米。在一马蹄金底面阴刻“廿朱”二字。经实测，3 枚重量分别是 256.47 克、265.00 克、

266.51克。麟趾金亦呈蹄形，底部椭圆，底面凹进0.7厘米，前部向上收缩成斜面，底部有小孔与顶上椭圆形大孔相通。一枚底面阴刻“斤一两廿三朱”，实测重量是284.10克，一枚底面阴刻“十五两十朱”，实测重量是244.34克。两种金币含金量均为98%。《汉书·武帝纪》载：太始二年“三月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蹄，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麟指麒麟，趾即脚。褭(niǎo)指“要褭”，骏马名。蹄即蹄。唐代以来，马蹄金和麟趾金虽屡有出土，但难以区分。毛王沟同时出土的这两种金币为辨别二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错金“一刀平五千” 西汉。1987年淳化县铁王乡小沟畔村出土。1枚。铜质，刀形(刀残)。首有环如钱，环径2.7厘米，厚0.5厘米，通长约7厘米。环孔上下篆书“一刀”2字，字陷处填有黄金。柄文为“平五千”3字，亦为篆书。“平”是值的意思。按当时规定，此一枚金错刀价值相当五千枚五铢钱。此钱为西汉居摄二年(前7)王莽所铸。

“货布”钱 新莽。1982年淳化县北城堡乡崔家原村出土。共22枚。铜质，布钱，平首方足，钱身呈长方形，腰微内凹，首上有一圆穿，穿的两面及钱两面均有周郭，圆穿下至方档有一凸起的直线。钱面模铸悬针篆书“货布”2字。通长5.71厘米，肩宽1.2厘米。此钱质地精良，形体厚重，书法秀美，始铸于新莽天凤元年(14)，为古代钱币中精品。

西魏“五铢”钱 西魏。1984年渭城区窑店乡胡家沟西魏侯义墓出土。共39枚。铜质，色黄白，圆形方孔，钱面边有郭，穿无郭。钱背边郭、穿郭均有。钱面篆书“五铢”2字。“五”字靠穿处有一竖画。钱径2.5厘米，边郭宽0.2厘米，肉厚0.13厘米，穿边长0.85—0.9厘米，重3.4—4.1克。侯义葬于西魏大统十年(544)。据载，西魏大统六年(540)和十二年(546)曾两次铸币，仍行“五铢”。故此墓所出“五铢”应为大统六年所铸。因侯义墓是西魏墓葬中少有的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故这批“五铢”钱在断代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北周“布泉” 北周。1988年4月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北周王德衡墓出土。共13枚。铜质，圆形方孔，钱面和背面均有内外郭。钱面阳文玉箸篆书“布泉”2字。但与王莽“布泉”作垂针篆不同。其直径2.6厘米，穿边长0.8厘米，郭宽0.1厘米。据《周书·武帝纪》：保定元年(561)“更铸钱，文曰‘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是此钱1枚当5枚五铢。

“五行大布” 北周。1988年8月渭城区北杜乡靳里村东北周独孤藏墓出土。共3枚。铜质，圆形方孔，钱正背两面有内外郭。钱面玉箸篆书“五行大布”四字。钱径2.7厘米，郭宽0.1厘米，穿径0.8厘米。据《周书·武帝纪》：建德三年（574），“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与‘布泉’钱并行。”是此钱1枚当10枚“布泉”钱。此钱与“布泉”钱不仅铸作精良，且都不以重量称之，突出强调钱的流通作用，是南北朝钱币的珍品。

东罗马金币 1953年渭城区底张乡隋独孤罗墓出土。圆饼形，纯金制作，模压纹饰。直径2.1厘米，重4.4克。两面均有图像和铭文。正面是一帝王半身像，周围有拉丁文缩写的“查斯丁二世，我们的主上，奥古斯都，祖国的父亲”（今译）等语，背面为一戴盔冑的女神立像，周围有拉丁文缩写的“至尊们的胜利”、“君士坦丁堡第5铸币点”等语。可知这枚金币为东罗马皇帝查斯丁二世（568—578）时期所铸。很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国的。又，1988年咸阳国际机场建设工地唐贺若厥墓亦出土1枚。出土时含于墓主口中。形制与独孤罗墓所出略同。据铭文推测，亦是东罗马查斯丁二世时在君士坦丁堡所铸。

隋鍍金“五铢” 隋。1985年11月兴平县上官道村出土。4枚。铜质，鍍金，圆形方孔。直径2.3—2.4厘米，穿长0.8—0.85厘米，厚0.12—0.15厘米，重2.5—3.1克。钱面铸“五铢”2字，边有郭而穿周无郭。钱背内外均有郭。此钱光洁鲜亮，工艺精湛，出土隋钱中少见。

隋“五铢”白钱 隋。1985年11月兴平县上官道村出土。1枚。铜质，圆形方孔。直径2.35厘米，穿长0.8厘米，厚0.15厘米，重3.4克。钱面铸“五铢”2字，边有郭而穿周无郭。钱背内外均有郭。此钱为隋炀帝在位时所铸。因铸时在铜中加有铅，故呈灰白色，世称为“五铢白钱”。此钱在出土隋钱中亦不常见。

“开元通宝” 唐。1980年5月兴平县西吴乡下上官道村西唐代建筑遗址窖藏出土。共数万枚。铜质，圆形方孔。钱面隶书“开元通宝”4字（对读）。两面均有内外郭。依大小分为三种：第一种径2.5厘米，外郭较宽，光背，或背穿之上有月纹；第二种径2.3厘米，光背；第三种径1.9厘米，外郭较窄，光背。

“乾元重宝” 唐。1980年5月兴平县西吴乡下上官道村西唐代建筑遗址窖藏出土。共数万枚。铜质，圆形方孔。钱面隶书“乾元重宝”四字（对读）。其背外郭有单轮、重轮两种。单轮者铸于乾元元年（758），重轮者铸于

乾元二年（759），一枚分别当十枚和五十枚“开元通宝”。依大小可分为17种。最大者径3.5厘米，宽郭、重轮，有的光背，有的背穿上月纹。最小者径2.05厘米，宽郭，背穿上亦有月纹。少数字体偏肥或偏瘦，质地较薄，恐为私铸。

北宋铁钱 1983年淳化县夕阳乡汉寨村窖藏出土。共4种。皆为铁质，圆形方孔。其一为“元祐通宝”，2枚。篆书者直径3.1厘米、孔宽0.8厘米，行书者直径3.3厘米、孔宽0.8厘米。皆旋读。其二为“绍圣元宝”3枚。篆书者直径3.4厘米、孔宽0.8厘米，正书者直径3.2厘米、孔宽0.8厘米。亦皆旋读。其三为“政和通宝”。4枚。篆书者直径3厘米、孔宽0.8厘米，“和”字反文，正书者分别为直径3厘米、孔宽0.8厘米和直径2.3厘米、孔宽0.7厘米。皆对读。其四为“宣和通宝”，3枚。直径2.4厘米，孔宽0.6厘米。皆正书，对读。北宋铁钱主要流通于川陕地区，而以徽宗时代所铸最为精美，历来为收藏家所喜爱。

越南“太平兴宝” 1981年9月旬邑县城关镇东关电厂工地出土。1枚。铜质，圆形方孔。钱文为汉文正书（对读），内外均有郭。直径2.4厘米，穿径1厘米，重1.9克。安南（今越南）丁部领以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建国，三年（970）改元“太平”，号曰丁朝，称大胜明皇帝。此钱即安南丁朝太平年间所铸。面文“太平”为纪年，背有“丁”字，纪国号。此钱为国内所见越南钱币中最早的汉文钱。

辽钱 1981年9月旬邑县城关镇东关电厂工地出土。铜质，圆形方孔。钱币见于一金代窖藏中。在大约98000余枚历代钱币中，共清理出辽钱7枚4品。计有：“清宁通宝”1枚，钱文正书，直径2.5厘米、穿径0.9厘米；“大康通宝”2枚、“大康元宝”1枚，均为隶书，直径2.4厘米、穿径0.9厘米；“大安元宝”3枚，均为隶书，直径2.3—2.4厘米，穿径0.9厘米，钱内外都有郭。钱质较差。钱文皆为汉字。辽国铸钱较少，主要赖宋钱的流入，并严禁铜钱出境。故出土辽钱很少。

西夏钱 1981年9月旬邑县城关镇东关电厂工地出土。铜质，圆形方孔。钱币见于一金代窖藏中。在大约98000余枚历代钱币中，共清理出西夏钱11枚2品。计有：“天盛元宝”9枚，钱文正书，直径2.4厘米、穿径0.9厘米；“乾祐元宝”2枚，钱文隶书，直径2.3厘米、穿径0.9厘米。其中“天盛元宝”铸工极精。钱内外均有郭。钱文皆为汉字。西夏虽一直铸造钱币，但境内流通仍以宋钱为主。西夏钱在曾属西夏的内蒙、宁夏一带的出土

遗物中亦不常见。

“正隆元宝” 金。1987年淳化中学出土。共1045枚。铜质，圆形方孔。直径2.3厘米，孔宽0.6厘米，正书“正隆元宝”四字（旋读），有内外郭。字、郭清晰，制作精美。系金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所铸。

“中统元宝交钞” 元。1965年10月与“至元通行宝钞”一同发现于咸阳市。纸色较黑，质厚粗糙。2件。长条形，长26.4厘米、宽18.2厘米。阳面顶部有“中统元宝交钞”6字，其下花纹栏上部有“壹贯文省”4字，下面是一串钱形图案，左右各有两行文字，外侧两行为“中统元宝”、“诸路通行”8个九叠篆字，内侧两行似八思巴文，疑亦“中统元宝”、“诸路通行”之意。其各有“字料”、“字号”字样，“字号”上一字是“师”字，当系编号。下部是10行文字，右边是“中书省奏准印造中统元宝交钞，宣课差发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元宝交钞库子攢司”，“印造库子攢司”。中间一行大字是“伪造者斩，赏银伍定（锭）。”下面是两行小字，为“仍给犯人家产”。左边依次为“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判”、“印造库使副判”及“中书省提举司”。“壹贯文省”和10行文字中央分别盖不同方形八思巴文朱印。左右两边上部均斜钤墨色合同印记。阴面上部中央盖长条形墨色印章。其上部有“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八字，下部是两串钱交叉组成的图案。下部盖有方形朱印（印文不清），左上方斜盖一墨色合同印记。保存基本完好。据文献记载，“中统元宝交钞”是至正十年（1350）印行全国的。此交钞与同时发现的“至元通行宝钞”均系元代由官方印发并在市面流通的法定纸币，因发现甚少，故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至元通行宝钞” 元。1965年10月发现于咸阳市。纸质较黑，质厚粗糙。1件。长条形，长27.5厘米、宽19.6厘米。阳面顶部印“至元通行宝钞”6字，其下花纹栏上印“贰贯”字样，左右各有八思巴文一行。左边释文为“诸路通行”，右边释文为“至元宝钞”。八思巴文下边分别有横排的“字料”、“字号”等字。中部有两串铜钱组成的图案。下部有10行文字，从右至左，前三行为：“尚书省奏准印造至元宝钞，宣课差发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后列“宝钞库子攢司”和“印造库子攢司”。中间一行为“伪造者处死”5字，字体较大。其下为两行小字；“首告者赏银伍锭”，“仍给犯人家产”。再后是“至元年月日”，“宝钞库使副”，“印造库使副”。最后是“尚书省提举司”。“贰贯”2字和10行文字中央均盖有大小不等的八思巴文朱印。阴面仅“贰贯”2字清晰可辨，其余合同印记文字模糊不清。

其上还斜盖有朱印。宝钞阳面左上角和阴面下部中央，分别盖有不同墨色的印记。保存基本完好。据文献记载，“至元通行宝钞”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三月开始印造、发行。币面斜盖的墨色合同印记按《四朝钞币图录》的考释，当是“支钱路名”。元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纸币空前盛行的时代，也是世界上最早推行纯纸币流通的朝代。纸币曾是元代惟一合法的通货。因元代纸币传世不多，此币及同时发现的“中统元宝交钞”均甚为珍贵。

“大元通宝” 元。1978年淳化县文化馆征集。铜质，圆形方孔，直径3.8厘米，面背有内外郭。钱文为蒙文（八思巴文）。

“至正通宝” 元。1989年8月征集，秦都区双照乡南上照村北出土。铜质，圆形方孔。直径4厘米，穿边长1.2厘米，厚0.3厘米。钱面正书“至正通宝”4字（对读）。背面穿下一星纹，星纹下一“五”字，似记值；穿上为一八思巴文。亦当为记值字。此钱当为折五钱，铸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

日本“宽永通宝” 淳化县拣选。共103枚。铜质，圆形方孔。直径2.2—2.4厘米，孔宽0.7厘米。钱文正书“宽永通宝”4字（对读）。背面有内外郭，其一枚背面有一“足”字。此钱为日本历史上铸量最大、铸期最长、版别最多的一种钱币。始铸于宽永三年（1626），其后大量铸造，并在中日贸易交往中流入中国，数量之多胜过某些明代钱。

“永昌通宝” 明末。淳化县拣选。1枚。铜质，圆形方孔，径3.5厘米，孔宽0.7厘米。钱面和背均有内外郭。钱面正书“永昌通宝”4字（对读）。“永”字从“二”，阔边。此钱为明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大顺朝所铸。李自成曾委任大顺朝淳化县知县，此钱当为其时流通。

“昭武通宝” 清初。2枚。1985年淳化县征集。铜质，圆形方孔。一枚直径2.2厘米，孔宽0.6厘米，钱文正书“昭武通宝”4字（对读）。背为素面。另一枚直径3.4厘米，孔宽0.9厘米，钱文篆书“昭武通宝”4字（对读），前有“壹分”2字。此钱为清初吴三桂起兵反清后所建“周”朝的昭武元年（1678，即康熙十七年）所铸。当时驻军固原、平凉的清陕西提督王辅臣亦响应吴三桂叛清。此钱疑为当时流入。

“咸丰元宝” 清。淳化县文化馆拣选。铜质，圆形方孔。直径4.9厘米，孔宽1.2厘米，阔边。正面正书“咸丰元宝”4字（对读），背孔上下有“当百”2字记值，左右各有满文一字记局。“当百”，即此钱一枚值制钱（平钱）一百枚。此钱铸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

“半两”钱范 西汉前期。铜质。共4件，均出土于渭城区窑店乡长兴村。以形制不同分为两类，其中长铲形2件，圆盘形2件。长铲形钱范一件形较规整，钱径2.3—2.4厘米，钱肉较厚，约0.15厘米，无周郭。钱文“半两”，字形瘦长，笔画较细，该范共有钱模14个，主浇槽较浅窄，横截面为半圆形。范长23厘米，宽8.2—9厘米，厚0.9厘米。另一件钱形不太规整，个别钱印不够正圆，钱径2.4—2.5厘米，钱肉较薄，约0.1厘米。无周郭。钱文“半两”，字形宽短，笔画圆钝。该范共有钱模12个，主浇槽宽而深，横截面呈三角形。范长21.6厘米，宽8.2—9厘米，厚1厘米。圆盘形钱范2件，形制基本相同。因锈蚀严重，钱文多数不清，“半两”二字亦不规整。二范均有钱模15个，钱径2.3厘米，无周郭，范中心有一小圆柱，制出的子范可叠铸。

双面“半两”钱范 西汉前期。1972年3月渭城区韩家湾出土。为长条形滑石范。石质细软，长47厘米，宽11.8厘米，厚3.3厘米。此范范面中部有一长槽为主浇道，长44.5厘米。浇道口呈半圆形，径2.2厘米。主浇道左右双行并列阴刻“半两”钱文。每行15枚，共60枚。主浇道与钱模之间及两行模之间均有支浇道相接。钱模直径2.3厘米，间距0.25厘米，中间方形穿凸起与范面平齐，穿边宽0.9厘米。穿中心均有一圆凹点，径0.3厘米，当为定位孔。范背面亦刻有主浇道和浇注口，主浇道两侧有序地排列着四行圆凹点，大部分圆点的两旁有刻好的阴文“半两”二字；其中有五枚圆周轮廓已基本形成钱模，其余均属尚未刻成的钱文，似因原刻不合格而改用背面重刻的。这件双面钱范为研究钱范的制作工序提供了实物资料。与这件双面“半两”钱范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大小相同的单面“半两”钱范，同为滑石质。

“五铢”钱范 西汉。1973年淳化县十里原乡魏家村出土。铜质。残长11厘米，宽7.3厘米。背有釜，面有溶槽，沟槽左右有对称的八个钱模。钱面方孔上有小沟槽，此钱即所谓汉宣帝上横文五铢。应是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以前所铸。

“货布”钱模 新莽时期。铜质。1975年出土于三原县张家坳乡。模近方形，长8.1厘米，宽6.4厘米，厚1厘米，沿高0.5厘米，四角圆折。模面并列两个钱，一为阳文正模，一为阴文背模。钱通长5.6厘米，足枝长2厘米，首宽1.8厘米，肩宽2.2厘米，首中部有一圆穿，穿径0.7厘米。穿及钱两面边缘都有周郭。钱正面有阳文篆书“货布”二字。钱文书法工整、清

晰。模背有“亘”字。此模为翻铸钱范的工具。铜质颇佳，铸作精美。

“货泉”钱模 新莽时期。铜质。1975年出土于三原县张家坳乡。模近方形。长9.4厘米，宽9.2厘米，厚1.1厘米，沿高0.6厘米，四角圆折。模面有6个钱，其中上面3个为背面，下面3个为正面。钱支干相连。钱径2厘米，郭径2.3厘米，钱周郭宽0.15厘米。正方形穿，边长1厘米，穿的一面（背面）有郭。穿左右有阳文篆书“货泉”二字。铜质较好，钱文较细。模背铸有一阳文篆书“泉”字。

第五节 壁 画

车马图 秦。1979年3月渭城区窑店乡秦咸阳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见于东西两壁，现存三组。第一组绘枣红马，马头部戴衔镳，颈上的轭和面部饰具皆白色。四马作奔驰状，身后拉车。车为单辕，全白色，车上有黑色伞状车盖，盖下为方形车箱，车箱后曳有两条黑白长带。第二组与第一组大体相同，辕较曲，车上有前大后小的两个窗。第三组车马中的右驂马残脱，两马为黑色，左驂马饰黑色和褐色两条长带。在第一、二组车马之间，各有两棵古树立于道边。画上颜料有朱砂、石黄、赭石等矿物质，底白色为蛤粉。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 C_{14} 测定，距今 2290 ± 80 年（公元前 340 ± 80 年），证明此壁画应为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定都咸阳后绘制。此壁画及同时出土的“仪仗图”、“建筑图”及“麦穗图”等壁画，虽残缺较甚，但颜色仍较鲜艳。因其描绘的是当时的社会生活，因而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此组壁画是国内迄今所见最早的宫殿壁画。

仪仗图 秦。1979年3月秦咸阳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见于东壁第四间。可以看出人的形象个体的共11人。整个画面可分上下两列，每列又可分南北两组。11人均身着长袍，前裾覆足，后裾曳地。上列左边1人和右边4人，袍较窄瘦，形如汉俑的喇叭口状。下列6人可看出袍服者显得身衣更为宽大，襟曳地如狐尾，很像东汉时的狐尾禅衣。11人袍色不一，有褐、绿、红、白和黑色。上列北组仅存1人，着绿袍；南组4人，2人着绿袍，1人着褐袍，1人着白袍。下列6人，可看出颜色者4人，分为深褐、褐、红和黑袍。人物的服色和秦始皇兵马俑坑的陶俑颜色相近。从仪仗图下列6人的头部轮廓看，似为禽兽之状。此种装饰，盖当时仪仗武士的形象。此图或以为“百戏图”，待考。

建筑图 秦。1979年3月秦咸阳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见于西壁第五

间和第六间。残缺殊甚，但可以看出属于宫室建筑，分上下两层，有窗棂。建筑物左右各一角楼，南边已残，北边角楼有三层，顶为“人”字形。参照其它部位残迹，可以看出建筑物造型与河南省辉县战国墓出土的“宴乐狩猎纹铜鉴”、上海博物馆所藏“刻纹燕乐画像椭栝否”以及汉代画像石上的建筑形象基本相仿。建筑物的南、北部及下部（上半部已残）均有人物活动，是否宴乐活动，因壁画残缺殊甚，难以确认。

麦穗图 秦。1979年3月秦咸阳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出土。见于东壁第八间和西壁第六间。前者保存较好，后者剥落殆尽。壁画上的作物穗子作直立棍棒状，子粒较大，与今关中小麦麦穗相似。麦穗图的出现，反映出小麦在当时粮食作物中的重要地位。壁画中除麦穗这种农作物以外，还发现了少数绘有竹、梅的壁画残块。这都说明当时关中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湿润。

杂役图 唐。1973年出土于三原县陵前乡焦村李寿墓中。图绘于第三天井处。出土时已脱落在该天井底部。画面为庭院建筑。院内有二女仆手推石磨，一女仆肩挑水罐。偏房内三侍女分别捧盆、碗准备膳食。庭院中坐一妇人，怀抱婴儿。整个画面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该墓葬于贞观五年（631）。同时出土的“牛栏图”、“播种图”等，都是当时农牧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七女侍图 唐。1979年出土于礼泉县杨恭仁墓中。图高98厘米，宽193厘米。画面上7个女侍分别持奩、杖、扇、钵、琴、棋等生活和娱乐用品。女侍面容清癯，均饰妆靛和花子，其中2人发饰花胜，保留着明显的隋代造型风格。画面线条纤细流畅，继承了东晋顾恺之“春蚕吐丝”的线描特色。该墓葬于贞观十四年（640）。

仪卫图 唐。1986年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长乐公主墓中。前后2幅，原均绘于墓道东侧。前幅高265厘米，宽356厘米。画面8人，皆头戴黑色幞头，内着白色圆领窄袖长袍，腰束黑板带，外穿淡青色系领敞襟短袖风衣，足着长筒尖头黑靴。个个浓眉大眼，身材魁伟。前1人为领班，左手按剑，右手指点，双目前视；后7人参差排列，庄重威严，各具情态，均腰佩长剑、弓弣、箭箠，手持长杆五旒红旗，其中第一人头上有一束长雉尾下垂。后幅高265厘米，宽408厘米。画面6人，皆头戴兜鍪，穿毛皮甲袍，腰束板带，着长筒尖头黑靴。前1人为领班，左手按剑，右手指点，双目前视；后5人参差排列，身材高大，威武强悍，均腰佩长剑、弓弣、箭箠，手执长杆五旒红旗。此二图前后相接，一文一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仪卫场面。绘画上

仍保留着六朝铁线银钩的艺术风格。该墓葬于贞观十七年（643）。

云中车马图 唐。1986年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长乐公主墓中。图高176厘米，宽410厘米。原绘于墓道西壁。图中车为红色，辕头雕龙首，双厢，前低后高，车顶置华盖，后两侧各插一红色旒旗。车前两马驾车，马皆缚尾扬蹄，驾车奔驰。二马之间一人着白色宽袖交襟长衫，挽髻。马右侧二人。车箱坐三人，其中一人挽髻，一人束发，一人戴莲花冠，有飘然长髯。箱中三人均着粉红色宽袖交襟长衫。车箱左下方绘一龙首鱼身摩羯，张口伸舌，鳍尾俱全。车前方可见一兽长尾。车周遍饰流云瑞气。该墓葬于贞观十七年（643）。

门阙图 唐。1986年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长乐公主墓中。此图位于第二过洞上部。画面门阙重层，中施平座，四阿顶式结构，顶上饰鸱尾，顶脊与瓦面为青灰色，木构部分施红色。顶上方绘朱雀和祥云。该墓葬于贞观十七年（643）。

持扇仕女图 唐。1978年出土于礼泉县段苘壁墓中。图高170厘米，宽82厘米。画面为一端庄典雅的唐代淑女形象。仕女头梳高髻，着白色窄袖衫，束棕、绿色相间的条纹长裙，穿笏头履。面庞丰满，眉目清秀，左手持团扇，扇中部为橘红色，其间绘树木、山水，是此前极少见到的一幅完美的山水风景画。该墓葬于永徽二年（651）。

给使图 唐。1978年出土于礼泉县段苘壁墓中。图为一组四幅。每幅高170厘米，宽82厘米。画面四人服饰相同，均头戴幞头，身穿窄袖圆领长袍，着黑筒长靴，束腰，佩囊。但姿态和表情各不相同。其一人右手执笏，左手指点，口微张，呈诉说貌；其一人左手握拳屈于胸前，右手指点，张嘴龇牙，呈讥讽貌；其一人拱手弓腰，侧目而视，形象猥琐而又居心叵测；其一人左手下垂指点，右手竖起拇指，呈矜夸貌。此组给使图生动地展现了唐代宫中内官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情形。为唐墓壁画中形神兼得的佳作。该墓葬于永徽二年（651）。

侍女戏鸭图 唐。1972年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李震墓中。图高100厘米，宽84厘米。画面女侍梳椎髻，穿蓝色圆领窄袖襦衫，束红白条纹相间曳地长裙。右手提裙，左手扬起，逗戏面前白鸭。鸭引颈张嘴，拍动两翅，如闻其声。该墓葬于麟德二年（665）。

侍女嬉戏图 唐。1972年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李震墓中。图高109厘米，宽66厘米。画面二侍女身体前后紧靠，前者左手横持团扇，右手被后者

用左手从腰际前伸握住。二人恣意嬉戏，看去天真活泼，无拘无束。侍女均头梳螺髻，穿白色圆领窄袖襦衫，束红白条纹相间曳地长裙，披深褐色披帛。腰身微倾，姿态婀娜，与同时出土的侍女戏鸭图一起，显示了唐代侍女休闲时的生活情趣。该墓葬于麟德二年（665）。

乐伎图 唐。1971年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李勣墓中。图高122厘米，宽92厘米。原绘于墓室东壁。画面为三个女乐伎，左者吹排箫，右者吹横笛，居中者残阙。二伎均头饰高髻，穿圆领窄袖红襦衫，束黑白相间条纹长裙，面容丰满，眉目清秀，左者髻顶端月牙状发式格外突出。此图与同时出土的舞伎图，是研究唐代乐舞的珍贵资料。该墓葬于总章二年（669）。

舞伎图 唐。1971年出土于礼泉县烟霞乡李勣墓中。图高152厘米，宽233厘米。原绘于墓室北壁。画面为两个舞伎。二伎均梳高环望仙髻，穿百戏舞衫，系黑白相间条纹曳地长裙，上身相向内倾，长袖挥舞，彩带飘动，体态窈窕，舞姿轻盈。该墓葬于总章二年（669）。

牛车图 唐。1972年出土于礼泉县阿史那忠墓中。图高178厘米，宽220厘米。画面为两御者驾一牛车。两御者头戴浑脱帽，穿白色圆领袍。车右者着长筒黑靴，目视前方。车左者缚棍，着麻鞋，作回顾状。牛双角直上，二目圆睁，张口伸舌，抬蹄欲行。车盖已残，车后有帷幔曳地，车厢及车轮涂黑色和红色。该墓葬于上元二年（675）。

男装女侍图 唐。1972年出土于礼泉县阿史那忠墓中。图高146厘米，宽83厘米。画面为一头戴黑色幞头，穿黄色圆领窄袖袍、波斯裤，足着圆头线鞋，浑身扮作男装的女侍。女侍面容丰满，眉目清俊，体态健美，双手抱弓弦、箭箠，娴静侍立。该墓葬于上元二年（675）。

宫女图 唐。1960年出土于乾县乾陵乡唐永泰公主墓中。四幅。一幅绘于墓内前室东壁南部，绘有宫女9人，头梳高髻、螺髻、双螺髻。身穿窄袖袒胸襦衫，肩披帛巾，下穿红、绿、黄色曳地长裙，裙下露如意云头履尖。分别手持烛台、团扇、如意、方盒、盆、高足杯等物，侧身缓行；一幅绘于墓内前室东壁北部，绘有宫女7人，5人分别着红、黄、绿色曳地长裙，肩披长巾，梳单髻、螺髻、双螺髻、高髻，2人着男装，其中一人戴黑色幞头，穿黄色翻领长袍，一人着圆领长袍，下穿波斯条纹裤。宫女分别手持蜡烛、杯、方盒、包裹、团扇等，缓步向前；一幅绘于墓内西壁南部，绘有宫女9人。为首一人头梳高髻，着白襦绿裙，披红色披巾，双手挽巾抱于胸前。最后一人头戴黑幞头，着圆领红袍，穿波斯条纹裤，作男装。中间7人分别梳

单髻、双髻，着窄袖襦衫，穿黄、红、绿色曳地长裙，肩披长巾，手捧杯、盘、漆奁、拂尘等生活用品，跟随为首一人缓步前行；一幅绘于墓内北壁西部，绘宫女2人。为首一人头梳高髻，着白襦红裙，裙下露云形履头，双手挽披巾抱于胸前。后者梳双螺髻，着窄袖襦衫，穿绿色曳地长裙，双手抱一漆奁，紧随其后。此4幅宫女图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豪华的宫廷生活。该墓葬于大足元年（701）。

马球图 唐。1971年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出土。原绘墓道西壁，高226厘米，宽688厘米。画面有骑马人物20余个，均着深、浅两色窄袖长袍，戴幘头，穿黑靴。画中突出5个持偃月球杖驱马抢球的骑者。前一骑作反身击球状，其余纵马迎击。后10余骑人马或行或止不一；行者骑枣红马，有的山间奔行，有的驰骋腾空；止者着绿色长袍，红翻领，伫目凝神，手无球杖。画面背景山峦起伏，五株古树孤零零地点缀其中。此图是有关马球运动最早的形象资料。该墓葬于神龙二年（706）。

客使图 唐。1971年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出土。二幅。一幅绘于墓道东壁，高204厘米，长275厘米；一幅绘于墓道西壁，高阔相近。东壁一幅共6人，前3人为唐朝鸿胪寺官员，身穿广袖朱衣，长袍曳地，头戴介帻笼冠，足登高头皂履，神情肃穆。后3人为客宾使臣。为首的深目高鼻，浓眉秃顶，身着翻领褐色长袍，腰束带，足穿黑靴，双手拱置胸前。第二人头戴双羽小尖状冠，身穿宽袖红领白短袍，下穿大口裤、黄靴，双手拱于袖中。第三人头戴翻耳皮帽，身着圆领黄袍，腰束黑带，外披灰蓝大氅，下穿黄皮毛窄裤、尖头靴，双手拱于胸前。西壁一幅与上图相对，图中前三人为唐朝官员，头戴笼冠，身着宽袖红袍，前一人回身向后，后二人双手持笏，与前者相对交谈。再后二人为异族使者，均着圆领长袍，脚穿黑色长靴，拱手而立。最后一人深目高鼻，络腮短须，头戴白色软角帽，身穿翻领夹袍，双手持笏前行。此图残损，不如上图色泽鲜明。该墓葬于神龙二年（706）。

阙楼图 唐。1971年乾县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中出土。2幅。原绘于墓道东、西壁，高、宽均为280厘米。画面为王宫阙楼建筑。以门阙为构图主体，各以一座母阙、二座子阙排成“三出阙”形式。台基由砖筑成梯形，阙楼耸立其上。屋有挑出檐外木构平座，上起观宇为单檐庑殿顶，顶置鸱尾。屋身面阔、进深各为三间，四周回廊环绕。柱头斗拱为五铺作双抄偷心造，令拱上无替木，间铺作下层人字拱，上为斗子蜀柱。诸阙中母阙最高，背景衬以山峦、林木。此图为唐代绘画中罕见的较完整、大面幅、高等级的阙

楼。该墓葬于神龙二年（706）。

捧双陆侍女图 唐。1985年出土于三原县陵前乡三合村西臧怀亮墓中。侍女单髻垂额，面庞圆润，修眉朱唇，上身着白色长襦衫，下着绿色曳地长裙，披肩后飘，举止娴雅。双手捧一方形棋盘，隐约可见盘内黑白两色棋子。此棋盘为研究唐代双陆棋提供了珍贵资料。该墓葬于开元十八年（730）。

冯晖墓壁画 五代。近年彬县底店乡冯家沟冯晖墓中发现。墓壁均有壁画。甬道、耳室、小龕内绘制蔓草、牡丹、双凤等图案，主室顶部绘二十八宿星象图及银河、明月，周壁绘6个侍女，拱手而立。主室南壁西侧绘庖厨图，图中有锅、灶、柴、菜、肉、盆、碗、碟等炊具和食品，主室南壁东侧绘宴饮图，图中桌凳、茶具、酒具、盘、果之类摆布整齐。画面色彩艳丽，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该墓葬于五代时期后周显德五年（958）。

第八章 近现代史迹

咸阳不仅以灿烂的古代文化享誉海内外，在近现代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曾经有过不少重要事件发生在这里。如这里有1918年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时，曾经作过司令部驻地的三原县鲁桥镇东里村“靖国公园”故址；有1937年至1940年间，曾经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培训过万余名革命青年的泾阳县安吴堡“安吴青训班”旧址；有1945年7—8月间，边区军民曾经顽强阻击、后又发起反攻，夺回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爷台山的“爷台山反击战”遗址等。建国后，人民政府相继修整和新建了不少烈士墓、烈士陵园及革命纪念馆。这些历史遗址和纪念地，已经成为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场所，其中不少已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第一节 故 址

靖国公园 位于三原县鲁桥镇东里堡，是一组古园林建筑群。1918年，于右任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时，此园为司令部驻地。此园传为唐初大将李靖

别墅，清同治初年毁于战乱。后为胡景翼所购，旋经靖国军诸将领商议，取名“半耕园”。杨虎城等为纪念靖国军，改名“靖国公园”。于右任为书“靖国公园”4字及“天地有正气，园林无俗情”对联。公园归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耀县、淳化等八县公有。杨虎城主陕时由省府秘书处管理。1930年曾经修葺。1937年公园成为靖国小学所在地，由靖国小学代管。1985年交由文物部门管理。园内建筑大都保存完整。

云阳革命旧址 云阳镇位于泾阳县城北10公里处。抗日战争初期，曾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和中共陕西省委驻地。红军总部设在南门文家，该院院落分正院、东院、西院三套，总宽32米，长80米，坐北向南。正院是总部首长办公住宿的地方，东院是总部直属机关部队住所，西院为总部马厩。现仍存正院两间厢房。

1936年“西安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于12月15日南下关中，进入渭北地区，集中主力部队，准备还击国民党亲日派“讨伐军”的进攻。同时成立了以彭德怀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邓小平为副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的前敌总指挥部。总部及直属机关参谋部、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皆驻扎云阳镇内，分别以代号“长江部”、“武昌部”、“衡阳部”对外工作。红一军团、三十一军团、九十三师、七七一团、七七二团在云阳至安吴一线驻扎，机枪连守卫在云阳东门外，担负着保卫总部的使命；红军总部卫生部、野战医院集中于镇北马家村，为西安谈判作了强大后盾。

“七·七”事变后，为了促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指挥（改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总部也随之改为八路军总部。下辖3个师，3万余人。1937年8月下旬，在云阳镇中街大操场举行红军改编和抗日誓师大会，刘伯承主持大会，左权作了抗日誓师动员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意义的报告，彭德怀宣布了中央军委改编的命令。泾阳县和云阳镇各人民团体、政府机关及附近学校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这是我军在云阳期间的一次盛会，会上，红军战士将带有五角星的帽徽改为青天白日帽徽，不少战士痛哭流涕不愿意更换，有的战士还把换下的帽徽珍藏起来作为留念。1937年9月6日，八路军总部由云阳出发，经三原、富平、蒲城、澄城、合阳、韩城而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省委迁入云阳镇，初设小北门毛家大院，后以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名义活动。周铭、汪锋、赵伯平等住在邓家、杜家办公。革命青年奔赴边区或参加安吴青训班，均由中共陕西省委介绍。1940年5月1日全部撤往陕甘宁边区马栏。现仍存厢房2间。

安吴青训班革命旧址 位于泾阳县蒋路乡安吴堡。安吴堡系清末安吴堡拾义堂周夫人（俗称“安吴寡妇”）家的庄园。堡子内有望月楼、迎祥宫、柏树林等8处清代晚期建筑。周夫人住的庭院是青训班总部，也是学员开会、上课、住宿的地方；庭院后面是坐北向南的望月楼；从庭院向东60米即迎祥宫（戏楼）；村东约100米柏树林，即吴家陵园。1937年9月至1940年4月，由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和西北救国联合会筹办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吸收西安等地进步青年，先后在泾阳县的斗口村、云阳镇、安吴堡三地共举办了14期“战时青年训练班”，组编了127个连队，培训了12000名学员，为抗日战争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青训班举办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为青训班题词，朱德总司令亲赴视察并作了抗日形势报告，林伯渠经常到青训班给学员讲课。安吴青训班旧址已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马栏革命旧址 位于旬邑县马栏乡。马栏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和中共关中地委、中共陕西省委所在地。遗存有关中分区机关和驻军旧址窑洞300多孔，其中最大的深7米、宽5米、高6米，且相通相连。还有1942年修建的大礼堂（即“大生产展览室”，又名“工字房”）。1984年陕西省文物局曾拨款维修，为本市境内重要的革命故址。

爷台山反击战故地 爷台山位于淳化县城东25公里的方里、固贤、南村三乡交界处，东临耀县，主峰海拔1313米。曾经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和前哨阵地。抗日战争刚胜利，蒋介石首先以此处为突破口，发动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1945年7月21日至22日，国民党三十六军暂编五十九师（整编后的陆军一百二十三师）、骑兵二师向八路军爷台山关中分区保安纵队、关中警卫队、警一旅三团和新四旅七七一团的六个连驻军发起攻击，占据了山南10多个村庄。蒋介石、胡宗南不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利团结抗日”的特电警告，不但不后撤，又续增兵力，加强进攻。八路军经过7昼夜艰苦抗击，终因众寡悬殊，于27日奉命撤退。国民党军乘机大举向北进犯。八路军新编第四旅、教导第一、二旅和三五八旅奉命增援关中，8月8日23时发起反攻，经过3天激战，于8月

10日夺回了爷台山，取得了反击战的彻底胜利，巩固了陕甘宁边区。这次反击战的胜利对于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对于增强解放区军民打败蒋介石的信心，都有很大意义。为了纪念爷台山战役中牺牲的革命先烈们的业绩，淳化县人民绿化了爷台山，并在主峰修建筑了纪念亭，树立了爷台山战斗纪念碑。

第二节 纪念地

李仪祉墓园 位于泾阳县王桥乡寺背后村，占地20亩。墓园坐北向南，园内苍柏葱郁，有李仪祉花岗岩雕像一座。

李仪祉（1882—1938），陕西蒲城县人，中国近代著名水利专家和近代水利事业的奠基者。他毕生致力于中国水利事业，精心设计并修建了“关中八惠”等水利灌溉工程。1938年3月8日因病逝世，3月11日，西安各界人士云集西安西关，沉痛悼念这位水利界泰斗。15日，灵柩移往泾阳，国民政府特颁发褒扬令，公葬于泾惠渠旁。

淳化烈士陵园 位于淳化县城关镇龙屋村。东依泰山，西临冶水，距县城1公里。1958年淳化县党政联席会议决定筹建，1959年5月动工，1961年6月建成开放。

陵园周长460米，占地24亩，建筑面积342平方米。园内有八角纪念亭，烈士纪念壁，壁上刻有330位在淳化境内牺牲的革命烈士和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淳化籍烈士姓名。陵园中央耸立高达20余米的烈士纪念碑，碑的正面是朱德“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左面是陈毅“为人民革命而牺牲最光荣最伟大”的题词，右面是彭德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题词，背面是谢觉哉“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纪念碑后面是烈士纪念馆、祭台和安葬着73位烈士遗骨的坟墓。为烈士墓题词的还有宋庆龄、刘伯承、郭沫若等人。

淳化烈士陵园建成后，屡经增修和绿化，使处于山环水绕，云霞明灭之地的烈士陵园，隐约于松涛柏浪之中；高耸的烈士纪念碑，独秀于翠微之上。整个陵园，显得庄重而壮丽。

旬邑县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旬邑县城东南泰山庙旧址上，建于1957年。

陵园占地27亩，建筑面积414平方米，其中左、右各五间展室，面积360平方米。园中竖有20余米高的烈士纪念碑，碑四周植有松树。碑后是烈

士坟墓，处松柏萦绕之中，四季常青。园内安葬革命烈士 169 位，有姓名者 34 位。

旬邑革命暴动纪念馆 位于旬邑县城南汭河南岸的翠屏山腰。系为纪念 1928 年 5 月在旬邑“二八”革命暴动中牺牲的烈士而建，故又称“二八”纪念馆。

该纪念馆 1984 年动土，1987 年竣工。占地 5293 平方米，建筑面积 452.7 平方米。为仿古式样的混凝土结构。进门第一平台东、西是展室，陈列烈士遗物；第二平台是 11 米高的汉白玉纪念碑，上刻舒同题写的碑名及习仲勋、汪锋的题词，顶上耸立着许才升、吕佑乾、吕凤岐、王浪波、王廷璧、程永盛、程国柱等 7 位烈士的汉白玉雕像。

咸阳市主要革命故址及纪念地一览表

表 5-2

类别	名称	年代	地址
革命故址	云阳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旧址	1936—1937	泾阳县云阳镇南文家
	云阳中共陕西省委旧址	1936—1939	泾阳县云阳镇毛家村
	陕甘宁边区关中特委、分区驻地故址	1936—1942	旬邑县马栏乡政府
	安吴青训班革命旧址	1937—1940	泾阳县安吴堡
	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工字房故址	1941—1949	旬邑县马栏乡医院
	桃渠原村淳耀县政府旧址	1935	淳化县桃渠原村
	安社村淳耀县政府旧址	1937—1940	淳化县安社村
	安社村中共陕西省委办公旧址	1940	淳化县安社村
	陕北公学旧址	1938—1939	旬邑县看花宫村
爷台山反击战故址	1945	淳化县爷台山	

续表 5-2

类别	名称	年代	地址
纪 念 地	旬邑革命暴动纪念馆		旬邑县西关村
	旬邑县革命烈士陵园		旬邑县东关村
	淳化县烈士陵园		淳化县城关镇龙屋村
	河南街村烈士陵园		秦都区河南街村
	史可轩墓		三原县东里李靖故居内
	八烈士墓		秦都区龙泉坊南村
	罗家岭烈士陵园		乾县罗家岭
	云阳烈士陵园		泾阳县云阳镇西街村
	长武县烈士纪念碑		长武县昭仁镇什字

第九章 文博事业

建国以前，本地缺少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许多文物遭到破坏或流失。建国以后，人民政府一直重视文物工作，逐步建立健全了各级文物管理机构；配合基本建设，清理发掘了不少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建立了9个博物馆和14个文管所；在文物的保护、研究和陈列展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第一节 管理机构

一、行政管理

建国前，境内各县文物古迹的保护管理一般例由县教育局（科）、民教

馆或县署兼之。

建国初期，咸阳专署文教科负责文物及陵墓保护。机构撤并后，权力下放各县市。1961年8月恢复专区建制，11月成立文教卫生局，文博事业始明确由文教卫生局管理。1963年10月分设文教局和卫生局，文博事业归文教局管理。“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文教局机关瘫痪，正常工作无法开展。1970年6月，咸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文教局成立，恢复对文博事业的管理。1979年1月，咸阳地区行政公署将文教局分设为文化局和教育局，文博事业归文化局管理。1984年6月，咸阳地区文化局更名咸阳市文化局。到1994年，正式成立咸阳市文物局，为市政府直属事业机构，专门负责全市文物、博物馆事业的管理。

1984年以后，咸阳市文化局与公安、司法、工商等部门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严厉打击了文物走私和盗掘古墓葬的犯罪活动。1986年4—7月，在全市范围内首次开展的宣传文物保护法，打击破坏、盗窃和走私文物活动中，依法严惩了一批挖掘古墓、走私和倒卖文物的犯罪分子，收回各种文物3059件，古钱币1606斤，其中86件珍品属于国家一、二、三级文物。1987年和1990年，按照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先后两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盗掘走私文物犯罪活动专项斗争，依法严惩了一批文物犯罪分子，盗掘古墓和倒卖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有所收敛。

二、业务管理

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1984年11月，更名咸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由副市长郑作舟任主任，市委宣传副部长张首迅和市文化局副局长吴来保任副主任，市计委、公安局、财政局等18个与文物工作密切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及部分市属文博单位负责人任委员，领导全市的文物保护、管理、调查、征集及随工清理工作。文管会下设办公室，由吴来保兼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业务。截至1990年底，市文管会办公室有工作人员15名。

50年代到70年代，一些文物分布较多的县（市）陆续建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其中最早的是1954年建立的咸阳市文管会，由程志廉副市长兼任主任，张宝三、赵培林、李钟瑞等知名人士兼任委员，其办事机构设陕西省咸阳文化馆。80年代中期以后，渭城、秦都、武功、礼泉等县区给文管会办公

室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彬县、永寿、兴平、淳化、杨陵等县区文化馆都配备了文物专干。截至1990年底,对全市306个文保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树立了保护标志,设立了专门保护机构(或有专人负责管理),建立了科学记录档案。文保组织发展到39个,文物保护员和文物通讯员发展到435名,并相继建立了14个文物保管所,加强了对各级重点文物的保护和管理。

第二节 文物保护

一、建国前的文物古迹保护

咸阳一带的文物古迹,历来为世所重。清代乾隆年间曾任陕西巡抚的著名学者毕沅,为保护这些古迹作出了不少贡献,至今受到称赞。毕沅在政务之余经常不惮劳苦,踏勘古迹。他对咸阳原上的西汉诸陵及渭北的唐代陵墓,大都身临其境,亲自考察。咸阳境内现存的汉唐陵墓前,几乎都竖有毕沅所立的记墓碑石,极大地便利了后来的保护管理。乾隆四十年(1775)春,毕沅在考察了泾阳县境的龙洞渠后,道经礼泉,拜谒昭陵,周览封域,发现昭陵陵园疆界不明,樵者乱砍滥伐,耕者随意垦种,丰碑任其剗凿,巨冢听其侵削。即命礼泉知县张心镜厘正疆界,严加保护。翌年又命于昭陵陵园筑围墙30余丈,建立碑亭10余所,公告全县保护昭陵。毕沅二次抚陕后,于乾隆四十八年(1813)又命礼泉知县蒋其昌增修围墙,立碑记事,并在陪葬墓前立石以辨名位,垂永远。翌年还亲撰《大清防护唐昭陵碑》一文,请当时名士钱坫篆书、孙星衍题额并摹勒,由蒋知县立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昭陵墓葬及遗迹的破坏。毕沅抚陕期间通过了实地考察而编纂的《关中胜迹图志》及《关中金石记》二书,对咸阳一带的古遗址、古建筑与其他古墓葬以及各种古代石刻记述很详细,至今在文物保护中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保护“昭陵六骏”,是民国初年本地文物保护中的一件大事。先是1914年,美国人卑斯博(BISSUY)申通北京琉璃厂“尊古斋”古董商黄鹤舫和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与陕西督军陆建章,通过交易,将昭陵祭坛上遗存的唐代著名石刻浮雕“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运到了美国。1918年,卑斯博再次来陕,与陕西督军陈树藩之父陈配岳交易,密谋将其余四骏运往美国。当其将四骏偷运至西安城北草滩的渭河边打成碎块装箱、企图由水路运

走时，被当地民众发觉，及时通告省垣各界，迫使陈树藩不得不下令将四骏运至西安，交省图书馆保存。

据纂于解放前夕的《咸阳县志稿·古迹古物篇》记载，咸阳原上的陵墓以前都有陵地和陵户。如汉高祖长陵“陵墙外余地三顷五十四亩四分，除陵户二名、地四十亩，实起租地三顷十四亩四分。”汉景帝阳陵“陵园外余地三顷九亩八分三厘，除陵户二名，地四十亩，实起租地二顷六十九亩九分三厘。”由此可知，当时帝陵的陵园内是不许耕种的，而每个陵园之外都有三顷以上的陵田，这些陵田除2名陵户各种20亩以给口食外，其余都是以出租的方式将地租出，然后以所收田租作维护陵园费用的。据前志所载，各帝陵依例均由各县“分祭”，如长陵“旧属泾阳分祭”，“文王陵”（实为秦惠文王公陵）“旧属咸阳分祭”。“分祭”疑即分管。由此可知，古代诸陵墓不仅各有2名陵户专司日常看管，还分由各县具体负责管理，且陵户的生活费用及分管县的管理经费亦均有固定的来源。这些办法作为一种管理措施，至今仍可借鉴。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设立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亦曾注意保护咸阳一带的文物古迹。据1934年12月27日南京《朝报》载，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滕固、黄文弼于当月受该会派遣，赴豫陕两省“视察盗掘古墓及古迹毁损”等情时，曾来咸阳、兴平诸县“视察周秦汉各代帝王功臣陵墓”，并与省府商讨过“护惜”事宜。又据1935年1月22日《西京日报》载，汉武帝茂陵“附近古迹、埋葬甚夥，尤以西汉石刻为最。南京考古会为保存古物起见，拟于今岁派员来陕，于茂陵筹设茂陵公园，俾资罗置珍藏。”据载，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已致函西京筹备委员会，该会委员长已“深表赞同，拟即函复前来筹设”。惜此方案后因种种缘故未能实施。

二、文物普查

建国以后，为了对文物古迹进行有效的保护，各地文化文物部门配合省文化文物部门，先后对各县（市）的文物进行了几次全面的普查。

1950年5月，各县按照陕西省文教厅下发的《西北历史文物调查表》及《西北古迹调查表》，对县境的主要文物进行了普遍调查，并逐一填报了调查表格。

1956年至1958年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首次组织实施文物普查，各县（市）都先后配合省普查队进行了第一次文物普查。这次普查，宣传了国

家文物政策法规，同时发现了一批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和石刻，征集了一批文物，采集了一些遗物，大体摸清了本地文物的底子，并为各县（市）培训了一支文物干部队伍，为文物保护工作打下了基础。

1980年，陕西省文物局组织对全省文物进行了又一次普查。本地文化文物部门密切配合，在调查中新发现各种类型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近现代史迹与石刻，同时还征集到了许多文物。

1988年4月至1989年4月，市文化文物部门按照陕西省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开展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普查，确认全市现有各类文物点4957处，其中古遗址1037处，古墓葬1135座，古建筑247处，石窟寺6处，石雕、碑碣2415件（组），近现代文物及其他遗存117处。这次普查，不仅推动了全市文物保护工作的广泛开展，同时进一步搞清了本地文物的基本情况，新发现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存，为制定文物保护规划和科学研究、考古发掘提供了可靠依据。

三、古建筑与石刻的维修、保护

咸阳一带的古建筑及石刻遗存极为丰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至解放前夕，大多数古建筑或倾或漏，残破不堪，而许多石刻珍品则被随意弃置，任其遭受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宣传国家的文物法令和政策，使不少古迹得到了妥善保护。1956年7月20日起，陕西省文管会开始维修茂陵古迹和邠县大佛寺。这是建国以后，人民政府第一次有计划地对本地的古建筑及石刻进行较大规模的维修、保护。1957年，陕西省文化局拨专款对咸阳县顺陵石刻、兴平县杨贵妃墓进行了整理修缮。同年，还整理维修了旬邑县泰塔，重新制作了石质塔刹。由于“大跃进”和1960—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影响，维修工作一度中断。1964年，人民政府又拨款对兴平县文庙大成殿进行了维修。1965年底，由省文化局拨款维修的长武县唐昭仁寺大殿竣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维修工作再次被迫中断。直到1971年，省文化局才拨款，对已经发生倾斜的顺陵石刻进行了维修加固。由于昭陵文管所的积极努力，70年代初期，省政府拨付专款，将昭陵陵园现存的神道碑全部移存所内，并兴建“昭陵碑林”，从而使二三十通唐代名碑得到了妥善保护。

本地对古建筑与石刻的维修、保护，主要是在80年代以后。1980年，省文物局开始拨款维修三原县城隍庙，直至1988年，累计拨款130多万元，

对城隍庙全部建筑进行了维修加固。1982年，彬县文教局拨款2万元对县城隍庙戏楼进行了维修。同年11月至1985年，省文物局陆续拨款9万元对永寿县武陵寺塔的塔身底部、塔檐、楼梯等进行了加固维修。1983年至1987年，省文物局先后拨款14.4万元，对彬县开元寺塔的塔檐、斗拱、平座栏杆及塔体裂缝等进行加固维修，并恢复了塔内的木楼梯。1984年，省文物局拨款加固了三原县龙桥护堤。同年11月，省文物局和市文化局决定再次扶正、加固顺陵石刻。自翌年7月10日至1986年2月28日，咸阳市园林建筑队对顺陵四座大型石刻的地基进行了全面加固，工程费用达43470元。1984年至1986年，省文物局先后拨款加固了三原县中王堡木塔的砖台基，增修了台基排水设施，翻修了所有屋面，补修并更换了部分糟朽的木构件和楼梯。1985年1月至1986年5月，省文物局拨款13万元整修礼泉县香积寺塔，除对塔身各层用铁箍加固，并补修塔檐、券门外，还加固了塔基及海漫、散水，恢复了塔内木楼梯和塔檐各角风铃。1986年10—11月，淳化县文化馆为唐金川湾石窟砌筑了保护墙，并在窟内顶柱，安装了钢筋门窗。1988年，省文物局拨款对渭城北杜千佛铁塔、三原孟店民居进行了维修保护。同年，又拨款4万元对泾阳县崇文塔进行了加固并重修了塔内砖梯。1988年至1990年，省文物局陆续拨款25万元，加固维修了泾阳县文庙大成殿、戟门及东西庑殿。1990年，省文物局拨款对兴平县文庙大成殿再次进行了全面维修。在古建筑与石刻的维修、保护工作中，各级政府文化文物部门配合省文化文物部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了维修、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三节 考古调查与发掘

一、考古调查

20世纪初期以后，海内外有不少学者曾来咸阳进行考古调查。1906年至1907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关野贞在调查洛阳龙门石窟后，即来咸阳一带对汉唐陵墓进行过调查。1907年，法国学者E·E·沙畹在调查中国古代石刻期间，首先来咸阳一带调查了汉唐陵墓石刻。1914年，法国V·色伽兰等人在中国从事文物调查时，亦首先来咸阳一带调查了秦汉陵墓。由中国学者对咸阳文物进行科学调查，始于1933年。是年，由徐炳昶率领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途经咸阳，在兴平县进行了秦汉遗址的调查。

1942年至1943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馆筹备处等单位联合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在甘肃境内考察结束后，特意来咸阳一带调查了汉唐陵墓。194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武功、栒邑、邠县等地，对周族都邑邠、豳进行了勘察。这是第一次对本地先周文化进行的科学调查。

建国后，各级文化文物管理部门和文物考古研究单位为了摸清本地文物分布情况，更好地实施文物保护和开展科学研究，在大规模普查的同时，组织进行了多次专项考古调查。

1953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着手调查关中唐十八陵，其间，对咸阳一带的昭陵、乾陵和建陵进行过重点勘察。1962年，省文管会开始勘察汉武帝茂陵，随后陆续对“五陵原”的西汉诸陵进行了勘察。通过这两次重点勘察，对本地汉唐陵墓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

1959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考古队与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考古研究所的部分考古工作者，以及地、县文化文物部门一道，有计划的对本地的邠县、长武、栒邑、永寿、乾县、醴泉、咸阳、兴平、武功等县（市）进行了考古调查，其间发现了100多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周文化遗址。在此基础上，中央、省、地文物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对本地渭水流域、泾河流域及武功等地的新石器遗址和周遗址进行了专门调查。这些调查对了解本地史前文化和周文化的分布情况及进行考古发掘提供了重要资料。

对秦都咸阳遗址的调查，虽然50年代即已开始，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始于1961年。是年下半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渭水队在地方文化文物部门配合下，于咸阳市窑店乡的长兴、滩毛、店上、刘家沟、姬家道、牛羊村等地点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首次发现了秦咸阳的有关建筑遗址，并在长陵火车站北沙坑中发现了千余斤铜器和铁器，其中有完整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1件。此后，又经过多次调查，从而对秦都咸阳的概貌有了基本的了解，为后来的深入勘察和考古发掘打下了基础。

1964年5月，陕西省文管会对秦郑国渠进行了初步调查。之后，陕西省博物馆和文管会又联合对郑国渠和唐昭陵进行了调查。70年代和80年代，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的学者及本地文物工作者还分别对秦直道、汉成国渠、宋元安仁瓷窑等重要遗址进行了科学调查。所有这些调查，为考古发掘及科学研究等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

二、考古发掘

1953年3月，负责西北地区文物清理发掘工作的西北工程地区文物清理队成立后，即于当月中旬在咸阳县底张湾清理隋唐墓葬15座，出土文物数千件。同时，还发掘清理了一批北周墓葬。这是建国后咸阳地区最早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咸阳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自1956年至1958年的第一次文物普查之后，始全面展开。

1959年至1962年，陕西省考古所泾水队在长武县下孟村遗址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下孟村遗址的发掘，不仅提供了泾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资料，而且为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系列提供了地层证据，从而引起了全国考古界的重视。

1960年8月4日—1962年4月14日，陕西省文管会乾县考古队对乾陵陪葬墓“永泰公主墓”进行了发掘。共出土壁画、陶俑（三彩）、石刻、陶瓷器等随葬文物1300余件。

1961年11月—1962年8月，陕西省考古所和咸阳市文化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顺陵西南隅的唐“苏君”墓进行了清理发掘。该墓规模较大，有7个天井，出土各类陶俑3520件、壁画14幅。

1964年冬，陕西省文管会在三原县文化馆协助下，清理发掘了三原县双盛村东隋李和墓。墓中不少文物和图案均有北朝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这座墓是建国以来发掘的隋墓中墓葬结构较完整的一座。

1965年8月，陕西省考古所咸阳考古队和咸阳市博物馆联合在咸阳杨家湾清理汉高祖长陵附近两座陪葬墓的兵马俑从葬坑11座，出土骑兵俑、步兵俑、乐舞杂役俑等共3000余件。这批彩绘俑群表现了汉初军阵的真实形象，为当时考古界一重大发现。

1970—1976年，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博物馆和咸阳市博物馆联合在咸阳杨家湾附近发掘推测为长陵陪葬墓的四号、五号墓。从两墓残存的银缕玉衣片和兵马俑陪葬坑以及有关文献记载推测，这两座墓疑即汉初名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葬地。

1970年10月22日—1972年1月18日，陕西省博物馆和文管会发掘了礼泉县唐昭陵陪葬墓尉迟敬德基。随后，省文管会和昭陵文管所相继发掘了张士贵、阿史那忠等昭陵陪葬墓，昭陵文管所清理发掘了临川公主、越王李贞、郑仁泰、李承乾及安元寿夫妇等昭陵陪葬墓。出土了大量陶俑、壁画及

石刻等重要文物。

1971年—1972年，陕西省文管会发掘了乾陵附近的章怀太子李贤墓和懿德太子李重润墓。这两座陪葬墓共出土随葬品 1600 余件，其丰富多彩的墓葬壁画和石椁线刻尤为世人所称赞。

1972年3月—5月，陕西省博物馆在咸阳汉阳陵西北 1.5 公里处发掘清理西汉刑徒墓地，面积约 8 万平方米，共发掘出刑徒墓 29 座，出土骨架 35 副，同时出土铁钳、铁钎等汉代刑具。

1973年3月—8月，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在三原县文化馆协助下，清理发掘了唐高祖从弟李寿墓，该墓出土的壁画、石刻，是研究初唐的农业、典章制度和绘画乐舞艺术的重要资料。

1974年3月—1975年11月，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咸阳考古工作站与咸阳市文物部门联合发掘秦都咸阳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继之，1979年3月—9月发掘三号宫殿遗址，1980年10月—1982年9月发掘二号宫殿遗址。秦都咸阳一、二、三号宫殿遗址的发掘，对研究秦都咸阳布局及战国至秦代的建筑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三号宫殿遗址出土的壁画，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宫殿壁画。

1975年和1977年，秦都咸阳考古工作在秦都咸阳以西（今窑店乡黄家沟为中心）东西长 4 公里、南北宽 3 公里的地域内，清理发掘战国墓葬 80 座，对研究关中地区战国墓葬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

1978年夏，咸阳地区文管会先后两次清理发掘了旬邑县城关镇安仁古瓷窑遗址。发掘面积 1261 平方米，清理出瓷窑 10 座，出土遗物（含瓷片）89101 件，还探出逾 1000 平方米的堆料与晾坯场遗址。从发掘所获遗物证明，安仁窑为宋代至元代的一座耀州窑系的瓷窑遗址，为了解耀州窑的生产地域提供了新的资料。

1979年—198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发掘了武功县漆水河西岸的浒西庄新石器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随之，又组织发掘了与浒西庄隔河相望的赵家来遗址。在赵家来遗址发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在下、客省庄二期文化在上的地层关系，对了解关中西部的龙山文化早期及龙山文化晚期的相对年代提供了新资料。

198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发掘了长武县碾子坡周文化遗址，其早期年代稍早于周太王古公亶父时期，晚期约略属于周人迁岐前夕或稍晚的先周时期。1981—1983年，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发掘了武功县漆水河东岸的

郑家坡周文化遗址。郑家坡遗址的早、中、晚三期是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两处周文化遗址的发掘以及对其所作的初步研究，对于探讨先周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1980年8月，在咸阳市东郊地质部第三普查大队基建工地发现古墓51座，其中约为西汉中晚期和新莽时期的34、26、36号空心砖墓，出土了多种制作精美的四神图案的空心画像砖。1983年5月—1984年2月，咸阳博物馆清理发掘了咸阳龚家湾一号汉墓。此墓约葬于新莽时期，是一座砖石结构、规模较大的积石积沙墓。1989年—1990年，咸阳市文管会在市北郊陕西省财经学校内清理发掘了一座有封土的砖室积石积沙墓，其中一块墓砖上书有“地皇二年”字样。这些空心画像砖墓和积石积沙墓基本都处于汉陵陪葬区，从而为研究汉代贵族墓葬提供了重要资料。

1981年5月，兴平县西吴乡豆马村农民在茂陵一号冢南发现了一号坑，咸阳地区文管会和茂陵博物馆对这一从葬坑进行了发掘，出土文物230多件，其中以鎏金铜马及鎏金竹节熏炉最为著名。这些自铭为“阳信家”遗物的发现，对研究西汉时期金属冶炼、公私手工业、度量衡制度、工艺技术乃至器物定名，都有一定的借鉴。

1984年12月—1985年1月，咸阳市文管会和咸阳博物馆清理发掘了咸阳胡家沟附近的侯义墓。此墓为少见的有明确记年（大统十年）的西魏墓葬之一。

1986年，陕西省考古所发掘了位于秦都区钓台乡沙河古河道上的两座古桥遗址。同时在附近还出土了大型铜饰件及多种陶建筑材料。此桥的发现，对研究古代交通、桥梁建筑及河流变迁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1988—1990年，陕西省考古所配合咸阳国际机场建设，陆续发掘了10余座北周墓葬，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叱罗协、若干云、独孤藏、尉迟运、王德衡、王士良等墓。1990年4月，咸阳市文管会在其附近坡刘村清理发掘了北周拓跋虎墓。从出土墓志看，这些墓主大都属于“使持节”、“上柱国”、“大将军”、“大都督”之列，《周书》、《北史》多为其列传。其中几座保存完好、未经盗扰的墓葬，对研究北周的历史，尤其是鲜卑族统治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艺术与民族关系以及北周文化考古断代研究、埋葬习俗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0年9月，昭陵博物馆发掘了昭陵东侧依山为陵的韦贵妃墓，出土文物174件，壁画72幅，墓志1方。在此之前，昭陵博物馆还于1986年8月—

11月清理发掘了紧靠昭陵的长乐公主墓，除出土100余件遗物外，还出土了部分壁画和1方墓志。此二墓之主均为唐太宗至亲。二墓的发掘，加深了对昭陵陪葬墓的了解。

1990年，为配合修筑西安通往咸阳国际机场的高等级专用公路，陕西省考古所汉陵考古队对阳陵南区路基下压的从葬坑进行了清理发掘。已清理从葬坑8个，出土各种遗物达数千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皇家生活的现实，为研究当时的物质文明提供了珍贵资料。

1990年冬，咸阳市文管会在市东郊任家嘴长庆油田基建工地清理发掘了235座春秋战国墓葬，出土文物1000余件。这些墓均为小型土圜竖穴墓，且均为屈肢葬。墓葬分布密集，打破关系复杂，为关中秦墓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四节 博物馆

1960年，咸阳市着手筹建博物馆。1961年11月20日，陕西省文化局通知，决定筹建咸阳市博物馆。1962年春节，咸阳市博物馆正式成立，并举办“中国通史展览”，正式对外展出，成为当时全国第一个县（市）级博物馆。70年代中后期开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咸阳地区的博物馆建设迅速发展。1976年，乾陵博物馆在原乾陵文管所基础上成立。1979年，昭陵博物馆和茂陵博物馆亦均在原文管所基础上成立。蜚声中外的乾陵、昭陵、茂陵3个博物馆与同时建立的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一起，一度成了陕西文物观光的热点，进一步推动了本地文博事业的发展。1984年旬邑县博物馆成立，1985年三原县博物馆成立，1986年长武县博物馆成立，1989年兴平县博物馆成立。与此同时，1980年陕西省中医学院成立了陕西医史博物馆，1987年西北农业大学成立了收藏有50多万种昆虫标本的西北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1985年，还在旬邑县唐家民居旧址改建了当时全省惟一的唐家民俗博物馆。这些各级各类博物馆的成立，是咸阳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

截至1990年底，全市共有各类博物馆11座。其中历史类博物馆9座，民俗类博物馆1座，自然科学类博物馆1座。博物馆数量之多，居全省各城市之首。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为咸阳博物馆、茂陵博物馆、昭陵博物馆、乾陵博物馆以及三原县博物馆。

咸阳博物馆 馆址在咸阳市中山街中段明代孔庙内。该馆是以收藏和展览秦汉历史文物为主的综合性历史博物馆。1960年筹建，1962年建成开放。

初名咸阳市博物馆，1984年改属地级市后，更名咸阳博物馆。馆藏文物藏品1.2万余件。展室面积约1600平方米。基本陈列是“秦汉历史文物陈列”。共分五个展室。第一、二、三展室主要展出秦孝公至秦始皇时期的各种文物，如反映商鞅变法后生产力有较大发展的铁铧、铁锄、铁铲等铁质生产工具，秦进行统一战争的戈、矛、剑、戟等铜兵器，秦统一度量衡的铜诏版、铜权、铜量和带有计量铭文的安邑下官钟、私官鼎、三斗钟等物证，还有各种陶器、丝织品和错金银灯座、夔龙纹镜及提梁壶等铜器，其中修武府温杯反映了秦统一文字为小篆的事实。这三个展室集中展出的秦咸阳宫殿建筑遗址出土的建筑材料和其他遗物，反映了秦都咸阳宫殿建筑的宏大规模和繁荣盛况。第四展室主要是西汉文物，展品有铁铧、铁锄、铁镰等生产工具，陶粮仓及各种陶动物模型等随葬器，瓦当、陶水管道及空心砖等建筑材料，金银玉器及汉“半两”钱石范、铜范与汉“半两”钱、“五铢”钱等。这些不可多得的珍品多出土于西汉帝陵附近，充分反映了西汉时期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第五展室是杨家湾汉墓兵马俑陈列专室，按10个俑坑的出土顺序，展出彩绘陶俑、陶骑马俑近3000个，为研究中国西汉初期军事编制、陶塑艺术、埋葬制度及人物服饰等，提供了重要文物资料。

1963年，咸阳博物馆创建伊始，参加全国16省市文物工作会议的国家文化部、文物局的领导在来馆视察时就提出：“希望咸阳博物馆办成一个研究秦汉物质文化的中心，在全国县市博物馆中独树一帜。”当时的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明确提出：洛阳、咸阳要办成全国中型博物馆。建馆20多年来，咸阳博物馆一直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茂陵博物馆 馆址在兴平县汉武帝茂陵东1公里处的西汉名将霍去病墓园。早在1952年，该处就接待过国际友人的参观。1979年在原茂陵文管所基础上建馆，馆藏文物近4000件，其中一、二级文物400余件。主要收藏和陈列茂陵陵区遗存及出土的西汉文物，其中有不少属稀世瑰宝。馆内环霍去病墓两侧，有东、西石刻廊，陈列着霍去病墓前的石刻。这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大型石刻中时间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组艺术珍品。霍去病墓前两侧，有东、西两个陈列室，陈列着茂陵及陪葬墓附近发现的西汉珍贵文物，其中1981年在陵东一从葬坑中发现的“阳信家”鎏金铜马、鎏金铜竹节熏炉等230余件文物，为罕见的艺术珍品。该馆内的霍去病墓为茂陵陪葬墓，墓冢象祁连山，系用天然石块垒成，墓前两侧有曲阶盘环，可登墓顶。馆内外环境优美，馆舍均为仿古建筑，古朴、大方、美观。加以服务质量上乘，一年

四季游客不断。平均每年有观众40万人次，其中外宾1万多人次。

昭陵博物馆 馆址在礼泉县唐太宗昭陵南5公里处的唐代名臣李勣墓园。1979年在原昭陵文管所基础上建馆。主要收藏和陈列昭陵陵园地上、地下遗存的各种珍贵文物。展出文物分四个展室。北区东、西两个展室陈列昭陵陪葬墓及唐太宗祠石碑40余通，新出土墓志20余方，称为“昭陵碑林”。其中的神道碑和墓志多为初唐时名家所书，如欧阳询书温彦博碑，褚遂良书房玄龄碑，王知敬书李靖碑等，不仅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而且保存了大量重要的历史资料，深受中外学术界和艺术界的重视。南区西陈列室展出尉迟敬德等20余座昭陵陪葬墓出土的大批陶俑和器物，主要为具有初唐风格的彩绘陶俑、彩绘贴金釉陶俑和唐三彩，尤以彩绘跃马俑、彩绘女骑俑、彩绘骑马俑等最为精美。其中李勣墓出土的三梁进德冠是首次发现的唐冠实物，长乐公主墓出土的辟雍砚更是稀世珍品。南区东展室是昭陵陪葬墓出土的壁画陈列。昭陵陪葬墓壁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表现贵族生活的人物画为主，技法上以线条与着色并重。其中以杨恭仁墓的七女侍图、长乐公主墓的仪卫图和女侍图、李勣墓的乐舞图、阿史那忠墓的牛车图和男装女侍图、李震墓的嬉戏图和戏鸭图、段苻璧墓的持扇仕女图和给使图等，最为典型。该馆北部为李勣墓冢，冢由三个相连的倒“品”字构成，系依汉卫、霍故事，一像阴山，一像铁山，一象乌德鞬山，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冢前有翁仲一对，东侧有石羊3只，西侧有石虎3只。前方中央有一丰碑，系唐高宗李治为李勣撰书的神道碑。由冢两侧拾阶而上，可登冢顶，以四顾陵园，北眺昭陵。

乾陵博物馆 馆址在乾县唐高宗与武则天葬地乾陵东南永泰公主墓园。1976年在乾陵文管所基础上建馆。乾陵博物馆有经科学发掘的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章怀太子李贤墓及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等三座墓葬，还有陈列这三座墓葬及其他乾陵陪葬墓出土文物的两个陈列室。三座开放的墓葬均保持了发掘前原状。永泰公主墓石椁线刻画中的持壶侍女图、披巾侍女图、戏鸟赏花仕女图，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马球图、客使图、观鸟捕蝉图、狩猎出行图以及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阙楼图、内侍图、架鹰图、驯豹图与持扇宫女图等均为现存唐代石刻和绘画中不可多得的杰作，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馆内陈列的乾陵陪葬墓出土文物以陶俑为最多，陶俑中有镇墓俑、文士俑、武士俑、乐伎俑、胡人骑俑、男女骑马俑及各种动物俑等，特别是三彩马和三彩俑，在造型和釉色等方面，都反映了唐代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陈列的

金、玉、铜、铁等随葬品造型精巧，雕镂细致，花饰华美大方，件件堪称珍品。馆藏文物 4300 余件，经常轮换展出。还有乾陵陵园游览区供人游览。乾陵依山修建，气势雄伟，现遗存有阙楼遗迹和司马道两侧的石柱、翁仲、石马等石刻百余件，其中的“七节碑”和“无字碑”等丰碑巨刻最为著名。馆址和游览区紧靠西（安）兰（州）公路，交通便利，建馆以来即成为陕西乃至全国的旅游热点。

三原县博物馆 馆址位于三原县城隍庙。1985 年在三原县文管所基础上建馆。该馆所在地三原县城隍庙始建于明洪武八年（1375），距今已 600 余年。建国以来，经过文物部门多次拨款修缮，基本保持了原貌。现为省内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整体建筑群之一。城隍庙坐北朝南，由南向北，沿中轴线，依次为：砖浮雕照壁、铸铁旗杆、木牌楼、重檐歇山顶大门、砖砌八字屏墙、东西两廊、二道牌楼、布满浮雕的棂星门、乐楼、木牌坊、钟鼓楼、卷棚顶拜殿、歇山顶大殿及重檐歇山顶寝殿。大殿与寝殿为“勾连搭式”，均面阔 5 间、进深 4 间。梁架为彻上明造。整个院内殿庑周环，曲屋连构，雕梁画栋，朱门粉壁，展现了明清建筑的神韵和风采。该馆除可供游人观赏的古建筑外，还收藏了三原县历年出土及遗存、传世的 3000 多件珍贵文物，其中有于右任书法真迹及 100 多通碑刻，尤以岳飞手书前、后《出师表》石刻为世所称。

第五节 文物收藏与陈列展览

文物收藏 民间自古即有收藏习惯。秦咸阳遗址内的长陵火车站附近一次出土“齐法化”及“蚁鼻钱”等铜币窖藏，有战国时期各国货币达 15 种之多。清道光初年，咸阳北原贾村人程一敬（号杏牧）专事收藏，家中凡金石书画，珍本秘籍，皮架盈壁。道光四年（1825），闻“苟氏兰亭”刻石于礼泉出土，不惜重金赚得，特为筑“宝兰山房”以藏之。惜毁于清末战乱。民国时期，三原于右任曾以巨资收购各地出土的北魏及隋代墓志 387 方，其中有七对夫妇墓志，遂名为“鸳鸯七志斋藏石”。现藏西安碑林。

除民间收藏外，民国时期，一些县的民教馆、图书馆或县署、学校曾收藏过少量文物，如礼泉县藏有《常乐郡夫人贺若氏墓志》及《程知节碑》，邠县藏有《唐姜嫄公刘新庙碑》，咸阳县凤凰台藏有北周造像碑、隋盘龙经幢、唐顺陵残碑及《寂照和上碑》，三原县民治小学藏有于右任收藏的数十块“高昌墓志”及 47 张“武梁祠画像”拓本。解放后，这些文物都陆续转归

文化文物部门，得以妥善保存。

新中国成立后，本地各级人民政府都重视文物的保护和收藏。1951年6月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土改反霸斗争中必须注意保护文物，从现存文书档案看，当时各县有关部门都按此要求指定了专门干部负责文物调查和征集工作。1953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专门发出文件，指示在基本建设中要注意保护文物。由于文物保护法规 and 政策的颁布实施，加以文化文物部门的重视，使分散在社会上和个人手中的流散文物得到有效征集和收藏。以原咸阳市为例，建国以来，征集文物达12800余件，其中征集的玉奔马、马蹄金、陈爰金饼、安邑下官锤等珍贵文物，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

在文物征集、收藏工作中，本地文博单位除主要动员群众自觉交献文物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访问，对基本建设过程中出土文物及时进行征集或收缴。对于自愿交献文物者，政府部门和文博单位都根据文物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建国以来，本地各文博单位累计征集文物达数万件（组），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陈列展览 建国以后，本地最早的一次文物展览，是1955年陕西省咸阳文化馆举办的“秦汉唐各个时代的文物展览”，主要展品来自凤凰台保存的文物。

1962年初，咸阳市博物馆筹建时，陕西省博物馆馆长武伯纶来馆辅导，并派专业人员帮助设计陈列方案，参与陈列。是年春节期间，“中国通史展览”（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在该馆正式对外展出。展品除凤凰台原有的一部分文物及董子平等知名人士捐献的一部分文物外，主要为建国后咸阳文化馆征集的文物。此为本地由博物馆举办的首次陈列展览。

60年代初期，随着乾陵永泰公主墓发掘工作的进展，陕西省有关部门即确定就地保护，并陆续拨款26770元，于1962年下半年进行了修整。由于该墓在国内影响很大，据不完全统计，仅1962年修整期间，就接待来自中央、西北局、本省、外省的参观者达75次、2000余人。此后，永泰公主墓即开始不定期接待来访参观。这是本地最早举办的“遗址”性陈列展览。

70年代初期以后，随着乾陵、昭陵及茂陵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进行，乾陵文管所、昭陵文管所和茂陵文管所陆续新建了文物陈列室并举办了各具特色的专题陈列展览。改革开放以后，咸阳、茂陵、昭陵、乾陵等博物馆在不断丰富、完善和调整基本陈列的同时，还各自举办了不少临时、辅助陈列。

如咸阳博物馆 1978 年与兴平县联合举办了“出土文物汇报展览”，1980 年举办了“古字画展览”，1985 年举办了“珍贵文物展览”，1988 年与渭城区联合举办了“文物成果汇报展”。这些不断更新的基本陈列和异彩纷呈的临时、辅助陈列相辅相成，较好地反映了各馆的文物特色，吸引了不少的国内外观光者。以咸阳博物馆为例，1981 年至 1990 年 10 年间，共接待内宾 586278 人次，外宾 110855 人次，总计 697133 人次，平均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近 7 万人次。而历来参观人数最多的茂陵、乾陵、昭陵三个博物馆中，除昭陵博物馆 80 年代后期因交通不便略有减少外，茂陵、乾陵博物馆平均每年接待游客都超过几十万人次。据不完全统计，咸阳市各文博单位 1981 年底以前年参观人数仅为 40 多万人次，到 1990 年底，已超过 200 万人次。

70 年代以后，本地许多文物珍品陆续被选送参加对外展出。其中咸阳博物馆收藏的秦都咸阳与西汉帝陵出土文物以及茂陵、昭陵、乾陵博物馆收藏的汉唐陵墓出土文物，曾多次赴欧、美和日本、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展出。这些珍贵文物出国展览，受到了各国各界人士的欢迎，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在本地的文物展览中，尤以 1990 年亚洲运动会期间首次在北京定点举办的《秦始皇咸阳宫珍贵文物大观》展览影响最大，最为知名。这次展览不仅展示了秦都咸阳的物质文明，宣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咸阳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大大促进了咸阳的改革开放事业。

第六节 科学研究

秦都咸阳研究 秦都咸阳的研究，在 60 年代以前一直是个薄弱环节。60 年代初，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渭水队在咸阳市文物部门的配合下，经过广泛调查和试掘，在咸阳市窑店乡牛羊村北原发现了秦咸阳宫殿建筑遗址，并在长陵火车站附近的滩毛村一带发现冶铜、制陶作坊遗址，于是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关注。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期，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和咸阳文物部门先后对一、三、二号宫殿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为秦都咸阳的研究陆续提供了许多新鲜资料。陈国英所写《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5、6 期）是对 60 年代以来秦都咸阳考古成果的全面回顾和概括。

尽管秦都咸阳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较大收获，但由于地面上已找不到城址踪迹，发掘得到的材料又未能提供可信的证据，故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王丕忠在《秦咸阳宫位置的推测及其他问题》（《中国

史研究》1982年第4期)一文中,明确表示不同意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第11期)以及刘庆柱在《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一文中(《文物》1976年第11期)所推定的咸阳宫遗址范围。他认为第一号宫殿遗址是咸阳城旁的宫观,并非咸阳宫。其理由是秦咸阳宫与汉长乐宫(即秦兴乐宫)隔渭水南北相望,汉代渭水在长安城北3华里,说明渭水向北移动8华里,因而咸阳宫以及城址都被冲坏。杨宽在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一书中认为王丕忠的论断是正确的。杨宽从成都故城和秦始皇陵园推测咸阳布局,认为“咸阳的布局 and 当时中原大国一样。采用西‘城’和东‘郭’相连接的方式、‘城’和‘郭’都是坐西朝东的,所以冀阙也该造在东门。”依照他的推测,秦咸阳宫在西边小城之内,不在城北原上;小城以东连结大郭,大郭东边才是冀阙。这亦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学理在其《秦都咸阳》一书中提出的第一号宫殿遗址是秦都咸阳“西阙基址”的看法不一。王学理《秦都咸阳》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运用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典籍文献,对秦都咸阳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可以看做是近年秦都咸阳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

西汉帝陵研究 清乾隆年间毕沅抚陕时,于西汉诸陵前立碑,其中错误不少。《陕西通志》与《咸阳县志》的记载亦有不少错误。近几十年来,陈子怡的《西京访古丛稿·咸阳原上汉帝诸陵考》虽有不妥与错误之处,却为学术界所采用。例如,旧说误汉元帝渭陵为昭帝平陵,又误昭帝平陵和上官皇后陵为哀帝义陵和平帝康陵,而误哀帝义陵为隋恭帝陵,误平帝康陵为元帝渭陵、王皇后陵为周成王陵。陈子怡误景帝阳陵为高祖长陵,又误一自然山头(即俗所谓“周赧王城”)为景帝阳陵。毕沅则误景帝阳陵东北的王皇后陵为惠帝安陵。长陵二冢中吕后陵居东,高祖陵居西,而毕沅颠倒了二陵名位。旧说还误秦文王公陵和秦武王永陵为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或误作汉陵陪葬墓。7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经过科学考察和认真研究,对上述错误一一作了纠正,明确认定西汉诸陵由西向东依次为:茂陵—平陵—延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长陵—阳陵,从而为西汉诸陵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60年代中期以来,长陵附近杨家湾汉墓及其随葬坑3000件彩绘陶俑的出土,阳陵附近大型从葬坑及其中大批陶俑的出土,茂陵附近“阳信家”鎏金铜马等230余件珍贵文物的出土,以及考古工作者对西汉诸陵的大量科学

勘查，为研究西汉帝陵的建筑格局与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刘庆柱、李毓芳编著的《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对包括咸阳北原上西汉九陵在内的所有西汉帝陵进行了综述和研究，特别是对西汉帝陵的分布、形制及陵园制度的研究，对西汉帝陵寝园、陵庙、陵邑及帝陵行政机构的研究，以及对西汉帝陵陪葬墓及随葬坑的研究，都较同类著述更为全面、系统。可以说是建国以来西汉帝陵研究中的集大成之作。王枫林的《咸阳知古录》（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第1版）中，凝结了他一生对咸阳文物的辛劳和思考，其间保存了不少真知灼见和珍贵资料，亦是研究西汉帝陵文物中不可或缺的著作。

唐代陵墓研究 唐代十八陵，在今咸阳市境的即有九陵，而最著名的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与武后合葬墓乾陵以及肃宗建陵，均在其中。建国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多次考古调查，对这些陵墓的历史和现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贺梓城的《“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3期，1980年）在记述这些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唐十八陵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此后刘庆柱、李毓芳又对唐十八陵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撰写了《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集刊》第5期，1987年），结合历史文献，对各个唐陵的陵墓位置、陵园制度、石刻遗存以及陪葬墓等，逐一进行了考察研究，并附了详细的图表。《报告》在对十八陵进行综合研究的同时，还将唐陵与汉陵加以比较，揭示了唐陵与汉陵不同的设计思想，从而加深了人们对唐代物质文化以及唐陵在中国帝陵制度中承上启下作用的了解。这无疑触及到了唐代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60年代初期，陕西省和有关县、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乾陵永泰公主墓和顺陵东南隅的“唐君”墓。70年代，又陆续发掘了昭陵的尉迟敬德、李勣、张士贵、郑仁泰、阿史那忠等10余座陪葬墓和乾陵的章怀、懿德二太子墓以及献陵附近的高祖从弟李寿墓。这些大中型墓葬提供的极为丰富的资料，不仅推动了学术界对唐代墓葬形制与埋葬制度的进一步研究，也推动了人们对唐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在这场研究热潮中，发表文章最多而又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这些大中型墓葬中出土的数百幅多姿多彩的唐墓壁画的研究。王仁波、何修龄、单晔所写《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文博》1984年创刊号、第2期）一文，乾陵、昭陵、献陵的部分陪葬墓出土的壁画，“为研究唐代历史、绘画史、各种制度（仪卫、舆服、内官、营缮）、社会生活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该文从唐墓壁画的制作

方法、题材演变与分期以及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汉唐陵墓石刻研究 咸阳市境的汉代陵墓石刻主要是茂陵霍去病墓一处。近代对这处石刻的科学研究可上溯至1934年。是年，考古学家滕固来陕调查兴平茂陵石刻，并在《金陵学报》第2期发表了《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的试察》一文。此后，对茂陵石刻进行介绍和研究的文章不少，比较有新意的当推何汉南的《霍去病冢及石刻》（《文博》1988年第2期）。该文不同意霍去病墓前的各种动物石雕是用作装饰的习惯说法，而认为“它是随葬制度的一种新情况、新形式、新创造。”“正像霍光给武帝陵所埋的那些‘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之类一样，只是没有武帝那么多，把活的生物改用石刻象生代替罢了。”他进而指出，除“马踏匈奴”像外，“为什么那些能够立的、跑的象生，都雕成睡的、卧的、爬的或挣扎的姿态，就是因为这些石刻不是装饰艺术品，而是象征性的生物埋藏时的状态。”

相对来说，金石学家对唐代陵墓碑石的研究要比汉陵早得多。清代初年，福建人林侗赴昭陵实地调查，著《唐昭陵石迹考略》。此后，专门研究昭陵诸碑的著述又有张昭《昭陵六骏赞辩》、刘喜海《昭陵复古录》、孙三锡《昭陵碑考》、罗振玉《昭陵碑录》和《昭陵碑录补》等。张沛编著《昭陵碑石》一书（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共收录唐代碑石43通、墓志46方、其它唐代刻石14种，各石均有拓本、录文，大都附有考释。堪称是对昭陵碑石一次全面、系统的清理。对于唐代陵墓石刻，刘庆柱、李毓芳的《陕西唐陵调查》逐一进行了记述，并从石刻组合的变化与雕刻艺术的差异，对唐代陵墓石刻作了分期，在唐代陵墓石刻研究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七节 文物保护单位

建国以来，国务院公布的咸阳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3批12处，名单见表5-3：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

表5-3

名 称	时 代	所在地	备 注
茂陵	汉	兴平县	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公布
霍去病墓	汉	兴平县	国务院1961年3月4日公布

续表 5-3

名 称	时 代	所在地	备 注
昭陵	唐	礼泉县	国务院 1961 年 3 月 4 日公布
乾陵	唐	乾 县	国务院 1961 年 3 月 4 日公布
顺陵	唐	渭城区	国务院 1961 年 3 月 4 日公布
昭仁寺大殿	唐	长武县	国务院 1988 年 1 月 13 日公布
秦咸阳城遗址	秦	渭城区	国务院 1988 年 1 月 13 日公布
长陵	汉	渭城区	国务院 1988 年 1 月 13 日公布
大佛寺石窟	唐	彬 县	国务院 1988 年 1 月 13 日公布
郑国渠首遗址	秦	泾阳县	国务院 1994 年 12 月 25 日公布
甘泉宫遗址	秦、汉	淳化县	国务院 1994 年 12 月 25 日公布
秦陵	隋	杨陵区	国务院 1994 年 12 月 25 日公布

1956 年 8 月 6 日和 1957 年 8 月 31 日, 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先后公布了两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来, 这两次公布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的被提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这种情况, 陕西省人民政府在对全省文物进行调查的基础上, 对原有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调整, 又增加了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 年 4 月 20 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对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保护范围统一进行公布。咸阳市现有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3 处, 名单见表 5-4:

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

表 5-4

名 称	时 代	所在地	名 称	时 代	所在地
沙河古桥遗址	汉	秦都区	端陵	唐	三原县
圪塔庙遗址	新石器	杨陵区	献陵	唐	三原县
坎家底遗址	新石器	杨陵区	三原城隍庙	明	三原县
平陵	汉	秦都区	中王堡木塔	明	三原县
刘古愚墓	清	秦都区	古龙桥	明	三原县

续表 5-4

名 称	时 代	所在地	名 称	时 代	所在地
延陵	汉	渭城区	孟店民宅	清	三原县
阳陵	汉	渭城区	东里花园	明清	三原县
康陵	汉	渭城区	西梁家遗址	周	淳化县
义陵	汉	渭城区	勾弋夫人墓	汉	淳化县
安陵	汉	渭城区	安仁瓷窑遗址	宋	旬邑县
李昫墓	北周	渭城区	秦塔	北宋	旬邑县
周陵	周	渭城区	唐家民宅	明清	旬邑县
渭陵	汉	渭城区	马家河石窟寺	五代	旬邑县
凤凰台	明	渭城区	安金藏墓	唐	永寿县
千佛铁塔	明	渭城区	长孙无忌墓	唐	永寿县
杨贵妃墓	唐	兴平县	娄敬墓	汉	永寿县
兴平北塔	唐	兴平县	陆贾墓	汉	永寿县
文庙大成殿	明	兴平县	武陵寺塔	宋	永寿县
池阳宫遗址	秦汉	三原县	建陵	唐	礼泉县
邵家河二号遗址	新石器至先周	三原县	香积寺塔	宋	礼泉县
樊家河二号遗址	新石器	三原县	金龟寺普通塔	清	礼泉县
庄陵	唐	三原县	郑家坡遗址	新石器至周	武功县
王征墓	明	三原县	香尧遗址	新石器至周	武功县
永康陵	唐	三原县	史家遗址	新石器至周	武功县
马理墓	明	三原县	王烧台遗址	新石器至周	武功县
姜嫄墓	新石器	武功县	苏武墓	汉	武功县
隋炀帝陵	隋	武功县	报本寺塔	宋	武功县

续表 5-4

名 称	时 代	所在地	名 称	时 代	所在地
武功城隍庙	明	武功县	李仪祉墓	民国	泾阳县
贞陵	唐	泾阳县	崇文塔	明	泾阳县
崇陵	唐	泾阳县	安吴青训班旧址	现代	泾阳县
泾阳文庙	清	泾阳县	梁山宫遗址	秦	乾 县
秦甘泉宫遗址	秦	乾 县	公孙贺墓	汉	彬 县
靖陵	唐	乾 县	公刘墓	先周	彬 县
苻坚墓	前秦	彬 县	将台山遗址	新石器	长武县
开元寺塔	宋	彬 县	拜家嘴遗址	新石器至周	长武县
碾子坡遗址	周	长武县	牛弘墓	隋	长武县
董家坪遗址	新石器	长武县			

第六编

卫生

第一章 卫生防疫

历代医家都很重视预防疾病，但受主客观条件制约，民间预防手段还比较落后。在许多情况下，一遇瘟疫，普通百姓往往束手无策。《重修泾阳县志》载：唐德宗“兴元元年（784）春，大旱，无麦苗，井泉竭，疫死者众。”《重修咸阳县志》载：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三至七月，不雨，疫行，死者甚众，知县宋国相舍饭施药救之。十五、十六年，民病疫多死，四十年复大疫。”《乾县新志》载：清“同治元年（1862）飞蝗蔽天，食禾苗殆尽。二年十二月大雪，人多冻死。三年，鼠兔食田苗几尽。秋，城内霍乱大作，死者数千人。”特别是1932年夏秋，陕西霍乱大流行，仅据淳化、三原、兴平、户县、乾县5县统计共发病16908例，死亡10189例。《乾县新志》记载“四境死者以万计”。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卫生防疫工作，地、县（市）先后成立了卫生防疫站。各乡（镇）卫生院逐步健全了防疫保健机构，各村有防疫保健人员，城市街道及工矿企业亦建立了初级卫生保健组织。至1969年，市境已有比较完整的卫生防疫网，能够集中力量预防和控制各种急慢性传染病。从1949年到1985年急性传染病的发病率已由20%下降到0.8%。同时，由于城乡卫生状况的改善，境内人口总死亡率由50年代初的20%以上降到7%以下，人均寿命由35岁上升到69岁。

第一节 爱国卫生

1952年初，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细菌战，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开始加强，咸阳专区开展了卫生保健常识教育，先后放映幻灯18场，卫生展览

11次，卫生座谈14次，讲演6场，印发宣传资料34572份。

1953年，各县市开展“一扑五灭”（扑鼠，灭蝇、蚊、虱、跳蚤、臭虫）、“五有”（鸡有窝、猪有圈、缸有盖、厨房有防蝇设备、厕所、粪坑有盖）、“八净”（孩子净、个人全身净、室内外净、街道净、厨具净、鸡窝净、猪圈净、厕所净）、“三不”（不喝生水、不吃生冷食物、不吃苍蝇馊过的东西）、“三要”（要取消井周30米内的漏水厕所、要把河水分段使用、要设公共汲水桶）卫生活动，人们参与卫生活动的自觉性有了提高。1956年，各县市成立除“四害”（蚊子、苍蝇、麻雀、老鼠）指挥部，制订了具体除害措施，制作了各种捕害和灭害工具，开展了大规模的捕灭活动。到1958年，继续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并坚持“两条腿”（即群众队伍与专业队伍）走路的精神，开展挖蛹、积肥、除害灭病活动。1960年3月，“四害”修订为老鼠、臭虫、蚊子、苍蝇。

1966年至1976年，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大办合作医疗，进行农村“两管五改”（即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炉灶、改畜厩、改环境卫生）工作，每年春、夏、秋季都要开展卫生活动。

1980年，爱国卫生运动仍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结合城镇发展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改善城乡卫生基本设施，加强“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治理，大力开展灭鼠防病保粮活动，把鼠密度和出血热发病率降下来，同时认真搞好环境卫生和职业病的防治，农村重点抓好“两管五改”。

1981年，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道德、讲秩序和心灵美、语言美、环境美、行为美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1982年，在首届“文明礼貌月”活动中，广泛开展了以绿化、净化、美化内容为内容，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1983年元月起，境内农村以改水、管粪、改造环境卫生为主，大力消除四害；城镇以推行“三自”（自修门前路、自栽门前树、自保门前洁）包干负责制为主，广泛开展了文明街村建设。据统计，全区先后涌现出文明卫生村、队（街道）1000多家，文明卫生单位2364个。到1985年，共建成文明卫生村208个，文明单位255个。其中礼泉县袁家村、旬邑县下皇楼村、彬县后王村、武功县背后村、淳化县强家村被评为市级文明卫生村。

1986年，全市创建文明卫生单位646个，文明卫生村386个，新建改建厕所30个。同时增设卫生管理人员1981名，卫生保洁员1661名。据统计，

当年国家、集体和个人投资改水款额达 479.82 万元，新建改水工程 459 处，受益人口为 794739 人。

1987 年，全市以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和文明卫生村镇为目标，开展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全市新修路面 2340 公里，增设下水道 23800 米，新建厕所 156 个，新建垃圾台 280 个，修建花坛 2964 个，植树 289 万株，灭鼠 923 万只，平均鼠密度由 5.8% 降到 1.7% 左右。

1989 年，咸阳市爱国卫生工作被评为全省第一名。1990 年，咸阳市荣获全国卫生城市称号。经鉴定，咸阳市区成为全省灭鼠先进城区。

第二节 传染病防治

传染病防治是卫生防疫工作的重点。市卫生防疫站采取有效措施扑灭各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并负责系统收集、汇报全市 25 种传染病的发生、死亡情况，给基层单位免费提供防疫药品和医疗器械工作。随着生物制品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群众性预防工作的广泛开展，人工自动免疫工作越来越普及。50 年代消灭了天花、鼠疫和古典型霍乱、回归热、黑热病。60 年代基本消灭和控制了白喉、斑疹伤寒的流行。70 年代基本控制了百日咳、脊髓灰质炎、布氏病、疟疾病的流行。80 年代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麻疹、炭疽明显下降。但传染性肝炎、菌痢等传染病，由于传染途径广泛，菌种类型多，而且又无特异性的生物制品，所以发病率反呈上升趋势。这些已经引起广大卫生防疫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一、报告和管理

建国后，各级卫生部门十分重视传染病管理工作。1950 年 3 月，咸阳专区普遍建立疫情旬报制度，由各县卫生院负责传染病汇总上报工作。1955 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各县进一步完善传染病管理和疫情报告制度。1955 年 7 月，卫生部规定传染病分甲、乙两大类，共 28 种，并制订了全国统一的“传染病报告卡片”。县卫生防疫部门按旬定期向地区及省卫生防疫站填具报表，并抄送本县卫生科（局）。

1956 年到 1981 年，从村医疗站、乡镇卫生院到县卫生防疫站，疫情旬报网已基本建立健全。市内综合性医院及专科医院均设有卫生防疫科（组），负责所在街道、地段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并接受市卫生防疫站疫情管理的监

督检查。在长期实践中建立起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制度，对及时控制、扑灭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及时掌握各县区的疫情动态，加强疫情联防，地区卫生防疫站在70年代定期印发“疫情动态”资料，并附发重点指导意见，要求各县防疫部门结合本县实际采取相应措施，控制疫情扩散。当时疫情管理所需药品器械一律免费供应。

1984年开始采用传染病登记卡，由卫生防疫站统一保管。通过对医疗单位实行“月自查，季县查”和奖罚制度，使疫情报告准确率达到90%以上。据统计，境内的传染病有：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性肝炎、炭疽、痢疾（包括菌痢与阿米巴痢疾）、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脊髓灰质炎、钩端螺旋体病、疟疾、伤寒（包括副伤寒甲、乙）、回归热、钩虫病、斑疹伤寒、猩红热、布氏病、黑热病、麻疹、百日咳、白喉、狂犬病、破伤风22种。某些食物中毒、农药中毒、职业中毒等也在短期或年度内列入疫情进行统计。

二、重点传染病防治

流行性出血热 1955年发现首例病人，之后仍偶有发现。因本病尚无特效疗法，故病死率相对较高。但由于临床治疗经验的提高和一些免疫制剂及抗病毒药物的出现，病死率逐年下降，1989年后稳定在3%左右。

出血热发病有明显的季节性，每年5—7月为小高峰，10—12月为高峰期，且每4—6年出现一个发病高峰年。60年代防治措施主要是灭鼠，在疫区每年都要开展2—3次大面积的突击活动。1985年后部分县区开展了应用植物血球凝集素（PHA）诊断，早期诊断率有所提高，总发病率明显下降。

病毒性肝炎 1959年在咸阳市区发现病毒性肝炎26例，次年在兴平、乾县、长武、三原等县共发现528例。1961年扩散到全区13个县、市。1971年至1983年每10万人均发病50例，1986年每10万人均高达195.9例，城区发病率始终居全市首位。预防措施以切断传染途径为主，尤其要加强饮食从业人员和保育人员健康检查。传染源控制则以隔离治疗为主。1987年开始接种乙肝疫苗，次年10月起，有组织有计划地在新生儿中推广乙肝疫苗注射，积极预防婴儿早期乙肝感染和母婴传播。

炭疽病 炭疽病为人畜共患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咸阳市1958年首次发病2例，1959年又发生5例，以后各县相继零星发生。通过疫区病畜检疫，死畜尸体深埋，加强皮、毛卫生监测，同时采取炭疽减毒活疫苗预防接种等综

合预防措施后，疫区范围大为缩小。

痢疾 各县每年夏秋季均普遍发生。60年代年均发病10407例。1968年最低，有1230例；1960年最高，有53451例。70年代年均发病29793例，1971年最低，有11407例；1972年最高，有45287例。80年代略有降低，年均仍有18713例。由于菌痢传染源普遍存在，传播途径广泛，预防措施以加强饮食卫生管理、改良环境卫生为主，要求公民注意个人卫生，尽量减少感染机会。

流行性感胃 市境曾于1957、1964、1972年发生过三次大的流行，流行严重的局部地区曾有村不漏户、户不漏人的情况。防治措施以呼吸道传染病防治为主，同时要求机关、学校、公共场所注意通风、消毒、净化空气，并辅以集体性的预防服药。1984年后，发病率逐年降低。

疟疾 1963—1964年每10万人疟疾发病率均在100例以上。1964、1965两年平均发病率高达483.61例，1966—1970年发病率在10—20例之间，1971年略有抬头，上升到52.65例，以后逐年下降。1986年降至0.1例，且病人均系外地感染，1988年后无病例发生。疟防工作以控制传染源为主，同时结合大力灭蚊等综合防治措施。境内以县、区为单位建立了三级防治网，采取“两根治（现症根治、复发根治）、一预防（预防服药）”、“一人得病、全家服预防药”作为防治常规，对现症病人治疗，使用“八日疗法”及“四日疗法”。卫生人员要对每例患者登记造册，年终填具疟疾发病村、镇分布表；疟原虫检查登记表；抗疟措施执行情况登记表。根据全国疟防规划考核标准，咸阳市已达到“基本消灭”的标准。1987年咸阳市卫生防疫站被评为陕西省疟防工作先进集体。

伤寒、副伤寒 60年代伤寒病在各县广为流行，发病率较高。1963年共发病8826例，死亡59例，每10万人年均发病率为60.57例，自60年代后期至1988年，发病率一直稳定在较低的水平，年总发病数在100—400例之间，各年互有小幅升降。这一现象表明伤寒病传染源仍然存在，各级卫生部门在饮水净化和饮食卫生管理、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管理、疫情报告和预防接种等方面，都有待改进和提高。

斑疹伤寒 咸阳地区50年代仅在市区发现2例。1960年在兴平、乾县、彬县、三原等县均有发现。以后各县、区连年散在发生。80年代发病率显著上升，1981—1988年共发病4018例，年平均446例，每10万人发病率1981年最低为3.88例；1986年最高为23.53例，年均11.34例。主要预防措施是

杜绝鼠体虱、蚤传播。

麻疹 麻疹是婴幼儿中主要传染病，病原系病毒，传染性极强，在儿童传染病中居首位，患病后可以获终身免疫。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或农村，终年不绝，几乎无人可以幸免。1965年麻疹疫苗问世后，预防效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60年代每10万人最高年发病率为1908.25例；70年代为538.79例；80年代为82.36例。1982年卫生部把麻疹列入全国计划免疫范围，1986年全市发病率一直控制在10例以下，到1990年发病率下降到2.99例。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为脑膜炎球菌所致，主要侵犯脑膜。50年代市境有散在流脑发生，60年代逐年增多，1967年为高峰，14个县市发病5432例，死亡388例，每10万人发病率为169.19例，死亡率为11.58例。1977年又出现小流行，全地区发病2094例，死亡64例，发病率为49.19例，死亡率为1.50例，80年代呈下降趋势。自磺胺药应用于临床后，流脑的病死率由建国前的50%降至20%以下。1966年推广阿托品及山莨菪碱抢救治疗爆发型流脑，病死率逐步下降至4%左右。在预防上，认真执行“三开”（开门、开窗、小窗改大窗）、“三晒”（晒衣服、晒被褥、晒家具杂物）、“三早一就”（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治疗、就地治疗），发病率大幅度下降。

脊髓灰质炎 1956年咸阳市发现首例脊灰，由于医学界对该病尚不认识，患病小儿初期发热诊断不清，用一般外感解热法，在臀部注射“百尔定”、“福白龙”等药后，到麻痹期即出现下肢瘫痪，误为打针所致。1960年后脊灰在各地相继发生。1964年全区发病353例，每10万人发病率为11.31例，死亡率为0.38例。1962年，开始使用脊灰减毒活疫苗（糖丸），1964年各县全面服用，发病率逐年下降。1984—1988年全市共发病14例，发病率控制到0.12例以下，已接近基本控制和消灭的目标。1989年发病明显上升，1990年全市发病161例（包括疑似病人），出现爆发点，这与全省脊灰发病情况相似。

流行性乙型脑炎 流行性乙型脑炎是经蚊子传播引起的，多在夏秋季流行。咸阳境内1953年报告首例乙脑病人。1957、1958年出现大流行，每10万人发病率高达92.46例。1964、1967、1975年又出现较大流行，发病率分别达20.11例、24.69例、36.58例。1955年使用疫苗，反应大，效率低，且使用范围较小、免疫效果不大明显。80年代初，地鼠肾细胞疫苗代替了鼠脑疫苗后预防效果明显提高。至1986年乙脑发病率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以1984

年发病高峰期为 13.38 例与 1975 年高峰期 36.58 例相比, 发病率下降 63.42%。但是因疫苗供应量不足, 仅限于疫区接种, 故尚难完全控制乙脑的发病。

三、计划免疫

建国初, 各县疫苗发送至各县卫生院, 由医院直接组织医务人员执行疫苗接种任务。当时疫苗只有牛痘苗、鼠疫菌苗、霍乱、伤寒混合菌苗、白喉类毒素 4 种, 除牛痘苗外, 其余 3 种仅限疫区或局部使用。各县农村陆续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区(镇)卫生所, 开展农村的医疗保健工作, 承担所辖区、乡各类生物制品的接种任务。1954 年中国红十字会在咸阳广泛招收和培训会员, 所培训的会员能基本掌握急救、卫生宣传和各项预防接种技术。1964 年至 1966 年咸阳专区所辖 14 个县(市)卫生防疫站陆续建立, 农村生产大队均办起医疗站或卫生室, 分级负责医疗预防工作。

1978 年, 咸阳地区卫生防疫站在淳化、三原两县开展计划免疫试点工作, 1979 年全面展开。1982 年卫生部门制定《1983—1992 年咸阳地区计划免疫工作规划》, 组织力量深入基层整顿农村计划免疫接种点, 落实乡村医生执行计划免疫任务的报酬, 有效地推动了计划免疫工作规划的进程。至 1986 年底, 全市 14 个县(区)卫生防疫站均成立了计划免疫科(组), 227 个乡镇(镇)卫生院建立了防保科(组), 3916 个村委会基本落实了保健医生, 从组织上建立健全了三级防保网。同年 5 月, 三原、乾县、礼泉、杨陵、秦都 6 个县区跨进计划免疫达标县。1987 年市卫生局印发《儿童计划免疫保偿合同》实施方案, 并在泾阳、三原两县进行试点。同年 12 月, 计划免疫保偿制在全市全面推开。据统计, 全市应投保人数为 495288 人, 实际投保人数为 456940 人, 投保率达到 92.25%。至 1988 年底, “四苗”(麻疹、卡介苗、百白破、脊灰疫苗)覆盖率达 86.17%; 三级预防保健网健全、稳定, 儿童计划免疫保偿率为 92.25%, 其中 7 岁以下儿童建卡率达 98.11%。市、县、乡、村冷链设备配备齐全, 并已全部运转。市、县、乡各级单位的计划免疫资料基本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档案化。

第三节 食品卫生

一、监测与管理

建国初期，食品卫生管理主要采取查、帮、管方式进行，例如举办各类服务从业人员学习班，学习卫生常识，提倡不喝生水，不吃腐败变质食物等。50年代后期开始加强了对食品加工厂、酿造、屠宰厂的监督管理。先后对市区内5449名炊事员、630名伙管员进行了培训，对483名饮食消毒员和从业人员进行了全面的健康检查。

60到70年代，咸阳地区食品卫生监测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80年代初，食品卫生检验设备不断完善，监测任务显著增加。1986年市卫生防疫站食品卫生科共作食品卫生监测219件，合格件数145件，合格率为66.2%。1988年全市作食品卫生监测1217件，合格907件，合格率为72.2%。与此同时，咸阳市食品卫生管理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据统计，1980年全市共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212个，从业人员28465名。食品生产企业67个。这些企业单位全部接受了卫生管理。

1982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颁布后，咸阳地区食品卫生监测管理走上了法制化管理阶段。到1987年，全市共处理食品违法案件1195起，其中警告并限期改进888起；责令停业改进58起；责令追回售出的违法食品18起；罚款210户，计33425元；没收或销毁伪劣、腐败食品704605.5公斤。从1987年市卫生防疫站开始对直属32个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卫生检验，依法处理了咸阳市和兴平县粮油议价公司从国外进口不符合国家标准的2200吨毛菜油案，分别罚款5000元和10000元，并责令对已售出的毛菜油全部收回，与未销完的一并加工脱溶，经检验合格后方允许销售。

二、食物中毒

建国初，境内便开展了食物中毒定项汇报工作。1966年至1971年资料断档，1972年咸阳地区恢复了此项报告制度。据21个年度的资料累计，共发生食物中毒689起，中毒人数29141例，死亡106例。典型案例有：

1979年9月30日晚，咸阳市自行车零件门市部一工人捡拾到河豚鱼一条，父子俩食后半小时相继死亡。

1983年，咸阳、兴平、三原、泾阳、礼泉、乾县等6个主要产棉区发生棉酚中毒19237人，住院256人，死亡68人，是陕西省特大中毒事件。棉酚中毒实际产生于60年代，当时有些群众在炎热夏天劳动后，全身发热，不出汗，痛苦难忍，离开日晒，休息后即可恢复。由于病因不清，群众叫烧热病。到70年代末，对病区食用棉油检验，棉油中含酚量过高，有的高达几十倍。临床检验，发现血液中钾元素下降，因而又叫低钾软病。油中含酚量过高的原因是：河南省制造的一种螺旋榨油机流入境内，此机榨油棉籽不蒸炒，棉酚得不到破坏和分解，加工后的油又不加碱脱酚。群众称这种榨油法为生拔毛。这种油食用2—3斤即可发病，妇女可引起闭经不孕。

1985年秦都区、泾阳县发生食用霉变甘蔗中毒2起，中毒6人，死亡2人，均为儿童。主要症状为呕吐，视力障碍，阵发性抽搐，大小便失禁，昏迷。同年7月22日，永寿县马坊乡焦府村，农民李云南将自己死因不明的牛肉煮熟卖给本村李保玉等51户，食肉者240人，中毒162人，72人住院治疗，死亡1人。

1986年三原县、秦都区、杨陵区四个农民建筑队，误食工业用亚硝酸盐，造成133人急性亚硝酸盐中毒。

三、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调查研究

1981年至1983年间，地区卫生防疫站先后在各县区进行了7项有关食品卫生与营养卫生学调查。1981年8月根据国家卫生标准，地区防疫站对境内11家县市酿酒厂（车间）生产的酒类进行了质量调查，27份样品甲醇氰化物含量全部合格，杂醇油含量合格者25份，铅含量合格者23份，总合格率为85.2%。1982年3月开始对兴平、乾县、泾阳、高陵、三原、礼泉、周至等县的棉油质量进行调查。经检验，全区各类棉油酚含量程度不同地存在问题，其中机榨油23份，合格12份，合格率为53%；螺旋榨油18份，均不合格；带壳冷榨19份，合格10份，合格率为52.6%；浸出法油17份，全部合格。6月地区防疫站对红卫、实验饭店食具消毒效果进行检验，检验结果：煮沸消毒5分钟，碗、盘、筷子细菌总数平均为7个/毫升，蒸气消毒为118个/毫升，均未检出致病菌，消毒10分钟后，煮沸消毒细菌总数平均为2个/毫升，蒸气消毒总数平均为20个/毫升，均未检出致病菌，可以清楚地看

出煮沸消毒较蒸气消毒效果好。同年7月，通过咸阳市韩家湾、窑店、石桥及市区10个冷饮门市部13种冷饮卫生学调查，结果发现有10个品种的细菌总数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有4个品种分离出副大肠杆菌，铅、砷、铜、糖精的含量基本合格。1983年7月地区卫生防疫站对三原县西阳乡正风村671人进行了棉酚中毒调查，发病161人，发病率为24%。其中女性112人，发病率为69.65%，显著高于男性。通过调查订出棉酚中毒5项诊断标准：即有食用粗制生棉油史；在发病季节；血清钾在4毫克当量/升以下；有低钾软病症状或烧热病症状；心电图改变：有明显的U波或TU波，T波低平或倒置，U波超过0.1毫伏，S-T段压低，有两项阳性表现或一项U波改变。

第四节 环境卫生

50年代初，环境卫生以开展除害灭病，讲卫生，积极改善城乡卫生面貌为中心。各级政府组织机关、单位及群众清除垃圾、粪便，改造厕所，填平污水坑，改良水井，疏通沟渠，喷洒药物，灭害消毒，植树种花，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各项环卫工作开始进入实质性的调查研究阶段。卫生部门广泛开展了行业卫生管理、饮水卫生管理、粪便无害化处理、室内卫生调查、水源污染调查、饮水消毒等。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环境污染和公害现象日趋严重，70年代工作重点是综合治理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保护生态环境。

80年代初，国家设立了各级环境保护机构，卫生防疫站环境卫生工作转入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环境因素调查研究，并由原来的宏观控制转为微观监督、监测管理。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卫生法规的建立和完善，环境卫生工作由单纯行政管理转变为行政管理、经济管理和法制管理相结合的新阶段。

一、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

1955年咸阳市卫生防疫站制订了《服务行业卫生管理暂行办法》，对理发、食堂、浴池、旅店、影剧院等提出了具体的卫生要求，通过经常性的行业卫生监督检查，协助各行业建立健全了各项卫生制度。1962年又对旅店澡塘、理发行业进行了一次全面整顿，重新修订了行业卫生制度，并对工作人员进行了健康检查，填发了健康证。1985年国家卫生部、体委联合发布《游

乐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和 1987 年国务院颁发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使这项工作由过去的行政管理过渡到法规管理，由一般性的宏观卫生检查提高到有明确的卫生标准的卫生监督。市卫生防疫站为了切实贯彻上述两个条例，从 1986—1988 年培训基层卫生管理人员，抽检样品 168 份，获得检验数据 1344 个，建立了本市游乐场所卫生管理资料档案。结合本市实际，先后印发有关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的条例、标准、规范等资料和讲义 8300 余册，培训公共场所从业人员 4828 人。

与此同时，卫生部门还开展了行业性摸底调查。据 1988 年 10 月统计，全市共有各类公共场所 1109 个，从业人员 6189 人。其中旅店业 258 个，从业人员 1653 人；理发业 387 个，从业人员 953 人；浴池业 7 个，从业人员 68 人；影剧院 45 个，从业人员 30 人；娱乐场所 30 个，从业人员 70 人；图书馆 20 个，从业人员 69 人；候车室 15 个，从业人员 63 个；其他行业 26 个，从业人员 296 人。卫生部门为这些行业与人员全部建立了卫生管理档案。

1986 年起，坚持对从业人员一年一次的健康检查制度，年平均体检率为 86.15%，合格率为 95.22%。对体检合格者发给《陕西省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健康证》；对患有各类禁忌症者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处理率为 100%。同年开始对市区各公共场所实行卫生监督和卫生监测工作，实行《卫生许可证》发放制。通过监测符合卫生要求的单位发给《卫生许可证》，对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单位采取批评教育、严重警告、限期改进、罚款、停业整顿等不同的处理办法。到 1989 年，受到警告的单位 22 个，限期改进的 14 个，停业整顿的 4 个，罚款的 2 个。

二、饮水卫生和水源水质调查

建国前，市区居民部分饮用渭河水，建国后修建了自来水厂。1955 年市卫生防疫站开始实施水源卫生管理。经过对渭河水的细菌检验，表明渭河水质不符合饮水卫生标准，随即会同有关部门宣传教育群众不要饮用渭河水，并在河岸两侧设置“禁止饮用河水”的木牌 14 个。1956 年对市区饮水卫生加强了管理，除对 14 眼机井进行抽样检测外，还对附近乡村部分土井进行了水质检测，共抽检样品 59 份，占总检数的 74.6%。1957 年到 1958 年，市卫生防疫站开展了水源卫生状况调查，选择了 11 个采水点，每个月抽样化验一次。

1962—1964 年，地区卫生防疫站对所辖 14 个县市的各类饮用水源（包括

自来水、深机井、土井、泉水、窑水、沟渠水)以及13个单位的自来水进行了理化、细菌检验及卫生学调查监测,抽样品277份,为进一步加强水源卫生保护提供了可信的资料。1978—1982年,全面进行了饮水水源水质调查工作,查出生活用水源有11类165978个,其中扎管井(也称手压泵井)88941个,占饮用水源总数的53.6%。全市共有大小河流32条相继汇入泾河及渭河。从饮用人口分布来看,饮用浅井水人数为766926人,占总人数的20.23%。抽样调查表明,有60%的饮用水源周围30米内有厕所、畜圈、粪堆等污染源的存在。

为了摸清水质卫生变化规律,找出影响水质变化的主要因素和介水传染病的流行规律,地区卫生防疫站又选择了不同类型和分布的水源612处,进行了丰、枯两期的水质检测。共采样品1164份,获得有效数据23136个。通过这次调查和检验分析,第一次摸清了本市生活饮用水源水质的情况,建立了资料档案,为其后改善饮水条件和预防介水传染病的流行,提供了科学依据。1983—1987年市卫生防疫部门参加了全国饮用水源水质和水性疾病的调查研究、陕西省饮用水源水质10年动态监测、分析质量控制等工作。共选择134个采样监测点,组成13个分析质量控制实验室,每年在丰水期和枯水期进行动态监测,每次分析15个项目,共获数据16080个。

1987—1988年市卫生防疫部门对13所城、镇自来水厂和154个自备给水单位进行建档建卡,对这些水源进行了余氯、浊度、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四项指标的常年监测。每年监测6次,分别于3、5、7、8、9、11月进行,同时开展了全市城镇各集中式供水人员的体检工作和水质全面分析工作,对本市27个单位的42名供水人员进行了体检,获数据2842个。

第五节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

咸阳市在50年代,有关劳动卫生管理尚无统一的章程,缺乏完整的科学监测手段,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各项工业劳动卫生管理受到严重影响。进入70年代末,劳动卫生管理和职业病防治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

到80年代中叶,全市共有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专业人员41人,其中专职36人。1985年4月,咸阳市职业病诊断小组成立。其任务是对本地区职业病诊断工作进行技术性指导和监督检查,并受理本地区职业疑难病的诊断。1989年4月,又成立了咸阳市职业病诊断领导小组,职业病诊断小组成

为下属组织。

从70年代开始,地区(市)卫生防疫部门先后开展了多项目职业病调查,对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工业卫生基本情况调查 据1980年全区工业卫生基本情况调查,全区职工人数148548人(其中女性49042人),生产工人107351人,接触职业危害人数56167人,其中:高温12866人,高频245人,噪声14098人,震协1155人,粉尘15899人,X射线502人,铅1125人,苯2570人,汞754人,锰1629人,其他5289人。

粉尘作业调查 1973—1975年卫生防疫部门对全市粉尘作业工人进行尘肺普查,共调查158个厂矿,10957名接尘工人,作体检拍片2500人,查出尘肺99人(一期58人,二期35人,三期6人);尘肺观察对象60人。

1981—1982年对7个水泥厂工人职业危害情况进行调查,共有职工1523人,从事粉尘作业的1140人(其中女性156人),体检852人,受检率74%,查出粉尘观察对象93人,I期水泥尘肺1人。7个厂检测粉尘点64个,样品128个,分散度81份,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测定27份,粉尘浓度全部超标,最高达1571.25毫克/立方米,超标784.66倍,分散度波动在61.30—98.60%之间,粉尘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最低为0.157%,最高40.98%。

1983—1984年对彬县、旬邑7个县办煤矿进行煤尘肺调查,7个矿共有职工3984人,从事粉尘作业工人2669人,全为男工,对接尘五年以上应检的1759人中,实检1239人,占应检人数的70.44%,检出一期煤矽肺49人,二期煤矽肺13人,尘肺观察对象146人。发病工龄最短8年,最长55年,平均发病工龄21年,患病率随工龄增长而增高。

毒物作业调查 1959年10月卫生防疫部门对咸阳市印刷厂铅中毒进行了调查,对30名铅作业工人进行了体检。据测定,铅作业车间空气中铅浓度普遍超过国家标准10—17倍,发现铅中毒工人2名。

1978—1980年,卫生防疫部门对全区从事铅、苯、汞、锰作业工人进行了职业病普查,共调查厂矿178个,接触毒物作业人3835人,进行体检3615人(铅作业396人,苯作业1526人,汞作业526人,锰作业1167人),受检率为94.26%。发现铅吸收5人,苯中毒观察对象54人,汞吸收93人,汞中毒5人,锰中毒观察对象10人,共进行现场监测345个点(铅36、苯84、汞44、锰92),其中:铅合格点16个,合格率44.44%,均值为0.208毫克/立方米;苯合格点58个,合格率69.04%,均值为79.32毫克/立方米;汞合格

点 13 个，合格率 29.54%，均值为 0.018 毫克/立方米；锰合格点 7 个，合格率 6.54%，均值为 1.85 毫克/立方米。

1982 年 12 月，卫生防疫部门对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新建工程进行竣工验收，共测定作业点 159 个，超标 67 个，占 42.1%。其中三氯乙烯 21 个点，超标 20 个，占 95.2%；噪声 18 个点，超标 17 个，占 94.4%；粉尘 14 个点，超标 12 个，占 85.7%。

1984 年 11 月卫生防疫部门对陕西医疗仪器厂的 272 名汞作业工人进行职业病检查，查出汞吸收 65 人，慢性汞中毒 6 人。

1984 年 12 月卫生防疫部门对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的 132 名铅作业工人进行职业病体检，结果发现尿 δ -ALA 高于每升 6 毫克者 102 人，占体检人数的 81.6%；尿棕色素阳性者 21 人，占 15.9%；网织红细胞增高者 34 人，占 20.58%；点彩红细胞增高者 3 人，占 2.6%；尿铅超过陕西地区正常值者 16 人，占 12.12%。

职业流行病学调查 1971—1983 年市卫生防疫站与省卫生防疫站协作，对兴平玻璃纤维厂进行长期性职业病流行病学调查。先后 9 次对合线、拉丝，织布车间的粉尘浓度、分散度、游离二氧化硅进行了测定。除 1977 年合线车间与 1982 年拉丝车间粉尘浓度高于国家卫生标准外，其他年度均低于国家卫生标准。分散度小于 5 微米的占 74.4—85.6%；游离二氧化硅含量最高 5.5%，最低为 1.8%。据调查，全厂有职工 2765 人，接触玻璃纤维粉尘工人 1120 人。其中接受体检的工人 252 人，其中女性 172 人。接尘年龄最短 5 年，最长 24 年，尚无一例尘肺发生。调查结果初步认为低浓度的中、粗玻璃纤维粉尘对作业工人基本无害，引起尘肺的可能性甚微。

1988 年 4 月市卫生防疫站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经过对全市 108 个厂矿，16046 名接尘工人的调查，共登记病人 195 人（其中女性 10 人），填写尘肺病历甲卡 395 张，乙卡 195 张，死亡 16 例，尘肺观察对象 395 人。尘肺病人中，有矽肺 70 例，煤工尘肺 121 例，石棉肺 2 例，电焊工尘肺 2 例，水泥尘肺 1 例，合并肺结核者 16 人。发病工龄最长 55 年，最短 3.17 年，I 期新发病例平均发病工龄 22.387 年。发病年龄最大 66 岁，最小 30 岁，平均发病年龄 47 岁。

放射防护调查 1981 年 5 月，咸阳市卫生防疫站配备 β 射线，X 射线及 X 射线测量仪器后，对全市 14 县（区）26 所医疗卫生机构的 46 台医用 X 线防护情况进行了监测。透视防护区空气照射量率，共测 39 台，仅 3 台达标，

合格率为 7.7%，X 线管头组装体漏射线，共测 38 台，304 个点，35 台 291 个点，合格率分别为 92% 和 92.7%。

1984 年对市区 127 名医用 X 线工作者受照射量进行了调查和剂量估算，据调查，这类人员平均工龄为 7.5 年，79.5% 的人员中累计剂量在 50 毫戈瑞 (mGY) 以下；94.5% 的人员平均年剂量当量低于个人剂量年限值 5 毫希沃特/年 (mSV/a) 的十分之一，均未超过国家规定的个人年剂量限值。不同时期的平均年剂量当量随着防护条件的不断改善呈下降趋势，短工龄组的年剂量当量低于长工龄组的平均年剂量当量。

1986 年 3 月咸阳市射线防护工作队成立后，开始对全市医用 X 线机进行了防护改装。截止 1988 年，全市 291 台医用 X 线机全部改装完毕，3000 名照射人员接受了受照射剂量调查。

第六节 地方病防治

1970 年咸阳地区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办理日常工作。1972 年改为中共咸阳地委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历届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组长均由市（地）委副书记或市政府（行署）副市长（副专员）兼任，副组长由市（地区）卫生局长兼任。

1975 年 8 月咸阳地区地方病防治所成立，是为咸阳地方病防治专业机构。1978 年设大骨节病科、检验科、地甲病科、办公室。1984 年 10 月改名咸阳市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县（区）的地方病防治机构，除永寿、旬邑县分别于 1978 年和 1989 年成立地方病防治所外，其他县（区）均在县卫生防疫站内设地方病科（组）。地段医院及乡（镇）卫生院均设有 1—2 名专职人员负责第一线地方病防治工作。

咸阳市是陕西省地方病重发病区之一，全市 14 个县区均有地方病，患者 69 万多人。北部沟壑地带以大骨节病、克山病为主，南部平原地带以地方性氟中毒、甲状腺肿发病较多。

地方性甲状腺肿、克汀病防治 地方性甲状腺肿（简称“地甲病”）是由于饮水和食物中长期缺碘而引起的身体甲状腺代偿性增生或肿大的疾病。肿大的腺体小者如核，大者如瓜，病区群众叫“瘦瓜瓜”、“大脖子”。本市 14 个县区均有发病，但以渭河沿岸的兴平县发病较多。建国后，经过多次调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长，发病人数逐年增多。1970 年调查，全市

共有患者 111505 人，1975 年普查已达 195877 人，其中女性 128848 人，男女之比为 1:2。按照病情分三型三度：弥漫型 155413 人，占 80%；结节型 28410 人，占 14%；混合型 12054 人，占 6%。一度患者 164752 人，占 84%；二度患者 25972 人，占 13%；三度患者 5153 人，占 3%。1979 年复查，全市累计达 200984 人。

咸阳市从 1975 年开始全面治疗地甲病，到 1979 年 5 月通过省检查团验收，5 年中国家总投资 150 万元以上。主要采取推广含碘食盐、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三种办法。1957 年在咸阳钓台乡采用食盐加碘的办法防治地甲病，这是全区最早在小范围内采用碘盐的尝试。1966 年，开始采用碘酊局部注射、“消瘦液”穴位封闭、含碘食盐片内服等方法治疗。

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底，在淳化、永寿、泾阳等 9 个县 3678 例地甲病患者中用昆布、海藻等中药制成“消瘦液”，在患者上肢“曲池”穴位进行注射，治愈 2701 例，治愈率为 73.44%，显效 122 例，有效率为 87.28%。由于“消瘦液”治疗方法简便，易于掌握，疼痛较小，患者乐于接受，而且药源广泛，价格低廉，效果较好，又无副作用，很快在全区普及。1977 年 5 月，对用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开展了手术治疗。首先在户县进行试点，接着在全区抽调有一定临床经验的医务人员 160 多名，组成 10 个手术队。后手术队发展到 34 个 300 多人。至 1979 年 5 月，共做手术 4158 例。采用气管悬吊术和自家输血法，解决了因气管软化而窒息死亡问题和在农村开展手术的血源问题。

地方性克汀病（简称地克病）是一种以神经系统损害为主，以痴、呆、傻、哑等智力障碍为主要症状的地方病。1975 年普查有患者 1057 例，行政区划调整后尚有 70 例，目前对此病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地方性氟中毒防治 地方性氟中毒是一种对人体健康危害很大的疾病，轻者发生氟斑牙，重者发生氟骨症，患者全身疼痛，腰背弯曲，肢体变形，严重的肢体僵硬瘫痪，终年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十分痛苦。1980 年，咸阳地区卫生部门组织专业调查队 325 个，参加人员 2927 人，基本摸清了氟中毒的发病情况。涉及病区的有 10 个县、89 个公社、659 个大队、病区人口 733984 人。1982 年 1—10 月，又进行了氟骨症复查诊断补课工作，通过对 9 个县、59 个公社、117 个病区大队、365599 人（其中女性 180966 人）的检查，又补查诊断出氟骨症病人 768 人（其中女性 350 人）。全区累计检查确诊患有氟斑牙人数为 352175 人，占病区总人数的 47.89%，有氟骨症患者 1451

人，其中：一度 1248 人，二度 174 人，三度 29 人。

咸阳市综合性防氟改水工作始于 80 年代初。一般由卫生部门负责病情普查、水质检验和防治效果的观察，水电部门负责水源建设，地质部门负责提供病区地下水含氟量等水文地质资料，计划、物资、财政、医药部门对改水防氟的资金、材料、设备、药物供应分别纳入计划。并给予优先安排，重点照顾。

1984 年在总结泾阳县打井改水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以中等病区为重点的改水工作。兴平县的防氟改水工作进度快、质量好，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完成改水工程 9 处，总投资 89.2 万元，其中病区群众集资 43.4 万元，使 22 个自然村，4228 户，2 万多人口和 1.6 万头大家畜饮上了低氟水。

截止 1989 年底，全市已建成改水工程 37 处，其中打机井 33 眼、手压泵井 1 处，除氟器 1 处、窖水 1 处。有 66281 人吃上了低氟水。这 37 处工程总耗资 281.77 万元，有效地解决了中等病区 65 个自然村饮水问题，占整个中等病区自然村 81.25%，受益人口占中等病区总人口的 86.78%。

氟中毒症治疗方法主要有：苁蓉丸疗法，麻芥丸疗法，氢氧化铝凝胶疗法，钙片、维生素疗法和蛇纹石疗法。疗程均为 6 个月，治疗对象为二度及三度氟骨症患者共 230 人（其中女性 121 人）。从治疗的效果看，这些药物对缓解症状的作用比较明显。

克山病防治 克山病在境内分布呈明显的地方性，渭河以北黄土高原的旬邑、长武、彬县、淳化、永寿县以及乾县、礼泉县北部的丘陵地带共 7 个县、103 个乡镇、117 万多人受到威胁。1958 年及 1959 年共发病 1218 人，死亡 498 人，病死率为 40.9%。1964 年至 1986 年的 22 年中累计发病 5614 人，其中急型 1587 人，亚急型 1580 人，慢型 2447 人，共死亡 1316 人，最高病死率为 75%，最低为 13.2%，平均病死率为 14.58%。

为了控制克山病，各级政府都选派医疗队深入病区抢救。但由于病因不明，抢救成功率很低，一度病死率竟高达 80%。1960 年改用升压药及强心药静脉滴注，病死率仍在 61.4%。1960 年以后开始推广西安医学院王世臣教授首创的大剂量维生素 C 静脉注射，病死率才降低到 10%。1977 年以后，根据“硒”与克山病的关系，在病区 15 岁以下儿童中推广口服“亚硒酸钠片”预防克山病。1984 年 10 月开始在旬邑、淳化、长武三个县及永寿县的 11 个乡镇（镇）、乾县、礼泉北部的 23 个乡镇（镇）大面积推广 1/6 万硒盐防治大骨节病及克山病，将克山病控制在历史上年发病率的最低界限。

大骨节病防治 本市北部的永寿、彬县、长武、旬邑、淳化、乾县、礼泉7个县的105个乡镇为主要病区，泾阳县的白王、口镇乡及三原县洪水乡的个别村庄也有发病，以永寿县最为严重。据1980年普查统计，全区共有患者146383人，占全省43%，其中二、三度患者31323人，占患者总数的14.59%，13岁以下儿童患者有57095人，占患者总数的39%，均居于全省的首位。

1977—1978年永寿县地方病防治所在御驾宫乡营里和固室两村对141名儿童亚硒酸钠和维生素E防治大骨节病，观察半年后复查，服硒组干骺端好转率为54.4%，没有恶化和新发者；对照组好转率为25.9%，恶化率为29.6%，有5例新发病人。1979年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和卫生部组成永寿县大骨节病考察组，开始第一次田野考察工作。在考察组的部署安排下，从1979—1981年由省、地、县三级地方病防治研究所承担，对亚硒酸钠的防治效果进行了三次复试，确认亚硒酸钠对大骨节干骺端改变具有促进修复防止恶化的较好效果。从1981年10月起，考察组又对永寿县永平乡用六万分之一的亚硒酸钠食盐进行全民服用观察，1983年扩大到11乡，通过总结，显示出硒盐对大骨节病有预防新发并大幅度降低病情的效果。1981年11月至1983年11月，在咸阳地区病区县设立口服亚硒酸钠片观察点，观察656例，得出了硒对干骺端修复有一定效果的结论。1984年10月起，开始在礼泉、乾县、长武、旬邑、淳化、永寿县范围内推广全民服用六万分之一硒盐，以防治大骨节病。经过5年观察，X线群体病情由1984年实验前的68.1%下降为1989年的14.9%，干骺端阳性率由45.9%下降为3.4%。通过发硒测定，硒盐组一年后平均在200ppb以上，而未服硒盐的彬县发硒虽有上升，但未超过80ppb，仍在非病区的水平。同时得出六万分之一硒盐对降低大骨节病群体病情有明显的效果，能预防新发，对干骺端病变具有修复和防止恶化的作用。大面积推广硒盐，对控制咸阳市大骨节病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麻风、头癣、疥疮病防治 1984年6月至1985年9月，市卫生部门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麻风病流行病学调查，在13个县、区，216个乡镇居民中共检查3853000人，登记麻风病线索1794人，实际检查1787人，受检率为99%，确诊麻风病患者3例，其中瘤型2例，结核样型1例。至1990年，又查出麻风患者6例，均系多菌型（属瘤型类）麻风病。

从1949年至1990年9月底，全市累计发现麻风病204例，其中治愈128例，死亡91例（包括治愈后死亡21人），复发5例（后又治愈4例），尚有

麻风病现症患者 5 例（旬邑 2 例、乾县 2 例、礼泉 1 例）。1989 年咸阳市各县、区麻风病均达到基本消灭的目标。

头癣是一种慢性传染病，传染性强。1981 年元月，咸阳地区卫生部门在彬县举办了头癣防治学习班，随即在全区开展普查工作，在 14 个县（市），258 个公社、3516 个大队、4041052 人中查出各类头癣病患者 2006 名，患病率为每万人 4.96 例，其中黄癣 1491 人，占总发病 74.1%；白癣 493 人，占总发病的 24.6%；黑点癣 18 人，占总发病 0.89%；混合癣 4 人，占总发病的 0.19%。同时对各类头癣病人统一采取剪、洗、擦、服、消的五字疗法（即剪发、洗发、擦药、服药、消毒）。1982 年 9 月，地区组织专业人员 23 名，分三个组，以半个月时间，对此项工作进行全面检查验收，共检查 74 个公社，184 个大队。检查群众 6189 人，未查出新发病人。检查头癣患者 616 人，已治愈 592 人，治愈率为 96.1%，误诊 12 人，误诊率为 1.9%，基本达到控制和消灭头癣病的标准。

疥疮病是一种易于治疗，但又易于复发和易于传播的皮肤病。1949 年后，疥疮病在本市基本绝迹。但是从 1982 年至 1984 年，一些县、区又发生疥疮病。经调查，泾阳、武功、乾县、旬邑、淳化、杨陵、秦都、三原、礼泉、永寿等 10 个县、区共发现疥疮患者 1702 例。1984 年底已治愈 1116 例，剩余 586 例在 1985 年的复查后全部治愈，同时控制了复发和新发病例。

第二章 妇幼保健

1936 年 9 月，咸阳县私立“强华”医院可处理难产手术。1941 年创立咸阳县卫生院，有 1 名助产士，专司接生。1950 年咸阳专区成立卫生科，给各县卫生院配备了助产士。1952 年 3 月，咸阳县首先成立了妇幼保健站，相继成立的有泾阳、三原、旬邑、武功等县。上述妇幼保健机构又于 1958 年先后撤销。1974 年至 1978 年之间，绝大部分县又恢复成立了妇幼保健站。1975 年 8 月咸阳地区妇幼保健站成立。1979 年改名为妇幼保健所。1984 年地改市后，又更名为咸阳市妇幼保健所。1989 年全市 14 个县（区）均有妇幼保健所。旬邑、乾县、三原、兴平 4 县于 1984 年先后扩建为妇幼保健医院。到

1990年，全市有病床48张，职工340人。

第一节 新法接生及围产期保健

民国时期，境内广大农村多采用旧法接生，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高达200‰以上。1949年解放后，咸阳分区在所辖各县卫生院即配备助产士，逐步开展改造旧产婆，大力推广新法接生。据1951年底统计，各县卫生院配备助产士14名，助理助产士5名，培训接生婆813名，并给每人配备了产箱。是年全区采用新法接生1634人，产前检查3800人，产后访视5126人，新法接生技术初步得到普及。1958年泾阳县首先举办农村产院，为全国树立了榜样，省政府在该县杨梧村召开了产院现场会，卫生部妇幼保健司司长黄静汝参加了会议。1975年调查，有些山区旧法接生率仍占50%左右，普遍存在接生员老化，操作不正规，接生器械严重短缺，新生儿破伤风又有发生。

1977年以后，地区妇幼保健所开始对各县、区的接生员、女乡医进行技术培训，增补新生力量，配备产包1300套和部分接生用具。至1979年底，全市共有接生员5244名，基本都能独立胜任工作。各县对接生员工作采取建立制度，统一管理，落实报酬，稳定队伍，防止旧法接生回潮。同年10月，全市44870名新生儿中新法接生42935例，新法接生率为96.8%。11月，地区妇幼保健所抽调地、县（市）、乡三级妇幼人员以及地区卫生局、地区妇联干部102人，分片抽查59个公社、110个大队，访问接生员26名、产院3个，评出旬邑、彬县等先进县，比较好的有兴平、三原、长武3个县，分别颁发了奖状和产包。

咸阳地区自1981年6月以后试行围产期保健制度。1982年全面开展了围产期保健工作（即从妇女受孕2周到产后42天的系统管理），具体步骤是：12周内初查，24—32周前每四周检查1次，32周开始每二周检查1次，38周以后每周检查1次至分娩。产前检查农村不少于5次。早孕初查登记建卡，计算预产期，确定妊娠月份，测基础血压、体重、骨盆各外侧线径，询问病史及早孕注意事项等。孕中、晚期检查包括防治并发症，识别高危，每检查一次，预约下次检查时间，失约一周者，由包片医生随访。正常孕妇由乡医、接生员管理。对于初查和产前检查确定的高危孕妇，进行专册登记，由乡卫生院医生统一管理，酌情增加检查次数，要求住院分娩。对高危因素复杂或病情严重者，及早转上级医疗保健单位进行诊查治疗或分娩。产后3天、14天、28天各访视1次，42天最后访视，进行健康检查，共访视4次，

回收保健手册，并建立儿童健康档案，对儿童系统管理。至1982年底，全市有59个乡、1239个村开展了围产期保健。全市共建卡16723人，按时产前检查35459人，产前检查率为96.8%。住院分娩13948人，住院分娩率为40.3%；产后访视31214人，产后访视率为85%；孕卡回收9389例，回收率为47.6%。1987年咸阳市制订了《围产期保健管理制度（草案）》，1988年制订《咸阳市孕产妇保健保偿责任制实施细则（试行）》。同年3月开始在全市推广孕产妇保健保偿合同工作，由市卫生局局长与各县区卫生局局长签订合同书，对人保对象采取婚前检查、遗传优生咨询、产前检查、产后访视一次收费，由县区妇幼保健站、乡（镇）卫生院，乡村医生或接生员根据各级职责、按照保偿内容进行保健保偿。并根据南北各县区经济、文化、生活水平差异较大的特点，在条件较好的县区保、偿同时进行，对条件差的山区县，适当降低收费标准或只保不偿。到1988年底，按总人口的7‰下达指标计算，应投保26147人，实投保23151人，投保率为88.5%，其中山区应投保6617人，实投保5416人，投保率为81.9%。平原县应投保19530人，实投保17735人，投保率为90.8%。本市在1988年底孕产妇保健保偿工作检查中获得全省第一名。

第二节 妇女病防治

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关怀妇女健康，先后制订了一系列保护妇女的法律和措施，逐渐完善了妇女“五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更年期）劳动保护措施和制度。对妇女病，人民政府多次开展普查普治。50年代即在咸阳城区开展妇女滴虫性阴道炎的普查普治。1954年2月，国家卫生部《关于女工滴虫性阴道炎防治办法意见》颁发后，咸阳市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各医院妇产科医务人员深入市区各单位分片、分厂进行普查，通过投药治疗解除了妇女的病痛。为了彻底根除这一妇科传染病，卫生部门联合有关单位，对有些单位女工大浴池逐步改装为淋浴。1959年对妇女病以宫颈癌为重点进行查治，后又对乳腺增生病和乳腺癌进行查治。

“文化大革命”初期，少数地方旧法接生有所回升，“五期”保护被废止，导致农村偏远地区妇女中子宫脱垂、尿瘘（以下简称“两病”）等新发病例有所增加。1977年以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两病”的普查普治，对查出的“两病”造册登记，全市共查出子宫脱垂患者10492人，其中一度患

者 5492 人，二度患者 3080 人，三度患者 192 人，尿瘘患者 74 人。1978 年在兴平县专门举办了治疗“两病”骨干学习班，聘请中华医学会陕西分会会长叶瑞禾教授作学术报告，并为 19 名三度子宫脱垂患者做了手术，为 13 名尿瘘患者做了修补手术。此后各县按照卫生部关于“两病”的防治意见，分片包干，逐人落实了防治措施。为了推广旬邑县“两病”防治工作经验，1980 年 9 月市卫生局在该县召开各县卫生局长、县妇幼保健站长参加的现场会。1980 年年底市上按照制订的“两病”防治检查验收标准、评分办法，统一逐县进行了检查验收。至 1980 年底，10429 名子宫脱垂患者中治愈率为 97%，有效率为 95.5%；74 名尿瘘患者中治愈率为 85.91%。

1987 年市妇幼保健所与市妇联、市工会两次组织市直机关、市直工会所属单位的女干部、女职工进行以防癌为主的妇科学普查普治，共有 103 个单位列入统计的 1300 名已婚女干部、女职工受检，患病率为 61.8%。市直机关 229 人中患各种妇科病 95 人，其中以宫颈炎最高，为 69 人，患病率为 30.1%。宫颈肥大 6 人。其次是子宫肌瘤、附件炎、滴虫性阴道炎、卵巢囊肿、子宫脱垂等共 26 人。患轻、中度贫血 58 人，贫血患病率为 25.3%。市属单位 1081 人中，患各种妇科病 714 例，以各种宫颈疾病最高，其中宫颈炎 435 例，患病率为 40.2%。对 1300 名受检者，全部作了阴道脱落细胞涂片检查，均未发现有癌细胞。

对查出各种妇科炎症，采取针对性的中、西药治疗。对 25 例需要定期复查的炎症患者，与患者单位联系，通知本人定期到门诊复查。有一位患宫颈息肉的患者息肉约 5.5 毫米 × 2.5 毫米，已脱到阴道外。过去误诊为“子宫脱垂”，医院通知她绝经后做子宫全切除，病人思想负担很重，这次检查后切除了大息肉并做了病理检验，解除了患者多年的病痛和精神压力。

在检查中发现市轻化建材厂女职工妇科病患病率高达 79.8%，高出本次检查平均患病率的 18%，其中宫颈炎患病率为 60.3%，比市属单位的 40.2% 高出 20.1%；阴道炎患病率为 34.5%，比市属单位的 11.7% 高出 22.8%。市妇幼所对该单位进行调查，发现该厂原来洗澡应用大浴池，而且男女共用一池（男用一天，女用一天），造成阴道滴虫的传播。由于女职工缺少这方面的卫生知识，虽然痛苦不堪，但羞于启齿，延误治疗。对此除采用“灭滴灵”按疗程治疗现症病人外，对患者的丈夫也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同时又根据该厂的作业环境和条件，与市工会共同向该厂提出改进妇女劳动保护的建 议，很快建起了女工冲洗室、孕妇休息室和妇女病治疗室。在检查的同

时,结合进行了婚姻、遗传、优生优育、妇女儿童保健、计划生育知识的宣传,提高了妇女防病治病的自觉性。市工会根据这次检查情况,要求各基层工会建立女工卫生间和购买冲洗器,加强妇女卫生保健知识的宣传教育,重视妇女劳动保护,抓紧现症病人的治疗,促进了妇女病的防治工作。

第三节 儿童保健

一、儿童健康状况调查

随着儿童保健工作的逐步开展,儿童健康检查已成为儿童保健的重要制度。建国以来,每年“六一”儿童节前各地均在不同的范围内进行一次儿童健康检查。如1951年“六一”儿童节,咸阳城区组织医务人员对2600名儿童及小学生进行了体检。1979年以后,儿童健康检查已由一般检查到查体与卫生宣教、指导科学育儿相结合,与防治疾病相结合,与计划生育相结合,与提高医务人员医疗保健水平相结合,逐步提高了儿检质量。同时逐步建立健康档案,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和各类常见病、多发病进行科学分析,掌握影响儿童生长发育的各种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不断提高儿童健康水平。

综合性健康检查 1979—1984年全地、市对7岁以下儿童进行了6次健康检查,检查人数累计1275380名,占7岁以下儿童总数的37.18%,总患病人数为343416名,占检查人数的26.93%,其中贫血、佝偻病、营养不良等3大病患者人数为115813名,占患病总人数的33.72%;矫治人数为178337名,占患病总人数的51.93%。随着计划生育的普及和深入,独生子女的比例越来越高,为使计划生育与儿童保健同步发展,全市开展了独生子女重点保健工作。在本市1984年进行健康检查的134015名儿童中,独生子女为112037人,占受检儿童总数的83.6%,占全市独生子女的92.8%。

重点疾病调查 1980年在全地区10个县区进行了一次儿童重点疾病调查,并开始建立健康档案。全市0—7岁儿童586550人,参加体检人数306025人,体检率为52.2%;患病人数76170人,患病率为24.9%。在受检儿童中,集体儿童16862名,占5.5%;散居儿童289163名,占94.5%;婴儿85324名,占19.1%;幼儿143001名,占46.7%;4—7岁学前儿童104700名,占34.2%。在检查项目中进行透视的4835名,肝功化验135名,大便检

验 5426 名，血常规检验 1486 名。

这次检查平原县儿童健康水平良好率多在 40% 以上，一般水平在 40—50% 之间，较差水平为 10% 左右。而山区儿童健康水平较差，良好率多在 25% 左右，一般水平为 60% 以上，较差水平在 10% 以上。平原县 1—3 岁儿童身高、体重超均率都在 50% 以上，4—7 岁儿童超均率在 55% 以上。山区 1—7 岁儿童身高、体重超均率多在 30—40% 之间，但也有体重发育优于身高发育的共同特点。

在各种疾病中，以佝偻病、营养不良、贫血患病率最高，其他如气管炎（包括反复发作和喘息性两种）、中耳炎、先心病、先天性畸形也占较高比例。各种疾病的顺位是：1. 佝偻病；2. 营养不良；3. 贫血；4. 气管炎；5. 中耳炎；6. 先心病；7. 先天性畸形；8. 大骨节病。

儿童膳食营养分析 1982 年咸阳地区妇幼保健所与咸阳市机关妇幼保健所共同在西北国棉二厂保育院进行了儿童膳食营养分析调查试点工作。西北国棉二厂是个老厂，有职工及家属 1.2 万人（职工 5225 人），0—6 周岁儿童有 639 人，入托率为 83.09%，（其中全托 67 人，日托 486 人），共开设 11 个班（其中哺乳班 1 个，托儿班 4 个，幼儿班 6 个）。保育院有工作人员 69 人，其中保育员、教养员 62 人。入托儿童应检查 569 人，实际检查 507 人，检查率为 89.1%，其中体重在均值以上者 242 人，占 47.8%，身高在均值以上者 260 人，占 51.2%；患病儿童 133 例，患病率为 26.2%（其中二度以上贫血 6 例、中耳炎 17 例、慢性结膜炎 11 例、沙眼 19 例、慢性气管炎 7 例、恒龋 56 例、其他 17 例）。有缺点儿童 91 例，缺点率为 17.9%（其中乳龋 37 例，一度贫血 43 例，沙眼 7 人，其他 4 人）。工作人员应查 69 人，实际检查 68 人。患病 7 例，均系一般小病。

体格发育调查 咸阳市妇幼保健所于 1986 年参照 1985 年《全国九市儿童青少年发育调查研究实施方案》和《陕西省 0—7 岁正常儿童体格发育调查实施方案》，在永寿、彬县、长武、淳化、旬邑 5 个山区县及乾县、礼泉的山区乡调查了 6280 名 0—7 岁儿童体格发育状况，摸清了本市北部山区儿童发育水平情况，掌握了不同时期儿童身体发育变动规律，制定了本市山区 0—7 岁正常儿童发育标准值。

体重：山区儿童体重的增长规律大体是：初生时体重为 3 公斤多一点，头三个月每月平均增长 0.9 公斤；4 至 6 个月，每月增长约 0.4 公斤；后半年每月增长 0.23 公斤，第一年体重共增加 5.6 公斤，第二年约增加近 2.5 公

斤。2岁至7岁前每年递增1.5公斤。故一岁以后体重的估计（我国农村儿童）公式： $\text{年龄} \times 2 + 6$ ，基本适用本市北部山区儿童。

身高：山区儿童初生时期身高约近50厘米，头3个月每月增长3.5厘米，3—6个月每月增长1.9厘米，后半年平均每个月增长1.1厘米，第一年共增长22—24厘米，第二年增长10—11厘米，以后年递增5厘米。胸围：山区初生儿的胸围平均在32.6厘米，头3个月平均每月增长2.1厘米，3—5个月平均为1厘米，以后每年递增均1.5—2.5厘米。

头围：山区正常儿童初生时为33.4—34厘米，头3个月每月增长2厘米，3—5个月每月增长1厘米，后半年每个月增长0.5厘米，以后每年递增0.5厘米。

初生时头围比胸围约大1厘米，因胸围发育快于头围，故至1岁以后胸围逐渐赶上并超过头围的值。因此，观察头胸交叉的时间亦可作为衡量发育是否正常的指标。一般地说，头胸围交叉的时间延长至两岁以后为胸围发育落后的表现，本市山区儿童头胸围交叉时间，男童为12个月，女童为15个月。

上臂围：山区儿童初生时上臂围为：男，10厘米，女，9.64厘米；6个月时，男，13.9厘米，女，13.31厘米。12个月到2岁这一时期有波动，2—7岁内在14.2—15.5厘米之间。

从上述6项指标分析看，本市山区县儿童生长发育各指标值呈常态分布，其均值与中位数值相差甚微，均值的50%、95%的可信间区与25—75%和3%—97%百分位数值接近，说明本调查资料两类统计指标效果一致。

六项指标测量值的生长趋势，符合一般生长发育规律，各项指标的均值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而身高、体重的年增长值与年增长率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例如：1.5岁男童身高增长值为9.53，年增长率为12.21；而5.5岁年增长值为5.67，年增长率为5.39。有性别的差异，男童高于女童。

儿童死亡回顾调查 1987年初，咸阳市妇幼保健站参照全国1986年婴儿死亡调查方案，对各县区1986年度0—7岁儿童死亡情况进行了回顾调查。本市1986年总人口为3793519人，接受调查958858人，占全部人口的25.3%。调查内出生19012人，出生率为19.83‰。0—7岁儿童人数为135479人，占调查人数的14.13%；0—7岁儿童死亡1087人，其中围产儿死亡755人，新生儿死亡649人，婴儿死亡884人，1—3岁死亡109人，4—7岁死亡

68人。

二、儿童疾病矫治与全面驱蛔

本市儿童疾病、缺点矫治工作，重点是解决贫血、佝偻病和营养不良问题，最高矫治率为67.4%，最低矫治率为30.4%。佝偻病在活动期采用维生素D₂或D₃肌肉注射；贫血采用药物治疗和饮食调整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对轻度营养不良者以指导哺养为主，自1983年以来，二、三度营养不良已基本消失，轻度营养不良患病率大幅度下降。1986年以来，对小儿佝偻病、营养性缺铁性贫血、肺炎、腹泻也进行了重点防治。

1979年为国际儿童年，按照国家三部一局通知精神，省上拨给本市驱蛔专款7.5万元。咸阳地区卫生局、财政局、商业局联合通知，决定为全区1—7岁儿童免费驱蛔，并优先保证独生子女。药品选用“驱虫净”，由医药公司按批发价供应。先在咸阳市区进行试点，检查农村及工厂儿童共410人，以大便检出虫卵为确诊指征。试点中农村儿童检验大便200份，检出人数124例，蛔虫感染率为62%；工厂（西北国棉一厂）检验大便210份，检出人数35例，蛔虫感染率为17%。随后，在全区14个县市展开了全面性的驱蛔工作，要求达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送药到手，看服到口，吐了再补，咽下再走的程度。据统计，全区1—7岁儿童624696名，服药人数为575946名，服药率为92.2%；总排虫人数为447087名，驱虫率为77.6%。

三、幼托卫生

咸阳市1988年有市区、厂矿、县城托幼园163所，收托儿童11000余名。咸阳市妇幼保健所以西北国棉二厂保育院、秦都区幼儿园、西北国棉一厂幼儿园、咸阳市机关幼儿园为重点，开展示范性的托幼院（所）卫生保健工作。结合各园、所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保健工作制度、健康检查制度、生活制度、个人卫生制度、传染病管理制度、库房厨房饮食卫生制度、膳食营养制度、安全卫生制度、家长须知等，做到制度健全、有章可循。同时实行“四卡”（健康检查卡、预防接种卡、传染病管理卡、季度身高体重测量卡）、“六册”（晨间检查册、疾病登记册、发病逐年对照册、发放预防药物登记册、卫生检查评比册、体重身高汇总分析册）、“一表”（膳食营养分析表）制度，力求做到儿童健康情况底子清，资料全。

在控制传染病方面，以计划免疫为主，健全必要的免疫卡册，指导保教人员严格按照免疫程序，做好全程足量的接种和服药，使托幼园、所儿童的预防接种率在90%以上，示范性幼儿园、所的四苗覆盖率在95%以上。同时做到“五个一”（即一人一巾、一杯、一碗、一勺、一绢），食具每餐消毒；儿童活动室、寝室保持空气新鲜；坚持紫外线消毒，控制传染病不继发、不流行。

第三章 医疗

第一节 医疗机构

境内历史上的医疗机构除秦、汉时的皇宫、皇家医疗机构外，别无史料可考。各县城、镇内的中药铺子，常有坐堂医师应诊，为百姓治病解痛。在农村替广大群众治病的，则是手摇铃铛的游医（又称“郎中”）。西医学于1911年传入境内，三原县始有“荣华医院”。直到建国前夕，境内仅有12所县卫生院，116名医务人员，171张病床。

建国后，咸阳市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很快。截至1989年，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医药卫生机构550个，病床8484张，平均每496人1张病床。卫生系统职工15553人，其中医务科技人员13092人，主任、副主任医、药、护师419名，主治（管）医、药、护师1950名，医、药、技、护师3977名，医士2004名。全市平均每336人有1名医生。医疗卫生机构中，200张床位以上的综合医院有7个；100张床位以上的综合医院有17个；县区属中医医院12个；地段医院、乡（镇）卫生院211个；村级医疗站（保健室）4253个；工矿企业及其他部门职工医院27个；工厂、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卫生所（室）200多个；另外还有个体开业人员1144人。是年全市各类医疗机构提供门诊治疗436.2万人次，住院治疗11万余人次。到1990年全市共兴办个体和联合诊所1068处。同时城区共拥有卫生技术人员5386人，设置病床3324张。

一、主要综合医院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位于咸阳市区毕原路中段，建筑面积 18000 平方米，医疗区占地 26640 平方米，生活区占地 6700 平方米。职工 403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309 人。1990 年有病床 300 张，固定资产 702.88 万元。1989 年门诊 103270 人次，收住院病人 3668 人次，业务收入 159.6 万元。该院是一所科室门类齐全、仪器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专科特色突出、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于一体的市级综合医院。

医院属咸阳市卫生局直属单位。除承担辖区的医疗、预防、保健任务外，还担负着市辖 14 个县区的医疗培训、抢险救灾、市卫生学校及省内其他医学院校学生的生产实习和援外医疗等项任务。

医院临床科室有：内一、二科，外一、二、三科，妇产科，儿科，传染科，中医科，眼科，皮肤科，耳鼻喉科，口腔科，急诊科，手术麻醉科，针灸科，理疗科。

医技科室设有放射科、检验科、药剂科、功能检查科、胃镜、支气管镜、肠镜、B 超、心电图、脑电图室、预防保健科、供应室、病理科、同位素室。

该院获得卫生技术职称的医务人员共 278 人，其中主任医师 1 人、副主任医师 6 人、主治医师 33 人、主管药师 3 人、主管技师 3 人、医师 60 人、麻醉师 3 人、技师 6 人、医技士 24 人、药剂士 16 人、药剂员 3 人、主管护师 1 人、护师 32 人、护士 87 人。

医院是 1958 年 8 月由宝鸡工合医院与西安西北区级贸易职工医院合并而成，初名为陕西省商业职工医院。1969 年 12 月，移交咸阳地区并搬迁至礼泉县市政街。1970 年 2 月更名为咸阳地区人民医院，1984 年 10 月更名咸阳市人民医院。1987 年 10 月更名为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并迁移今址。

60 年代，妇产科开展了子宫切除手术，成功地为一例患者摘除了 24 斤重的卵巢囊肿；眼科开展了白内障摘除术；内科治疗一例脊髓神经炎患者；外科治疗一例烧伤面积达 60% 以上的患者；外科在脑外、肝脏手术、食道癌切除术、内科活组织穿刺均获成功；放射科、检验科检查项目不断扩大，有力地配合了临床工作。

70 年代，医院逐步开展了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如针刺麻醉、中药麻醉、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中药治疗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等。同时增设了中

医科病房、中药房，建立了皮肤科、肿瘤科、病理室，恢复了口腔科，完善了五官科建制，选送了一批人员外出进修学习，增添了一些医疗器械，如400毫安X光机、B超、A超、肝扫描机、牙科综合治疗机、万能手术床、肾图仪、气管手术镜等，开展了同位素检查及放免技术，提高了对疑难病的诊断准确率。1977—1979年组织两期地甲病手术队，共做手术600余例，未发生任何意外，受到省卫生厅表扬。妇产科开展了人工阴道再造术、两性治疗术及不孕症的研究工作。小儿科每年抢救危重病人200人次左右，主要病患者为乙脑麻疹、合并肺炎等。

80年代，医院医疗技术发展较快，相继添置了大型B超诊断仪、脑电图、眼底荧光造影机、日产800毫安X光机、各类监护仪、钾钠离子分析仪、血气分析仪、电子显微镜、显微外科手术镜以及各种内窥镜；先后配备了大卡车、大轿车、救护车各一台；增设了急诊科、功能检查科、医疗器械科、预防保健科、手术麻醉科；分设内一、二科，外一、二、三科病区。医疗技术随之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外科人员结构趋于合理，逐渐形成了颅脑、泌尿、骨科、普外（肝胆、胃肠）、显微外科、肿瘤科、心胸外科等专业组，外科主任医师张福祥主持的颅脑外科可以做矢状窦脑膜瘤摘除、桥脑小脑角肿瘤摘除术，许培尧主任医师主持的胎儿胸腺移植治疗晚期癌症恶液质术，骨科人工股骨头植换术，普外开展的三脏器切除术、脾肾分流术和1986年开展的断指（趾）再植手术，都具有一定影响。1988年9月，以冯卫国为首的心胸外科小组，成功施行第一例心内直视手术，到1990年共计做21例心内直视手术。目前能开展室缺合并肺动脉高压矫治、房室管畸形矫治、干下型室缺流出道狭窄矫治、二尖瓣交界分离术等难度较大的心脏手术。内科抢救成功一例电击心跳骤停30分钟的患者，重症黄色肝坏死，人工心内临时起搏术，中心静脉压测定术以及抢救大量流行性出血热、乙脑、棉酚中毒的重危患者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妇产科开展的腹膜外淋巴结清扫、子宫广泛切除加化疗根治晚期宫颈癌术获得省内专家的好评。眼科1985年4月开展人工晶体植入术两例获成功，1986年3月，刘铁民医师等成功地进行了首例同种异体角膜移植术，1989年5月又开展了首例眼底荧光造影术。

在此期间，医技科室也得到了较快发展。放射科自己动手安装调试400毫安X光机，并派出4名同志外出进修学习诊断和X光机维修，1986年购置日本岛津公司800毫安X光机，1987年一次调试运转成功，为医疗技术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展了透视、拍片、造影、断层摄影等业务，分设了诊断组、技术组、维修组，日工作量可达100—150人次左右。同位素开展AFP、CG、CEA等放免测定。理疗科有26台件声、电、光、磁热牵引等医疗设备，治疗病种有运动、神经、消化、肌肉等系统病症。检验科设备较为先进，业务范围有生化、细胞、粒子、血清临检、酶免等项目，检测项目由初期的20余项增加到现在的200余项。药剂科在1980年后，制剂工作发展较快，日产大输液1000瓶，可做针剂、片剂、中药制剂、混悬液20余种，普通制剂可以配制100多种水剂，散剂、丸剂等以供临床使用。药检室采用“非水法测定控凝剂中枸橼酸钠含量测定”，已通过市级鉴定并被评为市级科研成果。

下乡巡回医疗和抢险救灾是医院的一项重要任务。1965年7月至1979年10月，共派出医疗队26期，参加医务人员达400余人次，诊病400万人次，做手术4500余例，行程约4万公里，培训农村医疗站乡医、卫生员1000余人次。其中柞水县支农5期，淳化县支农4期，河南省驻马店抗洪救灾1期，泾阳县支农1期，礼泉县支农2期，彬县支农3期，永寿县支农2期，旬邑县支农2期，长武县支农1期，咸阳市抗震救灾1期（治疗唐山地震伤员），周至县及白河县地甲病手术队各1期。参加重大抢险救灾8次。

护理工作是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1953年至1962年各科室均有护理单元，能够胜任各种重危病员的护理以及烧伤、重大创伤、胸、脑手术后的特护。1958年，咸阳市举行护理质量大检查，医院护理部获质量检查及综合检查第一名。同年9月符文、冯小菊、成小峰获咸阳市护理知识竞赛团体第一名。1966年该院供应室获咸阳市供应室大检查第一名。1975年在医务组内设护理专干，主管全院的护理工作。1978年10月，咸阳地区护理分会举办技术操作大比赛，该院取得总分第一名。1979年9月，护理部正式成立。全院设内、外、儿、妇、五官、门诊、手术室、供应室等8个护理部。1981年至1988年，先后选派70多名护士外出学习内科、外科、手术室、婴儿室、供应室、急救、心电监护、重症创伤、围产期等科室的护理及管理技术。1988年全院有12个护理单元，共有护理人员120名。

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位于咸阳市人民路东段，占地4800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3471平方米，有职工547名，其中技术人员417名。1993年拥有病床450张，日门诊量平均在千例左右，年门诊量在30万人次以上，住院病人年计9000多人次，年急诊手术370多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

经济的发展,医院在建筑设施、仪器设备、医疗技术、教学科研诸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一所环境优美,设备齐全、技术力量雄厚、专科特色突出的国家三级乙等医院。

该院属咸阳市卫生局直属单位,担负着全市14个县(区)人民的医疗保健任务和全市各级医疗卫生单位的卫生技术人员培训、抢险救灾以及援外医疗等项任务,还承担着第四军医大学、西安医科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医疗系等高等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实习任务。

医院前身系陕西省第三疗养院,成立于1953年1月25日。1954年1月,改称陕西省第三康复医院,主要任务是收治中国人民志愿军慢性伤病员。至1955年11月15日,在先后收治的988名伤病员中,病愈出院818人,转院155人,死亡12人,治愈率为83%。1955年12月开设门诊,面向社会服务。1956年7月1日,更名咸阳市第二医院。院址在咸阳城区仪凤街。临床科室设有内、外、妇产、小儿、五官、中医科等。

1963年改名咸阳市医院。1987年复称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科室有:内科(含呼吸、消化、内分泌、血液等专业组),综合科(神经内科、心血管病科),干部病房管理科,普通外科,神经外科,肝胆外科,创伤外科,泌尿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传染科,中医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急诊科,麻醉科,手术室,家庭病床科,针灸室,理疗科等。医技科室设有:放射科、检验科、药剂科、功能科、CT室、预防保健科、病理科、消毒供应室等。医院医务人员425名,其中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药师14名,主治(管)医(护、药)师94名,医(技)护师165名,医(技)护士150名。

创伤外科是该院的一大特色,院长周解围是省内著名的颅外专家。咸阳市创伤外科中心、咸阳市儿麻矫治中心、咸阳市中心血库就设在该院。

普外科在1956年开展了阑尾、疝气、瘘管手术,1959年做了第一例胆囊切除术。此后,开展了肺叶切除术、三脏器切除术、肾切除、输尿管结石取出、膀胱结石粉碎、前列腺切除、支气管造影、乳腺造影、人工血液净化等。肝胆外科是该院的重点专科,主任医师安东均设计的“闭式胃冠状静脉栓塞加脾肾静脉分流治疗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大出血的手术方式”在首届中华医学会消化道出血专题大会上作了报告。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胆囊残株癌”的命名,在中华医学会第五届全国胆道外科会议上被确认。内科能运用先进设备及最新治疗方法对心、脑、肝、肾等疑难重症进行准确诊断和

卓有成效的治疗。

妇产科开展了阴道式子宫切除术、阴道式子宫修补术、外阴修补、输卵管修补及各类妇科肿瘤切除。小儿科用肝素治疗新生儿硬肿症，对各种原因引起的心力衰竭、心肌炎、大剂量激素治疗肾病综合症等均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传染科先后开展了纤维蛋白元测定，粒细胞核的突起变异计数法以及血清治疗，聚细胞治疗等，流行性出血热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重氮乳凝试验的流脑早期诊断。传染病报卡率长期保持在 100%，曾得到国家卫生部的充分肯定。眼科的人工晶体移植，耳、鼻、喉科的乳突根治，气管异物取出，内分泌的 RIA 测定，以及皮肤病门诊治疗均具有明显的优势。脑外、骨科、普外、泌尿、五官、皮肤等科室一些项目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的标准。

检验科开展了肌酐、AFB（甲胎蛋白）测定、LgM、LgG、LgA（系列免疫球蛋白）、C3 以及甲肝、乙肝系列、室间质控及血液质控等。药剂科目前已注册的 15 项 180 余种制剂，年产值 40 余万元；其中苦胆木总生物碱的降压研究获省、市科技成果奖及卫生部乙级二等奖。

医院坚持医疗和科研相结合的方针，多年来，造就了一批术德咸铭的医务人员。其中院长周解围 1988 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副院长王克俭以胸外见长，主任医师程准权以心血管树帜，副主任医师宋思明以耳鼻喉闻名，传染科副主任医师张淑群，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素侠、王恕，副主任药师陈思荣在咸阳医务界享有盛名。在他们的带领和培养下，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正在成长，人才梯队结构已初步形成。每年参加全国性学术论文或在全国性杂志上发表论文 30 多篇。

医疗用房及仪器设备也在不断地更新，现已有能制 200 种药剂的现代化制剂大楼，1980 年 6000 平方米的住院大楼落成交付使用。购置有日本产 CT 机、荷兰产 100 毫安 X 光机、高压氧舱、美国产人工肾 2 台、日本产纤维结肠镜、纤维胃镜、B 型超声、脑电图机、脑、心流图机。有进口双人双目显微镜、钾钠分析仪、血球计数仪，眼底电图仪等大型精密医疗器械。

医院负有巡回医疗任务。1965 年，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先后派出 4 批 62 人次到咸阳市 6 个公社巡回医疗，共收治患者 29047 人，抢救重危病人 452 人次，做手术 784 人次，动员实行计划生育 232 人次，培训接生员、卫生员 556 人次，开办半农半医学习班 6 个，1966 年至 1975 年，每年派出 3—5 人医疗队赴淳化县巡回医疗，每

期3—6个月。1976年,接收在唐山地震中的197名伤员来院治疗。

医院于1979年设立护理部,并任命总护士长。到1990年底,全院共有护理人员184名,其中主管护师8人,护师67人,护士100人。1980年咸阳市护理基本功比赛中获得6个单项第一名。1983年以来在小静脉穿刺、定期消毒、胸腔注射、股动脉穿刺等方面有了较大提高,治疗操作实行了盘子化、车子化、程序化、标准化。1988年,内科护士长杜秀兰被国家卫生部命名为优秀护士。

省第二纺织职工医院 位于咸阳市渭阳西路,隶属陕西省纺织工业公司。占地面积为2910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26325平方米,其中门诊4000平方米,病房9600平方米。1990年有职工398人,病床300张,是一所科室齐全的综合医院。

该院1973年筹建,初名咸阳地区纺织职工医院。1979年10月,更名陕西省第二纺织职工医院。1981年设床位101张。1990年增至300张。

医院临床科室设有内、外、妇、儿、五官、中医、皮肤、传染、急诊、麻醉手术、理疗、家庭病床等科。卫生技术人员295人,其中中医师8人、西医师100人、中西医结合高级医师1人、护师48人、中药师1人、西药师14人、检验师8人、技师3人。专业技术骨干有内、外、儿、五官等科副主任医师5人,各科主治医师23人。

西藏民族学院附属医院 位于咸阳市文汇东路,是一所综合性的教学医院。该院承担全校师生员工家属的医疗保健及西藏驻咸阳干休所老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同时还担负着西藏民族学院医学系临床教学及学生实习任务,并全方位向社会开放。

该院共有职工150人,其中高级卫生技术职称9人,中级技术职称50余人,拥有病床120张。科室设置齐全。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急诊科、传染科、中医科、针灸科、理疗科、口腔科、五官科、皮肤科。辅助科室有:检验科、放射科、药剂科、B超室、胃镜室、心电图室、心功能室、脑电图室。技术力量较强,业务范围较广,设备较为先进,在社会上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核工业部西北地勘局二一五医院 位于咸阳市渭阳西路,隶属西北地勘局。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700平方米,其中门诊1700平方米,病房4000平方米。1990年有职工138人,开设病床153张,是一所科室较为齐全的综合医院。

医院前身是第二机械工业部西北一八二医疗队。1974年更名为陕西省二机局职工医院，编制56人，床位60张。1981年建成医疗楼，改为核工业部西北地勘局二一五医院。主要任务是承担本系统西北五省及华北各地勘大队职工家属的防病治病任务，同时也面向社会。

医院临床科室设有内、外、妇、儿、传染、五官、中医等科，还有理疗室、手术室。医院有99名专业技术人员，其中中医师1人、西医师36人、护师9人、西药师4人、检验师2人、技师2人。专业技术骨干有内科副主任医师1名，内科、外科、放射线科、传染科主治医师14人。

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中心医院 位于咸阳市文林路，隶属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医院占地面积19611平方米，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到1990年，有固定资产430万元，床位编制300张，是一所技术力量较强，医疗设备较为先进的全民所有制综合医院。

医院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十师医院，组建于1949年4月20日，1984年1月集体转业，1987年12月10日由青海省乌兰县迁入咸阳市城区开诊。临床科室设有：内一科、内二科、妇产科、外科、综合科、五官科、口腔科、耳鼻喉科、中医科等科室。医技科室有：检验科、放射科、特检科、血检科。还有药械科、手术室等。专科门诊有：血检病、小针刀、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视神经萎缩、肿瘤等专科。

1990年，全院有职工260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0人，中级技术职务47人，卫生技术人员占全院职工总数76%。服务范围以局内职工、家属为主，重点专科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

二、主要中医医院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原址位于咸阳市区胜利街东段。占地面积39662平方米，建筑面积26400平方米。1986年，部、省两级共投资3900万元，在咸阳市渭阳西路建设新附院。新附院病房楼高达17层，占地10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1578平方米，设置床位600张。医院是一所以中医为主，科室设备齐全，诊断手段较为先进，技术力量雄厚，集教学、科研、医疗为一体的省级医疗单位，是“七五”期间全国七所重点建设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之一。

该院于1952年起开始在胜利街修建，命名为咸阳市人民医院，1956年改名为咸阳市第一医院。1961年陕西中医学院由西安迁至咸阳，遂改名陕西中

医学院附属医院。1990年末全院共有职工606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475人:中医师123人、西医师11人、中西医结合高级医师13人、护师78人、中药师15人、西药师15人、检验师10人、技师10人、护士69人、中药剂士16人、西药剂士15人、检验士15人、护理员3人、初级卫生技术人员44人、其他技术人员38人。管理人员42人,工勤人员89人。著名专家有妇产科主任医师姜伟君,中医眼科主任医师张子述,中医内科主任医师杜雨茂、张学文,中医妇科主任医师韩天佑,中西医结合内科主任医师王朝宏,针灸主任医师郭诚杰。

临床科室设有内一科、内二科、外一科、外二科、妇一科、妇二科、骨伤科、肛肠科、儿科、传染科、肿瘤科、眼科、针灸科、气功推拿科、康复理疗科、急诊科、手术室、麻醉科、气功按摩科、口腔科、耳鼻喉科、保健科。医技科室有药剂科、放射科、检验科、设备维修科、诊断科(同位素、心电图、A、B型超声、脑血流图、脑电图、病理、内窥镜室),行政科室设有院办公室、后勤办公室、医教办公室(图书资料室、病案统计室、护理室)、保卫科、基建办公室、门诊部(收费室、住院处、住院管理处)。党群机构有党委办公室,团总支,工会。

大型医疗设备有德国西门子全新全身CT机、中心监护仪、床边监护仪、微循环测速仪系统、600毫安X光机、X光数字减影系统、动态心电监护系统、血球自动分析仪、PCR仪电复律装置及CCU病房、多项生命体征监护仪、平板人工肾、欧林巴斯胃镜、B超诊断仪,多普勒B超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钾钠自动分析仪、裂隙灯、心电多相心脏病鉴别诊断仪。

医院中医特色突出,针刺治疗乳腺增生,柔脉冲剂治疗高血脂、动脉硬化,结肠炎丸治疗结肠炎等分别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省级科研成果奖。中医手法复位治疗各类骨折及软组织损伤,穴位封闭治疗各种妇科病及疑难杂症,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肛肠症、眼底病、白内障等均获得显著疗效。“骨痹敌”治疗骨关节结核的科研成果为广大患者带来福音,并获得卫生部科研成果奖。临床各科室在常见病、疑难杂症的诊治中,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运用中医药治疗大面积烧伤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肛肠病等疗效显著,得到广大患者的好评。

心病科治疗冠心病、高血压病、心肌炎、风心病、肺心病、心肌病、难治性心衰、各种心律失常等疾病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科室研制的“洋参强心灵片”、“心怡康口服液”治疗急性病毒性心肌炎,已通过省级鉴定;

科室研制的“活心胶囊”、“心复宁片”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强心宝片”治疗心衰效果显著。

脑病科曾承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标课题“颅脑水瘀症”及“脑窍通口服液促进中风病早期康复的作用研究”，省科委中标课题“中医中药防治中风病的治疗与实验研究”。研制的“一贴清降压垫”通过了省级鉴定，并已投入批量生产。

骨伤科成功地进行了断肢再植，开展了狄克氏钉（DICKS）及嘎马钉（CAMAR）内固定术，可为骨折病人解除长期卧床的痛苦，所研制的音响牵引床，提高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病人的治疗效果。

医院结合临床研制了 100 多种草药验方制剂：复方降压片、生脉注射液、急协 4 号、治感灵、洋参强心灵片、心怡康口服液、7007 注射液、小中风片、通脉舒络液等均因疗效卓著而供不应求。其中，通脉舒络液 1986 年获卫生部重大科研成果乙等奖。

医院每年承担学院下达的临床理论教学 4800—5400 学时，完成学院学生见习 3000—4200 人次，完成学院多个专业，包括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等不同层次学生毕业实习 120 人次。每年接收社会基层医疗单位进修人员 60 人次，接收社会办学的自学考试及成人高校学生毕业实习约 40—50 人次，接收各地市卫生学校毕业生实习 40—50 人次，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

建院以来，院内职工共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1000 余篇，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28 项，地、市级科研成果奖 9 项。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国家或省级以上学科协作组或专业学术委员会的组长、主任委员 16 人。

1985 年来，该院年均门诊 33.89 万人次，年均住院 6538 人次，年中药房供应患者中药 7.5 余万公斤。床位使用率 98.2%，总有效率 95.7%。

此外，医院附设有中风研究室、肾病研究室、骨伤研究室、心血管研究室、急腹症研究室、眼科研究室、中草药制剂研究室及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室，各室均有自己的研究项目和发展目标，部分项目已在国家科委科研招标中中标，正在积极开展工作。

乾县中医医院 南院位于县城南环路南侧，北院位于县城内南什字。医院占地面积 25 亩，建筑面积 11427 平方米，是一所初具规模的全民所有制中医医院。

该院的前身是城关地段医院，1978 年 6 月更名为乾县中医医院。1990 年末全院共有职工 153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131，主治医师 13 人。临床科室

设有中医内科、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中医五官科、按摩科、痔瘕科、针灸科、急诊科、西医内科。医技科室设有放射科、检验科、心电图室、B超室、药剂科。

该院突出中医专业技术特色，深受患者欢迎。中医内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是该院的主要科室。1990年末开放床位100张，全年门诊62032人次，急诊3014人次，住院2273人次，日均门诊170人次，急诊8人次，病床使用率70%，治愈率77%，好转率21%，病死率0.2%。

1983年12月，国家卫生部授予乾县中医院全国卫生先进集体光荣称号。同年又被陕西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1991年被列为全国示范医院建设单位。

三原县中医医院 位于三原县城盐店街9号。占地面积2480平方米，建筑面积2182平方米，共开设病床160张，是一所初具规模的全民所有制中医医院。

该院前身系三原县城关地段医院，1978年改建为三原县中医医院。1990年末共有职工144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20人。其中副主任医师2人、主治医师5人。临床科室设有痔瘕骨伤科、中医内科、家庭病床科、针灸科、西医内儿科、皮肤科。另外还有手术室、急诊室、癫痫病室、按摩室、节育室。医技科室有检验科、放射科、药械科、心电图室、A超室、B超室、超声心动图室、脑血流图室。

1990年全年门诊114851人次，急诊6136人次，住院1131人次，日均门诊314人次，急诊17人次。病床使用率82.2%，治愈率69.7%，好转率24.8%，病死率0.9%。是年新院址2100平方米门诊楼和100张床位的住院楼同时交付使用，开设两个门诊部，增设急诊科及急诊观察床20张，针灸、痔瘕、骨伤病床各增加到15张，增设中医儿科，中医妇产科病床各15张，职工增加到170人，医疗设备投资增加到20万元。

彬县中医医院 位于县城内东大街，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是一所全民所有制中医医院。

该院前身系彬县城关地段医院，1985年12月改为彬县中医医院。1990年末，全院共有职工53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46人。卫生技术人员中中医师13人，其他医务人员33人。专业技术突出的是中医内科、儿科、妇科、针灸等。1990年末开放床位27张，日平均门诊病人300人次。

医院固定资产总值25万元，其中大型医疗设备总值3万元。

医院于1987年兴建了一幢2080平方米的门诊楼，1988年交付使用，病床增加到40张，人员增加到70人，医疗设备总值增加到10万元。

第二节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

一、中 医

中国医学在咸阳的历史上有着极其光辉的一页。春秋战国时期，中医药已相当发达，名医常跨国行医。公元前581年秦桓公派医缓为晋景公治病，他指出晋侯的病“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见《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后秦武公有病，请赵国名医扁鹊诊治，扁鹊从邯郸出发，来咸阳为武公治好了病。据载当时秦国中药材品种达242种，方剂达280个（见郭沫若著《中国史稿》）。

汉代长陵人安丘望之，不愿做官，只在民间行医。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汉书》中记载了西汉时期的医事制度、医药著述、医林人物等医药文献。

唐代医药卫生有了很大发展。曾任广州都督的咸阳人王方庆，兼精医药，著述甚富，计有《新本草》41卷、《药性要诀》5卷、《袖中备急方》3卷、《岭南急要方》2卷、《针灸服药禁忌》5卷和《随身左右百发百中备急方》10卷等。

明末清初，咸阳境内涌现了一批名医。三原人张征曾任职太医院，治病有方，升为御医院判。泾阳张碧山精通“八法神针”。王春阳人称“诊脉用药，皆世医所不及”。刘文恒医术高明，被人称为“刘一帖”，意为治病只需一剂药。三原的名医还有张昶、陈光道、李仲元、董凤肿等。李仲元医术超群，被当地人称“李半仙”。董凤肿擅长疹科（天花），著有《痘疹经验良方》6卷。清医刘企向（号梧林闲叟），咸阳县人，先儒后医，著有《月婴宝笈》，简明详切，便于据症验方，对诊治新生儿之疾病颇有裨益。咸阳人李绪羸，因母病，遂致力于医，著有《医学临症举隅》。礼泉的名医有韩福恒、高珍、梁玉树等。高珍精于脉理，善治疑难病症。梁玉树是外科名医，善治痈疽，并能炮制外用药物。兴平名医张炯，穷究医术，用药必以《神农本草经》为据，立方必按仲景规范，治病多见奇效。杨双山撰有《医论专门》、《医学回刍》、《医学称赞》等，其所著《经验备忘碑录》残碑现存陕西中医

学院医史博物馆内。

1929年3月27日，汪精卫之流曾提出“废除中医，锢禁中药。”武功县人焦易堂据理力争，将此摧残民族优秀文化，有害民族保健议案予以否决。后来焦易堂被委任为中央国医馆馆长，提出要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力主中西医结合。他还创办了中医药杂志，编辑出版了部分中医药教材，办起了国医学校。此外，境内名医有兴平县的冯幼清（1904—1979），在三原行医的房温如（1903—1981），著有《脏腑用药所主》、《十代名医赞》、《王润元医案类评》、《简易方药实验法》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50年代中期境内各县综合医院均增设了中医药科室，聘请中医药人才，诊治疾病，自愿带徒。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城乡各地中医药人员自愿结合办起了一批中医联合诊所或联合医院。咸阳市城区解放初就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中医个体联合诊所。第一联合诊所是1951年在“宝和堂”的基础上成立的。第二联合诊所是1953年在“仁寿堂”的基础上成立的。第三联合诊所是1954年由一些外地来咸的中医人员自愿结合成立的。1956年这三个中医联合诊所及城内一个西医诊所合并，成立了咸阳市联合医院，以中医为主。1955年，永寿县成立了县中医院。60年代，境内3900多个生产大队相继办起了农村合作医疗站，地段医院、公社卫生院多数附设有中草药专柜，配备有中医中药人员，缓解了农村看病难的矛盾。70年代到80年代末，各县区陆续都成立了中医医院。

与中医医疗机构迅速发展相适应，本市中医药专业队伍也逐年壮大起来。据1950年统计，咸阳专区8县（咸阳、泾阳、三原、兴平、高陵、周至、富平、礼泉）共有中医师544人。到1960年全区总计有中医人员1146人，其中国家卫生部门100人，企业及其他部门28人，农村人民公社206人，农村乡镇的个体联合诊所812人。

到1990年，全市共有中医药人员2378人，占全市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17.2%，其中中医师1404人，中西医结合高级医师32人，中药师134人，中医士426人，中药士254人，中药剂员128人。在中医药人员中，主治（管）职称以上的有606人，占中医药人员总数的25.4%。同时，全市共有中医病床730张（不含市、县、区医院的中医科病床）。三原、泾阳、武功、乾县、永寿、彬县、礼泉、旬邑、长武、兴平10县中医医院共设置病床465张，职工622人，其中中医师125人，中西医结合高级医师3人，中药师6人，中

医士 33 人，中药士 35 人，中药剂员 19 人。是年，全市中医医院共计门诊人数 650142 人次，住院 12644 人次。

随着中医事业的发展，中医药理论的研究，中医诊疗疾病的水平不断提高。陕西中医学院张登本主编《内经词典》、《黄帝内经灵枢经析义》获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杜雨茂主编《伤寒辨证表解》、《奇难病治疗指南》，张子述主编《中医眼科简诀》，郭城杰的《针灸医籍选》，韩天佑的《妇科产前产后自疗法》，郭谦亨的《中医诊断法》等著述相继问世。张学文研制的“通脉舒络液”治疗脑血栓形成获卫生部 1986 年重大科研成果奖，“小中风片”获省中医管理局科技成果一等奖。张振亚的“骨痹敌注射液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获全国医药卫生科技奖。省二纺职工医院李去病所写《逐瘀抗痛法缓解癌性疼痛观察》论文，曾在第四届国际缓解疼痛学术会上宣读。朝阳医院张朝堂研制的“双止灵”具有止疼、止血、消炎、生肌的作用，可作手术麻醉，术中无痛、无血、抗菌，可促进术后伤口愈合。

二、中西医结合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西医结合。50 年代，境内各综合医院均设有中医科或中医师坐堂门诊，中西医共同查房会诊，为开展中西医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60 年代，中西医结合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特别是 1961 年陕西中医学院及其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在咸阳建成后，中西医结合逐步趋向规范化。从 1959 年到 1986 年，陕西中医学院共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7 期，为全省各地培养中西医结合高级卫生技术人员 571 名，促进了全省中西医结合的广泛开展。

70 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医务人员的努力实践，中西医结合已取得丰硕成果。1971 年 12 月，咸阳地区卫生局在市文化宫举办了中西医结合图片展览，展示了市境中西医结合的实况。如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 596 例，其中急性阑尾炎 405 例、胆道蛔虫 108 例，取得满意效果。咸阳地区医院、兴平县桑镇医院开展针麻手术 25 种 169 例，有效率达 97.5%。1974 年礼泉县精神病院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疗精神病 227 例，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病作出了大胆的尝试。咸阳地区地方病防治所用《中草药消瘦注射液》治疗地方性甲状腺肿 3678 例，治愈 2701 例，治愈率为 73.44%，显效 122 例，总有效率为 87.28%。1980 年，三原县医院研制成功“中药消炎一号”治疗眼病；泾阳县医院用“压穴”治疗尿潴留；市二院用“苦木”治疗高血压，针刺治疗神经

麻痹；省二纺医院用中药“清热泻脾散”治疗单纯性疱疹；陕西省彩色显像管总厂职工医院用单味蝉蜕治疗破伤风；咸阳地区人民医院用“十号止血粉”治疗出血热等，均获得满意的临床治疗效果。1982年，永寿县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阑尾炎，咸阳地区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胫腓骨骨折亦收到了良好的临床效果。咸阳地区卫生局研制的“野萝卜防治慢性支气管炎”，获1976年国家级科技成果奖。1989年核工业部二一五医院赵步长医师发明的“药气针”、“药气帽”治疗脑血栓引起的偏瘫有奇效，被患者誉为“神针”。

第三节 西 医

西医传入境内的时间是清宣统三年（1911），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在三原县南郊购地20市亩，建成英华医院。还附设了护士学校。1934年，陕西省政府卫生处拨款购买了三原英华医院的全部财产，成立了三原县卫生院。

旬邑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医院设在马栏乡梢义沟，医院建有房屋32间，窑洞20多孔，医务人员60多人，病床80多张，内有内科、外科、检验室、手术室、药房、后勤等科室，主要为部队服务。另外在马栏街设有门诊部，为群众治疗疾病。此外还有解放医院、机关卫生所、关中商店医药门市部等。

咸阳县于1933年选派2名学员到省防疫训练所学习，期满回县后主要负责环境及饮食卫生并推行种牛痘。1936年，江苏人张方策及其妻姜伟君先后从南通大学医学院毕业来咸阳，在城区仪凤东街创办强华医院，主要诊治内、外、妇、儿等科疾病，姜伟君尤以妇产科见长，抢救过许多难产的妇女和婴儿。

建国前，各县卫生院设备简陋，专业上除种牛痘、预防天花、戒毒和进行公共卫生宣传外，仅能诊治内、外、儿、妇各科一般常见病、多发病。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医院、三原县卫生院还可做截肢、阑尾等外科手术。1949年各县卫生院医护人员每万人平均0.58人，病床每万人平均0.85张。

建国后，咸阳的西医医疗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50年代，各县市医院普遍设置了内、外、妇、儿、传染、皮肤、五官、急诊等科室，普及了X光机、显微镜等器械和常规检验项目，内科除能诊治常见病多发病外，还能治疗脑溢血，心律失常等复杂疾病，各县市医院外科多能开展腹部手术，妇产科能做剖腹产手术，一些医院还开展了制剂工作。

60年代，在治疗内科疾病方面，各级医院都能对呼吸系统疾病支气管

炎、肺炎等做出准确诊断和有效地治疗。对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胆结石等病的治疗也有了新的进展。在外科手术方面，能进行胃切除、脾破裂摘除、胆囊摘除、肠梗阻等手术，一部分医院还开展了骨科手术。妇产科除能做剖腹产外，还能进行尿瘘、阴道前后壁修补术、卵巢肿瘤、子宫切除等较复杂的手术。儿科能积极开展消化道、呼吸道以及各类传染病的防治。眼科可开展白内障摘除手术。一些医院还开展了对烧伤病人的治疗。放射科、检验科检查项目不断扩大，有力地配合了临床各科业务的开展。

70年代，地、县（市）综合医院普遍开展了皮肤科、肿瘤科、口腔科业务。城区各大医院均设立了病理室，选送医务人员到全国各大医院进修学习，增添了比较先进的医疗设备，如心电图机、A超、B超、400毫安X光机。同时还开展了同位素检查等，提高了对疑难病的诊断准确率。市一院妇产科开展了人工阴道再造术，外科开展了肺叶摘除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咸阳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很快，特别是在外科上有了新的突破。市二院脑外科成功地开展了脑矢状窦分流治疗积水、第四脑室肿瘤切除、脑动脉瘤结扎、颅脑成形、听神经肿瘤切除等十多种高难度手术，骨外科成功地开展了全关节人工关节置换、脊柱侧弯矫正、断指（趾）再植等几十种难度较高的手术。全市一些技术力量较强的医院都能开展腹腔三脏器切除、食道癌切除、输尿管结石取出、前列腺切除术、脾肾分流等手术。市一院于1988—1990年成功地进行了21例心内直视手术，还开展了人工心内临时起搏术、中心静脉压测定术。三原县医院能开展自体睾丸移植术、动脉导管未闭缝扎术，房室间隔缺损修补术、二尖瓣分离术、心导管检查术、鼻腔泪囊吻合术。

内科能运用先进设备及最新治疗方法对心、脑、肝、肾等疑难重症进行准确诊断和卓有成效的治疗。开展对心血管、脑血管、三衰的突发抢救，挽救了大批患者的生命。市一院内科曾成功地抢救了一例电击心跳骤停30分钟的患者。

妇产科开展了阴道式子宫切除术、阴道式子宫修补术、腹膜外部腹产、外阴修补、输卵管修补以及各类妇科肿瘤切除。市一院开展的经腹膜外盆腔淋巴结清扫、子宫广泛切除加化疗治疗晚期宫颈癌获得省内专家的好评。

小儿科用肝素治疗新生儿硬肿症，对各种原因引起的心力衰竭、心肌炎、大剂量激素治疗肾病综合症等治疗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传染科先后开展了纤维蛋白元测定、粒细胞核的突起变异计数法以及血

清治疗，聚细胞治疗等流行性出血热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重氮乳凝试验的流脑早期诊断。市二院传染科治疗流行性出血热、乙型脑炎的治愈率多年来一直在咸阳市区医院领先，曾得到国家卫生部的充分肯定。

眼科开展了同种异体角膜板层移植及人工晶体植入，网脱治疗，白内障、青光眼手术，眼底荧光造影等。耳、鼻、喉科开展了乳突根治、气管异物取出、鼻内筛窦开放术、上颌窦根治、扁桃体摘除等治疗项目。市二院内分泌的PIA测定以及皮肤病门诊治疗在市内具有明显的优势。

护理工作在医院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11年，英国人荣居安在三原县创办的“英华医院”就附设护士学校。60年代初市一院、市二院在各科室设有护理单元，护士可胜任各科重危病人的护理以及烧伤、重大创伤、胸、脑手术后的特护。70年代初，开始在医务组设护理专干，主管医院的护理工作。1979年市一、二院护理部成立，设总护士长，负责管理内、外、妇、儿、五官、门诊、手术室、供应室等护理工作。护理部设有护士长并建立了各项严格的规章制度。如入院病人接诊制度；分级护理制度；陪人探视制度；护士长查房制度；抢救室管理制度；小药柜管理制度；消毒室隔离制度；查对制度；交接班制度；差错登记制度；护理人员登记制度；病房护士职责；病房护士长职责；使护理工作走向技术操作常规化，各班工作程序化，病房设施规格化的轨道。

第四章 卫生管理

第一节 组织管理

一、卫生机构

市级卫生机构 建国后，咸阳、三原、彬县3个分区分别设有卫生科，专司卫生行政事务。后随政区调整而有所变化。

1953年元月撤销咸阳专区，各县分别由省政府和宝鸡、渭南专区领导。

多在文教部门设立卫生管理科，有的设卫生管理人员。

1961年8月，咸阳专员公署恢复。同年11月成立专署文教卫生局。1963年9月，专署文教、卫生两局分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2月，卫生局被造反派组织夺权，留用人员仅3人，其余5人下放基层或被调离，机关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1968年9月，咸阳专区革委会成立，卫生局业务由专区革委会生产组兼管。1970年9月成立咸阳地区革委会卫生局，下属单位是地区卫生防疫站。

1980年卫生局搬至渭阳中路，设办公室、医政科、药政科、卫防科、科教科。直属单位有：咸阳地区卫生防疫站、咸阳地区地方病防治所、咸阳地区人民医院、咸阳地区三原卫生学校四个县级单位和药检所、妇幼保健所两个科级单位。

1984年地改市后，地区卫生局随之改为咸阳市卫生局。1985年局内增设人事科，直属县级单位增加了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咸阳地区人民医院改名为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地区三原卫生学校一分为二，市卫校搬至咸阳市毕原路，三原卫校改名为咸阳市三原职工卫生学校。

1987年4月，中共咸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驻市卫生局纪律检查小组成立。到1990年，市卫生局内设科室有：秘书科、人事组宣科、卫防科、医政科、药政科、科教科、纪检组共7个。在编干部30人，其中局长1人，副局长2人，纪检组长1人。

县（区）卫生机构 建国后，各县卫生行政工作先由县人民政府第一、二科管理。有关医疗、防疫等卫生业务由县卫生院承担。以后相继建立县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50年代后，多数县设立卫生科。1970年以后，各县卫生局普遍建立，卫生行政的管理逐步稳定和完善。1984年后陆续增加秦都、渭城、杨陵3个区级卫生局。

二、防疫机构

民国以前，咸阳境内无防疫专业机构及专业人员。1940年咸阳县卫生院成立后，医务人员不足10名，仅有一名卫生稽查负责县城的卫生防疫和机关学校卫生，同时组织个体开业医务人员为居民施种牛痘、打防疫针。

1950年，各县卫生防疫仍由卫生院卫生稽查负责。1951年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细菌战的活动中，各县陆续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2年咸阳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成立，同时各县卫生院分别设立卫生防疫股（站），专门负责卫生防疫工作。到60年代，各县卫生防疫站基本健全。各乡（镇）卫生院都有卫生防疫组，各村有卫生员，各大厂矿以及中等以上学校的医疗机构中也有专职或兼职卫生防疫人员。到1990年末，全市有县、市、区卫生防疫站15个，有各类防疫专业人员590名，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卫生防疫网，为全市卫生防疫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市级卫生防疫站 1952年6月10日，咸阳专区防疫消毒站成立，主要任务是消毒和杜绝传染病流行，同时负责环境卫生宣传工作。1953年元月，咸阳专区防疫消毒站移交省卫生厅，更名陕西省卫生防疫站，人员编制50人。内设卫生防疫、消毒、化验、行政管理四科。1954年12月，省卫生防疫站又奉命迁往西安，所有房屋及部分财产、药械交咸阳市，改名为咸阳市卫生防疫站。1958年咸阳县卫生防疫站成立，1959年并入市卫生防疫站。1961年咸阳专员公署恢复，同年冬市卫生防疫站改名为咸阳专区卫生防疫站，共有职工42人，设卫生、防疫、检验、事管及卫生宣教组。

1969年，咸阳专区改为地区，专区防疫站随之更名为咸阳地区卫生防疫站，人员增至80多人。1984年，咸阳地区改为市，咸阳地区卫生防疫站又更名为咸阳市卫生防疫站。到1985年，先后设有计划免疫科、食品卫生科、流行病科、劳动卫生科、环境学校卫生科、卫生宣教科、总务科、预防保健门诊部、办公室。截止1990年底，工作人员增至105名。

咸阳市卫生防疫站与全市各级卫生防疫组织密切配合，协同攻关，在计划免疫、食品卫生、流行病管理、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86年至1988年连续三年被国家卫生部评为卫生文明单位。

县、区卫生防疫站 各县、区卫生防疫站成立时间迟早不一，少数成立于50年代后期，多数成立于60年代中期。其任务是负责各类生物制品的分配、接种、传染病防治、卫生宣教、劳动卫生、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的组织部署检查等。每年的元旦、春节、五一、国庆等重大节日，均安排群众性卫生运动，配合厂矿、学校开展职业病、常见病的调查，提出防治意见与改进措施。

三、医事机构

陕西医史博物馆 前身是始建于1965年的陕西中医学院医史陈列室，当时此室藏有100多件文物和图书。1966年底，陈列室遭受破坏。1975年重

建，1978年5月建成开放，定名为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张厚墉担任馆长。1984年9月建成了新展厅，增加陈列设施，调整了陈列内容。展室面积由130平方米扩展到360平方米。1991年4月，经陕西省教育委员会及陕西省文物局批准，更名为陕西医史博物馆。

医史博物馆创建10多年来，征集了许多珍贵文物与文献，藏品的质量与数量均居全国医史博物馆前列。下设办公室、陈列部、研究室、教研室、资料室，陈列部分为医史陈列室、铁盒陈列室和小碑林（药方碑），陈列面积500多平方米。珍贵文物有新石器时代砖石、战国时铜砭针、西汉药器、明代益元堂药罐等。

陕西医史博物馆是全国第一所医史博物馆。创建后，一直承担着陕西中医学院医学史教学任务，并为陕西周边地区医药院校学生和国内许多医史研究生参观和教学服务。同时向国内外的医药史、科技史专家学者、医务工作者及医药爱好者开放。先后接待参观者数万人次。该馆在医药史的教学科研、实地考察、文献整理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有的已被编入国内药理学现行教材，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咸阳市红十字会 成立于1952年，会长赵百平，副会长陈德俊。1988年2月29日改选，会长王兆亭，副会长张有才、穆熙璋、张毅、韩忠印、马世杰。秘书长张毅。副秘书长马康民。理事会设常务理事9人，理事11人。

中华医学会咸阳分会 中华医学会陕西省咸阳分会第一届理事会于1978年6月20日在咸阳成立。会长张有良，副会长王朝宏、王树梓、许仲珊。秘书长吴宗民、范荣培。理事会设常务理事11人，理事22人，下分内科、外科、儿科、妇产、检验5个学组。第二届理事会于1979年5月19日在咸阳召开。选出会长陈万丰，副会长王树梓、许仲珊。秘书长施耀华，副秘书长吴宗民、范荣培、张暄、杜志德。设常务理事16人，理事16人。办有《咸阳医药》杂志，属内部刊物，1980年至1983年共出3期。除正常学术活动外，召开了眼科学术年会（1980年11月17日）、外科学术会（1982年11月18日）。第三届理事会于1984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咸阳召开。选出会长穆熙璋，副会长王朝宏、张福祥、叶毓龙、李江峰。秘书长李江峰，副秘书长王培亭、刘纪志。常务理事10人，理事28人。下设17个学组。这届学会除了继续组织学术活动外，主要是组织专家巡回讲师团，到偏远县进行学术交流。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咸阳分会 于1981年12月25日在乾县成立。会长张

有良，副会长张学文、陈万丰、李培丰、邱德臣。秘书长施耀华，副秘书长邱德臣、郭谦亨。常务理事 11 人，理事 27 人。第二届理事会于 1984 年 11 月 30 日在咸阳召开。会长张学文，副会长李培丰、袁立新、张毅。秘书长袁立新，副秘书长雷清云。常务理事 11 人，理事 25 人。第三届理事会于 1988 年 9 月 13 日在咸阳召开。会长焦振芳，副会长张学文、杜雨茂、袁立新、刘源涛。秘书长李堪印，副秘书长马康民。常务理事 11 人，理事 18 人。

中华药学会咸阳分会 于 1984 年 9 月在咸阳成立。名誉会长穆熙璋。会长冯珍，副会长吕兰薰、潘成全、范志祥、杜志德。秘书长雷俊才，副秘书长王培亭。常务理事 12 人，理事 27 人。第二届理事会于 1986 年 9 月 13 日在咸阳召开。会长张毅，副会长朱明礼、齐忠俭、袁庭甲、杜志德、冯敬群。秘书长李金城。常务理事 10 人，理事 17 人。名誉顾问冯珍。

中华护理学会咸阳分会 于 1979 年 11 月在咸阳成立。理事长张卉，副理事长申美容、付继贤。常务理事 7 人。秘书长申美容，副秘书长韩雪娥。荣誉理事南修玉。

卫生工作者协会 咸阳专区所属 13 县于 1951 年先后组成各级卫生工作者协会。共计会员 2270 人。陕西省卫生工作者协会咸阳支会，于 1951 年 5 月 29 日在咸阳成立。理事长金秉仁，副理事长李怜涧、曾炎夫。常务理事邢作圣、马玉美、刘金喜、王鸿儒。理事 10 人。支会共编两个学组，一为中医学组，一为西医学组，分别领导全县各区、乡分组学习。会址咸阳县人民政府卫生科。共有会员 335 人。

第二节 医政管理

一、城市医院管理

咸阳解放后，人民政府便设有卫生科，负责卫生行政工作。卫生行政部门首先接管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公立医院，充实人员、设备，修缮病房，调整布局，使医院在短期内开诊，方便了群众治病。与此同时还本着“先普及，后提高”的方针，开始建设城乡基层医疗网。1956 年，城乡中、西医联合诊所和医院实行进一步联合，每个医院均设有防保组，分管本地区健康普查、预防接种、流行病调查、妇幼保健、传染病报告等工作。至此，咸阳市城乡基层医疗网基本形成。咸阳市是陕西纺织工业重点城市，纺织工人在全

市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市卫生行政部门，督促各企业建立自己的医疗机构，西北国棉一厂、西北国棉二厂、陕棉八厂、西北国棉七厂、陕西纺织机械厂、纺织器材厂、陕西二印等相继建立起职工医院，全市工人医疗条件得到较大改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卫生领导机构陷于瘫痪状态，各级医院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被破坏，医疗质量下降。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各项规章制度在全市医院得以恢复。从1986年起，咸阳市开始进行卫生体制和管理的全面改革，改革“独家办医”的模式，实行多种形式办医。鼓励集体、个人及各种社会力量多渠道、多层次办医，拓宽了卫生事业发展的道路。1987年，咸阳市卫生局制定了《关于加强咸阳市医疗卫生单位横向联合的意见》、《咸阳市医疗协作联合体管理办法》、《咸阳市医疗协作联合体经营管理实施方案》、《咸阳市医疗协作联合体理事会章程》，各大医院在突出特色、发挥专长的基础上，建立了7家专科医院，改变了过去“大而全”的单一结构。这7家专科医院分别是陕西省第二纺织职工医院的妇产医院、铁20局职工医院的血栓病防治中心、核工业部215医院的老年病医院、陕西省水电职工医院的康复医院、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创伤外科中心、秦都区沔西地段医院的咸阳市肺科医院、咸阳市地方病防治所的咸阳市中心血站。这些专科医院的建立为社会提供了充足的床位，挖掘了城市各大医院在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潜力，对缓解患者看病难、住院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填补了市内无专科医院的空白。同年，在市内12所医院开展了争夺“白求恩杯”竞赛活动，克服医德医风滑坡现象。医院各科室还普遍推行了医疗任务承包责任制，坚持综合考核奖惩办法，使医务人员的思想素质、专业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涌现出一大批白求恩式的医护人员。

为了加强城市医院的正规化建设，全市各医院推行了院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积极推行病区设置合理化，病房管理标准化，操作技术规范化的各项工作制度化，要求病房严格执行三级医师负责制，住院医师、主治医师、主任医师各负其责。实行量化管理，规定床位使用率、病床周转率、治愈率以及门诊人次、诊断符合率、误诊率等管理指标，定期考核上报，作为“白求恩杯”赛的主要考核内容之一。同时，市卫生局对各医院院长、医生、护士、医技及后勤人员按岗分类，统一进行考试、考核，合格率达到94.2%，成绩优良率达到78.4%。还对各医院急诊收费、医疗质量、医院管理等项工作进行检查，帮助医院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1989年市内各大医院

主动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 47 项，在患者未带钱或钱不够的情况下抢救生命垂危患者 964 例，为了抢救病人，医务人员无偿献血 1400 毫升。

二、各县区医院及乡、镇卫生院管理

1956 年，国家财政拨专款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兴平、三原、彬县、长武、旬邑等县均成立了卫生院。从 60 年代开始，地区（市）卫生系统坚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从各方面加强各县医疗卫生单位及乡、镇卫生院的建设，促进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1966 年底，各县公社卫生院历经多次修建，已初具规模，大部分公社卫生院设有门诊部、住院部、职工宿舍等。同时调配了一定的业务技术骨干，充实了一些大学、中专毕业的学生，加强公社卫生院的技术队伍。

“文化大革命”期间，医疗卫生事业受到冲击，有技术专长和较高学术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正常的医疗秩序被打乱。

1978 年以来，市卫生局把医政工作的重点一直放在县级医院的建设上。曾多次进行全市性的县级医院检查评比，评出三原县医院、乾县医院等一些先进单位。通过检查评比，对健全医院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对病历的规范书写，对改善医院的设备，对提高医院的医疗质量，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87 年市卫生局还对全市地段医院进行了全面调查，在此基础上确定了 20 所重点建设医院。1987 年 3 月 7 日，中共咸阳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卫生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咸阳市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快农村乡、镇卫生院建设，各方集资建设乡、镇卫生院，初步实现“一无、一有、一保证”（无危房、有医疗设备、保证卫生事业经费）。全市乡、镇卫生院先后筹集资金达 851 万元，新建医疗生活用房 34964 平方米，维修旧房 27572 平方米，购置器械 1086（台）件，培训人才 559 人次。到 1990 年，全市 67 所农村地段医院，146 所乡镇卫生院基本上实现了“一无、一有、一保证”。此外，还建立和恢复了 4253 个村级卫生所（室），乡村医生发展到 6630 人，三级卫生网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加强。

为了加强北部山区县级医院建设，从 1986 年 6 月至 1990 年 10 月，市卫生局先后抽调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省二纺医院、兴平 145 医院四支医疗队 94 名医务人员，分 14 批到彬县、旬邑、长武、淳化县医院，协助当地医务人员开展新业务，培训技术人才。先后举办专题讲座和开展各种学术活动 95 次，进行病案讨论 300 余次，受援县医务人员免费到支援单位

进修 15 人次，半免费进修 3 人次。为了提高医务人员对疾病的诊断治疗水平，各医疗队还与县医院的医务人员共同探讨研究，开展临床新项目 35 项。在市医疗队的帮助下，解决疑难病例 150 余例，救治重危病人 210 多例，帮助维修医疗器械 51（台）件，共节约资金 6700 多元。医疗队还协助各医院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省二纺医院协助旬邑县医院制定了二线医生值班制度，上级医师查房制度，术前、术后护理制度，疑难病案讨论制度；市二院帮助淳化县医院护理部建立责任制护理制度，完善了 9 项护理制度和 22 项基本操作规程，从制度上杜绝和避免了差错事故的发生。期间各县医疗、预防保健单位建起医疗、实验、生活用楼 38 幢，新增面积达 11 万平方米。

三、医疗事故鉴定

咸阳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于 1985 年重新组成，1990 年 3 月进行了调整，由本市各大医院的业务专家组成了新的医院事故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毅，副主任委员周解围。办公室设在咸阳市卫生局医政科。自 1990 年以来共立案调查医疗纠纷 22 起，经正式鉴定的 8 起，协调解决 7 起。

四、受援、援外、救灾

世界卫生组织援助项目 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本市与国际卫生组织建立了业务技术协作关系。咸阳市卫生防疫站被确定为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对西北五省（区）省、地、县卫生防疫站长培训中心。兴平县被列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妇幼卫生合作县。礼泉县被确定为世界卫生组织示范防疫站合作项目县。市上还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国内有关单位发展多边或双边合作，争取到国际投资近 50 万美元，计划免疫冷链专用汽车 17 辆。

1987 年 5 月 5 日，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及西德技术合作公司以黄维雄、毛里斯·阿里情森等一行 6 人组成考察团，在中央项目改办主任郑佑德等陪同下，对彬县接受该组织贷款、援粮、开展农村改水工程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考察，为改善彬县人民生产、生活条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援外医疗队 根据中国政府和苏丹政府签订的中国派遣医疗队赴苏丹工作的议定书，按照省上的安排，从 1971 年到 1989 年，咸阳市 8 家医院选派

了22名医务人员，还在其他系统抽调了5名行政后勤工作人员，参加了陕西省卫生厅组织的援外医疗队，分期分批赴苏丹工作达14年之久。

第一批从1971年4月至1973年8月，派出武功县武装部干部邢方元任医疗队长；第二批从1972年3月至1974年12月，选派了10名医务人员，有陕西中医学院焦新民、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马玉美、蔡玺、丁金榜，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王伟中，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王林祥、程准权、徐玲，三原县医院高芳艳，彬县医院徐中信，另外还选派了咸阳二中胡毅之任翻译，三原县商业局沈可信任厨师。第七批从1975年8月至1979年10月，选派陕西中医学院张武翔任医疗队副队长。第十一批从1979年9月至1981年7月，选派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师李润民。第十三批于1981年9月选派户县饮食公司刘伯田，周至县人民政府姜天信等2名厨师。第十五批于1983年选派了4名医师，有三原县医院马风起、兴平县医院王永文、周至县医院沙绍宁、陕西中医学院杜登峰。第十八批于1987年选派了6名医务人员，有四四〇〇厂医院李江峰，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张恨波，陕西中医学院李易男、李文德、张春景，三原县医院白康宁。

抗震救灾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发生强烈地震，中共咸阳地委于7月30日组成了50人的“陕西省赴唐山抗震医疗队咸阳中队”，其中专业人员37人，行政后勤人员13人，中队党总支书记兼队长由咸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尔谦担任，副书记兼副队长由礼泉县卫生局局长陈万丰及咸阳地区防疫站副站长王玉堂担任，程振辉、马官寿任党总支委员。8月5日起程，8月8日晚医疗中队抵达河北丰润车站，接收了531例伤员（返回咸阳途中5例伤员病情加重下车治疗，实际接回伤员526人），分送到咸阳市医院以及三原、泾阳、兴平等县医院治疗，全部治愈后，送返唐山。

第三节 公费医疗

1952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公费医疗预防制度》，同年5月成立咸阳专区公费医疗管理机构，并制定了咸阳专区公费医疗管理办法。国家财政按每人每年2元的标准拨给医药费。这种办法一直沿用到1953年咸阳专区撤销。

1961年咸阳专区复设，公费医疗由财政部门 and 干部所在单位共同管理。每年财政局在年初预算时，按每年每人18元的标准，1978年10月提高为每年每人30元，将医疗费一并下拨各单位，由各单位自行掌握，超支不补，节

余归单位。各单位在管理方法上有四种方式：一是实报实销。病人看病不分门诊和住院，都予以报销；二是门诊按定额包干，超支部分划开档次，按比例报销，住院费实报实销；三是门诊包干，定期按标准发到人，住院费按年龄或工龄划档次比例报销；四是不分住院和门诊，按年龄或工龄划分档次比例报销，对精神病患者和老干部实行全额报销。

1990年全市享受公费医疗人员已达107488人，其中市级10871人，县区级96617人，当年公费医疗支出1394万元，人均130元。

第四节 药政管理

一、药品管理

1970年8月咸阳地区防疫站始设药检组。1973年4月改设咸阳地区药品检验所，开始对全区的药品质量进行检查和监督。此后，各县区市陆续成立药检所15个。1980年地区卫生局成立药政科，除了执行药品生产的审、报、批手续外，还加强了毒、麻、限、剧药品的使用和管理。

1980年，地区卫生局对全市制药厂家进行了全面整顿，关闭42家不具备制药条件的厂家，保留14家，确定具有灭菌许可证的单位13家。1982年地区卫生局对咸阳医药市场进行了全面地检查和整顿，各县、市统一行动清理不法游医200多人，没收非法宣传品10000余份，收缴并销毁伪劣药品展筋散、黑虎丸等3000多包（瓶）。

1984年《药品管理法》颁布后，查处了永寿制药厂将咖啡因原料粉违法销售给药贩的事件。1985年查处了礼泉县石潭乡供销社贩卖假桔梗案，查处了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及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销售“晋江假药”事件。1986年查处了永寿制药厂将兽用土霉素砒原料作人用药原料案。1988年4月查处了市医药公司零售总店购回伪品沙苑子案，挽回了经济损失。

二、药品检验

1973年地区药检所成立，全区药品检验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从70年代起，先后对市场14个药厂的298个品种，10个药材加工厂的575个品种，30个医院制剂室的915个品种，以及市场药品经营和使用单位的药品质量进

行监督检验。

历年来，药检所以对境内药厂进行随机抽样的质量情况是：1984年不合格率为18.3%，1985年为16.4%，1986年为4.9%，1987年为6.9%，1988年为5.4%。

从医院制剂室随机抽样的质量情况是：1984年不合格率为76.4%，1985年不合格率为33.3%，1986年不合格率为22.6%，1987年不合格率为33.3%，1988年不合格率为47.5%。

在不合格的制剂中以大输液生产问题较为突出，市药检所及时帮助各医院分析查找原因，提出解决质量问题的改进意见。

市药检所还为“痰净”、“骨痨散”、“黄芪酒”、“苦木总生物碱及其片剂”、“苦木内酯甲及其片剂”、“维生素C冲剂”、“复方痰净片”、“505神功元气袋”等制定了质量标准，为《中国药典》（1985年版）修订了“沙苑子”质量标准，为《陕西药品标准》（1985年版）修订了“舒络片”、“复方丹参片”、“复主醋酸钠注射液”、“复方五味子片”等19种药品的质量标准。

1985年《药品管理法》正式实施后，设立了咸阳市药品管理法监督电话。是年底，共清查出炉劣、淘汰、变质药品1502种，价值465000余元。取缔非法药贩90人次，非法药店4家，非法药厂1家，销毁非法广告和商标547460张，查处制售假药文件20余起。

截至1989年，市药检所共检药品6736件，年均561件，其中送检2997件，抽验3783件，抽验率为56.1%。其中合格品4019件，不合格品2717件，合格率为59.6%。

第七编

体 育

咸阳境内体育传统源远流长。在漫长的狩猎生活时期，健身强体为当地先民的第一要务。出于生存的本能，先民们无不进行采集攀援、狩猎追逐等必备的体能锻炼。商周以后，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突出和部落争斗的频繁剧烈，军事体能锻炼得到广泛普及。隋唐开科选拔武举，使以武术为主的体育活动遍及民间。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如赛马、拔河、摔跤、举重等，虽从先秦时就已萌芽，但却时断时续。清代末年，随着新学的建立，学校始设体操科。民国时期后，一批仁人志士在陕西积极倡导办学，境内近代体育率先在三原县崇美中学（教会学校）和渭北中学推行。田径、篮球、乒乓球、网球等体育项目在境内逐渐推开。地处三原县的陕西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和渭北中学的田径选手曾在西安独领风骚，1924年代表陕西省先后参加了第十一届华北运动会和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其间，在山东齐鲁大学上学的三原籍学生李祥生（李廷瑞）还先后赴日本、菲律宾参加了第六届和第七届远东运动会三级跳远比赛，开本地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之先河。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部分学校师生和当地群众在三原县举行过武字区运动会。1942年和1946年，陕西省第十行政督察区（简称第十区）先后举行过两届秋季运动会选拔赛，并组队参加了陕西省第四、第五届运动会，在第五届运动会上第十区荣获10个单项冠军。

新中国成立后，咸阳体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1952年10月，咸阳专区举办了解放初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14个县市和专署机关等19个单位参加了比赛。1953—1959年，市县各学校普遍推行《体育锻炼标准》和《劳动与卫国制》（简称“劳卫制”）。同时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建成一批体育场，试行等级裁判员、运动员制度，使群众性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据统计，当时有篮球队66个，排球队22个，乒乓球队33个，垒球队28个，田径队42个。竞技水平也显著提高，1956年6人次打破省田

径、自行车比赛纪录并获一次省足球比赛冠军。在全省二、三届农民运动会上，咸阳赛区、三原赛区同时组队参加，破省轻量级举重纪录1项、田径纪录6项。

1960—1962年，国民经济困难，咸阳体育处于低谷。1963年后，群众体育恢复开展，运动竞赛活跃。1964年，参加省第四届运动会，破省田径纪录2项，刷新专区纪录63项；破省射击纪录10项，专区纪录6项。国防体育也在学校得到发展，刺杀、投掷、障碍跑等列入学校教材。

1970年咸阳地区体育运动委员会恢复后，各种形式的青少年业余体校成立，为咸阳地区培养了一批体育人才。其中咸阳市、三原县、乾县、兴平县业余体校成绩显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咸阳体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从1981年起，市县各级各类学校普遍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并将体育达标成绩作为招考的资格条件。截止1989年，全市“达标”学生累计10万余人，达标率64.5%。境内又确定了156所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受训学生4300余人。西北国棉七厂小学获全国先进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荣誉。同时，农民体育运动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泾阳县先后3次获全国“田径之乡”称号，兴平县获全国体育先进县称号。

第一章 群众体育

第一节 传统体育

一、习武性体育

角抵 相传源于战国时期。《史记·李斯列传》载：秦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优俳之观”。汉时，角抵活动在民间也普遍开展。隋唐时期，角抵已成为百姓逢年过节最喜欢的一种活动。后来逐渐演变为摔跤，成为人们强身健体的有益活动。

马球 唐时称为击鞠，很为盛行。1971—1972年在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壁画《马球图》，再现了当时骑马持杖、调马争球的热闹场面。骏马结扎尾巴，体态丰满，均备坐鞍。打球者左手执马缰，右手执偃月形球杖，有的在飞奔中回身反手击球，有的飞奔争球，有的调马持杖争球……，颇为精彩。

武术 咸阳武术盛行于清末。当时在境内三原、礼泉、兴平、乾县等县普遍流传高家拳和邢家拳。高家拳是高占奎创立的。流传于三原县境内。这套拳术是在少林拳、红拳的基础上，以江南身法、山东打法、河南跑法、陕西刁法为核心，博采众长形成的。其特点是“峰不倒，弓拉圆，形一实二手步连；踩退进，审势先，虚实变化巧连环；进中退，退中进，全神致志记心间；跤口明，步法结，双目紧看对方肩；闪绽速，化身变，贴身钻靠是真传”。1914年，三原县城西渠岸的刘志德、肖金城、向彭宗等人继承了高家拳。邢家拳是临潼县人邢福科创立的。流传于咸阳、兴平、礼泉、乾县等地。邢福科擅长盘刀、骑射、西北红拳、炮锤、花拳、醉拳、狂拳、风魔棍等。晚年在咸阳收徒传艺，学有成就者有李邦彦、张汉鼎、冯建勋、刘存和、杨善山、钱承德等。此外，咸阳还有一位以大小六合枪著称的神枪赵武。

马术 由古代骑马格斗、传递军情等发展演变而来，分为赛马、马上技巧等项目。唐贞观元年（627），太宗为阻挠突厥的进犯，借突厥内部分裂的有利时机，派兵重创突厥，与颉利可汗在唐长安城外中渭桥订立盟约，会盟中举行过盛大的马术表演。

举石锁 石锁用石凿成，中间有握手处，因形似古锁而得名。明清两代，武举人考试就有举石锁项目。石锁按重量分为三个号：一号为300斤，二号为250斤，三号200斤。举法有抓举和摆举，还有正掷、反掷、跨掷、背掷等。举石锁活动境内各县较为普遍。

揭碌碡 境内农村青年在庄稼收获之后，常聚集在麦场上用揭碌碡的方法比赛力量大小。揭碌碡时可以横揭竖揭，以所揭次数多者为胜。

扳手腕 境内城乡广泛流传，多为男性青年所爱好。活动方法是两人对面站立，伸出左手或右手，待两人互相握好后，按口令同时开始，用力把对方手臂压倒为胜。也有两人隔桌站立，待两人手互相握好后，按口令，两人同时用力下压，以压倒对方手臂触桌面为胜。

二、游戏性体育

斗鸡 是境内儿童经常喜爱的一种跳跃运动。玩时，在单足跳的情况

下，用膝盖互相冲撞，以击落或击倒对方为胜。可两人互斗，也可一人连斗几人。

跳绳 境内城乡男女青少年喜爱的一种民间体育活动。绳有长短之分，短绳可单人跳或双人跳，长绳则为集体跳。跳法有前甩、后甩、前交叉、后交叉、多人跳双绳、双摇飞、多摇飞，计时跳绳、集体八字形编花跳等。

骑马马 境内少年儿童模仿古时骑士对阵交战的一种民间体育游戏。游戏时三人一组，二人手拉手做马，一人坐在“马”上当骑士。做马的二人，在下边的两只手臂让“骑士”坐上，其余左右手扶坐骑士的背部。双方摆阵后，三人高喊“冲呀”、“杀呀”，冲向对方，两“马”对弈，“骑士”在“马”上撕拉，被拉下“马”的为输方，仍在马上的骑士为胜方。每一次比赛结束，败者要将胜者背上绕场一周。

跳皮筋 境内城乡女童最喜爱的一种运动。皮筋多用车内胎剪成，长短无规定。玩时，先由两人分持皮筋两端牵直固定，然后跳者可在皮筋上来回踏跳。跳法有挑、勾、踩、跨、摆、碰、绕、掏、压、踢等，以各种动作技巧编排而成。70年代后，跳皮筋由一条、两条发展到多条。

下马城 多在境内农村儿童中开展。比赛的方法是：数人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队，相距7米左右，分别成一列横队站立。防守队员之间手拉手，齐声念口歌：“翎之翎，下马城，马城开，叫你某娃上阵来”，被叫到的人从队中出列，迅速跑到对方队前，向任意两人中间冲去。若冲开，便可任选一人拉回自己队中，若冲不开即为俘虏，可编入对方一方。这样相互冲击数次，以队伍多的一方为胜。

老鹰抓小鸡 境内小学生喜欢的一种活动。数人一起玩，选一人为“老鹰”，其余为“小鸡”。小鸡为一路纵队，后者拉住前者的衣服后襟或抱住腰部，最前面一人为“老鸡”。老鹰左右盘旋捕捉小鸡，老鸡保护小鸡，尽量躲避老鹰的追逐。老鹰抓住小鸡为一局，另行择鹰组队，兴尽为止。

踢毽子 多在境内中小學生中进行，女生尤为喜欢。鸡毛毽子是用布或皮革缝裹小铜钱为底座，上插一束鸡毛即成。踢法多种，有盘踢、拐踢、蹦踢和对踢等。比赛形式有单人赛和集体赛。单人赛，有比踢次数；也有使毽子落在自己手、肘、肩、头等指定位置，以达不到固定的位置为失败。1985年咸阳市第一次开展了毽子比赛。集体赛在场中画宽为1米的“河”将场子平分为二，两队各占一区，一队先将毽子踢过“河”，对方需在毽子未落地前将毽子踢回对方区域，如此往返，一方未能将毽子踢回对方区域即失一

分，以10分为一局，采取五局三胜制。

打台 在市境农村流行。大都在农闲时间进行。具体玩法是在地上画两条线，一线叫底线，另一线叫顶线，距离在10米左右。玩时每人手持一木棒，站在底线往顶线处投掷，待木棒落地后，以最接近顶线者为主攻方，其他人为被攻方。随后比赛开始，被攻方持木棒站在底线处，向顶线处抛木棒，待木棒落地后，主攻方用自己的木棒设法把对方的木棒击出底线，击过底线为胜，将对方的木棒归于自己。若击不出底线，被攻方可以用自己的木棒击主攻方的木棒过底线，方告结束。

盯方 在境内农村开展普遍，多在农闲时间进行。有四盯、五围、七方、九方等形式。方格就地画成，两人对弈，各持土、小石块或枝叶、草梗为数，最后以数目的多少分胜负。

爪子 也叫抓蛋，是女孩子喜欢的一种体育活动。用瓦砾磨成或用石子、杏核代替作“子”，二至三人在地上玩耍。由一人按规定从一抓到七，先用手将七个子撒在地上，任捡一个，然后掷向空中依次抓起地面的一个、二个、三个，每次抓时还要接住空中落下的一子，抓满七子，然后将七子一起抛起并用手背接住，再用手背抛起用手心在空中爪子，以个人爪子的多少决定输赢。这种游戏可以锻炼手指的灵巧。

狼吃娃 农村男青年喜欢的一种活动。一方为“狼”，备3个子，一方为娃，备15个子，把子摆到棋盘上，充当狼的一方先走。乡间行话“狼动弹，娃叫唤”。每次双方只准走一格，狼吃娃的条件是娃身后出现空格。如果娃把狼全部围死，即娃方胜。如果狼把娃吃得所剩无几，娃方已无法围死，即狼方胜。

第二节 学生体育

一、中、小学体育

体育课 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二年（1902—1910），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咸阳县高等小学堂先后开设体操科。泾阳县瀛洲书院山长王海锋，为在学校推行新开体操科，专门编写了《劝学歌》，歌中对体操课的作用作了浅显生动的说明。1923年施行新学制，“体操科”改为“体育课”。渭北中学开设的体育课的内容为英、美游戏、田径、球类等项目。1938年，三原民治中学、

泾阳泾干中学、咸阳周陵中学、乾县中学均开设体育课，并配有专职体育教师，教学内容有田径、球类、单杠、童子军等。1942年，咸阳县城乡各小学，每周有体育课2—4节。中学体育课内容以田径、球类、国术、体操为主，小学体育课有游戏、跳高、跳远、赛跑等。大部分学校师资短缺，经费拮据，体育课形同虚设。

抗日战争时期，关中分区部分学校体育课中增设了军事体育内容，如刺杀、投掷手榴弹、军事演习等。

建国后，按照教育部规定，各县市中、小学将体育课列入课表。1953年，按苏联十年制教学大纲授课，同时结合“劳卫制”进行锻炼。1956年，按国家颁布的《体育教学大纲（草案）》授课，其内容以田径、体操、球类、游戏为主。

1965年，咸阳机器制造学校体育课增加军事体育教材。“文化大革命”初期，体育课停止。1971年后体育课恢复，各县中学试行《陕西省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1980年，咸阳地区教育局成立了体育教学研究会，对中小学体育课进行观摩评比，以提高体育课质量。1982年起，中等专业学校体育课增加了艺术体操，小学体育课增加了韵律操等项目。1985年陕西省教委公开发行中小学体育课本，各地中、小学基本上都以课本组织教学，体育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课外活动 学生进行早操和课外活动最早见于三原县渭北中学。1919年，渭北中学田径队到淳化县方里镇参加运动会。1923年，渭北中学、渭北师范、三原工业职业学校组建田径队、篮球队，在课外活动时间训练，以迎接比赛。1933年，陕西省第三中学、三原崇美中学、三原工业职业学校，每日早操20分钟，课外活动50分钟。1938年后，随着泾阳县泾干中学、咸阳县周陵中学等一批中、小学建立，各县中小学校际间时常进行篮球比赛。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小学课外活动空前活跃，学生自发组织篮球队，经常举行比赛，当时周陵中学组织的篮球队就有10多个。

50年代各县市中小学均安排有早操、课间操和课外活动。1955年，各县市中、小学有计划、有组织推行“劳卫制”锻炼，围绕“劳卫制”进行课外活动。据西北工学院、咸阳机器制造学校、咸阳中学1956年统计，2857人达到“劳卫制”一级，628人达到二级。1958年浮夸风严重，一些学校推行“劳卫制”时，虚假现象严重。

1963年后，各县中、小学逐步推行了“两课、两操、两活动”（每周两

节体育课、每天一次早操和课间操、每周两次课外活动)制度。1971年后,“三小球”活动遍及各县中、小学。1985年后,各校普遍实施了新的《国家锻炼标准》,中、小学体育课外活动得到了保证。

业余训练 民国初期,各县中、小学已开始了篮球、田径等代表队训练。三原县渭北中学篮球队、田径队曾代表陕西参加过第十一届华北运动会。1940年秋,泾阳县泾干中学的篮球队在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训练后,迎战省立三中、西安高中、蒲城尧山中学,结果三战三胜。

建国后,中、小学的业余训练更加广泛深入。50—60年代,咸阳市中学田径队、篮球队,泾阳县泾干中学的体操队,三原县南郊中学的田径队、篮球队,每周坚持训练3次以上,为省队输送数十名优秀运动员。60年代,咸阳二中、三中及乾县中学对射击、无线电、航模等国防体育尤为重视,各校都有业余代表队。70年代,国棉一厂的小足球、国棉二厂小排球、三原小篮球训练,中小學生几乎人人参加,每次训练长达2小时。

80年代中、后期,咸阳市体委设置了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除在中、小学有组织、有计划的训练田径、篮球、排球、足球外,还全面推行了“国家锻炼标准”。1986年西北国棉七厂子校被评为全国体育传统学校先进集体。国棉一厂子校的阮振忠、泾阳县永乐小学的刘清涛、三原县南郊中学的刘光汉3位教师被评为全国传统项目学校先进教练员。1988年,咸阳机器制造学校子校在儿童篮球队中创造性地将篮球基本技术与音乐、杂技融为一体,办起了渭城区苗苗女篮,为“八一”少年女篮输送队员1名。

体育竞赛 1919年,淳化县方里镇高等小学,举办了24个中、小学400余名运动员参加的竞走运动会。比赛寓趣味与政治内容为一体,竞赛中有“一旦进步”、“立图解放”、“大放光明”、“歌舞和平”等14种竞走形式。这是咸阳地区最早的一次中、小学田径运动会。1923年,渭北中学、渭北师范在西安习武园参加陕西省运动会。1930年,渭北八县学生联合运动会在三原县公共体育场举行,三原、泾阳、高陵、淳化县等派队参加。1932年,泾阳县第一高级小学和第二高级小学举行篮球友谊赛。1935年,乾县在中山公园举行学生运动会,比赛项目有千米赛跑、铁饼、团体操等。是年,省立三原县中学在县公共体育场举行秋季运动会。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学校体育竞赛活跃,地处旬邑县的延安鲁迅学院、陕北公学、关中第二师范及安吴青训班,经常开展校际比赛,其项目有篮球、徒手操、刺杀、投弹、爬山等。1937年安吴青训班男、女篮球队与泾阳第一高级小学进行了友谊赛,青训班

女队员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充分体现了男女平等。咸阳县还先后举办过各小学秋季运动会、咸阳县篮球、讲演、歌咏及青年健康体育竞赛大会。1942年、1946年两届第十行政督察区运动会，各县选手大部分由学生组成。

建国后，各级政府十分重视中、小学体育教育。1952年，咸阳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在西北工学院举行“五四”青年节篮球赛，西北工学院、周陵中学等校参加。1953年7月，陕西省直属县市田径、体操运动会，90%的运动员是学生。1955年5月，咸阳市举办了1250名小学生参加的田径运动会。是年咸阳中学运动员赵寿良打破1500米省田径纪录，这是咸阳中学生首次打破省纪录。1958年，咸阳市、咸阳赛区、三原赛区同时派队参加陕西省第一届中学生运动会，咸阳市足球队获省第3名。4月，三原北城中学在全国27省、市、自治区基层田径、通讯赛上获高中组、初中组第4名。1965年5月咸阳专区举行了首届中学生运动会。6月，参加省中学生运动会田径赛，高中组获团体总分第2名，男、女团体总分列第3名；3人打破省中学生纪录3项，詹爱茹荣获高中女子组铅球和铁饼两项冠军，安保中获初中男子组60米和100米两项冠军。后詹爱茹入选省中学生队并参加全国中学生田径比赛。6月，咸阳专区组队参加陕西省第二届中学生运动会，高中女子组破3项省中学生纪录，3人达到二级运动员的标准。

1972年5月1—10日，咸阳地区举行小学校基层田径通讯赛。是年参加省少年运动会，咸阳获甲组团体总分第2名，获乙组团体总分第1名。1973年3月12—23日，陕西省小学基层“三小球”运动会排球、篮球、足球比赛分别在三原、乾县和铜川市举行，咸阳地区队获男子排球、足球第1名，女子篮球第3名。同年4月15—24日，咸阳地区中学生田径队参加省第三届中学生运动会田径赛，甲组获团体总分第3名，王璞、石秀玲入选省中学生田径队。后两人参加全国中学生运动会田径赛，分别夺得男子110米栏和女子手榴弹全国冠军，石秀玲还以50.32米优异成绩打破了46.48米的省女子手榴弹纪录，王璞入选国家田径队。1975年8月15—22日，陕西省小学基层队排球赛在泾阳县举行，西北国棉一厂子校男排、二厂子校女排代表咸阳地区参加，双获亚军。

80年代初，各县市中、小学体育竞赛十分活跃。1981年7月22—24日，咸阳地区部分小学基层足球赛在兴平举行，西北国棉一厂子校、咸阳造纸厂子校、兴平玻璃纤维厂子校和秦岭公司子校等校参加。是年咸阳机器制造学校参加陕西省中等学校田径、越野赛，获团体总分第1名，1982年、1984年

咸阳机器制造学校又分获陕西省中等学校田径赛团体总分第1名。

1984年，在咸阳市体育场举行学校体育传统项目田径运动会，13个县区派队参加，获团体总分成绩前3名的是：泾阳县（182分）、兴平县（171.5分）、三原县（122.5分）。

1985年，全国初中、小学“雏鹰起飞奖”田径通讯赛中，陕西省共4所中学、7所小学获奖，其中有泾阳县泾干中学、柳村中学和西关中学；泾阳县柳村小学、城关小学、永乐镇小学和跃进小学。

1986年11月，咸阳市传统项目田径赛在市体育场举行，13个县区及咸阳铁路中学（代表企管科）共14个代表队参加，获各项团体前3名的男子组分别是彬县、泾阳县、杨陵区；女子组分别是乾县、泾阳县、永寿县。

1987年6月11—13日，咸阳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田径运动会在三原南郊中学举行，比赛分中学组、小学组进行，取得中学组男、女第1名的分别是杨陵区（57.55分）和兴平县（72分）；小学组男、女第1名均由彬县夺得。7月22—24日陕西省传统学校田径运动会在凤翔县举行，咸阳市和泾阳县组队参加，泾阳县获团体总分第2名。7月26日—8月3日，陕西省传统学校足球赛分别在国棉一厂和兴平县举行，西安、宝鸡、汉中、渭南和咸阳市5个代表队参加，咸阳市代表队获得了总成绩金牌。8月7—12日，陕西省首届毽球比赛在汉中市举行，咸阳市代表队获小学组男、女第2名。

1988年7月16—21日，陕西省传统学校田径运动会在兴平县举行，全省10地市和泾阳县队共11个单位参加，咸阳市运动员李敬红和泾阳县边东分别以1685分、1549分的成绩，破男子三项全能1508分的省少年纪录；张平在男子跳远项目中以6.19米的成绩破6.13米的省少年纪录；咸阳市男队获团体总分第2名，女队获第3名。7月22—29日，咸阳市中学生男子足球队在凤翔县参加陕西省传统学校足球赛，荣获冠军。

二、高等院校体育

民国时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工学院规定体育为必修课，一、二、三学期每周授课2学时，军事训练1—2学时。教学内容以球类、田径、器械体操、国术、舞蹈为主。抗战时期，旬邑县境内的两所陕甘宁边区学校，体育课以军事训练为主要内容。

建国后，各高等院校均开设体育课，一、二年为必修课，每周2学时。50年代按国家颁布的《一般高等学校体育课试行教学大纲》实施教学，教学

内容以田径、体操、球类为主。此时，体育课教学与“劳卫制”锻炼紧密结合。

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体育课基本停止。至1963年，各高等院校体育课恢复，教学内容增加了武术项目，为初级拳一、二、三路，太极拳、太极剑等。

1972年，体育课恢复，初期由于“开门办学”的冲击，教学时间没有保证，后期转为正常。

1977年后，恢复高考制度，各校开始执行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一、二年级开设普通体育课，每周2学时，两学年共144学时。教学内容有田径、球类、体操、武术、游泳等，并与《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相结合。

1984年后，各校的体育课形式一年级为普通体育课（即发展身体素质，达到《国家锻炼标准》）；二年级为专项课（即结合学校体育设施和教师专长，开设体育专项课）。女生增加了艺术体操、健美操。陕西中医学院根据专业特点，为三年级学生开设了中国传统保健体育课，还为残疾学生开设了适合其身体条件的体育保健课。

50年代和60年代，体育课作为考查课，标准由各校根据教学设施及学生具体情况而制定，成绩计100分，其中运动技术占70%—80%，课堂表现占10%—20%，出勤率占10%。80年代以后，体育课为考试课，标准是身体素质测验占30%，体育课成绩占70%。体育课成绩和评定“三好”学生、奖学金紧密结合。

课外活动 1936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制订了课外活动暂行办法。早操要求学生天天出勤，点名由训导处负责，由体育教师组织。课外锻炼的项目有国术（少林拳、太极拳）、篮球、足球、排球、网球、田赛和径赛等，学生自愿报名参加。1937年、1938年，该校举行第三、四届全校运动会，有队形操练、团体操、徒手操表演和田径、球类等比赛。

建国后，各校普遍重视课外活动，安排有早操、课间操、课外活动。早操一般以班为单位，先跑步后做操。课间操自由活动居多，有的散步，有的做操，大都走出教室到室外活动。50年代，课外活动除班际比赛外，主要以开展“劳卫制”为主。1955年，西北工学院695人参加“劳卫制”锻炼，及格345人，一级102人，优秀57人。60年代，各校普遍建立校代表队，踊跃参加省高校及市级比赛。此间，各校一年一度的全校田径运动会、越野赛和篮球赛，已形成制度。

1958—1989年咸阳各高校获陕西省历届
大学生田径运动会冠军统计表

表 7-1

组别	届次	时间	项目	成绩	姓名	单位
男子组	二	1974年5月	手榴弹	59.82米	麦拉颖珠	西藏民族学院
			标枪	45.42米	麦拉颖珠	西藏民族学院
	三	1977年10月	400米	56"2	赵卫国	西北农学院
			800米	2'8"5	宋珍民	陕西中医学院
	四	1979年5月	标枪	48.86米	金平	西北轻工业学院
	五	1981年5月	标枪	50.76米	金平	西北轻工业学院
	六	1982年5月	标枪	50.76米	李巍	西北农学院
十四	1990年5月	铅球	11.47米	达林太	西北农学院	
女子组	二	1974年5月	标枪	29.76米	大仓决	西藏民族学院
	三	1977年10月	4×400米接力	4'33"6		西北农学院
			铁饼	28.56米	嘎果	西藏民族学院
			标枪	26.44米	索朗旺姆	西藏民族学院
	四	1979年5月	铅球	9.31米	陈进怡	西北轻工业学院
	五	1981年5月	跳远	4.54米	相继航	陕西中医学院
			标枪	33.82米	次松卓玛	西藏民族学院
	六	1982年5月	3000米	11'59"1	巴泽	西藏民族学院
			标枪	36.04米	次松卓玛	西藏民族学院
			手榴弹	47.36米	次松卓玛	西藏民族学院
	七	1983年5月	100米	13"7	刘桂敏	西北轻工业学院
			400米	1'5"1	刘桂敏	西北轻工业学院
			800米	2'36"8	李淑盈	陕西中医学院
			3000米	12'9"9	李淑盈	陕西中医学院
	八	1984年5月	100米	13"9	黄六连	西北轻工业学院
200米			28"8	黄六连	西北轻工业学院	
400米			1'6"4	刘桂敏	西北轻工业学院	
800米			2'36"8	李淑盈	陕西中医学院	
九	1985年5月	100米	14"	黄六连	西北轻工业学院	

80年代，各校早操出勤率时高时低。课间操以自由活动居多。课外体育锻炼，除班际体育比赛外，“武术热”、“健美热”在各校出现。此时，各校普遍施行了《国家锻炼标准》，并将“达标”情况列为评定“三好”学生和先进班集体条件。各校都有校代表队训练，西北农学院、西北轻工业学院的校代表队多达十几个，每周训练3次。

体育比赛 50年代，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运动水平较高，在省运会上多次夺冠。1953年的陕西省球类运动会，西农获男篮、女排和男网冠军，西工院获女子乒乓球冠军，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获男、女排球，男子网球和羽毛球四项亚军。1958年陕西省高等学校体育协会成立，辖区各高等院校全部参加陕西省高校系统比赛。

1978年的陕西省大学生篮球赛，西农获男篮第2名，1981年又获男篮甲级队第1名。1980年的陕西省大学生排球赛，西农获男排第1名，后代表省高校赴青岛参加全国大学生排球赛。1981年，西农男排获省高校甲级队第1名，陕西中医学院获女排甲级队第2名。

1979年12月，参加陕西省大学生越野赛，西农获男子团体第3名，宁春红获女子个人第2名。

1980年12月，参加省大学生越野赛，陕西中医学院获女子团体第3名，西北农业大学林先喜获男子个人第1名。

1981年12月，参加省大学生越野赛，陕西中医学院获女子团体第2名，西北农业大学获男子团体第3名。

1984年12月，参加省大学生越野赛，西农获男子团体第2名、女子团体第3名。

第三节 职工体育

民国时期，咸阳的职工体育以篮球运动为主。建国后，随着工业发展，工厂逐年增多，职工人数不断扩大，各项运动技术水平均得到提高。

1938年，咸阳打包厂篮球队在武功参加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第四届春季运动会篮球赛。1945年，咸阳县在城关第一高等小学举行社会各界篮球赛。周陵中学、伤兵医院、陇海队、日月队、城关第一高等小学教工联队、青友队共6支球队参加，周陵中学获冠军。1947年春，咸阳县在公共体育场举行篮球赛，比赛分社会组、中学组。社会组有县政府联队、税务局、保安队、十八绥区队和西安请来的一个队参加。另外三原县举办运动会也有少数店员

参加。

1949年，共青团咸阳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为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咸阳县公共体育场举行了篮球比赛，西北工学院、陕西省咸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周陵中学、咸阳专署机关和咸阳军分区10支球队参加。1950年上半年，周陵中学、西北工学院、咸阳工职、咸阳文工团、咸阳地区干校又在咸阳县公共体育场举行篮球赛，咸阳工职队获亚军。

1952年，辖区各厂矿企业、机关单位普遍开展了广播体操活动。1954年1月26日，全国总工会要求在工矿企业中开展职工体育，西北国棉一厂率先响应，各车间开展了工前工后操锻炼。1955年，咸阳市举行五项球类选拔赛，各代表队主力队员绝大部分是企业职工。同年6月，在咸阳市体育场举行了职工六项田径运动会，市第一人民医院（现陕西中医学院附院）获男、女总分第1名。1956年，咸阳市纺织、银行、贸易、商业、邮电、公安、教育等系统建立体育协会，发展会员4948人。市区职工体育活跃，咸阳县市工会举办了省直属县市银鹰体协男子篮、排球运动会，市体育场协助西北国棉一厂、二厂选拔出赴省参加第一届工人运动会的自行车运动员；还选出赴天津、上海、北京（代表陕西房管局）比赛的足、篮、排球运动员。由体育教师组建的“体工队”和社会上组织的“五五队”经常参加市体育场主办的“周末比赛”表演，前来观看的群众络绎不绝。9月，国棉一厂青年女工范景云、二厂刘小莲入选省纺织体育协会代表队，参加省第一届工人运动会，两人在女子1500米田径场自行车赛中，均以优异成绩打破陕西省1955年最高纪录。1958年，咸阳一些机关、工厂也大搞“放卫星”、“插红旗”、“四红”、“五红”，限期通过“劳卫制”等运动。1959年，陕西省体育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经常性的体育锻炼，为生产、为国防、边普及、边提高”的要求，国棉一厂90%的职工参加了广播操。3月15日，咸阳机器制造学校40岁以下无疾病的教工均达到“劳卫制”一级。年内国棉七厂共开展篮球赛156场，其中对外35场，对内100多场，先后组织小型运动会2次，各车间2000余人参加，同时还举办了800多人参加的广播体操赛。10月，咸阳市组建了以职工为主的篮、排、足球队，乒乓球队、公路自行车队和无线电队，各队在省三运会比赛中均获优异成绩。

1960年，咸阳市职工体育代表队在陕西省中国式摔跤运动会上获团体总分第2名。1963年4月1—30日，咸阳举行中国象棋定级赛，七厂宋银定、严宽解分获甲级象棋第1、2名；吴家堡的吴光耀、底张机场的杨树庄分获乙

级象棋手第1、2名。后又选派其4人代表咸阳专区工会参加了陕西省老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象棋比赛。11月12日，咸阳还举行了职工乒乓球循环赛。

70年代，咸阳各厂矿机关的篮球赛、乒乓球赛日益增多，特别是职工足球运动十分活跃。1976年7月16日是毛主席畅游长江十周年纪念日，咸阳市、泾阳县、兴平县等体委组织职工群众游泳，咸阳市还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渭阳公园游泳池进行了武装泅渡表演。1977年5月1—5日，咸阳地区在咸阳市文化宫举行职工象棋赛，24位象棋选手参加角逐。1979年8月，咸阳市举行职工篮球甲级联赛，铁道部建厂工程局，咸阳地区运输公司，西北国棉一厂、二厂、七厂，陕棉八厂，咸阳火车站等20个队参加，咸阳火车站、陕棉八厂分获男、女冠军，八四六一一部队和西藏民族学院队屈居男、女亚军。10月8日，咸阳市举行职工足球赛，西北国棉二厂、咸阳造纸厂获团体第1、2名。

1980年，咸阳市举行职工足球分区赛，18个单位分两阶段进行，西北国棉七厂积分8分，获冠军；国棉二厂积7分，获亚军。7月18日—8月3日，在陕毛一厂俱乐部举行职工乒乓球赛，地运司、四四〇〇厂、陕棉八厂等16个单位参加，四四〇〇厂、地运司分获男、女团体第1名；陕毛一厂、陕棉八厂分获男、女团体第2名；孙虎宁、王尚林分获男、女单打冠军。8月11—20日，咸阳市举行职工羽毛球赛，建厂局、省建一公司、地运司等22个单位参加，建厂局、西北轻工业学院获男子联赛1、2名；轻工学院、化工部第六设计院获女子联赛1、2名；任卓才、赵杰分获男、女单打冠军。1980年11月30日—1981年1月7日，咸阳地区举行职工足球、篮球赛。是年5月26日—9月23日，咸阳市举行职工篮球、足球赛，咸阳火车站、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分获男、女篮球赛冠、亚军；国棉一厂、国棉二厂分获足球赛冠、亚军。

1982年和1983年，咸阳市还分别举行职工排球、羽毛球赛，四四〇〇厂男、女队双双夺得排球冠军；建厂局、西北轻工业学院分获羽毛球赛男、女团体冠军。

1984年，咸阳市职工体育代表团参加陕西省第二届工人运动会，贾来成、李保红、苏毅、王燕智打破全国首届工人运动会田径纪录4项；武术队获全省团体总分第1名；足球队获省亚军；排球男、女队双获季军。

1986年，咸阳纺织机械厂率先资助市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和陕西足球二队，还邀请郎平、张蓉芳、陈招娣等“全国十佳运动员”和首都20家新闻单

位来厂参观联欢。1987年举办“咸阳纺机杯”全国少年足球赛，该厂代表队获得冠军。1988年，该厂队在湖南衡阳市参加第三届“中国纺机杯”足球赛，与21支球队进行激烈角逐，荣获季军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第四节 农民体育

咸阳地区的农民体育历史悠久，种类繁多。逢年过节或遇古会，农民群众便自发组织开展文体活动，常见的有耍社火、跑旱船、舞狮子等。农闲时常见摔跤、掰手腕、举石锁、盯方等活动。

建国后，农民体育得到广泛开展。1949—1956年，咸阳市境的农民体育结合民兵训练，利用农闲时间，在就近学校操场举行村与村之间的篮球、拔河等比赛。1956年，咸阳县、市分别举行农民运动会，新华通讯社报道了竞赛盛况。这次运动会有280名男、女运动员参加。由15名姑娘组成的渭城队三战三胜，获拔河冠军；珠泉区获男子拔河冠军。钓台区取得男篮冠军，顺陵区屈居亚军。是年，咸阳县各乡均有3—4个篮球队和一个拔河队。许多乡还组织了锻炼小组，全县400个农业社，社社都有篮球队和小型运动场。

1957—1959年，浮夸风给农民体育带来了不良影响。据兴平县统计，1957年11月2—3日，全县414677人参加体育活动，59159人通过了“劳卫制”锻炼标准，10082人达到了国家等级运动员标准。

1959年，三原县举办全县民兵运动会，大程公社白玉良以67米的成绩打破了该县男子手榴弹纪录。后代表三原赛区参加省第二届运动会，荣获第2名。泾阳县农民运动员张继初次参加全省比赛，以优异成绩入选省队。

60年代初，农村体育坚持了“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原则，本着农闲多搞、农忙少搞、大忙不搞的具体做法，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据调查，三原县146个生产大队中，恢复体育活动的有78个大队，120个小队；咸阳市大王公社白良大队，6个小队，队队有篮球队，比赛安排在节假日或集市时进行。1963年咸阳市马庄公社，一、五、八逢集，每集都有生产队之间、村与村之间篮球赛，一年内共组织了200多场。

1964年，咸阳市举办了农民篮球锦标赛，和平公社获得第1名。永寿县举行县运动会，农民代表队参加了比赛。礼泉县则结合民兵训练，在农村开展小型的军事野营活动。

1968年，大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促进了各县农民体育的开展。西安市业余体校7名篮球队员下放三原县徐木公社社教大队落户，当地公社以

他们为骨干开展篮球活动，成为全县农村体育最为活跃的一个公社。前国家女篮队长邱晨，1969年曾在兴平县落户，在农村便开始了她的起步训练。

70年代，咸阳地区各县多次举办农民运动会，农民体育常结合民兵训练进行。省体委在三原县高渠公社申国大队进行农村体育工作试点，总结推广开展农村体育工作经验。1972年，为庆祝毛泽东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20周年，咸阳地区各市县举行大会，积极组织体育宣传队到农村巡回表演，仅三原县参加农民运动会的人数就有1878人，会期长达16天。

1973年1月26—27日，三原县在徐木公社举行农村体育工作座谈会。11月初，陕西省农村体育工作现场会在三原举行，各县均派代表参加。会议期间，全省代表专程到徐木公社社教大队参观，该公社为代表们组织了农民篮球、排球、射击和拔河比赛及民兵拳术和老年人广播体操表演。

1974年，三原县举办农民运动会。有17个公社的25支男、女篮球队参加。大程公社就有8个大队建立了灯光篮球场。全县各公社都有男子篮球队，9个公社还成立了女子篮球队。

1976年，咸阳市举办了春节农民篮球赛。10月，彬县举行了全县农民篮球赛。

1977年，咸阳地区各地农村体育的场地建设发展迅速，每个大队都有运动场（含篮球场），乾县、三原、兴平县和咸阳市农村有的还建了灯光球场，咸阳地区出席省群众体育先进集体12个，分别是：礼泉县烽火大队，永寿县监军公社永寿大队，乾县薛录公社，三原县渠岸公社盖西生产队、徐木公社社教大队，咸阳市窑店公社，兴平县豆马农场知青组、西吴公社北马大队，泾阳县太平公社开堡大队、蒋刘公社东风大队，旬邑县职田公社，长武县彭公公社晓村大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咸阳农民体育出现了新的局面。1980年，泾阳县结合农村特点，全县开展“四个一”活动（即“五一”田径运动会、“十一”田径破纪录赛、元旦越野赛跑、一次全县田径单项赛）。1982年，中国田径协会、中国记者协会、人民体育出版社、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群众部共同评选全国“田径之乡”活动，泾阳县入选全国十个“田径之乡”行列。1984年泾阳县举行第二届农民运动会，17个乡镇、334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篮球比赛。

1986年，秦都区政府规定每年元月为全区体育活动月。2月，举行了全

区首届农民运动会，设4个项目，历时6天，运动员400多人。1987年，永寿县渡马乡举行首届农民运动会，项目达21个，运动员1200人，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只有6岁，观众达6000多人。同年，兴平县、秦都区、永寿县被评为陕西省体育先进县。兴平县的弓景龙、周瑞锋被评为全省农村体育先进个人。11月，咸阳地区男、女篮球队赴安康参加陕西省农民篮球赛，男女队均获第3名。

1988年3月4—13日，咸阳市首届农民运动会在咸阳市体育场举行，运动会共设田径、篮球、武术、射击和中国式摔跤5个项目，14个县区派出413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获田径男子总分前3名的是兴平县、泾阳县、三原县；女子总分前3名的是泾阳县、渭城区、兴平县；秦都区田径队获体育道德风尚奖。男篮获前3名的是泾阳县、三原县、渭城区；女篮前3名的是乾县、三原县、渭城区，永寿县男队和渭城区女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三原县、秦都区分获武术表演赛前2名。乾县、渭城区分别摘取射击比赛团体第1、2名。大会期间，咸阳市农民体育协会成立，标志着全市农民体育已步入了一个新阶段。4月9—15日，陕西省首届农民运动会在咸阳市体育场举行，咸阳市代表团取得男、女篮第2名；田径获团体总分和男、女总分第2名；武术表演赛中，三原县贺娥获武术个人表演奖第1名，鹿艳莉获个人表演第2名。10月，三原县运动员贺娥代表陕西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农民运动会武术表演赛，获三等奖。

1989年，全市共举办乡级农民运动会16次，3530人参加了各项目体育竞赛。泾阳县每年举办一次农民运动会，渭城区窑店乡农村体育专业户陈守柱全家热心组织体育竞赛，被市、区誉为“体育之家”，还被评为陕西省出席全国农村体育先进个人。4月15—25日，陕西省乡镇企业篮球赛在泾阳县举行，五个地市男、女共10支农民企业篮球队参加了比赛，泾阳县云阳造纸厂男队获得金牌。是年，咸阳市有8名同志被评为全国农村体育工作积极分子，分别是：渭城区陈守柱和任向东，兴平县的何建国，秦都区秦武龙、史光明和李安保，永寿县孙玉昌、史孝民。年底，泾阳县通过全国组织的第三届田径之乡检查、验收，实现了全国“田径之乡”三连冠，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国家体委奖给泾阳县“田径之乡”铜质奖牌一面。

第二章 竞技运动

咸阳近代体操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三原县宏道高等学堂，田径则始于1919年的陕西省立渭北中学和三原县崇美中学。1931年，各县城镇一批中、小学成立，近代田径、体操、篮球、足球在学校中普遍开展。

建国后，咸阳市的竞技运动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至1990年，咸阳市（地区）共举办全民运动会6届、青少年运动会4届；竞技项目从过去的几项发展到30多项；有5人次打破或超过世界纪录；292人次打破全国纪录；200多人（队）打破省纪录；上万人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其中运动健将20人。在全省历届运动会中，咸阳市（地区）运动员竞技运动水平较好，部分项目居于省内上游。足球、田径，一直名列全省前茅，并为省以上运动队输送了一批优秀运动员。随着竞技体育的蓬勃发展，咸阳的裁判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二级以上各项目裁判员1000余人，其中国家级6人。

第一节 田径运动

田径运动始于1919年的陕西省立渭北中学。1923年，地处三原县的省立渭北中学、渭北师范在西安习武园参加省立各校第三次联合运动会田径赛。5月3—4日，在齐鲁大学就读的三原县人李祥生（李延瑞）赴天津南开大学，参加第十届华北运动会田径赛，获三级跳远第2名、急行跳远第4名。5月10日，李祥生又在上海约翰运动场参加远东运动会全国预选赛，以13.28米的好成绩获三级跳远第1名。5月22日赴日本大阪参加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三级跳远比赛。1924年，陕西省在西安成德中学举行第十一届华北运动会选拔赛，三原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省立渭北中学的铁饼、撑杆跳高获冠军。后代表陕西省参加5月16—18日在河南开封举行的第十一届华北运动会。之后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任陕西代表团指导，率团赴湖北武昌参加第三届全国体育运动会田径赛。1925年4月24—25日，第十二届华北运动会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李祥生获三级跳远第2名，急行跳远第3名。5月3日，他又代表华北区在上海参加远东运动会全国预选赛，获三级跳远第1名。5月

16—22日，李祥生代表中国赴菲律宾参加第七届远东运动会三级跳远比赛。1933年，在西安就读的泾阳县人贺明鼎、范玉贞及三原县女中的段秀丽，参加第一届陕西省运动大会田径赛，贺明鼎获男子中级部标枪第1名和400米跑第2名、范玉贞获女子部铁饼第2名、段秀丽分获200米跑第1名和50米跑第2名。

1942年，第十行政督察区秋季运动会在三原县举行，三原县各中学几乎囊括了所有田径赛的冠军。10月，参加陕西省第三届运动会田径赛，男子组获得了三个单项第1名。1946年，第十区秋季运动会田径赛分男子成人组、高中组和初中组；女子高中组、初中组比赛。10月，参加陕西省第四届运动大会田径赛，男子成人组、高中组分获田赛团体总分第3名、第2名；男子高中组、初中组均获径赛团体总分第2名；陈志亮、李奎生还分获成人组、高中组个人总分第3名。

建国后，田径运动在咸阳各地广泛开展。

1952年10月，咸阳专区参加省第一届运动会田径赛，4人1队打破5项解放前陕西省纪录，并获女子团体总分第1名；男子团体总分第2名；方培录等4人入选陕西省田径队。后参加西北区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田径赛，方培录获男子5000米、3000米第2名，10000米第3名；黄柏玲、谢筱芹分别获女子80米低栏和400米第2名；董世英获得男子铅球第3名。1953年咸阳县、咸阳市在咸阳机校参加直属县市体育选手选拔赛，打破省田径纪录5项。8月，参加陕西省体育选手选拔赛田径比赛，直属县市男、女队荣获团体总分第3名。1954—1957年，咸阳大、中、小学普遍执行“劳卫制”锻炼，达标人数达4000余名，咸阳机校被评为陕西省“劳卫制”锻炼先进集体。1957年，咸阳市的吕世道在陕西省田径运动会中，以46.66米的成绩荣获少年男子标枪第1名。

1963—1965年，各县、市举行过不同规模的田径运动会。1964年9月，咸阳专区举行第一届运动会田径赛，14个县市派队参加。10月，参加省第四届运动会田径赛，咸阳地区获田径团体总分第3名；许兆书、胡友根分别打破男子100米和标枪两项省纪录，并获3个单项第1名。1965年9月胡友根参加全国第二届运动会，以61.96米获男子标枪第7名，是陕西省田径队在本次比赛中惟一得分者。

1970年咸阳地区在各县市中、小学普遍开展田径运动。1971年6月，咸阳地区举行第三届运动会田径赛，81人刷新地区田径纪录30项，57人达到

田径等级运动员标准，其中一级1人。9月，咸阳地区参加陕西省第五届运动会田径赛，获一项第1名，三项第2名。1972年4月，咸阳地区举行少年运动会田径赛，少年女子1人破1项省少年纪录；少年男子17人次破9项咸阳地区少年纪录，少年女子14人次破7项咸阳地区少年纪录。8月，参加省少年运动会田径赛，4人破4项省少年纪录，甲组获团体总分第2名，乙组获团体总分第1名；此外还取得了7个单项第1名。1974年5月，咸阳地区少年田径运动会在礼泉县举行，14县市200多名少年运动员参加，咸阳市、兴平县、泾阳县分获少年男子甲组前3名；户县、泾阳县、咸阳市分获女子组前3名；少年男子乙组前3名分别由咸阳市、户县、高陵县夺得；少年女子乙组前3名由户县、三原县、兴平县夺得。7月1日，陕西省在宝鸡市举办全省少年田径运动会，咸阳地区获团体总分第3名。1975年3月，咸阳地区举行第四届运动会田径赛。5月参加省第六届运动会田径赛。9月，何改玲入选省队，后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获女子手榴弹第9名。1978年咸阳地区举行第五届运动会，24人14次打破11项咸阳地区田径最高纪录。

1982年8月4—6日，全国业余体校田径分区赛在咸阳市举行，咸阳地区业余体校队在与陕、甘、宁、青、新、西藏六省区的角逐中，王建成以3'15"6的优异成绩打破了保持八年之久的1500米省少年纪录。8月，参加省少年儿童田径运动会，咸阳地区男、女双获团体总分第1名。4月15—17日，陕西省业余体校田径达标赛在泾阳县举行，咸阳地区获男子团体总分第2名。年终，泾阳县荣获全国“田径之乡”称号，成为陕西省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县。从1980—1983年，泾阳县连续打破陕西省田径纪录3项，打破咸阳地区田径纪录35项，荣获陕西省“破纪录先进县”称号。

1984年3月，吴玲珍赴上海嘉定县参加全国马拉松竞走比赛。9月，咸阳市参加陕西省第二届工人运动会田径赛，4人打破4项全国第一届工人运动会田径纪录。1985年5月，吴玲珍入选中国竞走队，参加第四届“世界杯”竞走比赛。9月，在全国竞走赛中，吴玲珍获女子10公里竞走第2名，5000米竞走第3名。10月，张伟、吴玲珍代表陕西参加全国第一届青少年运动会，张伟获得男子乙组铁饼金牌，这是陕西省第四届运动会以来，在大型综合运动会上田径比赛的第一枚金牌。年终，吴玲珍入选国家体委公布的1985年全国优秀田径运动员名单；咸阳市运动员晁爱玲、王峰、张伟入选省中学生代表队。1986年参加全国中学生运动会，晁爱玲以5.65米获女子乙组跳远第5名，张伟以54.6米获男子甲组铁饼第3名，范小玲以13'52"4获女

子乙组 3000 米竞走第 3 名。11 月，省马拉松测验赛在洛南县举行，吴玲珍获女子 20 公里第 1 名。1987 年，陕西省业余体校田径运动会在咸阳市体育场举行，咸阳市一行 35 人参加，获乙组团体总分第 2 名；并获 7 个单项第 1 名。1989 年 5 月，咸阳市体育运动学校参加省体育运动学校田径赛，男、女队分获第 1 名、第 2 名。7 月参加陕西省业余体校田径分项赛，咸阳市获团体总分第 2 名。1990 年 7 月 20—23 日，陕西省少年田径比赛在宝鸡市举行，咸阳市男、女甲组分获团体总分第 2 名。

第二节 球类运动

一、篮 球

咸阳的篮球运动始于 1919 年。陕西靖国军外交处长王志远从广州购回篮球，篮球运动率先在三原县崇美中学推行。1924 年 5 月，三原县省立渭北中学、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在西安成德中学参加陕西省第十一届华北运动会选拔赛，渭北中学篮球队战胜西安青年会篮球队。后代表陕西参加第十一届华北运动会和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篮球赛。同年，泾阳县第一高等小学也有篮球竞赛活动。1936 年，西安黑白篮球队来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参加篮球赛。1941 年，咸阳县举行各小学秋季运动会篮球赛。1942 年，陕西省第十区参加第三届陕西省运动大会篮球赛，初中男子组以 25:19 战胜西安队。抗日战争胜利后，咸阳的篮球活动日趋活跃，周陵中学学生自发组织的篮球队就有十几个，此时，咸阳县校际间的篮球比赛活跃。1946 年，第十区在咸阳县举办秋季运动会篮球预选赛，兴国中学、北城中学、泾干中学等 8 支篮球队参战，兴国中学荣获冠军。

建国后，篮球运动很快在咸阳地区得到了普及和发展，并成为群众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1949 年，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咸阳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在咸阳县公共体育场举行第一次篮球赛，西北工学院、陕西省咸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咸阳文工团、咸阳军分区等 10 支球队参加。1950 年春，周陵中学、陕西省咸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咸阳干部培训学校、西北工学院等队参加篮球赛，西北工学院获冠军，咸阳工职队获亚军。1952 年，咸阳专区举办“七一”篮球比赛，有 22 支男队、4 支女队参加，西北工学院男、女队双获冠军。10 月，咸阳专区举办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篮球列为表演项

目。1953年，三原县、泾阳县及咸阳市一些大单位均参加省级篮球竞赛活动。2月，陕西省球类运动会在西安市举行，西北农学院男篮获冠军。1954年春，西北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李一青率西北篮球队来咸阳表演；8月，中央体育学院指导科篮球队来咸阳表演，还邀请了西安钟声队和商业队作表演。1955年，咸阳市经过球类选拔赛，组成了男、女篮球队，男篮队员有马海、白立章、任宗慈、杜伯谨等人，女篮队员有蒋成兰、李玉英、黄爱玲、田淑珍等。1956年，篮球活动除了在城镇工厂、学校、机关广泛开展外，农民也走上了篮球场，当时咸阳县每个乡都有3—4个篮球队，每次农民运动会都有篮球比赛项目。是年，陕西省篮球锦标赛在宝鸡市举行，三原赛区男、女篮球队双获季军。1958年2月，咸阳市、三原县分别组队参加了陕西省少年篮球分区赛（汉中赛区），三原少年女篮获亚军。4月，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率上海男、女篮球队来咸阳表演。7月，咸阳市男、女篮球队分别参加了陕西省篮球锦标赛。10月初，三原赛区、咸阳赛区、咸阳市参加省第二届运动会篮球赛，咸阳市男篮荣获亚军。10月22—24日，白立章、丁玉亮入选省男篮，参加了西北协作区篮球赛。1959年，咸阳市参加省第三届运动会篮球赛，男篮再度蝉联全省亚军。

60年代初，因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影响，咸阳的篮球运动两度处于低潮。1964年5月，陕西省举行少年篮球邀请赛，三原县男、女篮球队荣获亚军。10月，参加省第四届运动会篮球赛，咸阳专区男篮获全省第2名。1965年2月，三原县少年女子篮球队参加省六县市篮球调赛，获全省少年女篮冠军。8月，三原县女篮代表陕西省赴青海省西宁市参加全国少年篮球分区赛青海赛区比赛。10月，担任陕西省男篮队长的咸阳优秀运动员刘宏绪出席国庆大典招待会。

70年代，“三小球”运动在咸阳地区广泛开展，一大批少年儿童篮球队常年活跃在基层学校。1972年，咸阳地区少年运动会篮球赛在彬县举行，13县、市组队参加，男队前三名是户县、咸阳市、高陵县。1973年，咸阳地区举行“三小球”运动会。5月3日，省市单位青年职工篮球赛在咸阳市举行，咸阳地区男、女队分获冠、亚军。8月，陕西省基层小学“三小球”运动会在乾县举行，咸阳地区女篮获第3名。9月2—10日，咸阳地区、咸阳市同时参加省青年篮球分区赛，咸阳地区男队、女子一队双获亚军。1974年2月9日—18日，在户县举行咸阳地区青少年业余体校篮球赛，有户县、高陵县、泾阳县、礼泉县、乾县等16个单位330名运动员参加，咸阳市、兴平县分获

男子组冠、亚军；户县、咸阳市分获女子组冠、亚军。8月20—28日，咸阳地区中学生篮球赛在咸阳市举行，三原县、兴平县、礼泉县、咸阳市、乾县师范学校和地区卫校等16支篮球队参加，男、女篮冠军均被咸阳市夺得。1975年8月22—30日，咸阳地区、乾县、彬县等业余体校组队参加了在洛南举行的省业余体校篮球分区赛。1976年，陕西省职工基层篮球赛在铜川市举行，铁道部建厂工程局代表咸阳地区女队，火车站代表地区男队参加比赛，男篮获亚军。1978年，咸阳地区举行了业余体校篮球邀请赛，咸阳市、彬县、乾县、泾阳县、三原县等派队参加。1979年7月28日—8月13日，陕西省业余体校甲、乙组篮球比赛分别在泾阳县、白水县举行，咸阳地区男、女篮球队在乙组比赛中分获第2名、第3名。

1980年7月15—17日，陕西省第四届中学生运动会篮球赛在西安市举行，国棉七厂中学男队代表咸阳地区参加，获第3名。8月，咸阳市男队再夺省业余体校冠军。1981年8月23—31日，全国业余体校篮球分区赛在咸阳市举行，甘肃、新疆、四川、青海、宁夏和咸阳地区业余体校7个单位参加，咸阳地区男、女队双获团体总分第5名。8月20—27日，省业余体校甲组篮球调赛在韩城县举行，咸阳地区男、女队双获亚军。1985年8月16—18日，陕西省举行第五届中学生运动会篮球赛，咸阳市男队获第1名。1986年，美国大学生篮球队、美籍华人篮球队来咸阳市交流技术，增进友谊。5月，咸阳市业余体校篮球赛在彬县举行，兴平县、乾县分获男、女冠军。7月2—10日，咸阳市派兴平县男队和乾县女队在咸阳市参加陕西省业余体校篮球赛，兴平县队获男篮亚军。1988年4月，参加省农民运动会篮球赛，泾阳县造纸厂男队、乾县女队代表咸阳市参加，男、女队双获全省亚军。5月6—10日，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政府主办了“渭城杯”全国男篮邀请赛，空军部队、上海、四川、陕西等8支全国男篮劲旅参战。9月，咸阳市渭城区苗苗女篮赴京作球技表演，赢得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1989年6月13—17日举行咸阳市业余体校篮球赛，秦都区男队获冠军、兴平县队获亚军；渭城区女队获冠军，市体育运动学校队获亚军。

二、排 球

咸阳的排球运动最早见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46年，西安黑白体育会排球队应西北农专邀请前来参赛，黑白队以2:1获胜。是年，咸阳县中、小学春季联合运动会设9人制排球赛，比赛分三排，每排3人，运动员位置不

变，初中组周陵中学获冠军，简易师范学校居亚军。10月，陕西省第十区预选赛把排球列为比赛项目。

建国后，咸阳的排球运动逐步得到了普及。1952年10月，咸阳专区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设排球为表演项目。1953年，各县市在西北工学院举行七项目球类选拔赛，并组队于2月中旬在西安市体育场参加陕西省球类运动会排球赛，西北农学院女排获冠军。1954年11月，“八一”男子排球队和西北男排来咸阳市表演。

1956年9月，咸阳市少年业余体育运动学校设立排球班，招收13—15岁的少年儿童进行业余训练。1957年6月16—18日，陕西省排球锦标赛在咸阳市举行，咸阳市女排夺得冠军，男队荣获亚军，王小琦入选省男排。1958年，咸阳市参加省第二届运动会排球赛，市女排获亚军，二赛区（咸阳赛区）获季军。1959年春，天津市男子排球队应邀来咸阳市表演，咸阳机器制造学校男队迎战，以3:0取胜。11月，陕西省青年排球锦标赛在铜川市举行，咸阳市、兴平县等组队参加，三原县阎玉泉入选省男排。

60年代初，因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咸阳排球运动处于低谷。1964年，咸阳专区举行第二届运动会，设排球为比赛项目。后参加陕西省第四届运动会排球赛，咸阳专区女排获亚军。1965年9月11—16日，咸阳专区少年排球赛在彬县举行，咸阳市、彬县、周至县获男排前3名。

70年代初，咸阳的小排球运动蓬勃发展。1971年，咸阳地区在高陵县举行排球赛，三原县安乐中学女排获冠军。7月，陕西省少年排球赛在汉中市举行，三原县女排荣获冠军。1972年，咸阳地区参加全省少年运动会排球赛，咸阳少年女排又获冠军。1973年，咸阳地区举办“三小球”排球赛，并组队参加省“三小球”排球赛，咸阳地区少年男排名列全省榜首。是年，参加省中学生运动会排球赛，咸阳地区中学生男排荣获冠军。1974年6月，陕西省基层排球赛在西安市举行，三原县北城中学女排荣获亚军。1979年7月28日—8月9日，陕西省业余体校排球赛在扶风县举行，咸阳市女队获季军。

80年代咸阳市的排球运动，主要在业余体校中开展。1980—1989年，在陕西省1—8届运动会和1—3届青少年运动会排球赛中，男排获一次亚军，女排获一次亚军和季军。1985年7月30日—8月5日，省业余体校在汉中市举行女子乙组排球赛，咸阳运动员王小敏和王伟被评为“优秀运动员”。1987年7月25—31日，陕西省业余体校排球赛在榆林市举行，咸阳女排获第3名。1989年，咸阳市业余体校排球队在扶风县参加陕西省业余体校排球赛，

男队获第3名。

三、足 球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原宏道工业学堂派8人东渡日本学习足球。宣统二年(1910),足球最先在该校开展,后在渭北中学推广。1935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邀请西安黑白体育会远征足球队来校比赛,黑白队以1:0获胜。1942年10月,第十区参加陕西省秋季运动会足球赛,第十区和西安队经过110分钟(加赛20分钟)激战,难分胜负。1946年秋,第十区在咸阳东河滩临时操场举行秋季运动会足球赛,西北工学院与咸阳县对垒,西北工学院队获胜。

建国后,咸阳的足球运动逐步得到普及。50年代,西北工学院、咸阳中学和国棉一厂、国棉二厂足球活跃。1956年,陕西省足球锦标赛在咸阳市举行,以西北工学院为主组建的陕西省直属县市队,与11个单位足球队进行角逐,一举夺得省冠军。1956—1959年,咸阳市、咸阳赛区分别参加省运会足球赛,中学生运动会足球赛和省足球锦标赛,获亚军一次,季军两次。1958年,兴平县刘仁智入选省足球队。1959年4月,陕西省第三届运动会后,又有吴文明、夏国栋入选省足球队。10月刘仁智、姚建国、宋学仁代表陕西省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足球赛。

60年代初,咸阳的足球运动继续发展。1960年1月20—25日,咸阳市体委举办足、篮、排球锦标赛,市第四中学获足球赛冠军,西藏公学院获亚军。是年,参加省少年运动会足球赛和省足球锦标赛。1962年8月4—7日,陕西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在渭南举行,咸阳专区队荣获省冠军。黑志中、白青、李纯维等入选省青年队。1963年,陕西省8单位足球友谊赛在咸阳市举行,兴平县获第3名。是年,陕西省少年足球锦标赛在兴平县举行,咸阳市队获季军。1964年,参加省第四届运动会足球赛,咸阳专区获第3名。

70年代是咸阳足球的黄金时期。10年间,咸阳地区除在三届全地区运动会设足球赛外,还举办过全地区“三小球”足球赛和业余体校足球赛,职工足球赛等。这一时期参加省级以上足球赛8次,咸阳地区足球队获冠军2次,亚军2次,季军1次;咸阳市队获冠军1次。向省足球队输送沈建国、刘复生、雷浩、郭树振、安审祥、薛勇、李成生、姬云鹏、张庭安、杨刚等10名优秀运动员。

80年代,足球已成为咸阳广大青少年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1980—

1989年，咸阳市参加省运动会足球赛1次，省青少年运动会足球赛3次，以及省业余体校和传统项目学校足球赛2次，男足获冠军3次，亚军3次，季军1次；女足获亚军和季军各1次。1983年西北国棉一厂和秦岭公司子校率先开始了女子足球训练。4月12—23日，兴平县委、文教局、总工会联合举办了首届女子足球赛，比赛分中学组、小学组进行。

1984年4月13—19日，陕西省女子足球对抗赛在富平县举行，咸阳市女子足球队参赛。8月，咸阳市首届青少年运动会把女子足球列入比赛项目，取得1—3名的队是兴平县、秦都区、三原县。1986年，参加省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女子足球赛，咸阳市女子足球队获季军。

四、乒乓球

1919年，靖国军外交处长王志远从广州购回乒乓球和乒乓球拍子，于是，乒乓球活动便在三原县崇美中学开始推行。30年代，咸阳县公共体育场内和学道巷小学，也有乒乓球台、球、拍子等设施。

建国后，乒乓球运动最先在各县城镇机关、学校、事业单位内开始。1952年2月，陕西省球类运动会乒乓球赛在西安市举行，咸阳分区男队荣获全省团体亚军。2月15—31日，咸阳分区队的王振德入选省队，代表陕西参加西北区春季球类运动会乒乓球赛，获男子单打第4名。1955年，咸阳市举办六种球类运动选拔赛。1956年5月，咸阳市再次举行乒乓球选拔赛，6月，参加陕西省直属县市乒乓球赛。1957年8月，乾县、咸阳市、二赛区（咸阳赛区）、三赛区分别组队在临潼县参加陕西省乒乓球锦标赛。1958—1959年，咸阳市、二赛区、三赛区分别组队参加陕西省第二届运动会和第三届运动会乒乓球赛，咸阳赛区获省男、女团体第2名。

60年代，咸阳的乒乓球运动在工厂、学校普及。1960年4月23—28日，咸阳市队参加省乒乓球锦标赛，潘永辉夺得男子单打亚军。5月5—11日，陕西省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临潼工人俱乐部举行，咸阳市组队参加了比赛。1964年2月21日—3月2日，咸阳市、兴平县组队参加陕西省十县市乒乓球赛，咸阳市获混合赛冠军。6月，咸阳专区举行第二届运动会，首次将乒乓球列入比赛项目，男、女团体冠军分别由咸阳市队和兴平县队夺得。10月，参加省第四届运动会乒乓球赛，咸阳专区男、女队双获全省季军。

1966—1969年，咸阳乒乓球竞赛运动一度告停。

1971年，咸阳地区举办第三届运动会乒乓球赛，户县队、地区机关队分

获男、女团体冠军。1972年，咸阳地区在长武县举办了少年运动会乒乓球赛，咸阳市队获得了绝大部分项目的冠军。8月，陕西省少年运动会乒乓球赛在户县举行，咸阳地区男队荣获团体季军。1973年5月1—4日，咸阳地区举办首届业余体校乒乓球赛，咸阳市、泾阳县、三原县、乾县组队参加。是年，咸阳地区业余体校参加了陕西省业余体校乒乓球赛。1976年9月25—26日，咸阳地区举行业余体校乒乓球选拔赛，甲组男、女团体第1名分别由户县、长武夺得；乙组团体第1名分别由户县和地区业余体校夺得。1977年12月9—18日，咸阳地区在兴平柴油机厂举办职工乒乓球邀请赛，兴平化肥厂、咸阳地区运输公司、陕毛一厂、三原五号信箱等8单位参加。1979年8月1—5日，陕西省8单位业余体校乒乓球赛在蒲城县举行，咸阳运动员范强获乙组男子单打第3名。

1981年8月10—15日，陕西省业余体校乒乓球赛在户县举行。1987年，咸阳市举办业余体校乒乓球赛，国棉七厂业余体校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男子团体亚军。8月，以国棉七厂小学为主组建的咸阳市队参加了陕西省业余体校乒乓球赛，陈刚获身体素质测验第1名。1989年7月28日—8月3日，陕西省业余体校乒乓球赛在铜川市举行，咸阳市组队参加了比赛。

1990年7月15—20日，陕西省少年乒乓球赛在汉中市举行，秦都区业余体校代表咸阳市参加，获男子团体第3名。

五、羽毛球

咸阳的羽毛球运动约于1923年最先始于三原县崇美中学和三原工业职业学校。当时仅有少数教工活动，未见比赛。

建国后，羽毛球运动逐步在学校、机关、工厂中普及。1959年1月25—27日，陕西省少年羽毛球锦标赛在西安市举行，咸阳市队在五个项目的比赛中，获4项冠军和2项季军；安秀云获女子单打冠军，张海周、王家孝获男女双打冠军，王家孝、安秀云获男、女混合双打冠军。

1973年6月26—30日，咸阳地区参加陕西省五单位羽毛球赛，男、女队双双获团体赛季军，魏秀芬夺得少年女子单打冠军。

1981年，咸阳市举办职工羽毛球赛，西北轻工学院、建厂局等22个单位参加，任卓才、刘少明分获男子单打冠、亚军；赵杰、侯艳华分获女子单打冠、亚军。男子联赛第1名是建厂局，第2名是乾县。女子联赛第1名由轻工学院夺得，化工六院居第2名。

1982年10月6—19日，咸阳市举行职工羽毛球联赛，建厂局和轻工学院队分获男、女冠军，孙靖业和李玲分获男、女单打冠军。

1985年6月20—27日，秦都区举办职工羽毛球赛，8个单位参赛，轻工学院和铁一局获男子团体第1、2名，铁道部基建干部管理学院和华星电讯器材厂获女子团体第1、2名，孙靖业、贾雪莲获男、女单打冠军。

六、门 球

1985年3月，国家体委在上海举办门球教练员训练班，咸阳市派庞文科学习。同年5月，在市体育场举办全市及14县区门球教练员学习班，开始传授门球运动知识。经过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的大力协助，门球运动很快在县市城镇兴起，并成为老年人喜爱的运动项目。

第三节 武术、体操

一、武 术

清初，陕西武举参加乡试。雍正五年（1727）改会试，武举人、武进士剧增。清末，陕西武林四杰（“鹞子”高三、“黑虎”邢三、“饿虎”苏三、“通臂”李四）中的高三和邢三都在咸阳。赵武以“大小六合枪”著称，号称神枪赵武。高三，以关中红拳为基础，刻苦练习，博采众长，创立的高家拳在三原县一带流传。邢三晚年定居咸阳县，于是邢家拳便在兴平、礼泉、咸阳等县流传。1935年，陕西省教育厅发布训令，将国术（即武术）列为必修课。1938年，咸阳县周陵中学设国术课，宁志俊为国术课教师。从此，国术便在中、小学开始传授，为武术在咸阳中、小学的普及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建国后，咸阳武术运动发展迅速。1952年10月，咸阳专区举行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武术为表演项目。1953年陕西省直属县市体育选手选拔赛在咸阳机器制造学校举行，咸阳县获武术团体总分第1名。9月，陕西省武术表演赛在长安县举行，咸阳县的冯建勋、冯俊骥、冯志勤获表演奖。后代表陕西省参加了西北区民族形式运动会武术表演，又赴天津参加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冯建勋还专程到北京为国家领导人表演武术。1958年，咸阳

市、咸阳赛区分别举行武术选拔赛，并组队于10月参加陕西省第二届运动会武术比赛，咸阳赛区、三原赛区分获武术团体第2、3名；咸阳市的刘鹤令、李文才获拳术表演二等奖。1959年，三原县黄继贤、曹国福、曹亚莉（女）入选省武术队，参加了省第一届运动会武术比赛。

1960年5月14—17日，咸阳赛区参加陕西省少年田径、体操、武术运动会，赵笃信获一级拳、风摩棍、一级剑三个单项第2名和全能亚军。1964年，咸阳专区第二届运动会，将武术首次列入比赛项目，户县、咸阳市获团体总分第1、2名。10月，咸阳专区参加省第四届运动会武术比赛，男、女队分获团体总分第2名；郭树堂、赵笃信分获拳术、剑术亚军。

70年代，咸阳青少年习拳之人甚多，业余体校普遍建立了武术队，培养了一批武术苗子。在连续参加省五至七届运动会武术比赛中，团体总分一直名列全省2、3名。1979年10月1—2日，咸阳地区武术队在铜川市参加陕西省武术比赛，获团体总分第2名。

80年代，咸阳出现了“武术热”。1981年，咸阳市参加陕西省业余体校武术比赛，获团体总分第1名。1982年4月27日—5月1日，陕西省传统武术表演赛在渭南举行，咸阳地区的康乐生、张宝林分获成年组二等奖和三等奖。1983年4月9日，咸阳地区在商县参加陕西省武术观摩赛，获全省团体总分亚军；郭桂玲获女子全能冠军，刘存和、康乐生分别获成年组传统项目一、二等奖；三原县中山街小学体育教师崔应斌被国家体委授予“优秀武术教练员”称号。1984年4月15—20日，陕西省武术观摩赛在户县举行，咸阳市的李红萍、裴国强分别荣获少年女子个人全能和男子中量级太极推手冠军。9月19—23日，参加省第二届工人运动会武术比赛，咸阳市获团体总分冠军，毛二健、刘文成分别获得刀术、棍术第1名和二人对练冠军。1985年4月15—17日，陕西省业余体校武术比赛在商县举行，咸阳市除获团体总分冠军外，还获得16个单项第1名。1986年，咸阳市参加省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武术赛，再度夺得男、女团体总分冠军。1987年8月22—26日，泾阳县、三原县和咸阳市业余体校同期参加陕西省第三届儿童“习武杯”比赛，泾阳县和咸阳市业余体校分获团体第2、3名，泾阳县刘红莉、孟志坚还分别夺得女子甲组和男子乙组个人全能冠军。1988年4月，陕西省举行首届农民运动会，咸阳市运动员贺娥、吴陆分获个人全能和拳术冠军。此后贺娥入选省农民武术队，参加了全国农民运动会武术赛，获武术表演优秀奖。1988年，参加省第三届青少年运动会武术赛，咸阳市仍保持全省第二。1989年8月，陕

西省第四届儿童“习武杯”武术赛在西安举行，咸阳市获团体第3名，史莹获乙组女子个人全能冠军。在训练、参赛的同时，咸阳市还于1985年在市体育场举办了“三秦擂台赛”。1989年，主办“咸阳杯”中国北方武术散打擂台赛，这是陕西民间武术团体首次主办的全国性武术比赛。

二、体 操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始设体操科，内容以德、日兵式体操为主。光绪三十四年（1908），泾阳县官立小学堂授哑铃操。公、私立初等小学堂授走步法、正步法、全身运动、上肢运动等体操运动。1918年，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先生聘军事体操家庞建堂，并在三原县南门外大教场修建器械体操场，对官兵进行体操训练。1932年，泾阳县第一高等小学有单杠、双杠、木马等体操器械。1935年，咸阳县学道巷小学也有了单杠、双杠等体操设施。1946年5月1日，咸阳县举行中、小学春季运动会，周陵中学表演的团体操以动作整齐、图形变化新颖而荣获第1名。

建国后，体操运动在咸阳学校、机关、工厂中得到了普及和发展。1952年专区举行首届运动会，广播体操列为规定的比赛项目。1953年7月，陕西省直属县市体育选手选拔赛在咸阳机校举行，首设竞技体操表演，咸阳机校体育教师任宗慈以动作姿势优美、惊险荣获第1名，机校学生侯恒福获第2名。8月，任宗慈、侯恒福代表直属县市参加陕西省体育选手选拔赛，成绩优异。后代表陕西省、西北区体操队分别参加了西北区和全国田径、体操、自行车运动会体操比赛。1955年春，咸阳市举行小学生田径运动会，1290多名学生参加体操比赛。1956年5月12—13日，在西安市举行陕西省青少年体操运动大会，咸阳机校学生杨嘉志入选省青少年体操队。后赴青岛参加全国青少年运动会体操比赛。1957年8月10—13日，咸阳市、泾阳县、三原县、武功县、乾县参加陕西省体操锦标赛，泾阳县韩乃健获普通组男子甲组单杠亚军、双杠季军，杜德枯获支撑跳跃亚军和鞍马季军，陈丽芝获女子甲组自由体操、吊环、高低杠、平衡木四项第3名；咸阳市张思明获单杠亚军，张士珍获自由体操季军，彭光华获支撑跳跃季军。1958年7月，咸阳市、二赛区（咸阳）分别组队参加省中学生运动会体操比赛，张士珍达到二级运动员标准。10月，入选省队的咸阳运动员杨嘉志参加全国体操锦标赛，获鞍马第5名。

60年代，咸阳的体操运动以民族学院和咸阳二中为代表，多次组队代表

咸阳市参加省上比赛。1963年8月17—19日，陕西省少年体操邀请赛在汉中市举行，咸阳市和兴平县组队参加，咸阳市获女子团体总分第2名。1964年10月，参加省第四届运动会体操赛，咸阳专区男、女队双获团体总分第3名。1965年6月，陕西省12县区少年体操锦标赛在咸阳市举行，咸阳市获女子团体总分第3名。

70年代初，咸阳的体操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1971—1979年，咸阳地区组队先后参加省5—7届运动会体操比赛，张尧天、王文生、王小华曾分别荣获男、女个人全能第1名。1972年8月，咸阳地区在高陵县举行少年运动会体操赛，乾县、咸阳市分获男、女团体总分第1名，何育祥、魏玲玲分获甲组男、女个人全能冠军，李江海、王兰兰分获乙组男、女个人全能冠军。9月，咸阳地区参加省少年运动会体操比赛，男队获省团体总分第2名，梁军在男子甲组单项赛中名列榜首。1973年，参加省业余体校体操比赛，咸阳地区男队获团体总分第2名。1979年8月，省体育运动学校体操比赛在汉中市举行，咸阳地区少年组男、女队双双获团体总分第3名；儿童组男子队获团体第2名，黄英、陈景民、王建昌分别夺得少年甲组、少年乙组、儿童甲组吊环和跳马3项冠军。

80年代，咸阳市的儿童体操迅速发展。1980—1981年先后两次参加陕西省幼儿体操“流动杯”赛。1980年由第二印染厂、国棉七厂、陕毛一厂等队参加比赛，荣获团体总分第1、2、4、5、6名，第二印染厂幼儿园的孙东军获男子全能金牌，安锋获银牌，国棉七厂幼儿园的杨林、马燕分获女子全能冠、亚军。8月9—11日，陕西省儿童体操测验赛在西安市举行，王艳萍获个人全能第1名。1981年，陕西省第二届幼儿园操“流动杯”赛，咸阳地区队仍登男、女总分榜首。6月，陕西高校举行体操等级赛，陕西中医学院女队荣获团体总分第2名。1982年，省业余体校体操比赛于5月20—23日在宝鸡市举行，咸阳地区男、女队分获团体总分第2、3名。1984年7月15—19日，在省首届青少年运动会儿童体操赛中，咸阳张小雪荣获女子个人全能冠军并入选省队。1986—1988年，陕西省举行第二届、第三届青少年运动会体操比赛，咸阳市女队两次夺得团体总分第2名。

与此同时，咸阳市艺术体操比赛也开始举行。1984年8月，咸阳市组队参加在宝鸡市举行的陕西省第一届青少年运动会艺术体操比赛，获团体第4名。1986年8月，陕西省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在咸阳市举行，咸阳艺术体操队荣获团体第2名。1988年陕西中医学院参加陕西省大学生艺术体操比赛，

获团体总分和“三球三圈”第2名。

第四节 其他运动

一、游 泳

本地渭河、泾河、泔河沿岸群众，很早以前就有着“扎猛子”、“漂黄瓜”等游泳活动。但游泳活动的普及和发展，还是在建国以后。50年代初，当时在泾阳县永乐店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每逢夏季，有组织地到泾河游泳，游泳技能好的师生，还开展横渡泾河比赛。60年代，驻守在咸阳底张飞机场的兰州空军部队，已开始了游泳训练。驻地部队院内设有长50米、宽20米标准游泳池一个，供官兵游泳训练。7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后，本地群众夏季经常到泔河及渭滨公园游泳。其间，咸阳市体委多次举办训练班，邀请解放军做武装泅渡表演。

1971年6月，咸阳地区第三届运动会首次将游泳列入比赛项目，户县和乾县分获团体总分第1、2名。1972年7月4—7日，咸阳地区队参加陕西省游泳表演赛，王凯旗夺200米仰泳和200米混合泳两项冠军；祝卫国获少年男子甲组4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并以7'16"4的成绩打破9'32"1的省纪录。1973年7月12—16日，咸阳地区在户县惠安化工厂举行首次游泳运动会。8月，组队参加陕西省少年游泳比赛，杨喜玲、石小平、浴江东分别以7'58"7、8'20"2、8'51"7的成绩打破少年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9'32"的省纪录；女子甲组、乙组分获团体第2名。1977年7月8—15日，咸阳地区在户县参加陕西省7单位游泳选拔赛，张恺荣获少年男子乙组100米蛙泳、200米蛙泳两项亚军。1978年，参加省第七届运动会游泳赛，获女子团体第3名；熊志远、贾冰、付广奇、叶忠以2'57"4打破4×50米自由泳接力赛2'58"2的省纪录，田美莲获少年女子乙组200米、400米自由泳冠军。1979年8月1—4日，咸阳地区参加陕西省8单位游泳比赛，女子团体获第3名，田美莲1人独揽400米、800米自由泳和200米蛙泳三项冠军，儿童男子甲组也获4×5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

80年代，咸阳游泳运动更加普及深入，运动水平也有相应的提高。此时，业余体校和儿童比赛较多。1987年8月，咸阳市举行儿童游泳测验赛，袁志强、景峰和陈华、王芳分别打破男子乙组400米自由泳和女子甲组200

米混合泳市纪录。当月，在安康参加陕西省业余体校游泳赛，陈华、袁志强各获一项第2名。1989年7月20—21日，陕西省儿童游泳比赛在略阳县举行，袁志强获男子全能第2名。1980—1989年，参加了陕西省8届运动会和3届青少年运动会游泳赛，团体成绩居全省前列。

二、赛 车

自行车 咸阳自行车运动始于50年代初期，大都在田径场内进行。1953年7月，各县市体育选手选拔赛把自行车赛列为表演项目，咸阳县李宗渊的车技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在咸阳市人民体育场举行自行车选拔赛。同年6月，各县市自行车运动员参加陕西省大学生及青少年运动会自行车比赛，沈自芳获青年组自行车1500米第2名，并入选省青少年自行车队，赴青岛参加全国青少年运动会自行车赛。9月23日范景云、刘小莲入选省纺织体育协会自行车队，二人分别以3'7"9、3'20"6打破3'47"女子1500米省自行车纪录，范景云还以6'52"3再次打破1955年7'23"4的陕西省自行车3000米纪录。1958年，咸阳市自行车队参加省第二届运动会自行车赛，获公路自行车团体赛第3名，范景云荣获女子25公里、3000米赛2项冠军。1959年，范景云（女）、李志超、刘炳文、张林萍（女）、刘小莲（女）入选省队，参加省第一届运动会自行车集训。在北京—天津公路等级运动员测验中，5人均达到运动健将级标准。

1960年，陕西省举行三桥—户县公路自行车测验赛，李志超获男子100公里（普通车）第2名。1964年5月咸阳专区举行第二届运动会，首次设公路自行车赛，吕世智分别获男子100公里、50公里两项第1名，杨治民、李志超获男子两项第2名；范景云分获女子50公里、25公里两项第1名，刘小莲获两项第2名。

70年代，咸阳地区的自行车运动更加普及，咸阳市、三原县、礼泉县、泾阳县、兴平县相继成立了自行车队。1976年，咸阳地区首届自行车选拔赛在泾阳县举行，市队获男、女团体总分第1名。7月，全省公路自行车赛在临潼县举行，咸阳市队员屈建昌、官桂莲分获（普通车）冠军。1978年4月30日—5月1日，在咸阳市体育场举行自行车选拔赛，咸阳市队获各项第1名。9月，参加省第七届运动会自行车赛，咸阳地区获男子团体总分第1名；男队有5人次破田径场自行车3项省纪录，女队有6人次破田径场自行车2项省纪录。1979年5月，咸阳市石长建、史海泉、楼金品入选省队，参加全

国公路自行车多日赛，石长建以4:6'44"3的成绩获多日赛134公里第3名。7月16—23日，咸阳地区自行车队参加西北区公路自行车赛，咸阳女队在50公里赛中，打破了渭南地区女队1974年创造的1:36'26"3的省纪录。

80年代，因场地、器材等因素影响，至1990年咸阳市再未举行过自行车竞赛活动。

摩托车运动 咸阳的摩托车运动始于1956年。是年春季，咸阳市举行咸阳—乾县摩托车越野赛，西北工学院、咸阳机器制造学校、咸阳纺织工业学校参加了比赛。1958年咸阳市国防俱乐部成立，设摩托车训练项目。6月14—15日，咸阳市体委干部林德武在西安参加陕西省摩托车越野个人赛，获男子50公里第4名。10月，咸阳市参加省第二届运动会摩托车赛，获女子25公里第2名。1959年，林德武代表陕西省参加全国第一届运动会350型（两轮）50公里越野赛，获第4名及该车型越野环形公路全能第5名。

1976年3月，陕西省体委举办摩托车教练员训练班，咸阳市、兴平县、旬邑县各派1人参加。1977年，咸阳地区体委首次举办摩托车训练学习班，西北国棉一厂子校的王鑫、张俊亮、王亚玲（女），西北国棉七厂子校的高宝顺、王光华，咸阳二中的李建成参加学习。1978年，咸阳地区参加省第七届运动会摩托车赛，男、女队均获第4名。1979年，李建成入选省摩托车队，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摩托车赛，与同伴合作获男子两轮摩托车30公里越野赛团体亚军、个人第2名，达到运动健将标准，入选国家摩托车集训队。之后出访过日本国和香港。

1980年，李建成参加全国摩托车个人冠军赛，获250型（两轮）越野赛第2名。1982年8月9—10日，咸阳市参加陕西省摩托车赛，夺得团体总分第1名，何观峰获甲组第2名，徐新成、王江平分别获得乙组第2、3名。10月李建成在全国摩托车越野赛中，再次夺得摩托车125型（两轮）自选摩托车公路赛亚军。1985年，李建成又与同伴合作，获125型（两轮）公路团体赛第5名。

三、射 击

咸阳的射击运动始于1956年，咸阳市购进小口径步枪47支，配备了兼职射击教练员。1957年，国防体育协会和共青团陕西省委联合举办业余射击教练员训练班，咸阳市、礼泉县、乾县派员参加。同年，西北工学院的杨印芳、陆文信，咸阳机器制造学校的周嘉琪、赵志强和郑瑞云、赵梅蓉、冯兰

芳，国棉二厂的王诚然、王养括、余亚兰，陕棉一厂的孙义龙入选省世界射击冠军选拔赛训练名单。1958年7月11—14日，陕西省射击比赛在西安市射击俱乐部举行，咸阳市、兴平县、礼泉县、三原县青少年代表队参加。7月25—27日，陕西省举行射击竞赛大会，礼泉县中学的应万珍、王莹、南淑芹入选省射击队。10月，咸阳市参加省第二届运动会射击比赛，刘襄华、王俊安各获一项冠军。1959年，咸阳市已培养普通射手1927人，其中三级射手214人。

60年代，咸阳射击运动在普及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提高。1960年，陕西省举行优秀射击运动员选拔赛，礼泉县的应万珍在跑鹿50发单项射击赛中，以227环的优异成绩打破解放军队刘裕华在1959年创造的226环国家最高纪录，并超过运动健将标准。1963年8月5日，陕西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在西安市南郊陆上俱乐部射击场举行，咸阳专区获团体亚军和两个单项第1名（少年女子组一、二号项目）。1964年10月，咸阳专区举行第二届运动会，射击首次列为比赛项目，咸阳市获团体第1名，乾县、礼泉县分获第2、3名。1965年5月1—10日，咸阳专区举行首届中学生运动会射击比赛，咸阳市、礼泉县、乾县获团体前3名。6月7—12日，咸阳地区参加陕西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获团体亚军。

1966年射击运动暂停。1972年后恢复。西北国棉一厂、二厂、七厂紧密结合民兵训练，在青年工人中开展射击活动。1973年7月1—3日，陕西省射击运动会在省射击场举行，咸阳男、女总成绩排在全省前列；任悦凤、燕淑云、上伟花集体协作获女子组9+30项目亚军。是年，铁道部建厂工程局子校学生林波，乾县城关一中王永平、任悦凤（女）、礼泉县一中郑警畅代表陕西省队参加全国射击邀请赛，林波一人独揽全国3项冠军3项亚军，并入选省射击队。1974年7月22日，国棉二厂子校的褚刚，国棉一厂子校的范惠萍（女）、孟刚民，铁道部建厂工程局铁中的赵大仑，兴平县南郊中学的胡建平入选省射击集训队。1975年9月，在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射击比赛中，林波一人打破小口径自选步枪3×40立射及卧射两项全国纪录并夺得小口径自选步枪3×40的第1名；同时，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三届亚洲射击锦标赛上，由林波参加的中国射击队获小口径自选步枪团体冠军。1978年5月，在石家庄、杭州举行的全国射击比赛中，林波分别夺得小口径步枪40发立射、小口径自选步枪40发立射及小口径标准步枪3×20三个项目的第1名；同时，在昆明举行的第八届亚运会选拔赛上，林波再破小口径手枪3×40的全国纪录。

此后，在银川、沈阳等地举行的全国射击比赛及奥运会项目比赛中，林波、褚刚又多次夺得其优势项目的第1名并刷新了全国纪录。1982年11月，在第九届亚运会上，林波再次夺得小口径步枪两个项目的第1名。1978年，咸阳地区举行第五届运动会射击赛，咸阳市男、女队分获团体总分第1名。9月参加陕西省第七届运动会射击比赛，孟刚亮、安亚利（女）打破两项省射击纪录。

1989年，咸阳市参加陕西省青少年射击比赛，黄勇获男子自选步枪3×20项目个人成绩第1名及男子小口径自选步枪60发卧射、男子气步枪60发两项第2名。1990年7月15—21日，陕西省射击锦标赛在咸阳市射击场举行，咸阳市女队获团体总分第2名，并获男子气枪60发、女子小口径标准步枪60发卧射和女子气手枪40发3项团体第1名，智玉获女子小口径标准步枪60发、女子标准步枪3×20两项个人冠军，陆芳获女子气步枪40发冠军。

四、无线电收发报

咸阳的无线电运动始于1958年，主要开展项目有无线电快速收发报、无线电工程制作两项。庞春元在省第二届运动会无线电比赛中，以优异成绩破全国纪录。1959年，咸阳参加省第三届运动会无线电比赛，贺广贤在男子抄报、发报低速混合码比赛中，以115.92打破了在太原创造的110.81的全国收发报纪录。年内，咸阳中学无线电工程制作在京展出。1963年，咸阳市参加省无线电发报竞赛，还参加陕西省无线电工程制作评比竞赛。1964年，咸阳专区举行第二届运动会无线电收发报比赛，咸阳市获团体总分第1名，获个人前3名的是魏学良、郑清芳、张体勋。1965年7月21—26日，咸阳专区在永寿县举行无线电收发报运动会，14县市151名男女运动员参加，2人打破了专区1964年全部纪录，10人刷新了专区1964年的单项纪录，咸阳市、永寿县、户县分获男、女收报团体总分1、2、3名，永寿县、咸阳市、礼泉县获男、女发报团体总分1、2、3名。户县、高陵、永寿县获大会风格奖。

1977年4月20—5月20日，咸阳地区派无线电工程教练员1人，无线电收发报教练员3人，航模教练员3人去省上参加教练员训练班。10月，咸阳地区举行无线电收发报比赛，户县、长武、乾县、礼泉、淳化县及咸阳市派队参加。1978年，咸阳地区参加省第七届运动会无线电比赛，男、女队荣获团体第2名。1979年8月12—18日，陕西省无线电报务比赛在咸阳举行，户县一中、长武县东街学校代表咸阳地区参加，王永琪获发报第2名、全能第

3名,鱼新道和鱼少锋获男子通报第3名。

80年代初,咸阳仍多次派人参加陕西省无线电教练员学习班,举办咸阳地区业余教练员学习班,在学校开展无线电学习活动。1982年8月2—7日,咸阳地区参加省无线电比赛,获团体总分第1名。郭小峰入选省队并赴青岛参加全国无线电比赛,获80米波段第1名,2米波段第2名。1988年,许峰入选省队,参加全国无线电测向锦标赛,获2米波段第2名,获个人全能第4名。

五、航模与跳伞运动

1953年7月,西北农学院举办青少年夏令营,开展橡筋弹射、一级牵引模型滑翔机和一级橡筋动力模型飞机活动。1956年咸阳市、兴平县成立了航空模型俱乐部。1958年和1964年,咸阳分别派队参加了省第二届运动会、省第三届运动会航模赛,成绩均排在全省前列。1964年,咸阳市的刘成福、田勇,周至县的王乃民、武全兴,泾阳县的李公社入选省业余滑翔员训练班。1977年3月15—26日,咸阳地区派9人去省体委参加跳伞训练学习班。4月,咸阳四中的李秦杰,国棉一厂子校的关希梅、王秀丽,咸阳市五中的祝爱军入选全国跳伞队赴云南学习。王希梅此后在1979—1985年的多次国内、国际跳伞赛中,打破和创造了国家新纪录,取得优异成绩。1978年1月25日,秦岭中学的王一心(女)、咸阳市十一中学的王莉群(女)、兴平县西吴中学的张玉平在蒲城县参加省体委举办的跳伞训练学习班,经过一个月的训练,王一心、王莉群入选陕西省飞机跳伞运动队,并代表陕西参加全国跳伞运动员训练。1982年,参加省第八届运动会,咸阳地区刘洪获航模国际级自由飞模飞机(FIC)第2名。1986年9月,在济南举行的全国航模比赛中,咸阳运动员李海勇夺得FIC个人项目第2名。同年,在上海举办的全国跳伞乙级队比赛中,关希梅获个人定点、个人全能两个项目的第1名。

第三章 运动会

咸阳市(地区)级运动会始于1942年。至1990年,共举行全市(地区)

运动会 8 届，其中民国时期 2 届。按行业、年龄又分别举办过 1 届农民运动会，1 届中学生运动会和 3 届青少年运动会，并选派运动员或组队参加过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西北区运动会和省级运动会。建国后参加省运会 8 届，省青少年运动会 3 届，其他各类运动会 13 届。承办省级比赛 50 余次，全国或地域性单项竞赛 20 余次。

第一节 举办运动会

一、全市（地区）运动会

陕西省第十行政督察区秋季运动会预选赛 1942 年 10 月 1—2 日，在三原县公共体育场举行。公署专员温良儒任大会主席。大会下设总务股、竞赛股、评判股、纠察股和选拔委员会。咸阳县周陵中学，兴平县县立中学、泾阳县泾干中学，三原县县立中学、省立中学、省立女中、三原工职、振国中学、崇美中学、池阳中学、民治中学参加了比赛，项目有田径和篮球。1946 年 4 月 16—18 日在咸阳东河滩临时操场举行。咸阳县、泾阳县、高陵县、三原县等单位参加。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和垒球等。咸阳县运动员赵九福获 400 米、800 米第 1 名，赵运銜获三级跳远第 1 名。

第一届咸阳专区人民体育运动大会 1952 年 10 月 1—3 日在咸阳市北关西北工学院体育场举行，有三原、泾阳等 13 县及专署机关等 20 个单位参加，运动员共 325 人。比赛项目以田径为主，设有球类、国术、摔跤、技巧、民族舞蹈等表演项目。运动会设男女田赛、径赛集体奖和个人前 6 名单项奖。比赛最好成绩，男子：100 米为 12"1，200 米为 25"，5000 米为 16'27"，10000 米为 37'，铁饼为 28.16 米。女子：200 米 32"，铁饼 21.04 米。

咸阳专署第一届运动会（依序排为第二届） 1964 年 8 月 12 日—12 月 3 日分别在高陵县、咸阳市举行，参加比赛的有咸阳市及兴平、泾阳、三原、长武、礼泉、永寿、周至、乾县、旬邑、彬县、淳化等 13 县。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武术、体操、举重、自行车、射击、无线电收发报等。咸阳市、乾县、礼泉县分获团体总分前 3 名。

第三届咸阳地区运动会 1971 年 6 月 30 日—7 月 21 日分别在户县和泾阳县举行。咸阳军分区、地区机关和 13 县市共 15 个单位参加。大会组委会主任张逸之，副主任熊味斋。比赛项目共 7 项，田径、篮球、游泳在户县举

1964年咸阳专区第一届运动会各单项第1名成绩统计表

表7-2

项 目		男 子			女 子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体 操	单 杠	马普明	户 县	3.5分	房晓文	三 原	8.6分
	高低杠				任彩娥	泾 阳	8.3分
	双 杠	巨守先	户 县	8.1分			
	平衡木				阎小莉	咸 阳	8.2分
	跳 跃	张学智	泾 阳	7.5分	昌 平	咸 阳	7.5分
	自由体操	史振通	咸 阳	8.8分	李绍芳	兴 平	8.6分
	鞍 马	马普明	户 县	8.6分			
	吊 环	张学智	泾 阳	9.2分	小强巴	咸 阳	8.3分
	全 能	马普明	户 县	49.3分	昌 平	咸 阳	45.9分
武 术	拳 术	侯安福	周 至				
	刀 术	任春荣	咸 阳				
	枪 术	毛志奇	兴 平				
	剑 术	乔书安	咸 阳				
	棍 术	任春荣	咸 阳				
	全 能	乔书安	咸 阳				
女 子 一 级 体 操	高低杠				王彩玲	兴 平	15.5分
	平衡木				王彩玲	兴 平	15.65分
	跳 跃				索郎拉姆	咸 阳	14.05分
	自由体操				王彩玲	兴 平	15.5分
	全 能				王彩玲	兴 平	60.95分
自 行 车	100公里	吕世智	咸 阳	3:44'24"			
	50公里	吕世智	咸 阳	1:42'53"	范景云	咸 阳	2:8'56"
	25公里				范景云	咸 阳	57'39"
射 击	青年一号项目		乾 县	667环		咸 阳	582环
	少年一号项目		咸 阳	214环		乾 县	189环
	青年二号项目		咸 阳	1248环		咸 阳	1169环
	少年二号项目		乾 县	541环		咸 阳	556环
	青年军用步枪		咸 阳	267环			
无 线 电	魏学良	咸 阳		张福莲	咸 阳		

续表 7-2

项 目	男 子			女 子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田	100 米	姚 于	咸 阳	12"1	石燃莲	咸 阳	15"
	200 米	杨益民	咸 阳	25"	赵起贤	咸 阳	
	400 米	杨益民	咸 阳	55"5	札西曲珍	咸 阳	1'9"8
	800 米	勒礼才	咸 阳	2'16"8	札西曲珍	咸 阳	2'49"
	1500 米	邹洪谋	兴 平	4'27"			
	5000 米	邹洪谋	兴 平	17'13"			
	10000 米	邹洪谋	兴 平	36'52"8			
	80 米栏				王秀英	户 县	16"4
	110 米栏	王云飞	周 至	19"8			
	200 米栏	赵世斌	咸 阳	28"3			
	400 米栏	姚 于	咸 阳	1'5"			
	400 米接力		咸 阳	49"6		高 陵	1'3"5
	800 米接力					咸 阳	2'7"6
	1600 米接力		兴 平	45"2			
	径	五项全能			王爱玉	咸 阳	2034 分
十项全能		安继儒	兴 平	2800 分			
十公里竞走		程新民	兴 平	1:0'12"			
马 拉 松							
(20000 米)		程新民	兴 平	1:21'30"			
铅 球		刘 忠	礼 泉	10.50 米	曲 措	咸 阳	7.90 米
铁 饼		黄宝全	兴 平	29.30 米	曲 措	咸 阳	27.17 米
标 枪		郭建卫	户 县	43.60 米	曲 措	咸 阳	29.63 米
链 球		邱 岗	咸 阳	22.04 米			
跳 高		李 邠	三 原	1.65 米	王爱玉	咸 阳	1.22 米
跳 远	陈祖声	长 武	5.61 米	贺香雪	三 原	3.89 米	
三级跳远	陈祖声	长 武	12.20 米				
撑高跳高	周言华	咸 阳	2.50 米				

行；足球、排球、乒乓球和体操比赛在泾阳县举行。本届运动会分青年组和少年组进行。有 67 人、6 队 89 次打破 32 项地区田径最高纪录。获男子团体总分前 3 名的是兴平县、户县、三原县；获女子团体总分前 3 名的是户县、兴平县、三原县。

第四届咸阳地区运动会 1975 年 1 月 1 日—2 月 10 日分别在兴平、三原、高陵 3 县和咸阳市举行。大会组委会主任吴维录、副主任路玺琪。各赛区竞赛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参加比赛的有咸阳市、兴平县、泾阳县、户

县、高陵县、三原县、长武县、礼泉县、永寿县、周至县、乾县、旬邑县、淳化县和彬县 14 个单位，共 1647 名运动员，加上教练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 616 人，共计 2263 人。足球、篮球、体操、中国象棋在咸阳赛区进行，排球、武术在兴平赛区进行，乒乓球在三原赛区进行，田径在高陵赛区进行。获田径团体总分前 3 名的是咸阳市、高陵县和户县。

1971 年第三届咸阳地区运动会各单项第 1 名成绩统计表

表 7-3

项 目		男 子			女 子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体 操	单杠	董升卫	永寿	9.1分			
	高低杠				哈清珍	兴平	9.6分
	双杠	董升卫	永寿	9.4分			
	平衡木				哈清珍	兴平	9分
	跳跃	马晋明	户县	9.7分	哈清珍	兴平	9.5分
	自由体操	马晋明	户县	9.35分	哈清珍	兴平	9.3分
	鞍马	巨守先	户县	8.35分			
	吊环	董升卫	永寿	9.3分			
全能	董升卫	永寿	52.95分	哈清珍	兴平	37.4分	
田	100米	姚登峰	兴平	12"	刘小玲	三原	14"2
	200米	姚登峰	兴平	25"	刘小玲	三原	29"7
	400米	景延陶	兴平	55"3	张菊娥	三原	1'10"1
	800米	景延陶	兴平	2'7"8	王爱芹	泾阳	2'49"6
	1500米	武存德	彬县	4'35"3			
	5000米	雷顺锋	高陵	17'59"8			
	80米栏				王秀英	户县	14"3
	110米栏	于书梯	淳化	18"4			
	200米栏	于书梯	淳化	28"1			
	400米栏	于书梯	淳化	1'2"2			
	400米接力		兴平	48"5		户县	57"8
	800米接力					户县	2'3"2
	1600米接力		兴平	3'50"6			
	五公里竞走	程新民	兴平	27'9"8			
径	跳高	孙永刚	户县	1.62米	徐彬		1.32米
	跳远	卫书谦	兴平	5.75米	王秀英		4.20米
	三级跳远	卫书谦	兴平	12.09米			
	撑杆跳高	范国兴	户县	2.90米			
	铅球	付传军	旬邑	9.58米	张文宏	户县	8.32米
	铁饼	许恒	乾县	30.52米	高云芳	户县	24.90米
	标枪	付传军	旬邑	40.78米	庄珠莲	永寿	22.45米
	手榴弹	赵德才	三原	58.97米	张再荣	长武	37.22米
	三项全能				刘云霞	兴平	1483分
	五项全能	夏心彬	户县	1659分			

续表 7-3

项 目		男 子			女 子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田	100 米	王家振	兴 平	12"3	许新会	户 县	14"4
	200 米	袁永启	三 原	25"8	孙莉莉	兴 平	30"
	400 米	陈德全	礼 泉	58"1	郭秀琴	兴 平	1'9"7
	800 米	张善民	淳 化	2'17"2	李艳艳	三 原	2'41"3
	1500 米	张善民	淳 化	4'45"5			
	80 米栏				孙莉莉	兴 平	15"
	200 米栏	王家振	兴 平	29"1			
	400 米接力		户 县	51"3		兴 平	55"4
	800 米接力					兴 平	2'2"5
	1600 米接力		户 县	4'1"			
径	跳 高	王兴运	泾 阳	1.53 米	刘秀菊	泾 阳	1.29 米
	跳 远	丑治龙	户 县	5.09 米	高莲芳	兴 平	4.38 米
	三级跳远	蔡保森	泾 阳	11.03 米			
	撑杆跳高	奕金明	户 县	2.75 米			
	铅 球	韩建军	高 陵	11.35 米	王宏宜	高 陵	8.23 米
	铁 饼	董双灌	高 陵	38.47 米	王宏宜	高 陵	24.91 米
	标 枪	王树辉	礼 泉	44.26 米	阎淑侠	礼 泉	23.83 米
	手榴弹	崔江如	户 县	61.26 米	石秀玲	三 原	36.05 米
	三项全能	仇宇华	三 原	1247 分	孙景芳	兴 平	1220 分

1975 年第四届咸阳地区运动会各单项第 1 名成绩统计表

表 7-4

项 目		男 子			女 子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乒乓球	单 打	吕勃舒	咸 阳		张家秀	咸 阳	
	儿童单打	马友爱	户 县		尚小侠	咸 武	
体 操	单 杠	翟铁强	咸 阳	6.70 分	樊明侠	乾 县	6.85 分
	高低杠				王少华	乾 县	7.40 分
	双 杠	张尧天	淳 化	7.20 分			
	平衡木						
	自由体操	高红升	咸 阳	7.35 分			
象 棋	鞍 马	张尧天	淳 化	7.50 分			
	吊 环	何富强	乾 县	7.75 分			
武 术	集体项目	李自为	乾 县				
	个人全能	毛改奇	户 县	8 分	朱丽萍	户 县	32.62 分

第五届咸阳地区运动会 1978 年 7 月 28 日—8 月 6 日在咸阳市举行。13 个县市参加了运动会。大会组委会主任路玺琪、副主任许廷芳、高尔谦、冯世英、赵晓源、马宏升。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和射击、航空模型。这次运动会的田径赛中有 24 人 14 次打破 11 项地区最高纪录。咸阳市队分获男女篮球、排球、乒乓球、射击、无线电、田径第 1 名。

1978年第五届咸阳地区运动会各单项第1名成绩统计表

表7-5

项 目		男 子			女 子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乒 乓 球	单 打	王国平	兴 平		强家秀	咸 阳	
	少年单打	杨君渭	咸 阳		杨 眉	咸 阳	
射 击	9+30	蔡朝平	咸 阳	258环	安利亚	咸 阳	262环
	3×20	陈 林	咸 阳	491环	安利亚	咸 阳	485环
	10+40	余纯德	礼 泉	173环	常亚利	咸 阳	189环
田 径	100米	郭志民	兴 平	11"9	路小英	高 陵	13"9
	200米	许跃波	咸 阳	24"2	左桂珍	咸 阳	28"9
	400米	董双灌	高 陵	54"6	左桂珍	咸 阳	1'4"7
	800米	董双灌	高 陵	2'7"2	柴 林	咸 阳	2'29"4
	1500米	董双灌	高 陵	4'24"	范占红	泾 阳	5'2"8
	3000米	官锦秀	咸 阳	9'23"4	范占红	泾 阳	11'38"7
	5000米	祁朝辉	兴 平	17'29"1			
	10000米	官锦秀	咸 阳	36'52"9			
	100米栏				姬芳芹	户 县	17"6
	110米栏	刘 卫	泾 阳	19"			
甲 组	400米栏	王兴礼	高 陵	1'3"1	姬芳芹	户 县	1'19"1
	400米接力		兴 平	48"1		咸 阳	55"6
	1600米接力		高 陵	3'45"3		咸 阳	4'29"1
	跳 高	曹庆安	户 县	1.68米	王 梅	户 县	1.40米
	跳 远	郭志民	兴 平	5.78米	李小宁	兴 平	4.60米
	三级跳远	曹庆安	户 县	12.44米			
	撑杆跳高	李 祥	户 县	3.00米			
	铅球 (4kg)				张淑芹	乾 县	9.05米
	铅球 (7.25kg)	张永新	永 寿	10.25米			
	铁饼 (1kg)				张菊菊	兴 平	27.90米
铁饼 (2kg)	赵 定	咸 阳	31.26米				
标枪 (600g)				刘秀英	咸 阳	34.44米	
标枪 (800g)	木 政	咸 阳	47.50米				
手榴弹 (500g)				刘秀英	咸 阳	42.70米	
手榴弹 (700g)	任开会	兴 平	68.38米				
五项全能				王 梅	户 县	2638分	
十项全能	李 祥	户 县	4236分				

续表 7—5

项 目		男 子			女 子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田	100 米	王左代	兴 平	12"2	辛君荣	泾 阳	13"2
	200 米	李俊利	咸 阳	25"2	孙红芳	泾 阳	28"3
	400 米	牛 斌	咸 阳	56"2	樊小英	三 原	1'5"5
	800 米	体义安	咸 阳	2'10"6	张春红	咸 阳	2'32"3
	1500 米	陈小勇	咸 阳	4'31"9	张春红	咸 阳	5'10"6
	3000 米	体义安	咸 阳	10'4"7			
	100 米栏				孙红芳	泾 阳	16"5
	110 米栏	何建民	咸 阳	18"7			
	200 米栏	何建民	咸 阳	29"1			
	400 米接力		咸 阳	48"5		泾 阳	55"2
径	1600 米接力		咸 阳	3'46"2		咸 阳	4'28"8
	跳 高	赵存利	泾 阳	1.59 米	张爱芹	户 县	1.40 米
	跳 远	高建斌	兴 平	5.53 米	辛君荣	泾 阳	4.42 米
	三级跳远	余耀烈	兴 平	11.92 米			
	撑杆跳高	焦卫军	泾 阳	2.40 米			
	铅球 (4kg)				牛玉兰	咸 阳	9.44 米
	铅球 (6.25kg)	王平生	乾 县	9.81 米			
	铁饼 (1kg)				牛玉兰	咸 阳	32.04 米
	铁饼 (1.5kg)	鲁建国	泾 阳	34.94 米			
	标枪 (600g)				王西峰	兴 平	31.92 米
乙 组	标枪 (700g)	鲁建国	泾 阳	46.40 米			
	手榴弹 (500g)	任占军	周 至	66.70 米	张树新	三 原	39.44 米
	三项全能	焦卫军	泾 阳	1329 分	杨竹娥	高 陵	1368 分
	五项全能	商 琪	兴 平	1996 分			

1978 年第五届咸阳地区运动会各单项第 1 名成绩统计表

续表 7—5

项 目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武 术	刀 术	张 龙	泾 阳	7.80 分
	枪 术	袁曙光	咸 阳	8 分
	剑 术	王佩玲	乾 县	7.90 分
	棍 术	张 龙	泾 阳	8.40 分
	拳 术	张 龙	泾 阳	8.30 分
	传 统	张加林	户 县	8.25 分
	男子全能	张加林	户 县	32.40 分
女子全能	袁曙光	咸 阳	31.75 分	
无 线 电	字码发报	袁琦骥	三 原	112.4/×0
	短码发报	张少春	三 原	149.8/×5
	长码发报	袁琦骥	三 原	85/×1
	字码收报	刘崇梅	咸 阳	110/×1
	短码收报	刘 任	咸 阳	180/×7
	长码收报	刘 任	咸 阳	130/×4

第六届咸阳地区运动会 1982年4月9日—6月29日分别在咸阳市、泾阳、乾县、周至举行。大会组委会主任许廷芳，副主任郭建义、马宏升、郭有治。14个县、市共13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武术（咸阳赛区），少年足球、少年篮球（泾阳赛区），射击（乾县赛区），自行车（周至赛区）比赛。永寿县运动员王峰破省男子甲组5公里和10公里竞走纪录。32人次打破地区纪录。153人（其中女65人）达到国家等级运动员标准。其中二级6人，三级107人，少年级40人。咸阳市队获少年女子篮球第1名，青年男子自行车第1名，青年男、女田径总分第1名。

1982年第六届咸阳地区运动会各单项第1名成绩统计表

表7-6

项 目		男 子			女 子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射 击	9+30项目	白西峰	乾 县	261环	赵萍利	礼 泉	248环
	3×20项目	王建昌	乾 县	437环	赵萍利	礼 泉	403环
自 行 车	20公里	楼金品	咸 阳	35'21"	马富英	兴 平	42'59"
	30公里				马富英	兴 平	68'4"
	40公里	楼金品	咸 阳	77'13"1	马富英	兴 平	91'52"9
	60公里	石长建	咸 阳	114'6"3			
田	100米	施 明	户 县	11"9	刘万芹	乾 县	13"3
	200米	薛安民	户 县	24"6	刘万芹	乾 县	28"3
	400米	郭朝阳	户 县	54"9	范惠霞	礼 泉	1'4"2
	800米	周 洪	咸 阳	2'11"5	范惠霞	礼 泉	2'28"4
	1500米	靳秋放	乾 县	4'24"5	范占红	泾 阳	5'12"8
	3000米				范占红	泾 阳	11'16"6
	5000米	唐永学	永 寿	16'29"3			
	10000米	唐永学	永 寿	34'29"7			
	100米栏				孙红芳	泾 阳	17"2
	110米栏	庆明辉	泾 阳	17"5			
径	400米栏	何立凤	咸 阳	1'4"1	辛君荣	泾 阳	1'12"
	400米接力		泾 阳	48"2		乾 县	34"4
	1600米接力		乾 县	3'49"		乾 县	4'33"3
	五公里竞走	王 峰	永 寿	23'16"			
	十公里竞走	王 峰	永 寿	46'29"			
	五项全能				王 梅	户 县	2978分
	十项全能	邢新强	户 县	5030分			
	跳 高	李宝红	淳 化	1.90米	吴淑娟	咸 阳	1.51米
	跳 远	王跃进	兴 平	6.30米	史婉红	咸 阳	4.89米
	三级跳远	李宝红	淳 化	12.95米			
甲 组	撑杆跳高	郭占平	三 原	2.85米			
	铅 球	王燕智	咸 阳	13.20米	王 虹	乾 县	9.78米
	铁 饼	王燕智	咸 阳	34.22米	王 虹	乾 县	33.24米
	标 枪	司荣贵	乾 县	49.36米	次松卓玛	咸 阳	37.28米
	手榴弹	司荣贵	乾 县	64.92米	次松卓玛	咸 阳	46.02米

续表 7-6

项 目		男 子			女 子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姓 名	单 位	成 绩
田	100 米	刘卫民	咸 阳	11"5	洗 青	咸 阳	13"7
	200 米	刘卫民	咸 阳	24"2	郑亚绒	泾 阳	28"6
	400 米	郭小峰	咸 阳	54"1	晁爱玲	咸 阳	1'4"6
	800 米	郭小峰	咸 阳	2'6"1	吴林珍	咸 阳	2'31"7
	1500 米	贾来成	泾 阳	4'27"1	吴林珍	咸 阳	5'6"1
	3000 米	贾来成	泾 阳	9'39"7			
径	100 米栏				佟香梅	咸 阳	18"
	110 米栏	李宪石	咸 阳	17"4			
	400 米接力		咸 阳	48"		咸 阳	56"4
	1600 米接力		乾 县	3'57"		咸 阳	4'31"3
乙 组	五项全能	李跃武	泾 阳	2488 分	吴腊萍	三 原	2134 分
	跳 高	王庆平	兴 平	1.59 米	耿红霞	淳 化	1.46 米
	跳 远	刘胜利	户 县	5.92 米	郑亚绒	泾 阳	5.16 米
	三级跳远	李 奇	咸 阳	11.91 米			
	铅 球	姚四喜	泾 阳	11.63 米	吕大燕	泾 阳	11.65 米
	铁 饼	陈 峰	泾 阳	34.54 米	吕大燕	泾 阳	34.04 米
	标 枪	赵三合	户 县	51.54 米	郝彩云	彬 县	33.26 米
	手榴弹	张俊峰	泾 阳	63.82 米	孙秋玲	三 原	40.50 米

二、青少年运动会

第一届咸阳市青少年运动会 1984年6月1—3日在秦都区举行。13个县、区539名运动员参加了足球、篮球、举重、田径比赛。田径比赛中有2人次破1项省纪录，14人15次破15项市青年纪录，3人次破3项市少年纪录。唐飞在举重测验中1人6次打破抓举、挺举及总成绩省少年纪录。秦都区分获男子足球、男女篮球、女子田径第1名。

咸阳市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 1986年4月10—20日分别在泾阳县、三原县举行。王兆亭任大会组委会主任。有长武、彬县、乾县、礼泉、旬邑、兴

平、永寿、武功、淳化、泾阳、三原、杨陵和秦都 13 个县区，579 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比赛项目有田径、武术（泾阳赛区），足球、篮球（三原赛区）。秦都区获男子足球、女子篮球、男子武术和田径乙组第 1 名。

咸阳市第三届青少年运动会 1988 年 4 月 22—30 日在咸阳市举行。淳化、旬邑、长武、彬县、永寿、乾县、礼泉、武功、兴平、三原、泾阳 11 个县和杨陵、秦都、渭城 3 个区，624 名运动员（其中女 240 人）参加了田径、足球、武术 4 项比赛。在田径赛中，有 5 人 6 次破 5 项市少年最高纪录。秦都区获男子足球、女子篮球和武术第 1 名。渭城区获男子篮球第 1 名，武术第 2 名。

咸阳市第四届青少年运动会 1990 年 7 月 25 日—8 月 5 日分期在咸阳市区举行。设篮球、足球、田径、游泳、武术 5 个比赛项目。14 个县区共 800 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兴平县、秦都区、泾阳县取得了团体总分前 3 名。这次运动会取消了 100 名不合规要求运动员的比赛资格，选拔出了赴省参加第九届运动会 13 个项目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秦都区获男子篮球、武术和游泳甲、乙组等 1 名。渭城区获女子篮球、男子足球第 1 名；男子篮球、武术第 2 名。

三、其他各类运动会

陕西省直属县市体育选手选拔赛 1953 年 7 月 18—20 日在咸阳机器制造学校运动场举行。参加比赛的有咸阳市、长安县、户县、铜川县及西北纺织学校、咸阳机器制造学校、咸阳中学等 13 个单位共 184 名运动员。比赛项目有田径、体操、自行车和民族形式表演（包括武术、舞蹈和杂技等）。这次运动会共打破省纪录 5 项，超过原来规定标准 10 项，选拔 68 名运动员（其中女 22 人）组成直属县市代表队。

咸阳赛区田径、举重运动会 1957 年 8 月 1—5 日在咸阳市人民体育场举行。永寿、彬县、长武、兴平、武功、户县、周至、咸阳、乾县等 12 个县市，237 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有 53 人达到了国家等级运动员标准（其中二级 2 人，三级 27 人，少年级 24 人）。21 人通过了国家等级裁判员（一级 1 人，二级 8 人，三级 12 人）。在此基础上评选出 25 名优秀运动员，组成了赛区代表队出席省田径、举重运动会。

咸阳专区第一届中学生运动会 1965 年 5 月 1—10 日分别在咸阳市、乾县举行。全地区 14 县、市代表队参加了比赛。运动员有 886 名。比赛项目有

田径（乾县赛区）、乒乓球和射击（咸阳赛区）。咸阳赛区组委会主任冯和俊、乾县赛区组委会主任梁燕语；总裁判张恭德，副总裁判马振坤、庞文彦、杨生。在运动会期间，有2人分别打破射击、标枪各1项省中学生纪录，高中组25人次6队破9项专区纪录。57人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其中二级1人，三级39人，少年级17人）。大会还评出咸阳、乾县、旬邑3个“六好”代表队，56名“五好”运动员，17名“五好”裁判员和“四好”工作人员。咸阳市代表队获田径赛团体总分第1名。

咸阳地区少年运动会 1972年4月20日—28日分别在彬县、高陵县、长武县、永寿县、兴平县举行。全区14个县、市代表参加了篮球（彬县赛区），排球、体操（高陵赛区），乒乓球（长武赛区），足球（永寿赛区），田径（兴平赛区）比赛。在田径赛中，少年女子组的郭巧玲（咸阳市）以39.63米的成绩打破了省36.05米的手榴弹投掷纪录，少年男子组有17人次3队破9项地区纪录。咸阳市队获男子足球，男子篮球，男、女乙组乒乓球，女子体操，少年男、女田径第1名。

咸阳地区“三小球”运动会 1973年7月5日—8月2日分别在旬邑县（足球）和淳化县（篮、排球）举行，全区14个县市参加了比赛。

第二节 参加运动会

一、参加省际运动会

1924年5月，三原县渭北中学、陕西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代表陕西在河南开封参加了第十一届华北运动会。时隔不久，渭北中学校长郝楚九任陕西省代表团指导员，率团赴湖北武昌参加了第三届全国运动会。

1959年4月5日，三原县北城中学参加全国中学生田径、举重通讯赛，获初中组第4名。

1965年2月，三原县少年女篮在陕西省六县、市篮球调赛中荣获冠军。8月，代表陕西省赴青海省西宁市，参加了全国少年男子篮球分区赛—青海赛区的比赛。

1981年9月1—9日，陕、甘、宁、新、西藏、四川6省全国业余体校田径分区赛在咸阳市举行。咸阳地区业余体校也组队参加了比赛，女队获团体总分第5名，贾来成获男子3000米第1名。

二、参加省内运动会

陕西省第三届运动大会 1942年10月10日—14日在西安新城大操场举行。第十行政督察区72名运动员分别参加了初中部、高中部和普通部的田径、足球、篮球、排球比赛。第十区男子获初中部篮球、排球第1名。高信继获男子高中部100米（成绩13"）第1名，刘谋远获男子初中部跳高（成绩1.48米）第1名，周荣获男子组撑杆跳高（成绩2.88米）第1名，李建帮获初中组男子跳远（成绩5.13米）第1名。

陕西省第四届运动大会 1946年10月31日—11月3日在西安市革命公园公共体育场举行。第十区派队参加了田径、足球、垒球比赛。足球赛中第十区对裁判的判决提出抗议，足球比赛就此结束。

1946年省第四届运动会
咸阳运动员获各单项第1名成绩统计表

表7-7

项 目	运 动 员	组 别	成 绩
16磅铁球	金毓甘	成年男子组	9.30米
手榴弹掷远	浓希祥	高中男子组	42.05米
800米	刘现斗	高中男子组	2'19"
1500米	李奎生	高中男子组	4'55"
5000米	李景晏	高中男子组	18'8"
12寸垒球掷远	李惠兰	高中女子组	42.27米
50米	郭俊喬	初中男子组	7"
400米接力		初中男子组	55"5/10
80米栏	张鸿儒	初中女子组	16"4/10

参加陕西省第一至八届运动会 从1952年10月—1982年9月先后组队参加。在省第二届运动会上，咸阳市运动员庞元春打破了低速收报混合码全国纪录。贺广贤在省第三届运动会上打破了无线电抄报低速混合码全国纪录。在这8届运动会比赛中，咸阳共破省纪录23项，获省各单项第1名76个，获团体总分第1名4次、第2名12次。

1958年7月13—23日组队参加在西安举行的陕西省第一至八届运动会。咸阳赛区、三原赛区、咸阳市组队参加了田径、体操、足球和篮球比赛。咸

阳市队取得了省足球第3名。咸阳市队运动员史振通获体操三级全能第1名(成绩51.7分),张士珍获二级自由体操第1名。

参加省第二届中学生运动会 1965年6月10—16日在西安举行。比赛项目有田径、乒乓球和射击3项。咸阳专区队获团体总分第3名。高中女子组3人次破2项省一届中学生运动会铅球、铁饼纪录。38人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二级3人,三级22人,少年级13人)。乒乓球队被评为“四好”运动队。田径运动员武存德、乒乓球运动员肖国强、射击运动员程秀芳等14人被评为“五好”运动员。

参加省第三届中学生运动会 1973年4月22—26日分别在西安市、宝鸡市、渭南举行。全省7个地区3个城市共10个单位参加了田径、足球、篮球和排球比赛。咸阳地区获省男子足球、排球第1名,男子田径第3名。王璞、石秀玲入选省中学生田径队,后赴烟台参加了全国中学生运动会,王璞获男子乙组110米栏第1名(成绩是17");石秀玲获女子甲组标枪(600g)第1名(成绩33.29米),并以50.32米的优异成绩打破了46.48米的省中学手榴弹纪录;刘彩霞获女子甲组铅球第1名(成绩9.78米)。

参加省第四届中学生运动会 1980年7月15—17日在西安市举行。6个地区4个城市的代表队参加田径和篮球比赛。国棉七厂子校篮球队代表咸阳地区参赛,获省第3名。在业余组比赛中,贾来成获男子800米第1名(成绩2'10"1),刘伟民获男子三级跳远第1名(成绩13.42米),晁爱玲获女子跳远第1名(成绩5.22米)。

参加省第五届中学生运动会 1985年8月16—18日在咸阳市举行。咸阳市教育局受省教育局委托承办这届运动会。市代表队69人(领队3人,教练6人,男女运动员30人)参赛,获省田径团体第2名,男子篮球、男子田径团体总分第1名。晁爱玲、王峰、张伟入选省中学生代表队。后代表陕西参加1986年的全国中学生运动会,晁爱玲获全国跳远第5名(成绩5.65米),张伟获全国铁饼第3名并破省少年纪录(成绩54.6米)。在省五届中学生运动会上,晁爱玲获省女子100米栏(成绩16"7)、跳远(成绩5.22米)第1名,刘伟民获男子三级跳远(成绩13.42米)第1名,陈玉峰获男子铁饼(成绩41.70米)第1名,颜军获男子标枪(成绩53.84米)第1名,并获得4×400米接力(成绩3'46"6)第1名。

参加省第六届中学生运动会 1989年5月12—18日在宝鸡市体育场举行,仅有田径比赛。咸阳市获田径团体总分第2名(322分)。

参加陕西省第一至三届青少年运动会 从1984年2月—1988年8月，咸阳市共组队参加省青少年运动会3届。参加了除射箭、航模外全部项目的比赛。破省纪录15项。其中在省第三届青少年运动会上，李红梅还打破了60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获得了70多个单项第1名。有12人达到国家等级运动员标准。

三、参加其他运动会

陕西省球类运动会 1953年2月18—21日在西安市体育场举行。市境各县市、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组队参加。直属县市队获男子羽毛球和康乐球两项冠军和女子垒球亚军；西北工学院女子乒乓球队获冠军；西北农学院获男篮、女排、男网三项冠军和垒球亚军；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获男、女排球，男子网球和羽毛球四项亚军；王振德入选省乒乓球队，参加了西北区球类运动会乒乓球比赛，获男子单打第5名。

陕西省体育运动选手选拔赛 1953年8月3—6日在西安市举行，市境各县市代表团由68名运动员组成，在总教练马振坤的率领下参加了比赛，获男子组团体第3名。西北农学院男、女双获团体第4名。

陕西省田径、举重运动会 1957年8月18日在宝鸡举行。咸阳赛区、三原赛区、咸阳市组队参加了比赛。这次运动会，咸阳赛区有30人达到国家等级运动员标准（三级22人，少年级8人）。三原赛区18人达到国家等级运动员标准（三级14人，少年级4人）。咸阳市运动员成祥生以222.5公斤（60+80+85.5）的总成绩打破省次轻量级举重纪录。

参加陕西省第一、二届工人运动会 1956年9月23—30日参加在西安市西北体育场举行的省第一届工人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田径、举重、自行车、篮球、排球和足球6项。西北国棉一厂、二厂、七厂选出运动员，组成运动队代表咸阳市纺织体育协会参加了比赛。1984年9月19—23日参加在西安市、宝鸡市举行的省第二届工人运动会。咸阳市组队参加了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举重、武术、公路自行车等9个项目的比赛。咸阳市代表队获省团体总分第3名，获省男子足球第2名，获省男、女排球和公路自行车赛第3名。这次运动会上，李宝红、贾来成、苏毅、王燕智4人破4项全国工人运动会纪录。郭晓峰、李宝红、王燕智、李学平、刘玉良、薛勇、王东、潘明、王建奇、毛二建、刘文成11人人入选省工人代表队。后在全国第二届工人运动会上，毛二建和刘文成获武术对练二等奖。

陕西省青少年田径、体操、武术运动会 1960年5月14—17日在西安市西北体育场举行。咸阳市、咸阳赛区组队参赛。邹之尧以2.85米的成绩打破2.75米省撑杆跳高少年纪录。

陕西省少年运动会 1972年6月1日—8月30日分别在咸阳市、宝鸡市、户县和西安体育学院举行,3市7地区共10个单位参加。咸阳地区组队参加了田径(宝鸡赛区)、足球(咸阳赛区)、乒乓球(户县赛区)、体操(西安体院赛区)、篮球(高陵县赛区)、排球(汉中赛区)全部项目的比赛。获省女子排球、田径乙组团体总分第1名;获省男子足球、男子体操、田径甲组团体总分第2名。有4人破4项省少年田径纪录。

参加陕西省第一届农民运动会 1988年4月9—15日在咸阳市举行,4市6地区10个单位参加。咸阳市代表队参加了田径、篮球、乒乓球,中国式摔跤、射击和一项武术表演等。男、女篮球队双获亚军,田径获总分第2名。三原县运动员贺娥入选省武术队,参加全国农民运动会,获得武术表演赛三等奖。

第三节 承办运动会

一、承办全国性及西北地区体育竞赛

1975年5月1日全国田径分区赛及省第六届运动会田径赛在咸阳市体育场举行。

1976年5月20—28日全国青年排球联赛第一阶段比赛在咸阳市体育场举行。四川、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山西、陕西等11支男、女排球队参加了比赛。经过8天激烈争夺,四川男、女排球队荣获冠军,陕西男、女排球队屈居亚军。

1981年8月23—31日,全国业余体校篮球分区赛在咸阳举行。来自甘肃、新疆、四川、陕西、青海、宁夏和咸阳地区业余体校等14支男、女队参加了比赛。甘肃和陕西队分获男、女第1名,咸阳地区男、女队双获第5名。

1982年5月25日—6月10日,全国青年足球联赛在兴平举行。广西、陕西、福建、江苏、云南、河北、浙江、江西、宁夏、兴平(不记名次)等10支球队参加。福建、陕西、江苏队分获前3名。是年8月4—6日,全国业余体校田径分区赛在咸阳举行。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西

藏和咸阳地区等8个单位，共165名运动员（其中女81人）参加了比赛，四川队获团体总分第1名，陕西队和甘肃队分别获得第2名和第3名。

1987年4月，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咸阳纺织杯”篮球预赛在咸阳市体育馆举行。

二、承办全省性体育竞赛

1956年秋，陕西省足球锦标赛在咸阳市人民体育场举行。西安、宝鸡、三原赛区及咸阳市等单位参加，咸阳市足球队荣获冠军。

1972年8月1—15日，陕西省少年运动会足球赛在咸阳市举行。

1973年8月11—21日，陕西省小学基层“三小球”运动会排球赛在三原县体育场举行，有10个地、市的小学基层代表队、240余名运动员参加。同年6月24—30日，陕西省业余体校乒乓球、体操赛在咸阳市举行，体操比赛由咸阳地区文教局和体育运动委员会筹办，全省7地区、3市共10个单位参加，咸阳地区获得男子团体第2名。

1974年11月3—11日，陕西省业余体校少年足球赛在咸阳市体育场举行，由咸阳地区和咸阳市体委筹办。西安、宝鸡、汉中、延安、铜川、咸阳地区和咸阳市7单位参加，咸阳市队获冠军。12月，陕西省体操运动会在三原县举行，全省各地、市参加，西安市获团体总分第1名，宝鸡地区获第2名。同年，陕西省学校基层排球赛（泾阳赛区）在泾阳县体育场举行。宝鸡市和咸阳、商洛、汉中、安康4地区参加。

1975年2月，陕西省排球运动会在三原县举行，全省14支球队参加，榆林地区和延安地区分获男、女冠军。5月1日，第六届全省运动会田径赛在咸阳市举行，西安市双获男、女团体第1名，宝鸡市和渭南地区夺得男、女团体第2名，榆林和西铁分局列男、女团体第3名。1976年5月7日，陕西省重点业余体校足球赛在兴平县举行，省业余体校、汉中地区、咸阳市和兴平县等业余体校参加。

1979年，陕西省第七届运动会公路自行车赛在泾阳县举行，咸阳地区和渭南地区分获男、女团体第1名。6月6—13日，陕西省中学生足球选拔赛在咸阳市举行；7月28日—8月13日陕西省业余体校篮球甲组赛在泾阳县举行，全省各地、市和省业余体校男、女等11支队参加，宝鸡、西安、咸阳夺得男子前3名。

1982年8月，陕西省小足球赛在泾阳县举行。西安一队、西安二队获前

2名，高陵县列第3名。

1983年11月3—9日，陕西省农民中国象棋比赛在咸阳市举行，咸阳地区运动员尚生敏荣获冠军，李宏钧和韩丁义分别夺得第2名和第3名。

1983年3月9—15日，陕西省中国象棋比赛在咸阳市举行。西安、铜川、宝鸡获团体前3名。

1984年，陕西省首届农民象棋赛在咸阳市举行，咸阳市获全省冠军。

1985年8月22—29日，陕西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足球赛在咸阳市举行，榆林、咸阳、宝鸡、西安、商县、渭南、汉中、延安和省体校等10单位参加，榆林、咸阳、宝鸡获中学男队前3名，获小学男队前3名的是：咸阳市国棉七厂小学、渭南纺机小学和宝鸡铁路子弟小学。

1985年，陕西省农民田径运动会在咸阳市举行，咸阳、渭南、汉中获男子组前3名，渭南、咸阳、西安获女子组前3名。同年8月10—18日陕西省第五届中学生运动会在咸阳市举行，比赛项目有田径和篮球，咸阳市队获男子篮球、男子田径总分第1名，获女子田径总分第2名。

1986年5月15—20日，陕西省农民“丰收杯”篮球赛在兴平县举行。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汉中的6支男队和西安、咸阳、宝鸡3支女队参加比赛，获男子前3名的队是西安市、宝鸡市和咸阳市。

1986年8月，陕西省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在咸阳市举行，西安市以1534分获团体总分第1名，宝鸡市、咸阳市分获第2、3名。

1987年，陕西省中学生篮球运动会在三原县体育场举行。7月21—28日在咸阳市举行足球比赛，西北国棉一厂、宝成通用电子公司等8支球队参加，西安铁路分局夺走冠军，西北国棉一厂和咸阳纺织机械厂分获第2、3名。7月27—29日陕西省业余体校田径赛在咸阳市举行，11个单位、330名运动员参赛，竞赛分甲、乙两组进行。

1988年5月4—8日，陕西省首届体育运动学校田径单项赛在咸阳市、泾阳县举行，泾阳县获男子团体总分第1名，咸阳市和泾阳县分获男、女团体第2名。同年7月12日第三届青少年运动会游泳比赛在咸阳陕西彩色显像管厂举行；8月16—23日排球赛在咸阳市举行。年内，陕西省首届农民运动会在咸阳市举行。

1989年7月10—17日，陕西省青少年射击比赛在咸阳市射击场举行。

第四章 体育管理

第一节 组织机构

民国时期，三原县、泾阳县、咸阳县属第十行政督察区，体育工作由专署教育科兼管。

1949年5月—1952年12月，咸阳专区教育科兼管体育工作。

1953年1月，咸阳专区撤销，各县体育竞赛工作先后以陕西省直属县市、咸阳市、咸阳赛区、三原赛区等组织形式参加省级比赛。

1961年9月，咸阳专区恢复，专署文教卫生局管理体育工作。

1962年，咸阳专区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主任由咸阳专署副专员王国华兼任，副主任由咸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张孝堂和专署文教局局长麻生西兼任。

1963年9月，咸阳专区文教局管理体育工作。

1970年12月13日，地区体委正式成立，并编入革委会序列，单独办公。1975年，下设政工组、竞赛组、群体组。

1982—1984年，改设办公室、群体科和军体科。

1984年5月，咸阳地区体委改为咸阳市体委。下设政秘书、竞赛科、计财科、群体科。同年12月30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咸阳市分会成立。名誉主席王步唐，主席马宏升。下设田径、篮球、排球、足球、武术、农民、老年人、棋类9个单项协会。

第二节 队伍建设

一、体育教师培训

60年代，泾阳县、三原县、咸阳市体委和教育局协作，利用暑假时间对未受过体育专业教育的中、小学体育教师进行培训。课程有体育理论、田

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等。70年代初，咸阳市体育教学研究会曾举办3期中、小学体育教师培训班，150余人参加培训，期满考核实习，合格率达97.5%以上。1972年暑假，咸阳地区体委和户县体委联合举办了1期体育教师培训班，培训共25天，参加学员90人，任课教师除聘请本县教学经验丰富的体育教师外，还聘请了西安体育学院篮球、田径、排球专业教师各1名。1978年，咸阳地区教育局决定在乾县师范学校设立体育专业班，招收初中毕业生或高中有一定体育特长的学生，以补充中、小学体育师资力量。1978—1985年共培训体育教师四届计230人。学员毕业后大部分在初级中学和小学任教。

二、青少年培训

咸阳市体育职业学校 1956年10月5日成立，招收了市区初级中学、西北国棉一厂小学、陕毛一厂小学、果子街小学和中山街小学，年龄在13—15岁的青少年学生50人，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系统训练，以培养运动员苗子。招生办法是：在校体育教师推荐，业余体校进行身体素质和专项技术测验，择优录取。录取的学生在原校保留学籍。设足球、篮球两个班。1958年又增设了田径和排球班。每周训练3次，每次2小时，共计培养学生150余名。

1960年停办。1963年恢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一度停办。1971年恢复。1976年1月12日，成立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设少年篮球、排球、足球三个班，每班15人，由原来每天下午2小时的训练改为半天在校上课，半天集中在市体育场训练。儿童班为业余时间训练。招生由体校统一组织，在咸阳市五中上课。

1978年，更名为咸阳市第十九中学，当年招收初中、高中各一个班，每班45人，设文化课和体育专业训练。为半读半训。学校设田径、篮球、排球、男子足球4个训练项目。1980年，高中班毕业，大部分学生入选部队体育队，其中4人入选省女篮队，2人入选省女排队，3人考入体育院校，10人作为骨干招进工厂或担任民办体育教师。1981年，该校有文化教员11人，行政管理人员5人，专项教练员9人。此间，学校已发展到初中、高中各3个班。1985年，改名为咸阳市体育职业学校。

咸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1987年，经陕西省高教局批准，咸阳市体育运动学校成立。属中专性质，学制4年，每年招收40人。开设课程有政治、体育理论、生理学、心理学、解剖学、田径、体操、球类等。至1989年，该校在

校学生 200 余人，同时还另设初中 3 个班。

咸阳地区业余体育学校 1973 年成立。设篮球、体操两个班。1976 年增设航模、无线电、摩托车及乒乓球训练项目。1978 年增加了田径、射击训练点，以扩大训练面，培养更多的运动员苗子。80 年代初停办。

1957 年三原县业余体校成立，设篮球、足球、体操 3 个班，每班 13—14 人，1958 年又增设了射击、无线电和航模训练班。年内，乾县办起了射击培训班，1960 年后因国民经济困难停办，1963 年恢复训练。乾县射击班的上官春芳曾打破陕西省射击纪录一项。1965 年乾县吕成义、袁考文入选陕西省射击队。

1971 年后，随着“三小球”运动的兴起，各县青少年体育活跃，乾县、三原、泾阳、兴平等县业余体校相继建立。1972 年，各校基本上做到了教练、学员、训练场地和时间“四固定”。项目以“三小球”为主，还有田径、体操、武术和乒乓球等。据 1976 年统计，辖区有业余体校 17 所，在校学生 585 人。

80 年代，各县区业余体校经过调查、整顿，到 1986 年，全市有业余体校 11 所，在校学生 957 人。秦都区、兴平县业余体校被评为陕西省先进业余体校，还有 3 人被评为省优秀教练员。泾阳县业余体校校长崔思忍和秦都区文化教员张文静被评为全国业余体校先进个人。1989 年，全市各种业余体校发展到 19 所。秦都区、渭城区、兴平县、泾阳县、乾县、礼泉县、永寿县、彬县各 1 所，学校系统 6 所，企业系统 5 所。

1956—1989 年，全市各业余体校先后向陕西省和国家队输送了许多优秀运动员。据不完全统计：50—60 年代，向省队输送的有刘宏续、胡友根等 10 名运动员。1972—1982 年，向省及省以上输送运动员 66 人，占全省输送总数的 13.6%，居全省第 2 位。1983 年，输送运动员 15 人；1984 年，输送 118 人；1986 年，输送 53 人。

咸阳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始于 1982 年。是年，市境有 10 所传统项目学校。先是三原南郊中学、国棉七厂小学、泾阳县永乐小学，后有铁一局咸阳中学、周陵中学、新征中学、秦岭中学、国棉一厂中学、国棉七厂中学、礼泉县仓房巷小学、泾阳县西关小学。截止 1989 年，发展到 156 所，其中省级 13 所，市级 34 所，县区级 109 所。

第三节 设施建设

一、体育场

1954年1月3日陕西省咸阳人民体育场在咸阳市人民路中段落成。原占地面积44000平方米，场内设有兰曲式标准田径场一个，排球场两个，网球场、羽毛球场、垒球场各一个。还设有单杠、双杠、跳箱、乒乓球台等设施。1955年，改名为咸阳市人民体育场。后因城市建设规划而被占用。1958年，征地97.5亩，在渭阳中路建设新的体育场，该场于1959年第四季度竣工，设带有5层土看台标准田径场1个（含足球场1个），篮球场4个，排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各2个和垒球场1个。1963年11月20日，在场内西北角又新建有5层土看台的灯光球场一个。次年，咸阳市政府拨款7万余元，将土看台全部加高为18层的砖看台，并增加了裁判员、运动员休息室各一处。篮球场围墙高4.5米，场地面积680平方米，可容纳观众4千余人。

1961年，在该场的东侧，又建成了咸阳市射击场。射击场南北长126米，东西宽45米，占地7.5亩。场内设有简易靶房一处，50米、100米靶壕各1个，靶位18个，后因建体育馆被占用。

1967年12月，由市政府拨款2万元在该场大门西侧又新建乒乓球训练房1座。砖木结构，房高5米，使用面积420平方米，可放7副乒乓球台，也可进行体操、羽毛球等训练。1978年改作仓库和食堂。

1976年9月，在乒乓球训练房的南侧又新建训练房一座。砖木结构，使用面积378平方米，可进行篮球、举重、摔跤、乒乓球、体操等训练，后改作秦都区、渭城区体委办公室和职工宿舍。

咸阳市体育场经逐步修建、对调，至1981年2月总面积为101.03亩。1984年5月，原咸阳市体育场移交现咸阳市体委管辖。1986年7月，对灯光球场进行了整修，篮球场使用面积由 26×13 平方米扩大为 28×15 平方米。并将田径场直道8条、弯道6条，扩建为直道10条、弯道8条。

除咸阳市体委直属场地外，辖区工厂、学校、机关事业单位还有一批运动场地和设施，特别是大专院校和咸阳市的大企业，场地设施比较齐全，并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据1989年统计，大、中专院校有田径场12个，篮球场103个，足球场18个，排球场73个，游泳池6个，旱冰场2处，体育馆3

座，健身房5个。这些体育设施，除满足本单位群众锻炼外，还承担一些大型竞赛活动。

二、体育馆

1985年4月动工兴建，1986年11月24日竣工。该馆系统钢架砖混结构，占地面积6449平方米，总投资450万元，内有固定观众座位3608个，电动液压装置篮球架一副和电动记时记分器等设施。该馆是一座现代化多功能的体育馆，可进行篮球、排球、手球、乒乓球、羽毛球、武术、柔道、摔跤、体操、艺术体操等比赛，还可进行音乐、舞蹈、杂技表演和文艺演出。

三、射击场

1987年5月16日建成。该场位于咸阳市东郊渭城区石桥乡，占地面积13320平方米，建筑面积709平方米。场内安装有半自动升降式50米小口径步枪靶位27个和固定式25米靶位21个，另有手枪速对靶位两组10个。以靶棚为中心，向北可进行小口径步枪射击，向南可进行手枪射击，靶棚内可进行汽跑猪和气枪训练。此外该场还可以进行柔道、摔跤、乒乓球、象棋和桥牌等多种项目的训练。

第八编

档案·地方志

第一章 档案

咸阳境内档案事业始于商周。据载郢邑是商代司天官吴回后代和西周史佚的封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曾收六国档案于咸阳,并建立了一套注重政务效能的文书档案,这些档案包括户籍、律法、地图等多种类别。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下“焚书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成为古代档案史中一重大事件。公元前 206 年,刘邦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独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高祖本纪》)汉丞相萧何收集秦档案文书,使之幸免焚毁,对了解全国地理、关隘、财政、人口等情况,至关重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古代档案载体先后有甲骨、金文、简牍、缣帛、石刻、纸张等形式。在秦咸阳城遗址附近,发现有商鞅变法时的衡量遗范,又有秦始皇、秦二世的追定诏书,堪称完整的金文档案。礼泉县昭陵石刻,撰书皆名流,文字俱佳品,保存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档案资料。三原县档案馆现存的明万历年间《创建池阳龙桥图》、《龙桥落成竣工图》等,被认定为境内最早的科技档案图纸。

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档案工作。1956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发布后,各县县委、人委认真贯彻《决定》精神,纷纷建立了机关档案室。1959 年《中共中央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机关档案的通知》发出后,各县、市先后成立了县、市档案馆,统一管理县级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的档案。1961 年,随着咸阳专区的恢复,专区档案馆和专区档案管理处应运而生。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咸阳刚刚起步的档案工作受到了严重摧残。1968 年,三原县发生大规模武斗,烧毁公检法档案库诉讼文书档案 33400 余卷,将正在借用的县档案馆民国档案 3717 卷同时烧毁,给咸阳地区档案事业

造成了巨大损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咸阳档案事业得到全面恢复和健康发展。档案利用由原来主要为机关工作服务发展到面向社会各界,在为领导决策、工作查考、编史修志、纠正冤假错案、维护个人权益、解决各类民事纠纷服务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仅1984年以后的7年间,全市各级档案馆共接待查借阅95260人次,提供档案340264卷(册),资料16773册,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截止1990年底,全市已建立健全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机构4931个,有专、兼职档案人员5884人。

第一节 机构建设

最早的档案工作管理机构是从商代开始建立并完善的。当时就有掌管档案工作的史官。周时中央重要机构太史寮负责起草文书,保管典籍。秦汉时丞相府、御史府主管档案工作,地方设郡、县两级机构,主簿统领郡府文书档案工作。隋唐时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是中央最高辅政机构,也是文书档案工作的最高管理机关,中央、地方国家机关中一般掌握文书档案工作的是书佐、令史。宋以后阁库是各级政权机关普遍保存文书档案的专职机构,具体掌管档案的吏员称守当官、勾当官。清时书吏(典史、县丞)负责各级衙门科房中文书处理和档案收贮。民国时咸阳诸县政府有管卷科员,属秘书室管。

1949年后,咸阳的档案工作管理机构随着档案事业的蓬勃发展而逐步建立、完善。

一、档案局

档案局是咸阳市、县(区)主管档案事业的行政管理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咸阳市专门的档案行政管理机构起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随着咸阳专区行政区划的恢复,10月筹建成立了咸阳专区档案管理处和咸阳专区档案馆。处馆合署办公,既是中共咸阳地委的一个工作部门,亦是咸阳专署的一个直属机构,业务工作由地委秘书长直接领导。1980年3月29日,咸阳地区档案局成立。1984年6月1日改名为咸阳市档案局。1985年6月11日,中共咸阳市委办公室发出《关于调整我市档案工作领导体制的通知》,决定市档案局由

市委领导改归为市人民政府领导,是市人民政府的直属机构,由一名副市长分工领导。市档案局内设秘书科、业务指导科、档案管理科3个科室。

1980年以后,县(区)档案局机构陆续建立。1983年至1984年机构改革中,少数县(区)档案局机构曾一度被撤销,但又很快恢复。至1990年,除新设立的杨陵区外,全市已建立县(区)档案局机构13个。

二、档案馆

1961年10月咸阳专区档案馆成立,1968年9月改为咸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档案馆,1980年1月改为咸阳地区档案馆,1984年6月改为咸阳市档案馆至今。

1958年下半年,各县档案馆先后成立。8月礼泉县档案馆成立,成为咸阳地区第一个县馆。12月合大县后,乾县、礼泉、永寿档案馆合并为乾县档案馆;彬县、旬邑、长武档案馆合并为彬县档案馆;兴平、武功、扶风档案馆合并为兴平县档案馆;泾阳、三原、淳化、高陵四县档案馆合并为三原县档案馆,各县档案、设备、人员编入大县档案馆,隶属大县县委办公室领导。1961年下半年咸阳专署成立后,各县档案馆相继恢复或成立。至1990年,咸阳市共有两级综合档案馆15个,与档案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咸阳市各级档案局(馆)成立时间一览表

表8-1

地 名	档 案 局	档 案 馆	地 名	档 案 局	档 案 馆
咸阳市	1980.3	1961.10	永寿县	1980.11	1958.9
秦都区	1980.7	1958.12	彬 县	1981.10	1958.12
渭城区	1988.7	1989.10	长武县	1980.10	1961.9
杨陵区	未成立	1983.9	旬邑县	1981.3	1961.12
兴平县	1980.8	1958.10	泾阳县	1980.10	1958.12
武功县	1980.11	1958.94	三原县	1980.12	1959.9
礼泉县	1980.7	1958.8.1	乾 县	1981.12	1958.12
淳化县	1980.11	1961.9			

咸阳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是集中管理城市基本建设档案的专门档案馆。1983年4月9日成立。1984年地改市后,移交咸阳市规划建设局领导,1987年2月又移交市建委领导。1988年5月改名咸阳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三、档案室

机关档案室 建国后,地、县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先后建立和健全了相应的机关档案工作机构。截止 1990 年底,市、县区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已建立各类机关档案工作机构 3592 个,其中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已建立各类机关档案工作机构 464 个(文书档案室 220 个,科技档案室 49 个,专业档案室 181 个,综合档案室 14 个)。

文书档案室多建于 60 年代初。后经过对《机关档案室工作暂行通则》、《机关档案工作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的贯彻与实施,市、县区各级机关档案室机构逐步走向健全和有所加强。截止 1990 年,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已建立机关文书档案室机构 1884 个。其中,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已建立文书档案 220 个。

科技档案室多建于 60 年代初。1964 年全国大连技术档案工作现场会议后,一些科研、生产单位重视了对技术文件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并成立了相应的技术档案室或技术资料室。1980 年全国科技档案工作会议之后,随着《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的贯彻实施,各级科研、生产经营单位相继建立和健全了科技档案室机构。科技档案室一般隶属于总工程师或主管技术工作的行政领导人领导,具体工作由生产、技术科或总工办负责。截止 1990 年,市、县区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已建立各类科技档案室 281 个,其中,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已建立科技档案室 49 个。

专业档案室除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外,多建于 80 年代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档案的门类和载体开始向多门类、专业化方面发展,各级机关单位相继建立了一批专业档案室机构。主要有基本建设档案室、诉讼档案室、文化艺术档案室、地名档案室、财会档案室、教学档案室、病历档案室、农业区划档案室、地方病防治档案室、工业污染源调查档案室、商标档案室等。据 1990 年底统计,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已建立各种专业档案室 1344 个。其中,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已建立各种专业档案室 181 个。

综合档案室多建于 80 年代末。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始对机关档案工作体制、机构和组织形式进行了大胆改革和尝试,已初步建成了一批综合档案室和档案资料中心。截止 1990 年底,市、县区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已建立综合档案室 83 个,其中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已建立 14 个。

企业档案室 企业档案工作机构,一般始建于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一般文书档案室隶属厂党委办公室,由办公室主任领导,技术档案室隶属厂技术科(或生产科)领导。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特别是 1986 年开展企业档案管理升级工作以来,企业档案管理工作逐步向综合管理的方向发展,先后建立起不少档案综合管理机构——企业综合档案室(或档案信息中心),负责统一管理企业的各类档案,开展综合提供利用,并负责对本企业全部档案业务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指导。截止 1990 年底,全市共建立各级各类企业档案工作机构 1939 个,其中已建文书档案室 636 个(市直企业 64 个),科技档案室 577 个(市直企业 57 个),专业档案室 606 个(市直企业 64 个),综合档案室 120 个(市直企业 19 个)。1989 年至 1990 年,市自来水公司、公共汽车公司、冶金建材厂、省塑料厂、兴平县水泵厂、淳化水泥厂、旬邑县百子煤矿等 16 户企业档案室获省级档案管理先进企业证书。

四、档案学会

1985 年 11 月咸阳市档案学会成立。会议讨论通过了《咸阳市档案学会章程》,第一届理事长韩忠印,副理事长陈世魁、王凤鸣,秘书长马祝维。1989 年 12 月召开了咸阳市档案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陈世魁,副理事长马祝维、宋德忠,秘书长苑广保。各县区和市直机关也先后组建了会员小组和学会,积极发展会员组织开展学术讨论活动。据统计,截止 1990 年底,全市建有市级档案学会 1 个,县级档案学会 3 个,共有会员 318 人。

市档案学会成立来,档案学术研究活动空前活跃,取得了明显的研究成果。据统计,截止 1990 年底,先后组织召开各种档案学术讨论会、专题研讨会和报告会 8 次,参加西北地区档案协作会 5 次,省档案学会召开的档案学术讨论会和专题研讨会 7 次,组织会员撰写有关学术论文和文章 150 篇。其中被推荐参加国家、西北地区和省档案学术讨论会交流宣读的 50 篇,在国家、省以上刊物上公开发表的 40 余篇,获得国家、省以上优秀成果奖励的 12 篇。

第二节 队伍建设

一、队伍发展

建国初,咸阳市、县级一般没有设专门档案机构,其档案业务由各级机关、单位文秘人员兼管。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随着各级档案机构的建立,开始配备了专职档案人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档案干部队伍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加强。到1990年底,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共有档案干部5728人,其中专职档案干部413人,兼职档案干部5315人。各级档案局(馆)共有专职档案干部166人。

咸阳市各级档案局(馆)人员发展情况对照表

表8-2

单位名称	年代			单位名称	年代		
	1960	1980	1990		1960	1980	1990
咸阳市档案局(馆)	3	5	17	礼泉县档案局(馆)	3	3	11
秦都区档案局(馆)	5	5	8	永寿县档案局(馆)	4	7	15
渭城区档案局(馆)			7	彬县档案局(馆)	2	4	10
兴平县档案局(馆)	3	5	10	长武县档案局(馆)	2	3	6
武功县档案局(馆)	2	7	10	旬邑县档案局(馆)	2	3	9
杨陵区档案馆			5	泾阳县档案局(馆)	2	4	9
乾县档案局(馆)	2	3	16	三原县档案局(馆)	2	5	12
淳化县档案局(馆)	2	3	10	咸阳市城建档案(馆)			11

二、业务培训

50年代初,各县(市)委、人委多次选派干部参加省委、省人委和专署举办的文档干部训练班。60年代在各级档案馆建立后,逐步重视了对档案人员的

教育和培训工作。特别是80年代各级档案局恢复、建立后,档案人员的业务培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除了重视抓好档案局(馆)本身人员培训外,普遍重视了对基层档案人员的业务培训,采取以会代训、举办培训班、去大专院校进修、出外参观学习、召开现场会和经验交流会、举办档案展览等多种渠道进行培训。授课内容以《文书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编纂学》为主,并逐步增设档案现代化管理、电子计算机技术等内容。据统计,仅1980年以来,全市各级档案局(馆)共举办各类档案干部学习班168期,培训干部10964人次;全市档案局(馆)干部参加电大、函大、自学考试及各种类型培训班的达120人(次)以上。1985年市档案局首次开办了“咸阳市电大档案专业班”(大专),经过3年半脱产学习,系统地学习了19门大学基础课和档案专业课,领到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证书的32人,单科结业证书的7人。另外,1984年以来,市档案局还先后承担了西藏民族学院干训部秘书班、历史系档案班、中国语言逻辑函授大学陕西教学班、陕西省地名办、咸阳市军转干部培训班、咸阳市电大档案专业班及有关县区和市直主管部门档案干部培训班的档案专业课程的讲授任务,共计培训干部1000余人。

三、职称评聘

咸阳的档案专业干部职称评聘工作是80年代开始的。1982年11月25日,咸阳地区档案专业职称评定委员会成立。1983年5月10日至18日,对具备规定学历和1966年底以前从事档案工作的档案专职干部,统一进行了职称考核和评定工作。截止当年8月底,地、县(市)共评定出管理员7人,助理馆员9人,馆员5人。其中地区档案局(馆)获得助理馆员2人、馆员1人。1987年7月23日,咸阳市图书、文博、档案、资料专业中级职务评审委员会成立。8月3日,市档案局(馆)档案专业初级评审委员会成立。同时,市档案局还研究制定了《咸阳市档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办法》,并报请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审查同意。1987年8月11日开始,评定出管理员4名,助理管理员3名;评定推荐馆员3人、副研究馆员1人。1988年8月25日咸阳市档案专业中级职务评审委员会成立。

各县区和市直各有关单位,也先后建立了评审组织,开展了档案专业干部的职务评聘工作。截止1990年底,市、县区各级档案局(馆)评定(包括复查认定)副研究馆员1人,馆员14人,助理馆员31人,管理员47人,其他企事业单

位档案人员评出馆员 14 人,助理馆员 58 人,管理员 36 人。

第三节 档案管理

一、收集整理

收集范围 咸阳市、县区两级综合档案馆接收档案的范围和期限是:本级各机关、团体及其所属单位具有永久、长期保存价值并在立档单位保管 10 年左右的档案;属于本馆应接收的撤销机关、团体的档案;属于本馆应接收的建国前本地方革命历史档案及旧政权机关和其他单位形成的档案。具体包括:收发文件、书信电报、会议记录、领导讲话稿、内部刊物原稿、表册、照片、录音带、录像带以及本单位编印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档案馆要求档案移交接收前必须派员检查验收,档案质量合格后,方可办理交接手续。移交的档案、资料,必须编造案卷目录,一式三份,一份自存,两份交档案馆。交接时,根据目录由交接人查点清楚,合乎要求,在目录上签名盖章。接收撤销单位的档案资料时,要附有单位历史考证。

为了丰富馆藏,咸阳市各级档案馆走出馆门,深入机关、社会征集到了许多珍贵档案、实物档案,如名人手迹、清皇帝圣旨,地契和明代以来大量的地方史志、革命历史照片和民国时期各种证章等。

文书档案 以全宗为单位,采取年代、组织机构(或问题)、保管期限、密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整理、排列。1961 年专区档案管理处规定,构成全宗必须具备三条:可以对外行文;经济独立核算;有干部任免权。到 1990 年底,市档案馆共发展全宗 114 个,其中现行机关 82 个,革命历史档案全宗 17 个,旧政权档案全宗 15 个。

60 年代,专区档案管理处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和《机关文书档案保管期限参考表》等纲领性文件,对档案整理在执行中结合专区实际情况做了一些具体规定,如归档的文件材料一般由立档单位分别立卷,单位小、干部少,文件数量不多的机关采取集中立卷形式,坚持平时立卷,年终归档;文件材料的分类方法采取组织机构—年代—问题相结合的办法,在最大限度地保持文件之间历史联系的原则下,采用以问题为主,结合时间、名称、作者、地区、通讯者特征进行立卷。立卷的文件还必须分文件的价值,确定不同的保管期限,进行分类整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战备紧张,地区档案整理工作伴随着数次档案清理鉴定而全面展开,在按照案卷类目进行

整理的同时,还要求在组卷时做到“四个出发”(即从战备出发,从全局出发,从本机关主要组织活动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三个区别”(即从文件作者、内容、名称来区别)、“一个联系”(请示和批复相联系)。

1970—1973年档案部门组织力量对五六十年代的档案集中进行了鉴定整理,使案卷质量明显提高。1974年12月7日,地委办公室制定了《地直机关文书分工立卷办法》,要求文件立卷归档必须达到以下标准:归档文件齐全完整;分类清楚,组卷规正,按年代、问题进行分类,党政工团单独组卷,绝密文件亦应单独立卷;保管期限划分准确;卷内文件排列条理;拆除一切金属物,编排页码;登记目录,填备考表;装订结实,整齐美观。案卷以三孔装订(孔距6.5公分),用棉线在卷皮内装订,案卷厚度在200页左右(最薄不少于1公分);拟写标题,简明确切,案卷标题要正确地揭示文件的作者、内容和名称;书写封面,整洁大方;排列案卷,编目录,一个年度的案卷,按三种不同保管期限分开,同一种保管期限的案卷按组织机构或问题排列顺序,然后统一缮写文书处理号(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案卷脊背上的年度号等由档案馆填写),以文书号的次序填写案卷目录。

从1980年开始,地区(市)档案局统一印(监)制卷皮、卷内目录等供应有关单位,一直延续至今。

科技档案 从1981年到1983年开始进行全面整理,经1983年整顿验收,科技档案收集整理工作逐步转入正轨。1990年7月,按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本市全面展开科技档案整理工作。1987年4月15日咸阳市建委、市档案局制发了《咸阳市城建档案接收范围》和《咸阳市城建档案报送程序的规定》,市城建档案馆接收咸阳城市规划区域内需要永久、长期保存的城市建设档案。

专业档案 此外,从1985年以来,咸阳市根据上级要求,开始系统收集全市会计档案、地名档案、农业区划档案、审计档案、诉讼档案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二、鉴定统计

咸阳市档案的鉴定工作普遍开始于1966年。当年2月1日至3月15日专区档案处组成清理、鉴定试办工作组,利用35天时间在兴平试点,完成了对兴平县档案馆内保管的17038个案卷的鉴定任务,摸索总结经验,形成了《咸阳专区清理鉴定档案工作组关于对部分文件的处理和对部分文件保管期限划分的

意见》，用以指导全区的档案清理鉴定工作。1966年4月，中共咸阳地委办公室召开了县(市)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对全面开展鉴定档案工作做了研究部署。会后各县(市)档案馆共抽调140名干部，普遍开展馆内档案清理鉴定工作。经过鉴定，保留了109274卷，剔除拟销毁的57317卷，6374份文件，占原卷的35.7%。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开展清理鉴定工作。1970年11月15日至17日，地区革委会办事组在旬邑县召开了文书档案工作座谈会，会议要求于1971年上半年彻底清理完地、县、社、大队、小队和所有基层单位的全部文书档案和会计档案。地区革委会办事组印发了《关于档案清理鉴定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提出清理、鉴定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彻底消灭积存的档案文件，把应归档的文件都收集归档，划分好保管期限，分清主次，确保核心档案材料的完整，并把一些无保存价值的文件挑拣出来，使它符合“又精又全”的要求。“旬邑会议”后，全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档案清理鉴定工作。1972年7月地区革委会办事组在彬县召开全区档案清理、鉴定工作座谈会后，地区档案馆组织抽调专人在淳化对地区档案馆的全部档案进行清理鉴定，共清理鉴定72个单位，案卷10306卷，剔除4814卷。1986年市档案馆督促市物资局、卫生局等单位清理鉴定了1961—1985年来大量积压档案，共整理出永久、长期档案734卷。

对于经鉴定剔除需销毁的文件，要登记造册，经主管领导、部门审查批准，销毁时要进行监销，对批准销毁的档案，必须化为纸浆或焚毁，不准出卖或做他用。

档案统计工作的内容包括：档案的收进、移出、整理、鉴定、保管和提供利用，以及档案工作人员、机构、设备、经费等方面情况的基本统计。市档案馆建立的统计工具有：《档案收进情况统计表》、《档案销毁登记册》、《档案查借阅登记簿》、《全宗情况登记卡》等。1983年以后，档案统计工作正式纳入国家标准，建立了年报统计制度，每年年终集中填报一次。1987年国家档案局对《档案工作基本情况统计报表》进行了修订，增加了企业档案工作一项，同时建立了档案干部基本情况统计年报制度等。

三、库房保管

60年代末期战备比较紧张，各县市档案馆普遍建立了档案后库，以保证档案的绝对安全。

档案在库房的保管，一般按库分门别类存放。一个全宗内档案集中在一起，各全宗的排列，将同一时期、同一性质、同一系统的卷宗从左至右横排立

放,并编制全宗顺序号,建立档案存放地点索引,实行专人管库制度等。

对已破损和字迹褪色的重要档案、珍贵档案,各档案馆都程序不同地采取了保护、抢救措施,进行了裱糊修复和复制。

“文化大革命”武斗时,档案工作者仍然坚守工作岗位,拒不交档案库房钥匙,或将档案秘密转移到监狱等安全地方。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一些县档案馆将重要档案搬到防震棚中,24小时值班看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各级党委、政府逐步将改善档案保管保护条件列入议事日程。1986年,省政府决定在“七·五”期间实行省、市、县三级共同投资修建档案馆,市档案局根据市政府领导批示制定了“七·五”建馆计划,加快了建馆速度。截止1990年,省财政已累计拨款57万元,市上拨款34万元,县区自筹104.2万元,建设9个县区档案馆,其中永寿、彬县、乾县、礼泉、淳化、旬邑已竣工。至此,全市16个馆库面积达到7174平方米,其中库房面积4238平方米。与此同时,各级人民政府增加了对档案工作的投入,一些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保管保护设备逐步装备档案部门。截止1990年底,全市16个档案馆共拥有放像机1台、复印机6台、空调5台、去湿机3台、照相机4架。另外,有6个基层档案室还应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档案的管理和检索,有力地改善了档案的保管保护条件。

咸阳市各级综合(专门)档案馆设施一览表

表8-3

项 目 馆 别	馆库面积 m ²		馆内先进设备				
	总计	库房	放像机	复印机	空调	去湿机	照相机
总 计	7174	4238	1	6	5	3	4
市 馆	374	233	1	1			1
秦都区	240	144					
渭城区	45						1
兴平县	214	181		1		1	
武功县	165	140					
杨陵区	64	32					
礼泉县	1152	576					1
乾 县	1070	508		1			

续表 8-3

项 目 馆 别	馆库面积 m ²		馆内先进设备				
	总计	库房	放像机	复印机	空调	去湿机	照相机
永寿县	1126	375					
彬 县	678	624		1		1	
长武县	120	105					
旬邑县	942	538					1
淳化县	426	327		1			
三原县	227	199		1			
泾阳县	231	226					
城建馆	100	30			5	1	

四、编研利用

档案编研是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重要途径,70年代初期,咸阳地区一些档案部门即着手此项工作。1972年,地区档案馆编写了《档案馆介绍》、《咸阳地区人事、机构、区域演变》等专题资料。兴平、彬县档案资料编研工作为全地区树立了榜样。1983年8月地区档案局在彬县召开了档案史料编研工作现场会,总结推广彬县的经验,即:要从基础工作抓起,先编检索工具,后编一般性史料,最后再扩大史料的编研;要熟悉档案内容,广泛收集史料;安排计划、组织分工、责任到人;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统一的编研提纲;学好编纂理论,指导编研工作。会后各馆加强了史料编研工作。地区档案馆人人动手,逐卷逐页查阅255卷,编写了1968—1982年《地委常委会议研究干部任免专题目录》、1971—1982年《咸阳地区干部职务任免专题目录》、1961—1969年《地区大学生分配专题目录》、1961—1966年《地区各县、市、各单位征用土地专题目录》、1969—1971年《地、县、社党委成立情况资料汇编》、1971—1982年《上级文件文号卷号对照表》、《资料图书总目录》、《资料目录卡片》等8种检索工具和参考资料。1983年,根据上级要求,地、县两级档案馆与党史征编委员会联合开展党史资料征编工作。1986年,市档案馆编写的《咸阳市档案局(馆)组织沿革》被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转各县(市)、市直各单位参考。同年,市委组织部、市档案局、市委党史办联合成立机构,抽调人员,开展了组织史资料的征编工作,市档案馆还编辑、摘录了1949—1985年组织史档案资料卡片1000张,编写了《咸阳专区人事、组织、机构历史简况资料汇集(1949—1984)》、《咸阳专

区历届党代会简介》等专题资料。

利用档案是档案工作的最终目的,也是档案馆的主要职责之一。档案馆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接待查借阅为主要利用方式。凡机关单位和个人持有单位介绍信(写明利用的范围和利用者身份),履行登记,均可在档案馆查阅,如需借阅,要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但借阅期不得超过七天。“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使档案免遭破坏和歪曲利用,地委办公室发出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调阅各种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的通知》,规定查阅档案资料必须有中共正式党员 2 人以上同行,指定利用目的和范围,经有关领导批准才能给予提供利用。

1984 年后,档案利用工作由服务于政治运动为主转向以服务经济和改革开放为主,服务方法也改被动接待查阅为主动提供利用。市档案馆于 1986 年制订了新的《档案资料查借阅办法》,对查阅手续做一定简化,规定利用者持能证明本人身份的证件可利用一般性档案文件。1987 年,根据国家档案局、国家物价局的通知,市档案馆实行了档案查阅收费制度,对部分档案利用实行有偿服务。

咸阳市各级档案馆提供档案利用的方式主要有:阅览服务、复制服务、内部印发档案汇编、编写参考资料、参与编史修志、制发档案证明、函复查询外调、举办档案展览、报刊公布档案等。各级档案部门要求档案人员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钻研业务,熟悉馆藏,努力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对前来利用者热情接待,尽量做到及时准确的满足利用者要求。

咸阳市档案馆 1987—1990 年提供利用档案分类统计表

表 8-4

单位:卷次

年代 \ 项目	编史修志	工作查考	学术研究	经济建设	其他
1987	3530	2420	160	570	633
1988	1504	2073		225	120
1989	6254	3121	47	432	820
1990	7554	507	2	5	437

1987 年 9 月 5 日《档案法》颁布后,咸阳市对档案开放工作作了专题研究,提出了二三年内全市各类档案馆逐步向社会开放的计划。市档案局制订印发了《咸阳市开放档案暂行办法》、《咸阳市档案开放与控制范围划分意见》。全

市各档案馆对馆藏档案情况进行了重新摸底,并组织力量对开放范围的档案进行了鉴定、整理、编目,对一些重要档案进行了复制。截止 1990 年底,咸阳市、兴平、彬县、永寿、秦都、三原、泾阳、礼泉、乾县、淳化 10 个档案馆正式向社会开放档案 18178 卷,资料 5393 册。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只要有能够证明其身份的合法证件,如身份证、工作证、学生证等(港澳台同胞持省以上统战部门介绍信)都可查阅已经开放的档案。档案开放的范围是:自形成之日起满 30 年的,不涉及国家重大机密的档案、资料。对于经济建设、科技等方面的档案,根据需要,也可提前或暂缓开放。

五、档案馆藏

馆藏结构 从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地、县各档案馆主要保管同级党委、政府各项工作活动中形成的文书档案。旧政权档案起初一般由地、县公安机关代为保管,后逐步移交到当地档案馆保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经过档案工作的恢复整顿,各级档案馆基础工作得到加强,馆藏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管理门类上由过去单一的收集、保管文书档案发展为收集包括文书、科技、专业档案的多门类综合管理;在载体形式上由过去只收集纸质红头文件、资料向收集保管包括录音、录像、照片、标本、模型等实物的多元化方向发展,同时,广泛征集了一系列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馆藏量逐年丰富。1961 年全区各级档案馆仅保管 323 个全宗,116832 卷文书档案。经过 20 多年的艰苦努力,1990 年底已发展到保管 1575 个全宗,359835 卷。咸阳市城建档案馆统管城区勘察、规划、建设、市政工程、工业、民用建筑等各类建筑、构筑活动的档案材料,是一个专业性的部门档案馆,至 1990 年底,共收集保管 2117 卷、照片 701 张、底图 819 张、资料 1034 册。见附表 8-5。

馆藏介绍 市档案馆主要接收保管现行机关档案,同时接收(征集)了一些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资料。截止 1990 年底,馆藏档案共 114 个全宗,30330 卷,排架长度为 577.8 米,资料 687 种,7325 册。档案以文书档案为主,包括现行机关档案 86 个全宗,24520 卷,主要是地(市)委、专署、市政府及各部、委、办、局的档案,其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建国初期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有关土地改革运动、民主建政、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社会治安、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档案,又有“文化大革命”时期专区革委会等机构的档案,还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有关工农业生产、商贸、文教、卫生、体育等内容的档案。资料主要有西北国棉一厂、二厂、七厂、咸

1990年全市各级综合(专门)档案馆馆藏情况一览表

表 8-5

档案馆名	全宗(个)	案卷		文书档案			科技档案 (卷、盒)	专业档案 (卷)	录音录像 (盒)	照片档案 (张)	资料册
		总计 (卷)	总长度 (米)	革命历史 (卷)	中华民国 (卷)	现行 (卷)					
总计	1575	359835	6674.5	881	5532	313630	7459	29330	802	5337	54586
咸阳市	114	30330	577.8	44	3023	24520	193	2550	798	941	7325
秦都区	72	35872	701			35872					1432
渭城区											
兴平县	91	30630	397		142	25726		4762		1750	3022
武功县	175	16259	314.5		2446	13579	170	64			3568
杨陵区	7	3614	54.2			3141		473		27	759
礼泉县	74	22198	440.4	4	237	21703		254	4	192	1621
乾县	147	24146	529	9	389	19884	385	3479		126	7457
永寿县	125	23652	480	5	475	15313	1266	6593		591	7838
彬县	182	28151	360.3	107	379	26768		897		250	6452
长武县	122	15223	305		467	14756					1570
旬邑县	67	30314	628	455		27693		2166		132	2009
淳化县	89	20958	312.2	194	255	19197		1332		554	7161
三原县	143	41970	865	61	131	32664	3339	5775			1089
泾阳县	162	34401	680.1	2	600	32814		985		73	2249
城建	5	2117	30		11		2106			701	1034

阳纺织机械厂、陕西纺织器材厂、陕西第二针织厂、陕西第二印染厂等厂志，咸阳汽车运输公司发展史资料汇编，咸阳市农业区划，咸阳市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及报刊杂志、党史、统计资料、图书等。此外，还有1947年以后的革命历史档案14个全宗44卷；国民党咸阳县党部、三青团、县参议会、农会、动员委员会、交通银行、咸阳县政府、县警察局、邮局、民政科、国民兵团、咸阳二等邮局、钓台乡和周陵中学等单位的档案14个全宗3023卷、证章档案56枚，以及清朝皇帝圣旨（复印件）1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第10总队同学录及有关历史照片等资料，历史

档案最早的是 1930 年民国时期咸阳县政府的档案，并有民国末年《咸阳县志（1947. 7—1949. 5）》孤本手稿。除文书档案外，还有科技档案 193 盒，财会等专业档案 2550 卷，录音录像档案 798 盒，照片档案 941 张。

六、业务指导

1961 年 10 月，咸阳专区档案管理处成立，与专区档案馆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负责专区所属 14 县（市）档案馆和专区级机关及企业、事业单位档案工作的业务指导。1969 年专区革委会成立后，业务指导工作由专区档案馆承担，对外行文、业务指导均以革委会办事组和革委会办公室名义进行。1980 年，地区档案局成立后，仍然与地区档案馆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行使两种职能，局、馆内确定了专人负责业务指导工作。

1984 年 10 月，随着地改市后档案工作业务量的增加，市档案局设立了业务指导科，配备了专人，承担下列工作：根据党和国家关于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及上级业务机关的指示，按照实际需要，主持或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研究起草本市档案工作的具体实施细则或办法，并检查、监督和指导其贯彻执行；负责对市直机关档案部门和县、区档案局（馆）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负责对档案理论、档案教育、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进行综合或专题调查研究，提出指导性意见，并为全市档案工作会议起草有关报告、讲话、总结及提供典型经验材料；配合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对市级机关单位的文书立卷归档工作进行指导；负责起草和组织实施全市档案专业干部的培训计划，研究和编选档案专业学习材料；在市职改领导小组领导下，指导和组织全市档案干部业务职称评定工作；负责市档案学会的日常工作，协助档案业务协作小组开展活动。从 80 年开始，各县、区陆续成立档案局，市属各企事业单位也成立了档案机构，承担类似的工作任务。1985 年后，为强化业务指导职能，县、区档案局内部相继成立了业务指导组（股、科）或确定了专职指导人员，具体负责日常业务工作。止 1990 年底，全市档案行政管理机构 16 个（包括两个同时担负业务指导任务的市城建档案馆和杨陵区档案馆），专职业务指导干部 47 人，担负着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 4889 个各类档案室的指导任务。

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所属地区的档案业务指导，采取了多种形式进行。主要有：发布文件、转发材料；召开全面的或专业的工作会议、座谈会、表彰会；开展机关档案室的归档月活动；开展定期的检查评比和验收工

作；开展档案业务协作组织活动；组织培训、出外参观考察以及深入实际具体指导等。随着档案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档案部门的业务指导逐步转向提高管理水平、实现档案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方面。1987年2月市档案局制订了《咸阳市机关文书立卷归档工作实施细则》和《文书立卷工作程序》。1988年4月，市档案局组织市直机关档案工作协作组组长20余人，赴北京、大连、沈阳、青岛四市学习机关档案综合管理经验。又印发《机关档案工作业务建设规范》3000册，并配合《档案法》的学习、宣传、贯彻，组织力量对市直机关档案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市公安局有积存文件情况，督促其对建国30多年来的近5000卷档案进行彻底清理、鉴定、重新装订、编目。协助市农牧局、建设银行等建立综合档案室，取得了成功。随着全市企业升级工作的开展，各级档案局指导企业建立综合档案室（或档案信息中心），开展企业档案升级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至1990年底，已有116户企业（包括国营、集体、乡镇企业）档案管理达到市级先进，16户企业档案管理达到省级先进。

第二章 地方志

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周礼》中的外史掌四方之志、诵训掌道方志、小史掌邦国之志等，是方志之名的最早记载。当时的方志，是对封国或方国的自然和人文各种记录的总称。这些记录，绝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先秦时期，咸阳境内民风、景胜、人物、事件等流传至今的，多见于《诗经》中的“豳风”、“秦风”，《尚书》中的“禹贡”、“周书”及《春秋》三传中的有关部分。

两汉至魏、晋时期，以赋、记、录、传、图等形式记载咸阳、长安及其附近地理、人物、古迹、民俗等内容的作品，为数不少。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东汉班固、张衡的《两京赋》、《两都赋》，东汉长陵人赵岐的《三辅决录》，汉、魏时无名氏撰写的《三辅黄图》，晋时葛洪的《西京杂记》、潘岳的《关中记》、薛暹的《西京记》。此外，还有《三辅旧事》、《三辅故事》、《三辅耆老传》、《京师录》等。上述作品，虽未冠以志

名，实际都是境内地情资料的载体，是流传于后世的早期的地方志书。

唐、宋时期，反映境内地情的作品，以志为名者逐渐多起来。《新唐书·艺文志》收有鲍坚的《京兆郡方物志》、王方庆的《九峻山志》、凌准的《邠志》。宋代有宋敏求的《长安志》、路隋平的《邠志》等。此外，以记为名者，唐代有鲍坚的《南雍州记》、韦述的《两京新记》，宋代元澄的《秦京内外杂记》、范致明的《池阳记》、李焘的《秦中岁时记》（一名《咸镐岁时记》）等。以录为名者有程大昌的《雍录》、赵源一的《奉天录》等。

元代，有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李好文《长安志图》等。

从明代开始，全国各省、府、州、县，按照永乐年间朝廷颁降的修志条例，开创了“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的局面，形成了以政区为系统的较为完整的志书系列。境内各州、县志中，以明弘治状元、武功人康海撰修的《武功县志》最为驰名。全书2万余言，文约事丰，《四库总书目》认为“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后来志乘多以康氏为宗”。其次，宋廷佐的《乾州志》，阎奉恩的《邠州志》，也堪称佳作。流传至今的还有：成化《三原县志》、嘉靖《礼泉县志》、隆庆《兴平县志》、万历《咸阳新志》等。

清代是中国地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雍正时颁布了省、府、州、县志60年一修的诏令，许多著名学者投入修志行列。境内有孙星衍纂修的《直隶邠州志》、《三水县志》（三水即今旬邑）、《礼泉县志》；洪亮吉纂修的《淳化县志》、《长武县志》。在朝廷重视和名家参与下，地方志的体例不断完备，结构比较严谨，叙事力求翔实，学术质量大为提高。清代境内各州、县志，现存达37部，加上部分县的乡土志如兴平县的《士女志》、《马嵬志》，三原县的《鲁桥镇志》、泾阳县的《泾渠志》等，总数达40余部。

民国时期，境内因战乱灾荒较多，修志工作时断时续。从1912—1949年，共修县志10部，其中成书的6部。还修镇志1部（《续修鲁桥镇志》），专志1部（《周陵志》）。县志中质量较高的有范紫东编修的《乾县新志》和刘安国监修的《重修咸阳县志》。这两部志书，在编志者民主、科学思想指导下，摒弃了明、清志书中许多封建主义糟粕，增加了地理、交通、产业、教育等新篇章，增强了资料使用和记述方法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体现了志书的时代特点。

建国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1956年，编纂地方志曾列入国家科学12年规划的20个重点项目之中。境内各县市于1959年曾组织过县市志的编修工作。后因县级区划调整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而中断。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82年起，各县市陆续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开展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各级修志机构，在党委领导、政府组织、专家参加、各方支持下，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省地方志编委会关于新编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和编修规范，经过1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五卷本《咸阳市志》之综合卷（80万字）已出版发行。由88部市级专业志组成的《咸阳市地方志丛书》已出版23部。各县区志已出版4部。一批由厂、矿、科研院所自己编写的部门志，也已出版发行。与此同时，方志理论研究、旧志整理、地情资料的搜集与研究、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第一节 市志

1984年咸阳地区改为咸阳市后，成立了地方志工作机构，督导各县和各系统的修志工作。1987年，开始着手新编咸阳市志的编写准备工作。1988年，编成《咸阳市志》篇目初稿，提交市志编委会二届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征求委员们的意见，会后又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先后收到各种修改意见100多条。此篇目将全志分为总述、大事记、专志（17卷）、附录共20卷。各卷单独成书，称为“多卷本丛书结构”。与此同时，又给市级各部门，下达了85部专志的承编任务，出现了专志与市志专卷的协调问题。1990年，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将市志由20卷浓缩为5卷，即综合卷、经济卷、政治卷、文化卷、社会人物卷。在制订详细篇目过程中又改为4卷，将社会人物分别并入政治、文化卷中。

1992年开始总纂《咸阳市志》综合卷，1994年完成终审修改。随着编写工作的开展，市志办同志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95年又将市志由4卷调整为5卷（即综合卷、经济卷、政治卷、文化卷、人物卷）。同时，市志丛书也由85部增至88部。1995年完成了市志第一卷的修改、校对等各项工作，1996年2月正式印刷出版。此后，开始着手市志文化卷的编纂。

1997年3月，鉴于《咸阳市志》第一卷已经出版和市志编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咸阳市地方志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于3月19日在秦都饭店召开，市志编委会主任高存德，副主任孙万保、张卉、文建国、任清芳，市长助理董军等出席了会议，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滕云等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表彰了永寿县志办等20个先进集体和马宏轩等69名先进个人。高存德市长强调，市、县两级修志机构，现在不是撤并的问题，而是

需要健全、加强的问题；各县区志、市志专业志编委会的主任，都要由县区区长、部门主要领导领导兼任，同时要有一名领导具体分管；市地方志办面临的任務十分繁重而艰巨，要按照精干、高效的原则，适当增加内设科室，增加编制；要增加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正常经费，解决专项费用，设立修志奖励基金（每年2万元）；各县区政府也要将志书编写、出版印刷等必要的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如期拨付。会后，各项工作都得到较好落实，修志环境得到了改善。同年5月，全国人物志理论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市志办派员参加会议，并就咸阳市志人物卷的设计思路在会上作了发言。在得到充分认可的情况下，会后拟定了人物卷的编纂方案，开始了人物卷的编写工作。

1999年9月，市志办面对要求2000年全面完成首届修志任务的现实，经过反复认真地讨论，彻底调整工作思路，理顺工作关系，确定了全面推进、重点突击的工作方针，决定提前出版文化卷和人物卷，而后集中力量完成经济、政治两卷的编纂任务。市志办取消一切节假日，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开展工作。市政府领导亲临市志办鼓励士气，市志办又自加压力，决定不失时机地抓起年鉴工作。同年11月4日，政府常务会议专门讨论了地方志工作，并决定召开一次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同月24日咸阳市地方志工作会议在市政府办公楼召开。市级领导李堂堂、杨光明、胡补旭、董军、薛兆青出席了会议。董军副市长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李堂堂市长就修志工作的思想认识、工作重点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省志办主任滕云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市志工作的新思路 and 阶段性突破进展，全面布置了2000年底前完成首届修志任务的具体措施，详细安排了《咸阳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一致通过了《咸阳市地方志工作十二年规划（1999—2010）》方案。

经过市志办全体同志团结拼搏，市志文化卷、人物卷在1999年底全部完成送审稿，打印装订成册。送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和市志编委会各位委员审阅。

《咸阳市志》综合卷 咸阳市地方志编委会编，80万字，胶印，16开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漆布烫金精装加护封，印数4000册。内容由序、凡例、大事记和政区、县区概况、自然环境、人口、环境保护、城乡建设6编组成，编下设29章、119节。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断至1990年，部分内容适当下延。志书综合记述了咸阳市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历史与现状，介绍了所辖县区的基本情况，全方位记载了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成就和经验。志书卷首彩印最新绘制的八开《咸阳市政区图》、《咸阳

市市区图》、《咸阳市街区图》3张，反映咸阳古今风貌和建设成就的彩色照片92幅。文内插有各种单色地图26张，各类附表75幅。市志编委会主任郑德义，副主任孙万保、黄亚丽、张卉、文建国、任清芳。主编任清芳，副主编王岳林、陈若虚，编辑张鸿杰、司少华、何金铠、张世民。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截至1999年底，咸阳市地方志丛书已经出版了《咸阳市邮电志》、《咸阳市广播电视志》、《咸阳市交通志》、《咸阳市财政志》、《咸阳市物价志》、《咸阳市粮食志》、《咸阳市工业经济管理志》、《咸阳市体育志》、《咸阳市外贸志》、《咸阳市民政志》、《咸阳市计划志》、《咸阳市科技志》、《咸阳市自然地理志》、《咸阳市司法志》、《咸阳市工会志》、《咸阳市妇女志》、《咸阳市精神文明建设志》、《咸阳市体改志》、《咸阳（市）审判志》、《咸阳市教育志》、《咸阳市民族宗教志》、《咸阳市税务志》、《咸阳市卫生志》等23部。

第二节 县区志

境内见诸史籍的最早的州县志，是唐代凌准撰写的《邠志》。该志在《新唐书》、《宋史》艺文志中均有名录，宋以后佚失。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用《邠志》由至德元年（756）至贞元十三年（797）记事34处，近5万字。从引文的内容看，《邠志》记载了当时邠州境内新平（今彬县）、三水（今旬邑）、永寿、宜禄（今长武）一带的军事和战争活动。其他内容没有流传下来。《宋史·艺文志》还录有路隋平《邠志》3卷，已佚。明、清时期，境内各州县均修志书，明代共修州县志14部，清代共修州县志37部。

建国后，各县曾于50年代后期开展了一次修志工作，后因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有的只搜集了一些资料，有的编成了部分志稿，收效甚少。现存只有原《咸阳市志》“大事记”和“地理志”等油印稿约10余万字，《乾县志稿》手稿20册。1982年9月，地、县市陆续成立了编志机构。地改市后，市辖秦都、渭城、杨陵3区，也开展了区志的编纂工作。经过各县区编志人员的努力和各行各业的大力配合，除杨陵区外，全市13个县区志的编写工作已基本完成。其中已出版发行的有《永寿县志》、《兴平县志》、《秦都区志》、《渭城区志》4部，正在出版的有《长武县志》，已经过市志编委会二审的有《三原县志》、《旬邑县志》、《乾县志》3部，已经过县人民政府一审的有《淳化县志》、《彬县志》2部。《永寿县志》于1993年获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永寿县志》 永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80万字，胶印16开本。三

秦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漆布烫金精装，印数 1000 册。内容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组成。专志分行政区划、自然环境、自然资源、自然灾害、人口计划生育、生产关系变革、农牧、林业、水土保持、水利、工业、电力、交通、邮电、商业、工商管理、财税、金融、城乡建设、人民生活、政党、群众团体、政权、军事、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卫生、体育、民俗、宗教、方言、人物、“文革”（文化大革命）动乱与拨乱反正 32 个部分组成。下辖 138 章，336 节。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断至 1989 年。志书全面系统记载了永寿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全县摆脱贫困走向温饱的新鲜经验，为黄土原梁沟壑贫瘠地区脱贫致富提供了有益借鉴。卷首设彩色地图 1 幅，彩色照片 70 幅。1993 年，在全国地方志书评选中获优秀成果二等奖。县志编委会主任魏志发，副主任李永民、赵文学、陈新民。主编马宏轩。志书公开向国内外发行。

《兴平县志》 兴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40 万字。胶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漆布烫金封面加护封。印刷 5000 册。内容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组成。专志有行政建置志、自然环境志、自然灾害志、人口与计划生育志、土地管理志、经济综述、农林水牧志、工业乡镇企业志、交通邮电志、电力志、商业志、财税金融志、城乡建设志、管理经济志、政权志、党派社团志、军事志、科学技术志、教育志、文化文物志、卫生体育志、民俗宗教志、“文化大革命”志、人物志共计 23 志 1 述。其中 6 个专志为篇、章、节结构，其余为章、节结构。专志辖 21 篇，223 章、437 节。附录补为章、节体，设 4 章 2 节。上限溯至事物发端，下限断至 1989 年。志书全面、系统、翔实记述了兴平县的历史和现状资料，重点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兴平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兴旺工业地、平原来米粮仓”的业绩。卷首设彩色地图 1 张，彩色黑白照片 115 幅。卷内文、图、表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县志编委会主任曹森，副主任周开兴、王鹏远、赵民哲、翟崇仁、赵富贵。主编赵富贵，副主编许凌超。志书公开向国内外发行。

《秦都区志》 秦都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95 万字，胶印。16 开本。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漆布烫金精装加护封。印数 3000 册。内容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和附录组成。专志有行政建置、自然地理、土地、人口、城乡建设、交通邮电、经济管理、蔬菜、水利、农业、工业、乡镇企业、财税金融、贸易、政党群团、政权、民政人事、军事、教

育、科技、文化文物、卫生体育、社会风俗、人物 24 个部分。下辖 114 章，387 节。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断至 1990 年，卷尾附 1991—1993 年大事记要。志书记载了原咸阳县、咸阳市及秦都区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史实，重点记述了设区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鲜成就。资料翔实，记述得体，文图并茂，雅俗共赏。卷首设彩色地图 1 幅、彩色照片 62 幅。区志编委会主任国强，副主任李景含、李志正。主编李景含，副主编王自毅。志书公开向国内外发行。

《渭城区志》 渭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90 万字，胶印，16 开本。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漆布烫金精装加护封。印数 3000 册。内容由概述、大事记、专卷、附录组成。专卷分政区、自然环境、人口与计划生育、土地、城乡建设、经济管理、工业商业、交通邮电、财税金融、农业、水利、政党群众团体、政权、政治协商会议、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文物、民族宗教民俗、人物 22 卷。下辖 105 章 282 节。上溯事物发端，下限断至 1990 年，部分内容延至 1992 年。志书以大量科学资料，对秦咸阳、汉帝陵的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了翔实的记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各项成就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卷首设彩色地图 2 幅、彩色照片 68 幅。文内插有图、表 103 幅。卷前有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余树声研究员写的关于我国史志的起源与演变有独到见解的序言。区志编委会主任应志治，副主任马祝维、张改萍、蔡正中、雷里池。主编王鹏超。志书公开向国内外发行。

第三节 专志、村镇志

境内最早的专志有唐代咸阳人王方庆撰写的《九峻山志》，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各地收藏的专志有清道光年间胡元瑛撰写的《泾渠志》，光绪年间胡凤丹撰写的《马嵬志》，1934 年宋联奎等撰写的《周陵志》，以及清末兴平、武功等县的乡土志。村、镇志，有清道光年间王介撰写的《鲁桥镇志》、1923 年冯庚撰写的《续修鲁桥镇志》。

现存民国以前专志中，文约事丰，体裁新颖者可推《周陵志》，该志以孔子家乡《阙里志》的体例为蓝本，酌为变通。记述的范围，以咸阳周文、武、成、康诸陵为重点，延及彬县的公刘、武功的后稷、岐山的古公等周族祖先的葬地。记述的内容分为 6 类：一为陵寝兴废，二为世系，三为祀典、四为闻达后裔，五为碑碣，六为艺文。卷首置周陵旧图和民国时实测的 1:

18000周陵新图。全书约17万字。国民党要人林森题写书名、戴季陶作序。该志线装铅印，是一部研究周陵和历代丧葬祭祀制度的重要文献。

1982年以来，境内许多工厂、科研院校、事业单位组织编写厂、校、院所、行等部门志或专业志。已经出版质量较好的志书有《咸阳建设银行志》、《彩虹志》、《陕毛一厂志》、《咸阳纺织机械厂志》、《西北国棉七厂志》、《西北国棉一厂志》、《西北国棉二厂志》、《陕西纺织器材研究所志》8部。这些志书，对本专业本部门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科学的记述，是新中国成立后咸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创业的真实记录，具有资治、存史和借鉴的重要作用。

在部门、专业志编写的同时，各县区对重点乡镇、村志的编写也已起步，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已经出版的《三原南关村志》，记载了改革开放以后，三原县城南关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结了该村脱贫致富的典型经验。该志是陕西省第一部新编村志，它的出版，对境内各乡镇、村志的编写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此外，以《咸阳市地名志》为核心，全市各县区组织人力编写地名志13部，其中泾阳、乾县、淳化、三原、旬邑、彬县、永寿、咸阳8部已出版，兴平、武功、礼泉、长武4部打印初稿，对境内历代地名渊源、当代地名称谓作了清理和规范。

《咸阳市建设银行志》 咸阳市建设银行志编纂办公室编。胶印，16开本，漆布烫金精装。36万字，1992年印刷，印数500册，章节体编著。设概述、大事记和机构组织、基本建设支出预算管理、拨款管理、贷款管理、基本建设财务管理、施工企业财务管理、存款财务与会计、投资信息调查与项目评估、内部管理10章49节。外加附录和彩色地图1幅、彩色照片38帧。上限起1950年，下限至1989年。系统地记述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咸阳市中心支行由创建到曲折前进、改革发展三个时期机构沿革和业务开展的历程。编纂领导小组组长郝均科，副组长梁明慧、鲁俊山，成员郑志战、顾全明、朱相彬、王咸仁、秦致信。办公室主任秦致信。编辑陆磐荣、郝小平。书存市建设银行中心支行，内部交换与发行。

《彩虹志》 《中国彩虹》编辑委员会编。胶印，32开平装，17.5万字，199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7000册。为《中国彩虹》丛书之一。篇章体编著。设概况、生产发展、职工教育、企业管理、党群工作、工厂简介、生活服务等7篇55章。卷首有李鹏、万里、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题词和视察彩照。上限起 1978 年，下限至 1991 年。系统地记述了以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为主体的彩虹电子集团公司的创业历程和“彩虹牌”彩色显像管的国产化进程。编委会主任薛宝明、副主任李克敬、刘进福，执行编委王军。书存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内部发行与交换。

《陕毛一厂志》 陕毛一厂志编纂委员会编。胶印，16 开漆布烫金精装。28 万字，1988 年 6 月印刷，印数 2000 册。章节体编著。设前言、凡例及概述、工厂建设、体制与机构、生产发展与技术进步、企业管理、党群工作、教育工作、生活福利、支内援外与外事往来、劳动服务公司、大事记等 11 章。图表 78 幅，照片 113 帧。上限起 1958 年 4 月，下限至 1985 年 12 月。全面记载了陕西第一毛纺织厂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肖岱岗，副主任王志德、许光顺。总编辑马企良、副总编辑关虎臣。书存陕西第一毛纺织厂，供内部交换与发行。

《咸阳纺织机械厂志》 咸阳纺织机械厂志编纂委员会编。16 开本漆布烫金精装。20 万字。1988 年 7 月印刷，印数 2000 册。章节体编著。设前言及概述、大事记、组织机构、工厂建设、生产发展与产品开发、企业管理、车间概况、党群工作、教育工作、生活福利、劳动服务公司等 11 章。彩色图片照片 165 幅。上限起 1958 年，下限至 1986 年。该书系统记载了该厂的历史沿革和产业发展，已成为对全厂职工进行“坚持改革，艰苦创业”的教材。编纂委员会主任黄俊兴，副主任程秀荣、王树林。总编辑张维圻，副总编辑杨文瑞、杨志信，责任编辑谢和。书存咸阳纺织机械厂，内部交换与发行。

《西北国棉七厂志》 西北国棉七厂志编纂委员会编。胶印，16 开漆布烫金精装，31 万字，1987 年 9 月印刷，印数 2000 册。篇章节体编著。设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及生产建设、党群工作、文化教育、生活福利等 4 篇 20 章。外加附录和 122 幅图照。上限起 1958 年 1 月，下限至 1985 年 12 月。对企业体制、生产发展、生产管理与经营管理等章节的记述，专业特色和地方特色体现得较为充分。编纂委员会主任彭干松，副主任魏桂花、费旭东。总编辑费旭东、副总编辑孙建新、雷国胜，编辑宋志善、张怀玉、张继红、金锡茹、梁素华。书存西北第七棉纺织厂，内部交换与发行。

《西北国棉一厂志》 西北国棉一厂志编纂委员会编。胶印。16 开本精装护封。40 万字，1989 年 9 月印刷，印数 2000 册。篇章节体编著。设前言、凡例及概述、大事记、组织机构与领导体制、工厂建设、生产发展、车间概况、生产经营管理、党群工作、教育、生活福利等 10 篇 52 章。外加附录、

厂图、厂歌、题词等。插入彩色照片计 104 幅、资料照片计 99 幅。上限起 1951 年 1 月，下限至 1985 年 12 月。记述了 1951 年初由我国自行设计在咸阳建造的西北地区第一个大型棉纺织骨干企业的创业历程，总结了全国纺织工业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的经验。编纂委员会主任白希孟、副主任陈光夷。总编辑王振亚，编辑马国栋、马国朝、王义玲、王汉仪、王莉娜、刘敏之、杨家岭、赵茯霞、侯钢锋、韩淑文。书存西北第一棉纺织厂，内部交换与发行。

《西北国棉二厂志》 西北国棉二厂志编纂领导小组编。胶印，漆布烫金精装。52 万字，三秦出版社 198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印数 2000 册。章节体编著。设前言及概述、大事记、建厂、挖潜和引进、扩建、生产发展、企业体制、企业管理、生活福利、教育、党群工作、荣誉等 12 章 58 节。外加附录、题词、厂图等。彩色及黑白照片 6 帧。上限起 1951 年 8 月，下限至 1985 年 12 月。编纂领导小组组长申尔谦，副组长姜理唐。主编朱璇。书存西北第一棉纺织厂，全国公开发行。

《陕西纺织器材研究所志》 陕西纺织器材研究所编。胶印，16 开本，漆布烫金精装加护封。25 万字，1992 年 12 月印刷。章节体编著。全书设概述、大事记、基本建设体制机制科研队伍、科技工作、科研中间试验及生产、经营管理、党群工作、生活服务、劳动服务公司 10 章，下辖 40 节。卷尾设附录。卷首设彩色位置图 1 幅、彩色照片 18 幅。上限始于 1964 年 9 月，下限至 1990 年 12 月。该志以文、图、表、记、志、录等体裁，全面系统记述了陕西纺织器材研究所的创业历程与科研成果，记述了全体职工团结奉献、勇于进取的精神，具有一定的资治、教育和存史价值。编纂领导小组组长朱进生，副组长陆纪明、冯玉田。编志办公室主任张生勤。此书在内部交流与发行。

《咸阳市地名志》 咸阳市地名办公室编。铅印，16 开漆布烫金精装，40 万字。陕西省出版总社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印数 3000 册。章节体编著。设概况与沿革、行政区划与居民地、水利电力设施、交通设施、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纪念地 6 章。卷首有前言、卷尾加附录、后记。卷首与文内插彩色咸阳市及所辖县、区地名图 16 幅、专业地名图 3 张。彩色照片 52 帧。该书为咸阳市 2 万多条地名提供了标准字形和读音，对常用或重要地名，除了对其含义作准确阐释外，还充分记述其历史演变、经济发展、文化景观等信息。编写领导小组组长王保京，副组长殷秀亭、韩忠印、王祖武、王永

贵。主编张鸿杰。此书在内部交换与发行。

《三原南关村志》 三原县城关镇南关村志编写领导小组编。铅印 32 开，平装，13 万字。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印数 1500 册。全书由序、凡例、概述、大事记、专章、后记等部分组成。专章设解放前的南关、解放前中共组织在南关地区的活动、解放后南关地区党政群组织的建立与发展、经济体制、农业、企业、个体工商企业、人口计划生育与土地、民政、文教卫生科技、思想政治工作与文明村建设、人物、附录 13 章，下辖 40 节。卷首有 9 幅题词和 47 幅黑白照片。上限溯至事物发端，下限断至 1992 年。志书记载了解放前南关村劳动者“吃饭穿衣靠扁担，晚上睡觉找台沿”的悲惨状况，记载了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的发展历程，重点总结了改革开放以后，南关村农工商综合发展，一举成为全省有名的富裕村的新鲜经验。编写领导小组组长李天成，撰稿潘自新。公开向国内外发行。

第四节 旧志整理

1982 年各级修志机构成立以来，在编修新编地方志的同时，花了很大气力，广泛搜集流散在外地的旧方志。对北京、上海、西安、宁波等地收藏的境内旧州县志的绝大部分，采取复印、影印等方法，收集回来，存于各县区地方志办公室或档案馆、图书馆。对这些珍贵的地情资料，有条件的县区志办，组织力量，有选择地开展了校点、注释和残稿整理工作。到 1995 年底，已经正式印刷的有《重修咸阳县志》（标点本），有打印版《校订兴平县志》（点释稿）及刊登于《泾渭稽古》杂志上的《咸阳县志》（手稿）。

《重修咸阳县志》（标点本） 咸阳市秦都区城乡建设环保局编。胶印，30 万字。16 开漆布烫金精装加护封，1986 年 12 月印刷。印数 1000 册。《重修咸阳县志》是 1931 年咸阳县长刘安国监修，由吴廷锡、冯光裕主编，印数较多、流传较广的一部县志。原志分地理、建置、财赋、祠祀、官师、选举、人物、杂记 8 卷，分 4 册铅印竖排线装。另附 1 册《咸阳县井水、教育统计表》。该表对全县 400 多个村庄和县城所有水井的井深、水深、水质及乡办、村办小学作了详细调查记录，具有很高的科学史料价值。标点后的志书，改为横排，合订为 1 册，内部交流与发行。

《校订兴平县志》（点释稿） 兴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校订。油印，16 开本，16 万字，印数 300 部。《校订兴平县志》是 1933 年，陕西通志馆编纂，兴平人冯光裕，受兴平县长温伟之托，对 10 年前王廷珪主持编修的《重修兴

平县志》所作的校订，成书后冠以“校订”之名。全志分地理、建置、祠祀、官师、人物、艺文、杂识8卷，约15万字。1985年，兴平县志办组织人力，对该志进行了标点和注释，分上、中、下3册横排，打印装订。旨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后，再行修订。

《咸阳县志》(手稿) 咸阳解放前夕，由王仁夫、张宝三、赵洛亭等组成的县志纂修委员会编写。至1949年已完成手稿7万余字，现存咸阳市档案馆。1994年，在咸阳市档案局协同下，由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张世民进行整理。整理后的志稿分气候、土地、方言谣谚、古迹古物、农业、风俗、教育、卫生、宗教、艺文10篇及附录。该志书是在新旧社会交替的前夜编写的。参加编写的人员中既有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也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给县志搜集资料的同时，也为当时咸阳县工委编写《咸阳调查》提供了资料，促进了咸阳的顺利解放。整理后的志稿，被市文物局主编的刊物《泾渭稽古》1994年第2期专号全文刊出。附有整理说明。共印4000册。内部交流与发行。

第五节 修志机构

一、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4年12月，咸阳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委会主任为王步唐，副主任为郭建义、赵百平、焦义德，委员有赵富考、姚崇华、韩忠印、路桦、张悦、任宗武、寇博寿、王发武、文建国、王丕乾、王永贵、黄志敏、张国栋、吕存祥、范实、陈世魁、郭佑民、张雨亭、薛志强、穆熙璋、胡希茂、赵文合、李宏涛、张万照、李树君；1988年调整编委会主任为张宏勋，副主任为赵百平、张友才、尚行韬，委员有马善贵、任宗武、吕存祥、李东生、李树君、尚行韬、陈世魁、张悦、张友才、张元健、张宏勋、张学儒、张雨亭、张国栋、张首迅、张明忠、赵百平、赵富考、胡延光、霍宏才、夏遇南、郭佑民、黄志敏；1990年调整编委会主任为李锦江，副主任为沈树森、强文祥、赵百平、尚行韬，委员有马善贵、王岳林、王发武、任宗武、吕存祥、李东生、李树君、李维亚、李锦江、沈树森、尚行韬、陈世魁、张元健、张雨亭、张国栋、张学儒、张明忠、张首迅、赵百平、赵富考、胡延光、霍宏才、夏遇南、郭佑民、黄志敏、强文祥、雷衍

庆,同时,各县、区长均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1992年调整编委会主任为司南,副主任为沈树森、文建国、强文祥、赵百平、尚行韬,委员有上官相、马善贵、文建国、王玉民、刘光辉、王岳林、王发武、王开明、司南、孙应义、苏进荣、安云新、任宗武、吕寿林、吕存祥、沈树森、李树君、李维亚、李新民、张峰、张德钧、张元健、张雨亭、张国栋、张明忠、张首迅、吴华树、吴来保、陈若虚、陈世魁、陈万丰、国强、尚行韬、茹学强、赵富考、赵百平、胡延光、段永辉、郭佑民、聂国栋、聂万清、夏遇南、梁凤民、曹森、黄志敏、强文祥、雷衍庆、霍宏才、薛德文;1995年编委会主任为郑德义,副主任为高仰秀、黄亚丽、张卉、文建国,委员有郑德义、高仰秀、黄亚丽、张卉、文建国、孙学典、郑文宗、袁廷甲、赵俊峰、侯全忠、贾俊华、宇文新、陈生贤、贺永耀、任清芳、王岳林、陈若虚、贺力、徐西权、聂万清、吕存祥、茹学强、刘智、李选政、吕寿林、李林生、姚振才、王志远、严志祥、刘书贤、雷建华、聂崇轩、袁焕亭、王志杰、马骏英、国强、应志治、于书弟、段世忠、牛继鹏、郭志诚、刘光辉、曹森、李景含、罗亚民、段永辉、王志农、梁凤民、王玉民、赵和兴、夏遇南、霍宏才、张元健、高忠玉。1995年9月,编委会成员由于人员工作变动,作了部分调整,副主任高仰秀调整为孙万保,增补任清芳为副主任。委员中袁焕亭调整为郭纯,李景含调整为郭永亮,段永辉调整为张定会,梁凤民调整为上官吉庆。1996年7月3日,中共咸阳市委研究决定,调整高存德同志为咸阳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1999年11月,鉴于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工作变动较大,市委、市政府决定对其进行调整。编委会主任为李堂堂,副主任为杨光明、胡补旭、董军、陈留根,委员有刘聪博、梁玉栋、李兴文、杨耀文、张孝敏、李仲武、哈锐、朱德旺、侯春纪、崔明星、尹学成、聂万清、刘国志、吴怀德、冯志强、陈武、牛继鹏、汪源、张进祥、王志玉、杜建儒、李玉悌。2000年2月28日,为了加强对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领导,市委市政府决定增补尹学成同志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二、咸阳市地方志编委会会议

第一次会议 1985年3月26日在市政府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编委会主任、咸阳市市长王步唐主持,讨论了全市地方志工作的组织和工作任务等问题。

第二次会议 1988年9月1日至3日在秦都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市

志编委会委员，各县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市级各部、委、办、局负责人及市志丛书各卷主编共96人。市长、编委会主任张宏勋作工作报告，市委副书记沈树森讲话。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市志篇目（草案），讨论了各级志书编修中的有关问题，通过了以加快编志步伐，保证志书质量为中心内容的决议。会后，中共咸阳市委办公室、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了市志编委会的情况报告。这次会议，对开创咸阳修志工作的新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次会议 1991年12月5日在市政协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市政协主席、市志编委会副主任沈树森主持，副市长、市志编委会副主任强文祥讲了话，代市长司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在市区居住的编委会委员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审定了市志《大事记》、《凡例》及扉页人员名单等部分内容，讨论了二次会议以来的修志情况，部署了市县志工作。

第四次会议 1992年4月20日在凌云饭店召开。会议由强文祥、赵百平主持，沈树森出席并讲了话。市志编委会委员参加了会议，市志各专业志承编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县区志办公室主任、市专业志受奖单位的主编及市地方志办公室全体同志参加了会议。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市委第七次常委会议（讨论地方志工作）精神；表彰地方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审定市志综合卷中《总述》、《区县简介》、《政区》等部分内容。

第五次会议 1995年10月13日在秦都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咸阳市市长、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郑德义，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黄亚丽、张卉、文建国、任清芳，各县（区市）人民政府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专家学者中的市志编委会委员。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冀东山、县志处处长董健桥也应邀参加。会议讨论了咸阳市志篇目大纲和市志第一卷编写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会议决定将《咸阳市志》由4卷改为5卷；原则通过市地方志办公室《关于市志第一卷若干问题解决办法》的汇报。郑德义和冀东山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市政府向各县区市、市直各单位转发了郑德义市长的讲话，市志编委会下发了会议纪要。

第六次会议 2000年1月13日在凌云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市志编委会副主任董军，省志办地县志处、出版处领导及编委委员。会议审订并原则通过了《咸阳市志》文化卷、人物卷初审。会上，董军就加强领导、抓快进度、落实经费、确保组织等问题讲了话。

三、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1984年12月7日，设立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由李树君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隶属市政府办公室。1987年10月22日市委确定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为市人民政府直属县级事业单位。编制15人。同年10月26日任命尚行韬为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1988年6月21日，任命王岳林为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12月8日，任命尚行韬为《咸阳市志》主编，王岳林为副主编。1990年1月31日，任命陈若虚为《咸阳市志》副主编。1992年9月1日，任命陈若虚为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元月14日任命任清芳为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咸阳市志》主编。1999年8月15日，任命尹学成为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咸阳市志》主编，杜建儒为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咸阳市志》副主编。

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内设科室3个：（一）市志科。1988年初设市、县志编审室，1990年9月改为市志科。（二）县志科。1988年初设《方志研究》编辑室，1990年9月改为县志科。（三）秘书科。1988年初设政办室，1990年9月改为秘书科。

四、《方志研究》编纂委员会

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于1988年创办内部刊物《方志研究》，作为方志信息交流和方志理论研究的园地。创办后，成立编委会，尚行韬任主任，编委会委员有王岳林、陈若虚、张鸿杰、李启明、何金铠、司少华、张世民、杜建儒。主编王岳林，副主编陈若虚，责任编辑李启明、司少华。1988年至1992年，共出刊12期，约100万字，刊载各种文章150余篇。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刊。

五、《咸阳年鉴》编纂委员会

1995年3月21日，市地方志办公室申请开展年鉴编纂工作，6月30日成立《咸阳年鉴》编纂委员会，顾问李锦江，主任郑德义，副主任黄亚丽、王一、李维亚、任清芳，委员马骏英、王志远、王志杰、王岳林、吕存祥、吕寿林、刘智、刘书润、宇文新、孙学典、李林生、李选政、严志祥、陈生贤、陈若虚、郑文宗、赵俊峰、茹学强、侯全忠、贺力、贺永耀、姚振才、

袁廷甲、袁焕政、聂万清、聂崇轩、贾俊华、徐西权、雷建华、雷衍庆。主编王一，副主编任清芳、张鸿杰，责任编辑李启明、何金铠。1995年卷《咸阳年鉴》初稿完成于1996年底，未曾出版。

1999年11月22日，鉴于《咸阳年鉴》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工作变动，市政府决定对其组成人员作如下调整：主任委员董军，副主任委员尹学成、刘聪博、李兴文，委员朱德旺、刘国志、牛继鹏、刘世民、沈毛平、聂万清、苏吾生、王志玉、张进祥、赵金荣、杜建儒、徐新荣、惠存虎、惠家平、张新民、王普藩、岳生锋、许忠信、杨鑫、郑永强、王惠林、贺书田、任常智、卢力群。下设编辑部，主编尹学成，副主编杜建儒、司少华、武冬莉。同年11月23日，中共咸阳市委办公室、咸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出《关于加强〈咸阳年鉴〉编辑出版工作的通知》。11月24日，在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上，聘任徐新荣等131人为特约审稿，燕景安等132人为特邀编辑。

六、市级各部门及专业单位修志机构

承编《咸阳市地方志丛书》的73个市属部门，均要求设立编委会或编纂领导小组。一般都由党政领导一把手担任编委会主任或领导小组组长，有少数兼任主编。多数单位设立修志办公室，正式任命主任、主编，从事承编专志的编修工作。修志的程序一般是由内设各科搜集现实资料，再由修志办公室专人整理和摘抄档案、书刊及询访历史和口碑资料，制订编写计划，议定篇目，上报市地方志办公室审查。初稿编成后，先由单位组织一审，然后打印上报市地方志办公室及上级主管部门，分送有关专家、学者阅稿，在此基础上，召开志稿评审会，广泛征求意见。会后对志稿再行修改，最后形成终审稿，报市地方志办公室查验，并发文认定。审定后的专业志即可按规定办理出版印刷事宜。

各厂矿院所志书编修的机构和工作程序，大体与市级各专志相同，只是审定程序略有差别。大部分志稿，由主管上级审定，少数志稿由主管上级会同市地方志办公室审定并发给终审通知。

各部门的修志机构，在志书终审出版后，多数撤销，少数保留或归并秘书科或档案室，继续从事资料整理和志书发行工作。

七、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2年以来，各县、区陆续成立县区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为县

属科级事业单位。县区志编委会一般由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主要领导及有关部、委、办、局负责人组成。县区长任编委会主任。县区志的编纂任务主要由县区志办公室组织实施。县属各部门承担专业志稿编写或资料搜集任务。县区志办公室一般编制3—5人，编纂工作大部分由县志办编志人员和聘用编志人员协同完成，少部分由县志办专业编写人员完成。志稿总纂由主编、副主编完成。总纂完成的初稿，提交县委、县人民政府初审。初审合格后，正式报送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二审。二审一般由各级领导、方志工作者、各行业专家参加的评审会议审定。审定后的志稿，由县区志办修改后，提交市地方志办公室查验并报省地方志办公室终审，终审后的志稿由各县区志办组织出版发行。志书出版后，县区志办公室一般按市编委会要求挂靠县区政府办公室，有的归并档案局。但地方志编委会及其办公室的组织和机构名称仍然保存，准备续修新志。

第九编

民族·宗教

第一章 民族

咸阳市境有汉族和回、满、蒙古、藏、维吾尔、壮、苗、彝、朝鲜、白、土家、侗、锡伯、瑶、哈萨克、布依、傣、哈尼、高山、畲、纳西、土、柯尔克孜、撒拉、佤佬、俄罗斯、门巴、黎、仡佬 29 个少数民族,6 人未识别民族身份,还有加入中国国籍的 2 名外国人。

汉族是境内的主体民族,占人口数的 99.8%。境内汉族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华夏族同其他部族长期交往和共同发展中融合而成的。这种融合,主要表现在 3 个重大历史时期:

先周至西周。周人的先祖曾先后在境内居住。后稷居郃(今杨陵、武功),公刘居豳(今彬县、旬邑),古公居岐(包括今乾县武功西部),王季居程(今市区东部),文、武居丰、镐(包括今市区南部)。周人 5 次迁徙,促进了境内各部族与周族的交往与融合。

先秦至秦。秦人的先祖亦先后在境内居住。大骆、非子居犬丘(今兴平),灵公居泾阳,献公居栌阳,孝公迁都咸阳,至秦始皇以咸阳为中心,统一中国。这期间,秦人不断将六国贵族及寻常人家迁居咸阳,形成了“关中无旧族”的局面。这种局面,加速了汉民族形成的进程。

十六国至北朝。西晋后期,因战乱和灾荒,境内原住民大多数逃到四川、汉中、湖北一带,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大量进入境内。各民族的首领,先后在长安建立过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政权,并设置学校,教授经典,积极推行汉化教育。至隋、唐时期,留在境内的各族群众,已经基本融汇于汉族之中。隋、唐至今,汉族一直是境内居民的主体。

除人口众多的汉族以外,咸阳市 29 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总计有 8839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2‰。少数民族中以回族人口居多(6044 人),满、藏、蒙古、维吾

尔、壮等 5 个民族的人口在百人以上,其他 23 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在百人以下。

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虽少,但分布的地域很广,大分散,小聚居,插花居住在咸阳市所辖的秦都、渭城、杨陵 3 个区和武功、三原、泾阳、礼泉、乾县、永寿、长武、彬县、旬邑、淳化 10 个县及兴平市的城镇和农村,其中以秦都、渭城 2 区的文汇路、新兴路、人民路、西兰路和兴平市七里铺、城关镇等地较为集中。

第一节 汉族

周 公元前 22 世纪,居住在渭河北岸今杨陵区、武功县境内的有邠氏(周族的始祖),在首领弃的率领下,“树艺五谷”,发展农业,建造“有邠家室”,成为咸阳境内最早定居的农业氏族。弃以其“教民稼穡”之功,被尧举为农师,被舜封为全国主管农业的官员——后稷。“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史记·周本纪》)。后稷的后代不窋,因夏太康废弃农官而奔于甘肃庆阳一带的戎族之间。不窋之孙公刘,在豳地(今彬县、旬邑一带)复修后稷“务耕种、行地宜”之业,周围各部族成员纷纷迁往豳地,归附公刘。公刘 10 代孙古公亶父,因避北部游牧部族薰育的侵扰,于商武乙元年(约前 1142)^①率豳人南下,经今永寿、乾县到岐山境内的周原,正式建国,定国号为周。古公利用周原宜于农耕的有利条件,继续发展农业,并营筑城郭室屋,使居民分邑落定居,改变了部分居民的游牧习俗。古公死后,其子季历积极引进殷商的文字、官制、宫室建筑、手工艺等先进文化和技术,使周族进一步强大起来。武乙二十四年(约前 1118),季历率师东伐程国(今市区东部),与程人战于毕(在今市区西部),取得胜利。文丁五年(约前 1142)营造程邑,季历由周原迁居于程。期间,季历连年出征,取得攻伐周边的义渠、西落、燕京、余无、始呼、豳徒等非华夏部落的胜利,被商王朝封为西部诸侯之长——牧师。季历子昌(周文王)先后攻取了翟、密、邗、耆、崇、犬戎、黎等部落。这些胜利奠定了推翻商王朝的物质基础。周武王十一年(前 1066),周师攻商,庸、蜀、羌、獯、微、卢、彭、濮等部族都派兵从征,一举灭商,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周王朝。西周时期,咸阳为京畿之地,境内各部族已被华夏文化融合为华夏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秦 秦人的先祖是关东游牧部族。首领伯益,因助舜驯服鸟兽有功,被舜赐姓嬴氏。其子孙或在关东,或在“西戎”(今关中西部 and 甘肃东部)。周孝王时(约前 884—前 870),居住在犬丘(今兴平市东南部)的嬴氏后裔非子,善养

^① 西周共和元年(前 841 年)以前的纪年,引自葛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

马。周孝王使其在汧渭之间为皇室养马,因成效显著,被封于秦(今甘肃清水县),号称秦嬴,部族始称“秦人”。

西周后期,秦人作为周王朝西部附庸,不断与入侵的戎族作战。周室封非子曾孙秦仲为大夫,伐西戎,被西戎杀于豳南(今永寿县境内)。秦仲之子庄公,兄弟5人,在宣王支持下,打败了西戎,被封为西垂大夫。庄公之子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周将岐以西之地赐于秦。岐丰之地,多为戎占。平王与襄公约定,如秦能将戎逐出境外,其地为秦所有。秦自襄公起,势力不断东扩,宁公二年(前714),进入咸阳境内。宁公三年,秦人与占据在今兴平、三原一带的汤社作战,将汤社的戎君亳王逐出境外,占领了境内渭北诸地。宁公以后的秦诸先公,不断与周边各诸侯国或各游牧部落作战,占领了关中及陇西地区。秦穆公(前659—前621)被尊为春秋时代的“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公、宋襄公、秦穆公)之一。

秦人的政治中心,随着其势力的不断扩大而东移,战国时期,进入今咸阳境内。秦灵公(前424)由雍(今凤翔)徙居泾阳,献公二年(前383)徙居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孝公十二年(前350)始以咸阳作为秦都。

秦的先祖,由于长期与陇西戎族杂居,与戎族有世代联姻关系而被中原诸夏视为“戎狄”。入居关中后,在诸夏影响下,大量吸收华夏文化,成为华夏族的西方大国。孝公迁都咸阳后,积极推行商鞅所变之法,“内修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同时,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革除残留的戎族旧俗。变法的结果使秦国“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秦民大悦。周边92个戎翟小国都来臣服,秦国迅速变成诸侯国中最先进的强国。孝公以后,秦除了加紧对关东诸国的攻伐外,对西北边境(今长武县及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戎族大国义渠不断进攻。从惠文王七年(前331)至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的60年里,秦从咸阳出发对义渠发动过5次大的战争,消灭了这个戎族大国,从而拥有陇西、北地、上郡3郡的全部土地。后来秦又沿三郡边界修筑长城,以防止西北游牧部族的侵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田畴、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建立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此后,咸阳境内的居民一直以华夏族为主体。两汉以后“华夏”的名称逐渐为“汉”所代替。

戎 戎是殷周时期兴起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民族,有具体名称的部落有30余种,大部分以居住地命名。分布在今咸阳境内的有犬丘之戎、汤社之

戎、棫林之戎、义渠之戎等。

犬丘之戎。又名犬戎、犬夷、昆夷、西戎等。商代聚居在今咸阳市区西部和兴平、武功一带的犬征族，在渭水流域建立了一个大方国，称犬方。方国的中心区，在今兴平市东南5公里南佐村附近，称犬丘。商末，犬方被周文王姬昌伐灭。西周中期，周穆王将居住在犬丘的戎族驱逐至陇西一带。周懿王十五年（约前894），为避獯豸入侵，曾将周的都城自镐迁至犬丘。厉王十一年（约前846），西戎侵入犬丘，灭掉居住在犬丘的秦先祖大骆之族。周宣王三年（前825），以秦仲为大夫，率军攻伐犬戎，六年（前822）秦仲被西戎杀死。秦仲之子庄公战败犬戎，收复其地。因犬丘久废于戎，更名废丘。周幽王时，自然灾害频繁，统治者内部矛盾尖锐，幽王宠褒姒，废申后及太子，申后之父申侯联合犬戎伐周，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关中大部分地区被犬戎占领。周平王元年（前770）为“避犬戎难”迁都洛阳。关中西部的犬戎族，逐渐被秦人所并吞。

汤社之戎。西周后期居住在今兴平、三原一带的戎族，其活动中心在今三原县嵯峨乡杨杜村附近。另一个聚居点在兴平市冉庄乡西北部汤台村附近。“杨社”为“汤社”之讹。《史记》索隐认为：汤社为西戎之国，传说是成汤的后裔，因此将自己的部落名为汤社，君主自号为亳王。秦宁公三年（前713），汤社被秦所灭。十二年（前704），秦又扫除了汤氏的残部，至此，今市境南部诸县，已无戎族部落。

棫林之戎。棫林一名央林，西周《戎簋》铭文中称“棫林”，在今泾阳县西部。据1975年3月在扶风县法门寺白家村发现的周穆王时《戎簋》记载：戎伯率师伐入侵之戎，追至棫林，经过激烈战斗，杀死百人，俘获两名首领和114名兵卒，缴获盾、矛、戈、弓、箭、甲冑等135件。春秋时，棫林已为秦人所有。秦景公十八年（前559），晋国联络周、鲁、齐、宋等10国军队伐秦，至泾河渡口，其中郑国军队在司马子蟜率领下，进至棫林，无所获而退兵。可见在此之前，棫林之戎已不复存在。

义渠之戎。其都城在今甘肃省宁县西北，是商周时期地跨今陕、甘、宁3省区的戎族大国。今市境北部的长武、彬县等地，战国前为义渠的辖地。据今本《竹书纪年》载：商武乙三十年（约前1112），“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此后臣服于周。至平王东迁，周室衰微，“戎逼诸夏”，诸戎中唯义渠和大荔之戎最强，各筑城数十，自封为王。秦占领关中后，义渠与秦长期和睦相处，至厉共公时开始互相攻伐。据《史记·秦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秦厉共公三十三年（前444）“伐义渠、虜其王”，躁公十三年（前430）

“义渠伐秦，侵至渭阳(今咸阳市区)”。惠文王七年(前331)，秦趁义渠内乱，派庶长操率兵平定。十一年(前327)“县义渠、义渠君为臣”，更元九年(前316)“义渠败秦于李伯”(北地郡县名)。更元十年(前315)“伐取义渠二十五城”。武王元年(前310)“伐义渠”。至秦昭襄王时，义渠王朝秦，与昭王母宣太后私通，生2子。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宣太后在甘泉宫诱杀义渠王，随后起兵，灭义渠国。在其辖地置陇西、北地2郡。这一带的戎人，有的走向西北或西南，成为以后的匈奴、氐、羌等族的一部分，有的接受秦法，逐渐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翟 又名狄、薰育、厥鞮(《魏季子白盘》)。古籍载，殷、周统治者亦将其称为獯鬻、荤粥、玁狁等。翟是商周时代我国北方的游猎部族。武乙元年(约前1142)进入豳地(今彬县、旬邑境内)，将长期居此的古公亶父部族赶到周原。帝辛十七年(约前1081)“西伯伐翟”，又将翟人逐出豳地。西周期间，翟人多次入侵，逼进京师，对西周统治者威胁甚大。穆王十四年(约前963)秋九月，翟人入侵，进至毕(今咸阳市区北部)，穆王派孟兪率兵抗击，追至获泽(今泾阳县西北、礼泉县东北泾水出山处)。穆王在获泽与翟人言和。翟人给周朝良马400匹并归还侵毕所掠宝物。周懿王时，翟和戎交替入侵岐及镐，懿王避难迁都于犬丘。周厉王十四年(前844)“玁狁侵宗周西鄙”。周宣王五年(前823)夏六月，尹吉甫率师伐“玁狁”至于太原(今平凉、固原一带。一说今包头西、汉五原郡地，一说今山西西北)。此后，咸阳境内再无翟人踪迹。

匈奴 殷商时活动在北方的游牧部落，经过长期吸收融合北方的鬼方、薰育、戎及部分华夏部落，在战国后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前三世纪末，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机构。西汉前期，不断侵犯北部边境。西汉高、惠、文、景几个皇帝都通过和亲和“岁奉絮缯酒食物”来缓和匈奴的寇掠行为。汉武帝即位后，匈奴与汉战争频仍。元狩二年(前121)，匈奴在陇西和祁连山接连被霍去病打败，昆邪王谋杀休屠王，率4万人降汉。其中部分降卒被当做官奴安排在长安及近郊。西汉时三辅有胡越骑，就是由匈奴等非汉人组成的骑兵。甘露三年(前51)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在甘泉宫(今淳化县铁王乡境内)朝拜汉宣帝，随后住宿于长平(今泾阳县蒋刘乡五福村北秦望夷宫故址)。汉宣帝回长安时，“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在中渭桥上夹道欢呼万岁，迎宣帝回朝。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和解的壮举。此后半个世纪，汉、匈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东汉至魏晋期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附汉，徙入塞内(大部分在今山西境内)与华人杂居。西晋太康五年

(284)北匈奴太阿厚率其部落 29300 人归晋,七年(286)又有郝大博及萎莎等各率大小 10 万余口,到雍州刺史扶风王司马骏处归降。八年(287)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 11500 口、牛 22000 头、羊 105000 只来降。这些匈奴人与关中汉、氐、羌人杂居,形成了“关中之人百余万口,度其多少,戎狄居半”的局面。在各民族长期相处过程中,匈奴族不断接受汉文化,改用汉姓,采用汉语,同汉族群众一起在反对各族统治者残酷压迫的斗争中,逐渐融合为一体。永嘉三年(309)七月,匈奴人刘芒荡,联合羌族在马栏山(今旬邑境内)起义,被西晋统治者南阳王司马模镇压。前赵光初二年(319),匈奴屠各部落人路松多在新平(今彬县)、扶风(今三原、乾县一带)起兵反对匈奴统治者刘曜政权,被刘曜战败,逃至陇城(今甘肃张家川一带)。匈奴首领、前赵王刘曜为了阻止匈奴上层人物的汉化进程,于光初九年(326)在渭城(今渭城区窑店乡境内)建立单于台,拜其子刘胤为大单于,规定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后赵太和二年(329)八月,因刘曜在洛阳被擒而放弃长安西逃的前赵太子刘熙、南阳王刘胤,率众数万,自上邽攻占安定、新平、北地、扶风、始平诸郡,军至仲侨(九峻山东)被后赵(匈奴羯族政权)石虎打败,刘熙、刘胤以及匈奴将校、公卿 3000 余人死难,其台、省文武官员及秦雍大族 9000 余人被俘,并被徙于襄国(今河北邢台),匈奴屠各部 5000 余人被活埋于洛阳。前秦建元元年(364),匈奴右贤王曾鞮、左贤王卫辰率众 2 万反对氐族统治,屯兵马栏山,被前秦苻坚镇压,并徙其豪酋 6000 户于长安。后秦建初元年(386)二月,卢水胡(匈奴部族之一)郝奴率众 4000 人南攻长安,在马嵬(今兴平市马嵬镇)被羌族政权姚萇战败投降。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 10 万反对鲜卑拓跋氏政权,攻陷新平,南下长安,被北魏政权镇压。此后,留居境内的匈奴人便成为关中汉族的组成部分。

鲜卑 东汉时游牧于我国东北部的鲜卑族,在北匈奴西迁后,进入匈奴故地。桓帝时(147—167),鲜卑首领檀石槐分其族为东、中、西 3 部,各置大人率领。以右北平(今河北平泉县)至辽东为东部,宇文氏世为东部大人;以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为中部,慕容氏世为中部大人;以上谷以西至敦煌为西部,拓跋氏世为西部大人。十六国至北朝期间,鲜卑三部都在长安建立过政权,东晋太元十年(385)慕容冲在阿房建立西燕政权,拓跋氏(后改姓元氏)在长安建立西魏政权,宇文氏继而又建立了北周政权。

鲜卑族于前秦苻坚时进入咸阳境内。前秦建元六年(370)十二月,苻坚消灭了以鄯(今河南安阳)为都城的鲜卑族慕容氏所建立的前燕政权,俘获燕王

慕容暉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及鲜卑 4 万余户,安排在长安附近。这些鲜卑贵族不服氐族对他们的统治,伺机报复。在建元十七年(381)十二月,慕容暉请苻坚到其家参加儿子的婚礼,欲趁机杀死苻坚。苻坚知此事后,将慕容暉及长安城内鲜卑男女老少千余人斩尽杀绝。4 年后,深得苻坚信任的慕容冲,趁前秦与东晋“淝水之战”失败之机,在长安建立了属于鲜卑族的西燕政权。

当时,在关中氐、羌、鲜卑三大族的争斗中,鲜卑处于劣势。多数鲜卑人想投靠都城设在中山(今河北定县)的后燕政权,反对慕容冲久居长安的打算,因而杀掉慕容冲,立慕容颢为燕王,率鲜卑男女 40 余万口离开关中东迁今山西境内。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八月,被后燕慕容垂政权并吞。

北朝后期,鲜卑拓跋部和宇文部在关中建立西魏和北周政权,在鲜卑人汉化的同时又推行汉人鲜卑化,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西魏宇文泰采用汉人苏绰制定记账法和六条诏书(一清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要求州刺史、郡守、县官牢记六条诏书及计账法,否则不许做官。北周武帝宇文邕毅然将官私奴婢和杂户(指佛寺中的僧祇户、佛图户)释放为平民,在当时比南朝的汉人政权还文明得多。到杨坚(隋文帝)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后,关中的鲜卑族就成为汉族的组成部分了。

氐 氐族在西汉前主要分布在今甘肃东南部,陕、甘、川交界处。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派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兵征氐,在白马氐聚居地置武都郡(今甘肃西和县西南),氐人受到排挤,一部分移居关中西部千、陇之间。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三月,曹操徙武都 5 万氐人居扶风(今兴平、武功县境)、天水二郡。刘备占领汉中,逼近下辨(今甘肃成县),曹操又命武都太守杨阜前后徙武都汉、氐万余户居京兆、扶风及天水等郡,并将武都郡侨置于小槐里(今武功县境内)。三国魏正始元年(240),魏又徙陇西 3000 多氐人于关中。魏晋时期,今咸阳地区兴平、武功、礼泉、乾县等地居住的氐人最多。西晋扶风王司马骏把咸阳附近的氐族划归自己直接统辖,由部落变为编户,对氐人进行更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以齐万年为首的关中氐族大起义。起义军在元康六年(296)八月至九年(299)正月两年半的时间里,转战于今泾阳、乾县、武功等县境内及千陇之间,给西晋政权以沉重打击。

东晋永和七年(351),聚居在汲郡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的氐族首领苻健占领长安,建大秦(史称前秦)。前秦苻健死后,其侄子苻坚在位期间,征服了西域 30 余国,消灭了前燕、前凉等割据政权,统一了除中国东南部的东晋偏安政权以外的大部分疆土。同时,大量使用汉族文人和武官,兴修水利,兴办

学校。苻坚每月亲临太学一次，“考弟诸生经义，与博士讲论”，这些举措，对促进北方各民族的融合起了一定作用。“关陇清晏，百姓丰乐”，呈现出政治稳定、生活安定的良好社会局面。苻坚为了加强对各方镇的统治，不断将各地汉族和非汉族豪户迁至关中，又将关中氏族迁往各方镇。最大的一次氏族迁徙是在前秦建元十六年(380)七八月间，苻坚将三原、九峻(今礼泉)等地氐人15万分别迁至长乐(今河北冀县)、枹罕(今甘肃临夏)、晋阳(今山西太原)、洛阳等地。苻坚至霸上为诸氏送行，只见遍野恸哭，哀感路人。秦臣赵整援琴作歌道：“阿得脂，阿得脂，博劳^①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建元二十年(384)关中氏族在秦苻坚“淝水之战”失败后，一部分投靠羌族首领姚萇所建的后秦政权，一部分随苻坚族孙苻登，在关陇之间开始了历时10年的前(氐)后(羌)秦争夺战。后秦建初八年(393)，苻登在平凉为姚兴所杀，苻登子苻崇逃往湟中(今青海省湟中县)称帝，建兴九年(394)十月为西秦所灭。

前秦期间居于咸阳境内的已经高度汉化了了的氐人，随着前秦政权的覆灭，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

羌 传说周族先祖后稷的母亲姜嫄，便是居住在今市境西部武功、杨陵一带的羌人氏族之女。后稷被舜赐姓姬氏。后来姬姜二姓多世联姻，显现了周族和羌族的密切关系。武王伐纣时，羌人作为一支重要军事力量，随从武王出征。后来大部分融合于华夏族之中。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被秦厉公拘执为奴的羌人无弋爰剑，挣脱奴隶枷锁，逃往今青海东部河湟流域。无弋爰剑将秦人的农耕技术传授给当地羌人，深受各部落人的拥戴，被推为首领。其后世世为羌人豪酋。东汉建武十一年(35)，先零羌(羌族的一种)进攻临洮(今甘肃岷县)，被陇西太守马援战败。随后，马援及扬武将军马成又打败河池(今甘肃徽县)、武都和屯聚于浩亶(mén)(今青海民和县)的羌人，将数万归降者徙入天水、陇西、扶风3郡。咸阳境内始有羌人居住。永平元年(58)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在西邯(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打败烧当羌，徙归降者3000余口于三辅。永元十三年，金城太守侯霸又徙允川(今青海贵德县西)降羌6000余口于汉阳、陇西(二郡在甘肃东南部)、安定(含长武县地)。这些内迁的羌民“皆为吏、豪所徭役，积以愁怨”，且“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后汉书·西羌传》)。在东汉统治的近两个世纪里，羌族反抗延及咸阳市境的有6次：永初二年(108)滇零羌攻入三

① 博劳：即伯劳，是一种只能踈翅上下而不能飞翔的大鸟。

辅,逼近西汉陵园,在武功一带被西域副校尉梁懂战败;永和五年(140)且冻羌攻入关中,杀三辅令、长;六年(141)春,巩唐羌由陇西侵入三辅,到咸阳原焚烧西汉园陵;永康元年(167)正月,先零羌攻入云阳(今淳化),被都乡侯段颍战败;四月,攻陷京兆虎牙营和扶风营,杀千余人;十月又进入三辅地区,被匈奴中郎将张奂消灭。

西晋时,境内与汉人杂处的羌人,“数代之后,族类蕃息”,元康六年(296),齐万年率领的起义军,实际上是氐羌等族的联军,士卒数量达7万之众。东晋升平元年(357)五月,羌族首领姚襄与前秦军战于三原,兵败被杀。襄弟姚萇率羌众降秦。苻坚伐晋时,以姚萇为龙骧将军。“淝水之战”后,慕容冲趁机起兵,苻坚遣其子苻睿与姚萇讨伐慕容泓兵败。苻睿被杀,姚萇逃至渭北,关陇豪羌率其户口归萇者5万余家。太元九年(384)四月,姚萇自立为万年秦王,年号白雀(史称后秦)。五月姚萇进屯北地(今耀县),周围各郡羌人归降者10余万。次年八月在新平(今彬县)缢死苻坚,九月在新平南(今永寿县)战败慕容冲军,西燕尚书令高盖降萇。太元十一年(386),在马嵬战败匈奴卢水胡郝奴,占领长安。姚萇死后,其子姚兴即位于槐里,改元皇初。姚兴在位期间,招抚流民,抑制羌、汉豪强,提倡儒学,整顿吏制,加快了关中汉、羌融合的步伐。义熙十三年(417)姚兴子姚泓继位后,兄弟争权,互相攻击,遂被东晋刘裕所灭。长安、咸阳境内羌族10万余口,在刘裕占长安后,西奔陇上,被晋将沈林子追至槐里,俘虏上万人。此后,未西迁的羌人,逐渐成为关中汉族的一部分。

第二节 少数民族

一、回族

咸阳市有回族6044人,分布于市辖的14个县、区市,而75%以上的回族人口散居于秦都、渭城两个区和兴平市。

陕西是回族形成时间较早,人口较多的省份之一。泾、渭、洛三河流域,是全省回族的主要集中居住区或杂居区。据《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估计,清代约有70—80万人。清同治年间余澍畴所著的《秦陇回务记略》卷一载:陕甘回民系唐郭子仪借大食兵,克复两京后,留居中土者。迄今千余年。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

咸阳地处交通要道,自唐代起回族先民就在这里从事商业活动,经过五

代、两宋、金到元依然如此。为了便于经商,回族先民多居住在沿交通线的城镇中。到了元代,多分布于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元初,忽必烈即帝位时,就提出要兴复“文治”,恢复经济,他于是设立劝农司,提倡垦殖,扩大屯田网,用军屯、民屯、军民合屯等方式,充实农业劳动力,发展农业生产。在陕西就有回民的垦区。史载鞞端(今和阗)、可失合儿(今喀什)工匠 1050 户,在甘肃、陕西屯田。由于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相同,这些从事农耕的穆斯林,很自然地聚居在一起,形成了穿插在汉民村中的回民村,也形成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回族坊。据清代乾隆十年立的木际丰义行碑载:乾隆年间回族在渭城一带族姓繁多,生计鼎盛。立碑者 156 人,其中马、高、米、者、顶、魏、古、冶、胡诸姓,正可代表咸阳的回族大姓。到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回民在关中已达百万之众,有 800 余坊,建立伊斯兰教礼拜寺 800 余座。在陕西回民起义发生以前,西安、同州、凤翔 3 府和乾、邠、郿 3 州以及今咸阳境内渭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是回族主要集中区和杂居区。仅同治元年以前,咸阳县居住在渭河以南的回民,便有南纪家、北纪家。在渭河以北的有渭城、黑旗、红旗、七旗、普马家、者马家、任家嘴、穆家、马家堡、拜家堡、南北余家、西沟(今名永安堡)、牛家村(今名查田村)。另外求家堡和魏家川为回汉杂居村。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军首领设立的渭城府所辖 26 个村落,多为回民居住。

《重修咸阳县志》记述:同治六年,回军攻陷庆阳,其属县宁州、合水、环县之民逃至正宁枣刺街,约数万人,流离失所,凄惨万状。陕抚刘果敏公编为八旗,其一、二、四、六、八旗,安于泾阳、高陵,三、五、七旗安于咸阳东乡一带,开垦荒地。

在三原县,同治元年以前,城内的回民集中居住在兴和巷(今太平巷)一带。其次,姚家巷和水晶巷亦散居不少。在太平巷北口,有一座回民礼拜寺。当时三原城内回民有几百家,以安姓、马姓为最多。回民起义时大部分回民集中在清真寺里,门口安置两尊土炮,用以自卫。刀客攻不能入,便在寺周围纵火,烧了三天三夜,大部分回民被活活烧死在寺里,惟回民武举鞭钢鸣率部分回民冲出重围投向回民起义军。回民军失败之后,三原县从此禁止回民入境,把“兴和巷”改为“太平巷”。一直到民国初年,渐有回民小贩前来三原城内以经营牛羊肉为生。

泾阳县的回族多聚居于县城西关外的南铁门和魏家湾及永乐店以南,崇文塔以北的蔡家壕。在县城内有回民住宅,也有清真寺。城东南秀水巷以西的旧县公署大堂,就是回民清真寺的原址。

淳化县的回族多聚居于县城西北 60 公里处的纳家、拜家二村。

礼泉县城的计姓回族和赵村、吴村、肖东、蔡原头的回民,做生意的较多,还有不少是做经纪人的。

清同治二年(1863),陕西回民起义军转战出境,清政府把陕西各地原有的回民,除了西安城内约 2 万人以外,全部驱逐出境。这一空前未有的大变动,改变了陕西省民族成份的原有面貌。

现在咸阳境内的回族,大部分为解放前后陆续从河南、甘肃、宁夏和西安、镇安等地迁来的。

回族大多居于城镇,主要经营饮食业,其次是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尤以“牛羊肉泡馍”和传统的“清真小吃”久享盛名。

二、满、藏、蒙古、壮、维吾尔族

满族 咸阳市有满族 1223 人,分布在 14 个县、区(市),以秦都、渭城二区和兴平市的城镇人口较多。满族大部分在工厂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一般文化素质较高。

藏族 咸阳市有藏族 605 人,分布于渭城、杨陵区和乾县。以西藏民族学院的学生人数最多。

1958 年 2 月,西藏公学和西藏团校的师生开始向咸阳新校址(原工院校址)集中,到同年 9 月 15 日正式开学时,来咸阳的藏族师生达 4131 人,其中学生 3415 人,教职工 716 人(内有部分汉族),这是咸阳历史上藏族人口最集中的时期。1965 年 7 月 1 日,西藏公学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经过 30 多年为西藏培养出 14000 多名毕业生,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12000 人。除西藏民院以外,还有 110 余名藏族学生分别就读于乾县师范和杨陵农林院校的民族班。另外还有个别藏民因婚姻、工作调动来咸阳,插花居住在旬邑、长武、三原、泾阳县及兴平市和秦都区。

蒙古族 咸阳市有蒙古族 259 人,集中地分布在秦都、渭城、杨陵三个区的城镇,其中大专院校的学生约占 70%。

壮族 咸阳市有壮族 123 人,多杂居于秦都、渭城、杨陵三区。

维吾尔族 咸阳市有维吾尔族 121 人,其中除有 11 人分散居住在秦都、渭城等 4 个县外,全部属杨陵区西北农、林院校的学生。

三、朝鲜、白、土家等族

在咸阳市居住的朝鲜、白、苗、土家族等其他 23 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均在百人以下(最多的 77 人,最少的只有 1 人)。他们散居于秦都、渭城、杨陵三区 and 兴平、武功、三原等县(市)的城镇,大多数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极少数居于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朝鲜族 咸阳市有朝鲜族 77 人,主要分布在秦都、渭城二区和兴平、三原等县(市)的城镇。他们是解放后因工作调动、婚姻等原因,先后迁来咸阳的。

白族 咸阳定居的白族有 77 人,较多的分布在武功县和渭城区的工厂和学校,其余约 20% 散居于秦都、杨陵二区和兴平的城镇。

土家族 散居咸阳市的土家族有 67 人,主要为秦都、渭城二区和兴平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

苗族 咸阳市现有苗族 50 人,其中 80% 居住在秦都区、渭城区,其余散居于杨陵区和三原县。

锡伯族 锡伯族在咸阳市工作、学习的共有 33 人,他们插花居住在秦都、渭城、杨陵三区和三原、武功、兴平市的城区。

哈萨克族 居住在咸阳市的 31 名哈萨克族同胞,除 1 人定居武功,全部为西北农、林院校民族班的学生。

侗族 咸阳市有侗族 26 人,插花居住在秦都、渭城、杨陵 3 区及兴平市、武功县、三原县。

彝族 咸阳市有彝族 22 人,除 11 人散居于秦都区外,其余 11 人插花居住在渭城、永寿等 5 个县区。

瑶族 咸阳市居住的瑶族 18 人,分散在境内兴平市、秦都区、杨陵区和乾县 4 个县区。

土族 咸阳市有土族 12 人,插花居住在秦都区、渭城区和三原县境内。

布依族 咸阳市有布依族 9 人,插花居住在秦都、渭城、杨陵三个区的城镇。

仡佬族 咸阳市有仡佬族 9 人,居住在秦都区和渭城区。

佤族 咸阳市有佤族 7 人,居住在渭城区。

纳西族 居住在咸阳市的纳西族 7 人,分居秦都区、杨陵区和三原县。

俄罗斯族 咸阳市居住的有 6 名俄罗斯族,大多是境内工厂、事业单位的职工。

- 傣族 4人 居住在秦都、渭城区。
黎族 1人 居住在三原县。
哈尼族 1人 居住在兴平市。
畲族 2人 居住在秦都区。
柯尔克孜族 1人 居住在杨陵区。
高山族 4人 居住在秦都区。
撒拉族 2人 居住在兴平市。
门巴族 2人 居住西藏民族学院。

此外还有未识别民族身份的6人居住在秦都、渭城、杨陵三区 and 兴平市。外国人加入中国籍后,定居于市区的有2人。

第二章 宗 教

宗教在咸阳有悠久的历史。明代以前,境内汉族多信佛教或道教,回族信奉伊斯兰教。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境内。1840年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和基督教遍及各县,外国传教士纷至沓来。1931年,梵蒂冈在三原县城设立三原教府,建起了当时关中最高最大的教堂。天主教和基督教相继成为境内信徒较多、影响较大的宗教。

建国后,天主教、基督教界驱逐了敌视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罗马教廷代理人,割断了与帝国主义势力的联系;佛教、道教废除了寺院的封建剥削和特权压迫,僧、道自食其力;伊斯兰教摆脱了民族不平等的枷锁,恢复和新建了咸阳、兴平、三原、礼泉、长武等地清真寺,从而开展了正常的宗教活动。

“文化大革命”中,境内所有宗教被迫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平反了冤、假、错案,归还了教堂、寺观等宗教财产,恢复了宗教活动。据1994年统计,境内天主教有教堂47处,会所11处,主教1人,神甫22人,修女47人,修士28人,信徒34055人。基督教活动点91处,牧师6人,长老89人,传道员73人,慕道3830人,信教群众28135人。佛教有寺院16处,和尚66人,尼姑103人。道教宫观8处,道士13人。伊斯兰教清真寺7处,阿訇8人,满拉1人,穆斯林6402人。

第一节 天主教

一、传教活动

明万历年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在北京传教。泾阳人王徵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借进京应试之机会见了庞神甫,并接受了天主教洗礼,圣名斐理伯,成为陕西省第一位天主教教徒,时已45岁。天启五年(1625)王徵司理广平时,因丁母忧回籍,邀请在山西绛州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来陕,为其全家举行入教洗礼。金尼阁为咸阳境内第一位天主教传教士,王徵家则成为咸阳市境第一个天主教家庭,其所创“崇一堂”为咸阳市境第一座天主教堂,并曾做过关西主教堂。不久,金尼阁又会同神甫汤若望(德国人)于三原北城建堂一座。当时受洗入教者约有200名。入教名流除王徵外,尚有三原北城蒋姓某大员,吏部尚书张问达之子张敬一秀才(圣名保禄)等。从1625—1700年,德、法、意、比利时等国耶稣会传教士相继来传教者共10人,较有名者还有杜奥定、方德望、南怀仁等,他们多驻足三原北城或鲁桥天主堂,兼管全省教务。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后,天主教长驱直入中国内地各省。那时,传教活动和开拓教会堂点的路线有:(一)通远坊—泾阳—修石渡—咸阳—兴平—武功—西府。(二)通远坊—三原—礼泉—乾县—永寿—彬县—长武。境内各县会口大都在道光咸丰年间正式建立。泾阳城内的原林桂巷教堂,创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兴平县的坡头、陈文、五帮村和武功县的桃园庄、北营、普集镇等地教堂均于清道光、咸丰年间相继创立。礼泉县的茨林村、云里坊和乾县的马连村等地教堂也于这时由通远坊遣往西北一路的神甫所创建。

1917年,意大利人希贤主教由山西太原调来陕西关中教区时,带来了国籍神甫王道南,并派其在西北各县开拓教务。王由通远坊到旬邑、永寿、彬县、长武等地传教,最后落脚于彬县城内。

1931年11月1日,梵蒂冈划分西安总教区为西安、三原、周至、凤翔和大荔5个教区。又划三原教区归意大利威尼斯省方济各会士传教范围,设三原主教府,下属高陵、富平、泾阳、耀县、铜川、淳化、旬邑、长武、彬县、永寿、乾县、礼泉和咸阳等13个县。第一任主教为意大利威尼斯人班锡宜(1897—1986)。兴平、武功县则划归周至教区,属国籍教区,第一任主教为高正一。

建国初,咸阳境内天主教信徒总数约14000余人,其中人数最多的县为武

功,约4000多人,三原3000多人,兴平2000人,泾阳1000多人,咸阳500人,淳化200多人,彬县100多人。

从1932年到1949年17年间,先后到三原教区的外国传教士有16人,加上原有的主教班锡宜等4人共20人。到解放前夕,留下来的仅余7人。

建国后,梵蒂冈向中国天主教发来指令,谓“有神无神势不两立”、“爱国爱教有矛盾”等,不许中国天主教神长教民拥护共产党,不许阅读共产党的书报,不许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和活动等。这些指令激起了中国天主教爱国神长和教民的愤慨和反对。1950年11月四川广元县神甫王良佑和500名教民签名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咸阳市各县天主教会相继响应这一倡议,成立了“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委员会。三原爱国会带领爱国教徒坚决拥护政府,于1951年秋接管了三原益华小学,又于1953年秋将班锡宜和谢霖嘉驱逐出境,推举王秉德为三原教区代理主教。接着,三原教区神哲学院由通远坊迁进三原县辕门巷总堂。1956年,推选任志平为三原教区代理主教,同时正式成立了三原教区天主教爱国会,任志平任主任。当时教区总堂常住神甫,还有宗怀德、窦匀哲、韩锦堂,一方面任教神哲学院,一方面管理教务;武官坊的本堂神甫为李进义,桃李村为刘登席,张二册为韩文潮,泾阳、咸阳为蓝石、张刚毅,礼泉为蓝哲一,乾县为韩继光,兴平有神甫2人。1960年春,神哲学院解散。1966年后,咸阳各地教会完全停止了宗教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县区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的有关问题,先后给三原任志平、窦匀哲、宗怀德、刘登席,泾阳的蓝石,礼泉的蓝哲一,乾县的韩继先,兴平的吴潜,武功的李敦化等神职人员的冤假错案平了反。全市各县从1982年起相继开放了一批教堂和场所,三原县有武官坊、桃李村、张二册等12处;泾阳县修石渡、大训堡和王孟村3处;咸阳有渭城区穆家沟1处;兴平批准开放了五帮村、坡头、陈文村、来祁寨等16处;武功有桃园、北营、普集镇等9处;礼泉有茨林村、方家、魏村等5处。

陕西省天主教爱国会在省宗教局的支持、帮助下,经过充分协商,于1993年按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了教区,原三原教区改为咸阳教区,原周至教区所辖兴平、武功、杨陵划归咸阳教区,并代管铜川市的教务;而原三原所辖的富平、高陵,则分别划归渭南和西安教区。教区总堂设在三原辕门巷天主堂,主教为宗怀德。

全市各地会口都安排了本堂神甫,三原有5位神甫主持各大会口,泾阳、市区共有3人,兴平3人,武功4人,礼泉3人,乾县1人。武功教徒最多,超过

10000人,次为三原约7200余人,兴平5923人,泾阳3369人,礼泉超过3000人。天主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并抵制了境外宗教敌对势力的控制和渗透,走上了自办教会事业的道路。

二、教堂

三原鲁桥镇·北城教堂 三原鲁桥镇教堂始于1625年,是咸阳境内的第一座教堂。教堂四椽六间,以八根木柱分为正厅和两侧廊。院前设大门,门内两廊厢房,后院有中式后楼五间,西园内设置观象台。此堂300多年来称鲁桥北堂,原址在鲁桥城内贡家巷。北堂对门还有一大院,20余间房屋,称为南堂。稍后不久,金尼阁和汤若望又曾在三原县北城建堂一所,后经清康、雍、乾各帝禁教而改为东岳庙。

三原辕门巷教区总堂 为三原教区主教府驻地。1935年开工修建,1940年建成。计教堂面积为666平方米,堂面计高33米,长45米,宽18.3米。大堂建筑仿罗马宫殿模式,故称“罗马式”,又称“巴西利卡”(宫殿),最大的特征为长方形式,主厅两侧被罗马风格的圆柱分隔成中厅与侧廊(又名耳堂),中厅分两层,共高15米,各以八面圆形拱门和顶圆柱撑托。中厅末端为弥撒间,为一半圆形和大圆穹窿建筑,称圆形拱壁——回声壁,形同星夜大宇宙之穹空,非常壮观,总建筑风格浑圆雄伟。堂奉耶稣圣心为主保,名耶稣圣心堂。大堂南墙外还附建一授洗小堂,北墙外建有更夜所和钟楼,均有门相通。建造大堂的同时,又于其北侧修建三层楼一座,为主教办公楼。总计教堂与所属堂院共占地6亩6分。后教堂和大楼均毁于火灾。1990年重建。堂面镶嵌于右任手书“天主堂”石匾一方。1993年按行政区域重新划分教区,三原教区改称咸阳教区,三原辕门巷总堂定为咸阳教区总堂。

武官坊安多尼堂 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山东省教民移来后,教民数字猛增至800余,遂于1940年起在老城另建大教堂一座,1949年落成,堂奉安多尼圣人为主保。建筑风格大致采取古罗马式,“文化大革命”中被查封。1982年,教堂重新开放后,于1989年进行了重修,堂面换建为“哥特式”,附设音乐楼。堂高27米,长41米,宽12.5米,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堂内分正厅和侧廊,以两排18根石圆柱拱门撑托;最后部为祭台间,以大拱门和正厅相连。堂内有圆形石雕圣水缸,高约1米多,直径半米,刻有人物禽兽花卉纹饰,乃清代文物。教民约3000人左右,兼管附近的曹师凹、大李村、吴家堡等,教民总数约达4000人之多,属咸阳市最大的一个会口。

泾阳县修石渡圣母无染原罪堂 明末清初,修石渡教徒开始在一荆姓教民家中祈祷望弥撒,数十年后始在东城外建造了一座三间教堂。直到20世纪初期,教民已增到200多,由扶风人侯姓神甫设计建古罗马式教堂一座,共5间,堂面计高20余米。教堂于“文化大革命”中拆毁。

1983年落实教产时,经县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划给该教会地面5亩,教民开始筹集资金,于1991年建成了一座现代化大教堂,奉无染原罪圣母为主保,并以之称堂。教堂建筑占地872平方米,门厅五间三层,上建圆拱顶钟楼,正中高竖红十字架,楼顶正中为耶稣塑像,两侧为圣保罗和圣伯多禄像;教堂长10间,可容千余人;堂周围还建有神甫住房、门房等其他建筑。修石渡会口共有教民1100余人。

兴平县五帮村天主堂 1900年始建,1982年重新开放,第二年经批准重建。教堂建筑面积为660平方米,乃兴平县最大的一座教堂。堂院共占地3亩,共有房屋59间。教民1100余人。

武功县桃园村无染原罪圣母堂 桃园村天主教堂始建于清光绪二年(1876),共8间,占地面积约4600多平方米,还建有神甫住房等共19间。1983年重建,奉无染原罪圣母为主保。教堂共19间,还附建楼房和大房各3间,堂院共占地2亩2分。教民共计2600余人。

武功县普中村教堂 始建于清光绪年间,1987年重建,建筑面积为240平方米,堂院占地1.5亩,共有房屋20间。教民共计2400余人。

武功县营南村无染原罪圣母堂 始建于清光绪年间,1986年重建,建筑面积为180平方米,堂院占地1亩,教民共计2000余人。

三、修道院

修士院 高陵通远坊圣心修士院神学哲学班于1953年冬迁至三原辕门巷总堂内,称神哲学院,由王秉德代理主教任院长,任志平、窦匀哲神甫任教授。1956年院长改由任志平代理主教担任。到1960年停办,学院撤销。

1983年3月武官坊本堂神甫宋锡铎再次筹办起修士院,设在武官坊教堂内,于1985年9月迁至青杨村天主堂内,由余志毅负责院事。1989年7月,又迁回通远坊内。在三原,曾先后培训修士40余人,已先后有11人被祝圣为神甫,第一批2人是礼泉的陈振民和泾阳的张强华,并有一部分修士转入陕西或上海神哲学院继续深造。

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 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简称圣母会,俗称

白衣修女(会服为白色)。1899年传入三原东关油坊道。院内常住修女20人左右,第一任院长汉语名为若忍娜,意大利人,初到后即着手置地设院,于门前开建小教堂一座,办起了“玫瑰医院”。民国十八年(1929)饥馑时,华洋义赈会在该院开办了“舍饭场”,同时,又办起了孤儿院和纺纱织布、刺绣等职业学校。1945年后又在该院东边购地10余亩,筹划修建一座现代化医院。1954年,在咸阳青杨村教堂内建立分院,常住修女4—5人。1966年两处修女院停办,修女遣散回乡。1983年后,圣母会相继在三原东关油坊道神甫院南侧建立了一小型修女院,常住修女3人;青杨村修女院恢复,并在三原桃李村设立了分院。

方济各第三耶稣圣心传教会 方济各第三耶稣圣心传教会,简称圣心会,俗称黑衣会(会服为黑色),原国籍修女会。1923年创立于高陵县通远坊,1929年在三原武官坊老城建立了分会,第一任院长为三原大程人袁玉峰,常住修女5—6人,附设望会院,收望会生十余人,以培训有志修道的女青年。院内附设“安多诊疗所”,眼、儿两科为其专长。

1956年后修女或参加当地农业社为社员,或遣散回原籍。1984年将原修女院归还圣心会。1989年重新建一幢二层楼房,院长为解爱莲,三原新庄解家村人。附设的望会院从1987年后已有百余人被推荐到通远坊保守院弃俗修道。该院恢复了诊疗所,并办有缝纫、刺绣等事业。

圣心会又先后在桃李村、庙张村成立了修女院,有修女3—5人,并附设医院、诊疗所等。圣母会和圣心会在泾阳、礼泉、兴平、武功各地教堂也分别成立了修道院,住修女3—5人。

第二节 基督教

一、传教活动

光绪十六年(1890),基督教内地会系瑞华会,来三原阎家滩村和渭北一带传教,于光绪三十年(1904)移交后来的英浸礼会,转去合阳。

同治年间渭北战乱和自然灾害严重,三原县人户大减,田地荒芜。光绪十五年(1889),知县焦云龙闻知故乡山东青州一带人民灾荒难熬,便报请清廷批准移灾民到三原垦荒兴农。移民中多有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开发新村,建堂礼拜,为新村定名“福音”、“太和”等,移民中的贫寒神学生彭思温、张同道、刘丹芝、聂凌汉等有较深的神学造诣,一时信教群众遍及许多村庄。后来,经

由孙汉卿、刘丹芝、王源、孙香圃、聂鸿儒、郑有能等联络,函请山东青州英浸礼会派人来陕主持教务。

光绪十七年(1891),英浸礼会在山西主持教务的李提摩太,先后就近派英国传教士邵涤源和敦崇礼、莫安仁等从太原到三原福音村建立传教基地。

20世纪初期,陕西英浸礼会(实际已以中国教牧人员为主流),除在西安设立差会办事处外,全省设立5个公会,其荆南公会驻在三原县福音村,池阳公会驻在三原县城救世堂。

泾阳县于清末受三原影响,早有山东移民定居永乐、仁和及泾三交错地带,信教群众日渐增多。泾阳城关二条街教会,已有百年历史,最早的传教人为谢生智和其叔父及一位薛长老。早期在泾阳的仁和村也有教会建立。

兴平县 在光绪十九年(1893)即有外国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

咸阳市区 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以后,由兴平协同会牧师黄永昌来此讲道传教。

乾县 从光绪二十年(1894)起,有瑞典人博牧师、杨志胜牧师、淡牧师和马莲花牧师先后到乾县建南、北二堂主持教务。

永寿县 光绪二十年(1894),乾县教会派人设立永寿支会。

彬县 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美国人聂礼逊、聂德道父子传教。

武功县 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有瑞典牧师参玉兰、德玉桃和美国传教士庄训吾等先后传教、建堂。

长武县 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有丹麦国传教士杨铭新传教。

礼泉县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就由内地会系协同会设站,建堂传教。

1911年到1919年,中国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腐朽的清朝政府,成果却很快被北洋军阀所篡夺。五四运动虽已吹响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号角,但军阀割据,仍不能抵御殖民势力的侵入,基督教这时也在中国得以广传。其时进入市境的还有安息日会、安立甘会(圣公会)、循理会等。抗日战争中,又有小群会、真耶稣教会、耶稣家庭灵恩会、自立会、青年会等在三原、泾阳、兴平、礼泉、咸阳等县,设点传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基督教为西方差会控制的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1950年,以吴耀宗先生为团长的中国基督教访问团在西安召开西北基督教会负责人会议,咸阳李博爱、张文化、王怀仁、李鸿轩、李淑婉等基督教负责人出席会议。代表们一致拥护《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

言”)。不久,咸阳原协同会基督教会成立了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牧师李博爱被选为主任;泾阳县原中华基督教会也成立了该县三自爱国组织。

1951年,全国基督教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咸阳的协同会和中华基督教渭北区会领导基督教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与美国协同差会和英国浸礼差会有关的兴平、咸阳、乾县、永寿、彬县、武功、礼泉、三原等县调整教会机构,开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割断与差会的经济关系,清理差会财产。在三原县的中华基督教渭北区会,支持其陕西大会在三原召开常委会,将陕西大会改组为理、监事制,开展了和英差会的斗争。经十多次谈判、斗争,终于在1951年2月12日接收了英浸礼会差会在西安、渭北等地的全部房地产权。当年4月上旬,又召开第七次理、监事会议,通过决议,于4月12日起断绝与差会的一切经济关系。5月上旬又召开第八次理、监事会议,作出决定:英差会一切留陕人员(在三原有英国传教士德尔立夫妇),限于5月16日一律停止宣教工作,所有各县教会的宗教和文教卫生部门的工作和职务,全部移交中国教徒担任。7月17日,三原县基督教教牧人员张文化、李鸿轩、王怀仁、李淑婉等与十多人赴西安参加代表会议,之后,开展了反帝爱国工作。

1958年,境内各县基督教选派代表参加了陕西省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省、市联合的基督教领导机构——西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代表会议决定实行联合礼拜。从此,结束了基督教宗派林立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基督教各派在互相尊重信仰和礼仪基础上的合一,在基督教史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自此,咸阳市基督教改变了差会时期的格局,实现了以行政区划为范围的合理格局。设立于三原县的原中华基督教渭北区会,实际上成了教务管理机构,由王怀仁、张冠儒主持教务。1960年宗教制度改革后,三原县(含泾阳、高陵)只保留高陵、泾阳、三原、福音村四处教堂,原协同会所属各县基督教会也改变了跨市区、跨县境的教会组织关系,实行本县堂、点领导体制。

境内各地教会在实现自治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自养途径。各地不少教牧人员,积极参加社会劳动,兼办教务。有的自办宗教企业,广开教会自养的经济门路。1958年,三原县基督教人员开发的龙桥牌炼乳,成为省优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三原县基督教的炼乳厂,还安排了天主教、伊斯兰教的职业人员参加劳动,自食其力,至今渭北一部分教牧人员还领取职工退休金。1962年各县派出代表,参加了陕西省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

1966年基督教被迫停止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咸阳市从1980年开始,允许基督教界人士重新主持教务,恢复开放各地基督教活动场所,认真落实基督教财产,许可一些简易活动点的存在,为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供了物质基础。

1983年,在陕西省基督教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将省市(西安市)合一的“西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更名为“陕西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并且成立了“陕西省基督教协会”,三原教会牧师王怀仁、张冠儒,兴平杨达夫等选入领导班子,三原县基督教会的王怀仁牧师任省两会副主席、副会长兼秘书长。

1981年,兴平县率先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杨达夫牧师任主任,李仲寅牧师为副主任。1983年三原县基督教召开了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三原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三原县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张冠儒牧师为主任。1984年永寿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王天佑任主任。1986年武功县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李梓芳任主任。1987年杨陵区在张家岗村建立了三自爱国会筹备小组。1988年礼泉县在1963年首届三自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二届三自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组成了以刘子平为主任的七人委员会。乾县基督教会在1953年革新后,成立了三自革新会和基协。1983年恢复宗教活动后,按立王志贤为牧师,同时按立长老18名,分别主持12个支会的教务。泾阳县于1982年落实宗教政策以来,先后由白素梅、武大卫、王清文筹建本县基督教管理和教务组织。1991年1月10日,正式成立了泾阳县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教务委员会。

1984年底咸阳市召开了基督教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咸阳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张冠儒牧师为主任,薛经惠牧师为副主任兼秘书长。自此,全市基督教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

二、教堂

三原县东关基督教堂(原称救世堂)位于三原县东关油坊道,始建于1915年。教堂面积约300多平方米,其附属建筑中有中式古建楼房两座和瓦房100多间。教堂上雕刻着反映基督教教义的浮雕、字画,形态各异,造型精美,堂面南北两座对称的钟楼,托起矗入高空的尖顶,上面装有十字架。教堂结构严谨,格调和谐。三原教堂,历来是陕西神学教育的重要基地。1949年这里曾经开办过“妇女道学班”、“关中道学院”。改革开放后,陕西省在这里办了

六期教牧人员培训班,召开研讨会两次,泾阳、三原、高陵合办培训班一期,陕西圣经学校已在这里办了第三期。从1985年起在三原东关教堂曾29次接待国外、境外宗教团组和个人的访问、参观和讲学。1993年4月台湾山地歌舞团在三原东关堂与陕西圣经学校及三原教会进行文化交流,同台演唱,庆祝复活节。三原东关基督教堂在建筑艺术上,具有文物保护价值,在国内外也较有影响。

三原县福音村基督教堂 创建于光绪十七年(1891),扩建于1921年。1988年再次重修和扩建,其建筑风格和三原县东关堂如出一辙。该堂是英浸礼会来陕的第一站,曾开办学校。光绪二十六年(1900)该堂组织华人布道会,北向延安布道,本世纪20年代是英浸礼会荆南公会会址,在国内外知名度比较高。

三原县荣和堂 光绪十六年(1890)内地会系瑞华会即在此建堂宣教,之后几经改建,于1993年仿三原东关堂在原址重建,面积300平方米左右。

三原县的西阳镇安乐村、西王堡等地也重新修建和改建自己的教堂,不论建筑形式和容量,都与东关堂略同,能满足500—600人聚会礼拜。三原县境内,有礼拜堂16座,名称如下:东关堂、福音堂、太和堂、西王堡堂、西阳堂、清凉寺村堂、赵曲刘堂、大村王堂、山西庄堂、安乐堂、上朱村堂、荣和堂、上马堂、贺家堡堂、新兴镇堂、福音村安息日堂。

泾阳县城关堂 位于县城四明巷,1985年由10间民房改作教堂,有信徒300多人。

泾阳县仁和堂 位于云阳镇仁和村,有房6间,1938年建堂,1990年重建。信徒400人,以堂带蒋路、徐家两个点。

泾阳县永乐堂 位于永乐店北街,1929年兴建,1983年整修。

泾阳县桥底堂 位于桥底镇东沟村,40年代末,由礼泉县北屯堂在桥底建堂,1964年被拆毁,1990年建成简易堂,有信徒700人。

泾阳县阜下堂 40年代由永乐堂分出建堂。于1989年新买库房四间改修教堂,现有信徒400余人。该堂有部分信徒随真耶稣教聚会。

兴平市槐巷教堂 位于城内东街。清光绪六年(1880)创建,1982年重新开放,1987年重建,占地756平方米,房屋42间,曾开办女圣经学校。

兴平市店张堂 位于店张镇西兰公路旁,1934年创建,1983年开放。1990年重建,占地1亩,房屋11间。

兴平市定周堂 位于南位乡定周村,创建于1930年,1988年开放,占地

1800平方米,房屋12间。

兴平市豆马堂 位于西吴乡豆马村,1948年创建,1983年开放,占地321平方米,房屋12间。

兴平市符家堂 位于西吴乡符家村,1955年创建,1983年开放,占地1亩,房屋11间。

兴平市温坊堂 位于赵村乡西温阳坊村,1947年创建,1983年开放,1993年重建,占地0.5亩,房屋12间。

兴平市北金家堂 位于庄头乡北金家村,1909年创建,1988年开放,占地1000平方米,房屋24间。

兴平市花王堂 位于庄头乡花王村,1912年创建,1982年开放,1987年重建,占地1亩,房9间。

兴平市白家岭堂 位于庄头乡白家岭村,1943年创建,1983年开放,1985年重建,占地732平方米,房屋9间。

兴平市金郭寨堂 位于丰仪乡金郭寨,1934年创建,1983年开放,1989年重建,占地1600平方米,房屋17间。

兴平市桑镇堂 位于桑镇双山村,1919年创建,1988年开放,1992年重建,占地1300平方米,窑洞5孔。

兴平市西桑园堂 位于赵村乡,1922年创建,1982年开放,1984年重建,占地667平方米,房屋11间。

兴平市马嵬堂 位于马嵬镇,1919年创建,1983年开放。

永寿县监军镇西村教堂 有房13间。

永寿县仪井乡王家嘴教堂 有房屋3间。

武功县武功镇教堂 1920年创建,1991年重建,占地约0.5亩,信徒多达250人。

武功县镇东教堂 位于长宁镇东村,有教堂5间,占地1.6亩,有信徒250人。

武功县许家教堂 位于大庄乡许家村,有教堂4间,信徒180人。

礼泉县东关教堂 位于城东北郊,创建于1911年,占地3亩,信徒197人。活动点有:北屯二村教点,创建于1911年,占地1亩,有房4间,信徒105人。

礼泉县南坊镇北峰村教堂 占地1亩,有土窑5孔,创建于1920年,有信徒79人。

长武县城内福音堂 1914年修建,占地2.4亩,房屋36间,现在指定场所

作宗教活动。亭口镇原设立支堂。

彬县城内福音堂 城内菩萨巷原有福音堂,在永乐乡龙渊村也曾设立福音堂。

渭城区谷家巷福音堂 创建于1890年,占地2975平方米,1987年开放,咸阳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今在堂内办公。

渭城区圣保罗堂 位于中山街。该堂及一院房屋落实交回后,作为商业房出租,供教会自养。

秦都区安谷教堂 位于沔西乡。

三、教会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1915年上海安息日会《时兆月报》馆、河南书报员吴廷相来陕,在潼关与三原县福音村浸礼会牧师刘丹芝相识。刘引吴在三原大程、福音等地传布安息道理。1916年,经刘丹芝派谭传温去河南联络美国安息日会牧师史列民、李宏贵二人到三原县福音村和阎良区的谭家堡设立安息日教会,开办小学。1917年8月,美国安息日会牧师怀德按立三原福音村安息日教会刘云台、刘怀经为长老,信徒由26人发展到50多人。1919年,怀德牧师经三原县福音村入西安市成立安息日会,并在兴平县建立安息日会教会。

安立甘会(又名圣公会) 1935年,在陕西中华圣公会主教沈子高任期中,在咸阳市区圣保罗堂创建,早期会长为陈德恒,信徒约百人。圣公会于1912年在上海成立总会,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陕西中华圣公会传道区和咸阳圣保罗堂是惟一没有外国传教士的差会教会。

循理会(属于卫理宗,又称卫理公会或循道会) 1847年由美国传入中国,1940年入陕,1941年由牧师王锡岐、传教士翟桂珍负责在武功车站南街12号租房3间设立教会。

基督教徒聚会处(又称小群会) 1945年,武功刘信纯在农学院有小群派聚会。焦尚信、邱关园曾在西北工学院助教宿舍举行小群派聚会。

真耶稣教会 1938年,该会信徒来西安等地,后在咸阳市区、礼泉县、泾阳县等地设立教会。

耶稣家庭 在咸阳、三原等地曾经建“家”。耶稣家庭,注重“灵恩”,变卖所有,凡物公用,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由山东泰安县人敬奠瀛与其同工所创办,山东马庄设立总会称为“老家”。1935年裴丙麟(家庭的二号人物)、刘云堂等经商洛龙驹寨到眉县教坊建立“耶稣家庭”,称为西北老家。后在咸阳、泾

阳、三原等县地也曾建“家”。在三原县山西庄,曾由杨惠茹捐地,田万竿主持建立“家庭”。这些“家庭”都同眉县及山东“老家”保持密切关系。

灵恩会 亦称灵恩运动,曾以泾阳永乐店为西北中心基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基督教灵修院《灵光》报的牧师朱仲玉和神学院的神学生、牧师朱昆玉、王光达等逃难来陕定居。在泾阳、三原一带自由传教。基督教西北农工改进会在永乐店创建后,朱仲玉被聘为该会宣教部牧师,之后又在永乐店建立教会,成为西北灵恩派基地。王光达在三原南关、西王堡建立灵恩教会,并行游旬邑,远去汉中。

中华基督教协同会陕甘委员会 清末,境内各县的内地会系协同会改组为中华基督教协同会陕甘委员会。1927年7月,陕甘各县教会派出代表,在兴平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协同会陕甘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美国差会组织闻声派人潜回西安,分化中国教牧人员。直到1949年解放后,这个委员会才在各县真正履行自己的领导权力。

中华基督教会 1933年,中华基督教总会陕西大会下属西京、渭北、陕西三个区会。渭北区会设在三原县基督教堂。区会管辖三原、泾阳、高陵、临潼、富平、耀县、同官等县13个堂会,89个支会,信徒3000余人。在三原境内有县城东关和福音村、安乐村、荣和村、上马村5个堂会,下设支会20多处,信徒千余人。

第三节 佛 教

一、传教活动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境内秦都、渭城两区,兴平市、泾阳、三原、永寿、淳化、彬县、长武、旬邑等县,都发现和存有北魏、西魏、北周时的佛教造像石,彬县大佛寺石窟内有北魏摩崖石像。佛教在咸阳地区传播至少有1600余年。

隋、唐两代是境内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境内佛寺林立,兰若、招提丛生。重要佛寺有:隋文帝杨坚为其母在泾阳修建的太壶寺,唐天宝年间改名中兴寺,与长安青龙寺同为讲经胜地。唐太宗李世民在豳州为其母修建的庆寿寺(今名大佛寺)。以李世民出生地武功庆善宫改建的慈德寺。窦太后母弟忍辱和最师在咸阳修建的最师控寺和义乡控寺。武则天时为安排宫女在咸阳修建

的德业寺,在这里出家的宫女,死后均赠以“七品亡尼”。此外,还有位于今三原境内的庆善寺、云寂寺、观音寺、万善寺,兴平境内的千福寺,泾阳境内的宝泉寺、振錫寺,武功县境内的广元寺、昭光寺等官办佛寺。此外,还有数不清的民办小佛寺,名曰兰若或招提。这些小佛寺数量虽多,但无遗迹可寻。1980年,淳化县一唐墓出土了墓志型的一块石刻兰若遗记。此兰若名神隄兰若,刻于元和五年(810)(《淳化县文物志》称其为“道广恭毗遗记”),填补了境内唐代佛寺的一大空缺。

随着佛寺的普遍建立,佛经也广为流传。今存秦都、永寿、淳化的三通经幢保存比较完整。幢面由罽宾沙门佛陀波利翻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字迹比较完整。1981年在淳化金川湾发现的石窟中,窟壁刻满了约10万字的经文。可见的有《七阶佛名经》、《佛说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妙法莲花经》、《如来示教胜军王经》、《佛说大方广十轮经序品》等唐刻精品。

宋金时期,咸阳佛教发展趋缓。明清时期,各县佛教寺院,有的重修,有的扩建。洪武初年,三原县建洪福寺,正统年间建招庆寺,景泰年间建南观音寺,弘治年间建文峰寺,万历年间建金山寺。弘治九年(1496),修葺了唐时所建的三原县普觉禅寺,泾阳县龙泉寺、文塔寺。另外,泾阳的太壺寺、振錫寺、宝泉寺均于明时重修。彬县大佛寺于明正统十三年(1448)、嘉靖二十年(1541)两次重修,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道光二十四年(1844)、光绪元年(1875)三次重修。清顺治年间,三原县重修了金山寺,康熙年间重修了庆善寺、积庆寺、木塔寺。光绪六年(1880)永寿县重修了云寂寺,光绪九年(1883)重修盘龙寺,光绪十年(1884)重修香山寺。

民国以来,因战乱频仍,寺院经济不足,佛教界后继乏人,不少寺院非毁即废,名存实亡。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境内佛教寺院所存无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制定和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佛教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土地改革和宗教民主改革,废除了寺院的封建地租剥削和封建特权压迫,广大僧尼逐渐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不少佛教代表人士分别担任了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一些年久失修或被战火所焚毁的寺院,由人民政府拨款进行了维修。有些寺院还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佛教爱国团体被迫停止活动,不少佛教寺庙被拆除,有的被改作他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重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宗教

界的冤假错案平反,恢复开放了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逐步走上了正常轨道。一些县区先后成立了佛教协会及佛教小组,还开放了一些大的寺院。同时建立健全了民主管理机构,恢复了传统的住持制度,制定了学习、佛事、收徒、挂单等规章制度。对年轻一代僧众,除送一批有文化、爱国守法的到中国佛学院深造外,还举办僧伽培训班。

二、寺院

彬县大佛寺 大佛寺位于彬县城西 10 公里,原名庆寿寺,在泾河南岸,清凉山南麓石崖下,依山开凿造像。除唐贞观二年(628)的大佛窟造像外,其他石佛造像多属北朝时期修建。大佛寺驰名中外,州、县志均有记载。现存明《邠州志》载:庆寿寺,在州西二十里路旁,唐贞观二年建像。坐石崖下,高十丈许。座后出泉,前护层楼。俗名大佛寺,雄伟壮丽,关中一大奇观。

明《邠州志》记载,正统十三年(1448)重修,嘉靖二十三年(1544)重修。据清代《重修邠州大佛寺记》、《直隶邠州志》记载,清代大的重修有 3 次:康熙四十二年(1703)一月由陕西抚宪鄂山布政司督理粮盐道参政黄明和邠州知州王世爵主持重修;光绪元年(1875)四月由统领淮军刘咸藻和邠州知州吴钦曾等主持重修;道光二十四年(1844)二月,这次只修葺了菩萨殿。三次重修都有碑石记载。1947 年重修时,将所有小造像改为石胎泥塑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两次拨款,对西道院、护楼、千佛洞等进行修缮。

彬县还有倒流寺、云岩寺。

泾阳县振锡寺 振锡寺位于泾阳县北嵯峨山二台顶。清雍正年《泾阳县志》载,寺创建于唐元和七年(812)。现寺内存有明嘉靖二十年(1541)重修悟空禅师塔一座;残破红沙石坐佛一尊(光头、敞胸,似为弥勒佛或是悟空禅师像);铭文石一个;并有残断石刻文字,以及残断石墙、石柱。西侧的三台顶上有残碑一块。

悟空禅师塔为砖石结构,密檐楼阁式。每层青砖叠涩出檐,并仿木构件作单拱,一斗三升。塔为六棱柱体,以黄土实其心,共 5 层,高 13.5 米。据寺内石鼓铭文载,该塔为唐大中十四年(860)八月三十日建,内藏悟空禅师灵骨。明时,其塔倾颓,惟有灵骨存在,明嘉靖二十年(1541)三月,僧人如通等重建此塔,复记悟空之行状。

泾阳县还有太壶(kūn)寺、清凉寺、正觉寺、文塔寺等。

三原县文峰寺 文峰寺又名木塔寺。位于县城东南 7 公里处的中王堡。

建于明弘治元年(1488),万历三十四年(1606)工部尚书温纯捐俸倡修,建佛殿四楹,木塔一座。清康熙十九年(1680)住持僧如幻又多方募化进行了重修。寺院占地30余亩,建有大殿、钟鼓楼、乐楼,还有造型独特的木塔直立寺中。终因年久,墙倒屋倾,殿楼焚于兵乱,碑石毁于樵牧,木塔也倾斜不堪。寺僧散亡,游人杳无。1940年寺院经维修后,改作学校。

1981年县人民政府将文峰寺内学校迁出,并设立了文管所,辟为旅游胜地。木塔乃经重修,彩绘一新,再现古时风采。木塔3层,六边挑檐,塔身高20米,塔顶呈六角攒顶,远望似亭阁。塔基高4米,铺设砖阶通道,塔内可沿木梯登高极目,北望嵯峨山峰,气势雄伟;南眺八百里秦川,辽阔无垠,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三原县还曾有藏梅寺、庆善寺、西观音禅寺、清凉寺等。

永寿县佛爷沟寺 佛爷沟寺位于永寿县渠子乡去坊村慢坡沟底,建于明代。清嘉庆二年(1797)又建菩萨大殿及戏楼。佛爷沟寺,景色迷人,寺在沟底,南北两山树木成林,花香鸟语,顺沟东北而行,泾水滔滔。石佛莲台下有一清泉,经专家化验,为优质矿泉水。

1987年,释本义法师四处募化13万余元,重建佛爷沟寺。现建大雄宝殿3间,塑佛像10尊,建僧房8间,在石佛洞前建靠山亭3间,在亭南侧建砖窑两层,寺内立“重修佛爷沟寺”石碑一座。

永寿县还有云寂寺、盘龙寺、香山寺、大力寺等。

武功县石佛寺 石佛寺坐落在武功县南仁乡,面积30亩,始建于北周。寺院规模宏大,外貌奇特,佛像千姿百态。寺里有耕地180亩,常年出租。寺为十字形,坐北向南,寺背后有两级两坎,形成天然椅形,寺建在椅面上。由南进山门,内列四大天王,东西处有钟鼓楼,山门正北为头殿。殿正中,佛祖两边站立石佛身高1.8米,两壁列二十四天尊,前殿东西两边有伽蓝和药王殿各1间。头殿向北为中殿,殿内正中塑有三尊佛像,两旁列坐十八罗汉。中殿东边为白衣菩萨殿;西边为吉祥陀。中殿北为后殿,也称千佛殿。正中三尊大佛,内壁塑有千佛像,形态各异。寺内古柏参天,景色优美,山门外东南方有一塔林,面积4亩,内有舍利塔11座。山门西有戏楼,戏楼南50米处有一古槐,内虽已空,但枝繁叶茂,为一奇观。

武功县还有兴善寺、广元寺、清凉寺、月临寺、朱雀寺、宏法寺、广慈寺等。

长武县昭仁寺 昭仁寺位于县城东街,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寺内有唐碑一座,大雄宝殿3间,东西厢房6间。据《长武县志》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为悼

念洺水原战役阵亡之将士,并昭彰其战功而修建昭仁寺。从此,佛教在长武县兴旺起来。随着僧人、教徒的不断发展,先后在乡村修建了华阁寺、云德寺、云霄寺、清凉寺、潘家寺、回朝寺等。1953年昭仁、华阁、云德寺和泰鸿、泰元、义泰3个佛堂,共有和尚3人,居士51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活动终止。华阁、云霄寺已作他用。从1978年开始,昭仁寺由县文管所管理,供人们参观游览。寺内无僧人,有居士21名。

兴平县保宁寺 保宁寺位于兴平县西街,相传东汉明帝时蔡愔、秦景宪等人去大月氏取佛经返回时,在此地停留3日。后来地方官民为纪念佛教东传盛事,在此地建一佛寺,名曰“清梵寺”。唐时在寺内又建一座八棱七层砖塔和殿宇。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改为保宁寺。宋咸平二年(999)铸铜钟。宋天禧二年(1018)建浴室院。清末,寺渐衰落。民国时多驻军队,现县印刷厂设在塔南,塔东、塔北建成民宅。砖塔现为文物被保护。1986年由西安兴教寺派来二尼姑,法名释孔莲、释维灵,在塔下建3间佛殿,赵朴初题写的“清梵寺”匾额挂在殿前。1987年,正式批准为宗教活动点。

兴平县还有千福寺、弥勒寺等。

淳化县龙盘寺 龙盘寺位于淳化县西官庄乡席家村南5里的金牙山上。金牙山,西、南濒水,东临姜嫄河,北有走马岑一线之路,峭壁陡绝,孤峰高耸,秀丽奇特。据1984年10月金牙山金代窑藏出土宋金时期的木雕菩萨、罗汉和玉雕布袋和尚像,证明龙盘寺最迟建于宋代。玉雕布袋和尚像(现存龙盘寺),高95厘米,肩宽58厘米,座宽74厘米,喜笑、袒胸、乳肌突起下垂,右腿按地曲坐,左腿半支,跣足。

清道光七年(1827)《增修金牙山龙盘寺碑记》记载,龙盘寺有窑洞数10孔,佛殿3间,观音菩萨与无量祖师前后排列。后又建两座大殿,塑佛像23尊,建钟楼一座。后毁。

1955年龙盘寺住持释传利,由耀县香山寺来龙盘寺,僧侣5人,开荒种地十多亩,植松柏数十万株,栽果树八亩半,发展寺院经济。先后凿窑洞10孔,建僧房12间,大殿6间,塑佛像十余尊。

淳化县还有昌隆佛学院。

乾县铁佛寺 古名清凉寺,因建于清凉山而得名。后因火灾寺毁,迁建于山下今铁佛村东南隅。明万历年间,铸铁佛一尊,更名铁佛寺。民国年间,拆寺兴学,大部分殿宇被毁。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铁佛变为碎块,惟3尊铜佛像、水陆神像和36轴布缙子等存放在县文化馆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执行。铁佛寺被批准为开放寺院。在释正文法师的住持下,从1987年3月开始,建成大雄宝殿、伽蓝殿、祖师殿、韦驮殿、铁佛庙、斋堂、比丘宿舍、比丘尼宿舍,后殿厦房6间,山门外大石狮一对,钟、鼓楼各一座,总占地面积6.2亩。该寺有比丘6人,居士及周围信教群众200多人。

乾县还有中曲寺、方山寺、观音寺、兴国寺、弥陀寺等。

第四节 道 教

一、传教活动

境内道教的传播,起于北朝时期。《魏书·释老志》记:“扶风鲁祈,遭赫连子暴虐,避地寒山,教授弟子数百人。好方术,少嗜欲。”北魏时扶风郡治置于好畤。泾阳西北泾水出山处古称瓠口(谷口),又称寒门,鲁祈传道处,疑在此山。从各县(区)遗存的北朝造像石可以看出,当时境内信奉道教之风盛行。其特点是把道、佛两教合二为一,同时供奉。许多造像石上,既刻释迦牟尼像,又刻太上老君像。北周天和四年(569)的王迎男造像石(现藏咸阳博物馆内)就是如此。隋唐时,境内道教遗物较少。五代时,咸阳道士钟离权弃官修道,和隐于华山、终南一带的道士刘海蟾等人在内丹修炼方面多有建树,成为后代全真道尊崇的祖师。又有乾州人、普济大师张志清,长期活动于华山、太白一带,并在长安、扶风等地建有真大道宫观。

宋金时期,道教开始分衍宗派。金大定年间,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从此道教正式分为全真派和正一派。全真道士不饮酒茹荤,不娶家室,为出家道士;正一道士可饮酒食荤,可娶家室,为在家道士。王重阳早年为儒生,精通武术。曾在终南山筑墓穴居,自称居处为“活死人墓”,后出关传道。全真道以道教《道德经》、佛教《般若心经》和儒教《孝经》为经典,主张三教合一,通过“正心诚意,少私寡欲”的清修,达到克己、忍辱的超脱境界。王重阳死后,全真道尊其为祖。

元初,由于战争,各地宫观多有损坏,终南山祖庭灵虚观也化为灰烬。后在全真道士丘处机的努力下,全真道受到蒙古统治者的特殊礼遇,战争结束后,道教活动迅速恢复。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敕封王重阳为“全真开化真君”。在王重阳出生地咸阳县大魏村修建天圣宫。至元二十六年(1289)为王重

阳刻立《重阳王祖师仙迹记》。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又加封王重阳为“全真开化辅极帝君”。泰定三年(1326)全真道掌蓝道元因罪被黜,并诏“道士妻悉给徭役”,道教地位大降,走向消沉。

明清时期,正一道传入咸阳,各地广修城隍庙,大多为正一道士居住。民间与道教有关的祭祀活动泛滥,各地修建的三皇、五帝、城隍、火神、龙王、娘娘等庙达 87 类之多。

民国时期,道教进一步衰落,道教与民间信仰相互掺杂情况普遍。如长武县在 1905 年由马浩堂、司汉章、鱼仙源、曹士安倡导,设立了静修坛,1923 年改为悟醒宫。1933 年发起修建道德会募捐活动,历时一年,化募银洋 2115 元,在马寨村建成砖木结构的三层楼阁,一二层各 3 间,三层 1 间,飞檐翘角,玲珑秀丽,顶层供木雕无极老母像,中层供儒、释、道、伊斯兰、基督五教教主牌位,底层为礼拜堂,楹联为“三期普渡万教归一,五教同尊四民共仰”,横额“大同先导”。其楼阁“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现仅存石碑一通。建国后,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咸阳道教有了很大变化。经过土地改革,道士从事农业或林业生产,自食其力。1956—1957 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先后公布了全省第一、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咸阳境内的道观有:兴平县立清观、三原县城隍庙、彬县姜嫄公刘庙等。“文化大革命”中,道士、道姑被迫还俗,宫观建筑遭到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道教重新恢复了活动。

二、道 观

中五台 在咸阳市城区东北部,是道教活动的胜地。该台原名九天太一元君庙,金大定三年(1163),朝廷赐名“太清观”。明、清时期,称为“真武台”,后变为“中五台”。解放后,曾一度为塔儿坡小学校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宗教活动。道徒和群众集资修复了部分建筑,游人云集,香火不断。现有金太真等 5 名从道人员。

中五台历史遗迹丰富。主要有由金大定时颁发“尚书礼部牒”原样雕刻的牒石,记录着该观名称的来由。其文为“陕西东路转运司京兆府咸阳县,住持九天太一元君庙道士王道法状告:见住本庙,自来别无名额,已纳讫合着钱数,乞立太清观名额。勘会是实须合给赐者。”此外,境内各县已发现的还有:渭城广教禅院牒、礼泉福严禅院牒、泾阳洪福院牒、兴平云寂寺牒。《金石萃编》载,清代仅泾阳县就发现 7 块牒石。

黄山宫 位于兴平城西 15 公里,马嵬镇北坡上。其地古称黄山,西汉惠帝

二年(前193年)靠山凿洞修建。《东方朔传记》和《三辅黄图》载,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微服出游,北至池阳,西到黄山宫,曾在此为母求药。唐代,改黄山宫为老子宅,大加修葺。黄山宫明清两代多有修建,规模宏大。从坡下建前殿,沿台阶而上,庙庙相通,直到中洞,东西两侧,有几处小庙,曲径通幽,林荫遮地,甚为清静。黄山宫与楼观台隔河相望,曾称为“北台”。每年香客先朝楼观台,后朝黄山宫。清同治元年(1862)黄山宫毁于战乱。同治十二年(1873),兴平群众捐款修复东西两侧,光绪三十年(1904),兴平、乾县、武功群众捐款重修。先后建有山门、二门、钟楼、鼓楼、卷棚、玉皇殿、三清殿、老君洞及靠山崖半圆形排列的16孔窑洞,各塑神像,形态逼真,雍容华贵。1954年大部分建筑被拆除,移盖学校。“文化大革命”中塑像被毁,窑洞大部分坍塌。1980年,道士魏明仙居住黄山宫后,周围群众捐钱修中洞,塑老子像,盖三间大殿,供玉皇。附近有善男信女近千人。

第五节 伊斯兰教

一、传教活动

伊斯兰教传入在唐代初期。高宗永徽二年(651),阿拉伯大食帝国的使臣奉第三任哈里法欧斯曼之命,来到唐都长安,拜会了唐高宗,并介绍了大食帝国情况和伊斯兰教教义。从此中国与大食、波斯及西域诸国的友好往来日趋频繁,为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宗教人士通过丝绸之路经咸阳到长安开辟了方便道路。后来,这些穆斯林在长安、咸阳及其附近长期侨居下来。唐至德初年,阿拉伯帝国应唐王朝的请求,派遣了一支由阿拉伯穆斯林组成的军队与回纥等援唐军帮助中国平息了安史之乱,恢复了中国皇帝的帝位。唐帝向救援的穆斯林官兵提出:可以留住京畿,允许同中国女子结婚;并在762年敕建清真寺一座。同时,中亚的九姓胡诸国被阿拉伯帝国征服以后,这些小国的穆斯林也络绎不绝地来到长安及其附近的咸阳、三原、兴平、泾阳居住。

宋、金时期,境内的阿拉伯、波斯、中亚的穆斯林商人或因战乱受阻,或受宋朝官吏挽留,沿交通线与唐代居住在境内的回族先民后裔,逐渐接近融合联姻。经过长期繁衍,子孙世代相传,伊斯兰教逐渐在咸阳境内传播开来。

元代,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的穆斯林,作为蒙古贵族的战利品和随从,被迫远离故土长期居住这里,这里的穆斯林不断增多。明清时期,在渭城的胡

家沟,泾阳的永乐店、塔底,三原城内,礼泉、兴平等地形成了穆斯林聚居区,清真寺也相应地在各地逐渐修建起来。

明代后期,咸阳回族人口不断增多,居住分散,通用汉语以及儒家影响日益加深,多数回民已不懂得《古兰经》。咸阳渭城的经师胡登洲在西北首创经堂教育,很快就影响到全国各地的回民地区。到清初,经过胡登洲及其后继者的努力,经堂教育与清真寺组织管理制度日益完善,有效地解决了伊斯兰教“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问题。

清代后期,自同治元年回民起义失败以后,此后,伊斯兰教倍受歧视,穆斯林也在艰难困苦中度过。辛亥革命后,一些曾参加起义的穆斯林后代重新返回陕西。抗日战争前后,大批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穆斯林入陕,散居陇海铁路沿线的关中各县、市,伊斯兰教也随之发展起来。西安、河南的穆斯林陆续来到咸阳、三原、兴平等县,开饭馆经营羊肉泡馍。由于穆斯林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习惯上的需要,1938年在今咸阳市民院什字买地四亩,建起了伊斯兰教清真寺。1948年三原城关清真寺建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咸阳、三原、兴平、武功、长武清真寺正常开展宗教活动。

从1950年起,每年都有穆斯林青年男女被送往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深造和接受培训。穆斯林职工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受到尊重。咸阳大的厂矿企业都设立了清真食堂(灶)。

1964年2月14日至17日,咸阳专署召开了伊斯兰教人士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县(市)宗教界和穆斯林代表人士15人,传达了陕西省伊斯兰教座谈会精神,与会者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了更进一步的正确认识和较为全面的理解。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咸阳、三原、兴平、武功的清真寺都先后停止了宗教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逐步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咸阳市区及三原、兴平、杨陵、武功、礼泉、长武7座清真寺全部恢复、整修开放,广大穆斯林正常的宗教生活得到了保障。1984年12月13日至15日,咸阳市伊斯兰教召开了首届代表会议。出席会议代表36人,选举产生了咸阳市伊斯兰教协会常委会。推选刘书林阿訇为主任,买子奇阿訇为副主任兼秘书长。1990年1月28—29日,在咸阳市伊斯兰教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买子奇阿訇被推选为

二届一次全委会主任,马连春为副主任。

二、清真寺

咸阳境内曾有很多著名的清真寺:泾阳县清真大寺、永乐店塔底清真寺、永乐坡底清真寺、永乐镇巴巴寺、三原兴和巷清真寺等,其中以咸阳胡家沟清真寺最为驰名。清同治年间皆毁于清兵之手。

境内 14 个县区,现有清真寺 7 座,穆斯林人口 7000 多人,主要分布于渭城、秦都、杨陵、兴平、武功、三原、礼泉、长武等地。

咸阳清真寺 坐落于市区新兴路民院十字西侧,占地 12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700 平方米,为两进院。始于 1938 年。1949 年解放后,曾维修扩建。1958 年后,被回民福利社占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宗教政策,动员占用单位迁出。1989 年由省、市有关部门拨出专款,穆斯林群众多方集资在清真寺临街的回民公地上修建了一座 5 间 3 层楼房,底层中门为清真寺大门,3 层为咸阳市民族经济文化教育培训中心和咸阳市伊斯兰教协会办公室。现有坊民 5000 余人。

三原清真寺 三原最早的清真寺在太平巷(明代兴和巷)北口,原寺是一座典型明代建筑,两进四合院的中国伊斯兰教寺院,坐西面东,门房 5 间,院内南北各 4 间厢房,5 间过厅房,南北各有 2 间厢房,最后是 5 间大殿,层层引深,肃穆尊严,并建邦克楼,均于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六日遭清兵焚毁(参阅王生吉撰《关陇思危录》)。

新寺始于 1948 年,由坊民集资也帖置买民房一院,按照伊斯兰教清真寺的规格改建 3 间大殿,两间讲经堂屋,因陋就简过着宗教生活。1963 年河道巷拓路,县政府拨款 200 元,经与东关大队协商重新修建大殿两间,讲堂 3 间,水房 1 间。1967 年被私人占住,1980 年占用人搬出,交清真寺恢复宗教活动。1982 年清真寺管委会鉴于寺房年久失修,决定重新扩建。本坊穆斯林捐也帖 2000 余元,省民委、咸阳市、三原县民政局助资 5000 元,铜川、富平、西安穆斯林大力捐助,于 1983 年开斋节竣工,本坊百余穆斯林参加,举行了尔德节庆典。

清真寺位于县城河道巷内,占地 7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00 多平方米,礼拜大殿 3 间,讲堂 2 间,沐浴 2 间,满拉住房 2 间,另有一女学礼拜小院。有坊民 300 余人。

兴平清真寺 清同治年间,兴平县北关和板桥是两个穆斯林聚居村,有 1 座清真寺,被清军捣毁。1956 年经县政府批准,征用北塔附近的土地 1 亩,修

建清真寺。1958年停建,在西大街租用民房暂做清真寺。1960年有回民399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清真寺被毁。1983年4月县政府批准并资助5000元,回民集资也帖20000元,于1985年在环城路建成1座清真寺。兴平清真寺占地1167平方米,建筑面积166平方米,坐南向北,有礼拜大殿3间,房面有阿拉伯式的圆顶,前檐正面有“清真为本”的匾额。讲堂3间,小房浴室2间,阿訇及生活用房4间。1991年坊民捐资修建清真寺门庭,留有“重修清真寺门庭记”石碑。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大阿訇、哈知安士伟题写“兴平清真寺”匾额,高悬在清真寺大门之上。有坊民960人。

杨陵清真寺 位于杨陵火车站道北,占地半亩,建筑面积110平方米。大殿2间,水房1间,有坊民100人。1954年租用民房暂做清真寺礼拜处。1956年购地建寺,已建成大殿及南北厢房、讲堂、水房及阿訇住室。由阿文书法家刘志三阿訇开学。1958年刘志三辞学回西安,袁圣道阿訇继任。1984年因房屋积水下沉,回民集资也帖重新修建,于同年落成。

武功清真寺 寺原为普集清真寺,位于渭惠渠南侧,紧靠西宝公路。1954年始建,1985年经县政府批准重修。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现有大殿3间,厢房4间,坊民400人。

礼泉清真寺 礼泉清真寺位于城关镇西关村,建于1985年11月,占地1亩,建筑面积140平方米,建筑主体为礼拜大殿3间,讲经房、沐浴室各2间。寺门有伊斯兰教建筑风格的特征,拱顶、尖塔题有“清真寺”3个大字。寺内有建寺石碑一座,碑文记述了建寺经过及坊民的虔诚也帖。

长武清真寺 位于县城西关路南,面积1.16亩,现有礼拜殿3间,讲堂及水房各3间,寺大门厅房3间,建筑面积120平方米。

该寺初系回民马振文1952年出资也帖420元购买庄基地1亩1分6厘,当时有两孔窑作礼拜和阿訇住宿处。嗣后,增建土木结构沐浴房3间。1982年,专署及县政府资助1000元,增建讲堂3间,1984年县政府又资助320元,给清真寺安装了自来水,方便教民沐浴,过宗教生活。1985年,政府资助800元整修寺院围墙。1990年修建了寺门及客房3间,供旅客住宿,作为清真寺收入自养。县政协给在职阿訇月工资补助45元。有坊民106人。

第十编

民俗

咸阳市境的民俗属陕西民俗关中片。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这里开发较早，不少风俗习惯富有典雅的人文环境，皆可追溯其悠久的历史源流。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实，夏商时期周族开始从事农牧活动，“风俗以厚”，逐步扩大了创自今武功、杨陵一带的农耕习俗，懂得了民俗考察和移风易俗的重要性。《史记·货殖列传》载：“公刘适豳，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殖五谷。”先秦时期，咸阳市区是秦人国都所在地，社会风气典型。著名学者荀子来咸阳考察，回答应侯范雎质询时说道：

（秦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汗，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桀，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谥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悬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见《荀子集解》卷11《强国篇》第16）

可见统一前夕的秦王朝，朝野风气健康且上进。随着秦王朝的建立，秦地风习的特征，诚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在《诗集传》中所总结的那样：

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然本其初而论之，

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周南、召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则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情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其强毅果敌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

这个结论性概括，指出了秦民厚重质直的传统风习，充分肯定了这种风习的天然优势。

秦历二世而亡，刘邦率兵入驻咸阳，又南屯汉中，复回定三秦，内外风习水乳交融，遂使境内民俗演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三辅黄图校证》（陈直校证）载：

秦都咸阳，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汉高帝都长安，徙齐诸田，楚屈、昭、宋及诸功臣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兼并之家于诸陵，强本弱末，以制天下。是故五方错杂，风俗不一，贵者崇奢靡，贱者薄仁义，富强则商贾为利，贫窶则盗贼不禁。闾里嫁娶尤尚财货，送死过度，故汉之京畿，号为难理，古今之所同也。

两汉之际，咸阳原畔诸陵附近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宦人家，贫富悬殊，风俗错杂。从那时起，帝王将相厚葬之风即披靡于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移居关中，土著居民避难南迁，关中地区少数民族多达十分之五六。少数民族为当地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华夏民族礼乐制度占居主流，在民族融合中仍处于核心地位。时而汉化，时而蕃化，最终形成了“刚质有为”的共同习尚。

到了唐代，官风官习给予民间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尤其深刻。当其盛季，沟通中西文明的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咸阳作为西出阳关的第一站；商贾云集，店肆林立，胡风饮食史不绝书。诗人李白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雪花踏尽激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当时来自中亚国家的胡姬用面食制作的“胡饼”（可能就是今日的芝麻烤饼之类）闻名全国。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皇亲国戚在郑白渠上设置碾础，磨面取利，曾引起泾阳、高陵等县多次诉讼官司，同时也带来了生产习俗的不断变化。此外，“秦俗以二月二日携古乐郊外，朝往暮返，谓之迎富。”（见《天禄阁识录》）可能与古代春秋两季祭祀谷神有关。清明扫墓，夏暑奠基，清暑、中元、麻姑献祖、十月一日送寒衣，冬至与腊月祭祖等，都与汉唐时期官方礼仪有关。

唐、五代以后，关中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地位，民间风俗渐渐与官方礼仪脱轨。辽宋金元时期战事频冗，征调繁多，境内经济凋敝，破坏严重，昔日的首府之区沦为荆棘之地。明清时期，受固步自封的封建礼教制约，民风质朴醇厚，崇尚节烈。后来，欧雨东来，风气渐开，加之传教士同当地士大夫携手培植新文化，对当地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近代，剪辫子，反缠脚，破除买卖婚姻，提倡薄殓火葬，移风易俗才被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抗战前期，李敷仁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人创办《老百姓报》和《民众导报》，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白话形式，提倡时新风尚，鞭挞恶习陋俗。当时原陕甘宁边区淳耀、赤水县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生产自救，破除陋习，倡导新风，对当地风俗改良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建国后，咸阳市社会经济、文化事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风气也有了显著改变。“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发展教育，重视科技，搞活流通，对外开放，对全市人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广泛吸纳先进思想观念和文化信息，走出去，请进来，筑巢引凤，借船出海，引起了当地人民精神观念的巨大解放，社会生活习俗也有了明显变化。古会、庙会多数成为物资交流大会，逐渐淡化了敬神祭祖的风气。随着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力度的加大，地方社团组织也日渐活跃。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颁布，加上《新婚姻法》广泛推行，沿袭达千年之久的包办婚姻和多子多福习俗有所改变，重男轻女的陋习相对淡化。

由于咸阳地处祖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封建意识和小农经济传统的影响下，至今仍然存在着一些陈规陋习。封建迷信活动、赌博、吸毒贩毒、卖淫嫖娼、婚丧事大操大办等恶习，还时有发生。大力提倡移风易俗，遏止陋风败俗，已成为咸阳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第一章 生产习俗

咸阳市位于关中盆地中部。地势比较平坦，土壤肥沃，适宜于农耕生产。主要作物有小麦、玉米、谷子、棉花、薯类、豆类等。自从周族祖先后稷“封于郃（咸阳市杨陵区一带），始播百谷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其后”。

其后世公刘“立国于豳，复修后稷之业，而风俗以厚”。可知咸阳市境的农耕文化传统相沿已久。明代马理《陕西通志》载：“其民勤稼穡，贵家大族，皆力蚕桑。”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蚕桑业和种植业曾作为咸阳两大主要产业，直到明清以后才有所改变。

第一节 种 植

一、小麦种植

境内最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首屈一指的是从汉代中叶就传入关中的小麦。其传统种植过程是：先是耕地，然后分茬进行种植。

施肥 小麦播种前，先要施肥。将青肥、草木灰和圈粪、炕肥等农家肥送往地头，然后用铁锨撒布开来，俗称“撒肥”。讲究均匀、细碎。现在化肥使用比较方便，但农家肥仍被用作底肥。

耕作 小麦耕作多用畜力、犁耕，也有用人力刨耕或人畜合力耦耕的。刨耕用镢，有板镢、二叉镢、月亮镢和尖镢等。少量不易牛耕的地块，也可用铁锨翻地。耦耕用具为豁锄，也叫造造子。犁耕分木犁和铁犁两种，旧时多用木杆铁铧犁。境内农民多用秦川牛，边耕边吆喝。讲究深浅相宜，平整有序。耕法有一面倒和合手犁两种，以灌溉深度确定。

碎土 为保持耕地底墒，便于种子扎根，农家讲究播种时碎土。一般旱坡地用耙，耙分长耙、方耙和人字耙三种。长约6尺，宽2尺，以畜力牵引。操作时，让小孩站立耙上，大人居后一边执鞭，一边牵绳，踩足、倾身、弃土，促使耙身前移，以求均匀碎土，平整耕地。

播种 耕种小麦，讲究热种。亦即耕耙之后立即下种。旧时多用耩播，可使下种均匀，行距分明。彬县民间流传的《摇耩歌》唱道：

脚踏胡基手摇耩，眼睛用来定稀稠，

耩耩慎防夹耩匀，地头根茬多留种。

耩轴由耩脚、耩斗、耩杆、扶手和拖板等部件构成。操作时先定耩门控制籽种数量，然后一人居前牵畜，一人且扶且摇。牲口脖悬铜铃，叮咚作响。此外，也有点播和撒播之分。点播讲究窝距合理，籽种均匀，掩土厚薄适度。撒播“一步一扬手，满天撒星斗，不稀又不稠，明年大丰收”。忌讳留下“丈二宽的马刀”。撒埋后，由牲口拽耙耨地，以利于保墒生芽。

武功县西原一带，久有吃开场饭和扎根面之俗。每年夏收开始，只要搭镰收割或套碌碡碾场，不论家庭贫富，一律要做一顿丰盛的午餐，名叫“开场饭”。又称开碌碡饭。播种完，家家户户要吃一顿臊子面或酸汤面，称“扎根面”。期望麦子根苗茁壮，来年丰收。

浇灌 一般苗青之后，普遍都要泼一次水肥。冬灌时再施一次粪肥，如草木灰、焦土等。旱地要用牲畜拉上长而细的碾子碾压一次，有人力时也可用木制砸捶挨次敲打一次，以保温保墒。冬灌后，初春时节，如果年前积雪多而厚，在麦苗起身时（因冬季麦子铺地长，立春后麦芽向上长，俗称“抬头”或“起身”），要春灌一次，前后施肥一次，催苗生长，并使地墒充足。小麦灌浆前后，还要灌溉一次。俗谚云：“麦收八（月）十（月）三（月）场雨”，又说“冬灌金，春灌银”（此处月份按农历计算）。

旱涝灾害是境内主要农业灾害。每年冬春季节，庄稼缺雨；夏秋季节，又有连阴雨，对作物生长均很不利。旧时民间多向天神祈雨。一般要洗碾子、祈龙展身。旬邑县民间要让老人带上待嫁姑娘，抬上水桶，手执干草，播香敬神，边洗边唱：

洗、洗、洗碾子，天上吊的水灌子。

天爷爷，地爸爸（即奶奶），下些雨来救娃娃。

娃娃给你烧钱了。

也有的村子讲究洗石狮娃。洗者边洗边唱：

洗，洗，洗狮娃，各家姐妹都参加。

请龙王，拜玉皇，东风雨，下两场。

你浇水，我擦身，洗头洗腿手要勤。

先洗狮娃头，大雨下得满街流；

再洗狮娃眼，黄河都下满；

后洗狮娃嘴，白雨下个美；

洗过狮娃脚，踏两个泥窝窝。

洗了狮娃尻蛋子，下的白雨满院子。

洗了狮娃脚腕子，大雨掩了地畔子。

狮娃全身都洗遍，老天爷再甬睁眼早。

边洗狮娃边唱歌，感天动地起云朵。

风刮来，雨点落，龙王送雨快接着。

祈雨时男人要回避，否则老太婆要用水泼手抡，撵其离开。也有的地方

全村人不拘老少齐上阵，抬神敬神，祈祷多日。

倘若收麦前后连阴雨不断，民间又有祈晴之俗。讲究用洗衣裳的木棒槌（寓意阳天）直立于院子当中，由民妇边念歌谣，边祈天晴。俗云：“男跌晴，女跌雨”，连阴雨天忌讳妇女跌倒。又说：“棒槌可以戳破天”，也是同一意思。兴平市西吴乡流传的《顶雨歌》云：

棒槌棒，脚朝上，黑了给你要月亮，白日给你要太阳。

锄地 小麦播种后，需要进行冬锄、春锄。特别是耩播麦田，行距规整，春锄两三次可除去杂草，促使土质疏松，麦苗健旺。锄麦工具有条锄、板锄、月牙锄（又叫漏锄）等。条锄长1尺，宽2寸，（安）5尺许木把，用以锄撒播麦田；板锄约1尺长，4寸宽，（安）长木柄，用以锄点播麦田；月牙锄口宽背小，（安）约3尺长木短柄，多为山区农民锄坡田用。

备收 小麦扬花前后，人们要做好收割麦子的准备。农历二三月，各地相继举办古会庙会，进行物资交流，如农忙会（又叫杈把会），“羊头会”（又叫青苗会）等。旧时杈把会是为夏收做农具准备的集会，故名。主要交易牲畜、农具、籽种等。会期长短不一，视交易情形而定。

羊头会流行于晚清，系群众性自发组织。其任务是保护庄稼。公约规定：“官树不取枝，饮水不洗衣，田地不放牧，城道不放物，青苗不践踏，熟果不偷摘”等。有的地方杀羊为祭，宣读公约，故称。也有的地方规定：“凡猪羊前蹄入地者，罚麦八斗；后蹄入地者，罚麦一石。不愿交罚物者，所产粮食归公”。因此类组织皆以保护青苗为主，又称“青苗会”。

平场 每年收割前当地农民都要平整好打麦场地。一般早收的青稞、大麦、油菜地，经平整后碾光麦场。由于小麦种植面广量大，收割季节比较集中，故打麦场少则一家一处或几家合用，多则一家两个。多用房前屋后空闲地。人们先将地面破皮平整淋湿，称为“泼场”；随后遍洒草木灰或细绵土，再用碌碡滚压，碾实晾干。如有雨后缝隙，还要用干细绵土填缝。也有的人家在耕地边沿设场，待碾完麦子后复垦为地。

收割 小麦成熟季节，比较多雨，故须“抢收”。俗谚云：“五黄六月，绣女出阁。”旧时割麦全用镰刀，趁麦秸黄熟温软之时，随即用鲜秸拧成麦捆，叫“麦个子”，集中搬运，比较方便。麦镰有手镰和钐镰之分。手镰刃薄，弯柄，需弯腰收割；钐镰刃长，直柄，可站着走割。现平原地带也常见机器收割。

境内每逢小麦收割时，常有来自甘肃、陕北及北部数县的农民，成群结

队地自带镰刀前来割麦。一般干一天活，付一天工钱。过去多为步行，现也乘车。从南到北，边收边退，赶回家时，家乡的麦子也到了收割季节。因这些农民像候鸟一样定期往返，故俗称“麦客”。

运麦 运麦有驴驮、车拉等方法。用大车搬运时，要先用双齿麦杈或三齿钢杈，挑起麦捆入车，错落压茬，以粗绳揽住，于车后麦秸底部插入绞锥或绞棒。上拉下绞，你呼我应，俗称“绞车”。直至麦秸束紧，然后移回麦场上。

每逢开镰前十余日，出嫁的女儿要携带四色礼品回拜娘家，叫看忙口，又叫看前夏、看麦穗黄。尤其是新婚女儿要同女婿一道前去，礼物较重，款待也比较丰盛。夏收夏播之后，娘亲要带上礼品回看出嫁的女儿，或舅舅看外甥，俗称看忙罢，又叫看后夏。

拾穗 小麦收割完毕后，境内各地都有妇女儿童抢拾麦穗的习俗，以保证颗粒归仓。有的家庭为了鼓励孩子勤劳，贴补家用。也有给孩子留作体己钱或供其上学零用的。

摊场 小麦入场之后，先将麦捆栽起来，穗子朝上，便于太阳曝晒，待热干后抖撒零乱，摊成头道场，也叫生场。一般用碌碡碾打，现在也有用脱粒机的。碾打完后清出麦子，隔日重晒一遍，再碾再打，也叫熟场。摊场所用木杈与装车所用木杈一般不同，场伙多用三四股长杈，上有一形似鸡爪的单股，可杈住较大的散麦擎起来移走。也有用钢叉的。

碾场 旧时打场多用连枷，将切割下的麦穗集中摔打，促其脱粒；连枷由手杆和敲杆组成。手杆多用约6尺长的活竹竿，将根部尺许处用火烧软后劈半，折弯与杆平，即为杆柄，习称“连把”。敲杆用约3尺长，较硬的细木棍五六根平排，再用牛皮连结如板，上端加置一短木轴，即为敲杆，俗称“连拍”。用时将敲杆的轴套在连把弯处，操作者持柄使敲杆绕轴旋转，敲击铺在场上的麦穗，促其脱粒。后来多用碌碡碾场。碌碡多用青石凿成，中间略粗，两头稍细，便于运转自如。碌碡又称石碾，两端平面中央各凿一个小洞，俗称“脐窝”。脐窝要用生铁铸成，以蛋清浇灌，眼子装上木制或铁制框架，叫“拨架”。为使牵引马骡或牛上套不晕，要戴上遮眼；为防其吞吃麦草，要佩戴嚼子；碾场人一手牵牲口，另一手要执鞭或粪叉篙，喝叱牲口绕场旋转。碾过数遍之后，要将麦草翻过，俗称“翻场”。将沿边散乱麦子向中心挑拨，名叫“圆场”。直至麦粒全部脱落后，开始“收场”。先将麦秸一一抖撒清出，然后用木杵或刮板、扫帚集拢麦粒。刮板形如大铲，一人扶

把，一人牵拉，可将麦粒连带麦糠刮到顺风处扬场。现在碾场多用机械力牵动，如拖拉机等。

扬场 麦子脱粒后，扬场是最见功夫的农民技术活路。扬场人要侧风而立，手操木杵，铲起适量的带糠麦粒，估量风力大小强弱，掌握用劲轻重、扬程高低，以弧线形扬出，使精麦与秕糠分离。俗谚云：“锄草入麦秸，扬场左右杵。”可知扬场人讲究左右开弓，一边扬场，一边清扫麦粒上的穗子，要用长梢扫帚轻轻掠过。必要时要跪下扫掠，以避免麦粒溅飞入糠。麦子扬出后，要连续曝晒三天。讲究伏天晒麦，伏后不易发生虫蛀。晒后便可簸筛入仓。

堆秸 民间常选用部分上好麦秸，编织成冠，“形如伞而微小，稀疏不蔽风雨，出入寒暑不离”。但绝大部分麦秸仍要集中成垛，留作越冬柴火或牲畜饲料。也有的送往造纸厂生产纸浆。境内民间堆积麦秸，多取圆锥体，底小中粗，慢慢收顶，好像一座座蒙古包。堆秸完毕后，要用麦秸搓成的草绳纵横交叉，保护起来。也有的地方用草泥涂抹垛顶，以防雨淋。此时街坊四邻要前来帮忙，遇饭则吃，彼此换工。

二、玉米种植

玉米又名包谷。境内引进时，原先在旬邑等地山区播种，后来逐渐进入平原地带。

播种 玉米播种要抢时间，一般多用牲畜拽犁开沟，翻出新土，然后手播。也有的地方不直接开耕，用锄挖窝点播。一人挖坑，一人点种，随后浇水掩埋。山坡旱地土质较差，还要将牛羊粪逐窝埋施，以保证出苗茁壮。

锄地 玉米地讲究勤锄深锄。因夏播后气候炎热，耕地杂草生长很快，所以要一锄再锄。锄玉米地要用板锄，必须挖掉麦根草根，松土蓄墒，俗称“开荒”或“镑茬”。二三遍时要浅锄，以免伤及玉米根须。俗谚云：“头遍深，二遍浅，三遍四遍刮个脸。”又云：“锄头底下有水（蓄墒）。”锄三遍时，要定苗施肥，以农家圈粪和绿肥为佳，拥护玉米根系。

浇灌 立夏前后，如果干旱不雨，要引水浇灌一次，以利墒足苗壮。长至一米左右时，要为玉米根中培土，或以人工拽犁耕垄沟，或以锄起沟。如果伏天雨季来临，也可起到团根免倒的作用。谚语云：“有钱难买五月早，六月连阴吃饱饭。”

包秧 旧时武功县一带流传有一种包秧习俗。即在秋季庄稼成熟时，各

村堡或寨子便有人出头承包守护庄稼。包一料秋，可得三至五石小麦（折合500至750公斤），由种秋的人家分摊。承包者在路边地畔的秋禾叶秆上喷洒石灰水，作为标记；在村中贴出罚规，凡违犯者罚钱若干，或罚戏一台。承包者日夜在田间巡视，守护秋禾。后来多为那些地痞恶霸垄断乡里，他们用撒擒诡计敲诈勒索，坑害行人。现已彻底废绝。

扳包谷 玉米成熟后，平原地区多就地扳下包谷，先运回家中，然后脱下包皮；也有的地方带秆拉运回家，边扳边脱。脱完包皮后，留出辫子结成六个一爪或多个一条，挂在房檐上，也有的缠绕在门前大树或木桩上。此时或黄或白的玉米棒子，像一幢幢金银柱子，高擎于农家屋前，煞是好看。

脱粒 玉米棒子多用手工脱粒，俗称“扭包谷”。也叫剥包谷。多于闲暇时间剥粒，随后晾晒食用或作饲料。当地人用包谷制作搅团、发糕和玉米糝子等家常食品。

三、棉花种植

棉花在境内泾惠河流域种植较早。1934年前当地多种木棉，产量低，品质差；嗣后逐步选用四号“斯字棉”作为适宜品种，因其选育地点位于泾惠河流域，又称“泾斯棉”。

种植 棉籽播种前，要搅拌农药和羊粪之类。一方面耐寒早出，一方面防止病虫害。棉田平整后，要视其肥瘠确定作育株数。肥田、水田棉花植株不宜过稠。

拾花 又叫摘花。多由妇女和儿童采摘花絮。一般胸前围以棉兜，边摘边装，满后人车运回。拾花姑娘如彩蝶飞舞花丛，拱起棉袋，来回穿梭，讲究速度快，捡拾净。人们习惯上清早或黄昏捡拾，因午后过热，枯叶多脆，容易混杂。棉花采拾数次后，倘棉秆未拔倒或已拔倒在地，可允许他人捡拾遗棉。此俗至今犹存。

晒花 指将带籽的棉花（即“籽棉”）摊在用木竹杆或芦杆等编织成的箔子上晾晒。这时农村晒棉箔子相连，银絮耀目，非常好看。籽棉晒干后即进入脱籽等加工程序。

第二节 林 牧

一、林木栽植

“家有几株柳，不往山里走”，是平原地区民间俗语。因柳树发木较快，可折枝作柴，也可蓄木用材。还有“植树如栽摇钱树，造林似造聚宝盆”，“前人栽树，后人歇凉”等谚语，皆提倡人们从事林木栽植。

育苗 对用籽种繁殖的树，一般要先育苗，后移植，如松、柏、桃、梨、胡桃、椿、槐等。也有的压枝育苗，待新苗长成后移植，如冬青、杨、柳、桑等。民谚云：“榆撒钱，桃爱嫁，砍下柳枝河边插。”“门前一树槐，走马挂金牌。”又说：“核桃要用刀子砍。”这都是因袭传统的植树习俗。居民在房前屋后植树，也有所禁忌。如“（门）前不栽桑（谐丧），（屋）后不插柳（谐绌），（宅）院中不栽鬼拍手（指杨树叶招风易响）”。

蚕桑 境内原以蚕桑业为主要果木林之一。很早以前，就有栽桑育蚕的习俗。民谚云：“养得一季蚕，可抵半年粮”；“种得一亩桑，可免一家荒”；“清明前喂蚕，四十五天卖大钱”；“小满三日见新蚕”；“大麦发了黄，农家养蚕忙”；“春蚕宜火，秋蚕宜风”；“春蚕不吃小满叶，夏蚕不吃小暑叶”；“宁叫蚕老叶不黄，不叫叶尽蚕不老”等等。均可见旧时养蚕栽桑业的兴盛。

苹果 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境内人工果木林的主要树种之一。原来多为国内果树品种。讲究冬夏修剪。现在流行红富士、乔纳金等进口品种。以淳化、礼泉、旬邑等县栽种较多。其他县区亦有规模化栽植，并初步形成产业基地。

二、畜牧养殖

平原地区多养马、牛、骡，用以耕地役用。俗称马骡为高脚牲口，家畜饲养有奶牛、猪、羊、鸡等。

选用 每年开春，各地均有骡马会，交易耕牛、骡马、驴等牲口。俗称牵牛或拉马。同时也有众多交易猪、羊等家畜的。谚称：“卖牲口不卖绳，卖鸟不卖笼。”买卖不说买卖，而说是牵拉，也是一种口头忌讳。选用秦川牛时，民间也有说辞：

头是头，脚是脚，浑身上下没弹拨。
 犄角像根钻子，耳朵像把扇子，
 眼睛像酒盅子，嘴巴像面片子。
 前裆能塞进个斗，后裆能塞进只手，
 腰长腿短，上角像碗。

庄稼人对耕牛十分爱护，“家有绣尾龙，一辈子不受穷”。现在也有养奶牛、奶羊及肉牛的。

圈栏 饲养牲畜的地方，俗称马厩、牛棚、猪栏、羊圈、鸡架、狗窝等。牲畜圈栏多设在侧房或下屋，房屋简陋，距住房较远，以图卫生。牲口吃料的槽子，多为石制或木制、砖砌条形槽，可供多头牲畜共用。牲口都是拴在槽头喂养。人称“喂牲口无窍门，讲究三勤：一勤喂得饱，二勤圈常扫，三勤刷毛清水澡。”清扫圈栏并垫以干土，俗称“垫圈”。清除粪肥，俗称“起圈”。农谚云：“要想牲口强健，保持圈净栏干。”又说：“夏要通风冬要暖，春秋门窗可半掩。”“老牛老马过一冬，最怕三月摆头风。”

饲料 各种牲畜所需饲料均有不同。给牲口喂草料，统称“上料”。再喂食叫“添料”。饲料又分粗饲料、精饲料和青饲料等。谚称：“马不得夜草不肥”，“骡马要得壮，夜草不能忘”；“喂牛没窍，夜草喂饱”；“牛要满饱，马要夜草”等，说明人们喂养牲口对夜草极为重视。人说：“骏马似蛟龙，饲料须要精。谷草要铡细，麸皮拌草中。经常搭豆料，饮马因时行。”（以上喂马）“骡子个大，饲草略差。谷草黍秸，豆饼油渣。外加料粮，高粱最佳。”（以上喂骡）“黄牛本性善，下地埋头干；只要草一把，再苦无怨言。”（以上喂牛）“毛驴嘴巴杂，给啥能吃啥。”（以上喂驴）

放牧 每年春、夏、秋季，到处野草青青。人们常拉牲口到野外放牧，既节省草料，又能溜达牲口。俗谚云：“牲口要上膘，多多喂青草。”“青草旺，牛马壮。”放牧又叫放青。为了过冬储料，人们割下青草阴干窖存，冬季开窖喂养。青储饲料与精饲料一样，牲口爱吃，肯长膘增肥。

铡草 饲养牲口，不管是青饲料，还是干饲料，一律要铡成短节入槽饲养。讲究越短越好，越细越好。谚云：“寸草铡三刀，没料也长膘”；“长草喂马，犹如刀刮；毛长皮皱，越喂越瘦。”铡刀为一木制刀槽，以铁固定槽口，再用大刀刀片上下铡动。一般需两人合作，一人送草，叫人草；一人提刀，叫铡刀。

役用 农民对牲畜的役用和喂养，都十分精心。可谓冷暖饥饱、劳逸伤

疾，无不事事关心。牲畜使役之后，要及时休息。驴、骡、马卸套之后，要牵到平坦而干燥、松软的地方，让其打滚消汗，然后饮水喂料。牛在喂草之后，还要留出一段反刍的时间。俗称“回嚼”。俗语云：“驴打滚，马撒欢（踢踏跳蹬），老牛回嚼人抽烟。”

挂掌 又叫“钉掌”或“铲蹄”。这是圆蹄牲畜的一项特殊的需要。多由专门人员进行钉掌。俗云：“龙无云雨不腾空，马无蹄掌路难行。”马掌为铁制，U型，预留五孔，用特制铁钉钉在蹄子上。马骡驴皆需按时挂掌，否则役用时会磨伤牲口蹄足，损伤致残。在农村集市街口，多有专为牲口钉掌的匠人。将牲口蹄脚稳在蹄桩上，铲蹄换掌。人称此店为“马蹄店”。

养羊 境内渭北各县皆有养羊习俗。靠近山区的，多养山羊，成群饲养，每天早晨出牧，下午归来；位于平原的，一般都以家养为主。喂养有站羊和草羊之分，站羊即在家中栏圈内喂养的羊，多以青草或干草人工饲养。草羊即在野外放牧的羊，多为靠山人家所自养。

养猪 境内民间养猪习俗由来已久。考古发掘表明，当地居民在史前时期已能驯育野猪。因猪粪是农家肥中最好的品类，故农民养猪目的在于积肥。谚语云：“农业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猪多肥多，肥多粮多”。养猪处称为“猪圈”或“厩栏”。吃食处叫猪食槽，多用石料凿成。因猪好啃好拱，故石槽坚硬，既不怕猪啃栏，也不怕猪拱槽。猪饲料多用青饲料和精饲料搭配喂养。凡草秸藤蔓之类饲料，须剁碎使用。一般架子猪开始供给熟食精料，以图快长膘。民间一般很少养母猪，买猪仔通称捉猪娃。凡饲养猪崽的，都要阉过才喂。农村有专门从事阉猪行为的人，用挑担或自行车前挂红布条为标志，游村串乡。买卖架子猪时，要将缰绳带回，“卖猪不卖绳，卖鸟不卖笼”，恐怕带走财运。

养鸡 俗语云：“猪是钱串子，鸡是盐罐子。”农民家中养鸡，目的在于用卖鸡蛋钱购买油盐酱醋茶。过去一般鸡散养者多，栏养者少。但因鸡跑户外践踏庄稼，食毁青苗，故只能在自家院内游食。又因鸡和吉音谐，所以民间婚丧事宜也用鸡牵线。一般多用红冠公鸡或母鸡。每年春二月，是农村孵小鸡的时候。多选“罩窝”的母鸡，给其身下放十余枚鸡蛋。所谓“鸡抱鸡，二十一；鸭抱鸭，二十八”，便指的是孵育时间。

第三节 工 商

一、手工业

手工业行业非常多，分工也很细致。其中尤以木匠、铁匠、泥水匠等工匠在农村最为活跃。

木匠、泥水匠 境内民间工匠中，旧时最常见的为木匠和泥水匠。泥水匠多从事建筑行业，而木匠以门窗家具打造为主。其工具以斧、铨、锯、曲尺、墨斗、刨、凿、钻、锉、羊角锤等为主。民间木匠讲究用斧，有“千日斧子百日铨”之说。木匠做家具竣工时，要留一点尾巴，意取还有活干；做棺材时，却要收拾干净，否则会被认为诅咒主家再死人。这是犯大忌讳的。民间寿棺做成之后，主家要请亲戚友人来庆贺，一边欣赏木匠工艺，一边要酬谢工匠劳动。当面将工钱、礼物（如毛巾、烟酒、手帕）等和盘端出，请工匠当众收取。工匠一般收费合理，不会太高。木匠行业以师徒传艺，时间以3年为限，期间师徒管饭不付工钱，出师时师傅要赠送一套木匠用具。木匠业祖师为鲁班，每年五月初七举行鲁班会，隆重祭祀。泥水匠则多由木匠出身的人充当，也可由懂得图样或善于筑砖砌瓦技艺的人充当。其祖师也是鲁班。礼泉县史德镇流传的一首《木匠歌》，对木匠手工艺的特点和艰难作了深刻描绘。其歌词道：

哐哐哐，哐哐哐，手里斧头把歌唱，
 名师手下出高徒，咱做活儿有名堂。
 打辆纺车转得欢，一晌纺线三两三。
 做架机子腰儿圈，织出布来缝衣衫。
 咱做的风箱两头煽，烧火煮饭不见烟。
 咱做的甑笼名牌货，黑面蒸成白馍馍。
 出根扁担两头弯，李彦贵担水进花园。
 打条鱼船两头尖，胡凤莲好藏田玉川。
 做个龙头拐，佘太君出钱买；
 做个盘龙棍，送给那赵匡胤。
 木牛流马有名声，六出祁山立了功。
 司马懿偷去学着做，一窍不通把人丢。

四轮车送给诸葛亮，孔夫子来迟没跟上。
 徒弟把鞭做成棍，杨排风拿着去上阵。
 做桌椅，做门窗，老人下世全材方（指棺材）。
 雕龙椅，刻龙床，皇上嫁女做柜箱。
 天上盖起凌霄殿，海底修成水晶宫。
 盖起金殿坐皇上，修起官府卧豺狼。
 自古艺人遭恓惶，木匠住的柯杈房。
 老婆没床睡土炕，娃娃饿得脸发黄。

铁匠 铁匠有开铺行业的，也有游荡江湖的。所开门面叫做“铁匠铺子”。民间有“开过药铺打过铁，百样生意看不热”，意即旧时这两种行当收入虽薄，但细水长流，比较稳定。铁匠奉祀太上老君为祖师。每年二月初二或二月二十五日，各地铁匠都要聚会祭祀。一般铁匠家中要设龛敬拜。礼泉县赵镇流传的有《打铁歌》。打铁者赤裸着上身，左臂弯曲拍打节奏，右手在左胳膊窝、肩头、头顶、胸背、屁股和大腿上拍打。伴着歌唱，十分动听。其歌词是：

叮叮当，叮叮当，一打铁，二打钢。
 先打铁锤开毛铁，再打钳子手里捏。
 打个铁犁辕，牛郎好耕田；
 打个钢锭锭，织女纺线嗡嗡嗡。
 打把镢头打把锄，老愚公拿它去移山。
 打把钉耙好翻地，猪八戒拿去练武艺。
 打个铁勺把饭舀，灶君张奎都说它好。
 打个锄锄把炭铲，杨排风烧火用起谄。
 打把剪刀明晃晃，莺莺买去剪鞋样。
 打了一捆梨花枪，杨家父子全抢光。
 打把矛子刃刃长，岳飞枪挑小梁王。
 打把大刀寒光放，关公五关斩六将。
 打把斧头铁扁担，刘海砍柴进深山。
 打了一把青锋剑，送给英雄花木兰。
 唐僧买镫备马鞍，一心取经到西天。
 还捎了一把月牙铲，交给和尚沙老三。
 诸葛亮抽烟要火镰，王宝钏挖菜用铲铲。

李彦贵还要定水担，挑水卖钱进花园。

打桶圈，打门栓，打车环，打铤杆，

拴猪打的铁链链，头里还带一扭转。

打铁抡锤不敢停，腰弯背驼立不正。

打铁打了一天，天天没有人做饭；

打铁打了一年，年年都是光棍汉；

打铁打了一辈，脸蛋抹得象敬德。

敬德模样难成亲，姑娘个个嫌脸黑。

丢下铁锤改了行，一心当兵吃了粮。

钉锅匠 旧时民间多用铁锅，容易烂底，钉锅匠便“一条扁担两个筐，钉锅生涯任流浪”。礼泉县新时乡民间诗人、钉锅匠李登峰《钉锅苦》歌谣描绘道：

钉锅匠，真个苦，不论热冷把锅补。

六月里，天气炎，汗流满面把锅钻。

数九天，沿街叫，捉住家具手冻翘。

这行道，人品低，四季不能穿好衣。

有时候，缺菜饭，把人饿得难立站。

钉锅匠奉祀太上老君。行规规定只要正在钉的锅还未最后抹泥，就证明活未干完。后来的同行看见后，收入要见面分半。违规者，要受到同行谴责。遇老君圣会，要摆设香火、蜡烛、麻糖之类供奉。所谓“今日本是老君会，坐店一天把神陪。人多势众香火盛，神前又把献食供”。

民国时从事钉锅行业的人数甚众。今已非常罕见。

剃头匠 又叫待诏，今叫理发师。旧时剃头匠多游街串巷，挑着剃头挑子给人服务。常言道：“剃头挑子一头热”，意取一头担着炉子，随时烧水洗头；一头挑着器具，磨石、剃刀和抹布均在其中。由于剃头匠常要服侍人，世俗以为下贱。谚语云：“不学吹（鼓）手不学戏，不学剃头刮毛羽。”旧时剃头匠以吕洞宾为祖师。今剃头匠改称理发师，不再拜神。

酿酒匠 旧时民间酒坊多用大麦自酿烧酒，也有用红薯酿制的。这个行业奉祀杜康为祖师。武功县酒坊每年九月二十七日都要奉祀杜康。在酿酒过程中，每逢原料入瓮时或出酒时，工匠们都要跪拜祖师的神位。

二、商业

旧时民间经商有行商和坐贾之分。此行讲究和气生财。一般农民来商

号，允许季节性赊账，待到收获后还账。强调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一般多为师徒传艺，由学徒成长为掌柜的。经营者和投资者按一定比例破成分红，有的人银各半，有的人六银四，有的人七银三，视具体情况而定。在市场经营中，常有经纪人居中调停。议价时，经纪人用袖子遮掩捏手指计账，用行内暗语交谈，买卖双方均不明就里，经纪人便以垄断行情收取佣金。民谚云：“生意不懂行，瞎子撞南墙。”又说：“贴赔生意行家做。”“货真价实生意兴隆，卖假涨价门市倒灶。”旧时每逢朔望之日，商家早起都要站在门外，烧财神马，复兴隆铺，互相揖拜，口称发财。今此俗已淡化。

三、建筑业

旧时民间住宅建筑，多由泥瓦匠承担。长武、礼泉等县均流行《打夯歌》，由领唱者引唱，打夯人共同唱和。礼泉的《打夯歌》歌词云：

叫：大家鼓个劲儿哟！

众：嗨嗨哟嗨嗨！

叫：夯往前边挪呀！

众：嗨嗨哟嗨嗨！

叫：说个花儿哟！

众：说的什么花呀？

叫：二秃子抱西瓜哟！

众：原是三圆（原）花哟！

叫：鸡娃落在麦囤上哟！

众：原是饱（宝）鸡花哟！

叫：寡妇房里动哭声哟！

众：原是为男（渭南）花哟！

叫：柏树生在碾盘下哟！

众：原是压（哑）柏花哟！

一般农村住宅上梁、盖门楼和竣工后，主家都要设宴庆贺。上梁时，主家要高悬有八卦图案的红布于大梁之上，然后用一根红绳系着一个白碗，碗上再架一双筷子，意取镇妖去邪。亲朋好友各来庆祝，披绸子，鸣鞭炮。一般主家须设盛宴款待。长武等县盛行门楣斗格，一旦门楼修成，也要酬谢工匠。乔迁之际，烘房庆贺，更不在话下。

第二章 生活习俗

第一节 服饰

咸阳市境民间服饰可分为常服和变服两种。

一、常服

鞋帽 秦代，由于连年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和各诸侯国之间交往活动的频繁，各国服饰文化也都在交互影响和实际生活的优选中进行改革，以适应人们的生活节奏。其中冠帽的变化尤为突出。如楚国的通梁组纓为秦国所用，名为远游冠；楚国的洁冠、獬豸冠被秦人拿来赏赐近臣、御史。秦人灭赵，将赵国君王的高山冠拿来自己顶戴，惠文冠赐与近臣佩用。同时，秦还继承了周代的冕服。到统一六国前后，因始皇帝迷信阴阳五行学说，认为秦以水德治天下，故崇尚黑色，以黑巾裹头，有黔首之称。此外，还以“六”为各种制度的基准数码，如冠高六寸、路宽六尺等。

秦汉时期，华夏地区高贵的人头戴冠帽，卑贱的人顶戴幘巾（一种束发的包头布）。这在关中一带叫做络头。后来有身份的人士将幅巾戴法加以规范化，并以皂纱为之，作为常服。渭城杨家湾西汉墓从葬坑出土的戴弁陶俑，弁下有幘，也就是武弁大冠，后来演化为笼冠、笼巾。据咸阳国际机场考古发掘，北周时期的折角巾，将幅布叠起一角从前额向后包裹，两角置于脑后打结，所余一角自然下垂于脑后，在当时上层社会也有流行。现在仍有个别女子这样包扎头巾。三原隋代李和墓中出土的陶俑，头上所裹角巾，有的两角于脑后打结下垂如带状，也有的两角收顶打结作为装饰，已成为早期的幘头了。

到了唐代，社会上流行高冠峨髻的风尚。昭陵陪葬者李勣墓中出土的三梁进德冠，就是最早的唐冠实物。其形如弁上加幘头，帽壳以涂乌漆的皮革刻制成蔓草及蕨蕤繁縟的绕枝牡丹花饰，颇为美观。因其为鍍金支架，三

梁，故称“三梁进德冠”。同时，又在幞头内衬以巾子（一种薄而硬的帽子胚架）。三原贞观四年（630）李寿墓出土壁画，渭城底张湾贞观十六年（642）独孤开远墓出土陶俑的幞头，顶部较低矮，里面衬的可能就是平头小样巾。礼泉马寨村麟德元年（664）郑仁泰墓陶俑，幞头顶部增高，酷似高头巾子。神龙二年（706）章怀太子李贤墓石椁线雕人物中，有将两根垂在脑后的带子加长，打结后作为装饰的长脚罗幞头形象。其所垂两脚形状变得或圆或阔，并在周边用丝弦或铜丝、铁丝作骨，衬以纸绢，这就是翘脚幞头。高而前踞的式样，从唐开元二年（714）戴令言墓出土陶俑中可以见到。天宝年间幞头顶部像两个圆球，该式样在唐天宝三年（744）豆卢健墓出土陶俑身上也能见到。晚唐时期，巾子造型又变直变尖。至于包裹巾子的幞头，唐以前用缙绢，唐代改用黑色薄质罗、纱，并且有专门做幞头用的薄质幞头罗、幞头纱。这种起自民间的幞头后来演变为帽身端庄丰满、展角于动势中扩大视觉空间，脱戴方便的民族冠帽，一直到17世纪的清初才被满式冠帽所取代。

宋代一般劳动人民爱戴不带翅的直脚幞头。内衬木骨，外罩漆纱，可以随意脱戴，使用方便，平整美观，已经接近帽子。庶人则由花顶头巾、幅巾发展到逍遥巾。元代民间男子头戴有帽子、笠儿、凉巾、暖巾、暖帽。读书人向道教寻生存，多服星冠、交泰冠和三山帽、华阳帽等。《草木子》载：元代官民皆戴帽，其檐或圆或方，或前圆后方。

随着封建礼制影响的深化和对劳动人民控制的加强，明代妇女服饰已带有浓厚的封建社会束缚女权、压迫女性的特征。命妇头戴复杂繁盛的冠饰，使女子头不能抬，目不能侧。其时男子间最流行的是瓜皮帽，时称六合一统帽或小帽，是用六块罗帛缝拚，六瓣合缝，下有帽檐。帽顶只许用水晶、香木。到清朝上上下下都时兴这种帽子，材料用纱缎、倭绒、羽绫，一般用丝绦结顶，讲究的是用金银线结顶，也有用玉顶或红珊瑚顶的。遇丧帽顶用黑或白。直到抗日战争前后，民间仍有人戴用。

蓄发而总结于头顶，是我国民间传统的发饰习俗。从秦人兵马俑可看出其时兵卒形状各异、变化多端的发式习尚，较多的是将头发分成三股或六股编辫卡结，梳向后脑勺。隋代男性胡须多为菱角翘式，下作尖锐式，而唐代流行垂须。到宋代又兴五绺须。北周至隋的陶俑头梳成平云髻，额部鬓发剃齐，叫朝云近香髻。而盛唐妇女发型竞相高大，也可使用假发装戴。劳动妇女结婚时，可按末等命妇礼制穿饰。明代少女挽髻，髻上插有首饰，待到许嫁定亲时，由男家派人前往，为新娘上髻梳弄，改造成成年妇女的发饰。

清初顺治、康熙年间，为了以满制汉，推行满族衣冠制度，屡次颁布“蓄发令”。规定檄文到县，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说法，让剃头匠挑着担子游街串户，碰见蓄发的人就强行剃头，稍有反抗就砍下头颅，挂竿示众。故直到解放前后尚有理发担子挑竿的习俗。清代平民百姓所戴遮眉勒，在北方叫勒子或脑箍。以黑绒制作，套于额上掩及于耳，分两带于鬓下结之。这是由明代妇女所用额帕（又名头箍）演变来的。男子多用瓜皮帽，又名小帽、便帽、秋帽。帽作瓜菱形圆顶，下承帽沿，红绒结顶。到清末，帽顶结子收小如豆大，结色用蓝，戴时将帽向前额倾斜。一般帽内衬以红布，服丧时或黑或蓝，帽顶结子用白。毡帽为农民商贩所戴，比较普遍。

民国成立以后，政府明令颁布剪辮通令。地方各界人士纷起响应，辮发积习为之一变，传统衣冠制度也从此废除。普通礼帽分冬、夏二式，冬用黑色毛呢，夏用白色丝葛。其制多用圆顶，下施宽阔帽檐。穿着中西服装都可戴此帽，为男子最庄重的冠饰。其他变帽式样丰富，一般都以各人的身份、地位和职业而定，不再有统一的规制。据说民间偶尔尚有冠礼，惟已弛废多时，仅个别地方当儿子娶妻时，让其跪于庭中，由辈分、声望较高的人为之加冠、戴花，或届时年轻夫妇互换花饰，可能是古代冠礼的一种劫遗。

建国后，民间冠帽、发饰均有着丰富多彩的变化。帽类先后有八角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戴用过的）、工人帽、黄军帽、鸭舌帽等，种类繁多。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变迁，城市居民普遍穿用西装或便装，农村居民也以中山装为主。特别是在公共社交场所，已经以西式服装为主流。冠帽佩戴渐少，且多为鸭舌帽、贝蕾帽之类。

至于鞋子，从宋明以降，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妇女自行缠足，穿“三寸金莲”，围“三尺锅台”，其身心备受摧残。男子着皮靴或布鞋，多为手工制作。清末民初，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反缠足活动已成为时尚，妇女可以天足生活，故而裹足陋习得以遏止。建国初年，人们仍多以布鞋为主，有方口、圆口之分，也有平底、凸底之别。80年代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皮鞋渐盛于布履，且款式不一，色彩多样。

服装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咸阳市境就出现了庶人穿着上衣和下裳连在一起的深衣作为吉服的记载。《诗经·秦风·无衣》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意为没有用棉絮或柞麻制成的袍服，怎么能度过严寒的冬季？《豳风》又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亦可证明既短且劣的襦

衣（也即褐衣），应是这时劳动人民的基本服装。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在吸收列国服饰文化的同时，重点继承了周代的服饰制度。秦王在朝贺和祭祀时穿黑色礼服。但封禅祭祀泰山时，仍穿白色衣服，且赐赏百官母妻的，皆是五彩夹纈罗裙之类。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仍以黑色大冠为祭服，崇尚宽襦大裳，一般服装亦无禁例。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改正朔，易服色，表示受命于天，以正月为岁首，服色尚黄，数码用五，但为年轻将军霍去病送葬时，仍然以黑色为礼服。汉成帝时（公元前32—公元7年）规定青、绿为民间常服。由于这两种颜色在视觉上有平和后退之感，后世一直被定为平民的服色。

到东汉时，儒家学说指导下的衣冠制度正式确立。普通男女仍穿襦裤或襦裙，短上衣，与下身分开。同时，胡服开始介入朝野服饰习俗，战国秦汉以来的曲裾袍渐被淘汰。班超出使西域疏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联系，也促使西域胡装款式慢慢走入汉族民间的生活环境。

到南北朝时，由于境内外频繁战争和迁徙，周边胡族居民迁入市境，土著居民纷纷向山南、江南转移，造成了胡多汉少且交往频仍的局面。如裤褶原为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传统服饰，其基本款式为上身穿齐膝大袖衣，下身穿肥裤管，此时已开始广为流行。褙裆（亦即背心）亦由军戎服装中的褙裆甲逐渐演变出来，成为后来人们穿用的背心或坎肩，到明清时礼服中已有使用，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从咸阳国际机场发掘的北周贵族墓葬中，可以看出原先佩戴军旅生活用品的鞞鞶带，早已流传。这种来自西北少数民族的革带服饰，对唐代及后来的汉族衣饰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隋代民间妇女多穿青裙，外出要戴幂罗，把面部罩住（中亚国家妇女至今有此习尚）。其时士卒服黄色。唐代把赭黄规定为皇帝常服专用色彩，后来多次颁令禁止民间服用。唐中叶流行帔帛（即披在肩背上的一条长长的围巾），这在中宗神龙二年（706）入葬的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可以看到。唐人《步辇图》所绘宫女头上平起作云皱，穿小袖衣，朱绿绸裙，与渭城杨家湾唐初壁画相同，裙腰上至乳房以上，加帔帛，穿小口条纹裤，透空软棉靴，带金条脱。半臂（亦即半截袖式衣衫），是现代服饰常用的一种款式，在唐人服饰中亦可见到。永泰公主墓石椁线雕人物使用将半臂套在外衣里面的穿法。盛唐以后，因社会习尚以丰腴为美，穿半臂的绘画形像逐渐减少。

宋代裙子多为六幅、八幅，乃至有十二幅之多。纹饰或作彩绘，或作染纈。史载当时北方妇女多将布匹南输，而将成衣北运。其时红色石榴裙多为

歌伎所穿，受到诗人吟咏。青、绿色裙为老年妇女或农妇所穿用。由于家具的发展，妇女裤装开始有裆，但仍不外露。元代以下禁令增多，民间服饰向灰褐色系发展。霞帔是宋代以后妇女的命服，随品级高低而不同。文献记载中颇多赏赐命妇服饰的记录。

清代以后满族服装渐次流行。清初袍衫尚长，顺治末短至膝盖，后又加长。甲午海战后，受西式服饰影响，中式袍衫的款式越来越紧瘦，袍衫面料的使用也打破常规，出现逆反现象。如细薄的轻纱被用来作棉袍、夹袍。俗语云：“有理者无里，无里者有理”，反映了当时服装习俗的变化。其时北方人流行长裤，用带子将裤脚在踝骨处扎紧。且有系腰带习俗，所谓“三单不如一棉，三棉不如一缠”，至今在农村老年人中仍有流行。

晚清至民初服饰，所用布料多为家织土布，颜色有染靛蓝、藏青色（用涝池淤泥和一种名叫口袋叶的草汁染成）等。进入民国时期，立领式中山装在公务人员、青年学生中流行。清末开始广为普及的裤子，把传统的抵裆裤改为前后各两片组成，侧缝上端均有直袋，前后腰有折裱，以前裆裤缝为开门。其规制夏用白色，其他季节用黑色。咸阳城乡至今偶有存在，个别地方有所变化。民国初年中式礼服为长袍马褂，或长袍坎肩。20年代以后，逐渐流行旗袍，成为青年女性及体型较瘦削的中年妇女的常用服装。也有的青年知识女性上着大偏襟直领单衫，下着现代裙裾的。抗日战争时期，城市青年多穿士林蓝、安定蓝、蓝灰等颜色的服装，女青年也偶有穿用。此外，还有穿工人服、两用衫、夹克衫的。

50年代，咸阳人民热烈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自动穿起蓝色、蓝灰色的干部服、列宁服和棉大衣。“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穿着不戴标志的黄军服，城乡青年上山下乡，也有佩戴“为人民服务”和毛泽东像章，以及红袖章军服的。进入80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服饰渐趋多元化，以蓄长发、穿喇叭裤和牛仔裤的争议与流行为先声，开始了改革开放大气候下的服饰转换。西式服装已逐渐成为城乡人们穿用的主要服装，中山服、中式袍衫退居次要地位。大腰裤和大衿衫已很罕见。青年人服色绚丽多彩，款式多样，反映着他们生活习俗的历史变迁。

二、变 装

礼服 至今民间仍有吉凶礼服。原来，周代已规定以细纺织品为吉服质料，以粗纺织麻为凶服质料。秦汉礼服多尚黑色。唐宋以下民间妇女以青、

绿、灰、褐等色为主，喜事用九品命妇冠服，并饰红衣；丧事则以黑、白两色交替使用。清初强行推广满洲服饰，引起了汉族人民的激烈反对。后来为了缓和民族矛盾，采纳了“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倡伎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等建议，允许妇女保留明代服饰，未成年儿童、民间迎神庙会等活动，亦可穿用明式服装。民国时期，妇女婚嫁时仍要坐花轿，穿大红绣花喜裙。上配石青绣花袄或大红绣花袄，头戴凤冠，肩披霞帔。至今民间婚嫁仍以穿红色衣裳为吉祥如意。西式“文明结婚”者穿白色灯笼袖连衣拖地裙，多见于城区，农村罕有出现。建国后推行移风易俗，以家常服装结婚的男女青年为数众多。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今日婚礼服饰美观、多样，因人而异。

丧葬服饰，各县区（市）皆以白色衣裳为主要服饰，其质料以麻布为尚，按亲疏远近，服色款式略有不同。流行丧服是：男性丧服勒头布，拉拖绶，穿白长袍子，鞋上糊以白纸或白布。女性亦需勒头布，拉拖绶，上穿白大襟衫，下穿上腰的白裙和白鞋。不拘男女孝子，腰间都要勒麻丝。非直系血亲戴白孝帽即可。重孙辈头顶孝帽上可缀红布绶。经过三年，禫服已满，在坟前脱去孝衣孝帽，更换新衣新帽。民间对寿终正寝的老人，要在谢世前穿好寿衣，用冬、夏、春、秋四季加衬里共五套衣服。不分男女都要用紫色或黑色袍衣。男的戴黑彩帽，手拿黑扇、手帕或烟具，头枕公鸡枕头；女的戴八角黑绒保险帽。一般人死去后要以黑纱布盖脸，此俗相沿已久。据乾陵陪葬墓出土的刘浚墓志铭可知，其妻李氏在他贬官客死岭南后，历时四年，不远万里，携带幼子扶梓还乡，并拒绝让两个儿子侍奉武则天。唐睿宗即位后才率子赴京任职。开元十七年（729）六月三日在长安通政里家中临死之际，曾感叹地说：“古有失行者，耻见亡灵，所以用物覆面。后人相习，莫能悟之。吾内省无违，念革斯弊。”其子孙遵命安葬乾陵附近，受到朝野人士的赞仰。可证以布遮脸的习俗由来已久。

戏装 咸阳境内民间演艺装，以秦腔、弦板腔等戏剧服装为主，杂以民间行业性和时代变迁性服饰。秦腔戏装多沿用明代九品官服的基调，至今无多变化。弦板腔原系木偶小戏，其皮影衣饰仿照古装，但不规整。民间赛事活动中，也有相对确定的服装款式。如旬邑县流行的秧歌舞，男演员头扎羊肚毛巾，身穿白汗衫，腰系红绸带，手打小花伞；女演员身穿红色舞衣，腰系黑色舞裙，脚蹬纓纓鞋，手执粉色羽扇，与陕北舞秧歌接近。长武县一带道教醮师乐班超度（道场）活动表演的祭礼仪式——醮师分灯舞中，表演者

身穿黄、蓝、黑道袍，头戴三教九流太极图道冠，顶系佛牌。三原县至今流传的《十八罗汉舞》，大罗汉身穿黑色对襟衫，镶白边，腰扎白带，下穿红裤，头用白布扎成羊角形；而小罗汉为灰色中式对襟衫，镶白边，绿裤子，黑鞋黄腰带，头包红色三角巾。泾阳县有代表性的《竹马舞》，引马者为老生扮相，头戴无顶草帽或圆沿帽，穿黑衣，扎白裙，红腰带，黑便鞋。而永寿县民间舞蹈《接翠驴》，老汉用古铜色对襟褂子，黑色大腰裤，瓜皮帽或白毛巾，黑色圆口鞋。老婆穿藏青色大襟褂子，右胸前垂有银牙签、耳勺等，蓝色围裙，黑色裤子，裤管用黑色扎带，头戴黑色平绒帽。孙子衣白色对襟衫，蓝色腰带，蓝色中式裤，头扎白色毛巾。乾县《蛟龙转鼓》的表演者用白巾扎虎抱头，上着白衫套黑坎肩，腰系红色彩带，下穿蓝、黑裤子。秦都区盛行的《牛拉鼓》鼓手，则穿中式对襟白衬衫，外套黑色背心，背心上滚有二道白边，腰系深蓝色腰带，黑裤黑鞋，头扎白布巾。从左肩斜挎一条红色绸带于右腰间。绑绞者、司铎钹、大锣、马螺、螺号者服饰大同小异。

第二节 饮 食

咸阳市境民间饮食可分为日常饮食、节庆饮宴和名特吃食三类。

一、日常饮食

咸阳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区和关中盆地平原区过渡地带，农作物以小麦、玉米、豆类、薯类为主，人们日常饮食以小麦为主食，玉米、豆类、薯类、谷类为杂食，同时辅以蔬菜、瓜果、肉蛋和调料等。以北五县之一长武为例，因其受陇东文化、关中文化和陕北文化的交汇影响，饮食习俗讲究做工精细，花样繁多。地方特色是：

原滩硷地种菜粮，沟壑山坡放牛羊。

交通要冲商业旺，饮食讲究味偏长。

庄稼人的家常饭，生葱辣椒蒸馍蘸。

米汤搅团酸汤面，一年四季吃不厌。

以南九县区（市）的三原为例，它代表了关中腹地最普遍的饮食特点。每天早、午、晚饭前后皆得饮茶，清胃消食。每餐讲究菜碟上桌，荤素相间。一般人家仍以面食为主，花样较多，蔬菜以烹炒为主，比较简单。夏季

吃饭多佐以时鲜青菜，冬季以咸酸菜为主。

早饭 各县区（市）吃早饭时间，因有二餐、三餐习惯不同而有别。一般城市、郊区多以三餐为主，约在早8点以前用完早点。而农村地区仍以早10时左右用餐。清晨饮茶，下地归来才用早饭。早饭皆以米汤或稀粥为主，同时以蒸馍就咸菜、酸菜辅之。三原人讲究夏忙季节用大陶土茶罐喝茶，北部县乡百姓则爱熬罐罐茶。

午饭 午餐时间亦分12时和3时两种。正午用餐一般为三餐制中常见，下午用餐则为两餐制用饭时间。中午农村多食面条。面条以手工擀制为上乘，讲究“薄筋光，煎稀汪，酸辣香”。但也常吃又宽又厚的面条。现在亦常用米饭为主食。偶或上菜、饮酒。夏忙季节，常用陶罐送水，海碗盛饭，在地头蹲着吃。

晚饭 一般以喝稀饭为主，俗称喝汤。但也辅以菜馍。时间皆在晚6—7点钟。农村人常喜用大碗吃饭，无意中形成了“老碗会”，交流各种信息。

咸阳群众日常饮用的食品，花样繁多，且历时悠久。主要可分下列若干品类：

面制品 包括宽、窄面条，面片、面块、面汤、包子等软食品和蒸馍、锅盔、油饼等硬食品。像咸阳的biang biang面，乾县酸汤挂面，泾阳、三原烧汤哨子面，均很常见。还有武功七花面、北五县铡刀长面、旬邑饴饴等。硬面馍有长武锅盔，乾县、武功锅盔，礼泉柱顶石馍、泾阳石子馍等。

肉制品 以家畜中猪、羊、牛和家禽中的鸡、鸭，水产中的鱼、虾等为肉食对象，有用各种烹调手段制作的肉菜、肉臊、肉丸、肉片等。尤其是牛羊肉泡馍，在各县区市均十分普遍。

菜制品 主要指以野菜或家种菜制成的可食用的菜蔬。包括用块根的薯类、根茎的萝卜、莲藕，茎叶的白菜、油菜，以及菌类的蘑菇、木耳，还有莴笋、茄类等。

瓜果品 通常叫做干鲜果品。有苹果、杏、桃、李、梨、葡萄、石榴、柿子，也有枣、莲子、瓜子、核桃等果实，还有冬瓜、南瓜、西瓜、甜瓜、黄瓜等。

调味品 有盐、糖、醋、酱、姜、辣椒、芥末、胡椒、花椒、桂皮、茴香，以及味精等。食醋自酿，酸、咸菜自腌，辣椒、大蒜自种。地方风味饮食，以酸辣为主。

二、节庆饮宴

当地人每逢年节、婚嫁、丧葬、诞寿等日子，皆讲究饮食品味花样：

节令饮食 逢年过节，穿新衣，吃荤食，成为民间饮食的重要特色。正月初一早饭吃臊子面或肉饼子，取长年平安之意。午饭吃八跨五的酒席。正月初五（五穷节），要用高粱或玉米面打搅团吃，俗称炼穷气或缠穷气。因有大肉臊子、油汤相配，故有“五穷早上的搅团便饭，胜过三十初一的酒肉长面”的说法。初七要吃拉魂面。元宵节早吃长面，中午酒席，晚上要吃元宵。正月二十摊煎饼，借以纪念女娲补天之功。二十三要吃搅团，缠疖（一作干）魔。二月二炒豆豆，扯长面。清明节要备菜祭祖，分食猪肉；端午节吃粽子，纪念屈原投江。中秋节吃月饼，赏月华，同时品尝时鲜水果。重阳节吃枣糕、柿子、饮黄酒。十月一祭祖献饭。腊八节要吃以玉米糝、黄豆、麦面条、胡萝卜、白萝卜、白菜丝、豆腐、核桃、杏仁等煮成的粥饭，称为腊八粥。民谣说：“腊八吃得早，地里不长草。”腊月二十三杀鸡宰猪，饮酒食肉。腊月三十吃团圆饭，喝辞岁酒，并蒸馍包饺子。俗话说：“廿三晚肥肉解馋，三十晚瘦肉凉盘。”

婚丧饮食 红白事的饮食中，红事是正式席面，而丧事则因事忙乱，称流水席，不太讲究。每遇红白事，主家都要设宴酬客。婚嫁时饮食格外讲究：迎亲前一天晚上，要请乡党邻居来帮忙，名为请执客。由大家推举的执客头安排事体后，主家备办酒席，感谢执客。迎亲时，女方要送给男方食用礼品，九碟小菜，一圈烧酒。男方对送亲客人（俗称娘家人）的招待，一般是两餐，叫做“早汤午席”，上午挂面，正午宴席。婚后新娘回门携带礼品，娘家须回礼。遇丧葬事，也要请执客，先茶后饭，名叫喝汤。饭后端上酒菜，请执客就座饮酒吃菜，孝子敬酒磕头。葬日的前一天吃晚饭，以臊子面或挂面为主，叫通肠面，也有吃米汤、蒸馍、素菜、辣子的。还要给死者上献饭，一般是四盘菜一盘馍；接着请所有亲戚按亲疏内外吃奠饭，先饮酒后上菜、馍。奠饭后要为死者迎馔，按肴（押桌）、箸（竹筷）、酌（酒）、饌（一席菜，可分3—4次迎）、食（馍）、羹（汤或茶）、饭（面条）顺序依次迎完，最后由亲戚奠酒，先客后孝。葬日起灵前席口备有四盘菜、馍，一般吃的人很少。下葬后奠酒献饭，并请客人吃饭。

诞寿饮食 每逢诞寿庆日，当地人也讲究宴宾。凡是家中有新生孩子的，亲邻友好携带鸡蛋、挂面、红糖去看“月婆”。满月这一天，亲戚来贺

带四色礼，朋友搭干礼（即钱币）。至亲还有带囫囵馍、衣料等的。主家要设宴谢客。凡年逾五十，习惯上称作老人，多数家境较好的人要祝寿宴宾。所备饮食视家庭经济状况而定。

节庆饮宴依席面划分，有下列品类：

八跨五席 即行菜八道，坐菜五道。讲究一道安席的压桌菜——品盘。品盘由垫菜和表层两部分组成，前者多为面皮，多种凉菜和拆骨肉条；后者为猪腱子肉、耳蹄肝肠之类。顶部撒上各色菜丝。摆上酒具、餐具后，请6~8位客人入席上桌。所有席上客满后，专人浇上优质酸汤调汁，方可动筷品尝。品盘开动之后，客人一边饮酒尝菜，主家便一道接一道地端上8个行菜，讲究咸甜酸辣各味俱全，蒸炒炆烩各法都用。行菜多以烧头肉、红烧肘子、烩酥肉、炒肉片、炆肉片、雪花肉片、糖醋肉片、红烧条子肉、大升官、苜蓿肉、大油素饭、八宝甜米饭、蜜饯洋芋、酸辣肘丝等菜中选取。最后一道菜是烩完肠，意为行菜完汤。随后撤去酒具，抹净餐具，再上五道坐菜和蒸馍。故称“八跨五”席，多见于长武县城乡。

山台席 三原县民间的婚丧、喜庆和迎宾举办的宴席，讲究凉盘、主菜、面点、坐汤、酒果茶水五类齐备，用料、作工、色泽、造型、口味、制法各各不同。对整桌菜肴，要求在相辅相成、协调统一的情况下，按季节和对象具体确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山台席，是以牛羊猪肉和禽蛋为辅，山珍海味为主菜的宴席。其格局是：凉盘为十三花（一个中盘，十二个围盘）。主菜为包括后四道一块上的菜。它是由炖、烧、焖、蒸和炸、熘、爆、炒等法烹制的菜肴，既有用蜜汁、拔丝、挂霜等方法制作的甜菜，又有扒、贴、煨等烹饪和叉烧、焙制的大菜。山台席主菜除后四道可多至十六件、从菜二十件。还要加上四个坐菜。一般应是一马三从或一主二从，如主菜是清蒸鱼翅，则从菜便是瓢金线、烩口蘑。其盛器要用三大件：海碗、海口和尺盘。面点：一般分别配有蒸馍、花卷、荷叶饼、米饭、水饺、面条。也有配千层油饼、泡儿油糕、油酥饼，以及名贵糕点、什锦包子、烧麦饭的。席间用茶果招待，酒为白酒和甜、苦南酒三种。后四道菜中间还有一个清淡别致、醒酒开胃的坐汤，或加上什锦火锅压轴。送客时赠给每人高档点心一封。山台席要三上三下，甚至要吃一天。开始干果烟茶席一上一下；正式入席定位定杯，凉盘后上二至四个主菜退席间歇，又一上一下；再入席至宴毕。有的还上一道酒菜，只推让不动箸；有的上几道腰盘带小吃，并上特制面点，可以不吃兜着走。主菜件数（包括后四道菜）多少，决定山台菜席规格高低。凡

一马三件、一主二从的，称“大山台”；有主无从、外带腰盘小吃的，称“小山台”；只有主菜叫“准山台”。主菜分八、十、十二、十四件四种类型，加上从菜（不包括带腰盘）为十六、二十二、二十八、三十四件。主菜在八件以下的，就够不上山台席了。

十七围 为秦都、渭城两区民间订婚或结婚的主要宴席。十七围除要上四个荤菜、四个素菜和四个干果再加一盘糖（俗称十三花）以外，还要加上四个花样。通常是三仙头、丸子尾。过去常以豆芽为结席菜。近年又增加了牛肉、鸡鱼、排骨等。

除此之外，各县区（市）还有多种流行宴席用菜，诸如“海菜席”、“荤席”、“素席”、“糖席”、“瓢和席”、“五魁席”、“重八席”、“重九席”、“满十席”、“八围一”、“五碗菜”和“八大碗”（丧事埋人多见）等。

三、名特吃食

咸阳市境各县区（市）名特小吃花样繁多。

圪塔面 平原各县名吃之一。先把肉切丁割丝，剁成茸末，投入炒瓢上火烧煸炒，火力先大后小，待肉末散开，煸出香味来时放入葱花、姜末、盐及佐料，不停翻动，加入鲜汤浇开，撒入味精，盛碗即成干熘臊子。再把煮熟的面条，用筷子挑起绕成团状，放入酸汤碗中。吃时将团状面条抖乱，挑入另一净碗，浇上干熘臊子及调味品，搅拌均匀即可。因臊子肉末大都粘附于面条之上，故称猴儿上竿，味极鲜美。

千层油饼（塔） 三原县名吃之一。先将猪板油剔皮切丁，剁成茸末，并与五香粉、细盐揉匀。再将葱姜汁水放入盆中，倒入面粉调匀揉成面团，过一会儿擀成薄面皮，再将猪板油茸末匀抹在面胚子上，卷起切成细条，一寸长为一块，用手将细面条拉起盘成塔式，便成为千层油塔的坐胚。笼屉格上搽油后铺上面皮，摆上油塔胚子，再盖一层面皮为被。置开水锅上焖蒸一小时左右，即可出笼装盘。如果将油塔生胚放在油锅上，用慢火煎烙，至两面呈金黄色，即成千层油饼。亦称金钱油饼。熟后拍松装盘，即可食用。

绿豆糕 三原县名吃之一。先将绿豆拣洗干净倒入锅内煮熟，不可破皮；出锅后摊开晾干，脱皮碾成绿豆粉。再制作澄沙，将小豆洗净后按一比一的比例放入锅内。先以旺火煮开，再以文火焖煮。豆烂之后，用铜丝筛搅碎过筛去皮，控干水分提取豆沙，并与糖浆一起用小火炒至干稠，放入香油及桂花拌炒，即成澄沙。然后将白绵糖掺入绿豆粉中，当中开坑倒入香油、

蜂蜜，搅成绿豆泥，再揪成小团，放入澄沙馅，包住后填入糕模里，压实削平，磕出后即为清香爽口的绿豆糕。

包瓢紫酥 三原县名吃之一，先将面粉上笼蒸熟，出笼晾凉，掺入白绵糖、熟猪油，搅拌均匀，并用刀擦成油酥甜面。然后将酥面放入盆中，倒进香油、蜂蜜搅匀，揉透成圆团状，盖上湿洁布醒十分钟后，拉成长条，改切成核桃大小圆饼，把圆饼擀成小薄面皮，包入澄沙馅捏拢收口，填入糕模里，压实削平，磕出即成酥香可口的包瓢紫酥。

牛羊肉泡馍 各县名吃之一。先把牛羊肉剔去大骨，剁成大块。经过一漂、二剔、三旋、四冲后，再换三次水，浸泡六个小时方可下锅去煮。煮时先用大火烧一个多小时，转用文火炖五六个小时。用调料的原则是：小香出头，花椒少量，苕卜大补，草果杀腥，上元名贵，八角香浓。要一簸、二拣、三冲洗，然后包成大包，下入锅内。如此瘦肉别致，肥肉不腻，汤浓味香。吃法有五：一为干泡，煮时用汤很少，喝汤另取原计；二为叩汤，汤比馍多；三为水围城，用汤很多，能围住馍；四为单子，即用热烧饼夹肥肉，然后再上汤；五为馍碎，即烧饼掰得碎细，汤料容易渗入，吃来可口，易于消化。

石子馍 各县名吃之一。先用精细麦面粉、细盐、调料粉、碱面、猪油、鸡蛋、酵面等加水搅拌，揉匀后作成圆形薄饼，再把生饼放入平底锅内烧热的蚕卵石中，上面又盖一层热石子，上下热力夹攻，数分钟后刨去石子，凹凸不平的石子馍就焙干熟透了。做好的石子馍色泽微黄，香甜酥脆，不潮不霉，携带方便，为探亲旅行的实惠干粮。

饸饹 淳化等县名吃之一。大都以荞面为原料，调面时比较用力，须拿准水分，压出的饸饹以“长光劲，口感好”为上乘。浇饸饹的汤，要用小丁豆腐、红萝卜、肉丁、黄花、葱花、香菜等佐料。煎汤时油要汪，辣子要红，调料下准，汤烧得煎，吃到嘴里才又辣又香。

刀离面 各县面食中常见的一种手工面。讲究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捞进碗里挑不断。做饭时，一个锅煮面，一个锅煎汤，放大肉为荤，放豆腐为素，佐料不一，风味各异。农家手工长面有“薄筋光，煎稀汪，酸辣香”的特点。旧时吃面不喝汤，倒回锅里轮回浇面，俗称涎水面。乾县、礼泉一带较为常见。现已有所改变。

煨鱿鱼 三原县名菜之一。将鱿鱼改刀极细之丝，再放入火煨制。先用旺火烧开，再文火焖煨。鲜汤一次加够，要菜熟而汤尽。

烧烤乳猪 三原县名菜之一。先将四五个月的小猪宰杀除毛，从腹部开刀至嘴下，以脊骨为中线剖开，剥去四蹄，但不伤皮肤。再用清水加少量碱反复冲洗，待外皮洁白后，用料酒、盐、五香粉和葱姜汁拌和，均匀擦抹，放入海盐盒内醃渍二三个小时取出，放入清水中浸后控干水分。随即表皮上涂抹一层饴糖，再用火铗镊起烘烤，边烤边刷油，烤好后的乳猪又酥又脆。

带把肘子 三原县名菜之一。先将肘子刮洗干净并修割成方块，放入清水锅内用旺火煮开后，再焖煮1小时取出，趁热用糖色遍涂肘子皮部。再将肘子皮朝下放案板上，将肉切割成八分方块，不可伤皮。置入大盘中，加进冰糖、料酒及适量食盐、大香、桂皮、花椒、葱姜等，倒入原汁原汤入笼蒸熟，约1个小时。撒上味精，拣掉调料，放平棒骨，即可上席。配椒盐、葱段、面酱三碟及荷叶饼。

白封肉 三原县名菜之一。因这道名菜用筋条肉，且在烹制中以白麻纸封盖，故名。先将煮过的肉平放案上，切成一斤重的方块，用盐和佐料遍擦表里，放盆内醃渍1小时，放入清水中冲洗干净，将肉块置入大盘内，放进长方块肉皮、葱姜、料酒、盐及调料袋（内装大香、桂皮、花椒等）。倒入清水淹没肉块，入笼蒸制，先猛火后文火，约一两小时肉酥烂出笼，拣去葱姜、肉皮及调料袋，撒入味精，凉切条装盘食用。可配葱段、面酱小碟及荷叶饼佐食。

糖醋素鱼 三原县名菜之一。以山药、大豆制品、红萝卜和葱头等素菜为佐料。先将豆腐皮平摊回软，再将山药馅放入卷起，抹上蛋汁，粘上淀粉，即为素鱼。随后入菜油瓢烧三分钟，改小火炸至金黄色，捞出装盘，再爆出葱姜香味，放入红萝卜丝，洋葱丝煸炒，又放进番茄酱，白糖、醋、盐搅动，加入鲜汤烧开。用湿淀粉勾成薄芡，滴入香油及大油搅匀后浇在素鱼上即成。

清香素翅 三原县名菜之一。先将金针温泡切节，每六条一把，拌上少许面粉。再放入炒瓢上略炸即捞出，整齐地摆在香菇、玉兰片丝锅里。然后炸出葱姜、花椒香味，捞出后将香油烧在金针菜（素鱼翅）上。又向碗内加入盐、料酒、味精、糯米，入屉旺蒸半小时出笼。用原炒瓢上火，倒入蒸碗内的汤汁，淋入湿淀粉勾芡，浇在金针菜上即成清香鱼翅。其状似鱼，清香可口。

血条泡蒸馍 长武县名吃之一。先用猪羊鸡鲜血与白面粉搅拌，制成褐红色细面条，蒸熟晾干，存放备用。再在煮了肉的原汁汤中加水煮沸，放入

白豆腐条、臊子、鸡蛋薄饼片、生葱及韭菜碎段、香菜末、油熟辣椒、味精、调料和盐等佐料，配制成油质高汤。讲究油厚汤旺，一口气吹不透。然后将干血条下入汤内煮软，盛入碗中，只见红、黄、绿、白、褐五色俱全，香、辣、咸三味齐备。碗中以汤为主，血条柔筋可口。再泡上又熟又软的白蒸馍，边吃带喝，实为美味佳肴。可配以熟红、白萝卜、豆芽凉菜等。

水豆腐泡锅盔 长武县名吃之一。水豆腐是用石膏或盐卤点了烧开的豆浆后，凝结成的细嫩豆腐（俗称豆花）与豆浆的合称。先用半斤或一斤锅盔掰成小块放在大锅中，然后倒在盛有豆浆的铜锅内煮沸，待煎煮到沸腾时舀入锅中，再将豆花放在凸起的碗中馍块上，浇上鲜红的辣椒油、盐水，碗中红里透白，白里透红，恰似牡丹花，香味扑鼻。当地人常用为早餐。

黄酒冲蛋花 长武县名吃之一。先用铜壶将黄酒热沸，再倒入盛有鸡蛋糊的碗中，被冲热的蛋花立即漂浮在黄酒上面。这种黄酒是用酒谷米为主要原料土法酿制的，煮熟后具有较高的粘性。所冲蛋花营养丰富，香甜美味。

酒枣 彬县名吃之一。先选用个大、色浓、熟足、红透的晋枣，用水小心洗净，晾干，拣去破碎有伤的，再用上等白酒半碗，将大枣放入翻滚浸泡一两分钟，取出后置入干净的瓷罐或瓶子内，用净土或胶布、烛液将罐口严格封闭。放置于阴凉干燥处，来年春节时可启封食用。拆封后枣质与鲜枣无异，食之清脆，枣酒醇香，别具风味。

蜂糕 彬县名吃之一。用2斤麦面，8两蜂蜜（多加更好），3两清油。先把面粉发酵，加入适量碱，以面团无酸味为宜，再加蜂蜜、清油，揉和均匀，以软而不流为限。再用麦面擀成薄面底，衬在笼屉上，将蜜面团倾于其上，抹成五厘米厚的平面，在热处温发一个小时。上蒸笼烧熟后，稍晾片刻，剥皮去底，完全冷却后切成菱形小块。放入瓷盆，以免风干。蜂糕甜酥绵软，可健身补脾。

油炸果子 彬县名吃之一。用2斤精制面粉，6枚鸡蛋。1钱花椒熬成汁水，食用黄色素少许。先用花椒将面粉拌成穗状，加入鸡蛋、色素、食盐揉合，擀成薄皮，切成方形，长宽均为三五寸大小。对角叠成三角状，用刀在上面划出细条，再把两边长尖拉曲成圆盘形，粘合破口处，入锅油炸。炸时用筷子将面皮压平舒展，待面呈黄色捞出，趁热放平，晾干即成。外圆内包细条花样的果子，入口脆酥芳香，寓意团圆吉祥。

雪梨膏 彬县等县名吃之一。用梨去核去蒂，清水洗净，切成碎片，再用清水二倍，入锅熬成糊状，滤去梨渣，再用文火边熬边搅，至梨汁成紫色

发气泡时，装入瓷器。亦可配以白糖、人参、附子、干姜、丁香、没药、乳香、蜂蜜、橘红、陈皮、茵姜等佐料，既是上等饮料，又是滋肺阴、治咳嗽的佳品。

蜜酒 各县名吃之一。用3斤蜜水，配1斤食醋，3两白酒，5钱酒曲。和匀后盛入瓷坛密封，放置温热处，待过四十九天即熟。饮来酸甜可口，气味芳香，多饮能醉人。

酸汤面 各县名吃之一。其制作工艺是：将劲麦面粉加适量碱后揉搓结团，用压杆压半小时后，再反复揉压，待其由硬变软，再将谷子面或玉米面撒上折叠起来，用摆刀切成细条，收成1斤重的把子，分层放在簸箕或托盘内备用。臊子作法：将菜油入锅烧煎，再把小碎块肉倒进锅内，比例约为二十比一，铲刀搅炒至大肉油出，再加原生质五香料面，放入少许水，文火烹熟，以肉烂水干为准，再加辣面即成。调汤作法：把煮过大肉的原汁汤倒入砂锅内，加各种调料小包随汤同煮。调料顺序是：一盐二醋（醋必出头）三漂菜（春夏韭菜，秋冬葱花、蒜苗）。再把鸡蛋摊成薄饼切成碎屑漂在汤上。捞面不可太稠，每碗一筷头为宜，汤浇多半碗，用小勺加臊子即成。

茴香馍 永寿县名吃之一。其制作工艺：先将精粉少半作酵面，多半作兑面，加碱合成。然后切成约3斤重的团块，每块用压杆挤压三四遍，达到柔软光滑程度后，用湿布蒙住放入盆内。再将菜油、小茴香和盐掺和起来，把压成的面块搓成长条，再揪成2两重的小块，包蘸茴香油团成馒头状，然后用薄刀片转圈切成齿状花边，用木板压成厚约寸许的圆饼，再在两层鏊锅上烘烤。入鏊时先放上层，后放下层，约烘20分钟，即可烤熟出锅。

琥珀糖 原名虎皮糖、皮糖。秦都、渭城区名吃之一。其制法是：以小米加大麦芽为主料，先熬成饴糖，再加进白糖、核桃红、生姜粉、陈皮、桂皮和冰碱等辅料配制而成，具有补中益气、养血健体等功能。其颜色金黄，酥香可口，食不粘牙。因形似琥珀，故名。

花狗馍 兴平等市、县名吃之一。先用发面做成一个圆饼作为馍底。然后分别以小盆、大碗、小碗作模具，将揉合好的面胚扣在上面。入屉蒸熟后，趁热取出盆、碗，撕去面皮。次日将馍底放在案板上，把其他胚子按大小顺序放于馍底上，中间以一根竹棍固定，修好外形，再擀一张大面皮将馍胚包严包实，在底与馍相接处做一圈卷花，再做四朵菊花嵌入馍体四周，然后做一个大狗及两条巨龙，及一些花鸟虫鱼果蔬等，将龙盘绕于馍周围，将狗插在馍顶上，四周布满各种花样，入锅蒸熟，花狗馍即成。其馍形下圆上

尖，略呈塔形。大馍底盘直径约一尺半，高约一尺六七，小馍底盘直径约一尺一二，高约一尺三四，大馍用面一斗，小馍需六七升上等面粉。一般需二三人用两天时间才能蒸成。花狗馍因顶有大狗得名，意取吉庆祥和，百业兴旺。多为重阳节时娘家送给新嫁的女儿及小外甥的礼当。

乾州鸡面 乾县名吃之一。先取一公一母两只鸡的鸡脯肉，反复斩切，制成肉酱。又在案板上铺一张净纸，撒上细碎淀粉，然后捏成一团，压成扁饼，用一棒槌般粗而短的擀杖，反复拆碾，几分钟便擀成一张直径四五十公分的薄饼。随即抖落淀粉，入开水稍一氽，取出平铺在案板上，即成鸡脯肉煎饼。然后切成韭菜般细条，入碗，加高汤和各色配料，上笼蒸约20分钟，即可制成鸡面。其面长约20公分，既柔软又筋韧，适口耐嚼，鸡味浓郁，鲜美异常。

第三节 居 住

咸阳市境渭河流域是国内仰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原始村落遗址多数位于发育较好的马兰阶地之上。遗址面积一般在数万或十数万平方米之间，大的还有几十万平方米的，如秦都区尹家村遗址可达100万平方米左右。各遗址均不同程度地保存有房基、陶窑、灰坑、墓葬等生产生活痕迹。长武县下孟村发现有7座房屋，皆为中小型方形圆角半地穴式住宅；武功县游凤村发现多件陶屋模型或陶器上的屋形装饰。西周早期墓葬多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居住面比较平整且用火焙烤过，靠墙处多有凹入地面的椭圆形小灶。晚期为圆形半地穴式坑，墙壁表面涂有细泥，居住面也抹一层黄土细泥，平整而坚硬。屋内有灶坑，室外有斜坡形的出口。这两种房屋，皆是陶复陶穴式住房。周秦以降官府多为房、楼，砖木结构或土木结构，大量遗存的秦、汉、隋、唐建筑瓦块和建筑材料，可以表明当时建筑住房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近代以来，因咸阳地处秦岭以北，北山以南，泾、渭两河迤邐过境，冬冷夏热，故民居庭院大都南北极长，可免日晒风激。由此可分为两种情况：渭河沿岸的平原民居，是以木构架、土坯墙、夯土墙、砖墙为主要原料建筑的单层坡屋顶（俗语：“房子一头盖”）；渭河以北的台原地区断续分布有少量土窑洞民居，原来多用于住宅，而现在多用来存放鲜果及柴草。渭北二阶台地的后缘，黄土台原土层深厚，原面广阔。由于平原与台原接壤处黄土质地坚硬，多数民居就在向阳的原壁上开挖窑洞，有的因地掘穴，把地穴窑洞

和地面房屋组合起来，成为独立的院落。据三原县 1990 年统计，该县 750 个自然村中，原有各种窑洞 23017 孔，总面积达 62 万平方米，约为当地民房面积的十二分之一。

境内民居，以其建筑样式可分为瓦屋平房类、窑洞居室类和楼阁类。

一、平房类

咸阳市境平原地区（包括台地、平川），村镇布局多数比较集中和规整。平面多呈矩形或圆形。道路比较平直。村落选址一般要求交通便利，地势高爽，有利于给、排水而尽量少占良田。原来人们住房多为肩靠肩，背挂背。由于经济文化发展较快，也还有古城堡式的住宅布局。讲究后檐长于前檐，楼房高于门房，取意后世绵长，更加兴旺。原先许多宅院门前皆有砖雕、石刻之类表现于碑头、碑亭、石碑坊、影壁及拴马桩上，今天仍然常见到石墩狮、石头台，以取吉避凶。其平房以厦房为多，安间多用于正房。其住房可分以下几类：

独院式平房 多沿用地四周布置房间，由前向后，依次是门房、庭院、正房和后院。为了多争取使用空间，在庭院四侧布置两栋单坡顶的厦房（即厢房），组成四合院子。现有以二层楼为正房，辅以厢房、灶房的。一般讲究长辈住正面上房，晚辈住厢房。

纵向多进式平房 由独院式平房沿纵深方向重复组合而成。多以二进、三进为主。现因人多地少，经济实力限制，已很罕见。但各县市区仍多有保留，如泾阳县安吴堡东院寡妇住宅，即为多进式平房。一般长辈住正房居上，晚辈住在侧翼。

横向联院式平房 指将几幢多进式宅院，用几道墙门横向联通，为独家独户使用的民居类型。各院之间高墙森然，但有门通透，形成正院和偏院之分。现在亦很罕见。旬邑县唐家庄园原来结构就是这样。仍讲究长辈住正院，晚辈分住偏院。

二、窑洞类

原壑地区村镇常常靠山顺沟布置，用地也比较零散，不够规则。这类村镇的选址都傍山，靠崖上坡，不占良田。窑洞位置向阳高亢，既防洪涝灾害，又便于出人行止。由于黄土层深厚，稳定性能好，雨量稀少，加之当地

木材资源匮乏等，促使这一带群众习惯上大量采取窑洞民居的形式，既节省建材，又节约能源，具有冬暖夏凉之利。人们住房多呈散居状态，仍保留其自然属性。其墙壁多经草泥粉光，崖壁上的女儿墙高出地平线，或作青瓦挑檐，以保护墙壁，防止雨淋。讲究按辈份高低择房而居。从窑洞民居的类型看，有下列几种：

靠崖式窑洞 窑洞依山靠崖，顺沟布置，一般每户前都有院落。或者靠坚实的原生黄土层开挖窑洞，洞前经过平整后，砌围墙形成一个院落，一般在围墙中部开大门。或者在山坡转弯处取土下切，沿两垂直崖壁开挖窑洞，其余两边砌筑围墙，并开辟大门，形成院落。或者当山坡前用地较窄时，在山坡上切土，前边砌筑围墙形成凹院，在三个崖壁上开挖窑洞。靠崖式窑洞多见于北部诸县沟壑纵横地区和沿嵯峨山—北仲山—九峻山—五峰山等中部山脉形成的旱腰带坡地。现在人们逐步改住平房。一般正房为长辈居住，且用来待客宴宾。

下沉式窑洞 俗称“地坑庄子”。在渭河以北台原地带，如旬邑、永寿、淳化及泾阳、乾县、三原、礼泉北部山麓地带，居民多挖有下沉式井形院。沿四周崖壁挖窑洞，形成地下天井式四合院。下沿式天井四合院的尺寸，当为长宽各9米左右时，四周可开凿8孔窑洞；当为长9米、宽6米时，可挖6孔窑洞；其中有一孔留作门洞，设有斜坡形通道升上地面。然后再用胡基将洞顶圈箍起来，以防雨淋。由于家庭人口和经济条件的差异，洞室的数量和院落的布置也有所不同。例如乾县吴店村吴宅是典型的长宽各9米、有8孔窑洞的“八卦窑庄”。其起居室、厨房、贮房及厕所都主次分明，主要用住房向阳的原则沿四壁布置。现在住下沉式窑洞的人口逐年减少，且多数在出洞口前地面修建安间或厦房，同地下宅院联为一体。

独立式窑洞 又称平地“砖箍窑”。或者设围墙自成一家，窑室少则二三孔，多则十一二孔不同，形成一个大的窑院。或者与砖木、与土木房屋混合布置，称为前房后院。院落为四合院式，出入洞口设在右边第一或第二开间，大门后退，门内形成门厅，经过门厅照壁进入庭院或前院。讲究长辈住上房，晚辈居侧房；或长辈住对房，嗣子住上房。

三、楼阁类

咸阳市城镇地区（包括市区、各县城和少数集镇）居民住宅相应集中，且多以楼阁类为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住宅小区的建设速度加快，居民

住宅以二三层至六七层为常见，建筑面积和室内布局也渐趋合理。从砖木结构到钢筋混凝土浇灌结构，体现了居民楼阁类住宅的发展变化。此类住宅可分三类：

单元式楼房 多为单纯居住性楼房。根据其房间多寡，可分为一间半、两室一厅、三室一厅、四室一厅或两厅等。一般均为多门洞式住宅楼，每层以二户或三户为常见。90年代以来，客厅功能逐步加强，而居室相应缩小。室内装饰依其经济实力有高下之分。一般居住者多为城市工薪阶层，也有部分城郊居民。

独院式楼房 多为县城或市郊经济状况较好或土地面积较宽地区的民宅。现在农村独院式两层或三层楼房也比较多见。一般可分为两间两层、三间两层或三间三层、多间多层等。一般多为底层住宅，上层出租或存放物品。三原县大程镇东周村楼阁式住宅群，尤为典型。

临街式楼房 在城镇地区，临街房屋多为半商用、半民宅式建筑。一般上层住人或放物，底层开辟门面。如三原县城北大街、渭城区中山街和礼泉县沿西兰公路的商宅两用楼房等。旧时多为砖木结构，现在已多数采用砖混结构。市内各县城主要临街店铺，均是此类。

第四节 行 旅

受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境内居民有“好出门不如歹在家”的恋家习俗，民间旅行里程偏近，且较少禁忌习惯。民间路规为：轻车避重车，棉花车避瓮车，骡车要避老牛车，上坡车避下坡车。

一、访亲旅行

生活在咸阳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很早就进入了定居的农耕生活，安土重迁，不肯背井离乡。加上南有秦岭、北有北山，西出阳关故人稀少，东出又有潼关屏障，所以对外经济、文化交往比较困难。帝都在关中时，尚能容杂五方习俗，会见四海宾朋。帝都东移后，便日趋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在姻亲关系上，大量存在的是远不过三五十里，近只有邻村旁舍的频繁亲戚网络，所以访亲旅行距离较近。由于历史上人口流动造成的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省居民，同其迁出地仍有血缘联系，习惯上靠讲究辈次、共同祭祖等办法彼此沟通。但因市场经济发展迟缓，加之长期以来人民生活

比较贫困，这些联系也无法保持长久。建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对外交往视野拓宽，姻亲往来也逐渐广远。一般情况下，当地居民对访亲活动都非常重视，形成了许多规矩和仪节，凡遇四时八节要携带礼品馈送亲友，婚丧诞寿等家族大事也都互通声气，礼尚往来。但礼节的轻重，关系的疏密，既有血缘关系的因素，也有经济社会交往的影响。

二、打工旅行

咸阳市域地分南北。由于农作物成熟有前有后，所以每逢夏收时节，北部诸县群众成群结队地南下打工。特别看重的活路是收割麦子。因麦子沿渭河一带最先成熟，逐渐到中部渭北旱腰带地区，然后才是北部诸县。前来收割麦子的人叫“麦客”，大多步行或乘车南下，割麦后当场兑现工钱，房前屋后随便找个地方休息，次日凌晨四五点钟就赶到集市等待雇主邀约，工资依市场行情有消有长。50年代每亩收割费为5角至1元不等，后因交通、生活费增高，涨到20至30元钱，有的达到50—60元不等。麦客要自带被服、镰刀和磨石，吃饭由主人安排，习惯上不得登堂入室。例如泾阳县一带相传俗谚有“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及王村一撮毛”，就是由这些昔日财东对待麦客的态度不同传出的。有说法认为，有一年麦收遇雨，前三家皆不收留麦客，而王家宅心仁厚，不但为麦客提供饮食，还为之提供住宿，故麦客颇为感激云。

近十多年来，打工活动已由步行改为乘用三轮车、拖拉机及公共汽车；打工范围也不限于收麦，而涉及果树栽培、蔬菜育苗和其他农作物的收种活路。尤其是礼泉、淳化等县大片果树林发展起来后，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甚至已出现少量城镇剩余劳动力下乡打工的人流。相形之下，平原地带的民工开始从事建筑业，后来又投身乡镇企业，已大踏步地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走向城市，特别是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开发力度的加大，到沿海沿边地区打工旅行也逐渐普及。

三、军兵旅行

咸阳位居中国西北的重要中枢地区，历史上军事活动十分频繁。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篇《兵车行》写道：“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就生动地描写了唐时青年出征塞外的离别情景。据文献记载，这时的军兵旅

行，常常要携带“鞞鞞七事”（包括算袋、刀子、砺石、契苾真、哆厥、针筒、火石袋），蔚成习俗。清代左宗棠率兵西出新疆，一方面追赶包括泾阳、咸阳等县在内的起义回民，一方面抵御沙俄侵略，沿途植树，边走边修路。民国时期，淳化、旬邑等县是革命老区，多有青年奔赴陕北或抗日前线，参加革命活动；同时也有外地知识青年经市境北上延安。建国前夕，随着西北野战军解放大西北的进军步伐，当地青年纷纷入伍，效命沙场。不少人屯垦边疆，不再回来。建国以后青年从军，全村欢送，佩大红花，骑大红马，深受群众支持。80年代后，城乡青年仍然踊跃参军，把部队当作扩大视野、锤炼筋骨的大熔炉。

四、经商旅行

咸阳不沿边不靠海，但交通枢纽地位显著，历来经商旅行成为当地人们最主要的外出原因之一。从文献记载看，其经商旅行的线路大致有下列几条：沿宝鸡一线南下四川、贵州经营盐铁生意，自贡井盐的开发即应归功于陕帮商人；沿天水一线可到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带，仍以茶、盐、丝绸和皮毛贸易为主。境内虽不产茶，但泾、三原一带却曾成为西北砖茶制作、贩卖的重要集散市场。东出合阳、韩城一带越黄河到达山西，也是晋陕商人互相沟通的一个重要旅行路线，其货物以铁器、食品等为主。此外，还有东出潼关或南下武关到达河南、湖北，进一步走向江南一带的。明代中叶以来，这条路线就是东输皮毛特产，西运海盐、丝绸制品的重要途经。境内各县有名的大商号，在省内外广设当铺、商店和经营盐铁生意的贸易货栈。三原县鲁桥镇孟店周家，泾阳县蒋路乡安吴堡吴家，王桥乡于家、姚家，旬邑县唐家等，其商号近及西安，远涉川、甘、苏、淮一带。这些商号大都采用股东制和经纪人的办法管理，一般都要派自己的亲邻子弟学习经商手段，逐步发展为“分红破成”的合资生意。所以这些早岁出门的相公娃，常常成为人们寄予同情的一个对象。例如于右任先生的祖辈、父辈男丁，皆下四川岳池县经商。这些外出经商的人，年轻时离家都要经过一番磨难。兴平县民间流传的送子出门歌谣唱道：

第一盅酒斟给天，孩儿出门保平安。

第二盅酒斟给地，孩儿出门脚底利。

第三盅酒斟给爸，孩儿出门在啊达。

第四盅酒斟给娘，孩儿出门泪汪汪。

第五盅酒斟给哥，拉粮运草你管着。

第六盅酒斟给嫂，妯娌们过上你要好，人家多吵你落好。

第七盅酒斟给妻，少擦脂粉娘家去，少穿绿红门上立，
省叫人家说是非。

第八盅酒斟给弟，哥哥走了常打听。

第九盅酒斟给妹，跟上嫂嫂同床睡，金镯银镯捎两对。

第九盅酒斟给狗，孩儿走了要你前后守。

外出经商的人，每到年事稍高，就要打道回府，叶落归根，投资于地产或公益事业。清末民初，泾阳县安吴堡的掌权人寡妇周氏，因善于经商理家，字号达二三十处之多，俨然成为西北闻名的巨富，后来投资地方教育事业，耗资巨大。设在泾阳县王桥镇的旬邑唐家，下川做生意沿途不住他人旅店，在清代陕西也是富甲一方的。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陇海沿线农民纷纷搞起长途贸易，以乾县三眼桥布匹市场，秦都、泾阳蔬菜批发市场，礼泉苹果市场等为主，民间贸易日益广泛。三原熏蹄、兴平辣椒也走出关中，漂洋过海，祖祖辈辈蜗居于黄土地上的咸阳人大胆地向外走，一次比一次剧烈的经商旅行热潮，借助现代化的交通条件，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三六九，出门走”等片面的禁忌心理已大大淡化。原来常设外地的“山陕会馆”、“西秦会馆”或分县分馆，也以经商办事处或联络处名义重新出现，成为人们经商旅行的重要桥梁窗口。俗语云：“穷家富路”，意指出门在外的人要多带盘缠，以防不测。

第三章 礼仪习俗

第一节 婚 嫁

一、婚姻制度

当地流行的婚姻制度有下列几种：

一夫多妻 一夫多妻制是旧中国的婚姻制度，昔日的封建帝王、官宦士绅大都妻妾成群。除过妻子是法定配偶外，纳妾几乎不被纳入婚礼程序，甚至等同于上街购买货物，故“妾”在封建大家庭中是毫无地位可言的。妾生的儿子因是庶子，家庭地位不可与嫡子相比，在家产继承方面也没有平等的权利。

一夫一妻 旧中国一般百姓大都一夫一妻。建国后，法律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

招夫养夫 指前夫因病不能料理家务或从事劳动，女方可用招夫的形式，再找一个男人入住丈夫家，共同生活。

招赘 为了承嗣需要，采取女婿进门的办法，婚后男子成为女家的一员，一般长子或长女姓氏随女方，次子或次女可仍用男方姓氏，意在使女家香火绵延。现在民间仍偶有存在。

童养媳 旧时家境贫寒人家养不起女儿，遂将女孩自幼许配男家，待成年后举办婚礼，名叫圆房。建国前，境内童养媳现象比较普遍，贫困地区的少女常被寄卖与人，受到公公、婆婆的不公正待遇。建国后基本绝迹。

冲喜婚或冥婚 旧时当男女订立婚约以后，未到结婚年龄，未婚夫病急，便提前择日迎娶，叫冲喜婚。倘若丈夫死亡，女子终身守寡者，可继承家产，也可以寡妇名义改嫁。倘若未婚时男女中一方死去，生者不忍弃约，就用人或物代表死者嫁娶成婚，叫冥婚。女死男娶叫鬼妻；男死女嫁叫抱主、成主或归门守孝。据文献记载，唐代就出现了这种冥婚现象，今天已经绝迹。

过继婚 又叫转房婚。包括叔嫂成婚、兄弟妇婚等，俗称转房。建国前兄死妻归其弟或弟死妻归其兄，尚属多见。现在个别山区家庭为抚养死者遗孤或保证财产不外流的，偶尔也沿此婚习。

二、婚姻形式

包办婚姻 一般婚嫁男女未成年时，就由双方父母通过媒妁之言包办订约，待其成年后始行结婚。这种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但也有甘攀大户或只求儿婚女嫁的。至今境内山区边远地带包办婚姻仍很普遍。由于互相缺乏了解，或后来一方身体有病，或双方彼此缺少感情，婚后多数都只是凑合度日，真正情投意合者极少，也有因婚变造成恶性事件的。在经济落后地区，因包办婚姻习惯上不许反悔，否则就要赔偿经济损失，家境贫寒者轻易不敢

悔婚。

买卖婚姻 在缔结婚姻过程中收受较多彩礼，这种婚姻形式比较常见。建国前多以粮、棉、布计价，后以现金或衣料、家具等估计。一些偏远落后山区买卖婚姻仍很盛行。多数地区要求男方馈赠一笔数量可观的礼金，女方多半留作家用，少半陪嫁；也有女方不要聘金，却要求家庭现代化的，或将要来的礼金作为陪嫁品再带回新家的。

抢婚换亲 指采用强制手段抢成婚姻或因家贫需要为孩子交换配偶的婚姻方式。多数情况下，“抢”的时间、地点、对象是双方都知道的。礼泉县局部地区讲究天明前娶妻，可能即是一例。

自由婚恋 从20世纪30年代起，境内部分地区推行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婚姻条例》，首次提出了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口号。建国后，两次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要让男女青年自主择偶、自主结婚，而且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通婚（如姑舅表婚等）、有严重残疾不宜结婚的人不得结婚等。现在自由婚恋已为城乡青年所欢迎，男女双方通过参加社会活动相互熟识，或经过亲朋好友互为介绍，由男女双方自行决定的婚姻已习以为常。

公开征婚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出现以广告形式征婚或到婚姻介绍所登记择偶现象。多为晚婚、再婚或老龄婚姻者采用，也有因主、客观条件限制不能缔缘的适龄青年参与。

三、婚姻条件

经济条件 男婚女嫁，一般多为男方家中花钱操办。女方择偶时，对男方家境生活、工作环境、个人条件均有所考虑。六七十年代，武功一带女性择偶兴趣是：“一工二干三教员，宁死不跟庄稼汉”。“文化大革命”中，干部频频下放农村劳动，一些女性又对干部产生了恐惧心理，故当时民间有这样的说法：

挑个干部怕下放，挑个军人怕打仗，

挑个教员不理想，挑个工人最稳当。

许多地方受贫困条件制约，女性对男方家庭环境、个人条件的要求近乎苛刻，如武功河道乡流行过的歌谣唱道：

一套家具要新，二老归天要早，

三转一响带咔嚓，四季衣服要挺，

五官端正要美，六亲不认要狠，
七十元工资要稳，八面玲珑要滑，
酒（九）烟齐戒要省，十分听话要顺。

显然婚姻活动同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

年龄条件 从年龄角度来看，习惯上强调男大女小。民谣云：“宁叫男大十，不叫女大一。”根据境内发现唐碑记载，唐代女性的婚龄较小。渭城区底张湾出土的景云元年（701）唐《万泉县主薛氏墓志铭》称：薛氏“年十一，有行于豆卢（兴祚）”。薛氏为太平公主次女，武则天外孙女。景云元年（710）死时，才24岁。又乾陵出土的《大唐永泰公主墓志铭序》云：“（公主）以大足六年（710）九月四日薨，春秋十有七。”永泰公主为唐中宗第七个女儿，久视元年（700）嫁给武则天娘家侄武延基时，年仅16岁。其时崇尚早婚早育，以晚婚晚育为耻。同时，在包办婚姻时代，富裕人家为了早日传宗接代，在男孩幼年时就娶个大媳妇，既当保姆又当妻子。这就是民谣中“女大三，抱金砖”的说法。永寿县民间歌谣唱道：

十七岁姐七岁郎，夜夜睡觉抱上床。
说他夫来年岁小，说他儿来不叫娘。
等到郎大姐已老，待到花开叶已黄。

这是对大妻小夫制的一种控诉。建国后，这种婚俗已被明令废除。

四、结婚礼仪

古代婚姻讲究“六礼”，六礼告成，方可结婚。建国以后，移风易俗，逐渐兴起集体婚礼。如《咸阳报》1991年元月21日载：兴平县丰仪村21对新婚夫妇举办集体婚礼。由该村党支部书记宣布结婚证书，新婚夫妇与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尊老敬老协议书、计划生育保证书，拜访了村里的老寿星、五保户和五好家庭，参观了村办企业，共栽了同心树。集体婚礼可节约开销，有利于新婚家庭互敬互爱，相互学习。

境内婚礼由来已久。从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自己恋爱、自由婚配。其基本礼仪，约有下列若干方面：

送礼 向来男女婚嫁，皆讲究赠送彩礼。当男女到婚龄时，先是嘱托亲朋好友瞅对象，选准后请媒人牵线搭桥。旧时讲究先背见，后会面（叫看屋里），通过互赠礼物，确定婚约。双方彼此同意的，就互送见面礼，反之女方饭也不吃，就起身告辞。事成之后，由媒人与双方约定购买衣料，女方亲

友陪伴选料，男方掏钱。同时也要给男方买四色彩礼，不拘文具、衣物或鞋帽、日用品，各取所需。此间媒妁之言非常重要，当地人常说：“是媒不是媒，要跑七八回。”民间歌谣中，对媒人有褒有贬。淳化县流行的《谢媒歌》唱道：

养儿养得满院红，媒人今日把事成。

百客百主吃过饭，把你红爷都赞念。

一辈媒人三辈恩，迟早到家看成客。

而三原民间诗人谢茂公作《秀女结婚》中却说：

贼媒人，把媒说，他到两头图吃喝。

进馆子，吃啥家，先吃八宝甜盘子，

后吃酥肉肘子炸丸子。……

过去媒人主要是对属相、送庚帖、论八字、定彩礼。男女青年往往“口袋买猫，命由天定”，对媒人的依赖性很强。现在多数情况下媒人只能起牵线作用，男女双方完全可以自主择偶。

订婚 也叫订亲。旧时有些人家在儿女幼年时，便指认订亲。现在一般都待年届婚龄时，先行订婚，便于互相了解，互相往来。遇到四时八节，男方均要带礼去女家追节，而男方家中有事，女方也要过门帮忙，待双方觉得时机成熟时，可择日举办订婚礼仪。一般由男方家中备办几桌酒席，专请自家舅、姑、姐、姨等重要亲戚来贺，女方由媒人和婶婶、嫂嫂、父母亲陪同来做客。吃完酒席后，男方当面送礼，礼品多为先期约定购买的衣物之类。有的也送红封封，内装一定数量的现金，具体数额可提前约定，也可随意给付。媒人坐首席，被款待为上宾。近年来，订婚礼仪日趋常规化，其重要性似不亚于结婚礼仪。

备嫁 过去女方嫁妆包括衣服、被褥、床单、枕头、包袱、门帘、面盆、茶具和餐具等物。有些物品由姑娘自制，有些物品可由亲戚添箱，也可由男方约买。一般情况下，男方提供嫁妆，由女方配齐。民间还有“亮嫁妆”习俗，让亲友知道哪些礼品是谁提供的。至于嫁妆数量，根据双方家庭经济条件商定，也有女方单独出资筹备的。男方为筹办婚礼开销和嫁妆开支，有时要负债备礼。80年代三原县一带流行的结婚条件：

一套家具要组合的，电视机要彩色的，

录音机要双卡的，洗衣机要双缸的，

电风扇要豪华的，电冰箱要双开的。

同时，男方还要缝制被服，准备住室设施。永寿县讲究缝被时四角装上核桃、红枣，缝制人边缝边唱吉祥歌：

双双核桃双双枣，双双娃娃满院跑。

请媒 女家先一天办席，俗称上门筵席，请媒待客。上门筵席当日中午，俗称换服。办酒席时，男家派其姐夫或其他合适人选前往送娶单，与新人开脸等物。永寿一带称为迎女。迎女之人须待开脸完后方可离开，以恐开脸之物不全。同时上午还要派人送衣柜，内装大红礼服，俗称送柜子。中午新娘要修眉整容，捋去汗毛短发，整装待嫁，俗称开脸。而存在于永寿东北一带迎亲仪式中，规定先一天男方要派人携带女方所需陪嫁礼品前往女家，再逮上一只公鸡或母鸡，一条鸡腿上要用红线绑1—2元或5—10元人民币不等。到女方家中解开后，女家还要添上同样数量的价钱，绑在鸡的另一只腿上。迎女的男人当天不必回男方家中，次日才同嫁车返回。迎娶的人到女家后，女方端出三碟馍，每人须将碟中顶部馍抓取收存，俗称抓顶，取意带回儿女。抓顶毕，女家摆出九碗全席。但席中饭菜不能吃，要全部收好准备带走，主人家要另外摆上一桌饭菜才动筷子。

请执客 秦都、渭城、三原、泾阳、礼泉等地在婚前两日晚上请执客。当晚，主人把乡党邻居请至家中，酒肉款待，烟茶议事。先行举荐一名办事干练、熟知乡俗，在村中有威望、有组织能力的人当执客头，由主人委托他安排过事执客分工，选定待客男女仪宾。厨师一般由主人物色确定，其他帮忙人选由执客头决定。执客头又称大总管，总管所有执客。原则上主家的人也要听从调遣。所需烟茶物料，均由主家交付大总管安排。迎亲前一夜烘房，讲究床（炕）不空，必须有已婚男子同新郎共同居住。

迎亲 古代迎亲讲究由新郎亲迎。建国前后，迎亲或坐轿或骑马，或用硬轮席棚车，也有用各式大车挂绸迎娶的。70年代以后或用汽车，或乘拖拉机或骑自行车。迎接新娘时，男方要去一男一女两位娶客，还要带上常规礼品，如大肉2斤、白酒2瓶、莲菜2根、糕点2斤，礼馍油包子各12个（秦都区流行）。礼品一一用红绸子捆扎。女方要有一男一女两位送客，一个或两个压轿男孩，抱着礼盒，内装陪嫁礼物。送亲时，所带礼品有：挂面12撮，大葱2根，还有饺子、蔬菜等。迎亲人马一到女家，烟茶稍待，立即入席。“只吃一口，起身就走”，因为新娘已坐上花轿了。有的地方古风犹存，由女婿亲迎，那就不这样急促了。兴平一带讲究女儿从娘家走出家门（或由弟背上花轿）时，送女的伴娘要搀扶着新娘，手拿一碗，新娘手拿双筷，刚

走出门，伴娘将手中的碗摔碎，新娘将筷子朝后一扔，然后再踏干草，过火堆，上花轿。进轿之后，面朝轿尾（一路都要面朝轿尾），放下轿帘，在鞭炮声中起轿，新娘开始哭嫁：

前年订婚刀割肉，今日出嫁火烧心。

这根铁链谁制造？紧紧锁我身！

现在人们的哭嫁内容已有了新的变化，如：

爸妈从小养我大，今日就要去出嫁。

丢下弟弟和妹妹，谁来洗衣裳？

新娘哭嫁，表示不愿离开又不得不离开父母身边，若不哭泣，邻里人会笑话议论新娘“没皮脸，急着去找女婿娃呀！”一般哭嫁到村外即可。到了男家门外，男方要有一个提斗，里面盛放着大枣儿、核桃儿、麸子皮、谷草秕、纸花等物，一边主持放炮，一边唱着《撒帐歌》。其唱词是：

撒草撒草，俩口子相好。

百年偕老，生个娃娃满地跑。

又如：

一撒麸，二撒料，三撒新媳妇下了轿。

一撒金，二撒银，三撒新媳妇进了门。

新媳妇，好手脚，走路好像风摆柳。

今年娶，明年抓，生个胖娃叫大大。

现在撒帐已用各色花纸屑代替了。新娘下轿之后，每搬一件嫁妆，女方都要索取红包，讨价还价，十分热闹。

合卺 现在叫结婚仪式。新娘要梳洗更衣，换掉来时的衣裳，仪式地点多在设宴的厅堂或帐篷下。先是鸣炮奏乐，再由证婚人宣读证书，司仪主持拜天地，拜祖宗（现在多为拜到场长辈），再夫妻对拜。并请双方家长或亲戚友人讲话，祝新人恩爱和睦，白头偕老。礼成后宣布午宴开始。媒人和男女双方的舅父要坐上席，男方家长和新娘新郎分别一一敬酒，都得从这一席开始。猜拳行令，热闹非凡。宴罢少坐，女方送亲队伍就告辞回家。彬县义门乡一带婚宴上，讲究由主婚人吟诵《新婚礼歌》。淳化西府一带广泛流传的《席前行礼歌》云：

天到今日喜临门，张灯结彩迎新人。

新人带来新气象，这个家庭变新样。

一对新人拜花堂，红花戴满两胸膛。

郎才女貌两相当，好比织女会牛郎。

携手建设新家乡，幸福日子万年长。

亲朋好友喜洋洋，席前要拉下马羊。

据汉代王肃《纳征词》曰：“玄纁束帛，俚皮雁羊。”郑玄《婚物替》曰：“羊者，禅也。”然则婚之有羊，自汉末始也。现在境内淳化西府、旬邑土桥一带仍有陪嫁奶羊的习俗，但因有红事不见白的说法，故吃合巹酒之后拉下马羊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其主要目的是互相借此形式去联谊。当地司仪唱的《拉下马羊》歌云：

天上织女配牛郎，有情男女配成双。

桌前同把喜酒尝，主人要拉下马羊。

先把羊价折公平，不用亲戚再争竞。

中国羊，种类多，提出几种比优越；

铜川羊，尾巴大，走起路来向后蹿；

新疆羊，毛太密，翻沟过河没力气；

甘肃羊，尾巴长，远看好像一只狼；

生产羊，吃草高，一见乏瘦就跌跤；

二转子，质不纯，拉到集上不惊人；

此地羊，也不一，山羊绵羊分两级。

提起山羊真糟糕，不爱吃草光爱跑。

只有绵羊真正好，一年两料下羊羔。

羊虽好，价折好，余钱还要敬月老。

说到此，就算完，请客收了盘中钱。

一般由司仪用盘子端上三五角钱送至席前，由娘家送女主客收下。据说原来下马羊钱要由娘家人陪送，后来则演变为由婆家承负。故娘家人要致答，所唱《答歌》云：

你说得真巧，桌面上把羊价折了。

不管折多折少，并不烦恼。

袖筒虽小，圈羊的地方，

收了羊价，实在菲薄。

主人的酒，客人的手，空里赁个人情。

你俩跑前跑后，敬你一人三杯酒。

你站好，我不走，你取壶子我倒酒。

淳化西部的斟酒习俗，与此相映。

闹房 举行完婚礼的当天晚上开始，左邻右舍的年轻人，新郎新娘的伙伴们，还有那爱凑热闹、贪图开心的自家嫂侄们，三天之内不论大小，齐来闹房。有说绕口令、猜谜语、说笑话、点烟叨花、过独木桥等多种形式。武功县代家乡一带闹新房时，还要唱歌：

种种种，收收收，一收收到山背后。

山背后，麦还绿，娃他爸也往回走！

语意双关，寓庄于谐，不失为古俚曲之遗。

躲节 婚礼过后，娘家的女送客带新娘给婆婆敬酒时，顺便商定接送新娘回娘家时间，一般多为躲三、躲五，还有躲灯、躲干、躲炒、躲刃、住十等“九躲”。新娘子要在日出之前，由娘家、邻居或亲戚接走，日落之后送回，用意在于保护新娘身心健康，让其好好休息。讲究新娘“熬对月”，即新娘在婆家住几天返回娘家住相同天数。当地民谣有“九对九，两家有”、“八对八，两家发”之说。

谢媒 婚礼进行前后，许多地方流行谢媒习俗。淳化县西府一带《谢媒歌》云：

两姓和好，凭的是二位媒人说得好。

给儿完婚，红帖请到。

茅庵草舍，百样皆无。

吃没吃好，坐没坐好。

喜今日到彩堂，亲朋来宾贺的是新郎。

一对鸳鸯入洞房，二位媒人跑来跑去，

今日六礼告成（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礼物虽小，情意可见。

盘子中间你看：

黑面馍馍八个，粗布一节，

刀头一方，鞋袜两双。

论起礼当，实在菲薄。

千万收了，莫要笑话。

同时，媒人要即席站起，唱《答谢歌》：

酒是好酒，肉是好肉，

连吃带拿，实在不雅。

心到礼到，盛情领了，
礼物全部回了！

再婚 旧时，男子可再娶，女子却不可再嫁。寡妇再嫁，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民国时期，妇女改嫁，原夫家要乘机索取重礼。娶亲车辆也是黄昏时到达，天黑后离村，晚上拜堂，不举行宴宾席。建国前永寿一带妇女再婚叫办寡妇，须由寡妇本人做主。也有因子女不从不愿改嫁者，另有带孩子改嫁者。带子女改嫁，一般财礼较大。妇女改嫁后，一般要去亡夫灵前烧化纸钱，哭祭一番，以安慰亡灵。有子者同去。有的地方要求改嫁者头顶黑锅，脚穿铁铧，本人若不贤良，四邻为其身上泼油。上马后村族人家遮道刁难，花钱后方可出村。此俗今已完全废弃。建国后妇女再婚受到法律保护，礼仪不受约束。

第二节 丧 葬

一、墓葬制度

境内多处考古发掘表明，古代丧葬制度多为模拟其生前居室而确立。据考仰韶文化时代的墓地多在原始村落附近，墓葬形制多为土坑葬，也有瓮棺葬（多为幼儿葬俗）。西周时房屋多为长方形或圆形半地穴式，居住面比较平整且用火焙烧过，即“陶复陶穴”式。故其墓葬亦多为长方形竖穴墓，西周墓没有墓道。泾阳县兴隆乡高家堡发现的戈国墓葬即可证明。先秦墓葬葬主头多西向，或北向，且用人殉，但庶民百姓并无多少殉葬器物，且呈竖穴式，也有部分是洞室墓。

西汉帝陵多为覆斗形，用夯土筑成。原来地面设有陵城建筑，有的设有专门负责祭陵护陵事宜的邑城设施。其陪葬墓多在帝陵东侧或东北侧，且墓坑平面作曲尺形，有多台阶墓道、墓门、中庭、后堂等。后堂中有复杂的木构建筑，巨大的棺槨四周填以木炭或沙磧。例如西汉窦太后墓所发掘的47个从葬坑，位于陵园西侧，坑内置陶棺或用条砖砌成长方棺形。每坑的陪葬物品类数量各有不同。

西汉以后，帝后埋葬皆同茔不合陵。据西魏华山郡主元氏墓志铭载：“合葬非古，始自周公。”此周公即指北周开国皇帝宇文觉。从咸阳国际机场附近发掘的13座北周墓葬看，多为天井墓，其天井少则1个，多则6个不

等。墓葬内建造天井、小龕，而且大量出现并成为墓葬内容之一。其中7座有墓志的贵族墓葬方向朝南、墓道在南，墓室居北。大多由前室、后室、通道、天井、过洞和斜坡墓道组成。墓室东西宽大于南北长，平面呈扁方形，都设有土坯或砖封门，也有石门和木门的。甬道一般都在墓室南壁正中处，或稍微偏西一些。墓室顶为穹窿式的藻井形。个别墓的地面上至今残存有锥形覆斗形夯筑封土堆。北周尉迟运墓封土堆前的地表上，还有石羊、石人、石虎等石刻遗物。北周葬具都是木棺。单室土洞墓棺床一般都在墓室北壁下，也有设在西壁下的，头南足北。双室土洞墓棺床都在后室或耳室内，头南足北。墓道为竖井式的只有王士良墓一例。

隋代天井墓的形制承袭了北周先例，甚至有所发展。三原县李和墓有5个天井，为隋代最早的一个多天井墓。渭城段威墓有3个天井，独孤罗墓亦5个天井。墓内已有木棺、石槨葬具。

唐代多天井多小龕墓的形制发展达到了顶峰。武德元年（618）蜀国公独孤罗夫人贺若氏墓，为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座唐代多天井墓。墓葬全长49米，有7个天井过洞，长斜坡墓道。贞观年间，出现了多天井、多小龕的砖砌单墓室。而尉迟敬德夫妇合葬墓（显庆三年，658），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座多天井、多壁龕的砖砌双室墓。墓前均有石人、石羊、石虎和石华表之类。盛唐时，有大型砖砌石室墓，如懿德太子李重润、章怀太子李贤、永泰公主李仙蕙等。中唐时，墓室大多南北宽窄不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甬道大多东移至墓室南近东侧或东侧。其东壁与墓室东壁之连线几乎成一直线，墓道逐渐缩短，竖穴墓道增多，竖井墓道少见，天井过洞和小龕逐渐减少或消失。晚唐天井墓几乎不见，规模比较小，只有墓室、甬道和墓道，无天井过洞。甬道大多成束腰式。墓道以竖穴或竖进式为主，北宽南窄，平面成梯形。唐代帝王陵墓前，多有石人、石马、石羊、石虎、石狮之类石刻，随葬陶俑中有武士、镇墓兽和天王等。因这些墓葬均为模仿其生前宫殿建造的，故其壁画墓常采用多天井、多过洞、多小龕的墓葬形制，并在墓道内绘制阙楼，过洞上方纵有重楼建筑，在过洞、甬道两侧和墓室四壁绘出立柱、阑额、斗拱构成廊式建筑，以象征其生前功业或豪华邸宅。号墓为陵的規制也相当大，多为覆斗形土冢，设有陵园，冢之正南筑有土阙，阙南列石狮、石人、石华表等。上自贵族，下及少数民族出身的官僚，无不竞相夸饬门第，自称名门之后或君子之泽。

北宋墓葬仍分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种。兴平市西郊发现宋宣和元年（1119）

墓葬，在六角形主室的五面各砌一方形小室，形制特殊。

建国以来，政府规定国家公务人员一律实行火葬。每个县均建有火葬场。尤其是市区火葬场入葬人数逐年增多。但境内农村仍然沿袭传统的土葬办法，火葬者很少。一般多为竖井式墓穴，然后在其中一侧挖个墓洞，下棺后用土坯或砖块封门；也有少数家底殷实或发家致富的人，专门用砖石砌箍墓穴，建造成一穴两室（一夫一妇）合葬墓。《周礼·春官·冢人》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渭北台原地区的竖穴式墓葬，与靠崖式、下沉式窑洞模式非常相似，正足以反映当地民间阴、阳二宅之间的某种模拟关系。

二、丧葬仪礼

咸阳境内丧葬方式有两种：一是土葬，二是火葬。火葬礼仪现在多是对国家公务人员和部分城镇居民使用，一般分发出讣告、瞻仰遗容、开追悼会、举行火化仪式等程序。土葬礼仪包括养老、停丧、吊祭、备丧和出殡等。数千年的丧葬礼仪，其中带有浓厚的封建达信痕迹。为了保存史料，以借鉴革新，特录如下：

养老

老人年逾 50，已届 60 时，其子女就开始张罗预备后事，由此形成了多种防老习俗。首先是制作棺木。俗话说棺板为材方，称匠人割好（做成）的棺材叫寿材。棺材一般以松木、柏木、杉木为上料，楸木、桐木为中料，杨木、柳木为下料。各个地方可因地制宜，彬县以杉、橡、松、柏、枣木为主。民间工匠精雕细刻，巧夺天工，样式有“三圆”、“四平”。重底重盖、栽棕拔簧、阴刻阳雕、彩绘油漆等。交木宴席讲究用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名茶醇酒之类，不可吝啬，招人笑话。还要鸣放鞭炮，披红挂彩，显示儿孙晚辈的一片孝心。交木时，亲朋好友皆要携带厚礼前来庆贺，少则数十人，多则百数人。

其次是缝制寿衣。讲究用绫罗棉绸，忌用缎子（以防断子绝孙）、兽皮（以防当牛做马）。村里一律为红色，面子可紫可黑。其件数规制为五身至七身或七套至九套，取单数为阳之意。意谓人在阴间，仍向往脱生阳世，故不取双数即阴数，以图吉利。寿衣缝制讲究由儿子、女儿购料制作，要求单、夹、棉、袍齐全，以回应春、夏、秋、冬四季。还要为男的备黑帽、黑扇、手帕或烟具及公鸡枕头。女的区别只在帽子上，戴黑绒八角保险帽。

此外，少数富裕家庭在老人生前便修筑坟墓，名叫寿墓。多用砖块璇

砌，俗称砖箍墓。还有的在双老中的一位去世时，为健在的老人预留堂口，以便将来合葬。对老人后事的处理，不少人心存虚荣，不图老人在世享受，只图落个“孝子”虚名。群众讽刺道：

活着“墙头记”，死了电影戏。

活着不给端饭碗，死了宴席摆一院。

活着不给一尺布，死了寿材砖箍墓。

活着无穿戴，死了绸缎身上盖。

这种重死轻生的陋风败习，已逐渐消除，厚养薄葬习俗逐渐兴起。

停丧

送终 老年人，特别是子孙众多的老人，都希望在弥留之际和儿女晤面，以作最后的诀别。因此，儿女守着父母，伴其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叫送终。只有儿孙齐在身旁守候，无疾而死，才叫善终。

烧倒头纸 即在死者脚下放一黄纸贴糊的瓦盆，焚烧纸钱。这种倒头纸，传说是为前往阎罗所在的丰都城而支付的买路钱。烧化的纸灰，入殓时要同瓦盆一起放入棺材，烧纸时孝子放声痛哭。

报丧 人死后，主家立即打发专人，分头分路报丧。淳化一带特别重视老小外家，遇事要报得早，报得快，其他远近亲戚，皆须专人一一通知，不得失误。兴平一带先向本族报丧，本族、亲戚闻知噩耗后，前往探丧，在遗体前化纸举哀，起身后安慰家属，并告知出殡时家中要来的孝子，顺便领回孝布。

净身 老人咽气后，要用新瓦盆盛水遍擦身体，并作必要的整容，这叫净身。凡是男人要剃净头发，刮胡须、洗面庞、洗脚；女人要梳头、缠脚。一般都要求及早把事先套装好的寿衣穿上，一件一件地拉平整，穿好鞋袜，戴上帽子，脸上盖以烧纸，俗称苦脸纸。有些富裕人家，要把死者衣帽全部送人或扔掉，但也有经过选择、消毒而留作纪念的。

移床 人倒头之后，要先蒸一碗小米饭，这叫倒头饭。给头门上贴一张冥纸，再将死者抬放在堂屋中间，另设木床停放，俗称搁床。这时要给死者手中放一块用柏树枝穿起的饼子，以防身喂狗。

点灯 死者搁床后，要在脚下点一盏油灯或一根蜡烛，这叫路灯或长明灯。取意目的是照亮死者进入阴曹地府的道路，以防黑灯瞎火，行走不便，故此一直要燃烧到棺木抬出。

入殓 又叫盛殓。死后择日，待儿女和重要亲戚都在场时，先烧亡魂

纸，俗叫黄昏纸。随即将棺材打扫干净，抬至亡人身边，内撒一层细灰，或五谷杂粮、铜钱等，谓之生死有禄。身上覆以柏叶，等儿孙、亲戚全部到场后，再给棺材内铺好褥子。由儿女孝子动手将死者平稳地放入棺内，用纸裹棉花将死者头部至两侧夹实，脚下又垫以胡基，给死者左手拿扇，右手拿醮面和钱币，将衣裳逐层拉扯平整，上面又盖以红绸或红布（兴平一带用黑纱掩面），取出苦面纸，最后将棺盖彻底合拢嵌牢。然后烧纸，孝子来客齐动哭声，入殓告成。礼泉一带若有重要亲人在场，棺盖要留出缝隙，待亲人回来看了亡者后，再行盖棺。入殓时，要防止有关犯克属相的人到场。殓后停柩三年不葬者，俗称暂厝。

吊祭

死者入殓后，便进入吊祭阶段。

成服 入殓完毕后，孝子成服，即开始披麻戴孝。一般为穿白布孝服，戴白孝帽（带），鞋上蒙一块白布，并在腰中系上麻丝，以代替披麻戴孝。孝子中，正孝子（儿子、孙子、重孙）均穿长孝衣（孝袍），戴长孝带（与人等长）；远亲穿短孝衣（孝褂），戴短孝带。女孝子身穿白衫，下穿白裤，外套白裙子（有的地方以白大褂代之）。一般孝子戴的孝都是白色的，惟重孙戴红孝。未过门的媳妇穿的白孝衣上缝有红布条，叫做搭红。怀孕的女孝子，在埋葬前不得到死者遗体前来。对于极个别特别孝敬父母的孝子孝媳，也有村邻亲友为其披红挂彩的。成服之后，即进入服期，孝子开始守灵。

吊丧 包括写对联、开吊、写讣告等。一般在入殓后第二天进行。各地讣告格式不一，内容也不尽相同。如淳化人的讣闻是：

讣闻

不孝男×××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己身，免延新逝家严（慈）
 ×府君讳××，系××相^{距生}公元××年×月×日×时，享寿×旬有×。不幸以疾辞世，寿终正（内）寝。儿等伺奉在侧，亲视含殓，遵礼成服。谨告期服、大功服、小功服、缌麻服。

孤（哀）子×××率孙×××曾孙×××泣血（拭泪、枚期）稽颡。
 ××××××××××××××××

而秦都、渭城区人讣告的写法是：

讣

××侍奉无状，痛遭先考（妣）某府（太）君讳××，恸于××年×月×日×时，以某病卒于正（内）寝，距生于××年×月×日×时，即阴历×

×年×月×日×时，享寿几十有几岁。××亲视含殓，即日成服，定于×月×日下午×时至×时，即阴历×月日在家设奠。哀此，

讣闻

孤（哀）子××谨启

讣告须用白布或白纸书写张贴于大门一侧。

请阴阳择穴，定安葬日期 现在老丧一般在五至七天内埋葬，多为公坟。也有第三天一大早天不亮就埋葬的。其时间长短，也和主家经济状况相关联。定日子择穴，有的请阴阳，有的不请，由户族中的长老和孝子共同商定。日子确定后，立即一面请户族、村邻破土打墓，一面磨制面粉、备办肉菜及其他所需之物。

打墓 一般请阴阳勘定墓穴后，便开抬打墓。秦都、渭城两区常根据地层特点挖穴道。渭河以南，穴道较浅；渭河以西以北，一般只挖明腔（或称明厅，指垂直墓穴），深6.8尺至7.6尺，黑堂停放灵柩，其大小由棺木来定，底深与明腔相同。旧时有钱人讲究树石牌楼，有功者要求金鼎御葬，皆以砖箍墓。现在砖箍墓渐渐增多，也有箍寿墓的。长武一带把打墓叫修茔，土穴打洞叫黑堂，不拘快慢，要有三天时间，早上吃饭后去墓地，中午饭由孝子亲自送去，晚饭回来再吃。而兴平一带打墓者一般要有四人，每天要吃四顿饭。早晨、中午、晚饭外，下午还有一顿加餐，*必须由男孝子捧送，长子居前，其后按辈份大小排成一列，手端盘子，上放饭菜、酒筷之类。送去的饭菜若未吃完，不能原辙端回，宁可全部倒在墓地附近。旬邑人的习俗是：打墓前先请阴阳勾穴地，勾穴时要破土，边勾边念《破土诀》。诀云：

天圆地方，律令九章。

今辰破土，万事吉昌。

鬼魅凶恶，远去他方。

金锄一举，起光安详。

金锄再举，富贵永昌。

一画天门开，二画地户闭。

三画鬼路塞，四画人通利。

请乐 境内各县遇到丧葬事情，都要邀请唢呐乐手前来奏乐。这些唢呐乐手有相对稳定的演奏队员，平时居家务农，遇事结伙奏乐。一般乐队有四至八位乐手，依据主家经济状况决定邀请人数多少。据1987年统计，全市唢呐乐手有2100多名，班社约有300余家。在北部旬邑、彬县等地区不拘婚丧

皆可邀请唢呐鼓手，而其余多数县区（市）只用于丧葬礼仪。近年来，有的地方西洋鼓乐队也介入民间婚丧礼俗。

出子 在人死后第三天早饭前，所有男女孝子包括族中的兄弟及侄男子弟，凡有服者都要出席署名。据说这天是人死后上“望乡台”的时候，也是最后与子孙亲戚见面的一天。出子要注名死者姓名、年龄、生卒时间、享年多少，还要写清全部儿孙、户族子弟及孙子、曾孙等。有的地方直系男、女孝子全写，有的只写男孝子不写女孝子。在头道门上要用大点的斗方纸，写上“×月×日成服”（出子日），“×月×日发丧”（发丧日）。

悬灵、布置灵堂 一般在葬日前三天悬灵，即把两条长凳子放稳，将棺材平稳地置于凳上，也叫升灵。在灵前升挂一页新席，挨席再挂以新床单，前边置一方桌，名叫供桌。两旁贴上对联，中间贴上灵牌，或摆上死者放大后的遗像，上书横批。旧时中间放木主，是为神主，摆设瓜果糕点和献饭，又摆上香炉、香筒、花筒、蜡烛等，桌前的上方高处挂以吊子。接着派专人截好柳木棍，每个约2尺长，用白纸涂上浆糊缠好，作为孝子拄杖，俗叫纸棍，并在供桌下置以瓦盆，叫纸盆。凡烧过的纸灰皆装入盒内，有的还将食物投赠死者。有些地方的人为显示隆重，还有围“二祭”的，即在离供桌前约三尺处，再置两张方桌上铺以蓝布，并用蓝布加高桌子的四周，放以古式专用角架，上面放些小碟，碟内盛装经过涂色的用纸、蜡或面粉制成的桃、梨、苹果或点心，特制的花馍等。又放上纸活，如祭楼、花圈、童男童女、马、楼斗，不一而足。在供物的上边再覆盖上用蜡制涂色葡萄树、枝、蔓、叶俱全，又装上闪光灯，以图美观。

守丧 旧时守丧多为念经。有些富裕人家请道士念经，也叫打醮。如兴平一带道士念经时，全家人无论大小，都要身着孝服，沉默肃静，见人叩头，每日三餐，拈香献帛。在大家吃饭前夕，给灵前献上一份，放进一个小瓦罐内，将来与棺材一起埋掉。男、女孝子每天早上烧纸时，都要哭上一场，俗称举哀。道士来家念经，三五天不等，人数也不确定。每天茶饭由主家招待，整天奏哀乐不停，哭泣不停，酒席不停。只要有行礼、拈香、祭奠者来，就得奏乐。

备丧

各地的丧葬礼俗，重点在埋葬仪程上，礼节繁多，规程较严。

请执客 咸阳地区有“喜事要到，丧事要叫”的说法。故凡遇丧事，一般在葬日前的先两天夜间都要由主家派人到各家各户专门通知。通知到的人

家都不推辞，一般在当日下午至傍晚便纷纷来到。先喝茶、闲聊，等到齐后吃饭（俗称喝汤）。饭后即端上酒菜，让所有执客就座，喝酒、请菜，孝子给各位执客一一敬酒，敬完酒后孝子又给执客叩头。在吃喝过程中，先提名推选大总管两名，然后由大总管（有些地方叫执客头）出头安排一切事宜。等待一切就序，次日下午亲戚村邻即带上礼品，陆续前来行礼祭奠。有些地方还举行迎亲礼，即带上乐人到村口等候来客，来一家或两三家，由乐人边吹边拉，连同礼当一并迎至家中，迎完了事。

招魂 即迎请死者父母（老坟）或老伴（新坟）神主。招魂时，泾阳、淳化一带要由长子承担，女婿、外甥一人一手提纸香，一手提灯笼；另一人端盘子，内盛献饭四碗，筷子两双，烧酒一壶，乐人在前吹吹打打，孝子随后，手持哀杖，怀抱神主（或牌位），动哭声（出村后停哭），直至坟上。摆好献饭，继而烧香、奠酒、化纸、磕头，然后返回。抵村口仍动哭声，至家门口由长媳妇接住神主（或牌位）。其他男女孝子跪迎，哭声不停，抱至灵前，置于供桌之上，然后上香、酌酒、乐人吹打，礼成。礼泉一带讲究先由礼宾先生中的领导者，牵引孝子中的孤子（父丧称孤子）或哀子（母丧称哀子），或孤哀子；以左三右四的次序绕坟循转。每转一圈，叩首奠酒一次。在叩首奠酒时，其余所有跪地等待的男女孝子，也随之叩首拜揖。这时乐队吹奏，其他礼宾先生亦列队肃立。返回时，由孝子前行者手捧祖先神主牌位，还有招魂幡、引魂旗等物，均由孝子高举。如果途中遇到十字路口或进出村庄、城门时，还得焚香洒酒，烧化纸钱，表示告祷阴间负责关长的神明鬼差，让其先祖魂灵通过。到家中后，即将牌位安置祖堂香案，再由孝子叩首，才算招魂安主完毕。然后由乐队引导，孝子后随，将礼宾先生送去休息。此时即举行亲友祭奠礼。兴平习俗讲究招魂前孝子在灵前成服，然后在礼宾先生的指导下烧香、叩头、化纸。随后，一先生通：“招魂！”另一先生引：“执事者掌灯，孝子抱主抱祖，前往坟地招魂，鼓乐前导。”鼓乐在先生“引”字喊罢时响起，并前往各处坟地招魂。当地讲究先小后大，即先去晚辈坟地，从小请大，最后请辈份最高的祖先。到了坟地，孝子要站成一行。一先生通：“祭坟！”又一先生引：“孝子孝孙孝侄孙依次跪下！”通：“献礼！”引：“执事者献祭品！”通：“上香！”引：“执事者燃烛上香！”通：“致《招魂文》！”引：“代祭生后前搭躬开读！”请魂回家时，不能走原来的路。要一路鼓乐不停，逢十字路口，孝子叩头，执事者烧香化纸。到家门口，由细乐（如板胡、二胡等）随女孝子引迎魂。通引之后，再读《门路祭文》，

同往家中。

扫墓 扫墓的取意是说，佳城既定，让死者认领住处，特别是提前给死者打扫好卫生。淳化一带扫墓时皆由女婿、外甥提灯带帚，乐人在前吹打，孝子随后，擎持哀杖，怀抱灵牌，直至坟茔。化纸后，孝子入墓（窑），仔细打扫，并检查窑的深度、高度，然后在乐人吹打声中返回。至家，男女孝子动哭声，跪迎至灵前，继而上香、酌酒，乐人吹打，礼成。

迎情 先迎纸活。有的在扫墓前迎，也有的在扫墓后迎。此即将亲友带来的纸活礼品如神楼、花圈、楼斗、童男、童女、竹马、摇钱树、聚宝盆、金斗、银斗、钱串子，按亲戚远近，由近及远，依次迎来。要一家一家地从村子或村口迎到灵前，然后上香、酌酒、乐人吹打，孝子叩头相谢，礼成。

奠祭 指在家庭所设灵桌上安放死者灵位，用烛光照亮灵堂或院落（现在院落照明多用电灯），首先由孝子献饭，一献酒，二献饌，三献茶。亲戚朋友按次序祭奠行礼。每个亲友奠祭后，孝子都要起身磕头感谢，名叫谢纸。祭奠人依次轮完后，便磕头烧纸，家奠即告结束。这是流行于乾县一带的传统礼俗。淳化人讲究先换新孝衣孝帽，由孝子数人在乐人吹打声中，端来新孝帽向老小外家、娘舅家跪拜，举盘于头顶，然后由一人递给各人取旧换新，至灵前上香、酌酒、叩头，礼成。随后，开始给死者上献饭，生者吃奠饭，奠饭吃完后即迎饌。饌是献给死者的一席菜饭，包括肴（押桌，俗称七寸）、箸（筷子）、酌（酒）、饌（一席菜，分3至4次迎）、食（馍）、羹（汤或茶）、饭（面条）。要依次序迎接，多达9至10次。迎时女婿外甥提灯，另一人执盘，孝子拄哀杖，乐人吹，一件一件迎至灵前，孝子跪拜、叩首，献给死者。迎饌中间乐人奏乐停顿时，主人要在供桌上押赏钱1至2元不等，一直到迎完为止，礼成。当晚最后一个礼节是化纸，众亲戚都要参加，先上香、酌酒、动哭声，然后燃纸成礼。过去秦都、渭城一带的人们奠祭亡灵，礼仪十分隆重、繁琐。常以礼宾为主导，礼宾先生由6人组成，其中主祭官1人、土官1人、司礼4人。礼宾先生起居饮食要特殊招待，净室小灶侍候。祭灵开始，由执事人带路，乐人奏乐，迎接礼宾先生到灵前，举行第一场祭礼。第二场祭礼俗称“孝子初献”。先请执事人到位，孝子肃立，然后由主祭官通神点主。随后大孝子手捧毛血（一般皆用鸡血），献上牛角，至灵前焚香、斟酒、三叩首。孝子退位鞠躬后，再次捧上水盆、水果、山珍海味，敬请先祖享用。接着礼宾先生诵读祷文。一般诵读《诗经·小雅·蓼莪》三章，是为孝子悼念父母的诗。初献礼即成。第二场由孝侄献礼，称作“孝侄

亚献”，献食为糕点、稀粥之类。祷文一般诵读《诗经·周南·麟之趾》，全诗三章，是称颂周文王子孙繁多而贤明的。第三场为孝孙终献，礼品多为瓜、枣、桃、梨等水果及烟茶等，祷文是《诗经·周南·螽（zhōng）斯》三章，用以祝主人多子多孙。三献礼齐，孝子退位，闭户、熄灯、撤供品、退堂。最后由女婿、外甥、亲朋好友祭酒，俗称奠灵。有“五号踩四角”、“白马分宗”、三拜九叩等奠法，形式不拘一格。祭奠至夜半更深，有族众户大者，通宵达旦。现在一般礼仪程序简单，不动礼宾，不献饭，不念祷文，只是三拜九叩奠酒而已。

守灵 祭奠完毕，孝男孝女对死者恋恋不舍，男左女右，坐草守候在灵柩两侧，俗称守灵。这也是孝子最后一夜同死者同室。因孝子悲痛至极，丧事操持全部委托执客头办理，主人可以坐而不问；而奠祭之后，仍有亲戚朋友前来吊唁的，待吊唁者化过纸钱后，孝男孝女要叩首谢吊。所以除孝子守灵外，族人好友也通宵聚守灵前，俗称“暖丧”。

出殡

这是死者丧葬活动中最隆重的一个礼节。境内各地普遍讲究早起，即在太阳出山前起灵出葬。其仪礼包括：

起灵 淳化一带讲究起灵前席口备上四盘菜和热馍，执事、客人愿吃者吃。一般人多在自家吃饱，在灵前吃饭者很少。孝子要在灵前上香、酌酒、化纸。正式起灵时，将棺材抬出大门以外，放上灵床抬起。乐人吹打，孝子齐动哭声，而长孝子依杖牵缚抱主，摔碎纸盆，其他孝子各持纸活，徐徐走到坟地。秦都、渭城一带起灵时还讲究先转饭，即由执事人领路，乐队奏哀乐前导，清晨朝祖拜望。孝子依次捧饭，以示菜肴丰富，厨师手艺不凡，孝子对先祖不薄。再送祖，即快到中午时朝祖拜望，问候祖先灵魂休息安好，祭礼受用是否称心如意。孝子抱上祖先牌位到坟前火化。再请抬，即邀请乡里乡党前来抬埋，乡亲闻声都会放下农活赶来。有的地方要入席饮宴，有的地方直奔坟地。再行礼，即在村头摆设灵桌，纸扎如金童玉女、金斗银鏢两边排列。由执事人公布行情礼单，行定柩礼、醒柩礼、移柩礼、起柩礼，接着鸣炮告土，祈祷各路神灵开路放行。起灵时，由孝子举哀，抬埋人从屋内抬好灵柩、龙头棺罩压顶，男孝子用白布挽联扯拽灵柩起动，俗称扯纤。女孝子扶柩随后，执事人前行，手提方盒子祭品，内装香烛纸钱，一路抛洒冥币。旌旗、纸扎悬举于前，乐队细吹细打，乡邻亲友二十四抬，轮流换肩，前呼后拥。孝子手执丧杖，扯拽灵柩，号啕痛哭。大孝子或孝孙头顶纸盆，

由舅父或年长者扶定，行至村头什字路口摔碎，俗称摔纸盆。摔纸盆（即指死者的饭碗）的人，都是家产继承人。长武县彭公乡方庄村民间葬埋人起灵时，法师要唱《发引歌》，歌词是：

灵舆前曰：

灵輶（ér）既驾，荣归佳城。

前拥鼓乐，后随亲朋。

子女扶柩，坦然长平。

凶煞远避，吉星相迎。

父兮父兮，随儿起程。

惟愿我父，早归坟茔。

哀哉尚飨！

乾县等地讲究棺轿由十六人抬着，路上可换肩，但不能着地，且要平平稳稳，徐徐行进。灵柩一出村，继承者将头顶用黄金纸裱糊的瓦盆（叫纸盆）破之于村外，外孙前边举着引路幡，其他人举着各种纸幡和纸亭阁、罐罐纸等烧物。孝子手拿哭丧棒（柳木棍），牵着用白布拴着的“棺轿”（灵车），躬背而行。女儿手扶着灵柩，一路上哭声载道，送丧队伍浩浩荡荡，直送坟地。

下葬 淳化一带讲究将棺材平稳地放入窑内，定好方向，放好随葬品，点燃长明灯，然后封口。随即全土，众人动手填坑，堆土为冢。孝子谢客，三叩头。再上老小外家、娘舅家、众亲戚、户族依次奠酒，孝子最后奠酒谢客。然后到场孝子动哭，化纸。由阴阳先行祀土，孝子上香、酌酒、读祝文后，礼成。长武县彭公乡方庄村民间丧葬封土时，还要吟唱《封土歌》，其词云：

四尺崇封，玉骨深藏。

水源木本，春露秋霜。

一线灵脉，常发其祥。

墓前拜别，追远焚香。

愿我后昆，百世流芳。

自葬之后，人财两旺。

子子孙孙，永世其昌。

而秦都、渭城两区老人落葬后，由阴阳先生以罗盘校正方位，大孝子进黑堂用眼罩（麻冠）抹净棺材，放进“金童玉女”等纸制随葬品，然后点火封

口。乐人吹奏，亲朋燃香化纸，礼宾宣读安葬祭文，女孝哭吊，九步一拜而回；众邻全土起坟堆，男孝将丧杖按子、孙、曾孙辈次，白、黄、红三种颜色，列成三排，插于墓堆之上。孝子挽起吊孝，登好孝鞋，同抬埋全墓人招呼而回，开宴招待，孝子跪拜谢孝。宴席间约定头七、五七、尽七拜坟祭奠时间。乐队奏乐，送亲友散去。乾县一带讲究坟前棺木一抬离棺轿，就要立即将棺轿抬走。棺木入墓室，按方位摆正位置，然后点着香烛，再用土坯堵严窑口。填土时，第一撮土要由孝子填入，然后由邻居填埋，土堆要成圆形或一头大一头小的鱼形。土堆封好后，孝子立即返回村边，分别跪在大路两旁，向送葬的邻居、亲友磕头，以示感谢，然后招待吃送葬饭。一般是只喝酒，不吃主食。旬邑县南原流行由执客头领上孝子，向帮忙的客人谢饭并作揖的习俗。执客头唱道：

孝子给咱谢饭哩，没得辣子有蒜哩。

有看哩，有转哩，瞎好吃饱谁管哩。

坐在上席比较年长的人接唱道：

操着哩，吃着哩，端上杯子喝着哩。

不要嫌我啰嗦哩，相互帮忙多着哩。

打怕 旧时各地讲究葬后设庐于墓，由孝子素食护冢，后来逐渐演变为围墓以薪，点火烧之，名叫打怕。亡人葬后一连三晚，孝子都要去坟墓，用守丧时铺在地上的麦草绕坟撒上一圈点燃，一来怕亡人灵魂受其他邪魔恶鬼的欺凌，为亡者仗胆打怕；二来为亡灵作伴除寂，借以表示对亡人恩德难忘，对生离死别有无尽的思念。这是秦、渭、兴平一带的习俗。淳化人打怕则由孝子扛上水担至坟前，燃火、化纸，然后扛上水担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边转边喊道：“爸（妈）！你不怕！”然后扛上水担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边转边喊：“爸（妈）！你不怕，儿给你打怕哩！”第二天晚上在半路，第三天晚上在家门口。而乾县一带安葬后，连续三日，每晚孝子都要打着灯笼到墓地呼喊死者三声，以引尸魂回家，俗称“叫魂”。意思是说死者在这里孤独寂寞子孙于心不安。也是希望死者能继续保佑子孙。

七期 从亡者气绝身死算起，每7天为一期，其中头七、五七、尽七，家人亲友都要上坟祭奠。若在七期内逢上阴历七日，就算犯了重七，必须推后一天祭奠。乾县人五七时就可脱重孝。七期后百日也是一个重要祭祀日。

禫祭 俗称三周年。一年一祭，连续3年。所谓“三周之期，设坛祭奠”。禫祭日与丧葬日一样隆重。富裕人家要大肆铺排，白事当红事过。请执

客、乐人，搭棚、起灶、杀猪、宰羊，礼行三献，乐奏九章。普通人家也是穿白戴孝，祭奠亡灵先祖，宴请宾朋亲戚。次日上坟祭奠，去时全身孝服，上香点烛，焚化纸钱，礼仪完成，脱孝换吉，意取服去福来。原来门口贴着黄对联，午时过后要换成红对联，并将家中灵牌换成神主，丧葬习俗至此完成。旧时大户人家曾流行通神点主仪式，即将“皇清（或中华民国）显考（姓）×府君（孺人）讳××之神主”影轴，由有身份、有功名的人点主，用朱砂笔在“相”字上添一竖画，是为通神；再给“王”字上边度（dū，督音）上一点，谓之点主。因搞通神点主活动要赠送贵重礼物，故极少有人成此习俗。

立碑 从境内历代王公坟墓的发掘情况来看，墓地上有神道碑，下有墓志铭，自魏晋以下比较常见。其中西魏侯义墓志是市境已发现的最早一通碑石。隋唐时期，几乎所有王公重臣乃至有些寻常人家墓地均筑园造碑。近代以来，除了有功名、有身份的人家或家境富裕的人家造墓碑、设牌楼外，一般人家均很少立碑。但近年来，随着一部分地区、一部分群众富裕起来，立碑习俗有增长之势。一般墓碑多是在3年时设立，墓志铭则要随葬安放，也有时隔多年追念立碑的。现在政府提倡火化，不再造墓，即不再立碑。

挂幛 一般人家遇到丧事，亲戚友人送来布料，作为礼物。有的送有“功德高尚”等大字挽幛，以表达社会上人们对死者的评价。有的采取开追悼会、读悼念词的办法寄托哀思。长武县相公乡和芋元乡一带却流传着一种给死者挂小字挽幛的习俗。特别是在芋元乡的柳泉、南宫等文风较盛的村子更为盛行。凡村人公认德高望众、事业有成，且对当地民众作出贡献的人逝世后，众乡邻为其悬挂这种锦幛。请本地学识渊博，既有身份、懂礼规，又精书法、善写作的人，按照一定格式，介绍亡人生平简历、品德、事业或修养方面的成就，同时还要记叙其家族的几代变化沿革，撰成幛文，并在挽幛两边书写对条。逝者祭奠之日，众乡邻便用旗竿高高打起幛子，在孝子和乐人的迎接下，把它作为最贵重的祭祀礼品敬献在灵柩之前，俗称挂幛。这些幛多用红色丝绸、锦缎或金丝绒等高级面料制作，长约八尺、宽约五尺，红底黑边，垂有彩色丝穗。这些小字幛只限乡邻敬挽，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一切费用皆由敬挽者（又叫行情人）共同承担，还要请本地裁剪艺人精心缝好。此幛待死者安葬后，由其子女妥善保存，世代相继，留作永久纪念。

嗣后无论谁家过红、白喜事，在搭棚合围时，都可借来本村或邻人家的挽幛，挂在摆设筵席大棚内的四周，少则用五六幅，多则十几幅，有幛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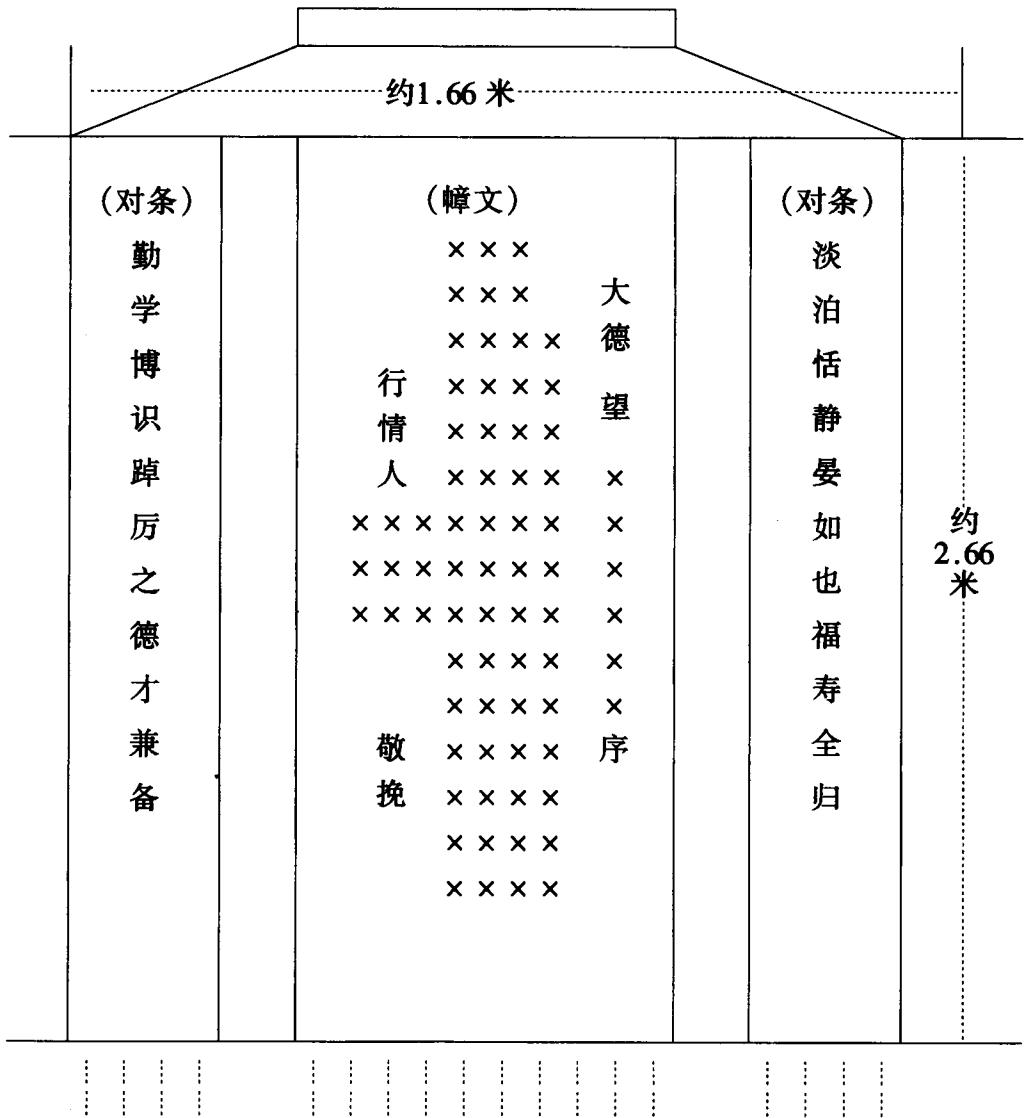


图 10-1 长武县民间小字挽幛的基本格式

说明：1. 幛文一般用广告色或墨笔书写，字数为数百字至一两千字不等。2. 送幛人又叫行情人，有几十人到百余人不等。届时要由孝子跪接乐人欢迎，且须招待行情人吃饭。3. 幛子一般由子孙保管，或挂在窑洞上方，或藏在箱柜里边，不能轻易损毁。4. 对条一般书写颂德内容。图中所采为其中一例。5. 从相公、芋元两乡的文化环境来看，多为隋唐文化遗迹，故这种小字挽幛当起源甚早。

借此可光宗耀祖，故乐意相借，而主家则利用亲朋好友聚集的机会，让大家通过欣赏该乡村颇富风情的名人轶事，从不同侧面了解本村或本乡的去和现在，牢固树立热爱家乡、服务桑梓的思想。教育后人向幛上标榜的地方名人学习，做一个品德高尚、造福人民的人。此举深受当地人民欢迎，且有日渐兴盛的趋势（见图 10-1）。

第三节 诞 寿

一、求 子

即尚未诞生儿女前的求取习俗。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新婚不满一年的新人求子。如旧时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晚，乾县一带普遍流行要子习俗。当晚，新婚不足一年的媳妇婆家要备好应用食品，供奉娘娘神像或牌位于新房桌上。然后由福寿双全、多子多孙的两位老太婆，扮演成一对“老两口”，怀抱事先做好的布娃娃，点明香烛，双双跪地，口唱《求子歌》，祈求新娘早生贵子。经过一番打趣耍笑后，“老两口”便把布娃娃塞在新媳妇怀里，旁观者硬推扯着新媳妇向神位纳头跪拜，再把布娃娃取出来放在炕上的被窝里，大家这才欢笑散去。主家设宴款待两位老太婆。此俗全由妇女们操办，表示妇女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责任。乾县的《求子歌》唱道：

娘娘婆，杜二哥，或儿或女给一个。

背一个，抱一个，炕上坐了一伙伙。

这里所说的“杜二哥”，传说为送子娘娘的丈夫。也有说送子娘娘就是姜嫄圣母的。

另一种情况是夫妻结婚多年未怀孕生子的，夫妻二人同到神庙求子。旬邑县境内娘娘庙庙会期间，年轻妇女虔诚地跪在塑像前，边烧纸边祈子。祈祷完毕，烧香化裱。祈儿者将供桌上的圆边圆囫馍和一只小鞋悄悄地揣在怀里，祈女者将供桌上的纸花揣进怀中。临出庙门时，还要给送子娘娘许愿。祈子者要求守口如瓶，从离开寺院到回家路上，不许与人说话。有的还要在庙堂或寺院窑内铺上麦草，盖上麦草，过上一宿。偶有野合，不足为奇。无论庙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律不能大惊小怪，大呼小叫，否则神要降灾罚罪，开言者是无法承受的。现在这种住宿习俗已不复存在。

二、出生

当地人叫坐月子或临床，按习惯其丈夫不能随意出入产房，接生要由接生婆担当。但孩子出生后，讲究丈夫要陪夜，以保护母子平安。胞衣或者深埋于大树之下，或者放在住所的上方位置（地下），总之不能让人随便偷去吃掉。因孩子胞衣，特别是头胎胞衣，是很富营养的，故忌人拿去。长武人讲究临产当月初二三，女方亲娘要携带大烙饼（锅盔）和小孩裹肚，住到女儿家服侍。一般进门先不打招呼，而要直奔灶房，将大饼扣压在锅盖上，用拳头击破，将裹肚从女儿住房的窗口抛进去，再进屋捡起来压在席底，称为打锅，意在祈求生产顺利和母子平安。其所唱《催生歌》云：

天门开，地门开，王母娘娘催生来。

一斧砍开阴山门，母子分身生下来。

产后3天娘家人擀生面条去女儿家中，亲戚相聚，同吃面条，称为下奶。产后10天，娘亲邻居要携带烙饼、鸡蛋、挂面、红糖和衣物，探望产妇及婴儿。而多数地方每当婴儿降生，婆家要当即通知媳妇娘家，次日娘家要送来红糖、醪糟、鹿角等，以利于下奶。也有的娘家母亲提前三五天来，以服侍女儿、外孙。农村中人缘好些的，村里人要先抱主人家的柴禾放在家门口烧，名叫烧娃。这时主家人要捧着烟酒糖果出来招待大家，就地设宴。也有人给降生婴儿的祖父、祖母脸上抹上锅底黑墨或添上朱红色，既表示祝贺，也图个热闹。兴平人在妇女分娩前，由丈夫或父兄先请接生婆，当地叫老娘婆。请入家后，先用白小鸡蛋招待。分娩时由妯娌或婆婆照料，丈夫可在一旁照看，但娘家人绝对不能前来产房。生产时产妇房间地上堆层柴禾，上面放几块胡基，让产妇坐在上面。若能顺产则罢，若难产就要吃几个梨，意取母子分离。婴儿出生之后，若不能哭出声来，老娘婆就要倒提婴儿两腿，叫着婴儿父亲的名字打婴儿屁股，这样出生的孩子叫“忌草娃”。婴儿出生，落在了产妇身下的柴草上，叫做落草。产妇原则上不能在娘家生孩子。但生下孩子三天后，娘家母亲就来侍候，也有在第五天或第十天来的，一般拿鸡蛋、肉臊子、红糖、醪糟等滋补身体、破血下奶之物。婴儿出生后，门帘上要挂红布，不让毛女子擅自入内。

三、满月

婴儿出生后满1个月的这天就叫满月。近年也有将10天、20天、30天

归并到20天时过事的。满月是生辰纪念中最隆重的喜庆日子，亲朋好友皆来贺喜，朋亲搭干礼（钱币），亲属则带上囫囵馍、衣料、鞋帽等四色礼品。淳化人讲究礼重舅家，要求舅家给孩子带上自做的青蛙图案花裹肚，从头到脚的衣帽鞋袜一应俱全，还要给婴儿母亲带上珍贵礼品，以表示娘家人对女儿、外孙的关怀，取其大吉大利之意。主家须设宴席，备美酒，共同庆贺。这天中午还要备香棣，由婆婆抱上婴儿，点烛燃香，婴儿母叩头下拜，敬灶神，许心愿。同时要给婴儿取名字、穿新衣、理胎发、留照片。当日中午或傍晚，一般由孩子的婆婆或外爷、外婆抱孩子出门，在门前碰干亲，男的叫干大，女的叫干妈。也有特意安排的人家。然后母子去娘家，一住40天至50天方回自家。秦都区渭河南一般将婴儿第一次去舅家叫移窝。去前先给孩子抹点锅墨，住上8天，最长9天，不能过10天，但也不得少于3天。由舅家回来时，给孩子脸上抹点白粉或白面，意为黑娃变成白娃，得到了舅家人承认。此外舅家人要给婴儿一个铜钱，用一截细红线绳拴住，套在孩子脖颈上。旬邑县土桥镇一带小孩满月这天，要请卷娃婆（也就是接生婆）坐在上席，主人家端出礼当，唱《谢卷娃婆歌》云：

衣服一件红（布）一方，盘子不多只一张。

你为咱娃费心肠，甬嫌情薄请接上。

卷娃婆要回唱：

咱娃是个福蛋蛋，腿儿胖来脸儿圆。

盼望咱娃快快长，不收礼当只收盘。

四、过 岁

当孩子满百日时称百岁，寓意祝贺婴儿长命。满周岁时，举行的礼节叫周岁或抓周。一般在桌子上放些纸、笔、书、算盘、脂粉、纸制的生产工具等，看孩子抓住什么，以预测其将来的志向。现亦讲究合影留念。

五、过 关

在农村流传过关习俗已很早了。多为在老人做寿棺时，左邻右舍为那些爱闹小毛病的孩子讨吉免灾的一种习俗。具体的形式是：一个人将小孩托在手中，从未上底的木椁里直贯下去，下面一个人接住后又从外边交给上边的人，如此反复三次，同时要对唱三遍《过关谣》。凡是给孩子过关的主家，

都要专门给木匠师傅提上烟酒，送些赏钱，以讨取吉祥如意。淳化县通润镇北村的《过关谣》唱道：

蛋娃子，过关来。过来了！过来了！
 汪汪汪，呛呛呛，哈巴子狗娃咬和尚。
 汪汪汪，呛呛呛，咬的饿了吃麻糖。
 汪汪汪，呛呛呛，咬的渴了喝凉凉。

长武县彭公乡一带也有传唱的《十保关歌》：

一岁孩子一岁关，玉皇老爷保寿安。
 二岁孩子二岁关，二郎哪吒保寿安。
 三岁孩子三岁关，三关大帝保寿安。
 四岁孩子四岁关，四海龙王保寿安。
 五岁孩子五岁关，五方五帝保寿安。
 六岁孩子六岁关，六路神仙保寿安。
 七岁孩子七岁关，北斗七星保寿安。
 八岁孩子八岁关，八大金刚保寿安。
 九岁孩子九岁关，九天圣母保寿安。
 十岁孩子十岁关，十殿阎罗保寿安。
 天赦地赦皇恩大赦，三灾四煞都过了。
 五行六害厄都过了，七伤八难厄都过了。
 阎王关山都过了，白虎关山都过了。
 三十六关都过了，七十二煞都过了。
 千关万关都过完，保得孩子岁岁安。

礼泉、乾县等县小孩过关还有一种形式，这就是在皮影戏台子上过。因乾、礼一带流行弦板腔皮影戏，故当晚上皮影戏撑起亮子开场前，给娃娃过关的主家，要端上酒菜、香烟和红布，由长辈抱着孩子来到台前。把孩子由这头台角递进去，台上签手把孩子接住之后，在亮子上一绕，又由另一头台角送下去。同时伴唱《过关歌》，歌词是：

蛋蛋娃，过关来。（众应）过来了，过来了。
 汪汪汪，呛呛呛，哈巴狗儿咬和尚。
 蛋蛋娃今日过了关，无灾无难长得乖。
 蛋蛋娃今日过了关，长大念书坐高官。
 蛋蛋娃，过关来。（众应）过来了，过来了。

六、还愿

也叫赎身。孩子满月时，为了使孩子平安生长，就要给灶神许下一个愿，如9岁送一只鸡，12岁送一头猪之类，求神保佑。孩子长到12岁时，标志着孩子由童年进入少年，舅家每年的送灯礼节就结束了，这叫做完灯。旧时认为孩子从那个娘娘庙祈要的，就是那个娘娘庙的神灵撒下的，要购买一个银项圈在脖子上，俗称锁锁。要是满月时碰有干大，就要沿门讨要百家钱，托百家众人之福，把孩子牢牢拴住，乖乖长大。同时，还要特意做两个小巧玲珑的红口袋，吊在项圈上，一个封底，一个无底。意思是说孩子将来听到好话，装进有底的口袋记下；听到坏话，就装进无底的口袋漏掉。家境贫寒的要做红布项圈，用红线打结为记，每岁结上加一枚线，12岁完灯时开锁取之，以示孩子成人，要在娘娘庙或灶神前磕头谢恩，故称赎身。时间在腊月二十三灶君升天之日。淳化一带还讲究这天杀猪宰羊，设香案，敬灶神，谢娘娘。孩子要穿新衣，戴新帽，烧香磕头。众亲友前来祝贺。旧时舅家要带囫囵馍、衣物、皮带、玻璃灯等，而今多带文具盒、书籍、年画、手电、雨伞等，以望外甥成龙。

七、寿辰

给德高望重的老人祝寿，也叫做过好日子。旧时淳化老人这天早上吃恰恪，中午吃酒菜，必须亲朋俱至，侍祖上香，由老人坐在上席。凡儿孙辈、外儿孙辈、侄儿孙辈，皆须给老人叩头请安，以示家道和睦、万事如意。现在多为儿女至亲带礼物，或做点好菜好饭，以示纪念。长武老人50称寿，一般人家60岁做生日，70、80岁时做好日子的比较普遍。而经济比较富裕的地区，诞寿礼节更加隆重。有些人家还要搭彩棚、贴寿联、演电影、请乐队，甚至请礼生、举仪式、行寿礼、致祝词。家境贫寒的只是做些鸡蛋、饺子，买些糖果，来客只有出嫁的女儿。兴平一带亲戚贺寿要带寿馍12个，形如眼儿馍。后有一龙尾，取龙寿最长之意。拜寿时堂上要挂鹤寿图，先乡党鞠躬三下，再儿孙依次跪拜，有些人家还要请大戏（如秦腔）或小戏（如木偶），或演电影，放录像。

第四节 禁忌

一、宗教禁忌

信仰佛教的人常吃素食，戒食荤腥。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禁吃猪肉，同时认为自死的牲畜肉不干净。在宗教性禁忌中，已渗入生活领域的禁忌是火的禁忌。境内各县区常流行祭祀灶神的礼仪，如兴平人讲究建灶时，火门一定不能朝正南或正北，说是“火门朝南，越烧越难，火门朝北，越烧越鬼”。每年正月三十日晚上，各地还有跳火堆的习俗，名叫燎花花（或燎荒荒），目的在于燎去人们过年期间惶惶不安的心理，祈求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淳化等地原始宗教信仰往往崇拜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护卫神，尤其是选庄基地、墓地时强调“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同时还重视关帝、土地神（又叫社神）、布袋和尚、弥勒佛等。

二、礼仪禁忌

当地人在婚、丧、诞、寿等人生仪礼中，皆有禁忌。

婚姻禁忌 忌五服内同姓通婚，忌结婚时女孩、孕妇、寡妇进入洞房；订婚时忌男比女小，所谓“宁叫男大十，不叫女大一”。女子月经期不能结婚，以忌“骑马拜堂，家破人亡”。结婚时忌妨属相，《属相歌》是：“正七迎鸡兔，二八虎和猴，三九蛇与猪，四十龙和狗，牛羊五十一，鼠马六十二”，以上为结婚利用歌。“羊鼠一旦休，鸡狗不到头，白马怕青牛，黑猪怕猿猴，白虎见蛇如刀斩，兔儿见龙泪长流”，以上为属相不合歌。俗称“大相不合”，婚后会终日吵闹。娶新媳妇孩子忌带“败家红”（披肩红）布条；喜事忌说霉气话，忌讳打破碗碟，恐主家破财，夫妻不睦。结婚时还忌讳相克属相的人到场，且须全命的妇人陪伴，拄上滕（shēng）子，挂上尺子、镜子、铜锣，以驱邪避煞，引新娘下车。永寿人还忌讳男女年龄相差四岁、六岁，认为“四六不成”，恐婚后夫妻反目。忌男女生辰破日：“男破妇家，女破男家”。送女之客，切忌单数。新婚忌洞房十日内长命灯熄灭，恐夫妻不能白头偕老。新婚之夜闹洞房忌炕塌，恐难养活子女。婚后忌讳在娘家坐月子。

丧葬禁忌 忌讳未婚小伙子给死者掘墓。小孩子死了要用天葬瓮葬，放在荒野或沙埋土中，让野兽吞食越早越好。未成年的孩子不用棺木，要用芦席卷埋。横死（或凶死）的青年人要立即埋掉，不可过夜。死在外边的人，不得把尸体搬回家中，而要放在村外庙宇或专门搭棚设灵祭奠。直系亲属葬期，孝子忌进入别人家门，且不得结婚、作乐。报丧时要拜村邻，孝子不可直接进入户报丧。三年期内忌要社火、贴红春联，而要贴白色对联。老人寿衣忌用缎子，恐死后断子绝孙。忌用兽皮，恐当牛做马。扫墓的外甥下到墓室，打扫的脏物要带回家中，防止鬼怪和不洁物品藏在墓室内，使死者难以安宁。回家时要避开灵柩，不能相撞。入殓、起灵时忌讳相克属相的人到场。长武人忌重丧（百日内死亡二人），灵柩同出大门，必须破墙从崖背吊出棺材埋葬。青壮年死亡有出殃忌日，全家老小都得躲避，以免凶鬼扑身。永寿过去因故不能安葬则要厝棺或浮棺（又叫悬棺），在暗室中用砖头或胡基砌严密封，以待吉期，最长可等3年之久。双亲寿棺忌用两色，恐兄弟不睦。丧杖须用柳枝，忌用他木，恐后无子。墓穴忌后空，恐后世不发。出煞忌惊动，恐煞不出门，于家中不利。出煞忌家中留人畜，恐于人畜不利。亡人未入土前，忌收长头巾，恐孝子头痛。未出七期，孝子忌剃头发，恐亡人头痛。亡人未过百日，忌男婚女嫁，恐于男女不利。

生育禁忌 讲究妇女经期不串门，忌打水。家有孕妇不动土，怕冲动胎身。孩子出生后，切忌第4天和第6天见生人，出门闯，以防止“四六风”。未满月的孩子忌生人出入房间，门口要挂红避煞。忌谈婴儿体重和肥胖，而要说身体健壮。礼泉县民间流传有《出生破月歌》，认为出生于某些月份不吉利，唱道：

正蛇二鼠三月牛，四猴五兔六月狗。

七猪八马九羊头，十月鸡儿架上愁。

冬月老虎满山游，腊月老龙不抬头。

小儿到换牙年龄时，掉下牙应扔到房顶，掉上牙应扔入水窝，由小儿自扔，以期快快长出。

祝寿禁忌 忌直问老人年龄，而要说“高寿多少？”忌直呼姓名，应问“尊姓大名？”以含尊敬之意。遇老人过寿，忌说“死”字。

三、节日禁忌

农历节日禁忌是很多的。旬邑人正月初一到初四忌讳洒水扫地，恐污秽

神灵。初五不出家门，恐给别人带去穷气。初七忌撕柴、动刀、狗吠，恐分魂、断魂、惊魂。十二老鼠嫁女，忌套碾磨面。十三杨公（继业）忌日，男人不下田挖土，女人不动针穿线，民间全部停工歇息。当地有歌谣：

妇女这天捉了针，一辈子难翻身；

男人这天干了活，一辈子灾难多。

这天破了土，肚子胀如鼓。

十五忌动水沾地，沾地者头上生疮。正月二十三日，老牛老马歇一天，故这天忌用牛马劳作。当晚忌刀切斧剁，忌针工忌干活，以防“疖”（又作干）落伤身。二月初二龙抬头，不许挖土扫院，怕铲伤龙身，划破龙鳞；不许动刀捉针，怕切了龙尾，刺了龙眼；不煎汤不炒菜，怕烫了龙心呛了龙胆。祭龙王时不许鸣炮，不许喧哗，怕惊了龙驾。寒食节不动烟火，吃冷食，喝凉水，以纪念介子推。端午节戴禁戒绳、拴香包、插艾叶，以避毒虫。送寒衣节女儿当天返回自家，不可逗留娘家。腊月三十忌讨债，忌串门。长武人祭灶时忌买灶王爷，而要说声“请”字。永寿、乾县人腊八忌吃辣子，“腊八吃辣子，必定生傻子”。早饭禁太阳出来后吃。正月初一，忌水火出门，取意出门破财。忌扫地扫炕，忌饭案上动扫帚。忌吃实馍（馒头）。初二忌走亲访友，初丧要拜新灵。但泾阳、三原一带不忌拜亲访友。初五为五穷日，忌探亲访友，以免把穷气带人人家。初七为人期，忌家人出外失魂。初八忌做针线，恐为寡妇。初九忌做针线，恐生哑吧。初十忌做针线，恐生聋子。十一忌做针线，恐生蚰蜒。十二忌做针线，恐生蚰蜒上身。十四忌做针线，恐害红眼。十六男妇皆忌做活，恐生疾病。十七忌做针线，恐生鱼口。二十忌做针线，恐老鸭拔苗。俗谓碾磨生日，忌碾米磨面。二十二日忌做针线，恐生疖。二十三日忌做针线，恐做活“走马疖”。二十四日忌做针线，恐蝎子伤人。二十五日忌做针线，恐得癩症。二十六日忌做针线，恐做活转肠风。二十七日忌做针线，恐生面疮。二十八日忌做针线，恐得大头瘟。三十忌做针线，恐全年不吉利。二月初一忌做针线，恐头疼。秦都、泾阳、三原、礼泉等县区正月初一不动土、水、火，不出门，不走亲戚，妇女不许到别家串门子。正月十五到二十三日前妇女不动针线活。

四、生活禁忌

包括吃、穿、住、行等生活方面的禁忌。如永寿人出门忌黑道，恐于出外者不利。张王李赵忌六、腊月拆除动土，七姓八白忌六、九月拆除动土，

恐冲犯土地神，于拆除动土者不利。忌和尚道士进入人家，恐冲庄基神祇。建房时忌先建下首房，恐家中出事。上梁忌黑道日，恐房倒塌。院中忌随便挖土，恐冲犯太岁。忌公鸡前半夜叫鸣，恐家生祸事。夜间忌鸺鹠、鸱鸢鸣叫，恐于家人不利。走路忌飞鸟于身上拉屎，恐本人不利。忌右眼皮跳，恐出祸事，所谓“左眼跳财，右眼跳崖”。忌狗夜哭叫，忌猫吃草，皆恐有饥馑年岁。大年初一忌下雨，恐收成不好。九尽忌下雪，俗云：“九尽一场雪，麦子、豌豆用犁耕。”入伏第一日忌下雨，恐后天旱。四月初八请阴阳择定吉日，画符咒、挂筛子、竖犁铧，以除邪避凶。盖房上梁，要书写“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立柱上梁，大吉大利”等红帖子，搭红布，写对联，放鞭炮。居室使用遵循上为尊、左为大、右为主的习俗，分家惯例为哥东弟西，兄南弟北。兴平人建房时讲究前不遮，后不挡，左不冲，右不撞，门前有流水，门后还响亮，地下无墓穴，风水不冲突。室内炕沿不朝后门，忌朝外上炕。恐于家人不利；忌镜子朝炕，忌炕对着炕，忌案板朝炕，且忌隔门朝外泼污水、簸粮食，恐泼污过路人，泼掉粮食。衣着方面，忌婚嫁喜事穿着白衣裳。忌丧葬礼仪穿红衣裳（重孙孝服缀红布条例外）。饮食方面，“迎客饺子送客面”，忌讳吃翻。忌讳夫妻或恋人分梨吃，“吃梨不分梨，分梨心则离”，恐后来反目离心。梨枣也不能同吃，以恐早离。还有讲究不过二月初二（农历），不许烧干锅（即烙饼之类）。但有些人家正月二十这天专门烙馍，据说“女娲补天”，就在这天。

五、生产禁忌

夏季收麦子时，忌在场伙上用扫帚朝场外扫，且不得说不吉祥的话。收麦子时只许说多，切忌说少。且要从下水处向上收，忌从上水处向下收，恐来年歉收，挡住丰收势头。旧时镗漏锅匠见面，凡锅底未糊泥巴者，一律要见面分半，忌讳独享。农村忌栽种构树，认为“树够人不够”，家里有构树，必定会死人的。卖牲口忌连绳卖掉，恐以后养牲不利。秦都区民间麦子收藏好后，家家都要在麦囤上插一张铁铧，避免毛鬼神偷麦。

六、语言禁忌

如称人已死去，不能直说死字，而要曲讳成“过世了”、“殁了”、“不在了”、“老了”、“升天了”。旬邑民间有“灯下不谈鬼，家中长安宁”的禁忌。

第四章 节日习俗

第一节 传统岁时

一、一般节俗

从境内北部旬邑、淳化和长武等县流传广泛的《节俗歌》，可以概要地了解当地传统岁时的基本情况。地域不同，习俗又有所差异。见表10-1。

二、重要节日

随着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迁，当地岁时习俗也发生了种种变化：有的已被淘汰，有的逐渐淡化，有的却得到承认。现举重要节日予以扼要介绍。

春节 中国全民性的传统节日之一。一般放假3天或5天，境内各地过春节讲究守长夜，贴春联，早起礼神放炮，向长辈磕拜，亲戚友人之间互赠礼物。大的方面基本接近，但“十里乡俗不同”，南北各地又有小的差异。永寿、长武等地初一初二祭祖族拜，皆不走亲戚。乾县、礼泉初二走“新灵”（死人未满三年叫新灵）。而城区及泾阳、三原、淳化等地初一水火不出门，初二就可走新亲，访朋友。乾县初一早饭吃酸汤挂面；礼泉吃“烙面”；旬邑吃臊子面；淳化吃饺子、细面；长武吃长面、饼子、馄饨；兴平吃臊子面、饺子。午饭都是肥肉、美酒，比较丰盛。走亲戚多以自蒸包子（馅子有糖、肉、豆腐、油等）为主，辅以糕点之类，数量视亲疏不等，“礼馍”最多送十二个。新婚女儿回娘家拜年，要带够四色礼（包子、点心、酒、肉等）或八色礼，与女婿同去同回，凡娘家族亲愿来年走动的，留足礼品，否则不留“足礼”。春节讲究先拜祖先“神主”（祖先牌位），再拜族中长辈；先拜本家族人，再拜亲友。旬邑新婚夫妇给长辈拜年，要磕怀头，即男女双方一

旬邑、淳化、长武习俗歌对照表

表 10-1

旬邑 (采农时歌)	淳化 (采节俗歌)	长武 (采节俗歌)
<p>正月初一万象新， 男女老少喜吟吟。 十五元宵雪打灯， 高跷社火耍得红。</p>	<p>正月初一过大年， 家家户户吃细面。 烧香火、拜祖先， 男女老少新崭崭。 正月初二丈人喜， 备办酒席待女婿。 初五以前拜年忙， 又散果果又散钱。 初六以后灯笼红， 舅提灯笼外甥迎。 过了初八耍社火， 高跷芯子花样多。 正月十五闹元宵， 狮子竹马带高跷。</p>	<p>正月初一起得早， 磕头拜年吃水饺。 初二三家家忙， 外甥看舅女拜娘。 初四初五爆竹响， 走亲访友心欢畅。 初七吃的拉魂面， 观天看香保平安。 过了初八耍社火， 高跷芯子花样多。 正月十五闹元宵， 花灯焰火满街飘。 十六吉日游百病， 老少出门笑盈盈。 二十一日烙煎饼。 补天祈福把神敬。</p>
<p>二月初二龙抬头， 冰消雪化闹春耕。 三月清明地泛绿， 植树造林遍山沟。 四月立夏麦扬花， 修渠引水灌庄稼。 五月端阳粽子酒， 龙口夺食忙夏收。 六月小暑莫迟疑， 抓紧回茬种谷糜。 七月白露打核桃， 前后十天种麦好。 八月中秋月儿圆， 瓜果蔬菜香满园。 九月重阳日西斜， 姑娘下地拾棉花。 十月立冬冬天变冷， 种完麦子把地整。 冬至过后天数九， 家庭副业样样有。 腊八煮肉擀长面， 锣鼓咚咚又一年。</p>	<p>二月初二龙抬头， 家家户户炒豆豆。 三月里来是清明， 清明拜祖祭坟莹。 四月将尽麦稍黄， 女办厚礼去看娘。 五月里来五端阳， 请包粽子送女尝。 六月初六好日头， 姑娘媳妇晒丝绸。 七月初七逢庙会， 邀朋结友去看戏。 八月十五月儿明， 万家欢聚吃月饼。 九月九来送枣糕， 外婆送糕外孙挑。 腊月初五过五豆， 五谷杂粮蒸豆粥。 初八吃了腊八面， 娃娃拍手待过年。 廿三晚上烙灶馍， 杀猪宰羊办年货。 除夕坐夜人团圆， 锣鼓咚咚又一年。</p>	<p>二月初二龙抬头， 牲畜山货大交流。 三月清明扫坟园， 妙龄女儿打秋千。 四月半间麦花香， 收拾镰刀去赶场。 端阳插艾饮雄黄， 妙齿避邪除祸殃。 夏至过后麦上场， 女做烧馍去看娘。 七七牛郎会织女， 姑娘喜唱乞巧曲。 八月十五度中秋， 月饼点心献玉兔。 九月初九过重阳， 娘蒸枣馍全家尝。 十月一，把祖祭， 门前煨火送寒衣。 腊月初八粘米饭， 祝愿五谷吃不完。 二十三日扫庭院， 敬请灶神到人间， 除夕之夜摆酒宴， 合家守岁话团圆。</p>

手搂住对方，一手互挽，头脸相贴，同起同落，大礼参拜。春节一般初五以前为拜年，主要是晚辈访长辈；初六到十五日，为长辈回访，许多地方舅舅给外甥送灯笼。近几年过春节多数已不再供奉祖先神主，只在腊月三十下午上坟烧纸，以示纪念。

破五日 农历正月初五，俗称“破五”。传为忌日“五穷”。清晨，人们要从厨房向外放炮，“赶穷气”。打扫庭院，将垃圾倒出户外，叫“送穷”。长武旧俗有用醋烧煎灌入犁铧，从内向外泼洒，以图激犁（吉利）。并念道：

大吉大利，醋汤泼地，

饥神饿鬼，全都出去，

如不出去，踏住脖子抽吃系（筋）！

现仍有吃搅团，“缠穷气”的。兴平人讲究这天吃臊子面，不向邻居借东西，要借也只能以物易物。旬邑人这天早饭吃搅团，用意是“填穷坑”。午饭吃饺子，取意用元宝塞窟窿。一般这天不出远门，怕带给人家穷气。

人齐日 农历正月初七为人齐日，又叫拉魂日。俗传这天人的灵魂都要到阎王爷跟前去应卯，早去晚归，故讲究全家人都要齐等在家，天明就吃“拉魂面”，只许吸溜，不可咬断。长武人还要在傍晚插香，以香燃烧的快慢，看灵魂归来迟早。要按长幼称谓名字，大呼七声，谓之唤魂，以祈人丁兴旺。体弱多病者还要到村中十字路口叫魂，叫者直呼其名，应者答：“回来了！”回家后在门外煨火驱邪迎回家。有些老年人可根据早、中、晚气候预测老、中、青吉凶祸福。过了人齐日之后，人们才能远行。旬邑人这天上香时心情紧张，表情严肃。发现有香柱熄灭，主妇立即磕头祈拜，跪于灶前祈祷：

灶爷灶婆主家安，快招儿魂回家园。

保家保财人平安，我给灶爷许个愿。

家安财旺财不散，明年灶前就还愿，

杀猪宰羊挂红匾，灶爷保我一家安。

祈祷完毕，将所熄之香重新点燃，用心观察。这天早饭必吃细如丝、长如线，形同挂面的“关魂面”；或擀薄切宽，形如长带的“纳魂面”。下午吃饭时，主妇要揭锅盛面，每盛一碗，呼唤一个家庭成员的名字，谓之“回魂”。

元宵节 境内元宵节讲究吃元宵或水饺。长武城乡居民家家用精粉制作十二生肖花馍，互相馈赠。青年媳妇为早生贵子还要“偷”吃牛犊馍，并躲到邻居家至灯亮后回家（这叫避灯）。举办社火灯会、放焰火、猜灯谜，孩子们手执舅舅们赠送的各式各样的“长命富贵”灯，互相嘻闹，非常热闹。淳化人讲究门框、粮仓、面缸、水瓮到处放上老鼠馍，上插蜡烛，让孩子看；给祖坟、牛槽、猪栏、鸡舍随处悬灯照明，以驱虫害，讨得吉利。彬县

民谣唱道：

正月正，正月十五闹花灯。
肖家姐姐爱玩灯，吃的萝卜就的葱。
前里打的是明灯，后头打的是瓜灯。
三侄李铺灯，五子李和灯。
六月柳下灯，七月芝麻灯。
八月八彩莲花灯，九月九日门上挂的是社火灯；
大摇大摆相公灯，忸儿忸儿姑娘灯，
腰弯头低老汉灯，龙头拐杖老婆灯。
龙儿灯，龙儿灯，当中夹着兔儿灯。
把这灯，不算灯，东街又来一路灯。
辣子灯，一串红，萝卜灯，圆膨膨，
白菜灯，一蒲笼。把这笼，不算灯，
西街又来一路灯，鸡娃子灯哽哽哽，
兔娃子灯打愣愣，狗娃子灯腾腾腾。

秦都人送灯笼须带上 10 根麻花，10 个粽子，10 个尖馍。给出嫁头一年的姑娘专送大红宫灯与“长命富贵”灯各一对。乾县、礼泉人制作各种老鼠馍，放在锅案、缸和土地爷身后，由邻家孩子“偷”去食用，认为可以避鼠害。旬邑灯笼溶民间剪纸、纸扎、竹子、木条和五色彩纸制成，有花卉、人物、禽兽、名胜建筑等造型，也有宫灯、纱灯、火罐等传统灯笼。傍晚发灯（点蜡烛）时，孩子们一手挑着灯笼，一手拉着眼钱花（即用火药卷成的纸芯），高声唱道：

老鼠老鼠上墙，今年更比去年强。

鸡娃鸡娃看灯，来年五谷丰登。

每当丰年裕岁，各县举办耍社火、玩龙灯、跑竹马，更加热闹。如淳化多演《双进宝》、《清官册》、《将相和》之类的剧目，秦都人耍社火、竹马、高跷、旱船、巨龙、狮子等，还有咸阳市区东南坊牛拉鼓、绑绞队助威添声，俨然成为一种新风俗。现在元宵节既是春节庆典的高潮，又是欢庆新年的结束。

燎荒节 农历正月二十三日为燎荒节，又叫燎干节、燎疖节。旬邑俗传先天下午“干”落地，民间忌刀斧针工，以防落身。谣云：“正月二十三，老牛老马歇一天”。故又称牛马节。晚上家家在大门口燃一堆干草，孩子们从火堆上跳来跳去，不会走路的婴儿由母亲抱着燎，看谁家火旺焰高。次日黎明，要把孩子衣服、灶上刀铲拿来放在门口水眼旁点燃的火上燎过，边燎边说：“燎干燎干，燎过身安。”主妇给火中撒盐浇水，冲天的火焰顿时变成一柱黑烟，袅袅升上天空，孩子们齐声喊：“干上天了！干上天了！”兴平礼

泉人则以农历正月三十日为燎荒日，晚上家家户户在门前点一堆谷草秸，大人、小孩连跳三次。是时，村子里火光明亮如昼，大人笑、孩子闹，场面热闹非凡。人们于正月最后一天晚上笼火燎荒，目的在于驱灾祈福。结束时人们常用扫帚扑打火堆，让火星飞散，从中看来年麦子、谷子收成良莠。长武人正月二十一日，各家于门楣遍插谷草秸杆，二十三日傍晚门前煨火炒豆，跳火堆，驱晦气，秸疖（杆）健身。还有的边煨边喊：“石石糜子石石谷”，预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惊蛰节 又叫龙抬头节、农头节。指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当日上午，娘舅家要给女儿和外甥送些炒蚕豆、炒包米花、炒面豆。礼泉人谣云：

二月二，龙抬头，
大仓满，小仓流。
二月二，吃豆豆，
人不害病地丰收。

长武、永寿人传为药王寿诞，故当地医药店多有祭祀活动。有的地方农活初开，古庙会逐渐演变成物资交流大会。也有的地方认为是纪念龙抬头，旬邑当日早起祭礼龙王，外祭设在麦场中央，内祭置案井边。兴平等市县还有龙抬头的动人传说。

清明节 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为清明节。据说清明节前为“寒食节”，人们要糊些纸制单衣连同冥钱上坟烧化，为亡人送单衣，同时留下一张纸压在坟头，以示后继有人。若为新灵（或称正坟，即亡者未满三年），上坟时还要提上献祭（礼品）、酒菜等。清明节扫墓祭祖，亦是中国全民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每到清明节前后春光明媚，大地青翠，也是人们出外踏青的好时节。旬邑县还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民歌：

清明节，荡秋千，妇女们，好打扮，
山门来，抬头看，心里快活口难言。
黑油头，明又鲜，红绸袄，青布衫。
丝罗带子束腰间，裙下露出小金莲，
绣花鞋，白裹脚，穿的紧又紧，
缠的尖又尖。东头瞅，西头看，
这是一个好秋千。姐姐拖，妹妹赶，
十指纤纤扳仙绳，双足尖尖登云波。
一丢丢到半天里，直丢得头昏腿软腰又酸。

这是旧时清明节妇女荡秋千的情景。现在每逢清明节，政府有关单位、学校则组织祭奠革命烈士，举行踏青、旅游、放风筝等活动。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由于夏至已过，天气开始炎热，各种

病菌容易滋生，故驱病避邪就成为过端午节的重要内容。民谣云：

五月五日午，天狮骑艾虎。

蒲剑斩百邪，鬼魅入虎口。

人们讲究把艾草悬挂在门外，孩子们佩戴各色香包、禁戒绳、裹肚，耳鼻、额头、屁股涂抹雄黄，祛湿解毒，驱虫除秽。淳化县未满周岁的孩子要到外婆家“躲端午”，结婚头一年的新娘娘家要给女儿“追端午”，即送些衣料、凉席、雨伞、鞋袜等，特别要带上各种香包、花馍，以祈节日吉利。传说端午节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投汨罗江而沿习，故多讲究吃粽子。秦都区端午节又称女儿节。节前出嫁的女儿要给娘家送绿豆糕。若是新婚还要带酒、肉等四色礼。同时，娘家要给女儿送粽子、糍馍，又叫“追新节”。

曝晒节 当地俗谣：“六月六，晒绿绸”。即以农历六月六日为曝晒节。长武俗称此日为天贶(kuāng)节。民间多炒箕子豆为食，故又云：“六月六，炒豌豆”，也有炒面豆的。城乡居民多取皮毛、绸缎衣物及书籍字画曝晒，谓可免虫蚀。兴平人讲究正午时分，大人总要将小孩脱光，让在太阳底下晒一个时辰，并且以晒肚脐眼为主，俗称“晒铁身子”。旬邑人也讲究晒衣，特别是老年人都要翻晒自己的寿衣寿帽。孩子们在衣物间钻来钻去，捉迷藏猫，边唱边喊：

天上日头光光，百虫晒得惶惶。

天上日头圆又圆，地上百虫都晒完。

日头爷，红又红，晒得百虫咯蹦蹦。

祈巧节 农历七月初七是祈巧节。又称乞巧节，七七节。传说是牛郎织女隔年重逢之时。这也是传统节日的一个姑娘节。各地讲究提前五六天泡出豌豆芽，名叫“巧芽芽”。届时村中未成年的女子和将要出嫁的姑娘公推一位俊秀灵巧、人才出众的姑娘领头，折来柳枝扎成“巧娘娘”，待天色将晚，设案祭奠，姑娘们把平时绣制的枕巾、鞋垫等女红陈列于前，然后虔诚地跪拜祈祷，边祈边唱《祈巧歌》，以保佑她们心灵手巧。然后在熄灭灯光的暮色中穿针剪花，直到深夜。永寿县的《唱七巧》。

巧呀巧，梨儿枣，众家姐妹唱七巧。

第一巧，巧我心，心巧人心换人心。

好心要报好心人，十人见了九人亲。

第二巧，巧我耳，耳巧好坏能明清。

女娃要听好人言，不做惹事是非精。

第三巧，巧我口，口巧人前不出丑。

多在人前说好话，背后少惹众人骂。

第四巧，巧我眼，眼巧看近能看远。

不偏不斜看得正，好事坏事能看清。
 第五巧，巧我手，手巧样样都会做。
 会织会纺会做饭，一世不穷有吃穿。
 第六巧，巧我脚，脚巧不缠烂裹脚。
 穿上花鞋走正路，一直走到天尽头。
 第七巧，巧我头，头巧不戴花来不搽油。
 世上好人配好人，恩恩爱爱到白头。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中秋节。又叫团圆节。中秋节前，出了嫁的姑娘或外甥要给娘舅家送去酒、水果，特别是月饼等礼物。其他亲朋好友之间也互有月饼馈赠。中秋晚上，秋高气爽，举行献月、赏月活动。秦都人祭月时要制一团圆馍，仪式结束后全家分享，以庆团聚。倘有人不在家，也要留给一份。旬邑人则将成熟的瓜果摘来，当庭摆上八仙桌，桌上放满各类水果祭品，俗称“献月亮”。乾县人专门烙制麦面锅盔馍，形圆光边，有脸盆大，内有芝麻和佐料，名叫月饼。等月升中天时，供奉食品，上香礼拜。次日切块互赠，以求和睦、团结和友好，也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现在中秋节已成为中国人民渴望祖国统一、同胞团圆的全民性节日。每逢中秋节，各机关单位都要召开茶话会、座谈会，怀念亲友，表达祖国统一的心愿。

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节。因九代表阳数，又称重阳节。传统的重阳节，人们常结伴登高，设宴饮酒赏菊。境内民间讲究以糖、油、米、面、大枣做糕食之，俗称重阳糕，又叫枣糕。淳化人多数为新婚女儿赠糕，表示“步步登高，家业兴旺”。秦都人除送塔形枣糕外，还送柿子，故又称柿子节。他们给出嫁第一年的女儿送的花糕特别大，一锅只蒸一个。送时要用扁担挑上，外面不苫布，意在流动展览。出嫁两年后的女儿，给送的花糕就小多了。女儿生孩子，外甥第一年过重阳节，舅家要带四个花糕，其中两个算是送给外甥的。旬邑人给出嫁的闺女送枣糕（又叫早糕），意在督促新娘新郎莫贪恋罗床锦被，早早下田劳作。这些造型丰满的枣糕常引起新人邻居的品评赏析，大伙争来抢去，议论纷纷，成为农家一大乐趣。

寒衣节 又称“鬼节”。农历十月初一为寒衣节。由于这时咸阳市境内已进入冬季，气候骤然下降，故而“十月一，穿齐备”成为民间习俗。人们在给活人准备棉衣时，并没有忘却已故去的祖先，于是便有了给逝去的人送寒衣的习俗。过去秦都区人要在先天夜里穿白戴孝，打上引魂幡，把新灵请回家中，献礼祭奠。当天出嫁的姑娘或在外的晚辈都要赶回家。正午男孝子一齐到坟上摆放供品，烧纸焚香，三拜九叩，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由长辈绍述祖先艰难创业的事迹，待人接物的品德。傍晚女孝子上坟，自带冥钱、纸衣等。跪拜时要叮嘱祖先穿衣戴帽，盖好铺好。然后由长辈将祭品分给大

家，礼成。旬邑传说天寒地冷，先祖亡灵多在夜间活动，故每到冬至黄昏，全家兄弟跪于坟前、姊妹跪于坟角，磕头上香。若是新灵，儿女们还要哭奠一番，女儿边哭边说：

哎—— 我大（娘）实可怜，
生养女儿心操烂，为过日月力用完。
撇下儿女离世间，你儿从此谁来管，
你女盼谁前来看！

哎—— 我大（娘）心安然，
女儿有心难报还，今送棉衣遮风寒，
物料不好身上暖，儿女常常把你念！

……

送冥衣、冥钱的女儿必须当天返回，不得逗留娘家。如出远门不能回家者，则在十字路口画圈焚化冥衣纸钱，让各地游魂捎给祖先。

腊八节 每年农历腊月初八为腊八节。兴平人讲究腊八吃粥，要凑够八样东西，如粳子、大小米、大小豆、豆腐、粉条、大肉、青菜、豆芽等。还有一句俗语：“腊八姓张，越吃越香。”长武民谣云：“鸡儿鸡儿吃腊八，明天给娃下圪塔（鸡蛋）。”各地均讲究吃粥，但北原以粘米黄豆煮粥，又以大肉、萝卜、菠菜、芫荽、豆腐等烹调五香汤；南原在粥中杂以斜形面片、麦仁和蔬菜，凑够八样，要求当日太阳冒尖前即吃。俗云：“腊八吃早，地里不长草。”饭后，还要用残粥喂牛、猪、鸡，涂抹树木花草之类，以取吉利。乾县人爱吃腊八面，内有豆、米、红萝卜、豆腐等，要连吃几顿，意取为不缺吃。从这天起人们开始办年货，即“过了腊八闻年气”。淳化人说“吃过五豆腊八，有钱尽量少花”，告诫人们年节将到，要注意节俭。旬邑人家吃面条，也有的吃麻食面，用臊子汤。当天早晨，男人们黎明即起，纷纷奔向井台打水，据说谁打上第一桶水，谁来年就会交上好运。吃完腊八面，人们还搬出封存了一年的锣鼓家伙，用火燎烤后开始操习。“过了腊八，锣鼓铿锵”，“吃了腊八面，一天长一线”，妇女们赶集上会买线，开始给孩子准备新衣过年。

祭灶节 每年腊月二十三为祭灶节，谷称“小年”。旬邑人这天家家都烙一锅干粮（即饽饽），从集市上买一匹用纸剪成的灶马，请回灶爷像，天黑后摆上案板献供上香，由男主人向灶爷祈祷：

灶爷灶婆上了天，多说好话行方便。
今年缺吃又少穿，明年粮食得宽展。
灶爷灶婆你莫嫌，干粮盘缠多带点。

……

然后女主人接着祈祷：

灶爷灶婆穿得青，骑戏马，戴红缨，
扳的银鞍踩金镫。撒米泼面我有错，
清水恶水无奈何，上去不敢给天公爷爷说，
只说好，甬说瞎，南无佛，阿弥陀。

供品必须摆上 12 个干粮和用甜萝卜熬成的灶糖，以求灶爷“上天言好事”。也有人家请灶爷拴锁拴儿，保佑孩子长大成人，并许愿孩子 12 岁时杀猪宰羊还愿。烧过三柱香，长者铺开黄裱在 12 个干粮上逐个掐些碎块或一些稀糖，包住烧掉，再加些麸子和麦草给竹马。次日早晨把灰扔到房顶或崖背上，意即送灶上天。当地有民谣：“腊月二十三，灶爷送上天。打酒磨白面，收拾过新年”。除夕时再接回新的灶王爷即“回宫降吉祥”。兴平人年献灶馍 12 个，闰年还要献 13 个。一般人家都是腊月二十三祭灶，但“张王李赵，二十四日祭灶”。长武县祭灶时富户杀猪宰羊，贫户也得杀鸡。灶神堂前还要贴上对联：“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祭品要供于案头，并将毛、血沾于像边。建国后，祭灶活动逐渐淡化。人们这天常用来打扫室内室外卫生，准备年货，布置房子，喜迎新春佳节。

除夕 每年农历腊月最后一天称除夕。一般常年在外面的人都要赶着回家团圆。过去除夕守夜，叫坐不当。凡是官府债主催粮催债，这天晚上贴对联门神后，即可隔免皇粮，讨账的人不能进门。乾县人讲究打扫卫生，糊窗纸贴窗花，贴年画、贴门神。门上贴有春联，神龛贴对联。炕上贴“身卧福地”，树上贴“根深叶茂”，牲畜棚贴“槽头兴旺”，院子贴“抬头见喜”等条幅。生产和生活用具上贴有黄色裱纸，当天蒸好做好五天内的食物。晚上熬年过岁，祭奠神灵和祖宗牌位。兴平人还讲究“矮个超房檐，除夕夜晚爬门坎”，让矮个孩子从门坎底下爬过，并到椿树前边摇边唱：“椿树椿树你别长，我长高了你再长”，说是如此这般来年就会长高许多。建国后，除夕时人们皆煮肉炒菜，蒸馍擀面，忙于新年饮食。入夜门前挂灯煨火，晚辈向老人祝福，长辈给儿孙散“压岁钱”。80 年代以来，除夕之夜搞电视广播文艺晚会，深受群众欢迎。

第二节 古会庙会

在传统节日中，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祭祀活动相当繁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演变为后来的古会庙会，被人们作为集市贸易、物资交流的约定节日。长武县古会庙会便有：正月初九，财神寿诞。二月二，药王寿诞。二月初九，观世音菩萨寿诞。三月三东岳庙、无量庙、王母娘娘庙盛会祭祀。三月十二

日花娘娘庙会，妇女求子还愿。四月初八佛祖寿诞，僧侣云集，善男信女谒庙敬香，布施钱财。寺院以素斋饷众徒，击鼓诵经“沐浴佛祖”。四月十日祀吕祖，五月十三祀关帝，六月十九为马王庙、观音庙会。七月初二阿姑圣母庙会。七月七九天圣母寿诞，村村联合聚会祀神。又祀织女神。七月十五道教中元节、佛教盂兰盆节，又是县城太白庙火神会。七月二十三财神会，商人祭祀。八月初二城隍寿诞。从初一到十五，县城举行盛大祭祀活动。十月一日醮会祭奠亡灵，超度亡魂。十一月十九祀太阳神，十二月二十三祀灶神。各行各业自有所祭。现将部分主要古会庙会予以介绍。

秦都区两寺渡骨魂庙会 农历十月初一，两寺渡人都要到此叩拜“骨魂爷爷”。这天人们用敞篷大轿，抬着软衣“骨魂爷爷”塑像，前边鸣锣开道，香火继后，高竿社火紧随，打有一副对联：

仰吾身瘦骨棱棱，断不可瘠人肥己。

队伍从各家门前通过，人们纷纷赠钱、送物。过会时本村人要请两台大戏演唱。据说是为纪念一名叫冯显的人，他于灾年毁家纾难，救活了一方百姓，自己却瘦饿而死，后人遂于这天送寒衣，以示纪念。近年来已发展成为物资交流大会，并成立有民间武术协会，设擂表演，健体强身。

秦都区南寺庙会 每逢农历冬月十五日举办。南寺庙原称定角寺。传说唐玄奘法师曾取经过此，后人为纪念他而建庙。逢会时，群众自发组织邻近四社（一南寺村、周村，二陈良村、尹村，三吕村，四大寨村）轮流负责过会，会期5至10天。会终社与社之间举行交会仪式。其时戏班、艺人、名吃、干果云集于此，游客多达两万余人。现古庙已坏，庙会改为物资交流大会。

秦都区西里村三王爷庙会 农历三月十三举办。相传明代嘉靖年间，西里村方圆地面发生瘟疫，祸害牲灵。当地群众集资修了三王爷庙（药王爷、马王爷、牛王爷），烧香祷告，以求槽头兴旺，五谷丰登。现尚有古钟铸造着修庙年月、人名。一般过会3至5天，一年一度，已成为当地最大的牲畜交易会。

秦都区大寨村司浪庙会 每年农历四月初六，当地人到此祭祀水神司浪。传说当地香柏李家有人在江南做官，回家时船过长江，水浑风急浪大，生命垂危，立誓许愿水神：尔保佑吾命存，修庙宇塑金身。很快风平浪静。后骑马至此驻足，遂于此地修庙上香还愿。现庙中大殿前有口铁钟，上面铸有清代铭文。大寨及邻村人每年届时到会购买农忙家具，准备夏收。

秦都区渭河南岸亲戚会 农历六月初五至七月底举办。每次会期一天（多选单日），有100多个村庄参与，轮流坐庄。至时逢忙罢，各村居民满怀丰收后的喜悦心情，精心准备走亲戚会。买来各种时鲜水果、蔬菜及糕

点，杀猪或买回上等好肉，磨面时特意收些上等细面，雪白的面粉配上黄澄澄的菜油，可蒸出碗大喷香的油杳馍。届时各家老小亲戚尤其是女婿外甥，都得带上自家精心蒸制的油杳馍前来赴会。亲戚进门，主人切西瓜、洗水果、倒凉茶、开电扇，忙前跑后，殷勤招待。亲戚会这天有的村子还要演戏。戏台底下，有买卖日用百货的，有经营各种吃喝的。各家的亲戚都去看戏。因为客人中以女婿为主，所以亲戚会又叫女婿会。中午的宴席准备停当后，老丈人兴冲冲地对着新女婿高唱：“娃呀，跟爸吃饭去。”老小女婿，特别是新婚不久衣着体统的新女婿，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着岳父朝家里走。午宴上，翁婿、兄弟、朋友、姊妹们欢聚一堂，布菜让饭，传杯换盏，问候生计，传递信息，总结上半年的致富经验，交流下半年的生产打算，感情融融，气氛和谐。这种走亲戚会深受当地群众喜爱，年年举行，经久不衰。

渭城区城隍庙会 农历八月初二举行。先天晚间古会已趋高潮，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游人，云集于东明街、东关和咸阳古渡故址附近，人如潮涌，摩肩接踵，叩头贡献于城隍神位之前。香案旁有功德箱，供人们布施。佛教弟子诵经念佛，规劝世人“争强好赌惹祸殃，强要人财不久长”。还有用彩纸扎糊的“万人伞”以图吉祥。古会的另一个中心是龙王庙会。每年农历八月初二举办。先天晚在龙王庙堂前供奉“龙王之位”，挂上“有求必应”旗匾。主祭人穿着法衣，背绘八卦图，一个主唱，众人应合。因庙对渭河，故有陈列纸船、纸轿、纸马、纸衣的习俗。当日正午，置于彩船上顺水而去。届时戏台闹嚷，小吃鳞次。古会上香烟缭绕，烛光通明，演戏的鼓乐丝竹声夹杂着街上阵阵爆竹声，煞是热闹。因该地已成为市区中心，故渐趋岑寂。

兴平市石岭子古会 农历正月十七日举办。会期一天。汉霍去病墓俗称石岭子，相传能显灵生育，故当地人修庙祭祀。现在此地修有茂陵博物馆，当地群众仍然照例进香唱戏，感谢送子娘娘赐舍儿孙之恩。

兴平市城隍庙老婆会 每逢农历八月初二举办。会期一天。相传兴平城隍婆能制止男人吸毒、赌博、打骂妻子，故当地妇女每年八月初二要为之过生日，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庆典。其活动多从八月初一晚上开始，次日由城东冉店乡张家村迁往县城。妇女们常借机诉苦喊冤，祈福祈寿，或拉家常，或唱古经，或讲些傻女婿酸故事等。

兴平市十三村老王会 农历十月十五日举办。会期一天。由茂陵策村一带13村轮流举行，力求文明、热闹、红火、安全。相传是嘉庆年间当地有弟兄五人曾为民请命，开仓济困，遭到县府杀害。故当地村民修建老王祠，定期祭祀。一般由老者高举旗幡行走于前，数十名青壮年村民抬轿随后，鼓乐喧闹，绕场而行，气氛相当热烈。

礼泉县玉皇庙会 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举办。原为道教玉皇庙落成，上

香庆典，因道徒常聚集三五日不散，渐成庙会。同时还举行花火庆祝会。会期10天至30天。过去由供销社、城关镇、村主办，现为县政府工商部门主持。交流物资已由山货、瓷器、木材、牲畜，增加有纺织、百货、果品等。从1993年起更名礼泉县冬季商品交易大会，蜚声省内外。

礼泉县赵镇尧都村药王庙会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举办。会期一天。据说为纪念药王孙思邈而设。实为当地春耕备耕农用生产工具的交易大会，尤其以耙齿、犁耙之类为盛。

礼泉县赵镇姑婆会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举办。会期一天。据说赵镇大姓吕氏有一女儿，曾为民办事，后成神祇，故当地人俗称姑婆会。会前要到永寿山中迎回神牌，参加聚会的人多为老太婆，以烧香磕头为多。后来逐渐融入活动。

礼泉县赵镇古会 每年农历九月初十至十月初十前后举办。会期少则30天，多则40天。因其规模较大，故远至甘陇，近至各县客商皆择道而来，进行各种物资交流活动。其中以关中驴、秦川牛等当地农用牲畜交易最盛。近年逐渐演变为常规性集市贸易。

武功县河滩会 武功县故城以东漆水河畔有后稷教民稼穡的台址，武功镇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一举行规模庞大的河滩会。原来会期一天，只有当地人参加，后来发展到西北五省的客商到此聚会，会期3、7、10天不等。主要交易品种有西北各省名马、裘皮百货，本地骡子、关中驴、秦川牛、山羊、良种猪，以及瓷器、木材、竹器、箱柜之类等。据说原来人们到此听取务农耕作技术或经验，现在赶集仍有提大馍的习俗。为了纪念后稷，庆贺升平，人们还扭秧歌、耍社火、跑竹马、唱大戏，载歌载舞，彻夜灯火通红。

泾阳县桥底镇菩萨庙会 泾阳县桥底镇东沟附近有菩萨庙会。民谣云：

桥底街里放大炮，七村八寨都上庙。

页子村，两头翘，中间有个菩萨庙。

寨子沟，沟不正，寨子沟里耍龙灯。

马家轿，雾腾腾，石庄村里赛北京。

湾里王，坐正宫，弹花李家蹦蹦蹦。

南北柴家七里通，咎家上来一窝窝。

吓得焦家钻烟囱。

现为农村集贸会。

泾阳县东关庙会 农历二月初二举办。现为泾阳县城盛大的物资交流会。会期有时延展到10至15天。

三原县城关镇腊八会 农历十二月初八举行。建国后，变为县城盛大的物资交流、文化娱乐活动。届时各地商客设栈摆摊，来自邻近县乡的人们到

此采购年货，交易物资。历时 20 余天，直到春节前夕。

旬邑县庙会 有二月二张洪寺大腊会，二月十五丈八寺庙会，二月十八伽蓝寺庙会，三月十五东老爷庙会，七月十五石门庙会等。逢会推举会长、理事，分工负责。正会抬出主神置于戏台前彩篷中间，摆设香案，和尚列队，凡经过台前的人都要布施。现多数已经变为物资交流大会，或文化活动现场。

第三节 法定节日

新定节日包括两种：一种是对传统节日的承认并赋予它以崭新的时代内容。如清明节，多用来为烈士扫墓，追怀民族英烈；中秋节用来缅怀同胞，座谈祖国统一等。另一种是按公历确定的纪念日。民国时期有“清明植树节”、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四月四日“儿童节”、六月三日“禁烟节”、七月七日“国耻日”、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纪念日”、九月三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十月十日“中华民国国庆节”、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的节日有：

元旦节 公历 1 月 1 日为元旦节。原来元旦节为农历一岁之首，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时，改定为公历岁首。

妇女节 公历 3 月 8 日为妇女节。

植树节 公历 3 月 12 日为全民植树节。

劳动节 每年公历 5 月 1 日为国际劳动节。

青年节 公历 5 月 4 日为中国青年节。

儿童节 公历 6 月 1 日为儿童节。

建党节 公历 7 月 1 日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

建军节 公历 8 月 1 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

教师节 公历的 9 月 10 日为教师节。

国庆节 公历 10 月 1 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纪念日。

第十一编

方言

咸阳市方言大部分属北方官话区中原方言关中片,而杨陵区五泉乡、武功县游凤乡部分村庄、彬县永乐乡、长武巨家、路家等乡属中原方言秦陇片。市境大的方言点有:市区话、窑店话(渭城区属)、兴平话、武功话、礼泉话、乾县话、永寿话、南彬话(包括彬县城关及彬县南部)、北彬话(主要包括彬县香庙、龙高、新民、炭店、曹家店等地)、长武话、旬邑话、淳化话、泾阳话、三原话。淳化方言韵母系统与市境内关中片方言又有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对普通话〔ən:əŋ〕(本编记写方音用国际音标)两组各韵母的读法上:大部分地区读作〔ē:əŋ〕等,五泉等地并作〔əŋ〕等,淳化读作〔ei:əŋ | i ē:iŋ | uei:uŋ / ɥei:ɥəŋ | y ē:yŋ〕。比较如下(其中“荣旬”等5字为阳平字,其余为阴平字):

例字	喷	分	金	敦	春	军	
市区	p'ē	fē	tɕiē	tuē	ts'ɥē	tɕyē	
五泉	p'əŋ	fəŋ	tɕiŋ	tuŋ	ts'ɥəŋ	tɕyŋ	
淳化	p'ei	fei	tɕiē	tuei	ts'ɥei	tɕyē	
例字	荣容	旬巡循	夙	经	冬	冲	拥
市区	yŋ	suē	fəŋ	tɕiŋ	tuŋ	ts'ɥəŋ	yŋ
五泉	yŋ	ɕyŋ	fəŋ	tɕiŋ	tuŋ	ts'ɥəŋ	yŋ
淳化	yŋ	suei	fəŋ	tɕiŋ	tuŋ	ts'ɥəŋ	yŋ

此外,秦都区渭河南、渭滨乡、兴平北乡、旬邑底庙等方言岛,其语音又各具特色。

咸阳历史悠久,唐以前是建都之地或京畿要地,语言源远流长。西汉扬雄的《方言》一书就大量记述了包括咸阳在内的“关西”、“秦晋”方言。如《方言》卷八:“獾,关西谓之獾。”许慎《说文解字·豸部》:“獾,兽名,读若湍。”今咸阳市方言即称“獾”为“獾”[t'uā] (“困”阴平)。又如宋代陈彭年等所修《广韵》一书中

记录了许多字,是咸阳市方言的本字:[爨 $ci\epsilon$ 阴平]是“烤”的意思,《广韵》业韵虚业切,《集韵》注:“~,火迫也。”[搥 ci 阴平],用手掌打,如“在娃脸上~”,《广韵》支韵许羈切:“~,击也。”

元明之际山西大量移民迁来关中,咸阳市方言便具备了山西方言词汇的一些特点。举侯精一、温端政主编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3 年 7 月出版)一书中一些例词和例句如下,1、2、3、4、5 分别是临汾、和顺、长治、文水、万荣。

1. 茅子厕所 手巾毛巾 凉着了感冒了
2. 早起清早 刀菜刀 晌午饭午饭
3. 吃烟抽烟
4. 日头太阳 年时去年 蛛蛛蜘蛛
5. 莲菜藕 老哇乌鸦 爷祖父 生活毛笔 风匣风箱 胡壑土坯

建国后,群众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尤其是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干部、学生的口语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日益明显。如旬邑中老年“第地”读作“替”,“办伴拌瓣”读作“判”,“局”读作“渠”,“跪、柜”读作“愧”,“件”读作“欠”等,而青年人多读作与普通话声母相一致的不送气清声母。

第一章 语 音

咸阳市方言在声韵调三方面与普通话基本对应。声母方面,比普通话多[ŋ ŋ v z]四个;秦都区沔东乡又多[pf pf]两个。韵母方面,比普通话多[ɯ iæ]两个;有些方言点(如三原)[yɿ ye]两韵母与普通话[ye]等韵母相对应。声调方面,咸阳市方言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除古入声字不太对应外,从调类到数量都与普通话相对应,但调值不同。

为了便于阅读,特列《国际音标与汉语拼音字母对照表》于下。

本编方言及普通话声调描写均用五度制调值,如市区方言阴平 31,阳平 24,上声 52,去声 44;普通话阴平 55,阳平 35,上声 214,去声 51。

第一节 语音特点

咸阳市方言语音特点,可从声母特点、韵母特点,文白异读、声调特点四个方面分述。

国际音标与汉语拼音字母对照表

表 11—1

国际音标		汉语拼音字母	国际音标		汉语拼音字母	国际音标		汉语拼音字母
咸阳音	普通话音		咸阳音	普通话音		咸阳音	普通话音	
p	p	b	tɕ	tɕ	j	ā	an	an
p'	p'	p	tɕ'	tɕ'	q	ē	ən	en
m	m	m	ɱ④			aŋ	aŋ	aŋg
f	f	f	ɸ	ɸ	x	əŋ	əŋ	eng
v		v	k	k	g	ər	ər	er
pf①			k'	k'	k	ia	ia	ia
pf②			ŋ⑤		ng	iɛ	iɛ	ie
t	t	d	x	x	h	i	i	i
t'	t'	t	ø	ø	o	iæ③		iai
n	n	n	a	a	a	iau	iau	iao
l	l	l		o	o	iʋu	iou	iu
ts	ts	z	ɻ	ɻ	e	iā	ian	ian
ts'	ts'	c	ə	ə	e	iē	in	in
s	s	s	ɿ	ɿ	-i(前)	iaŋ	iaŋ	iang
z③			ɿ	ɿ	-i(后)	iŋ	iŋ	ing
tɕ	tɕ	zh	æ⑥	ai	ai	ua	ua	ua
tɕ'	tɕ'	ch	ei	ei	ei	uɤ	uo	uo
ʃ	ʃ	sh	au	au	ao	uə	uo	uo
ʒ	ʒ	r	ɻu	ou	ou	u	u	u
uæ	uai	uai	ɥæ⑦			yɛ	ye	üe
uei	uei	ui	ɥ⑧			yɤ⑨		
uəi	uei	ui	ɥæ⑩			yə⑩		
uā	uan	uan	ɥei⑪			y	y	ü
uē	uən	un	ɥei⑫			yā	yan	üan
uaŋ	uaŋ	uaŋg	ɥā⑬			yē	yn	ün
uŋ	uŋ	ong	ɥē⑭			yŋ	yŋ	iong
ɥa⑮			ɥaŋ⑮					
ɥɤ⑯			ɥəŋ⑯					

注 释:

①[pf]是秦都区沔东方言“朱抓桌追专准庄中”等字的声母。

②[pf']是沔东方言“出炊戳吹川春创冲”等字的声母。

③[z]是咸阳方言“人授锐软闰茸”等字的声母。

④[ɱ]是咸阳方言“你宜压捏业鸟咬牛年眼娘仰宁硬女”等字的声母。

⑤[ŋ]是咸阳方言“爱额安恩昂我鹅”等字的声母。

⑥[æ]以及[ã ɛ uæ ie]等韵母分别与普通话[ai an ən uai ie]等韵母相对应,为了比较,[æ]等分别与[ai]等韵母相对当。普通话的复合元音韵母[ai]在咸阳方言中被单元音化了,普通话的前鼻韵[an ən]在咸阳方言中分别成了[a ɛ]的鼻化音。普通话[ie ye]两韵母中的[e](ɛ),咸阳方言读成了比[e]低的[ɛ]。

⑦彬县、长武方言的[ai][uai]两韵母分别与普通话的[ei uei]两韵母相对应。

⑧[iæ]是泾阳、三原等地方言“阶皆谐戒界介解”等字的韵母。

⑨[ɥa]是咸阳方言“抓欸刷授”等字的韵母。

⑩[ɥɿ]是咸阳方言“桌戳朔所”等字的韵母。

⑪[ɥə]是长武方言“桌戳朔所弱”等字的韵母。

⑫[ɥ]是咸阳方言“朱出书入”等字的韵母。

⑬[ɥæ]是咸阳方言“揣帅衰甩”等字的韵母。

⑭[ɥei]是咸阳方言“追吹水锐”等字的韵母。

⑮[ɥai]是长武方言“追吹水锐”等字的韵母。

⑯[ɥã]是咸阳方言“专川涮软”等字的韵母。

⑰[ɥɛ]是咸阳方言“准春顺闰”等字的韵母。

⑱[ɥaŋ]是咸阳方言“庄创双”等字的韵母。

⑲[ɥəŋ]是咸阳方言“中冲茸”等字的韵母。

⑳[ɥɿ]是咸阳方言“角却学岳药”等字的韵母。

㉑[ɥə]是长武方言“角却学岳药”等字的韵母。

一、声母特点

1. 能区分 tʂ tʂ' ʂ 和 ts ts' s,但读 tʂ tʂ' ʂ 的字比普通话少。知照两系开口三等读 tʂ tʂ' ʂ,开口二等读 ts ts' s,照系止摄开口三等之脂支三韵及庄系深摄开口三等侵缉两韵、臻摄开口三等真质两韵以及庄系流摄开口三等尤韵等字也读 ts ts' s。下面举咸阳市方言读 ts ts' s 的部分字,与普通话语音予以比较。

例字	茶查荏	渣	沙杀	斋	豺柴	晒	支之	齿
咸阳	ts'a ²⁴	tʂa ³¹	sa ³¹	tsæ ³¹	ts'æ ²⁴	sæ ⁴⁴	ts ₁ ³¹	ts' ₁ ³¹
北京	tʂ'a ³⁵	tʂa ⁵⁵	ʂa ⁵⁵	tʂai ⁵⁵	tʂ'ai ³⁵	ʂai ⁵¹	tʂ ₁ ⁵⁵	tʂ' ₁ ²¹⁴
例字	士试事是	时	翟宅	罩	抄钞	捎	搜	瘦
咸阳	s ₁ ⁴⁴	s ₁ ²⁴	tsei ²⁴	tsau ⁴⁴	ts'au ³¹	sau ³¹	syu ³¹	syu ⁴⁴
北京	ʂ ₁ ⁵¹	ʂ ₁ ³⁵	tʂai ³⁵	tʂau ⁵¹	tʂ'au ⁵⁵	ʂau ⁵⁵	ʂou ⁵⁵	ʂou ⁵¹
例字	山衫	站	绽	产铲	村	参人~	争	撑
咸阳	sã ³¹	tsã ⁴⁴	ts'ã ⁴⁴	ts'ã ⁵²	ts'ẽ ⁴⁴	sẽ ³¹	tsəŋ ³¹	ts'əŋ ³¹
北京	ʂan ⁵⁵	tʂan ⁵¹	tʂan ⁵¹	tʂ'an ²¹⁴	tʂ'an ⁵¹	ʂən ⁵⁵	tʂəŋ ⁵⁵	tʂ'əŋ ⁵⁵
例字	生	省	察					
咸阳	səŋ ³¹	səŋ ⁵²	ts'a ³¹					
北京	ʂəŋ ⁵⁵	ʂəŋ ²¹⁴	tʂ'a ³⁵					

2. 古全浊声母仄声字今读送气声母,咸阳市方言由南向北渐次增多,长武最多,彬县、旬邑次之,市区、武功、乾县、三原最少。长武的例字:

肚~子 t'u⁵⁵ 地 t'i⁵⁵ 迭 t'ie³⁵ 白 p'ai³⁵ 垫 t'ia⁵⁵
 拌 p'ã⁵⁵ 柜 k'uei⁵⁵ 件 t'ia⁵⁵ 贱 ts'ia⁵⁵ 泽贼 ts'ai³⁵
 着睡不~ ts'uə³⁵ 值侄 tʂ³⁵ 郑 tʂəŋ⁵⁵

3. 普通话无 ŋ v 声母,咸阳市方言有 ŋ v 声母。ŋ 声母除来源于疑母(见第一章第二节“一”)外,还来源于影母,例如:哀 ŋæ³¹ 葛 ŋæ⁵² 扼 ŋei³¹ 奥 ŋau⁴⁴ 恩 ŋē³¹;v 声母主要来源于微母逢今合口呼,例如:无 vu²⁴ 未 vei⁴⁴ 万 vā⁴⁴ 袜 va³¹ 物 vy³¹ 文 vē²⁴ 妄 vaŋ⁵²。

二、韵母特点

1. 咸阳市方言有〔u〕〔iaɛ〕两个特殊韵母。〔u〕韵母主要与普通话 k k' x 三声母拼 y 韵母的字相对应,〔iaɛ〕韵母主要与普通话 tɕ ɕ 两声母拼 ie 韵母的字相对应。例如:胳疙屹屹 ku³¹ 咳~嗽克~郎:坑 k'u³¹ 核~桃 xu³⁵ 阶皆 tɕiaɛ³¹ 岩埃 iaɛ³⁵(以上市区例) 械戒界介 tɕiaɛ⁵⁵ 谐 ɕiaɛ³⁵(以上三原例)。

2. 普通话读作 tʂu- tʂ'u- ʂu- zu- 的音节,咸阳市方言读作 tsy- ts'u- sy- zu-。举市区例如:朱竹 tsy³¹ 出初 ts'u³¹ 书淑 sy³¹ 人褥 zu³¹ 抓 tsya³¹ 刷 sya³¹ 掇动词 zya²⁴ 掇形容词 zya⁴⁴ 桌捉 tsy³¹ 所 sy⁵² 帅 syæ⁴⁴ 追 tsyɛi³¹ 锐 zyei⁴⁴ 睡锐瑞 syei⁴⁴ 专 tsyã³¹ 软 zyã⁵² 船 syã²⁴ 淮 tsyē⁵² 春 ts'uē³¹ 唇 syē²⁴ 闰 zyē⁴⁴ 庄 tsyay³¹ 窗 ts'uay³¹ 撞 ts'uay⁴⁴ 双 syay³¹ 中 tsyay³¹ 虫 ts'uay²⁴ 绒茸 zyay²⁴ 鼬 zyay⁵² 荣容 融 yŋ²⁴。

3. ay 横行各韵母中的 ŋ 音素实际音值为 ỹ。

三、文白异读

咸阳市方言的文(文读:读书音)白(白读:口语音)异读因地域不同而参差 不齐。下列各例,文白音之间用双竖线隔开,双竖线前为文读,后为白读,主要 列举典型方言点的文白异读现象,凡带有普遍性特点的不注明具体方言点。

1. ɕi- (齐) || x- (开) 下上~吓~一跳〔ɕia⁴⁴ || xa⁴⁴〕瞎〔ɕia³¹ || xa³¹〕匣〔ɕia²⁴ || xa²⁴〕鞋〔ɕie²⁴ || xæ²⁴〕解(姓)〔ɕie⁴⁴ || xæ⁴⁴〕蟹(螃~)〔ɕie³¹ || xæ³¹ 兴平〕涎(~水)〔ɕiã²⁴ || xã³¹〕闲咸〔ɕiã²⁴ || xã²⁴〕苋(人~:苋菜)〔ɕiã⁴⁴ || xã³¹〕项(~目)〔ɕiaŋ⁴⁴ || xaŋ⁴⁴〕杏〔ɕiŋ⁴⁴ || xaŋ⁴⁴〕行(~走)〔ɕiŋ²⁴ || xaŋ²⁴〕孝(~衫:孝衣)〔ɕiau⁵⁵ || xau⁵⁵ 兴平〕。

2. uei || y 苇 - 子〔uei⁵² || y⁵²〕魏(~ 寨)慰蔚(~ 然)渭(~ 河)喂(~ 鸡, 泾阳等地)味(~ 道, 旬邑等地)〔uei⁴⁴ || y⁴⁴〕; suei⁵⁵ || ɕy⁵⁵ 穗(麦 ~)。

3. su || ɕy 俗(风 ~)〔su²⁴ || ɕy²⁴〕宿(~ 舍)肃夙〔su³¹ || ɕy³¹〕; tsu³¹ || tɕy³¹ 足(满 ~, ~ 球)。

4. k'u || fu 哭窟(~ 窿)〔k'u³¹ || fu³¹〕苦(~ 胆)〔k'u^{52:31} || fu^{52:31}〕裤(~ 儿: ~ 子)〔k'u⁴⁴ || fu⁴⁴〕。

5. i - || ŋi - 衣〔i³¹ ~ 裳 || ŋi³¹ ~ 包: 胎盘〕压〔ia⁴⁴ 血 ~ || ŋia⁴⁴ ~ 迫〕鸭〔ia³¹ || ŋia³¹〕哑〔ia⁵² ~ 口无言 || ŋia⁵²〕严〔iā²⁴ || ŋiā²⁴〕颜(~ 色)言(不 ~ 传: 不吱声)〔iā²⁴ || ŋiā²⁴〕酩(~ 茶: ~ 醋)〔iā⁴⁴ || ŋiā⁴⁴〕荫荫〔iē³¹ || ŋi ē³¹〕饕饮(~ 马)〔iē⁴⁴ || ŋiē⁴⁴〕; 旬邑: 雁〔iā⁴⁴ || ŋiā⁴⁴〕坳〔iau³¹ || ŋiau³¹〕勒〔iau⁴⁴ || ŋiau⁴⁴〕殃秧〔iaŋ³¹ || ŋiaŋ³¹〕。

6. ts' || s' 辞词赐。

7. tɕ' || ʂ 阐蝉蝉〔tɕ'ā²⁴ || ʂā²⁴〕盛(~ 东西, 彬县)〔tɕ'əŋ²⁴ || ʂəŋ²⁴〕仇(~ 人, 旬邑)〔tɕ'yu³⁵ || ʂyu³⁵〕。

8. ie || i 携〔ie²⁴ || i⁵²〕; i || ie 滴〔ti³¹ || tie³¹〕起(~ 来)〔tɕ'i⁵² || tɕ'ie⁵²〕。

9. ɕæ || ɕei 拽〔tsɕæ⁴⁴ || tsɕei⁴⁴〕摔〔sɕæ⁵² || sɕei³¹〕。

10. 阴平 || 阳平 姑〔ku³¹ ~ 夫 || ku²⁴ 姑母〕妈〔ma³¹ || ma²⁴〕叔〔sɕ³¹ || sɕ²⁴〕。卫(后 ~, 旬邑)uei⁴⁴ || uei³⁵; 虑滤〔ly⁴⁴ || ly⁵²〕。

11. 旬邑等地: tɕ'yā³⁵ || ts'uā³⁵ 泉全; ɕyā || suā 宣〔ɕyā³¹ || suā³¹〕旋〔ɕyā³⁵ || suā³⁵〕选〔ɕyā⁵¹ || suā⁵¹〕铍〔ɕyā⁴⁴ || suā⁴⁴〕, tɕyē⁴⁴ || tsuē⁴⁴ 俊竣竣, ɕyē³⁵ || suē³⁵ 旬荀枸循; 淳化: tɕyē⁴⁴ || tsuei⁴⁴ 俊竣竣; ɕyē²⁴ || suei²⁴ 旬荀枸巡循。

12. 泾阳等地: zɕyu || zɕyu 肉〔zɕyu⁵⁵ || zɕyu⁵⁵ 又 zɕyu³¹〕辱〔zɕyu⁵¹〕褥〔zɕyu³¹〕 ||〔zɕyu³¹〕。

13. 无规律可循的字:

例字	大(老 ~)	也(我也是陕西人)	蜗(~ ~ 牛: ~ 牛)	做(~ 饭)
文读	ta ⁴⁴	ie ⁵²	uɿ ³¹	tsuɿ ³¹
白读	tux ⁴⁴ 市区 t'ux ⁴⁴ 旬邑	ia ⁵² a ⁵²	kua ⁵²	tsɿu ⁴⁴ 永寿等地
例字	去(来 ~)	婿	儿(~ 马)	榆(~ 树)
文读	tɕy ⁴⁴	si ³¹	ər ³⁵	y ³⁵
白读	tɕi ⁴⁴	siē ³¹ 旬邑	z ³⁵ 旬邑	zɕ ³⁵ 旬邑
例字	惠(姓)	医(~ 院)	泪(眼 ~)	尾(~ 巴)
文读	xuei ⁴⁴	i ³¹	luei ⁴⁴	vei ⁵²
白读	ɕi ⁴⁴	i ⁴⁴	ly ^{44:31}	zɕei ⁵² i ⁵²
例字	刨(推 ~ : 刨子)	酵	家(王 ~ 庄)	鞘
文读	pau ³¹	tɕiau ⁴⁴ ~ 头	tɕia ³¹	tsiau ⁴⁴ 旬邑
白读	p'v ³¹	ɕiau ⁴⁴ 发 ~	ia ³¹	siau ⁴⁴ 旬邑

例字	嘯(~ 笛:吹笛)	翘(两头 ~)	耀(~ 眼)	照(~ 镜子)
文读	ɕiau ⁵⁵	tɕ'iau ⁴⁴	iau ⁴⁴	tʂau ⁴⁴
白读	sau ⁵⁵ 兴平	ts'au ⁴⁴	z'au ⁴⁴	z'au ⁴⁴
例字	还	匀	跑	摸(~ 揣)
文读	xæ ³⁵	yē ²⁴	p'au ⁵²	mɿ ³¹
白读	xa ³⁵ 旬邑	iē ²⁴	p'au ²⁴	mau ³¹
例字	矛(~ 子)	藏(隐 ~)	铸	削
文读	mau ²⁴	ts'au ²⁴	tsɿ ⁴⁴	ɕiau ³¹ 兴平
白读	miau ²⁴	tɕ'iau ²⁴ ts'iau ³⁵ 旬邑等地	tau ⁴⁴	suɿ ³¹ 兴平
例字	望(~ 南)	硕	射(水 ~ 出来了)	涯
文读	vaŋ ⁵⁵	ʂuɿ ³⁵	ʂɿ ⁴⁴	ia ³⁵
白读	maŋ ⁵⁵ 兴平 mā ⁴⁴ 乾县	ɕyɿ ³⁵ 泾阳	ʂ ²⁴	iee ³⁵
例字	耕更(三 ~)	刚(~ 来)	适(合 ~)	醋
文读	kəŋ ³¹	kaŋ ²⁴	ʂ ³¹	ts'u ⁴⁴
白读	tɕiŋ ³¹	tɕiaŋ ²⁴	tɕ'ɿ ³¹	ts'vu ⁴⁴ 旬邑
例字	取	昧(~ 良心)	亨	抱(~ 娃)
文读	tɕ'y ⁵¹	mei ⁴⁴	xəŋ ³¹	pau ⁴⁴
白读	ts'ɿ ³¹ 旬邑	mi ⁴⁴ 旬邑	xē ³¹	pu ⁴⁴ 永寿
例字	握(~ 手)	弱若	肉(手心是 ~)	就(~ 是)
文读	uɿ ³¹	z'uɿ ³¹	z'ru ⁴⁴	tɕiɿu ⁵⁵
白读	ŋyɿ ³¹	z'ɿ ³¹ 市区	z'ɿ ³¹ 乾县、永寿	tsɿu ⁵⁵ 兴平
例字	威(恶劣)	辱(羞)	辱	
文读	uei ³¹	zɿ ⁵²	zɿu ⁵² 三原	
白读	uee ³¹	sɿē ²⁴	sɿē ³⁵ 三原	

四、声调特点

1. 境内方言声调的主要特点:①声调四个(轻声在外),阴平半降、阳平中升,上声中降或全降,去声高平或半高平;咸阳市方言对古平上去三声的读法,与普通话基本一致。②古人声字在普通话里是人派三声,而且主要分派到了去声调里;而在咸阳市方言主要是人派平声:清声母及次浊声母入声归阴平,全浊声母入声归阳平,少数例外。

2. 境内方言变调影响语义,例如:“我”“你”“他”读作上声调时,单指“我”“你”“他”,读作阴平调时是复数指“我们”“你们”“他们”。又如“蒸馍”读本调时是指“蒸馍馍”[tʂəŋ³¹ mɿ⁴⁴],读变调时是指“馒头”[tʂəŋ³¹ mɿ^{44:31}]。

咸阳市方言声调调值比较表

表 11-2

	市区	兴平、三原	泾阳、彬县、长武	旬邑	淳化	乾县、永寿	礼泉	武功、杨陵
阴平	31	31	31	31	21	31	31	31
阳平	24	35	35	35	24	35	35	35
上声	52	52	51	51	52	52	53	42
去声	44	55	55	44	44	44	44	44

古汉语入声字在普通话及咸阳市方言中的分派比较表

表 11-3

例字	全清声母			次清声母			次浊声母		全浊声母		
	八桌	福德	笔甲	撇擦	即察	铁塔	物律	墨役	夺直	勃泊	幕育
北京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阳平		去声
咸阳	阴平			阴平			阴平	阳平	阳平	阴平	

3. 境内方言大部分疑问句和陈述句从音值和语气上分不清, 现略举例如下:

你跟集来? (你赶集来着?) η_i^{52} $k\bar{e}^{31}$ $t\bar{a}i^{24}$ $l\bar{a}e^{31}?$

我跟集来。 η_x^{52} $k\bar{e}^{31}$ $t\bar{a}i^{24}$ $l\bar{a}e^{31}$ 。

4. 方言的重读和轻读对于表情达意有重要的作用。举例如下:

你说啥? η_i^{52} η_y^{31} sa^{44} 问说的什么。

你说啥? η_i^{52} η_y^{31} sa^{44} 表示对所说的话不满。

你走。 η_i^{52} $tsy\bar{u}^{52}$ 同意对方走开。

你走! η_i^{52} $tsy\bar{u}^{52}$ 命令对方走开。

第二节 标音举例

$\bar{c}i\bar{e}^{31:24}$ $\bar{c}i^{31}$ $\cdot fur$ pu^{31} $t\bar{a}e^{44}$ xua^{31} —— $\bar{c}i\bar{a}^{24}$ $ia\bar{u}^{24}$ ($\bar{c}i\bar{a}^{24}$ $ia\bar{u}^{24:31}$)。

新 媳 妇 不 戴 花 —— 嫌 洋 (咸阳)。

lau^{52} $x\bar{a}^{44:31}$ $t'uei^{31:24}$ $t\bar{s}'\bar{e}^{31}$ $t\bar{s}'\bar{e}r$ —— $\bar{c}i\bar{u}^{31}$ $p'i\bar{u}^{24}$ ($\bar{c}i\bar{u}^{31}$ $p'i\bar{u}^{24:31}$)。

老 汉 推 车 车 儿 —— 兴 平 (兴平市)。

$k'u\bar{u}^{52}$ fu^{31} $ts\bar{t}^{52}$ la^{31} li^{52} —— li^{52} $ts'u\bar{a}^{24}$ (li^{52} $ts'u\bar{a}^{24:31}$)。

孔 夫 子 纳 礼(送礼) —— 礼 全 (礼泉县)。

i³¹ kv³¹ xvy²⁴ ʂaŋ^{44:31} pau⁴⁴ liaŋ⁵² kv³¹ xu²⁴ lvy³¹ — sā³¹ yā²⁴ (sā³¹ yā^{24:31}).

一个和尚抱两个葫芦——三圆(三原县)。

tɕie⁴⁴ tu^{24:31} ua⁴⁴ t'iau⁴⁴ mē²⁴ k'ā⁵² — ivu⁴⁴ tuē^{31:24} kvu³¹ · tsɿ ivu⁴⁴ ʂaŋ³¹

疥 蛛 蛙(癞蛤蟆) 跳 门 槛 —— 又 敦 尻 子 又 伤
liā⁵²。

脸(指翻脸使人难堪)。

pei³¹ · ti pei⁴⁴ luŋ^{52:31} k'ā⁴⁴ ɕi⁴⁴ — ivu⁴⁴ ʂaŋ^{52:31} ŋiā⁵² ivu⁴⁴ ɕy⁴⁴ ti⁴⁴

背的背 笼 看 戏 —— 又 揉 眼(贪婪) 又 趸(多占) 地
faŋ³¹。

方(指有的人过于贪婪不看场合)。

kvu⁵² tɕi³¹ ŋiā⁴⁴ p'au³¹ — tɕi⁴⁴ tuv³¹ z_vvu⁴⁴ ʂau⁵²。

狗 吃 尿 脬(膀胱) —— 气 多 肉 少。

tɕi³¹ ua^{44:31} tɕiau⁴⁴ tɕiau⁴⁴ miŋ²⁴ · ŋi — xaŋ⁵² pu³¹ tsy⁴⁴ ʂi²⁴ tɕiā³¹。

鸡 娃 娃 叫 明 呢 —— 夯(掌握) 不 住 时 间。

ma^{52:31} i^{52:31} k'uā³¹ tvu⁴⁴ fu^{52:31} — t'i²⁴ pu³¹ tɕie⁵² · lie。

马 尾(马尾儿) 贯(穿) 豆 腐 —— 提 不 起 咧(不好提说此事了)。

pei³¹ mu³¹ tsvu⁴⁴ kv³¹ kæ⁴⁴ ŋi — faŋ⁴⁴ · ti z_ɛ²⁴ pu^{31:24}

柏 木 做 锅 盖 呢 —— 放 的 人 不

tsy_q³¹ p'au²⁴ tɕər⁵² ʂvu⁴⁴ tɕi⁴⁴ læ^{24:31} · lie。

装(如柏木可做棺材,此指可倚老卖老), 跑 这 儿 受 气 来 咧。

pei²⁴ xuei³¹ iau²⁴ li⁵² p'ie³¹ · lie i^{31:24} tsy_q ā³¹ — pei²⁴ tɕi⁴⁴ ts'y_q^{31:24}

白 灰 窑 里 撒(打,扔) 咧 一 砖 —— 白 气 冲

t'iā³¹。

天(指有的人过于傻)。

mau⁴⁴ kæ³¹ sau³¹ syā^{31:24} la³¹ · tsɿ — lyē²⁴ xuŋ²⁴ · lie。

帽 绞 梢(帽辫子) 拴 辣 子(辣椒) —— 抡 红 咧(走红,贬)。

t'uv³¹ · lie fur⁵² faŋ⁴⁴ pi⁴⁴ — tur³¹ i³¹ fā³¹ (又 tau^{44:31}) ʂvu⁵² ɕy⁴⁴。

脱 咧 裤 儿(裤子) 放 屁 —— 多 一 番(又“道”) 手 续 眨。

pā³¹ · ti lvy³¹ tsy³¹ ta^{52:44} yv³¹ liaŋ^{44:31} — tɕi³¹ pu³¹ tau⁴⁴ kau^{31:24} ti³¹ · ma

搬 的 碌 碡 打 月 亮 —— 知 不 道(不知道) 高 低 吗(难道)

liā²⁴ tɕiŋ³¹ tsy_q⁴⁴ ie³¹ tɕi³¹ pu³¹ tau⁴⁴ · lie。

连 轻 重 也 知 不 道 咧。

kē³¹ liaŋ²⁴ tɕi²⁴ pu^{31:24} tɕia³¹ k'vu⁵² tæ^{44:31} — ts'uē²⁴ ɕiē²⁴ pu³¹

跟 粮 集 不 夹 口 袋 —— 存 心 不

liaŋ²⁴。

量(“量”指买粮食,谐“良”)。

ɕyŋ³¹ t'aŋ²⁴ kua⁴⁴ tsau⁴⁴ ly³¹ — lau²⁴ ɕiē³¹ kuv⁴⁴ y²⁴。

胸 膛 挂 笊 篱 —— 捞(谐“劳”) 心 过 余(讽刺有的人操闲心太多)。

iau⁴⁴ fã⁴⁴ ·ti tɕie⁴⁴ suã⁴⁴ p'ã^{24:31} — tɕyŋ²⁴ iɣu⁵² tɕyŋ²⁴ ·ti ta⁵² suã^{44:31}。

要 饭 的(乞丐) 借 算 盘 —— 穷 有 穷 的 打 算。

t'i²⁴ ·tɕy kua⁴⁴ .kuã tsuy^{31:24} i³¹ ·ŋi — ɕi ē²⁴ ·tɕy tiɣu³¹ ti⁵² ·ŋi。

提 着 罐 罐 作 揖 呢 —— 寻 着 丢 底(丢人) 呢。

kua^{31:24} ɕi³¹ fu^{44:31} suŋ⁴⁴ mæ²⁴ — z̄ē²⁴ ia³¹ tsa⁵² læ²⁴ tsæ²⁴ tsa⁵² læ²⁴。

瓜(傻) 媳 妇 送 埋(送葬) —— 人 家 咋 来(怎么办) 咱 咋 来。

suei⁴⁴ ua⁴⁴ tɕi³¹ ts'uei²⁴ ·t'ɣu — tei³¹ ·lie ɕyɣu⁵² ·lie。

碎 娃(小孩儿) 吃 槌 头(拳头) —— 得 咧 手 咧(指趁好机会狠捞一把)。

sã³¹ suei⁴⁴ mæ⁴⁴ tɕaŋ³¹ mɣ^{44:31} — sa⁴⁴ sɿ⁴⁴ tɣu²⁴ tɕiŋ³¹

三 岁 卖 蒸 馍(馒头) —— 啥 事 都 经

·kuy。

过(经验过,贬指有的人见多识广)。

k'ɣu⁵² tæ^{44:31} mæ⁵² mau²⁴ — ta⁴⁴ mur⁵²。

口 袋 买 猫 —— 大 摸 儿(根据大概情况来估计)。

tɕia³¹ ·ti suɣ⁵² la³¹ tiɣu³¹ tu ē⁵² — pa³¹ sɿ⁴⁴ mɣ³¹ ta⁴⁴ sɿ⁴⁴。

夹 的 喷 呐 丢 盹(打盹儿) —— 把 事 没 当 事(指对大事也敷衍了事)。

ua⁵² ta⁴⁴ ·ti^{02:24} ɕi³¹ kua³¹ i³¹ tsa⁵² xɣu⁴⁴ ·ti pi²⁴ — kua³¹ ɕi²⁴ ·lie。

碗 大 的 西 瓜 一 拃(豁口) 厚 的 皮 —— 瓜 实 咧(傻尽了)。

kã⁵² tɕaŋ^{44:31} ts'uei³¹ ti²⁴ — mɣ³¹ ŋiã⁵² ·ŋiã。

擀 杖(擀面杖) 吹 笛(~子) —— 没 眼 眼(指无孔可入)。

tɕy³¹ xu^{44:31} tsuy^{31:24} i³¹ — kei³¹ lɣu⁴⁴ ·tɕy ·ŋi。

车 户 作 揖 —— 隔 路(隔行) 着 呢。

tæ⁴⁴ ·ti ŋiɣu²⁴ liŋ²⁴ ta³¹ mɣ⁴⁴ ·tsɿ — t'u²⁴ liē²⁴ tɕia³¹ xau^{52:44}

戴 的 牛 铃 搭 磨 子 —— 图 邻 家 好

t'iŋ³¹。

听(指有的人不求实际善于虚张声势)。

tsau⁵² xur²⁴ tɕy⁵² pã⁵² — liaŋ⁵² tɕyɣ⁵²。

枣 核 儿 扯 板(解板) —— 两 锯 儿(谐“句儿”,指说话不多)。

第二章 词 汇

第一节 构词特点

一、分音词和合音词

1. 常见的分音词

不来 pu ³¹ læ ³¹ —→摆 pæ ⁵²	不棱 pu ³¹ læŋ ³¹ —→蹦 pəŋ ⁴⁴ 抨弹 pəŋ ³¹
壳娄 k'u ³¹ lɿu ³¹ —→扣 k'ɿu ⁴⁴	窟窿 k'u ³¹ luŋ ³¹ —→孔 k'uŋ ⁵²
壳郎 k'u ³¹ laŋ ³¹ —→簾 k'aŋ ³¹ 坑	窟窿 k'u ³¹ luŋ ³¹ fu ³¹ luŋ ³¹
曲囡 tɕy ³¹ lyã ³¹ —→圈 tɕyã ³¹	囟囟 xu ³¹ luã ³¹ —→环乾县 xuã ³⁵

2. 常见的合音词

什么 ʂɛ̃⁴⁴·mɿ—→啥 sa⁴⁴ | sɿɿ⁴⁴乾县 | 怎么 tsæ⁵²·mɿ 市区 | tsɿ⁵¹·mə 长武—→咋 tsa⁵² | tsuɿ⁵¹旬邑 | 一个 i³¹ ky³¹—→曳 ie³¹旬邑 | 人家别人 zɿ̃²⁴ tɕia³¹(又 ia³¹)—→ŋia⁵²市区 | ŋia⁵⁵三原 | ŋiã³⁵泾阳 | ŋie³⁵北彬

二、旬邑方言名词的几个特点

1. 旬邑方言带“子”尾的名词比普通话及咸阳市大部分地区方言多,举例词如下。

口袋子 小孩子 碎刀子(小刀) 茶杯子 一堆子 书本子 一捆子 树叶子 两截子 羊羔子 牛犊子 | 牛娃子 指印子 指头子 梨瓜子(甜瓜) [按:北彬也具备这一特点]

2. 旬邑方言 AA 式重叠较多,尤其是土桥一带,例如:簇簇、笼笼、窑窑、袄袄、米米、馍馍、帽帽、鞋鞋、椅椅、碗碗[按:咸阳市方言除城区有些人口语习惯“椅”字可以重叠外,其他地区“椅”字不重叠]。同时,诸如“柴草”“汤水”“瓜蔓”“菜叶”“泡沫”等普通话不重叠的词语,旬邑方言及咸阳市多数地区的方言可重叠为“A₁A₁A₂A₂”式,表示“很多”的意味。例如:把院里的柴柴草草弄一下 | 剩下的汤汤水水饮牛 | 碗里尽是菜菜叶叶 | 瓜瓜蔓蔓满地的 | 煮肉时,锅里漂的

泡泡沫沫要舀出来倒了。有些单音节名词,如“话”“路”“面”“蒜”“饭”“眼”“脸”“手”“脚”等,普通话一般不重叠,旬邑方言及咸阳市一些地方的方言可以重叠,用来说给小孩儿听,兼有“爱,亲昵”的意味。例如:我跟狗娃说话话|小明学着走路路|吃面面、就蒜蒜、摸脸脸、洗手手。

3. 和上举“话话”等重叠形式的意味相同,旬邑方言有些单音节动词也可以重叠,例句比如:小红会走走啦|小宝来啦快坐坐|她领着孙子游游转转|明明尿尿、屁屁(大便)、耍耍|兰兰把头梳梳下(“下”音 ka³¹)|狗娃把脚洗洗再睡觉。

三、前缀“圪[ku³¹]”字

“圪”字充当前缀,在咸阳市城区等地的方言中能产性不强,而在旬邑方言中的能产性较强。“圪”字多与单音节词干相结合,其意义一般指单音节词干本身。举例词如下,例中不加横线者系城区等地及旬邑方言共同具有的。

动词:圪拧 圪偎 圪搅 圪锯 圪眨 圪扒 圪筛 圪折 圪游 圪晃 圪捻 圪摇 圪拐 圪守守(守住)

形容词:圪潦(写字潦草) 圪弯(两~) 圪啦(语言难懂) 圪嚷(许多虫聚集一起乱动的样子:蛆~~的)

量词:圪节 圪卷 圪爪(一~葡萄)[ku³¹.tsɿa]

象声词:圪扎 圪叭 圪压[-ɲia⁴⁴如重物压得大车吱吱响的声音] 圪吱 圪哇 圪唧 圪呐 圪铮

又,“圪塔”一词缩略为“圪”以后,可与名词性根词相结合,例如:圪丁子(老茧) 圪肉子(硬而不脆的东西) 圪兜 圪梁(土梁) 圪橛(一棍打得身上起~了) 圪塄

四、形容词后缀

1. “人[.zɛ̃]”尾,(又叫做使感结构,“V/N+人”是使人感到V/N的意思),可与单音节形容词词干结合,表示形容词词干给人的感觉,感受是人所厌恶,所不愿接受的,例如:气~(令人生气)、疼~、咬(痒)~、压~、扎~、烫~、烧(烫)~、挣累~、垫~、饥~、饿~、冰~、冻~、渴~、冷~、辣~、酸~、痲[lau⁴⁴]~(苦,味苦)、勒~(勒得令人难受)、急~、胀~、聒~、纳[la³¹~](令人很不满意),等。

例句如:这件事气~得很|他打了我一槌头(拳头),疼~得很|桃毛毛[t'au²⁴

mu²⁴mu^{24:31}]沾到人身上,咬~得很|土脚地(地面)睡上当然垫~|看你办事急~的|你声太大,聒~死了|绳子太细,咋能不勒~?|这件事他谋了好长时间,没办成,难~尽咧。

2. 双音节的后缀,以泾阳、兴平方言为例

泾阳:粘[zã³⁵]哇哇|臭哇哇|老哇哇|闷哇哇|("哇哇"有令人讨厌的意味);白晃晃|明晃晃|油晃晃("晃晃"有明显的意味);痴嘟嘟(傻乎乎);软搭搭(软得令人讨厌);粘 pia³¹·pia(同"粘哇哇");白 pia³¹·pia(白得难看)。

兴平:毛拉拉(满是毛的样子)|油拉拉(满是油的样子);死浆浆|粘浆浆;软的些|瞎(坏)的些|呆(~板)的些|可怜的些|忙活的些|难受的些("的些"是"那个样子"的意思);蔫蔫不出(又作"蔫不出出",“慢慢腾腾”的意思);疯疯不唧(疯疯癫癫)。

3. 三音节的后缀

先举常见的例子:黑嘛古冬(黑咕隆咚)|蔫麻古冬|淹(慢)麻古冬|痴嘛古冬|粘嘛古冬("嘛古冬"是指它前边的单音节形容词所反映的程度太强,太不令人满意);

痴嘛圪[ku³¹]登(兴平)/痴嘛楞登(泾阳)(傻乎乎的样子);

短不唧唧|光不唧唧|红不唧唧|假(虚伪、做作)不唧唧|瓜(傻)不唧唧|淹(慢)不唧唧("不唧唧"表示极端的厌恶意味);瓜哩不唧(泾阳同"瓜不唧唧",又作"瓜瓜不唧");

淹里圪唧/淹里圪登/淹古唧唧/淹圪唧唧(泾阳方言是“慢得令人讨厌”的意思);

红不楞登/花不楞登/黄不楞登。

再举旬邑等地特殊的:硬圪铮铮(硬而适度)|硬而适度|皙圪铮铮(漂亮而不柔弱)|冷圪森森(阴湿而冷)|脆圪生生(脆而酥)|甜圪生生(很甜)|甜圪哇哇(甜而粘;饮食淡而无味)|紧圪拧拧(紧而舒适)|清圪森森(清冷)|尖圪哇哇(如“尖圪哇哇酸”指酸而味道不纯正);

旬邑方言“ABB(BB为后缀)”式形容词嵌入“不”字,构成“A不BB”式(“不BB”表示更加明显的意味),例如:水不漉漉|火不煞煞|烂(破)不瓷瓷|辣不吡吡|大不拉拉(大不咧咧)|臭不烘烘|吝不唧唧|慢不腾腾|酸不溜溜|软不咧咧|稀不沓沓|软不拉拉|怪不哇哇(令人不好意思)|笑不嗤嗤|青不森森|红不苏苏|蓝不英英|鬼不祟祟|湿不溜溜|死不腾腾|黑不油油|黑不洞洞|气不烘烘|稀不拉拉(很稀疏)|憨不呆呆。

五、重叠词

1. 咸阳市方言单音节名词有 AA、AA 子、AA 儿三种形式的重叠,其 AA 等重叠式有小称作用,AA 儿式既有爱称作用,又有小称作用。下面举市区常用 AA 等形式的小称词语。

AA 桌桌 箱箱 盆盆 罐罐 碟碟 本本 纸纸(纸屑) 眼眼(小孔)
 AA 子 桌桌子 箱箱子 盆盆子 罐罐子 碟碟子 本本子 纸纸子 眼眼子
 AA 儿 桌桌儿 箱箱儿 盆盆儿 罐罐儿 碟碟儿 本本儿 纸纸儿 眼眼儿

2. 咸阳市方言有两相关的单音节形容词相连重叠为 ABAB 式的,其意义是“又 A 又 B”,例句如:

他长得黑丑黑丑的|这个娃白胖白胖的|这截电线细长细长的|这个棵树细高细高的。

常见的 ABAB 式还有:“胖大胖大|瘦高瘦高|黑瘦黑瘦|瘦碎瘦碎(又瘦又小)|圆大圆大”等。

六、代词

1. 咸阳市方言的人称代词“我你他”主要是通过声调的变化来区别单数和复数的(读上声表单数,读阴平表复数);其次,在读作阴平调的“我你他”后加上“的”字或其他字表复数,表四中加括号的字是时有时无的字。比较如下:

咸阳市方言人称代词单复数对照表

表 11-4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咸阳	我 ŋ ⁵²	我(的)ŋ ³¹ ·ti	你 ŋ ⁵²	你(的)ŋ ³¹ ·ti	他 t ⁵²	他(的)t ³¹ ·ti
兴平	我 ŋ ⁵²	我 ŋ ³¹	你 ŋ ⁵²	你 ni ³¹	他 t ⁵²	他 t ³¹
武功	我 ŋ ⁴²	我(的)ŋ ³¹ ·ti	你 ni ⁴²	你(的)ni ³¹ ·ti	他 t ⁴²	他(的)t ³¹ ·ti
		我家 ŋ ³¹ t ³¹ a ³¹		你家 ni ³¹ t ³¹ a ³¹		他家 t ³¹ a ³¹ t ³¹ a ³¹
武功常宁	我 ŋ ⁴²	我家 ŋ ³¹ t ³¹ a ³¹	你 ni ⁴²	你家 ni ³¹ t ³¹ a ³¹	他 t ⁴²	他家 t ³¹ t ³¹ a ³¹
礼泉	我 ŋ ⁵²	我 ŋ ³¹	你 ni ⁵³	你 ni ³¹	他 t ⁵³	兀伙人 u ⁴⁴ xu ⁵³ z ³⁵ ē ³⁵
乾县、永寿	我 ŋ ⁵²	我 ŋ ³¹	你 ŋ ⁵²	你 ŋ ³¹	他 t ⁵²	他 t ³¹
南彬	我 ŋ ⁵¹	我(子)ŋ ³¹ ·ts ¹	你 ŋ ⁵¹	你(子)ŋ ³¹ ·ts ¹	他 t ⁵¹	他(子)t ³¹ ·ts ¹
北彬	我 ŋ ⁵¹	我(们)ŋ ³¹ ·mē	你 ŋ ⁵¹	你(们)ŋ ³¹ ·mē	他 t ⁵¹	他(们)t ³¹ ·mē

续表 11-4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旬邑、泾阳	我 ŋv ⁵¹	我 ŋv ³¹	你 ni ⁵¹	你 ni ³¹	他 tã ⁵¹	他 tã ³¹
淳化	我 ŋv ⁵²	我 ŋv ²¹	你 ni ⁵²	你 ni ²¹	他 tã ⁵²	他 tã ²¹
三原	我 ŋv ⁵²	我(的)ŋv ³¹ ·ti	你 ni ⁵²	你(的)ni ³¹ ·ti	他 tã ⁵²	他(的)tã ³¹ ·ti

2. 咸阳市方言指示代词远指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不太远,一般是可以看得见的;第二层次是很远的,可能看不见的。下面比较咸阳市方言表处所的近指、远指代词。

咸阳市方言指示代词对照表

表 11-5

	近 指	远指第一层次	远指第二层次
咸阳	这搭儿 tɕl ⁴⁴ ·tar	兀搭儿 u ⁴⁴ ·tar	奈搭儿 læ ⁴⁴ ·tar
	这儿 tɕər ³¹	咧儿 ur ³¹	
	这搭儿 tɕei ⁴⁴ ·tar	卫搭儿 uei ⁴⁴ ·tar	
兴平	这儿 tɕər ³¹	咧儿 ueɹ ³¹	兀里 u ⁵⁵ ·li
	直搭儿 tɕl ³⁵ ·tar		兀里里儿(更远)
	这陀儿 tɕei ⁵² tur ³⁵		u ⁵⁵ li ⁵⁵ ·liɹ
武功	这搭 tɕl ⁴⁴ ta ³¹	兀搭 u ⁴⁴ ta ³¹	那搭 la ⁴⁴ ta ³¹
常宁	这些儿 tɕa ⁴² ·ɕiɹ	瓦些儿 ua ⁴² ·ɕiɹ	奈搭儿 læ ⁴⁴ ·tar
礼泉	这搭 tɕl ⁴⁴ ta ³¹	兀搭 u ⁴⁴ ta ³¹	奈搭 læ ⁴⁴ ta ³¹
		咧 ur ⁵³	
乾县、永寿	这搭 tɕl ⁴⁴ ta ³¹	兀搭 u ⁴⁴ ta ³¹	奈搭 læ ⁴⁴ ta ³¹
南彬	这搭 tɕl ⁵⁵ ta ³¹	兀搭 u ⁵⁵ ta ³¹	奈搭 læ ³¹ ta ⁵¹
	□tɕa ⁵⁵	瓦 ua ⁵¹	
北彬	这搭 tɕl ⁵⁵ ta ³¹	兀搭 u ⁵⁵ ta ³¹	奈搭 læ ⁵⁵ ta ³¹
长武	这搭 tɕl ⁵⁵ ta ³¹	兀搭 u ⁵⁵ ta ³¹	
旬邑	这 tɕa ⁴⁴	洼 ua ⁴⁴	奈儿 læ ⁴⁴ ·ɛɹ
	这儿 tɕa ⁴⁴ ·ɛɹ	洼儿 ua ⁴⁴ ·ɛɹ	
	这搭 tɕl ⁴⁴ ta ³¹	兀搭 u ⁴⁴ ta ³¹	

续表 11-5

	近 指	远指第一层次	远指第二层次
淳化	这搭 $\text{ʂ}^44\text{ta}^{21}$	兀搭 $\text{u}^{44}\text{ta}^{21}$	奈搭 $\text{næ}^{44}\text{ta}^{31}$
泾阳	这搭 $\text{ʂ}^55\text{ta}^{31}$	兀搭 $\text{u}^{55}\text{ta}^{31}$	奈搭 $\text{næ}^{55}\text{ta}^{31}$
	这 $\text{ʂ}^{\text{a}55}$	洼 ua^{55}	
三原	长儿 $\text{ʂaŋ}^{\text{52}}\cdot\text{ər}$	瓦儿 $\text{ua}^{\text{52}}\cdot\text{ər}$	

咸阳市方言表处所的疑问指示代词如下：

咸阳	阿搭儿	$\text{a}^{24}\cdot\text{tar}$	
兴平	阿搭儿	$\text{a}^{35}\cdot\text{tar}$	达搭 $\text{ta}^{35}\text{ta}^{31}$
武功	达	ta^{35}	
常宁	达搭些儿	$\text{ta}^{35}\text{ta}^{31}\cdot\text{ciər}$	
礼泉	达搭	$\text{ta}^{44}\text{ta}^{31}$	
乾县、永寿	达搭	$\text{ta}^{52}\text{ta}^{31}$	
彬县、长武、泾阳	阿搭	$\text{a}^{55}\text{ta}^{31}$	
旬邑	阿搭	$\text{a}^{44}\text{ta}^{31}$	
	达搭	$\text{ta}^{35}\text{ta}^{31}$	达儿 $\text{ta}^{35}\cdot\text{ər}$
淳化	阿搭	$\text{a}^{44}\text{ta}^{21}$	
三原	阿搭	$\text{a}^{31}\text{ta}^{31}$	

七、与普通话“儿、子、头”等名词后缀的比较[只列举不同的]：

北京	花儿	杏儿/杏子	裤子	被子	斧子	锄头
咸阳	花	杏 $[\text{xæŋ}^{44}]$	裤儿	被儿	斧头	锄
北京	败家子儿	铡刀	剪刀	骨头	猴子	谷子
咸阳	败家子儿	铡子	剪子	骨嘟	猴	谷

八、动物小称的比较[只列举几个有特点的县(点)]：

释义	小狗	小猫	小羊	小鸡
咸阳	狗娃	猫娃	羊羔儿/羊娃	鸡娃
长武	狗娃	猫娃	羊娃	鸡娃
长武爱称	狗儿	猫儿	羊儿	鸡儿
旬邑	狗娃子	猫娃子	羊羔子	鸡娃子
南彬	狗娃	猫娃	羊羔	鸡娃

北彬	狗娃子	猫娃子	羊羔子/羊娃子	鸡娃子
释义	小牛	小马	小老鼠	小麻雀
咸阳	牛犊儿	马驹儿	老鼠儿子	雀儿子
长武	牛娃	马娃	老鼠儿子	雀儿子
长武爱称	牛儿	马儿		
旬邑、北彬	牛犊子	马驹子	老鼠儿子	雀儿子
南彬	牛犊	马驹	老鼠儿子	雀儿子

第二节 常用词汇对照

本节所列词汇,凡窑店与咸阳城区词汇形音相同的,只列咸阳城区;南彬与北彬相同的,只列南彬。

	晒太阳		兴平	宿宿	ɕiɻu ⁵² ·ɕiɻu
咸阳	晒暖暖	sæ ⁴⁴ lyã ⁵² ·lyã	武功	宿宿	ɕiɻu ⁴² ·ɕiɻu
	晒爷	sæ ⁴⁴ ie ⁴⁴ 西乡	礼泉	星星	ɕiɻ ^{31:53} ·ɕiɻ
窑店	晒暖暖	sæ ⁴⁴ luã ⁵² ·luã	乾县	星星	ɕiɻ ^{31:52} ·ɕiɻ
	晒爷爷	sæ ⁴⁴ ie ⁴⁴ ie ⁴⁴		宿宿	ɕiɻu ⁵² ·ɕiɻu
兴平	晒暖暖	sæ ⁵⁵ lyã ⁵² ·lyã	永寿	宿宿	ɕiɻu ⁵² ·ɕiɻu
武功	晒爷	sæ ⁴⁴ ie ⁴⁴	长武	宿宿	siəu ⁵¹ ·siəu
礼泉	晒暖暖	sæ ⁴⁴ lyã ⁵³ ·lyã	南彬	宿宿	siəu ⁵¹ ·siəu
乾县	晒暖暖	sæ ⁴⁴ luã ⁵² ·luã	旬邑	星星	siɻ ^{31:51} ·siɻ
永寿	晒爷	sæ ⁴⁴ ie ⁴⁴	淳化	星星	siɻ ^{21:52} ·siɻ
	晒暖暖	sæ ⁴⁴ lyã ⁵² ·lyã	泾阳	星星	siɻ ^{31:51} ·siɻ
长武	晒暖暖	sæ ⁵⁵ lyã ⁵¹ ·lyã	三原	星星	siɻ ^{31:52} ·siɻ
南彬	晒爷爷	sæ ⁵⁵ ie ^{35:31} ie ^{02:51}		端午	(“端”字有变作“单”的)
	晒暖暖	sæ ⁵⁵ lyã ⁵¹ ·lyã	咸阳	五月端	u ⁵² yr ^{31:24} tuã ³¹
旬邑	暖日头	sæ ⁴⁴ ər ³¹ ·tɻu		五月当	u ⁵² yr ^{31:24} taɻ ³¹
	晒暖暖	sæ ⁴⁴ lyã ⁵¹ ·lyã	窑店	五月端	u ⁵² te ^{31:24} tuã ³¹
淳化	晒暖暖	sæ ⁴⁴ lyã ⁵² ·lyã		五月端阳	u ⁵² ye ^{31:24} tuã ³¹ iaɻ ^{24:31}
泾阳	晒暖和	sæ ⁵⁵ luã ⁵¹ xur ^{35:31}	兴平	五月端午	u ⁵² yr ^{31:35} tuã ³¹ u ^{52:31}
三原	晒暖暖	sæ ⁵⁵ luã ⁵² ·luã	武功	五月端午	u ⁴² yr ^{42:35} tuã ³¹ u ^{42:31}
	星星		礼泉	五月端午	u ⁵³ yr ^{31:35} tuã ³¹ u ^{53:31}
咸阳	星星	ɕiɻ ³¹ ·ɕiɻ	乾县	端午	tuã ³¹ u ^{52:31}
	宿宿	siɻu ⁵² ·siɻu 西乡	永寿	端午	tuã ³¹ ur ^{52:31}
窑店	星星	ɕiɻ ^{31:52} ·ɕiɻ		端午	tã ³¹ ur ^{52:31}
			长武	端午	tã ³¹ u ^{51:31}

- 南彬 端午 tuā³¹ u^{51:31}
旬邑 端午 tuā³¹ u^{51:31}
端午 tā³¹ u^{51:31}
淳化 端午 tuā²¹ · u
五月端午 u⁵² y²¹ tuā²¹ · u
泾阳 端午 tuā³¹ u^{51:31}
三原 端午 tuā³¹ u^{52:31}
明间儿
- 咸阳 开间 k'æ³¹ tɕiã³¹
窑店 开间 k'æ³¹ tɕiã³¹
堂尾 t'au²⁴ u³¹
兴平 开间 k'æ³¹ tɕiã³¹
过道 ku⁵⁵ tau^{55:31}
武功 开间 k'æ³¹ tɕiã³¹
礼泉 开间 k'æ³¹ tɕiã³¹
乾县 明间 miŋ³⁵ tɕiã³¹
开间 k'æ³¹ tɕiã³¹
永寿 明间掂 miŋ³⁵ tɕiã³¹ tiã³¹
明架掂 miŋ³⁵ tɕiã⁴⁴ tiã³¹
亮间掂 liaŋ⁴⁴ tɕiã³¹ tiã³¹
南彬 房底下 faŋ³⁵ ti^{51:55} · xa
旬邑 开间 k'æ³¹ tɕiã³¹
淳化 明间 miŋ²⁴ tɕiã²¹
过庭 ku⁴⁴ t'iŋ²¹
泾阳 开间 k'æ³¹ tɕiã³¹
三原 开间 k'æ³¹ tɕiã³¹
厕所
- 咸阳 茅子 mau²⁴ · tsɿ
后院 xvu⁴⁴ yã^{44:31}
窑店 茅厕 mau²⁴ sɿ³¹
兴平 茅子 mau³⁵ · tsɿ
茅房 mau³⁵ faŋ³⁵
后院 xvu⁵⁵ yã^{55:31}
武功 茅子 mau³⁵ · tsɿ
后院 xvu⁴⁴ yã^{44:31}
礼泉 茅子 mau³⁵ · tsɿ
茅房 mau³⁵ faŋ³⁵
- 后院里 xvu⁴⁴ yã⁴⁴ · li
乾县 茅房 mau³⁵ faŋ^{35:31}
后院 xvu⁴⁴ yã^{44:31}
永寿 后院 xvu⁴⁴ yã^{44:31}
茅子 mau³⁵ · tsɿ
茅房 mau³⁵ faŋ^{35:31}
长武 茅子 mau³⁵ · tsɿ
后院 xəu⁵⁵ yã^{55:31}
南彬 茅房 mau³⁵ faŋ³⁵
后院 xəu⁵⁵ yã^{55:31}
茅子 mau³⁵ · tsɿ
旬邑 后院 xvu⁴⁴ yã^{44:51}
茅子 mau^{35:31} tsɿ^{02:51}
茅房 mau^{35:31} faŋ^{35:51}
灰圈子 xuei^{31:51} tɕyã^{44:31} · tsɿ
淳化 茅房 mau^{24:21} faŋ^{24:52}
茅子 mau^{24:21} tsɿ^{02:52}
泾阳 茅子 mau^{35:31} tsɿ^{02:51}
茅房 mau³⁵ faŋ³⁵
三原 茅子 mau³⁵ · tsɿ
后院 xvu⁵⁵ yã^{55:31}
曾祖父
- 咸阳 老爷 lau⁵² ie⁴⁴
嬷嬷爷 ŋy²⁴ ŋy^{24:31} ie⁴⁴
兴平 老老爷 lau⁵² · lau ie⁵⁵
武功 老爷 lau⁴² ie⁴⁴
礼泉 老爷 lau⁵³ ie⁴⁴
乾县 老爷 lau⁵² ie⁴⁴
永寿 爸爸爷 pa⁵² · pa ie⁴⁴
长武 太爷 t'æ⁵⁵ ie³⁵
南彬 老爷 lau⁵¹ ie^{35:31}
旬邑 老爷 lau⁵¹ ie⁴⁴
淳化 老爷 lau⁵² ie⁴⁴
泾阳 老爷 lau⁵¹ ie⁵⁵
三原 老爷 lau⁵² ie⁵⁵
曾祖母
- 咸阳 嬷嬷 ŋy²⁴ ŋy^{24:31}

- 娣娣婆 $n_{\text{by}}^{24} n_{\text{by}}^{24:31} p'_{\text{y}}^{24}$ 西乡
 窑店 娣 n_{by}^{24}
 兴平 老婆 $lau^{52} lau^{52:35} p'_{\text{y}}^{55}$
 武功 老婆 $lau^{42} p'_{\text{y}}^{44}$
 礼泉 老婆 $lau^{53} p'_{\text{y}}^{35}$
 乾县 老婆 $lau^{52} p'_{\text{y}}^{35}$
 永寿 爸爸婆 $pa^{52} \cdot pa p'_{\text{y}}^{35}$
 长武 太 t_{ae}^{55}
 南彬 老娣 $lau^{51} pa^{35:31}$
 旬邑 老娣 $lau^{51} pa^{35}$
 淳化 老婆 $lau^{52} p'_{\text{y}}^{24}$
 泾阳 娣 n_{by}^{35}
 三原 娣 n_{by}^{35} | 娣娣 $n_{\text{by}}^{35} n_{\text{by}}^{35:31}$
 外公(“外”字读如“胃”音)
 咸阳 外爷 $uei^{44} ie^{44:31}$
 兴平 舅家爷 $t_{\text{ei}}^{55} t_{\text{ei}}^{31} ie^{55}$
 武功 外爷 $uei^{44} ie^{44}$
 礼泉 外爷 $ue^{44} ie^{44:31}$
 乾县 外爷 $uei^{44} ie^{44:31}$
 永寿 外爷 $uei^{44} ie^{44:31}$
 长武 舅家爷 $t_{\text{ei}}^{55} ia^{31} ie^{35}$
 南彬 外爷 $uei^{55} ie^{35:31}$
 旬邑 外爷 $uei^{44} ie^{44:51}$
 淳化 外爷 $vei^{44} ie^{44}$
 泾阳 外爷 $uei^{55} ie^{55:31}$
 三原 外爷 $uei^{55} ie^{55:31}$
 叔父 || 叔母
 咸阳 达 ta^{24} || 妈 ma^{24}
 窑店 达 ta^{24} || 妈 ma^{24} | 姨 i^{24}
 兴平 爸爸 $pa^{55} pa^{55}$ || 娘 n_{ia}^{55}
 武功 爸 pa^{44} || 娘 n_{ia}^{44}
 礼泉 达 ta^{35} || 娘 n_{ia}^{35}
 乾县 爸 pa^{44} || 妈 ma^{35}
 永寿 达 ta^{35} | 爸爸 $pa^{44} \cdot pa$
 || 娘娘 $n_{\text{ia}}^{44} \cdot n_{\text{ia}}$
 长武 达 ta^{35} | 爹 t_{ie}^{55} || 妈 ma^{35}
 南彬 达达 $ta^{35:31} ta^{35:51}$ || 娘 n_{ia}^{35}
 北彬 大大 $ta^{55} \cdot ta$ || 娘 n_{ia}^{35}
 旬邑 达 ta^{35} || 娘 n_{ia}^{35}
 淳化 大大 $ta^{44} \cdot ta$ || 娘娘 $n_{\text{ia}}^{24} n_{\text{ia}}^{24:52}$
 | 娘娘 $n_{\text{ia}}^{24} \cdot n_{\text{ia}}$
 泾阳 达 ta^{35} || 娘 n_{ia}^{35} | 妈 ma^{35}
 三原 达 ta^{35} || 妈 ma^{35}
 岳父(旁称)
 咸阳 丈儿爸 $t_{\text{sa}}^{44:52} pa^{44}$
 丈门爸 $t_{\text{sa}}^{44} m_{\text{e}}^{24:31} pa^{44}$ 西乡
 窑店 丈人 $t_{\text{sa}}^{44} z_{\text{e}}^{24:31}$
 兴平 丈门爸 $t_{\text{sa}}^{55} m_{\text{e}}^{35:31} pa^{55}$
 武功 丈人 $t_{\text{sa}}^{44} z_{\text{e}}^{35:31}$
 礼泉 丈人 $t_{\text{sa}}^{44} z_{\text{e}}^{35:31}$
 永寿 娃他外爷 $ua^{44} t_{\text{a}}^{31} uei^{44} ie^{44:31}$
 长武 丈人 $t_{\text{sa}}^{55:35} z_{\text{e}}^{35:31}$
 南彬 姨夫 $i^{35:31} fu^{31:51}$ 非旁称
 北彬 丈人叔 $t_{\text{sa}}^{55} z_{\text{e}}^{35:31} su^{51}$
 旬邑 丈人 $t_{\text{sa}}^{44} z_{\text{e}}^{35:31}$
 淳化 丈人 $t_{\text{sa}}^{44} \cdot z_{\text{e}} i$
 老丈人 $lau^{52} t_{\text{sa}}^{44} \cdot z_{\text{e}} i$
 泾阳 丈人 $t_{\text{sa}}^{55} z_{\text{e}}^{35:31}$
 三原 丈人 $t_{\text{sa}}^{55} z_{\text{e}}^{35:31}$
 妻兄
 咸阳 丈儿哥 $t_{\text{sa}}^{44:52} ky^{24}$
 丈门哥 $t_{\text{sa}}^{44} m_{\text{e}}^{35:31} ky^{24}$ 西乡
 窑店 丈人哥 $t_{\text{sa}}^{44} z_{\text{e}}^{24:31} ky^{31}$
 兴平 大舅子 $ta^{55} t_{\text{ei}}^{35} \cdot ts_{\text{I}}$
 武功 妻哥 $t_{\text{e}}^{31} ky^{35}$
 礼泉 丈人哥 $t_{\text{sa}}^{44} z_{\text{e}}^{35:31} ky^{53}$
 乾县 丈人哥 $t_{\text{sa}}^{44} z_{\text{e}}^{35:31} ky^{31}$
 永寿 丈人哥 $t_{\text{sa}}^{44} z_{\text{e}}^{35:31} ky^{35}$
 长武 室兄哥 $ʃ_{\text{I}}^{31} ʃy_{\text{I}}^{31} k_{\text{a}}^{31}$
 南彬 室兄哥 $ʃ_{\text{I}}^{31:51} ʃy_{\text{I}}^{31} k_{\text{a}}^{35}$
 北彬 室兄哥 $ʃ_{\text{I}}^{31:51} ʃy_{\text{I}}^{31:35} k_{\text{a}}^{51}$
 旬邑 室兄哥 $ʃ_{\text{I}}^{31} ʃy_{\text{I}}^{31} ky^{51}$
 淳化 妻哥 $t_{\text{I}}^{21} ky^{24}$
 泾阳 丈人哥 $t_{\text{sa}}^{55} z_{\text{e}}^{35:31} ky^{35}$

- 三原 妻哥 ts³¹ ky³⁵
大伯子(旁称夫兄)
- 咸阳 伢他哥 n³¹ t'a⁵² ky⁵²
窑店 阿伯子 a^{31:52} pei³¹ · ts¹
兴平 娃他伯 ua⁵⁵ t'y³¹ pei⁵⁵
武功 娃他伯 ua⁴⁴ t'a³¹ pei³⁵
礼泉 哥 ky⁵³ | 哥 ky³⁵
乾县 哥 ky³⁵
永寿 哥 ky³⁵
长武 娃他伯 ua⁵⁵ t'a³¹ pei⁵⁵
南彬 哥 kə³⁵ | 阿伯子 a^{31:51} pei³¹ · ts¹
北彬 哥 kə⁵¹ | 阿伯子 a^{31:51} pei³¹ · ts¹
旬邑 阿伯子 a^{31:51} pei³¹ · ts¹
淳化 阿伯子 a^{21:52} pei²¹ · ts¹
泾阳 阿伯子 a^{31:51} pei³¹ · ts¹
三原 阿伯哥 a^{31:52} pei³¹ ky³⁵
阿伯子哥 a⁵² pei³¹ · ts¹ ky³⁵
大伯子哥 ta⁵⁵ pei³¹ · ts¹ ky³⁵
妯娌(兴平等处“后”有又读音)
- 咸阳 先后 ciā⁴⁴ xu^{44:31}
窑店 先后 ciā⁴⁴ xu^{44:31}
兴平 先后 ciā⁵⁵ xyu^{55:31} (又 xyu^{55:31})
武功 先后 ciā⁴⁴ xyu^{44:31} (又 xyu^{44:31})
礼泉 先后 ciā⁴⁴ xu^{44:31}
乾县 先后 ciā⁴⁴ xyu^{44:31} (又 xu^{44:31})
永寿 先后 ciā⁴⁴ xyu^{44:52}
长武 先后 siā^{55:35} xəu^{55:31}
南彬 先后 siā^{55:35} xəu^{55:31}
北彬 先后 siā⁵⁵ xəu^{55:31}
旬邑 先后 siā⁴⁴ xyu^{44:31}
淳化 先后 siā⁴⁴ xyu^{44:21}
泾阳 先后 siā⁵⁵ xyu^{55:31}
三原 先后 siā⁵⁵ xyu^{55:31}
本家
- 咸阳 家门中 tɕia³¹ mē²⁴ tsɕəŋ³¹
自家 ts¹ tɕia³¹
窑店 门中 mē²⁴ tsɕəŋ³¹
- 兴平 家门中 tɕia³¹ mē³⁵ tsɕəŋ³¹
家屋 tɕia³¹ u³¹
武功 本家 pē⁴² tɕia³¹ | 门中 mē³⁵ tsɕəŋ³¹
家门中 tɕia³¹ mē³⁵ tsɕəŋ³¹
礼泉 宗族 tsu³¹ tsu³⁵
门中 mē³⁵ tsɕəŋ³¹
乾县 自家 ts¹ tɕia³¹
永寿 家门 tɕia³¹ mē^{35:31}
本家子 pē⁵² tɕia³¹ · ts¹
长武 家屋 tɕia³¹ u³¹
家屋家 tɕia³¹ u³¹ tɕia³¹
南彬 自家 ts¹ tɕia³¹
家门子 tɕia³¹ mē^{35:31} · ts¹
北彬 自己 ts¹ tɕi^{51:31}
家门 tɕia³¹ mē^{35:31}
旬邑 本家子 pē⁵¹ tɕia³¹ · ts¹
淳化 亲房 t'iē²¹ · faŋ
泾阳 自家 ts¹ tɕia³¹
三原 自家 ts¹ tɕia³¹
凶门(个别点读音特殊)
- 咸阳 凶门 ciē⁴⁴ mē^{24:31} | ciē⁴⁴ mi³¹
窑店 凶门 ciē⁴⁴ mē^{24:31}
兴平 凶门口 ciē⁵⁵ mē^{35:31} k'yu⁵²
武功 凶门儿 ciē⁴⁴ mē³⁵
礼泉 凶门 ciē⁴⁴ mē^{35:31}
乾县 凶门口 ciē⁴⁴ mē^{35:31} k'yu⁵²
永寿 凶门 ciē⁴⁴ mē^{35:31} k'yu^{52:31}
长武 凶门 siē⁵⁵ mē^{35:31}
南彬 凶门口 si⁵⁵ mē^{35:31} k'yu^{52:31}
旬邑 凶门口子 siē⁴⁴ mē^{35:31} k'yu⁵¹ · ts¹
淳化 凶门穴 siē⁴⁴ · mei ciē²⁴
凶门穴儿 siē⁴⁴ · mei ciē²⁴
泾阳 凶门口 siē⁵⁵ mē^{35:31} k'yu⁵¹
三原 凶门 siē⁵⁵ mē^{35:31}
后脑勺
- 咸阳 后马勺 xyu⁴⁴ ma⁵² cy^{24:31}
马勺把把子 ma⁵² cy^{24:31} pa⁴⁴ · pa⁴⁴ · ts¹

西乡
 窑店 后脑勺 xvu⁴⁴ nau⁵² ɕyɿ²⁴
 兴平 后脑勺 xvu⁵⁵ lau⁵² ʂɿ^{35:31}
 后马勺 xvu⁵⁵ ma⁵² ʂɿ³¹
 武功 后马勺 xvu⁴⁴ ma⁴² ɕyɿ³⁵
 马勺 ma⁴² ɕyɿ³⁵
 礼泉 脑勺把把 nau⁵³ ʂɿ^{35:31} pa⁴⁴·pa
 乾县 后马勺 xvu⁴⁴ ma⁵² ʂuɿ³⁵
 永寿 后脑勺 xvu⁴⁴ lau^{52:44} ʂuɿ^{35:31}
 长武 后脑勺 xəu⁵⁵ lau⁵¹ sɕə^{35:31}
 南彬 脑勺 lau^{51:55} sɕə^{35:31}
 北彬 后脑勺 xəu⁵⁵ lau^{51:55} sɕə^{35:31}
 旬邑 后脑勺 xvu⁴⁴ lau⁵¹ ʂuɿ^{35:31}
 淳化 后脑壳儿 xvu⁴⁴ nau⁵²·k'ər
 泾阳 脑把子 nau⁵¹ pa⁵⁵·tsɿ
 三原 后脑把 xvu⁵⁵ nau⁵² pa⁵⁵
 眼眇(“眇”字音特殊)
 咸阳 眼胶子 ɳiã⁵² tɕiau³¹·tsɿ
 窑店 眼角眇 ɳiã⁵² tɕyɿ³¹ sɿ³¹
 兴平 眼经 ɳiã⁵² tɕiŋ³¹
 武功 眼眇儿 ɳiã⁴² tsər³⁵
 礼泉 眼睛眇 ɳiã⁵³ tɕiŋ³¹ sɿ⁵³
 乾县 眼睛眇 ɳiã⁵² tɕiŋ³¹ sɿ⁵²
 永寿 眼角 ɳiã⁵² tɕyɿ³¹
 眼角眇 ɳiã⁵² tɕyɿ³¹ sɿ³¹
 长武 眼角眇 ɳiã^{51:55} tɕyɿ³¹ sɿ³¹
 南彬 眼角眇 ɳiã^{51:55} tɕyɿ³¹ sɿ³¹
 北彬 眼胶 ɳiã^{51:55} tɕiau³¹
 旬邑 眼角眇 ɳiã⁵¹ tɕyɿ³¹ tsɿ³¹
 淳化 眼胶 ɳiã⁵² tɕiau²¹
 泾阳 眼角胶 ɳiã⁵¹ tɕyɿ³¹ sɿ⁵¹
 三原 眼角眇 ɳiã⁵² tɕyɿ³¹ sɿ⁵²
 脖子
 咸阳 脖项 pɿ²⁴ xaŋ^{44:31}
 窑店 脖郎 pɿ²⁴ laŋ³¹
 兴平 脖项 pɿ³⁵ xaŋ^{55:31}
 武功 脖项 pɿ³⁵ xaŋ^{44:31}

礼泉 脖项 pɿ³⁵ xaŋ^{44:31}
 乾县 脖项 pɿ³⁵ xaŋ^{44:52}
 永寿 脖子 pɿ³⁵ tsɿ⁵²
 脖项 pɿ³⁵ xaŋ^{44:52}
 长武 脖子 p'ə^{35:31} tsɿ^{02:51}
 脖项 p'ə^{35:31} xaŋ^{55:51}
 南彬 脖子 p'ə^{35:31} tsɿ^{02:51}
 脖朗骨 p'ə^{35:31} laŋ⁵⁵ kuə³¹
 旬邑 脖子 p'ɿ^{35:31} tsɿ^{02:51}
 脖朗骨 p'u^{35:31} laŋ⁴⁴ ku³¹
 淳化 脖项 pɿ²⁴·xaŋ
 泾阳 脖郎 p'ɿ³⁵ laŋ³¹
 三原 脖项 p'ɿ³⁵ xaŋ^{55:31}

腋下

咸阳 胳肢窝 kuɿ³¹ tsɿ^{31:24} uɿ³¹
 兴平 胳撈窝儿 kuɿ³¹ lau³¹ uɿ^{31:35}·ər
 武功 胳撈窝 kuɿ³¹ lau³⁵ uɿ³¹
 礼泉 胳搔窝儿 kuɿ³¹ tsau³¹ uɿ^{31:35}·ər
 乾县 胳搔窝儿 kuɿ³¹ tsau³¹ uɿ^{31:35}·ər
 永寿 胳搔窝儿 kuɿ³¹ tsau³¹·uɿɿ
 长武 胳搔窝 kuɿ^{31:51} tsau^{31:35} uə³¹
 南彬 胳肢窝 kəi³¹ tsɿ^{31:35} uə³¹
 胳肱窝 kəi³¹ tsieu^{31:35} uə³¹
 旬邑 胳肢窝 kuɿ^{31:51} tsɿ^{31:35} uɿ³¹
 淳化 胳正窝 kuɿ²¹ tɕəŋ⁴⁴ uɿ²¹
 胳折窝 kuɿ²¹ tɕɿ^{21:24} uɿ²¹
 泾阳 胳肘窝 kuɿ³¹ tɕɿu³⁵ uɿ³¹
 三原 胳肘窝 kuɿ³¹ tɕɿu³⁵ uɿ³¹
 肩膀
 咸阳 胛股 tɕia³¹ ku⁵²
 胛股儿 tɕia³¹ kuɿ⁵²
 胛帮 tɕia³¹ paŋ³¹西乡
 窑店 胛骨头儿 tɕia³¹ ku³¹ t'ər²⁴
 兴平 肩帮 tɕiã^{31:52} paŋ³¹
 武功 肩拱儿 tɕiã³¹ kaŋ³⁵
 礼泉 胛骨 tɕia^{31:53} ku³¹

- 乾县 胛骨 tɕia³¹ ku³¹
永寿 胛骨 tɕia^{31:52} ku³¹
长武 胛骨头 tɕia³¹ ku³¹ t'əu³⁵
南彬 胛骨 tɕia³¹ ku³¹
北彬 胛骨子 tɕia³¹ ku³¹ tsɿ
旬邑 胛骨 tɕia³¹ ku³¹
胛骨子 tɕia³¹ ku³¹ tsɿ
淳化 肩股 tiā²¹ ku⁵²
泾阳 胛骨 tɕia³¹ ku³¹
三原 胛骨头儿 tɕia³¹ ku³¹ t'vu³⁵ ər
肚脐
- 咸阳 脐窝 pu⁴⁴ tɕi^{24:31} u²⁴
肚子窝儿 tu⁴⁴ tsɿ u²⁴ 西乡
窑店 脐窝儿 pu⁴⁴ tɕi^{24:31} u²⁴
兴平 脐窝称 pu⁵⁵ ti^{35:31} uər³⁵
肚子窝儿 tu⁵⁵ tsɿ uər³⁵
武功 脐窝儿 pu⁴⁴ tɕi^{35:31} u³⁵
腓丘窝儿 p'u³⁵ tɕi³⁵ vu³¹ u³⁵
礼泉 腓腓 p'v³⁵ p'v^{35:31}
乾县 腓腓 p'v^{35:31} p'v^{35:52}
永寿 腓脐眼窝窝儿 p'u³⁵ tɕi^{35:44} ŋiā⁵²
u^{31:35} u³⁵
长武 腓脐眼窝 p'u³⁵ tsɿ^{35:31} ŋiā^{51:31} u³¹
南彬 肚脐 t'u⁵⁵ tsɿ^{35:31}
旬邑 腓脐眼窝 p'u³¹ tsɿ⁴⁴ ŋiā⁵¹
腓脐眼窝 p'u³¹ tsɿ^{24:21} ŋi ā⁵²
泾阳 肚肚窝儿 t'vu⁵⁵ t'vu uər³⁵
三原 脐窝儿 p'u³⁵ tsɿ³⁵ u³¹ ər
膝盖(“膝”字读音特殊)
- 咸阳 壳膝盖 k'u³¹ tɕi³¹ kæ⁴⁴
壳揪盖 k'u³¹ tɕi³¹ vu³¹ kæ⁴⁴ 西乡
窑店 跂蹴盖 ku³¹ tɕi³¹ vu³¹ kæ⁴⁴
兴平 壳录盖儿 k'u³¹ l'vu³¹ kær^{55:52}
武功 膝来盖儿 t'i³¹ læ³¹ kær^{44:42}
礼泉 壳录盖 k'u³¹ l'vu³¹ kæ⁴⁴
乾县 壳录盖 k'u³¹ l'vu³¹ kæ⁴⁴
永寿 壳膝盖 k'u³¹ tɕi³¹ kæ⁴⁴
- 长武 壳搜盖 k'ə^{31:51} səu³¹ kæ⁵⁵
南彬 腿肢盖 t'uəi⁵¹ tsɿ³¹ kæ⁵⁵
壳膝盖 k'ə^{31:51} si³¹ kæ⁵⁵
北彬 壳膝盖 k'u³¹ tsɿ³¹ kæ⁵⁵
壳膝盖 k'u³¹ si³¹ kæ⁵⁵
旬邑 壳膝盖 k'u^{31:51} tsɿ³¹ kæ⁴⁴
淳化 壳肢盖儿 k'u²¹ tsɿ²¹ kær^{44:52}
泾阳 壳膝盖 k'u³¹ t'i³¹ kæ⁵⁵
三原 壳膝盖 k'u³¹ tsɿ³¹ kæ⁵⁵
踝骨(“踝”字音“铍”)
- 咸阳 脚骨棧 tɕy³¹ ku³¹ tsɿ⁴⁴
核桃疙瘩 xu²⁴ t'au²⁴ ku³¹ ta³¹
窑店 核桃疙瘩子 xu²⁴ t'au²⁴ ku³¹ ta³¹ tsɿ
兴平 脚骨棧 tɕy³¹ ku³¹ tsɿ⁴⁴
武功 踝拉骨 xua^{35:31} la^{31:44} ku³¹
礼泉 桃核儿 t'au³⁵ xu³⁵ ər
乾县 黄拉骨 xua³⁵ la³¹ ku³¹
永寿 踝拉骨 xua³⁵ la³¹ ku³¹
长武 核桃疙瘩 xə^{35:31} t'au^{35:51} kə³¹ ta³¹
南彬 踝拉骨 xua^{35:31} la^{31:51} ku³¹
北彬 拐骨 kuə⁵¹ ku³¹
旬邑 桃核 t'au³⁵ xu³⁵
淳化 桃核 t'au²⁴ xu²⁴
泾阳 桃核 t'au³⁵ xu³⁵
三原 桃核 t'au³⁵ xu³⁵
棺材
- 咸阳 棺材 kuā³¹ tsɿ | 材 ts'æ²⁴ 西乡
窑店 枋 faŋ³¹
兴平 棺材 kuā³¹ tsɿ | 枋 faŋ³¹
武功 材 ts'æ³⁵
礼泉 棺材 kuā³¹ ts'æ^{35:31} | 枋 faŋ³¹ 棺材板
乾县 棺材 kuā³¹ ts'æ^{35:31}
材木 ts'æ³⁵ mu³¹ 陵园乡
永寿 材 ts'æ³⁵
长武 棺材 kuā^{31:51} ts'æ^{35:31}
南彬 材 ts'æ³⁵ | 寿材 ŋvu⁵⁵ ts'æ³⁵
北彬 材 ts'æ³⁵ | 梭 liŋ³⁵

- 旬邑 棺材 kuā³¹ ts'æ^{35:31}
 枋 faŋ³¹ | 材 ts'æ³⁵
- 淳化 材枋 ts'æ²⁴ faŋ²¹
- 泾阳 枋 faŋ³¹
- 三原 枋 faŋ³¹ | 材 ts'æ³⁵
 棺材 kuā³¹ · ts₁
 丧棒, 哀杖
- 咸阳 纸棍 ts₁⁵² kuē^{44:31}
- 窑店 纸棍子 ts₁⁵² kuē^{44:31} · ts₁
- 兴平 纸棍儿 ts₁⁵² · kuē r
- 武功 柱棍儿 ts₁⁴² kuē r^{44:35}
- 礼泉 纸棍 ts₁⁵³ kuē^{44:31}
- 乾县 纸棍 ts₁⁵² kuē^{44:31}
- 永寿 纸棍 ts₁⁵² kuē^{44:31}
- 长武 哭棍子 fu^{31:51} kuē^{55:31} · ts₁
- 南彬 哭棍子 fu^{31:51} kuē^{55:31} · ts₁
- 旬邑 纸棍子 ts₁⁵¹ kuē^{44:31} · ts₁
- 淳化 纸棍 ts₁⁵² · kuei
- 泾阳 纸棍子 ts₁⁵¹ kuē^{55:31} · ts₁
- 三原 纸棍子 ts₁⁵² kuē^{55:31} · ts₁
 涎布
- 咸阳 涎水帘帘 xa³¹ s₁uei^{52:31} liā²⁴ liā^{24:31}
- 窑店 帘帘儿 liā²⁴ · liār
- 兴平 拥拥 yŋ^{31:52} · yŋ
- 武功 婴肚儿 iŋ³¹ tur^{44:35}
- 礼泉 围围 uei³⁵ uei^{35:31}
- 乾县 担肩 tā³¹ t₁aiā³¹
- 永寿 涎水担肩 xa³¹ s₁uei^{52:31} tā⁴⁴ t₁aiā³¹
- 长武 兜兜 təu^{31:51} · təu
- 南彬 围围 y³⁵ y^{35:31}
- 北彬 围子 y³⁵ · ts₁
- 旬邑 围围 uei³⁵ uei^{35:31}
- 淳化 涎水布袋 xa²¹ s₁uei^{52:21} pu⁴⁴ · tæ
 围围儿 y²⁴ · yər
- 泾阳 围围儿 y³⁵ · yər
 围围 uei³⁵ uei^{35:31}
- 三原 围围子 uei³⁵ uei^{35:31} · ts₁
- 棉鞋
- 咸阳 窝窝 uy^{31:52} · uy
- 窑店 窝窝 uy³¹ · uy
- 兴平 窝窝 uy^{31:52} · uy
- 武功 暖窝儿鞋 luā⁴² uy^{31:42} xæ³⁵
- 礼泉 棉窝窝 miā³⁵ · uy³¹ uy
- 永寿 窝窝 uy^{31:52} · uy
- 长武 窝窝 uə^{31:51} · uə
- 南彬 棉鞋 miā³⁵ xæ³⁵
 窝窝 uy^{31:51} · uy
- 旬邑 棉鞋 miā³⁵ xæ³⁵
 窝窝 uy^{31:51} · uy
 暖鞋 lyā⁵¹ xæ³⁵
- 淳化 窝窝 uy^{21:52} · uy
 暖鞋 lyā⁵² xæ²⁴
- 泾阳 窝窝 uy³¹ · uy | uy^{31:51} · uy
- 三原 窝窝 uy^{31:52} · uy
 雨鞋
- 咸阳 胶鞋 t₁aiāu³¹ xæ²⁴
- 窑店 雨鞋 y⁵² xæ²⁴
- 兴平 泥鞋 ŋi³⁵ xæ³⁵
- 武功 水鞋 s₁uei⁴² xæ³⁵ | 泥鞋 ŋi³⁵ xæ³⁵
- 礼泉 泥鞋 ŋi³⁵ xæ³⁵
- 乾县 泥鞋 ŋi³⁵ xæ³⁵
- 永寿 泥鞋 ŋi³⁵ xæ³⁵
- 长武 雨鞋 y⁵¹ xæ³⁵
- 南彬 雨鞋 y⁵¹ xæ³⁵
- 旬邑 雨鞋 y⁵¹ xæ³⁵
- 淳化 雨鞋 y⁵² xæ²⁴
- 泾阳 雨鞋 y⁵¹ xæ³⁵
- 三原 雨鞋 y⁵² xæ³⁵
 粘裕褙
- 咸阳 打褙子 ta⁵² pei⁴⁴ · ts₁
 打裕褙 ta⁵² ku³¹ pei^{44:31}
- 窑店 抹褙子 m₁y⁵² pei⁴⁴ · ts₁
 抹裕褙 m₁y⁵² ku³¹ pei^{44:31}
- 兴平 打褙子 ta⁵² pei⁵⁵ · ts₁

- 武功 打褙子 ta⁴² pei⁴⁴·ts₁
 礼泉 打褙子 ta⁵² pei⁴⁴·ts₁
 乾县 打裕褙 ta⁵² ku³¹ pei^{44:31}
 永寿 打褙子 ta⁵² pei⁴⁴·ts₁
 长武 打褙鞋 ta⁵¹ ts'əŋ⁵⁵ xæ³⁵
 南彬 打褙子 ta⁵¹ pei⁵⁵·ts₁
 抹褙子 mæ⁵¹ pei⁵⁵·ts₁
 北彬 抹裕褙 mæ^{51:55} ku^{31:51} pei^{55:31}
 旬邑 打裕褙 ta^{51:44} ku^{31:51} pei^{44:31}
 淳化 抹裕褙 mɿ⁵² ku²¹·pei
 泾阳 抹裕褙 mɿ^{51:55} ku^{31:51} pei^{55:31}
 三原 抹裕褙 mɿ^{52:55} ku^{31:52} pei^{55:31}
 抹布(抹桌的 || 抹碗的)
 咸阳 撮布 t̪sã⁵² p'u^{44:31}
 撮布 t̪sã⁵² p'ɿ^{44:31}西乡
 窑店 抹布子 ma³¹ pu^{44:31}·ts₁
 || 撮布 t̪sã⁵² pu^{44:31}
 兴平 抹布 ma³¹ pu^{55:31} || 撮布 t̪sã⁵² pu³¹
 武功 抹布儿 ma³¹ pɿ^{44:35}
 || 撮布 t̪sã⁵² p'u^{44:31}
 礼泉 抹布 ma³¹ pu^{44:31}
 || 撮布 t̪sã⁵³ p'u^{44:31}
 乾县 抹布 ma³¹ pu^{44:31}
 || 撮布 t̪sã⁵² pu^{44:31}
 永寿 抹布 ma³¹ pu⁴⁴
 || 抹布 ma³¹ pu^{44:31} | ma³¹ p'u^{44:31}
 长武 抹布子 ma³¹ p'ə^{55:31}·ts₁
 || 撮布 t̪sã^{51:55} p'ə^{55:31}
 南彬 抹布 ma^{31:51} p'ə^{55:31}
 旬邑 抹布 ma³¹ p'ɿ^{44:31} || 撮布 t̪sã⁵¹ p'ɿ³¹
 淳化 抹布 ma²¹·p'u || 撮布 t̪sã⁵²·p'u
 泾阳 撮布 t̪sã⁵¹ p'ɿ^{55:31}
 三原 沾帕子 t̪sã⁵⁵ p'a³¹·ts₁ | 撮布 t̪sã⁵²
 p'u^{55:31} || 抹布 ma³¹ p'u³¹
 土布
 咸阳 老布 lau⁵² pu⁴⁴
 大布 ta⁴⁴ pu⁴⁴西乡
- 兴平 穿布 ts'uā^{31:52} pu^{55:31}
 武功 老布 lau⁴² pu⁴⁴
 礼泉 土布 t'u⁵³ pu⁴⁴
 乾县 老布 lau⁵² pu⁴⁴
 永寿 老布 lau⁵² pu⁴⁴
 长武 老布 lau⁵¹ pu⁵⁵
 南彬 老布 lau⁵¹ pu⁵⁵
 旬邑 老布 lau⁵² pu⁴⁴
 淳化 织布子 t̪sɿ^{21:52}·pu·ts₁
 泾阳 粗布 ts'xu³¹ pu⁵⁵
 三原 织布子 t̪sɿ^{31:52} pu^{55:31}·ts₁
死结
 咸阳 死纆结 sɿ⁵² ku³¹ ta³¹
 窑店 死横子 sɿ⁵² k'uei^{44:31}·ts₁
 死纆结 sɿ⁵² ku³¹ ta³¹
 兴平 死纆结 sɿ⁵² ku³¹ ta³¹
 武功 死纆结 sɿ⁴² ku³¹ ta³¹
 礼泉 死结 sɿ⁵³ t̪ɕie³¹
 乾县 死纆结 sɿ⁵² ku³¹ ta³¹
 永寿 死纆结 sɿ⁵² ku^{31:52} ta³¹
 长武 死纆结 sɿ⁵¹ ku^{31:51} ta³¹
 南彬 死曲头 sɿ⁵¹ t̪ɕy³¹·t'əu
 死曲子 sɿ⁵¹ t̪ɕy³¹·ts₁
 旬邑 死纆结 sɿ⁵¹ ku³¹ ta³¹
 死曲头 sɿ⁵¹ t̪ɕy³¹·t'ɿu
 淳化 死曲头 sɿ⁵² t̪ɕy²¹·t'ɿu
 死曲子 sɿ⁵² t̪ɕy²¹·ts₁
 泾阳 死头儿 sɿ⁵¹·t'ər
 三原 死纆结 sɿ⁵² ku³¹ ta³¹
猪蹄结(一种绑猪蹄的结)
 咸阳 猪条环 tsɿ³¹ t'iau^{24:31} xuā^{24:31}
 猪条花 tsɿ³¹ t'iau^{24:31} xuā³¹西乡
 窑店 猪蹄花 tsɿ³¹ t̪ɕi^{24:31} xuā³¹
 猪囚花 tsɿ³¹ ɕiɿu^{24:31} xuā³¹
 兴平 猪条回 tsɿ³¹ t'iau^{35:31} xuei^{35:31}
 武功 猪条环 tsɿ³¹ t'iau³⁵ xuā^{35:31}
 礼泉 出条环 ts'ɿ³¹ t'iau^{35:31} xuā^{35:31}

- 乾县 猪条花 tsɿ^{31:52} t'iau^{35:31} xua³¹
永寿 猪条环 tsɿ^{31:52} t'iau^{35:31} xuã^{35:31}
长武 猪蹄贯 tsɿ^{31:51} t'i^{35:31} k'uã³¹
南彬 猪蹄压子 tsɿ^{31:51} t'i^{35:31} ɲia³¹ · tsɿ
旬邑 猪蹄环 tsɿ³¹ t'i³⁵ xuã³⁵
淳化 猪蹄眼 tsɿ^{21:52} t'i^{24:21} · ɲia
泾阳 猪蹄盘 tsɿ³¹ t'i³⁵ p'ã³⁵
三原 猪蹄环 tsɿ³¹ t'i^{35:31} xuã^{35:31}
饺子
咸阳 煮馍 tsɿ⁵² mɿ^{44:31}
兴平 扁食 piã⁵² ʂɿ^{35:31}
武功 饺子 tɕiau⁴² · tsɿ
礼泉 扁食 piã⁵³ ʂɿ^{35:31}
煮饺子 tsɿ⁵² mɿ^{44:31} · tsɿ
乾县 角角 tɕyɿ^{31:52} · tɕyɿ
永寿 角角 tɕyɿ³¹ · tɕyɿ
长武 饺子 tɕiau^{51:55} · tsɿ
南彬 煮角 tsɿ⁵¹ tɕyɿ³¹
角角 tɕyɿ^{31:51} · tɕyɿ
旬邑 煮角 tsɿ⁵¹ tɕyɿ³¹
淳化 煮馍 tsɿ⁵² · mɿ
煮角 tsɿ⁵² tɕyɿ²¹
角角 tɕyɿ²¹ · tɕyɿ
泾阳 煮馍 tsɿ⁵¹ mɿ^{55:31}
煮角儿 tsɿ⁵¹ · tɕyɿɿ
三原 煮角 tsɿ⁵² tɕyɿ³¹
发糕
咸阳 锅塔子 kuv³¹ t'a³¹ · tsɿ
发黄子 fa³¹ xuaɿ^{24:31} · tsɿ
窑店 锅塔塔儿 kuv³¹ t'a³¹ t'ar²⁴
兴平 发花馍 fa³¹ xua³¹ mɿ⁵⁵
武功 锅塔塔 kuv³¹ t'a³¹ t'a^{31:35}
礼泉 发发馍 fa³¹ · fa mɿ⁴⁴
乾县 粑粑 pa^{31:52} · pa
永寿 粑粑 pa^{31:52} · pa
长武 锅塔塔 kuɿ^{31:51} t'a³¹ · t'a
南彬 锅塔塔 kuɿ^{31:51} t'a³¹ · t'a
块块 k'uɿ^{51:55} · k'uɿ
北彬 黄黄馍 xuaɿ^{35:31} xuaɿ^{35:51} mɿ^{55:31}
旬邑 粘糕 zã³⁵ kau³¹
黄子 xuaɿ³⁵ · tsɿ
淳化 粑粑 pa^{21:52} · pa
泾阳 粑粑馍 pa^{31:51} · pa mɿ⁵⁵
三原 锅塔塔 kuv³¹ t'a³¹ t'a^{31:35}
厨房
咸阳 厨房 ts'ɿ²⁴ faɿ²⁴ | 灶伙 tsau⁴⁴ xurɿ^{52:31}
兴平 灶伙 tsau⁵⁵ xurɿ^{52:31}
武功 灶伙 tsau⁵⁵ xurɿ^{42:31}
礼泉 灶房 tsau⁴⁴ faɿ³⁵ | 厨房 ts'ɿ³⁵ faɿ³⁵
乾县 厨房 ts'ɿ³⁵ faɿ^{35:31}
永寿 厨房 ts'ɿ³⁵ faɿ^{35:52}
灶房 tsau⁴⁴ faɿ^{35:52}
长武 尾里 u^{31:51} · li
南彬 厨房 ts'ɿ^{35:31} faɿ^{35:51}
灶伙 tsau⁵⁵ xuɿ^{51:31}
北彬 厨房 ts'ɿ³⁵ faɿ^{35:31}
灶房 tsau⁵⁵ faɿ^{35:31}
旬邑 屋里 u³¹ · li 也指屋内
淳化 灶伙 tsau⁴⁴ · xurɿ
泾阳 灶房 tsai⁵⁵ faɿ³⁵ | 灶伙 tsau⁵⁵ xurɿ^{51:31}
三原 厨房 ts'ɿ³⁵ faɿ^{35:31}
菜刀
咸阳 菜刀 tsa⁵² ta³¹
窑店 切面刀 tɕie³¹ miã⁴⁴ tau³¹
兴平 切面刀 t'ie³¹ miã⁵⁵ tau³¹
武功 刀 tau³¹
礼泉 切面刀 tɕie³¹ miã⁴⁴ tau³¹
乾县 切面刀 tɕie³¹ miã⁴⁴ tau³¹
永寿 刀 tau³¹ | 菜刀 tsa⁵² ta³¹
长武 刀子 tau^{31:51} · tsɿ
南彬 切面刀 ts'ie³¹ miã⁵⁵ tau³¹
旬邑 菜刀 tsa^{51:44} tau³¹
淳化 切面刀 t'ie²¹ miã⁴⁴ tau²¹
泾阳 刀 tau³¹

三原 厨刀 ts'ɥ³⁵ tau³¹ | 刀 tau³¹
锅铲

咸阳 铲锅匙 ts'ã⁵² kuɤ³¹ sɿ²⁴
铁匙 tie³¹ sɿ²⁴

窑店 铲铲儿 ts'ã⁵² · ts'ã r

兴平 铁匙 tie³¹ sɿ³⁵

武功 铲锅匙 ts'ã⁴² kuɤ³¹ sɿ³⁵

礼泉 铲铲 ts'ã^{53:44} · ts'ã

乾县 铲锅刀刀 ts'ã⁵² kuɤ^{31:35} tau³¹ · tau

永寿 铲锅刀刀 ts'ã⁵² kuɤ³¹ tau^{31:52} · tau

长武 铲锅刀子 ts'ã⁵¹ kuə^{31:52} · tau

南彬 铲锅刀子 ts'ã⁵¹ kuə³¹ tau^{31:51} · tsɿ

旬邑 铲铲 ts'ã^{51:44} · ts'ã

淳化 铲锅刀儿 ts'ã⁵² kuɤ²¹ tau²¹ · ər

泾阳 铲铲 ts'ã⁵¹ · ts'ã

锅铲子 kuɤ³¹ ts'ã⁵¹ · tsɿ

三原 铲铲 ts'ã⁵² · ts'ã

锅巴

咸阳 乞杂 ku³¹ tsa²⁴

乞巴儿 ku³¹ · par

兴平 乞渣 ku^{31:52} tsa³¹

武功 沟巴儿 kvu³¹ par³⁵ 搅团 ~

锅底 kuɤ³¹ ti⁴²

礼泉 锅巴 kuɤ³¹ pa³¹ | 锅底 kuɤ³¹ ti⁵³

乾县 刮刮 kua^{31:52} · kua

永寿 刮刮 kua^{31:52} · kua

长武 刮刮 kua^{31:51} · kua

南彬 刮刮 kua^{31:51} · kua

旬邑 刮刮 kua³¹ · kua

淳化 锅底 kuɤ²¹ ti⁵² 硬的

粘粘 zã²⁴ · zã 软的

泾阳 锅底 kuɤ³¹ ti⁵¹

三原 锅底 kuɤ³¹ ti⁵²

算子

咸阳 甑算子 tɕiŋ⁴⁴ pi^{44:31} · tsɿ

甑算儿 tɕiŋ⁴⁴ · piər

兴平 甑帮 tɕiŋ⁵⁵ paŋ³¹

武功 甑笆儿 tɕiŋ⁴⁴ pər³⁵

礼泉 甑笆 tɕiŋ⁴⁴ pa³¹

乾县 甑笆 tɕiŋ⁴⁴ pa³¹

永寿 甑笆 tɕiŋ⁴⁴ pa³¹

长武 甑底子 tsɿŋ^{55:35} ti^{51:31} · tsɿ

南彬 甑底 tsɿŋ⁵⁵ ti^{51:31}

甑算 tsɿŋ⁵⁵ pər^{55:31}

北彬 甑片子 tsɿŋ⁵⁵ piã^{51:31} · tsɿ

旬邑 甑片 tsɿŋ⁴⁴ piã^{51:31}

淳化 甑片 tiŋ⁴⁴ · piã

泾阳 甑片 tiŋ⁵⁵ piã^{51:31}

甑算儿 tiŋ⁵⁵ · piər

三原 甑算儿 tiŋ⁵⁵ pi^{55:31} · ər

风箱(“函”字读音特殊)

咸阳 风匣 fəŋ³¹ ɕiã^{24:31}

风函 fəŋ³¹ xã^{24:31}

兴平 风函 fəŋ³¹ xã^{35:31}

武功 风函 fəŋ³¹ k'ã³¹

礼泉 风箱 fəŋ^{31:53} ɕiãŋ³¹

风匣 fəŋ⁵³ ɕiã^{35:31}

乾县 风箱 fəŋ^{31:52} ɕiãŋ³¹

风函 fəŋ⁵² xã^{24:31}

风函 fəŋ^{31:52} xãŋ³¹ | fəŋ⁵² ɕiã³¹

永寿 风箱 fəŋ^{31:52} ɕiãŋ³¹

风函 fəŋ^{31:52} xã^{35:31} | fəŋ⁵² ɕiã^{35:31}

长武 风函 fəŋ^{31:51} k'ã³¹

南彬 风函 fəŋ^{31:51} k'ã³¹

旬邑 风函 fəŋ^{31:51} xã^{35:31} | fəŋ⁵¹ ɕiã^{35:31}

淳化 风函 fəŋ²¹ · xã

泾阳 风函 fəŋ^{31:51} xã^{35:31}

三原 风函 fəŋ³¹ xã^{35:31}

筷子笼

咸阳 箸笼罐儿 tsɥ⁴⁴ luŋ^{52:31} kuã^{44:52}

窑店 筷笼子 k'uae⁴⁴ luŋ^{52:31} · tsɿ

兴平 箸箸罐 tsɥ⁵⁵ lvu^{52:31} kuã⁵⁵

武功 箸笼罐 tsɥ⁴⁴ luŋ^{42:31} kuã^{44:31}

- 礼泉 箸笼 tsy⁴⁴ luŋ^{53:31}
- 乾县 箸笼罐 tsy⁴⁴ luŋ^{52:31} kuā⁴⁴
- 永寿 箸箸罐 tsy⁴⁴ lvy^{52:31} kuā⁴⁴
- 长武 箸箸罐 tsy⁵⁵ ləu^{51:31} kuā⁵⁵
- 南彬 箸箸罐 ts'y⁵⁵ ləu^{51:31} kuā⁵⁵
- 旬邑 箸箸罐 tsy⁴⁴ lvy^{51:31} kuā^{44:35}
- 淳化 箸箸罐 tsy⁴⁴·lvy kuā⁴⁴
- 泾阳 箸箸罐子 tsy⁵⁵ lvy^{51:31} kuā⁵⁵·tsɿ
- 三原 箸笼子 tsy⁵⁵ luŋ^{52:31}·tsɿ
筷笼子 k'uæ⁵⁵ luŋ³¹·tsɿ
- 麦草
- 咸阳 麦秸 mei³¹ tɕia³¹ | mei³¹ tɕiã³¹
- 兴平 麦秸 mei³¹ tɕie³¹
- 武功 麦草 mei³¹ ts'au^{42:31}
- 礼泉 麦草 mei³¹ ts'au^{53:31}
麦秸 mei³¹ tɕia³¹
- 乾县 麦草 mei³¹ ts'au^{52:31}
- 永寿 麦草 mei³¹ ts'au⁵²
- 长武 麦秸 mɛi^{31:51} tɕia³¹
- 南彬 麦秸 mɛi^{31:51} tɕia³¹
- 北彬 麦秸 mei^{31:51} tɕiã³¹
- 旬邑 麦秸 mei^{31:51} tɕia³¹
- 淳化 麦秸 mei²¹ tɕia²¹
- 泾阳 麦秸 mei³¹ tɕiã³¹
- 三原 麦秸 mei³¹ tɕiã³¹
- 茜草
- 咸阳 粘粘蔓 z̥ã²⁴ z̥ã^{24:31} ts'au⁵²
粘粘蔓 z̥ã²⁴ z̥ã³¹ vã⁴⁴ 西乡
- 兴平 丝丝蔓 sɿ^{31:52}·sɿ vã⁵⁵
- 武功 堰儿麦 iãr^{44:42} mei³¹
- 礼泉 粘哇哇 z̥ã³⁵ ua³¹·ua
- 乾县 粘粘哇 z̥ã³⁵ z̥ã^{35:31} ua⁴⁴
- 长武 粘粘哇 z̥ã³⁵ z̥ã^{35:31} ua⁵⁵
- 南彬 黑葡萄蔓 xei³¹ p'u³⁵ t'au³¹ vã⁵⁵
- 北彬 草籽 ts'au^{51:31} tsɿ^{51:31}
- 旬邑 粘粘草 z̥ã^{35:31} z̥ã^{35:51} ts'au⁵¹
- 淳化 涩哇哇 sei²¹ ua²¹ ua^{21:24}
- 泾阳 粘哇哇 z̥ã³⁵ ua³¹ ua^{31:55}
- 三原 粘哇哇 z̥ã³⁵ ua³¹ ua^{31:55}
- 王不留
- 咸阳 胖官 p'aŋ⁴⁴ kuã³¹
- 窑店 麦兰兰 mei³¹ lã²⁴ lã^{24:31}
- 兴平 胖轱辘 p'aŋ⁵⁵ ku³¹ lu³⁵
l'p'aŋ⁵⁵ kuv³¹ lu³⁵
- 武功 麦莲莲 mei³¹ liã³⁵ liã^{35:31}
- 礼泉 王八留 uaŋ³⁵ pa³¹ livu³⁵
- 乾县 王不留 uaŋ³⁵ pu³¹ livu³⁵
王不留 uaŋ³⁵ pu³¹ lvy³⁵ 阳洪
- 永寿 王不留 uaŋ³⁵ pu³¹ livu³⁵
- 长武 王不留 uaŋ³⁵ pu³¹ liəu³⁵
- 南彬 胖娃娃 p'aŋ⁵⁵ ua³¹ ua^{31:35}
- 旬邑 王不留 uaŋ³⁵ pu³¹ livu³⁵
- 淳化 麦瓶瓶 mei²¹ p'iŋ²⁴·p'iŋ
与“米瓦罐草”同
- 泾阳 王不留 uaŋ³⁵ pu³¹ livu³⁵
- 三原 胖官官 p'aŋ⁵⁵ kuã³¹ kuã^{31:35}
- 米瓦罐草
- 咸阳 麦瓶儿 mei³¹ p'iē r²⁴
- 窑店 麦瓶瓶 mei³¹ p'iŋ²⁴ p'iŋ^{24:31}
- 兴平 麦瓶 mei³¹ p'iŋ³⁵
- 武功 麦后瓶 mei³¹ xvɿ⁴⁴ p'iŋ³⁵
- 礼泉 麦花瓶儿 mei³¹ xua³¹ p'iŋ³⁵·ər
- 乾县 麦瓶花 mei³¹ p'iŋ³⁵ xua³¹
麦花瓶 mei³¹ xua³¹ p'iŋ³⁵ 阳洪
- 永寿 麦忽萎瓶 mei³¹ xu³¹ lvy³¹ p'iŋ³⁵
- 长武 麦轱辘瓶 mei³¹ ku³¹ ləu³¹ p'iŋ³⁵
- 南彬 麦忽瓶 mei³¹ xu³¹ p'iŋ³⁵
- 旬邑 麦希瓶 mei³¹ xi³¹ p'iŋ³⁵
- 淳化 麦瓶瓶 mei²¹ p'iŋ^{24:21} p'iŋ^{24:52}
- 泾阳 麦瓶瓶 mei³¹ p'iŋ^{35:31} p'iŋ³⁵
- 三原 麦瓶瓶 mei^{31:52} p'iŋ³⁵ p'iŋ^{35:31}
- 蒲公英
- 咸阳 壳萎盖儿 k'ur³¹ lvy³¹ kar^{44:52}
- 窑店 黄儿庙 xuãr²⁴ miau⁴⁴

兴平 可老窝 k'y⁵² lau^{52:35} uɿ³¹
 武功 黄花苗 xuaŋ³⁵ xua³¹ miau³⁵
 礼泉 壳娄哇 k'w³¹ lɿu³¹ ua⁴⁴
 乾县 壳娄娄 k'w³¹ lɿu³¹ lɿu^{31:35}
 永寿 壳娄娄 k'w³¹ lɿu³¹ lɿu^{31:35}
 长武 壳娄娄 k'w³¹ ləu³¹ ·ləu
 南彬 壳塔芽 k'əi³¹ t'a³¹ ia^{35:31}
 壳娄苔 k'əi³¹ ləu³¹ t'æ³⁵
 北彬 壳娄娄 k'w³¹ ləu³¹ ləu^{31:35}
 旬邑 壳娄娄 k'w³¹ lɿu³¹ lɿu^{31:35}
 淳化 壳娄娄 k'w²¹ lɿu^{24:21} lɿu²⁴
 泾阳 壳娄娄 k'w³¹ lɿu³¹ lɿu^{31:35}
 三原 圪圪能 ku³¹ ·ku nəŋ³⁵

瓦松

咸阳 酸酸 suā³¹ ·suā
 窑店 酸溜溜 suā³¹ liu³¹ liu^{31:44}
 兴平 麦钻钻 mei³¹ tsuā³¹ ·tsuā
 武功 麦酸酸 mei³¹ suā³¹ ·suā
 礼泉 酸酸 suā^{31:53} ·suā
 乾县 麦钻钻 mei³¹ tsuā³¹ tsuā^{31:35}
 麦酸酸 mei³¹ suā³¹ suā^{31:35}
 永寿 麦钻钻 mei³¹ tsuā³¹ tsuā^{31:35}
 松塔塔 suŋ³¹ t'a³¹ t'a^{31:35}
 长武 麦钻钻 mēi³¹ tsuā³¹ ·tsuā
 南彬 松塔塔 suŋ³¹ t'a³¹ ·t'a
 北彬 酸溜溜 suā³¹ liəu³¹ liəu^{31:35}
 旬邑 浆水水 tsiaŋ³¹ sɬei^{51:31} sɬei^{31:35}
 淳化 酸溜溜 suā²¹ liu²¹ liu^{21:24}
 泾阳 松塔塔 suŋ³¹ t'a³¹ t'a^{31:35}
 三原 堂捞捞 t'aŋ³⁵ lau³¹ lau^{31:35}

牛虻

咸阳 虻嚼 məŋ²⁴ tsā³¹
 窑店 瞎毛 xa³¹ mau^{24:31}
 兴平 牛蚊子 ɳiɿu³⁵ vē³⁵ ·tsɿ
 武功 蚊嚼 vē³⁵ tsā³¹
 礼泉 牛蚊子 ɳiɿu³⁵ vē³⁵ ·tsɿ

乾县 牛蚊子 ɳiɿu³⁵ vē³⁵ ·tsɿ
 永寿 牛蚊子 ɳiɿu³⁵ uē³⁵ ·tsɿ
 长武 虻钻 məŋ^{35:31} tsuā^{31:51}
 南彬 牛蚊子 ɳiəu³⁵ uē³⁵ ·tsɿ
 旬邑 虻嚼 məŋ^{35:31} tsā^{31:51}
 淳化 牛蚊子 ɳiɿu²⁴ vē²⁴ ·tsɿ
 泾阳 虻子 məŋ³⁵ ·tsɿ
 三原 牛虻 ɳiɿu³⁵ məŋ^{35:31}
 蚂蚁(“蟻”字音特殊)
 咸阳 蚂蚁虫儿 ma^{52:31} i^{52:31} ts'ɿ ē r²⁴
 窑店 蚂蚁 ma^{52:31} i⁵²
 兴平 蚂蚁虫 ma^{52:31} iē^{52:55} ts'ɿəŋ^{35:31}
 武功 蚂蚁虫 ma^{42:31} iē^{42:44} ts'ɿəŋ^{35:31}
 礼泉 蚰蚂蟥 pi³⁵ ma⁵³ fəŋ³¹
 乾县 蚰蚂蟥 pi³¹ ma⁵² fəŋ³¹
 永寿 蚰蚂蟥 pi^{35:31} ma^{52:44} fəŋ³¹
 长武 蚰蚂蟥 pi³¹ fəŋ⁵⁵ ma³¹
 南彬 蚰蚂蟥 pi³¹ ma⁵¹ fəŋ³¹
 北彬 蚰蚂蟥 pi³¹ fəŋ⁵⁵ ma³¹
 旬邑 蚰蚂蟥 pi³¹ fəŋ⁴⁴ ma³¹
 淳化 蚂蚁 ma^{52:21} i^{52:21}
 蚰蚂蟥 pi²¹ ma⁵² fəŋ²¹ 会飞的
 泾阳 蚰蚂蟥 pi³⁵ ma⁵¹ fəŋ⁵⁵
 三原 蚰蚂蟥 pi³⁵ ma⁵² fəŋ³¹

大雁

咸阳 咕喽雁 ku³¹ lɿu³¹ iā⁴⁴
 窑店 雁 iā⁴⁴
 兴平 咕喽雁 ku³¹ lɿu³¹ iā⁵⁵ (又 ɳiā⁵⁵)
 武功 咕喽雁 ku³¹ lɿu³¹ iā⁴⁴
 礼泉 雁 iā⁴⁴ | 大雁 ta⁴⁴ iā⁴⁴
 乾县 雁 iā⁴⁴
 永寿 雁 iā⁴⁴
 长武 咕喽雁 ku³¹ ləu³¹ ɳiā⁵⁵
 南彬 咕喽雁 ku³¹ ləu³¹ ɳiā⁵⁵
 北彬 雁扑鸨 niā⁵⁵ p'u³¹ pau⁵¹
 旬邑 雁儿 ɳiā⁴⁴ ·ər
 淳化 大雁 ta⁴⁴ iā⁴⁴

- 泾阳 雁 iā⁵⁵
 三原 雁 iā⁵⁵
 麻雀
 咸阳 雀儿 tɕ'iau⁵²
 兴平 雀儿 t'iau⁵²·ər | t'iau⁵²
 武功 雀 tɕ'iau⁴²
 礼泉 雀 tɕ'iau⁵³
 乾县 雀 tɕ'iau⁵²
 永寿 雀儿 tɕ'iaur⁵²
 长武 麻雀 mau^{35:31} tɕ'yə^{31:51}
 雀儿 ts'iau⁵¹·ər
 南彬 鹌鹑 ɕy^{31:51}·ɕy
 旬邑 雀儿 ts'iau⁵¹·ər
 淳化 雀儿 t'iau⁵²·ər
 泾阳 雀儿 tɕ'iau⁵¹·ər
 三原 雀儿 ts'iau⁵²·ər
 燕子
 咸阳 燕儿 iār^{44:52} | 燕唛儿 i ā⁴⁴·tɕ'ir
 窑店 燕唧唧 iā⁴⁴ tɕi³¹ tɕi^{31:24}
 兴平 燕子 iā⁵⁵·tsɿ
 武功 燕子 iār^{44:42}
 礼泉 燕雀 iā⁴⁴ tɕ'yv³¹
 乾县 燕唛 i ā⁴⁴ tɕ'i³¹
 燕雀 iā tɕ'iau³¹陵园乡
 永寿 燕唛 iā⁴⁴ tɕ'i³¹
 长武 燕唧唧 iā⁵⁵ tsi³¹ tsi^{31:35}
 南彬 燕唧唧 iā^{55:35} tsi³¹·tsi
 北彬 燕子 iā^{55:35}·tsɿ
 燕唛唛 iā⁵⁵ tsi⁵⁵ tsi⁵⁵
 旬邑 燕姐姐 iā⁴⁴ tsiɕ⁵¹·tsiɕ
 淳化 燕唧唧 iā⁴⁴ ti²¹·ti
 泾阳 燕雀 iā⁵⁵ tɕ'yv³¹ | iā⁵⁵ tɕ'yv³⁵
 三原 燕子 iā⁵⁵·tsɿ
 老鹰
 咸阳 鹰 iŋ³¹ | 饿老雏 ŋv⁴⁴ lau³¹ tsu³¹
 窑店 饿老鼠 ŋv⁴⁴ lau^{52:31} su^{52:31}
 兴平 老鹰 lau⁵² iŋ³¹
 饿老鼠 ŋv⁵⁵ lau^{52:31} su^{52:31}
 武功 鹰 iŋ³¹
 礼泉 饿老鼠 ŋv⁴⁴ lau^{53:31} su^{53:31}
 乾县 饿老雏 ŋv⁴⁴ lau³¹ ts'u³¹
 永寿 饿老雏 ŋv⁴⁴ lau³¹ ts'u³¹
 长武 花标 xua^{31:51} piau³¹
 南彬 饿老 uə⁵⁵·lau³¹
 旬邑 饿老雏 uv⁴⁴ lau³¹ ts'u³¹
 淳化 鹰 iŋ²¹
 泾阳 鹰 iŋ³¹
 三原 坠唛唛 tsuɕei⁵⁵ lɿu³¹·lɿu
 饿老鼠 ŋv⁵⁵ lau^{52:31} su^{52:31}
 喜鹊
 咸阳 野鹊 ia⁵² tɕ'iau³¹
 窑店 喜鹊 ɕi⁵² tɕ'yv³¹
 兴平 野鹊 ie⁵² t'iau³¹ | ie⁵² t'iŋ³¹
 武功 野鹊 ie⁴² tɕ'iau³¹
 礼泉 野鹊 ie⁵³ tɕ'yv³¹
 乾县 嘎嘎 ka³¹·ka | 嘎哇 ka⁵² ua³¹
 永寿 野鹊 ie⁵² ts'iau³¹
 南彬 野鹊 ie^{51:55} ts'iau³¹
 北彬 野鹊 ie⁵¹ ts'iau³¹
 旬邑 野鹊 ie^{51:44} tɕ'yv³¹
 野鹊子 ie^{51:44} ts'iau³¹·tsɿ
 淳化 嘎哇 ka⁵² ua²¹ 又指乌鸦
 嘎嘎 ka⁵²·ka 又指乌鸦
 野鹊 ie⁵² t'iau²¹
 泾阳 野鹊 ie⁵¹ t'iau³¹
 三原 嘎嘎 ka⁵²·ka
 猫头鹰
 咸阳 鸱鸢子 ts'ɿ³¹ tɕ'iau³¹·tsɿ
 贼老鸱 tsei²⁴ lau⁵² ua³¹
 窑店 咕咕咩儿 ku⁴⁴·ku miə⁵²
 鴝鹚子 ɕiŋ⁴⁴ xu³¹·tsɿ
 兴平 鴝鹚 ɕiŋ⁵⁵ xu³¹
 鸱鸢 ts'ɿ³¹ tɕiɕ³¹
 武功 鸱鸢儿 ts'ɿ³¹ tɕ'iaur^{31:35}

- 礼泉 鸱鸢 *ciŋ⁴⁴ xu³¹*
 乾县 鸱鸢 *ciŋ⁴⁴ xu³¹*
 永寿 鸱鸢 *ciŋ⁴⁴ xu³¹*
 长武 鸱鸢 *ciŋ⁵⁵ xəu³¹*
 鸱鸢 *ts'ɿ³¹ tsəu³¹*
 南彬 鸱鸢 *ciŋ^{55:35} xəu³¹*
 鸱鸢 *ciŋ⁴⁴ xŋu³¹*
 淳化 鸱鸢 *ciŋ⁴⁴ xu²¹*
 泾阳 鸱鸢子 *ts'ɿ³¹ tɕiau³¹ · tsɿ*
 咕咕咩儿 *ku³⁵ ku^{35:31} miər⁵¹*
 三原 鸱鸢 *ciŋ⁵⁵ xu³¹*
 鸽子
- 咸阳 鸱鸢 *ku²⁴ pɿ³¹*
 鸱鸢儿 *ku²⁴ · pər*
 兴平 鸱鸢儿 *p'u³⁵ · kvər*
 武功 鸱鸢 *p'u³⁵ kau³¹*
 礼泉 勃鸢儿 *p'u³⁵ kuv³¹ · ər*
 乾县 勃鸢 *pu⁵² kau⁵²*
 永寿 勃鸢 *pu³¹ kau⁵²*
 长武 勃鸢 *p'u³¹ kau⁵¹*
 南彬 勃鸢 *p'u³¹ kau⁵¹*
 北彬 勃鸢 *p'u³¹ kuə⁵¹*
 旬邑 勃鸢 *p'u³¹ kv⁵¹*
 淳化 勃鸢 *p'u²¹ kau²¹*
 泾阳 鸱鸢儿 *p'u³⁵ · kər*
 鸱鸢 *ku³⁵ pau³¹*
 三原 鸱鸢儿 *p'u³⁵ kv³¹ · ər*
 鸱鸢 *p'u³⁵ kau³¹*
 蝙蝠(“蝙蝠”读音特殊)
- 咸阳 夜蝙蝠 *ie⁴⁴ piəu³¹ xu³¹*
 |ie⁴⁴ piə³¹ xu³¹西乡
- 兴平 夜蝙蝠 *ie⁵⁵ piə³¹ xu³¹ |ie⁵⁵ piəu³¹ xu³¹*
 武功 夜蝙蝠儿 *ie⁴⁴ piə³¹ xu^{31:35}*
 礼泉 夜蝙蝠 *ie⁴⁴ piə³¹ xu³¹*
 乾县 夜蝙蝠 *ie⁴⁴ piə³¹ xu³¹*
 永寿 夜蝙蝠 *ie⁴⁴ piə³¹ xu³¹*
- 长武 夜蝙蝠 *ie^{55:35} piə³¹ xu³¹*
 南彬 夜蝙蝠 *ie⁵⁵ piə³¹ xu³¹*
 旬邑 夜蝙蝠 *ie⁴⁴ piə³¹ xu³¹ |ie⁴⁴ piə³¹ xu³¹*
 淳化 夜蝙蝠 *ie⁴⁴ piə²¹ fəŋ²¹*
 泾阳 夜蝙蝠 *ie⁵⁵ piə³¹ xu³¹*
 三原 夜蝙蝠 *ie⁵⁵ piə³¹ xu³¹*
 蟋蟀
- 咸阳 蚰蚰 *tə'y³¹ · tə'y*
 促织虫 *su⁴⁴ tsɿ³¹ ts'ɿəŋ^{24:31}*
 窑店 蚰蚰儿 *tə'y³¹ · tə'yər*
 兴平 蚰蚰 *tə'y³¹ · tə'y*
 促织儿 *su⁵⁵ tsər^{31:35}*
 武功 促织儿 *tsɿu⁴⁴ tsər^{31:35}*
 礼泉 蚰蚰 *tə'y³¹ · tə'y*
 乾县 地蚰蚰 *t'ɿ⁴⁴ tə'y³¹ tə'y^{31:35}*
 永寿 促织织 *su⁴⁴ tsɿ^{31:52} · tsɿ*
 长武 蚰蚰 *tə'y^{31:51} · tə'y*
 南彬 促织织 *ɕy⁵⁵ tsɿ³¹ · tsɿ*
 旬邑 促织织 *ɕy⁴⁴ tsɿ³¹ · tsɿ*
 淳化 蚰蚰 *tə'y²¹ · tə'y*
 泾阳 蚰蚰儿 *tə'y³¹ · tə'yər*
 三原 蚰蚰儿 *tə'y³¹ · tə'y · ər*
 蝌蚪
- 咸阳 蛤蟆蛙 *xŋu²⁴ ma³¹ ua⁴⁴*
 窑店 蛤蟆骨蝓 *xu²⁴ ma^{31:24} ku³¹ tɿu³¹*
 兴平 蛤蟆蛙 *xŋu³⁵ ma³¹ ua⁵⁵*
 武功 蛤蟆鱼儿 *xŋu³⁵ ma³¹ yr³⁵*
 礼泉 勺娃娃 *ɕuɿ³⁵ ua³¹ ua^{31:35}*
 勺巴巴 *ɕuɿ³⁵ pa³¹ pa^{31:35}*
 乾县 蛤蟆骨蝓 *xəŋ³⁵ ma³⁵ ku³¹ tu³¹*
 永寿 勺舀舀 *ɕuɿ³⁵ iəu^{52:44} · iəu*
 长武 蝌蚪 *kə³¹ təu⁵¹*
 南彬 □□ *tsəu⁵¹ · tsəu*
 北彬 勺把娄 *sɿə^{35:31} pa⁵⁵ ləu³¹*
 旬邑 蛤蟆骨蝓 *xu³⁵ ma³¹ ku³¹ tu³¹*
 淳化 蛤蟆鱼儿 *xu²⁴ ma²¹ yər²⁴*

- 蛤蟆骨蜍 $xu^{24} ma^{21} ku^{21} tʃu^{21}$
 泾阳 蛤蟆骨蜍 $xu^{35} ma^{31} ku^{31} tʃu^{31}$
 三原 蛤蟆骨蜍 $xu^{35} ma^{31:35} ku^{31} tʃu^{31}$
 早晨
 咸阳 早起 $tsau^{52:31} tʃi^{52}$
 窑店 早起 $tsau^{52:31} tʃi^{52}$ | 乾早 $kā^{31} tsau^{52}$
 兴平 早上 $tsau^{52} \cdot \text{ʃaŋ}$
 武功 早上 $tsau^{42} \cdot \text{ʃaŋ}$
 礼泉 早上 $tsau^{53} \cdot \text{ʃaŋ}$
 乾县 早晨 $tsau^{52} \cdot \text{ʃe}^{35:31}$
 永寿 早上 $tsau^{52:44} \cdot \text{ʃaŋ}$
 长武 早晨 $tsau^{51} \text{ʃe}^{35:31}$
 南彬 早资 $tsau^{51} tʃi^{31}$
 北彬 早起 $tsau^{51:31} tʃi^{51:31}$
 早今 $tsau^{51} tʃi^{51:31}$
 旬邑 早起 $tsau^{51:31} tʃi^{51:31}$
 淳化 早起 $tsau^{52:21} tʃi^{52}$
 泾阳 早上 $tsau^{51:55} \cdot \text{ʃaŋ}$
 三原 早上 $tsau^{51} \cdot \text{ʃaŋ}$
 下午
 咸阳 后晌 $xʋu^{44} \text{ʃaŋ}^{52:31}$
 窑店 后晌 $xu^{44} \text{ʃaŋ}^{52:31}$
 兴平 晃里 $xuaŋ^{52} \cdot li$ | 晃儿 $xuaŋ^{52} \cdot \text{ər}$
 武功 晃 $xuaŋ^{42}$ | 晃里 $xuaŋ^{42} \cdot li$
 礼泉 洪晌 $xuŋ^{44} \text{ʃaŋ}^{53:31}$
 乾县 晃 $xuaŋ^{52}$ | 后晌 $xu^{44} \text{ʃaŋ}^{52:31}$
 晃晌 $xuaŋ^{52} \text{ʃaŋ}^{52:31}$ 南院乡
 永寿 晃儿 $xuar^{44}$
 长武 后晌 $xəu^{55} \text{ʃaŋ}^{51:31}$
 南彬 后晌 $xəu^{55} \text{ʃaŋ}^{51:31}$
 旬邑 后晌 $xəu^{44} \text{ʃaŋ}^{51:31}$
 淳化 后晌 $xʋu^{44} \cdot \text{ʃaŋ}$
 泾阳 后晌 $xu^{55} \text{ʃaŋ}^{51:31}$
 三原 后晌 $xʋu^{55} \text{ʃaŋ}^{52:31}$
 傍晚
 咸阳 才黑 $ts'æ^{24} xei^{31}$
 麻黑儿 $ma^{24} \cdot xər$
 窑店 擦儿黑 $ts'ar^{24} xei^{31}$
 麻擦儿黑 $ma^{24} ts'ar^{24} xei^{31}$
 兴平 擦黑 $ts'a^{31:35} xei^{31}$
 武功 才黑 $ts'æ^{35} xei^{31}$
 礼泉 傍晚 $p'arŋ^{35} vā^{53}$ | 才黑 $ts'æ^{35} xei^{31}$
 乾县 才黑 $ts'æ^{35} xei^{31}$
 永寿 爷压山 $ie^{44} ŋja^{31:35} sã^{31}$
 黑得咧 $xei^{31} tei^{31} \cdot lie$
 太阳跌窝儿 $t'æ^{44} iaŋ^{35:31} tie^{31:35} uvr^{52}$
 长武 麻下啦 $ma^{35:31} xa^{55:51} \cdot lia$
 南彬 才黑 $ts'æ^{35} xei^{31}$
 旬邑 才黑 $ts'æ^{35} xei^{31}$
 淳化 麻子眼 $ma^{24} \cdot tsɿ niã^{52:21}$
 泾阳 擦黑 $ts'a^{31:35} xei^{31}$
 三原 麻擦黑儿 $ma^{35} ts'a^{31:35} \cdot xər$
 今天(个别点“今”字音特殊)
 咸阳 今儿 $tʃiēr$
 兴平 今儿 $tʃiēr^{31}$
 武功 今儿 $tʃiēr^{31}$
 礼泉 今儿 $tʃiēr^{31} \cdot \text{ər}$
 乾县 今儿 $tʃiēr^{31} \cdot \text{ər}$
 永寿 今儿 $tʃiēr^{31}$ | 今 $tʃiēr^{31}$
 长武 今儿 $tʃiēr^{31} \cdot \text{ər}$
 南彬 今 $tʃiēr^{31}$
 北彬 今儿 $tʃiēr^{31} \cdot \text{ər}$
 旬邑 今儿 $tʃiēr^{31} \cdot \text{ər}$
 淳化 今儿 $tʃiēr$
 泾阳 今儿 $tʃiēr^{31} \cdot \text{ər}$
 今个 $tʃiēr^{31} \cdot ky$
 三原 今儿 $tʃiēr^{31} \cdot \text{ər}$
 如今,现在
 咸阳 任忽 $zərŋ^{24} xu^{31}$
 兴平 任儿 $zərŋ^{35} \cdot \text{ər}$
 武功 任个 $zərŋ^{35} \cdot ky$
 礼泉 任忽 $zərŋ^{35} xu^{31}$

乾县	这码嘴	tʂɿ ⁴⁴ ma ³¹ tsa ³¹	北彬	门前	mē ³⁵ ts'ia ³⁵
永寿	任今	z ₂ ē ³⁵ xuei ^{44:52}	旬邑	门上	mē ^{35:31} ʂaŋ ^{02:51}
	任格	z ₂ ē ³⁵ kei ⁵²	淳化	门上	mei ²⁴ · ʂaŋ
长武	如今	zɿ ³⁵ tɕiē ³¹	泾阳	门上	mē ^{35:31} ʂaŋ ^{02:51}
南彬	任庚	z ₂ əŋ ^{35:31} kəŋ ^{31:51}		门口	mē ^{35:31} k'yu ⁵¹
北彬	任格	z ₂ ē ⁵⁵ kəi ³¹	三原	门儿	mā ³⁵ · ə
旬邑	任格	z ₂ ē ³⁵ kei ³¹ 营		涝池	(个别点“池”字音特殊)
		ir ³⁵ 底庙乡	咸阳	涝池	lau ⁴⁴ ts'ɿ ^{24:31}
淳化	如今	zɿ ²⁴ tɕiē ²¹ 任格	窑店	涝池	lau ⁴⁴ ts'ɿ ³¹
		z ₂ ē ²⁴ kei ²¹	兴平	涝池	lau ⁵⁵ ts'ɿ ^{35:31}
泾阳	这格	tʂɿ ⁵⁵ kei ³¹	武功	涝池	lau ⁴⁴ ts'ɿ ³¹
	这阵	tʂei ⁵¹ tʂē ^{55:51}	礼泉	涝池	lau ⁴⁴ ts'ɿ ^{35:31}
三原	这阵	tʂɿ ⁵² tʂē ^{55:31}	乾县	涝池	lau ⁴⁴ ts'ɿ ³¹
	门前			水壳涝	sɿei ⁵² k'u ³¹ lau ^{44:31}
咸阳	门儿	mē ²⁴	永寿	涝池	lau ⁴⁴ ts'ɿ ³¹
窑店	门上	mā ²⁴	长武	涝池	lau ^{55:35} ts'ɿ ^{35:31}
兴平	忙上	maŋ ³⁵ · ʂaŋ	南彬	涝池	lau ⁵⁵ ts'ɿ ^{35:31}
武功	忙上	maŋ ³⁵ · ʂaŋ 门	旬邑	涝池	lau ⁴⁴ ts'ɿ ^{35:31}
		mā ³⁵	淳化	涝池	lau ⁴⁴ · ts'ɿ
礼泉	门上	mē ^{35:31} ʂaŋ ^{02:53}	泾阳	涝池	lau ⁵⁵ ts'ɿ ^{35:31}
乾县	门头里	mē ³⁵ t'yu ³⁵ · li	三原	涝池	lau ⁵⁵ ts'ɿ ^{35:31}
	门上	mā ³⁵ · ʂaŋ			
		阳洪乡			
永寿	麻儿	ma ³⁵ · ə			
长武	门前头	mē ³⁵ ts'ia ³⁵ · t'əu			
南彬	门上	mē ^{35:31} ʂaŋ ^{02:51}			

第三章 语 法

第一节 常用虚词及句式

一、“些”

咸阳、兴平等地读作[·ɕie]，三原、泾阳等地读作[·sie]，乾县、永寿等地读

作[·cia],旬邑等地读作[·sia],系表恳求的语气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呀”,用于句末。例句如:你过来~!|叫他来~!|你俩不要争(不要说话;不要争执)了~!|回走(回去)~!

二、“吗”[·ma]

嵌在“V不V”等句式中间,表示“究竟”的意味:来~不来?|去~不去?|吃~不吃?|寻~不寻?|垫~不垫?|对~不对?|好~不好?

三、“了”

字在咸阳市方言中表示时态或语气时的用法和读音。举例如下:

	吃了饭再走。	他做啥来了?	他去了没去?
咸阳	·lie/·liau	·lie	·lie
三原	·liau	·la	·la
旬邑	吃了[·lau]饭了[·la]。	·la	·lau
长武	·liau	·liau	·liau
永寿	你吃了[·lie]饭了[·lie]没有?	·lie	·lie
	(你把饭)吃了?	好了就对了。	
咸阳	·liau	·lie	·lie
三原	·liau	·liau	·la
旬邑	·la	·lau	·la
长武	·liau	·liau	·lia
永寿	·liau	·lie	·lie

四、“哩”[·li]

市区、兴平、礼泉等南部地区不用此词,旬邑、彬县等地既相当于普通话的结构助词“的(地、得)”,又相当于普通话的句末语气助词“呢”。举例句如下:

谁~书?|国家~钱,人民~血汗|老老实实~做人|安安宁宁~过日子|好~很|他工作认真~很|你做啥~?|我看书~。

永寿方言对“哩”字的用法介乎彬、旬和市区等地之间,即结构助词“哩/(地、得)”,语气助词“哩/呢”分别通用。例如:谁~书/谁的书?|你做啥~/你做啥呢?

三原方言只用“哩”字,与“呢”字义同:你做啥~?|我吃饭~。

五、“来”[læ³¹]

相当于普通话的“来着”。例如：

你做啥(去)~? |我跟集(赶集)(去)~。|跟会弄啥~? |跟会逮猪娃(买小猪)~。

六、反复问句的特点

“V不V”式疑问句的特点是，一般可省去反复问句中“不”字后的中心词。比较如下，主要列举有代表性的县(点)。

	在家不在?	去不去?	该来不该来?	吃不吃?	好不好?
咸阳	在屋吗不在?	去吗不去?	该来吗不该来?	吃吗不吃?	好吗不好?
	在不(在)?	去不(去)?	该来不?	吃不吃?	好着没?
三原	在(屋)不?	去不?	该来不?	吃不?	好不?
彬县	在(屋)不?	去不?	该来不?	吃呀不吃?	好不?
永寿	在(呀)不?	去(呀)不?	该来(呀)不?	吃(呀)不?	好不(好)?
武功	到呢么?	去·nia不?	该来·nia不?	吃·nia不?	好·nia不?

七、“V一下”式在咸阳市方言中的特点

比较如下：

	尝一下/尝(一)尝。	看一下/看(一)看
咸阳	尝[saŋ ²⁴]下[ka ³¹]。	看下子/看·tsər。
武功	尝 kər ²⁴ 。	看 kər ²⁴ 。
礼泉	尝葛[kv ³¹]子。	看葛子。
永寿	尝下[ka ³¹]子。	看下子。
	说一下/说(一)说。	拾掇一下/拾掇拾掇。
咸阳	说下子/说·tsər。	拾掇下子/拾掇·tsər。
武功	说 kər ²⁴ 。	拾掇 kər ²⁴ 。
礼泉	说葛子。	拾掇葛子。
永寿	说下子。	拾掇下子。

八、对话环境中，“不”字的两种用法

1. 在表否定的回答语中，“不”字往往被镶嵌于谓语的“中心词”中，例如问

“你知得道？（你知道不知道？）”答：“我知不道。”问：“你认得得？（你认识不认识？）”答：“我认不得。”

2. 旬邑、三原、彬县等地在回答问题时，把“不去”“不来”“不吃”等“不V”式的否定式回答均回答为“不有”。用“不”修饰动词“有”，这在普通话的词语搭配中是没有的。

第二节 语法例句

你知道不知道？

咸阳 你知得道？ η_i^{52} $t\zeta l^{31}$ tei^{31} tau^{44} ?

武功 你知得道噢？ η_i^{42} $t\zeta l^{31}$ tei^{31} tau^{44} ·au?

永寿 你知哩道知不道？ η_i^{52} $t\zeta l^{31}$ ·li tau^{31} pu^{31} tau^{44} ?

你认识不认识？

咸阳 你认得得？ η_i^{52} $z_6\bar{e}^{44}$ tei^{31} tei^{24} ?

永寿 你认的得？ η_i^{52} $z_6\bar{e}$ ·ti tei^{35} ?

去不去？

咸阳 去吗不去？ $t\zeta i^{44}$ ·ma pu^{31} $t\zeta i^{44}$?

长武 去不去？ $t\zeta i^{55:35}$ pu^{31} $t\zeta i^{55}$ | 去价么？ $t\zeta i^{55:35}$ · $t\zeta ia$ ·mu?

三原 去不？ $t\zeta i^{55}$ pu^{31} ?

这是谁干的？

咸阳 这是谁弄下的？ $t\zeta v^{44}$ $s_1^{44:31}$ sei^{24} $n\alpha\eta^{44}$ $xa^{44:31}$ ·ti?

兴平 这是谁来？ $t\zeta v^{55}$ $s_1^{55:31}$ sei^{35} $l\ae^{31}$?

是我干的。

咸阳 是我来。 $s_1^{44:31}$ ηv^{52} $l\ae^{31}$ 。

兴平 是我来。 $s_1^{55:31}$ ηv^{52} $l\ae^{31}$ 。

能看见吗？看得见看不见？

咸阳 看得见？ $k'\bar{a}^{44}$ tei^{31} $t\zeta i\bar{a}^{44}$? | 看得着？ $k'\bar{a}^{44}$ tei^{31} $t\zeta v^{24}$?

兴平 看得来？ $k'\bar{a}^{55}$ tei^{31} $l\ae^{35}$? | 看得着？ $k'\bar{a}^{55}$ tei^{31} $t\zeta v^{35}$?

旬邑 看得来呀么？ $k'\bar{a}^{44}$ tei^{31} $l\ae^{35}$ ·ia·mɿ?

你是不是陕西人？

咸阳 你得是陕西人？ η_i^{52} tei^{31} s_1^{52} αi^{31} $z_6\bar{e}^{24}$?

长武 你得是陕西人啦么？ η_i^{51} $t\alpha i^{31}$ s_1^{55} $\zeta\bar{a}^{51}$ si^{31} $z_6\bar{e}^{35}$ ·lia·mu?

我不是。

我就是。

咸阳 我不是 ηv^{52} pu^{31} s_1^{44} 。

我就是的。 ηv^{52} $t\zeta v^{44}$ $s_1^{44:31}$ ·ti。

长武 我不是 ηv^{51} pu^{31} s_1^{55} 。

我就是的。 ηv^{51} $t\zeta i\alpha u^{55}$ $s_1^{55:31}$ ·ti。

你是陕西人，我也是陕西人。

咸阳 $\eta_i^{52} s_1^{44:31} \text{ʃã}^{52} \text{ɕi}^{31} z_1 \tilde{\epsilon}^{24}$ $\eta\gamma^{52} i\epsilon^{52} s_1^{44:31} \text{ʃã}^{52} \text{ɕi}^{31} z_1 \tilde{\epsilon}^{24}$ 。

旬邑 $\eta_i^{51} s_1^{55:31} \text{ʃã}^{51} s_1^{31} z_1 \tilde{\epsilon}^{35}$ $\eta\gamma^{51} a^{31} s_1^{55:31} \text{ʃã}^{51} s_1^{31} z_1 \tilde{\epsilon}^{35}$ 。

永寿 $\eta_i^{52} s_1^{44} \text{ʃã}^{52} \text{ɕi}^{31} z_1 \tilde{\epsilon}^{35}$ $\eta\gamma^{52} a^{52} s_1^{44:31} \text{ʃã}^{52} \text{ɕi}^{31} z_1 \tilde{\epsilon}^{24}$ 。

你在,我(要)走了。

咸阳 你在着,我走呀。 $\eta_i^{52} tsæ^{44} \cdot \text{tʃu\gamma} \eta\gamma^{52} ts\gamma u^{52} \cdot ia$ 。

兴平 你倒,我走价。 $\eta_i^{52} tau^{55} \eta\gamma^{52} ts\gamma u^{52} \cdot tɕia$ 。

南彬 你在着,我走价。 $\eta_i^{51} tsæ^{55:35} \cdot ts\gamma \text{ə} \eta\theta^{51} ts\gamma u^{51} \cdot tɕia$ 。

在不在?

在呢。

咸阳 在不在? $tsæ^{44} pu^{31} tsæ^{44}?$

在呢。 $tsæ^{44} \cdot \eta_i$ 。

兴平 到不到? $tau^{55} pu^{31} tau^{55}?$

到呢。 $tau^{55} \cdot \eta_i$ 。

南彬 在呢不? $ts'æ^{55} \cdot \eta_i pu^{31}?$

在哩。 $ts'æ^{55} \cdot li$ 。

那样干什么(你何必如此呢)?

咸阳 兀样弄啥? $u^{44} ia\eta^{44} n\epsilon\eta^{44} sa^{44}?$

武功 么喀弄啥呢? $m\gamma^{42} k'y^{31} n\epsilon\eta^{44} sa^{44} \cdot ni$

你怎么啦?

咸阳 你咋咧? $ni^{52} tsa^{52} \cdot lie?$

旬邑 你咋? $ni^{51} tsu\gamma^{51}?$

你去的时候把我叫一下。

咸阳 你去得咧把我叫下子。 $\eta_i^{52} tɕi^{44} tei^{31} \cdot lie pa^{31} \eta\gamma^{52} tɕiau^{44} ka^{31} \cdot ts_1$ 。

三原 你去得唠把我叫下子。 $ni^{52} tɕi^{55} tei^{31} \cdot lau pa^{31} \eta\gamma^{52} tɕiau^{55} ka^{31} \cdot ts_1$ 。

我们村里死了一个人。

咸阳 我村里把一个人死咧。 $\eta\gamma^{31:24} ts'u\tilde{\epsilon}^{31:24} ts'u^{31} \cdot li pa^{31} i^{31} k\gamma^{31} z_1 \tilde{\epsilon}^{24} s_1^{52:31} \cdot lie$ 。

旬邑 我村里把夷人死啦。 $\eta\gamma^{31:35} ts'u\tilde{\epsilon}^{31} \cdot li pa^{31} i\epsilon^{31} z_1 \tilde{\epsilon}^{35} s_1^{51:31} \cdot la$ 。

旬邑 我村里把块人死啦。 $\eta\gamma^{31:35} ts'u\tilde{\epsilon}^{31} \cdot li pa^{31} u\epsilon^{31} z_1 \tilde{\epsilon}^{35} s_1^{51:31} \cdot la$ 。

我们家丢了一只老母鸡。

咸阳 我屋把个老母鸡没咧。 $\eta\gamma^{31:24} u^{31} pa^{31} k\gamma^{31} lau^{52:31} mu^{52} tɕi^{31} m\gamma^{31} \cdot lie$

永寿 我屋里把个老母鸡失机咧。 $\eta\gamma^{31:35} u^{31:52} pa^{31} k\gamma^{31} lau^{52} mu^{52} tɕi^{31} \text{ʃl}^{31} tɕi^{31} \cdot lie$ 。

(有人敲门)谁?

(有意)摔破了。

(无意)摔破了。

咸阳 谁? $sei^{24}?$

摔咧。 $s\gamma ei^{31} \cdot lie$ 。

打咧。 $ta^{52:31} \cdot lie$ 。

旬邑 谁块? $sei^{35} u\epsilon^{31}?$

摔啦。 $s\gamma ei^{31} \cdot la$ 。

打啦。 $ta^{51:31} \cdot lia$ 。

这个比不上那个。

咸阳 这个磕不住伟个。 $tʃei^{52} k\gamma^{31} pu^{31} ts\gamma^{44} uei^{52} k\gamma^{31}$ 。

兴平 这个着不住咧儿。 $tʃei^{52} k\gamma^{31} tʃau^{31} pu^{31} ts\gamma^{55} u\epsilon^{52}$ 。

礼泉 这个吃不住兀个。 $tʃl^{44} k\gamma^{31} tʃl^{31} pu^{31} ts\gamma^{44} u^{31} k\gamma^{53}$ 。

礼泉 这个不胜兀个。 $tʃl^{44} k\gamma^{31} pu^{31} ʃ\epsilon\eta^{44} u^{31} k\gamma^{53}$ 。

卷 末 语

《咸阳市志》文化卷经初审、终审后，于2000年7月底完成总纂修改任务。除将初稿120万字压删、调整至约90万字外，还将部分记述内容下延至90年代中叶，个别编章如地方志章等，更下延至落笔之前。

本卷在编写、组稿过程中，得到了中共咸阳市委、市人民政府及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各有关部门、县区（市）志办的多方协助。市教育局张存及张沛、王玉民等同志提供了教育志资料，市科委沈毛平及王全举、郭根英等同志提供了科技志资料，市文化局王均贵、高宗祥提供了文化志资料，张胜利、程晓峰提供了新闻出版志资料，市卫生局魏志发、焦振芳提供了卫生志资料，市体委及刘耀武等同志提供了体育志资料，市档案局陈世魁、姜勤发提供了档案志资料，市民政局马志信、王小林及张鸿杰提供了民族宗教志资料。市教育局张沛撰写了文物编和概述，市地方志办公室张世民撰写了民俗编，户县教师进修学校孙立新撰写了方言编，市地方志办公室张鸿杰撰写了地方志章。部分县区、部门及高彦民、刘岩、傅晓东、李军朝、胡宝成、逯茂怀等同志提供了照片资料。在志稿评审出版过程中，市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及市志编委会作了初审，省地方志办公室作了终审，三秦出版社贾云担任责任编辑。此外，还邀请陕师大郭子直教授、西北大学杨春霖教授审阅了方言志稿，陈惠云副编审审阅了全部志稿，赵彩萍副编审校正了版式。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谢忱！

咸阳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2000年8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咸阳市志/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0.9

(陕西地方志丛书)

ISBN 7-80628-439-7

I. 咸… II. 咸… III. 地方志—陕西—咸阳市

IV. K29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6766 号

陕西地方志丛书

咸阳市志

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

电 话 (029) 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音乐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57

插 页 26

字 数 927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439-7/k·170

定 价 400.00 元 (二、三、四、五卷)

X I A N Y A N G S H I Z H I

责任编辑 / 冯慧福 贾云

封面设计 / 毋培华



ISBN 7-80628-439-7



9 787806 284391 >

定价: 400.00 元